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 意识形态归来

上

[瑞典] 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加] 莫斯可 (Vincent Mosco) 主编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校



# Marx is Back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当今之世界，毫无疑问，马克思是所有伟人中被曲解或误读最多的一位。这种曲解似乎不仅是“现在进行时”，还将是“未来进行时”，只要“资本”还支配着这个世界。

在今日之中国，谈论马克思归来，是一种修辞还是社会语境？是一种想象还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及其转向）？谈论马克思的归来对今天的青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今天的学术青年又如何重新激发出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其本自具有的逻辑说服力与情感感召力？尤其关键的是，我们怎样在某种可能的历史转向中真正寻找和把握一个边缘性的思考位置？

《马克思归来》由一批西方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重新思考和诠释马克思的学说，并将马克思主义概念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强有力地应答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媒介与传播领域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和挑战。

《马克思归来》提醒我们：马克思从未离开我们，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他。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始终应该成为我们手中的“思想武器”之一，而不是一种装饰或修辞。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 批判思维归来

下

[瑞典] 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加] 莫斯可 (Vincent Mosco) 主编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校

# Marx is Back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当今之世界，毫无疑问，马克思是所有伟人中被曲解或误读最多的一位。这种曲解似乎不仅是“现在进行时”，还将是“未来进行时”，只要“资本”还支配着这个世界。

在今日之中国，谈论马克思归来，是一种修辞还是社会语境？是一种想象还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及其转向）？谈论马克思的归来对今天的青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今天的学术青年又如何重新激发出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其本自具有的逻辑说服力与情感感召力？尤其关键的是，我们怎样在某种可能的历史转向中真正寻找和把握一个边缘性的思考位置？

《马克思归来》由一批西方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重新思考和诠释马克思的学说，并将马克思主义概念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强有力地应答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媒介与传播领域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和挑战。

《马克思归来》提醒我们：马克思从未离开我们，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他。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始终应该成为我们手中的“思想武器”之一，而不是一种装饰或修辞。

上架建议：传媒、新闻

ISBN 978-7-5675-4013-2



9 787567 540132 >

定价：138.00元（全二册）

www.ccnupress.com.cn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 马克思归来<sup>①</sup>

[瑞典] 福克斯、[加] 莫斯可 主编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校

# Marx is Back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 马克思归来<sup>①</sup>

[瑞典] 福克斯、[加] 莫斯可 主编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校

# Marx is Back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归来/(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主编;“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675-4013-2

I. ①马… II. ①福… ②莫… ③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传播学—  
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G20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1643 号



### Marx is Back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Copyright ©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719 号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 马克思归来

编者 (瑞典)福克斯 (加)莫斯可

译校者 “传播驿站”工作坊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60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4013-2/A·005

定价 138.00 元(全二册)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归来/(瑞典)福克斯,(加)莫斯科主编;“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675-4013-2

I. ①马… II. ①福… ②莫… ③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传播学—  
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G20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1643 号



### Marx is Back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Copyright ©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ristian Fuchs and Vincent Mos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719 号

###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 马克思归来

编者 (瑞典)福克斯 (加)莫斯科

译校者 “传播驿站”工作坊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60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4013-2/A·005

定价 138.00 元(全二册)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发展的转折点，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危机不断加深。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全世界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都面临挑战。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想象与信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亡，反而在这些新的问题与危机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生机。马克思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正以不同的方式复活。

与此相联系，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体系与制度，一方面作为技术基础和经济部门，一方面作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民主社会的基础，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而转型中的巨大困惑和危机也越来越多地激发人们的思考。一系列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做出清理与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理论资源的批判传播研究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朝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并为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与方法，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批判理论的新路，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

由于中国问题和传播问题是讨论全球化危机与出路的两个重要领域，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自己历史责任的义务和条件。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球视野中整理、理解与反思这一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这一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发展，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个全球视野不仅面对西方，同时更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开放，并希冀在不同的比较维度与视野中，

重新确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近一个世纪前,在1929—1930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后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屠杀共产党人、扼杀左派思想的腥风血雨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用大写的“批判”一词代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此后,“批判”一词,因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内核,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以追求人类解放和挑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学术取向的代名词。今天,我们不愿也无需遮掩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把本书系定名为“批判传播学”,除了出于文字的简洁性考虑之外,更是为了突出我们的批判立场,强调我们弘扬以挑战不平等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传播学术的主旨。当然,批判的前提与归宿是建设,批判学术本身即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建设性理论实践。在此,我们对传播的定义较为宽泛,包括任何涉及符号使用的人类意义分享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所依托的传播技术和知识基础。

本书系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道路,重新检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前提的观念、范畴与知识谱系,反思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在历史和当代语境下中国化的成就与问题,探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传播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挑战,分析当下的经济危机与全球媒体、信息与文化产业的状况和相关法规、政策,以及全球、区域与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我们尤其关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播定位和文化自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社会现状,社会正义与批判的生态学视野下的信息技术与社会发展,文化传播、信息产业与阶级、种族、民族、性别以及城乡分野的互构关系,阶级意识、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和国内维度,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动态历史关系、文化传播权利与全球正义等议题。我们还将挑战横亘于“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以及“批判传播”与“应用传播”间的简单二元对立,不但从批判的角度检视与质询那些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社会关系的传播观念与实践,而且致力于促进与发展那些挑战和变革现有不平等社会传播关系的传播政策、观念与实践,并进而开拓批判视野下的组织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应用传播领域的研究。最后,我们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法论发展与经验研究的批判性运用,探讨文化研究如何在当下传播情境中更新其批判活力,关注媒介教育、文化赋权和社区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大众传媒与网络时代的大学、学术与跨国知识流通如何强化或挑战统治性知识权力关

系等问题。

本书系包括“批判传播学译丛”、“批判传播学文论”和“批判传播实践”三个系列。“译丛”系列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文论”系列以专著、讲义、论文集、工作坊报告等形式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实践”系列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卓有成就的中外传播实践者有关自己的传播劳动和传播对象的反思性与传记性著作、以及富有批判性的优秀新闻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 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和 2013 年 7 月成立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是这套书系依托的两家专业机构，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支持。宗旨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和跨文化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推动中国传播学术的创新和批判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尤其是新一代批判传播学人的成长。

在西方，面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马克思回来了”已然成了当下批判传播学界的新发现、新课题和新动力。在中国，在这片马克思主义自 20 世纪初就被一代思想家和革命家所反复思考、探索与实践的古老土地上，我们愿以这套书系为平台，为发展既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学术主体性的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对过去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做出深刻反思，需要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与实践前沿建立有机的联系，需要在克服媒介中心主义的努力中与国内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良性互动，更需要与各种不同的传播研究学派、观点进行真诚对话，彼此砥砺，以共同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以平等与民主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发展，促进以和平与公正为诉求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是所望焉。

#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

——关于《马克思归来》的翻译

赵月枝

本书的翻译出版是一个宏大的工程。虽然每章分别有译者和校对者的署名,但是,本书的“总译者”是“传播驿站”。在我眼里,这是一个比所有署名译者和校对者简单相加更博大的学术共同体,一个通过批判地引介国外“批判传播学”文献来培养中国传播学术自主性理想的承载者,也是一株充满成长的喜悦、痛苦和烦恼的学术新苗。

由于早年留学,我本人很少阅读翻译成中文的传播学术著作,但是,在与国内传播学界的交往中,我逐渐认识到准确翻译的重要性和翻译中的学问。正是这一不断强化的认知,孕育了“传播驿站”的最初胚芽。那是2005年,我第一次应邀在复旦大学“中外传播理论和方法论暑期班”讲学。整整3天,共讲了18个小时,累得我几乎没力气开口。这时当年有位正在翻译一本美国传播学专著的年轻学者,拉着我问一些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包括 good 一词的在某一句子中的译法。我并没有受过翻译的训练,但看了前后文,觉得不应是翻成英语初学者都知道的“好”,而应该是“良”,犹如 good governance 翻成“良治”。这位学者大喜。虽然自己当时真的很累,但看着她那激动的样子,我为自己对别人“有用”而感到满足。这不是因为自己有多高明,而是我从中悟出,一个人在翻译中寻找汉语表达时,需要一双新鲜的眼睛来重新看待那些看起来简单但怎么翻译也不妥贴的字眼。

2006年,还是在复旦大学暑期班讲学期间,我第一次体验到,错翻一个词是多么倒胃口。这年,我在讲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经典文本《“意识形态”的重新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一文,当我发现在

国内某文化研究刊物上已有译文时,喜出望外,这下可以更方便学员们阅读了。可是,当我阅读这篇中译文时,这篇我曾熟读于心的文章却变得非常陌生,甚至十分难懂。当我读到译文中的“贸易联合会”,而我的英文文献记忆中却没有任何霍尔讨论什么“贸易联合会”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译者望文生义,居然把英文中常见的固定名词 trade union,也即代表劳工的组织“工会”翻成了一般是代表商人、资本家的“贸易联合会”了!我进而小题大做地胡思乱想起来:在英语语境里,文化研究最初可是关注工人阶级的学问啊,何以这个简单的涉及劳工的词汇经过学术翻译,到中国就成了有关商人的词汇呢,这是偶然的文字错误,还是整个工人阶级被遗忘的后改革时代中国文化研究及其阶级立场的知识症候?是有人把这个词刻意过滤掉的结果,抑或是学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知识结构、语言选择或不够认真导致的?在我眼里,此词的错译几乎是对文化研究和霍尔的极大讽刺和颠覆。我对学术翻译的重要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2008年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范式恢复了可预期生机。在西方传播学术界,面对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危机,许多批判传播学者发现,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通过重读原著来用新的批判武器武装自己,在批判学术道路上重新出发。在此语境下,有了这本致力于信息时代的批判传播研究的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的特刊——《马克思归来》。我也曾受邀参与为该特刊写文章,但一来忙,二来自己当时指导的一名优秀博士生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正在潜心阅读马克思,并有理论创新,且有意参与这个项目,所以自己不参与也就释然了。不过,我当时推测,中国批判传播学术的青黄不接和冷战意识形态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的长期影响将意味着,在中国这个虽然有一批学者因通晓马克思著作和研究马恩列斯新闻传播思想而获博士学位的国度,却可能不会有任何人是这本特刊的作者。

这更加催生了我组织翻译这本特刊的热情,我希望通过集体翻译活动,从一个字、一个词、一篇文章的翻译开始,通过相互协作和翻译工作坊的形式,训练年轻华人学者群体的批判学术意识和对英文文献的分析能力。当时,我正好在筹划成立中国传媒大学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以就把这项工作当作这个研究所最主要的奠基工作。这个想法得到了我的两位学者朋友的鼎力支持:一位是本丛书的主编之一吕新雨教授,一位是在华人传播学界译作颇丰、有非常丰富的学术翻译经验的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

我们一致认为,把这辑特刊当作书系中“译丛”系列的一种,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方面,中国传播学界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需要知道国外学者是如何重新开始的;另一方面,由于这本特刊的作者并不都是名家,而是有像我的博士生那样初出茅庐的西方作者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这就有利于打破国内学者对国外文献的“经典”性和权威性的既有假定,而以更平等和更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文献。

于是,“传播驿站”应运而生。当时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即将毕业的博士生龚伟亮以很大的热情投入了初期的工作。我们在“招兵买马”的“启事”中写道,这是一个主要由处在学术起步阶段的博/硕士生和年轻学者组成的翻译团体,旨在批判性引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以及训练青年学人在对原著的译介和批评过程中获得学术思考的视野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厉兵秣马,从而进一步“获得学术萌芽的养料与思想入门的钥匙。”“启事”还充满期望地认为,“传播学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批判传播学的价值支持与重新定向,同时也亟需一批有历史视野、中国立场,同时又有国际眼界的知识青年的薪火相传”。因此,这个从翻译工作入门、围绕一个“译”字的“传播译站”,“愿意成为为年轻学生(学者)提供批判视野的给养、助力他(她)在学术征途中策马扬鞭的学术‘驿站’”。“启事”最后写道,这个学术新生事物“将以蓬勃的朝气和反思的锐气、主体的自觉与智识的品格,以及严谨的学风和友爱的精神树立批判传播学术译介的旗帜与品牌,推动有学术志向的青年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促进批判传播学的发声与发展,以具有扎实独立研究能力的青年学者后备军的培养为基础,为中国批判传播学学术影响力与团队学术声势的壮大以及整个传播学学科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是在这个有高远立意的最初“启事”的涵义上,我们把这本书译者的署名位置给予了“传播驿站”。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个“驿站”的协调机构和活动平台依托我们几位所在的院校,采取统一协调(共同遵守一致的时间统筹与技术规范)、分头运作的工作方式,以我们周边“有志于传播学术研究的年轻学子力量为中坚,辐射和带动京沪等地其他高校以及海内外的年轻学生(学者)共同推动批判传播学著作的引介与批评”。我们希望,这一方面可为本书系中的“译丛”系列提供优质稿源,另一方面也为本书系中的“文论”系列以及为以新锐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学术工作坊(类似2012年成功举办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工作坊”)培养和输送梯队人才。

“传播驿站”以引介国外大型有影响或有里程碑意义的批判传播学文献

为己任。按照“传、帮、带”的学术承传理念,我们组织有志于批判学术的年轻博士生做翻译者主体,让博士后和青年教师做译校,以单篇文章为单位组织团队进行工作。翻译阶段的工作流程包括组队、选译、试译、初稿、一校、二校等步骤,每篇文章的译校以不同层次学者互助合作的方式协作完成。完成初步译校后,我们组织工作坊,让译者和校对者就翻译中的难点和问题交流意见,寻找解决方法;与此同时,让参与者对所负责的文章结合中国的学术语境进行批判分析,以求共同提高,并在此过程中对国外文献进行甄别和“去魅”,培养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总之,工作坊既是一次译介成果展示,又是一次可以提升翻译水准的集体校阅,更是促进思想的批判性吸收的头脑风暴。

《马克思归来》成了我们“初试牛刀”的实验。项目参与者很多,大家热情也很高。2013年盛夏,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为期两天的“《马克思归来》翻译工作坊”上,海内外年轻华人学子,包括冯建三教授团队中来自英国等地的年轻学者,围绕一篇篇文章的认真讨论场面令人激动,我至今记忆犹新。正是在这个工作坊上,我看到了华语批判传播研究的勃勃生机和未来希望。

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学术工作是辛苦的、繁琐的;翻译工作很难,同时又被认为是“低端”的,甚至是学术“绩效”上不算数的。随着项目进入“深水区”,有人中途而弃了,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而且影响到了这个刚呱呱坠地的学术共同体的健康成长。然而,也许正是有了“驿站”这个理念所内涵的精神,个别人的“掉链子”并没有拖垮整个集体的集体意志,大家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一步一步把工作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积累经验,之后才会少走弯路,做得更好。

我感谢所有参与过本书翻译工作的年轻学者——包括一些参与过这个项目不同阶段和不同性质的工作,但最后并不在译者或校对者署名中出现的学生和学者,包括冯建三教授和邱林川教授。无疑,这本书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大家精诚协作、团结友爱的结晶。

这里,我有必要提及一些特殊的个体。首先,我要由衷感谢吴畅畅,他不仅一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入这个项目的上海团队组织工作,而且在这个项目推进最困难的时候,不但默默承担了全部的组织工作,还负责了多篇文章的校对,以及组织了整部书最后的统筹和校对。在“传播驿站”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吴畅畅无疑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其次,我要感谢

张志华,为了推进项目进度,无论翻译、校译还是其他相关的组织工作,他都不计分内分外地全力以赴踏实工作,甚至不惜推迟了对自己非常重要的博士论文的进度。另外,姬德强、高明等也自始至终积极参与本项目的工作,为校对稿子花费了不少心思。特别是项目收尾的关键时刻,张韵、沙垚、范松楠、朱清河、张晓星和陈思博等人对“传播驿站”工作无条件接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我还要特别感谢王满满的认真、大度和宽容——她花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准备了近两万字的工作坊笔记,这些笔记最终以综述的方式在此书以附文的方式出版,读者因此可以管窥工作坊的一斑。

最后,我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和彭文曼编辑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以及他们的耐心。殷鹏博士为本书的最后统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特此致谢。翻译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作为本书的轮值主编,我愿对本书翻译中的不完善之处负责,欢迎读者帮助纠错和批评。

本书是“传播驿站”这个集体译者的第一部习作。在漫长的3年工作过程中,我们这支团队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我们经历了成长的痛苦,甚至挣扎和失望。但是,我们汲取教训,改进方法,整合团队,重新上阵。2014年盛夏,我们以新的姿态和新的阵容,在复旦大学围绕《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的译介,成功举办了第二期翻译工作坊。我们请来该书的两位编者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在工作坊上与参与者交流,深入讨论本书的背景、编辑理念和主题思想。我们不但在工作坊上热烈讨论了书中的观点立场与中国现实的关系,还请每篇文章的译者或校者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写出作为文章导读的重要内容。本书的注释保持了单篇的统一。

作为“驿站”概念在中外学术交流和批判传播学者代际承传与超越意义上的演绎,在2014年的工作坊上,我们还请来了我的加拿大博士生、《马克思归来》的作者之一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分享他在博士论文中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史上知名的“盲点争论”的最新颠覆性挑战观点。普雷这位学术新秀与当年这一争论的关键人物之一格雷厄姆·默多克教授在复旦大学面对面讨论,使一看来是初学者“练兵场”的翻译工作坊成了国际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术的最前沿阵地。现在,普雷的博士论文尚未答辩,就凭着自己的理论创新和优异学术成果成了荷兰知名的格罗宁根大学助理教授了。在与我道别的午餐上,他还念念不忘他的中国之行在他学术成长道路上的重要



意义。

在《马克思归来》付梓之际,《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的译校工作已近尾声,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播驿站”还会有第三部、第四部译作问世。“驿站”本身就意味着永远再出发。实际上,在国内的一些学术场合,当我听到有人自我介绍说听过我在复旦暑期班的演讲,还有人自我介绍参与过“传播驿站”的工作,当我碰到年轻学者问我是否还继续翻译工作坊时,我知道,“传播驿站”这朵批判传播学中的“奇葩”,已经发挥了她的作用。她不是当下流行语中作为耻笑对象的“奇葩”,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让人惊艳的花朵。在当下充满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浮躁情绪的学术圈里,以她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的性格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在学术百花园中扎根,有一席之地。诚邀本书的所有读者一起培植她,使她结出更多、更丰硕的好果实。

谨此,是为序。

# 目 录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 ..... (赵月枝) 1

导论:马克思归来 ..... 1

## 第一篇 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 ..... 27

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  
..... 65

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 ..... 92

反商品化 ..... 116

“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 ..... 149

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 ..... 168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 ..... 196

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 ..... 238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 ..... 283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 332

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 350

## 第二篇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阿根廷传媒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之后 ..... 389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位置及传播	
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 .....	418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	499
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 .....	535
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 .....	556
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	579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 .....	611
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 .....	642

### 第三篇 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工人调查表 2.0”:社交媒介语境下生产性使用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	665
技术的牧领权力: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 .....	698

### 第四篇 马克思,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 .....	717
21 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推进革命 .....	754
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 .....	787
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 .....	814
学术出版的封闭与异化:学术工作者的训诫 .....	830
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与替代性社交网站 Diaspora .....	870
马克思的记者生涯:重温言论自由的辩论 .....	905

#### 附录

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 .....	931
------------------------------------	-----

# 目 录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 .....	(赵月枝) 1
导论:马克思归来 .....	1

## 第一篇 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 .....	27
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 .....	65
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 .....	92
反商品化 .....	116
“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 .....	149
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 .....	168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 .....	196
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 .....	238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 .....	283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	332
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	350

## 第二篇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阿根廷传媒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之后 .....	389
------------------------------------	-----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位置及传播	
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 .....	418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	499
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 .....	535
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 .....	556
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	579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 .....	611
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 .....	642

### 第三篇 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工人调查表 2.0”:社交媒介语境下生产性使用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	665
技术的牧领权力: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 .....	698

### 第四篇 马克思,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 .....	717
21 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推进革命 .....	754
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 .....	787
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 .....	814
学术出版的封闭与异化:学术工作者的训诫 .....	830
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与替代性社交网站 Diaspora .....	870
马克思的记者生涯:重温言论自由的辩论 .....	905

#### 附录

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 .....	931
------------------------------------	-----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sup>①</sup>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sup>②</sup>

## 导论：马克思归来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与当代传播学批判研究

张韵(译),高明(校)

[导读]\* 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下,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归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内部,具体的概念和理论层面之外,“马克思回来了”之于从事传播学批判研究的学者们而言又意义何在? 本文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基础的批判研究方法重要性的强调,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回应。

作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方法,是将人类存在视为物质现实中的历史过程,并通过人类理性去生产关于人类存在的知识的途径。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运用辩证推理去批判地理解文化和意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之间的关键节点。而通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于

---

① 现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信息与媒介系担任媒介与传播学教授。Triple 杂志编辑,著有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2008),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2011),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即将出版)等著作。

② 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社会学名誉教授,曾任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首席研究员(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以及皇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近期著作包括: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with Catherine McKercher,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2009), 以及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edited with Ursula Huws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10)。

\* 本书中,凡“导读”均为译者撰写,凡“摘要”则属原文翻译而来。——编者注

“意识”问题的处理,将推动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同时,当我们满足于对“盲点之争”和“受众商品论”的局限认识之时,作者重新回归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理论资源,将人类活动置于理解社会过程的中心,从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未来的可能性进行探寻的做法,也颇具启发性。

正如本书此刻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仍依赖于西方理论译介。在西方传播学批判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间,研究者如果缺少对研究方法的自我意识,或许我们就应该警醒可能出现的“拿来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深入到理论和方法的内在逻辑之中,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与问题出发,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去探究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以第三世界的经验贡献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学批判研究,媒介批判研究,批判理论。

\* “马克思(Karl Marx)又再次流行了”,负责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德国柏林迪茨(Dietz)出版社负责人舒特朗夫(Jorn Schutrumpf)这样表示。自2005年以来,马克思著作的销量在以前低迷的水平上翻了三番,特别是在夏天出现了飙升。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上个月作出了一个恰当的评价:“马克思很早以前就观察到,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通过把现实、权力和能动者归于无生命来使自己神话化。”甚至连教皇也开始赞扬这位资深的无神论者具有“卓越的分析能力”(The Times, Financial crisis gives added capital to Marx's writings. October 20, 2008)。

\* 现在没有人会声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个老男孩值得颂扬。因为他注意到“这是经济,傻瓜!”,那些看上去上无所不知的、占领了经济制高点的伟大人物们当然不愚蠢,他们被剥削的贪婪驱动着,威胁着我们所有人。马克思的作品也不是圣经,尽管他的一些信徒努力把他塑造成这样(The Evening Standard, Was Marx Right All Along? March 30, 2009)。

\* 马克思回来了。至少德国的出版商们和书店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马克思的书正在飞离货架(The Guardian, Booklovers Turn to Karl Marx as Financial Crisis Bites in Germany. October 15, 2008)。

\* 如果想要理解接二连三的金融恐慌、抗议浪潮和困扰世界的其他问题,政策制订者们应该好好去研究已故多年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著作。他

们必须尽早认识到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百年一遇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装备起来去寻找出路(Bloomberg Business Week, Give Karl Marx a Chance to Save the World Economy. August 28, 2011)。

\* 2009年2月2日的时代(Time)杂志以马克思为封面,并且问道:关于现今的金融危机,“马克思会怎么想”?在封面故事里,马克思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他的思想也因而被肢解地面目全非:“我们需要反思马克思。若想寻求资本主义的解救之道,那就要去研究这个体系最伟大的批评者”(Time Magazine Europe, February 2<sup>nd</sup>, 2009)。

这些媒体评论无不表明,伴随着新一轮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我们似乎也进入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阶级冲突和危机的不断爆发,马克思的著作才会引起如此热烈的关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bourgeois)报刊企图通过将马克思诠释为资本主义新的救世主来限制和扼制他的理论。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资本主义分析者,同时也是在其所处的时代里对资本主义最强硬的批评者: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Marx and Engels 1848/2004, 94)

1977年,斯迈思(Smythe 1977)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文章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给予足够重视。35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使学者们不再关注社会阶级与资本主义,相反,人们热衷于谈论全球化(globalizatio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随着共产主义的衰落,甚至断言了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成为了

---

<sup>①</sup> “历史终结论”最早源于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讲座。1989年夏,他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刊发于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该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译者注



所有社会科学的盲点。马克思主义学者被边缘化,而采用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方法的青年学者们则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危及职业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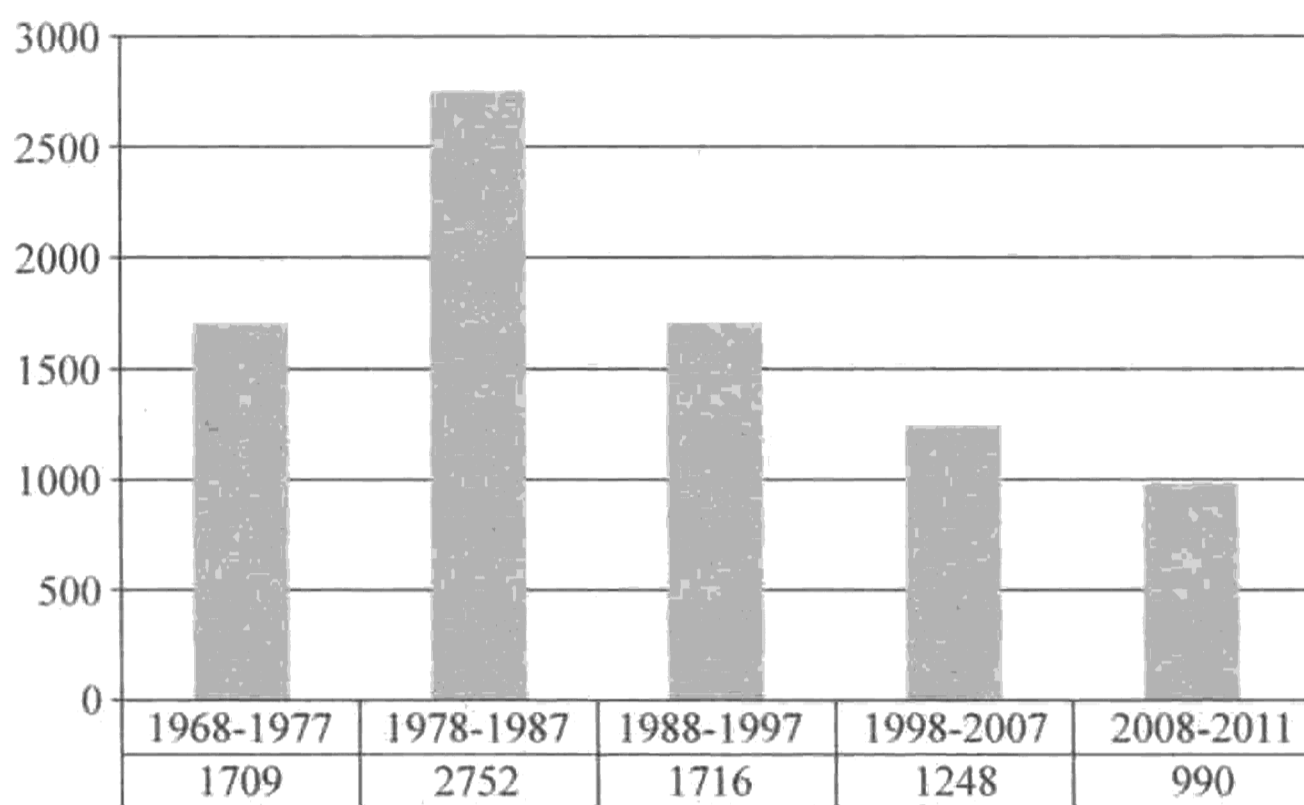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收录的关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图1展示了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里,标题中含有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数量,直观地展现了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趣的下降趋势。搜取的文章皆发表于以下五个时期:1968至1977年,1978至1987年,1988至1997年,1998至2007年,2008至2011年。这些时期的选择与划分,有助于判断自2008年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以来是否有新的变化产生,正如1968年社会大动荡<sup>①</sup>标志了学术的转向。

图1显示,1978至1987年关于马克思的学术产出相对较多,共有2752篇文章发表。鉴于文章发表的数量总是历史性地逐渐增多的,1968至1997年有关马克思的文章数量也显示了对其较高的学术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产出在1988至1997年和1998至2007年两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紧缩,分别只有1716篇和1248篇文章发表,鉴于前一个时期的增长,这一紧缩表现地尤为显著。而这一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强化的阶段,一切事物(包括许多国家的公共服务传播)都被商品化,社会科学领域则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强烈偏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

<sup>①</sup> 此处指1968年欧洲出现经济危机并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从巴黎“五月风暴”到布拉格、华沙、伦敦等地,激进抗议浪潮席卷全球,欧洲从东到西都陷入动荡。——译者注

2008至2011年期间,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年平均发表数为247.5篇,相对于1988至2007年的每年125篇和1988至1997年的每年172篇有所增加。这种状况可以作为一个经验性的指标,表明新资本主义危机的情境下社会科学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新的兴趣。问题在于这种兴趣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持续,并体现在制度变革中。

由于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劳动的普遍不稳定,和全球新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新自由主义不再被视为共识(common sense)。全世界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及其导致的不断升级的阶级冲突。尽管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从未有一个思想家如同马克思一样被曲解,对于马克思的作品的偏见往往都背离了他的思想的核心。<sup>①</sup>然而自二零零八年资本主义危机开始以来,情况发生了改观。一种对于马克思著作的浓厚学术兴趣正在扎根。齐泽克(Žižek 2010)也进一步指出,近期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研究的新兴趣。

共产主义(communism)不是存在于遥远未来的境况,它存在于对可替代选择(alternatives)的希冀中,体现在人们与资源、所有权、财富、知识、食物、住房、社会保障、自主决定、平等、参与、表达、健康、准入权(access)等各种贫困类型(poverty)的斗争之中。正是以多数人为代价换取少数人利益的全球分化体系造成了这些类型的贫困(system of global stratification)。因此,共产主义存在于人们抵制资本主义、争取自主空间的每一处。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Marx and Engels 1844, 57)。这是一场无产者的革命,它的发动者是那些没有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自然、自我、身体、意识、知识与科技的人们。共产主义需要空间来实现自己成为一种运动。这些空间不是指 Facebook, Youtube 或者 Twitter, 而是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 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 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 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Catalunya)和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 这些当代斗争所处的语境是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殖民化。一个新的世界的出现是必要的,但是能否创造出新世界仍不确定,只能取决于斗争的结果。

资本主义危机和由此产生的针对一切贫困的斗争正是本专题所立足的

---

<sup>①</sup> 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London, 2011.

语境。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致力于探讨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传播与知识的分析具有现实的相关性。

麦克切斯尼曾准确地指出,传播学者研究马克思的时候,“没有系统地研读马克思,没能在其对于传播的各种表述中厘清传播这一概念”(McChesney 2007,235f,fn 35)。他也指出,鉴于传播的重要性,他可以想象马克思对此有话要说。本书的任务就是力图弥补一直以来对马克思的传播与媒介理论系统研读工作的欠缺。

本书中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著作为本,涉及多样的主题,明确地反驳了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观点。他曾声称,对于文化和媒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几乎不能被拯救了,也不能被一般化了”。同样错误的还有他坚持认为“生产理论(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矛盾的辩证运动)与它的对象——物质生产——具有严格的同构性,不具有可转变性,成为了某些内容的前提或者理论框架,而这些内容从来没有被首先给出”(Baudrillard 1981,214)。麦克卢汉(McLuhan 1964/2001,41)也曾宣称的,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们“不理解新传播媒介的活力”,这一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TripleC's 杂志特刊《马克思归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与当代传播学批判研究》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传播学批判研究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意图批判地进行传播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社会变革中,马克思为我们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此外,这些文论坚信,批判地研究传播学离不开对资本主义、阶级和剥削的深入分析与批评,并最终需要在实际的斗争中去争取解放。

本书在征稿启事中曾提出以下问题:

(1)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学研究?它之于当代的意义何在?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假设、经验与遗留问题、任务、方法和类别是什么,它们与马克思的理论又有何关联?有哪些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媒介/传播学研究,它们有何不同点,又有何相同点?

(2) 在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不同领域、分支和路径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扮演了什么角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历史上具有什么作用、地位和重要性,特别是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时期?

(3) 除了作为一位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马克思还始终坚持着进行记者的工作。他的新闻实践在新闻理论、新闻教育和可替代媒体(alternative media)等方面带来何种启示?

(4) 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并在大学中进行传授,面临着哪些结构性条件、限制和问题?新资本主义危机给这些条件带来哪些实际及潜在的影响?

(5) 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同分析媒介与传播的社会角色之间,存在什么关联?

(6) 如何才能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如阶级(class)、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剥削、商品/商品化(commodity/commodification)、异化(alienation)、全球化、劳动力、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与战争(capitalism, militarism and war)、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评(ideology/ideology critique)、拜物教(fetishism)和共产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媒介角色、知识生产和传播进行分析、重构和批评?。

(7) 马克思的著作是如何阐述媒介、传播与信息的?

(8) 现有的对于马克思是如何分析媒介、传播、知识、知识劳工和科技的诸多诠释路径,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9) 辩证哲学和辩证分析作为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和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

(10) 马克思对媒介、传播、信息、知识生产和文化做出的核心假设是什么,这些观点可以怎样运用于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之中?

(11) 马克思的著作与理解社会媒体有何相关性?

(12) 马克思的哪一部著作最适用于当今媒介与传播的理论创建?原因与方法为何?

(13) 特里·伊格尔顿(Eagleton 2011)认为关于马克思的十个最普遍的偏见都是错误的。当代媒介与传播研究对马克思抱有哪些偏见?这些偏见造成了哪些后果?如何驳斥这些偏见?新资本主义危机影响下,对于马克思的偏见有哪些延续或者中断?

莫斯科(Vicnet Mosco)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理论的任务在于:“阐明传播与文化如何成为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相互构建,以及传播与信息如何成为社会活动和社会意义建构的辩证实例。将这一任务放置于理解权力与反抗的大框架内,才能将传播直接融入至今仍具有活力和实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Mosco 2009, 44)。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将传播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看待,“强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包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分析,对商品化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对社会阶级分化与抗争的分

析和对矛盾与对反动运动的分析等”(Mosco 2009, 94)。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研究不仅在当代具有现实的关联性,而是一直以来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传播总是被嵌入在阶级社会的不平等结构中的。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也遭受了挫折: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被边缘化与歧视成了常事(详见本刊 Irfan Erdogan),马克思主义也常常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总是有现实性的,但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又总是面临很大的困难,其中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稳固的制度基础。今天,我们能看到对于马克思著作的关注正在持续升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可能将它引导为制度变革,挑战当前支配性媒介机构的行政性质,以推进传播学批判研究的制度化进程。

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总结马克思著作中有关媒介生产、使用和效果的内容(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媒介传播的详细讨论和理论模型阐释,请参见 Fuchs 2010, 2011)。

在商品生产(commodity production)中:

- 具体:媒介技术在媒介产业中的技术合理化
- 具体:媒介领域的资本积累(concentration)与集中(centralization)过程
- 具体:媒介资本的生产,知识工作者作为媒介公司雇佣劳动力
- 一般:传播技术在时间与空间上对生产进行协调,减少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和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的份额(shares)
- 一般:传播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空间扩张的实现途径

在商品流通(commodity circulation)中:

- 具体:传输(transmission)技术作为手段实现媒介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资本的积累
- 具体:媒介作为广告的载体
- 一般:传播技术作为手段减少资本流通(circulation)与周转(turnover)时间
- 一般:媒介作为世界贸易全球化的手段与结果
- 一般:媒介作为资本空间集中的手段

在观念的交流(circulation)与接收(reception)中：

- 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和传布者(circulators)

在非主流媒介(alternative media)的生产、流通和接收中：

- 被另种方式(alternatively)生产、分配、解释的可替代媒介作为阶级斗争的方式和批判观点传播的方式

表 1 对媒介在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中作用的系统阐述

流通(Circulation)	生产(Production)	流通(Circulation)	消费(Consumption)
M-C(Mp,L)	.....P.....	C'-M'	
	媒介技术作为合理化手段:s/v ↑		
	媒介领域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过程		
知识工作者作为媒介公司雇佣劳动力			
媒介作为跨组织的公司传播与协调方式:v↓,c↓			
服务于空间分配(spatial distribution)和资本扩张的媒介			
		媒介作为广告的载体	
		作为资本形式的传输媒介	
		媒介与贸易全球化	
		媒介与资本的空间集中化	
		媒介作为意识形态载体与传输渠道(diffusion channels)	
可替代媒体作为媒介生产、流通与消费中的否定力量(negating forces)			

图 2<sup>①</sup> 中的模型总结了媒介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也即,媒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四种角色:

① 按照文本顺序,此处应为图 2,原文或误作为图 1,以下同。——译者注

- (1) 媒介的商品形式
- (2) 媒介的意识形态形式
- (3) 媒介接收
- (4) 可替代媒体

水平整合、资本集聚、资本中心化

媒介融合、水平整合、资本集聚、资本中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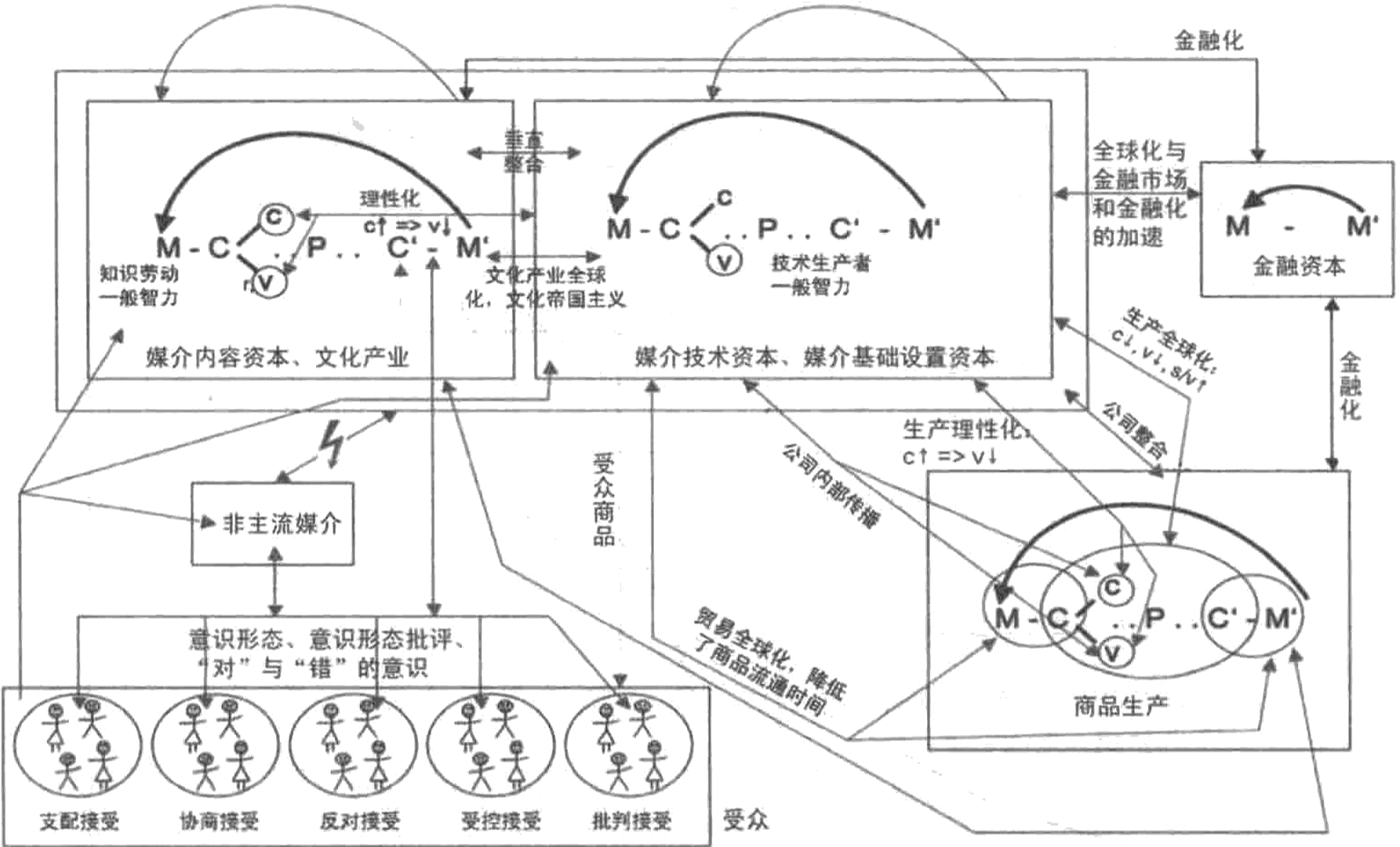


图2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媒介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模型展示的是媒介在经济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角色,不涉及媒介与政治体系,如国家、市民社会、法律等方面,以及与文化体制,如教育、家庭、宗教等层面的联系。媒介中的资本积累既发生在媒介的内容领域(content sphere),又发生在媒介的基础设施领域(infrastructure sphere),二者共同形成了媒介资本的范围。这两个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循环理论中有所显现,表明它们是面向资本积累的。

商品理论假说在图2中直观地表现为如下过程:垂直与水平整合(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媒介集中化(media concentration),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媒介全球化,媒介资本与其他资本整合,生产的合理化,生产、流通与贸易的全球化,公司内部传播(intra-company communication),广告与市场营销。媒介内容生产和媒介技术生产显示为两个不同的

系统,它们同属于媒介产业,但创造的产品不同。垂直整合的过程使二者的界限模糊化;而媒介集中化过程和水平整合过程,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在特征,分别塑造了这两个领域;媒介融合则是媒介基础设施资本的特有特征。这两个领域一起构成了影响文化工业全球化的因素。图2右下角展示的经济领域显示了非媒介产业与服务业中的资本积累,它在企业整合过程中部分地与媒介行业相整合。在整合过程中,媒介技术同时促进了非媒介领域和媒介内容产业的生产合理化过程,得以使它们进一步推动生产、流通和贸易的全球化;反向而言,全球化过程又促进了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介技术也被使用于公司内部传播。合理化、全球化和公司内部传播的目的在于利润最大化,主要手段是减少投资的资本消耗,包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投入,和促进相关剩余价值生产,即以更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产出。图2还显示,媒介内容产业对于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广告推广与市场营销至关重要,这同时也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资本实现过程。

意识形态理论假说在图2中在媒介内容资本及其与受众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产生虚假意识的媒介内容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媒介内容则依赖于受众。正如图2左下部分对于接受理论假说的展示,接收是意识形态实现再生产和面临潜在挑战的领域。

可替代媒介是一种对现有资本主义媒介产业提出挑战的领域。可替代媒介的组织与生产方式在图2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示意出来,可替代媒介另辟途径,以别种方式组织并生产媒介,目的是创造批判性的内容来挑战资本主义。媒介内容是依赖于接收的。五种具体的接收形式可见于图2的左下部分。接收是意识形态实现再生产和面临潜在挑战的领域。斯迈思(Smythe 1977)在论述受众商品论的文章中指出,在媒介内容资本的部分类型中,资本积累是通过将受众作为商品贩卖给广告商来实现的,其定价取决于媒介内容受众的人口学特征(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因为广告收益并不是媒介资本的主要因素,受众商品在图2中用一条点状线来强调。近来,接收者逐渐变为可生产内容和技术的积极受众,但这并不是媒介民主化的体现,而更多的是剥削受众与使用者的新的方式。

媒介与媒介技术的使用价值首要在于提供信息、促成传播(enable communication)和推进文化创新的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被产品的交换价值所支配(dominated),成为商品。当媒介采用商品形式,其使用价值只有通过消费者的交换实现,这便积累了资本家手里的资金。媒介与技术



作为具体的产品,代表了信息与传播的使用价值,而媒介的货币价格代表了信息与传播的交换价值。商品理论假说强调媒介的交换价值。意识形态理论假说则展示了媒体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如何创造了媒体在合法化与再生产中的控制角色。这两个理论假说通过媒介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互对立的三重角色相关联。作为商品的媒介与货币的使用价值有关,后者可以实现前者的交换价值,也即以价格的货币形式实现。货币是作为交换价值与媒介产生关联的。它在媒介商品中实现其交换价值,即一般等价物的交换。消费者对媒介和技术的使用价值感兴趣,而资本家对能帮助他们实现货币资本积累的交换价值感兴趣。只有当资本家把其掌控的商品通过复杂过程与货币进行交换时,消费者才能得到媒介与技术的使用价值。这意味着,媒介与技术的使用价值只有通过货币有关系的交换价值才能实现。商品化过程构成媒介与技术在资本主义中的基础。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媒介与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立的两极”(MEW 13,72)。<sup>①</sup> 媒介与技术到达消费者时,它们是以商品形式呈现的并因此可能带有意识形态特征。可替代媒介领域挑战了媒介的商品特性,其目的在于一场逆转:通过扬弃交换价值使媒介与技术的使用价值成为主导特性。可替代的接收过程超越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特征,接收者获得了质疑其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商品化特征的权力。

显示在图 2 中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媒介的分析可以被总结为四个主要维度。特刊中的文章也是按照媒介在资本主义中的角色分类来组织的。

#### (1) 媒介与商品

资本积累,媒介技术产业,媒介内容产业/文化产业,数字媒介产业,媒介与金融化,媒介与全球化,受众商品化,媒介集中,媒介整合等

#### (2) 媒介与意识形态

媒介操控,媒介宣传过滤,广告,公关,商品市场营销,文化帝国主义等

#### (3) 媒介接收与使用

意识形态接收,批判接收,批判的媒介使用等

#### (4) 可替代媒介

可替代媒介的生产空间,可替代的公共空间,媒介与社会反抗等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1998,页 113。——译者注

此次发表与提交的论文关注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媒介与商品化、媒介与意识形态和可替代媒介领域,媒介接收研究并没有较多地呈现。这意味着,对现在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学者来说,类似于受众对媒介内容的解读这类问题,例如电视真人秀(reality TV)、流行音乐、肥皂剧、体育、电影、问答节目或电脑游戏等,不具有太强的重要性;相比之下,这些议题更具重要性:对网络免费劳工的剥削、研究与教育的商品化、网络意识形态、发生于多国的关于媒体角色的社会抗争,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边缘化与被歧视状态,资本主义危机与媒介,传播劳工,新闻批评,社会主义开放出版,或可替代社交网站。<sup>①</sup> 这种现状说明了三:

(1) 在现有资本主义危机和不平等扩大的情况下,政治经济议题,阶级斗争事务,可替代媒介的角色等问题显然更为重要。相对而言,文化研究议题(如,粉丝文化)则很容易被资本主义利益所俘获,不讨论紧迫的现实问题,例如不安定的生活条件和世界不平等问题等。

(2) 传统的受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变为中介劳动(mediated play labour)和媒介生产-销售(media prosumption)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一领域,对生产、消费和广告的研究被融合起来。正如特刊所显现的,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研究欢迎这种融合,相关的议题也已成为该研究取向的重要主题。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指责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研究没有特别关注接收与媒介消费的那种传统批评站不住脚了,因为,随着消费的增长变得更具生产性,这一问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随着网络生产消费的崛起,对始于广播领域的受众商品化研究而言,其相关分析也进入了新的维度。

(3) 对于马克思及其阶级与资本主义批判来说,当前最为紧迫的议程就是解读和改造现代社会和现代媒介。此次发表的论文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与深入,这些学者们显然没有追随那股或批评或忽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潮流,而是坚守在批判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的学术阵地上。

本书的28篇论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现实意义,他帮助我们把握自己生活的世界,激励可以并且应该进行的斗争以及揭示媒介在资本主义中、在斗争中、在创造可替代范式中的作用。令人鼓舞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马克思的著作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中。事实上,马克思始终都具有其现实性,只是这种现实性在今天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并没有被

---

<sup>①</sup> 此处仅列举了专题所涉及的一部分议题。

充分重视。马克思总是被曲解与误解,部分原因也是出于对他著作的误读或是忽视。伊格尔顿(Eagleton 2011)曾经总结了十个针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常见偏见,并分析了马克思正确的原因以及这些偏见为什么有误。此次,我们在每一种偏见中引入了媒介与传播研究的维度。本书中的论文论证了这些偏见的错误性,并且说明了当下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概念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研究成果的总结,我们针对每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做出了反驳,这些反驳以专题中的研究分析为基础,显示了马克思对批判地理解社会与媒介的重要意义。

### 1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Outdatedness*)

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于后工业社会。

**反驳** 马克思主义有时事性! (*Topicality*)

为了恰当地和批判地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传播,我们需要马克思。

### 2 马克思主义有压迫性! (*Repression*)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也许还有些道理,不过一旦将其付诸实践,结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暴政和屠杀。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媒介的合理性都是虚无缥缈的。

**反驳** 资本主义才有压迫性!

鉴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不平等、全球战争和环境破坏,资本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看上去都不太理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媒介的可行性从资本主义危机中诞生。

### 3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 (*Determinism*)

马克思相信历史的必然规律,认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终结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媒介的结束。

**反驳**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和复杂的! (*Dialectics and Complexity*)

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辩证法让我们理解了社会与媒介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社会与媒介是如何被结构条件,持续开放的斗争,以及结构和能动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塑造的。

### 4 马克思主义是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 (*Do-Goodism*)

马克思对人性的善良抱有天真的幻想,忽视了人天性的自私、贪婪、野心和好斗。因此媒介必然以利益和竞争为基础,否则无法维持。

**反驳** 资本主义是邪恶的! (*Wickedness*)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利益最大化和竞争在新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得以运行,正是这种逻辑改造了媒介景观使其变得愈加不公平。

#### 5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还原论! (*Reductionism*)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将所有文化与政治现象都归结于经济,他们不理解媒介与传播的非经济层面。

#### 反驳 马克思主义具有复杂性!

现代的发展显示,经济在资本主义中并不具有决定性,但是经济系统导致了一个局面,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现象,包括所有媒介现象都具有阶级的面向,与阶级辩证相关。在解释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之时,阶级虽然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概念,但却是一个必要的概念。

#### 6 马克思主义反人道主义! (*Anti-Humanism*)

马克思对于宗教和道德问题毫无兴趣也毫不在意,他为斯大林(Stalin)等人铺平了反人道主义的道路,马克思没有为媒介道德问题提供任何基础。

#### 反驳 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

马克思是深刻的人道主义者。对他来说,共产主义正是人道主义实践,而阶级斗争则是他的道德实践。他的理论具有深刻的道德性和规范性,媒介传播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包括了对媒介的道德批判。

#### 7 阶级理论过时了!

马克思对于阶级问题的过分痴迷过时了。今天,知识的扩张正在消除所有阶级屏障。

#### 反驳 阶级理论具有重要性!

存在于社会组织每一层面上的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表明,现代社会首先就是一个多级(multi-levelled)的阶级社会。知识工作不是同质性(homogenous)的,而是一个阶级架构的空间,具有内在的阶级关系和分层模式,所以管理者,临时雇佣的电话中心接线员或是数据录人员都属于知识工作者。

#### 8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主! (*Democracy*)

马克思主义者崇尚暴力革命,反对和平改良和民主。他们否认媒介在民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反驳 社会主义是民主的!

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部写满了侵犯人权、结构性暴力和战争的历史。在媒介领域,也有媒介支持反民主目标的资本主义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对和平、民主和民主媒介的号召。马克思曾在自己的新闻稿件和实践中不断

为言论自由、废除审查、新闻民主和媒介民主而斗争。

### 9 马克思主义支持独裁! (*Dictatorship*)

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就是政党的逻辑,并影响国家建立恐怖的(monstrous)独裁以控制、监视、操纵和审查媒介。

#### 反驳 资本主义支持独裁!

资本主义通过经济和意识形态手段建立了恐怖的经济独裁来控制、监视、操纵和审查媒介。马克思的逻辑旨在培养全面的人文环境使人们都能够积极地追求,其中就包括人人皆可为记者的观点。

### 10 非阶级导向的新社会运动! (*Non-class-oriented New Social Movements*)

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同性权益,和平运动,青年运动等抛离了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争取可替代媒体的斗争与新社会运动相关,与阶级斗争无关。

#### 反驳 阶级导向新社会运动!

肇始于现有的危机的新社会运动,比如一系列占领运动(the Occupy movement),以及现在有关民主全球化的运动,都出自于对不平等和阶级的深切关注。现在的斗争是运用了大量可替代媒体的阶级斗争。

## 第一篇 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科恩(Nicole Cohen)分析了文化产业对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的剥削。她不认同文化工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观点,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没有保障的文化劳工问题具有必要性。她坚持,对于文化工作的分析不应该脱离资本主义普遍结构的剥削和其他形式的工作。剥削和阶级是劳动过程理论(labour process theory)的核心,并且至今仍然具有实用价值。具体而言,她分析了新闻工作中的无偿和无保障劳工。

埃克曼(Mattias Ekman)探讨了媒介与传播在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中发挥的作用。作者列举了三个事例:(1)瑞典媒体在报道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sup>①</sup>时侧重描述具有实际或潜在暴力因素的个体行为,从而遮蔽了运动的政治目标和斗争的缘由。(2)瑞典媒体和政治家们将

---

<sup>①</sup> 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也称反全球化或另类全球化运动,抗议全球贸易协定,认为会对贫穷及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主要诉求是改革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建立一个国际社会正义的运动。——译者注

瑞典电信公司特力(Telia)的私有化塑造为给公众提供购买“人民的股份”的机会。(3)在诸如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网站中,用户及其劳动在被商品化的过程中,剥夺和暴力发挥的作用。

费舍尔(Eran Fisher)分析了 Facebook 的受众在商品化过程中面临的异化和剥削。在杰哈利(Sut Jhally)和斯迈思的理论基础上,建构了受众异化的观点,认为商业媒体的受众不仅被剥削,而且不能控制内容与内容生产。Facebook 既被视为生产途径也被视为传播手段,既被视为技术也被视为媒介。Facebook 带来的是剥削的加重和异化的缓解,而商业化大众媒体则是以低剥削和高异化为基础的。

霍尔(Richard Hall)和 斯塔尔(Bernd Stahl)探讨了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是如何影响大学的。作者强调,在新自由主义的认知资本主义之下,大学普遍成为了剩余价值生产和斗争的场所。分析的语境是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初期以来的大学商品化的加剧。正在兴起的科技越来越具有嵌入性、互联性、隐形性、适应性、个人化和普及化,促进了大学里的商品化和拜物化。

赫布尔怀特(William Hebblewhite)分析了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论文《作为生产方式的传播方式》。作者认为,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base and superstructure)的关系,威廉姆斯建立的是一个还原论的文化主义的概念。为了克服威廉姆斯和马克思及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的缺陷,有必要引入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作者认为网络是生产与传播的一种方式,并且介绍了生产-传播(promunication)的概念。

曼泽罗尔(Vincent Manzerolle)和乔森(Atle Mikkola Kjosen)分析了数字化带来的资本积累循环(cycle)的变化。作者认为,个人化(personalization)与普遍连接(ubiquitous connection)是社交(communicative)资本主义影响资本运作循环的两个重要方面。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传播的批判分析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循环理论为基础,数字化传播加速了资本循环并促进了信贷发展。他们指出,资本循环是一个传播的过程。

佩雷斯(George Pleios)聚焦于在信息社会中,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概念化。他强调,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中的传播具有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特征,传播是一种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传播被整合进了阶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中,并不单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作者结合自由放任(lais-

sez faire)资本主义,垄断(monopoly)资本主义和符号(symbolic)资本主义观察这种现象,他认为休闲和工作的融合会进一步消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生产与传播之间的界限。

普瑞(Robert Prey)分析了网络的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架构中的角色。作者讨论了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关于网络社会中权力的分析,强调了卡斯特对于排他原则(exclusion)的重视。借助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的观点,<sup>①</sup>他强调将社会批评根植于网络隐喻(network metaphor)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会导致对于阶级和剥削问题的忽视。作者认识到网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应当将这一研究取向同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相结合。

浦若迪尼克(Jernej Prodnik)探讨了商品在媒介与传播批判研究中的角色。他对马克思关于商品理论的分析进行了概述,并指出这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均有所涉及的一类概念。其他相关观念,例如商品拜物教和事物的普遍商品化在文章中也有所讨论。作者还特别分析了商品在斯迈思的理论和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ous Marxism)中的角色,反驳了现在以卡拉韦(Brett Caraway)的观点为代表的对于斯迈思的批评。

斯楚罗特(Jens Schröter)分析了互联网将带来无摩擦资本主义(frictionless capitalism)<sup>②</sup>的观点。互联网兴起于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作为一项技术,成为了无危机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与意识形态的投射。而作者强调,本世纪初的互联网危机(dot. com crisis)早已击碎了这种意识形态,互联网反而陷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

维特尔(Andreas Wittel)认为数字化媒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以劳动、价值、所有权(property)和斗争的概念为核心的。惠特将数字化媒介阐述为分布式媒介(distributed media)。他认为,信息生产的途径在数字化时代更易获取,而资产阶级掌控了重要的信息分配的手段。作者在文章中对网络免费劳工进行了分析,对知识与数字化媒介时代劳工的可测量性提出了争议,对始于文件共享的所有权(property)提出挑战,并为数字公众(digital commons)而斗争。

---

<sup>①</sup> 详见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著,《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高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译者注

<sup>②</sup> 详见比尔·盖茨著,辜正坤译,《未来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译者注

## 第二篇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卡斯塔尼奥(Pablo Castagno)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去理解阿根廷的政治体系发展、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媒介的角色和媒介政策。作者解释了新自由主义如何被法西斯主义军政府(fascist military junta)所推行,并于1989至1999年<sup>①</sup>梅内姆政府统治时期被深化。作者展示了多年来阿根廷的政治发展如何影响媒介角色,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媒介控制,梅内姆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媒介私有化,基什内尔(Kirchnerismo)为建立国家文化产业所推动的国有商业关系网。

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分析了传播在马克思著作中扮演的角色和马克思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地位。作者对传播学学术期刊中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角色进行了经验研究。作者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被系统地歪曲和边缘化了。其后果之一便是,主流研究通常用不动声色的方式忽略马克思,而可替代的研究取向,例如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则往往倾向于攻击马克思并做出无知的断言(make uninformed claims)。埃尔多甘对马克思文本的细致研究表明,马克思将传播视作人类生活的重要方式,认为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阶级属性。

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对网络批判研究的路径进行了概述,并指出了该领域的核心概念。他认为,在网络文化批判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和批判政治经济学(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网络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差异和斗争。他探讨了网络批判研究中的十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网络批判研究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包括:辩证法,资本主义,商品化,剩余价值/剥削/异化/阶级,全球化,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公众(common),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共产主义和美学。

加兰(Christian Garland)和哈珀(Stephen Harper)探析了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冲突已经转变为了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的绝对优势和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适应自由多元主义盛行的现状。作者通过两个例证指出对新自由主义批判

---

<sup>①</sup> 此处应为1999年,原文误为2999年。——译者注



的局限性: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丑闻和关于经济危机发生原因的讨论。

麦圭根(James McGuigan)回顾了 in 资本主义当代变迁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作者强调,经过对经济主义(economism)的批评,文化研究往往摒弃了经济学批判。他分析了“酷(cool)”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里的作用。消费文化正是“酷”资本主义的重要表现,传播技术“酷”的特性尤其突显。对当代文化与媒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对于理解这种意识形态与经济的作用具有重要作用。

尼克松(Brice Nixon)讨论了辩证法思想之于媒介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意义。作者认为,意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基础。他指出,辩证法的方法可以运用于媒介与传播的批判研究之中,这需要充分结合批判理论家们的理论,参考卢卡奇(Georg Lukács)、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列斐伏尔(Henri Lefèbvre)、萨特(Jean-Paul Sartre)和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著作。

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观点分析了佩林(Sarah Palin)的政治观与意识形态。她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复兴是必要的。当前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参与是不充分的,今天的媒介与传播批判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中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具体而言,作者分析了佩林如何挪用和转换女性主义的内容来为自己反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目的服务。

苏斯曼(Gerald Sussman)探讨了意识形态和宣传在当代资本主义媒介经济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人们正生活在一个宣传社会,意识形态和宣传已经成为了核心生产力。文章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那部分经济所依赖的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的无偿劳动。对生产型消费者的剥削和监管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今天的重要性。数字化媒体环境也使抵制资本主义的集体性活动成为了可能。

### 第三篇 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布朗(Brian A. Brown)和奎恩-哈斯(Anabel Quan-Haase)的贡献在于

处理了研究数字化劳动和社会媒体生产型消费者的数字化劳动条件所需的方法论问题。“工人调查 2.0”(Workers' Inquiry 2.0)的方法论建议是建立在马克思工人调查表和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合作调查方法的基础上的。作者以对 Flickr 的调查为例,展示了“工人调查 2.0”的方法论是如何实行的,他们还指出了工艺品、社区和生产者(producers)<sup>①</sup>在其中的重要性。

虞格仁(Katarina Giritli Nygren)和基隆德(Katarina L Gidlund)分析了数字化文化中异化的作用。他们运用了福柯(Foucault)的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者借用福柯的观点去分析数字化技术中的牧领权力,认为这种形式的权力使人们误以为,数字化技术能给予个体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被用于数字化技术领域,揭示出现在传统形式的异化都伴随着数字化异化,这种异化与消费文化、在 Facebook 等自我表达平台上的个性化以及商品化的互联网直接相关。

#### 第四篇 马克思,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奥拉格(Miriyam Aouragh)为观察和分析阿拉伯革命中的社会媒体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视角。作者将调节理论(notion of mediation)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联系,并且认为这体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革命是根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阶级架构的。作者质疑西方自由主义将革命和社会媒介框定为东方主义的做法,并提出了一个辩证革命模型,将社会媒体置于“在线-离线(online-offline)”的辩证革命中。

亚茨(Lee Artz)分析了 21 世纪社会主义如何在委内瑞拉运行以及传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委内瑞拉是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政府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公众有机会通过公共辩论去商讨和影响所有的政府预案,社会服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建立起来。他分析了委内瑞拉的媒介政治经济:超过 80%的媒体是商业性质的,与之对立的是社区媒体和公共服务媒体。结论认为委内瑞拉及其媒体正在经历转变,并且具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潜能。

鲁德斯(Peter Ludes)讨论了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classless society)的看法。在回顾了马克思的相关观点后,他得出了关于 20 世纪资本主义发

---

<sup>①</sup> 此处或应为 producers,原文误为 producers。——译者注

展的结论。文章认为,一种替代的制度的建立需要将规划形成网络,并且此时此刻就应该开始。卢德思建议参考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观点,升级马克思理论中的无阶级社会这一概念。在建立替代方式的过程中,应当特别考虑传播的作用以及文明化(civilizing)和去文明化(decivilizing)的进程。

莫斯可(Vincent Mosco)认为资本主义危机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因此,深入解读他的所有的著作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帮助照亮媒介与传播批判研究中,诸如知识劳工,媒体实践等盲点。作者点明了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的信息与传播方式的重要性,以及将马克思的新闻实践作为一种政治的呼唤,对于当代传播学学生、学者、记者和知识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皮考斯(Wilhelm Peekhaus)对学术期刊出版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他展示了对免费学术劳动力的剥削、垄断与资本集中趋势、图书馆预算减少而期刊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并分析了这些情况如何塑造了这个产业。他将资本主义学术出版阐释为一种原始积累的形式,指出出版的开放获取可以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式。当然,资源开放今天仍具有局限性,需要通过一场资源开放运动来反对资本主义、质疑学术出版的资本主义特性,进而克服局限。

塞维吉纳尼(Sebastian Sevignani)在探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privacy)的语境中分析了可替代社交网站 Diaspora\*。作者强调它与免费软件运动的关联,描述了私的概念的起源及其与私有财产观念的关联。他考察了通常被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忽略的马克思对于私的概念的批判,勾画出了社会主义替代方式的基础,并把这种分析应用于了 Diaspora\* 这一案例上。

肖(Padmaja Shaw)分析了马克思的著作在印度当代政治新闻报道中的角色。作者分析了马克思著作在新闻报道中三个方面的相关性:言论自由与监管,作为自由贸易一部分的新闻,媒介在资产阶级民主中的角色。作者强调,一方面,在印度报刊中左翼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主导着红色走廊(Red Corridor)起义地区的左翼思想和左翼新闻报道被监管和压制着。制度化的左翼只有仔细思考马克思的新闻政策才能更好地应对这种情况。

本辑特刊呈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于媒介与传播批判研究的重要意义。它很清楚地表明,媒介与传播研究不应该仅仅具有批判的特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不论是本

次特刊所体现出的学术兴趣以及研究质量,还是其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活动(如“第四届信息通讯技术和社会大会:21世纪信息社会的批判、民主和哲学”,2012年5月2日—4日乌普萨拉大学的“迈向社会媒体的批判理论”会议,见福克斯2012,另见:<http://www.icts-and-society.net/events/uppsala2012/>),尤其是在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中所表现出的热度都说明:马克思回来了。对马克思著作的深刻兴趣体现了对当下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传播的担忧以及寻求其他出路的渴望。

### 参考文献:

- Baudrillard, Jean.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Press.
- Eagleton Terry. 2011. *Why Marx Was Righ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uchs, Christian. 2012. New Marxian Times. Reflections on the 4th ICTs and Society Conference“Critique, Democracy and Philosophy in 21st Century Information Society. Towards Critical Theories of Social Media”. *tripleC-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1):114—121.
-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Fuchs, Christian. 2010. Grounding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Karl Marx.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4(1):15—41.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MEW). *Werke*. Berlin: Dietz.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4. *The German Ideology*.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8/2004.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eterborough: Broadview.
- McChesney, Robert W. 2007.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McLuhan, Marshall 1964/2001.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Routledge.
-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2<sup>nd</sup> edition.
-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1—27.
- Zizek, Slavoj. 2010.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Verso.



## 第一篇 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妮可·S·科恩(Nicole Cohen)<sup>①</sup>

##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sup>②</sup>

殷鹏(译),吴畅畅(校)

[导读]本文主要是以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剥削理论分析自由作者受到的剥削。作者在开篇提出,由于自由作者的工作方式看似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存在矛盾——比如自由作者离开了物理形式的工厂、对自己的工作掌握一定的自主权等——导致在分析文化工作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失了。然而,作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解当代文化工作的一个有力框架,主要原因在于:(1)在经验层面,文化工作者摆脱工作场所不代表脱离了剥削关系;(2)在理论层面,唯物主义的方法可以将文化工作置于资本主义的动态关系中考察。

接下来,作者结合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和劳动过程理论,以自由作者为案例,经过分析后指出:有关文化工作自主性和控制劳动过程的争论忽略了劳资关系中的剥削,而这正是影响文化工作的关键。作者通过对文化公司榨取自由作者剩余价值的两种方式——剥削无偿劳动时间和以不合理的版权

---

① 约克大学传播与文化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她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收录于《民主传播》(*Democratic Communiqué*)、《劳动力:加拿大工作与社会学刊》(*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和《加拿大传播学期刊》(*Th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约克大学,nscohen@yorku.ca。

② 感谢大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评论,感谢斯蒂芬妮·罗斯(Stephanie Ross)、利亚·沃斯科(Leah Vosko)、帕特里夏·马泽帕(Patricia Mazepa)、基利·得·普特尔(Greig de Peuter)和马特·卡林顿(Matt Carrington)对本文不同版本的反馈意见。



制度侵占知识产权——来展现这种剥削。

在剥削无偿劳动时间方面,自由作者与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只是通过劳动获得计件工资。这样一来,(1)文化公司首先无需支付工人劳保、工资、培训等费用;(2)文化公司支付的计件工资中,只为产品本身支付费用,而没有为自由作者生产这件产品的过程,包括创意、自我提升等支付工资;(3)文化公司还通过雇佣实习生等方式加强竞争,进一步压低工资。

在版权剥削方面,由于通信技术的发达,复制变得十分简单。文化公司(1)采用买断文化产品所有权的方式,一次支付,多次使用;(2)通过与自由作者签订不平等或强制性的合同,将多次使用的过程合法化。

最后,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视角能够揭示文化产业转型和工人经验转型的动态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工作可以视为是一个斗争场所,而这些自由作者本身既是劳动的工具,也是斗争的工具。

[关键词]文化工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自由作者、剥削、劳动过程、版权、不可预见性(或者不稳定性?)

## 一、引言:马克思的缺失

文化工作(cultural work)是指媒介、文化和传播的生产,<sup>①</sup>它曾是传播学

① 在针对传播和文化产业中的工作和劳动力研究中,许多基本定义还未达成统一。本文中,笔者用“文化工人”(cultural workers)一词指代那些在文化行业,或是在生产并流通“影响我们理解世界”和“制造社会意义”产品行业工作的人(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p. 3&12. )。班克斯(Banks)把“文化行业”(cultural industries)定义为“生产‘艺术’或‘符号’产品和服务的行业,这些产品的核心价值在于能够承载图像、符号、标识和声音”(Mark Banks. 2007.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2. )。当人们把文化与创意和艺术联系在一起时,产生了许多新议题,我使用“文化”一词,就是要同这些议题进行对话。到底哪些行业属于文化行业,人们看法不尽相同,比如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就把从图书馆员和展览策划人到作家、艺术家,以及电影和广播中的技术工人算作文化行业的工人(参见 Statistics Canada. 2012. Occupations in Art, Culture, Recreation and Sport. *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2011*. <http://www.statcan.gc.ca/cgi-bin/imdb/p3VD.pl?Function=getVDDetail&db=imdb&dis=2&adm=8&TVD=122372&CVD=122373&CPV=5&CST=01012011&MLV=4&CLV=1&CHVD=122374>)。这个范围虽然从某种程度来说过于宽泛,但却很有用。因为它从行业特性,从工作执行的方式而非工作内容本身来理解文化工作。文化产品及其消费中的一些特性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文化生产是通过特定方式组织的(参见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p. 101, Bernard Miège.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and Nicholas Garnham. 1997. Concepts of Culture—Public Polic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Studying Culture*, 2nd ed. edited by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54—61. London: Arnold)。这就能避免将文化工人的经验归因于他们的个人性格特质,这也是笔者(转下页注)

研究的一个盲点,<sup>①</sup>但现在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其开展研究。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却在这些研究中缺失了。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对19世纪工业生产的研究对于后福特时代的文化工作来说似乎已经过时。他在《资本论》中描述了当时工人在工厂劳动的情形:雇佣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这种最特殊的商品,被卷入“自由”的剥削关系,被雇主安排工作。<sup>②</sup>在资本家的控制下,工人们每天长时间的辛苦劳动,却只能得到很少的工资。在挣得能够在生劳动力的工资之后,她就开始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是资本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工人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她的具体工作被抽象为标准化商品生产的一部分。马克思描述的是被动的、异化的工人,他们与其他工人都可以任意交换,再生产过程中出卖自己的劳动。

当劳动离开实体的工厂,进入创意经济领域的工作室、办公室和或者家中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认为过时了。在许多研究中,文化工人被视为是独特的一类工人,文化工作也与其他类型的工作截然不同,不存在劳资对抗(labour-capital antagonisms)。<sup>③</sup>还有更偏激的批评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太简单(reductive),因为他没有关注工人的能动性或主体性<sup>④</sup>对马克思理论最广泛的批评是针对“异化”(alienation)概念<sup>⑤</sup>。比如,马克·班克斯(Mark Banks)就曾经对把文化工人视为“被异化劳动力”的观点提出

---

(接上页注)在文中的观点之一。“创造性劳动”(creative labor)关注的是个人特质(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3),但笔者认为文化生产组织对工人的经验有结构性影响,自由作者的劳动经验直接来自于他们工作的行业。

① Vincent Mosco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6) Editorial.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493.

② Karl Marx. ([1867]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③ Richard F. Caves. (2000)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 L. Florida.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Mark Deuze. (2007) *Media Work*. London: Polity.

Susan Christopherson. (2009)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Risk, Adapt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xclusionary Network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72—9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④ Mark Banks. (2007)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Bridget Conor. (2010) ‘Everybody's a Writer’ Theorizing Screenwriting as Creative Labour. *Journal of Screenwriting* 1 (1): 27—43.

⑤ Karl Marx. ([1844] 1978a)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594—617. New York: Norton.

批判,这种观点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主体性,受到来自‘上级’主管和所有者的压迫”。<sup>①</sup> 对文化工作的描述更多的是与异化截然相反:它是一种社会的、协同的工作,在劳动过程中给予工人相对自主性,激励他们表达自我,并为他们参与全部人类活动提供机会。文化工人对自己创造的产品有强烈的附属感,特别是当这些产品——比如小说或电影——带有他们名字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马克思认为工作是异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自愿,而是强迫的”<sup>②</sup>,而文化工作是充满渴望并富有魅力的,这两种观点很难调和。<sup>③</sup>

我在下文将详细回顾的这些批评理论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产品的特性要求工人在劳动过程的创意阶段获得相对自主性,<sup>④</sup>这能够让文化工人与其他类型的工人相比获得更长时间、更多自主性和资源,并减少被异化的感觉。<sup>⑤</sup>虽然这种相对自主性是短暂的且协商的,但是这种安排引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工作应该被视为潜在的好工作,或者说文化工作即使在资本主义限制内也能够产生“‘激进的’自主批评”(“radical” autonomous critiques)。<sup>⑥</sup>然而,当代文化生产正在削弱这种相对自主性:文化工人的物质条件不断下降,工作不确定性不断增长,具体表现在“间歇性就业和对未来的极度不确定性”,以及“缺乏财务及其他物质保障”。<sup>⑦</sup>的确,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文化工作的核心特点。这

① Mark Banks. (2007)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11.

② Karl Marx. ([1844] 197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Norton. p. 74.

③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是从主观经验的角度解释异化,而是从客观的角度,将其描述成为围绕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力而组织的生产方式。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人缺乏生产方式(means of production),为了生存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因此而被异化。

④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Mark Banks. (2010) *Autonomy Guaranteed? Cultural Work and the ‘Art-Commerce Relation’*.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14 (3): 251—269.

⑤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p. 70.

⑥ David Hesmondhalgh and Sarah Baker. (2011) *Creative Labour: Media Work in Thre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Routledge.

Mark Banks. (2010) *Autonomy Guaranteed? Cultural Work and the ‘Art-Commerce Relation’*.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14 (3): 252.

⑦ Andrew Ross.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 4.

Enda Brophy and Greig de Peuter. (2007) *Immaterial Labor, Precarity and Recomposition*.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Lanham, MD: Lexington. p. 180.

个行业十分复杂,在充满不稳定性的同时,又能让工作者产生满足感;既有风险,也有收获,尽管多学科方法对于思考其复杂性很有必要,但是马克思对于工作内在逻辑的洞见,为我们理解塑造文化工作的结构力量提供了基础。

马克思的基本概念<sup>①</sup>对于研究工作和工人生活转型提供了富有意义的视角。我认为,对于导致文化工作日益不稳定的过程、实践和结构,动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能够做出解释,特别是剥削依然是推动文化产业转型的关键过程,也能够展现文化工人的相对自主性正在被削弱的方式。我将以对自由作者的研究为例对此进行探讨。自由作者是加拿大传媒劳动力中不断壮大的一支队伍。<sup>②</sup>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摆脱雇佣关系(或是被雇佣关系否定,这正日益成为一种标准)并不意味着能够脱离剥削或者劳资对抗。资本家以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创造剩余价值,<sup>③</sup>而依靠自由劳动力的现代企业则通过其他方式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包括延长劳动时间和野蛮获取版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过程导向的和历史的,它关注工人的能动性,追求自主性,这都为研究文化工作的现状提供了洞见。有关文化工作的研究可以汲取唯物主义方法和把文化工作当作斗争场所的方法中的精髓,其中唯物主义方法把文化工作置于与资本主义的动态关系中考察。包括产业。国家。培训机构、学者和工人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媒体工作者必须接受并适应这个产业的各种不确定因素。<sup>④</sup>马克思主义方法则打破了这种思维模式,解释了文化工作的本质,分析了其演变的过程。接下来,我将首先搭建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化工作的框架,以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讨论本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可能性;然后通过自由作者的

---

① 马克思理论的其他方面对于理解文化劳动十分有用,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The Grundrisse*)。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Marxist*)用这本书中的观点来审视当代资本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一般知识(*general intellect*)、以及工人们的情感和个性纳入积累的过程。但我在本文中主要关注马克思的“老”概念(Ursula Huws,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 135),这些概念在传播学和文化研究中关注的人比较少。

② 这项研究基于对加拿大 200 名自由作者的定性研究和自由作者组织代表的访谈。除特殊说明之外,本文中的引用都是匿名研究对象提供的。

③ Karl Marx. ([1867]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645.

④ 参见 Angela McRobbie. (2002) *From Holloway to Hollywood: Happiness at Work in the New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Analysis and Commercial Life*, edited by Paul du Gay and Michael Pryke, 97—114. London: Sage; Mark Deuze. (2007) *Media Work*. London: Polity; 和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p. 7.

案例研究,分析剥削工人无偿劳动时间和版权的动态过程;最后讨论将文化工作作为斗争场所的观点如何揭示文化工作的转型。

## 二、回归马克思:文化工作的政治经济学

文化工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劳资关系的动态,影响这一关系的张力与矛盾,对控制和剥削的斗争,以及权力与抵抗中的问题。这种方法来源于这样一种理解:实践与过程都处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中。在这一情境下,工人缺乏生产资料,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养家糊口,被卷入剥削剩余价值的自愿关系(consensual relationship)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还原论(reductive),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辩证的思想家,关注“过程、流动、变化和关系”,而不是分析结构与事物。<sup>①</sup>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构成和维持并发展的过程,<sup>②</sup>解释了“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同元素之间丰富的动态的关系”。<sup>③</sup> 他的概念抓住了推动变化和不稳定的动态关系和矛盾,而变化和不稳定性是资本积累的天生特点。<sup>④</sup>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文化工作的分析同文化产业的历史发展进行对话。文化产业目前并没有完全形成,但却是文化如何生产和工作如何组织这两个问题长期争论的结果。文化工作具有变数多、项目制和不稳定的特点,而历史的、过程导向的视角揭示出,随着资本主义动态变化而转型的传媒和文化产业,是如何产生上述这些理所当然的特点。最近,资本主义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由福特主义式的大规模生产向灵活积累的(flexible accumulation)方式<sup>⑤</sup>转

① David Harvey.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Malden, MA: Blackwell. p. 49.

② Ibid, p. 50.

③ David Harvey.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p. 12.

④ David Harvey.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Malden, MA: Blackwell. p. 54.

⑤ 哈维使用灵活积累这个词来描述从上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开始的一种渐变的积累过程,其特点是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方式,还有信息署和财务服务的兴起(参见 David Harvey.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Malden, MA: Blackwell. p. 147)。沃斯科(Vosko)认为,这个词比“后福特主义”要好,因为它强调了“变化中的延续”(参见 Leah F. Vosko. 2010. *Managing the Margins: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86),或“大生产体系中某些方面的延续,这些延续随着新生产技术和生产更专业化而产生,与福特主义相关”(参见 Leah F. Vosko. 2000. *Temporary Work: The Gendered Rise of a Precarious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 27)。

变,这种积累方式是围绕精细化生产、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撤销管制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而展开的。<sup>①</sup> 在这一背景下,文化产业发生重大变革,也影响了工人的经历。<sup>②</sup> 比如,人们都以为文化行业的工人具有“无边界”和“组合式的职业生涯”(portfolio careers),也就是说他们通常以项目的形式,同时为多个雇主工作。<sup>③</sup> 然而,这种组合的方式通常只是被描述为文化工人的内在特点之一,而不是他们应对工作不稳定的一种策略。后者明显无法吸引读者,但却是将工作安排同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动态联系在一起。在多数对文化工作的解释中,资本主义在影响文化工作和权力关系中的作用都很模糊,而将文化工作直接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重新肯定了研究媒体、文化和传播的唯物主义方式。

马克思的观点在文化研究中常被忽略,因为他没有关注工人的主体性,而主体性又是文化工作的一个关键要素。文化工作“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传播意义,这也是一个关于认同和快乐”<sup>④</sup>的行业。的确,主体性是所有工作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把工人的主体性融入生产当中。<sup>⑤</sup> 在思考资本包容工人抵抗的局限性,以及为什么文化工人选择以特别的方式集体组织起来、如何组织起来的时候,主体性的作用更加重要。<sup>⑥</sup> 然

① Kim Moody. (1997)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London: Verso 和 Gregory Alba. (2010) The “New Economy” and Capitalism Today. In *Interrogating The New Economy: Restructuring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Norene J. Pupo and Mark p. Thomas, 3—2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② 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0.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Their Impact on Employmen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Labour-management Relations*. Geneva: ILO.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dialogue/sector/techmeet/smei00/smeir.htm>.

Anna Gough-Yates. (2003) *Understanding Women's Magazines: Publishing, Markets and Readerships*. London: Routledge.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Mark Deuze and Leopoldina Fortunati. (2011) Atypical Newswork, Atypical Media Management. In *Managing Media Work*, edited by Mark Deuze, 111—120. London: Sage.

③ Charles Leadbeater and Kate Oakley. (2005) Why Cultural Entrepreneurs Matter. In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John Hartley, 299—311. Malden, MA: Blackwell.

John Hartley. (2005)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John Hartley, 1—40. Malden, MA: Blackwell.

④ Jim McGuigan. (2010) Creative Labour, Cultural Work and Individu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6(3). p. 326.

⑤ Nick Dyer-Witheford and Grei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4.

⑥ Greig De Peuter.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4): 417—425.

Nicole S. Cohen. (2011)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 17 & 18: 119—138.

而,哈维指出,仅仅从工人的主观劳动经历很难理解当代文化工作。<sup>①</sup>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类劳动的客观条件,或者说“工人被迫应对和防御抵抗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才是在每次转变时影响他们的表现力(manifest forces)”。<sup>②</sup>

这个方法源于马克思,他指出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③</sup> 当然,如果仅仅从文化工人的数量增多、教育和培训项目扩展,以及工作竞争愈加激烈的角度来看,文化工作似乎可以给人们带来成就感,也会给人一种创作自主性的感觉,但是这类工作通常是很不稳定,工资很低甚至没有工资。<sup>④</sup> 要理解为什么人们以特定方式理解这类工作,我们需要扩展视野,从个人经历走出来,将文化工人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在同把他们的劳动力商品化的条件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方法将工人作为参与生产动态过程的积极主体,他们向权力关系提出挑战,而不是简单“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sup>⑤</sup>

为了同更广泛的社会总体性(social totality)和资本主义劳动条件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把文化工人当作是完全独一无二的工种。比如,麦克·韦恩(Mike Wayne)将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对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工人之间的关系概念作出详细阐释。<sup>⑥</sup> 他认为,“创造性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更广泛社会条件是一种集体关系(collective relationship),这种关系处于资本和‘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sup>⑦</sup> 在研究发达的资本

① David Harvey.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p. 113.

② 同上书。这里更加强调整来源。

③ 参见 Karl Marx. ([1852] 1978b)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66—135. New York: Norton. p. 595.

④ Kelly Hill and Kathleen Capriotti. (2009) *A Statistical Profile of Artists in Canada*. Hill Strategies Research Inc., February.

Ross Perlin. (2011) *Intern 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 London: Verso.

Liam Lacey. (2011) *Screenwriting: It's a Terrible Job But Everybody Wants To Do It*. *The Globe and Mail*, July 7, R1.

⑤ Bridget Conor. (2010) 'Everybody's a Writer' Theorizing Screenwriting as Creative Labour. *Journal of Screenwriting* 1(1): 27—43.

⑥ 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⑦ Ibid, p. 7.

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人时,他借用了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对知识分子阶级性质的理论化——“他们这类人的主要活动是阐释和传播思想”。<sup>①</sup> 赖特认为,知识工人(intellectual workers)无法控制别人的劳动,也无法“真正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从经济层面看,这些工人处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从意识形态来看,他们处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sup>②</sup> 文化工人也处于这种矛盾的位置,因为他们被整合进资本主义,拥有“文化特权、相对独立的工作场所和(通常情况下)薪酬水平”,因此与工人阶级有区别,但他们不是资本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地位,不断强调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低于他们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类似剥削并被无产阶级化”。<sup>③</sup> 我将证明,文化工人作为劳动力的状态正在以快速的步伐不断强化。

虽然工人之间有显著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是绝对的。相反,我们可以把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工人视为社会阶级和经济阶级中的不同部分,他们必须出售自己劳动力才能生存。<sup>④</sup> 而资本的目的,是要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建立等级结构,马克思强调,“资本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社会统一的劳动能力,其中的特定角色只是整体劳动的一个部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工作都是服从于更宽泛的剥削。<sup>⑤</sup> 对文化工作的这种认识,保留了劳动与资本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媒体形式、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变革。资本的“内在动力”<sup>⑥</sup>是要以降低劳动成本来追逐剩余价值,这与工人追求有意义的工作、获得体面的工资以及维持自己生活的愿望是相冲突的。

---

① Erik Olin Wright. (1978) *Intellectual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ited by Pat Walker.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p. 192.

② Erik Olin Wright. (1978) *Intellectual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ited by Pat Walker.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p. 106, 204.

③ 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p. 23.

④ 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3–2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⑤ 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p. 15.

⑥ Karl Marx. ([1867]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437.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没有将文化工作当作一种特殊的工种。它拒绝将文化工人的行为视为是受他们的艺术气质、个性和无尽的“创造欲”驱动，而是将这些行为同他们工作的政治经济背景相联系，<sup>①</sup>比如市场经济、监管机构、国家政策和雇佣政策、行业组织、工资、工会保护等，都影响着工人的行动和经验。要想充分认识文化工作，我们应该应把文化工作“恒久特点 (enduring features)”，如风险和不稳定性，与对构建这些动态政治经济背景的历史分析结合起来。<sup>②</sup>

这一分析的关键是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它是指一个群体(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被另一个群体(资本家)所控制。<sup>③</sup>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产生于对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压榨。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源于将一天中的工作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工人出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赚取自己的工资，在第二部分中，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家生产利润。<sup>④</sup> 正是这种对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剥削，推动资本积累，引起了阶级冲突。正如苏珊·希梅尔韦特 (Susan Himmelwit) 写道：“资本主义的生产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斗争史，资本想要不断增加，工人阶级抵抗剩余价值率的提高”。<sup>⑤</sup>

剥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把对立与抗争联系在一起：那些剥削工人的人同时依靠工人实现剩余价值，这就为工人赋予了权力，是“内在的抵抗力”。<sup>⑥</sup>

① Richard E. Caves. (2000)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

Susan Christopherson. (2009)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Risk, Adapt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xclusionary Network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72—9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74.

② 参见 Susan Christopherson. (2009)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Risk, Adapt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xclusionary Network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72—9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Bernard Miège.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③ Susan Himmelwit. (1983) Exploitation.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57.

④ Susan Himmelwit. (1983) Surplus Value.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74.

⑤ Ibid.

⑥ Erik Olin Wright.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5.

剥削过程包含工人组织、抵抗和对自主工作的追求。自主论马克思主义 (autonomist Marxism) 认为,资本总是要面对工人的抵抗,并做出应对,这就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sup>①</sup> 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过程,而是要对工人组织和斗争做出应对的动态和结构性 (constitutive) 过程。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现的,“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盲目崇拜 (fetishism), 它模糊了剥削中剩余价值的本质,这对于资本家和工人都一样”。<sup>②</sup> 文化工作中的劳资关系被掩盖的原因很多,包括在赋权风险情况下选择追求文化工作、企业越来越多地强调文化工作,以及基于个人关系的文化工作会掩盖经济关系。<sup>③</sup> 剥削关系如此模糊,以至于人们似乎常常认为文化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进而引发关于“爱的劳动 (labor of love)” 的表述,抢占了对权力关系的讨论。<sup>④</sup> 回归马克思可以揭示出弥漫在文化工作中对资本主义对立和社会关系的讨论。传统上,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下一节中,我将回顾劳动过程理论对文化工作的相关研究。

### 三、劳动过程理论和文化工作

劳动过程理论源于哈里·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sup>⑤</sup>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他批判了该制度下的工作组织,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损于工人的技能。布雷弗曼借鉴马克思的思想,试图理解现代工作中的矛盾。现代工作一方面需要增加对工人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更大的不满。

---

① Harry Cleaver. (2000)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d Edinburgh: Anti/Theses and AK Press.

② David Harvey.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p. 113.

③ Isabell Lorey. (2009) *Governmentality and Self-Precarization: On The Norm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ers*. In *Art and Contemporary Critical Practice: Reinventing Institutional Critique*, edited by Gerald Raunig and Gene Ray, trans. Lisa Rosenblatt and Dagmar Fink, 187—202. London: MayFly Books.

Gina Neff, Elizabeth Wissinger, and Sharon Zukin. (2005) *Entrepreneurial Labor among Cultural Producers: 'Cool' Jobs in 'Hot' Industries*. *Social Semiotics* 15 (3): 307 - 334.

Carol Ekinsmyth. (2002) *Project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nd Risk in Magazine Publishing*. *Regional Studies* 36 (3): 229—243.

④ Andrew Beck. (2003) *Introduction: Cultural Work, Cultural Workplace—Looking at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1—6. London: Routledge.

⑤ Harry Braverman. ([1974] 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布雷弗曼介绍了劳动过程是如何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并被其塑造的:资本家为了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价值,不断控制着工作;这种劳动过程被不断合理化,首先在工厂、然后在办公室。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从创造有用的东西转变为扩大资本的过程。竞争和积累的结构动力推动资本家不断改进生产,提高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这帮助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正如马克思写道,“资本……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和不变的趋势,就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能够降价商品价格,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降低劳动者本人”。<sup>①</sup> 这个过程是通过在劳动过程中应用新技术和科学管理原则来实现,这两方面把工作分成不同组成部分,降低工人技能,将思想与行动分离,使工作处于管理控制之下。<sup>②</sup>

布雷弗曼认为,资本主义把广大工人简化为一个同质的群体,其中具体的工人可以互相替换,也无需专门培训。他关于退化工作(degraded work)的观点在某些情况被带入数字化时代。例如,数字化时代的计件工作越来越多,其中的脑力劳动,如研究、翻译和设计,都被分解成小任务,通过远程工作的形式,以极低的薪酬外包给为 Mechanical Turk 网站,ODesk 网站和 Microtask 网站工作的人。然而,劳动过程理论研究文化工作,特别是其中的创意环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原因之一在于劳动过程理论主要关注工作场所,关注雇佣关系中工人,而文化工人则处于这些结构之外。此外,文化工人看似不需要强迫自己完全投入工作,或者为了低工资长时间工作。<sup>③</sup> 最后,文化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获得了相对自主性,这一观点似乎对劳动过程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

迈克尔·迦南(Michael Chanan)<sup>④</sup>和比尔·瑞恩(Bill Ryan)<sup>⑤</sup>回顾了

① Karl Marx. ([1867]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p. 436—437.

② Harry Braverman. ([1974] 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49, 118.

③ Gillian Ursell. (2000) Television Production: Issues of Exploit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UK Television Labour Marke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6): 805—825.

Angela McRobbie. (2002) From Holloway to Hollywood: Happiness at Work in the New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Analysis and Commercial Life*, edited by Paul du Gay and Michael Pryke, 97—114. London: Sage.

④ Michael Chanan. (1976) *Labour Power in the British Film Indust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Michael Chanan. (1983) Labour Power and Aesthetic Labour in Film and Television in Britain. In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iberation, Socialism*, edited by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 317—33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⑤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艺术和艺术实践(artistic practice)向文化产业商业化劳动的转变过程,二人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审美劳动(aesthetic labor)概念——这种劳动形式不同于其他商品生产,很难把作者同他们的作品完全分开。当艺术实践被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逻辑中,就会产生“艺术与资本的矛盾”,这是文化向资本转变过程中内在冲突的来源。<sup>①</sup>从历史上看,文化商品有使用价值,这些商品必须保留原创者的痕迹,尤其是对于“特定的人”或个性化的劳动,原创者的名字与作品是联系在一起的。<sup>②</sup>就像瑞恩说的,“每本书都有一位作者,每段音乐都有一个谱曲家,每部电影都有一位剧作者和导演……这与桃罐头和汽车不同……这些商品买家完全不知道它们的直接生产者是谁。艺术家必须参与实名的、具体的劳动”。<sup>③</sup>即使是那些并不是“明星”的文化生产者也因为他们可被识别和表达的能力而拥有价值,他们这些能力的可识别性和表达性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sup>④</sup>这样的文化工作者被看作是一个小圈子,在这里面借助自己的知名度就能获取高额报酬<sup>⑤</sup>——他们也应该因为自己的“辨识能力和表达能力”而受到尊重,这些能力文化工作的创造过程可以分解为不同组成部分,对具体劳动的要求限制了这一观点的应用范围,因此文化工作往往能够在创意阶段(创意并生成符号)给予工人相对自主权,同时严格控制文化产品的复制、发行和流通。<sup>⑥</sup>迦南写道,“文化形式的内容是最不可能被机械化的”。<sup>⑦</sup>机器无法取代生产原创文本的工

①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34.

②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3—2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12.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136.

③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45.

④ Ibid, p. 44.

⑤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p. 199.

⑥ Michael Chanan. (1976) *Labour Power in the British Film Indust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ernard Miège.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⑦ Michael Chanan. (1983) *Labour Power and Aesthetic Labour in Film and Television in Britain*. In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iberation, Socialism*, edited by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 317—33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p. 318.

人,其他人如果不改变文本,也无法取代这些工人。<sup>①</sup>这就使资本的生产过程变得复杂了。通常情况下,资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要求把具体劳动——特定工人拥有的具体技能或任务——缩减到平均水平,这样一来,谁做这份工作就不重要了。理想情况下,个体劳动者被转化为抽象劳动:在生产中可以任意替换,商品形式掩盖了工人的具体贡献。资本就是要区分管理和执行,把工人的专业知识和多样的技能简化为简单的劳动。<sup>②</sup>

承认文化工人在生产中获得相对自主性的结构倾向,会使文化工作研究脱离劳动过程分析。<sup>③</sup>如果文化工人能够真正控制他们的劳动过程和产品,那么劳动过程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似乎不再适用。许多文化工人非常自觉,他们为了追求职业成长,“给自己安排”工作、在工资很低的情况下长时间劳动、接受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sup>④</sup>从这个观点来看,管理者不需要激励文化工人或者提高生产力,这些工人通常会自我剥削(self-exploit)。识别出自我剥削是揭露权力运作多种方式的关键,但会掩盖真实的剥削关系,几乎让资本逃脱干系。

希拉·科恩(Sheila Cohen)指出,劳动过程理论不那么容易回避。她认为,布雷弗曼之后的劳动过程争辩过于关注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忽略了剥削

① 表演艺术的形体本质(embodied nature)应该能够对这一观点做出最好的证明。正如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和威廉·博文(William Bowen)写的,改变表演者的训练和具体情况“会影响他提供的服务。”表演者与制造业工人不同,他们“不是原材料和商品之间的中介,他们的活动本身就是消费者的商品”,因此,具体工人不能与他们的表演工作分开(参见 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 1966. *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 164)。

② Harry Braverman. ([1974] 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David Harvey.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p. 57.

③ 以下这些四个研究属于例外,包括 David Murphy. (1991) *Journalis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White-Collar Production Workers*. In *White-collar Work: The NonManual Labour Process*, edited by Chris Smith, David Knights, and Hugh Willmott. 139—161. London: Macmillan, Yung-Ho Im. (1997) *Towards a Labour-Process History of Newswriters*. *Javnost/The Public* 41(1): 31—48, Gillian Ursell. (2000) *Television Production: Issues of Exploit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UK Television Labour Marke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6): 805—825 和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3—2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④ Angela McRobbie. (2002) *From Holloway to Hollywood: Happiness at Work in the New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Analysis and Commercial Life*, edited by Paul du Gay and Michael Pryke, London: Sage, p. 101.

Gillian Ursell. (2000) *Television Production: Issues of Exploit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UK Television Labour Marke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6): 805—825.

的过程,这才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sup>①</sup>“构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主要动力”不是控制,而是剥削、是生产资料所有者、还有阶级。<sup>②</sup>她还强调,劳动过程理论关注的是稳定物价(?) (valorization) 和剥削,这是资本主义积累和生产的动力,紧密围绕在榨取工人剩余价值这一基础结构周围。说劳动过程是政治,不是因为这一过程是“不断争夺管理统治的权力斗争”,而是因为它是“剥削和获取剩余价值这一中心动态的场所”<sup>③</sup>。这意味着,只要不妨碍剥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是可以放弃的。事实上,为了适应价值增值这一资本主义的总体目标,工作不断受到调整<sup>④</sup>,放弃对某些工人劳动过程的控制与资本积累的需求完全一致。这包括工厂车间中的赋权策略,<sup>⑤</sup>新媒体公司营造“有趣”工作环境来捕捉工人的创造性和情感潜力,以及利用工人“自由的思想 and 冲动”提高生产力。<sup>⑥</sup>从某种角度看,放松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延长工作日这种古老策略的延续。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指出,面对新媒体公司有趣愉悦的办公室,“谁还愿意回家呢?”<sup>⑦</sup>

把生产合理化还有更多、更明显的例子,文化工作就是一个典型。以前,人们通常认为文化工作不会把作者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合金娱乐公司(Alloy Entertainment)是为出版商提供图书项目的公司,每年针对青少年女性推出30本书。这个“图书工厂”<sup>⑧</sup>不寻常之处不是其为迎合大规模市场(mass-market)而采纳的公式化情节和普通修辞,而是生产每本书的劳动组织方式:会议中头脑风暴产生图书创意,一位编辑拟定故事情节,一个临时选择的作者撰写具体章节。作者与编辑密切合作,不断拓展情节、编写更多章节。合金娱乐公司向出版商出售这些章节、图书梗概和封面图片,并保留所有的知识产权。图书作者通常

① Sheila Cohen. (1987) A Labour Process To Nowhere? *New Left Review* 165(October): 34—50.

② Ibid, 35, 66.

③ Ibid, 39.

④ 参见 Harry Braverman. ([1974] 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⑤ 参见 Kim Moody. (1997)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London: Verso.

⑥ 参见 Andrew Ross. (2003) *No Collar: The Human Workplace and its Hidden Cos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 19.

Nick Dyer-Witheford, and Grei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⑦ Andrew Ross. (2001) No-Collar Labor in America's 'New Economy'. *Socialist Register* 37: 78.

⑧ Alana Semuels. (2008) Book Publisher Finds Teen Lit Adapts Well in Hollywood.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8/aug/02/business/fi-alloy2>)

会用公司的笔名,而非原作者的真实姓名,有时候也会用代笔团队的名称。<sup>①</sup>这可能是文学生产合理化的一个极端个案,但为我们展示了资本如何生产赚钱的产品,如何根据需要赋予创意工人相对自主权。根据合金娱乐公司的模式,谁来写这本特定的书并不重要。在以前,作者代表着作者名字出现的一种特权,而现在,作者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而且并不会因为他们的作品而受到尊崇往往与他们的作品脱离了。

劳动过程分析从马克思那里吸取了动态概念之后,仍然是研究文化工作的有效方法,也为研究文化工作的各种具体形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劳动过程理论关注资本积累的过程,它是一个研究的起点(critical line):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已经彻底渗透到文化产业,如果剥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础,那么这个动态在文化工作如何体现?如果文化工人在创意阶段获得相对自主权,那么资本如何应对?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会加强对那些在生产中无需相对自主权工人的管制,这就在文化产业工人中制造出地位、工作质量和物质条件的分裂。随着技术变迁,文化工人的相对自主性进一步受到侵犯,对于自由作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追求享有自己作品的自主权。对自由作者的个案研究揭示了这种张力。

#### 四、案例分析:自由作者

从表面上看,自由作者似乎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没有联系。他们在法律上被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为多个客户提供一次性的劳动成果,或者受聘参加短期项目。他们为杂志、报纸、书籍写文章,为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写材料。<sup>②</sup>自由作者在文化生产中的劳资关系常常被掩盖,因为自由作者并没有参与雇佣关系,也没有固定工资,看来他们只是出售一件完成的劳动成果,或者说是“已经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sup>③</sup>而非生产这件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但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也是计时工资的一种形式,这种支付形式

---

① Rebecca Mead. (2009) *The Gossip Mill: Alloy, the Teen-Entertainment Factory*.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9:62—71.

② 我研究的自由作者大多是自由记者(freelance journalists),他们为不同的报纸、杂志和在线新闻机构写文章。然而,因为单纯依靠自由记者这份工作难以维持生活,许多自由作者扩展了工作范围,为不同行业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务。因此,我使用自由作者这个广义的称呼。

③ Karl Marx. ([1867]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692.

“没有改变其本质”,它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sup>①</sup> 自由作者的文化工作核心还是剥削关系。

从历史上看,计件工资是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的一种方法。<sup>②</sup> 但对于文化工人来说,从事自由职业能够摆脱雇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自己掌握在哪里工作、何时工作、用什么工作、和谁工作,以及如何工作。加拿大的自由作者主要在媒体行业工作,尽管这一行业能够不断盈利<sup>③</sup>,但近三十年里他们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税前平均工资只有2.4万加元<sup>④</sup>。我对加拿大各地200名自由作者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45%的受访者通过自由写作挣得的收入不到2万加元(税前),这些受访者中71%表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自由写作。

自由撰稿一方面代表了工人的终极自由<sup>⑤</sup>,另一方面也是资本的理想安排。企业由此可以不必承担雇佣员工的压力,省去了培训成本、运营费用和各种福利,也不用为非生产时间支付费用,只需要为短期项目雇佣工人或采购成品:一篇文章、一份研究或者一次设计。生产的风险和成本就落到工人身上,他们必须不停地找工作,并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因此不得不努力生产最好的作品。他们不断讨价,降低自己的劳动力成本,这样一来就为资本提供了充足的选择。这样的安排能够带来创意生产的相对自主性,但同时也推动企业探寻新的方法来追逐剩余价值。对出版商来说,媒体工作中的临时工使剥削变得更简单了,它提高了工作的竞争,降低了工人的安全感,同时也压低了工资。

马克思对计件工资的观察指出了自由职业中的矛盾:<sup>⑥</sup>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计件工资一方面给予个人以个性,以及伴随其中的自由、独立和自我控制的感觉,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

① Karl Marx ([1867]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p. 693, 696.

② Ibid, p. 698.

③ Dwayne Winseck. (2010)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Crisis of the Media': The Rise and Fall of (Some) Media Conglomerates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3): 365—393.

④ 加拿大职业作家协会(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PWAC)调查了85位自由撰稿人,他们大多是全职作家,这意味着写作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参见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⑤ Daniel H. Pink. (2001) *Free Agent Nation: How America's New Independent Workers are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Live*. New York: Warner.

⑥ Karl Marx ([1867]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697.



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倾向,在把个人工资提高至平均水平以上同时,降低了平均工资本身。

这体现了劳资关系的辩证性:工人不断抵制剥削,而资本不断调整来应对工人的抵抗。哈维(Harvey)写道,“如果一定程度上合理的工人自治能够更好确保工人的价值生产力(value productivity),那么就这样吧。如何保持和加强劳动力的生产力对于资本来说很有可能是无所谓的。”<sup>①</sup>越来越多的资本通过剥削自由作者的无偿劳动时间和他们作品的版权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力价值。我将依次分析每一个案例。

## 五、临时用工和对无偿劳动时间的剥削

从传统来看,自由职业为记者提供了一种摆脱雇佣关系和常规新闻生产局限性的方法,他们能够追求更富创造性、实验性、或有趣的写作。以前,这种方法对于一小部分记者来说,是他们利用自身技能获得垄断地位、并建立自由职业生涯的一种策略。然而在今天,随着媒体工人被临时雇佣,这已经成为一种核心商业模式。公司将更多的商业风险和成本转嫁到工人身上,尽管他们的工资很低,却进一步削弱了他们享有的自主权。

目前已有很多关于就业形式不稳定的文献研究。<sup>②</sup>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向新自由主义转型,及其引起的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和就业调整,<sup>③</sup> 文化产业的雇佣关系从全职、稳定的形式向多种不稳定的形式转变,包括兼职、短工、临时工、合同工和自由职业者。<sup>④</sup> 其特点是工资低、没有福利、缺乏

① David Harvey.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p. 116.

② 比如 Leah F. Vosko. (2010) *Managing the Margins: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和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③ 参见 Leah F. Vosko. (2000) *Temporary Work: The Gendered Rise of a Precarious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和 Gregory Albo. (2010) "The 'New Economy' and Capitalism Today." In *Interrogating the New Economy: Restructuring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Norene J. Pupo and Mark P. Thoma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p. 3–20.

④ 参见 Graham Murdock. (2003) *Back To Work: Cultural Labor in Altered Tim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London: Routledge. Pp. 15–36.

Gerd Nies and Roberto Pedersini. (2003) *Freelance Journalists in the European Media Industry*. *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europe.org/pdfs/FinalReportFreelance.pdf>

Emma Walters, Christopher Warren, and Mike Dobbie. (2006)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A Global Survey and Case Study of Atypical Work in the Media Industry*. Switzerland: (转下页注)

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会保护受限,以及工作时间长。文化行业已经开始临时用工制了,从“内部的、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转化到依靠个人网络提供专业化的按需服务。<sup>①</sup> 这些变化都与公司策略有关,包括集约(concentration)、分散(convergence)、外包、工会力量削弱,以及临时用工形式的接受和扩展。全球劳动分工的调整也促进了这一变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灵活积累的链条。这个链条始于将生产中部分工作外包给世界上工资较低的地区,现在这些外包工作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知识、有信息和文化工人的家庭联系在一起。<sup>②</sup> 虽然文化行业在历史上曾有过非标准化工作形式,<sup>③</sup>但接受自由职业者、合同工或临时工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因为企业缩减用工,使劳动力市场充满大量自由职业者。<sup>④</sup> 文化产业不会长期雇佣工人,而是与文化生产者保持松弛的关系,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企业可以轻松地挑选。

这些文化工人“后备军”(reserve army)<sup>⑤</sup>缓解了文化企业的金融风险,因为风险被转移到个人。因为生产的创意阶段无法完全理性化,公司通过

---

(接上页注)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org/pdfs/ILOReport070606.pdf>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p. 3—28.

① 参见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Labour: Content, Contract and Control*.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29 和 Kelly Hill and Kathleen Capriotti. (2009) *A Statistical Profile of Artists in Canada*. Hill Strategies Research Inc., February.

② Ursula Huws. (2007) *Defragmenting: Toward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1(2):1—4.

③ 的确,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文化产业通常被认为是灵活的、以项目为基础的工作模式的典范。参见 Andrew Ross.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18—19 和 Angela McRobbie. (2004) 'Everyone Is Creative': Artists as Pioneers of the new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Tony Bennett and Elizabeth Silva. Durham, UK: Sociologypress. pp. 186—202.

④ 参见 Gerd Nies and Roberto Pedersini. (2003) *Freelance Journalists in the European Media Industry*. *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europe.org/pdfs/FinalReportFreelance.pdf>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Emma Walters, Christopher Warren, and Mike Dobbie. (2006)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A Global Survey and Case Study of Atypical Work in the Media Industry*.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org/pdfs/ILOReport070606.pdf>

⑤ Graham Murdock. (2003) *Back To Work: Cultural Labor in Altered Tim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London: Routledge. p. 22.

合同和自由职业者的地位,以相对自主性换取更高的价值,降低资本风险,减少劳动力成本,强化工作竞争。<sup>①</sup> 这些项目制的工作、短期合同和灵活的工作安排显示出文化工作的一些根本矛盾:这些关系给予工人生产创意作品所需的相对自主性和灵活性,而企业可以由此免去支付工资和劳动保障方面的福利。自主性的益处被这种不确定性破坏了。这种安排尽管源于政治经济动态,但却造成这样一种观念:要想成为文化工人,必须接受并适应间歇式的工作、低工资和不确定性,这样一来,“为艺术而煎熬”的浪漫想法不复存在,转而艺术成为工业化、高度资本化的文化产业。<sup>②</sup>

计件工人和自由作者通常按文章或者按字数计算费用(或像那种不幸的玩笑说的,“也许”是这样)。<sup>③</sup> 出版商向自由作者购买成品的故事,而对于开发和研究思路、设计故事情节和访谈所需的时间,以及编辑和改写的时间,他们都不支付费用。按字数任意付费的方式对于杂志和报纸很流行,但这种方式掩盖了撰写这些文字所需要的大量劳动。一位自由作者曾提到:“支付的费用往往并不等于你的工作。他们希望你出思想、做研究,却不给你钱。当你的故事被采纳,你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除此之外,自由作者还要保护自己的作品、自我提升、培训和提高技能,开发票和追账,以及从事其他维护职业生涯的各种任务。正如我在下面讨论,只要写出一篇文章,公司再生产的成本是最小的,但这些作品以不同形式被多次使用后,作者往往无法获得支付,或者说“文章中依然隐含了劳动力”。<sup>④</sup>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无偿劳动是资本的剩余价值之来源,是资本家对

①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48.

David Hesmondhalgh.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nd ed. London: Sage.

Chris Smith and Alan McKinlay. (2009). *Creative Labour: Content, Contract and Control*.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40.

② Pierre-Michel Menger. (1999) Artistic Labor Markets and Career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541—574.

Andrew Ross. (2000) The Mental Labor Problem. *Social Text* 18 (2): 1—31.

③ 参见 Paul William Kingston and Jonathan R. Cole. (1986) *The Wages Of Writing: Per Word, Per Piece, or Perhap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对于企业和非新闻的合同,自由职业者通常是按时间支付薪酬。

④ Guiseppina D'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238.

劳动力的剥削。<sup>①</sup> 由于劳动力被临时工化,剥削蔓延到整个文化产业。这让越来越多的工人同时做多份工作来维持生计,他们挣得的工资就远远低于生产作品所需要的时间。这些过剩的自由职业者和失业者(un-employed)、未充分就业者(under-employed)对于公司来说有巨大价值,因为激烈的竞争压低了工资。另一方面,空间化进程,或者说扩展到新空间的价值剥削,带来了新的剥削形式。对于自由作者来说,他们的住所是这种新空间<sup>②</sup>。媒体公司进一步把这种安排资本化,建立起依靠灵活、低廉或者免费劳动力的新商业模式,他们不必雇佣这些劳动力。例如,企业雇佣免费实习生代替付费工人(paid workers);作者拿到的稿酬由其作品在《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这类盈利网站转载的几率决定;职业记者纷纷被解雇,因为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样的主流新闻机构越来越依赖于自愿提交的内容;或者大量使用“众包”(crowdsourcing)<sup>③</sup>形式的“公民”记者。<sup>④</sup> 对版权的剥削补充了这些战略。

## 六、对版权的剥削

在数字化时代,自由作者的生计建立在脆弱的版权保护之上,公司对知识产权的严格控制正在侵蚀版权保护。普通工人放弃其产品的所有权,换

---

① 女权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家曾长期争论,无偿劳动时间、特别是妇女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对资本主义非常重要。参见 Marilyn Waring. (1999) *Counting For Nothing: What Men Value and What Women Are Worth*, 2<sup>nd</sup>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和 Dalla Costa, Mariarosa, and Selma James. (1972)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Bristol: The Falling Wall Press. 麦克彻(McKercher)在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和自由写作不稳定的工作之间的做出了重要联系,参见 Catherine McKercher. (2009) *Writing on the Margins: Precarity and the Freelance Journalist*. *Feminist Media Studies* 9(3):370—374.

② 参见 Vincent Mosco.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sup>nd</sup> ed. London: Sage.

③ “众包”是互联网带来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最早由在美国《连线》(Wired)杂志记者杰夫·豪(Jeff Howe)在2006年首次提出。它是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众包的任务通常是由个人来承担,但如果涉及到需要多人协作完成的任务,也有可能以依靠开源的个体生产的形式出现。——译者注

④ 参见 Ross Perlin. (2011) *Intern 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 London: Verso. *tripleC* 10(2):141—155.

Marissa Guthrie. (2011) CNN Cuts 50 Staff Members. *The Hollywood Reporter*, November 11.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cnn-cuts-50-staff-members-260737>

Farooq A. Kperogi. (2011) Cooperation with the Corporation? CNN and the Hegemonic Coop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Through iReport. *New Media & Society* 13 (2): 314—329.

取工资,<sup>①</sup>自由作者则与之不同。他们在加拿大的法律上被列为独立承包商,对自己写的文章享有著作权;出版社只能获得有限许可,只能在指定时间指定刊物上发表。<sup>②</sup>传统上,这是自由职业的一个福利,他们能够重复出售自己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低工资。<sup>③</sup>然而,这一传统做法现在受到了新技术和激进出版方式的冲击和破坏。

过去几十年里,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通信和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促使媒体公司和娱乐公司不断壮大和联合,并为媒体内容提供了一种通用的语言,加速了不同媒体平台的融合,同时也加深了企业对劳动力的剥削。<sup>④</sup>数字化使信息能够快速传递,信息复制也变得更加简单,尤其是在网络上,这意味着出版商可以把信息重新包装后,以多种形式发布。

加拿大的大多数期刊和报纸都隶属于几个大型连锁传媒机构,这些机构控制了一批整合媒体资产(integrated media property),他们热衷于搜寻能够在不同平台多次包装利用的信息。数字化帮助企业实现了集约(concentration)和融合的愿望,获取版权助长了这一过程,反过来又加剧了企业对版权的获取。<sup>⑤</sup>媒体机构的这些快速变化,直接影响了自由作者的收入,挤压了他们能够重新销售文章的市场。<sup>⑥</sup>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做法越来越普遍。罗杰斯传媒公司(Rogers

① Guiseppina D' 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4.

② 参见 Canada. (1985) *Copyright Act*. Department of Justice. S. 13. Accessed May 16, 2012.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2>.

Giuseppina D' Agostino. (2004) Should Freelancers Keep Their Copyrights in the Digital Era? *Copyright & New Media Law Newsletter* 8 (4). P. 6.

③ 参见 John Lorinc. (2005) *Creators and Copyright in Canada.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Creators in Quebec and Canada*. Report prepared for Creators' Copyright Coalition and Droit d'auteur / Multimédia-Internet / Copyright. p. 37. Accessed May 16, 2012. [www.creatorscopyright.ca/documents/lorinc-beaulieu.html](http://www.creatorscopyright.ca/documents/lorinc-beaulieu.html).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P. 41.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④ Vincent Mosco. (2003)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Canada*. In *Changing Canada: Political Economy as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Wallace Clement and Leah F. Vosko, 287—308.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⑤ Guiseppina D' 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20.

⑥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p. 35.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Media)是媒体巨头罗杰斯通信公司(Rogers Communication)的一个子公司,该公司2010年秋季开始,在不告知原作者的情况下,把自由作者为本公司杂志撰写的文章联合发布(syndicate)到其他网站,却没有向原作者支付费用。<sup>①</sup>同样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罗杰斯数字传媒公司(Rogers Digital Media)的高管们开始把联合发布作为公司的一项新措施,促进广告商阅读内容。公司表示,联合发布属于罗杰斯新合同的“推广”(promotions)条款范围内,所有作者都必须签署这一合同,它规定公司“有权在各种媒体形式推广自己的出版物和/或品牌时发布签约作者的任何作品和/或编辑过的版本”。<sup>②</sup>然而,作家组织则称这种对合同解释太宽泛,比如自由作家代理人德雷克·芬克(Derek Finkle)说:“多数作者不会把‘推广’理解为他们的作品首次刊登在罗杰斯出版物数月后,还会(在网站)联合发布。”<sup>③</sup>

该个案显示,出版商越来越想完全占有作者的版权,他们的作品“通过廉价的数字循环利用”能够带来新的利润。<sup>④</sup>这种策略与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解释<sup>⑤</sup>是一致的:工人挣得足够支付他们再生产的收入之后,资本家占有了她生产的价值的剩余部分,“对资本家来说,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多数大型出版商现在都与作者签署“精简”(streamlined)合同,合同规定所有作品的版权都是一次性的。<sup>⑥</sup>合同要求公司拥有作品的所有版权,也就是可以在未来以任何形式利用作品,这些任何形式包括他们还没有想出来的可能的媒介形式。这些合同通常是硬性的(non-negotiable)的,公司也不会为这些额外的权利支付费用。<sup>⑦</sup>根据公司及其传媒所拥有的不同股份(media hold-

① D. B. Scott. (2010) Rogers Syndication Practices Called Into Question by Canadian Writers Group. *Canadian Magazines*. October 2. <http://canadianmags.blogspot.com/2010/10/rogers-syndication-practices-called-into.html>

② Ibid, Story Board. (2010) Rogers Refuses to Remove Writer's Work from Yahoo. *Story Board*. November 30. <http://www.thestoryboard.ca/?p=142>

③ Ibid.

④ Guiseppina D'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239.

⑤ Karl Marx. ([1867]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London; Penguin Books. p. 325.

⑥ Guiseppina D'Agostino. (2005) Freelance Authors For Free: Globalisation of Publishing, Convergence of Copyright Contracts and Divergence of Judicial Reasoning. In *New Directions in Copyright Law*, edited by Fiona Macmillan, 1:166-215.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 166.

⑦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p. 35.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ings),这些权利可能包括翻译、数字化、改编和表演、重印、再次授权、促销,以及存储在电子数据库中。

目前的合同体系能够无限扩大对剩余价值的剥削。<sup>①</sup> 在经济学家看来,版权是鼓励创作者生产智力和艺术作品最主要的经济激励形式。<sup>②</sup> 然而,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来说,版权的主要功能是确保其拥有者独自享有剥削工人作品、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权力,他们在生产过程中获得了相对自主性。工人提供一次性的服务,企业不关注他们如何创作,因为真正的价值在于不断剥削已经完成的作品。一位自由作者说:“只要我完成工作,没有人关心我在哪里”。企业关心的不是完成一个项目所需的时间和步骤,即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是最终成品的所有权。这些最终成品可以重新发布、重新授权、重新利用,产生剩余价值,降低劳动成本。

资本主义通过生产榨取工人知识的技术而发展,资本主义以此来控制生产,提高效率,扩大剥削,<sup>③</sup>并继续以这种方式占有工人生产的信息。<sup>④</sup> 文化工作和资本之间的这个联系十分关键,但却很少有人研究,它被以下两点掩盖了:一是单独关注文化工人的自主权,二是没有看到被转化为私有财产的文本、图像、观念和符号是由劳动创造的。<sup>⑤</sup>

版权在加拿大等国已经成为斗争的前沿阵地。在北美,自由记者赢得了针对出版商的集团诉讼(class action lawsuit),这些出版商私自使用这些记者的作品,却没有支付稿酬。<sup>⑥</sup> 2007至2008年间,电影和电视剧作家罢工三个月,以为了赢得在DVD的销售和下载收入中拥有更大份额的剩余收益

① Guisepina D' 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241.

② 参见 Ronald V. Bettig. (1996) *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 7.

Ruth Towse. (2003) Copyright Policy, Cultural Policy and Support for Artists. In *The Economics of Copyright*, edited by Wendy J. Gordon and Richard Watt, 66—80.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③ Harry Braverman. ([1974] 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④ Christopher May.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xim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Labour. *New Political Economy* 7(3). p. 318.

⑤ Ned Rossiter. (2006) *Organized Networks: Media Theory, Creative Labour, New Institutions*.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p. 145.

⑥ Guisepina D' Agostino.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residual money*)。<sup>①</sup> 自由摄影师通过许可协议,有效推迟了《人物》(*People*)杂志 iPad 版的发布,摄影师要求如果他们的照片在杂志以外的页面使用时需要支付费用。<sup>②</sup> 像合金娱乐公司和五呷深处公司(Full Fathom Five)<sup>③</sup>这样的出版商转换了作家和出版商之间的版权关系,他们提前设计好故事情节,再雇佣作者以公司名义编写,并保留作品的所有权,一方面可以通过协议将这些故事出售给电影和电视,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合同防止作者对著作权的索取。<sup>④</sup> 随着数字化时代进一步发展,这些斗争将变得更加紧张和激烈。

## 七、结论: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文化工作的研究能够理出工作条件的不稳定性和在文化产业正在进行的广泛变革二者之间的联系,同时把工人当作能够与自身劳动条件抵抗、斗争和谈判的有主体性的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过程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它,我们就无法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新、旧表现形式,尤其是当传统的劳动被转换为临时雇佣,以及数字技术被用于变革生产方式之后。正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很善于把剥削隐藏于交换过程背后,在这方面它是独一无二的”<sup>⑤</sup>。

---

① Kevin Klowden and Anusuya Chatterjee. (2009) *Writers' Strike of 2007—200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Digital Distribution*. Santa Monica, CA: Milken Institute.

② Andrew Wallenstein. (2010) People Magazine iPad App Delayed by Paparazzi. *The Hollywood Reporter*. Accessed October 14, 2010.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exclusive-people-magazine-ipad-app-26788>

③ 弗雷(Frey)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作家,他成立了五呷深处公司,进军商业青年小说市场(commercial young adult fiction market)。弗雷雇用应届(和负债的)美术硕士(MFA)毕业生编写小说,每部作品支付作者 250 美元(一些作者完成后还能再多得 250 美元)。这些作者可以按一定比例从图书的所有收入中提成(如果选题来自弗雷,作者能够获得 30%;如果来自作者本人,他们能够获得 40%),包括从电视、电影和商品特许经营中获得的收入。作者不享有这些图书的版权,但需要对任何潜在的法律诉讼(legal action)负责。即使作者不再参与该项目,五呷深处公司依然有权决定是使用作者的姓名还是化名。作者对于公开使用他的照片和简介没有发言权,他们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如果“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承认为五呷深处公司工作”,将会受到 50000 美元的罚款。对弗雷来说,设计这些项目版权的条款是不可谈判的。参见 Suzanne Mozes. (2010) James Frey's Fiction Factory. *New York*, November 12. <http://nymag.com/arts/books/features/69474>。

④ Suzanne Mozes. (2010) James Frey's Fiction Factory. *New York*, November 12. <http://nymag.com/arts/books/features/69474>

⑤ Susan Himmelwit. (1983) Exploitation.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58.



充分理解文化工作的关键是探寻剥削如何影响工作和工人的生活。

在上面讲到的自由作者这个案例中,剥削是理解临时用工和疯狂追求版权的核心。对自由作者来说,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既换来了更灵活的雇佣形式,但同时也使得他们工作得更卖命,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低,因为资本家要更大程度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sup>①</sup> 虽然市场早就并长期影响作者们出售的产品,<sup>②</sup>但当出版商物色可以在多平台联合发布的“内容”时,这种市场压力进一步加剧。这些出版新实践限制了作者生产某些作品的可能性,包括那些需要研究、新闻调查,以及创造性或挑战性等需要长时间投入的作品。加拿大自由作者的经历体现了这些限制。我调查的作者中,一半以上最喜欢写长篇叙事特写、创作型纪实作品、散文和调查新闻报道。然而,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撰写这类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也很少能够获得足够的报酬。另一份报告指出,自由作者最想写的作品和写的最多的作品之间存在差异:他们最想把稿子投向期刊、图书和杂志,但写的最多却是为企业客户和杂志短文这些能够快速完成的作品。<sup>③</sup> 正如一位作者所说,“我的职业生涯建立在‘服务’新闻产业(‘service’ journalism industry)上。它为我买单,帮助我建立声誉,提升技能。但其实我更想写一些更有意义、同具体事件相关的文章。我写过一些,但这些我真正引以为豪的作品只有三、四个人愿意购买”。对于自由作者来说,最早促使他们走上自由职业这条路的是新闻工作,而今天,这已经成为只时间和金钱允许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这些问题对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提出了挑战。

马克思剥削概念的核心是对抗,资本主义生产在“本质上和结构上是充满斗争的场所”,<sup>④</sup>因此把文化工作当作斗争的场所非常有用,<sup>⑤</sup>一些文化工

①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② 参见 C. Wright Mills. (1956)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ul William Kingston and Jonathan R. Cole. (1986) *The Wages Of Writing: Per Word, Per Piece, or Perhap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③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④ Mike Wayn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⑤ 另外参见 Lee Artz. (2006)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Dialectic: Toward a Class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In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edited by Lee Artz, Steve Macek, and Dana L. Cloud, 5-51. New York: Peter Lang.

作研究也认可这一概念。文化工作中的斗争表现为“创意自主性的艺术欲望”和以利润为导向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sup>①</sup>也有一些更宽泛的观点认为,这场斗争是以劳动为重点,是对劳动力商品化和剥削的论争。马克思理论中的自主论理论很有用,它的理论起点是工人积极抵制资本主义剥削和围攻,工人的抵抗通常让其有希望摆脱资本的控制,但是资本也会对工人的抵抗做出应对——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又能产生与资本生产斗争的新战略和战术,进一步威胁资本主义。<sup>②</sup>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不断延伸,工人开始寻找有意义的和自主形式的工作。自主论认为,向灵活工作的转变部分是工人自己推动的。例如,格雷格·德·普特尔(Greig de Peuter)在他的“不稳定劳动角色”(precarious labor personas)模式中,发现了当代资本主义下不稳定性的空间,他认为,“自主工作者”,特别是自由职业的文化工人,一方面是迫于“自上的制度对灵活性的需求”,但同时也渴望这种类型的劳动安排。<sup>③</sup>他写道,“从系谱学角度看,自治工人无处不在,在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 production)过程中,追求弹性工作既是出于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也是出于对标准化工作的有意排斥。”<sup>④</sup>

从这个角度考量自由作者是很有意义的。新闻行业在19世纪末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化生产产业(mass industry),记者随之被无产阶级化,或者被纳入雇佣劳动制度,这一制度将新闻报道这一劳动(labor of reporting)标准化了。<sup>⑤</sup>为

① Mark Banks. (2007)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6.

Bill Ryan.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② Harry Cleaver. (2000)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d Edinburgh: Anti/Theses and AK Press.

Enda Brophy and Greig de Peuter. (2007) Immaterial Labor, Precarity and Recomposition.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191 - 207. Lanham, MD: Lexington.

③ 同时参见 Andrew Ross.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eah F. Vosko. (2010) *Managing the Margins: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d Hesmondhalgh and Sarah Baker. (2011) *Creative Labour: Media Work in Thre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Routledge.

④ Greig De Peuter.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4):419—420.

⑤ Smythe, Ted Curtis. (1980) The Reporter, 1880—1900: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News. *Journalism History* 7(1):1 - 10.

应对大众读者需求而引入的公式化新闻写作,对记者的独立性提出挑战,也降低了写作的艺术性。<sup>①</sup> 记者通过工会组织获得专业地位,但他们却因为匿名、工资依赖性和乏味的工作条件而变得颓丧。<sup>②</sup> 自由职业帮助记者摆脱沦为“无产阶级白领”(a white collar of proletariat)的局面<sup>③</sup>或者在新闻编辑室消磨时光。虽然现在自由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一种选择,但很多自由职业者都保留了这种精神,他们寻求自主性、开展有趣的和创造性劳动、灵活性以及对自己劳动力商品化的掌控。自由职业也代表了一种更加政治化的工作概念,同时也提出应该如何组织工作这个问题,暗示存在“拒绝工作”的激进概念和摆脱工资关系(wage relation)。正如安德鲁·贝克(Andrew Beck)<sup>④</sup>指出,自由文化工作既是“边缘的劳动”也是能够抵抗资本主义的最后场所。<sup>⑤</sup>

自由职业者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因为我们看到媒体行业不断把工作外包,国家憧憬在充满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的城市中满是个体工人,联合办公(co-working spaces)模式的扩张吸纳更多不需办公场所(office-less)工人,以及不会有工作不被完成的情况。<sup>⑥</sup> 然而,他们的工资普遍较低,收入也不稳定,并经历着日益加剧的不稳定性。这些情况表明,为了应对工人的抵抗,资本调整了策略,继续剥削这些看似摆脱工资关系的工人,这是劳资对

① James W. Carey. (1963)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In *The Sociology of Mass Media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Paul Halmos, 23—38. Keele: University of Keele.

② Smythe, Ted Curtis. (1980) The Reporter, 1880—1900: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News. *Journalism History* 7(1):1—10.

③ Arthur J. Kaul. (1986) The Proletarian Journalist: A Critique of Profession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2):47.

④ Andrew Beck. (2003) Introduction: Cultural Work, Cultural Workplace—Looking at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1—6. London: Routledge.

⑤ 《新探索》(*The New Inquiry*)主编在杂志中讨论不确定性的文章中指出,“我们许多人都在兼顾两个半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单独的无望的职业生涯之唯一的不好事情。”参见 *The New Inquiry*. (2012) *The New Inquiry*. February 1.

⑥ Sara Horowitz. (2011) The Freelance Surge 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Our Time. *The Atlantic*, September 13.

<http://www.fashionmagazine.com/blogs/society/2012/01/13/snps-word-of-the-day-precariat>.

Guy Standing.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De Peuter, Greig.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 (4): 417—425.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1/09/the-freelance-surge-is-the-industrial-revolution-of-our-time/244229>

抗的延续。

斗争进入了新层面,工人们开始集体组织起来,应对和抵抗工作中的不稳定性。除了在电影和电视行业建立工会,那些通常被认为是非劳动场所的行业,如模特行业、艺术行业和写作行业,也开始识别和挑战针对他们的剥削。一系列行业中的文化工人,接受了源于欧洲社会和抗议运动的“无产阶级”(precariat)这个词语,重申他们的工人地位。<sup>①</sup> 加拿大的自由作者在历史上曾组织过专业协会,现在再次回归工会,共同要求提高工资,并声讨带有剥削性的合同。<sup>②</sup> 美国的全国作家联盟(National Writers Union)组织“支付作者稿酬”活动,对互联网免费劳动力提出抗议,并为网络自由记者设定合理的工资范围。加拿大艺术家联盟(Canadian Artists' Representation/le Front des Artistes Canadiens, CARFAC)代表加拿大的视觉艺术家(visual artists),要求当他们的作品进行二次销售时,需要支付费用,因为他们的劳动力融在了作品中,而作品为卖家带来了剩余价值。<sup>③</sup> 在加拿大艺术家联盟的基础上,纽约市的艺术家组成了“更佳经济境遇下创作之艺术家”(Working Artists in the Greater Economy, W. A. G. E.)组织,要求当他们的作品在画廊展示时,需要为其中的劳动支付费用。同样在纽约,模特联盟(The Model Alliance)组成,他们要求把模特当作一种工作,并向那些支持模特“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sup>④</sup>的剥削关系提出挑战。<sup>⑤</sup> 这些运动的关键是文化工人要求署名,并应对针对他们的剥削。

文化工人开始集体组织起来的力量,对关心工人运动革新(labour movement renewal)的人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人试图通过实验组(experimental formation)的形式,把那些无组织的人组织起来。这些实验组可以作为在灵活的

① 参见 Prickett, Sarah Nicole. (2010) SNP's Word of the Day: Precariat. *Fashion*. January 13. <http://www.fashionmagazine.com/blogs/society/2012/01/13/snps-word-of-the-day-precariat>

Guy Standing.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De Peuter, Greig.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 (4): 417—425.

② Nicole S Cohen. (2011)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 17 & 18: 119—138.

③ CBC News. (2011) Visual Artists Vie for a Cut of Resale Profits. *CBC News*. November 28, 2011. <http://www.cbc.ca/news/business/story/2011/11/28/art-resale-right-carfac-auction-gallery.html>

④ 指以身体或虚拟形态进行的,生产或者调整情感的劳动,参见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293. ——译者注

⑤ Greig De Peuter. (2012) Modelling Workers' Rights. *Shameless*. <http://www.shameless-mag.com/stories/2012/04/modelling-workers-rights>

经济体系中组织不稳定工人的“测试案例”(test cases)。<sup>①</sup> 通过与工会建立联盟或组织工会以外的力量,他们提高了劳工工人对行业中存在的劳工斗争和权力关系的警觉性。这些工作的核心并非要回归标准就业形式,而是对政策改变决和,以及可以在任何特定工作场所以外建立工人权力的诉求,对把非标准化工作重新列为自主、灵活的且安全的工作的诉求。<sup>②</sup> 但是,这些努力是否能够支持劳工运动,并将文化工人政治化,这些组织是否可以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加强文化工作的个人主义和企业家精神,还有待继续观察。<sup>③</sup> 但这些努力表明一切正在改变,这对于劳动力政治和文化生产的方式有重要意义。

越来越多的文化工人开始组织游行示威,理解削弱文化工作自主权、进而破坏文化工作的剥削过程、实践和社会关系因此变得重要起来。仍有不少文化工人对未来抱着必然性和自我负责的想法,打破他们的这些观念是否必要和紧迫,而这需要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种研究视角把物质条件视为“始终活跃、始终不稳定,总是改变”的。<sup>④</sup> 简单讲,就是马克思那句最著名的话,重要的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sup>⑤</sup>

### 参考文献:

Abrahamian, Atossa Araxia. 2012. The 'I' in Union. *Dissent*. Accessed May 16, 2012. <http://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4094>

Albo, Gregory. 2010. The "New Economy" and Capitalism Today. In *Interrogating The New Economy: Restructuring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Norene J. Pupo and

① Greig De Peuter. (2010) Creative Economy Contested: Notes on Precarious Labour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Paper presented at Are We All Cultural Workers Now? Getting By In Precarious Times, Centre for Cultur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November 25—26.

② 参见 Greig De Peuter.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4):417—425.

Leah F. Vosko. (2010) *Managing the Margins: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参见 Atossa Araxia Abrahamian. (2012) The 'I' in Union. *Dissent*. Accessed May 16, 2012. <http://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4094>

Nicole S. Cohen. (2011)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 17 & 18: 119—138.

④ Lee Artz. (2006)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Dialectic: Toward a Class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In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edited by Lee Artz, Steve Macek, and Dana L. Cloud, 5—51. New York: Peter Lang.

⑤ Karl Marx. ([1888] 1978)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143—145. New York: Norton.

Mark p. Thomas, 3—2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rtz, Lee. 2006.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Dialectic; Toward a Class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In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edited by Lee Artz, Steve Macek, and Dana L. Cloud, 5—51. New York: Peter Lang.

Banks, Mark. 2007.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Banks, Mark. 2010. Autonomy Guaranteed? Cultural Work and the 'Art-Commerce Relation'.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14(3): 251—269.

Baumol, William J., and William G. Bowen. 1966. *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Beck, Andrew. 2003. Introduction: Cultural Work, Cultural Workplace—Looking at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1—6. London: Routledge.

Bettig, Ronald V. 1996. *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Braverman, Harry. (1974) 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ophy, Enda, and Greig de Peuter. 2007. Immaterial Labor, Precarity and Recomposition.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191—207. Lanham, MD: Lexington.

Canada. 1985. Copyright Act. Department of Justice. Accessed May 16, 2012.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2>.

Carey, James W. 1963.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In *The Sociology of Mass Media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Paul Halmos, 23—38. Keele: University of Keele.

Caves, Richard E. 2000.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BC News. 2011. Visual Artists Vie for a Cut of Resale Profits. *CBC News*. November 28, 2011.

<http://www.cbc.ca/news/business/story/2011/11/28/art-resale-right-carfac-auction-gallery.html>

Chanan, Michael. 1976. *Labour Power in the British Film Indust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Chanan, Michael. 1983. Labour Power and Aesthetic Labour in Film and Television in Britain. In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iberation, Socialism*, edited by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 317—33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Christopherson, Susan. 2009.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Risk, Adapt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xclusionary Network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72—9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Cleaver, Harry. 2000.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d Edinburgh: Anti/Theses and AK Press.

Cohen, Nicole S. 2011.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A Canadian Journal of Work and Society* 17 & 18: 119—138.

Cohen, Sheila. 1987. A Labour Process To Nowhere? *New Left Review* 165 (October): 34—50.

Conor, Bridget. 2010. 'Everybody's a Writer' Theorizing Screenwriting as Creative Labour. *Journal of Screenwriting* 1(1): 27—43.

D'Agostino, Giuseppina. 2004. Should Freelancers Keep Their Copyrights in the Digital Era? *Copyright & New Media Law Newsletter* 8(4): 6—8.

D'Agostino, Guiseppina. 2005. Freelance Authors For Free: Globalisation of Publishing, Convergence of Copyright Contracts and Divergence of Judicial Reasoning. In *New Directions in Copyright Law*, edited by Fiona Macmillan, 1: 166215.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D'Agostino, Guiseppina. 2010. *Copyright, Contracts, Creators: New Media. New Rul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Dalla Costa, Mariarosa, and Selma James. 1972.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Bristol: The Falling Wall Press.

De Peuter, Greig. 2010. Creative Economy Contested: Notes on Precarious Labour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Paper presented at Are We All Cultural Workers Now? Getting By In Precarious Times, Centre for Cultur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November 25—26.

De Peuter, Greig. 2011. Creative Economy and Labor Precarity: A Contested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5(4): 417—425.

De Peuter, Greig. 2012. Modelling Workers' Rights. *Shameless*.

<http://www.shamelessmag.com/stories/2012/04/modelling-workers-rights>

Deuze, Mark. 2007. *Media Work*. London: Polity.

Deuze, Mark, and Leopoldina Fortunati. 2011. Atypical Newswork, Atypical Media Management. In *Managing Media Work*, edited by Mark Deuze, 111—120. London: Sage.

Dyer-Witheford, Nick, and Grei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kinsmyth, Carol. 2002. Project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nd Risk in Magazine Publishing. *Regional Studies* 36(3):229—243.

Florida, Richard L.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 Leisure ,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Garnham, Nicholas. 1997. Concepts of Culture—Public Polic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Studying Culture*, 2<sup>nd</sup> ed. edited by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54—61. London: Arnold.

Gough-Yates, Anna. 2003. *Understanding Women's Magazines : Publishing , Markets and Readerships*. London: Routledge.

Guthrie, Marissa. 2011. CNN Cuts 50 Staff Members. *The Hollywood Reporter*, November 11.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cnn-cuts-50-staff-members-260737>

Hartley, John. 2005.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John Hartley, 1—40. Malden, MA: Blackwell.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Malden, MA: Blackwell.

Harvey, Davi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Malden, MA: Blackwell.

Harvey, David.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Harvey, David.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Hesmondhalgh, David.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sup>nd</sup> ed. London: Sage.

Hesmondhalgh, David, and Sarah Baker. 2011. *Creative Labour : Media Work in Thre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Routledge.

Hill, Kelly, and Kathleen Capriotti. 2009. *A Statistical Profile of Artists in Canada*. Hill Strategies Research Inc. , February.

Himmelwit, Susan. 1983a. Exploitation.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157—15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immelwit, Susan. 1983b. Surplus Value.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Laurence Harris, V. G. Kiernan and Ralph Miliband, 472—47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rowitz, Sara. The Freelance Surge 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Our Time. *The Atlantic*, September 13.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1/09/the-freelance-surge-is-the-industrial-revolution-of-our-time/244229>



- Huws, Ursula.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Huws, Ursula. 2007. Defragmenting: Toward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1(2):1—4.
- 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0.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Their Impact on Employmen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Labour-management Relations*. Geneva: ILO.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dialogue/sector/techmeet/smei00/smeir.htm>
- Im, Yung-Ho. 1997. Towards a Labour-Process History of Newswriters. *Javnost/The Public* 41(1):31—48.
- Kaul, Arthur J. 1986. The Proletarian Journalist: A Critique of Profession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2):47—55.
- Kingston, Paul William, and Jonathan R. Cole. 1986. *The Wages of Writing: Per Word, Per Piece, or Perhap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lowden, Kevin, and Anusuya Chatterjee. 2009. *Writers' Strike of 2007—200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Digital Distribution*. Santa Monica, CA: Milken Institute.
- Kperogi, Farooq A. 2011. Cooperation with the Corporation? CNN and the Hegemonic Coopta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Through iReport. *New Media & Society* 13(2):314—329.
- Lacey, Liam. 2011. Screenwriting: It's a Terrible Job But Everybody Wants To Do It. *The Globe and Mail*, July 7, R1.
- Leadbeater, Charles, and Kate Oakley. 2005. Why Cultural Entrepreneurs Matter. In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John Hartley, 299—311. Malden, MA: Blackwell.
- Lorey, Isabell. 2009. Governmentality and Self-Precarization: On The Norm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ers. In *Art and Contemporary Critical Practice: Reinventing Institutional Critique*, edited by Gerald Raunig and Gene Ray, trans. Lisa Rosenblatt and Dagmar Fink, 187—202. London: MayFly Books.
- Lorinc, John. 2005. *Creators and Copyright in Canada.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Creators in Quebec and Canada*, Report prepared for Creators' Copyright Coalition and Droit d'auteur / Multimédia-Internet / Copyright. Accessed May 16, 2012. [www.creatorscopyright.ca/documents/lorinc-beaulieu.html](http://www.creatorscopyright.ca/documents/lorinc-beaulieu.html)
- Marx, Karl. (1844)1978a.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sup>nd</sup>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594—617. New York: Norton.
- Marx, Karl. (1852)1978b.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sup>nd</sup>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66—135. New York: Norton.
- Marx, Karl. (1888)1978c.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sup>nd</sup>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143—145. New York: Norton.

Marx, Karl. (1867)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May, Christopher.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xim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Labour. *New Political Economy* 7(3): 317—342.

McGuigan, Jim. 2010. Creative Labour, Cultural Work and Individu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6(3): 323—335.

McKercher, Catherine. 2009. Writing On The Margins: Precarity and the Freelance Journalist. *Feminist Media Studies* 9(3): 370—374.

McRobbie, Angela. 2002. From Holloway to Hollywood: Happiness at Work in the New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Analysis and Commercial Life*, edited by Paul du Gay and Michael Pryke, 97—114. London: Sage.

McRobbie, Angela. 2004. 'Everyone Is Creative': Artists as Pioneers of the new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Tony Bennett and Elizabeth Silva, 186—202. Durham, UK: Sociologypress.

Mead, Rebecca. 2009. The Gossip Mill: Alloy, the Teen-Entertainment Factory.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9: 62—71.

Menger, Pierre-Michel. 1999. Artistic Labor Markets and Career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541—574.

Miège, Bernard.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ills, C. Wright. 1956.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dy, Kim. 1997.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London: Verso.

Mosco, Vincent. 2003.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Canada. In *Changing Canada: Political Economy as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Wallace Clement and Leah F. Vosko, 287—308.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sup>nd</sup> ed. London: Sage.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6. Editorial.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 493—497.

Mozes, Suzanne. 2010. James Frey's Fiction Factory. *New York*, November 12.

<http://nymag.com/arts/books/features/69474>

Murdock, Graham. 2003. Back To Work: Cultural Labor in Altered Times.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dited by Andrew Beck, 15—36. London:

Routledge.

Murphy, David. 1991. Journalis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White-Collar Production Workers. In *White-collar Work: The Non-Manual Labour Process*, edited by Chris Smith, David Knights, and Hugh Willmott, 139—161. London: Macmillan.

Neff, Gina, Elizabeth Wissinger, and Sharon Zukin. 2005. Entrepreneurial Labor among Cultural Producers: 'Cool' Jobs in 'Hot' Industries. *Social Semiotics* 15(3): 307—334.

Nies, Gerd, and Roberto Pedersini. 2003. Freelance Journalists in the European Media Industry. *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europe.org/pdfs/FinalReportFreelance.pdf>

Perlin, Ross. 2011. *Intern 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 London: Verso.

Pink, Daniel H. 2001. *Free Agent Nation: How America's New Independent Workers are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Live*. New York: Warner.

Prickett, Sarah Nicole. 2010. SNP's Word of the Day: Precariat. *Fashion*. January 13.

<http://www.fashionmagazine.com/blogs/society/2012/01/13/snps-word-of-the-day-precariat>

PWAC [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 2006. *Canadian Professional Writers Survey: A Profile of the Freelance Writing Sector in Canada*. Toronto. <http://www.pwac.ca/files/PDF/PWACsurvey.pdf>

Ross, Andrew. 2000. The Mental Labor Problem. *Social Text* 18(2): 1—31.

Ross, Andrew. 2001. No-Collar Labor in America's 'New Economy'. *Socialist Register* 37: 76—87.

Ross, Andrew. 2003. *No Collar: The Human Workplace and its Hidden Cos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Ross, Andrew.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Rossiter, Ned. 2006. *Organized Networks: Media Theory, Creative Labour, New Institutions*.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Ryan, Bill. 1992.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Scott, D. B. 2010. Rogers Syndication Practices Called Into Question by Canadian Writers Group. *Canadian Magazines*. October 2.

<http://canadianmags.blogspot.com/2010/10/rogers-syndication-practices-called-into.html>

Samuels, Alana. 2008. Book Publisher Finds Teen Lit Adapts Well in Hollywood.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8/aug/02/business/fi-alloy2>

Smith, Chris and Alan McKinlay. 2009a.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3—2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mith, Chris and Alan McKinlay. 2009b. Creative Labour: Content, Contract and Control. In *Creative Labour: Work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Alan McKinlay and Chris Smith, 29—5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mythe, Ted Curtis. 1980. The Reporter, 1880—1900: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News. *Journalism History* 7(1): 1—10.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Statistics Canada. 2012. Occupations in Art, Culture, Recreation and Sport. *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NOC) 2011*.

<http://www.statcan.gc.ca/cgi-bin/imdb/p3VD.pl?Function=getVDDetail&db=imdb&dis=2&adm=8&TVD=-122372&CVD=122373&CPV=5&CST=01012011&MLV=4&CLV=1&CHVD=122374>

Story Board. 2010. Rogers Refuses to Remove Writer's Work From Yahoo. *Story Board*. November 30. <http://www.thestoryboard.ca/?p=142>

The New Inquiry. 2012. *The New Inquiry*. 1 February.

Towse, Ruth. 2003. Copyright Policy, Cultural Policy and Support for Artists. In *The Economics of Copyright*, edited by Wendy J. Gordon and Richard Watt, 66—80.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Ursell, Gillian. 2000. Television Production: Issues of Exploit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UK Television Labour Marke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6): 805—825.

Vosko, Leah F. 2000. *Temporary Work: The Gendered Rise of a Precarious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Vosko, Leah F. 2006. *Precarious Employment: Understanding Labour Market Insecurity in Canada*.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Vosko, Leah F. 2010. *Managing the Margins: Gender, Citizenship,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lenstein, Andrew. 2010. People Magazine iPad App Delayed by Papparazzi. *The Hollywood Reporter*. Accessed October 14, 2010.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exclusive-people-magazine-ipad-app-26788>

Walters, Emma, Christopher Warren, and Mike Dobbie. 2006.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A Global Survey and Case Study of Atypical Work in the Media Industry.*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http://www.ifj.org/pdfs/ILOReport070606.pdf>

Waring, Marilyn. 1999. *Counting For Nothing: What Men Value and What Women Are Worth*, 2<sup>nd</sup>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Wayne, Mik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Weeks, Kathi. 2005. The Refusal of Work as Demand and Perspective. In *The Philosophy of Antonio Negri: Resistance in Practice*, edited by T. S. Murphy and A-K. Mustafa, 109—135. London: Pluto Press.

Winseck, Dwayne. 2010.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Crisis of the Media': The Rise and Fall of (Some) Media Conglomerates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 (3): 365—393.

Wright, Erik Olin. 1978. Intellectual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ited by Pat Walker, 191—211.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Wright, Erik Olin.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马蒂耶斯·埃克曼(Mattias Ekman)<sup>①</sup>

## 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体 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sup>②</sup>

熊琦(译),伍静(校)

[导读]当前,在各种公共服务已被或将被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所蚕食时,新闻媒介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以及所为者何都是引人深思的问题。马蒂耶斯·埃克曼的《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关注的正是此题。这篇文章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实空间,一个是媒体空间,它主要是以大卫·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的概念为线索来结构全文。这篇文章整体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剥夺性积累和它裹挟的暴力,而它要解释的是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这一议题;第二部分通过几个实例来论证新闻媒体在剥夺性积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其实就是分析新闻媒体如何为资本积累为虎作伥。

首先,在分析剥夺性积累及其暴力过程中,作者论证了资本积累离不开资本循环,而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产生所依赖的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这样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必然会带来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卢森堡当年用消费不足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全面性危机,大卫·哈维很认同这一点,在他看来,今天,剩余资本和劳工都存在,但它们没办法结合在一起。因此,作者认为,剩余资本没有了进一步进入到资

---

<sup>①</sup>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媒体研究系讲师,曾参与撰写《Sage 百科全书之社会运动媒体》(*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Movement Media*)一书。ekman@jmk.su.se。

<sup>②</sup> 我要表达我对安德烈亚斯·维德赫姆(Andreas Widholm)的谢意,他提出的意见对本文很有帮助。

本循环里面去扩大再生产的这样一个先在的现实条件。而为了解决这个危机,资本会通过时间或空间的转换来扩大再生产,这也就是哈维所说的“时空修复”。而在作者看来,时空修复是依靠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它整个体系完备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运输和传播的进步可以压缩时空关系。而在开辟新剥削领域的过程中,便必要会出现各种暴力。

文中埃克斯用到了原始积累的概念。其实是要说明,在今天资本要开拓出新的劳动形式和新资源,就必须像原始积累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一样来剥夺人民当下的公共服务以完成它的剥夺性积累。

接下来,作者以实例来呈现新闻媒体如何在剥夺性积累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指出剥夺性积累实现的四个途径也就是它的四个特征:那就是私有化,金融化,危机控制与管理,以及国家再分配。

作者指出,这四个过程与暴力和社会运动是相伴相生的,其实也就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齐泽克把暴力区分为客观暴力和主观暴力,而这样的客观暴力和主观暴力其实都为资本和权力所利用。而媒介恰好代表的是客观暴力这样一个面向的。

这个客观暴力施展过程,作者分别从传统媒体和网络空间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第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层面,作者主要讲述了传统媒体作为客观暴力在资本积累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这里作者用了两个案例,一个是讨论新闻在公共服务私有化当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新闻媒体是怎样与金融业的利益达成一致的。第二个案例是媒体如何再现在瑞典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和全球抗议运动的。

第一个案例主要讲的是,瑞典公有的电信公司特里尔公司如何被私有化的过程。资本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做了大量的商业广告和政治活动来引诱瑞典人购买它的股票。比如它用“人民股份”这样具意识形态意味的名词来消除私有化带来的问题,并且通过金融业界人士鼓吹私有化和电信公司的股份能提供赚钱的机会,以此来推动特里尔公司私有化的过程。这里其实突显出今天新闻商业化与金融业之间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案例主要讲反全球化运动如何在媒体中呈现。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往往把这些抵抗运动描述为落伍的跟不上时代的行为。并且把焦点集中在社会运动发生的暴力上面,然后把它纳入治安为本位的法律和秩序话语里边,从而达到一种去政治化的效果。也就是说,一方面,新闻媒体

搁置抗议部分,而抗议者又在遭受暴力。另一方面呢,新闻媒体通过传播法律和道德秩序意义上的这种治安话语,使体制性暴力得以合法化正义化。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作者讨论的是网络公共空间的商业化。这里作者是用大家都熟悉的斯迈思的“媒体公司—观众—广告商”的框架来解释网络公共空间商业化的。也就是说上网其实也就是一个剩余劳动的过程。在上网的过程中,大部分用户都被监视,而这样的监视得来的用户资料又被提供给广告商。而从齐泽克的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区分来看,毫无疑问这种监视以及对网络用户隐私资料的占有就是一种客观暴力。这是整个文章的大致内容。

作者在最后的总结里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新闻媒体生产和传媒技术领域从来就不是单一而僵化的,因此它也需要被理论化也需要从浮现出来的另类角度来进行分析”。这篇文章无疑给分析新闻媒体与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资本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它引发我们对今天中国的媒介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在于:今天公共服务也正面临私有化的趋势(如土地私有化、铁路私有化等),中国的媒体在这样的剥夺性积累的过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媒体与国家三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结构性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剥夺性积累,政治经济学,新闻媒体,商品化,私有化,Web 2.0, Facebook

## 一、引言

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激发了大量社会理论家将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的许多关键论点和路径予以振兴和重塑。如果没有从《资本论》派生出来的日益充实的文献作映衬,本文将不过是又一次试图与这部从前无数次被资本主义的护教学拒之门外的开山之作套近乎的尝试。

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Marx 1867, 1990)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理论以及该理论对于分析(大众)媒体、网络传播和传播体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相关性。为了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点重新焕发活力,原始积累理论已参照哈维(David Harvey)的“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理论得到修正。哈维借鉴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讨论旨在揭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自由主义转向。



遵照对原始积累和剥夺性积累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性解读,本文阐述了新闻媒体内容和媒体结构中,与剥夺性积累过程相关的两个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本文考察了媒体对反资本积累的社会抗争的再现,以及新闻媒体内容和新闻媒体体制如何促进了金融业的资本积累。此外,本文还探究了互联网应用(特别是 Web 2.0)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本文还就日常的网上冲浪何以被理解为剩余劳动以及互联网用户何以转变为商品等问题贡献了思考。就日常在线活动的讨论而言,马克思原始积累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通过对 Web 2.0 时代文化生产、分配和传播领域里的知识资产(intellectual assets)和创造力(creativity)的占有而产生的新的剥削形式。本文在这里还讨论了闲暇时间、自我和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何以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还用较短篇幅探讨了互联网监管以及个人信息的商业化收集、所有和处理是否可被理解为对主体的潜在威胁和齐泽克(Žižek)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剥削之客观暴力的一部分。

本文既反映了新闻媒体的经验研究的成果,同时也运用案例分析了在一个系统性危机的时代,社交媒体的日常运用与文化生产/分配领域内的知识资产、知识创造力如何透过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得到阐释。而哈维对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更新版本对于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近况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 二、资本积累的过程

资本主义内在驱动力便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为积累而积累。抑或正如马克思(Marx 1867, 1990, 595)所言“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马克思(Marx 1885, 1992)在《资本论》第二卷里概述的最基本的资本积累公式勾勒出了资本如何通过七个关键阶段达成流通:

$$M-C(L_p/M_p)\cdots P(v/c)\cdots C'-M'$$

简言之,资本积累通过资本流通来完成,在此过程中货币(M)通过购买劳动力( $L_p$ )和生产资料( $M_p$ )被转换为商品(C)。为达到积累的目的,货币在这一过程结束之时需要比开始时更多,这意味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要高于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商品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当与生产出来的商品相联系时是以生产资本(P)的形式出现的。

劳动力的价值( $v$ )等于购买劳动力的成本(工资);而生产资料( $c$ )的价值等于所使用的资料(不变资本)的成本。所以,当商品出售的价格高于生产成本时,剩余价值便产生了,而剩余价值是通过剩余劳动(无偿劳动时间)来实现的。因此,剩余价值主要是由资本家未付酬的劳动时间创造的。当生产出来的商品( $C'$ )被售卖时,资本再次以(新)货币( $M'$ )的形式进入流通过程,而资本积累的过程由此得到持续(Marx 1867, 1990; Harvey 1982, 2006, 156ff; Fuchs 2011, 138)。

虽然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非常复杂而详尽(整个《资本论》第二卷主要是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概述),但仍然有可能在大体保留其内在本质的前提下以此种方式对其进行简化。在通常情况下,资本积累通过扩大再生产而得以确保<sup>①</sup>。在这一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仅商品和剩余价值被再生产出来,而且资本与劳动之间——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整体关系亦被生产出来(Marx 1967/1990, 578)。而且由于剩余价值有赖于资本与劳动力( $L_p$ )之间的剥削关系,因此资本流通归根结底就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是附属于绝对剥削或相对剥削的过程的。绝对剥削指的是延长每个工人所需投入的劳动时间,相对剥削则指强化劳动过程(Mosco 2009, 131)。

资本流通是个无休止的过程,而鉴于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终究要面临系统性危机。历史马克思主义者围绕资本主义正经历何种危机所展开的辩论往往会发生转向。卢森堡(Luxemburg)(1913/2003)强调消费不足(under-consumption)的问题从而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作出解释,但消费不足很难充分解释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当前正面临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的危机<sup>②</sup>,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一种情境,即“剩余资本与劳动并存,但没有办法将他们结合起来”(Harvey 2006, 96)。当多余的商品、货币和生产力与剩余劳动力同时并存,而资本缺乏“有利可图的机遇”进行扩张时,过度积累的危机就会显现(Harvey 2003, 88)。为了解决过度积累危机,资本试图通过时间或空间的转换来扩大再生产。哈维(Har-

---

① 马克思(1867, 1990, 711ff)对“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马克思 1867, 1990; 1885, 1992)作了区分。简单再生产主要是劳资关系的再生产,不发生任何资本积累。

② 过度积累的定义在这里被高度简化,因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往往承继了多方面的特征。(要更深入地了解对系统性危机的分析,请见哈维 2003; 2006; 2010b。要综观当代危机的不同解释,可参见福克斯 2011。)

vey 2003, 89)称其为“时空修复”(spatio-temporal fixes)。例如,将剩余资本和劳动投资到长期的(大型公共)项目中,或将剩余资本和劳动转移到其他地理空间(Harvey 2006, 96)。资本家们倾向于通过将劳动力或生产资料的购置转移至他处来从地理上扩大再生产,从而为资本积累创造新的空间。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体系,因此扩大再生产通常会导致一种情形,就是危机是按照地理的顺序移动的。“时空修复”有赖并兴盛于传播技术和体系的进步。交通和传播的进步压缩了时空关系,因此它成为时空转换的核心。在寻求投资剩余资本新途径的过程中,资本家力求将新的劳动形式和新资源挪用至资本流通中,而这些新资源既有物质的(如自然资源),也有非物质的(如知识)。这样一来,从原本未被剥削的工作和资源中创造剩余价值就成为可能了。在当代过度积累的危机中,理解劳动与资源挪用过程的方法之一就是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为了解释地理帝国主义(geographical imperialism)与全球资本(global capital)之间的关系,哈维(Harvey 2003; 2006; 2010a)借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原始积累的讨论来揭示我们当代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向(the neo-liberal shift)。

### (一) 原始积累

在马克思(Marx 1867, 1990, ch. 26)《资本论》的讨论中,原始积累指的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因此它也是生产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从而被转化为供市场售卖的雇佣劳动者的过程(即,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因此原始积累也构成了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本身:

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史前史。(Marx 1867/1990, 874—875)

马克思在对旧的封建制度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描述中认为,主张资本的自然演化的自由式资本主义一般会遭遇赤裸得多的现实。封建制度的变革是一个以残酷的且通常是暴力的资本剥夺为标志的过程。公地的圈围、殖民制度、帝国主义、奴役劳动的使用,以及对被迫成为产业雇佣工人的农民的驱逐等等,通常都是暴力的。所以在马克思(Marx 1867,1990,875)关于原始积累的说法中,暴力发挥着主要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著名论述中所言,“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无疑,马克思对资本历史进程的描述只具部分真实性,事实上在这个进程中和平的或至少是不那么暴力的变革也是存在的(Harvey 2010a,304f)。然而,马克思揭穿了自由主义神话,并勾勒出了一幅平稳变革的蓝图,而变革源自于成为雇主的具有专门劳动技能的勤劳人们的双肩——这种说法绝不是真的。

对于劳动者而言,原始积累的过程具有两面性,工人们从奴隶制等封建压迫制度中解放出来,却只不过陷入了新的剥削关系之中,即间接的强迫劳役——雇佣劳动的制度。一位前奴隶主愤怒于这样的事实,即奴隶从奴役中被解放出来,但并未在奴隶主所拥有的大农场中成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中针对他的愤慨作了评论:

他们已不再是奴隶,但并非为了变成雇佣劳动者之目的,他们反而是为了他们自身消费而工作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对他们而言,资本并非以资本的形式存在着,因为自发的财富本身之存在是建立在对劳工直接或间接压迫奴役的基础之上的。(Marx 1857/1993,326)

我们将回到当代的一些实例中来,来看看自给自足的农民与集体所有并组织的农业生产(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动员的,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 MST [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 和农民之路 [Via Campesina])是如何与将其变为雇佣劳动人口的驱逐与强制行为作斗争的以及媒体在以经济发展之名合法化驱逐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关键的角色。

如此一来,如果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那么它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有着怎样的帮助? 在卢森堡(Luxemburg 1913/2003)的启发之下,哈维(Harvey 2003; 2005; 2006; 2010a)认为,在当今的现代新自由资本主义中,原始积累的许多具体特征都是非常显

而易见的。在马克思看来,积累的“正常”过程就是扩大再生产,而卢森堡(Luxemburg 1913/2003)却认为连续的资本积累也承继了一种“原始”的特性。这构成了她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论点:资本总是创造剥削的新地理空间,或者说“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渗透”(Callinicos 2009,40)。卢森堡的理论也可用于理解资本流通之外的其他社会环境怎样沦为资本的殖民地(Hartsock 2006)。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已把卢森堡的殖民主义思想用于分析女性在家庭中的再生产性工作。通过确保(男性)雇佣劳动者的再生产,女性的再生产性工作实际构成了“一种内部殖民地和原始积累的环境”(Fuchs 2011,282)。

哈维(Harvey 2006)认为当下的资本积累亦继承了原始过程中的特点。事实上,通过扩大再生产达成的积累和通过剥夺达成的积累“是有机地联系的,是辩证地交织的”(Harvey 2003,176)。至少有两个关键论点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中找出了原始积累的具体特征。首先,存在着大量人口驱逐和土地侵占的实例(尤其是在拉美和亚洲),同时还存在着对自然资源的暴力开采(整个南半球);而反抗这些遍布整个南半球的过程的人则会遭到系统的、有时甚至是极端的暴力镇压。在有些例子中,暴力程度不断升级(Harvey 2010a,308)。其次,当前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似乎依然涉及原始积累的某些特征,例如不断增长的国债以及马克思(Marx 1867/1990,777ff)所称的不断成熟的信贷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主导的金融信贷的整个尝试与数百年前私有化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信贷体系及作为行动者的国家具有惊人的相似。哈维(Harvey 2003;2005;2006;2010a)将这些原始积累的特征形容为“剥夺性积累”。它也可被描述为对全球增长持续下滑的(徒劳的)新自由主义解答(Harvey 2003,145;2006,42)。剥夺性积累的特征由四个关键要素构成: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国家再分配(Harvey 2006)。

### 1. 私有化

剥夺性积累体现在公共资产的私有化中,如公地的侵占。这样的私有化涵盖了自然资源(水、土地、空气)、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电信、能源供给)、社会再分配制度、社会服务、医疗、教育、公共机构、公共住房、战争等等一切领域,基本囊括了所有尚未卷入资本流通的东西。同时存在的还有诸如知识、基因材料之类的非物质资产的私有化和再生产过程。所有这些领域之前因其被视为公共用地、公共服务、事关国家利益而与资本积累绝缘,但如

今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里则不同程度地被侵占。在加入到资本流通之后,他们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中,由此也改变了社会中各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病人、戒酒者、公民等等被转化为以商品出现的物资和服务的客户、顾客和买主。剥夺性积累的过程因而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剥削的过程。当前的私有化进程已被印度作家、运动人士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 2001; Harvey 2006, 44—45)定义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野蛮剥夺”。

私有化的进程可以是快速而利落的,无需作特别的斗争或使用武力,北半球尤其如此,在那里国家是私有化的主要推动者。但南半球的剥夺过程通常会伴随着残酷或暴力的对农业人口的驱逐和对日常自然资源的侵占(Harvey 2006, 45)。有时剥夺的后果是引发了公开的社会抗争,有时资本甚至成了失败的一方。1990年代末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市发生的水资源战争便是一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私有化浪潮中,这座城市的公共饮用水被出售给了美国的贝泰公司(Bechtel),这直接导致了水价上涨、供给受限。对水的剥夺引发了一场为争夺水这一人类基本财产的使用权的艰苦抗争,最终迫使这座城市重新购回用水权(Olivera and Lewis 2004)。所以私有化进程也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激化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

私有化也裹挟着战争。战争事实上就是一种日渐被商品化的行为,其间私营公司在保卫与折磨中牟取暴利。战争只是一个政府资金大量转换为私人资本的过程。卢森堡(Luxemburg 1913, 2003, 434)20世纪早期对“作为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的军国主义”的讨论基本可以说是今天晚期资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解释。这其中,军工联合企业在促进资本扩大再生产和通过暴力和破坏“创造”新的剥削空间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Žižek 2009)。

通过剥夺实现的对公共资产的侵占制造了一种积累在不断增长的表现,因为新的剥削领域和剩余价值过程被添加到了资本流通中。

## 2. 金融化

剥夺性积累的第二个特征便是金融化。金融资本的大幅扩张与市场的放松管制、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私有化进程是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里的投机活动透过大型资本再分配拉动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而金融体系在“偷窃”诸如养老金之类的公共资产方面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Harvey 2006, 45)。借助对冲基金、庞氏骗局和资产倒卖等手段,辅之以对股票价值的倚重,当前的虚拟资本的累积创造了明显的经济增长。

当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这些过程被描述为主要的推动因素。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 cycles)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划分为盛衰不断交替的历史时期,而金融化和金融业不断提升的重要性也标志着周期中衰退期的到来(Arrighi 2010)。为了理解资本的不断增长的跨越国界的权力和资本的迅速(空间上的)集中化,马克思(Marx 1867,1990,920)强调了信贷体系的重要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建立“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机构以攫取‘金字塔底部的财富’,然后榨干这些财富以资助萎靡的国际金融机构…并用这些财富偿付资产和并购游戏……”(Harvey 2010a, 272)。媒体研究者阿尔米龙(Almiron 2010)指出了金融资本与新闻媒体组织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新闻媒体越来越依赖银行等金融操作者,因此金融化对新闻实践和内容具有深远的影响(Almiron 2010)。

### 3. 危机的控制与管理

第三,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已经导致了精心策划的经济危机。危机以结构性调整计划的形式放任资产的快速再分配和经济休克疗法。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期间,精心策划的危机多少已成为拉丁美洲的惯例。单一国家的债务危机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计划作出快速应变,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跨国机构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发生了转变。这些蓄意挑起的危机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本迁移,并创造了明显的资本积累。该危机导致了大量失业劳动力的产生,造就了“便于进一步积累的廉价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Harvey 2006,47)。这些危机也揭开了为确保资本的利益而付诸使用的暴力行为。这些萌发于资本与国家的交会处的暴力主要体现在对遍布整个南半球的抗议、劳工结社和社会运动的残酷镇压上。

### 4. 国家再分配

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国家被转化为公共资产再分配(私有化)过程中的最核心的行动者。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或公共服务资金的剧减构成了剥夺性积累的第四大关键要素(Harvey 2006,48)。虽然当权的政府具有政治性,但依然有大量实例能说明国家在私有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举例来说,将养老金体系予以私有化的有法西斯独裁政府(1980 年,智利)、社会民主党政府(1990 年代末期,瑞典)和阿根廷的庇隆政府(1990 年代);将公共住房予以私有化的有 1980 年代英国的撒切尔政府、过去 15 年中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和中间偏右政府;而将农业用地予以私有化的有 1990 年代墨

西哥的民族主义政府(革命制度党)。私有化的名单几乎是列不完的。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国家再分配引发公共资产被大规模地转化为私人所有。公共资产向私营部门的转移不只牵涉到教育、医疗、社会工作、基础设施、养老金等社会服务的私有化,而且还包括以私营部门的银行纾困项目和政府投资形式出现的现钱向商界的转移。在美国,象征着新自由主义转向的“企业福利计划”已导致纳税人的钱被大量再分配,落入私营部门的手中(Harvey 2006,49)。

国家再分配的后果有时是暴力的。反对社会动员的直接冲突发生过多起,例如对墨西哥恰帕斯和瓦哈卡州的社会运动、对哥伦比亚的工会主义者、对巴西无地农民运动中被组织起来的无地农民工以及印度土著人的镇压等等。国家再分配也可能牵涉到更隐性的符号暴力,而暴力的受害者是因大量公共住房私有化(例如在伦敦)后出现的房产投机行为和自然资源的私人征用所导致的大量人口被驱逐(这种现象在南半球无处不在)而被迫走出家门的人。这些间接暴力的形成是晚期资本主义诸种进程的一个关键属性。接下来我们来探究原始积累的暴力与以剥夺性积累为标志的当前新帝国主义时期的暴力有何区别。

## (二) 暴力在资本积累中扮演的角色

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和标志全球资本扩张之过程,我们必须思考全球资本是如何以新帝国主义的方式与区域性地缘政治(territorial geo-politics)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积累或剥夺性积累基本上都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形式(Harvey 2003)。资本主义继承了全球资本扩张与区域权力逻辑(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行为)之间的矛盾(Harvey 2006,105)。哈维(Harvey 2003)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表明,地缘政治斗争和全球资本积累在发生时间上不谋而合,从而重塑了积累的基础。对由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构成的资本积累和地缘政治发展的分析表明,暴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暴力简直就是积累内在逻辑的一部分,作为落实资本的“权利”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一旦有需要就会自动浮现。沃勒斯坦(Wallerstein 2001,29)认为,系统性危机时期的扩张问题将与可能更暴力的资本扩张相伴相生。相比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跨国机构而言,民族国家的地位日趋削弱,与由此带来的政治衰落相呼应的是,这一过程无疑将加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日常暴力的频度。暴力往往出现



在全球资本积累(特别是剥夺性积累)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的区域地缘政治的交汇点上。因此暴力难免成为孕育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的一部分,故它也可被理解为植根于系统内的必需品。

现在让我们回到暴力在剥夺性积累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中来。资本主义制度依赖于积极和潜藏的暴力,它们是保障资本积累和私人掌控生产资料的手段。齐泽克(Žižek 2008)对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进行了区分。人身攻击、犯罪、恐怖行为或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等属于主观暴力,是公开实施的,并在实施时带有某种具体意图(如病态的、政治的、父权的、宗教的等等)。相反,客观暴力则是内嵌于资本主义实践之中的,体现在公开歧视、结构性种族主义、经济贫困或其他更微妙的剥削形式中。这两种暴力形式是相互关联的。诸如巴黎和伦敦这类城市里发生的城郊骚乱这样的主观暴力会被认为与客观暴力——经济剥削、驱逐、种族主义和歧视造成的社会信任的覆灭——不无关系。主观暴力只是在两种形式里更显而易见(Žižek 2008)而已。正如客观暴力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剥削性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果,它也同样表现为对挑战资本主义的那些人的潜在暴力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暴力就是葛兰西所定义的霸权认同(the consent of hegemony)的一部分,是将武力和认同这两种资本主义统治形式融合起来的一种暴力形态;或者用葛兰西(Gramsci 1929—35, 1971, 263)的话说,是“高压政治的盔甲保护下的霸权”。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乃是由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剥削构建起来的系统暴力的两种不同表现。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往往带着公然的系统暴力的印记,而这些暴力主要表现为危机疗法、对传统生产资料的实体消灭和我们在伊拉克已见到过的通过战争和占领进行的物质上的侵占(Žižek 2009, 17),同时,这种剥夺性积累也是以南半球主体的日益暴力化和经济上的贫困为标志的(Ekman 2011)。于是,暴力变成了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的一个共同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会使侵占过程中资产分配的极端不对称性趋重。客观暴力也包含符号暴力或者说加尔东(Galtung 1990)所定义的“文化暴力”。它涉及文化的诸多方面,“可以用于正当化或合法化直接的或结构性的暴力”(Galtung 1990, 291)。因此,按照齐泽克的模式,文化暴力可以涵盖新闻媒体的那些将镇压社会动员和抗议过程中的武力使用予以合法化或将战争正当化的方面。

总之,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之前的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视为一种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规模人口驱逐以及大工业、工人阶级与资

本家的形成为特征的历史形态。但我们也可以将原始积累看成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些特征的延续。透过时间与空间对劳动和资源的永无止境的侵占,被迫纳入到资本主义产权关系中,无疑带有马克思(Marx 1867,1990)描述过的众多特点。最终,原始积累的主要特征在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被迫分离。

### 三、资本积累中媒体与传播的总体作用

许多理论性与经验性的著作援引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理解媒体与传播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Mosco 2009; McChesney 2007)。福克斯(Fuchs 2011,141ff)将多个不同的层面作了区分,既有媒体与传播(作为产业)的内部层面,也有(作为概述)外在于媒体与传播的层面,以阐明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为了理解与原始积累或剥夺性积累相关联的媒体与传播,我只会触及可能发挥作用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媒体内容以及新闻体制与金融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的意识形态维度的。意识形态元素在经济、政治、法律等多方面对资本主义再生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媒体通过规范和促进日常生活私有化从而在社会关系的具体化中占据强势地位。再如,媒体内容将受众转化为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者。提及这一点目的倒不在于唤起太多意识形态批评的历史讨论,而是要分辨出与剥夺性积累相关的一些核心的意识形态元素。第二,对于个体的闲暇时间如何被占用并被转化为剩余劳动的讨论触及到了社交媒体如何充当推动资本积累的广告的基础设施的问题(参见 Fuchs 2011,149)。社交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对于压缩日常商品流通中的时间与空间具有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使用智能手机、上网时,时常被确定为目标消费者。事实上,互联网的大多数部分已被商业化,而商品化的过程仍在持续征服用户。互联网中的内容并没商业与非商业的明显区分(Hesmondhalgh 2007,259)。

#### (一) 新闻媒体与剥夺性积累的驯化

我想要谈论几个案例。这些案例突出显现了新闻媒体的结构性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与原始积累和剥夺性积累的过程的联系。第一个案例讨论了新闻在公共服务私有化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新闻媒体怎样与金融业的利益达成一致并促进金融业的实践(参见 Almiron 2010; Hope 2010)。第二个案例

探讨的是瑞典大众媒体对全球正义运动、全球抗议运动和世界社会论坛(又译,社会运动论坛世界峰会)的再现(Ekman 2011)。

### 1. 支持私有化,促进金融化

1980和1990年代,私有化浪潮席卷世界上的多数国家,这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在瑞典,公共部门以前发展良好而且在经济上得到优先发展权,放松管制和私有化过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瑞典的情况或多或少反映了西欧其他国家明显的发展趋势。随着199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迅猛来袭,“市场”<sup>①</sup>这一名词成为有关经济事务的新闻中的最显眼的原动力之一(参见 Martenson 2003; Viscovi 2006)。“市场”作为统一的行动者,对政治决策作出反应,宣布政治行动者的好坏,并决定如何看待整个经济状况,且改变了经济事务新闻报道的话语(Martenson 2003)。“市场”这一中间化的概念是作为新自由主义转向和资本主义经济大幅放松管制的意识形态要素而出现的。为应对“市场”的出现,新闻将目光转向了金融业,而股票市场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新闻专题。这也意味着金融业中的行动者在日常新闻流(news flow)中往往以专家姿态占据支配地位。对经济议题的再现出现了一个鲜明的从劳动力市场和工会等向金融市场的转向,并且将中间化的公民建构为私营经济的主体(相对于雇佣工人或金融投机领域外围的人而言)(Viscovi 2006)。2000年阿尔米龙对两份主要的西班牙报纸所作的研究呈现了同样的结果。金融业参与者和指标成为新闻的主宰,而阿尔米龙(Almiron 2010, 167)断定:“其中大部分的信息无疑是缺乏独立的新闻调查的。”马特森(Martenson 2003)和维斯科威(Viscovi 2006)所认定的新闻的范式转换与剥夺性积累中的金融化过程遥相呼应。

让我们首先来思考瑞典的一个具体案例,它可以说明新闻媒体通过促进普通人的存款流入金融市场以支持私有化时所发挥的作用。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现象,它可以表明新闻流如何与金融流交织在一起以及金融新闻的利益如何与金融业者的利益不谋而合。

2000年6月,国营电信公司 Telia 被部分私有化(30%卖给了公众)。几乎有100万的瑞典人在新闻媒体辅助的大量商业广告(出现在电视、报纸和公共空间里)和一场政治宣传(整个私有化过程得到了财政部长的亲自出马支持)的怂恿下,成为了该公司的股票持有者。在该公司私有化的过程中,

---

<sup>①</sup> “市场”将放在括弧内,以标出其意识形态状况。

新闻以“人民股份”<sup>①</sup>的口号来为股票促销。使用这种意识形态名词是为了抚平这样一个事实,即公众现在可以购买本就属于他们的某样东西,并有机会赚钱获利<sup>②</sup>。例如,在私有化的几周前,瑞典第二大小报《快报》(Expressen)刊登了数篇文章支持读者购买股票。其中一篇文章用了这样具有诱惑性的标题:“八大理由支持 Telia,……这就是拥有它的股份就会变为赢家的原因所在”(Bolander 2000a)。小报和日报上的文章都利用金融業者鼓吹私有化和快速赚钱的机会:“股票市场专家认为能在股票市场大发一笔”(Bolander 2000b)。“Telia 被预测开庄大吉。专家都建议购买这一全新人民股份”(Magnusson 2000)。一些文章干脆就写成了购股指南:“如何购买 Telia——这一全新人民股份”(Norlin 2000),“如何购买人民股份”(Wedel 2000)。声援私有化的文章就更加难以计数了。“人民股份”这一概念的整个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金融业日益受重视密切相关的媒体现象。搜索瑞典最大的新闻资料库 Mediearkivet 可以发现,在 Telia 私有化之前,“人民股份”这一术语总共在 186 篇文章中出现过。但是从 1999 年 Telia 私有化进程开始及以后,这一术语出现了 1113 次,而在 2000 年的顶峰之年同时有 400 篇文章中出现过。仅在 2000 年,瑞典 7 大报纸发表了 220 篇含“人民股份”一词的文章。

电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私有化与新闻生产中发生的类似的市场化进程形成呼应(Almiron 2010)。由于新闻商业化程度日益加剧,而且财经新闻与金融业之间的共生关系日渐紧密,加之新闻生产中经济资源有限、截稿期限缩短,这一切导致新闻业完全丧失了批判锋芒(当然也有显著的例外情况)。不断加码的利润(从马克思所定义的相对剩余价值中获得,1867,1990,429ff)要求令新闻业的处境难上加难,与此相伴的还有销售额的下滑,而这种种因素使得财经新闻很容易成为经济形势良好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俘获的目标。因此,除了信息与传播技术在促进金融市场资本流通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之外,传统新闻媒体所发挥的同等作用也不应被忽视(Hope 2010)。

---

① “人民股份”这一名词响应了“人民之家”这一概念,是用于解释二战之后盛行于瑞典的福利模式的一个语汇。“人民之家”的概念第一次被使用是在 1928 年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的一次演讲中。

②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一股份后来让人大失所望,2010 年时其股票市值已降至 2000 年发行价的一半(见《达拉纳报》,2010)。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现象,在这里,新闻媒体迎合了金融市场的利益,并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实践。接着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被马克思称作 M-M' (即钱生钱) 的资本积累 (Marx 1867, 1990, 248)。新闻媒体与金融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相反,这种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出现的第一份报纸上,而这份报纸的所有者就是一个金融家族 (Almiron 2010, 68)。然而,由于 1990 年代金融业 (银行业、信贷流等) 大规模放松管制以及通过信息和传播技术进行金融投机的新手段开始涌现,新闻媒体流和金融流中的信息开始实时共通 (Hope 2010, 654)。比如在金融业像彭博 (Bloomberg) 和 CNBC 这样的广播公司已成为不断累积的资产转移流的引擎,从而造就了大规模的投机性金融经济。在 1980 和 1990 年代大型电视台与金融交易界相融合,为遍布全世界的新闻记者提供大量金融信息 (Hope 2010)。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金融广播电视为全世界的新闻播出机构提供了原材料 (体现为数据、指数、比率、金融“专家”话语) 等。接着,这些原材料被用来制作不同经济和地理环境下不同媒体平台上播出的新闻。全球金融体系中某处股票市场的一个急剧的变动会对金融业者和媒体业者都产生直接的影响。1990 年代中期,这些媒体/金融信息流也被转移到了网上,成就了网上迅即的金融信息流。1980 年代金融资本领域和一定程度上引人注目的新闻业之间的利益融合多少成为 1990 年代信息和传播技术快速发展之后的一个样板 (Hope 2010)。21 世纪初,“大多数顶尖新闻媒体集团与金融业的联系不断紧密,对金融业的依赖也不断加深” (Almiron 2010, 152)。因此,鉴于信息借助传播体系实现了快速的流动,金融业在过去 10 年中的头几年里经历了爆炸式的成长。网络金融业者数量的增加带动了计算机辅助的算法交易、秘密对冲基金、衍生交易、资产剥离的繁荣,造成了大量虚拟资本的累积。正因此,新闻业者与金融业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难以区分,而这一点在新闻从业人的隶属关系和个人利益上都有体现。例如,高产的新闻记者摇身一变成为金融博客里的顾问,而博客圈则“有助于构建财经印刷媒体和商业电视频道的信息环境” (Hope 2010, 660)。

新闻与金融业之间的利益互惠是 2008 年经济危机酝酿过程中新闻业彻底 (几乎) 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 (Almiron 2010)。新闻从业人和新闻生产者对之前 2008 年发生的金融崩溃的总体上熟视无睹的态度已招致了一些内部批评 (Schecher 2009; Fraser 2009), 但对财经新闻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讨论依然被边缘化, 尚未被纳入批判媒体研究的范围。

所以考虑到财经新闻机构和经济记者的角色,新闻媒体通过推动金融化进程,无疑助长了金融体系内愈演愈烈的投机行为。金融信息的过剩通过传播体系被迅速转移,加之其与金融业者的依赖和所属关系与日俱增,便削弱了经济议题新闻流的批判精神。你甚至可以认为很大部分的财经新闻简直就是金融资本利益的信息基础设施。随着马克思所发现的信贷体系(基本就是今天的金融体系)的兴起,银行、信贷机构和其他金融業者者通过传播体系压缩时空的作用不可被低估。无可否认的是,信息与传播技术和金融新闻流在促进金融机构手中资本迅速集中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为这些金融机构奠定了与原始积累历史进程中银行和信贷体系平起平坐的关键行动者的地位(Marx 1867,1990)。

## 2. 全球正义运动:暴力和政治

全球正义运动处于反抗剥削性积累的最前沿。该运动属于那些处理资本与带有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特征的过程之间的具体关系的运动之一,是一个纷繁多样但在社会和政治上具有连贯性的运动。不同社会运动抗争的焦点是正处于进行中的农民驱逐过程、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土地及生产资料的窃取、对本地人民的镇压、金融债务体系以及结构调整计划,而这一切都是在残酷的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国家和全球资本的胁迫下展开的。简言之,全球正义运动可以看作是对剥夺性资本积累的组成过程的一个社会和政治反应(Harvey 2010a,313)。

1999年11月末在西雅图举行的WTO会议令上一个千年临近结束时所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全球峰会展开的抗议运动变得世界瞩目。随着世界各地在类似场合的抗议运动的爆发,全球正义运动已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Klein 2001)。对劳动、资源和土地的剥夺引发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抵抗运动借助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WSF)的创办打造了一个共同的平台。世界社会论坛为产出多样的政治合作、平台、宣传及决议的讨论、会议、研讨班和社会联系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空间(Sen and Waterman 2009)。简言之,世界社会论坛和全球正义运动标志着,在一个具有鲜明后政治特征的时代里,全球反抗资本的运动已在组织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Mouffe 2008)。

那么,全球正义运动的社会动员何以在(瑞典)主流新闻中脱颖而出的呢?一方面,与剥夺性积累的特点相联系的政治议题(如债务免除、金融投机和放松管制的后果等)越是温和,越容易进入新闻流中。债务免除、对金融投机征税以及主张对某些民生用品(特别是水)的使用权等要求得到了主

流媒体的报道,有时甚至被全球正义运动之外的政治评论员和参与者所支持。另一方面,最终,越来越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大部分的媒体对全球正义运动的再现都倾向于认为全球经济体系中要发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并无可能。当要求彻底的债务免除这样的政治行动在新闻媒体中得到再现时,报道框架便忽略了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计划的社会运动中的长期斗争。事实上,西方政府的代表因将这样的议题带到全球峰会的议程中而受到赞赏(Ekman 2011)。美国新闻媒体的研究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正如兰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和其同事对美国新闻媒体所做的研究中总结到的:“新闻媒体对全球化论争的建构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也许是,世界经济论坛(WEF)的精英们被过誉竟是因运动人士长期以来所界定的、并力图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新闻的议题”(Bennett 2004,450)。反对剥夺性积累的大型社会运动的抗争大多遭到忽略,而当他们在新闻中崭露头角时,他们的抗争被描述为落伍行为。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关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话语中,农民运动和抗争被架构成阻碍了南半球更广大地区的经济进步和繁荣的东西。至少在主流媒体报道世界社会论坛的政治议程时确实是这么回事。

更激进的政治议题对抗的是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理论基础本身,但这些议题却湮没无闻;相反,许多新闻报道往往要么侧重于全球正义运动在政治和社会诉求上的混乱这一报道框架,要么将视线投向抗议过程中发生的暴力行为。举反对峰会的全球抗议活动这个例子来说,该新闻流中的政治维度完全让位于对暴力的报道,甚至是对潜在暴力的报道。后者主要体现为,新闻报道将即将发生的抗议活动作为暴力威胁、作为无可避免的暴力对峙乃至不在场的暴力(通过对游行示威出奇地和平这一特点进行评论来实现)来呈现(Ekman 2011,136)。当涉及政治事务时,全球正义运动受到了负面的刻画,与全球峰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实践和过程产生关联(Ekman 2011)。

如果仔细看看媒体对暴力的再现你会发现,暴力实际上构成了新闻报道的基本期待。在影响深远的对抗议活动的历史解读中,聚焦暴力俨然已成为一个要素,被移植到新闻业与国家/警察机构之间的话语实践中(Halloran, Elliot and Murdock 1970; Murdock 1981; Carter and Weaver 2003; Doyle 2003; Cottle 2006)。媒介化暴力倾向于再生产以治安为基础的法律和秩序话语,并充当了权力合理化的凭借,而在此过程中,新闻业将系统暴力

再现为保护公民和维持总体秩序以对抗组织化的暴力抗议活动的必要手段(cf. Wahl-Jorgensen 2003)。因此,对全球正义运动的社会动员来说,媒介化暴力可以被看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闻媒体将部分抗议和抗议者贬低为暴力。另一方面,新闻媒体通过传播法律和秩序意义上的治安话语,使系统暴力得以合法化和正当化(Galtung 1990)。例如,在对抗议 2003 年坎昆市举行的 WTO 会议的社会动员的新闻再现中,新闻媒体不着痕迹地将会议的军事化管理框架为“安保”议题(Ekman 2011)。许多新闻将现场大规模的军队和警察(超过了两万人)、军用直升机、军船以及警察筑起的重重关卡描绘为对 WTO 参会代表的保护(Ekman 2011,157)。同时,游行示威被描述为对自由贸易的威胁(Ekman 2011,156)。这种形式的客观暴力便在国家/资本军事化和新闻媒体之间的交集处浮现出来(参见 Žižek 2008)。

总之,全球正义运动的新闻再现通常被全球化、经济学、社会抗议与政治这样的霸权性话语所支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是以“全球主义”(globalism)这样的支配性话语出现的(Fairclough 2006)。在新自由主义争夺霸权的时期,它在解释社会变革何以在媒介化的公共政治辩论中发生的过程中占据了优先地位(1999—2007 年之间,Ekman 2011)。对全球动员和抵抗的新闻报道因缺乏对未被内部系统化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大型讨论或解释而被最终具体化了。反倒是,现实遭到切割、简化和包装,并且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全球经济的支配性话语的背景中得到具体化(Ekman 2011)。正如媒体学者伯格列兹(Berglez)所认为的:新闻业“虽然掩盖了政治抗争的激进维度(削弱了它的左翼和阶级属性),但仍然对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抗争‘表示了部分的拥护和理解’,从而为激进政治抗争转化为他种(正常的)日常生活实践铺平了道路”。因此,反对剥夺性积累的大规模全球社会动员并没有通过传统媒体的披露而赢得实质上的政治合法化。

## (二) 对日常网络活动的剥夺

通过考察网络传播体系和平台的具体作用,第二部分将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理论用于媒体与传播的研究中。在这里,马克思(Marx 1867/1990,668ff)对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的讨论可以解释社交媒体的用户进行的网络活动如何被资本占用并被转变为剩余劳动。所以在此我要深入探讨怎样理解 Web 2.0 上日常社交媒体用户的活动(通常指生产性使用者)及其与资本家利益的关系(参见 Fuchs,2009;Jakobsson and Stiernstedt 2010)。通过剥削 Facebook、You-



tube 等社交媒体网站的网络活动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之所以成为可能有赖于出售用户,更具体地说,出售他们的网络活动给广告商。媒体受众作为商品这一概念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已有过很好的讨论(参见 Smythe 1982; Mosco 2009,136ff)。斯迈思的主要观点在于受众是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斯迈思的概念突显了媒体生产者在构建受众与广告商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受众商品化的概念亦将媒体机构作为资本流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置于“总体资本主义经济”(total capitalist economy)中(Mosco 2009,137)。然而受众进行如观看电视这样的活动是为媒体所有者工作这样的理念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引起过大量争议。媒体学者博林(Bolin 2011,37)认为,“观看电视可以被理解为工人劳动力再创造的一部分”。观看电视并非生产性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可以被定义为广告商和媒体公司所承担的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如此一来,看电视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作为统计数据的观众),但它不能被视为劳动(Bolin 2011,37)。在资本流通的第一阶段,资本家尚只是扮演商品购买者的角色,此阶段中媒体公司购得观众的人口统计数据(Mp)以用于制作广告(参见 Marx 1867/1990)。然而,莫斯科(Mosco 2009,137)认为斯迈思的受众构成了劳动的想法是有用的或者说不容忽视。事实上,斯迈思这一唯物主义理论中的真知灼见在于提出了“媒体公司—观众—广告商”三者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的构想(Mosco 2009,137)。媒体不仅是意识形态生产者或传播者,而且也完全融入到了资本流通中,这一看法在分析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时,无疑是非常有用的。

在 Web 2.0 用户的案例中,侵占过程事实上就是侵占劳动的过程。当用户通过形形色色的互联网商业平台和站点进行传播活动时,资本剥夺的是用户所做的一切。例如,在 Facebook 等网络平台的案例中存在着一个将日常用户的上网活动的剩余劳动转移到资本流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向广告商提供某些具体的用户而得以完善的,并且这一过程是基于网站流量中所获得用户信息以及互联网上的网站和其他地方的用户的使用偏好和上网活动。在这里,每当我们上网时,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构成了被侵占的劳动。大部分的用户活动都被不同的网站、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服务等所监控和圈占。实际上,你在这里可以谈及把生产资料(知识型的、传播型的和创造型的)与劳动者(生产性使用者)相分离的过程(Marx 1867/1990: 875)。它虽不是直接的强制分离,但也是间接性的。间接的强迫因素主要是当你远离 Facebook 这样的网络平台时将会体验到一些劣势,比如失去工作

机会、人脉、社会关系及其他非物质资产等。不参与这些网络平台的代价可以与“出卖”你所有的信息和活动给从商者以获得参与机会相抵消。结果,日常上网活动就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潜在剩余劳动领域,随时可能被转化为剩余价值。这一过程随着监控系统的出现而获得改进,因为监控系统可以将你上传的东西、你“赞”(liked)(例如在 Facebook 中)过的帖子、你的电子邮件中的内容(例如在 Gmail 中)、你固定访问的网站和你在互联网的商业领地里冲浪时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予以分类,从而对用户行为实施跟踪、对上网活动予以监控(Fuchs 2011; Jakobsson and Stiernstedt 2010)。

然而,并非只有以文本、图片、视频形式出现的用户时间和工作以及其他层面的个人信息(以无偿劳动的形式出现)被资本剥夺。诸如 Facebook 之类的网站也改变了用户与商业公司之间的社会关系。当用户把商业公司、品牌及其他商品整合进他们日常的社交网络中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就演变成另一种私人关系,与你的日常社交生活中所拥有的关系非常相似。例如,可口可乐在其 Facebook 网页上拥有几乎 4000 万的粉丝<sup>①</sup>。由于公司、品牌和产品在如 Facebook 这样的网站里有他们自己的网页,那么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将可能是实时的和永无止境的。通过变革与产品和消费有关的人际传播,社交网站上的活动也推进了商品化的个人主义。大型跨国公司的营销策略旨在创造环境将私人 and 个体生活的持久部分予以殖民化从而俘获社会本身。这反映了或者说事实上推进了杰哈利(Jhall)所说的“对我们文化势不可挡的……商业殖民化”。这种具体化过程的最终面貌很可能是那种放任将个体建构为品牌或商业品牌的平台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这种现象在博客领域里非常显而易见。为抓住广告公司的眼球以便从商业部门获得利润,成千上万的博主通过在 Web 2.0 的沟通平台上纳入或曝光他们的消费,充当了大品牌和产品的广告海报。结果,沟通平台和基础设施构成了一个深具活力的劳动剥夺的舞台和雇佣劳动之余的“生活”。当日常生活的闲暇时间和社会条件整合进资本积累的生产-消费关系中时,用户作为图片、文本、视频、故事的无偿生产者而被具体化,而后者被转化成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和公司。诸如 Facebook 这样的商业平台上的用户原创内容的所有权归属、存储和处理,都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目的。当然,这是企业投资的整体理念。事实上,互联网充斥着资本的利益,因此你基本可以将其归为“企业

---

<sup>①</sup> 以“赞”的形式(Facebook 2012)。

所支配的……空间”(Fuchs 2011,337)。

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具有重大影响。例如,根据有关公共空间私有化的研究,现代手机技术具有新颖和能动的方式来引诱对象进入资本积累的生产-消费关系之中。对公共空间私有化过程的传统讨论聚焦于公共空间如何被转化为大型购物区、企业化区域、封闭社区等,产生了森尼特(Sennett)所说的“死去的公共空间”(dead public spaces)。这些经过消毒的、由企业掌控的商品化空间遍布全球,越来越引人注目。这些空间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他们如何通过将消费模式整合内化于日常生活的组织中来影响社会关系和行为。

然而,随着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有的公共空间都被潜在地商品化了。一个人很可能通过手机频繁登录他的 Facebook 账户,仅仅这一事实就开启了公共空间商品化的全新维度。这意味着你至少有可能会成为持续的企业监控的对象,会被整合进你的网络里的诸多行动者所监视,因此你所进行的是被资本侵占的无偿劳动。这不仅对隐私概念本身(参见 Fuchs 2011,313)而且事实上对构成闲暇时间、工作与公共空间的整个概念体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智能手机通过使用快速反应码(Quick response-codes)等使传统广告与网络活动达成互动,物理公共空间(physical public space)里的活动(无论是在去上班的地铁上还是在你住宅区墙上的广告牌上)就融合进了你虚拟空间里的活动中。这样的“应用程序”似乎促进了个体传播模式的发展,也使私人主体殖民化,并通过将他们转移到资本积累的生产-消费关系中从而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社会行为模式。这样的“应用程序”具有一种双重商品化的特征,它们既是用户要购买的商品,同时又吸引用户投身到更多的消费活动中。毋庸置疑,当网络传播发生时,手机的发展和空间的大规模错位也开启了更积极且具创造力的非商业传播行为。它也为反抗资本和支撑劳动剥削的政治结构的社会动员和抵制行动增添了力量(Fuchs 2011)。当然,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在于沟通型社会关系被资本殖民化。

与剥夺性积累的特征相关,诸如 Facebook、MySpace、Gmail 和 YouTube 之类的网络企业主对隐私的监控和侵入可以理解为是社会关系及其自身具体化的扩展方式。但我也想强调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另一种内在因素——暴力——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接受齐泽克(Žižek 2008)的系统暴力及其后来继承他的思想的主观维度(物理的)和客观维度(结构化的或符号化的)的暴力的思想,我们就可以认为,企业凭借先进技术监控我们上传的信息和我

们参与的网络活动,而这种对私人主体的监控已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客观暴力。倘若对这些海量信息如何存储和使用缺乏透明度,如此占有大量的私人与群体的私密信息,就会被理解化对主体的潜在威胁。遍布广告的网络和平台出于满足广告商的利益会审查和禁止某些内容和活动,除此之外,私人主体的信息有可能被出售给任何人。这意味着,有关政治议题或其他社会敏感事务(用户可能认为隐私设置和亲身交流非常隐私)的信息,会被收集起来,服务于商业广告以外的目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网络企业的监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潜在威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信息被用作何种目的,谁在购买这些信息,私密或个人信息流通到何种程度都没有安全保障。Facebook 之类的企业所拥有、搜集和加工的敏感信息,可以作为商品出售给军事-工业联合体的主事者或政治人物。因受监控的主体和从用户发出的持续信息流是市场里的商品,因此客观暴力成为了一种对那些个人或私密信息与主政的政治经济势力的当前利益相矛盾的那批人的潜在威胁。

#### 四、结 论

为了识别新闻媒体与传播体系在当前资本积累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我曾提出,马克思(Marx 1867/1990)的原始积累概念和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理论可以对批判媒体和传播研究产生贡献。原始积累作为资本扩大再生产中的一套持续显现的特征,该概念有助于理解当前新闻媒体的内容、新闻流和新闻媒体体制以及网络传播平台里的一些显著元素。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资本积累突显的过程与马克思所描述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如出一辙。当前的全球危机表明,资本扩大再生产正面临诸多限制,因此对确保资本积累的新途径的开拓表明,我们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方面正被并将继续被重新置入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中。在这些变革的过程中,商品化的新领域不断被发现,侵占无偿(闲暇时间)劳动的方法不断得到开发。在这些过程中,新闻媒体体制和网络传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本文触及了两个原始积累/剥夺性积累对媒体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贡献的两个领域。

首先,我分析了新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维度以及财经新闻流和体制在资本积累中发挥的功能。第二,我探讨了剩余价值是如何在日常互联网应用和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不同方面。

第一个方面可以概括为新闻媒体怎样促进了公地的私有化、怎样支持了公共资产向私有产权关系的转移以及怎样将反抗资本的社会动员去政治化和去合法化。另外,本文呈现了新闻流及新闻媒体体制与金融流和金融从业者之间如何达成利益的一致并相互勾结,由此建立了与金融新闻与金融业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关系也依附于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迅速变革和资本积累的时空压缩。

第二个方面则剖析了 Web 2.0 的政治经济学并特别关注了生产性使用者(producers)如何被商品化并被出卖给广告商,以及用户在如 Facebook 这样的网络平台里所进行的网络活动如何被资本占有。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应用的商品化的影响有可能非常深远。资本所主导的对闲暇时间的殖民化,对消遣娱乐、人际关系乃至个体本身的整体商业化,因企业对社交网络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层面的控制而成为可能。对私人信息进行商业化收集、拥有和处理的互联网监控是资本流通中的一大资产,可被视为是对用户的潜在威胁,甚至是资本主义剥削形成的客观暴力的一部分。

无可否认,本文侧重于体现一些负面的方面,比如主流新闻媒体如何促进和再生产了资本剥削,比如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如何被资本殖民化,再比如商品化过程如何往往支配了全球媒体和传播体系的信息流。然而,媒体生产和传播技术的多个方面也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并且开启了全球背景下对抗霸权的新形态。另类和激进媒体的积极生产和流通和当前建设公共互联网的抗争是批判媒体和传播研究中有待突显的重要方面。新闻媒体生产和传播技术领域从来就不是单一而僵化的,因此它也需要从不断涌现的另类视角进行理论化和分析(参见 Fuchs 2011)。毕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开创性理论也指出了整体资本剥削的其他可能性。

### 参考文献:

- Almiron, Núria. 2010. *Journalism in Crisis. Corporate Media and Financialization*.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 Arrighi, Giovanni. 2010.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 Bennett, W. L. Pickard, V. Iozzi, D. Schroeder, C. Lagos, T. and Caswell, E. 2004. Managing the public sphere: Journalistic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437—455.
- Berglez, Peter. 2006. *The Materiality of Media Discourse-On Capitalism and Journalistic Modes of Writing*. Örebro: Örebro.

Studie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4.

Bolander, Hans. 2000a. A°tta skäl som talar för Telia. Expressens Hans Bolander: Därför kan aktien bli en vinnare. *Expressen*, May 21. 6.

Bolander, Hans. 2000b. Börsexperterna tror på klipp. *Expressen*, May 31. 6.

Bolin, Göran. 2011. *Value and the Media*. Farnham and Burlington: Ashgate.

Callinicos, Alex. 2009.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olity Press.

Carter, Cynthia. and Weaver, C. K. 2003. *Violence and the Media*.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Cottle, Simon. 2006. *Mediatized conflict: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nflict studies*.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Dalarnas Tidningar. 2010. Sa° mycket har Teliaaktien fallit. Dalarnas Tidningar 14 June 2010.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2. <http://www.dt.se/nyheter/dalarna/1.3086140-sa-mycket-har-teliaaktien-fallit>

Doyle, Aaron. 2003. *Arresting Images: Crime and Policing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Camera*.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Ekman, Mattias. 2011.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 in Swedish Media: Hegemonic formation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journalism and capitalism*. (English title) Stockholm: JMK.

Facebook. 2012. Facebook CocaCola.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2. <http://www.facebook.com/cocacola>

Fairclough, Norma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Fraser, Matthew. 2009. Five reasons for crash blindness.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20(4): 78—83.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reflections on Manuel Castells' book *Communication Power*.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7(1): 94—108. Accessed 27 February 2012. <http://www.triple-c.at/index.php/tripleC/article/view/136/90>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Galtung, Johan. 1990. Cultural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7(3): 291—305.

Gramsci, Antonio. 1929—35,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alloran, James. D. Elliot, Philip. and Murdock, Graham. 1970.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Hartsock, Nancy. 2006. Globalization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David Harvey's Dialectical Marxism. In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Castree, N. and Gregory, D. Malden, MA: Blackwell.

Harvey, David. 1982.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Harvey, David. 1989.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71B:3—17.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06.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Harvey, David. 2010a.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Harvey, David. 2010b.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Hesmondhalgh, David. 200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Sage.

Hope, Wayne. 2010. Time Communication, and Financial Collap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2010:649—669.

Jakobsson, Peter. and Stiernstedt, Fredrik. 2010. Pirates of Silicon Valley; State of exception and dispossession in Web 2.0. *First Monday* Volume 15, Number 7. Accessed February 25,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799/2577>

Jhally, Sut. 2000. Advertising at the edge of the apocalypse. I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ercialism*. Edited by R. Andersen and L. Str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ein, Naomi. 2001. Reclaiming The Commons. *New Left Review* nr. 9

Luxemburg, Rosa. 1913, 2003.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Classics.

Magnusson, Karl. Erik. 2000. Teliä spa's en bra start. Experterna ra'der till köp av den nya folkaktien. *Göteborgs-Posten*, May 22. 35.

Marx, Karl. 1857, 199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Marx, Karl. 1867, 1990.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Marx, Karl. 1885, 1992. *Capital: Volume 2: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

don; Penguin Classics.

McChesney, Robert. W. 2007.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London: The New Press.

Mediearkivet. 2012. Accessed on February 25. <https://web.retriever-info.com/>

Meidner, Rudolf. 1993. Why did the Swedish Model Fail? *Socialist Register* Vol. 29: 211—228.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ouffe, Chantal. 2008. *Om det politiska*. Hägersten: Tankekraft.

Murdock, Graham. 1981. Political Deviance; the press presentation of a militant mass demonstration. In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social problems, deviance and the mass media*. Edited by Cohen, S. and Young, J. London: Constable.

Ma<sup>o</sup> rtenson, Bo. 2003. *Den televiserade ekonomin-Nyheter om statsbudgeten 1980—1995*. Stockholm: JMK.

Norlin, Arne. 2000. Sa<sup>o</sup> köper du Telia-Den nya folkaktien. *Aftonbladet*, April 15. 5.

Olivera, Oscar, and Lewis, Tom. 2004. *Cochabamba! Water Rebellion in Bolivi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Schechter, Danny. 2009. Credit crisis; How did we miss it?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20(1): 19—26.

Sen, Jai, and Waterman, Peter. (eds.) 2009 *World Social Forum Challenging Empires*. Montreal/New York/London: Black Rose Books.

Sennett, Richard. 1992.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Smythe, Dallas. W. 1982.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Durham, M. G and Kellner, D. M. 2006. Malden, MA: Blackwell.

Viscovi, Dino. 2006. *Marknaden som monster och monster. Ekonomiska experter och nyheter om ekonomi i Rapport 1978—1998*. Göteborg: JMG.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1. *Liberalismens död*. Stockholm: Vertigo.

Wahl-Jorgensen, Karin. 2003. Speaking Out Against the Incitement to Silence; The British Press and the 2001 May Day Protests. In *Representing Resistance-Media,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 Edited by Opel, A. and Pompper, D. Westport/CT: Praeger Publishers.

Wendel, Per. 2000. Sa<sup>o</sup> köper du folkaktien. *Expressen*. May 21. 6.

Žižek, Slavoj. 2008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New York: Picador.

Žižek, Slavoj. 2009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伊安·费舍尔(Eran Fisher)<sup>①</sup>

## 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

——社交网站中的受众劳动<sup>②</sup>

俞平(译),吴畅畅(校)

[导读]受众劳动的概念已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关注与媒体所有权,认为媒体也是一个由特定生产关系组成的生产场域,而受众劳动这一概念对此作了修正,突出了受众在媒体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受众既是商品也是工人,因此将问题的焦点指向了受众剥削。近期,媒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型——尤其是Web 2.0和社交网站的出现,使得人们对政治经济学分析又重新燃起了兴趣,并对受众剥削进行再思考。本文将脸书(Facebook)作为个案研究的范例,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两大主题——剥削与异化,来探讨社交网站中的受众劳动。本文认为,受众劳动中剥削与异化之间的历史转向是伴随着大众传播向社会化媒体过渡这一过程的。在大众传播时代,对受众劳动的剥削能力是很有限的,而异化后,这一能力便大大提高了。与此同时,社交网站中的受众劳动,因其涉及到传播和社会性,因此通过自我表达、真实性以及与他人的关系能够缓解异化。此外,本文还提出,社交网站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剥削和异化的辩证关系之上的:为了去异化,脸书的用户必须相互交流,进行社交,但这样却加重了自身的被剥削。反之亦然,脸书为了能

---

① 以色列开放大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传播学系,eranfisher@gmail.com。

② 感谢尤里·兰姆(Uri Ram)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一并感谢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和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为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够剥削其用户的劳动,就必须为他们去异化。

[关键词]受众劳动;社会化媒体;社交网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剥削

## 一、大众传播中的受众劳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贡献极为深广(如,参见 Hardt 1993, Artz, Macek and Cloud 2006)。而媒体研究分为各具影响力的两大分析维度:文化分析和唯物主义分析。<sup>①</sup>这两种方法在精确定义受众扮演何种角色时,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文化分析聚焦于超结构,并揭示出媒体内容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角色。举例而言,此类文化研究分析(Holmes 2005, 23—24)包括对书籍(Radway 1984)、杂志(Lutz and Collins 1993, Stevenson Jackson and Brooks 2001)、广告(du Gay et al. 1997, Section 1)、电影(Wasko 2001)、电视节目(Liebes and Katz 1994)、新闻(Said 1981)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行分析(参见 Akass and McCabe 2007)。分析媒体内容潜在的意识形态关涉到一些资本主义关注的问题,如阶级、消费主义和不平等,以及其他议题,如性别、民族主义和种族(参见 Hooks 1996, Hall 1995)。

这一分析维度的发展核心围绕着两大思想遗产:法兰克福学派(Adorno 2001, 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6)和伯明翰学派(Hall 1980, 1995)。这两大学派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意识形态研究的阐释和对受众扮演角色的论述的不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是被强加于被动的受众的。因此,他们研究的是意识形态如何被融入媒体信息之中。而伯明翰学派则赋予受众积极“解码”(摆脱强加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能力;或是“解读”媒中的体意识形态信息的能力,并抵制这些信息(Hall 1980, Mathijs 2002)。因此,他们展开的是,在媒体文本的多重意义建构中受众作为参与者的理论化研究(Ang 1985, Morley 1992)。一般说来,无论是假设意识形态内容是自上而下地通过宣传途径传到给受众的,还是假设受众积极参与到意义生产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部分思想成为了媒体分析的一个意识形态场域。

---

<sup>①</sup> 我使用“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两个概念来区分两类观点(ideal types),指的是分析类型,而非指代实际的学派,或具体研究者,后者指代的意义通常更为微妙。例如,我不会研究为何法兰克福学派从不研究意识形态,但我会探讨文化研究的理想类型及其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是如何集中体现在该学派的著作中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传播学研究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聚焦于“基础”(base)的唯物主义分析。这一政治经济学分析揭示了媒体机制中的生产关系。同时,人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两大主要的研究方法。首先,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媒体的所有权。这一研究方法将媒体作为一种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进行剖析,探究媒体垄断、传媒公司并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媒体工作者的就业等问题(Mosco 2009; Mosco and McKercher 2009; Schiller H. 1991; Schiller D. 2010; McChesney 2008; Herman and Chomsky 1988)。20世纪70到80年代,人们常常将媒体作为一个天然的生产场域来分析,突出受众在创造媒体价值过程中所扮演的生产角色——既是商品又是劳动力,从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修正。这一研究方法的开创者是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他关于受众商品的突破性研究(Smythe 1981)奠定了这一方法的基础。斯迈思认为,大众传播过程中最受要的并非受众对媒体内容(由传媒公司创造)的消费,而是向广告商出售受众的注意力。这一假设使受众成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领域一个主动的参与者。斯迈思还提出,受众的劳动包括认知和情感两方面:学习渴望和学习购买某些特定品牌和特定商品。他批评上文所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存在“盲点”,因为这种分析法只关心媒体产品的内容。

斯迈思没有将媒体仅仅视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超结构的工具,即支持经济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的工具,类似于工厂里放置的机器一般;相反,斯迈思将媒体定义为资本积累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媒体将受众商品贩卖给广告商。作为回报,受众离不开电视,于是也一直在观看着广告节目,这成为了最重要的消费助推器。斯迈思首次将大众传媒和受众置于发达资本主义的中心,提出“大众传播生产出了受众,并将之作为商品贩卖给了广告商”,同时广告商通过“使受众自己走向商品市场”实现了“受众力量”(audience-power)(Jhally and Livant 1986, 129)。从某些方面看,斯迈思将伯明翰学派的积极受众的概念从意义生产场域移植到了赚钱获利的市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论路径进一步发展,将媒体作为一个天然的价值生产的场域进行分析。杰哈利和利凡特(Jhally and Livant 1986)认为,斯迈思过于关注受众劳动对于品牌生产者的贡献,这“已经偏离了传播学分析,发展成了对受众消费行为的分析”(Jhally and Livant 1986, 129)。他们说:“斯迈思最终关心的是,如何在更广泛的社会资本生产体系内将注意力吸引到传播领域。”(同上, 129)杰哈利和利凡特批评斯迈思过分强调了

信息(作为刺激消费)的使用价值,他们则探索了“更深深植根于传媒产业”的盲点(同上,129)。因此,他们将观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因为观察能够影响人对价值创造的“感知能力”(同上,126)。媒体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基于“额外收看”电视广告所得,即以超出实际需要地收看过多广告来支付电视节目制作。这一“剩余收看时间”(同上,127)意味着受众实际上是在为节目制作方劳动,而非广告商。

在这样的分析视野里,媒体被描述成一个受众(劳动力)和媒体提供商(资本)激烈争斗的场域,并且这场斗争随时间推移不断重复上演。杰哈利和利凡特(Jhally and Livant 1986)借用马克思对广泛剥削和集约剥削(extensive and intensive exploitation)的区分,进行了上述分析。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斗争永远是随时间推移不断重复进行的,因为剩余价值只能从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内产生。这部分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并非的用于交换等价物,而是被归入资本,并被纳入资本积累的过程(例如,通过投资新技术)。由于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紧随着一个阶级(工人)的价值创造过程,且被转入另一个阶级(资本家)时未对工人阶级进行补偿,马克思将此定义为剥削。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天然生成的问题便是,剩余价值会随时间流逝而消失,资本积累也就丧失了其来源(Marx 1993, Ch. 13)。资本努力拓展更多途径以扩大剥削的范围,以此提高或仅是维持其剩余价值率。实现这个目标有两种方式:广泛剥削和集约剥削。广泛剥削指的是通过技术和劳动统筹规划增加劳动时间,例如延长工作日,或则减少午休时间和假期。集约剥削则是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实现的。杰哈利和利凡特(Jhally and Livant 1986)提出,这两种剥削的过程中大众传播领域都早已发生。受众历来都被要求付出更多的劳动。广泛剥削的实现是通过带给受众更多广告,这样便能使之观看(即劳动)更多时间。集约剥削,或曰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则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重组观看人群和观看过程”(Jhally and Livant 1986, 133)。重组观看人群包括各种技术手段,从媒体市场调研到评估体系,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帮助媒体公司能够将特定广告投放到某一具体受众群中,如市场细分能使广告价值得到提升。正如杰哈利和利凡特所说:“将受众群体具体化、细分化地对待,能够使受众形成一种‘集中观看’,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存在无效观看。”(133)因为具有高度针对性的广告投放成本更高,“我们可以说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受众,观看得‘更为卖力’,更集中,也更有效率。”(Jhally and Livant 1986, 133—4)相对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另一种

方式则是,通过较短的广告分割时间段。

## 二、大众传播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十分关注传播中的剥削问题,但却几乎不曾在这一框架中提及异化这一概念。这一点非常奇怪,因为马克思认为这剥削与异化之间存在着解不开的关联。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念相当复杂,也是多层次的,涉及过程和结果。异化是指工人与重要的生活过程和事物相分离,以及与这些事物之间产生的陌生化状态。这正是工人与劳动过程、与其他工人、与劳动产品的疏离,以及最终与他们自身——这一物种——的疏离(Marx 1978)。资本主义劳动最终导致的是异化,它不是一种工人自主掌控的活动;也并非由劳动来具体化一个人的本质;也非一种自我实现和表达的途径;更不可能使人通过劳动与他者关联、交流、合作。

我使用异化一词,借其较为宽泛的含义,以突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人文主义特性,也是将其与结构主义批评和经济学批评区分开来。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异化和剥削是密不可分的,甚至被认为是互为补充的两条教义。异化既是剥削的前提,又是剥削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和劳动商品化,而异化和剥削是这二者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解决其中一方,则另一方也无法解决。然而,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它们却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两个不同方向分别来自于(受阿尔都塞影响)青年马克思和思想日趋成熟的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较为人文主义的批判,而成熟的马克思则更侧重于经济主义的批判。这一区分在实践中的准确性有待商榷(成熟的马克思还坚持认为异化与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因和结果有关)。尽管如此,它仍抓住了深入探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两大关键的切入点。

异化造成了“价值”和产品与其生产者分离的社会经济环境,并将价值和产品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此外,异化暗示着一种存在状态:不控制任何事物(劳动过程、产品等);一种疏离(与个体的人性等)。深入探究这一概念,以及为何将之与剥削联系起来,是人文主义视角凸显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我使用“异化”一词来指代劳动、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以及人的本质产生

或多或少的异化现象的条件。这样对纯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妥协,得到了史实的证实。诚如吕克·布尔当斯基和夏娃·夏佩罗(Boltanski and Chiappello 2005)所述,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一再用一个问题掩盖另一个问题,而非消除这两个问题本身。由此可见人文艺术批判与经济社会批判之间的区别。本文中,异化程度较轻意味着有更多自我表达的可能;更有可能控制生产过程、使本质客观化、与他人联系与沟通。例如,在某人的 Facebook 主页上“劳动”与收看电视节目所作的劳动相比,前者的异化程度较轻。

在自由话语体系内,收看媒体节目只是意味着一种休闲活动。媒体消费被描述成异化的对立面,因为异化作用于生产领域;它是一种对工作日异化的逃离,是去异化的一个机会(正如使用与满足理论中所援引的例子,见 Blumler and Gurevitch 1973—4)。因此,收看媒体节目是一种消费行为,体现了受众主动选择的能力。劳动过程中,工人没有任何控制力,与之相反,收看电视时,人们一般认为控制权是在观众手里的(准确地说,是随着遥控器的诞生而来)。那么,收看大众传媒就在自由话语体系中被建构成一种消费主义的、非理性的、有趣的,并能满足需求的活动。

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忽视了异化问题,而文化主义分析却关注到了异化的一些核心问题,即便未触及本质。在资本主义媒体环境中,如果收看是一种劳动形式,那么劳动过程和内容也是与受众本身相异化的。事实上,广告和节目(支持广告内容)都导致并加速了受众异化,这意味着自我满足和客观化应该,同时也将来自于消费和休闲活动,而非来自于劳动。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Adorno 2001, Ch. 6)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此类分析却没有明确地将受众剥削与受众异化直接联系起来。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异化和剥削是密不可分的,也是资本主义基石——私有财产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必然结果。一方不得解决,另一方也不可能解决。

### 三、社交网络中的受众劳动:以脸书(Facebook)为例

近期,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人们重新燃起了对受众劳动的兴趣,尤其是在 Web 2.0 和社交网络出现以后。新媒体环境的某些特征使对受众劳动的再思考显得尤为重要。与大众传媒相反,社交网络的特征体现为高度参

与性；用户提供内容(UGC)；创造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包括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

马克思主义的新媒体环境研究几乎只聚焦于受众剥削。同时，主流研究(自由主义的)则倾向于重申共识，对社交网络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即社交网络通过向用户提供自我表达的机会、真实性、沟通交流、与他人合作的可能，并且使之能够深刻地参与到文化、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去，甚至能获得一定的控制权。

我认为，这两大趋势貌似互相对立，实则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在解读社交网络时，剥削和去异化并非两个简单对立的角度；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鼓励我们兼容并蓄，将二者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中。社交网络通过向用户提供了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真实性、沟通交流、与他人合作的可能，因此也赋予了受众更多对象化的机会。当用户沟通和社交能力被改写时，他们的劳动同样成为了剥削的对象。接下来，我将以脸书为例，详细考察社交网络剥削和异化的辩证关系。

### (一) 作为传播工具的脸书

社交网络用户都在做些什么？他们究竟生产了什么？他们是如何被剥削的？为了对脸书进行辩证地分析，我们应该既将其视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生产的工具。它不仅是一种兼容多种新交流方式的新媒体(Napoli 2010)，还是推动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技术。这种分析能够克服早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弊端，即将交流工具和生产工具两种功能割裂开作分析。当这种辩证的研究方法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大众媒体研究时，这种方法在新媒体环境中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新媒体环境中交流与生产的关系更为紧密。事实上，Web 2.0 的独特性激发着研究者对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进行更详细的探索。(Scholz 2010, Lee 2011)

脸书是当今世界最流行的社交网络，于2004年2月推出，至2011年12月底已经拥有8.45亿活跃用户(Facebook 2012b)。脸书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以创建个人主页的平台，使其能够充分展现自己，并能就其行踪、想法、感受和活动进行不同深度和广度的交流。用户可将其他用户加为好友，与之交流，关注他们的公共消息和行踪。用户也可以根据共同的兴趣爱好创建社区或次级网络。用户在个人主页上能够根据不同类别来描述自己，例如性别、教育背景，也可以通过生活方式进行分类，如最喜欢的艺术家和

兴趣。

用户通过各种私人或公共工具与朋友交流,如“状态”,它能告知好友用户当前的位置和正在进行的活动;“墙”是每位用户主页上的一块留言板,朋友们能够在“墙”上留言;“聊天”功能则能够与朋友进行即时的私人聊天。用户还可以创建或加入兴趣组和“喜欢”页,这些功能最初是由政府、商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发起和运作的,将之作为一种广告、销售和动员的手段。包括脸书在内的网络社区过剩的现象可能导致社会行动——通过通讯和各种组织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公民的、社会的行动。报道称,脸书在推动和组织社会运动及政治剧变方面起到了日益核心的作用,从反对全球化运动到阿拉伯之春都是极好的例证。

脸书在社交方面具有天然的“倾向性”,因此即便是个人主页上一些个人行为也会被自动转化成为一种社交形式。例如照片应用中的照片“标签”,这是脸书最热门的一个应用,利用它用户能够上传相册和照片。如果一张照片中圈出用户的朋友,那么系统就会自动向这位朋友发送通知,并附上该照片的链接。这样,发布照片就会变成一种社交行为。

这样的描述突出了脸书作为社交工具的特性,这一特性使用户能够去异化,这正是大众媒体所欠缺的。大众媒体时代是由电视、广播、报纸和电影所把持的,是集权化的,只运行信息由少及众、自上而下地单向传播。大众传媒在主动的生产者与被动的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等级制的二元对立,媒体内容都是包装好之后再行销售的,因此缺乏多样性,它假设受众具有同质性,同时也导致受众需求的趋同。与之相反,社交媒体具有多种传播形式: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它是互动的,提高了用户的参与性,将大众媒体时代被动、同质的受众变为主动参与的受众。互联网上的传播使个人能够讲述他们的生活(如博客)、公开发表他们的观点(评论)、展现他们的创造力(YouTube)。互联网用户还能够在参与性日益提高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协作(Jenkins 2009, Burgess and Green 2009)。事实上,许多研究都是从人的物化角度来研究脸书的社交功能及其对个人的赋权能力的。

因此,互联网研究倾向于将多样性的、民主的、打破时空限制的传播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实现手段就是互联网。同时研究还关注脸书上的用户行为,尤其是个人有意通过该网站进行社交的用户行为。如《方法论的个人主义》(Popper 1971:Ch. 14)一文,将个人用户作为分析的起点;在此基础上,更多研究聚焦于用户满足度(Bonds-Raacke and Raacke 2010, Quan-



Haase and Young 2010),或关注脸书用户使用时的主观性和心理状态(Gonzales and Hancock 2011,Ong et al. 2011)。最后,传统的虚拟民族志研究也强调了脸书作为社交工具的特性,将隐私和私人领域的消融作为研究的首要问题(West, Lewis and Currie 2009; Brandtzaeg, Luders and Skjetne 2010)。

借用脸书网的宗旨“赋予人们分享的权利,让世界更开放,让联系更紧密。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在使用脸书与朋友联系、上传不限量的照片、分享链接和视频、更多了解所遇之人”(脸书,2012年),这些研究将其视为一个集传播、社交和社区于一身的虚拟空间。

## (二) 作为生产工具的脸书

公众和对脸书的研究都首先将其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并强调了它在去异化方面的贡献(或阻碍)。如上所述,本文的目的是要揭示出其中的物化是如何与剥削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回到现实,脸书首先是一家商业公司,其首要任务是资本积累,因此我们也应该将其作为一种刺激社会关系发展的技术进行分析。此类将脸书作为产生并加剧剥削的资本主义技术的分析应该与将其作为去异化的传播媒介的分析结合起来。

脸书的积累战略从其跌跌撞撞的市值可见一斑。当脸书的市值极度不稳且投机成分过强时,其估值仍在750亿到1000亿美元之间。脸书的身价确值1000亿美元?其价值源于何处?从社会学层面上看,社交网络的生产关系又是怎样的?我们不仅将脸书作为一种传播工具,而且还视其为体现社会关系的技术,借此我们能够逐步勾勒出社交网络政治经济学的轮廓。

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涵盖如下方面:把脸书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同时也是生产工具;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媒介。事实上,媒介与技术、传播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而脸书正是新生产关系的缩影,在这种新关系下,价值首先不是由工人创造的,而是由受众。脸书用户生产出的最重要的是传播和社交性——这是脸书价值的首要来源。

脸书的价值来自于其史无前例的信息获取、存储、占有、处理和分析能力,并能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用户。因此,脸书很可能被形象地误解为一个信息仓库,但是“仓库”这一比喻并不能真正体现脸书的创新性。为了更好地理解脸书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必须问,信息是由什么组成的?信息如何而来?又是由谁创造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将信息分为五大类,在

一定程度上它们之间是垂直层叠的关系,即人口学的、个人的、传播交流的、行动的和相关联的。此种分类说明,脸书绝非一座“仓库”,而是一家“工厂”,它通过传播和社交生产信息,而非简单的存储信息。脸书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也是对于政治经济学尤为重要的——是社交网络中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于对它的使用,来自于其本身作为传播和社交媒体的特性。因此脸书是传播(媒体)手段和生产(技术)手段的结合。

脸书用户之间的交流产生出大量的个人和社交信息,而对于消费品行业的企业来说,这些信息的价值日益提升。这些公司原本就需要通过广告、公关和市场专业人士急切地搜寻这些信息。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是相当“简洁”的,可称之为人口信息。社交网络成为记录、聚合、组织地理信息的主要网站。社交网络的地理区位信息来自于用户自愿开放的信息(如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或学历)或服务器所在地(地理位置)。虽然此类信息是“先于”脸书的,但并不能完全脱离脸书独立存在,因为是社交网络鼓励其用户开放个人信息的。脸书的使用条款中就有正式说明,禁止用户“在脸书上提供任何虚假的个人信息”,并引导用户“保证个人联系信息的精确,并及时更新”(Facebook 2011a)。事实上,脸书不断地调整隐私设置,以使用户信息尽可能提高公共开放度(Fuchs 2011a, 2011b)。更为微妙和根本的是,社交网络的伦理和规范是要求个人公开真实信息。早期在线社交形式,如论坛、聊天室和多用户网络游戏(MUD)等提倡的是一种匿名文化,而如今的社交网络则显示出与之相背离的态度(Turkle 1997)。

这就引出了第二类“更厚”的信息层,即从属于用户的身份和真实性的信息。社交网络的伦理要求的是公开性,用以定义、辨识个人,并将个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这类网站鼓励用户展现真实的自己,通过个人主页表达个性。这就要求用户反省自我,必须去思考、定义、表现自我。这一自反性是镶嵌在网站设计内的,鼓励用户全面、系统地开放自我。正如伊娃·伊鲁兹(Illouz 2007, Ch. 3)所说,基于个人信息的网站(如相亲类网站)在其使用条款里鼓励用户思考“我是谁”,根据网站预先设定的类别对自身进行归类,这样就使得开放个人信息显得更为合理。例如,在脸书上填写个人信息时,在“个人哲学”一栏内,用户可选择的类别有“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启发你的人”、“座右铭”。即便这类个人信息是在使用脸书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因此不能将其视作只不过是脸书所获得的先在信息,而是在社交网络的特定语境中相互勾连起来的信息。

第三层信息进一步依赖于用户对脸书的使用：基于用户传播内容的信息，即用户间的聊天内容。从经济学角度看，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否是由用户生产的，仍是有争议的。事实上，企业、专业人士的注意力以及那些希图定义社交网络的应用，都首先集中在传播的内容上。他们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分析人际和社交传播的内容，以破解人们谈话的内容及方式。经过分析的趋势、关键词、主题和表述方式能够与人口信息（如性别、地域或年龄）或行为信息（如消费行为）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有价值的商业信息。这样的信息是高度个人化的，能够在特定内容与特定的人之间形成特定的关系。

商业利益不仅打探用户的聊天，还使用社交网络发起、参与聊天甚至引导聊天方式。他们能够转发消息、制造热点、引领时尚，从而参与聊天。例如，病毒信息（或 meme）通常是由专业的公关人员制造和传播的（参见 Downes 1999, Green 2010: Ch. 11）。在此类情况下，用户本身就变成了媒体，而信息就是通过他们传播的。

虽然脸书上所传播的内容覆盖了人类交流的方方面面，但有两类信息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即一般信息（mundane information）和情感序列（emotional queues）。社交网络尤为擅长组织这类信息，且在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的价值日益提升。一般信息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一些表达，如旅途中的照片，或记录自己的所到之处（Beer and Burrows 2010）。迄今为止，人们仍认为这些关于日常生活的信息碎片过于零散、无关紧要，且个人化色彩浓重，因此在公共领域其价值不值一提。但社交网络特别适合这类信息，而这些信息反过来也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使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入了大众视线。情感序列是关于伴随着交流的主观情感的表达及情绪标准。情感序列通常与用户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如读到一则新闻或在超市排队结账。通过移动设备，社交媒体的泛在性和即时性意味着情绪一旦产生，就立刻被记录并表达出来，而非在回顾中重现。社交网络是个人的、人际间的和社会性的；同时也与休闲活动及社交相关；并且还鼓励用户乐于表达自我、坦诚相待，最重要的是要求用户具有高度的沟通性。鉴于此，社交网络尤为适宜生产和提炼以上两类信息。

第四层信息是行动的信息，即关于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活动的量与质的特征，如好友数、活跃度、在脸书上的参与度、花在脸书上的时间，以及活动类型（发帖数、上传照片数、“爱好”的数量和类型）等。

第五层,也是最后一层信息,与上一层紧密相关,即关联信息。这指的是社交网络的次级网络构成:一名用户与其他用户、与商业和政治网站、与新事件新品牌等之间的链接。通过建立关联网络,用户生产出一个个具有意义的网络、象征性的世界和语义场。关联信息对于进一步辨识和区别个体意义非凡。在后现代文明中,身份是通过各种标签建构起来的,用户“爱好”编织起的网络可以看作是辨识其身份的指标。因此,关联信息有助于揭开各指标之间的关系。此外,因为据此建构起的次级网络具有可辨识的特征,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公共关系角度看,次级网络是被高度区隔的组群,因为加入这些次级网络都是用户根据它们所显示的标签特征自愿选择的。故此,公关专业人士能够通过关联信息辨识出(也可以建构起)特定的组群,即对某一产品、服务或文化产品持积极态度的组群,并跟踪他们所生产的不同层次的信息,最终直接参与到这些组群活动中去(例如制造热点)。

从最基本的人口信息开始到最复杂的信息,如今社交网络使信息搜集更为简便,且并非局限于那些先在的个人信息。更为戏剧性的是,这些信息的产生和存在大多依赖于对社交网络的应用;依赖于人们在其中的参与,并且将大部分的生活投入在了社交网络上。这是通过每一次交流传播和社交活动所产生的信息。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五类在当代经济中价值日益提升的信息由一种传播工具生产出来的。

#### 四、社交网络中剥削与异化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媒介分析分为两个维度:一种是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方法;另一种是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更抽象地说,这两个维度分别代表着媒介完全不同的两个侧面:传播工具和生产工具。虽然马克思坚持对社会进行辩证分析,但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研究却普遍是在这二者中择其一作为切入点(Fenton 2007)。这并不是说这些研究就完全是非辩证的,而是说辩证法并未成为媒介分析的内在特性。例如,文化分析侧重研究媒介产品,如电视节目等,是如何从意识形态上维护了生产关系,而非单就媒介本身而言。

关于新媒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受众劳动的研究也有相对一边倒的倾向,强调社交媒体是剥削“自由劳动”的场所(Terranova 2004, Ch. 3)。这一研究方法被批评为过于绝对化,落入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窠臼

(Caraway 2011)。它低估了媒介作为劳动和资本斗争场所的潜力,对资本的研究有所偏颇。斯迈思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使得所有时间都变成了生产实践。这一论点随后伴随着社会工厂和非物质劳动这两个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卡拉韦认为,这一研究框架无法将休闲时间与劳动时间区分开来,也未能把劳动与自由劳动、劳动能力与劳动意愿区别开。由于缺乏区分性,这一研究方法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劳动的分类。斯迈思认为,工厂劳动时间的下降由花在媒体广告上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所抵消,而卡拉韦质疑了斯迈思的这一历史叙事。卡拉韦提出了另一种阐释,即赋予劳动以政治行动能力(agency)。据此,劳动时间的减少,休闲时间的增加是工人阶级自20世纪初以来坚持不懈、浴血奋战的结果。卡拉韦(Caraway 2011)进而又提出更为理论化的观点,即社会工厂和非物质劳动这两个概念的潜在批判性在当代语境是缺席的。特雷伯·肖尔茨也强调,脸书作为游戏场所和作为工厂之间是存在辩证关系的(Scholz 2010)。

在一连串的质疑之后,本文试图在斯迈思(Smythe 1981)、及杰哈利和利凡特(Jhally and Livant 1986)的研究基础之上,探索当代媒介形式中的生产与传播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进一步更新这些观点。本文认为,在大众传媒中,剥削和受众劳动无论是在范围上的扩散,还是程度上的恶化,都没有遇到太多阻碍。剥削范围的扩大受制于观众收看广告的能力。观看电视广告通常并非受众愿意欣然接受的事。因此,媒体不能播放过多的广告,以免失去观众的注意力(这是售卖给广告商的现实劳动力)。电视播放的新技术使得观众获得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如 TIVO),同时也为剥削进一步设限,因为受众可以选择跳过广告收看节目。

剥削程度的恶化同样也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大众传媒的监控、评级和细分系统代价高昂。<sup>①</sup>另外还存在一个悖论:关于关注的信息越精确,收看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上升得越多(Jhally and Livant 1986)。然而,价值的这一增长又被搜集精确信息的成本所削减。此外,观众的收看情况是基于统计分析的,因此不够精确和可靠。受众个体的需求、个性和行为则很难评估。第二个因素则限制了大众传媒中剥削在程度上的恶化,即剥削程度的加深需要媒体公司制作出能够提供恰当“诱饵”的节目,以吸引观众。如果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受众,或未能吸引到预期的那部分受众,就会输得一

---

<sup>①</sup> 例如,2011年全球最大的媒体评级公司尼尔森的收入超过55亿美元(Nielsen 2012)。

败涂地。

而社交网络却超越了这些限制,使得在大众传媒中受限的剥削得以在范围和程度上进一步扩展。用户在社交网络上花费的时间更多,这就使得剥削实现了范围上的扩大。脸书用户一直在不停歇地劳动。2010年1月,脸书成为美国网络用户使用时间最长的网站(Parr 2010)。网络用户平均花在脸书上的时间超过浏览谷歌、雅虎、YouTube、微软、维基百科和亚马逊时间的总和(Parr 2010)。尼尔森公司当月统计显示,美国用户平均每月用于浏览脸书的时间超过7小时,平均每天超过14分钟。脸书的美国用户还并非是最为铁杆的。2011年9月,行业检测与分析公司益百利发布的一份行业研究报告表明,脸书使用最频繁的是新加坡,平均访问量超过38分钟(Emerson 2011)。

此外,得益于移动设备(从笔记本电脑到智能手机)以及无线网络(从Wi-Fi到3G)的普及,用户几乎可以随时随地登录脸书浏览。收看电视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相比之下脸书则提供了更为灵活的使用模式。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天,人们都可以在脸书上花费更多时间用于社交。自我监察(Self-surveillance)技术,如Foursquare或脸书的位置服务也使用户与朋友们只有一臂之遥,并使他们的在线活动时间延长。

社交网络同样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大众传媒企业是通过调配资源来区隔其受众的,而社交网络则与之不同。在社交网络上,用户自主地将自己归类,只是电视时代无法想象的。这一过程成本低廉,因为事实上它是“外包”给用户完成的,用户此时就是生产者(Bruns 2008)。此外,社交网络所收集到的关于受众的信息也更为精确和“丰满”。因此,大众传媒对其受众的了解只是统计意义上的,是聚合在一起的抽象的碎片;而脸书所了解的受众却是真实的个体。社交网络的覆盖面能触及到更细微的方面,因此也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同时这一生物政治学的神经系统是阻碍用户的非物质劳动的。

这便对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提出了质疑。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这两个概念意味着知识的去地域化,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首要生产方式。保罗·维尔诺(Virno)提到“知识是无法与主体以及他们的语言活动分离的”(Virno 1996,引自Dyer-Witheford 1999,222)。这些知识难以确知来源、不宜本土化,也不宜整理收集,因为它们是在私人空间内、在休闲时间段、通过个人间的交流被“生产”出来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

文的分析结果认为,我们应该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技术加以研究,通过这一技术生产知识的劳动——非物质劳动,以及被生产出的知识——一般智力,都得到了再地域化(Peterson 2008)。

所以,与大众传媒相比,社交媒体中剥削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依赖于积累阶段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的运用,尤其是通过传播和社交进行的信息生产。社交网络的受众凭借接受信息、使用媒体平台表达自我、交流、社交创造了价值。这种剥削受制于去异化的承诺。社交网络所提供的媒体环境使受众的劳动可能走向物化:用户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虽然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非拥有所有权)有了更多的掌控权;劳动带来的交流使用户之间相互联系更为紧密,并使人类存在的更多方面得以具体化地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在社交网络这个空间内自我表达;结交朋友;组建社群;组织政治、文化、社会或经济活动。

社交网络推动着两个过程的发展,即剥削的进一步恶化和异化的缓和,这二者不是简单地同时呈现,而是辩证地相互关联。社交网络在剥削与异化的辩证关系上建立起了新的生产关系:为了去异化,用户必须进行沟通和社交。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分享信息、与朋友交谈、浏览朋友的帖子、关注其他人,也被其他人观众。但这样做也加深了对他们自己的剥削。反之亦然,脸书为了剥削用户劳动,就必须为去异化做出贡献,传播一种理念,即去异化只有通过通过社交网络上进行沟通、社交才能实现。这是关于传播、网络作协、自我表达的理念(Dean 2010),它将网络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视作去异化的必由之路。据此,异化是与沟通不足和社交孤立有关,而通过交流传播和社交网络这一痼疾是能够被治愈的。因此,越多的用户参与到社交网络,上传更多的照片,关注更多的朋友,标记更多自己的“爱好”——简言之,他们发布更多的真实的自我表达,参与更多的人际交往,他们就将更为物化,也就更去异化。换个角度看,他们劳动的越多,创造越多的剩余价值,他们被剥削的程度也就越深。

## 五、传播与生产的封闭循环

脸书这一案例说明,社交媒体的新环境孕育出了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与大众传媒环境中固有的,也是被斯迈思(Smythe 1981)、杰哈利和利凡特(Jhally and Livant 1986)理论化了的的生产关系有着显著不同。前者是

基于剥削和异化之间新的平衡关系之上的。相较于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社交网络可被视作一种泛化且深化剥削的技术,但与此同时又缓解了异化。社交网络上的受众劳动更具剥削性,而去异化性也更强。事实上,社交网络剥削受众劳动的能力依赖于它去异化的能力。社交网络用户劳动得越多——生产更多的信息、参与更多的交流和社交,这一劳动对他们而言去异化的程度也越甚。

近期,人们对受众劳动和剥削的兴趣日盛。在两个互补的章节中,马克·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 2011a, 2011b)检视了剥削和异化的分类应用,以分析社交媒体政治经济学。他提出,只有在社交媒体用户不能掌握他们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时,我们才可以认为他们是与其媒体劳动相异化的(Andrejevic 2011b)。他将与社交媒体剥削相关的两类信息区分开来:有意信息(intentional information)和无意信息(unintentional information)。前者是从用户的有意行为(如上传照片或写一条微博)中提取的信息,后者则是用户在进行其他活动时无意中生产出的信息。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 2011b, 85)认为,无意信息的产生可以被描述为“用户活动被异化或疏离”。而我提出的由用户生产的信息分类则说明,安德烈耶维奇所提出的这一区分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区别被异化的劳动和未异化的劳动的理论基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用户生产的大部分数据具有双重性:既是有意的,如上传照片,同时也是他们也生产无意信息,如由照片中所涉及的其他用户或对照片进行评论的用户组成的用户网络。

本文的论点基于对异化的不同理解,即异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本文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人或多或少会遭到异化。因此,我认为社交媒体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之上的,即媒体企业有权修改用户生产的传播产品(也即,剥削他们);同时,反过来又赋予用户控制传播生产过程的权利,并使他们拥有更多去异化的机会。

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 2011a, 83)的确指出了社交媒体用户与社交媒体企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事实上,他明确定义了社交媒体语境下使用剥削这一概念所面临的挑战,即要解释“自愿参与与商业剥削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为了解释社交媒体中的剥削,我们还必须将受众劳动看作是用户乐趣的来源,是“在消费领域克服异化”一种方式(Andrejevic 2011b, 80)。然而,他并未说明二者之间的直接关联。

在社交网络和 Web 2.0 上,媒体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和一种生产方式



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对于这一问题最具成效的理论研究是通过非物质劳动的概念进行分析的(Virno and Michael Hardt 2006)。其实,更早时候斯迈思就提出了受众注意力的商品化,即通过利用其认知官能进行资本主义积累。非物质劳动(以及在其他语境下:一般智力[Virno 2001])是一种由认知、情感和沟通能力综合而成的创造力,它内生于个人,而非来自工厂。这一分析范畴由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学派发展而来,其主要原则之一是人类生活和经验所蕴含的这一生产潜力是极难通过资本利用、保存或结构的。因此,资本主义对非物质劳动日益增长的依赖具有革命性的潜力。

然而,本文对媒体的辩证分析通过探索非物质劳动如何借由媒体实现,对该问题提出了另一种阐释。这一分析表明,社交网络能够精确地指出通过资本,人类的生产潜力及其内涵在哪一个空间和工厂得到了实现。正如拿波里所言:“对媒体企业而言,受众的创造性劳动是日益重要的经济价值来源。”(Napoli 2010,511)反思 Web 2.0 上受众劳动这一概念,拿波里提出的理论是,新媒体就是大众传播。他认为,这一术语足够灵活,可以涵盖当代媒体环境中的受众。Web 2.0 的革命性并非来自于普通人也具备的创造内容的能力,而是来自于他们能够通过网络传播内容的新能力(Napoli 2010)。拿波里进而将视线带入传播领域,而非生产,这是当代媒体环境中受众劳动的关键所在。如我们所见,传播是社交网络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如拿波里所言,如果现在更多的个人能够获得广泛的受众,新媒体也成了大众传播,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新媒体让更多人能够自由生产出数量空前的信息(内容),并且激发出数量惊人的传播途径。

社交网络最为独特的特征是,它产生出一个专制的经济体系,一个传播和生产的封闭系统,这在大众传媒时代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李(Lee 2011)的研究表明,谷歌广告为创造交换价创造价值出了一个自我驱动机制。公司“垂直整合了搜索引擎、广告代理和评级体系”(434)。比如,谷歌将关键词卖给广告商,允许他们在网民搜索特定词汇时,突出其广告。李强调,这些关键词本身不具有使用价值,事实上它们只在谷歌的“谷歌广告关键词”(Google AdWords)内具有交换价值(Lee 2011,440)。尼克·科恩(Cohen 2008)和福克斯(Fuchs 2011a,2011b)也强调了社交网络资本流动中不同环节的整合。他们的研究都说明,在社交网络语境下,监管成为了修改用户生产的信息的手段。对于如何理解企业对社交网络用户进行监管,福克斯(2011a)提供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此作为对自由“公民”视角的补充。此类监管的目的首先不是政府的政治控制,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欲望的信息商品化。福克斯(Fuchs 2011a)还强调了当代社会中监管和隐私的矛盾本质。当资本主义受到私有权要求的约束(如银行账户和私有财产)从而导致财富不平等的合法化时,它同样也加剧了对工人的监督,以便更严格地控制他们,并提高资本积累的效率。

事实上,社交网络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之前分别独立的过程——生产、传播和消费整合在了一起。它们不仅是发生在同一场所,而且还相互促进。用户的信息生产被监督、整合、分析,最后被转化成信息商品,又称为了用户的消费品,如此循环往复。



非物质劳动是推动社交网络价格企稳的生产力,它体现出双重特征:加剧剥削和实现去异化。一方面,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相比更具休闲性;与人相关,包容异质成分;在休闲时间内完成或甚至是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休闲活动;具有娱乐性、情感性和交流性。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非物质劳动是在社交网络上完成的,它也是被商品化了的,伴随着剩余价值的产生。

诚如我们所见,脸书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能够使传播和社交商品化。举例而言,交换价值来自于用户所创造的用户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之所以成为信息商品,是因为企业能够从中获知消费者行为。但是它们同时也是商业信息的传播渠道(即媒体)。总之,社交网络上的受众就是商品(被販售给了广告商),是劳动力(进行传播生产),也是媒介(传播的工具),通过他们商业信息被广泛传播开来。

## 六、结 论

表1概括了以上论述。在大众传媒中,对受众劳动的剥削是相对有限的。媒体企业与劳动的受众之间的交换本质是节目(可视作“工资”),这是作为对收看广告(“劳动”)的报酬。剩余价值来自于额外收看(Jhally and Livant 1986),来自超过制作节目所需价值的那部分价值生产。相形之下,社交媒体的剥削程度更甚,范围也更广。媒体本身,即平台(“工资”)用来交换受众交流和社交的劳动(“劳动”)。剩余价值来自于额外的交流,来自于创造比个人用户所需的内涵更丰厚的信息。

表1 不同媒体环境中剥削与异化的水平变化

	剥 削	异 化
大众传媒	低 交换方式:以节目交换广告收看	高 匿名 被低动 结构层级
社交媒体	高 交换方式:交流平台 	低 参与  真实性

大众传媒中劳动受众的异化相对要高。对媒体而言,电视观众仍是无从辨别的、匿名的对象。这样的受众从根本上看是被动的,几乎不可能主动选择其需要的电视节目。大众传媒还在内容创造着和消费者之间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层级结构。社交媒体中受众异化的程度低。受众积极参与媒体内容的生产。受众深入参与到媒体中,打开了真实表达自我以及与人交流合作的机会。最后对受众劳动的高层次剥削使得社交媒体辩证地与低异化关联起来。高度的剥削依赖于高度的交流和社交,反过来,也依赖于社交网络去异化的能力。

### 参考文献:

- Adorno, Theodor. 2001.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Adorno, T. W. 1976. Television and the Patterns of Mass Culture. In *The Critical View of Television*, edited by Horace Newcomb.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kass, Kim, and Janet McCabe. 2007. Analysing Fictional Television Genres. In *Media Studies: Key Issues and Debates* edited by Eoin Devereux, 283—301. London: Sage.
- Altucher, James. 2011. Why Facebook is Worth \$50 Bill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5. <http://blogs.wsj.com/financial-adviser/2011/01/05/why-Facebook-is-worth-50-billion/>.
- Andrejevic, Mark. 2011a. Social Network Exploitation. In *A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edited by Zizi Papacharissi, 82—101. New York: Routledge.
- Andrejevic, Mark. 2011b. Exploitation in the Data Mine. In *Internet and Surveil-*

*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71—88. New York: Routledge.

Ang, Ien.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Methuen.

Artz, Lee, Steve Macek, and Dana Cloud, eds. 2006.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Beer, David, and Roger Burrows. 2010. Consumption, Prosumption and Participatory Web Cultures,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10(1): 3—12.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2005.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Bonds-Raacke, Jennifer, and John Raacke. 2010. MySpace and Facebook: Identifying Dimensions of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for Friend Networking Sit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search* 8(1): 27—33.

Brandtzaeg, Petter, Marika Luders, and Jan Haavard Skjetne. 2010. Too Many Facebook “Friends”? Content Sharing and Sociability Versus the Need for Privacy in Social Network Si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6 ( 11—12 ): 1006—1030.

Bruns, Axel. 2008.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cership*. New York: Peter Lang.

Burgess, Jean and Joshua Green. 2009. *YouTube: 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Oxford: Polity.

Caraway, Brett. 2011. Audience labou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 Marxian revisiting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3(5): 693—708.

Cohen, Nicole. 2008. The Valorization of Surveillanc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acebook. *Democratic Communiqué* 22(1): 5—22.

Dean, Jodi. 2010. *Blog Theory: Feedback and Capture in the Circuits of Drive*. Cambridge: Polity.

Downes, Stephen. 1999. Hacking Memes, *First Monday* 4(10), available at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694/604>.

du Gay, Paul, Stuart Hall, Linda Janes, Hugh Mackay, and Keith Negus. 1997.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 Sage.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Economist, The*. 2012. The Value of Friendship. February 4.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6020>.

Emerson, Ramona. 2011. Facebook Use By Country: See Who Spends The Most Time Social Networking. *The Huffington Post*. October 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9/30/Facebook-use-by-country\\_n\\_987722.html#s379259&title=1\\_\\_Singapore](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9/30/Facebook-use-by-country_n_987722.html#s379259&title=1__Singapore).

Facebook. 2012a. Information page. <http://www.Facebook.com/Facebook?v=info>.

Facebook. 2012b. Newsroom. <http://newsroom.fb.com/content/default.aspx?NewsAreaId=22>.

Fenton, Natalie. 2007. Bridging the Mythical Divid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the Media. In *Media Studies: Key Issues and Debates*, edited by Eoin Devereux, 7—31. London: Sage.

Foreman, Tom. 2011. How Much is Facebook Really Worth? *CNN*, March 8. [http://articles.cnn.com/2011-03-08/tech/Facebook.overvalued\\_1\\_mark-zuckerberg-Facebook-worldwide-users?\\_s=PM:TECH](http://articles.cnn.com/2011-03-08/tech/Facebook.overvalued_1_mark-zuckerberg-Facebook-worldwide-users?_s=PM:TECH).

Fuchs, Christian. 2011a. An Alternative View of Privacy on Facebook. *Information 2*: 140—165.

Fuchs, Christian. 2011b. Web 2.0, Pro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8(3): 288—309.

Gonzales, Amy, and Jeffrey Hancock. 2011. Mirror, Mirror on my Facebook Wall: Effects of Exposure to Facebook on Self-Esteem.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 Social Networking* 14(1/2): 79—83.

Green, Andy. 2010. *Creativity in Public Relations* (4<sup>th</sup> ed.). London: Kogan.

Hall, Stuart.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A. Lowe, and p. Willis. London: Hutchinson.

Hall, Stuart. 1995.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 In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Media*, edited by Gail Dines and Jean Humez, 18—23. London: Sage.

Hardt, Hanno. 1992.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Herman, Edward, and Noam Chomsky.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Holmes, David.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y: Media, technology, Society*. London: Sage.

Hooks, Bell. 1996. *Reel to Real: Race, Sex, and Class at the Movies*. New York: Routledge.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Adorno. 1976.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Illouz, Eva. 2007.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Jenkins, Henry. 2009.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Cambridge: MIT Press.

Jhally, Sut, and Bill Livant. 1986. 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3):124—143.

Katz, Elihu, Jay G. Blumler, and Michael Gurevitch. 1973—4.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7(4):509—523.

Liebes, Tamar, and Elihu Katz. 1994. *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Cambridge: Polity.

Lee, Micky. 2011. Google Ads and the Blindspot Debat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3(3):433—447.

Lutz, Catherine, and Jane Collins. 1993. *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x, Karl. 197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Tucker, 70—91.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Marx, Karl. 1990. *Capital, Vol. 1*. New York: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3. *Capital, Vol. 3*. New York: Penguin Books.

Mathijs, Ernest. 2002. Big Brother and Critical Discourse: The Reception of Big Brother Belgium.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3(3):311—22.

McChesney, Robert.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Enduring Issues, Emerging Dilemma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Sage.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9. *The Labou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Morley, Davi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Napoli, Philip. 2010. Revisiting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Work' of the Audienc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2(3):505—516.

Nielsen. 2012.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come Statement. <http://ir.nielsen.com/reports.aspx?keyreport=592&iid=4260029>.

Ong, Eileen, Rebecca Ang, Jim Ho, Joyclynn Lim, Dion Goh, Chei Lee, and Alton Chua. 2011. Narcissism, Extraversion and Adolescents' Self-Presentation on Facebook.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2):180—185.

- Parr, Ben. 2010. Facebook is the Web's Ultimate Timesink. *Mashable*, February 17. <http://mashable.com/2010/02/16/Facebook-nielsen-stats/>.
- Peterson, Soren Mork. 2008. Loser Generated Content; From Participation to Exploitation. *First Monday* 13(3).
- Popper, Karl. 1971.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Quan-Haase, Anabel, and Alyson Young. 2010.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Social Media: A Comparison of Facebook and Instant Messaging.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30(5):350—361.
- Radway, Janice.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Said, Edward. 1981.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Schiller, Dan. 2010.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chiller, Herbert. 1991.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olz, Trebor. 2010. Facebook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In *Facebook and Philosophy: What's on Your Mind?*, edited by D. E. Wittkower, 241—52. Chicago: Open Court.
- Smythe, Dallas.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Ablex.
- Spears, Lee, Brian Womack, and Ari Levi. 2012. Facebook's Epic Offering by the Number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February 2.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Facebooks-epic-offering-by-the-numbers-02022012.html?campaign\\_id=rss\\_search](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Facebooks-epic-offering-by-the-numbers-02022012.html?campaign_id=rss_search).
- Stevenson, Nick, Peter Jackson, and Kate Brooks. 2001. *Making Sense of Men's Magazin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 Turkle, Sherry. 1997.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Virno, Paolo. 2001. General Intellect. In *Lessico Postfordista*, edited by Adelino Zani and Ubaldo Fadini. Milano: Interzone [Italian, translated by Arianna Bove].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virno10.htm>.
- Virno, Paolo, and Michael Hardt. 2006.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asko, Janet 2001. *Understanding Disney: The Manufacture of Fantasy*. Cambridge: Polity.

Wasko, Janet, Vincent Mosco, and Manjunath Pendakur. 1993.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Norwoo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West, Anne, Jane Lewis, and Peter Currie. 2009. Students' Facebook' Friends':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2(6):615—627.



理查德·霍尔(Richard Hall)<sup>①</sup>

贝恩德·斯塔尔(Bernd Stahl)<sup>②</sup>

## 反商品化

——大学、认知资本主义与新兴技术

王祎(译),姬德强(校)

**[导读]**14、15世纪,资本主义通过“圈地运动”,将农民与土地强行分离,获得了第一批“自由劳动力”,使资本主义深入农村,开辟了国内市场,完成了资本的第一轮原始积累。伴随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终端的不断升级,“数字化生存”从预言成为现实,每个人都被卷入“信息化”的大潮,被告知所谓“信息时代”的来临。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利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统治权和压倒性资本优势,将原本中立无偏的信息技术“征用”,成为进行盘剥的最新、最有效的工具,并进一步生产出了无数的“免费数字劳工”,进一步突破了国界,扩大了市场,服务于其资本的再生产及其统治的全球扩张。这种最新一轮的“圈地运动”较之以往更为强有力,也更加隐蔽。在此背景下,关于技术反思、信息拜物教批判、知识劳工、数字劳工、学术的商品化等研究进入

---

①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图书馆与学习服务部门理事,德蒙福特大学“以技术促学习”部门的负责人,受聘于英国国家教席,教育与科技高级讲师,德蒙福特大学计算机与社会责任中心研究助理。研究兴趣包括:大学理念及其激进替代;技术与批判性社会理论;弹性教育与克服高等教育瓦解的合作实践领域;以及21世纪大学理念中的社会化媒体领域。rhall1@dmu.ac.uk, <http://www.richard-hall.org>

② 英国莱斯特德蒙福特大学技术批判研究教授,计算机与社会责任中心主任。研究兴趣涵盖商业、技术和信息交叉引发的哲学问题,该领域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系统主要路径的伦理问题。bstahl@dmu.ac.uk, <http://www.cse.dmu.ac.uk/bstahl>, bstahl@dmu.ac.uk, <http://www.cse.dmu.ac.uk/bstahl/>

了学术视野。正如《反商品化:大学、认知资本主义与新兴技术》一文的核心论题。资本主义不仅在商业领域继续维持着绝对领导力,且已日益侵蚀到诸如大学等原本应保持独立性的领域。在有形劳动和无形劳动之间日益断裂的背景下,资本与技术形成合谋,合作征服着高等教育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充满了商品化与反商品化、拜物崇拜与破除迷思的斗争。大学这一相对独立的范围被资本不断蚕食,原本的公共性日渐消弭,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弥漫着功利主义与铜臭,充满了权力斗争。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目的不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是谋求资本的再生产与市场的全面扩张。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学生本体的提升,而是服务于“社会工厂”中的资本再生产,为其“量身定制”其所需要的“劳工”,并冠之以“以学生就业为关切”的名号,使每个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其间师生,也不乏学术激进主义者奋起抵抗,以求唤醒独立之思考,摆脱信息资本主义的迷思,这篇文章就是基于这一立场书写。

在认知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本文通过对四种具体的新兴技术,即情感计算、虚拟现实、云系统和人机共生进行研究,从技术本身的研发背景、特性与应用领域出发,进行深入分析,点出了深深藏匿于貌似中立与先进的新兴技术背后,那些隐蔽的信息拜物教倾向和资本的侵蚀轨迹。并通过这些分析,提供一种新的想象,找寻学术斗争背后的权力结构罅隙,充分利用其间的矛盾与张力,以期解决文中所述的学术商品化问题,重新夺回高等教育的自主权,恢复公共性。诚然关于抵抗策略,文中方案尚待完善,且需结合具体语境进行有意识的培养和具体设计。但全文对被全球歌功颂德并期待其恩赐福祉的新兴技术和高校教研进行的揭露与批判,剥开了其背后不为人知的经济政治图谋,这正是文章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大学,新兴技术,学术激进主义,商品化,认知资本主义

## 一、引言

以情感计算、虚拟现实、云系统和人机共生四种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可以作为典型例证来说明大学里的技术创新是如何被商品化、被拜物迷信以及如何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自我再生产的。马克思(Marx 2004, 493)在论及技术历史总体中的位置时是这样理解和描述这一问题的:“技术揭示了人类之于自然之能动的关系,揭示了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进而也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思想观念。”<sup>①</sup>因此,新兴技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第259页。——译者注

术的产生,正是要改进人重塑、革新社会关系的模式局限性,这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批判视野,即资本是如何为了服务于价值的形成与积累而重构高等教育,“指派”大学内部的研究与发展的。

此处的论述将通过分析商品化与拜物化对技术研发的支撑来阐发上述“指派”的观点。对新兴技术的关注,有助于探索技术创新如何影响学术权力斗争以及学院内部的抵抗,尤其是在那些仍旧把学术权力斗争与抵抗植入到学术实践中的大学里。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技术展示了对教育的想象与实践方式进行重大而深刻改变的潜在可能,通过此种方式,教育机构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期重新书写资本主义劳动史(Postone 1996)。因此,这一讨论的核心涉及到新兴技术对大学内部科层权力进行再生产的机制问题。通过分析商品拜物主义、新兴技术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罅隙,新兴技术、学术激进主义以及学术界内外学生/教职工抗议的可能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将得到解决。

对大学的统治作为认知/知识资本主义的一个场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认知资本主义模式下(Dyer-Witheford 1999, Virno 2004, Williams 2012),这些社会关系是在特殊的时空压缩包围下结构而成的(Lebowitz 2003, Marx 2004, Postone 2009),而这一时空是由经技术转化过的资本锤炼而出的。新兴技术的商品化及其随后的拜物化加速了大学的转型过程,大学被转塑为一个抵抗认知资本主义价值的活跃场域。这一过程强调了资本对学术领域内权力的调度方式,宣扬了一种学术实践中的工具主义取向(Holloway 2002, Tiqqun 2001, Virno 2004),这种工具主义取向通过无形劳动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与对学术激进主义和知识生产的自动化控制等相关批判联系在一起。

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autonomous Marxism)对权力关系的批判,有助于开展对新兴技术如何发展为异议表达空间这一问题的讨论。这里对权力的合作性征服可能作为消除权力关系的一个步骤而有所发展(Holloway 2002, Dyer-Witheford 2004),以重新书写关于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并批判我们技术使然的全球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将人“去人性化”,在这一网络中,人们被当作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手段,而不是将人通往共同富裕本身当作终极目的。目前的问题在于,学生和教师是否能够夺回新兴技术的生产与分配权,以把大学的象征性权力消解于真实存在的抗议与否定的现实中。进一步说,从哈维(Harvey 2010, 46)的角度来看,对新兴

技术的批判能否使那些在高等教育领域工作的人“从一种不同的想象图景中,找到可供选择的另外一种基于社会再生产立场而生效的社会价值形态”?

## 二、关于技术的笔记

技术在资本主义内部的历史发展,一直是作为生命权力(biopower)再生产(Feenberg 1999, Foucault 1977, Noble 1998, Weber 1969)的实现手段,通过社会技术常规、程序与文化来系统化劳动控制(Postone 1996)。对于新兴信息通讯技术(ICT)应用(ETICA)项目的伦理问题,涉及到伦理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影响,上述文化濡化过程是问题的关键点。下面详细论述到的观点正是基于这一项目的一些研究结果。该项目团队指出,技术

是一个影响人与世界互动方式的高级系统。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种技术能生产出许多人工制品,并适用于多种不同情况。它需要与一种大视野联系起来,这种视野要体现人类的具体观点,反映人在世界中的作用(Ikonen et al. 2010, 3—4)。

技术在世界中的这一角色以一系列社会技术特征为基础。因此,在对环境技术(ambient technologies)的分析中,这些特征通过其行动主体体现为嵌入性、互联性、不可见性、自适应性、个性化、普遍性等具体形式。因此,ETICA项目定义了一个社会技术视角下的世界,其中人类的进取心或劳动力,需要且渴望得到技术的无缝支持,这个世界通过诸如传感器、网络、计算程序和网格坐标等人工制品的系统整合而越来越适应人类需要。

自适应技术出现并变为日常现实,塑造并重新定义了人类与自然或曰世界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能源开始作为机器与人类关系一个核心线索浮现。马克思指出,机器形式的技术“是人类工业的产物,自然资源转化成人类统治自然或其在自然中活动的工具……它们是知识的物化权力”(Marx 1993, 594)。这种物化权力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那些使用技术去建构、重设、再生产社会者、革新具体技术者与劳动中技术的使用者三者之间。用费恩伯格(Feenberg 1999, 87)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技术是一个社会斗争的场域,借此,霸权地位得以建立、合法化、再生产与被挑战;他还指出,“技术批判理论可以揭示技术的作用范围,揭穿有关

技术必要性的幻象,揭露流行技术选择本身的相关性”(Feenberg 1999,87)。

把技术作为斗争的关键场域的这一观点,反映了社会工厂内部劳动异化的增强,这种增强是通过人机共生技术实现的(Negri 1989, Tronti 1973)。正因为人类是与技术的附属物相互交织并内嵌于其中的,使得自动化控制的可能性和主体的进一步异化变得更加明显(Tiqqun 2001)。哈维指出,这种物化是人类血肉之躯融入资本机器内部的功能体系,是新自由主义面对1970年代经济政治危机的反应。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积极寻求一种“格外重视‘智能’与创新性企业主义”的新策略(Harvey 1990,157)。这种企业主义已经部分地在新兴技术中实现了,这些技术把人性融入到固定资本的现实当中。通过死劳动与活劳动的融合,新形式的价值被榨取,这种融合是减少资本流通成本的一种重要方式(Marx 2006)。哈特和内格里(Hardt and Negri 2000,406)认为,这是深度的政治对抗,因为“机器和技术不是中立的、具有独立性的实体。它们是用于特定生产机制的生物政治工具,这种生产机制为某些特定实践提供便利,同时阻碍其他形式的实践”。

正是社会技术系统的生产力量和自动化系统的创造物,使得人类与其生活世界变得越来越机械,以至于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都被归入资本再生产的手段之中了(Habermas 1987, Hardt and Negri 2000, Marx 2004, Tiqqun 2001)。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这进一步把社会关系物化为商品,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被榨取,举例来说,个人数据的监测和采集,消费空间与消费方式的限定和控制,运用风投资本主义来支持特定社会网络,以及情感的技术扩增与捕获。这种对日常活动的真实吸纳确保了:

个体劳动的创造力将其自身构建成资本的权力,一种与其自身相对抗的异化力量……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曰社会生产力(劳动自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诸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与合作、交流手段的完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都不会使工人变得更加富有,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因此只是再次扩大了对劳动的统治力……这一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Marx 1993,307)。<sup>①</sup>

---

<sup>①</sup> 中本摘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6—268页。——译者注

因此,技术成了资本用来“摧毁所有限制生产力进步、需求扩张、限制生产多样化以及对自然和精神力量进行剥夺与交换的一切藩篱”的革命性力量(Marx 1993,409。)①这种全面开发不断试图克服物质条件限制的障碍,越来越依靠社会人与技术的融合,以期创造新的商品和拜物教形式。大学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技术领域,在其中,资本克服障碍的进程正在进行。

### 三、技术、无形性和大学的商品化

以2008年莱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为标志的全球政治紧缩(austerity politics)时代,见证了新自由主义对国家补贴公共资产的激烈反对,将反对补贴公共资产作为一种经济休克疗法(Klein 2007)。在英国,这一进程导致了高等教育被吸入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之中,随之高等教育理念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由公共物品转变为基于北美模式的通过私人债务提供的个人物品(Collini 2012, Bailey and Freedman 2011, Williams 2012)。大学生活被吸入市场反映了资本的系统逻辑,其目标在于实现自身的一体化(Hardt and Negri 2000)。正如梅克斯因斯·伍德(Wood 1997,1)所述: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刻,资本主义第一次成为真正的普适/遍在(universal)体系……资本主义在其理念上是普适性/遍在性的,其逻辑——积累、商品化、利润最大化、竞争——渗透入人类生活和自然界自身的几乎方方面面。

这一进程中的一个分支是学者和学生学术工作的商品化,包括课程、技术、知识和文化资产等各方面(Ball 2012, Canaan and Shumar 2008, Newfield 2012, Williams 2012)。大学里的劳动越来越为效率所驱使;受诸如关键性信息集(information sets)及影响手段、公共/私人合作关系、知识转化与外部收益生产等事宜指挥;被“如果教育产品的生产者效率低下,那么其将在市场中付出代价”的逻辑约束(Cullerne-Browne 2012, McGettigan 2012)。因此,高等教育已然成为了一个市场化场域,在这里,通过社会及国家资产与私人

---

①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3页。——译者注

企业之间新的合作关系,学者个体的知识劳动正被引入与其他学者的直接竞争。

学者个体之间、以及那些他们构成的新的团体之间的竞争,形成了一种从社会意义上建构相关学术劳动分配与学术劳动丰富性的方式(Marx 2004)。市场对学术劳动的吸纳,催化了可供交换的学术使用价值的创造,也催化了学术的可商品化。交换的天然属性、从被“指派”的学术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的尝试,意味着在大学内部发展起来的等级制权力关系,就像那些可被实际交换的物品关系一样被再生产。结果,学术劳动被直接吸纳进这一榨取剩余价值的动机之下(Clark 1994, Marx 2004)。

作为蕴含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大学里的知识劳动极有价值。马克思强调劳动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生产特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Marx 2004, 129)。① 在高等教育中,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水平革新有助于提高剩余价值榨取率,特别是在技术研发能催化生产效率提高、减少特定资本流通时间的情况下。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和对更高相对剩余价值榨取率的期待,将就业能力的问题提上了政府教育部门的议事日程,在他们看来,大学里培养的技能需要不断提高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应性(Bailey and Freedman 2011, Ball 2012),这一过程本身形塑了一个规制学术劳动的核心机制(Marx 2006)。

正因为技术在资本主义内部被用来提高系统效率以及进一步实现价值增殖,使得实证主义者关于强化技术技能可解放潜能的论断变得难以令人相信。技术革新与推广的逻辑,服务于提高生产率或方便外包,服务于工作场所监视及科层化劳动管理监督,或是服务于开辟新市场实现价值的生成(Lebowitz 2003, Marx 2004)。在短期内,技术革新给予资本高额边际生产率,这既靠着公私领域的高水平需求来支撑,同时又支撑着这些高水平需求。然而,随着的时间推移,“无形损耗”开始影响技术革新带来的收益:

除了物质性磨损,一台机器还有别的损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形

---

① 中文摘自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第4页。——译者注

损耗。或是由于同种机器的生产成本降低,或是由于更先进机器进入竞争,它的交换价值将有所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机器依旧崭新并充满活力,它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中实际赋舍的劳动,而是取决于再生产同样的或者更好机器的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它或多或少失去了价值。再生产其总价值的周期越短,无形损耗的风险越小;每天工作时间越长,则这一周期越短。当机器初被投入生产,对其更为廉价的再生产方式便接二连三地涌现了,对机器的改进也是如此,这不仅适用于个体零件和机器的细节部分,其整体制造亦是这个道理。因此,在机器寿命周期早期阶段,这一延长工作时间的特殊动机将自己最为突出地表现了出来。(Marx 2004,528)<sup>①</sup>

于是,在跑步机式的竞争逻辑驱使下,整个社会技术系统的革新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以维持或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率,并跨越消费不足这一障碍。正如纽菲尔德(Newfield 2010,13)所强调的,这在学术劳动方面亦有体现,在三种类型的劳动中,学术工作持续无产阶级化。第一类劳动与“商品型技能”有关,即既“容易掌握”且不挑持有人的那类技能,如后勤部门或服务部门的工人。第二种类型包含那些拥有“筹码型技能”的人,掌握这类技能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一般是能够为大学提供清晰的附加值的人,而这类劳工在大学里有不少,如计算机程序员或网络管理员。第三种类型包括那些“专有技能”的持有者,他们被定义为“帮助一个组织建立事业的企业特殊人才”。大学管理部门只培养那些有能力推动专门性知识进步的劳动者,并使之商品化,以从中榨取租金和利润。

前两种类型的劳动较易无产阶级化或被外包出去,因为他们工作价值中包含较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然而,专有技能由于被附上了市场化学术劳动的竞争性,这种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Bonefeld 2010, Neilson and Rossiter 2008)。这是由于具体商品的生产、创新及技术本身所耗费劳动力的社会必要性特征随着时间发展而日益减少,这相应降低了劳动的市场价值。结果,对技术创新的持续需求成了维持系统的关键。因此,问题围绕在那些可交换的专有或创造性技能的持有者及对其管理之上,这里,凝结在新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第283页。——译者注



兴技术形式下的学术劳动在其社会形态上以价值的形式越发呈拜物的趋势(Marx 1993)。

在商品生产社会,拜物化是指社会地存在于市场中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被呈现为“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Marx 2004,164)。<sup>①</sup>也就是说,具体商品的交换价值(事实上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表现形式),呈现为商品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以价格的形式在市场上出现。这部分因为,由于商品是被独立的个人生产出来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并没有显示出直接的社会化。因此,劳动只在交换过程中体现出社会性的必要,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这是异化的现实基础。

生产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Marx 1993,458)<sup>②</sup>

产品或商品已然摧毁了个体劳动者的一部分活劳动,并通过交换过程,将之异化为一种拜物化的价值形式。在大学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基于认知资本的创造与商品化,由于生产和流通过程是“无形的”,拜物教的概念需要被重构和重新分析(Žižek 2009)。用费恩伯格(Feenberg 1999, viii)的话来说,这是技术本质主义的现实,在其中“技术把一切东西简化为为功能和原材料”,结果导致个人情绪和感情、文化风俗与习惯、人际关系的建立等东西“本身恰恰是我们每天遭受剥削的物质材料”(Žižek 2009,139)。在这一过程中,要理解知识工作、认知资本或信息社会是怎样被拜物化的,有两个因素十分重要。首先,资本发现机械或技术能够帮它将流动性日强、越来越

---

① 中文摘自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第283页。——译者注

② 中文摘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5—456页。——译者注

被身份驱动的一整套社会关系封闭化、商品化,这奠定了进一步交换的基础(Virno 2001, Virno and Hardt 1996),这套社会关系经大学内部劳动的催化,以人的主体性变异为基础(Vercellone 2007)。其次,资本从日常经历与日常关系中榨取价值、实现价值商品化,以减少资本的非生产性流通时间,进而提高利润率和相对剩余价值(Dyer-Witheford 1999; Marx 2006)。

在这一拜物化过程中,社会关系越来越通过诸如大学等的技术调节下的组织得以建构,进而重新书写越来越具有技术性、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Foucault 1977)。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过程通过劳动的排他性分工,使得社会中的独立个体被异化和分离(Lebowitz 2003; Marx 2004)。此外,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把全部人类生活吸纳进资本逻辑的技术,其发展强化了资本主义关系是自然的、纯粹技术的这一观念。然而,这一归化过程揭示了知识的建构通过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再生产而实现,或知识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Marx 1993)。一方面,资本利用这一过程进一步吸纳社会关系并将之异化为商品,特别是通过对传播的控制和赋予信息新的用途(Dyer-Witheford 1999, Negri 1989)。另一方面,将一般智力再生产为大众理性(*mass intellectuality*)则成了实践性颠覆活动的实际基础(Neary and Hagyard 2010; Virno 2001)。

部分看来,这些大众理性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被网络技术的极端社会化和新兴技术的社会化方式所放大了。因此,大学里新兴技术的研发是一个斗争的关键场域,透过它,社会技术与认知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可能得到发展,反对它,学术激进主义可能得以被揭露。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对社会技术创新和变革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凸显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机制。

借助机械、化学过程和其他各种方法,(资本)不仅在不断改变着生产的技术基础,而且也在改变着工人的技能与劳动过程的社会融合。同时,它也借此彻底改革了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并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向另一个生产部门。(Marx 2004, 617)<sup>①</sup>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第345页。——译者注

#### 四、新兴技术与认知资本主义

关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相关叙写与分析越来越多(Ball 2012, Canaan and Shumar 2008, McGettigan 2012, Newfield 2012, Williams 2012)。有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首要关注的应是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在他们看来,科技手段首先意味着促进经济的增长,技术靠经济效益、商业效率和重新设计业务流程等话语支撑。这样的观点在许多高级政策文件中比比皆是,例如《欧洲视野 2020》(*European Vision 2020*) (European Commission(EC)2010)、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 2012)对技术辅助学习的支持以及创新项目资助协议(the funding protocols for innovation programmes)等(EC 2012; Hall 2012)。这些协议形塑并规定了作为独立实体的大学发展项目、制定使命宣言或发展战略的空间,同时将教育创新同财政“现实”绑定在一起。

通过资金拨款政策,便可以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定位,拨款更加侧重自然科学与技术,而社会、人文科学得到的资助随之减少。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强化了这一意识形态转向,并在对教育实践与教育机构进行限制的同时(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 2009; Feenberg 1999),进一步催化了其商品化与拜物化(Hall 2012)。这削弱了教育的道德合法性(Stahl 2006)。目前问题的焦点是,应抛开对大学里已建立、已植入的现存技术的讨论,以便进一步分析新兴技术是如何对高等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产生冲击,进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成为可能的。

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对日益无形化的劳动力进行组织、规范和加以剥削,这是通过利用嵌入日常活动和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各类新兴技术得以实现的(Dyer-Witheford 1999, Habermas 1987, Valtysson 2012),这些技术作为大学研究开发的中心得到发展。这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对生产方式的不间断变革为中心的无情动态过程,其目的是使资本能够“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加强用于交换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能力——传播及运输工具——用时间消灭空间——变得极其必要”(Marx 1993, 524)。① 在减少生产与流通时间的过程

---

① 中文摘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译者注

中,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整体再生产紧密相关,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Postone 2009)。

然而,在这场针对时间与生产/流通成本的战争中,人与机器的融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机器作为武器被用在了资本与劳动的斗争中。大学里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是异化的场域,因而也就为否定与异议的萌芽提供了空间。为了阐明这一观点,针对四例相互联系的新兴技术的分析,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新发展。在接下来的小节里,通过更深入探讨选择这四种技术的理由,新兴技术的定义将逐渐清晰,同时它们在未来高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也将逐渐明了。这四种技术是:情感计算、虚拟现实、云系统和人机共生。

### (一) 新兴技术

这部分讨论旨在探索通过水平扫描(horizon-scanning)所界定的新兴技术,是如何有可能影响高等教育,并在拜物化、商品化和无形性等概念性问题中起作用的。对这些新兴技术进行讨论的基础,引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历史不确定性,和对那些技术性质和用途加以预测的根本不可能性等问题。尽管未来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人类确实已经建立了对未来加以预期的机制,通过这类机制做出决定、形塑未来。一个在学术界已经建立起来的机制是——对前瞻性研究的应用(Cuhls 2003),这类研究并不宣称可以预知未来,而是呈现多种未来可能性,以供决策者朝着满意的可能性进行努力。此处的观点正是利用这一逻辑,并借鉴了已有的关于未来和新兴信息通讯技术的研究成果,探索这类技术在高等教育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此处的论述借鉴了 ETICA 项目的研究结果(Ikonen et al. 2010),以阐明新兴技术在高等教育中可能起到的作用。ETICA 项目是一项欧洲资助的研究项目,自 2009 年 11 月开始运行,该项目可以被定性为前瞻性项目,它旨在通过分析新兴技术的伦理后果来界定何为新兴技术,并进而考虑其管理和政策影响(policy implications)。ETICA 将新兴技术定义为那些在不久的将来 10 到 15 年里可能深刻改变人与世界互动方式的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受深入性研发项目影响的特点,该特点使得其未来状况可被合理预测。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些技术被称作新兴的,但这和它们当下的状态无关。其中一些新兴技术早已建立起来,如云计算,他们被称为新兴的,是因为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重要研发活动旨在改变其形态和可能性应用,以及其社会

政治影响。

ETICA 项目并不关注于技术的应用,无论是在高等教育还是在其他领域,也并未采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此详述的观点在任何方面都不代表 ETICA 的观点,也不反映 ETICA 财团的立场。然而,对 ETICA 项目第一阶段成果的分析使得对与高等教育尤其相关的新兴技术网络的界定成为可能。四种相互关联技术的引入作为一个起始点,展示了产生于大学内部并支撑大众理性发展的社会关系与认同的商品化与拜物化。这四种技术是:情感计算、虚拟现实、云系统和人机共生。

从 ETICA 项目认定的十一种技术中选取这四种,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高等教育内部的早期技术应用,且它们新兴技术的地位,意味着它们作为更受重视的高端技术将变得更具有影响力(Gartner 2011)。因此,它们适用于分析大学如何被新兴技术所影响。它们代表了涵盖此处讨论问题的一个技术系谱,展示了大学内社会科技系统的再生产,以及抵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潜在可能。然而,其中的任何一种技术都与另外至少一种存在互动,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技术的创新性融合或许会对高等教育内部资本和劳工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四种技术中的每一种都将在对其进行定义的独立小节中进行讨论,并进一步讨论其在高等教育中的预期用途,以及这些功用与意识形态、拜物化、商品化与非物质性等问题有何关联。继而我会提出,由这些技术所揭示出来的、通向反抗的道路。

## (二) 情感计算

**技术:**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有时也被称作情绪计算(emotional computing),旨在开发能够感知、表达和模拟人类情感的人工制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起始于 20 世纪最后十年的实验室研究中,其关注的是情感或情绪的数字计算,同一时期并行兴起的是新自由主义对可被用作社会工厂创新点的企业技术的关注。该技术的一个关键性进展是电脑不断增强的情绪模拟能力(Cowie 2005),以及利用此技术将情感性嵌入社会技术系统,进而使资本能够利用认知或无形性来实现自我再生产。这类技术的定义被不断泛化,将情感处理或人类行为模拟也包含在内,这一定义的泛化过程见证了上述再生产过程。

因此,此类研究为人机互动中更为智能的应用程序的编制提供了基础,以便通过数据收集、分析、人脑成像工具和探测情绪传感器等手段,驾驭在

决策过程中情感所起的作用。虽然罗宾逊和凯利欧拜(Robinson and Kaliouby 2009)的研究论述了许多与社会融入、模拟社会认知相关的应用领域,显然,情感计算促进了社会认知的商品化。例如,它可以用来制造模拟产品,供代理商或机器人进行社会情感情报的管理(Tao and Tan 2005);用来开发能对玩家情绪状态做出反应的情感游戏,使游戏能够在最适当的时刻提供最适当的内容(Sykes and Brown 2003);用来实现将游戏玩家的情感状态传达给第三方的功能(Hudlicka 2009)。

对资本来说,对此类活动的捕捉和挖掘是创新和榨取价值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数据显示,只有不到10%的人类生活是完全非情感化的。其余均涉及到某种情感”(Cowie 2005)。因此,通过技术来捕捉情绪或情感,致力于加强“人机交流的质量和提升电脑的智能程度”(Tao and Tan 2005,981)。由于情感在人类互动中无处不在,对情感的敏锐洞察便成了交往行动的基础(Habermas 1987)。因此,情感计算影响着人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因为它介入到了感觉与伴随感觉的物理变化之间,并随之带来观念、判断和行动的转变。

**教育应用:**在设想中,理解用户情感状态并对其做出反应的功能,是通过游戏性学习和虚拟世界模拟等电子教学创新形式实现的,此类教学能够感知学习者的情绪,以便定制相应学习与呈现形式(Porto Interactive Center 2012, xDelia 2012)。在情感计算研发的驱动下,认知和行为心理学在资本内部进一步商品化了,部分是通过大学与商业的合作关系实现,这是因为情感计算假定了人类情感可测量、可认知、可分类、可生产并且可定价(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Media Lab 2012)。该新兴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情感和诸如消费等外在行动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

同样道理,情感觉知有助于更好地从教师那里收集反馈情况,教师可以监测自己和学生的情绪状态,以便收集关于教学工作效果的双向反馈。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 2012)开始关注“情绪或其他情感现象,以及由它引出的,或故意影响它的现象与问题的计算”。对学习分析法(learning analytics)的关注持续升温,这种分析法可以作为监测、监督学习成果的一种手段,以帮助学习成果实现商品化,这种关注同时将认知、情绪实践(emotional practices)与学习成果连结在了一起(Educause 2012),更要紧的是,它们与“通过移动设备递送学习内容”这一正在进行的拜物化过程连结在了一起(Blackboard 2012)。

在高等教育中,特别是在工作和实习导向型学习中,涉及到模拟真实环境的学习中,情感计算潜在的积极效果,可以与那些需要越来越多的操纵和控制而收效甚微的技术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奖励特定反应行为这类有效干预,个人化的行为和特征可以更轻易地被纳入教学计划。这种情况因为如下事实而变得更加糟糕,即在教育中运用的此类技术很可能是被私人企业设计出来谋取利润的,私人企业或许还可以通过从基于应用程序的干预措施中收取租金获利。这些干预很可能被转化为市场化的解决方案,进而更加有效地将学生导向就业能力培养,而不是对大学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等问题进行批判性质疑。

**抵制:**抵制情感计算的一个关键空间,在于重新人格化(rehumanisation),在于对游戏、虚拟真实或工作导向型学习等相关问题解决方案的合作式探寻,以及对商品化的虚拟互动的彻底拒绝。事实上,由于用户能够觉察到其被操纵的可能性,情感计算为分析伦理上有问题的社会技术系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空间。此外,有理由相信,学者们反对情感出现在教育机构,这部分因为这种情感看起来是虚假的,即它们根本不同于人类情感,这些学者有能力建立起一种道德的数字素养(ethical digital literacy)。具体来说,这依赖于学术批判共同网络的参与,以便把真实世界的情感性与问题的合作式解决联系起来。希望这将克服个人化的、虚假的或夸大的情感的威胁,这些威胁把技术的使用者与他人隔离开来,使认知资本主义得以维系其在大学内的权力关系,例如通过学生对教师、员工对管理者的反监视(Ganascia 2010)。

### (三) 虚拟现实

**技术:**虚拟现实与情感计算联系非常紧密,它从海利格(Heilig 1962)的传感体验模拟器(Sensorama Simulator)发展而来,该模拟器的设计用途是,通过模拟资本所要求的劳工受训环境,来降低危险性工作带来的风险。虚拟现实的发展历史将大学内部的创新与商业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来,诸如拉涅尔的VPL数据手套等技术应用证明了这类技术可以突破头戴式显示方式,实现手持和液晶显示器显示,可被延伸至用于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从而通过对内容加以限制及受限内容的订阅与租赁来加强日常体验的市场化。而后内容被进一步商品化,就像虚拟信息被投射于扩增的物体上,或是扩增信息被投射于真实环境之中(Zhou et al. 2008)。

先进的电脑软件能够使虚拟扩增现实的应用程序变得更加引人入胜,进而完全融入日常生活。这样,该技术可延伸应用于复杂机械的制造和维修,降低固定劳动维持成本,发挥其解释物体与环境的潜能,并进一步把用户的生活经历及其真实身份拜物化。资本利用这些技术来影响行为、人际交流和劳动认知,同时增强虚拟空间的殖民地化及并扩展其疆域范围,这意味着虚拟身份(如虚拟化身)超越了它们脱胎其中的社会关系被个人化和商品化了。这样,虚拟物体承载的信息通过呈现现实世界中的任务,将劳动真正吸纳其中。通过用虚拟物体或数据扩充日常现实,无形性劳动者能够比依靠自身感官更加全面地感知周遭环境。所以沉浸其中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捕获并驾驭多重感知渠道,增强劳工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及与之互动(Cline 2005)。这就使资本能够以新的形式实现自我再生产,并通过生产新服务的方式突破消费不足的藩篱。

**教育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是非常先进的,其关注的领域包括训练、探索型学习、建模、游戏和扩展虚拟资源。它与国防军事训练、市场营销机遇扩展(Hamilton 2011)、移动学习(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JISC)2012)等都存在历史性联系。例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 2009)作为一个平台,为学术社会内部提供了资料与互动,同时以一种近似游戏的形式提供模拟体验。大学已经利用这一平台来提供某些话题的专门训练,这类话题的训练往往仅依靠文本界面是不够的,例如精神分裂症的管理、需要观看身体或器官的健康科学,以及通过虚拟校园的建构来与远程学生进行互动。而“第二人生”或许是虚拟环境最突出的例子,高等教育中面向这类技术存在着更加广泛的转向(Human Interface Technology Laboratory New Zealand(HIT Lab NZ) 2012),在一定程度上,诸如毕博(Blackboard)等学习管理系统,正在不断尝试将扩增与沉浸等要素整合进其虚拟环境中。

**抵制:**扩增技术使得空间创造成为可能,通过虚拟世界或基于应用程序的创新,运行于教育内部的私人企业可以从空间创造中榨取租金。这证明了新兴技术、资本主义劳动和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的“指派”关系(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 2009)。虚拟化明显引发了大学内部的议论,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由外部供应商来兴办教育,并将其作为一种财富积累形式从中榨取租金。这一问题是由诸如外包环境中的知识资产和教学资源安全性等实践性考量所引出的。然而,学术性的抵制则侧重于技



术和可用性问题,以及能否接受虚拟空间借助扩增技术而进一步封闭的问题(Wake and Stahl 2010)。关于教育领域的抵制,目前的问题是采用何种方式来积极鼓励学者们生产、共享公开课程与产品,这种方式要能体现人性关怀,不形成新的商品,却有助于在不同的团体之间维持专业知识的多样性。因此,在这些共有空间中,边际性发展(marginal developments)——诸如应用本位的(application-based)、表示方位的(locative)、增强现实等服务——之间的关联,可能受到舆论共识的质疑,并关系到社会需求和隐私与身份问题。

#### (四) 云计算

**技术:**越来越多的以情感计算或虚拟现实为特征的创新服务,是通过云计算来实现其管理的,该技术保证了计算资源可以通过全球化流通网络被传递到不同地方。它起源于利克里德(Licklider)的阿帕网(ARPANET)(Ikonen et al. 2010)。伴随军事价值的产生,它的发展预示了其作为诸如水、电之类的公共事业的价值。随着1990年代带宽的不断增长,这变得越来越有可能。该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远程作业成为可能,脱离任何正式的、泰勒式的工作场所,都可从远距离对无产阶级化劳动进行分离与监视,并使资本能够通过外包在低薪社会中来分配可用的商品与筹码型技能(Newfield 2010)。云计算经过网栅(grid)与效用计算、应用程序服务供应和软件服务(Dikaiakos et al. 2009)等阶段的演进,使认知劳动的原动力遍布于社会工厂之中,并借此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无形性(Hardt and Negri 2000, Virno 2004)。

具体来说,云计算借助对各种系统、网络和数据的公司控制,使得资本可以从社会网络和个人交往中榨取价值,借助可伸缩的弹性IT兼容能力(IT-enabled capabilities),来降低生产性资本的流通成本,这种IT兼容能力被解释为一种从低薪流通过程向能够榨取较高价值的空间进行转移的服务(Marx 2006)。由于企业寻求以最划算的方式来进行其信息技术服务消费,利润已经在勾勒一系列宽泛服务的过程中增长,例如从“云”而不是从本地设备获取计算能力、存储空间和商业应用程序等内容。这种外包的方式旨在降低商品和劳动的分配成本。

在云服务用于存储诸如照片和视频等相当个人化的数据时,数据挖掘和标识便与租赁成本和目标行销等资本主义积累行为纠缠到了一起。在某

些情况下,这促进了智能化消费的实现,如通过 RFID 标签等硬件和智能手机之间的数据驱动连接而实现的本地化服务、消费者关系管理系统以及支付服务供应商等各种云基服务(The Think-Trust project 2010)。它也使得商家和保险方之间医疗记录等相关数据被商品化(Andriole and Khorasani 2010),从而支持了生命权力(bio-power)被进一步整合到医疗保健之中。通过强调迅捷、优化的人际联系等云服务的易用性,以及强制性的服务条款或协议,用户被迫放弃了其私人数据的所有权(Fuchs 2010)。这些网络中由共享数据而生成的相互联系十分活跃,使得这类服务的消费者们能够生产和消费一种游牧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受空间限制较小,而受时间限制较大。事实上,这些服务的永久无形性形塑了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尝试。

**教育应用:**云计算是一种已经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技术,特别是应用于如电子邮件和后台信息管理等共享服务,以及服务于研究进程或数据存储(JISC 2011)。它尤其广泛地分布于社交网络和其他社会化媒体中,它们趋向于以利润定位为导向,进而使人际关系进一步物化。这在围绕“粉丝”、“好友”等词汇形成的话语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大学里,以绿色 IT 和可持续发展的名义来帮助云计算实现商品化并出售出去的努力也正在进行,尽管缺乏证据证明云“更绿色”,工业已经将这个概念裹挟其中,以便为下一步的服务导向型创新赢得空间(Hall and Winn 2011)。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云计算如何能够影响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组织方式,具体来说即大学如何重设其教学设计,围绕云进行授课与演讲(Das 2012),以及像图书馆馆藏那样提供服务(Sanchati and Kulkarni 2011)。英国有过一个关于使用技术来降低教育费用的争论,其中云计算被视为一种通过共享服务来降低成本的手段。这纯粹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减少教育财务成本,并围绕商品化服务来重新设计劳动力市场(JISC 2011),而并不考虑教学实际需要和技术部署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抵制:**云计算使得技术、组织化结构中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更为明显。一方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即在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中设置云技术以便榨取租金和价值的做法遭遇了抵制。这是国家补贴私有化的一种形式,重点关注的是通过外包和共享为学生提供服务的持续性与供给情况等问题。这涉及到相关数据和隐私问题,以及开放教育数据以供跨国风险资本家挖掘。类似的跨国网络也使得政府可以依照保护国土安全的逻辑来监控数据(Walden 2011)。

然而,社会化媒体也允许对控制的规避,因此也为颠覆性合作提供了反抗和抵制管理议程(managerial agendas)的新路径。云计算的应用导致了边界的模糊,受经济利益驱动的高等教育机构,随之发现越来越难以找到大学的合理边界。这对资本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其架构无法控制网络之中、大学以外的雇员与学生的活动,并且他们能够被“指派”来打开缝隙,使知识产权和社会关系产品可以为他人和公益服务。封闭的动机推动了云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而云技术的推广应用也反过来种下了反抗封闭的种子。

### (五) 人机共生

**技术:**不断有人为降低交换过程与相对剩余价值榨取的成本及其相关成本而努力,资本渴望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努力与渴望的顶点就是人机共生和人体机能增强。这是一种揭示了情感和扩增技术二者联系的技术,扩增技术通过云基工具被用来生产社会赋予意义的、身份标示功能驱动的商品,以及这类商品的研发、监测与分配。已被证明的是对这样一种拜物化形式的崇拜,即把人类作为最佳劳动力,为了价值增值把人类设计为机器,加以扩增和异化(Marx 1993)。

人机共生最初是由利克里德(Licklider 1960,1)提出的设想,作为一种手段,通过人与机器之间一种“非常紧密的结合”来实现更高效的合作行动,从而提高“程式化思维”的效率,以及对“无预定程序可以简单依靠的复杂情形”加以控制。利克里德希望“这种共生的合作关系相比人单独操作能更高效地完成智能化操作”(Licklider 1960,1)。前提是人类智力能够被增强,并因此使人类能够执行超出其身体常规限制的任务或劳动。

该想法导致了鼠标的发明,人机互动、交互计算、超媒体及视频会议等技术创新的出现,正如媒体提高了劳动效率和价值,减少了商品的流通时间(Ikonen et al. 2010)。用罗伊(Roy 2004)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人机共生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技术,它能提高人类的潜能,突破人类能力的限制。他把这种技术看作人类的延伸,认为这种共生技术能通过可穿戴技术、辅助技术或神经植入来实现(Ikonen et al. 2010)。

与马克思的观点(Marx 1993,2004)不同,这是资本强化工业化劳动合作这一需求的逻辑结果之一。这种合作通过以下方式溶解于社会组织之中:个人控制台(personal consoles)的开发、集成于移动和个人技术之中情感需求、机械作为劳动力的扩展与劳工身体的一体化等。正如格里夫等人(Greef

et al. 2007, 1)关于增强认知的论述,其目的是“创造适合的人机协作,不断优化人机系统的性能”。这点与马克思(Marx 1993)关于劳动被吸纳入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器的观点有联系。

在机器中,物化劳动作为统治劳动过程的权力,在劳动过程中与活劳动相对抗;这是一种占有活劳动的权力,是资本的表现形式……劳动方式的机械化发展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将传统的、继承性的劳动方式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知识与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因此被作为劳动的对立面吸纳入资本,从而表现为资本的一种属性(Marx 1993, 694—695)<sup>①</sup>。

人机共生目前对社会的渗透已达到如此程度,技术被视为一种偶像或是一层神秘面纱,社会脑好比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中涌出的一泓天然甘泉,通过新兴技术建构起来。这样,消费者已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个人化技术,因为这些技术扩展了他们在社会工厂中的角色和身份。这影响到了通过存取信息、开展业务和进行全球沟通来实现劳动的方式。然而,尽管这种共生技术使得劳动既能完成更复杂的计算,又能降低信息或通讯等商品的流通成本,但无形损耗的影响意味着需要不断进行创新。

**教育应用:**可能的应用方式与提供直接的个性化的反馈相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机共生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医疗工作(MIT Media Lab 2012),其正在设计、开发并测试新的人机界面,可以将之应用于依靠触感操作的触觉界面。该实验室旨在将精神物理学、生物力学和精神病学融入智能高效的触觉界面和设备的开发中。此外,麻省理工学院 10X 项目(MIT 2012)正在不断测试着包括记忆等内容在内的交叉应用领域,以期增强并扩展人类的认知能力。该项目的重点在于其将支撑大学内部知识劳动的实践活动,将通过知识交换进入社会工厂的实践活动进行彻底重构。这类共生技术展示了对超越人类生理限制的人类体验进行商品化和再生产的不懈努力,因为技术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组织起来的。

这种认知处理能力的增强以脑机交互界面的创新为基础,这是一种新

---

<sup>①</sup> 中文摘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9—210页。——译者注

兴的神经技术,可以将人脑活动转换为外部设备的指令信号。关于这些界面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从建立人脑与具体待控制设备之间的直接沟通路径开始。虽然这些技术的发展主要是出于医学原因(Berger 2007, Gasson and Warwick 2007),它们同样为大学里不同形式的无形劳动提供了想象空间,并直接导致日常体验被公司“指派”来榨取剩余价值。这种情况见诸于最优决策人机集成系统(Human-Systems Integration for Optimal Decision Making),它扩增了在诸如空中交通管制和护士培训等动态复杂环境下的劳动体验(Ikonen et al. 2010)。不仅大学里的研究催化了这类无形性创新,那些类似的大学环境也提供了工作导向的实践空间,借此可以将新技术在社会中加以试用并嵌入其中。

因此,高等教育环境范围内关注的是人机集成系统的强化,以考虑将人员、培训、系统安全和健康隐患等社会技术问题,纳入到目标受众将使用的共生技术的设计中来。认知和组织系统工程项目(The Cognitive and Organisational Systems Engineering project(COSE)2012)正在模拟人机集成系统来支持在一系列环境中的最优决策。这体现了大学里产生的研究是如何通过开发和测试的整体过程和工具,以使它们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工作,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能够在空间上超出高等教育的范围。因此,尽管这些工程最初是用来支持医疗卫生、空中交通管制等认知性工作导向型学习,其特殊意图是通过整合学习培训、人、技术和他们工作的环境,把这种无形工作扩展到其他领域。

**抵制:**人机共生是这样一种技术,它提供一种彻底抵制的可能性,抵制通过影响人类对真实自然的认知来将人性吸纳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方式。这种被夸大了的人类与技术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视为有问题的、不良的,特别是伴随劳动力通过技术升级被不断优化,去人性化的过程因而被揭示出来。这是对把人类像机器一样进行设计、增强和异化以维系价值的拒绝。这些信息通讯技术的用途因此可能会在高等教育领域受到非议,该领域的一个传统目标是自主个体的发展,而非使个性商品化,商品化的目标是与技术本身的再发展相矛盾的。

## (六) 总结:高等教育中的新兴技术

上述四种技术所代表的创新使认知性劳动者能够通过虚拟现实超越物

理障碍,并用新的方式消费其教育生活世界。正如那些体验在全球和个人两个层面被生产和商品化,资本能够捕获并驱策日常体验,使之变得如商品一样可以赚取租金、榨取价值、获得利润(Clark 1994, Marx 2004),并且通过培育专有技能来实现其自身的进一步再生产。大学里的研究恰恰催化了资本将人体禁锢于机器剥削中的这一事实。然而,它的实现亦是借助以下事实:对市场化和云基(cloud-based)学习环境与服务部署;将虚拟化和扩增作为维持霸权的一种手段应用于教育;工作导向的学习和实习经历;以及通过将新型机器直接植入劳工的生活世界之中。这意味着,劳工的教育生活世界,恰恰是一个创造和榨取剩余价值,并通过商品化和租赁实现价值积累的场域。正如梅克斯因斯·伍德(Meiksins-Wood 1997)指出的,这一并无外部可言的全面异化系统。

然而,从普疏同(Postone 1996)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性作用包含了革命性的潜在可能,原因恰恰是资本主义日益增加的剥削、异化和去人性化的机械化在日常实践中被不断地揭露。由于教育成为霸权话语和权力关系再生产的核心场域,通过先于大学内部的自反性(reflexivity)与实践而存在的技术创新,强化了对于商品化的揭露。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劳工将意识到其教育实践正在不断地无产阶级化。因此,有可能勾画这样一种繁荣发展的异议并对其加以支持,这些异议得以产生的基础是,自主运用那些给人们带来悲惨境遇的新兴硬件、软件与网络(Coleman 2012, Dyer-Witheford 1999, Newfield 2010)。这里的问题是,大学内部新兴技术生产是如何以一种激进主义的形式来影响学术劳动的。

## 五、全面撤离(Exodus)与学术激进主义的勇气

霍洛威(Holloway 2002)指出,如果我们相信那些为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而存在的结构能够被用来改善其不断异化的工作组织,那么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尽管他的话作为破灭的革命希望的标志,是针对民主国家的结构而言的,但是他的观点可能也同样适用于大学。

事实上,国家(大学)的作为受到这样一件事实的限制与形塑,即它只是作为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单一节点而存在。至关重要的是,这一社会关系网以工作的组织方式为中心。工作被组织于资本主义基础上

的事实,意味着国家(大学)所做的和能做的,都受到维持资本主义组织系统这一需要的限制和形塑,它只是该组织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Holloway 2002,6)

因此,任何机构的活动空间都受制于跨国性全球资本,尤其是受制于经技术转化的金融资本所带来的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与限制。若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机构进行控制的努力将镇压资本主义反抗者的变革意图,因为这种变革总是和权力的有限调度有关。用维尔诺(Virno)(北达科他州)的话来说,这是基于“弱势思维”,或是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它“由‘70年代’末期以后,提供(新自由主义)挫败(劳工运动)意识形态的哲学家的理论发展出来”。因此,教育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内部建立在自由主义民主的信条之上,与平等或自由等观念,或是与诸如尊重、开放等概念模糊的实践或品质联系在一起。甚至在大学内部也变得很难去想象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工作现实的不同形式的社会生活。

由此,新兴技术的拜物化面临着强化霸权的风险,使得它们的革命性看起来只体现在其生成个体、由用户生成的结果等方面,而并不体现在对价值新形式的描绘中。从这一观点出发,它们再生产了一套普适的、超历史的规范,在该规范中,主张超越那些被民主资本主义强加的其他价值或组织的形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此外,表述资本主义内部教育精英的结构性统治,或是对教育的价值进行有限的、程序性的定义,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教育革新都变得不再可能。在此很重要的一项是创新借以涌入/流出大学的机制,为新自由资本主义有意设计、宣扬和操纵民主和治理的形式来辅助其现实目的提供了途径(Harvey 2010)。这部分是通过在社会技术组织和公民文化内部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实现的,但这也反过来使得逾越消费者权利的控制逻辑变得不再可能。

这并不是说以一种与大学相反的形式利用开放的新兴技术并不可能(EduFactory 2012, Hall 2011, OpenDemocracy 2012,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2012, Occupy Wiki 2012)。反霸权实践活动正越来越被视为教育性的,并正在通过会员大会、由公众考察并加以实践的激进研究战略与活动,使得对社会技术系统和生活方式的重新想象成为可能。实际上,正是从这些激愤的全球运动中,可能形成一种对大学里新兴技术发展的批判,以期为不同意见、为对异化了的资本主义工作的华丽虚饰加以否定和反抗提供机

会(Holloway 2010)。这种批判的出现有两个来源:首先,源于对消费主义教学法的反对,该教学法通过日常事务与活动的商品化来为采用新兴技术正名;其次,源于对这样事实的重新认识——新兴技术有助于批判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与现实。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激进的教育计划正在政治意义上重新定义权力问题,并尝试将高等教育重新书写成一种融入社会结构之中的高层次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教育计划)认为学校机构或大学对社会转型具有象征意义上的关键作用。这些教育机构形成了一个重新想象的进程,这一进程可能带来激进教育被拜物化或世俗化的风险,但却提供了另一种不同进程的惊鸿一瞥,这一进程的闪光之处在于其将大学作为社会关系全球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也聚焦于公众对学术在社会中作用的重新思考,新兴技术使得这种重新思考变得更加容易,而新兴技术在公共生产(production-in-public)中的作用则成了将问题组织起来的中心主题。其中一个关注点是,通过联合一致,通过对所涉及问题进行学术的、合作性的思考,进而将相关资源植入目标社会,来克服个人化问题(Downes 2012)。

因此,对与(学院内外)高层次学习相关的日常学术活动的批判,依照资本的技术生产逻辑展开,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空间,否定、异议与反叛就是在这个空间内得以生成(Holloway 2002)。这里,全球范围内联系在一起的人机共生技术可能对打破资本主义的集权逻辑尤为重要,该技术有助于以共同的、合作的方式征服权力,这是通往废除权力关系的步骤之一。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揭露在生产/消费过程中的去人性化手段,例如情感计算支持下的情感挖掘,或是教育生活的虚拟化,并不把人作为能够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的个体。因此,云基新兴技术的使用,提供了通过社会技术系统把全球的政治反抗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这需要创造一个分离的、非统一的、非连续性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由于资本主义自身异化和去人性化的重复、不稳定性质被揭露,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学术劳动将变得更具风险。

通过新兴技术将高等教育与社会联系起来十分重要,这将划定技术支持下意义与反抗的空间,因为大学依然是大众理性被消费、被生产、被(所有人)扩展的场域象征。因此,揭露社会工厂内共同的异化经历,应用能够突出受压迫感并允许将这种感觉进行分享的新兴技术,为新的反抗、批判场域的形成提供了可能。通过放大这一过程,大学里的学术实践针对圈定人们集会、联合、组织的方式、地点与原因这一不合理现象,提供了勇敢反抗的空



间(Agamben 2005)。然而,考虑到意识形态、政治驱动力以契约化研究与债务(indentured study and debt)、国际化、私有化、外包为导向,一旦涉及到抵制封闭的竞争逻辑,主张高等教育的社会化角色等问题时,大学里的学术活动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因此,大学的内部逻辑越来越受制于金钱规则,这排除了建立变革性社会关系——如反抗拜物化生产和增值过程——的可能性。

“全面撤离”的观点在此作为一种异议、反叛和抵抗的形式是很重要的,其反对的目标是正如新兴技术所展现的资本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剥削。这种剥削通过游戏工业的玩工(playbor)见诸于情感技术之中(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 2009);也见诸于云数据的攫取之中,通过攫取数据吸纳更多身份信息,以服务于社会网络的进一步积累(Winer 2011);或是见诸于以营利性扩增程序来封闭开放网络的行为之中(Short 2011)。因此,个性化、自我品牌(self-branding)、人们借以相互联系新兴技术,这三者的拜物化过程,使我们在世界上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与所有行动,都面临商品化的风险。然而,这一增强了的、相互连结的社会关系语义网,也提供了一个罅隙,借此罅隙有可能反抗资本的统治。正如伊里奇(Illich 1975,82)所述:“只有在欢乐的结构化工具之中,人们才能学会使用现代技术赋予他们的新层次的权力”。因此,正是资本为实现约束和控制劳工,而要求发展的自动化或人机增强与共生,使得全面撤离资本主义工作社会成为可能,这一全面撤离通过对作为自动化的结果而产生的空闲时间进行激进的重新处置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群体在空闲时间里得以相互联系的新的生活方式(Virno 2004)。

这样,学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高了全面撤离资本主义工作社会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一系列反对资本控制论指令的原子化的最后一搏(Dyer-Witheford 1999)。这一作用始于对认知性劳动起点上的否定和拒绝。用诺布尔(Noble 1998)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反对在虚拟化推动下将智力活动转化为智力资本进而转化为私有财产,而虚拟化本身则又是受教学研究的商品化和具商业价值的专利产品的出现所驱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技能退化和自动化、商品拜物化、劳工的无产阶级化居于这一过程的核心。因此,通过把包含研发在内的大学生活世界与马克思的深层结构性技术批判重新联系起来,可以使新兴技术的公共发展合法化,并使得对它们作为生产的拜物性力量的揭露成为可能,成为学生、教师和公众之间活动的一种重新政治

化的形式。此外,可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培养异议空间,或是进行以新工人主义反叛(new workerist revolts)为基础的抗议(Coleman 2012, Mason 2012)。这些抗议的工人主义特性非常重要,因为资本倾向于将无产阶级社会劳动置于次要位置并加以剥削,进而供养并增强那些更有价值的、有着专有技能的认知性劳工(Newfield 2010, Dyer-Witheford 2004)。

因此,大规模的抗议形成了反抗紧缩的政治事件,学者们应该考虑他们的参与传统及应处位置,以及如何主动为消解自己专业知识的商品性而贡献力量,以便支持生产的别样社会结构形式。通过特定新兴技术的生产/消费,揭示了对知识生产的批判,在对其批判中,大学能够获得超越自身象征性作用的发展。作为结果,学生和教师可能会重新考虑他们参与新兴技术的方式,以便有助于他们社会互动网络的重组。学生和教师如何在反对统治和排斥(foreclosure)的公共性异见中发挥作用?从马克思的观点来说(Marx 1992, 2004),技术是社会革命性转型的一条中心线索。这种转型通过建构一种替代性的价值结构推翻了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这一替代性的价值系统并没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质。与马克思的认识不同,学者们可能会考虑其借助新兴技术所进行的有关新兴技术的工作,是如何有助于在实际的、现实存在的抗议中消解大学的象征性力量的,以期参与到超越纯粹商品化的转型进程之中。

### 参考文献:

- Agamben, Giorgio. 2005.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riole, Katherine P., and Ramin Khorasani. 2010. Cloud Computing: What Is It and Could It Be Usefu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7(4):252—254.
- Azuma, Ronald T., Baillot, Yohan, Behringer, Reinhold, Feiner, Steven, Julier, Simon and Blair MacIntyre. 2001. Recent Advances in Augmented Reality. *IEEE Computer Graphics and Application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cs.unc.edu/~azuma/cga2001.pdf>
- Bailey, Michael, and Des Freedman. 2011. *The Assault on Universities: A Manifesto of Resistance*. London: Pluto Press.
- Ball, Stephen J. 2012. *Global Education Inc. New Policy Networks and The Neo-Liberal Imaginary*. London: Routledge.
- Berger, Theodore W. 2007.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wtec.org/>

bci/BCI-finalreport-10Oct2007-lowres. pdf

Blackboard Inc. 2012. Blackboard Mobile.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blackboard.com/Platforms/Mobile/Overview.aspx>

Bonefeld, Werner. 2010.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Shift Magazine*, 11.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shiftmag.co.uk/?p=400>

Canaan, Joyce E, and Wesley Shumar, eds. 2008.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Clarke, Simon. 1994. *Marx's Theory of crisis*.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Cline, Mychilo S. 2005. *Power, Madness, and immortality: The future of virtual reality*. University Village Press.

COSE. 2012. COSE Project.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nicta.com.au/research/projects/cose>

Collini, Stefan. 2012. *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 London: Penguin.

Colman, Gabriella. 2012. Our Weirdness is Free. *Triple Canopy*, 15.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canopycanopycanopy.com/15/our\\_weirdness\\_is\\_free](http://canopycanopycanopy.com/15/our_weirdness_is_free)

Cowie, Roddy. 2005. What are people doing when they assign everyday emotion terms? *Psychological Inquiry* 16(1):11—48.

Cuhls, Kerstin. 2003. From forecasting to foresight processes—new participative foresight activities in Germany. *Journal of Forecasting* 22(2—3):93—111. Accessed April 1, 2012.

Cullerne-Brown, William. 2012. Research Blog.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exquisitelife.researchresearch.com/exquisite\\_life/williamcullernebrown.html](http://exquisitelife.researchresearch.com/exquisite_life/williamcullernebrown.html)

Das, Gaurav. 2012. 6 universities to teach cloud computing, mobile tech.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2-08/guwahati/31037183\\_1\\_cloud-technology-manipur-university-curriculum](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02-08/guwahati/31037183_1_cloud-technology-manipur-university-curriculum)

Dikaiakos, Marios D., George Pallis, Dimitrios Katsaros, Penkaj Mehra, and Athena Vakali. 2009. Cloud Computing: Distributed Internet Computing for I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EEE Internet Computing* 13(5):10—13.

Downes, Stephen. 2012. Welcome to Change: Education,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change.mooc.ca/about.htm>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Dyer-Witheford, Nick. 2004. *Autonomist Marxism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nberra: Treason Pres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libcom.org/library/autonomist-marxism-information-society-nick-witheford>

Dyer-Witheford, Nick, and Gre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duFactory. 2012.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edu-factory.org/wp/>

EC. 2010. COM(2010)2020: *Europe 2020-A strategy for 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ec.europa.eu/eu2020/>

EC. 2012.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Framework Programme 7*.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ec.europa.eu/research/fp7/>

Educause. 2012. Learning Analytics: 51 Resourc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educause.edu/Resources/Browse/LearningAnalytics/39193>

Greef de Tjerk. E., Arciszewski Henryk F. R., and Mark A. Neerincx. 2010. Adaptive Automation Based on an Object-Oriented Task Model: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in a Realistic C2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gnitive Engineering and Decision Making* 4 (2): 152—182.

Feenberg, Andrew. 1999. *Questioning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Pantheon.

Friedewald, Michael. 2005.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uter User: Visions and User Model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Total Intera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New Paradigm*, edited by Gerhard M. Buurman, 26—41. Basel: Birkhäuser.

Fuchs, Christian.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 179—196.

Ganascia, Jean-Gabriel. 2010. The generalized sousveillance societ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49(3): 489—507.

Gartner. 2011. Gartner's 2011 Hype Cycle Special Report Evaluates the Maturity of 1,900 Technologi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gartner.com/it/page.jsp?id=1763814>

Gasson, Mark, and Kevin Warwick, K. 2007. D12. 1 *Study On Emerging AmI Technologies*. FIDIS-Future of Ident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fidis.net/resources/deliverables/hightechid/d122-study-on-emerging-ami-technologies/doc/8/>

Habermas, Jürgen. 1987.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volume 2 of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Hall, Richard. 2011. Occupation: a place to deliberate the socio-history of re-production. In *Roundhouse Journal: Reimagining the University* 2: 54—63.

Hall, Richard. 2012.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War on Public Education. Ac-

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richard-hall.org/2012/03/22/educational-technology-and-the-war-on-public-education/>

Hall, Richard, and Joss Winn. 2011. Questioning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Resilient Higher Education. *E-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 8(4):343—356.

Hamilton, Karen E. 2011. Augmented Reality in Education.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wik.ed.uiuc.edu/index.php/Augmented\\_Reality\\_in\\_Education](http://wik.ed.uiuc.edu/index.php/Augmented_Reality_in_Education)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Blackwell.

Harvey, David.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HEFCE. 2012. Enhanc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rough the Use of Technolog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hefce.ac.uk/learning/techlearn/>

Heilig, Morton L. 1962. *Sensorama Simulator*.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www.mortonheilig.com/SensoramaPatent.pdf>

HIT Lab NZ. 2012. BuildAR.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www.buildar.co.nz/>

Holloway, John. 2002.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Hudlicka, Eva. 2009. Affective Game Engines: Motivation and Requiremen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4<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undations of Digital Games*, 299—306. Orlando, Florida: ACM. doi:10.1145/1536513.1536565

Human Machine Symbiosis Lab. 2012.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symbiosis.asu.edu/research\\_hms.html](http://symbiosis.asu.edu/research_hms.html)

Ikonen, Veikko, Kanerva, Minni, Kouri, Panu, Stahl, Bernd Carsten & Wakunuma, Kutoma. 2010. ETICA Project Deliverable D. 1. 2: Emerging Technologies Report.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ethics.ccsr.cse.dmu.ac.uk/etica/deliverables/D12Emergingtechnologiesreportfinal.pdf>

Illich, Ivan. 1975. *Tools for Conviviality*, London: Fontana.

JISC. 2011. Cloud Computing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to Universiti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jisc.ac.uk/news/stories/2011/05/cloud.aspx>

JISC. 2012. Mobile Learning Infokit.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s://mobilelearninginfokit.pbworks.com/w/page/41122430/Home>

Klein, Naomi. 2007.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London: Penguin.

Lebowitz, Michael A. 2003.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Lepratti, Raffaello. 2006. Advanced Human-Machine System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ome Issues for Employing Ontologies f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17(6):653—66.

Licklider, Joseph C. R. 1960. Man-Computer Symbiosis. *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 HFE-1:4—11.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groups.csail.mit.edu/medg/people/psz/Licklider.html>

Mason, Paul. 2012. *Why It's Kicking Off Everywhere: The New Global Revolutions*. London: Verso.

Marx, Karl. 1992. *Capital, Volume 3: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9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2004.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2006. *Capital, Volume 2: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cGettigan, Andrew M. 2012. Critical Education: All about the Arts, Human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toda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andrewmcgettigan.org/>

Meiksins-Wood, Ellen. 1997. Back to Marx. *Monthly Review* 49(2):1—9.

MIT Media Lab. 2012. Affective Computing.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affect.media.mit.edu/>

MIT. 2012. 10x Human-Machine Superperformance.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10x.media.mit.edu/>

Neary, Mike, and Andy Hagyard. 2010. Pedagogy of Excess—an Altern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udent Life. In *The Market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Student as Consumer*, edited by Mike Molesworth, Richard Scullion and Elizabeth Nixon, 209—24. London: Routledge.

Negri, Antonio. 1989.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Neilsson, Brett, and Ned Rossiter. 2008. Precarity as a Political Concept, or, Fordism as Excep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5(7—8):51—72.

Newfield, Christopher. 2010. The Structure and Silence of Cognitariat. *EduFactory Webjournal* 0:10—26.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edu-factory.org/edu15/webjournal/n0/Newfield.pdf>

Newfield, Christopher. 2012. Remaking the Universit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

tp://utotherescue.blogspot.com/

Noble, David F. 1998. Digital Diploma Mills: The Auto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irst Monday* 3(1):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569/490>

Occupy Wiki. 2012. OccupyWiki.org.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occupywiki.org/>

OpenDemocracy. 2012. # occupy communiqu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opendemocracy.net/freeform-tags/occupy-communiques>

Postone, Moishe. 1996. *Time, Labou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stone, Moishe. 2009. Rethinking Marx's Critical Theory. In *History and Heteronomy: Critical Essays (UTCP Booklet 12)*, edited Moishe Postone, Viren Murthy and Yasuo Kobayashi, 31—47.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

Porto Interactive Center. 2012. LifeisGame Project.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portointeractivecenter.org/lifeisgame/>

Really Open University. 2012. The Really Open University.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reallyopenuniversity.wordpress.com/>

Robinson, Peter, and Rana el Kaliouby. 2009. Computat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Machin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4 (1535): 3441—3447. doi:10.1098/rstb.2009.0198.

Roy, Deb. 2004. 10x: Human-Machine Symbiosis. *BT Technology Journal* 22(4).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10x.media.mit.edu/10x\\_draft.pdf](http://10x.media.mit.edu/10x_draft.pdf)

Sanchati, Rupesh, and Gaurav Kulkarni. 2011. Cloud Computing in Digit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Global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1(12): 36—41.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globaljournals.org/GJCST\\_Volume11/6-Cloud-Computing-in-Digital-and-University.pdf](http://globaljournals.org/GJCST_Volume11/6-Cloud-Computing-in-Digital-and-University.pdf)

Short, Adrian. 2011. It's the End of the Web As We Know It.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adrianshort.co.uk/2011/09/25/its-the-end-of-the-web-as-we-know-i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2012. Radical Education Project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sociologicalimagination.org/a-work-in-progress>

Stahl, Bernd Carsten. 2004. E-Teaching-The Economic Threat to the Ethical Legitimacy of Education? I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Education* 15(2): 155—66.

Sykes, Jonathan, and Simon Brown. 2003. Affective gaming: measuring emotion through the gamepad. In *CHI'03 extended abstracts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732—733. Ft. Lauderdale, FL: ACM. doi:10.1145/765891.765957

Tao, Jianhua, and Tieniu Tan. 2005. Affective Computing: A Review.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3784: 981—995.

The Think Trust. 2010. Cloud Computing Scenario.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think-trust.eu/downloads/think-trust-documents/cloud-computing\\_v0-2/download.html](http://www.think-trust.eu/downloads/think-trust-documents/cloud-computing_v0-2/download.html)

Tiqqun. 2001. The Cybernetic Hypothesi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archive.org/details/Tiqqun1>

Tronti, Mario. 1973. Social Capital. *Telos* 17: 98—121.

Valtysson, Bjarki. 2011. Facebook as a Digital Public Sphere: Processes of Colonization and Emancipation.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10(1): 77—91.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triple-c.at/index.php/tripleC/article/view/312>

Vercellone, Carlo. 2007. 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1): 13—36.

Virno, Paolo. 2001. General Intellect. *Generation Online*.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virno10.htm>

Virno, Paolo. 2004.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Los Angeles: Semiotext.

Virno, Paolo. n. d. General Intellect, Exodus, Multitude: Interview with Paolo Virno. *Archipelago* (54).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virno2.htm>

Virno, Paolo, and Michael Hardt, eds. 1996.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alden, Ian. 2011. Accessing Data in the Cloud: The Long Arm of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781067](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781067)

Wake, Matthew, and Bernd Carsten Stahl. 2010. Ethical Issues of the Use of Second Lif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Proceedings of ETHICOMP*, 13 to 16 April 2010, Tarragona, Spain.

Weber, Max. 1969.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Williams, Jeffrey, J. 2012. Deconstructing Academe: The birth of critical university studie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edu-factory.org/wp/deconstructing-academe-the-birth-of-critical-university-studies/>

Winer, Dave. 2011. Facebook is scaring me.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scripting.com/stories/2011/09/24/facebookIsScaringMe.html>



xDelia. 2012. Xcellence in Decision-making through Enhanced Learning in Immersive Applications.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www.xdelia.org>

Zhou, Feng. Duh, Henry Been-Lirn, and Mark Billinghurst. 2008. Trends in Augmented Reality Tracking, Interaction and Display; A Review of Ten Years of ISMAR. In *ISMAR '08: Proceedings of the 7<sup>th</sup> IEEE/AC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xed and Augmented Reality*.

Žižek, Slavoj. 2009.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威廉·亨宁·詹姆斯·赫布尔怀特(William Henning James Hebblewhite)<sup>①</sup>

## “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

罗锋(译),姬德强、吴畅畅(校)

[摘要]本篇论文希望考查雷蒙德·威廉姆斯提出的“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的论断。本篇论文在同意威廉姆斯的中心论断的同时,认为他用来说明这个论点的模式没有得到充分实现。通过结合马克思与阿尔都塞与此相关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工具来具体说明威廉姆斯的观点。

[关键词]雷蒙德·威廉姆斯,传播工具,因特网,生产工具,马克思,阿尔都塞

### 一、导 言

在本文中,通过批判性地考察威廉姆斯《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我试图去探索他关于传播工具可以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论断。我认为威廉姆斯的理论为传播理论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然而我也认为,尽管可能开拓新空间,但是威廉姆斯的理论本身并不能将这些可能性转变为最终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在此引入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来促进这种可能性的发展。本文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厘清马克思对于生产工具的定义以及他如何将传播工具视为生产关系的形式之一。同时我也将讨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以及将传播工具视作生产工具对我们理解社会又怎样的影响。在第二部分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我将理清雷蒙德·威廉姆斯关于传播

---

<sup>①</sup> 拉筹伯大学, whebblewhite@students.latrobe.edu.au。

工具即生产工具的阐述。我认为威廉姆斯一方面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一方面又因为这种观点是基于对“生产”这样一个称呼的定义之上的,也就降低了准确描述生产工具的含义的能力。我认为威廉姆斯希望能够说明生产不仅仅只是“商品生产”,传播也是一种将信息视作商品的生产。在最后一部分中,我希望考察,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是如何从理论上有助于对如下观点的检讨,即:因特网是生产工具,从而也生产信息产品。本文的目的有二: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下,给对于诸如因特网这样的传播工具的持续性分析打好基础,同时希望借此克服雷蒙德·威廉姆斯研究中对于结构主义的批评。

## 二、马克思与生产工具

1857年,马克思写就他流传最久的作品之一。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arx 1859/1994)绝对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所做的所有工作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下面是这一文稿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被非常多的人解读。马克思这样写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

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sup>①</sup>

这个章节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产工具的概念。从“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结构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并且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而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如何建构生产方式的。《序言》中的这两部分对我们在本文的讨论,必然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雷蒙德·威廉姆斯假设传播工具也是一种生产工具,那么这就是对于社会结构的反思,或者说这种假设成立么?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组成这个论点的各个要素。正如我们在威廉姆斯的文章标题中所看到的,最主要的要素是:传播工具和生产工具。我们可以认为这样一个标题说明了生产工具相较于传播工具是一个更为宽泛的类别,而传播工具只是生产工具的一种。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那么接下来自然而然需要了解的就是生产工具是什么。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工具的两个要素在劳动过程当中成为了统一的力量。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劳动力与原始资料是生产力与相对生产的矛盾的表现的一个方面。它们以这样的形式定义社会结构。接下来需要我们对这些概念做更深入的研究。按照马克思的话“劳动工具是一神物,或是物的合成体,劳动工具使工人可以在其自身与劳动对象之间进行干预,并担任了指挥的角色,指导工人在对象上展开行动”(Marx 1990, 285)。尽管关于生产工具以及哪些可以或者不可以借由这个概

---

<sup>①</sup> 中文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82—83页。——译者注

念来进行理解还存在着争论,柯亨(G. A. Cohen, 2000)认为像力量、技能、知识以及智力这些东西虽然并不是原始材料也非劳动力要素,但却是实际劳动过程中的工具。而像生产工具、劳动工具这些所谓的模糊性允许不同的人描述生产过程中的这些组成部分时有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表述。那么依照概念来看,劳动工具是诸如一把锤子或者一个工厂这样关注于劳动目的的活动。这个概念本身已经足够宽泛,但是在我们引入马克思“在劳动工具中,我们需要包含劳动过程发生的一切客观条件”这样的说法之后,概念的含义变得更加宽泛了。

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可以推断原始材料和劳动对象也包含在劳动工具的概念里面。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注意到原始材料与劳动对象的并存。所有的原始材料都是劳动对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对象都是原始材料。在马克思的观念里,原始材料在经过了劳动过程之后就不仅仅只是劳动材料了(马克思1990)。我们可以说一块木板是原始材料,而森林中的一棵树是自然资源。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一块木板已经经过劳动力的改造,成为了产品。根据我之前所述,劳动力要素可以全盘被看作是生产工具。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不管形式如何,只要能够提供供劳动的客观情况,就可以被看作是劳动力要素。正如劳动对象就是劳动发生的场所,我们可以推知劳动对象是一种劳动力要素,与其他劳动力要素一起被制作成可供消费的产品。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生产工具不外乎就是劳动条件。考虑到生产力是劳动过程与生产工具的结合,也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将它们联接起来成为了生产力。

### 马克思与“传播工具就是生产工具”

这与我们关于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将生产工具看作是劳动过程要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就必须证明传播工具是劳动资料的一种,而传播工具作为一种生产工具需要为劳动过程提供必要的条件。

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与大规模生产这一部分中,马克思讨论了生产工具与传播工具的关系。他简明地写道“工业与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又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有发生革命的必要”,<sup>①</sup>这些“生产的社会过程”就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第267页,已将原文“生产方法”更改为“生产方式”。——译者注

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传播工具”与“运输工具”(Marx 1990,506)。在马克思写作的时代,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形式通过电报与铁路系统实现了。马克思并不经常使用“传播工具”这一词,只是偶尔提及运输工具。实际上在资本论一书当中,很难去区分马克思所说的传播工具与运输工具。这一点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当中宣称传播工业的非商业化的一面在于“搭载客货和传递信息”(Marx 1992,134)<sup>①</sup>得到了证明。如果我们顺着马克思的思路,那么我们能不能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得出马克思认同传播工具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结论呢?通过生产关系我们可以理解促进生产与复制生产工具的社会关系整体。在序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这样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Marx 1994,211)。<sup>②</sup>

在我们说传播工具是生产关系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经济关系。从中我们看到物质生产力(劳动力要素与劳动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传播与交通工具)中的必要基础。而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框架,我们很容易将传播工具视作生产关系。我们在《资本论》第二卷当中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疏离(distancing),传播工业与运输工业一起,被看作是工业体系里重要的分支,“其生产过程的生产物,不是一种新的对象的生产物”(Marx 1992,134)。<sup>③</sup>对于马克思来说,运输产业与传播产业都没有生产新的商品,而是“替换人或者物品”(Marx 1992,135)。这在《资本论》中多有记载,正如之前所述,对于马克思来说,相较于生产方式而言,传播工具在结构和过程上与运输方式更接近,甚至在变革中也以同样的方式发展(Marx 1990,506)。需要注意并且进一步讨论的是运输工具和传播工具的进步最终将限制大型工业制造(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生产力)。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将会阻碍(或者说束缚)它的进一步发展。到这个时候,社会革命将会发生,演进出能够使得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关系。当然如果马克思认为传播工具是一种生产关系,那么在某些阶

---

① 中文摘自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第22页,已将原文“传达书信电报”更改为“传递信息”。——译者注

②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82—83页。——译者注

③ 中文摘自《资本论》(第二卷),第22页。——译者注

段我们会发现马克思所说的传播工具与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说的传播工具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下一章当中我将把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看作是一种可以用来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而威廉姆斯的研究相较于经济更多的侧重于文化使得他可以视传播工具为生产工具。

我们必须认清商品中有形商品与无形的“传播”之间的差别。在不同的层面,传播既存在于生产者与供应者之间,也发生于工人与经理之间,同样也存在于消费者与制造者之间。我们必须认识到大众传播与本土化传播之间的区别。而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看不到;马克思的著作中所提到的传播类型最终都是与大众传播有关。这是一种大规模生产的传播。我们可以认为本土化传播从属于大众传播。没有了局部传播的效果,或者说经理告诉工人如何去做,那么也就不会存在有效的大众传播,或者是信息也不能从作为具体商品生产者的工人那里传播到包括供应者与消费者等不同人群那里去。

### 三、威廉姆斯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研究

在威廉姆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阐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着眼点在于一些由特定的关键词所组成的论述。他在著作中对于生产、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威廉姆斯认为,马克思所制定的(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前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误解。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们对马克思所使用的独特语言形式的误解。威廉姆斯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学习特定某个思想家的语言,而不是他们提出的抽象概念(Eldridge and Eldridge 1994)。正如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所说:

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中,以及在具有解释性的和说教性的构想的发展过程中,在其最原始的论点之中的词语是设计出的……就好像它们是一些明确的概念……就好像他们是一些为社会生活中可观察到的领域而制定的术语。(Williams 1977,77)

对威廉姆斯而言,马克思提出的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讨论,不过是一种类比(Williams 1993),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语言表述。而这种表述并未能恰当的将整个社会的图景展现出来。它仅仅提供了一个简化了的真实社会的变种。威廉姆斯认为,恩格斯 1890 年写给布洛赫(J. Bloch)的信,

提供了一种基础,它减弱了马克思所使用的基础—上层建筑公式的有用性(Williams 1993)。对于马克思的这种准则,威廉姆斯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一段文章为证,来展现马克思所宣称的有关上层建筑的理性。而据威廉姆斯称,这理性使得公式变得复杂。对此,他写道“通过任何有效的手段意识到其复杂性,是为了提高马克思理论修养首先要掌握的。其次要掌控的……是懂得(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构成”(Williams 1993)。在写给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写道,任何关于经济基础对社会结构有决定性作用的归纳性陈述都是对马克思和他本人意思的曲解,而这些陈述是“毫无意义,抽象以及荒谬的……”(Engels 1890)。恩格斯进一步写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元素……也对历史的斗争有影响。而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甚至决定了历史斗争的形式”(Engels 1890,475)。基于此,威廉姆斯认为,恩格斯展现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它说明马克思的公式只是一种比喻,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结构并非如此绝对和清晰。威廉姆斯并未紧随恩格斯的脚步,他批评恩格斯在层次上并未跳脱公式化的方法。威廉姆斯认为,恩格斯的模式和马克思的模式一样,犯了相同的错误。他写道,“恩格斯并没有对其中的种类做过多的修订……而只是复述了一些类别,同时举例指出一些特例,间接性和一些可能使一般的规律状况变得模糊不清的不规律性的存在。”(Williams 1977,80)由此可以看出,威廉姆斯决定从重经济基础、轻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走出来。对于威廉姆斯而言,“马克思……强调文化和经济的关联性是正确的,但是他误解了这种关系的本质。文化和传播曾经被看作是主要的而不是次要的社会内容,在社会秩序的保持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构成性的而不是反应性的作用。”(Higgins 1994,110)

威廉姆斯反对马克思理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类比,这一观点总结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的一篇文章里。他写道:

正如创造了它的社会斗争,为了维持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物质生产是必然需要的。从城堡、宫殿和教堂,到监狱、救济院和学校;从战争武器到凸轮压机:任何统治阶级,经常通过物质的各种方法,来制定社会和政治秩序。这其中从未有上层建筑活动。他们是以一种明显的自立模式进行的必要的物质生产,可以独立运行。(Williams 1977,93)



当然,不管城堡、宫殿、教堂和监狱的“上层建筑活动”性质,而将他们设想为物质生产,尽管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立刻察觉出威廉姆斯论述中的缺陷。也许的确是这样,上层建筑在过去一直仅仅被当作一种意识的非物质形式。这一论断在当代马克思理论中是被反对和不被接受的。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指出的:“威廉姆斯的著作中有一种强烈的暗示,给某些现象贴上‘上层建筑’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这种现象现实的有效性程度少于其作为物质生产的存在因素”(Eagleton 1989,168)。也许正像阿尔都塞那样,威廉姆斯考虑到了黑格尔式的因果关系模式。这种模式表达了一种观点,即所有有关社会整体性的现象也许都简化成一种特别的精华模式。但是,并不像阿尔都塞那样,认为马克思已经超越了黑格尔曾经的影响,威廉姆斯主张,马克思晚年所提出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对于实际的因果关系模式方面仍做了很大的投入。伊格尔顿认为,威廉姆斯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是在重新创造体系。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过时模式的批评,与其说从某种理论意义上是有用的,不如说是一种例行公事(Eagleton 1989)。如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威廉姆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可以看作“马克思对于‘整个社会历程’的‘不能分解的统一体’的原始洞察的复杂整体的回归”(Higgins 1999,114)。它“克服了‘社会’和‘自然’的二分法”(Williams 1977,19)。威廉姆斯并未将经济看作是社会核心概念,而是将文化放在“现代思想和实践”的中心位置(Williams 1977,11)。文化这个术语因此成为威廉姆斯关注的核心,这可从他尝试着去建构一个文化唯物论(参见 Williams 1977,1993)和一个文化社会学(参见 Williams 1977,11)中看出来。于威廉姆斯而言,“马克思……正确地强调了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联,但是他严重地混淆了联系的性质”(Higgins 1999,110)。文化并不是如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标榜的那样是与其他上层建筑元素一样的(社会的)次要属性。相反,“文化和传播应当被视作社会整体性的主要组成部分”(Higgins 1999,110)。文化唯物论认为,文化应被同时看作社会的和物质的生产过程,和将“艺术”视为一种对物质生产手段进行社会使用的实践(Williams 1980)。他跟随赫尔德(Herder)和柯勒律治(Cole-ridge)的浪漫主义的脚步,将文化“同政治和经济分离,并将其置于比政治和经济更高的位置”。然而,文化主义是否单单只是一种将文化置于经济之上的决定论呢?它是否只是一个对威廉姆斯所批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构

想的一种反转?不一定。尽管看起来如此,但威廉姆斯的决定论与他所力图批判的决定论相比,具有不同的很特别的意义。决定论的概念在威廉姆斯的著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解决马克思文化理论方面的问题,要比解决‘决定论’方面的难得多”。对于“决定论”这个关键词,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专门有一章对其进行了阐述。他力图对决定论进行定义。他认为决定论不是“被预计了的、被预示了的、被控制了的合集”,而更像是一种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合集(Williams 2005,34)。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中有很深的技术决定论思想,对此他也深感厌恶。我们也必须再次指出威廉姆斯有着与阿尔都塞很相似的观点。两位思想家,都不愿将决定论看作为一种控制的过程,而认为其是一种限制的设定。二者都在某种程度上都遵循了恩格斯对于决定论的描述。这描述出现于之前所说的那封恩格斯写给布洛赫的信中。威廉姆斯批判他所称作“抽象的客观性的东西”,在这种抽象的客观性中决定过程独立于人的意志,同时人类无法掌控。这便是在第二国际时期被广泛传播的经济主义建立地位的基础。威廉姆斯进一步认为,对于哲学和政治的学说而言,这地位毫无意义(Williams 1977)。威廉姆斯反对经济主义,然而尽管他反对,决定论仍旧在他的著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认为在社会结构中,文化具有卓越的地位。文化不再是上层建筑,而是和其他像经济和政治这些决定性元素一样,是一个基本过程。而为了从文化决定论中逃脱出来,威廉姆斯将自己的著作,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学说,具体来说是其关于霸权概念的学说联系在了一起。霸权,在这层意义上来说,是指统治与屈从。这就是说,正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言,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要素尽管不是“统治”着其他要素,但是它使得对其他要素的需求成为必需的。因为它们可以从其他的元素的需求当中找到自身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于威廉姆斯而言,作为社会结构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元素协同工作,构建社会。

在威廉姆斯模式下,由于他自己对于“物质”被用作描述“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忽视,传播方式并不能被恰当地看作是一种生产方式。如果我们接受威廉姆斯的模式,那么对生产的定义将会变得宽泛,马克思主义这一对生产的笼统称呼,将会变成一种通俗的可以用来定义任何生产种类的词语。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社会基础,甚至连一个“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没有被说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分类,经常为人们所重新定义。在之后的章节,我将要对传播手段进行讨论。根据马克思结构主义者的论述,传播手

段完全可以定义为一种生产方式。

#### 四、阿尔都塞和作为生产方式的传播手段

和威廉姆斯不同,阿尔都塞强烈推荐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学〉序言》中提出的模式。然而,阿尔都塞将恩格斯对此的反应也考虑在内。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明确指出,经济是社会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研究克服了决定论和经济主义,而这些也是威廉姆斯尝试着克服的。但阿尔都塞的研究没有像威廉姆斯那样陷入依赖文化的决定论模式中。像威廉姆斯一样,阿尔都塞的逻辑起点也是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中所提及的“复杂性”的重要性。对于阿尔都塞而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式依然重要。但同恩格斯一样,阿尔都塞偏向于同意上层建筑元素的相对自治,经济只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现在看看这个最后一种可能的决定性因素,则像是对马克思决定论的一种推测。然而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决定论包括设定限制。这就是说,经济是最少决定支配社会构成的社会整体的元素。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正如威廉姆斯主张的那样,支配元素“根据多重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的矛盾和其未能被看到的发展而改变”(Althusser and Balibar 2009, 357)。我们对因此产生的两点很感兴趣。第一,“最终决定因素”(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和“具有支配作用的结构”(structures in dominance)之间的不同。第二,多重决定论所扮演的角色。威廉姆斯批评多种决定因素的概念,认为其是在重复“‘经济主义’中的一个基本错误,它依旧依赖着作为社会结构的首要决定因素的经济”(Williams 1977)。然而,在深入讨论多重决定论之前,我们必须对“最终决定因素”和支配者之间的不同进行讨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最少的决定者”的范畴第一次为人们所知道,是在恩格斯和布洛赫的通信中。恩格斯写道: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于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sup>①</sup> (Engels 1890)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37卷第460页。——译者注

这就是说,有因果联系存在的社会结构元素,即是经济基础。它主张自己具有决定性的力量。阿尔都塞采用了恩格斯的定义并对其进行扩展,是对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结构化的研究。阿尔都塞对此扩展的成果之一,便是认为这种“最终决定因素”从未能真正实现(Althusser 2005)。阿尔都塞试图用一种可适用的因果关系的模式替代曾经的那两种因果关系模式(即是机械的和有效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两种模式都有缺陷。阿尔都塞认为结构性的力量对社会构成起作用。而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结构元素包含社会构成,并对社会构成产生影响。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不是由社会结构之外的事物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结构自身的元素所决定(Althusser 2009)。威廉姆斯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即是他们认为基础结构(不管它可能包含了什么)具有同上层建筑分离的实体结构。阿尔都塞对此进行了补充: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元素,这些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了社会结构。

阿尔都塞的结构理论是如何在威廉姆斯的理论失败之处取得成功,从而确定传播手段是一种生产方式呢?正如上文所说,威廉姆斯的问题在于,他设想到了上层建筑包含非物质的内容,但却是为了论述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他试图去说明的,是上层建筑的元素作为物质生产的一部分和其作为经济生产的一部分没有区别。但是也没有人会否认,上层建筑元素是物质的,且自身可以生产东西,在阿尔都塞的著名文章《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他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进行了讨论。对于阿尔都塞,“一种意识形态经常以一种机器的形态而存在”(Althusser 1990, 112),并且他还声称,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存在。在阿尔都塞看来,物质的概念存在于不同的、以物质存在理论为基础的形态之中。所以尽管意识形态也许并不是“物质的”,就威廉姆斯的理论而言却仍是物质的,它们仍旧存在于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中。因此当我们主张意识形态对于现实而言是一种虚构的关系时,它们并不拥有物质的存在形式。阿尔都塞想说的是,这些信仰的实现在行动上和实践上巩固了他们的物质性。现实生活中的关系,要求我们参加某些在物质思想机构之中的实践。之后,这些实践就应验成为我们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在这一情况下,法律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将会被看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如果按威廉姆斯所言,他认为根据“物质”这个词的用法,传播手段可以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言,如果我们仅仅是运用一个结构主义者的观点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物

质”这个关键词。

## 五、E. P. 汤普森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对阿尔都塞的论点概述完毕,我现在来说说汤普森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批判。汤普森的批判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论战:“先是冷嘲,然后热讽,最后批得一文不值。”(Thompson 1978,130)他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归类于新斯大林主义,很有见解,并且颇具影响。虽然艾略特(Elliot 2009)认为汤普森的批判对阿尔都塞着墨很少,而是更多的涉及到了巴里·辛德斯以及保罗·赫斯特的观点。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对汤普森的批判做出概述。对汤普森而言,阿尔都塞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根本无法回答关于文化(传播)的问题,因为阿尔都塞赞同结构主义应脱离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论。他写道,“阿尔都塞发现自己的学说只能极为笼统抽象地回答有关价值、文化以及政治理论方面的问题,而无法具体解决问题。”这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单一的结构主义”,脱离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Thompson 1978,197)。他又进一步说阿尔都塞的概念体系没有为阐释变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工具。按汤姆森研究来看,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既不允许历史转型,也不允许社会转型。“结构,就像一头鲸鱼,它张开了利齿,吞下了过程。而这个过程在结构的胃里待得很不舒服。”(Thompson 1978,283)这就是说,虽然过程可能是在社会结构里发生,如同阿尔都塞所描述的那样,但是过程并没有改变结构,结构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然而他的结构主义并不像汤普森说的那样是一个静态的庞然大物。阿尔都塞阐释的结构主义并非处在静止的状态。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可还原性决定了二者关系不会出现汤普森所认为的静止状态。那些在阿尔都塞定义的结构中发生的过程,它们的作用被过分高估了。而通过引进‘最少决定论和主导结构’等概念,他免于让结构陷入相对主义。安德森(Anderson 1980)表明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解读没有涉及后者提出的对“历史客体”的定义,而这个定义会揭开动态结构的面纱:“阿尔都塞确有尝试更详细地定义历史客体:所谓史实,就是会引起现存结构关系变化的事物。”汤普森忽视了他批判的定义中的关键点,也就是“改变”一词。阿尔都塞的理论架构极为强调“改变”,远不是汤普森想象中的“静止”那么简单(Anderson 1980,14)。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建立在“多重决定论”、“最少决定论”以及“主导结构”这些概念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概念为阿尔都塞的体系增添了动态改变,而这恰与汤普森的观点相左。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对阿尔都塞而言,他提到决定即某一元素施加压力于特定元素之上,从而建立限制,进而使主导结构发生作用。汤普森误读了这一点,否则会同阿尔都塞产生极大的共鸣。比如他自己曾说“我和威廉已经在定义‘决定’一词就‘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这两个层面上各执己见数年”(Thompson 1978, 351)。主导结构不会永远不变,而是跟着不同的多重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的矛盾的改变而改变(Althusser 2009)。如果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确如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动态主义,不同于汤普森所言的静止,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阿尔都塞的概念体系确实为人类提供了评价和分析改变的理论工具,而且还进一步让我们得以回答跟文化相关的问题。

阿尔都塞和汤普森之间的争论属于有关结构和人类能动性的激烈争论的一部分。其争论点在于,在人类行为的发展过程中,是结构处于首要地位还是能动性处于首要地位。马克思告诉我们“不是人类的社会意识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Simon 1994, 211)。在马克思看来,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结构决定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意识。阿尔都塞将这种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即认为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质询中,个人才得以作为主体而呈现出来(Althusser 1990)。与之相反,汤普森认为,“社会结构或许会作用于人类行为,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微弱’的,在任何‘现在’不足以作用到‘任何活着的一代’,他们驾驭经验的方法跟预测完全不同,并且不同于任何对决定的狭隘定义”(Thompson 1978, 363)。

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争论很多,不足以在本篇论文中逐一概括。但是让我们试着想想我们针对主论点都说了些什么。不能否认网络已是西方社会的一个主要的文化改变。为了应对这种改变,人类的行为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发生自我变化。个人现在已经无法脱离于网络而存在了。每天查看邮箱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的结构确实决定着我们的行为,这和汤普森的观点是相左的。但是在结构并非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唯一因素这一点上,我是认同汤普森的。即便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论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我也并不认为这意味着结构就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从很多方面来说,争论结构和能动性哪个更重要好比是争论天赋和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

## 六、互联网——一种传播和生产工具

自雷蒙德·威廉姆斯的论文发表以来,媒介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令人震惊。在本文的最后一节中,我想提出的是,互联网提供给我们的传播手段,如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事实上是生产工具的一种。威廉姆斯不一定会认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是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物质资料的统一。生产工具,也许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劳动者加工生产资料用以满足某种特定需要的事物。在经济领域,这种特定的需求即为商品,它会在市场中因为其具有的价值而被出售。然而,我们所描述的上述类型的生产方式并非只发生在经济领域。就以您正在阅读的本文的生产为例:提供给作者的有以下两样东西:(1)生产工具,在我们这个例子中,比如诸如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马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之类的概念工具,和我们用来写论文的电脑,以及为了明确了解每个思想家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构成所需要阅读的相关书籍等等。(2)生产资料,或者说是雷蒙德·威廉姆斯的研究成果。作者使用这些物质的和概念的工具来将生产资料发展成一种产品,也就是摊在你面前的这篇论文。本质上,驱动作者进行此项生产活动的,并不是雷蒙德·威廉姆斯所定义的对社会起主导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作品的出版是为了巩固作者学术地位,但是这仅是对学术出版文化的一个分作用力。这种生产不仅仅限于在学术界的知识生产,以及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商品生产,还适用于互联网所提供的思想的通信工具和交流方式。例如这种类型的传播工具是如何被描述成上述所提及的生产工具的。用户可以使用电脑、手机等等可以访问互联网的各种电子设备来使用 Facebook 这个互联网论坛。因此,我们可以确认两种形式的生产工具:(1)与互联网相连的电子设备,以及(2)网络本身。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认资料被用于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上述两种形式的生产工具所提供的所需资料往往会主动传递某些信息,无论是关于你的个人信息如爱好、个人喜好,还是你的姓名和邮箱地址,而这些零碎的、不成形的材料将被用于制作一个成品,即属于你的网络剖面图。我必须承认“生产”这一术语是一个泛指,但我并不赞成将 Facebook 这样的网络论坛诋毁成为某种生产工具。

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手段、一种生产工具,如今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通过借鉴阿尔文·托夫勒(Toffler 1980)以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Fuchs 2012)的观点,我萌生了想用“产销者”(Producer)这样一个概念来进一步阐述并深化我的观点。产销者,是一个新词,顾名思义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和生产工具已经见证了产销合一者的成长过程。福克斯(Fuchs 2012, 43)认为,虽然互联网用户所看到的是基于用户活动的商品市场的增长,但同时必须承认他们也是内容的供应商,“这里由用户生成内容,并且也由用户频繁地参与这种创造性活动、沟通、社区建设以及内容生产。”作为生产工具,互联网或者是基于互联网的Google、Facebook以及Youtube,它们能通过原料来提取信息,将信息再次提供给用户,并且能利用该信息来创造新的产品,无论这种新的产品是一种为诱导用户投资时间和金钱的新在线游戏,还是简单的为帮助公司吸引更多用户而新增的积分制度。我们已经简单地讨论了互联网既是一种传播手段也是一种生产工具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的互联网真的能同时成为传播手段吗?

我们还应区分社会型生产工具和经济型生产工具。Jacob Torfing提到:

大众媒介日益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组织我们的业余时间,塑造我们的社会行为,提供我们的阶层、种族、国籍、性别等身份认同赖以构建和用来区分“自我”和“他者”的物质基础。(Torfing 1999, 210)

从社会型生产工具的角度来说,对Facebook这样的网站和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Eli Pariser制定出一种算法规则:“筛选-泡沫”规则。即你所查看某一特定页面会通过对你兴趣的了解,对外界直接获取的信息进行筛选,将与自身相左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过滤掉。我之所以会称其为社会型的生产工具,是因为这种对于你个人信息的计算衍生的产品会形成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同样,我们也可以将传播工具理解成为一种经济型的生产工具,即你的个人信息会被某些产品的广告商所利用,并反过来取悦于你。即便是简单地瞥一眼你Facebook中的头版头条,该网站所提供的“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广告也会对你进行狂轰滥炸。福克斯(Fuchs 2012)以网络跟踪器DoubleClick广告为例进行了有关的讨论。网络跟踪器DoubleClick是谷歌公司在2007年购买的,用于搜集人们上网时留下的各种数据痕迹,并将这类数据售卖(Fuchs 2012, 46)。购买的公司会根据这些数据针对个人兴趣、需求的



不同来投递广告邮件。

## 七、斯迈思：盲点、受众商品和生产工具

斯迈思(Dallas Smythe)关于广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作用有详尽的论述分析。斯迈思认为,在大众传播领域,对于表达“大众传播系统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无能为力暴露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欧洲和大西洋流域文化”传播的盲点。如我们上文所述,谷歌为了使广告投放能够与受众需求相一致,采用了数据挖掘的策略。在斯迈思看来,这种类型的广告是资本的经济功能的一个体现。为了回答什么形式的商品适合大规模生产的问题,广告赞助商试图直接与受众进行沟通。斯迈思认为,报纸、广播以及我们本例中提到的互联网中的广告实际上从传播产业链中买来以试图制造出生产贴合某种特定产品的受众群。传统观念认为,广告商通过从媒体购买版面空间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空间”即被理解成某种商品(Smythe 1977,1)。如果广告商的商品是通过媒体中的“空间”进行宣传,那么不管广告商在空间内放置什么商品,它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某些广告中特定空间的价值(如广告牌、电视广告、电台广告、互联网广告)比商品实际占用的空间价值更高。就拿互联网来说,高流量的网站能够比低流量的网站获取更多的广告费用。这就告诫我们,购买空间只是广告商宣传商品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斯迈思认为,广告商购买的其实是可预测的特定的受众服务,这些受众会在特定的时间给予特定数量的关注度(Smythe 1977,4)。这可以在电视及互联网广告中看到。例如,当我们正在观看某一档电视节目,与这档电视节目特色相吻合的产品会迫切地想要占据其特定的广告空间(如一档卡通节目中出现的大多是关于出现过的卡通人物的玩具广告)。在斯迈思看来,受众如今正成为大众传播产业链中的特定商品,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购买、生产、销售。

我们该如何进一步理解作为生产工具的传播手段?我已经在上一节中阐明,生产性消费在互联网中已经得到增长。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作为互联网用户使用其产品,但是我们也具有生产互联网产品的能力。简单举例,当我们参与、创建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时,这就显示了我们具有生产互联网产品的能力。那为什么是这种产品?在创建你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时,不管页面中有什么,你都会使用生产工具(即信息、计算机、互联网访问)生产出

其他人会使用的东西。正是这样的页面为 Facebook 创造出很多很多利益并帮助维系这个最大的社交网站的生存。在介绍达拉斯·斯迈思观点的同时,我们也同时引进了一个全新等级的传播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传播方式(电视、广播、互联网)是通过广告来生产受众的。之后我们也许会力图在结构层面理解作为生产工具的传播手段,而这一层面,正是斯迈思一直详细描述的有关于产销者的情境。

## 八、总 结

互联网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工业生产的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可以被用来更好地理解电视、电信和报纸的生产过程。而互联网不只是这三个过程的简单组合,还在认知、沟通、合作、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层面扩展延伸至新的方向。互联网作为一个“虚拟世界”,其参与唯物主义理论生产的能力仍需要讨论和理论化。在整个需要将马克思理论用于研究互联网的研究项目中,类似于产销者概念的引进可能只占很小的位置。与产销者这个概念类似,另一个概念“生产传播”(promunication)也值得关注。

要想发展出可以恰当解释由互联网引出的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我们需要遵循结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阐释。虽然经济问题是影响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元素,因为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其作用不仅仅是生产力,更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但我认为经济因素还不足以成为决定性因素。

我讨论了从未出现过的“最终决定因素”和支配因素之间的不同。这种关系在互联网上每天、每时、每分都在发生。而鉴于威廉姆斯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在互联网中占有主导性地位的力量是文化。绝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社会互动,无论人们是通过在线游戏、交友网站,或只是为了使用各种类型的免费软件与朋友的通信。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是影响互联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传统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互联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在互联网发生的每一个互动,都会被不同的因素主导,不管是政治和法律因素还是经济和文化因素。但这并不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结性论断,也不可能是。我只试图在本文中为以后的讨论——作为一种传播方式的互联网可以被视为生产工具——打下点基础。

## 参考文献:

- Althusser, Louis. 1990.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lthusser, Louis. 2005. *For Marx*. London: Verso.
-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2009. *Reading Capital*. London: Verso.
- Anderson, Perry. 1980. *Arguments with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 Aune, James A. 1994. *Rhetoric and Marxism*. San Francisco, CA: Westview Press.
- Cohen, Gerald A. 2000.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x, Hywel. 2008. *After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 Eagleton, Terry, ed. 1994.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olity Press.
- Eldridge, John and Lizzie Eldridge. 1994. *Raymond Williams: Making Conn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 Elliot, Gregory. 2009.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London: Haymarket Press.
- Engels, Friedrich. 1890. *Engels to J. Bloch in Königsberg*. Retrieved January 6, 2012, from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0/letters/90\\_09\\_21.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0/letters/90_09_21.htm)
- Fuchs, Christian. 2012. Google Capitalism.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1): 42—48.
- Higgins, John. 1999.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Johnson, Lesley. 1979. *The Cultural Critics: From Matthew Arnold to Raymond Williams*. London: Routledge.
- Marx, Karl. 1990.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992. *Capital: Vol 2*.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994.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 Meehan, Eileen. 1993. Commodity Audience, Actual Audience: The Blindspot Debate. In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dited by Janet Wasko, Vincent Mosco and Majunath Pendakur, 378—397.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O'Connor, Alan. 1989.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 London: Blackwell.
- Pariser, Eli.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London:

Penguin.

Prendergast, Christopher, ed. 1995. *Cultural Materialism: On Raymond William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imon, Lawrence S., ed. 1994.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1—27.

Smythe, Dallas W.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Snedeker, George. 2004. *The Politics of Critical Theory: Language, Discourse, Socie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Thompson, Edward 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Torring, Jacob. 1994. *New Theories of Discourse: Laclau, Mouffe and Žižek*. Oxford: Blackwell.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81.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93.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Hogwarth Press.

Williams, Raymond. 2005.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曼泽罗尔(Vincent R. Manzerolle)<sup>①</sup>

乔森(Atle Mikkola Kjosén)<sup>②</sup>

## 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sup>③</sup>

唐旻(译),高明(校)

[导读]技术革新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铁律”之一——革新交通和通信技术,缩短流通时间,降低流通成本,提升利润。这篇《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正是将传播技术的发展放置在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资本流通和循环的角度来考查。

文章分析了几个最新技术,如近场通信技术、泛大西洋光纤电缆、盗版现象的产生和数字编码等的发展与应用,从而提出研究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技术的发展以及这些新技术背后的寓意是什么?作者认为,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流通角度去理解,这些技术的产生是资本流通的要求,是由资本流通的过程和方式所决定的。从物质到资本的循环发生在特定空间和时间中。循环的速度越快,越多的剩余价值就会被创造和生效,资本一直试图消灭循环的时间和空间以期将资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耗费的时间缩减到最短,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就解释了上述新技术的发展,这些新技术都是通过把空间时间化,把空间的距离缩减成时间的距离,继而再尽可能地减少时间的距离。

---

① 曼泽罗尔(Vincent R. Manzerolle),西安大略大学,伦敦,加拿大,vmanzero@uwo.com

② 科森(Atle Mikkola Kjosén),西安大略大学,伦敦,加拿大,akjosén@uwo.ca

③ 特别感谢代尔-维德福特(Nick Dyer-Witheford)、科莫尔(Edward Comor)和弗罗曼(Bernd Frohmann)对这篇文章做出的诸多贡献。同时感谢曼泽罗尔(Vernica Manzerolle)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以及对本文编辑做出的贡献,以及麦圭根(McGuigan)对本文的初稿提出的各种宝贵意见。

这篇文章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出发,探寻传播技术革新的本源动力,对我们理解技术和资本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译者也需要指出本文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全文以资本(capiatl)作为主体,但是作者并没有进一步探究“资本是谁的资本?由谁掌控资本?”这些问题。如果仅仅关注技术发展中资本的逻辑,而忽略了推动这些技术研究和发展的作为人的主体,将会有陷入资本决定论或者技术决定论的危险。其次,基于第一个问题,本文同样忽略了推动技术的研究发展的主体。譬如,作者列举出了不少新的技术发展如近场通信、云计算、物联网等等,但作者并没有说明是谁在研发和推动这些技术,是作为公领域的研究机构或者政府、还是作为私领域的企业?政府和企业、公领域和私领域之间,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关联和博弈?更进一层,这篇文章着眼于北美西欧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忽略了技术发展在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能有的不同逻辑,以及技术从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过程中可能有的帝国主义话语和权力分配。

由此我认为,以这篇文章的理论框架为逻辑起点,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西方语境下,不同身份的个体、群体和机构(individuals, players, entities and institutions),比如企业、政府、IT研发者、消费者等,在传播技术发展中扮演怎样不同的角色?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怎样的?译者建议,未来研究可以着重考查一些全球企业技术研发的过程和实践,以及政府关于相关技术的政策导向。第二,在微观和中观层面,考察资本加速和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比如,如何理解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和新技术所展现出的个性化(personalization)所呈现出的矛盾?又如,如果我们将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理解为这种资本加速流通的结果,它对传播结构和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第三,考察技术发展和资本流通关系在欠发达、发展中国家的逻辑和实践。呼应上述第一点建议,在明晰相应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逻辑过程时,应该着重考察国家、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同时在此基础上,考量世界传播和信息体系下,新技术和资本的流向,以及技术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的资本间博弈、政府间制衡。

**[关键词]**《资本论(第二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数字媒体,移动支付系统,融合,加速,图表论,控制论和速度经济学

在讨论资本流通和其加速的逻辑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数字媒体中一个正在兴起的领域。这个领域将为我们的讨论奠定更加广阔的理论基础,那就是移动支付技术。近距离无线通信(NFC)规定了一系列近距离数据传输的技术要求,类似一些借记卡和信用卡所具有的点击支付特征。由于在其芯条和软件设置里面对读写能力进行了限制,近距离无线通信能够保证个人数据的安全传输。这种技术建立在遥控标准基础上,其目的是在全球系统和设备中建立协同工作的能力。它“让无线设备在不超过4厘米的距离内以最大424kbps的速度共享信息”。<sup>①</sup>根据近距离无线通信论坛([www.nfc-forum.org](http://www.nfc-forum.org))上的一个游说和标准化团体:

近距离无线通信是基于感应耦合,其中松式耦合感应电路可以共享几厘米以内的电源和数据。NFC设备与类(13.56 MHz)RFID标签和遥控智能卡共享基本的技术,但其具有一些重要的新功能。一个具有NFC功能的设备可以在读/写操作、点对点模式、以及卡仿真模式中运行。一个NFC标签通常是一个存储数据的无源(被动)器件(比如它可以被融合在智能海报中),同时它存储的数据可以被具有NFC功能的设备读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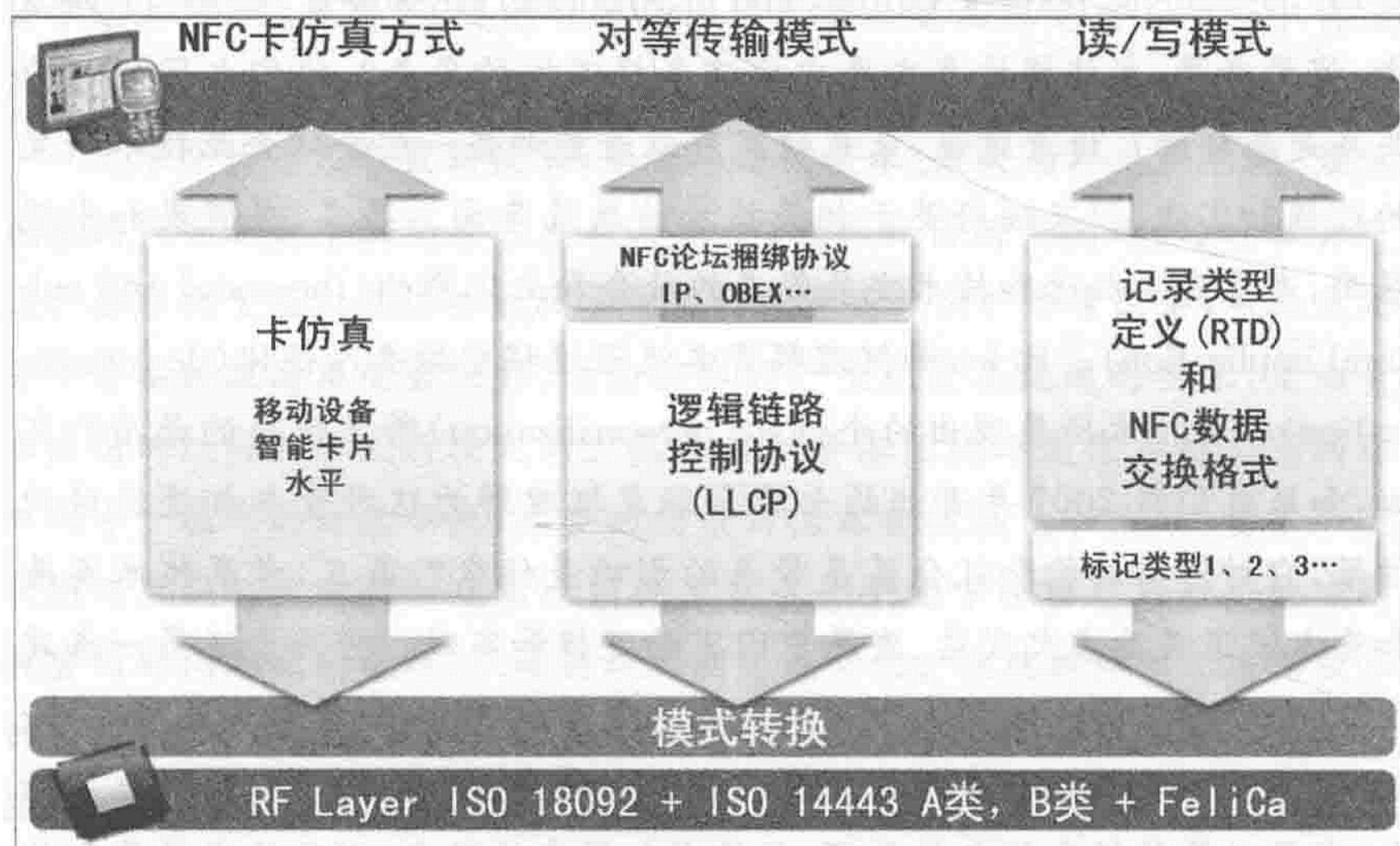


图1 NFC运行模式图([www.nfc-forum.org](http://www.nfc-forum.org), 2012)

<sup>①</sup> “用户可共享名片,进行交易,从智能海报获取信息,或者为进入控制系统提供凭证”(http://www.nfcforum.org/aboutnfc/nfc\_and\_contactless/)。“从结构上来说,近距离无线通信论坛的具体条例都是建立在已有的和被广为认可的标准系统上的,比如ISO/IEC 18092,ISO/IEC 14443—2,3,4,以及JIS X6319—4等”(http://www.nfc-forum.org/aboutnfc/interop/)。

虽然以 NFC 为基础的技术已经有一定的使用范围,比如医疗卫生、交通、一般信息的采集与交换等等,但是不少商家已经盯上了它所能带来的商业利益,如使用此技术制造移动支付系统,这样可以有效地消除对信用卡、借记卡及其他各种个人身份识别证件的需要。<sup>①</sup>

现在,移动产业里有很多商家都支持使用 NFC 标准,比如软件开发商(谷歌、微软),手机设计商(三星、黑莓<sup>②</sup>),半导体研发公司(高通、博通、恩智浦半导体),信用卡公司(Visa 和万事达卡)。例如 ISIS<sup>③</sup>,一个已经在美国全面推出的支付网,就是建立在 NFC 标准上,它现在已经汇集了全美最主要的电信公司(Verizon 公司、AT&T、T-Mobile)和信用卡公司(Visa 卡、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对于媒介研究者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电信业、金融业和基础设施<sup>④</sup>之间的广泛融合。加拿大的罗杰斯通信公司就证明了这种兼做银行和债权人的融合的可能性。<sup>⑤</sup>

---

① 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移动支付系统,这反映出市场上需求的多样性;比如,PayPal 公司的云基础移动支付就被看作是 NFC 的一个潜在竞争者(参见 Alistair Barr,《Paypal 用定价和数据追逐大型零售商》,路透社,2012 年 2 月 10 日,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2/10/paypal-kingsborough-idUSL2E8D8AE720120210>)。新兴公司 Square 也提出了同样的用插入移动设备的读卡转化器来提供移动支付服务(<https://squareup.com/>)。尽管没有做出明确承诺,但 Visa 公司已经在 Square 上投入了很多(参见 Chris Barth,《Visa 和 Square:为什么戈里亚斯要投资大卫?》,福布斯,2012 年 4 月 27 日, <http://www.forbes.com/sites/chrisbarth/2011/04/27/visa-and-square-why-goliath-is-investing-in-david/>)。苹果公司也加入到移动支付的竞赛中,他们开发了移动 iTunes 应用软件,苹果手机的用户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手机软件让实体店里的东西直接转移到他们的账户上(参见 Michael Boland,《苹果移动支付计划受到关注》,Huffington Post,2011 年 11 月 16 日,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ichael-boland/apples-mobile-payment-plans\\_b\\_1090003.htm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ichael-boland/apples-mobile-payment-plans_b_1090003.html))。与此同时,苹果公司还在积极开发移动支付专利的投资组合产品(参见 Chantal Tode,《苹果公司移动支付灵感受到专利奖的关注》,Mobile Commerce Daily,2012 年 3 月 8 日, <http://www.mobilecommercedaily.com/2012/03/08/apple%E2%80%99s-mobilepayments-aspirations-come-into-focus-with-patent-award>)。尽管如此,NFC 的优势在于来自于移动产业很多大公司的支持。

② 黑莓公司曾用名 Research in Motion。——译者注

③ <http://www.paywithisis.com/>

④ 最近,零售商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的压力,要求他们升级支付终端系统以接受智能卡的使用,这会使 NFC 的兼容性更强。“商家面临升级支付终端的巨大压力。过去几个月,维萨卡、发现卡和万事达卡公司警告不能接受智能卡的商家必须自己承担诈骗可能带来的风险……惠尔丰电子公司在为智能卡升级系统的同时,还计划为智能手机钱包升级系统,以便可以使用 NFC 技术,因为这项技术被最大的两家有智能手机钱包的公司——谷歌和 ISIS——所使用”。(参见 Joshua Brustein,《许多公司在竞争手机钱包业务》,纽约时报,2012 年 5 月 6 日, <http://www.nytimes.com/2012/05/07/technology/many-competing-paths-on-the-road-to-a-phone-wallet.html>)。

⑤ “罗杰斯银行想要主营信用和移动支付业务,以此走与传统银行储蓄和借贷业务不同的道路”。参见 Peter Evans,《罗杰斯想要开始新的银行业务》,CBC 新闻,2011 年 9 月 6 日, <http://www.cbc.ca/news/business/story/2011/09/06/rogers-bank.html>。



NFC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在媒体和金融领域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重组,同时在更微观的层面,NFC指引我们去关注两个当代数字媒体的最具决定性的特征:个人化和普遍连接性,无处不在的可接入性。这些特质不单纯是技术变革的自主性表达。我们认为,它们反映了一种数字媒介自身的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流通领域的一些既有障碍所塑造的。事实上,我们希望把这些新现象放在马克思关于资本流通的理论中去理解,并提出新的理论分析模型以期揭示出新的张力和潜在的矛盾。

我们认为,NFC只是资本的加速逻辑下数字媒介变化的一个小例子。而我们正是要在整体的资本循环中考察传播媒介,来理解这种资本加速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想从资本的角度提出媒介研究的新框架。也即,我们想将资本作为传播研究的主题与目的,这一研究主题的传播能力被其自身的流通过程所构建。媒介使资本得以反复移动,因此成为资本流通关键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资本正是通过媒介来实现资本与资本之间在社会中的交流的。

本文认为流通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当代和未来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更具体地说,就是对于资本主义媒介的批判性分析。本文还认为,这些问题也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再生产相对于价值实现和减少流通时间的分析里面的核心问题。同时,这些问题还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关注的问题有一致性。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资本流通的概念也暗含了一种传播理论的可能。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出构成马克思媒介传播理论的逻辑机制,这种机制突出了新媒体在减少流通时间上发挥的作用。

很少有学者从资本循环和流通的角度去研究媒体,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Garnham 1990; Martin 1991; Fuchs 2009)。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提出要避免用马克思理论里面纵向的基础-上层建筑的方法研究媒介,而是应该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横向的、连贯的、循环以及贯穿时间线的过程(Garnham 1990, 45)。根据加纳姆所说,作为马克思价值理论里面最核心的部分,资本的流通“是任何关于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出发点”,因为它重新关注传播里面资本的物理、空间和时间的自我实现(Garnham 1990, 45)。他提出从资本流通的角度对媒介现象进行全面的分析是很有好处的(Garnham 1990, 45—53)。虽然加纳姆约20年前就提出了这个想法,马克思主义媒介研究还是主要以生产为中心,或是采用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福克斯(Fuchs 2009)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他认为,

“要系统地把媒介置于资本主义框架中研究,我们可以以马克思理论关于商品循环变型和资本的积累为起点,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二里面所写的”(Fuchs 2009,377)。福克斯使用资本循环的好处是,这让他可以把资本看作是一个商品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体系。

我们认为从资本循环和流通的角度来理论化传播研究的必要性来自于一系列新出现的技术,这些新技术有时强化、有时又弱化了资本加速流通的逻辑。这里举两个较近的例子来帮助说明这种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移动支付系统和 NFC 技术所体现出来的电信和金融的融合影射了一个关于传播媒介的更广泛的概念化,那就是流通和交换的过程被重新商品化然后卖给消费者。移动支付系统使得营销信息的传播和商品价值的实现都变得更加有效率(通过个人化),因为这两者都被结合在一个无处不在的连接技术里。而另一方面,数字盗版的增加让我们看到了商品形式的瓦解,因为资本流通的速度已经几乎达到光速(或者一眨眼的功夫),随着更多的带宽发展和消费者对 3D 打印机的使用,这种速度还将继续增长达到新的水平(Kjosén 2010)。

我们如何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去理解这些往往是矛盾的或者与自身成反效果的技术系统?为了理解这些用于加速资本流通的技术,或者说用于减少流通速度的技术,我们需要关注《资本论》第二卷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中的关键部分(参见 Marx 1973,401—423,516—549,618—690,717—735)。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在资本循环中价值传播的加速逻辑和未来数字媒体的变化和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将不断发展演进的当代媒体置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大纲》中所指出的那种逻辑之中。在马克思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焦点放在数字媒介的形式和物质特质上。为此,我们应用了传统媒介理论中的一些理论家的观点(如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以及其他人的)。这样我们把资本加速循环的逻辑放在当代数字媒介的物质性中来考量,同时可以发掘出新的张力和矛盾<sup>①</sup>。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特点就是在于数字媒体的成熟的复杂

---

<sup>①</sup> 本文不考虑与流通相关的反抗和阶级斗争问题。但是,揭示资本如何缩短循环是我们研究流通重要性的最终目的。研究表明最近的物流革命削弱了劳工的力量(参见 Bonachich and Wilson 2008,239—243)。但是,供应链的精简化和理性化给在分配领域有优势地位的工人更多的阶级权力(Silver 2003,100—103; Bonachich and Wilson 2008:244—249)。类似地,电信业里面,无论是加入了工会还是没加入工会的工人都不断证明资本的流通设施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参见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性、繁复性和盈利能力,以及电信和媒介产业的发展融合。通过这种融合,数字形式的传播使得信息交换变得无处不在和非常及时。事实上,我们在开头介绍的 NFC 的例子正是这种现象最好的写照。

数字媒体不仅带来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流通加速,而且通过个人化服务,还提供了资本的新动量,在生产和交换、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寻找最短路径。因此,除了具有加速循环的特性,资本流通经过个人化之后变得图表化了。<sup>①</sup>然而,当这种加速达到极限之后将会面临资本循环的停滞,而它的再生产又是基于资本。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是,由于数字媒介带来的无处不在和即时性,资本加速的逻辑来到了一个逻辑终点。在我们对传播媒介的分析中,资本被假定为一个反人类的对象<sup>②</sup>,它处于一个不断被强化的重复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被表达为自我扩张、“运动中的价值”。

## 一、资本的循环

加纳姆(Garnham 1990)和福克斯(Fuchs 2009)认为,媒体和传播必须被系统地置于资本循环中。基于此我们更进一步认为资本传播的是价值,资

---

① D. N. Rodowick 将“图表化”描述为“权利策略的制图学”,所以图表可以帮助勾画“一幅权力策略如何通过监视、记录和表达来复制自己的历史图景,而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看到集体生活的空间组织”(引自 Elmer 2004, 41—42)。Elmer 写道:“当代信息学里面,图表让我们可以追踪日常经济数据,为了控制这些经济数据,它们的习性、惯例、节奏和流动都被数字化、编码、诊断。”(Elmer 2004, 47)

② 在这里,我们认为资本既是一个结构也是一个在自我传播(从而自我再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对象。这个修辞学策略经常被马克思使用,在他的《资本论》中资本是一个主体、能动,而资本家仅仅是资本自身的主体性的人格化。例如,马克思写道,“在 G-W-G 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妆的存在方式。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增殖中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价值作为这一过程的扩张着的主体,首先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形式,把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Marx 1976, 255, 中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 175—176)。在后面“工作日”这一章中,马克思又写道:“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有恒产者有恒心。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Marx 1976, 342, 中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 260)。

本的循环(货币-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价值传播的方程式,因此资本的流通也就是一种传播理论了<sup>①</sup>。

资本的流通采用了商品流通(商品-货币-商品)作为它自己进程中的一部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商品的流通比单个的资本循环要广;商品-货币-商品也可以指更广泛的一般性流通,在这个框架下各种不同的单个的资本循环进行互动。“资本流通与大的一般流通相关,前者形成自己的过程,而后者是被资本假想出来的”(Marx 1973, 619—620)。流通领域指的不仅仅是市场交换。尼古拉斯·加纳姆认为,在流通领域,“我们需要关注被马克思称为地点的和时间的时刻,这既是指实际市场空间的延伸(货物的实际位移和传输),也包括在商业交易中的时间扩展(这个时间不仅指商业交易中花费的劳动时间,还包括在商品和货币互相转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Garnham 1990, 46)。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说的,因为资本使得某一数量的价值在三种互相关联的蜕变过程中经过,所以资本是一种循环。在它经过这些阶段的过程中,价值不仅保持而且还增加了自身的大小。经过每一个阶段之后,资本就完成周转并可以在下一次重复这个过程。

图表 2 描述了这个循环过程中的三个阶段:生产领域(第 2 阶段),流通领域(第 1 和第 3 阶段);和资本的三种特别形态(货币[M],商品[C]和生产资本[P])。

当资本满足其某一形态中的特定功能之后,它便完成了一个阶段,并呈现为下一个形态。阶段 1 是通过资本家用货币作为支付或购买的方式以获取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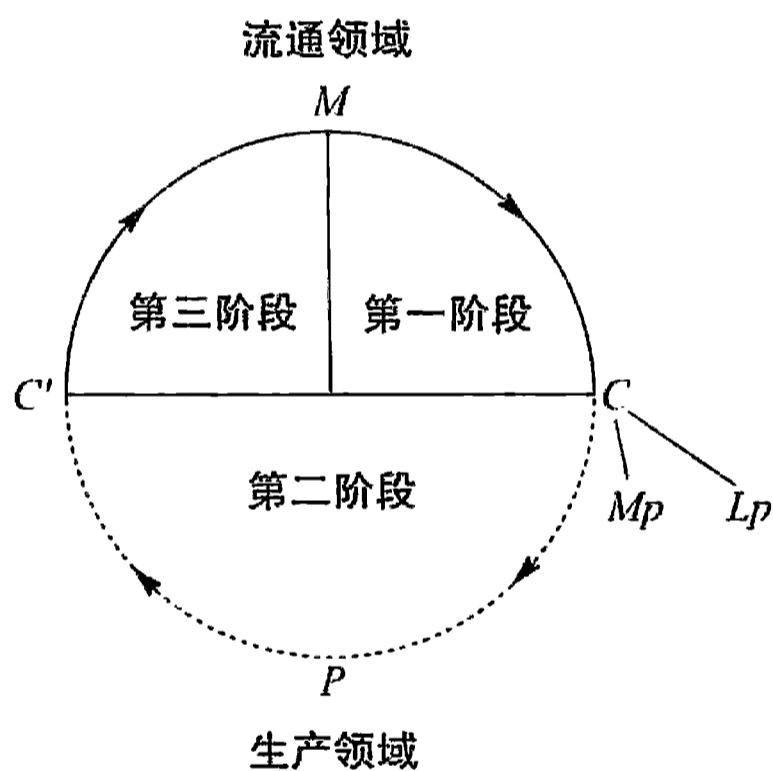


图 2 资本的循环(改编自 Lebowitz 2006: 61)

<sup>①</sup> 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资本是一个循环,或者说是一个闭合的环线,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资本既是主体对象又是价值传播的目的。在《大纲》中,马克思说当商品的流通并入进资本的循环过程中,它就给了这个过程价值的内容(Marx 1973, 626)。马克思写到,资本“以流通的主体而存在”并且它是价值形变的主导对象(Marx 1973, 620; 1976, 255)。我们认为,资本是一个反人类的主体对象,它试图在循环中传播价值内容,而这只能通过迫使内容获取然后舍弃三种形式的资本来完成。其他行为体比如工人和资本家就只是这整个传播过程中的一环(传播者和接受者),或者像活劳动,他们就是数据源。

动力和生产资料来完成的。当这些商品成为生产资本,并被有效地使用,第二个阶段就完成了。生产阶段的结果是比其初始阶段具备更多价值量的大众化商品(C')。商品被出售和购买之后,第三阶段就完成了,实现了生产过程中制造出的剩余价值,使得第一轮的资金积累成为可能(Marx 1978, 132—133)。

这种循环就是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各种特定形态的资本在这一通用的形式下都相互关联。因此资本的身份既存在于它的统一体中,又存在于它自身和这种统一体的不同之中。这种负面的一体性在资本的任何一个阶段或任何一种形态中都存在(Arthur 1998, 102—116)。资本存在于以下两者中:“一是在过程的一体性里面,二是在不同阶段的独特形式中。因此它既是自己,又与那个统一的自己所区分”(Marx 1973, 622)。资本在它的普遍形式到特殊形式的运动过程中统一。虽然不同的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都是资本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同的形态下它们并不一定是为了资本或作为资本存在。在资本的循环外,他们的作用只是货币、商品和劳动过程。只有在循环当中,它们才具有社会功能和资本形式(Arthur 1998, 107)。这三种形式只有当它们内在相关、共同构成循环的整体性时才是资本,并具有资本流通的功能(Arthur 1998, 102; Marx 1978, 133)。换句话说,它们是资本的形态是因为他们都有进入、完成并通过到下一阶段的可能,也因为他们在整个循环中有自己特定的功能(Marx 1978, 112)。所以当资本处在负面的一体性的时候,当且仅当它们可以舍弃目前的形态并变化成下一个形态的时候,且完成相应的功能之后,才有可能成为资本。货币资本是潜在的生产性资本,而生产性资本又使商品资本有可能变成货币资本。

马克思将资本概念化为一个循环,这和黑格尔的概念<sup>①</sup>几乎一致。因为形式上,资本就是一个从普遍变成特殊形式的过程,资本要想成为资本必须经历每一种形式并完成每一个相关的阶段(Arthur 1998)。然而,马克思不认为资本可以自动完成循环,他也不认为这个概念具有流动性和思考的速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个体的资本家都能够完成一次循环积累。

---

<sup>①</sup> 原文是大写(Concept),特指概念与时间的关系。——译者注

这三个让资本成为一体的过程都互相独立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因此,他们从一个到另一个转变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他们让资本从个体变成统一体的过程是偶然的。尽管他们内部具有共同性,他们是彼此并排存在于对方外部的,每一个预设对方的存在。而当被看作一个广泛的整体时,它们又必须维持这种内部的整体性,因为整个生产依赖于资本,因此它必须经历和实现自我行程的每一个必要时刻,并且包含每一个决定要素,这样才能使那些时刻成为真实。(Marx 1973,403)

换句话说,资本在形式上的流通(内部整体性)和其实际上的流通过程(外部一体)是矛盾的,在下一过程中资本承担某种物质形式及其特定的经济形式。资本流通的第一个障碍是资金必须把自己投资在物质的东西上,而这些东西有可能是抵触资本的(Arthur 1998,117)。这就是为什么资本有被束缚于某些间隔时间的风险,因为它从来不能保证资本会蜕变到另一种形式(Arthur 1998,133)。因此,流通必须从其形式和实质两方面来考量。

实际的流通是指物质的实际循环,即在一个给定的速度下商品和金钱在空间和时间里进行的运动。因此实际的流通包括了运输、基础设施、交通工具、包装、仓库、银行等等。因此实际的流通本质上是一个需要特定组织或空间和时间结合的物流工作。<sup>①</sup>此外,这个工作一直在加速资本的运动速度。这种加速通过积极地重组时间和空间,采用更新更快的媒介,如喷气运输、集装箱运输和数字化、电信等来实现。

资本加速其形变的过程有很多好处。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和与规模与资本的速度成负增长。<sup>②</sup>资本的速度越快,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效也就越多。当速度使流通成本降低时,剩余价值的比率和利润就会增加(Marx 1973,518; 1978,124,389)。在给定的时间内,周转速度代替了资本量(Marx 1973,518—519,630)。相较于社会平均水平来说,这有利于个体的资本家减少他们的周转时间(Harvey 1989,229)。

为了实现积累,资本必须不断地在生产和流通这两个领域中移动,尽管

---

① 物品流通直到当今才成为资本管理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参见 Bonachich and Wilson 2008,3—4)。

② 原文中的 negatively 似乎意思反了,应该是正相关才对。——译者注

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里被生产出来的,它必须在流通领域里进行实现和积累。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里的实现是整个资本移动中的必要条件:资本是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统一(Marx 1973,405—406,535,620; 1978,205)。实际上,资本要想保有资本的特性,必须始终处在运动中。当资本不再运动,而是停留在一个特定的形式和阶段上的话,它必将被否定和贬值(Marx 1973,621)。因为这种否定和贬值的存在,资本必须增加它的速度,同时减少花费在流通上的时间。然而,为了加速,资本必须开发或采用媒体,因为这样它们可以把时间和空间捆绑在一起,从而积极有效地克服资本给其本身的运作设置的障碍。

## 二、关于阻碍:空间和时间

在《大纲》中,马克思认为资本设置的障碍与其本身想要自由运作和无限扩张的倾向是相矛盾的。因为这种障碍延迟了资本从一种形式和阶段到另一种形式和阶段的变化,并限制了在特定时间内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数量(Marx 1973,421,538)。马克思指出生产领域的障碍是必要的劳动力,而在流通领域的障碍是需要/使用价值、等同物(货币)的可获得性、空间和流通时间(Marx 1973,404—405,542—543)。

为了“释放自己的效能”,资本不断地试图克服其障碍(Negri 1984, 115)。我们假定,资本依赖于各种媒介技术来克服这些障碍。在生产领域的机械操作是为了掌控时间,即减少工人的必要劳动。媒介也有类似的操作时间的功能,但媒介操控的是流通时间,而不是劳动时间。人们在流通领域运用媒介手段以减少流通时间,这样可以增加在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或者减少与流通相关的时间成本(如存储)。更重要的是,媒体可以通过使资本克服在需要、资金、空间和时间等方面的障碍来减少循环时间,比如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更大、更快的交通工具可以扩展市场空间,消除空间隔阂,或者减少资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信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使资本克服货币的障碍。但是我们下面将要解释,信用其实也增加了资本流通的速度和动量方向。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是移动设备,它们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让我们可以同时应对诸多障碍。

资本的循环在空间和时间中完成。随着资本不断扩张其空间以期将整

个世界都变成资本市场,资本试图与时间一起“将这个空间消灭,也就是说将资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耗费的时间缩减到最短”(Marx 1973,539)。空间被时间消灭的意思是说空间的距离被缩减成时间的距离;空间扩张折换成流通时间。因此空间被时间消灭和缩短资本流通时间变成了一回事。而流通时间也是资本的障碍之一,因为耗费在流通上的时间可以被用来稳定价值。使用价值和等价交换中的障碍也是很显著的,但是这点我们将在本文后半部分讨论。

换句话说,流通时间是从生产时间中扣除的,更具体一点说是从剩余劳动时间中扣除(Marx 1973,538—539)。当流通时间达到其绝对值也就是为零的时候,可重复数量达到了最大。在这种情况下,流通过程将不再对生产产生影响,而总体的周转周期将和生产周期一致(Marx 1973,544—45,627)。“因为是资本本身规定了流通时间是生产时间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尽可能地使流通时间为零——暂停流通——则成为了资本的必然趋势”(Marx 1973,629)。流通时间越接近于零,“资本运作能力越强,生产力和自身的稳定性也越强”(Marx 1978,203)。正是在这种趋势下,资本主义要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寻求新的传播方法。正如我们在快速发展的电信行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所看到的,资本对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重视正是源自这种加速的逻辑,这种逻辑和减少流通时间是一致的。

我们来看一个这种力量驱使的典型例子——近来在泛大西洋光纤电缆的投资,这项工程声称可以简省6毫秒的传输时间。海伯尼亚大西洋电缆公司目前正在建设10年以来第一个新的跨大西洋电缆。通过缩短电缆长度约310英里,4对光纤光缆系统可以将伦敦和纽约之间的传输时间从现在的65毫秒里减少6毫秒。在一个高频率运转的世界里,交易时间不再是以人的体感来测量,而是以非人类的软件算法如毫秒级的单位来测量。对于人类的行动和感知来说,节省多少毫秒的时间毫无意义,但是对于依赖算法进行买卖交易的高频金融交易所来说,节省哪怕1毫秒就意味着年终红利里面多了1亿美元(Hecht 2011; Williams 2011)。然而,伦敦和纽约之间59毫秒的距离对于全世界的金融资本来说还是不够快。

当电磁介质以60%至90%的光速运行时,对于所谓的人类来说,我们的世界已经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了。但是对于那些以微秒计算时间的非人类物体比如媒介来说,这个地球依旧是巨大的。从新泽西到芝加哥的最快光缆大概是16毫秒。而正如唐纳德·麦肯齐(MacKenzie 2011)所说,在这个



算法交易主宰的世界,这 16 毫秒是“很严重的延迟,这 16 毫秒的时间你有可能就能到达月球”。的确是这样的,纽约泛欧交易所的网络服务主管安德鲁·巴赫说“光速的限制变得越来越烦人”(引自 Hecht 2011)。最近,有些研究人员在探索通过将中微子穿射地球的方式缩短金融中心之间的时间距离。在金融交易中使用中微子的意义重大,因为“中微子以光速运行”,所以“使用这种技术的交易员在伦敦和悉尼之间进行代理业务交易只需要 44 毫秒,这比其他人平均节省了 30 毫秒”(Dorminey,2012)。

随着资本主义媒介不断延伸它的终极目标,流通时间几乎被减少到不存在,或者至少是一个极小的对人类基本没有任何意义的数量。然而,资本的加速也是受到限制的。马克思在《大纲》里面说:

循环时间必须是从生产时间中扣除的。资本的本质前提是它在流通的不同阶段里面移动,而不是只作为一个意念在人脑里移动。它的流通是必须在时间上分离的情景中发生的,而不是像在人的思维里不需要时间而发生。它必须经历在蚕茧中的过程才能羽化成蝶。(Marx 1973,548—549)

尽管资本正在努力消除流通时间,倾向于使之归零(Marx 1973,629; 1978,203),但如果真的达到了这种状态,资本会自我否定。流通时间为零的绝对速度意味着流通领域的中止。没有交换的时刻,剩余价值将无法实现,因而资本被自我否定。所以,如果流通时间被中止,那么伴随而来的是“交换、货币和劳动分工的必要性都将悬置了,而最终依赖于以上这些的资本也就不存在了”(Marx 1973,629)。

数字盗版的现象可以理解为资本达到绝对速度(Kjosén 2010)。数字化使商品摆脱它的形式而起飞,创造出被尼克·代尔-维德福特诗意戏称的“即时蝴蝶”(Dyer-Witheford 1999,202)。鉴于互联网和电脑是在电磁场基本法则下,以电子脉冲的速度进行运转,资本循环中的三个阶段在同时发生。资本要达到不同阶段和形式的变化必须有潜伏时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没有时间经历所有的变形过程。因此数字盗版应该被理解为资本打破了其自身的速度限制,从而无法正确地实现形变,导致其很重要的部分不能承担商品形式。换句话说,商品形式被电磁波的速度瓦解了,因而资本循环过程中有价值漏了出来(Kjosén 2010:87—102)。

### 三、关于通用等价品的融合:货币和数字代码

“这样的钱已经成为了一个伪事件——只有信息。”(McLuhan and Nevitt 1972,78)

资本必须“将其自己投资于实际的东西上,一些可能会抗拒资本的东西”(Arthur 1998,117)。资本是否有能力被运输或传输取决于它自身的经济和物质形式,其中物质形式也包括数码数据和电磁波的编码。比如,商品资本的流动性取决于传播方式和商品的自然属性,如重量、大小、易碎性和易逝性。这种媒介化的资本需要特定的组织和空间时间的生产(Harvey 1989)。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依赖于媒介去绑定空间和时间,以和其加速的逻辑相匹配。而数字形式则自然地承接了这种逻辑。

在此我们将数字编码看作是资本选择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在现代社会里非常独特的形式。数字编码的形式品质和让其能够存储传输的物质基础既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前兆又是其表现(Fuchs 2010)。为了将具体的资本主义媒介发展置于更广的媒介变化历史中来研究(这样子我们可以突出不同媒介的形式、物质和技术区别),我们转向去看传统的媒介技术理论(伊尼斯、麦克卢汉、基特勒),以观察这种逻辑如何体现于媒介的物质和技术组成之中。具体来说,我们找到了一种可以连接现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看媒体如何对空间和时间的结构组织产生重要作用。哈罗德·伊尼斯(Innis 1964; 1995)认为,媒体将空间和时间组织起来,从而再生产(或者解构)社会/权力结构。但是这种学术传统对媒体的理解很广泛,包括了机构、组织和技术(Comor 2001,276)。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媒介强调不同的空间/时间比率,这也反映出任何一种媒体都存在偏向。与强调其在时间里的恒久性的媒介(建筑、石刻、宗教仪式和机构)相比,强调对空间掌控的媒介被认为有对空间的偏向。对于伊尼斯,空间偏向是指如价格体系和市场体系,它们使时间变成“不连续的、统一的、可衡量的版块,可用货币进行计算”(Babe 2000,73; Innis 1995,66—87)。例如,伊尼斯指出在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价格体系的空间偏向促成了信用的使用、交换的兴起和为预知未来降低风险的保险业的发展(Babe 2000,72; 参见 Innis 1964,33—34)。进一步说,偏向这个概念也

反映出媒体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框架下结合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偏向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来自于伊尼斯对“能力”这个概念的应用。对于伊尼斯来说,“能力是一个潜能的指数”(Comor 1994,122—123)。因此,“能力这个概念让伊尼斯分析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的限制和机遇,以及可能会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影响他们的因素……因此,历史涉及并包含了传播媒介。从较广的角度定义,传播媒介既是方法也是工具,通过这种方式生产过程可以实现,运用这种工具人们可以以能力运用信息(Comor 1994,123)。

在和资本有关的讨论中,能力和潜能应该被理解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和潜能。在生产领域,总是有未使用的能力,这也是马克思所指的相对剩余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减少流通时间或者克服其他方面障碍的媒介有效地释放了资本的生产潜能。在流通领域被解放的时间可以被转换成剩余劳动时间。

为了努力克服在流通中出现的物理的、空间的和时间上的障碍,数字编码成为现在资本着重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因为数字化就是一个加速的过程。通过数字的形式,资本的实际循环正在越来越接近资本的形式和理想化循环。事实上,数字数据是稳定价值的理想载体。一旦东西被数字化,他们就只在概念和符号意义上存在,这使得图像和符号的意义超过了实际的物体。任何被数字化的物体都是一个数字的再现(Manovich 2001,52)。

数字编码将所有质上的差别都抽象为纯粹量上的差别。在电脑里面“一切都成为一个数字:没有图像、声音,只有数字”(Kittler 1999,1)。这非常有效地将所有使用价值转换成非人类的二进制代码价值。任何数字物品间的差别都只是定量而非定性的(Manovich 2001,27—30,174; Kittler 1999,1—2)。人类可以感受到的他们在质上的差别变得只是表面的效果或是表面上不同的形式(Kittler 1999,1; Betancourt 2006)。就像金钱一样,数字代码成为普遍的等价交换物,它将质上的差别变成量上的差别。

类似于货币,二进制码或数字数据就是能够以数量上的不同代表物品间质的不同的一般等价物。《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是让所有商品都和其他商品相关联,并让它们以交换价值呈现,即以数量呈现,而不涉及它们的质。货币代表商品世界,也可以被转化为任何商品。在数字形式下,价值和钱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等价于它的质量的纯数量。

数字数据的传输是多余的:其直接结果是增加信息,而不是形式上的变化。这种物质上的多余对于资本有巨大的潜在效益:数字商品只需要很小

的存储空间,几乎不用保养,因为没有任何副本的存在,除非数字商品存到用户的数字设备上的时候。于是数字数据的生产就好像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几乎不需要支付任何活着或死去的劳动力。

然而,最重要的是,相比以原子方式存在的资本,以比特<sup>①</sup>形式存在的资本对流通不那么抵触。在数字形式下,资本可以以电磁波的速度循环。也就不再需要不同物质形式间的变化了,在资本循环中商品的流通仅仅是不同的电压和一个数字的增值上。地球的广袤被电磁波的速度减少到不存在了。不必遍历真正的空间,资本花费在商品运输上的时间被消灭了。与大量的物质化的商品相比,数字形式的资本几乎不耗费时间,这样商品的形式既不会被否定也不会贬值。

在马歇尔·麦克卢汉诸多的预言中,他敏锐地观察到“我们正稳步地向信息交换代替商业交换的方向发展”(McLuhan 1964, 149)。我们应该不抱任何幻想,因为这是金融交换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货币-货币'(M-M')是典型的作为信息移动的商业交换。随着诸如 NFC 这样的技术的发展,这个过程也伴随传统的商品形变发生。

#### 四、消费能力和资本的传播

马克思在专门讨论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著作中蕴含了资本主义的目的论,其中,资本是传播的主体。在《资本论》里面,马克思经常把资本(或其在资产阶级中的人格化)描写成能动者、主角。我们从这种逻辑出发来理解传播和资本加速循环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资本来说,传播的范围涉及物流和文化生产(包括意识形态)。正是在传播的这种范围内,我们可以从当代数字媒体的演变中揭示资本加速的逻辑。但是正如我们早就指出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量的增加,个人化和可连接性提升了资本流通的动量。资本的流通覆盖到无处不在的个人化数据传播中,加速因此变得图表化。

我们认为,个人化和连接性的无处不在让我们看到它正在试图克服的两个至关重要同时互相关联的障碍——因流通需要,将空间和时间绑定时——外在于资本内部一体性的障碍。在《大纲》中,马克思清晰地阐释了资本传播图谱中的两种障碍,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的碎片化”(Marx 1973,

---

<sup>①</sup> 即 bits,是计算机的最小信息量单位。——译者注

398—423)。第一个障碍是由需求、使用价值和欲望的扩张带来的文化障碍；第二个则涉及支付手段。马克思说，“第一个障碍是消费本身，也即对消费的需求；那么第二个障碍必须是和其对等的”（Marx 1973, 404—405）。这两者一起折射出特定的消费能力或者说消费幅度。第一个障碍追踪整个广告和市场营销的机制（以及它们向数字化平台的演进），而后一个障碍因为信用和信用体系的创建而被消灭（信用和信用体系的扩张直接与数字和基础设施相关，见 Manzerolle 2010）。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在数字媒体和新媒体中，消费能力的表述融合了资本传播图谱。文化和物流的障碍在不断兴起的个人化和网络化设备中找到表达和可解药。同时，我们还可以对消费能力如何联结起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的组织（和生产）进行评估。

有关社会中自由时间的创造的那段话先于那段有关传播的话，这一点，意义是重大的：

创造剩余劳动力和可支配时间是资本的法则……就像它也有将必要劳动减到最小的趋势一样……以及和它要让人力劳动成为（相对）多余的从而使它趋于无穷大一样。（Marx 1973, 399）

随着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社会个体的生产能力也越来越高。很重要的一点是，空闲时间让社会个体和社会的文化都得到更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其实是一种文化适应的过程，由此带来更加多元的社会需求。文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人也是一样。

社会人的各种品质的养成，越丰富越好的物质需求的生产，这种越完整越普遍的社会产物，为了能够从很多方面获得满足，他必须能够享受快乐，从而在文化上上升到更上一层，就像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条件。（Marx 1973, 409）

由于剩余价值依赖空闲时间的生产，以此来加大必要和剩余劳动力之间的比例，资本也会尽量创造自由时间以使得文化活动可以扩张。这样做的结果是，资本可以更自由地流通，因为剩余价值在文化产业生产的各种需求扩张中实现了。

因此，与这种需求扩张相关联的消费再生产了“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存在

的消费者自己,这不仅是对他活着的直接证明,更重要的是他活在一些特定的社会关系中”(Marx 1973,717)。社会化的个人和资本的流通被不断变化的消费关系所绑定。正是因为如此,空闲时间可以通过信息传播技术(ICTs)被用于资本的流通需求(Webster and Robins 1999; Manzerolle 2011)。消费(使用价值)的文化领域和 ICTs 的政治经济发展对社会人进行了再生产,这种社会人的能力与资本流通的需求相吻合。

发展空闲时间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它创造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新的时刻,这些时刻既归入到流通中,又是流通的一种扩展。关于这一点,斯迈思发现了生产力值得注意的形式,使受众关注一系列新的使用价值(Smythe 1981,40; McGuigan 2012)。日常生活日趋被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设备所占领,这挖掘出了日常生活中更多可能被用于资本加速的传播工具。如莱奥波尔迪娜·伏特娜蒂所说的,无处不在的移动媒体帮助填补了每天工作的空余时间,同时将这些时间用于新的“传播用途”(Fortunati 2002, 517)。数字媒体日趋强化人类生活的技术媒介化,为剥削(非常热情的)使用者的免费劳动力提供了途径(Zwick et al. 2009)。

网络 2.0 时代(和它的各种衍生品)的兴起证明了资本流通中不断增长的必要的免费劳动力的投入。无薪酬的劳动力和免费时间付出正是资本的加速逻辑在不断寻求的。资本主义要求将文化的外在性看作未来商品化的来源。马克思很含蓄地指出,资本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以便将这些时间用来流通(Marx 1973,401)。借用马克思描述工作流通的必要性的比喻,这种创造性和沟通性的工作就像是“点燃用来发热的材料的导体”(Marx 1978,208)。ICTs 带来的空闲时间使人力资源能力(创意、认知能力、注意力和情感)就像燃料一样不断加速资本的流通(见 Stiegler 2010)。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重要的是大规模个人数据的制造,无论这种创造是可见的还是隐形的(Manzerolle and Smeltzer 2011)。

所以,为了克服流通中的各种障碍,资本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对空间和时间管理至关重要,但指的是这种管理与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相关的物品购买力一致的时候。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和 ICTs(包括一系列无处不在的个人化的可移动媒体)的普及如此重要的地方。它们不仅是对整体的资本流通很重要,这些技术对将商品资本转化成货币也很重要。同样,个人化的数字媒体的普及性和即时性为准确协调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可能性,这种精准的协调取代了以往偶然的和匿名的信息流通,通常这种流通下过于强调对

空间和时间中消费者的识别和辨认。正是这个过程使资本可以提高流通的矢量、使循环图表化。

现在人们常用一眨眼的功夫来比喻全方位环绕着文化和经济信息的电子脉冲。我们认为现在正在上演的移动支付系统变革,和更广泛意义上来说的传播媒介和信用体系的融合,是这个过程的标志。消费能力不断在数字媒体中表达出来。我们可以从提高消费能力的角度来理解像 NFC 这样的移动支付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商家通过在数字领域的电信和金融的结合,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数码设备让我们能够作为交流和表达的主体,但同时也在将我们的行为吸收并转化为可用的数据流。最近有很多评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这种环境下数据生产不再是资本的阻碍(Hardy 2012; Lohr 2012);现在是一个存储、处理和挖掘巨大的个人化的和可扩展的数据的时代。因此,就像在生产领域工业机械吸收了工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能力;在流通领域,我们所处的网络环境吸收了个人化和流通性所带来的信息流。正因为如此,这个过程被融入到智能手机的设计、技术构成和功能中。看看智能手机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中的迅速崛起便知道了(ITU 2011)。事实上,这种监控在至少三个层面展开:操作系统、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应用程序。这种监控就像建了一个种子一样,密切关注个人信息在这些无处不在的相互关联的移动设备中流入和流出。当数字网络技术不断地媒介化我们的生活时,这种数字监控已经嵌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关系中。像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网络利用使用者的社会协作来把他们纳入到网络中,使他们成为了把社会关系变成资本循环的一种工具(和无偿的文化劳动力)。

人们关注到这样一些现象:个人信息的经济效应不断提升,移动数字媒体带来了各种形式的有偿和无偿数字劳动力。在 36 氪<sup>①</sup>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蒂姆·奥莱利(Web 2.0 的大师)和 LinkedIn 创始人雷德·霍夫曼就被问到,如何把这些现象理论化,如何从理论的角度去想象网络 3.0 时代。尽管他们都承认网络 3.0 背后可能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数字和网络媒介所生产出的爆炸式的个人化信息将使万维网具有从未有过的能量。霍夫曼解释到网络 3.0 构成了一个“由所有这些个人数据释放出的洪流”(TechCrunch

---

<sup>①</sup> TechCrunch 中文网站名称。——译者注

2011)。此外,他们都注意到 Web 3.0 如何从根本上摒弃了网络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匿名性,因为从此以后,线上和线下的身份融合在一起了。这可能是这个现代数字媒介时代最重要但我们理解最少的一个变革。不像以前,个人数据被各个机构放在不同的数据库里。现在这个个人化和普遍连接的时代不仅带来了个人数据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成指数倍数的增长,还让这些数据可以被用户和位置(主要是通过流动服务)自动索引。

这将带我们走向何方? 数字媒体帮助我们社会人转变成在循环的过程中和矢量化中的无数节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存在的整体效果就是把个人转换成独立的交换中心,而这个过程让人们越来越受制于不断强化的加速循环过程的节奏。

消费在交换的每一个环节都被操纵……对每一个资本家来说,除去他自己的工人,所有其他工人的总量并不是工人而是消费者,是交换价值(工资)和货币的持有者,因为他们用钱来换取商品。他们就像是很多个流通中心,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交换行为得以发生,同时资本的交换价值得以保持。(Marx 1978,419)

事实上,随着无孔不入的媒介的兴起,媒介介质本身和稳定的数据信息流变得不可分割。数据的个人化和无处不在共同促使日益扩大的信息循环成为资本矢量扩张和强化的来源。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描述的,数字媒体的前提是将所有信息都以电子脉冲的形式被同质化为数字编码。这对所有信息都是一样的,不管内容如何,在形式上它们都一样。随着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说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尤其是 ICTs 网络的全球化应用,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是用传播手段来缩短金融流通中商品-商品'的转变。当资本不需要经过物质形式的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转换时,周转周期就变短了。但是正如我们在新的跨大西洋电缆系统中看到的,缩短循环时间的压力一直都存在。

然而,即使在数字化和极端的金融化时代之前,马克思就已经暗示了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在越来越复杂的抽象化中表现自己。“通过簿记以及确定和推算商品价格(价格计算),资本的流动被注册和控制。生产和稳定物价表明了商品仅是一个价值的载体,因为物品的理想价值是以货币的形式确定的,所以它们的名称其实是在人们想象世界中的象征性体现”(Ma-



rx 1978,211)。<sup>①</sup>事实上,这种流通的扩张和加速要求资本创造不同形式的抽象化概念以帮助绑定空间和时间,通常以此来代替资本为了加速的需要,在流通时必经的形变。价格体系,各种形式的商业信息,股票市场,和日趋变异的金融工具、衍生产品和债权品都是循环抽象物,它们被斯迈思称作“受众商品”。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不仅是货币体系作为交换媒介和存储价值,而且还是一个抽象品变成真实存在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流通速度不断加快是因为资本必须将抽象品兑换成真实存在来完成产品变革。循环为了反映出信息流而不断加速,这些抽象概念越来越被认为是凭他们本身的实力存在(而不是物流效果)的真实的商品(并且看上去似乎保有真实的剩余价值)。在这些抽象概念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信用,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创造新的流通产品,还努力减少流通时间,努力“赋予流通以时间价值,这是一种生产时间价值,它存在于在各个生产过程中协调的环节;同时不断把这些时间定义为钱,或者更广泛地说是资本”(Marx 1973,659—660)。

马克思经常提出信用的问题,但常常因这个问题推迟他的分析(Marx 1973,519,535,542,549; 1978,192,330,420—421,433)。这个问题反映了数字数据遇到的类似问题——它名义上的存在可以与其他所有类型的信息互换。通过抽象的过程,数字代码创造出丰富的信息。信贷和信用机制增值以确保资本流通的加速。

信贷克服了在资本扩张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用来购买等价物的经常性匮乏,所以它使得抽象概念在流通中的运用成倍增加。“用来实现额外的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的额外的钱从哪里来呢?”(Marx 1978,419)“存储钱是一方面,但是有时根本不需要存储钱,因为直接通过堆积信贷票据就可以了”(Marx 1978,422)。纵观马克思关于流通流域的论述,尤其是在《大纲》中的论述,马克思不断地指向整个系统,即信贷。在不同的地方,他提出了信贷的凶兆,指出它如何克服障碍,或人为地绕过流通,在制造虚拟货币资本时给循环带来危机。“整个信用体系,和与之相关联的过度交易、过度投机等等,倚仗于跨越流通障碍和扩大交换领域的必要性上”(Marx 1978,416)。所有信息都变得同质化并且可以互换。对于资本主义的积累法则来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逻辑建立在转变价值和一步一步被合理化的形

---

<sup>①</sup> 尽管“想象中的符号性反思”是自主的、规范的甚至是机械生活的常态。

变过程中。数字化之后,只有机器能够识别金融交易和文本信息之间的差异。这让价值、资本和数字代码可以通过机械和计算的形式被虚拟地成倍增加,而完全不管实际人类生活和自然世界中的物质限制。

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展开论述,他认为信贷经济只是货币经济的延伸,只是这两者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证明其与自然经济的不同……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区分中,比较明显的特征并不是经济合理性,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与这两种经济模式性对应的生产者之间的商业模式”(Marx 1978, 195—196)。正是在信用经济中媒介的个人化从质上改变了生产者之间的商业模式。通过数字数据、代码带来的个人化,信贷机制与媒介相互交织融合。

信用不仅是一种加快资本循环和周转时间的介质(Marx 1981, 567),同时也是一个个性化的抽象系统,它可以前瞻性地商品化上述各个抽象生产时刻的交换。通过以债权人的身份和性格作为制约未来支付的杠杆(例如,信用报告和评级机构,Manzerolle and Smeltzer 2011),信用克服了时空的界限。信用卡不仅在借钱的过程节约时间,还通过技术机制来授予信贷,从而减少流通时间。数字化使信贷机制扩张,有时甚至是有害的或掠夺性的目的(Manzerolle 2010)。因此,数字媒体系统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金融概念,即金融化——而这些通过对材料和劳动力的消费成为真正的抽象品。

这种通过抽象化和信用机制的加速不能独自发生,而是需要基础设施来实际传输速度,扩大金融和个人数据的范围,从而促进更加复杂的抽象概念的产生。虽然创造和提供信用是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提供可以借贷个人化数据的信用机制,以加快交易(无论是信贷或实际货币)。NFC技术只是各种信贷机制中的一个小例子。我们的数字媒体作为促进信贷或使信贷更有效的手段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信用等级、信用卡、虚拟物品、手机支付)。这些数据流被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一种仿真货币,或者至少因为它们的市場重要性给予它们一些面值。生产抽象概念的功能是价值的中介让循环时间趋近于零,例如那些新兴的信用体系。在这方面,有其他类似的想法,比如,认为个人数据本身可以转化为货币(Brustein 2012a; Zax 2011)。

## 五、结语:资本主义的控制论想象

个人化和普遍性的结合使日益扩大的信息流通成为资本流通中加速、

扩张和加强的资源。信用和信用体系的生长以及越来越快的光纤电缆都是媒介,它们在减少资本流通时间中起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大纲》里面关注到的,资本流通的大趋势之一是把个人、工人变成独立的交换中心,使其更受控于不断加强的流通节奏(Marx 1973,419)。这个过程在数字的、个人化的交互媒体的信息流中越来越多地发生,但是为了克服其自身的障碍也要同时强调消费能力。在和这些信息流的互动中,我们在现象层面感受到日常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这就是汤姆林森(Tomlinson 2007)所说的“瞬时性的到来”——文化生产和资本循环动力融合的结果。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移动支付系统和光纤电缆最近的发展证明了资本的加速逻辑。这些媒介反映出在资本主义下数字媒体的演变,这种演变是资本为了克服使用价值、等价品、空间和时间的障碍所进行的探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将资本看作是传播的主体。马克思关于流通的描述将资本传播勾画为一个为了克服不同障碍的场域。一方面,我们发现了资本的物流流通(商品、劳动力和货币);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文化习俗和机制所塑造的需要、欲求和使用价值的问题。

媒介的个人化有点类似自由市场的理想模型,即找到消费者和商品的完全匹配。已集成了 NFC 功能的移动设备的发展将会把这些设备变成提供或自动产生一系列个人化服务的设备。这种演进对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后工业化经济具有深远影响。这种个性化服务会导致很多服务行业的工作过时,因为这些工作要么变成自动化的,要么被不需要酬劳的网络使用者所替代。这个过程将与流通相关的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同时电信运营商和其他第三方(例如,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以扩大数据的范围用于商业。

我们可以把在这个普遍连接的时代个人化发展看作是在我们个人媒介里面流动的一种反馈机制。同时,这种机制又是更广泛的不断加速和计算扩张的数字洪流(不论是金融的、物流的、个人的,或者是所有这些的总和)的一部分。

马克思将资本看作一种循环,这一概念中所具有的算法特质既不让人惊讶,也绝非偶然。马克思使用循环回路的概念来构建他的资本运动模式是他有意而为之的,可能是为了隐射他想要批评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显见的偏见。奥托·迈尔(Mayr 1971a)写过自由市场理论的起源和反馈技术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部关于控制论的先锋历史。这种算法特质的根源既存在于知识机器(apparatus)中,也存在于算法特质的历

史发生之中。也许早期的关于全球贸易的模式以回路图反映出来只是个巧合(Mayr 1971a,4);亚当·斯密也碰巧和詹姆斯·瓦特是朋友并可能有着相同的社会控制论的想象力;又可能查尔斯·巴贝奇只是碰巧既策划设计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机器,又写下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章程;又或者,第一个电磁频谱理论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参见Mayr 1971b)也只是碰巧为工业资本设计了第一批的商业自我规范管理调节器,然后正好被控制论的祖师爷诺伯特·维纳引用了(Wiener 1948)。

据迈尔(Mayr 1971a)所说,自我更正/自我规范系统的概念是对自由市场的重要比喻之一。在这里,货物、货币和价值的流动会创造出一个自我更正的系统以便最大限度地为最多数人扩大社会福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个人化正是符合典型的自由市场理论的理念和价值的,个人化和普遍连接性被用来有效即时地将客户需要的服务和产品匹配起来。我们的媒介系统在“资本主义的控制论想象”中大大地发展(Webster and Robins 1999,111)。虽然我们被淹没在人际交往中的定量增加,在管理资本传播和其加速逻辑上,还有一个具备广阔的无线扩张可能的。其早期形式展示了香农关于传播的数学理论,而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反馈系统(Shannon and Weaver 1949)。这两个理论都认为,对完美信息的追求和对噪音的消除构成了数学意义上完美的传播系统。从这点来看,我们的通信手段和交换方式(包括网络中的货币和信息)的融合就不足为奇了。在技术媒介化的社会网络中,个人化带来了近乎完美的关于用户和他们的位置的信息;然而同时,噪音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符合我们所形成的算法的声音、意见和信息,这些噪音在我们所中意的架构以外。在资本主义的控制论想象中,数字媒体为资本提供了加速逻辑的动量,通过这种动量,加速的逻辑以图表化的方式得以表达。的确,我们的媒体在经历着转型,但是在什么样的结构偏向和政治经济命令下转型呢?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通过市场力量实现的云计算、物联网、以及3D打印机的发展呢?我们已经做出了论述,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媒介中心的角度来考量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的分析。

### 参考文献:

Arthur, Christopher J. 1998. The Fluidity of Capital and the Logic of the Concept. In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Essays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 edited by Christopher J. Arthur and Geert Reuten, 95—128. London: MacMillan.

- Babe, Robert E. 2000. *Canadian Communication Thought: Ten Foundational Writer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arr, Alistair. 2012. Paypal execs woos big retailers with pricing, data, Reuters, February 10.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2/10/paypal-kingsborough-idUSL2F8D8AE720120210>
- Barth, Chris. 2011. Visa and Square: Why Goliath is investing in David, Forbes, April 27. Accessed May 3, 2012. <http://www.forbes.com/sites/chrisbarth/2011/04/27/visa-and-square-why-goliath-is-investing-in-david/>
- Betancourt, Michele. 2006. The Aura of the Digital. CTHEORY.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2. <http://www.ctheory.net/articles.aspx?id=519>
- Betancourt, Michele. 2010. Immaterial Value and Scarcity in Digital Capitalism. CTHEORY.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2. <http://www.ctheory.net/articles.aspx?id=652>
- Boland, Michael. 2011. Apple's Mobile Payment Plans Come into Focus, Huffington Post, November 16. Accessed May 3, 2012.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ichael-boland/apples-mobile-payment-plans\\_b\\_1090003.htm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ichael-boland/apples-mobile-payment-plans_b_1090003.html)
- Bonachich, Edna, and Jake B. Wilson. 2008. *Getting the Goods: Ports, Labor and the Logistics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rustein, Joshua. 2012a. Start-ups Seek to Help Users Put a Price on Their Personal Dat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3/technology/start-ups-aim-to-help-users-put-a-price-on-their-personal-data.html>
- Brustein, Joshua. 2012b. Many Competing Paths on the Road to the Phone Walle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6. <http://www.nytimes.com/2012/05/07/technology/many-competing-paths-on-the-road-to-a-phone-wallet.html>
- Comor, Edward. 1994. Harold Innis's Dialectical Triad.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29(2):111—127.
- Comor, Edward. 2001. Harold Innis and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2):274—294.
- Dorminey, Bruce. 2012. Neutrinos to Give High-frequency Traders the Millisecond Edge, Forbes, April 30. Accessed May 3, 2012. <http://www.forbes.com/sites/brucedorminey/2012/04/30/neutrinos-to-give-high-frequency-traders-the-millisecond-edge/>
-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Elmer, Greg. 2004. *Profiling Machines: Mapp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Evans, Peter. 2011. Rogers Wants to Start Bank, CBC News, September 6. Accessed February 8, 2012. <http://www.cbc.ca/news/business/story/2011/09/06/rogers-bank.html>

Fortunati, Leopoldina. 2002. The Mobile Phone: Towards New Categor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4):513—528.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Studies: Reflections on Karl Marx and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369—402.

Fuchs, Christian.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179—196.

Garnham, Nicholas.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Hardy, Quentin. 2012. I. B. M. : Big Data, Bigger Patter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Accessed February 11, 2012.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2/02/15/i-b-m-big-data-bigger-patterns/>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New York: Blackwell.

Hecht, Jeff. 2011. Light is Not Fast Enough For High-speed Trading. *New Scientist*, October 1. Accessed March 10. <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1128324.700-light-is-not-fast-enough-for-highspeed-stock-trading.html>

Innis, Harold Adams, and Daniel Drache. 1995. *Staples, Markets, and Cultural Change: Selected essays [of] Harold A. Inni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Innis, Harold Adams. 1964.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TU. 2011. *The World in 2011: ICT Facts and Figure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Kittler, Friedrich A. 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josen, Atle. 2010. *An Accident of Value: A Marxist-Virilian Analysis of Digital Piracy*.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London, Canada. Available from [http://uwo.academia.edu/kjosen/Papers/387636/An\\_Accident\\_of\\_Value\\_A\\_Marxist-Virilian\\_Analysis\\_of\\_Digital\\_Piracy](http://uwo.academia.edu/kjosen/Papers/387636/An_Accident_of_Value_A_Marxist-Virilian_Analysis_of_Digital_Piracy).

Lebowitz, Michael. 2006.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NY: St. Martins.

Lohr, Steve. 2012. The Age of Big Dat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Accessed February 13,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2/sunday-review/big-datas-impact-in-the-world.html?\\_r=1&pagewanted=1&ref=technology](http://www.nytimes.com/2012/02/12/sunday-review/big-datas-impact-in-the-world.html?_r=1&pagewanted=1&ref=technology)

MacKenzie, Donald. 2011. How to Make Money in Microsecond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3(10):16—18.

Manovich, Lev.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Manzerolle, Vincent. 2010. The Virtual Debt Factory: Towards an Analysis of Debt and Abstraction in the American Credit Crisis.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8(2): 221—236.

Manzerolle, Vincent. 2011.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10(3/4):455—469,

Manzerolle, Vincent, and Sandra Smeltzer. 2011. Consumer Databases and the Commercial Mediation of Identity: A Medium Theory Analysis.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8(3).

Martin, Michele. 1991.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Form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lephone, 1876—1920. *Antipode* 23(3):307—333.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tin Nicolaus, Trans.).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76.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Ben Fowkes, Trans.).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78.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 (David Fernbach, Trans.).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81.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3* (David Fernbach, Trans.). London: Penguin.

Mayr, Otto. 1971a. Adam Smith and The Concept of the Feedback System: Economic thought and technology in 18<sup>th</sup>-century Britai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2(1):1—22.

Mayr, Otto. 1971b. Maxwell and the Origins of Cybernetics. *Isis* 62:425—444.

McGuigan, Lee. 2012. Consumers: The Commodity Product of Interactive Commercial Media, Or, Is Dallas Smythe's Thesis More Salient Than Ev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McLuhan, Marshall, & Nevitt, Barrington. 1972. *Take Today: The Executive As Dropout*. Don Mills, Ont.: Longman Canada.

Mosco, Vincent, and Katherine McKercher. 2008. *The Labou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Negri, Antonio. 1984. *Marx Beyond Marx*.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Inc.

Silver, Beverly.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nnon, Claude Elwood, and Warren Weaver.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mythe, Dallas Walker. 1981.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Pub.

Stiegler, Bernard. 2010.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TechCrunch(Producer). 2011. So is Web 3.0 already here? (tctv). [Video] Accessed March 1, 2012. <http://techcrunch.com/2011/04/18/so-is-web-3-0-already-here-tctv/>

Tode, Chantal. 2012. Apple's Mobile Payments Aspirations Come into Focus with Patent Award, *Mobile Commerce Daily*, March 8. Accessed May 3, 2012. <http://www.mobilecommercedaily.com/2012/03/08/apple%E2%80%99s-mobile-payments-aspirations-come-into-focus-with-patent-award>

Tomlinson, John. 2007. *The Culture of Speed: The Coming of Immediacy*. Los Angeles: SAGE.

Webster, Frank, and Kevin Robins. 1999.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Wiener, Norbert. 1948.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New York Paris: John Wiley & sons

Williams, Christopher. 2011. The \$300m Cable That Will Save Traders Milliseconds, *Telegraph*, September 11. Accessed March 2,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news/8753784/The-300m-cable-that-will-save-traders-milliseconds.html>

Zax, David. 2011. Is Personal Data the New Currency. *Technology Review*, November 30. Accessed March 1, 2012.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blog/helloworld/27377/>

Zwick, Detlev, Samuel Bonsu, and Aaron Darmodt. 2009. Putting Consumers to Work.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8(2):163—196.



乔治·佩雷斯(George Pleios)<sup>①</sup>

##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 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

张时健(译),张时健、吴畅畅(校)

[导读]佩雷斯以“传播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作关键词,追索它在马克思理论百年流变中如何翻转定位。长期以来,传播或符号文化是僵硬的物质构造基础的映射物,作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发展主旋律形之于外的表征,又或是巩固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手段,在意识形态上用功。但后期对这个阶级关系优先的“物质决定论”的反省,蔚为风潮,主要认为除却经济基础的文化活动,有其不必依附物质的独立性(或作:自主性);文化推进社会变迁的影响力不下于经济的作用。两种争议的焦点,在于谁能更好地解释社会变迁过程。

这个回顾是佩雷斯能够提出理论洞见的前提,他隐然反对这个把文化与经济对立起来的认识框架。特别是近代消费社会文化的兴起,好比符号横流的现象,在鲍德里亚那里造成了真实意义(meaning of truth)的混淆,但在佩雷斯的计划中,是晚期资本主义为了突破生产力障碍而动用的道具。但这里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指认普罗阶级目眩于文化工业产品而白痴化的驯化观,而是说通过操弄符号包装商品,鼓动全部人类那不可抑遏消费欲,有助于解决资本主义的扩张难题。

就在这里,佩雷斯接上法国调节学派的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

---

<sup>①</sup> 希腊雅典大学副教授, gplios@media.uoa.gr, <https://sites.google.com/site/georgepleioswebsite/>

tion)说,试图解开沉溺于文化/经济优先性的纠结。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在20世纪初期由外扩式向紧迫式转型,目的在超克以暴力手段压榨劳动剩余的极限,使无产者能志愿投入生产活动,关键的转机在于扩大消费。消费与更多的消费,不但使无产者的阶级自觉混乱(政治问题),也使无产者主动提高生产效率,即生产力(经济问题)。这个提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听来可能有些刺耳,却是佩雷斯创见的支点:“是扩大的消费推进了生产力,‘而非相反’”(Pleios, 2011: 239)。这正是:

消费规模的扩大,不只有助于商品消费,也重新构造了劳动力,使其能更多产,也就提高生产力。换句话说,减少了劳动力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对剩余价值的贡献(Pleios, 1993: 56—58; 转引自 Pleios, 2012: 234)。

消费社会兴起这个转机,因为大众传媒的相助而深化了,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大众传媒不只是让无产者的脑袋变得单纯,更重要的是把消费主义变成普遍意识而促成扩大的消费(从而促成生产力进一步的发达);而商品必须与符号结合或得到符号的代表(好比:广告)才能广泛流通。所以“大众文化与商业化的传播,不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成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它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基础’”。资本主义按此便定性为:“符号资本主义”(Pleios, 2012: 240)。

所以说符号资本主义的特性是大量消费,其积累模式到了六十年代出现了障碍,必须转型。佩雷斯认为那是生产力的增长减速,而扩大消费的成本持续上升(应为工资上升之意)造成的利润挤压。为了克服资本积累障碍、刺激生产力增长恢复,传播模式再次扮演关键角色:深化劳工的志愿性投入,不只是为了工作,更是为了“自我实现”。信息社会里的新信息科技允许工作者以更个人化的方式劳动,淡化了论资排辈的工作伦理,同时使工作与娱乐的界限消弭,职业的定义变得更流动且多样。这就是当今具后现代特色的“深度符号资本主义”。

如果传播方式与实践具有转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位置,那么推动社会转型也就不必然要以阶级对垒之姿夺取治经济权力中心,异议分子通过在新兴社群媒体上的串联,发挥聚沙成塔的新力量也能扳动铁板一般的独裁势力。佩雷斯以21世纪以降东欧、北非等国家的人民运动为例,为本篇论文做总结。

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来解释历史变迁以及为社会阶段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说到底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分配问题,因此文化因素难免居于次位作补充性质。佩雷斯重振传播决定性作用的办法仍未跳脱这个框架,只是用绕弯的方式将传播与生产力发展挂钩:生产力若由传播因素所影响,则历史变迁便可由传播因素来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传播借由鼓动大量消费、促成工人的志愿性投入,从而使生产力增长了。这确实是有意义的启发,让我们重新思考构筑物质基底的文化动因。如马克思所言,即使是价值,也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

进一步而言,佩雷斯的作法可以说是提取近代信息社会理论的精髓,即认为新的通讯传播科技根本地改变了现代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从而重构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与制度设计。卡斯特尔(M. Castells)的说法是:“信息化经济独特的地方,是由于它转变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技术范型,使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夏铸九等译,1998:97)

然而这样的论说可能造成两个值得再思索的部分:首先是技术的非中立性。按佩雷斯引用的网络社会论说,无产者因为流动的技术、变形虫组织、弹性的生产关系(劳雇关系、劳劳关系)等取得自由的形象,或可作阶层(strata)解体的征象,但如赖特(E. O. Wright)所言,这并不足以否定阶级(class)关系的存续,以及更为根本的剩余争夺的问题。佩雷斯既然主张新传媒技术促成生产力跃升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那么没有进一步阶级立场的分析架构就有些可惜。席勒(Schiller 1999, 2007)的近作为我们整理了新技术为大型企业所用,以及政策与之共谋的过程,我们得以窥知这个社会重构的目的可能是反民主的,即使它造成了非意图的民主结果。又或较保守地说,民主行动作为一种可买卖的商品而得到发展,但其发展的极限可能无法(长期)超过商品与市场的范畴。

放弃阶级的分析视野,即牵涉到第二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或许动摇佩雷斯的论说合法性:以生产力增长迟滞来断定资本主义的障碍与发展,是合适或充分的吗?在佩雷斯文中以利润挤压(profit-squeezing)论解释70年代初的总体经济危机。暂不论利润挤压本身的争议,如前面摘要所提,这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增长不足,二是工资增长过速。佩雷斯侧重前者,主张新传媒科技促成的深度符号消费社会,再次刺激生产力增长解决积累障碍,这不能说有误,特别在强调第三部门(服务与信息部门)兴起的社会转型论中见得;然而针对后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常在当代政治经济研究中看到,

即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本文中是缺位的。新自由主义落实在里根与撒切尔政权的种种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反工会的政治手段中,有效打击无产者团结争议的能力,压抑工资以及劳动条件,为弹性生产关系背书,以及襄助私营企业扩权。并且作为后见之明,80年代后期的经验数据显示,先进国的生产力增长其实有限,新自由主义时期整体成长的动力可能来自金融自由化,而当时的自由化政策为今日深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这个意思是,资本主义的危机生成、超克与长期发展之复杂,难以单用生产力增长迟速来解释,那么我们思及佩雷斯的解释进路之有效,就得稍作保留。再说生产力增长,在劳动过程的研究领域讲究的是组织的经营管理手段如何尽可能地榨取劳动力,鼓动无产者的志愿性投入是一端,但非全部。对使用相近管理手段的个别资本而言,面对相同质素的劳动供给,竞争胜出的关键是技术更新,也就是资本技术构成(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的问题,在熊彼得而言是创新如何可能。说到底,劳动者的志愿性投入有其生理极限,在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的生产力提升幅度很快会被资本开发殆尽,要说能长期支撑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太稳当。

以上列举佩雷斯在解释工具上的选择,可能映照了他采取的研究方法。其论述底盘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生产力、消费量、就业、工资、成长、积累迟速等文中铺排的关键概念,还缺乏经验材料支持。他的核心命题如大众传播的兴起与促成消费社会的发达,而后消费社会促成工人的志愿性投入,工人的志愿性投入促成生产力增长,都可按经验材料验证,验证而否证的历程会促使研究者反省想当然的原始主张,提出更谨慎的结论。这令人想到佩雷斯动用的理论框架:调节学派,在另一篇回顾性批评中亦指出同样毛病,即概念推论与经验材料不见得相符(Brenner & Glick 1991)。

然而在这个推论与经验的落差之处,或许藏有开启新观点的契机。在此试举一例:调节学派在理解福特主义生产体制上,因为有将大量生产与消费同一的倾向,因此暗藏消费不足论对70年代总体经济危机作解释:碎裂化的消费习惯,使得福特主义下量产的商品难以消化,整个量产制也就无以为继而崩溃。继之的新阶段以后福特主义名之,标志是可弹性调变的生产体制。然而所谓“碎裂的消费”的由来,耐人寻味。调节学派开山祖阿格列塔(M. Aglietta 1998)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内生于人类社会的,然而这不同于理性选择论的“理性人”假说,而是说天生是彼此不同的、独特的人的行动、意识与价值,必然镶嵌于社会制度(regulation)中

运转,而在崇尚规格化量产、爱论资排辈的巨型科层组织等社会制度下,人的个体差异被抹灭不彰,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直到后福特主义时代才得释放。

这样把个体主义自然化的办法,局限了理论解释的效力。我们或可借由佩雷斯的论说进一步发展。按佩雷斯的说法,60年代后个体主义的兴起是传播模式(继续)作用的结果,那么传播模式如何配合体制转型需要策动集体主义的崩溃,就是有趣的论题。或许个体主义只是媒体打造的符号表象(其实不然)?或许个体主义是媒体宣传的理想生活形式(其实不然)?这都可以在佩雷斯的社会转型框架中再细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符号资本主义,沟通理论,大众文化,大量生产,弹性专殊化,后福特主义,扩大的消费,文化工业,消费资本主义,信息社会,劳工组织,新科技,后现代,社会变革

## 一、方法论论题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将马克思派的传播理论当成特定领域加以检视,而是将传播置于马克思总体的社会理论中,使之作为一个变量加以理解。换句话说,本文企图将传播的结构性角色,置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构造框架中理解,同时考虑传播在马克思社会理论中定位的历史转型,以及采取不同的理解路径。因此,本文将详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取径以及之后各路学派的想法,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受马克思影响的思想家;并且尝试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视为传播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结果,也对这个过程进行评估工作。

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传播之间的关系,前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传播与生产关系是同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arx and Engels, 1978a:67)的主要论点就是把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按“交往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定性。<sup>①</sup> 马克思与恩格斯使用这个词汇,意在解释意识形态(按他们的理解这

<sup>①</sup> 原作 forms of communicatiuon,在此按《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恩全集》第三卷里的译法,译为“交往形式”。但在非马恩原典处,forms of communication 则取常用汉译译法,作“沟通形式”。两者实为同一。——译者注

等同于唯心主义)与生产方式以及阶级关系之间的关系。分工的程度或形式的不同,导致劳动者产品分配的质与量也随之不同。换句话说,分配的结构与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有关。一定的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关系,皆源自于分工(Marx and Engels, 1978a:78)。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白,生产关系一方面是阶级/所有权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交往形式。

如同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指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人们,他们受到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Marx and Engels, 1978a:67—8)。①

所以马恩把生产关系置于更大脉络下的社会关系中理解。在其中,社会互动即符号使用,自其中长成的或用于指涉互动的种种观念,被以整体视之。按此说,“交往形式”就成为建立、维持与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手段,反之亦然,并且要与分工联系理解。从这个观点出发,沟通与符号结构就不是被动的手段,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成分,特别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是如此。好比马克思指摩西偏好的善行、公正与美德的法规所以取得成就,都是建立在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Marx, 1983:100)。② 换句话说,交往形式对于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为何,得视分工与总体生产方式而定。

第二步(第二阶段),马克思认为传播,特别是它的观念内容,相对与生产关系分立且应置于上层建筑中理解,而生产关系即阶级与所有权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

①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三卷,页29。——译者注

②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页477。——译者注

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Marx and Engels, 2001: 39)<sup>①</sup>

在此处,传播受制于且反映了经济基础,也就是阶级与所有权关系。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Marx and Engels, 1978a: 94)<sup>②</sup>这个观点可以按两种方法解释:

(1) 较为机械的说法,会认为传播工具从属于生产资料所有者,他们会“刻意”操作传播手段为己喉舌,目的是为他们的事业赚取利润,或者/以及是要使社会的不平等看似正当且运转不息。传播的产物(或者是符号学所谓的文本)作为可买卖的东西,比如商品生产的产物,是为卖(交换货币)而买,以满足别种需要。马克思这么说:“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Marx and Engels, 2001: 39—42; Marx, 1979: 45)<sup>③</sup>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断言谁拥有生产资料,谁就拥有传播工具,可用于维系他们对社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保卫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和阶级关系。“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978a: 94)<sup>④</sup>

(2) 以上的主张也可以用更具结构观的方式理解。言必称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人,通常也认为他们的观点会反映在传播产品上。这个理解进路主要着重于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面向。“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

①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十三卷,页 8。——译者注

②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三卷,页 52。——译者注

③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页 47。——译者注

④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三卷,页 52。——译者注

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978a: 94)<sup>①</sup>。按威廉姆斯(R. Williams)的说法,正好是实证主义者会认为(观念的)传播反映了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寓居于基础的社会结构里(Williams, 2001: 153)。传播产品要按其内容的整个观念来探讨。在这个脉络下,传播以及传播产品/商品便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传播的定位在马克思主义里发展到第二阶段,多少成为具有自主性的社会领域。马克思自己不只把上层建筑与基础分开理解,也把艺术与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独立处理(Marx and Engels, 1975)。这样的观点长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主导地位。

第三阶段,对于上述的传播-生产关系的框架,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不同的、更讲究系统性的理解方式,并与之泾渭分明。同时,他们的贡献促成了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按本文的分析,不可忘记这些说法先后的顺序关系,以及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特定历史与时空背景。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将传播视为是文化领域,是更大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反映,表现为观念与论述的种种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首先注意传播内容与实务上的意识形态面向(主要考虑内容的虚构成分)。马克思主义结构论者正是这个路数(Althusser, 1990: 69—95);同样的还有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但方法上稍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结构论者并不在乎文化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对生产过程与传播内容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少有着墨;结构论者关心的是传播内容展现了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视之为统治阶级对现实的看法(view of reality)。文化生产的两个面向(经济与传播的)被当成在结构上是平行的,基本上是欠缺互动的。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功能(即使它的商品性质被提及)保有自主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规则与所属的特定文化领域。或者说,文化产品的商品功能被意识形态所吞没。不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三卷,页52。——译者注



论是哪一种状况,传播的意识形态功能都和它的经济角色没有构造上的联系,就只是完全的符号性过程。这一路马克思主义方法,和本文视传播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而发展的分析无关。

除了以上所提(主要是文化进路),还有另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方法。它的分析采用不同的进路与层次,把符号以及非符号产品的商品生产过程,与传播以及传播内容结合理解。批判理论,特别是阿多诺(Theodor Adorno),便采用更具结构观的社会哲学进路,探讨传播作为一个领域如何渗透到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结构)里,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Horkheimer and Adorno, 1986; Adorno and Horkheimer, 1987: 219—243)。工业生产与商品化过程携手进入传播领域,但问题并不在技术本身,因为技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化结果(materialization)。这一方面导致了传播产品的极端商品化,使其广告宣传的性质淡化;另一方面却又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置入于内容之中。传播产品因为量产,留给另类观念的余地也就有限。阿多诺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强调:“电影与收音机再不必使自己表现为艺术的样子。真相是,它们不过是一门生意,作为意识形态使他们刻意生产出来的垃圾合法化。它们以工业为名自诩,而电影导演公开他们吓人的收入叫所有批评者闭嘴,再不能质疑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有无社会必要性。”(Adorno and Horkheimer, 2001: 72)

此外,传播的商品化(比如广告)有助于现代工业的非文化商品流通,是很有力的工具,主宰了现代人的每日生活。传播产品与其他非文化产品一样,它的消费可满足劳动力例常再生产之所需。“晚期资本主义下,娱乐就是工作的延伸。工人想要自机械化的劳动过程中挣脱,所以寻求娱乐放松,才有力气再上工。然而,在他们享受娱乐的同时,机械化的过程仍然有力地作用在休闲与愉悦上,彻底地主导了娱乐商品的构造,让工人下班后也只能经历上班时劳动过程的残像。”(Adorno and Horkheimer, 2001: 72)因为工人的消费被置入了观念、被商品化,劳动阶级也就整合进整个体系里。

因此,传播是为了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服务。按此说,批判理论不只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在自主的上层建筑的效果,如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结构论。而且,它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播的渗透,及其带来的意识形态与结构后果,最终使上层建筑的自主性崩毁,所以说经济基础就此征服了上层并使之同化。按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对

这个推论的定性,这是文化与传播研究的“经济决定论”(Garnham, 1979),这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结构论的唯心主义而主张的。但是批判理论并没有探讨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中,传播自身的生产扮演了何种角色(比如在劳动现场被消费的符号财物的角色)。它仅检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如何通过传播再生产,以此为争议拍板定案。

另外,宣传模式以更工具性的观点采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更准确地说,这个说法认为资本家在文化生产上的代理人会置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到内容中(主要是事实性的内容),以促成他们经济或政治目的实现。所以宣传模式更注意传播商品的生产过程及其意识形态内容、政治效果,以及如何维系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这些都与掌握了文化生产工具的阶级的活动与目的紧密配合(Herman and Chomsky, 2001)。按此说,为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的运作不是直接作用的,而是通过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共识。

而“编码/译码”模式则把传播的文化以及经济分析,与传播过程中的生产以及消费(阅读)面向作有机结合(Hall, 1980)。从这里开始,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结合批判/理论分析以及实证/经验分析,研究经济、文化与政治变因如何决定了传播产品,以及传播领域如何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成分(Schiller, 1973; Mosco, 2009; Curran, 1979; Golding and Murdock, 2001)。工业-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传播产品并非位居核心,而是更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利益结构的一部分(Golding and Murdock, 2001: 26—28)。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以更复杂且讲究历史的方法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播的作用。如同加汉姆所指出的:“……上层建筑/文化是从属性的、第二性的没错,但一方面其间的物质性剩余的抽取与分配方式为何(比如阶级关系),以及另一方面物质性剩余在上层建筑里的配置为何(比如公共支出分配比例的问题),两者间的关系至为重要。”(Garnham, 1979)然而,尽管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晚期资本主义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机制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为我们提供重要且有益视野,但是传播对(非传播)商品生产过程以及“分工”的作用为何,还有待厘清。

一般而言,在这个理论的第三阶段,传播被视为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也是被不断延展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所渗透的领域。概括地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播领域以及传播方式起的作用,长久以来一直是探索的焦点,但是传播(方式)之重

要,如何在商品生产上(而非在流通上、政治上)起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分析。

正是后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在第四阶段要发展的重点,而这里不可与前述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二分理解,也就是要把传播与生产过程联系起来。按我看,批判理论采取的是新马克思主义取径,把视野放得更远,看到传播在维护与再生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作用。但是,如同我已经指出了的,这是把研究视野简单局限在劳动力再生产,甚至在进入田野观察工作现场前,就作此主张。威廉姆斯有意把“经济基础”当作是上层建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劳动力的层次(Williams, 2001:154—155)。威廉姆斯认为:“如果我们用更宽泛的方式审视生产力的概念,我们看待经济基础问题的方式会完全不同,如此才不会轻看上层建筑;如此一来上层建筑虽为次要,但仍是必需的生产性社会力(productive social forces),这就是用更宽泛的概念、从经济基础出发的取径。”(Williams, 2001:155)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zensberger)探讨生产领域中传播扮演的有机角色,主张传播方式即生产方式(means of communication are means of production)(Ezensberger, 1981)。最终若要回到历史脉络中来谈,我们无可避免地会以马克思的术语重新梳理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思想,即生产方式是传播方式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相反(Baudrillard, 1990:112; Pleios, 1993:50—64)。按此说,我们必须重拾德波(Guy Debord)的理论,也就是主张景观是商品生产、交换与消费的高阶形式(Debord, 1986)。

传播与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用两种方式来理解。首先,传播被视为一个过程,主要作用于商品流通领域,也就是促进产品的销售(比如用于广告、或促成生活的消费化)(Marx and Horkeimer, 2001; Fuchs, 2010a)。

其次,有人主张,传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不只局限在交易与消费的领域。在我看来,传播可作为从核心地带(即“分工”)促进、强化或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过程,其作用远不止于文化工业与文化消费的领域。我们或许可以用此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以调变,以及传播与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深层角色为何。

我的分析法正是定锚于这个理论的第四阶段,我并不把传播视为反映或再生产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或是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了的场域,又

或是促成财货流通的手段来加以检视。我探讨的是传播作为社会性的组织,包括文化工业在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核心中扮演什么角色。这里所谓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指(非文化工业的)商品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关系构造。换句话说,我把传播视为能从工作现场的社会性生产关系下手,即从其核心地带维护或改变生产方式的一种力量,而就此检视。与其说这用来给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形式定性,不如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结果。因此,我承认传播不只有助于实现生产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也有助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我分析的起点是,通过消费,某种质素(价值观或是规范)在工人之中形成,提升他们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工作组织安排下,生产过程可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第二个说法在消费者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可以成立。

消费规模的扩大,不只有助于商品消费,也重新构造了劳动力,使其能更多产,也就提高了生产力。换句话说,减少了劳动力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对剩余价值的贡献(Pleios, 1993: 56—58)。这个取径并不稀奇,但一直以来是用别的概念术语被提出的。好比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功能论的一支便采取类似的取径(Schultz, 1961)。在本文,采取前述分析光谱的第二部分去关注社会-符号的建构,而不是劳动力在生物-身体方面如何通过消费与传播进行制造与再生产。

## 二、马克思主义取径及其争议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框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的公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展开被认为是构造整个社会系统(或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社会-经济构造[social-economic formation])的根本力量(Marx, 1978: 115)。为了理解与评估这个辩证过程以进一步作经济分析,特别是按马克思主义,往往分为两个进路,其一主张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劳动力)优先,其二主张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阶级关系,等等)优先甚或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优先(Plamenatz, 1963: 282—283; Blackledge and Hunt, 1995: 160)。这个分裂长久以来存在于马克思主义阵营里,不只是理论上,在政治、文化与其他层面上皆然。

就这点上,我们必须强调两个重点。首先,如同前面提过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方面将生产关系定义为“交往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

(Marx and Engels, 1978a: 67)。另一方面(Marx, 1978), 生产关系被视为经济基础, 其上矗立着的一切事物, 也可以用别的术语称为“沟通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法律、政策、艺术, 等等)以及其他社会制度。很明显的, 往后生产关系主要指的是经济-社会范畴即阶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而“沟通形式”则不再属于经济基础。

为了理解这个冲突, 我们必须问: 阶级/财产关系能否与沟通形式分而治之? 而阶级关系又是在何处决定且型塑了沟通形式。(1) 生产关系如何可以不靠沟通形式而存在? (2) 如果我们把沟通自“沟通形式”中拿掉, 剩下的会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白的: 在一个没有意义沟通交换的世界, 你无法想象或理解阶级关系或任何社会关系。按格伯纳(George Gerbner)的说法, 沟通是“通过讯息发生的社会互动”或符号建构物(Gerbner, 1970: 72)。因此各种阶级关系(包括其政治形式)只有通过沟通以及各种沟通形式才有存在可能。事实上, 阶级关系需要借由沟通形式才能得到牢固的基础, 也才得以转型(在各个社会里取得其特殊的历史形式)。

根据前述的分析, 第二个问题(即若我们抽掉了一切沟通可能性, 则“沟通形式”还剩下什么?)的答案是: 思想。就结果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或时期, “上层建筑”被当成是思想的总和, 如果按马克思自己的文字所述(Marx and Engels, 1975: 68), 思想是由社会的物质基础所构造, 其中包括了生产思想的制度性机制。

这个路径一直以来主要以两种方式理解。首先, 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被认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以偏概全。在实证主义、功能论与韦伯派(Weberian)社会学里这样的看法很普遍(Alexander, 1987)。而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之重要, 却被认为是以偏概全之最。他们主张: 要对社会作进一步的认真分析, 经济因素显然不够充分。当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曾指出就社会组成(societal organization)的分析要竟其功, 还必须结合传播/文化面向, 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结合“内容”的“形式”, 但这也和经济过程依次互相作用。按恩格斯的设想, 这要靠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Marx and Engels, 1978b: 469)<sup>①</sup>。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 第三十九卷, 页 96。原文为“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 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译者注

第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取径(主要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特色,在于以历史事实刻画理论(a theoretical imprinting of a historical reality)。马克思详实地描写了19世纪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如何运作(Russel, 2006: 26—29),并非以资本主义一般或笼统的阶级社会作泛泛之论。这个假设在我看,正好切中威廉姆斯指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是布尔乔亚公式的核心要义(Williams, 1978: 75—82)。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分析,必须把传播/文化扮演的角色纳入考虑。

所以,不论你如何从早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内部或外部去检视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在社会组成中的角色,你都可以观察到趋同的结果。也就是要如何从上层建筑的活动,重构“经济基础”或更大的生产方式所扮演的完整角色。这结论如同社会理论的发展进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理论活动。然而单靠理论是推导不出结果的,我们必须同时运用本体论知识(Horkheimer, 1976: 213)。除了极端的唯我论(solipsism),理论都是社会建构物而社会建构物必然不能是任意武断的(Demertzis, 2002: 144—175)。社会建构物是把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之外的诸事件构成论述,再将论述组织而成。换言之,社会建构物包括的诸事件是客观的,如同自然事件经济事件一样(Demertzis, 2002: 149—152)。

晚年马克思所描绘的特定社会经济构造,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认识到的。它之所以看起来合理可信,有两个理由。其一,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论述与马克思著作中的一般路线相合(corresponds to the more general course),也就是从抽象与一般下降到具体与特殊,或者说把哲学与一般社会学分析结合经济与政治事件。第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资本、工作、商品的描述,是对资本主义的“概念典型”进行分析。但是这确实可以在历史上被观察到,即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国。

当我们尝试运用这个分析技巧研究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一种资本主义形式,都必须对理论架构做或大或小的调整,如同恩格斯在写给恩斯特(Paul Ernst)的信中强调的(Engels, 1978a: 426—428)。<sup>①</sup> 这些“调整”可以视为要配合不同历史情境以及/或是不同历史阶段,有如配合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新阶段的“概念典型”。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页93—99。——译者注

### 三、符号资本主义的诞生

当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定性与转型的本体论基础确实有所不足,我们就应该开始注意是什么事实造成了这个限制。根据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知识论(Polanyi, 2001),巨变即资本主义本质的变迁发生在19世纪末叶。这个变迁的结果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或有人称为组织资本主义)(Lash and Urry, 1987; Sennet, 2008: 27),以及竞争减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主义国家衰微。但从另一观点来看,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与生产过程的剧烈变动有关,特别是工作的社会组成形式(Burawoy, 1979);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公共部门的兴起(Hobsbawm, 1978)。

这个重要的变动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研究影响甚剧。好比鲍德里亚就以这个变动为本,颇能说服人地把媒体发展与传播方式的统治地位解释成凌驾在生产方式之上(Baudrillard, 1990: 112)。尽管鲍德里亚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型,但我想他对这个变动的理解有误。鲍德里亚指认这个变动发生在商品的市场流通范畴里,特别发生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之间,以及商品与消费的关系中。确实,商品流通与金融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影响至巨,这是恩格斯在写给康·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信中也承认的。但“决定性时刻”仍是生产无误(Engels, 1978b: 436)<sup>①</sup>。

资本主义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商品的流通或生产(这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前就存在了),而是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随之更进一步的商品生产一般化。“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Marx, 1979: 520)<sup>②</sup>流通是剩余价值实现的时间点,而不是剩余价值创造的时间点。生产剩余价值最重要的条件是劳资关系,也就是劳动力自身成为商品之所在(Jessop, 2002: 12—13)。剩余价值的生产,特别是指剩余价

---

<sup>①</sup> 原文为:“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译文取自《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页485。——译者注

<sup>②</sup> 译文取自《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页556。——译者注

值率( $s/v$ ),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形式与本质。也就是说,垄断现象作为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都无法用生产组成(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作解释,或至少说无法放入生产组成的框架里被理解。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变迁,最重要的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或方法出现了差异,而不是剩余价值实现(商品流通)的方法有所不同。价值实现方法对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如何是无关紧要的。

根据调节学派的说法(Aglieta, 1979; Lipietz, 1990),我们可以说1870年代的危机乃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剩余价值生产系统的危机,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特点为剩余价值的外扩式(extensive model)生产及经济发展(不论是个别公司或全国总体经济皆然)。为了解决危机难题,体系必须扭转成密集式(intensive model)的组织资本主义,表现为垄断结构。这个过程包含了不同的剩余价值生产系统,从而生成了不同的价值实现方法。

在外扩模式里(作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标志),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增量(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的增量来实现的。首先,这借由压低工人工资直到逼近生存底线,并配合延长工作时间等等的方式来达成。这个阶段的劳动力内容主要是无技术性且非自愿的纯体力劳动。工人能够有效地参与生产过程,是因为被经济暴力所迫(生活资料被剥夺)。资本主义企业的职能如此,使得政治或道德关怀很难介入劳资关系,特别是工人被夺取了一切经济手段。19世纪末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出现了这样的劳资关系,还有与之相应的资本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与不同企业间的关系。其次,作为这个发展阶段的结果,外扩模式(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的增量、以及经济的发展成长,主要借由个别企业家不断地借营利再投资(按清教徒的新教精神)繁殖原本的事业体,不断生成新的生产单位。

从这个时候开始,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乃可视作工业资本主义如脱缰野马般不断扩张的时期,不只重塑经济结构,也根本地改变社会关系以及人口的分配与组成,此即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描述第二波社会的样子(Toffler, 1982)。最后,在前述诸面向打造的外扩模式里,按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的说法,是劳动的技术组成推进了剩余价值增长(Rueschemeyer, 1986),换句话说即借由机械的部署以竟其功。技术持续变革的结果是缩减了必要劳动时间,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简言之,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在总体层次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我看来,在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里,社会传播与工作分离的程度



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反之亦然,尽管那仍从属于相同的劳动规定。劳动过程与社会组成的传播(socially organized communication)无涉,它以自身为目的,为劳动主体的需要与期望服务。此外,社会组成的传播主要仍从属于普遍交换的必要条件,方式有二:一方面,传播的社会生产与消费尽皆商业化,其特性与一般物质商品生产的做法、生产者间的关系以及行规,都无二致。

论及与雇主的关系,符号商品的生产者和工厂工人是很像的(Pleios, 1993:49—50; Mosco, 2009:133)。马克思的商品概念为前述这个模式提供了理论说法,他认为商品[的需要]“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并无紧要”(Marx, 1979:45)<sup>①</sup>,正因为两者的生产方式与条件相同,并且生产都是为了消费者的需要而非生产者自己。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交换关系能得到适当地表现,是拜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语言所赐(特别是社会传播中的书写文字与印刷术)。

作为符号系统的自然语言变成了符号世界的等价物(symbolic equivalent of value)。它变成了符号的“货币”,能够“公开的”(on the show)兑换任何其他的意义表述。这就是为什么平面媒体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媒体,而在信息-文学交错的轴心上,内容的诸类目则在平面媒体里外占有主导地位(Pleios, 1993:51)。换句话说,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里,社会传播在相对意义上与劳动分离,但两者皆一方面从属于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定,另一方面从属于商品生产的规定。这绝不是说所有文化生产与传播都已商业化。只就社会组成(比如:商品化的)的文化生产而论,这个说法才为真。

然而,外扩模式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延续有其瓶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垄断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主要认为是资本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结果,而劳资关系则视为稳定不变。这意思是,垄断结构可以简单理解为个别小企业为了追求大型企业的垄断利润而进行整并的结果。然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操作劳动的技术组成所促成,这是马克思考察长期状况加以主张的(Marx, 1979: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页47。原文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译者注

627—644)。它同时也是劳动强度提高的过程,可能伴随着利润率下降趋势。换句话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同时也是“活劳动与物质化劳动<sup>①</sup>生产的总量”(Richta, 1976: 47)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说,垄断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的兴起,必须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量以及生产力提升的现象合并解释,或理解为是向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即紧迫性的发展模式。

这个结果并非由技术变革所致,而是生产过程中劳动社会组成(特别是科层制)的转型造成的(Rueschmeyer, 1986; Sennett, 2008: 28; Braverman, 1974)。“企业组织方式的变革在这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Sennett, 2008: 28)。因此,所谓的泰勒化生产、福特主义、“人际关系理论”、甘特系统(Gantt system)、Halsey、Rowan 等等该时期劳动组成形式(在个体层次)的理论标志,与经济上的垄断组织同时发生绝非巧合(Parker, 2000; Pleios, 1993: 54)。事实上,密集模式把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组成面向提高到一个相当重要的程度。相反的,在外扩模式里,劳动的社会组成并不作为一个需要在乎的问题。外扩模式里劳动的社会组成仅仅是技术延伸的作用,即通过机械将工作组织起来,相反则不然。

垄断资本主义里的劳动者,最终仍按纪律被组织起来,一般称此为“军队化”。“被市场搞砸了的利润要靠科层组织来拯救”(Sennett, 2008: 28)。这对泰勒化与福特主义而言正是如此。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指出把军队的组织纪律应用到产业上并推而广之到社会其他领域的过程,正是在韦伯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命题,即劳动组成的形式。桑内特就说:“我们能分析军队化社会……都要谢谢马克斯·韦伯”(Sennett, 2008: 28)。因为这是韦伯在自己的国家观察到的现象,并对之分析。德国被认为是这类资本主义的工业或社会组成的诞生地,或按拉什与厄里(Lash & Urry)的说法,是其“理念型”(Lash & Urry, 1987: 17—28)。然而,一方面(军队式)组织资本与社会的标志是垂直式与科层制的组织,讲究严明的纪律;但另一方面它能有效运转靠的是个人的志愿性投入。

该模式的基础是安排某些工作给主动参与者执行(Sennett, 2008: 30—39),也就是需要工人的同意以及自愿与组织整合。在这样的劳动组织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依据的经济暴力已不足以让工人有足够的动机发挥工作效率。相反的,生产过程要有效能,就必以共识为基础打造劳资关系(Bura-

① 即前述的死劳动。——译者注

woy, 1979: xii)。为了在新环境中展现工作效率,工人面临生产流程设定的目标,需要自我调适并转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目标,试图应用之、实现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马克思关心的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韦伯对组织资本主义念兹在兹,两个并不相同,但他们两个都把一己关注的资本主义形式概推而一般化了。

因此,如果要达成可欲的控制水平并鼓动工人的志愿性投入,使之成为密集模式的核心内容,通过绝对剩余价值抽取遂行的经济暴力(饥饿)以及劳动剥削虽然曾经举足轻重,但就此而言已不足够。所以把非经济要素(比如政治与文化)等等与经济文化以及生产过程整合就有必要。这样的目的可能在一开始就作为政治愿景被编派好了(比如民主、国家,或未来的社会主义,等等)(Pleios, 1996)。

事实上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早期(也是财产权以集合形式遮饰其私有性质之时),密集模式的发展主要是令资本与商业活动的不同形式再组织化。或更准确地说,重整国家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到了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个态势就非常明白了。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就此提出了正确的看法(Burawoy, 1979: xi),但是他只看到了组织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特别是那些本来就缺少自由主义传统,而有相对丰富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国家。这些国家把劳工与整个社会当成军队整编,可能为的是各样的理由,也相对容易达成,好比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希腊等等。然而,深受自由主义传统影响的国家,会把增进与维护人民的个人所得当成是国家存有的目的(Hobsbawm, 2008: 51—52),又或有的国家已经出现了密集式生产方式,则前述的发展长期来看就未必成立或可行。

为了确保工人对军队化劳动组织的志愿性参与以及纪律,使有助相对剩余价值的产出(Jessop, 2002: 56, 58),就必须把超经济的机制整合入生产过程,而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便注意到:“很明显的,文化工业体系是在自由放任的工业国里降生的;而媒体作为其标志,好比电影、广播电台、爵士乐、杂志等等,在那儿繁衍茁壮。”(Adorno & Horkheimer, 2001: 79)。

密集生产所动员的更多生产力,当然可通过扩大消费消耗掉。但有些学者认为扩大(大量)消费主要用来促使生产力提升,而不是相反(Jessop, 2002: 7; Matsuyama, 2002)。如果工人消费量提高的同时不能增加他们的生产力,则资本家就没有理由因为他们的高生产力而提高工资。生产力并

非只能是“经济规模”的结果(Jessop, 2002: 56)。生产力提升是扩大消费的必要条件,但只有在扩大消费是生产力提升的必要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才会成立。但按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只有利润才是最终目的,工人用什么方式过活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从资本家的角度思考,扩大消费只有在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时,才有存在的必要。

然而,扩大消费到某种程度时,便可作为密集模式的前提:(1)不必为了防止新进竞争者的吞并而把多余的(维持公司运作所需下限之外的)钱储存起来,钱被用来消费花掉了;(2)钱被花用在商品购买上,而且可以用来鼓动工人的自愿性参与与纪律心。这不仅可行,而且确实发展到新的高度,按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说法,是使工人不再是无名的、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劳苦大众,反而地位上升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分子,甚或是得享过去只有精英阶级独享的权利(Arendt, 1991)。

换句话说,问题被商品消费解决了。也就是,商品取得了超越使用价值(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的符号价值(symbolic value)(Baudrillard, 1990; Arendt, 1959: 72—83, 108—110),这和符号商品(比如传播产品)是一样的。这里所说的消费是个人的消费。

扩大的商品消费(符号与符号商品)让工人得以成为主体。罗·威廉斯(Rosalind Williams)在她的作品中已经指出了大众消费与上层阶级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Williams, 1991: 13)。因此这类商品的消费便用于阐明精英与普罗劳动者的共同目标、共同意义。又或者,如马格林与巴度里(Marglin & Bhaduri)以总体经济学语言所表示的:“如果需求够多,产能利用率便能高到足以同时满足工人与资本家的需求”(Marglin & Bhaduri, 1990: 153)。按此要领,工人便与精英阶层有志一同了。也就是说,扩大消费的主要目的(不必然是明显可辨的)是让劳动者接受并支持历史所安排的新分工模式,而不是鲍德里亚以为的,扩大消费是超经济力量造成的历史断裂(Baudrillard, 2003)。

事实上,扩大消费的作用并非如人力资本论(Schultz, 1961)或其他研究(Lash and Urry, 1987: 67—8)所假设的,把劳动力打造为用之不竭的自然力量使可用于生产。与其这么说,不如说它是在劳动者的意向与意识上作功而使劳动力可用,在符号上它表现成激励、动机、目标等等名目。要保证这样的操作有效,必须在消费主义已成普遍意识形态的脉络下落实消费活动(Bocock, 1997)。按此观点,消费主义就不只是个人追求商品使用价值的活

动,而是要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以彰显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美德与生活方式(Pleios,2001;Ch.3)。就此来说,符号价值因为它在生产上担负的关键功能与作用,是不同于商品拜物教的。

在政治上,推动凯恩斯政策有助解决前述难题。换句话说,是借由保证大量消费的制度安排,支撑了大量生产体制的运转不辍(Aglieta,1987;Lipietz,1990)。凯恩斯主义不只是使商品-符号生产爆量的元凶,也是大众文化的符号商品生产爆量的推手。然而,这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外扩发展模式以及渐向密集生产方式转型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广泛消费的经济成本看起来好像是花用掉了,其实不然;这是投资(“表现为”劳动力价格),而欠缺这种投资则密集式生产与更高的营业利润都无以为继。

所以说,密集式生产的结果与前提,就是商品-符号(以及符号商品)的消费,反之亦然。是扩大(大量)消费推进了生产力,而松山公纪(Kiminori Matsuyama)主张生产力提升才使消费扩张(Matsuyama,2002)是正好颠倒的看法。大量消费的目的在打造劳动力的某些“质素”,从而是打造量产制不可少的某些要素。按此说,扩大消费摇身一变作为生产力。它的角色再不只局限于符号商品(直接地)或者/以及商品-符号(间接地)的流通领域。除此之外,在许多国家扩大消费的物品(objects)是以天然的、非商品的形式供应,好比电视、教育或其他媒体与文化产品(Allen,1992;Mosco,2009:134)。

这个变迁不只是一般意义下的大众传播得以发展的基石,视觉传播同样受惠。这些视觉媒体以具象的方式供输商品的符号价值,以及环绕其上的生活方式。它们提供商品的影像,以之作为商品流通的基本前提,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商品影像的流通对商品自身的流通而言变得非常重要(Adorno and Horkheimer,2001;Pleios,1993:Ch.2;2001:Ch.3),反则不然(Debord,1986)。所以文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扮演的角色才得突显,而反之亦然。但是更丰富多样的而耗费更多的流通(与消费)要能实现,除非它能促成更高的生产力使能摊平流通(以及消费)的成本,进一步能提升剩余价值以及经济成长。也就是说,消费与流通扩大的实际范畴与结果,是使剩余价值在量上的增长(Pleios,2001:ch.3;1996),但不是比例上增长。

然而,按此说,大众传播动态地卷入其中,作为一种机制鼓动大众文化消费的实现,以促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及密集式生产方式的条件。因

而,大众文化与商业化的传播,不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成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它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基础”。或换句话说,“物变成了媒体,而媒体成为物”(Lash and Lury,2007:4)。

按此观点,资本主义发生重大改变,成为“符号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并消费商品-符号(实存的劳动力再不只是商品,而是成为更大的符号-文化认同)。因此,在符号资本主义里,符号-信息过程是有机地体现在商品的生产(以及剩余价值生产)与消费之中,即作为经济过程整体不可或缺的要害(Webster,1995; Castells,1996:ch. 4; Fuchs,2010b)。按此说,传播再次整合进劳动过程,但这次是按更工具性的逻辑整合;而劳动过程亦以有机的方式与传播结合,深入到文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即文化工业)。但是整合能竟其功,必须让这些过程互相联系,使其有助整个体系的运作。在总体层次,“经济与超经济的制度与实作”的整合,即作为符号资本主义结构的关键特点(Jessop and Sum,2006:1)。

按此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演进的历史产物就更是文化政治经济学(Jessop,1990)所关注的对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符号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因为传播与文化不只是附属现象或单纯的上层建筑。正好相反,它们成为整个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结构要素之一。然而,与符号资本主义“理念型”对照,这些符号资本主义所展现的不同形式并不构成各国或各文化的例外状况,而是符号资本主义一般现象的具体形式。符号资本主义一般与符号资本主义在各国表现的具体样态(比如在西欧或美国,或地中海式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这个问题对符号资本主义的理论化工作非常重要,但其分析不是本文意旨所能触及的范畴。符号资本主义是两条变迁轴线交叉作用的结果:其一:在生产关系,向相对剩余价值的抽取转向或使其成建制(即密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二,导入扩大消费的规定,使其支撑紧迫模式运作。

除此之外,符号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主要视以下三个要素而定。第一,福利国家的类型,即用什么方式扩大消费。Esping Anderson 对福利体制的研究归纳出三种福利国家的类型(后来增为四种):自由式(比如美国)、统合主义-国家集权式(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式(比如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以及地中海式(比如希腊)(Esping-Anderson,1990; 1999)。

按此分类,我们还可再分出四种扩大消费的类型:

(1) 扩大消费的基础,一方面是有限的国家干预,另一方面讲究个人分

配。在这的社会中,扩大消费的手段是把社会工资<sup>①</sup>压到最低,工资以货币形式支付给个别工人,让工人用购买的方式取得教育、医疗服务、大众传播产品等等(比如美国)。

(2) 扩大消费的基础,一方面虽然仍是市场关系,另一方面讲究集体分配,比如通过家庭、专业团体等等(像是德国)。在此模式下,各地方的、宗教的或其他组织提供非商品服务(托婴)给弱势团体。

(3) 以国家干预与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福利国家。扩大的消费手段不只以商品形式(工资)支付给每一个工人,也采取非商品形式或天然形式-直接取用教育与医疗服务、大众媒体产品等等(比如斯堪地那维亚半岛诸国)。

(4) 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福利国家,但扩大的消费手段同时采用商品与非商品形式,主要用于家庭与专业或社会组织等(比如希腊)。

第二,符号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根据传统文化在该社会盛行的广度与形式而定。更准确地说,它根据的是传统在现代社会还能发挥的功能而定。汤普逊(Thompson, 1995)主张传统文化负有以下若干功能:解释、合法化、规范与认同。根据汤普逊的说法,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仅余有两项功能尚在运作:解释与认同。在我看来,在典型的西方民主体制里也是如此。相对的,在威权体制里,传统的功能或多或少保有规范性及合法性功能,由国家权力支持。

这就是希腊长期以来的状况。扩大消费用传统的、文化的国族主义,甚至是宗教活动与论述来包装(Tsoukalas, 1983)。在我看来,传统愈是在文化体系里普遍存在(特别是按规范性与合法性功能),扩大消费愈是为超经济因素(比如政治)范畴服务,这也意味着在紧迫性生产方式与扩大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效与非理性的(Charalambis, 1983)。这让扩大消费与紧迫生产方式的距离拉开,取得更高的自主性。

第三,符号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取决于一个社会既有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然而,如我在前面所提,这还需要更多系统性的申论。

#### 四、符号资本主义的两个时期

虽然我们在前文一提再提从 1870 年危机开始到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

---

<sup>①</sup> 所谓的社会工资指的是不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劳动者所得,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社福单位、宗教团体、或劳动者身处社会网络里的其他行动者,以非市场手段、非营利目的提供,比如教育、医疗、住房、托育等等的基本生活所需。——译者注

的这一个资本主义时期,符号资本主义的跨期却有别的区分法,我们可以再细分出两个子时期。第一个时期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及福特主义有很强的关联,概括地说这是符号资本主义的第一时期,或起始时期。这个时期的符号资本主义与两个方面之间存在有机联结:一方面是重工业机械,另一方面是科层化的、单面向的旧媒体。1960年代、70年代间经济与文化危机,以及以多样化生产与消费为标志的全球化新阶段,则触发了第二时期的符号资本主义,无可避免地关联到信息科技和“新媒体”(Davis, 1988; Castells, 1991; Mosco, 2009: 15)。

### (一) 早期符号(或组织)资本主义

符号资本主义的第一时期,用别的观点看是成熟(与早期相对而言)现代性的社会经济内核,实际上是由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现代性向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晚期现代性转型的过渡阶段。如同早先所提,这个时期是由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所型塑。更具体地说,这是由作为一种工作组织形态的福特主义所型塑,导致了大量(紧迫式)生产以及扩张消费(劳动关系以垄断结构规定)(Lipietz, 1990)。

量产制并非福特主义的产物,而是早就出现,存在于工业资本主义早期(Chandler, 1994: 1—14)。按贝尔(Daniel Bell)的说法:“几乎我们所有的重要产业:钢铁、电力、电报、电话、汽车、航空业,都是19世纪就有的产业。”(Bell, 1990: 112)福特主义真正的贡献,在于打造紧迫生产的发展方向,并推而广之至极致。真正前所未有的要素不是量产制,而是扩张消费(Baudrillard, 1990: 112),而量产的商品为这个新现象的铭记。如法兰克福派的学者所说,这个发展让工业量产制转型为符号商品(文化工业)模式(Horkheimer and Adorno, 1986)。但是,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商品-符号甚或是符号商品的扩张消费,是导致成熟或先前各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衰退的主因。

扩大消费作为挪用一切符号价值的过程,在没有营销体制(比如广告)与大众文化的社会里是无从想象的(Wernick, 1991; Ewen, 2001; Lash & Urry, 2007)。营销机制与大众文化打造了劳动阶级在社会中流动的假象,使之产生自以为是上层阶级的认同。换句话说,扩大消费成为塞内特(Sennett)所谓“社会资本主义”的基础(Sennett, 2008: 35—44)。结果是,事实上促成了社会凝聚、和平与政治稳定(Breed, 1958),形同以国家层级实现了系统性的社会组织计划,强化了民族国家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信念,巩固了国族



主义意识形态。

因此,新阶段的发展正是以传播作为社会性组织,以工业化方式大量生产(Horkheimer & Adorno,1986)。这是紧迫生产方式的关键要因。我想布洛维(Burawoy,1979)把工作现场中滋生的共识,与媒体以及扩大消费促成的共识两分的做法并不正确。在我看,两者是互相牵动的。文化工业以工业化量产制生产许多不同的商品,或是符号商品,包括以不同的符号系统组织而成的商品。然而,因为一些原因我无法在本文就此详述,最重要的原因是消费主义的出现与再生必须倚赖动态影像(moving image)的繁盛才行(Pleios,2001:ch. 4)。

组织资本主义的出现,不只伴随着扩大消费的畅旺以及播放设备的发达,也有电影与之后的电视作为社会传播主要角色的出现与蔚为主流,这两个现象同时发生绝非巧合。我们可以把动态影像定义为视觉影像组的连续变化(按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说法,影像把物的更抽象层次表现出来)(Arnheim,1969:135—152)。即,将符号重点抽象再现,作具象的表演。

换句话说,这些新现象发生在传播层次,特别是在文本层次发生的。这一方面在生产层次上,另一方面在扩大消费的层次上,与简单的工人组织资本主义有关。它为后者提供了典型与意义(Debord,1986; Ewen,1999; Pleios,2001:ch. 3)。按此说,不只是电视,甚至是一切记号媒介物都作为消费者资本主义下生活形态之所依。因此,一般文化消费、甚至是动态影像的消费,以及扩大消费,都与福特主义的量产制互生共存(Benjamin,1968)。如果组织资本主义的标志是密集式生产方式,则其公开传播的标志便是动态影像主宰一切。商品-符号-的消费构成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内核。

这里要强调一下,所谓动态影像并不必然指特定的视听媒体形式,比如电影或电视,而是指各种不同再现系统的共同构型,但特别以视听媒体为显例。事实上,电影、电视、影带影碟与当代的数字媒体(比如计算机或网络),都是动态影像承先启后的不同形式,与不同形式的符号资本主义并进(Pleios,1993)。因此,从社会学或文化观点,这些传播形式不应该只内向地相互比较,而应该与各自所产生与从属的社会经济条件作联系加以理解,这些条件支撑着传播形式,反之亦然。按此说,(商品-符号的)扩大消费以及文化工业就与紧迫的组织资本主义紧紧相依,或换个方式说,与符号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紧紧相依。扩大消费与文化工业是为了密集生产方式及其动力而存在,让国家与企业的获利能力与财务状况都能得到长足发展。

如果我们换个方式看,扩大消费与文化工业(特别是视觉媒体一类的文化重工业)的成本可由高生产力模式支应(Matsuyama, 2002)。以全国规模作严密的系统性组织的条件下,这样的关系特别易于出现。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深究,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论:“传播形式”再不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是确保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生产运转不息的条件,也就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换句话说,虽然资本主义在移去超经济因素后,经济上巨大的不平等使其四海皆同(Wood, 1997),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超经济的关系有机地镶嵌入经济关系中,特别是在生产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生产中。

前瞻资本主义的未来,最有趣的问题是这个体系的限制为何,以及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而崩坏成为历史遗迹。顺着这个问题再思考,大量生产与密集式组织资本主义能欣欣向荣的三个条件便是:(1)大量消费,以保证大量生产制的存续。所以扩大消费的功能在于作为密集式发展的引擎。(2)为了摊平扩大消费的成本,便要使扩大消费对生产力提升以及剩余价值的增量有积极贡献,从而巩固阶级序位。(3)把社会作全国规模的系统性组织,并以此为基础。

这三个条件一旦松动,即导致密集式组织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体制的崩坏(Lash & Urry, 1987; Lipietz, 1990)。差异化的消费者需求以及弹性生产制成为60年代晚期出现的重要产业发展趋势,并且持续在进行(Jameson, 1984; Harvey, 1989; Castells, 1991; Mosco, 2009:15)。1968年的社会骚动似乎是对大量消费的反扑,商品-符号以及符号商品的消费一转变成多样化的、碎裂化的以及/或者是个人化的(Perniola, 1991:30—40)。调节学派指出了扩大消费的增速为经济发展与利润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但最终反而使这关系翻转,利润率降低使得阶级差异性也不那么明显了,统治阶级的因应之道是削减福利政策,以及将资本移至海外寻找更便宜的要素投入(Lipietz, 1990; Vergopoulos, 1999)。因此,国家规模的组织资本主义便因为当前的全球化新阶段而发生改变(Sassen, 2009)。

虽然这三个条件彼此重要性相当,但论者经常指出其中有一或二在推翻量产体系上是主要的催化剂,在全球化脉络下更是特别强调扩大(文化)消费之重要(Sassen, 2009; Sennet, 2008)。然而,我们必须集中心力关注体系在个体层次上的核心问题。如同早先所提,借由符号功能巩固受雇者、组织与生产逻辑的纪律,同时提升生产力或获利率,正是消费的能力所在。因此,探问体系的解组,必须指认在符号-传播层次上及其社会经济功能的变迁

为何。

商品-符号与符号商品的扩大消费,可以有两种意义,后者已经由霍尔(Hall,1980)阐明,但是总的来说它应是一种符号传播过程,以社会作用论,符号价值的占有最是重要。符号商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作为经济过程,若不首先理解其中的符号传播面向,便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Hall,1980)。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解释符号商品的功能,视之为社会诸条件框架下的文本。这功能的作用在提供个体一种幻想,让他自以为在社会中流动,享有不受规制、彰显一己个性的自由。除此之外,特别是霍尔(Hall,1980)所说的视觉生产,根本的解释机制即隐含义(connotation)、个人经验与期望。因此,按此说再延伸:大量生产已经无法满足它所曾经建立的整个体制。这个事实对体系的基础(比如,量产制)造成直接的问题。另一方面,持续成长的扩大消费,在社会需求之助下作为体系的核心要因并且为体系运转贡献良多,现已经无助于增长,甚至造成获利能力与发展的衰退(Lipietz,1990)。

## (二) 深度符号(或解体)资本主义

紧迫式(以及符号)组织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成,在于生产体系的效率与成本之间出现失衡。换句话说,扩大消费有助于经济体系生产力的发达(成长)。当扩大消费的成本不变或(大量)增长,生产力水平也不变或增长。

这样的发展表现为利润的下降(“利润挤压”)(Marglin & Bhaduri, 1990)。为了要抓紧阶级规律,此处有必要多做着墨。如前述调节学派的分析所示,该危机实际上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生产力不足”或生产力增长放缓的危机(Lipietz,1990; Cook,1990:79—84)。虽然劳动阶级享受到扩大消费的益处,但并没有按其所打造的资本主义目标发展(增进紧迫式生产的生产力或获利能力)。它在既有的阶级结构下,竟成为脱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文化过程。

一开始危机的因应手段有两种,然而并未对症下药:(1)将事业向海外移动,资本得以找到更便宜的劳工(Elam,2000:64—65),以及/或者(2)缩小先前扩张消费的规模(Lipietz,1990; Pond,1989)。然而,问题根本的解方是要鼓动受雇者的“工作兴致”,让工作能有助生产力或获利能力增长,此即先前扩大消费的建制。也就是,符号资本主义的逻辑要延续,但促成经济目的的手段要调整。换句话说,生产体系该按消费逻辑(商品-符号与符号商品)的改变方向进行重组,社会行动也要整个翻转。这个改变的关键要因在差

异化-个性化,公众主动的互动以及单向行动的科层制解体,以及公众的符号与文化资本活化等等(Lash & Urry,1994)。

生产体系面临“生产力不足”的危机势必要调整,并且得靠两个同时发生且互相牵引的体系转型来促成:其一是劳动者的技术组成(Robins & Webster,1988; Toffer,1982; Webster,1995:ch. 1),其二是劳动者的社会组成(Lipietz,1994; Mouriki,1994)。以传播与信息科技为基础的自动化数字技术的导入(Richta,1976; Castells,1991; Mosco,2009:15),促成生产多样化以满足不同消费需求(Davis,2001)。在扩大消费的领域内操作传播“竞赛”创造了这一切,并且作为维持与扩张消费的关键要因(Bauman,2005:16—33; Pleios,2001:ch. 3)。

必须强调的是“新媒体”的出现,比如因特网,已经溢出生产的领域,并且不单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它更是这样一个大环境的结果:为了民主化的需要以实现传播过程的个人化,技术发展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然而这样的需要在“旧媒体”时代已有发展。早在“新媒体”出现以前,“旧媒体”就一直因为其中心化与单向度的本质而作为理论的、社会的、政治的批判对象(Baudrillard,1986; Manovich,2001)。

相较于“旧媒体”的发展方向,符号商品与商品-符号的消费逻辑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展开,也是很合乎逻辑的。文化消费的逻辑在:个性化的选择,参与的能力,以及个人对意义的主动涉人与协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文化消费领域里出现完全一样的民主参与逻辑(Brown,1992),并且民主化是扩大消费中的一种恒久内在的过程(McCracken,1988)。

至于本文关注的劳动组成体制之所以转型,正是为了鼓舞工人的“兴致”而导入所谓的后福特主义工作组织形式(Lipietz,1994; Mouriki,1991)。相对于福特主义的“单一逻辑”,后福特主义并不坚持单一的组织模式,而是包括许多不同且互补的设计(Hirst & Zeitlin,1991)。如同阿明(Amin)强调的:其实很多人质疑福特主义的理想型是否真的为主流模式。批评者认为国与国之间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使福特主义主流的单一逻辑站不住脚(Amin,1994:11)。柯瑞亚特(Benjamin Coriat)也认为全球规模的福特主义是单一福特主义模式(即美式量产制)扩张的结果(Coriat,1997:242)。如果我们体会到后福特主义的目的在鼓励工人主动参与工作,并且以全球、各国与在地不同层级的不同思维与不同生活方式为特征,那么后福特主义的复数逻辑就有其意义。其变形为何,在总体层次要看“资本、劳工或国家何者对结构

重整的影响力最大”而定(Lash & Bagguleg, 1988)。

尽管后福特主义具有多样性,它的根底仍是要打造新形态的劳动干劲,相对于福特主义劳动组成采用的是“生产纪律”,后福特主义则是“生产积极性”(production initiative)(Pleios, 1996)。“生产纪律”需要受雇工人就生产逻辑与目的展现志愿配合的纪律,以满足工人与雇主、个别事业与总体经济、经济与国家的共同利益。若待满足的是人人不同的特定目标与个性化的生活形态,则需要更多空闲时间与扩大消费来支撑,而这要视生产过程的效率而定。

相对的,“生产积极性”要把工人的生产参与度与他追求个人目标的兴致相结合,使公司的成功、事业的整个流程都成为员工个人关心的事。“生产积极性”的标志就是“更高的公司忠诚度”以及“更愿承担责任的员工”(Hickox and Moore, 1992: 109)。就这一点来说,不只是设定物质的经济目标,还有操控权与威信的行使、特定观点与品味的投射,总之是要完全彰显个人特质,尽在其中。也就是说,后福特主义的特性即在创造一个水平科层,把行政监管责任丢给工人自己,同时还有个人的志愿投入、水平协作以及参与,有效地运用教育、符号与文化资本,让工人不只自诩为生产者,同时也是公民与消费者(Lipietz, 1997; Mouriki, 1994; Senett, 2008)。

水平科层的导入,加上其他要因比如责任制等等,配合新技术的使用,造成生产过程中的阶级与其他社会差异好似消失了的假象。这样一来,一度为扩大消费所担负的职能,如今改由生产过程挑起,运用后福特主义的制度设计推进。按总体观点来看,这是首要的变迁,尽管隐微不显。相较之下较为人所注意的变迁,是(全球)生产体系的中央单位掌握了更强大的力量与职能。Sennett 观察到:“信息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指挥权的调整与解释权由新形态的中央集权取代。”(Sennett, 2008: 39)莎逊(Saskia Sassen)也指出,当前(全球)体系中中央单位的功能,特别在金融与新经济领域,愈益强化(Sassen, 2009: 99—100)。这样一来,新形态劳动组成的这两个面向合流,不是朝军队化前进,而是变成“黑帮”或“游击队”式的结构,这可以在广告业看到显例(Avidsson, 2007)。这和组织资本主义的军队结构类似,但缺少公民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类型的承诺,也没有相当的价值体系或限制,并且超越了有效性与成功的考虑。桑内特形容这劳动社会组成的新形式为“MP3 组织”,与组织符号资本主义的金字塔式科层形态不同(Sennett, 2008: 65—88)。这样的劳动形式可因应新技术组织(数字自动化技术),以及多样、弹性与持续变动的生产

的需要,相反也是(Amin,1994:14—15;Davis,2001)。

因此,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及初期符号(或组织)资本主义相较,高度发展(或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的主要不同,在于劳动的技术组成与社会组成同步变迁。这不像19世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劳动的技术组成扮演吃重角色;而初期符号资本主义以劳动的社会组成至为关键。但到了深度符号资本主义(或解组织资本主义),劳动的技术与社会(再)组成同样重要。技术变迁与新形态的劳动社会组成并进,反之亦然,两者的根据都是“生产积极性”。要把(生产)技术内含的技术层次与传播社会层次分离是不同能的,反之也无法。这正是技术与传播的结合体。因此,劳动工作组成的重要面向,即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构成,可用来弥平遮饰财产关系造成的不平等。这个遮饰的功夫是由扩大消费通过符号手段进行,确保工人的纪律与主动投入,维系紧迫生产的目标与理性。

待分析的切入点有若干,其中有二在本文中最重要的。首先,从时间、空间与社会的观点观之,劳动与生产领域发生的变迁(至少在结构与生成原因),是源自商品-符号与符号商品的扩大消费领域,其发展特别拜各类传播模式的“竞争”(game)所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生成了后福特主义,而非相反。或至少在加尔特曼(David Gartman)看来,后现代主义“辩证地影响了这经济发展”(Gartman,1998:119)。也就是,生产方式的变迁从扩大消费的领域出发,与生产活动融入整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新资本主义”内,传播不只是角色(以及整个上层建筑)维持不变,它还以生产活动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之姿,在新的社会形态/结构中蹿起。传播形式的变迁指引且补充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迁。所以说,传播不仅没有式微,反而愈益有机,终使新的资本主义以符号资本主义的形态作为标志。

甚且,扩大消费与社会组织中介的传播推动生产规律变迁的事实,多少意味着一部分的扩大消费过剩了。生产变迁,特别是劳动的社会组成变迁,担起了扩大消费的职能,至少按经济观点看是变得更“理性”了(包括私有化与消费的个性化)(Hamnet,1989)。这不只是降低了消费的成本,提升了生产的获利,也促成劳资之间更坚定的共识与目标认同,从而有效地维持稳定和谐。这特别在个体层次为真,甚至不需要福利国家惯常操作的长期公共政策(以垄断规模规制劳动)加以安排(Jessop,1994; Loader and Burows, 1994)。其次,自动化生产动用的(数字)科技在结构与功能上,与消费中采用科技的近似(Sennett,2008; Barrett and Davidson,2008; Fuchs,2010b)。这

和符号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差别,符号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完全不同于扩大符号商品与商品符号消费活动所使用的技术(Burawoy,1979)。而这导致许多副作用。

首先,在文化消费领域内养成运用新科技的能力以及新科技的文化,正好在工作领域(劳动或在职训练)中派上用场并作为必备技能,反之亦然(Green,Reid and Bigum,1998:22; Gualerzi,2010:147)。其次,这造成一种结果:和劳动市场所要求许多个人条件(或工作资历)相比,正式资格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而新的平等主义的兴起,各科层层级要求的不同知识与资历原本有的等差也被消除了。有如图斯费尔得(Thursfield)所指出的:“举例来说,技术创新也许促成工作内容去技术化,但并不见得工人也去技术化了,虽然工人的技术确实可能在此过程中贬值。而且,尽管工人没有取得正式资格,仍可具备特定职类工作要求的专业技术”(Thursfield,2003:47)。在后福特主义的工作组织中,为了让工人有效率地工作,正式教育训练提供给工人不只是工作技能与知识,更是工作品性(ethos)与公民意识(Hickox and More,1992:108,110)。这意味着广义地看,职场所需的整套技能,就是社会化过程(Pleios,2004)。这在“新媒体”、文化消费与公众传播中特别清楚,在因特网上尤然。如同普列特(Poulet)以新闻业与因特网的互动为个案所指出的,网络上的知识相当于就不同议题发表的业余评论,一般而言具有扩大平等主义的作用,推翻了建制化的正式科层知识(Poulet,2009:175—178)。所谓的成功,已不限于在特定领域表现出色,而是要能受到公众欢迎。这也发生在生产流程中,但通过后福特主义商业活动一连串复杂的互动而实现(Sennett,2009; Terranova,2004:20—27)。

第三,在以上复杂的互动影响后,导入新科技到生产中,特别是在体系中央单位的功能强化的年代,都使个别部门的主动性以及在直接决策上扮演的角色分量愈来愈低(Sennet,2008; Sassen,2009)。这在传播领域中亦可见得,意味着MP3结构成为更普遍的社会行动结构。各功能单位的独立性被压倒了,特别“新媒体”的文本具有这个特点。不同的内容类持续整合,同化程度前所未见(Hill,2007)。几乎所有形态的内容都被卷入新典范中,如信息社会理论家所说,信息已不单是信息,而是“愉悦信息”(Pleasant Information)。内容经过数量-技术面向的编排,即成信息(Webster,2005)。从质的观点看,不同的文本可以共存并且分享流通,正因为它们有相同的质量作基础。在供给新知的同时,也娱乐使用者。换句话说,新媒体文本是按“娱乐

信息”的逻辑构成(Thussu, 2007),而这趋势会使不同类型的内容以及不同文本彼此间的差异性降低(Pleios, 2011: ch. 2)。而内容类型间的差异主要是数量与技术层面的,而不再是文本内容的。

第四,生产领域的这个演变主要是在符号与功能层面展开的,而较少在经济与结构层面上作用,在符号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也是如此。社会阶级与经济等级的差异,以及文本层级的“论述次序”(Fairclough, 1995: 78)的差异,作为事实如今大大缩小了。这样一来,MP3 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各层面的聚合程度提升了,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传播、经济与文化间的动态互换持续不停(Toffler, 1982; Fuchs, 2010a)。不同之处在于,托夫勒关注的是现象的功能层面,而非根据社会不公与续存于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的事实层面。传播与生产的聚合与交换可以有多种形式。

福克斯(Fuchs, 2010a)指出,网络用户为了娱乐目的而免费的劳动被产品营销所利用,比如使用者的娱乐活动变成为利润而工作。尽管这个聚合仍有其他重要面向,其主要问题仍是剩余价值生产。好比(数字)传播强化了劳动力的生产力,也就减少再生产所需的时间,这不只发生在剩余价值实现(比如交易)的领域。除此之外,“新媒体”,特别是因特网,是根据电话模式(mode of telephone)所创造出来的,他们先后脱胎自企业运作的需要,也反映了其组织与关系(Garnham, 2003)。

然而,按此进路,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分别真的消失了,甚且,工作与传播间的分别也消失了,这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现象的功能层面上。因此,同时作为生产数据与传播手段的“新媒体”,在使用时无可避免地让劳动逻辑与娱乐逻辑联系在一起,让生产逻辑与消费逻辑联系在一起(Toffler, 1982; Fuchs, 2010a)。在下班与上班、休闲与工作、休闲空间与工作场所中习得的技术性与制度性能力,则扮演了辅助性角色。结果是,工作被视作追求个人目标的过程,而个人娱乐与自我实现作为职业、作为一种活动,为主体提供有用的动机。在我看,这已经与马克思经济学字面上的意义分道扬镳了,但另一方面,则可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哲学的再出发。

## 五、结 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要通过对社会过程的分析把握实践的重要意义,即检讨并参与社会变迁的过程,这是马克思在他著名的《费尔巴哈论



纲》第十一条所指出的。社会科学不可能遗世独存(而又能对所从出的世界提出解释),必然是为了改变与推进社会而存在。按此理路,在百工各有职司的社会里,社会分析的社会效用与存在的功能才得完满。

所以问题是,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的社会变迁是否为真?根据前述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生产关系的发展翻新了生产关系、权力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管理,甚至使之生成假民主的样态(或最少是徧狭的民主)。水平式科层、劳动力参与、行政机关职能移转给劳动力等等都是变迁的症候。最重要的是,甚至这个变迁有机地与某种传播形式结合,即和所谓的“信息社会”切合(Webster,1995; Castells,1996; Poster,1990)。在深度符号资本主义里,变迁的核心方向是指向权力关系与生产管理,而这个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的侧面确实在后福特主义的提问取径中被忽略了(Vallas,1999; Keneett,2003)。与之不同,在初期符号资本主义时期,这个变迁首先是消费关系的,其次才是权力关系,这反映了初期符号资本主义与前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间的稳固关系。然而,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迁则是初期符号资本主义变迁的延续。

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权力关系与管理手段,也许就是最根本的、最稳固的阶级关系与社会不公义(Mann,1986),它不只由经济手段锻造,同时也是(主要是)符号构造的结果(Mouzelis,2008:10)。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与初期符号资本主义相较,权力关系变迁似乎对深度符号资本主义更重要。这在整体上与权力关系有关,其他形式的生产关系则作为手段。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因为它们的符号化使得权力关系多少与其他生产关系形式一样重要,或更重要,尽管事实上这个过程的目的在遮饰后者。这样的势态或许支持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批评(以及后结构主义取径),他们认为生产(与消费)关系是为权力关系服务的,反则不然(Baudrillard,1990)。按此说,我们应把后现代社会理论视为深度符号资本主义事实的一种扭曲反映,而不是对历史真相的断言。

也就是说,(深度符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有机地与信息社会的“传播形式”结合。这个变化,如同早先在扩大消费发生的一样,用来隐瞒阶级不平等、资本积累/更多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最重要的是,“传播形式”再不被视为次于生产关系的被动因素。

换句话说,深度符号资本主义中的传播成为保存或扰动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的指标。当然在过去消费民主化的阶段,某些类似的部分已经

发生过了。然而,这次景况大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互动再不是受制于总体或中层层级,比如全国经济体制,而大部分是发生在个别企业或区域经济的个体层次,并且作为结果来看,让个别企业层级的标准与一国层级的标准相配合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国家层级的标准大量地被取消了。

这结论让我们回到一个基本问题。总体层次的发展不见得主导了社会变迁的过程。换句话说,若传播部门发生了恰当的变化,可能导致“生产关系”也出现改变。在全国或全球社会(或全球规模的阶级构成[formation])的层级提出总体的规定再没有必要了。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社会变迁(包括阶级关系变化)可以借由深度符号资本主义下发展的各种传播方式来促成;其次,这可以在个体的经济结构或个别企业操作。这样的变化可以解释当代相对主义的历史基础。换句话说,再不需要预先掌握权力才能改造世界,正如哈洛威(John Holloway)所主张的(Holloway, 2006: 340),而是可以由下而上、部分点滴地改造世界。哈洛威注意到今日社会关系可用于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他犯了一个错误,按我看来,他忽略了技术力量,特别是传播力量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

社会变迁可以从经济系统的个别部分下手来达成,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把所谓的经济系统放大到全国或全球(比如以全球化的脉络来思考)。这不是说总体层次的规范已无必要。若没有在社会政治领域发生相当的变迁,职场的社会变迁断无可能,而反之亦然。而联系这两个领域的是草根民主的发展趋势。如果深度符号资本主义以及信息科技与职场水平科层体制的发展同步并进,则经济领域的民主化也一样要有政治领域的草根民主配合才有实现可能,反之亦然。在我看来,运用“新媒体”(比如部落格、社交媒体等等)抗议以及操作符号政治,对草根民主的目标是必要的,特别因为“军队化”组织经济与科层式政党政治都已宣告失败。这可以部分解释不同国家发生的“愤怒”(indignados)运动(都植基于“新媒体”),比如埃及、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希腊与美国。

希腊的国家中心制经济体系已然失败(Sakellariopoulos, 1992; Kazakos, 2001),同时它的中心化政党民主制也破产(Lyrintzis, Nikolakopoulos and Sotiropoulos, 1996)。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何过去两年(2010—2012)“新媒体”在扳倒当前政治体系合法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对各种草根政治组织与动员的出现同样意义重大。如果欠缺“新媒体”与新形态的内容,这些运动都是无从想象的(Labrakou, 2011)。希腊的运动已被

称为“脸书版本的1968年5月”。但社会变迁的问题仍未解决,除非我们在政治领域与生产关系上落实草根的规定。

政治与经济的草根民主都无法单靠“新媒体”实现。我想“新媒体”不论用在政治过程或生产过程中,在今日它的根据都还是“奇观”。影像/奇观虽然运作的方法不同,仍在“新媒体”中扮演关键性的结构角色,一如在“旧媒体”与“扩大消费”时期那样。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家已不再是变迁的促成者,而是其工程师。在信息科技横流的时代,社会科学家的职能与革命情怀聚合成为新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 参考文献:

- Adorno, Theodor and Horkheimer, Max. 1987. *Sociology. Essays*. Athens: Kritiki (in Greek).
- Adorno, Theodor and Horkheimer, Max. 2001.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Meenakshi Durham and Douglas Kellner, 71—101. Oxford: Blackwell.
- Aglietta Micha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Verso.
- Alexander, Jeffrey. 1987.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llen, Robert. 1992. Audience-Oriented Criticism and Television. In *Channels of Discourse, Reassembled: Television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Robert Allen, 101—137. London: Routledge.
- Althusser, Louis. 1990. *Positions*. Athens: Themelio (in Greek).
- Amin, Ash. 1994. Post-Fordism. Models, Fantasies and Models of Transition. In *Post-Fordism: A Reader*, edited by Ash Amin, 1—39.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 Arendt, Hannah. 1959. *The Human Condition. A Study of the Central Dilemmas Facing Modern Man*.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 Arendt, Hannah. 1991.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Media Culture*, edited by Kostas Livieratos and Takis Fragoulis, 121—126. Athens: Alexandria (in Greek).
- Arvidsson, Adam. 2007. Creative Class or Administrative Class?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7(1): 8—23.
- Barrett, Michael and Elizabeth Davidson. 2008. Exploring the Diversity of Service Worlds in the Service Economy.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Service Economy: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edited by Michael Barrett, Elizabeth Davidson,

Catherine Middleton and Janice DeGross, 1—12. 2<sup>nd</sup> edition. New York: Springer.

Baudrillard, Jean. 1986. *Requiem for the Mass Media*. Athens: Eleftheros Typos (in Greek).

Baudrillard, Jean. 1990.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Athens: Alexandria (in Greek).

Baudrillard, Jean. 2003.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London: Sage.

Bauman, Zygmunt. 2005.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Poor*. Berkshire: McGraw Hill.

Bell, Daniel. 1999.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Benjamin, Walter. 1968.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edited by Walter Benjamin and Hannah Arendt, 219—253.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Blackledge, David and Hunt Barry. 1995.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thens: Metechmio (in Greek).

Bocock, Robert. 1997. *Consumption: Key Ideas*. London: Routledge.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eed, Warren. 1958.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Social Forces* 37(2):109—116.

Brown, Doug. 1992. Doing Social Economics in a Postmodern World.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0(4):383—403.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anuel. 1991.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ed Society*. Oxford, UK: Blackwell.

Chadler, James Jr. 1994.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ralambis, Dimitris. 1983. *Clientelism and Populism*. Athens: Exandas (in Greek).

Cook, Phillip.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Locality*. Winchester, MA: Unwin Hyman.

Coriat, Benjamin. 1997. Globalization. Variety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edited by Roger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240—264.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urran, James. 1979. Capitalism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1800—1975. I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 and Janet Woollacott,

7—11. Beverly Hills: Sage.

Davis, Stanley. 2001. *Management: Managing the Future Now*.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Debord, Guy. 1986.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 Athens: Eleftheros Typos (in Greek).

Demertzis, Nikos. 2002.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isk, Publicity, Internet*. Athens: Papazisis (in Greek).

Elam, Mark. 2000. Puzzling out the Post-Fordist Debate: Technology,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Post-Fordism. A Reader*, edited by Ash Amin, 43—70. Oxford: Blackwell.

Engels, Friedrich. 1978a. Letter to Paul Ernst. In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Engels Friedrich*, Vol. 10, 426—428. Sofia: Partizdat (In Bulgarian).

Engels, Friedrich. 1978b. Letter to Conrad Schmidt. In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Engels Friedrich*, Vol. 10, 435—442. Sofia: Partizdat (In Bulgarian).

Ewen, Stuart. 1999. *All Consuming Images*. New York: Basic Books.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wen, Stuart. 2001.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1981. *Toward a Theory of Mass Media*. Athens: Epikouros (in Greek).

Fairclough, Norma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Fuchs, Christian. 2010a. Grounding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Karl Marx.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4(15): 15—41.

Fuchs, Christian. 2010b.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 179—196.

Garnham, Nicholas. 1979.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2): 123—146.

Garnham, Nicholas. 2003. *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thens: Kastaniotis (in Greek).

Gartman, David. 1998.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st-fordism?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1): 119—137.

Gerbner, George. 1967. Mass media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edited by Frank Dance, 40—57.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

ston.

Golding, Peter and Graham Murdock. 2001.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25—52. Athens: Patakis (in Greek).

Green, Bill, Joe-Ann Reid, and Chris Bigum. 1998. Teaching the Nintendo Generation? Children, Computer Culture and Popular Technologies. In *Wired Up: Young People and the Electronic Media*, edited by Sue Howard, 19—41. London: UCL Press.

Gualerzi, Davide. 2010. *The Coming of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Path of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A Long-Run Perspective in the Late 2000s Recession*. New York: Routledge.

Hall, Stewart.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ew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507—517. London: Hutchinson, 1980.

Hamnet, Chris. 1989. Consumption and Class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In *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edited by Chris Hamnet, Linda McDowell and Phillippe Sarre, 199—213. London: Sage.

Harris, Jess and Catherine McDonald. 2000. Post-Fordism,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Personal Social Services: 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 and Brita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0(1): 51—70.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Blackwell.

Herman, Edward and Noam Chomsky. 2001. A Propaganda Model.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Meenakshi Durham and Douglas Kellner, 180—217. Oxford: Blackwell.

Hickox, Mike and Moore, Robert. 1992. Education and post-Fordism: A New Correspondance? In *Education for Economic Survival: From Fordism to Post-Fordism*, edited by Phillip Brown and Hugh Laude, 95—116. London: Routledge.

Hill, Annette. 2007. *Restyling Factual TV*. London: Routledge.

Hirst, Paul and Jonathan Zeitlin. 1991.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versus Post-Fordism: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 1—156.

Hobsbawm, Eric. 1978.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Marxism Today*, September: 279—286.

Hobsbawm, Eric. 2008. *The Age of Revolutions. 1789—1848*. Athens: Cultural Institute of National Bank (in Greek).

Holloway, John. 2006.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Athens: Savalas (in Greek).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Adorno. 1986. *Th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Athens: Ypsilon/books (in Greek).

Horkheimer, Max. 1976.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Critical Sociology: Selected Readings*, edited by Paul Conner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Jameson, Fredric.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9—92.

Jessop, Bob.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Cambridge: Polity.

Jessop, Bob and Ngai-Ling Sum. 2006. *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Jessop, Bob. 1994. The Transition to Post-Fordism and the Sc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 In *Towards a Post-Fordist Welfare State?* edited by Brian Loader and Roger Burrows, 13—17. London: Routledge.

Jessop, Bob. 2002.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Kazakos, Panos. 2001. *Between State and the Market. Economic Policy after War in Greece 1944—2000*. Athens: Patakis (in Greek).

Kennett, Patricia. 2003. Exclusion, Post-Fordism and the “New Europe”. In *A New Europ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Exclusion*, edited by Phillip Brown and Rosemary Crompton, 14—32. London: Routledge.

Lash, Scott and Paul Bagguley. 1988. Labour Relations in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A Five-Nation Comparis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3): 321—338.

Lambrakou, Zoi. 2011.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The Case of Collective Action with the Use of New Media in Greece 2007—2011*. Unpublished MA thesis. Athens: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in Greek).

Lash, Scott and Celia Lury. 2007.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The Mediation of Things*. Malden MA: Polity.

Lash, Scott and John 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WI: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ash, Scott and John Urry.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Lipietz, Alain. 1990. *Mirages and Miracles*. Athens: Exandas (in Greek).

Lipietz, Alain. 1994. Post-Fordism and Democracy. In *Post-Fordism: a Reader*, edited by Ash Amin, 251—279.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Lipietz, Alain. 1997. The Post-Fordist World: Labour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and Global Ecolog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1): 1—41.

Loader, Brian and Roger Burrows. 1994. Towards a Post-Fordist Welfare State? The Restructuring of Britain, Social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Welfare. In *Towards a Post-Fordist welfare state?* edited by Brian Loader and Roger Burrows, 1—13.

London: Routledge. Lyrantzis, Christos, Ilias Nikolakopoulos, and Dimitiris Sotiropoulos, 1996. Introduction. In *Society and Politics: Aspects of the Third Greek Republic 1974—1994*, edited by Christos Lyrantzis, Ilias Nikolakopoulos and Dimitiris Sotiropoulos, 19—42. Athens: Greek Socie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melio Publishing (in Greek).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 1760.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ovich, Lev.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arion. Marglin, Stephen and Amit Bha-duri. 1990. Profit Squeeze and Keynesian Theory. In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edited by Stephen Marglin and Juliet Schor, 153—186. Oxford: Chalderon Press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75. *For the Art.* Athens: Exandas (in Greek).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1978. *The German Ideology, Vol. 1.* Athens: Gutenberg (in Greek).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2001.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Ruling Idea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Meenakshi Durham and Douglas Kellner, 39—42. Oxford: Blackwell.

Marx, Karl. 1978a. Towards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Vol. 7*, 113—291. Sofia: Partizdat (In Bulgarian).

Marx, Karl. 1978b. Letter to Franz Mering. In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Engels Friedrich, Vol. 10*, 477—472. Sofia: Partizdat (In Bulgarian).

Marx, Karl. 1979. *Capital.* Sofia: Partizdat (in Bulgarian).

Marx, Karl. 1983.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Athens: Kalvos (In Greek).

Matsuyama, Kiminori. 2002. The Rise of Mass Consumption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5): 1035—1070.

McCracken, Grant. 1988.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the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2<sup>nd</sup> ed.

Mouriki, Alik. 1994. Politics of Reform and New Forms of Organization of the Labour. *Contemporary Issues*, vol. 54 (in Greek).

Mouzelis, Nicos. 2008. *Modern, Postmodern Social Theorizing.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ker, Martin. 2000.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olog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Making of a Division of Labour.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 124—146.

Perniola, Mario. 1991. *The Society of Simulacra*. Athens: Alexandria (in Greek).

Plamenatz Petrov, John. 1963. *Man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Pleios George. 2004. Labour and Meaning in Late Modernity: The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Image.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B2004 (114): 61—87 (in Greek).

Pleios, George. 1993. *Moving Image and Artistic Communication*. Athens: Delphini (in Greek).

Pleios, George. 1996. The Crisis of Education in Mature Capitalism. *The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19: 143—185 (in Greek).

Pleios, George. 2001. *The Discourse of Imag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thens: Papazisis (in Greek).

Pleios, George. 2011. *The Society of Pleasant Information. Modernity and the News*. Athens: Kastaniotis (in Greek).

Polanyi, Karl.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Pond, Chris. 1989.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ealth and Poverty. In *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edited by Chris Hamnet, Linda McDowell and Phillipe Sarre, 43—77. London: Sage.

Poster, Mark.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oulet, Bernard. 2009. *The End of Newspapers and the Future of Information*. Athens: Polis (in Greek).

Richta, Radovan. 1976. *Civilization at Crossroads*. Athens: Rappas (in Greek).

Robins, Kevin and Frank Webster. 1988. Cybernetic Capitalis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veryday Lif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edited by Vincent Mosco and Janet Wasko, 44—7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Rueschemeyer, Dietrich. 1986. *Pow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Polity Press.

Russell, James. 2006. *Double Standard*.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akellaropoulos, Theodoros. 1992. *State and Social Interests during the '80s*. Athens: Kritiki (in Greek).

Sassen, Saskia. 2009. *A 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 Athens: Metechmio (in Greek).

Schiller, Herbert. 1973. *The Mind Managers*. Boston: Beacon Press.

Schultz, Theodore.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1):1—17.

Sennett, Richard. 2008.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Athens: Savalas (in Greek).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Thompson, John.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Thursfield, Denise. 2003. *Post-Fordism and Skill: Theories and Perceptions*. Burlington: Ashgate.

Thussu, Daya Kissan. 2007. *News as Entertainment. The Rise of Global Infotainment*. London: Sage.

Toffler, Alvin. 1982. *The Third Wave*. Athens: Cactos (In Greek).

Tsoukalas, Konstantinos. 1983.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ome General Issues. In *Hellenism and Greekness*, edited by Demetrios Tsatsos, 37—48. Athens: Estia.

Vallas, Steven. 1999. Rethinking Post-Fordism: The Meaning of Workplace Flexibility. *Sociological Theory* 17(1):68—101.

Vergopoulos. Kostas. 1999. *Globalization. The Great Mirage*. Athens: Nea Synora (in Greek).

Webster, Frank. 1995.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Wernick, Andrew. 1991. *Promotional Culture: Advertising, Ideology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Williams, Raymond. 1978.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2001.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Meenakshi Durham and Douglas Kellner, 152—165. Oxford: Blackwell.

Williams, Rosalind. 1991. *Dream Worlds: 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od, Ellen M. 1997.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or Capit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3):539—560.

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sup>①</sup>

## 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 过程关系本体论

王满满(译),吴畅畅(校)

[导读]随着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快速发展,网络已不仅仅作为一种新近的技术形式而存在。作者文中的“网络隐喻”正是这样被大规模、弥漫性地转移至几乎全部的当代生活,成为当代社会的模型。从“9·11事件”的恐怖主义网络到引发信贷恐慌的金融网络,网络隐喻无时无刻不在,同时也在积极建构人们试图理解的世界。在这样一个联系不断增强却仍然坚定地执着于追逐剩余价值剥削的世界里,权力的批判该往何处去?作者正是从这样一个疑问开始其论述的,即网络隐喻是如何塑造我们对权力的理解的?

作者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是以卡斯特等为代表的网络理论家,就网络理论家的网络本体论与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进行了清晰的比较及批判,并重建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文章主要就网络理论家如何在“排斥主题”下组织批判进行了阐释与驳斥,作者认为网络隐喻与排斥具有同源性,它转变了人们对社会和政治批判的认知,尤其是极大地削弱了对权力的理解和批判,特别导致了一种对权力的单向度理解,容纳/排斥的二元逻辑几乎无视剥削关系。排斥主题的局限呼唤重新将剥削主题引入当代社会批判。作者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如何通过“生产”范畴来物化过程、及其对内在关系和矛盾的独特理解来发展其剥削理论,使其不仅不是历史遗迹,反而

---

<sup>①</sup>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国际传播、非物质与流动劳动力。他从2006至2008年工作于南非的移民世界电视(MWTV),2007至2008年是韩国首尔圣公会大学社会学系的访问研究员。robp@sfu.ca

非常适合于理解和批判信息资本主义背景下剥削的强化与扩大。

最后,作者总结了本文的两个主要论点:1. 网络隐喻会导致社会批判聚焦于排斥而忽视剥削。排斥的确存在,但作为社会批判中心议题的是剥削。2. 说明在现代信息资本主义中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为何仍然与批判权力有关。

网络隐喻是一种当代迷思,超越政治、去历史化,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和空间,一个不同于先前所有时代的信息时代,通过消除复杂性和矛盾性来创造一种“欢快的明晰”。正如文中所说,在信息资本主义中,排斥变得更加明显和易于辨认,剥削却愈发难以通过现代全球生产链来追踪测量。网络隐喻和排斥同样具有水平的、空间的特征,这让排斥主题占据了批判主流。罗伯特·普雷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没有采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为所谓“联系主义者”世界建立一个剥削理论,而是创造性地选择了指引网络理论家和马克思思考的共同的过程本体论框架,清晰地阐释了马克思剥削理论与信息资本主义权力批判的衔接。普雷这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他的分析角度和思路,基于共享本体论视角的分析与批判,使得本文的分析逻辑性强又有说服力,并让卡斯特等网络理论家的网络思维与排斥主题批判在不断发展的、或者是“回来的”马克思剥削理论面前疑点重重。作者没有否定排斥的存在和重要性,而是强调了走出网络隐喻的迷思,重返社会现实,重新理解和思考网络、排斥与剥削的内在关系,寻找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解途径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认为本文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1)在作者的分析中,网络只是水平的,但网络真的只是像蜘蛛网一般的水平形态吗,其本身是否也存在垂直关系?(2)作者对网络隐喻的强有力批判也可能会引发这样的担忧——只要使用网络社会分析就不免陷入了伪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泥沼?

对此我的理解是,作者不赞成使用网络隐喻,因为这会导致对权力关系的错误理解、导致批判焦点的转移,但这并不代表他否定或不承认当代社会新的发展组织形式,其重点是旨在纠正或扭转信息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批判倾向。

我们现在的确存在于一个网络社会,对网络隐喻的使用却常常那么漫不经心和自然而然,仿佛是活在当下的人类不可逃脱的宿命,但由此导致的扁平化网络思维营造的却可能是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等级结构的假象,所有人都变成了联系的节点,成功与否只在于使用网络的能力、在于对网络的价值,这种去政治化的迷思仿佛创造了一个迷人的民主图景,看起来的机会平等却不是事实上的平等,正如只有在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的共同体建立

的基础上,才能有个人的全部自由与发展。而卡斯特等人的网络思维恰恰是遮蔽了这个民主和平等的基础。

反观中国,作为一个日益被卷入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浪潮的国家,面临市场改革的深化和社会转型,传播研究也深受美国实证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但就如赵月枝老师所说的,中国传播研究几十年来都是在“试图发现抽象的发展规律和去政治化的努力中”,似乎偏离了社会权力关系这个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国内不少研究也深受网络理论的影响,比如有很多针对农民工、女性群体等的社会排斥研究,关注的是定义为有缺陷、缺乏资格的阶层在资本网络中的风雨飘摇,而不是网络技术背景下新的剥削关系中的阶级状态,比如对于很多网络行动中的行动者更多的是关注他们凭借新媒体技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而忽略考察他们的阶级构成和复杂动力,可以说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解在整体意识上还缺乏反思与创新的能力。因此,我们需要得到更多类似本文作者所带来的启发和反思,拒绝膜拜普世化的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立足于中国紧迫的社会现实和传播议题,时刻警惕水平化和空间化的思维逻辑,以剥削理论等角度重新认识思考网络社会中的不平等与压迫、重新关注社会权力分配,跳脱发展表象所遮蔽的殖民逻辑。这些都是中国传播学界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关键词]网络,马克思,卡斯特,哈特,奈格里,过程关系本体论,剥削,排斥,内在关系,生产,矛盾,信息资本主义

## 一、引言

正如哈特(Hardt)与奈格里(Negri)所描述的,今天,从袭击双子座大楼的恐怖主义网络到引发信贷恐慌的金融网络,“所及之处皆有网络”(Hardt and Negri 2004, 142)。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同构(isomorphism)和中心隐喻(metaphor),网络概念已经变成我们如何理解当代社会互动关系的新“组织架构”(卡瓦纳 Cavanagh 2007, 24)。

这自然引发了关于社会批判的几个重要问题。我们用来所指的隐喻、叙事和框架无论在权力的形式上还是在我们设想权力批判的能力上都发挥着作用。因此,本文即以探寻这样一个应当显而易见的问题为开始:网络隐喻是如何塑造我们对权力的理解的?

在下文论述中,我认为网络隐喻引致了一种单维的(one-dimensional)权

力理解,它将视线固定在容纳/排斥的二元体(binary)中,而几乎无视剥削关系。我将会讨论网络思维与排外主义批判之间同源性(homology)的原因,同样要讨论的还有单就以这样的术语来思考权力的不足。

考虑到这个特殊问题的主题,我会转向这样一个考察,即在一个联系虽不断增强却仍然坚定地执着于剩余价值剥削的世界里,马克思如何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不断发展完善的(better-rounded)对权力的批判。然而,不同于从意识形态批判高度对网络隐喻展开密集轰炸,本文采取了重建的方法,即首先承认一个为网络理论家和马克思所共用的共同的本体论基础——我称其为“过程关系本体论”。从这个共有的立场出发,就有可能通过物化(materializing)“过程”和内化(internalizing)“关系”来重建这条马克思所采用的独特路径。我认为这些关键的差异解释了马克思著作中剥削的重要性,以及大多数网络理论家工作中对剥削的忽略。我们的最终指向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来自于马克思过程本体论的剥削理论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等级世界的遗迹,而是一个独一无二地适合于批判当代“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内部权力的社会关系理论。

但是,在网络思想家和马克思可以被放在一起对话前,让我们先将注意力转向网络隐喻;它的普遍存在和由它引发的批判模式。

### (一) 网络隐喻

媒介中对“网络”或“网络化”术语的持续使用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只不过是肤浅的流行用语。然而,在一些学术圈子里,“网络”研究被视为是新型超级科学(super-science)(巴拉巴斯 Barabasi 2003; 瓦茨 Watts 2004),而且是“一个当仁不让的理论基础”(Cavanagh 2007, 25)。对于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一位“网络社会”的先驱理论家而言:

网络理论能通过基本的共享的生物网络、神经网络、数字网络以及人类沟通网络这诸多网络,提供一种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共同语言、一条共同途径(Castells 2011b, 795)。<sup>①</sup>

---

<sup>①</sup> 本文讨论的网络理论中,我主要关注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概念,以及他的“网络社会”论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中最著名和最为人熟知的网络理论版本。虽然卡斯特提出了一种原创性网络理论,但我的大多数分析和批判可以被看作适用于一般而言的网络理论。

正如瓦茨(Duncan Watts)指出的,不管我们如何评判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但有一点毋庸置疑:

作为研究议程的网络中相互介入的情形已联合了物理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并且带动了数学家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生物学家加入其中。(Cavanagh 2007,25)<sup>①</sup>

媒介和传播学者普遍认为网络形式是“新媒体”的关键特征之一(盖恩与比尔 Gane and Beer 2008)。实际上,就如卡瓦纳(Allison Cavanagh 2007, 9)所表述的那样,“网络”是信息革命的“欢呼”声之一。尤其因特网作为近年来涌现出的“世界上最辛勤工作的隐喻”(Cavanagh 2007,23),被视为衡量网络为何物的首要标准(gold standard)(Cavanagh 2007,48)。

这自然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视角,它将“网络”的概念降低为一种新近的技术形式。网络无疑不是一项当代发明。<sup>②</sup> 它们出现在贯穿历史的各个社会中。但是,卡斯特和其他当代学者认为:

当代社会环境为这种遍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渗透性(网络)扩张首次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基础。(赫普、克罗茨、穆尔斯与温特 Hepp, Krotz, Moores, and Winter 2008,4)

---

① 某种程度上,这与网络定义的宽泛程度有关。正如瓦茨评述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比网络更简单的了。网络本质上只不过是某种方式彼此相连接的客体集合体。另一方面,网络这个术语的绝对普遍性使其本身难以被精确地加以诠释。(Watts 2004, 27)

“网络隐喻”应用在社会理论中所产生的多种理解已经导致这样一种情形,

甚至在学科内部,如果两位理论家同时在讨论同样的概念,它也是机缘凑巧而不是计划行事的产物。(Cavanagh 2007, 9)

② 通过因特网研究来理解社会也并非新尝试(见匡特 Quandt 2008)。在传播与媒介研究中,马特拉夫妇(Mattelart and Mattelart 1998)描述了先驱传播学者罗杰斯(Everett Rogers)是如何从贝特森(Gregory Bateson)、齐美尔(Georg Simmel)和莫雷诺(Jacob L. Moreno)的工作中汲取养分,通过强调传播网络分析来修正他的创新理论的。无论如何,尽管网络分析绝不再只是一种边缘努力,卡斯特与其他当代“网络社会”论题的支持者还是认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用于理解社会。

技术、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独特组合已然合并,于是网络从以前主导性的组织等级形式阴影下浮出水面,这种基本论点说明了“网络隐喻的兴起”之因(Cavanagh 2007)。

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即隐喻并不只是描述,而且规定——隐喻积极构建我们试图理解的世界——那么,我们必须乐于接受在选择如何描述我们的世界时会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在里面。这不是反对使用隐喻的争辩。事实上,如同厄里(John Urry)写道的:“社会科学工作依赖隐喻,并且不同隐喻间的大多数理论讨论是由论争组成的”(Urry 2003,42)。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认真思考所使用的隐喻类型,以及它们对塑造我们关于社会现实看法产生的影响。<sup>①</sup>

下面的部分将对于网络隐喻如何恰好转变我们对社会和政治批判的认知加以考察。我会提出网络隐喻将批判导向到一个关注容纳和排斥的二元论中。在此情况下,它同时使批判偏离了剥削问题。在下文中,我将会关注网络思想家们最常见的倾向:在“排斥的主题”下组织所有批判(波尔坦斯基与夏佩罗 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347)。

## (二) 网络隐喻与“排斥”:同源性(Homology)

当代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有这样一种差不多约定俗成的观点,即当今权力与不平等的关系更多是通过排斥而非剥削导致。例如,社会学家拉希(Scott Lash)就主张剥削已不再是权力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排斥,其中包括了“相对抽离的”(relatively disembodied)精英的自我排斥(Lash 2002,4)。与此相似的还有卡斯特最近的一本书《传播权力》(*Communication Power*),他认为:

有一种所有网络中都很常见的运用权力的基本形式:网络排斥……有一种排斥形式——因而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在网络世界普遍存在:即容纳全球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同时也排斥了贬值的“地方化”

---

<sup>①</sup> 卡斯特无疑意识到这个问题;事实上,它是其“传播权力”理论的中心议题。在他近期的大部分著作中,他用神经系统和认知语言学去证明我们由通过使用隐喻、叙事和框架来产生意义的神经网络组成,并与外部网络世界相连接。卡斯特(2009,145)这样表述,“权力产生于意志的风车”,因此“权力的基本形式存在于塑造人们意志的能力中”(同上 3)。



的东西。(Castells 2009,50)

我们可以从这段引述看出,卡斯特不仅仅将排斥看作是“运用权力的一种基本形式”,而且“排斥”与“权力”似乎竟变身为同一个概念。根据卡斯特和其他社会理论家的观点,如果网络和连通性是主导逻辑或生命形态,那么压迫就可以由这些网络的断裂来定义。就如英国地理学家和理论家思里夫特(Nigel Thrift)客观陈述的那样,“新的连接形式产生了新的断裂形式”(Thrift 2002,41)。

对卡斯特而言,以网络社会为特征的新的空间逻辑得以出现,是通过在一种变化的超链接地理中物理空间产生分裂、及结构上引发的“黑洞”(black holes)——即他所指的“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这种“社会排斥的新地理”包括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美国市中心的贫民区、法国郊区和亚洲特大城市的棚户区(Castells 2000c,168)。排斥也因此成为了当代“信息资本主义”的主要副作用。一位评论家这样评价卡斯特:

……与其说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被压制——还不如说他们被财富和权力的全球流动……所遗弃、宣布失去价值、以及绕过不管……极权主义政权对其国民强烈的、即使专制的关注也已经被信息资本主义的广泛忽视所取代,这也宣布了全体民众被排除在富人区域之外,是“多余的”、被忽略的或被作为不受欢迎的移民来对待。(斯塔尔德 Stalder 2006,131)

“网络社会”中的权力运用是通过社会行动者的网络把关(Barzilai-Nahon 2008)来实现的,社会行动者确立他们在权力中的地位:

凭借构建一个积累有价值资源的网络,之后运用他们的把关策略去对那些没有为网络增加价值或损害网络项目中最具主导意义的利益的人设置障碍(Castells 2011,774)。

如果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停止发挥其有效机能,它就会被逐步淘汰出网络,并且网络会重新自我安排——就像细胞在生物进程中所做的那样(Castells 2000b,15)。

所有对网络的继续生存有用和必须的才被允许进入,所有被认为无用或有害的都会被消除。网络“以一种二元逻辑运转:容纳/排斥”(同上)。

从这样一种权力概念中被抽离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它是由网络制定的协议而不是个性化决策来规定。协议是一种将看似有自主权的代理人结合在一起以能够互动并形成网络的机制。<sup>①</sup>“没有一个共享的协议,就没有网络”(Galloway 2004, 75)。<sup>②</sup>协议允许权力从个体代理人的行为中脱离出来,相反将权力嵌入组成系统的规章制度中。

排斥机制被完全置于如此有利的位置,它在一个似乎处处以网络黏合的社会中承担着政治批判的主流职责;在这个社会,被不断变化的相似联系所连接变成了终极目标,在这个社会中权力也从未被表明是存在于一个固定的“阶级”、个人或组织。<sup>③</sup>正如贝兰德(Daniel Béland)所阐释的:

……社会排斥建立在一个水平的、空间的隐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主要关注收入不均的不平等的垂直模式之上。从社会排斥模式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多的是在主流社会的“里面”或“外面”,而不是阶级或

---

① 在数字计算的世界,“协议”这个术语是指控制具体技术执行的标准、以及其间的沟通。然而协议并不是一个新词。一项协议在性质上可以是技术的、法律的、金融的或是文化的。正如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特别指出的:

在应用于计算机之前,协议指在一个公约的具体制度中任何正确的类型或适当的行为。它在社交礼仪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也同样重要(Galloway 2004, 7)。

② 例如,公路系统像任何由各种协议共同控制的系统一样,允许“在独立基础之上的相互依赖”(Stalder 2006, 134)。被拒入境、或被排除在系统之外——比如被拒发司机驾照——代表了最严重的威胁。因此,不同于传统的监控了互动内容的命令—控制型等级制度,权力通过制定“契约规则”的协议在网络中运作。如同斯塔尔德(Felix Stalder)强调指出的,

这恰恰就是要点所在,我们可以确定借由压制的权力运作到借由排斥的权力运作的转变(Stalder 2006, 135)。

③ 对于权力发源于一种可辨中心观点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几乎成为了一种新的学术正统。当卡斯特将权力描述成在“流的空间”中运作时,他正依赖和加强一种包括了福柯(Foucault)、拉克劳(Laclau)、墨菲(Mouffe)及其他有影响力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不同传统。从另一方面看,我将会详细讨论的哈特与奈格里(2000, 2004, 2009)的近期工作也依赖于这种传统。卡斯特、哈特与奈格里的贡献在于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世界提供了这个完美隐喻,因为“根据定义,网络没有中心”(Castells 2000b, 15)。

收入分配结构的“上面”或“下面”。(Béland 2007,127)

网络隐喻也是一个水平的、空间的隐喻。“世界是平的”(world is flat)是因为它日益被连接成网络。这是网络隐喻与“排斥主题”之间同源性的根源所在(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347)。在法国学者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与夏佩罗(Ève Chiapello)开创性的《新资本主义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他们有说服力地表明了“排斥主题”“清晰地建立在围绕网络隐喻构建的一种社会再现机制基础之上”(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348):

在我们看来,随着联系主义者(connexionist)世界建立,依照网络而定义的社交世界(social world)概念快速扩散,这就有可能了解,最初与边缘群体命运相联系的排斥和容纳的动态是如何能够通过社会不幸再现和补救手段取代之前的指定社会阶级。(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349)

因此,按照波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对网络不断增加的关注有利于将社会和政治辩论从阶级不平等和收入重新分配上转移开来。相反,个人或群体的相对成功变得取决于他们利用网络的能力:被判定对网络的“价值”。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排斥。如果简单性和一致性决定了一个论点的成功,那么这种容纳/排斥的二元模式无疑会在当下取胜。

### 1. 关于“排斥”问题

尽管在我们这个“联系主义者”的世界里,排斥是一个有价值的批判目标,但波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还是对大多数当代社会理论中对排斥主导性的、几乎是一门心思的关注提出了异议。<sup>①</sup>因为他们认为“排斥”作为批判的中心点有很多不足。

首先,“排斥”以缺少某些东西、或者具有负面特征来给那些被排斥者下

---

<sup>①</sup> 同样地,在本文中我并没有试图否定排斥的存在,只不过它已变得太过霸权(hegemonic)。因此,与墨菲(Raymond Murphy,1985)所描述的他设法诉诸韦伯的(Weber's)社会排斥的闭合理论(social closure theory of exclusion)来克服后来成为批判主流声音的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局限相比,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理智时刻。

定义。波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描述了关于排斥的论述是怎样作为一种讨论身体或精神残疾的边缘群体的方向,最初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但是此后却把那些被认为有社交障碍的“危险”人口也包括进来。<sup>①</sup>对特定人口排斥的最常用解释是缺乏资格。

这恰好是贫穷与缺陷(fault)的关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贫穷与私人财产的关联。

波尔坦斯基和夏佩罗(2005, 354)指出,“这很容易转变为个人责任因素”。指责受害者是明显的退步,不管它以怎样的面目出现,“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概念被成功破坏了”(同上)。

社会阶级模式中对“无产阶级”贫穷的解释是以确认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其“剥削”负责为基础的,排斥模式与社会阶级模式不同,它允许没有进行等级指控的某种消极认同。被排斥者不是某人的受害者,即使他们具有共同人性(或“共同公民资格”)的成员身份,应慎重考虑他们的苦难并给予援助。(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347)

因此,“排斥”对波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而言不是一个“谴责主题”,而是一个“情感主题”。将责任推卸给被压迫者的确削弱了批判的政治力量;批评者除了呼吁慷慨与同情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使用的武器进行斗争。<sup>②</sup>波尔坦

---

<sup>①</sup> 在一篇名为《社会排斥探讨》(*The Social Exclusion Discourse*)的文章中,贝兰德记载了这个概念的法国起源。他写道:

早在1965年,社会评论家克兰佛(Jean Klanfer)就出版过一本书——《社会排斥:西方社会的边缘研究》(*Social exclusion: The study of marginality in western societies*)。在这本强调个人责任的道德书中,“社会排斥”一词指的是由于不负责任的行为而无法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的人(Béland 2007, 126)。

<sup>②</sup> 贝兰德写道:

社会排斥的主流政治讨论只不过是合法化了适度社会方案,该方案没有对寻求限制社会支出、同时鼓励公民变得日益依赖于市场收入(即“重新商品化”)的自由主义逻辑提出挑战(Béland 2007, 134)。

斯基和夏佩罗认为排斥以“某人的不幸(需要抗争),而非一些人从对其他人的损害中获益的社会不对称结果”形式体现,因为“排斥不同于剥削,没有任何人获益”(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354)。

最后,这个世界里的不公平被认为与系统排斥有关,再整合成为唯一救赎途径。如果说这是解决之道,那么我们如何评判透过将主体收编进剥削性网络或制度这一方式而产生的压迫?如同从马克思到福柯这些批判性思想者已经认识到的,权力的现代制度事实上是通过合并的方式来实现运作的。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的研究中得出了现代权力是生产性的(productive)结论,因为:

它的目的是加强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和提高公共道德水准;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sup>①</sup> (Foucault 1991,207)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或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都将政治与经济融为一体——通过权力的组织而创造价值。当代任何试图修正权力理论的尝试都不应当忘记,价值的创造、抽取和循环在根本上是权力的一种运用和表现;它不仅为了出现而要求权力的不对称,也在此过程中生产新的权力关系。这在卡斯特的作品中并没有得到清楚论述,例如“排斥”在网络社会是如何作为运作权力的基本形式来增加经济生产力的。相反,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像马尔库塞(Marcuse)所说的:

被排斥者是否真的被排斥在系统之外,或者是否他们实际上对系统有用却简单地被排除在系统利益之外。(Marcuse 2002,139)

“排斥主题”的所有缺陷都共有一个隐含的假设:世界是由一种内/外二元体(inside/outside binary)所组成。在这样的世界中,如果——

一边我们有非常繁荣富强的人民,而另一边是处在悲惨境地的平民百姓,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关联并彻底走向不同世界。(Boltanski

---

<sup>①</sup> 中文摘自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239页。——译者注

and Chiapello 2005, 360)

传统的剥削批判就变得毫无意义。这能够真实描绘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网络思考者一心关注的排斥问题变得耐人寻味;“网络”不是共享的、普遍的理解世界的最卓越(*par excellence*)形式吗?“网络科学”不是一门“连接时代”(the connected age)的超级科学吗(Watts 2003)? 这里我们得出一个看似矛盾的说法:网络隐喻假定了一个连接的、相关的世界,而同时却设想权力主要通过排斥和断裂来运作。

世所公认的局限召唤将“剥削主题”再次引入当代社会批判。这绝不是开创性的认识。但是当它被认可的时候,我们常常面临以下两个选项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采取的最常见反应当属“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ekritik);所有关于网络的话题都被视为是意识形态的,呼吁阶级和剥削分析的回归(加汉姆 Garnham 2004; 卡利尼科斯 Callinicos 2006)。或者是,以波尔坦斯基和夏佩罗(2005)为马首是瞻,即我们总体上接受网络讨论并试图产生一个更加适合于我们这个“联系主义者”世界的剥削理论。

在下文中,我试图提供第三条途径,抛开脱离主题的、被隐匿在网络隐喻和叙事中的社会自我再现,而转向一个我认为指引网络理论家与马克思思考的共同的本体论框架。马克思显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下的“网络”理论家。但他关于资本作为一种联系和流动价值(value-in-motion)的论述与网络思考有密切联系。<sup>①</sup> 这不仅仅是巧合。在本文中我认为这种密切关系起源于一个共享的过程关系(process-relational)本体论。它有可能通过指出一个共同立场的起点重建马克思独特道路,这条道路吸收了概念化的“过程”和

---

<sup>①</sup> 基尔希(Scott Kirsch)与米切尔(Don Mitchell)进一步详细展开了马克思和网络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尤其是网络行动者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以网络语言写作。但他的确在用网路(circuits)的语言写作,他极其详尽地表现了资本——作为流动价值——是如何在一套网路中行进的,比如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作场所的机器与楼房,再进一步转变为生产的商品。他表明了资本如何恰恰因为(because)是一种关系,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商品而变得或多或少的凝结延续其中,结果当商品在市场上被交换时,资本又重新回到资本家手中。商品通过技术及“物本身”(things as such)来“稳定”社会关系,商品循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网络。(Kirsch and Mitchell 2004, 696)

“关系”，相应地，就会理解这条道路不是引导我们走向容纳/排斥的死胡同，而是扩大的(writ large)剥削批判。<sup>①</sup>

## 二、网络本体论

现在让我们先将网络隐喻抛在脑后，按照我们的思路来到本体论这个层面。一旦这么做了，我们就会很快意识到这个隐喻只不过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哲学立场的当代代表性策略，这种哲学立场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前(pre-Socratic)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这个我将称之为“过程关系本体论”的理论已经在网络分析中焕发新的生机。我将从阐释“过程”的含义开始论述。

### (一) 过程

网络思想家强调过程。社会现实不仅由静态事物组成，还充满了行动、变化和流动。过程先于物质已经成为从赫拉克利特到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这些过程哲学家们的主要观点。

它是怎样与网络相关联的呢？网络是过程的动态(dynamic)模式。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是卡斯特在伯克利时的同事，他是一位对复杂性与自生论(complexity and autopoiesis)这门新科学孜孜不倦的普及者，这门

---

<sup>①</sup> 尽管本文中我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的剥削和排斥，但需要指明的重要一点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并不局限在这个领域。布坎南(Buchanan 1979, 122)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包含了：

三种区别又相关的剥削概念：(a)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剥削概念，(b)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且适用于所有阶级社会劳动过程的超越历史的剥削概念，以及(c)并不局限在劳动过程本身的一般性剥削概念。

马克思最全面的剥削概念出现在其早期著作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一书中，他描述了资产阶级人际关系观，即总体上(in general)将所有的人类关系都视作是剥削性的：

……所有……人们相互交往中的个体行为，例如演讲、爱情等，都(被资产阶级)描绘成效用与利用(utility and utilization)的关系。在这里效用关系有非常不寻常的含义，也就是说我通过损害他人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人剥削人 exploitation de l'homme par l'homme)……这些实际上都与资产阶级有关。出于其自身原因，对资产阶级而言只有一种关系是正当的——剥削关系；所有其他关系只有在资产阶级将其纳入剥削关系这一范畴内才拥有正当性，甚至遇到的关系并不能被直接纳入剥削关系，资产阶级也至少将它们纳入到想象中。这种使用的物质表现是金钱，金钱是所有事物、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体现。(Marx 1974, 110)

新科学将网络置于过程的中心。卡普拉借鉴了智利生物学家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与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开创性的工作,他认为新生与重建的特征使生活成为一个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系统。

活着的网络通过转变或更换要素,持续不断地创造、或重建自己。如此一来,它们在保存了其网状(web-like)组织模式的同时,也经受不断的结构变化。(Capra 2004, 10)

因此,网络不是由个体要素(例如相反的基因蓝图观点)来决定的,网络也不具有静态和稳定的组织关系特征。相反,它是整体的互动过程(process),通过与周围环境变化互动持续不断产生一种具有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的存在,这可以阻止网络走向衰败。

一次性互动也不是网络的特点,相反,其特点是——随着时间推移,持久的、循环往复的以及重建的互动模式。于是对过程的关注必然引发我们对时间性(temporality)重要性的关注。从过程的角度来看:

我们如何使自己作为存在,正是在于我们如何让自己存在于时间中,在于我们如何成为时间,以及时间如何成为我们。(Pomeroy 2004, 108)

存在即(is)时间是因为存在总在变化形成。

事实上,许多网络理论家常常滑回到实体论(substantialism)。似乎伴随每一次网络讨论的无所不在的网络图表,往往将空间性凌驾于时间性和叙事突现之上。然而,就像埃米贝尔(Mustafa Emirbayer 1997)所指出的,这归咎于日常想法模式中的实体论霸权主义,西方语言完全的嵌入性迫使我们将过程降低为静态条件。<sup>①</sup> 但是需要记住,网络思想(若非总是其再现)将网络设想为始终在形成的过程中,这一点很重要。

---

<sup>①</sup> 我们只能通过为一样事物加上动词来表示其变化。埃米贝尔援引了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话来举例说明:

我们说“风在吹”,似乎风就是一样静止不动的东西,而在一个给定的时间点上才开始移动和吹动。(Emirbayer 1997, 283 引用自 Elias 1978, 111f.)



## (二) 关系

荷兰网络理论家凡迪克(Jan van Dijk)写道,关系是“网络视角关注的主要焦点”(van Dijk 2006, 25)。<sup>①</sup> 关系被认为是任何网络所固有的最基础形式,每当两种或更多连接的关系出现时,一个网络才可以说是存在的。

网络思想家认为我们可以透过嵌入的关系更多了解某人或某物,这与通过审视行动者生活在怎样制度与结构之下、或通过行动者所拥有的个人品质和特征试图来理解他们不同。这个观点是以一种将世界视作由形式而非内容构成的本体论为基础的。关系本体论假设实体之间(between)的关系在本质上比实体本身更加重要(怀尔德曼 Wildman, 2010)。费利克斯·斯塔尔德指出,在任何网络中:

认为节点先出现、然后它们开始创造联系的观点是说不通的。反而是节点通过联系互相创造和规定。联系创造了节点,同时没有节点也不可能有联系。(Stalder 2006, 177)

根据网络思想家对关系之于节点相对重要性的不同构想,可以划分出不同研究途径。凡迪克采用了一种他称之为“适度网络途径(moderate network approach)”,不仅强调关系,也“关注网络(人、团体、组织、社会)中相关联的单位(节点)特征”(van Dijk 2006)。其他网络理论家将关系本体论这种逻辑方式推向极端,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本质(单位或节点)。网络行动者理论家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罗(John Law)称他们的途径为“激进关系论”(radical relationality)。其原则是:

任何进入关系的东西本身都没有固定意义或属性。相反的,系统

---

<sup>①</sup> 然而众所周知卡斯特没有为他使用的概念提供清晰定义——反而宁愿通过其使用让定义自然浮现——冉·凡迪克在其书《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中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网络定义。

网络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单位组成要素间的联系集合体(a collection of links between elements of a unit)。这些要素被称为节点。单位通常被称为系统。最少需要三个要素,最少要有两个联系。两个要素的单一联系被称为一种关系。(van Dijk 2006, 24)

中任何特定要素的属性、网络中的任何特定节点,都完全由系统中其他有关要素、网络中的其他节点来规定。(Law,2003,4)<sup>①</sup>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接纳被所有网络理论家共同认定的中心论点而走向极端;该论点即“所有实体……都通过与其他实体的联系而获得意义”(同上)。

最后,过程与关系应当被看作是唇齿相依的,因为:

被过程的运行所驱动的世界必定是一个相关联的世界。事实上,行进的运动本身就是关系性的自生(self-generation)。(Pomeroy 2004, 143)

如同我将在下面部分所阐释的,过程关系角度也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其剥削理论的关键。

### 三、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

马克思如何也是一位过程关系思想家?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怎样不同于例如曼纽尔·卡斯特这些网络理论家的观点?在下文论述中,我将通过阐释马克思如何通过他的“生产”范畴来物化过程哲学以及马克思如何不仅强调关系、而且强调内在(internal)关系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我会详细说明“矛盾”在引发马克思本体论动态性质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以及源自这样一个本体论的剥削理论如何对当代信息资本主义中的批判力量有重大意义。

#### (一) 物化过程

就像奥尔曼(Bertell Ollman)所认为的,马克思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将运动的位置置于稳定之上:

---

<sup>①</sup> 正如首先由索绪尔(de Saussure)提出的观点,所有单词只有在与其他单词并置时才能获得意义——例如父亲与儿子、白天与夜晚等——激进关系论超越了语言,将这种观点延伸至所有事物和存在。

由于稳定一向限制变化而不是相反,马克思——不同于大多数现代社会科学家——没有也无法研究事物变化之因(隐含之意是变化只是外在于事物本身,是某种碰巧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某物)。考虑到变化总是事物本身的一个部分,他的研究题目就可能只是如何(how)、何时(when)、会变成什么样(into what)以及为什么有时候它们看上去并非事情本身(意识形态的)。(Ollman 2003,66)

但是,尽管马克思与网络理论家有着同样的偏爱,过程却仍然在其作品中呈现出了一种完全崭新的意义。就像哲学家波默罗伊(Anne Fairchild Pomeroy)所说的,这是因为马克思通过他的“生产”基本范畴将过程物化了。<sup>①</sup>波默罗伊将马克思与过程关系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相比较,阐释了在马克思那里的“生产”范畴如何与怀特海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中的“过程”范畴“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t)的(Pomeroy 2004,44)。<sup>②</sup>对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含义的简略回顾有助于说明“生产”是怎样预示了他的过程关系本体论的。

对马克思而言,“生产”作为必要的抽象概念,是个极度复杂的术语。就像对怀特海来说,“过程”作用于分析的多个层面,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也在从最抽象、最概括到最具体和最明确的很多层面上产生作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这样起作用:

(1) 在所有生产的一般条件层面上作为人类生活与自然之间的交换(interchange),实际上两者具有同一性(identity);(2)在许多生产的历史形式层面上:公社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3)在每个历史形式中生产

---

<sup>①</sup> 过程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因此它有助于对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做一简单概述。马克思不同意康德(Kant)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时间不是一个先于观念的形式,也不是纯粹被置于集体主体性(collective subjectivity)之外的客观序列(牛顿 Newton)。相反,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时间意识(time-consciousness)正是产生于对象化世界的劳动行为。这是因为真正新奇的产生只能通过劳动行为(生产)。海德格尔(Heidegger)假定“存在”(Being)的活动是时间性的来源,马克思却将这种活动(劳动)看作是把时间引入物(客体、制度等)。相应地,劳动的“对象化”(objectified)形式引入了客观的时间(更多详细解释参见古尔德 Gould,1978,56—68)。

<sup>②</sup> 可以总结几点波默罗伊关于“生产”与“过程”等同性的观点如下。首先,“马克思与怀特海都用他们各自的术语既指涉所有生产过程活动的总体抽象特征,又指涉这些活动任何特定的具体实例或时刻。”其次,“生产和过程不仅指涉而且也有助于解释时间世界或历史世界是不断发生的运动……”。最后,“过程与生产都受到社会性相关个体的影响……”(Pomeroy 2004,60)。

的不同分支层面上,以及(4)在“积极参与更大的或更分散的生产分支整体”的社会主体行为层面上。(Pomeroy 2004,46 引用自 Marx 1973,86)

首先确定生产的最一般特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一般特征,生产的具体方式就将不可想象”(Marx 1973,85)。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将生产看作为一个时间的过程。生产包含了三种分析上既区别又统一的阶段:挪用(appropriation)(对社会—自然世界的),生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y)(通过主体及主体本身创造性的再创造)以及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对一个新奇的相关存在或对象)。不论一个人是否在建造房屋或在看杂志,这个人始终在进行这种生产过程。重要的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也通过这种活动、被这种活动改变了。

生产活动不仅在自然界中生产“物”(things)或客体,也使主体行为形式本身对象化了。它是一种特定的个体生产。(Pomeroy 2004,54)

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中所描述的,“他作用于外部自然并改变它,他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其自身的本质”(Marx 1990,283)。因此,“过程性或生产性的个体就是其所为(is what it does)”(Pomeroy 2004,70)。这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清楚阐释,生产方式:

……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sup>①</sup> (Marx and Engels 1974,42)

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区分了生产、分配与消费,但马克思认为所有这些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具体阶段而已。尽管显然并不相同,他们却在一个统一体中区别于彼此。他们都有助于推动生产过程前进。当我“消费”一餐饭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7页。——译者注

的时候,我也在“生产”我这个存在。

作为一个环节的消费、作为一个环节的生产都是为了运动本身和过程本身才发生。(Pomeroy 2004,53)

作为过程的生产也必定是作为关系的生产。就像波默罗伊表述的,“过程运动本身是关系性的自生”(Pomeroy 2004,143)。因此,站在生产过程中心的不是独立的、隔离的生产者——像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鲁滨逊漂流记》(*the Robinson Crusoe*)中塑造的角色——而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体,或是如古尔德(Carol Gould 1978)表述的,“关系中的个体”(individuals-in-relations)。

社会(social)特征是整个运动的总体特征:正如(just as)社会本身生产人成其为人(man as man),于是社会也被人生产(produced)出来。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存在方式(mode of existence)上,活动和消费都是社会的(social):社会(social)活动和社会(social)消费。(Marx 1988,104)

因此,对马克思而言,每个人都是他或她所为,并且他或她所为不断成为产品。当我们生产某样新东西的时候,也在连续不断地再生产我们自己。

之前我描述过网络思想家是如何将新生与重建(renewal and recreation)的过程看作为网络能够维持它们自身至关重要的因素。除了“关系中的个体”与被生产为存在的客观世界,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发挥了几乎一样的功用。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中,生产的核心从关系中的个体转变为网络知识(knowledge-in-networks)。因为对卡斯特来说,网络社会中生产力的主要来源不是知识工作者,而是知识本身。这种被网络理论家自然化(naturalize)知识的倾向是一种赋予生产要素以固有价值素质的经济思想长期趋势的延续。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猛烈批评了此谬论,他无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知识或信息——

并不天然存在价值,但需要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整合使它成为某种有价值的物(Jessop 2003,2 引自 Schiller 1988,32)。

网络途径并不一定排斥过程的物质观。哈特与奈格里(2000,2004,2009)和卡斯特一样,设想网络是当代社会权力使用的主导形式。不同于卡斯特和其他多数网络理论家,哈特与奈格里认为权力通过容纳(inclusion)的过程来运作。他们称之为“帝国(Empire)”的资本逻辑被认为:

是一个普遍的共和国(universal republic),是构建于无边界、容纳性建筑中的由权力和反制权力(counterpowers)组成的网络(Hardt and Negri 2000,166)。<sup>①</sup>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此逻辑使持续运动和向外扩张成为必要。作为对马克思的回应,哈特与奈格里写道:

资本主义市场是一部反对建立内外之分的机器。当它遇到壁垒和排斥时,它的发展就受到阻挠;相反,当它纳入越来越广大的空间时,它就兴旺发达。<sup>②</sup> (Hardt and Negri 2000,190)

哈特与奈格里通过对纳入的关注,得以更好地将权力想象成是生产性的。

谁是这种“帝国”力求纳入的生产之源?在哈特与奈格里的斯宾诺莎影响下的语言(Spinoza-influenced language)中,这个根源就是“大众”(multitude)。大众是一个包括了所有那些为生产“公共体”(the common)而劳动、超越了雇佣劳动者(wage-labourer)的阶级概念。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哈特与奈格里重新评估了剥削,认为剥削与公共体的征用(expropriation)有关。我们可以将此视为“网络剥削”(network exploitation),通过网络剥削,由大众网络活动生产的公共体同时被帝国剥削了。因此资本取决于大众的生产。

哈特与奈格里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将人力(human agency)理解为过剩生产力:作为生产过程的生活。这代表了超越网络理论的一种前进,网络理

---

① 中文摘自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68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191页。——译者注

论仅仅将权力看作是通过排斥而起作用。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排斥主题趋向于关注有缺陷的人或残疾人,这是一种宽泛解释。例如被排斥者是那些缺乏适当教育条件的人。因此缺乏(lack)引发了排斥。另一方面剥削是一个过量的(excess)问题。“剥削”将被剥削者规定为那些拥有(have)某些东西的人,那么为何他们会被其他人剥削?按照哈特与奈格里(2004,333)在《大众》(*Multitude*)中所写道的:

“被压迫者”(或被排斥者)可以由边缘的和无权力的民众命名,但是“被剥削者”必定是一个中心的、生产性的和强大的主体。

通过从排斥到容纳这个批判焦点的转换,哈特与奈格里能够更好地处理包括当代剥削过程在内的更加复杂的权力方式。与此同时他们对网络隐喻的坚持仍然会引发一些问题,对此我随后会更详细地表述。首先,让我们进入这样一个讨论,即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是怎样以其内在关系的理解为特征的。

## (二) 内在关系 (Internal Relations)

在埃米尔贝尔(Mustafa Emirbayer 1997,290)被广泛引用的“关系社会学宣言”(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中,他将马克思形容为一位“深刻的关系思想家”,马克思的关系本体论通过他的——

异化(alienation)分析……他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论述,他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中内在关系的敏锐洞察,以及确切来说他对资本/雇佣劳动者关系本身的理解——

展示出来。有人说“也许没有哪个单词比关系(Verhältnis/relation)一词更频繁地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了”(Ollman 2003,73)。<sup>①</sup>

但是仅仅告诉我们马克思是一位关系思想家还不够。这个问题应换一

---

<sup>①</sup> 但是奥尔曼(2003,73)也承认,非德语(non-German-language)读者对被关系者(Verhältnis)在马克思思想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是有些缺少了解的,这是由于翻译经常用“条件”、“系统”和“结构”替代“关系”。

个问法,马克思是哪一种关系思想家?

马克思的关系性产生自一种内在关系哲学——奥尔曼认为是“他的整个辩证法(dialectical method)中备受忽视的基础”(Ollman 2003,116)。当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灵感的时候,作为斯宾诺莎思想核心原则重现于现代的内在关系哲学则可追根溯源至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

所有关系都是内在的说法暗示了每样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有某种尽管遥远的关系,并且这些关系都是必要的(necessary)。说其必要是指它们对被关系者(relata)的特征是必不可少的。

内在关系是那样一些关系,即个体在其中被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改变,就是说,这些个体间的关系都会被关系互相影响。(Gould 1978, 37)

反之,外部关系有助于连接被关系者,但是:

每个被关系者(relatum)都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自我存在实体,它脱离关系存在,并在其本质或构成上显得完全没有变化。(Gould 1978, 38)

当我们审视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命题时,区分由内在(internal)关系构成的关系性和外部(external)关系组成的关系性是重要的,这一点日益明确。卡斯特区分了“生产方式”(modes of production)与“发展方式”(modes of development),这使他得以设想一个新奇社会形式的出现——一个“网络社会”。<sup>①</sup> 据卡斯特所言,现在的生产方式依然是资本主义的,但伴随出现了一种新的激发其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sup>②</sup> 但是,卡斯特并不足以将这种发展方式固定在生产方式内。“信息主义”看起来只

---

① 据卡斯特所说,生产方式的特征表现为“占用与控制剩余的结构原则”(Castells, 2000a, 16)。“网络社会”仍然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上,不管怎样,给予网络社会界定性征的因果力量是其具体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以激发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或“要素”为特征。

② 工业发展方式是以新能源的引进及使用为基础的,现今“信息发展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将其生产力来源锁定在“产生知识、信息处理与象征沟通的技术”上。卡斯特承认知识与信息对历史上所有发展方式都很关键,然而他认为,信息发展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



是起到了一种外部因果力量(external causal force)的作用。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作为一个隐藏了被生产条件的生产因素,知识或信息被自然化了(像是土地、资本或劳动)。因此价值被错误地归因于进入(brought into)生产过程的物天生具有的素质,而不是归因于产生于(out of)特定社会关系的过程。

这个问题就像韦恩(Wayne)意识到的那样:

我们怎样在(within)一种以不断变化的技术力量和社会关系为取向的生产方式里评估连续性和差异性?(Wayne 2004,141)

如同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中所写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法理解驱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联系。相反,这种发展被归因于“外部的和似乎偶然发生的情况”(Wayne 2004,139 引用自 Marx 1972,106)。这恰好是卡斯特的分析所存在的问题。

对卡斯特而言,网络关系是外部的。网络社会是新社会形态的出现,它由先于被关系者(relata)存在的新(技术)关系发展引起。<sup>①</sup>卡斯特谨慎承认了技术并没有导致(cause)向网络社会的转变,但他坚持认为它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物(medium)”(Castells 2000b,14)。换句话说,卡斯特认为(技术上的)网络提供了个体被带入关系的手段。

很多关于卡斯特这个方面理论的评论都围绕着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指责(参见 Webster 1995; van Dijk 1999)。但是,我宁愿认为任何这样的决定论是一种对本体论的外部(external)而非内在(internal)关系的集中关注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就这一点而言,技术决定论或者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不过是一种围绕外部关系构造的哲学症状。

哈特与奈格里对网络隐喻的使用不同于卡斯特,它也提供了一种产生于外部关系的决定论形式。作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Marxists),哈特与奈格里认为资本依赖于大众生产力。实际上,劳工是资本试图驯化的积极主体代表了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最具创新性的一个观

---

<sup>①</sup> 这一点在冉·凡迪克的著作中甚至更加明显,他提出在网络社会中“基础单位包括了日益被社会和媒介网络所联结(increasingly linked by social and media networks)的个体、家庭、群体和组织”(van Dijk,2006,28)。

点。它颠覆了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即资本按照某种自动的、独立的(self-contained)逻辑来呈现。但这仅仅是单方面的。

问题是当哈特与奈格里将生产作为资本赖以生存的网络过程来强调时,“大众”和“帝国”——并没有内在地(internally)相关联。大众被认为是脱离于帝国而自治的(autonomous)。哈特与奈格里(2004,225)坚持认为大众不应当被看作帝国的“辩证支持”(dialectical support)。

帝国与大众不是对称的:然而帝国不断依赖于大众和其社会生产力,大众则潜在地自治并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创造社会(同上)。

因此,可以说网络技术对应了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网络斗争对应了哈特与奈格里的“共同体”(commonwealth)。就他们孤立了一种单一外部因果力量的角度而言,卡斯特与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都被认为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t)。

这并不是说网络技术的影响或斗争的网络形式是错误的解释。与其说本质主义解释是错误的,不如说是片面的。就像雷斯尼克(Resnick)与沃尔夫(Wolff)所表述的:

……每个本质主义环节(essentialist moment)都被认为是真实的——它说明了一种联系——错误的是——它遮蔽了其他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倘若考虑到这些被遮蔽的联系,所有先前复杂联系的真假就会显现出来。(Resnick and Wolff 2006,83)

换句话说,技术决定论与所谓的“阶级斗争决定论”(class struggle determinism)都是片面的解释,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是“抽象概念”(abstractions)。按照古尔德所说:

从马克思的角度出发,外部关系仅仅是一种现象,它是内在关系产生于单方面或抽象观点的方式。(Gould 1978,38)

内在关系理论对马克思意味着“确切地说,互动是内在行动(inneraction)(它是他在研究中声称的‘内部的联系’)”(Ollman 2003,27)。对马克思

而言,这意味着关系性已始终在那儿。它不需要网络技术来使它存在。对这种技术来说,关系性是一种优先存在的可能性条件(condition of possibility)。虽然网络技术的蔓延有助于增强和突出这种固有的关系性,却不会发明它。例如,脸书(Facebook)是一种俘获内在于人类关系性中连接渴望与实践的巧妙方式。然而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没有发明社交网络;他仅仅在一个领域中组织了社交活动(sociability)。

这种陈述当然不是说网络技术和新的网络组织形式对社会发展毫无影响。它们当然有影响。但是这些技术和组织形式并不是来自外部空间。它们从内部产生,从内在社会关系中具体化和抽象化。细想一下金钱,它是最强大和无处不在的网络“技术”。乍看起来它好像是一种影响和扭曲几乎全部生活领域的外部关系。然而马克思将金钱看作为是一种的内在关系抽象。这在《资本论》卷一最后一章中得到非常有力(与幽默)的说明:“现代殖民理论”(The Modern Theory of Colonization)。马克思讲述了英国政治家韦克菲尔德(E. G. Wakefield)在殖民地发现资本主义关系事实的故事——如果没有工资劳动者购买,金钱就没有意义:

一位皮尔先生(Wakefield)抱怨说,他带了总计5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到澳大利亚西部斯旺河地区(Swan River)。此外这位皮尔先生甚至很有远见地带来了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旦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就被工人们遗弃了,连一个替他整理床铺到河里边打水的仆人都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什么都预见到了,除了将英国生产关系出口到斯旺河!(Marx 1990, 932f.)

在这里马克思用事实证明了其鼎鼎大名的观点“资本不是一个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同上)。剥削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形容这种关系的术语。

剥削对马克思而言是一个必要的(necessarily)关系概念。它只能产生于内在关系的哲学中。在剥削者需要被剥削者来生产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的同时,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被剥削者为了出卖他们的劳动力(labour power)也需要剥削者——为了生存。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不仅仅是这样一种观察,即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成功与对于其他人的剥夺具有因果关系。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从社会中一个特定阶级的存在(existence)取决于另一个阶级

的存在(existence)这种观察开始的。事实上,就像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中有两种理想范畴一样,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了保持其身份(identity)而彼此需要。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剥削理论预先假定了由内在关系组成、必需共享的世界存在。

当诸如卡斯特一类的网络理论家承认剥削存在时,他们就将剥削理解为了外部(external)关系——一个事件而非一个过程——这种预示的实体或被关系者互相作用。这种事件在特定的时空里比在其他时空中更频繁发生,但剥削不被认为对被关系者的存在是必要的。

无论如何,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论述是不够的。不讨论“矛盾”(contradiction)的重要性,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与产生于此的剥削理论就无法被理解。我们将转向“矛盾”这个概念。

### (三) 矛盾

矛盾使人们得以理解变化如何(how)发生、为何(why)发生。当然,矛盾在一个系统内描述了两种同时彼此依赖和否定的结构性原则的存在。人们普遍公认资本主义是由矛盾及其应对矛盾的相对成功与失败来阐明的。<sup>①</sup>矛盾也是统一马克思过程和内在关系理解的原则,就像过程是通过内在的矛盾(contradictoty)关系激发的。

矛盾对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及其剥削理论的重要性或许通过与卡斯特路径的对比来解释最合适。卡斯特提出的权力模式极度轻视(minimize)矛盾的价值。就像韦恩(Mike Wayne)指出的,卡斯特的展方式有时甚至“听起来让人怀疑像是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新的生产方式”(Wayne 2004, 142)。通过引入一种展方式/生产方式二元性(duality),卡斯特淡化了所有在特定阶级关系内部的知识起源。相应地这也扁平化了存在于马克思生产方式论点中的辩证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要知道权力对卡斯特而言,是通过定义中不包含中心的“流的空间”来

---

<sup>①</sup> 杰索普(Bob Jessop 2001, 4)描述了资本主义中一些主要的矛盾:

例如,商品同时具有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和使用价值(use-value);工人既是一个抽象劳动力个体,可被其他这种个体(或者,实际上是其他生产要素)替代,又是一个有特定技能、知识和创造力的具体个体;工资既是生产成本,又是需求来源;金钱同时作为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起作用;生产成本既是运动中的抽象价值(尤其在可用作再次投资的已实现的利润形式中),也是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储存,被定价过程中的特定资产;等等。

循环的。相反,它通过容纳和排斥来运作;吸收有价值的并抛弃掉所有其他的。卡斯特并没有回避批判产生于这种权力解释的非正义,比如上述的“黑洞”。但是这种批判不论怎样吸引人,也仅仅提供了描述(description)而不是解释(explanation)。安吉利斯(Massimo De Angelis)很好地抓住了这个问题:

当我们把权力理解为一个流的时候,不管这个隐喻可能如何有见地,在我们按照社会关系的流动及其运作方式(mode)提出这种“流”之前,权力仍然为一种物(一种流动的物,但仍是一种物),因为作为一种关系(relation)的权力运用是怎样使其运动变化并没有被解释。因此,就跨国利率差别(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而言,我可以将资本流理解为一种物,但是在我将这种运动与两个国家的生活如何凭借(by virtue)这种资本运动或这种运动的威胁系统地相互竞争这个广泛问题相关联之前,在我理解并问题化这个基本原理(rationale)之前,我的权力概念从极端替代方案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无用的。(De Angelis 2007,172)

不论卡斯特围绕网络建构的社会变迁理论如何高度精妙与细致,其核心仍然建立在一种传统的因果链描述之上。这种社会变化的解释就是黑格尔所指的“坏无限”(bad infinity):无穷尽的连续原因产生于由先前结果导致的结果,永远不会得出一个怎样(how)或为何(why)的解释(里斯 Rees 1998,7)。

就像早前讨论到的,这是将“原因”理解为系统的某种外部(external)关系而非内部(internal)关系倾向的结果。如奥尔曼(2003,18)写道:

然而非辩证思想家……被卷入了对“外部鼓动者”(outside agitator)、对来自所审查问题以外某物或某人的无休止寻找,它是无论发生任何变化的原因,辩证思想家则将所有变化的主要责任归于系统内部矛盾或产生矛盾的系统。

黑格尔的辩证哲学遗产清楚地将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与那些诸如卡斯特的网络理论家的理论区别开来。因为马克思通过剥削关系能够物化黑格尔矛盾的唯心概念。在资本主义中,剥削同时是矛盾的中心来源和表现,就像——

劳动者既是一个劳动力的抽象单位……又是一个具有特定技能、知识和创造力的具体个体。(Jessop 2003,4)

但是矛盾不应当被理解为能以一个可预见的目的论方式(teleological fashion)自行解决。矛盾必定暗示了“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意思是:

一个个体、一个事件、一场社会运动等等——由它们所产生于的社会和自然整体的所有其他方面所构成。(Resnick and Wolff 2006,80)

每个实体、历史的每个方面都是矛盾的,因为它不断被其所有多元决定因素往多个不同方向推或拉。事实上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多元决定的密集网络”,或者用阿尔都塞的名言说,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同上)。

雷斯尼克和沃尔夫(2006)发展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来突出矛盾在马克思过程本体论中的作用。

任何存在的矛盾性(contradictoriness)都会推动它发生变化(例如使每个存在成为一个过程),从而这改变了矛盾性是怎样多元决定了所有存在的(同上)。

因此马克思概念化的过程通过内在关系之中和之间的固有矛盾获得了活力。我们只有将“原因”和“结果”这类用语抛在脑后,才能进入“多元决定组成的逻辑”(同上)。

哈特与奈格里通过他们调用网络隐喻来描述了“大众”和“帝国”的构成,他们尤其确认了“信息网络加剧了集体生产和个体商品挪用之间的资本主义矛盾”(福克斯和齐默尔曼 Fuchs and Zimmerman 2009,107)。实际上这种矛盾形成了“大众”与“帝国”间对抗关系的核心。但是尽管这可能是信息资本主义核心的一个中心矛盾,它还是可以被看作为一个“欠定的”(underdetermined)矛盾。这是因为哈特与奈格里在资本被理解为“帝国”、且劳动被理解为“大众”的范围内,未能拷问复杂的阶级动力和矛盾。当批评家指出哈特与奈格里作品中有主观主义和过分乐观的色彩时,他们确实指出了多元决定存在缺失。

当然,就像我在整篇文章中一直重复的,资本是一种经由剥削来“预先

假定和再现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互依存”的关系(Callinicos 2006, 200f.)。但是,正如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所指出的:

资本关系也必定包括了“许多资本”(many capitals),因为通过竞争公司的竞争性斗争,资本主义方式的独特趋势变得有效。(Callinicos 2006, 201)

跟随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观点,卡利尼科斯认为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为由两种矛盾关系构成: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垂直关系”(vertical relationship)以及“许多资本”间的“水平关系”(horizontal relationship)。

指出这一点有助于将矛盾再次引入“帝国”的扁平范畴。对于“大众”也必须这么做。例如,如同福克斯和齐默尔曼(2009, 93)提醒我们的那样,被剥削的大众“是由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及阶级碎片(class fractions)对抗性地构成”。对生产的多种跨国网络与组成“大众”的“矛盾的阶级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positions)(莱特 Wright 1985)作出说明是必需的。<sup>①</sup> 通过忽视在(within)大众内部运作的剥削关系,网络隐喻的扁平化骗局会再一次施展魔法。

透过哈维(David Harvey)用来解释马克思辩证法的图表,可以看到一个更好的、更加“多元决定的”路径(见图 1)。哈维图中的每个“中心”(hubs)都作为社会变化中的决定性力量可以单独存在,但是为了全面了解情况,所有都必须在一个“生态整体”(ecological totality)内被作为动态环节(dynamic moments)来考虑——关系地、辩证地(Harvey 2010, 196)。这个解释的过程是持续进行的;没有完结、终止或最终目的地。

认识了所有内在关系是矛盾的、相应也是多元决定的,最后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是如何取得其动态形式的。反过来,这样一种过

---

<sup>①</sup> 当然,地位不同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不一定会引起分裂和对抗。然而统一体也不是自动形成的。它必须付出努力。例如,在麦克彻与莫斯科(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会运动(trade union movemen)趋势的研究中,他们这样描述:

小规模的和关注点狭隘的(narrowly-focused)工会的联合会导致更大、更加多样化的组织,不仅在一个特定行业、甚至在一个单一的产业内代表工人,而且在一个广泛的经济领域中,诸如融合传播、文化及信息领域代表工人。(McKercher and Mosco 2010, 3)

程关系路径赋予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以生机,使我们得以理解它的当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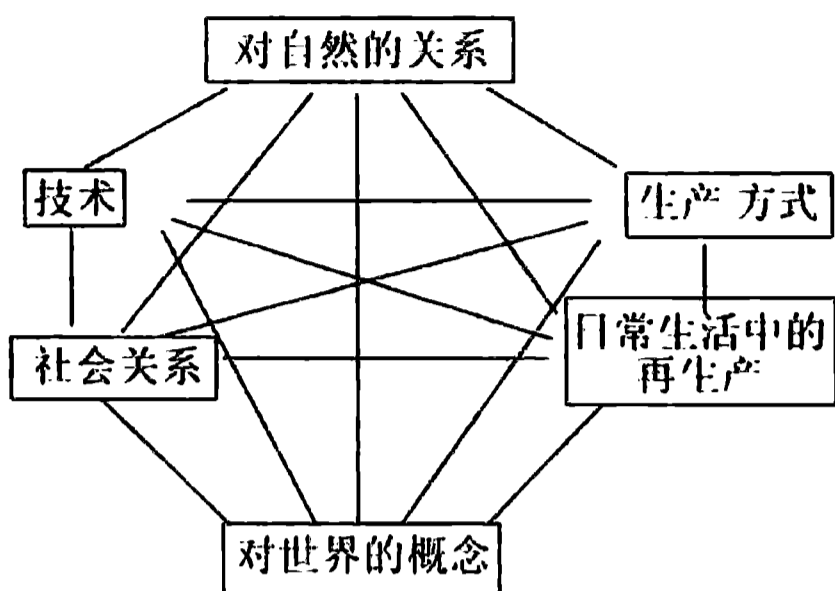


图1 (Harvery 2010. 195)

#### 四、全球信息资本主义与剥削

到这里我们的讨论已经关注了对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的阐释,以及为何它引导我们走向一条剥削批判的道路,而不是走向容纳/排斥死胡同的问题。我们得以理解此问题是因为我们把马克思本体论中的矛盾角色、内在关系和生产看作是过程的物化。

在本文余下的有限空间中,我会简要论及(我称之为)信息资本主义下剥削的强化(intensification)与扩大(extensification)。我这么做是希望清楚说明来自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的剥削理论非常适合于处理关于现代传播与媒介研究的议题。

##### (一) 强化

马克思剥削概念的“官方”版本——来源于《资本论》卷1——是指劳动力的不等交换。剥削包含工人对加诸于他的/她的创造力之上控制的屈服,资本家为了攫取被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而购买得到特定时段的权利。<sup>①</sup> 马克

<sup>①</sup> 生命活动的任何假定延伸既包括再生产时间,也包括生产时间,“模式再现(reenactment)时间与超越了仅仅是物理繁殖的创造性时间”(Pomeroy 2004, 112)。在工人出卖其劳动力给资本家期间,“再生产的”与“生产的”时间通过马克思的必要劳动时间(工人需要生产出与他或她得到工资同等价值的工作时间),以及剩余劳动时间(超出了这种工作时间的部分)范畴来表现。就像波默罗依简要表述地那样,“资本家为再生产付钱,及获得生产利润”(Pomeroy 2004, 100)。



思的著名论断“环节(moment)是利润要素”对于理解和批判所有有偿劳动(包括传播和媒介领域的劳动)的剥削依然重要。近期传播工业中关于劳动的学术批评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参见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Ross 2009; McKercher, Mosco, and Huws 2010)。尤其是媒介工业中许多工作的感知魅力(perceived glamour)和吸引力(desirability)常容许雇主采取 19 世纪水平的“绝对剥削”(absolute exploitation)。例如,韦斯弗德(Dyer-Witford)与波特(de Peuter)(2006)开展的电子游戏工业调查揭露了存在的过度工作的程度;每周工作 85 小时,一周工作 7 天,没有加班费或休假形式的补偿,这些都被视为惯例。

然而,假设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只限制在工厂内发生,这种想法并不正确。以前面讨论的马克思的生产范畴为基础,不难想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更加一般的概念,一个超越了特殊生产过程的概念(Buchanan 1979)。要记得马克思认为我们全体(all)每时每刻(all the time)都在生产。因此生产是生活的基本过程。<sup>①</sup> 生产“不仅为主体创造一个客体,而且也为主体创造了一个主体”(Marx 1973, 92)。在资本主义中,这种循环的、连续的生产过程与转变使用价值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过程相交。通常这发生与雇佣劳动关系下,就像常常发生于马克思所称的“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之外。考虑到在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因特网背景下对知识和信息的日益依赖、商品化以及控制,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这种趋势加剧了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sup>②</sup> 就像福克斯与齐默尔曼所解释的:

……知识不仅在企业中以知识商品的形式被生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由例如教育孩子的父母、参与日常政治的公民、生产社会意义的媒介消费者来生产,他们由此成为产消者(prosumers), Myspace、YouTube 和 Facebook 等的使用者生产被资本挪用的信息内容,广播听众和电视

---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生产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论证上并不自洽,因为“生产”这个术语意味着终结,无法代表网络世界中不间断的创造过程,因此应当被诸如“造用”(produsage)这样的术语来取替(布伦斯 Bruns 2008)。

<sup>②</sup> 当越过因特网固有的“渗漏的”(leaky)知识和信息商品,试图声称和保护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时,这个矛盾就日益展开。

观众为了与演播室嘉宾讨论及传达观点在直播中打进现场电话,这些谈话和观点在实时(real-time)经济中被瞬间商品化,等等。因此,知识生产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的过程,但是知识被资本挪用,通过这种挪用,知识生产者变得就好像是传统工业劳动的一个被剥削阶级。(Fuchs and Zimmerman 2009,95)

遵循这一论点需要废除在工作与休闲之间、在生产与再生产之间作任何有意图的区分。事实上,就如亨宁格(Max Henninger)所说的“生活时间和生产时间完全重合”(Max Henninger 2007,170)。虽然这是一个激进的论断,但它对于记得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论题的媒介研究学者们来说并不是完全崭新的。斯迈思的论点为说明马克思的剥削过程关系本体论如何可以被延伸至现代传播领域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如同文森特·莫斯科阐释的,对斯迈思而言,媒介商品化过程:

……这个过程形成三位一体,它把媒介、受众和广告商联结在一种有约束力的互惠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ships)中。大众媒介的节目安排用来建构受众,广告商为取得受众而付钱给媒介公司,受众于是被转交给广告商。这种观点扩展了媒介商品化的空间,使商品化不仅包括媒介公司出版报纸、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等直接过程,而且把广告商或资本一般也包括进来。商品化的过程使媒介产业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这主要不是因为媒介产业制造了充满意识形态的产品,而是因为它为广告商生产受众,并且(en masse)是符合广告商需要的特定的人口学特征的受众。(Mosco 2009,137)<sup>①</sup>

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的贡献在于它是一个生产性的、动态的隐喻,因为它——

提供了思考前面所说的“三位一体”的方法,同时又不至于陷入这

---

<sup>①</sup> 中文摘自文森特·莫斯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4页。——译者注

种结构论述经常带来的机械论的思考之中。(Mosco 2009,137)<sup>①</sup>

它反而提供了一种剥削的过程关系的理解,文森特·莫斯科呼吁媒介和传播研究要将“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放在最显著的位置”(Mosco 2009,129)就是一个例子。这就必须选择不同的切入点,以便来强调——比如说凝结在由私人实体挖掘流行故事的商品化过程,而不是仅仅由媒介机构开始和结束研究。

事实上,随着 Web 2.0 及被称作“产消者商品”(Manzerolle 2010)的兴起,斯迈思的观点在今天看来甚至更加有启发性。Web 2.0 已经为自治论者所称的“社会工厂”——“社会的总体包容”提供了整体的新批次工人(Negri 1996,150)。就像费舍尔(Erin Fisher)在其近期书中写道的:

新经济日益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实际上是以没有得到补偿或……包括了新的、更加不稳定和部分的补偿方式……的劳动为条件的,自从引入了网络技术,这些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新关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公司在攫取利润时越来越有经验,它们只返回极少量金钱或不付钱给工人。(Fisher 2010,118)

因此,可以说 Web 2.0 与网络技术总体上促成了新的生产关系,目的是开拓剥削的新途径。“众包”(crowdsourcing)实践的持续完善及其他从“免费时间”(free time)剥削价值的手段能够最清楚地显示这种剥削的“强化”。费舍尔指出了某期《连线》(*Wired*)杂志的封面——“众包:上亿的外行想要你的工作”。就如费舍尔指出的:

威胁是清晰的:某人在劳动队伍中的位置更多地不是来自其他工人的威胁,而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一个新的……外行预备部队。(Fisher 2010,117)

但是,自治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工厂”不仅指延伸至工厂与

---

<sup>①</sup> 中文摘自文森特·莫斯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5页。——译者注

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价值攫取的数量上的扩大,而且指通过工人在生产循环中被动员起来的特有“精神”所实现的资本主义强化的质态(贝拉尔迪 Bernardi 2009)。这是个非常激进的论断:人类不仅在其整个生命中被导致是生产性的,而且资本主义被认为通过同时生产“主观性与经济价值”(拉扎拉托 Lazzarato 1996)“侵入我们的生活”。该观点不仅激进,而且是对马克思的生产“不只为主体创造客体,也为客体创造主体”(Marx 1973,92)论断的修复与重新解释。

所以,只有理解对马克思而言的生产既是(both)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Marx 1990)特定的活动,也是一种人类“类存在物(species-being)”(Marx 1973,1988)普遍进行的活动,马克思剥削理论才会对现代传播和媒介学术具有延续不断的活力。在马克思的一般生产概念中,我们可以找到潜藏其中的传播研究的灵感,即批判所谓的“产用者”(producers)或“产消者”(Fuchs 2010; 2011)剥削、“双重剥削”(double exploitation)<sup>①</sup>(Murdock 2011)、以及社交剥削(exploitation of sociability)——安卓耶维克(Mark Andrejevic 2009)所指的“剥削 2.0”(exploitation 2.0)——所有现代信息资本主义下剥削强化的例子。这种批判学术有助于讨论这样一种观点,即剥削存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的锅炉房中,并不存在于我们的网络化信息资本主义闪亮新世界。

## (二) 扩大

剥削“强化”通过试图使日常生活更加有生产力价值而与剥削“扩大”同时存在——扩大是指剥削关系的空间扩张。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因为剥削程度总是反抗剥削斗争状态的结果,对剥削强化的抵抗越剧烈,扩大对于维持价值积累就越重要,反之亦然。

资本主义为了——常常至多是部分地和临时地——解决它的矛盾,始终不可避免走向地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创造。而在这点上,传播长期以来都是重要的,并且日益重要,因为计算机已从一个计算设备转变为一种穿越空间的“协调技术”(coordination technology)(Malone and Rockart

---

<sup>①</sup> 默多克(2011,33)认为当那些付出免费劳动的“产消者”之后不得不作为消费者支付“价格溢价(price premium)”给“他们的劳动果实”时,双重剥削就会发生,因为联合创造的产品常常比那些由传统生产制度制造的产品成本更高。

1991)。

诸如像卡斯特等网络理论家已深入研究全球网络是如何出现及如何转变生产过程。卡斯特所说的“网络企业”(the network enterprise)(Castells 2000a, 163—215)是一种应对网络逻辑与技术更加广泛的联合而产生的新的组织形式。卡斯特的全球生产系统依赖于:

公司之间、每个主要公司的分散化单位之间,以及彼此连接且与大公司或公司网络连接的中小型企业网络,彼此的策略性联盟和特别(ad hoc)合作计划。(Castells 2000a, 123)<sup>①</sup>

然而,卡斯特的全球生产网络并没有与所有那些被卷入生产过程整体的人和物协同扩展(co-extensive)。在这里网络隐喻似乎妨碍了对那些直接存在于生产链条之外的部分进行分析。这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卡斯特的关注点在:

生意如何被组织(发展方式)(mode of development),而不是这种组织的社会特征(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Stadler 2006, 56)。

但是,存在于这些生产链条“内部”与“外部”的内容是相互构建的,或是内在(internally)相关。就像上文所讨论的剥削“强化”,再生产时间与它所产生的价值在剥削的“扩大”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换句话说,再生产成本与生产成本超越了全球经济的不同空间,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马西莫·安吉利斯写道:

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中……最令人厌恶的人类实践不仅仅“仍然”存在于某个遥远的大陆,是古老时代的遗产,而是反而变成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构成环节(constituent moments)。因此,比如说现代奴隶制度……在全球生产链条向上逆流(trickle up),通过提供给劳动力更廉价的食物和更廉价的一般再生产条件、因而降低了劳动力价值来实现这

---

<sup>①</sup> 中文摘自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43页。——译者注

种逆流,这里的劳动力可以用通过即时通信与其美国客户联系的技术熟练的印度程序员来说明。(De Angelis 2007,72f.)

“逆流”的概念允许我们将马克思最普遍的生产范畴——作为生活的生产——吸收进等式中。正因如此,这对按照过程关系方式来理解剥削是一条有益途径,因为它迫使我们把生产看作为一个内在地与其整体关联的过程。

甚至当我们离开“超经济”(extra-economic)过程的分析,走进标准雇佣劳动生产方式时,我们也无法不考虑内在关系。这样做实在太容易了。对“高技术”、知识密集型公司“非物质”工作的关注经常转移我们对现实的注意力,这些工作实际上由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来认购的。正如卡芬特齐斯(George Caffentzis)阐释的:

为了获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平均利润率,雇佣极少劳动力、但大量使用机器的工业部门必须能有权要求得到高劳动、低技术部门创造的价值池(the pool of value)。如果没有这种部门或没有这种权力,那么平均利润率就会在高技术、低劳动工业中变低,以至于所有投资都会停止,制度也会终结……计算机需要血汗工厂,电子人存在的前提是奴隶。(Caffentzis 2005b,34)

或者如同卡芬特齐斯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所表述的,“一如资本主义既往历史,技术上的飞跃来自于对最有技术的挨饿工人金钱的骗取”(引用自Henninger 2007,163)。这意味着,“实际吸纳”和“形式吸纳”在马克思的术语中不仅同时共存,而且共同关涉(co-implicated)。因为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所以实际吸纳永远不能完全取代形式吸纳。就像卡芬特齐斯解释的:

如果高有机组成部门无限增长,利润率就会降到零……除非有抵消力量来将重担交还给形式吸纳队列。(Caffentzis 2005a,107)

“全球工人”是一种容易引起共鸣的说法,即马克思所指的“那些劳动对生产成品必不可少的所有人”(Mandell 1990,945);它们的个体工作已变成

“合作整体”(co-operative totality)的一部分(同上,946)。因此,如果不将在中国组装电脑的女性外来打工者包括在内,我们就无法谈论“知识工作”(参见 McKercher, Mosco and Huws 2010)。也就是说,我们对“知识工人”的定义必须足够开阔,以容纳光谱另一端的那些(经常被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对于给西方所谓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及其产品/服务以特权的“网络”和价值链是必要的。

卡斯特的二元(生产方式/发展方式)路径包含了这样一种意思,即网络社会被认为优先考虑这些能为网络增加知识、并能紧跟快速技术发展的高级技术工人。当然,其必然结果就是低级技术工人面临被排斥的危险,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知识去交换、因而带给网络较少价值。当排斥变成唯一的关注,剥削也因此成为一个盲点。这就是发展方式中的转变被理解为是内在(internally)如此关键的原因,在全部的生产方式中——运行逻辑仍然是对“全球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剥削。

很明显,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下的权力运作,我们就不应听从卡斯特、拉希和其他网络理论家的召唤来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剥削转移到排斥上。卡斯特(2009,33)认为:

对大多数世界人口的首要关注要避免枝节问题,而是要从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例如我们所说的剥削——因为剥削确实对被剥削者有意义。

我们势必要抛弃这种肤浅和宿命论的观点。如果没有剥削理论,现代资本主义、它的矛盾和危机甚至就无法被理解。当我们开始意识到“网络”技术、“网络”生产与剥削的“强化”和“扩大”之间的关系时,这一点愈发明显。

就像马克思所认为的,与诸如奴隶制或农奴制这些从前的剥削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是通过一系列复杂弯路来掩饰其剥削的能力。剥削无疑愈发难以通过现代全球生产链来追踪和测量。与此相反,排斥变得更加明显和易于辨认。内罗毕(Nairobi)的清洁工是——不论追踪和测量会多么困难——剥削链条中的第  $n$  个节点;作为被价值生产排斥在外的不重要网络“被排斥者”。这是一个某些行动者转移到价值链中不太理想位置的过程,而不是完全将他们从链条中移走。简言之,比“排斥”更大的问题是“边

缘化(marginalization)”。

当然,任何人都不应该在批判剥削或批判排斥之间做选择。排斥和剥削有一种亲密关系,这是其自身过程关系。对劳动力的剥削正是、并始终依赖于一种结构性失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这一点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就如波尔坦斯基与夏佩罗所说,“企业之外的排斥往往始于内部剥削,尤其是不合格工人或非正规工人”(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404)。而且,企业排斥有时候是由其内部的剥削程度直接导致的。比如戴尔·韦斯弗德与德·波特在他们所做的电子游戏工业研究中发现:

……超长的工作时间……被这种男性主导的文化活动所榨取,车间转而成了妇女参与的屏障,她们常常背负着“第二班”(second shift)重担……在家等着她们的孩子照着和家务劳动。(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 2006,607)

“社会工厂”的概念警醒我们有一个问题将会日益引人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将会紧随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其外部剥削的能力增长。虽然这也许是建立在一种旧实践基础上的新趋势,这种旧实践的最著名描述是马克思关于“所谓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论述。因为对公有物的剥削总是首先要求驱逐(剥夺)那些合理地认为公有物属于自己的入口。只有排斥屏障被定为法律后,租金才能被抽取。因此排斥既是这种剥削形式的症状,也是(and)最典型行为。<sup>①</sup> 换句话说,排斥与剥削就是内在相关的它们自己。

## 五、结论:网络与剥削

本文试图完成两个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说明网络隐喻势不可挡的流行,像所有隐喻一样,作为一种启发性设计是有用的,但对权力影响不是没有责任的。我们选择怎样描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直接的政治意义。我认为尽管网络隐喻可以说明遍及当代社会的新的组织形式,但它同样有助

---

<sup>①</sup> 大卫·哈维(2005)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这种过程的辩证认识,即他称为“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一种连续的“原始积累”演变。



于将社会批判聚焦于排斥问题而忽视剥削过程。<sup>①</sup> 虽然排斥是一种重要而明显的非正义(unjustice),但如同卡斯特(2009,33)及其他网络理论家(例如拉希 2002,4)所认为的,排斥不是“网络社会”中最显著的非正义方式,剥削也不是排斥的衍生物(Murphy 1985)。与此同时,本文的目的在于强调剥削——网络的“盲点”——这并不应当将“排斥”看作是一种幻象。相反,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排斥过程与剥削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

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然而“排斥”作为社会批判的中心议题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事实上,“剥削”似乎更能胜任这个角色,它提醒了我们共享的和动态的社会现实基础。但是,不同于遵循波尔坦斯基与夏佩罗的引导和创造一个更加适合于一个“联系主义者”世界的新剥削理论,本文认为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可以提供给这个世界的剥削理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本文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是说明在现代“信息资本主义”中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为何仍然与批判权力有关。首先我展示了网络理论如何植根于一个与马克思的本体论有很多共同点的过程关系本体论。马克思对过程(process)和关系(relation)的独特理解、对矛盾(contradiction)的认识都与现代网络理论家的理解和认识截然相反,尤其是卡斯特,还有哈特与奈格里。这种共同的过程关系(process-relational)视角使我们得以理解马克思的当代意义,但是这些主要的区别——产生重要影响的差异——必将恢复批判的活力。

彼得·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批评卡斯特呈现了“没有排斥者(the excluders)的被排斥者”(引自 Stalder,2006 140)。但是我认为这个批评不能仅限于对卡斯特。相反,似乎所有围绕网络隐喻形成的社会批判都天然地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网络理论家将权力看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流”,通过制定网络“操作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的协议来运作。福柯式(Foucaultian)的权力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权力被视作通过互相连接的网络不断变形构成来渗透社会——这种将权力视作为一种“资源”(resource)、产生于一个固定的外部位置的观点常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不管怎样,我希望本文对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与其伴随的

---

<sup>①</sup> 在我批判网络隐喻的“盲点”时,我非常同意费利克斯·斯塔尔德的评价,他认为网络社会论题预示了“在对可能性、或者甚至是愿望这样一个研究项目的多年后现代悲观主义(postmodern pessimism)之后,社会学宏大理论的回归”(Stalder 2006,1)。这通常是受到欢迎的,但是我将其主要归因于过程关系本体论对这个论题的引导,过程关系本体论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回到结构形式和规定这些形式的相关过程。

剥削理论的说明使这个事实更明确,即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我认为马克思的内在(internal)关系哲学思想、他的通过“生产”范畴实现的过程的物化、以及矛盾所产生的统摄作用,使得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得以发展扩大(writ large)。相应地,我初步尝试说明——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过程关系解读对于那些旨趣在当代信息资本主义中批判剥削的当代传播和媒介学者,如何显示了其持续的相关性和潜力。

综上所述,伯特尔·奥尔曼简要总结了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所隐藏的意义:

马克思的探索……从不以研究事物开始变化(好像它还没准备好变化)的原因为目的,而是要研究这种变化具有的各种形式以及变化为何似乎(appear)已经停止。而且,他的探索从不以一种关系是怎样建立(好像那儿之前不存在关系)为终点,而再次要研究关系所采用的不同形式,以及一种已经存在的关系的某些方面为何看起来(appear)是独立的。(Ollman 2003,14)

当我们望向窗外,所处的世界似乎日益变化不断、日益相互连接,我们要面对的任务就是不要被这些表象迷惑而得意忘形。相反,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表象怎样取得了特定形式,以及它们为什么以特定方式向我们展现其自身。这么做可以使我们自己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即意识到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与流行看法完全不同,它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等级世界的遗迹,而是一种非常适合于在当代信息资本主义中批判权力的社会关系理论。

### 参考文献:

Andrejevic, Mark. 2009. Critical Media Studies 2.0: An Interactive Upgrade.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1(1):35—51.

Barabási, Albert-László. 2003. Linked: 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71(4):409—410.

Barney, Darin. 2004.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arzilai-Nahon, Karine. 2008. Towards a Theory of Network Gatekeeping: A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Information Contro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9(9):1493—1512.

Béland, Daniel. 2007. *The Social Exclusion Discourse: Ideas and Policy Change*. Poli-

cy & Politics 35(1):123—139.

Berardi, Franco (Bifo). 2009. *The Soul at Work: From Alienation to Aut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2006.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Bruns, Axel. 2008.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cership*. New York: Peter Lang.

Buchanan, Allen. 1979. Exploitation, Alienation, and Injustic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9(1):121—139.

Caffentzis, George. 2005a. Immeasurable Value: An Essay on Marx's legacy. *The Commoner* 10:88—114.

Caffentzis, George. 2005b. The End of Work or the Renaissance of Slavery? A Critique of Rifkin and Negri. *Common Sense*, no. 24. Accessed March 15, 2007.

<http://commonsensejournal.org.uk/files/2010/08/CommonSense24.pdf#page=22>.

Callinicos, Alex. 2006. *The Resources of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Capra, Fritjof. 2004. *The Hidden Connections: A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Living*. New York: Anchor Books.

Castells, Manuel. 2000a.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2000b. Materials for an Exploratory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1):5—24.

Castells, Manuel. 2000c. *End of Millenniu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II*.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Castells, Manuel.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Castells, Manuel. 2011a. A Network Theory of Po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73—787.

Castells, Manuel. 2011b.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shop: The Promise of Network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794—795.

Cavanagh, Allison. 2007. *Sociolog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Berkshire: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De Angelis, Massimo. 2007.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Dyer-Witheford Nick and Greig de Peuter. 2006. 'EA Spouse' and the Crisis of Video Game Labour: Enjoyment, Exclusion, Exploitation, and Exodu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

munication 31:599—617.

Emirbayer, Mustafa.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281—317.

Fisher, Eran. 2010. *Media and New Capit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The Spirit of Network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Foucault, Michel. 1991.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Penguin Books.

Fuchs, Christian. 2007. Transnational Space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21st Century Society* 2(1):49—78.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Reflections on Manuel Castells’ Book *Communication Power*. *tripleC —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7(1):94—108. Accessed November 3, 2011. <http://www.triple-c.at/index.php/tripleC/article/viewFile/136/90>

Fuchs, Christian.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179—196.

Fuchs, Christian. 2011.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ide Web: Social Medium or New Space of Accumul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Med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Media Industries*, edited by Dwayne Winseck and Dal Yong Jin, 201—220. London: Bloomsbury.

Galloway, Alexander. 2004. *Protocol, or,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Gane, Nicholas and David Beer. 2008. *New Media: The Key Concepts*. Oxford: Berg.

Garnham, Nicholas. 2004.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y as Ideolog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ader*, edited by Frank Webster, 165—184. London: Routledge.

Gould, Carol C. 1978. *Marx’s Social Ontology: 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ty i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Real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9.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arn, Alison. 2010. Reality Television, The Hills, and the Limits of the Immaterial

Labour Thesis.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8(1): 60—76.

Henninger, Max. 2007. Doing the Math: Reflections on the Alleged Obsolescence of the Law of Value under Post-Fordism.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7 (1): 158—177.

Hepp, Andreas, Friedrich Krotz, Shaun Moores and Carsten Winter, eds. 2008. *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Flows: Conceptualizing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

Jessop, Bob. 2001. The Stat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Knowledge-Driven Economy.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Lancaster LA1 4YN. Accessed March 25, 2012.

<http://www.comp.lancs.ac.uk/sociology/papers/Jessop-State-and-Contradictions.pdf>

Lash, Scott. 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Law, John. 2003. Networks, Relations, Cyborg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Technology. Published by the Centre for Science Studies, Lancaster University; Lancaster. Accessed December 30, 2011.

<http://www.comp.lancs.ac.uk/sociology/papers/Law-Networks-Relations-Cyborgs.pdf>

Lazzarato, Maurizio. 1996. Immaterial Labo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133—147.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lone, T. and Rockart, J. 1991. Computers, Networks and the Corpor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65, No. 3, 128—136.

Mandel, Ernest. 1990. Introduction to "Appendi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Manzerolle, Vincent. 2010.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 *Ephemera* 10(3/4): 455—469.

Marcuse, Peter. 2002. Depoliticizing Globalization: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of Manuel Castells. In *Investigating the City: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ohn Eade and Christopher Mele, 131—158. Oxford: Blackwell.

Marx, Karl. 1972.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Martin Nicolaus.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

guin.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4. *The German Ideology*, edited by Chris J. Arthu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ttelart, Armand and Michèle Mattelart. 1998.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cKercher, Catherine and Vincent Mosco. 2010.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4 (2): 1—9.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8.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Murphy, Raymond. 1985. Exploitation or Exclusion? *Sociology* 19(2): 225—243.

Murdock, Graham. 2011.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 Good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11—40. Oxford: Wiley-Blackwell.

Negri, Antonio. 1996. Twenty Theses on Marx,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 Situation Today, 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 edited by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149—180. New York: Routledge.

Ollman, Bertell. 2003.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omeroy, Anne Fairchild. 2004 *Marx and Whitehead: Process, Dialec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Quandt, Thorsten. 2008. Network Theory and Human Action: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In *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Flows: Conceptualizing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Andreas Hepp, Friedrich Krotz, Shaun Moores, and Carsten Winter, 111—133.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

Ross, Andrew. 2009.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talder, Felix. 2006. *Manuel Castells and the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Polity Press.

Thrift, Nigel. 2002. A Hyperactive World. In *Geographies of Global Change: Remapping the World*, edited by R. J. Johnston, Peter J. Taylor, and Michael J. Watts, 29—42.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Urry, John. 2003. *Global Complex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an Dijk, Jan A. G. M. 2006. *The Network Society: 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Watts, D. J. 2003. *Six Degrees: The Science of a Connected Age*. New York: Norton.

Watts, D. J. 2004. 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243—270.

Webster, Frank. 1995.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Wayne, Mike. 2004. Mode of Production: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Napster File. *Rethinking Marxism: 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6(2)137—154.

Wildman, Wesley J. 2010. An Introduction to Relational Ontology. In *The Trinity and an Entangled World: Relationality in Physical Science and Theology*, edited by John Polkinghorne and John Zizioulas, 55—73. Grand Rapids: Eerdmans.

詹纳吉·浦若迪尼克(Jernej Prodnik)<sup>①</sup>

##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 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

王华(译),张韵、吴畅畅(校)

[导读]《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A Note on the Ongoing Process of Commodification: From the Audience Commodity to the Social Factory)是斯洛文尼亚学者詹纳吉·浦若迪尼克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从马克思到安东尼奥·奈格里,从生产到消费,从物质生产到非物质生产,从报纸到谷歌、脸书网,从商品形态、商品化到批判政治经济学,从批判传播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系统地引领读者进行了一次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旅行。

所有资本主义研究都不应该忽略商品形态和商品化过程。在流通交换过程中,不加夸张地把一切事物转换成私人商品的过程,它对于资本主义增值和再生产来说至关重要。这在马克思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著述中都有所体现。从这一点出发,浦若迪尼克论证了商品形态和商品化过程在上述批判理论核心著述中是如何被分析的,以及根据这些作者所言,作为社会与社会关系的商品形态的全球化后果是什么。继而,他讨论了商品化在商品拜物教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相应的交换如何促成了人的个体化。文章认为,“当下是一个一切事物持续商品化的全球化过程,包括文化、创造

---

<sup>①</sup>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科学系社会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和媒介研究系教学助理。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政治经济批判(尤其关注传播)以及技术变迁的广泛社会语境与新技术带来的民主可能(包括电子民主和电子参与),jernej.prodnik@fdv.uni-lj.si。



力、信息和多样传播形式,这些类别逐渐成为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文章关注了这些话题如何与商品批判研究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发生关联,应该说,它主要通过斯迈思的“盲点辩论”和“受众商品”讨论而实现。

浦若迪尼克最后讨论了商品化在数字时代如何渗入整个传播过程并生产了新商品。他将上述结论发现与最近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相联系,特别是主张自治主义/后工人主义作者的研究发现,试图说明对这一知识链的审视如何能够借助交际资本主义、语言资本主义和社会工厂等概念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提供一种理解。这些商品化过程有必要被再次提出并加以强调,它既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注入理论力量,又是对推动这一过程的社会语境和社会变迁的现实考察。

值得强调的是,在后福特资本主义时代和新媒体语境下,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越来越富有意义,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成了学者们将资本主义与传播、信息、语言联系在一起的现实前提。浦若迪尼克在认同这一点的基础上,特别引入了自治主义/后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者提出了消费工人、非物质劳动、社会工厂等概念,认为传播甚或诸如语言才能之类在现代社会获得了霸权地位,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一个新来源,正所谓“资本主义结构性趋势,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世界综合经济体系,它不仅商品化和定价化了所有物质和社会生活,而且将人类生活本身(即物种存在)纳入进了它的积累周期:言语以及说话[逻辑]能力、我们的感受和情感以及我们进行活动的人类一般能力。这一趋势决定着没有第二个人类生命将会通过脱离工具理性和详细算计的经济循环而被浪费掉。每个人类行为都被覆盖,社会生活每一方面都被仔细测量。”商品化已经侵蚀和改变人类接触与社会关系。它不仅在大众传媒领域工具化了传播,也可能侵犯人际传播,将人类变成机器人。当商品开始统治社会,使用价值的任何独立可能性都是被根除的。任何缺乏交换价值、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变得一文不值、可有可无和无关紧要。除了社会沟通向度外,信息传播不能只被看成是诸多商品类型的一种,它们是我们认为的建立在不受压迫和表达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和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之,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基于商品化的一次传播政治经济学历史考察,同时也是对多种理论交锋的呈现与讨论。论文对于全面梳理西方传播理论史、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理论同源关系、深入理解传播与公共性问题、全面认识信息的解放与压抑力量、受众研究转向以及新媒体政治经济

学内涵都具有较高的启示意义,同时,它也为当下深入阅读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和多元传播思想提供了契机,对深入、全面地总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播思想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实践及其特性,提供了一种参考。

[关键词]商品形态,商品化,抽象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批判,社会工厂,受众商品,网络,传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批判传播研究

## 一、引言

尽管经常被忽略,商品形态和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中却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阿多诺(Adorno 2001/1991)、德波(Debord 1970, ch. 2)、卢卡奇(Lukács 1971)、佐恩·雷特尔(Sohn-Rethel 1972; 1978)、克利弗(Cleaver 2000/1979)、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83, ch. 1)、胡斯(Huws 2003)和波斯通(Postone 2003/1993)这些研究者,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一所谓的“资本主义细胞形态”上,如同商品成了马克思著述的特征与标志一样。商品形态<sup>①</sup>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它在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起到关键作用。从马克思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著述到他的后期观念,其中都包含着商品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发展演进(Marx and Engels 1976; 1987; Marx 1993/1858; 1990/1867; 同时参见 Murdock 2006; Barbalet 1983, 90f.)。即使在后现代性语境下,商品化过程也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普遍维系和资本持续扩张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历史地看,在流通交换过程中,不加夸张地把一切事物转换成一个(虚拟的)私人化商品形态的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增长和再生产来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只有通过为交换而进行的各种商品生产,资本家才能从劳工身上榨取剩余价值(Huws 2003, 61)。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论证商品形态和商品化角色在非正统批判理论核心著述中是如何被分析的(这些理论既体现在马克思著作中,也体现在其继承者的著述中),以及根据这些作者所言,作为社会与社会关系的商品形

---

<sup>①</sup> 佐恩·雷特尔(Sohn-Rethel)仔细考察了“形态”(form)术语,他将其定义为受时间限制的:“它与时间一起产生、死亡和变化”(1978, 17)。这应该能够区分马克思及其辩证思考与所有其他思想学派。詹姆斯(2011, 35)认为,“形态”这一单词防止了具体化或物化金钱、交换关系等,它们是首要的社会关系。

态的全球化的主要后果是什么。文章接下来三个部分将对此进行阐明,其中我将密切关注商品形态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是如何被分析的(第二部分),及其是如何关系到广泛的历史变迁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第三部分是对追随马克思的不同批判学者如何分析上述进程所做的一次密切观察,它将有助于澄清商品化在商品拜物教兴起中所发挥的作用和相应的交换是如何促成人类个体化的(第三部分)。在第四部分,争论将被进一步扩大,具体通过论证当下全球性的商品化是如何裹挟了一切事物,包括文化、创造力、信息和多形式的传播,而这些类别正在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信息社会的基础。此外,我还比较关注,这些话题如何与商品批判研究发生关联,特别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参见 Mosco 2009, ch. 7)。后者首先并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盲点辩论”(与同时出现的“受众商品”论)的重新评估而得以实现,这些论点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sup>①</sup> 第五部分将有助于阐明商品化如何借助数字化能够渗入整个传播过程并创建新商品。在最后一部分,即第六部分,这些结论发现被关联到最近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上,特别是那些主张自治主义/后工人主义的作者的研究发现。我将试图表明的是,对这一知识链的审视如何能够借助交际性(Communicative)、语言资本主义和社会工厂等概念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提供一个理解,以及它如何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几种融合性论点。

论文的主要前提是,在后福特资本主义时代,传播将越来越富有意义。传播渗入并源自社会结构的各个角落;无论如何,这一观念在当前历史时期显得特别重要,各阶层人们和社会生活在这一时期似乎完全被传播所渗透(比如认同社会媒介化的各种观念)。然而,传播同时也变得几乎完全商业化。后工人主义理论称,传播或甚诸如语言才能之类在现代社会获得了霸权地位,同时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一个新的来源。由马克思、马克思早期追随者和对“盲点辩论”有贡献的作者提出的一些说法,因而需要被再次提起与强调,因为这种显著(但不是根本地)变化的社会语境和技术变迁正在进一步推动商品化的扩大。

---

<sup>①</sup> 斯迈思于1977年在他的文章《传播》中发起了这场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它引起了一些回应和修正,最著名的是默多克(Murdock 1978)一年后的回应以及同年斯迈思(Smythe 1978)对默多克的答辩。

## 二、商品形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角色与作用

在卢卡奇看来,当马克思决定展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开始在其重要作品中进行商品分析,这绝非巧合。按照卢卡奇的说法,商品化问题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方方面面的中心的、结构性问题”(Lukács 1971,83)。它不应该被看作是孤立的或仅仅是经济的中心问题,因此也就意味着在对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批判的时候,这个问题很难被忽视。马克思(Marx 1990/1976,90)认为,商品形态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同样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连的历史范畴)的成果,它是目前历史时期的经济细胞形式之一。这些范畴促使马克思在最抽象的形态中,同时也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抽象化看作是对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一种主要(或许只是可能)手段,它连同辩证法一起促使探究者超越了对事物仅仅是表面的分析。<sup>①</sup>

从马克思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到其后来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商品的关键作用,同时许多著作家也坚信这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所有分析的杰出起点(比如 Lukács 1971; Sohn-Rethel 1978; Postone 2003/1993)。在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例如 1847 年法语版《哲学的贫困》中(Marx and Engels 1976,105—212),他讨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特别是交换价值,以及在生产者进行各自商品交换的社会中,后者成了商品生产不可改变的必然部分。在这个时候,他界定了商品的价值法则取决于凝聚在商品身上的劳动时间(他还写到了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这也是他后期著述中出现的一个更加精确的思想)。于是,劳动时间成了价值的测量标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

<sup>①</sup> 自然科学的实验设计被社会科学的抽象能力所取代。例如,理论总是对经验现实的抽象,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必须建立在同样的现实之上,马克思同时指出“如果事物的表面形态直接等同于它们的本质,那么所有科学都将是多余的”(Marx 1991/1981,956)。他说,正是在这里,“庸俗经济学完全感觉精通此道,这些关系越是不言自明地出现,它们的内在联系越是难以发现”。(如上)伊格尔顿(Eagleton 1996,6)认为,在事物实际上是什么和看起来是什么之间,总有一个差距;所以说,本质和表象之间存在差别,因为后者需要被穿越或避开从而能够认识现实(see Barbalet 1983,23f.; Postone 2003/1993)。因此可以声称,辩证法和抽象化两者的核心目标之一即是超越事物单一表象进行分析,(在几种机制同时运行下)仅仅分析具体现实是不可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事物不是仅仅晦涩难懂或者如其表面似的。Barbalet(1983,24)指出,正是商品拜物教(本文后面有所讨论)的社会作用整体性地揭示了这一点。对表象和现实矛盾更详细的分析(和关注超表象和反表象的问题)同样可见于 Collier (1994,6f.)关于批判现实主义后理论状态的阐释。

(Marx and Engels 1976, 130), 劳动本身是商品: 劳动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如果有两件产品(商品)进行交换, 其中所进行的是等量的劳动交换, 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劳动时间交换(Marx and Engels 1976, 126)。正如马克思的经典陈述: “时间是一切, 人什么也不是; 他最多是时间的架子。质量不再重要。数量独自决定一切; 一小时就是一小时(hour for hour), 一天就是一天(day for day)”(Marx and Engels 1976, 127)。当然, 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特性, 而不像蒲鲁东(Proudhon)当时所认为的什么永恒正义。

根据默多克(Murdock)的看法, 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候, 就已经确认了“商品化是推动资本主义扩张的中心动力”(Murdock 2006, 3)。在所有事物面前, 它因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身体到精神, 这些在人类历史中原本从来不会被兜售或购买的东西, 被拿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同上, 同时参见 Marx and Engels 1976, 113)。可能因此在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中, 商品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中的作用几乎没有被夸大。商品形态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资本积累循环系统中的血液, 而这种积累循环系统是资本主义持续再生产必不可少的。<sup>①</sup> 这也显示了商品形态是资本主义严肃批判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一思路得到了传播学批判研究, 尤其是那些遵循斯迈思路径的学者们的极大继承和发展。比如莫斯科可认为, 商品化过程即为“将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的过程”(Mosco 2009, 129, ch. 7), 它是构筑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的核心进程之一。

尽管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述中已经分析了商品形态, 但他的后期著作才格外地对商品形态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进行详细考察。最为详细的记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Marx and Engels 1987, 257—417), 该文写成于 1858 到 1859 年间, 被认为是《资本论》第一卷中他进行商品论述的基础(Marx 1990/1867)。在这些著作中, 这一称作“资本主义细胞形式”的所有部分得到了全面展开, 其中包括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间的区别: 前者是交换价值的来源, 后者可以生产使用价值各异的无数样式, 是现实物质财富的来源。交换价值或者是简单价值, 和抽象劳动都可以被视为

---

<sup>①</sup> 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积累循环的血液细胞, 它不仅仅是个类比或者隐喻。在原始积累分析中, 马克思实际上指出, “今天在美国没有任何出身证明的大量资本, 昨天是在英格兰流淌着资本家血液的孩子”(Marx 1990/1976, 920)。这至少含蓄地触及了其商品分析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即商品拜物教。该问题稍后本文会有讨论(尤其在 3.4 节)。

这些历史性“细胞形式”,也都是商品形态不可或缺的部分。<sup>①</sup>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所有这些类别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据马克思所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键区别在于“交换价值定位的劳动是抽象普遍的和统一的劳动”,而“使用价值定位的劳动是具体和独特的劳动,根据它的形式和适于的材料而构成无数不同种类的劳动”(Marx and Engels 1987,27)。因此可以说,抽象劳动是对社会有用的劳动,但是对个体是没有特别使用价值的。马克思认为,“普遍的劳动因此不是一个现成的先决条件,而是一个新兴的结果”(Marx and Engels 1987,286);它以一种潜在的状态存在于商品身上,并仅在交换过程结果下变得普遍。政治经济学关涉的主题只是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而所有被视为是交换价值的商品都“只不过是一定数量的凝结的劳动时间”(Marx and Engels 1987,272)。它后来引发了马克思的著名陈述“时间是利润的要素”(moments are the elements of profit)(Marx 1990/1867,352),泰勒制管理法则将其在生产过程中发展到了极致。

重要的是,尽管“交换价值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然而需要补充的是,它是一种隐藏在物质面纱下的关系”(Marx and Engels 1987,276)。这种持久的神秘化可以被视为马克思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之一,并于后来通过拜物教概念而得到充分发展。许多早期思想都来源与这一重要假设的核心观念:

这是劳动的一个独特特征,它假设交换价值导致不同个体间各种社会关系以一种不同事物间社会关系的扭曲形态出现。[……]只有日常生活规范才让它显得普通且平常,社会生产关系应该呈现事物形态,因此这些进入人们工作过程的关系表现为不同事物以及不同人的关系。在单一商品上,这种神秘化仍然是非常简单的。人们或多或少清晰地了解到,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间关系实际上是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朴素的表象消失在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中。货币制度的所有幻象出现在一种失败的认知上,这种认知是,尽管货币是一种具有清晰产权的物质对象,其代表的却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Marx and Engels 1987,275f.)

---

<sup>①</sup> 事实上,这种特殊类型的劳动特别地仅仅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同时是资本主义功能发挥的基础,导致了马尔库塞(Marcuse 1955,287—295)和波斯通(Postone 2003/1993)呼吁(如我们所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废除劳动。

这些结论发现产生了一些重要结果,也许其中最有名的是:虽然马克思的方法假设需要对资本主义工作认识抽象化(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但在由商品交换主导的现存历史时代也存在着一个一直在运行的、真实的抽象化。马克思强调,“抽象化在社会生产进程中每天都在进行”(Marx and Engels 1987,272)。这是在事实上不平等事物之间建构对等的一个前提。例如,将不同种类的有用劳动压缩为同质的抽象劳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使得内在于商品身上的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货币交换变得可能。其次,这些研究结果对认识社会生活在现有社会下如何构成影响巨大。最显著的是,商品形态在商品拜物教概念层面上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是什么,以及商品交换在人类的个体化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什么样的工具合理化原则被发展了?这些问题将在下一节中得到彻底分析。

### 三、商品化与个体化:历史变迁与商品拜物教

作为抽象劳动和世界范围内不同分工的结果,商品存在明确的社会特征并借助市场在不同个体及其私人劳动之间发挥影响。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进行商品交换的时候,它关系到的不是商品的物质属性,而是它的社会特征:核心是它与其他可用来交换的商品的关系(如不同种类有用劳动的产品)。通过市场,各种商品之间关系以及由此带来不同劳动的等价性得以形成。不仅所有的商品都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而且某一个商品只有借助一系列等式在与其他商品的关联中才得以存在。“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商品之间的真正关系。这是由彼此独立的不同个体所支撑起来的一个社会过程”(Marx and Engels 1987,282)。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著名陈述那样,它将创建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通过以商品拜物教为依据的事物和形态而建立的:

这只不过是人们各自之间明确的社会关系,在此假设,为了他们,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美妙形式。[……]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Marx 1990/1867,165f.)

因此,不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人来中介的,结果产生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关键的神秘性。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由其他事情所取代,在这一状况下,转换成了商品之间关系,同时创造了一个物质面纱(这直接将我们引向下文的个体化问题)。这种置换和商品拜物教背后的一般观念整体上来说相对简单的,但与此同时,它的难解也是出了名的(Balibar 2007,57)。之所以特别这样,是因为这一概念在我们如何生活在我们所生活的(后)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深远影响。

### (一) 历史变迁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

马克思提出的这些主要的抽象历史观念,对于社会后果分析至关重要,霍布斯鲍姆曾对此作过简要介绍(2011,130—132)。他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他的“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分析基础之上的。<sup>①</sup> 这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有关人类本性的基本存在论立场。正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描述的那样,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特定阶段相当抽象的记述是从人类开始的,人类劳动改变自然并来自于自然。这是创造和再造人类存在的基础和自然条件。处理和改变一部分自然或许被视为第一种占有。这种占有仅仅是人类劳动的一个方面,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交换,它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占有也在财富观念中被表现,但它非常不同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私人财产,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色所在(Hobsbawm 2011,130; May 2010)。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发明了劳动合作和社会分工,后者只不过是功能的专业化,促使人们生产超出维持生存所需的过剩与再生产个体与群体。此外,“剩余和劳动分工的存在一起促成了交换。但生产和交换最初只是将使用作为其目标”(Hobsbawm 2011,131)。当人类从自然中解放自己并开始“控制”(同时也改变了生产关系)自然,社会关系领域的重大变化随即发生。这些变化已经被部分指明了,后文将会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然而在历史意义上,这些变化既是上述劳动专业化的结果,也是货币形态发明以及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结果。这提供了“一个以前无法想象的程序基础,其中包括资本积累过程”(Hobsbawm 2011,131)。在资本主义制度最新阶段,工人因此被简化成仅仅是一种劳动力。

---

<sup>①</sup> 参见 Barbalet(1983)。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积累之间的彻底分离是这个时代非常明显的特征。再生产实际上脱离了——甚至是反对——(商品)生产,但二者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是相结合的(Fortunati 1989,8)。人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目的与先前的生产模式是根本不同的,后者专注于关涉人类生活再生产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对弗图纳提(Fortunati)来说,这意味着商品生产可以被定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点和如同描述资本主义本身法则一样的进行自我管辖的法则”(Fortunati 1989,8)。主要目标变成了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为了积累而积累——这种实现最大化积累的理性意图是辖制资本主义所有经济活动的一大“法则”(Wallerstein 1983)。

可以说,有一整个由不同范畴组成的复杂过程,它需要被开发(产生出质的社会变迁),从而打造出资本主义社会:从假定了生产的唯一目的在于交换(因而被交换价值所支配)的抽象劳动、商品形态和商品化(Marx 1990/1867,733),到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发现、劳动的社会(最后是全球)分工、以积累为目的进行的积累、以及无休止积累的一种历史的新的可能性。对于后者的可能性,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是物价稳定措施,通过生产过程实现购入商品价值的不断增加(Marx 1990/1867,711)。这种复杂性需要一种特定的资本关系及其生产,即资本家是一方面,付费劳工是另外一方面(Marx 1990/1867,724)。

我将在下一章节对这些变迁进行详细关注。为了对如马克思所界定的资本主义时代特定时期进行详细分析,我们首先应该转向《资本论》第一卷(Marx 1990/1867)。从表面上来看资本主义,人们会迅速发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裂痕明显,后者被定义为那些不拥有生产资料或者是被限制直接接触(因此脱离)生产资料的人。这一关键分离是通过所谓的原始(或主要)积累而特别建构起来的,原始积累可以被视为一种固有的、额外的经济过程,并由此对经济如何理所当然地“正常”地再造自身毫无影响。<sup>①</sup>正是原

---

<sup>①</sup> 原始积累(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个极端的暴力过程。近年来原始积累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兴趣,表明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仍然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它还表明,这一话题在当前社会十分重要。对这一概念重新解释的关键争论之一是,原始积累不是一个历史性的有限过程,它在资本积累起始阶段意义重大。实际上,它不断地再生产并成为资本主义永恒不变的而一部分,既建立又扩大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关于这一话题可以参考 Perelman(2000),Bonefeld(2001),De Angelis(2007, ch. 10),Prodnik(2011),或 Mezzadra(2011)的著述。Harvey(2003,144—152)用“剥夺”来表达“积累”这一术语的另外一面,明确表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进程的永久性。有关公共产品私有化,它关系到这些同样话题,参见 Bollier(2002)和 Boyle(2008)。

始积累历史地、顷刻之间促使了公地圈占、平民征用、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将不同活动与领域纳入商品交换关系,最后也将这些领域纳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用佐恩·雷特尔的话,私人占有的社会相比以往生产的社会)。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一过程非常有助于劳动力商品生产。它有效地阻止了人们获得生产资料,以及他们自己的生存财富,因此将他们推向了工资-劳动(同时创造了一个富于变化的社会结构)。默多克(Murdock 2011, 18—20)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者之一,一直强调圈地和积累过程的历史作用,这种积累是商品化发展中的一种剥夺,同时也迫使人们开始为工资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这一无法获得生产资料的事实是无产阶级的主要特征,它的发展最后促使了劳动力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体系中更大的无产阶级化(Wallerstein 1983, ch. 1)。当人们被拒绝(通常是强制的)获得生产资料时候,他们需要在劳动市场上出卖劳动以图生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次历史革新(经过一个时期的真正发展,最后将许多人推到了极端贫困)(Polanyi 2001/1944)。人们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在买者(资本家)和卖者(劳动者)之间进行一种自由和表面公平的商品交换。在大多数情况下,自身的身体及其所固有的能力是无产者所拥有的唯一商品,它们现在可以(或也必须)被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交换。资本家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购买者,只可以在一个特定时期“租用”劳动者,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sup>①</sup> 后者被看作是作为政治经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一个原则,体现为人类社会自由。它促使达成共识的双方在市场中进行表面上自由的交换,并促进劳动市场本身的发展。但马尔库塞指出,某一个体自由出售劳动力的事实,实际上是劳动力更加成为一种商品的前提。劳动合同因此在自由资本主义语境下“体现这种自由、平等和正义”(Marcuse 1955, 308)(当然也体现剥削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劳动力能够也只是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到目前为止,它的所有者,劳动力的归属个体,将其拿出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出售。为了让拥有者将其作为一种商品进行出售,他必须能够自我处理它,他必须是他自己劳动能力以及他自己的人的自由所有者”。(Marx 1990/1867, 271)随着资本家暂时地购买了劳

---

<sup>①</sup> 它经常未被足够地强调,但是如是个体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没有和不能拥有(交换)价值。包含着个体的商品潜在地持有价值:他们的生产能力—劳动力。资本主义因此没有占有劳动者,但占有的是他的劳动,这种交换在具体现实中借助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发生,但是却发生于具有生产能力的个体和资本之间(参见 Fortunati 1989)。

动者的劳动力,他(或她)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雇佣他(或她),其中前者可以直接控制后者,确保工作的完成。最后,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生产了(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后者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源泉。<sup>①</sup>

## (二) 商品交换与社会总体

这一简短总结对于那些已经充分认识马克思的人似乎显得多余,但是对于理解他所讨论的交换、等价和商品所扮演的角色却至关重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下的产品必然是商品。同时,它们也必然被置放在与其他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这也只有通过市场来实现。毕竟是以下因素使产品成为了商品:它们的社会特征,它们因为社会需要而具有可交换性的能力,以及市场作为对比这些商品的唯一途径。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只是其实际生产者的一些有用的产品,而生产过程的焦点将不过聚集在实际生产者产品的使用价值上。<sup>②</sup> 但是资本家出售这些产品的所有重要性实际上是基于交换价

---

① 这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抽象层面成功证明的一个最关键的发现(Marx 1990/1867, 293—306):劳动力商品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但这不是在市场上,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表面。这一不平等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其中规则是劳动者用他的劳动力创造了更多价值而付费相对较少:“劳动力价值,以及劳动力在劳动过程成定价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量;这一区别是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需要记住的”(如上 300)这被称作剩余价值,首先,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技术的而非道德术语(因为它经常被阐释和使用)。劳动力也是唯一能够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而在市场上付费相对较少的商品形态。Negri(1991/1984, 79)认为,在交换表象背后,一种价值的窃取因而发生。另外,由于劳动者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暂时性地向资本家出售了他的劳动力,他所生产的产品在工作日最后被资本家转离他们(异化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概念,但其概念化经历了剧烈变化,甚至在马克思的著述中随着他的思想发展而变化)。劳动过程的最终产品因此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而不属于作为其直接生产者的劳工。劳工在他暂时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候,放弃了对产品的权利。没有保留这些产品,他因为他的劳动而获取工资,这些工资的价值远远比实际生产低得多(因此,有了剥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因此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等价交换关系。正如 Fortunati(1989, 9)所指出,它实际上是不对等物之间的非等量交换。马克思作出的抽象论证也假设了劳工获取的薪资没有高于生活费用。他在 1847 年就发现了这一点,“劳动力,本身作为商品,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测量的。那么,生产这种劳动力商品需要什么呢?正是用来生产维持劳动力可持续生存的不可或缺对象的足够劳动时间,也就是,确保工人生活和繁衍种族的条件”(Marx and Engels 1976, 125)。一些学者声称这是说明马克思如何在历史上完全错误的有力例证,但是他们(或许是故意地)忘记了这是一个抽象论证,它建立在资本主义将如何运作的理性趋势之上。当然,还有其他几种趋势和机制在一个具体且复杂的社会现实下以及国家进行的其他政治干预中(劳动时间、最低工资规定)产生作用,这种干预经常是一个特定社会中阶级对立和权力关系的产物。

② 再者,正是这种社会特性是商品的主要特征。商品必须在市场上交换。自相矛盾的是,如果它对拥有者来说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这种特定的商品实际上不是一种商品。“对它的主人来说,它反而毫无使用价值。”马克思(Marx and Engels 1987, 28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商品“只不过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或仅仅是一种交换手段。[……]商品对它的主人来说只有具有交换价值才有使用价值。因而,商品必须还有使用价值,首先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如上)

值的生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在市场上表现为价格形式(即通过货币形式,这是一般等价物和交换价值的量度)。为一般等价物而进行物品交换的努力,这也使得剩余价值的提取相当简单,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者进行商品生产的唯一原因。如果某一事物对社会非常有用,但同时(直接或间接地)缺乏交换价值,它在原则上将对资本家来说没有任何特别重要意义。<sup>①</sup> 在理想化情况下,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如福利国家)将是是否关照于此的不同支撑体系。

此外,由于资产阶级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商品),劳动者偶尔也需要购买这些产品作为生活财富(或资料)。如此,他无意间帮助了资本主义积累循环的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系统一体化;劳动者无意间助长了自身剥削(Marcuse 1955,309; Hobsbawm 2011)。因而,劳动者无意中维护了现有的阶级关系,因为他重申了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因此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Postone 2003/1993, cf. Marx 1990/1867, 716,724),它立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权关系。至关重要的是,尽管现代社会历史和资本自是社会性建构的,但它仍“拥有一个准自治发展逻辑”(Postone 2003/1993,31)。因此,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如何工作或多或少是独立与自动化的,它生成了一个超越任何个体控制的动力来建构自身(但不是超越个体的联合、多数人或整个社会阶级的控制能力的,集体性能够抵抗上述动力的宰制,但这都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这在马克思讨论(交换)价值中变得特别清晰,交换价值“无形”地依附于商品。尽管它是无形的,却不是主观的:它既是(社会性)实体,同时在时空上也是不断变化的,因为商品是社会有用(也是社会必要)劳动的结果,它在社会的不同具体类型间变换(比如与科技发展相关的生产力的上升与下降、自然环境等)。<sup>②</sup> 马克思指出,“交换

---

① 这并非因为资本家某种程度上的道德败坏(尽管可能是),而是因为竞争激烈的市场体系中,他受迫于强制性的竞争法则。如果每个资本家没有遵循其自我利益,他很快就会破产。资本家因此在激烈竞争体系下要为他们的活动扫除障碍。例如,在进行生态问题讨论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② 在此大量地引用马克思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和经常被误解的假设:“劳动时间用以表达的和交换价值是某一个体劳动时间,并且个体劳动时间并非不同[……]于其他个体,只要它们进行平等劳动;因而,一个人进行给定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任何人进行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是某一个体劳动时间,他的劳动时间但只是作为对所有人都一般的普通劳动时间;因此,它是谁的劳动时间则是非常不重要的。这种普通劳动时间表现在普通产品上,一般等价物[……]只是作为这样一种一般的量确实代表了一种社会的量。[……]个体劳动时间因此实际上是社会生产特定使用价值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满足了特定需求”(Marx and Engels 1987,272)。

价值似乎是偶然和完全相对的,因此是一种内在价值,也就是,交换价值与商品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并依附其上,看上去是一种矛盾说法”(Marx 1990/1867,126)。但当他进一步论证后,人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庸俗经济学的独特论证。商品价格是波动的,但不论它的价值还是市场表现(通过价格和货币)都不可以被视为任意。它们的共同特性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语境下显现大量的物化(抽象)劳动,劳动时间“具体化了商品使用价值,既是物质将它们转换成交换价值并变成商品,也是价值得以精确测量程度的标准”(Marx and Engels 1987,272)。然而,关于生产一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劳动者本身很少有实际影响——在商品世界是市场动力支配了这些社会关系——它们当然也不需要直接进入市场和其他劳动者建立直接的人际关系。所有这些关系表现为不同商品之间的定量关系(通常通过货币形式),只有通过从这一物质面纱背后观看,才有可能看到它们实际上是对立的生产关系,冲突随时可能出现。

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证十分复杂,可以说,一种连贯的辩证方法需要被拿来在整体上对其充分覆盖。这将使人们可能不会忽略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每一个方面。我认为需要观察社会整体以实现充分地理解,包括诸如商品、价值或者抽象劳动这样的最抽象的范畴。它们都是构成系统的细胞部件,系统影响并制约了它们,这意味着一旦它们被与他者或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孤立看待的话,它们是无法被充分理解的。对整体性的需要是辩证法的需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观点可以被看作是全球性的和包罗万象的(Lefebvre 1968; Harvey 1996,48—57; Jameson 2009, ch. 1; Harvey 2010,195f.)。在这一点上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仅从商品形态自身进行观察确实会丢失它实际上所代表的东西:它事实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这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方面,商品进入与其他商品的交换关系之中,并成为整个商品世界的一部分,这一点是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劳动分工为前提的;<sup>①</sup>另一方面,积累过程中的其他部分也需要被纳入考虑,在流通领域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和“测量”(它不能被“直接”地测量,因为它需要被置放在与其他商品的关系之下;在进入这种关系前,没有办法能够弄清楚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什么),而生产领域则是工资劳工

---

<sup>①</sup> “尽管说私人交换意味着劳动分工是正确的,但认为劳动分工意味着私人交换,却是错误的”(Marx and Engels 1987,299)。

生产这些商品的地方。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需要为一个完全的商业社会准备就绪与运作,其中商品交换以一个非常自动的方式发生。借用巴里巴尔(Balibar)的话,“生产和流通结构赋予劳动产品(即商品)一种交换价值,形成一个整体,以及货币的存在,商品一般等价物的‘发达’形式,它是这一结构的必要功能之一”(Balibar 2007,61)。所有这些范畴和关系必须被发展和功能性地准备就绪。

### (三) 等价和真正的抽象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形态外观基本上是松散的。卢卡奇(Lukács 1971,84)指出,当交换价值还没有自己的形态时候,它直接绑定到使用价值上。这一语境下的生产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它们只有在供给超过需求的时候才成为交换资料。只有在商品成功地渗入社会到一定程度并占据主导地位时,质变才会发生,无休止的(资本主义)积累才成为可能。卢卡奇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商品只能在其没有失真的真正状态下才能被理解,那时它成了全社会的普遍范畴”(Lukács 1971,86)。这种发展在资本主义来临之前不会发生,当人们的生活和劳动逐渐客观化、完全独立于他们所需时,它“凭借与人类自动分离,控制了人类”(Lukács 1971,87)。人类劳动不可避免的抽象化在这一点上嵌入了商品,经济领域的抽象化进程得以完成。传统生产模式意在进行使用价值制造,它在特定的公共关系中服务于个体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唯一目的变成了“交换价值生产,即追求价值的价值创造”(Fortunati 1989,7)。根据弗图纳提的说法,这将直接导致“商品,即使用价值,优先于个体使用价值,尽管个体实际上依然是价值创造的源泉”(Fortunati 1989,7)。这种发展需要一种特定的合理化,如同卢卡奇所言(Lukács 1971,88),它基于“是什么”和可计算,即是说工具化的合理测量,它是对实际上不对等事物(使用价值)等价化(交换价值)的唯一途径。佐恩·雷特尔(Sohn-Rethel 1972,54)称之为一种数学推理,它也可被追溯到交换抽象化(同时他也将其与客观知识及“精确”科学相联系)。这个发现的结果是,如果交换进程在一个社会中可以有效地工作和自我生产,很明显的是等价原则充分地普遍化及需要被执行。一个充分发展的等价原则实际上必须在不对等事物间建立起来,以使它们一旦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能够被衡量以及借助一些基本特征而具有可比性(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的抽象劳动和劳动时间)。这也把我们带回到了资本主义细胞形态上,带回到了马克思

分析中最根本、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即商品、抽象劳动和价值,它们全部是资本的固有部分。在最抽象的意义上,上述三大范畴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组成部分。非常清楚的是,抽象化不仅是社会分析的思想进程,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抽象化,“抽象化依赖的不是思想而是行动,在具体时空下运行”(Sohn-Rethel 1972,51)。抽象化发展借助几个基本概念:交换抽象化、商品抽象化、劳动抽象化、时间抽象化等(Sohn-Rethel 1972; 1978)。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同种类劳动力全部意义上的平等只有通过它们实际上不平等的抽象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概括它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人类劳动力消耗,以及人类抽象劳动”(Marx 1990/1867,166)。这种说法当然可以延伸到其他范畴上去,而不仅仅是抽象劳动。马尔库塞指出:

[抽象化]借助它关涉资本主义社会主题的结构,对辩证法施加了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抽象化是资本主义的本身事务,马克思方法只是遵循这一路径。马克思的分析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不断凝聚而建立并延续。这种经济一步一步地避开了具体的人类活动和需求,并只是通过复杂的抽象劳动实现了个体劳动和需求的一体化,其中个体劳动到目前为止一直只是计算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商品的物与物之间关系。商品世界是一个“歪曲”和“迷惑人”的世界,批判性分析首先必须遵循构建世界的这个抽象化原则,然后离开这些抽象关系以获得它们的真正内容。因此第二步是对抽象化的抽象,或者是对虚假具体性的放弃,这样那种真正的具体性就可能恢复。(Marcuse 1955,313)

这一观念在前面提及的一些著作者那里被进一步发展,比如佐恩·雷特尔,他指出抽象化在不同的社会机制下得以成形,其中主要是货币形态。佐恩·雷特尔还强调,“抽象化在它发生的时空中变化,但未被注意”(Sohn-Rethel 1972,51—52),不仅仅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交易涉及物质对象,而且商品交换的真实性不输于任何事物;而且由于抽象化依然具有一种思想形态,尽管它不是来自思想,而是来自于客观实际活动(例如考察一下抽象化在交换进程中的发展:商品真正的物质改变没有发生,物质事件处于绝对的最低限度,交换商品的定量差异未予认可,等等;变化的是商品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唯一的事实是,抽象化没有引起注意,这或许是日常生活活动

最重要的实践结果。

#### (四) 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拜物教<sup>①</sup>观念是前文提及的发展进程的一个高潮。他的设想在《资本论》第一卷有关商品拜物教的章节里面得到了全面铺展(Marx 1990/1867,163—177)。哈维认为,拜物教是一个“揭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奥秘的必不可少的工具”(Harvey 2010,38)。关于这一思想概念非常重要的一些基本论证在本文前面已经被暗示性指出,人们可以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马克思指出拜物教与商品生产不可分开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商品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它一出现就超越感觉;它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或社会的物。(Marx 1990/1867,163,165)

正如杰哈利(Jhally)所强调的,拜物教如何以及为什么兴起,存在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出于商品交换;第二,出于资本与劳动关系(或更精确地说,作为社会阶级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它以工资劳动为中心,构建了广泛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两大原因都已经被透彻分析过。

一些批判传播学学者已经在他们的著作中讨论了商品拜物教(比如 Jhally 1987; Maxwell 1991; Murdock 2006; 2011; Fuchs 2011,152—154)。杰哈利如是写道拜物教:

总之,拜物教在于将物的意义视为有形存在的一个固有部分,而实际上这些意义是它们与某一意义系统结合成连贯一体而创造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拜物教认为事物本身看上去天然具备固有价值,而实际上价值是人创造的:它归入一个社会过程。因此,事物看上去具备固有价值。然而本质仍是人类创造了价值。[……]在马克思那里非常清楚的是,商品拜物教和商品神秘性关注商品的虚假表象,这种表象认为它本身拥有价值而不是劳动的结果。商品拜物教理论实

---

<sup>①</sup> Balibar(2007,63)指出,马克思如何认识到货币(作为商品间相互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或万能商品)崇拜实际上只不过是商品崇拜。这只有对商品形态及依附其上的交换价值作用进行仔细的分析才有可能,这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没有出现。在这些早期著作中,这一特殊社会作用后来被归因于商品,它实际上直接认为是货币具有的:“疏离事物对人的完全支配,在货币方面很明显,它是完全冷漠的,不论是对物质本性,即私人财产的特定本性,还是对财产所有者个性。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配不是一般的物对人的支配,以及产品对生产者的支配。正如等价物概念一样,价值已经暗示了私人财产的分离,所以货币是感性的,甚至这种分离客观存在”(Marx and Engels 1975,221)。



际上是一种神秘化理论。(Jhally 1987, 29, 39)

随着商品形态在社会上的普遍化,商品生产由不同个体或群体完成,劳动因为社会性分工而相互独立。这意味着内在于产品上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交换中才表现出来(Jhally 1987, 29, 39);但如已经强调的那样,这些关系实际上隐藏在物质面纱背后,在商品本身背后。这些物质面纱不仅隐藏了社会关系,还有抽象劳动,后者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了商品,这是所有者和被剥夺所有权的劳工之间敌对关系的发生地。默多克(Murdock 2011, 19)认为,拜物教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人们(被理解为商品消费者)忘记了商品从哪里来,相反不去思考这些问题而是分享这些商品所带来的便利和愉悦。最后的影响是任何有关剥削性工作条件、劳动过程或环境恶化讨论的废除与取消。购买和消费商品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仅仅是将商品作为一种愉悦的对象。

商品拜物教因此是一个通常被定义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的一个主要例证(Fuchs, 2011, 152—154),但它是真实存在而不能被简单忽略或不予思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种幻象。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客观现实,因为它在生产的瞬间就将自己固定到了商品上(Marx 1990/1867, 165)。在目前世界性分工和全球市场语境下,这种情况尤其突出。这种物质拜物教创建的面纱实际上出现在市场背后:明确的劳动剥削社会关系。上述有关表象(商品世界)和本质(社会生产关系)的差别在此全部显现。因此特别是通过商品的拜物教特征,马克思对抽象化和辩证法之能力的断言才能够显示它的力量:他声称它们的关键特征是一种超越事物简单表象的能力。

商品拜物教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商品因此独立于生产了它们的人类之外而存在,并取得了它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商品不仅实现了独立于人类之外,它们还成了压迫人类积极和客观的动力(Marx 1990/1867, 175; Barbalet 1983; Postone 2003/1993)。正如哈维所强调的,“市场力量,这种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无法掌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了我们”(Harvey 2010, 42)。

商品拜物教问题实际上是通向持续性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一种“另类”路径。至少意识形态批判分析的两大分化(深入地说是冲突)的面向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已经发展起来。一个方面是将商品拜物教作为一个起点,认为商品形态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在物质层面上得以发展的物质面纱(借助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这一社会图式),其中包括的理论家如卢卡奇,

阿多诺,佐恩·雷特尔以及波斯通(其中一些著作者依据的是这一思想的分支概念,如物化或异化)。在批判传播研究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已经被采纳,特别是被斯迈思(Smythe 1977; Meehan 1993)等学者们运用在受众商品化的讨论中。另一方面,以阿尔都塞和齐泽克等学者为代表,焦点几乎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意识形态生产机器上。它通过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来进行管理和发展,而不是借助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观念(即在上层建筑层面,拥有权力的阶级能够确立意识形态。)让我们记住,马克思(Marx and Engels 1987, 263)的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简言之,意识形态的生活形状”。尽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相互关联方法,后者与前者却差异明显,并衍生出对商品拜物教关注问题。后者仅仅是一个上层建筑的问题,而前者将意识形态看作为由商品交换生产出的物质面纱;因此,它是物质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从物质基础中产生(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内在方法)。

本文目的不是对这两种方法进行详细描述,但是前一方法更加接近于威廉姆斯(Williams 1973)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的重新解释或是葛兰西(Gramsci 1971)的霸权观念,它为意识形态观念提供了一种替代的可能(两者都接近福克斯[Fuchs 2011, 48—53]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再思考)。在葛兰西思想方面,可以说商品拜物教是通过人类日常活动而再生产出来的,不论人们是否愿意,但是它也显示了经济基础是如何远非静止和没有冲突的。<sup>①</sup> 这种方法主要包括物质基础,可以说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冲突与对抗出现于这一社会层面。之所以如此,因为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先决条件并且比上层建筑更加根本(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基础也限制了上层建筑功能如何发挥,但是并不决定它)。这种物质水平在重大意义层面形成和影响了上层建筑层面的意识,后者产生于这一“现实基础”,即物质基础;至少与阿尔都塞的关注之处相比,这似乎更接近于马克思自己所称的社会中的真实发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提供的著名界定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模式影响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般过程”,而且“不是人类意识决定存在,而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Marx and Engels 1987, 263)。

---

<sup>①</sup> 这被威廉姆斯(1973)在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通常是矛盾的)的机械论解释的批判中最有力地指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佐恩·雷特尔旨在准确地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搭建起一座楼梯,“二者共同形成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的物质基础,[……]这个楼梯在地下室中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停泊处,在为商品而生产的社会,它只能在商品自身的正式分析中才可以发现。”(Sohn-Rethel 1978, xi)对于前一方法来说,物质面纱对理解社会神秘化至关重要,物质面纱实际上是存在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不存在,不仅仅因为社会关系从来都不能是直接的、无中介的(Postone 2003/1993, 167)。很明显,人们会在意识形态层面生成阶级对立意识,通过推翻上层建筑机构而以斗争方式解决冲突,但是如果物质层面的经济基础范畴保持不变的话,它也不大会有什么变化(例如商品形态控制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这在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语境下也是有意义的。

### (五) 作为个体化关键动因的交换

尽管马克思存在论的基本立场是,人是社会动物,<sup>①</sup>但他不是天真幼稚的。在他的时代,成熟的个体化已经发生,他认识到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个体脱离了自然束缚并从自然中解放了出来(换言之,“那些将工人束缚在土地和土壤及其领主上的束缚关系的解除”,Marx's 1993/1858, 502)。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体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至少与早先历史时期相比,那时他们是一个清晰的、有限的人类团体的一部分(Marx 1993/1858, 83—85; Barbalet 1983, ch. 3)。

然而,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个体化不是源于人类本性的一个自然条件,虽然这似乎是17世纪以来一个主流的哲学立场。它是一定历史过程的产物。矛盾的是,人类是“一种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够进行自身个体化的动物。孤立个体脱离社会的生产[……]如同没有生活在一起和相互交谈的个体而发展语言一样荒谬”(同上, 84)。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人从他原来自然生产条件中的解放过程”,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人类个体化”,交换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动因(Hobsbawm 2010, 132)。人类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可以个体化他们自身,这是一个自我强化过程。

---

<sup>①</sup> 马克思(1973/1993, 84)实际上谈的是一种政治动物。Hannah Arendt(1998/1958)是正确的,她指出马克思实际上将社会和政治领域混为一谈,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观念简单化为社会动物(对阿伦特来说,在现代社会,社会对政治领域和公共行为实现了全面胜利)。尽管两大概念区别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本文中心。

正如巴巴利特(Barbalet 1983, 69f.; 89f.)论证的那样,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类关系实际上是非社会的;他声称,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关系成了独立和非社会存在的外部关系(这是接近自由个人主义的一个预设)。<sup>①</sup> 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深入发展,他改变了观点,说明这些关系“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内容上有别于封建社会关系”(Barbalet 1983, 89)。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仍然具有最高度发达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因为交换本质和商品在社会中的作用(如早先提过)。然而,它生产一种空间,而不是直接的关系,同时也超越行动者自身的意愿与控制而完整地运作(Barbalet 1983, 90f.)。

商品交易当然没有特定的社会或相互义务,如同在政治经济学崛起前居于主导的不同种类的道德经济学所述一样(Thompson 1991, ch. 4; ch. 5; Murdock 2011)。最重要的是,商品形态“不仅是个体化社会的基础,也是认为个体不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观念产生的根源”(Barbalet 1983, 92),是一个尤其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及其他个人主义者的世界观中占支配地位的本体论假设。

#### 四、所有事物的全球商品化:漫长的历史

资本主义体系运行只有一个目标,即资本积累(甚至更多资金),这是由资本持有者完成的。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带有某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殊类型的社会需要被建立起来。即使资本主义已经普遍化,以及人们通常发现很难再想到替代品,尤其是这一系统已经完全嵌入其中这么久了,但是它的发展依然艰难,且充满荆棘。<sup>②</sup> 沃勒斯坦在试图解释资本主义何以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出现时写道,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资本主义不仅不像它所辩称的那是一个自然系统,而且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系统:“积累资本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资本。资本家就像跑步机上的白鼠一样,一直在更

---

<sup>①</sup> 马克思(1975, 220)在他的《论詹姆斯·密尔》中宣称,“社会权力在私人财产关系下表现的越大和越发达,人们越会变得更加自私自利、不合群和疏远自我本性。正是因为人类活动产品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贸易,因此这些活动本身相互竞争和交换表现为劳动分工,它尽可能地把人变成了一种抽象存在,一种机器工具等等,以及将他改造成了一种精神和肉体怪物”。

<sup>②</sup> 沃勒斯坦(1983, 18)写道,一种无尽的资本主义积累如何成为经济活动占据上风的唯一目的,但当这些过程渗透进了社会组织,这些过程中的反对声音更大、更响亮。

快速地奔跑,目的是跑得更快”(Wallerstein 1983, 40)。正如他所强调(Wallerstein 1983, 15),资本主义的整个循环在现代社会以前只是被很少地完成;一些环节消失,意味着一些进程尚未通过市场交易,这意味着它们还没有被商品化。在沃勒斯坦看来(Wallerstein 1983, ch. 1),历史资本主义因此首要和关键地将自己表现为不同社会进程下的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化过程,它在其中形成了复杂的商品链(它不久就全球化了)。它不仅是一个交换过程问题,而且是生产、分配和投资过程的商品化问题。<sup>①</sup>

詹姆逊(2011)最近指出,商品不仅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先决条件,它实际上构成了资本的“前史”,因而严格地说“还未关涉资本”。尽管詹姆逊的贡献十分重要,但这些陈述似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问题的。商品形态不仅是资本积累的一个持久性前提,而且它的存在与构成部分(类似于原始积累)在最根本层面上促成了剩余价值攫取。从詹姆逊强烈支持的辩证法观点来看,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把商品与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分开是不可能的(历史地说,它们应当同时发展)。在资本主义积累周期的每一个领域,商品形态是一个关键的细胞形式(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周期的准确概述,可以参见 Fuchs 2011, 137—141),尽管生产过程可能是首要的,但资本主义不通过商品化或作为一个整体的商品形态来再生产自身,则是无法存在的,其中商品化促使了它的进一步扩大。

不论人们是否赞同他所提及的问题,詹姆逊都承认,在商品化主导的某一社会时期,这一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的持续批判中发挥着关键性政治作用。然而,默多克(2006)写道,关于几乎所有一切的商品化,沃勒斯坦和詹姆逊都走得很远,认为实际上所有一切都是可以被商品化的。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Wallerstein 2011, 16, 26),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倾向于普遍化,人们可以说商品形态具有倾向性主导。同样,沃勒斯坦指出,“全球积累过程是通过所有事物的商品化而发展的”(Wallerstein 2001/1991, 24f.)。

---

<sup>①</sup> 它可能适于区分商业化、商品化和对象化,莫斯科(2009, 132f)指出的这三种进程通常是相关的。商业化还可以被称做市场化,它是三个进程中最狭义的。它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表层发生了什么,换言之,在透明可见的市场上:在交换进程中,积累领域。拿传播研究中的商业化/市场化来说,将关系到受众和广告商之间创造的关系(如上)。资本主义市场必须包括一些更多的这类交换关系;正如已经指出的,例如它假设劳动商品化生产了商品,因此也应该包括生产过程。在这一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商品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最后,对象化特别是指去人性化的特殊进程。拿卢卡奇(如上, 1971)来说,他使用物化来表示人类和人际关系变得如物一样(thing-like)(如上)。不是所有的客观化必然是一个商品进程。

默多克解释了如何“只有在一个完全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商品生产和市场化才成了增长和利润的核心驱动力”(Murdock 2011,18)。世界市场因此对资本主义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Hobsbawm 2011,145),可以说,在过去20年,它最终在整体上获得发展,构建了一个普遍化整体,其中一切都被纳入到资本原则之下(Hardt and Negri,2001)。商品化过程对于资本主义扩张以及原始积累(或是作为剥削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不断扩张也具有无法避免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不断扩张,资本主义体系就会发生危机。因此公平地说,商品化用自身形象塑造了世界。胡斯据此认为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理解社会变迁的核心。在她的观点中,基于商品化,“资本主义经济倾向于生产新的和不断标准化的产品,以求在市场上销售,它们的销售产生了利润,这种利润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扩大”(Huws 2003,17)。

然而,波兰尼(Polanyi 2001/1944, ch. 6)强调,存在着一种对于商品虚构的持续需要,以便使不同类型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合法化,这不断提醒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极端虚假性。当某些领域市场关系仍然正在建立过程中以及事先还没有从属于商品交换时候,它特别明显。正如波兰尼所讲的,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需要新的虚拟商品来确保新经济关系的成功运作,其中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资金和土地。在向后现代性转换的过程中,人们在另外一方面能够创建一个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时代,其中越来越缺乏未商品化的产品、过程,或活动,这些都无奈地被归入和抑制在经济主义合理性之下。<sup>①</sup> 在文化工业有关章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2/1947, ch. 4)预言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指出它在商品化过程中生成。但尽管他们的分析很难被归因于推测资本主义能够将社会所有领域殖民化,却意味着人类生活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被作为一种投资可能或一种市场机会去理解。因此,资本主义还不是仅将文化生产、公共空间和创造力,或更广泛地说社会符号,纳入到它的积累周期里面。首先,它确实使得文化和人类艺术创造力成为一种工业(Adorno 2001/1991; 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2/1947, ch. 4)。另外,不仅是符号、公共表达和

---

<sup>①</sup> 波兰尼所没有注意到的是,不仅土地、劳动和货币是虚构商品。所有商品都是虚构的。没有所谓“自然”商品这样的东西。简单的区别是,某些商品非常明显需要某种意识形态支撑(或一种潜在的虚构)来社会性地将其合法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同时其他商品地位很少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它们在一个特定社会语境成功地被合法化成了商品。

观念(在今天)不断被商品化,而且知识和信息也被商品化,而所有范畴在后现代社会正在成为资本主义一个组成部分(Schiller 1989, Parker 1994, Fleissner 2009, May 2010)。马拉奇(Marazzi 2008)指出,信息和传播不仅是原材料,而且是一种劳动工具(Williams 2005/1980, ch. 2)。信息和知识变成了商品,如同其他商品一样被收购与兜售,在文化和信息领域生产各种资源。赫伯特·席勒称之为“意识工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同时表示,“由于各种原因,利润动机对各个领域的进入历史地脱离了当下这一普遍力量(this now pervasive force)”(Schiller 1989, 91)。全新的私营工业得到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相似工业对我们如何思考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see also Jhally 1987, Hardt 2004)。这些私有化和商品化过程在另外一面也构成了新的知识垄断,它在人类所有社会历史上都是独特的(Innis, 2008/1951)。

德波(Debord 1978, ch. 2)关于商品形式在后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完全浸入了景观之中的陈述,至今仍是对我们生活与书写的世界的最有力的阐释。德波触及了商品对整个人类生存的统治,提出景观作为一场永久性的鸦片战争,将自己沉迷到并贯穿这个商品世界。万事万物都被纳入了世界市场,随着它满足经济的资本主义类型及其工具理性厘定的规则方式而改变。由于商品是独立的,它可以自主地统治整个经济和社会;社会生活因此被彻底殖民。在德波看来,景观实际上是“商品对社会生活整个占领的时刻。商品关系不仅是可见的,而且是唯一可以被看见的:人们看到的世界即是它的世界”(Debord 1978, ch. 2, par. 42)。一切都淹没在景观之中,商品世界的完全统治通过景观满足了自身。德波的关注至少间接地指向了大众媒介和充满图像的社会,而且仅在十年后,大多数理论家承认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中介化了的社会。套用德波的话,在这些症候中,我们必须再次认识“我们的老对手:商品”(Debord's 1978, ch. 2, par. 35)

德波的现代生活批判,在50年前写作完成的时候很可能被视为(或者甚至就是)一种夸张。但是,德波的许多观察在充分发展的后现代社会越来越明显,在这一社会中,诸如人类社交、体验和传播转变成了商品,并被交换。传播商品化的扩大因此也意味着这些讨论肯定会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同时也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它的研究视野和对如此侵占过程提供一种批判。

## 五、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受众商品论

资本对以往非商品领域的全球扩张表明,传播政治经济学通过许多方式开始覆盖各种探究,这些探究由源自社会批判理论的其他领域所促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例如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更为普遍的社会批判理论)路径显然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斯迈思(Smythe 1960)通常被认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然而对媒介和传播批判研究路径更深远的起源甚至更早,至少要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Hockheimer 2002/1947; Adorno 2001/1991),或是英尼斯(Innis 2008/1951)。实际上,从这些著作者身上可以发现,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有着共同的起源,同时在资本主义批判分析和文化进程中意见基本一致(Babe 2009, ch. 1; Wasko 2005, 42f)。传播在后现代社会的日益重要性,促使了批判理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出现了几个新的趋同观点(Fuchs 2010)。

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如何思考商品化的过程,可以发现这种关系在至少两个基本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传播和技术一起支持了经济和整个社会中的商品化过程。工具理性中的技术作用对于商品化是必要的,它伴随着数字化变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不管怎样,商品化还渗透进了相关传播组织,开始侵入以传播为它们基础的日常生活实践。两者也被福克斯所强调,他对马克思的传播和媒介思想进行了一个细致阅读(Fuchs 2011, ch. 4)。按照福克斯的说法,马克思认为传播媒介从最基本层面上来说,在跨空间协调生产、加快信息传递和协调不同企业间商品运输上是重要的。它们同时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意义上也是关键的,帮助拓宽了资本对商品化领域的扩张,积累和消费在其中得以发展(但目前还没有)。这一过程因此支持了整个资本流通过程。莫斯可(Mosco 2009, ch. 8)用“空间化”来形容这一过程,它指的是对空间限制的克服。我们可以看到,空间化过程是直接商品化相连的。针对更狭义的媒介设施和媒介内容,福克斯还指出,对马克思来说,传输技术是由公司经营的。这意味着媒介不仅本身是商品(或基础设施),而且也因此传输商品。媒介可以被看作是“促进商品销售的广告信息载体”(Mosco 2009, 149),从而加速了商品流通。另外两个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批判传播研究至关重要的范畴是劳动和受众。正如前文所述,在劳动市场上兜售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经济诸多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一个重要的新



颖之处在于,知识和信息变得完全商品化,它创造了一种新型劳动需求,从而能够满足这一“社会”需求。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因此在它不同的传播形式上(如知识劳动、信息劳动、记者劳动等)已被专门分析,大量工作是由莫斯可与麦克切尔(Mosco and McKercher 2008)完成的。然而,本文焦点将特别集中在第二个范畴“受众”上。它们的商品化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相对创新,而作为商品的受众的概念化,提出了若干涉及社会领域内商品化普及的重要问题。

### (一) 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下的受众

关于受众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非传统和非寻常方法,它在大多数情况被主流以及关注这一话题的欢庆式传播研究(celebratory communication studies)所忽视。<sup>①</sup> 不管怎样,“盲点辩论”实际上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历史发展中最为激烈的辩论之一,它提供了一些对于理解受众如何被资本工具化至关重要的有益见解。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至少间接地在当今社会非常不同的技术和社会语境下持续(参见 Bermejo 2009; Napoli 2010; Fuchs 2010; Caraway 2011; Biltereyst and Meers 2011; Kang and McAllister 2011),它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批判传播研究相关实践和理论的一个宝贵来源。更重要的是,它还对商品化如何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扩散,以及我们在弥漫着传播的后现代社会下如何分析这些进程提供了一些见解。传播研究

---

<sup>①</sup>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的事实,“代表性”著作在涉及受众时忽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Sage 在 2009 年发行了一部四卷的受众研究的论文集,题为《媒介受众》,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收集了许多文本,有 1320 页,但是它没有从政治经济学观点角度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见解(参见:www.uk.sagepub.com/books/Book233064)。同样例如适用于期刊《参与:国际受众研究杂志》,如今更名为《参与:受众与效果研究杂志》,“欢迎来自不用领域的贡献”,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化与媒介研究”(参见:www.participations.org)可见,杂志基本陈述了所有可能方法、视角和规则,一个罕见的例外则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事情可以在由 Virginia Nightingale(2011)编辑,近来出版的《媒介受众手册》中观察到,其中几乎完全回避了政治经济学(也许是 Napoli 的一个例外贡献)和仅仅纯属巧合(就算真有的话)地触及了权力关系、私人所有权、剥削或者阶级关系这些问题。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批判,在谈到受众时经常被忽略和遮蔽;他们往往被视为主动和赋权的“消费者-市民”。少到几乎对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关于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和社会整体性问题很可能完全被忽视或认为是理所当然。不同的是在这些方法中,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或预先假定因素待在幕后,它的影响不值得作任何深入分析:当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它们经常被看作是过时的和还原论主义的,甚或是故意曲解的(我感谢本论文评论员关于这一话题的评论,参见 Biltereyst 和 Meers 2011 的批判)。比如,这在费斯克有影响力的著作《传播研究导论》(1990)中非常明显,其描述马克思理论是“经济主义”。它还把它弱化成意识形态话题,对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论证给予非常简单的描述。

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提供的见解,因此在当前历史时期提供一个广泛思考,超越了狭隘的肯定方法。

在“盲点辩论”下,媒介和传播的商品化话题已经超越了内容和媒介劳动,进入到了受众。受众成了关键的媒介“商品”,这一点能够并应该是学术关注的目标。在这一辩论之前,媒介内容被普遍认为是媒介向它的读者兜售的重要商品。有关“大众媒介是生产和分销商品的第一且最重要的工商业组织”的认知(Murdoch and Golding 1973, 205f),在批判理论家中间已经被广泛接受。批判传播研究作用的重要反思由斯迈思发起(Smythe 1977)。莫斯可(Mosco 2009)和米汉(Meehan 1993)都曾指出斯迈思首次提出受众商品论的论文,带来了批判传播研究的重大转向。批判传播研究的考察对象现在包括所有依存于广告的传播公司,而不仅仅是媒体。这实际上可以被解释为由传播政治经济学带来的可能分析领域的一次早期和根本性的扩大,这一领域范围被斯迈思的观念进一步拓宽,他认为在宽泛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可以被定义为“社会生活的控制与生存研究”(Mosco 2009, 3)。根据这一解释,政治经济学可以被视为最为整体的和包罗万象的方法,同时有许多类似于社会分析的方面,它实际上应当提供批判角色。

在许多方面,斯迈思的结论几乎预测性地证实了一些议题,这些议题后来在关涉物质工作和后福特生产的组织变迁中变得十分重要,这一点已被高兹(Gorz 2010)很好证明(本节第5部分有讨论)。因此,评估斯迈思一些关键的、挑衅性的陈述及其在新媒体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兴起下的持续有效性,显得至关重要。

## (二) 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和技术变迁

现在有必要从斯迈思(Smythe 1977)引发了关于受众商品辩论的原著中提取一些关键论点,这些论点不仅仍具有现实相关性,而且实际上自被提出以来,它们已经被技术与社会变迁所强化。<sup>①</sup>

---

<sup>①</sup> 斯迈思(Smythe 1977)早期主张之一的批判理论(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传播(因此是“盲点”)。40年前可以被断言,但是今天很难。它甚至当时还是一个有问题的论题(无论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那里,还是在SFR Yugoslavia工作的一些研究者那里),默多克(Murdock 1978)在对斯迈思的回应中充分地将其指了出来。如今,我们拥有一个发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同时还有一些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例如自治主义,提出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主要范畴从根本上说是传播。

首先,受众是重要商品,他们在市场上被制造和兜售。不仅如此,受众还是劳动。这些是“受众作为商品”讨论的主要起点。斯迈思声称,媒介工业生产的最重要商品是受众本身,它被创造和兜售给广告主。这一论点不仅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且在提出后,其重要性得以提升,它被其他一些讨论类似议题的批判方法所论证(其中一个讨论在第5节)。这显得特别有趣,因为当斯迈思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关于受众商品化的理论经常被驳斥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他本人也被批评者指控为经济还原论者(Meehan 1993)。媒介作为一种商业受制于利润逻辑思想的恢复,在文化研究主导时期甚至显得过时。在1990年代早期,米汉(Meehan 1993)认为,斯迈思的分析和随后的断言实际上本可以更加激进。根据她的说法,斯迈思这些论点的有效性已经被历史和现实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sup>①</sup>事实上,根据最近对这一辩论采用新观察角度的比尔特伊斯特和米尔斯(Biltereyst and Meers 2011)的说法,媒介内容是次要的,“免费午餐”是最好的。媒介实际上首要和重要的是生产受众,而不是节目或者内容!这意味着媒介趋势是成为单纯的受众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s*),而休闲时间成了资本主义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扩大和商品化此前未知领域。休闲时间或非工作时间被纳入到资本之下货币化和被定价(*valorised*)。

有趣的是,阿多诺(Adorno 2001/1991, ch. 8)指出,这些进程早在1969年他发表论文《闲暇》(*Free time*)时就已经发生了。他指出,闲暇成了自己的反面,是对自身的反讽,因为它只是唯利是图生活的一个连续;它屈服于生产过程中的类似规范和非自由特性。他借用爱好观念揭示了这一点。现在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爱好,它可能由“娱乐业”和“休闲工业”来提供(两个词都失去了它们的所有讽刺意味)。自由时间因此受到许多社会控制。在所有生命时间整体性地商品化之前,它因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与阿多诺一样,威廉姆斯(Williams 2005/1980)指出,10年后传播方式必须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这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其中传播显著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直接和间接)生产力。

其次,在这些初步发现基础上,更重要和激进的一个论题被斯迈思提了出来。仿佛仅仅是继承了阿多诺和威廉姆斯思想路线,他声称,今天“大多

---

<sup>①</sup> 正是受众(那些再次被降为商品的生命存在)、媒介内容和广告主(代表资本)之间相互矛盾(几乎是敌对的)的三层关系,在这里至关重要。

数人工作时间是一天 24 小时”(Smythe 1981a, 121)。这些发现的结果是激进的和广泛的,而更重要的是,斯迈思的意见一天一天被证实。即使有人不赞成斯迈思关于如何界定劳动的意见,他的论点却从根本意义上表明了商品化在整个社会新领域内的激进扩张。

斯迈思的两个论题表明,劳动时间已经大大地延伸进了非工作时间,劳动力经常被再生产。杰哈利和里文特(Jhally and Livant 1987, 83—90)深化了这一观念,而且坚定地将他们的观点建立在马克思概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他们指出,观看(作为一种劳动形式)实际上恰恰是工厂时间的一种延伸,这不应该被视为一种隐喻或象征。它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在整个媒介经济过程中至关重要;如同劳动者如何向资本家出售劳动力一样,受众向媒介拥有者出售他们的观看力。闲暇因而在当代资本主义运作中成了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被纳入到资本之下货币化和被定价(valorised),受众被工具性地看待,唯一的目的是(剩余)价值榨取。受众活动(听、看、浏览、“点击”)创造了价值,这一价值被资本家据为己有,进行交换的是提供了一个表面上免费的午餐(各种类型的内容)。

以上所述的斯迈思观点还表明,不论人们是否需要或者知道,社会和个体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完全商品化和卷入资本主义积累周期。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人类劳动被遗留,其中一定数量的交换价值很难被榨取或据为己有。这种可能的原因也源于数字技术的兴起,它开始在这些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提供前所未有的细节和测量、量化和控制的进一步合理化(Napoli 2010; 2011)。拿破里(Napoli 2011, 10)甚至更深刻地声称,对今天媒介公司能够使用数据收集的广泛选择让互联网变得非常重要。这些技术使得记录用户(或者是营销者话语:个人消费者)的空前细节成为可能。在这一意义上,卡斯特(Castells)关于互联网是我们生活组织物的观念,在涉及侵犯人们隐私时候,应该被严肃对待。

新数字技术带来的关键变化是,提供了控制和测量受众新方法:(1)分化;(2)正式地提升受众自主权、参与和契约;(3)消费的空前控制;(4)用户和受众测量的空前细节(Napoli 2011)。媒介环境的分化及其带来的受众创造了一种日益突出的“长尾”情景,它将受众碎化得越来越小。从早期大众媒介特有的广播(broadcasting),到由卫星电视和基础设施私有化与放松管制促使的“窄播”(narrowcasting),最后再到大概由数字化和互联网促成的“点播”(pointcasting),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后者借助几种不同技术和方法,

促使了一个激进的“测量合理化”和可能货币化的所有活动的充分量化(参见 Gandy 2012, Andrejevic 2012, Fuchs et al 2012, Prodnik 2)。毋庸置疑的是,网络用户(也被称为“网迷”)在如何使用新媒介方面,较之以往能够更多地参与并有更多的影响,但从互联网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促使平台的拥有者使用一个更加详细的测量方法来测量他们的活动和喜好,或许还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信息。盲目地推测互联网已经开启了革命的可能性的观点显然过于理想化了。一个更加唯物主义的方法应该考虑广泛的社会背景,认识到这样一种事实,不对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直在增长,而互联网不幸地对减轻这一点却毫无作为。反观之,甚至可以这么说,一定程度的数字化扩大了差距,强化了集中和有权者与被剥夺权力的大多数者之间的差异(参见 Hindman 2009, Bellamy Foster and McChesney 2011)。

谷歌毫无疑问是这些特征的经典案例,(参见 Kang and McAllister 2011)。该公司获取的主要利润来自于广告(特别是它的主要广告产品谷歌广告),借助对其用户的广泛商品化,将他们分化成小众市场受众,再将他们出售给可能的广告主,这些广告主则提供了关系到这些受众的特定类型的商品。一个由马拉齐(Marazzi 2008)提出的关于后福特主义经济的论断,详细地指出了公司的这一关键职责:产品差异化成了获取消费者注意的方式之一。在这一观点下,生产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背景,而以前很少值得关注的注意力经济升到了重要位置。实际上,谷歌的年收入相当于一些较小国家(如拥有 200 万人口的斯洛文尼亚)一年的预算,并(正式地)雇佣了 3 万人。这只有通过严重侵犯了用户隐私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一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经济监测(参见 Fuchs et al 2012; Prodnik 2012)。如帕斯昆内里(Pasquinelli 2009)和福克斯(Fuchs 2012)这些研究者指出,谷歌公司资本积累过程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它的平台使用者的无偿劳动,而全球网络内容生产者是一来源。两者之所以是被剥削的,因为谷歌公司能够从他们的活动中提取剩余价值。这使我们直接面对社会工厂的界定和来自自治主义(后工人主义)运动的“一般智力”,这将在第六部分讨论。

### (三) 卡拉韦对斯迈思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主题

最近对斯迈思论点最有力的一个批判来自卡拉韦(Caraway 2011),他大力反对了斯迈思在其有巨大影响的研究中提出的若干基本假设。然而,他的批评并不能代表一系列不同的反驳,这些异议主要来自于文化研究领域,

总体上往往是针对政治经济学的(综述参见 Biltereyst and Meers 2011,特别是 417—424),这也为本文的语境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在这里特别如此,因为卡拉韦声称他给予这一话题一次马克思主义重温。他的文本因而需要一个简短的补充说明,如此可以更好地融入这些早先提出的问题和话题。

人们可以完全同意卡拉韦对主张受众商品论的学者提出的几点反对意见。首先,他称这一方法夸大了受众联盟作为一种价值来源的程度和免费劳动的实际达成,因为受众活动不是直接受控于资本家(受众商品交易)。他的第二个观点是与第一个相关联的,即这一方法特别是斯迈思自身,完全缺乏关注主体性及其能动力量(受众权力和媒介内容作为免费午餐论题)。第三,缺乏对使用价值的关注。无论如何,追问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方法,以及什么学科领域影响了这些作者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对此作出回答可能会澄清一些难题。让我们从最后一个开始,更仔细地看看他的论点。

卡拉韦认为,“对受众从媒体产品中获得使用价值的考察,将会表明资本家对生产领域统治的局限性”(Caraway 2011, 700)。正如本文早先指出一样,在《资本论》第一卷几乎没有使用价值观察资料。相反,马克思关注的几乎全是交换价值。他发现使用价值简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附庸,甚至将交换价值等同为价值。这不是因为他个人觉得使用价值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因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怎样运作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甚至深入地陈述,“使用价值,存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主要因为它是“商品的一个必要前提”(Marx and Engels 1987, 270)。“由于商品使用价值是假定的,具体实用性和依附其上的劳动的一定效用也是假定的;但这是劳动作为有用劳动的唯一一面,它与商品研究相关”(Marx and Engels 1987, 277)。商品必须经常具有一些社会有益价值,但其实际内容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Jameson 2011, 35—37)。① 恰恰是某一特定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或者社会性地相关)特征让其成为一种交换商品,同时,这一特征也使其实际内容特别不重要,只要它还拥有消费者;基本上,任何事物都能够商品化,只要它具备一定的使用价值以及其他人需要它。使用价值为商品注入了商业内容,这使得它们成了“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显然,商品交换

---

① 或转用 Sohn-Rethel 的话:“作为它可能性的一种条件,商品交换要求,当它们受制于交换业务时商品使用被暂停”。(Sohn-Rethel's 1972, 51)

关系的准确特征就是对使用价值的抽象。在交换关系中,一种使用价值等同于另外一种使用价值,只是表现为量的不同”(Marx 1990/1867, 126f.)交换价值是基于关系或比例的一种量的关系,就我们在此关心的议题而言,对Lady Gaga新近夸张造型的闲聊,也能够是交换价值,只要社会认为这些使用价值有足够关联去消费它们。

其他著述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杰哈利(Jhally 1987),关注了相关于商品拜物教和符码(即是大宗商品所制造的意义)社会建构的使用价值的作用,尽管保留着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范式。正是因为斯迈思自己没有关注到这一方面(马克思也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方法是不正确的(他只是选择了一个特定角度)或甚至是认为其他角度没有价值,比如杰哈利的角度。针对马克思有相当多的攻击,认为他自然化了使用价值和制造了交换崇拜。这些批判并不新鲜,但几乎都不太公平。政治经济学自身没有关注使用价值,并不意味使用价值在社会上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

现在让我们转向卡拉韦的另外两个批评点:受众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对资本实际臣服的,以及能动性发挥了什么作用。他声称,不论是在斯迈思还是杰哈利和里文特的分析中都发现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所述的劳动过程(受众-劳动)是在资本控制之下的;也没有任何尝试去说明使用价值是脱离受众的”(Caraway 2011, 697)。然后,他提出了新技术监视,但强调有必要“继续地再评估资本能够将这些活动带进积累逻辑的程度。……这些努力的效用应该受到高度质疑”(Caraway 2011, 698)。他接着说,“对受众确切和公正的测量,如同幻想”(Caraway 2011, 699)。

在我看来,卡拉韦的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错误的。他不无正确地认为,在媒介关系上资本家没有直接控制劳动。这当然是真的,但在传统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也没有完全控制劳动者;媒介所有者可以通过内容来“购买”受众兴趣,而在这两种状况下,劳动者如果想去消费都没有过多的选择(当然还有关掉电视的选择,但这种莫名其妙地、奇迹般地增加的受众权力,不过是一个理想化假设)。相比劳动过程,这里的关系明显不是那么不同。劳动者,就非常像受众,可以形式上地选择为谁工作;然而在现实中,他们的选择在两种情况下都是非常有限的。媒介工业老板像传统资本家一样,十分清楚他们能够出售什么以及能够花销多少以确保利润。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关门。计算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它无法算出来,业务就无法生存。这里不需要神秘化;一个资本家将适应他必须面对的任何执行环境。它也将

读者引入歧途,借助斯迈思的表述是“受众并不显示为商品卖方”(同上,697)。他们的商品是抽象时间,这些抽象时间被“卖”给媒介所有者而换来内容,所以说是他们的“自由时间”,或休闲时间。涉入交易的使用价值实际上是不重要的,但进入具体细节层面,数字时代的使用价值是媒介所有者能够将其卖给广告商(或非常简单地说,他卖了他们的注意力,只要这些受众分化极低)的受众个人特征(社会地位、兴趣等)以及非常引人注目的由受众在数字环境下所生产的内容。这里没有契合马克思主义分析并非是什么不寻常的,“受众和广告主之间没有正式的合同、协商或讨论条款”,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同上),卡拉韦似乎觉得这是劳动作为商品出现的关键方面(这并非如此;唯一的前提是,劳动者将劳动力投至市场时有能力自由地选择剥削者)。卡拉韦所提及的一切实际上大部分非正式地确实发生,但在互联网上经常是正式的,例如通过使用条款和隐私声明(Sandoval 2012),而协商在鼠标点击或远程控制下正在进行。媒介内容消费者能够改变“雇主”,在互联网上,一个人通过建立个人网站很容易进行自我雇佣,但它在现实生活情况下会面临诸如谷歌或脸书网(Facebook)一样的巨头,当然将有巨大的生存困难(就像发生在现实世界经济一样)。

卡拉韦在整个文本中的主要问题是,他在两个非常不同的论证层面上作出区分: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两个层面当然非常重要,关注趋势发展的抽象论证,建立的唯一目的是解释具体现实活动。抽象论证抽象化了详细情形和实际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几种操作机制,然而它永远无法完全解释具体现实和详细情形,因为它的洞察力是有限的(故意如此)。马克思使用抽象化的原因在本文前面已经陈述,但一个可能最明显的原因是,沉入到具体现实层面,没有办法分析一切事物,因为具体层面分析唯一关注的是详细情形(这些分析可以带来大量新知识,但话说回来也非常少)。如同科利尔(Collier 1994, 255—259)所指出的,完全理解具体物是不可能的,难以认识到这一点经常让我们忽略了关键机制和决定因素(或我们最好用很少的解释力来建构普遍化)。<sup>①</sup>

卡拉韦无力解释政治经济学需要抽象化(以及关注趋势发展),这在他的陈述可以看出,“广告主购买的不是受众力而是受众的编造形象,正是这

---

<sup>①</sup> 然而事实是,理论从具体到抽象的深远迈进更容易出错,应该指出的是,“为了解释具体危机,我们不得不通过分析(思想)来阐明那些导致它之所以如此的多种机制和趋势”(Collier 1994, 255)。



种加工编造需要受到批判性学术质疑”。难道他真的相信广告主不知道吗？他们购买一个粗略的、抽象的、统计学构建的受众而不是“真正”受众：这里有一个相对趋势，（由于他们拥有所有数据），他们所购买的加工编造的受众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他们计划的方式产生举止规矩。在抽象论证上，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广告主会破产；按照抽象推理，这一粗略性必须足够接近现实，从长期角度使其成为一种合理购买（真实地风险投资购买这些加工编造物，这不是批判性学术；如果这不是一个提高资本收益的经济实践的话，他们会完全放弃它）。它非常类似于资本家，从来无法提前知道他能否从所购的劳动力身上获取足够多的剩余价值，因此他能够用计划生产的大宗产品来占领市场（资本家需要预测到他将足智多谋得足以控制劳动者和榨取足够剩余价值）。来看具体例子，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从来没有完全控制他所雇用的劳动者；在最糟糕情况下（对他来说），工人将会罢工。或在媒介所有者最糟糕情况下，受众将停止观看他所生产的内容（这意味着他要么实况转播其他内容、降低花费以符合购买广告带来的金钱，或者关门）。抽象方法当然是去主观化的，但这正是资本主义实际上所做的：合理化、对象化和抽象化（见 3.3 节）。

值得我们反问自己的是，除了目前大多数已故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否有人真正相信马克思在他的后期著述中对主观性和工人阶级权力缺乏明显兴趣，这些主题直接指向他对世界进步变化的不关心？这违背了他整个生命中的大多数实际行为。相反，正是因为他缺乏对主体性关注，他才能够抽象地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再者，只是在抽象而不是必然的具体层面上，其他几个趋势才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人类能动力量能够抵制这种征服）。如果某人接受古典政治经济学构建的资本主义市场理想类型，他不得不从对于抗击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具体现实其他方面进行抽象，来揭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剥削工人的。<sup>①</sup> 抽象化为马克思和斯迈思提供了一个观察资本主义如何以一种抽象形式进行运作的特殊视角，很明显这一视角是不完整的；它忽略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部分。这是一种抽象，非常重要但在范围上依然有限，这是任何抽象化的一大特点。不

---

<sup>①</sup> 让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亚当·斯密和他《国富论》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他的论点大多是抽象的，让我们无法用具体实例去反驳（即当它们应用于具体现实时，他的理论被认为是失败的）；哪怕迄今为止，我们期待看到这样一个完美的竞争市场，这是他理论的根基（可以说，从未有这样一个例子，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参见 Harvey 2010）

过,如福克斯所指出,斯迈思实际上没有忽视主观能动力量,尽管他发现没有自发抵抗。<sup>①</sup>正如斯迈思在《依附之路》中所指出的:

确实,人们受到了意识产业无情的压力;他们被纷至沓来的商品和服务包围;他们把自身制造成了(受众)商品;他们再生产了他们自己生活和被损坏的能量,并采用商品形态。但是人们绝不是被动或无力的。人们尽最大努力去抵制资本强大和多样的压迫。这里有一定量的个体和群体抵抗,每天被再生产出来,激起了人们的天生能力和对爱、尊重、群体关系和创造力的需要。核心区域(如在整个世界)的主要矛盾在于人与资本之间。目前,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sup>②</sup> (Smythe 1981b,270f)

卡拉韦关于斯迈思据称对能动力量无知的观念因此似乎并不奏效。即便如此,批判一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因此采用一种特定的认识论立场)推动研究的学者没有关注主体性,似乎类似于批判一位一线医生说他不是一位化学家(或一位木工,因为他不是一位水暖工)。人们可以给予更多的视角,但如果他不是(这一行业),为什么因此而责备他呢?虽然社会科学需要包括几种不同视角,特别是它们是批判的,但同时必须知道从不同学科进行分别分析,在不同的方法及其主题之间进行区分依然是重要的;在我看来,简单地将一种方法与另外一种方法混为一谈将是一个错误,即使它们对于社会分析具有不同的贡献。

许多作者——马克思或许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如果他接受詹姆逊(2011, 37f)关于《资本论》实际上不是一本政治行动著作的核心评论——将可能会认同关注能动力量(例如,不同主体性的抵抗和社会运动制造的(反)权力可能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经济学(或批判)主题。在任何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可以甚至必须被视为成功的政治行动的核心前提,它触及了财富再分配

---

① 这一论题在他题为《社会媒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全讨论中被提出,论文是2012年5月3日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21世纪信息社会会议“批判、民主与哲学”论坛上宣读的。他还指出,私下里说,斯迈思在所有范畴中关注的是劳动——劳动是一种活动,它本质上是积极的人类主体进入的一个场所。

② 斯迈思对机构的这一引用被Fuchs在乌普萨拉会议上的演讲所介绍,来自于他的陈述,参见:<http://www.scribd.com/doc/92818866/Christian-Fuchs-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of-Social-Media-and-Informational-Capitalism>。另见Fuchs即将在“三C”(Triple C)刊出的长稿(题目:重组达拉斯·斯迈思:受众商品、数字劳动辩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当今批判理论)。

的需要,并为看清财富来源(人类劳动)提供了基础。<sup>①</sup>只要人们愿意(不用寻求稻草人论点或抽象化带来的简单不足),没有理由不去用激进的政治理论来补充这一政治经济学视角。这是奈格里和哈特(Hardt)(2001; 2005; 2009)的一个方法以及所有自治论者的思路(见第6节)。但是能动力量和主体性实际上从来都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卓越主题。它们是(激进)政治理论主题。就个人而言,我发现当人们声称奈格里和哈特采取了一个关注大众而忽视无产阶级(好像它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这样一种简单路径时,它更为混乱不清。情况不是这样的。类似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述,在奈格里和哈特的著作中,无产阶级可以被视为一个技术性概念(就像马克思著作中的其他几个概念,如商品拜物教或剥削,参见 Harvey 2010)。正是这些解读类型将它们转化成了政治概念。例如,自治主义提供了对这些概念的政治性解读,这些概念是技术性的和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构建的(Negri 1991/1984; Cleaver 2000/1979)。大众(Virno 2004; Hardt and Negri 2005)在另外一方面可以被视为激进政治理论派生的一个概念,这种理论没有可能去否定或反对无产阶级,而只是用另外一个概念来表扬这个概念(派生于一些特定领域)。同时它也不排斥他者。我在这里的目标当然不是盲目地捍卫政治经济学是唯一正确的。相反,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如果只是通过关注趋势发展和机制提供了一种“客观论”阐述,它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然而,它的基本前提应该被认为是值得的,荣誉应该被赋予应该拥有荣誉的地方:如果马克思没有率先给我们提供一个严格的技术性、抽象性、非主观和非政治性解读的话,这些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政治解读将是不可能的。

## 六、交际性(Communicative)资本主义和社会工厂

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展现的观点和后工人主义/自治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关键差异是,后者将其范围延伸到了媒介和传播之外(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它从互联网上选取例子用于个案研究)。它也投入更多精力关注主观能动力量;生产价值的是个体对象,因为价值生产已经蔓延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如“社会工厂”),这提供了政治可能性的激情扩张和人类对这一过程

---

<sup>①</sup> Barbalet(1983, 29—30)强调,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形态(比如商品拜物教)废除需要社会和政治行动,而不是科学调研。批判科学无论如何是更广泛的革命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的抵抗。

一些关于受众作为商品的发现和观点,可以直接与这一思路联系起来,我们能够看到在批判理论方法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具有若干融合点。创作者根据这一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传播甚至诸如语言能力在当代社会占据了支配性的首要位置,因此提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几种可能中的唯一一种。“社会工厂”概念披露了工作如何超越场所(即工厂),通常试图做主将生产过程组织进更广泛的社会中(Negri 1984/1991; Negri 1992; Terranova 2004 etc.),也间接地指向了一个成熟的商品化社会,这一认识非常类似于斯迈思及其他参与受众商品争论的学者们的观点。

诸如阿甘本(Agamben 2000, 109—120)、维尔诺(Virno 2004)、特拉诺瓦(Terranova 2004)、马拉齐(Marazzi 2008)、奈格里(Negri 1991/1984; 1992; 1999)、奈格里与哈特(Negri and Hardt 2001; 2004; 2009)、迪恩(Dean 2008)、帕斯昆内里(Pasquinelli 2009)、高兹(Gorz 2010)、弗马加利和梅扎德拉(Fumagalli and Mezzadra 2010)、莫里埃·布当(Moulier Boutang 2011)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最近正在撰述有关交际、认知甚至是符号和生物语言学资本主义的变迁,其中传播和语言占据重要地位。它们甚至被视为有关人类这一特殊存在的更为深刻的本体论主张(Dyer-Witheford 2004)。类似研究发现此前被拉扎拉托(Lazzarato 1996)运用,他关注的是非物质劳动。后来,高兹(Gorz 2010)对这一类型劳动进行了最仔细地分析。高兹揭示了非物质劳动如何转变成当代社会工作支配形式和价值创造源泉。由于这一转变,人们完全被纳入资本之下,进入个体企业,他们必须到他们该到的企业,必须持有尽可能多的人力资本,“基于自我创业关系,所有人和整个生活最后都被推去工作和被剥削。生命变成了‘最宝贵的资本’。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界限消失,不是因为工作和非工作活动采用同样技能,而是因为生活时间减少,整体地落入价值控制之中”(Gorz 2010, 22)。

这是非常奇特的。重要的是要注意这样一种劳动和非劳动时间之间的密切关联,远非资本主义社会常见。恰恰相反,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被视为生产的(借助资本)和非生产的之间发生了一次彻底分裂,其中非生产的仅适用于人类生活再生产。如同汤普森(Thompson 1967, 59f.; 1991, ch. 6)所论证的,任务导向的工作和“工作”及“生活”之间的模糊界限,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其间社会交往和劳动混在一起——根据任务确定工作日时长或合同——而且在劳动和‘打发时间’(passing the time of day)之间,冲突意

识不再强烈”(同上,60)。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在历史上一直被时钟严格测量和定时(有着深远意义)。汤普森不仅论证了时间感知是社会性建构的,而且时间的线性测量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由资本家和劳动剥削构成的,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因而是能够测量劳动者劳动。这即是抽象时间意味着一切,尽管资本家已经开发了一些新测量技术,并促使一些学者论述了新泰勒主义或数字泰勒主义(Brown et al. 2011, ch. 5)。然而,它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如果我们知道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而其间的劳动却无法轻易被测量出来(Gorz 1989)。这通常意味着新泰勒主义实践接近于一个纯粹的表象,因为它们无法测量任何具备独特意义的事物。然而与以往一样,它们是监视和劳动力控制的有效手段。当然,这一困难随着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之间不断地模糊而越发突出。正如波斯通(Postpone 2003/1993, 26f.)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过程中,价值作为‘真实财富’生产测量方式变得越来越多余。[……]价值在促进价值提升的潜在的生产体系中变得过时了;这种潜在的实现必须废除价值”。这意味着“价值废除预示着劳动时间不再被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财富生产不再根本上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人类直接劳动所产生”。波斯通因而清晰指出,“依据马克思说法,克服资本主义需要实现生产资料形式和人们工作方式的根本转变”。

大量劳动在生产过程或者传统上作为生产场所的场所(如工厂)之外开展,历史上这不是一个新奇的事情。然而,这类劳动被认为是非生产性资本,也经常被指示为“进步的”社会主义运动,后者由基本为白人男性组成的所谓“真正的无产阶级”构成的(Huws 2003)。然而,这些场所对劳动者生活的再生产至关重要。这里有一个显著情况,即妇女在家庭中所进行的非生产性劳动,其中的差异与分化是基于性别的(关于更广泛积累过程中的这种劳动作用,参见 Wallerstein 1983, 22—28; Fortunati 1989; Huws 2003)。按照弗图纳提(Fortunati 1989, 9)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双重特征,分为生产和再生产。后者被视为无价值(它经常是没工资的,在家里进行的),前者被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价值。然而,弗图纳提扭转了这一逻辑,阐明了再生产是生产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显然对作为资本主义周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创造做出了贡献”(Fortunati 1989, 8)。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一个间接性工资劳动,同时实现了一份工资剥削了两个工人。这种观念在今天得到了深入发展。比如,胡斯(Huws 2003, 27;

45f.; 68f.)使用了“无偿消费劳动”和“消费工人”术语来指代许多无赢利工作,这些工作促使回到消费者那里,强调了普通人为了再生产他们的劳动力(因而是他们生活)而必须做的不付费劳动。这种工作经常由妇女完成,她们受到了这些要求的不平等作用,再生产了性别关系。最新奇的是,资本已经能够将(所谓的)“经济外部性”这一类型纳入了它的积累周期。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里没有对劳动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劳动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太多思考。这些确实可以被视为今天政治经济学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我们也都不想要在这个或许是全新的资本主义阶段关注资本主义结构变化。我们在此需要考虑的似乎是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即商品化得以侵入人类生活的程度,哪里和什么可能被殖民,需要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分析目前历史时期商品化作用,还是资本在什么地方能够榨取剩余价值,斯迈思的早期研究发现和几种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言论之间具有显著的融合点。根据双方结论,商品化过程没有限制,同时许多批判传播学学者在他们的理论工具方面形成了一体化的自治主义者(自治论者)视角,这不是一个巧合。两者似乎充分展现了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1983年声明的真正价值,即“如果马克思今天还活着,他的主要工作将是传播而不是资本”(引自 Nordenstreng 2004,13)。

正如自治主义者(自治论者)作者声称的,现代社会当下新颖之处在于,在资本主义积累循环中,资本试图囊括仅有的人类能力来生产知识、传播、迅速适应多变环境(灵活性)、参与或合作。这些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他们有能力创建社会和政治机构。这些特征被当代资本借助不同技术和设备直接“雇佣”,发挥了从活劳动身上榨取价值的作用。这种说法甚至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趋势,它在殖民化能够榨取价值的各种领域时,不能为自己设置任何障碍。

这直接适用于对维尔诺(Virno 1996; 2004)“一般智识”概念的重新解释,这一概念源自马克思《经济学批判要纲》中的“机器碎片”。维尔诺认为,后福特资本主义调动了描述我们人类的所有官能(如语言、抽象思考、可塑性),这个论点产生于他的社会本体论。在维尔诺看来,这些能力在一般人类那里都有,“后福特主义调动了描述我们物种的所有官能:语言、抽象能力、学习倾向、可塑性、没有坚实习惯的习惯”(Virno 2005,29f.)。正是这些特点,可能被所有专业和职业所使用(在确定的传播意义上是人类语言能力的必要的社会表现)。相反,帕斯昆内里(Pasquinelli 2009)使用术语“共有智

识”(common intellect),表明了资本实际上是如何利用所有人共有的人类能力,同时占有我们共有的社会生产而不付费的(Hardt and Negri 2009)。

正如 Chicchi(2010)、Marazzi(2010)和 Vercellone(2010)所指出的,金融资本已经传遍了整个经济积累周期。这在根本上意味着金融目前出现于经济循环所有阶段,从开始(生产)到结束(消费)。这是金融资本能够在传统生产价值区域(即工厂边界后面的交换价值生产)之外榨取价值的主要原因。这同时意味着商品化得以在生活各个领域蔓延。

## 七、结 论

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一直贯穿全文,更多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不是给出答案。其中一个肯定是劳动这一范畴:它在当前历史语境下包含什么?对许多人来说,思考这样的观念或许是不容易的,即普遍所称的“休闲时间”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特殊劳动类型。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一个必然的历史现象寻求永恒的、人类学的或本质论(essentialist)的定义,即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下的劳动。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什么被资本认为是劳动,不论这一特定类型劳动如何令人难以置信或者它的产品在我们看来是私人的(甚或有人会觉得这些生产的使用价值是多么多余,因为没有任何真正需要去证实其中任何一个,我们只需要观看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首要和关键的是需要技术定义,而不是道德定义,后者将促成对资本主义政府的激进式政治抵抗。是否可以往前一步认为,任何为商品拥有者生产额外交换价值的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劳动(不论这一额外价值有多大)?这和源自马克思著述的马尔库塞的定义很接近。马尔库塞界定劳动是,“在最后的分析中借助它资本主义才真正地被理解,意指在商品生产中制造剩余价值或者‘制造资本’的活动”(Marcuse 1955,293)。这种意义上的生产力总是由资本单独界定的。

现在要期待的是更为详细的答案,但重要的是承认社会和经济层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对它们当中的许多地方缺乏可以接受的答案和深入分析。通过本文提出的问题和困境,这些转变的指标已经明确。我们可能因此会对包罗万象的商品化提供一个工作论文。这个论文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可以给一些基于这个话题的已经提出的想法奠定一个坚实基础:

资本主义结构性趋势,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世界综合经济体系,它不仅商品化和定价化(valorise)了所有物质和社会生活,而且将人类生活本身(即类存在)纳入进了它的积累周期:言语以及说话[逻辑]能力,我们的感受和情感以及我们进行活动的人类一般能力。这一趋势决定着人类生命没有哪一秒将会通过脱离工具理性和详细算计的经济循环而被浪费掉。每个人类行为都被覆盖,社会生活每一方面都被仔细测量。

马克思已经能够表明商品形式和交换对于我们社会生活和个体化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阶段的商品化远远超过于此;它开始侵蚀和改变几乎整个人类交往和关系。它不仅在传媒领域工具化(instrumentalises)传播,也可能侵犯人际传播,将人类变成机器人。当商品开始统治社会,使用价值的任何独立可能性都是被根除的。任何缺乏交换价值、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变得一文不值、可有可无和无关紧要(整个欧盟领域严厉紧缩措施的真正意义还有什么呢?)。让我们担忧的不仅是社会沟通,这可能多少是一个抽象概念,还有民主生活的基本范畴。信息和传播不能只被看成是诸多商品类型的一种。它们是我们认为的建立在不受压迫和表达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和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哈特(Hardt 2004,74)所强调,传播在多数具有说服性的民主定义中处于中心位置。但是如果整个传播过程变成一个巨大的、相互联系的世界性商品链并必须在“强制竞争法则”(Marx 1990/1867,433)下运作:从生产(知识劳动)到内容、设备以及受众-人类,那我们真的可以说存在言论自由吗?当“创新、知识工作变成了大规模生产,而个人思想遭受符合市场需求意识审查,预测和重复是商业成功的关键”(Hardt 2004,34)时刻,是否还有自由?当关键的传播渠道和表达自由实际上被垄断(或最多是寡头垄断)和被最少数的精英阶层拥有(McChesney 2008),<sup>①</sup>是否还有自由?

可以说,从一开始,批判理论已经驳斥了工具理性和那种没有反思或批判地将人类及其关系工具化的实证主义世界观(Fuchs 2011,11—26)。作为

---

<sup>①</sup> 曼彻斯尼(McChesney)进一步强调,“媒介在美国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反民主力量。媒体企业巨头变得越富有,权力越强大,参与民主的前景越贫穷”(McChesney 2008,426)。哈特同样认为,“媒介已经成了美国社会企业势力范围一部分,它将经济主导转化成了政治霸权。因此,媒介形构了意识,帮助强化了主导企业意识形态,后者成了统治性的政治意识形态”(Hardt 2004,48)。



批判理论家,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对这些过程进行有力批判。之所以如此,特别是因为持久的工具主义与经济理性,它们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总体的、看上去前所未有的商业化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相信沃勒斯坦,不管怎样这些进程都至少有一个积极结果:“全面商品化最终揭开了市场面纱”(Wallerstein 2001/1991,25)。

### 参考文献:

- Adorno, Theodor W. 2001/1991.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Agamben, Giorgio. 2000. *Means Without Ends: Notes on Politics*.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ndrejevic, Mark. 2012. Exploitation in the Data Mine. In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71—88. New York: Routledge.
- Arendt, Hannah. 1998/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2<sup>nd</sup> ed.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be, Robert E. 2009.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ward a New Integration*.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 Balibar, Étienne. 2007. *The Philosophy of Marx*. London, New York: Verso.
- Barbalet, Jack M. 1983. *Marx'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 London, Boston [...]: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 Bellamy Foster, John and Robert McChesney. 2011. The Internet's Unholy Marriage to Capitalism. *MRZine* 62(10). Available via: <http://monthlyreview.org/2011/03/01/the-internets-unholy-marriage-to-capitalism>(March 17, 2012).
- Bermejo, Fernando. 2009. Audience Manufac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Broadcasting to Google. *New Media and Society* 11(1—2): 133—154.
- Biltreyst, Daniel and Philippe Meers.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dience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415—435. Malden, Oxford: Wiley-Blackwell.
- Bollier, David. 2002. *Silent Theft: The Private Plunder of Our Common Wealth*. New York, London: Pluto Press.
- Bonefeld, Werner. 2001. The Permanence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Commodity Fetishism and Social Constitution. *The Commoner* 2: 1—15.
- Boyle, James. 2008. *The Public Domain: Enclosing the Commons of the Mind*.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rophy, Enda and Greig de Peuter. 2007. Immaterial Labour, Precarity, and Recomposition.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177—192. Lanham: Lexington Books.

Brown, Phillip, Hugh Lauder, and David Ashton. 2011. *The Global Auction: The Broken Promises of Education, Jobs and Income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away, Brett. 2011. Audience Labo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 Marxian Revisiting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5): 693—708.

Chicchi, Federico. 2010. On the Threshold of Capital, At the Thresholds of the Common. In *Crisi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Andrea Fumagalli Sandro Mezzadra, 139—152. New York: Autonomedia.

Cleaver, Harry. 2000/1979.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ti/Theses.

Collier, Andrew. 1994. *Critical Re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De Angelis, Massimo. 2007.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Dean, Jodi. 2008.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In *Digital Media and Democracy: Tactics in Hard Times*, edited by Megan Boler, 101—121. Cambridge, London: MIT Press.

Debord, Guy. 1970. *Society of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and Red Press.

Dyer-Witheford, Nick. 2004. 1844/2004/2044: The Return of Species-Be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2(4): 3—26.

Eagleton, Terry. 1996.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Malden, Oxford: Blackwell.

Fiske, John. 1990.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Fleissner, Peter. 2009. The “Commodific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7(2): 228—238.

Fortunati, Leopoldina. 1989. *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 Housework, Prostitution, Labour and Capital*. New York: Autono-media.

Fuchs, Christian.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 179—196.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12. Google Capitalism.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1): 42—48.

- Fuchs, Christian,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eds. 2012.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 Fumagalli, Andrea and Sandro Mezzadra, eds. 2010. *Crisis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Autonomedia.
- Gandy, Oscar H. Jr. 2012. Matrix Multiplication and the Digital Divide. In *Race After the Internet*, edited by Lisa Nakamura and Peter A. Chow-White, 128—145.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 Gorz, André. 1989.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 Gorz, André. 2010. *The Immaterial*. London: Seagull Books.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Hardt, Hanno. 2004. *Myths for the Masses: An Essay on Mass Communication*. Malden, Oxford, Victoria: Blackwell Publishing.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1.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9.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Cambridge: Blackwell.
-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New York: Verso.
- Hindman, Matthew. 2009. *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 Princeton in Oxford: Princeton Press.
- Hobsbawm, Eric. 2011.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Reflections of Marx and Marxism*.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2002/1947.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ws, Ursula.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R Press.
- Innis, Harold Adams. 2008/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2<sup>nd</sup> ed.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 Jameson, Fredric. 2009.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New York: Verso.

Jameson, Fredric. 2011. *Representing Capital: A Reading of Volume One*. London, New York: Verso.

Jhally, Sut. 1987.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Kang, Hyunjin and Matthew p. McAllister. 2011. *Selling You and Your Clicks: Examining the Audience Commodification of Google*.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9(2): 141—153.

Lazzarato, Maurizio. 1996. *Immaterial Labou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133—147. Minneapolis and Londo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Lefebvre, Henri. 1968. *The Sociology of Marx*.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Lukács, Geor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Marazzi, Christian. 2008. *Capital and Language: From the New Economy to the War Ec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Marazzi, Christian. 2010. *The Violenc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Los Angeles: Semiotext(e).

Marcuse, Herbert. 1955.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2<sup>nd</sup> ed. London: Routledge & Keegan Paul Ltd.

Marx, Karl. 1993/1858.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0/186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One*.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1/1894.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Three*.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5. *Collected Works, Volume 3 (1843—1844)*.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6. *Collected Works, Volume 6 (1845—184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87.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9 (1857—186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xwell, Rick. 1991. *The Image is Gold: Value,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Fetishism*. *Journal of Film and Video* 43(1—2): 29—45.

May, Christopher. 2010.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New Enclosures*. 2<sup>nd</sup> ed. New York: Routledge.

- McChesney, Robert W.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eehan, Eileen. 1993. *Commodity Audience, Actual Audience: The Blindspot Debate*. In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edited by Janet Wasko, Vincent Mosco, and Manjunath Pendakur, 378—400. New Jersey: Ablex.
- Mezzadra, Sandro. 2011. *The Topicality of Prehistory: A New Reading of Marx's Analysis of "So-Call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2(3): 302—321.
-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sup>nd</sup> edition. Los Angeles, London: Sage.
-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8.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 Moulier Boutang, Yann. 2011.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Malden: Polity Press.
- Murdock, Graham.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09—119.
- Murdock, Graham. 2006. *Marx on Commodities, Contradictions and Globalisations Resources for a Critique of Marketised Culture*. *E-Compós* 7: 1—23.
- Murdock, Graham. 2011.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 Good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13—40. Malden, Oxford: Wiley-Blackwell.
-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1973.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0: 205—234.
- Napoli, Philip M. 2010. *Revisiting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Work' of Audienc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2(3): 505—516.
- Napoli, Philip M. 2011. *Audience Evolution: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Audien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egri, Antonio. 1991/1984.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London: Pluto Press.
- Negri, Antonio. 1992.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 Situation Today: Methodological Aspects*. In *Open Marxism, Volume 2: Theory and Practice*, edited by Werner Bonefeld, Richard Gunn, and Kosmas Psychopedis, 69—105. London: Pluto Press.
- Negri, Antonio. 1999. *Value and Affect*. *Boundary 2* 26(2): 77—88.

Nightingale, Virginia, ed. 2011. *The Handbook of Media Audiences*. Malden, Oxford: Wiley-Blackwell.

Nordenstreng, Kaarle. 2004. Ferment in the Field: Notes on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its Disciplinary Nature. *The Public-Javnost* 11(3):5—18.

Parker, Ian. 1994. Commodities as Sign-System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s*, edited by Robert E. Babe, 69—91. Boston Dordrecht,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asquinelli, Matteo. 2009. Google's PageRank Algorithm: A Diagram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the Rentier of the Common Intellect. In *Deep Search: The Politics of Search Beyond Google*, edited by Konrad Becker and Felix Stalder.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Available via: [http://matteopasquinelli.com/docs/Pasquinelli\\_PageRank.pdf](http://matteopasquinelli.com/docs/Pasquinelli_PageRank.pdf) (April 1, 2012)

Perelman, Michael. 2000.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olanyi, Karl. 2001/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Postone, Moishe. 2003/1993.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odnik, Jernej. 2011. Permanentnost primitivne akumulacije, ali: o privatni lastnini, komodifikaciji in povratku rente [eng. : The Permanence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r: On the Private Property, Commodification and Return of the Rent]. *Casopis za kritiko znanosti* 244:89—109.

Prodnik, Jernej. 2012. Toward a Critique of Surveillance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A Reflec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Volume Edited by Fuchs, Boersma, Albrechtslund, and Sandoval.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1):92—99.

Sandoval, Marisol. 2012. A Critical Empirical Case Study of Consumer Surveillance on Web 2.0. In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147—169. New York: Routledge.

Schiller, Herbert I. 1989. *Culture, Inc. :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60.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Journalism Quarterly*(Fall), 563—572.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In *Coun-*

*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Thomas Guback, 266—291.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In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Thomas Guback, 292—301.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81a.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Economics. 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Dependency: The Tradition of H. A. Innis*, edited by William H. Melody, Liora Salter and Paul Heyer, 111—126. New Jersey: Ablex.

Smythe, Dallas W. 1981b.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Sohn-Rethel, Alfred. 1972. Mental and Manual Labour in Marxism. In *Situating Marx*, edited by Paul Walton and Stuart Hall, 44—71. London: Human Context Books.

Sohn-Rethel, Alfred. 1978.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London,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Thompson, Edward Palmer.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56—97.

Thompson, Edward Palmer. 1991.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Merlin Press.

Huws, Ursula.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tripleC* 10(2): 274—301, 2012.

Vercellone, Carlo. 2010. The Crisis of the Law of Value and the Becoming-Rent of Profit. In *Crisi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Andrea Fumagalli Sandro Mezzadra, 85—118. New York: Autonomedia.

Virno, Paolo. 1996. Notes on the “General Intellect”. 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 edited by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265—272.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Virno, Paolo. 2004.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Semiotext(e),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Virno, Paolo. 2005. *Interview with Paolo Virno (by Branden W. Joseph)*. Grey Room 21: 26—37.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1/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2<sup>nd</sup> e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asko, Janet. 2005. *Study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Comunicação e Sociedade* 7:25—48.

Wasko, Janet,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eds. 2011.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Malden, Oxford: Wiley-Blackwell.

Williams, Raymond. 1973.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New Left Review* 82:3—16.

Williams, Raymond. 2005/1980.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延斯·斯楚罗特(Jens Schröter)<sup>①</sup>

##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邓惟佳(译),朱晔、吴畅畅(校)

[导读]自1994年第一批浏览器问世以来,因特网成为了最卓越的新媒体。正如所有新媒体的境遇一样,新技术也面临着关于其未来用途和影响的激烈讨论。这场讨论的焦点之一是新媒体能否解决资本主义的所有问题——比尔·盖茨(Bill Gates)称之为“无摩擦的资本主义”。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其中一些论点,这些经常由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家公开表达的论点,旨在通过将因特网构造成商业媒体来解决后资本主义问题。但2001年网站倾覆暗示了这一构建的问题。本文的第二部分则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一种特殊阐释的讨论。有人主张(可追溯到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因特网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它可能导致非常深层次的、甚至是终极的资本主义危机。因特网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自从2008年以来,我们目睹了一次深层危机的一系列日益加剧的症状。通过采取马克思的方法,新媒体的一些重要影响可以被描述得远比尔盖茨等人未经反思的欢愉表述更为精确。

虽然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作者认为“因特网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以及作者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阐释和论证这一观点,但译者认为本文第二部分有关“由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家公开表达的论点:通过将因特网构造成商业媒体来解决后资本主义问

---

<sup>①</sup> 德国锡根大学, [schroeter@medienwissenschaft.uni-siegen.de](mailto:schroeter@medienwissenschaft.uni-siegen.de), <http://www.multimediale-systeme.de>。

题”的阐述、分析、质疑和批判堪比一篇严谨、缜密并且内容丰富的文献述评,也让研读者受益匪浅。

[关键词]商业化,危机,盖茨,因特网,马克思,盖茨,生产力,生产关系

## 一、引言

1989/90年以后,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新媒体”的价值能与因特网相媲美——这点可以同时从两个平行的层次来论述:第一,因特网已成为并依旧是跨国经济的核心载体;第二,这项新技术成为了各类神话的焦点,“还没等资本主义媒体开始在非社会的技术乌托邦中狂欢,社会乌托邦就已经被放逐了”(Haug 2003,68;Mosco 2004;Schröter 2004a;Flichy 2007)。在东方斯大林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间的冷战以后,好像历史的下一个阶段会解决所有问题,即由因特网导致的“无摩擦的”(比尔·盖茨)资本主义——因为显然到那一时刻为止的资本主义还是充满了摩擦,尽管所有的断言都是相反的。

早在1981年,利奥塔(Lyotard)就已经注意到“甚至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或新自由主义的论点,在当代情景下几乎没有任何可信度”,因为“它不再知道如何使其合法化”。然而,资本主义能开发“信息技术”以达到“全社会的计算机化……这就是今天的资本主义视野,显然这将把资本主义带出危机。”(Lyotard 1986,210)。利奥塔完全想当然地认为信息技术能解决经过诊断的危机,而不是使之恶化。

然而,就目前来看,这样的“因特网”(the internet)并不存在,现存的仅是它鲜被企业运用的网络前身。阿帕网(The Arpanet),因特网的前身,源于军事(一旦热核战争爆发,沟通仍起作用)和学术(共享计算机资源,当时仍十分缺乏)话语实践的重叠。很长时间以来,它都一直被强调是非商业、非经济的媒体(Abbate 1999;Schröter 2004a,20—148)。直到20世纪90年代该网络才被更广泛地运用,尤其是随着1991年对商业活动解除禁令和1994年开放万维网(WWW)之后。而在2011年的今天,它似乎已成为“世界市场之网”(Marx1991,929)。

因特网最好地验证了技术是如何不会自动导致社会变革的,而是通过霸权散漫的实践被重新指定<sup>①</sup>——一种自1973年起由“新自由主义”支配的资本主义,特别是从1989/90起尤其如此。因此,生产条件和生产力都不能

<sup>①</sup> 霸权的概念,参阅 Laclau & Mouffe(1985)。

被视作单一的原因；恰恰相反，该原因总能在它们复杂的互动中被发现。因此“跨国商业”——日益增长的外包公司整个部分的趋势——由于网络而得以加速或真正成为可能，跨国商业本身日益纳入霸权资本主义话语：“迄今在“商业”这个术语覆盖下，地域、组织、制度和法制的联合现在已经被瓦解、拆除、分散了。如今商业只是一个虚拟实体(Kurz 2005, 88)。准确地说，这种商业单元的“分子化”(molecularisation)只有因为“实时的信息的即时全球流动”才能起作用(Kurz 2005, 89)。可以从许多进一步的层面来列举，在这些层面上因特网已经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构，从而自一开始即造就了它的全球位错(dislocation)：例如，通过电子邮件开展的交流如何使个人做到永远能收到信息，各种新形式的远程工作和表面上的自主创业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新的分销渠道是如何打开的，最重要的是，庞大的、去实体化的金融领域是如何由于数据网络发展到如今的规模的(Kurz 2005, 220—298)。这个复杂的过程当然并非毫无矛盾，但它的各个方面无法在此详加考虑(Dyer-Witheford 1999; Haug 2003, 67—96)。

相反，问题是网络是否没有自相矛盾地成为了“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好例子(Engels and Marx 2009, 10)。换句话说，因特网能够成为霸权资本主义论点是如何试图将一个全新的、最初欠定的技术转化成一种由霸权操纵的技术的一个例子，却发现它恰恰受到这一尝试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主义本身”(Marx 2006, 358)。再换句话说，对网络潜力的最初兴奋感——至今仍存在于因特网还在扩展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带，正如阿尔祖玛(Alzouma)(2011)举的尼日尔的例子——其间有关的(试图的)的霸权结构的沉淀也同样受挫于网络。这并非由于网络上存在“抵抗的”亚文化，如后面将显示的那样，而恰恰是因为网络的“成功”。有新媒体的霸权“适应”(“Zurechtmachungen”，按照尼采的德国原文)，但没有人可以保证它们会如起初预期的那样发展。

以下将概述关于发展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因特网的部分论点。我们尤其关注那些论点：“用户友好”的万维网平台几乎并未流行开来，试图将因特网转换为一种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媒体。

## 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1991 年，因特网用于商务活动才变得明朗起来，随即因 1994 年之后万

维网和浏览器的传播而开始快速扩张。政界反应迅速。早在1994年,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做了名为“建构信息高速公路”(Building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演讲,其中他首创了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戈尔引用随着因特网的早期形式发展起来的“通用存档”这一乌托邦模型:“关于任何现存的可以想象的问题,如今我们都拥有大量的信息”(1994)。正如这位副总统十分清晰地表述,这类信息主要供“商务人士”使用,以使他们能够成功完成任务。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在如此海量的信息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我们面对如此大量的信息,我们看到的是能够对信息进行快速分类、组织和应用的这些新设备的外观。”这些“新设备”当然不是别的,正是自90年代初开始迅速散布开来的个人电脑。它们在解决经济问题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正如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做的一样:“我在我位于白宫西翼的办公室里做的的工作中,大概有90%都是在电脑终端上进行的。”但为了能获得所有信息,这些机器需要被连在一起。戈尔强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发展主要是私营企业的任务——尽管数据网络的发展主要靠军方和大学支撑,因此至少部分是靠公共资金支持。

自然,欧洲不想落在美国后头。欧盟很仓促地拟定了以欧洲和全球信息社会(Europe and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为题的“本格曼报告”(Bangemann Report),虽然只是顺便重新提及了戈尔的与交通相关的隐喻,但听起来更加乐观:“信息社会拥有改善欧洲公民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社会与经济组织的效率、以及增强凝聚力的潜力”(Bangemann et al. 1998, 7)。在西方世界一直联合起来反对的东欧集团(the Eastern Bloc)瓦解五年后,网络不仅被看作为创造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新手段,而且是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方法。然而,“有一种危险,就是个人会排斥这种新的信息文化及其装备”(Bangemann et al. 1998, 7)。尽管反复提及“多元化”(Bangemann et al. 1998, 19),该报告看起来认为倾向于“刻板、迟钝和区分[原文如此]”的反对者是不可接受的——“必须花大力气来实现公众对于新技术的普遍接受和实际使用”(Bangemann et al. 1998, 7)。“市场驱动的革命”——与阿尔·戈尔相似,由大学和军方开发的数据网络具有高度资助的特性,这一市场化意识的抑制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要求并鼓励“充分竞争”,从这里同义反复的推理继续道:“由于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信息基础设施是无边界的,信息社会在本质上有着全球维度”(Bangemann et al. 1998, 12, 16)。一

个先验的假设就是一个全球市场,新媒体就要去接近并提供服务。因此这些纲领性的论述继续着——因此,实际上对于诸如联网电脑之类的可编程机器也是如此。<sup>①</sup>

《知识时代的大宪章》(*Magna Charta for the Knowledge Age*)于1994年出版发行。这份保守的思想家发表的声明主要围绕着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反复要求的“普遍接入”网络空间,“实际上是普遍的生物电环境”(Dyson et al. 1994,27)。虽然——对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带着公然的漠视——它宣称“实际上,今天我们普遍接入(universal access)个人计算机”(Dyson et al. 1994,33—34),另一方面,它又提道:“为普遍接入交互式多媒体创造条件将要求一个对政府政策的根本性的再思考”(Dyson et al. 1994,34)。显然,从以上每个人都已经网络化的陈述和每个人都应该网络化的要求间的矛盾,可以看出《宪章》对于信息社会没有清晰的概念或政策。相反,这份宣言——与在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变化一致(Kurz 1999,642—667)——仅仅披着新外衣的古典自由主义。这种咒语般的需求是为了一个网络空间市场(Dyson et al. 1994,31),免于(社会的)国家限制,每个人都能使用:由于他们对政府的怀疑,作者反对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高速公路的建设往往是国家的事。《大宪章》中暗示的普遍接入绝非指信息本身,而是指适合市场的信息。

该声明称:“自由的意义、自治的结构、财产的定义、竞争的性质、合作的条件、社群的意识以及进步的性质都将因知识时代而重新定义”(Dyson et al. 1994,26—27)。由于数字媒体的压力,这些术语需要重新定义:诸如(前)音乐文件共享服务纳普斯特(*Napster*)、甚至简单的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光盘刻录机来复制音乐CD的现象表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或版权的概念(“产权的界定”)正处于被数字代码及其潜在的复制能力暗中破坏的危险之中。正如作者们写的:“信息[……]几乎可以零成本复制——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理论上)消费社会的所有产出”(Dyson et al. 1994,28)。然而,为了防止这种理论成为现实,《大宪章》的作者们回归到对财产更为传统的定义上来,并且要求在对新自由主义话语有诸多诋毁的地区果断采取行动。

<sup>①</sup> 讨论霸权散漫的实践是否且如何嵌入在技术中并因此设法实施这些技术这个问题,就电脑而言是特别相关的,因为该技术很明显是开放的和可编程的,像海绵一样等着以程序的形式吸收散漫的实践;参阅 Schröter(2004a,7—17,279—292;2005)。这一编程的过程同由凯尔纳(Kellner)(2004)提出的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简单、不可持续的工具主义论断毫无相同之处。

“明晰且具有执行力的产权使市场运作十分必要。定义这些权利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Dyson et al. 1994, 29)。在诸如纳普斯特这样的文件共享网站上使用数字因特网技术从那以后已经因监控而削减了,以确保兼顾音乐产业的需求(“明晰且具有执行力的产权”)。<sup>①</sup> 这个特定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人们至少一直在努力塑造他们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使用的新媒体和新方法——必要的话还会诉诸警力。<sup>②</sup> 从这一层面上说,坚持谈论“数字革命”是荒谬且愤世嫉俗的——因为“革命”一词,无论好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一直与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观念相关的。<sup>③</sup>

无论如何,宣扬关于知识时代的新观点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激增的据推测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仅仅重复了人们熟知的新式自由主义的诉求:国家的消退,一个以“包括易进入和低进入壁垒的动态竞争为特征”的市场扩张(Dyson et al. 1994, 30)。结果是——正如不断坚持的“普遍接入”指出的那样——强制性的市场参与。然而要点是网络空间(虽然只向商业交易开放了四年)被视为“典型的竞争市场”(Dyson et al. 1994, 34),最终允诺了一件事:“美国的商业和技术领导地位的复兴”(Dyson et al. 1994, 30)。这种网络自由主义及其并发的反国家的冲动也在“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的口号之下渐渐为众人所知(参阅 Barbrook and Cameron 1995)。约翰·帕里·巴罗(John Perry Barlow)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Barlow 1996)也是由同样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它以杰斐逊的美国独立宣言为基础,同样也抵制网络空间中任何国家的干涉——即使没有明确提及对该市场的一种自由主义的理解。<sup>④</sup>

这里提及的几乎所有文章都要求减少垄断,但考虑到英特尔和微软在当今计算机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这一观点似乎又十分荒谬。微软创始人及前任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反对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因为“高速公路隐喻的真正问题在于强调基础设施而非应用”(Gates 1996, 6)。然而,提及应用表明,可能盖茨反对该隐喻的主要原因是它不够商业化。盖茨所写的显示了一种只能被冠以乌托邦的见解:“交互的网络将成为终极市场”(Gates

① 门户网站依然存在(www.napster.com),但免费共享音乐文件已不再可能。

② 或者带有大规模的威胁与恐吓——正如海报、电影院和电视运动一样明显。这些有着如安装工艺说明书一样的功能,明白地说明如何保守地使用数字网络,即一种符合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

③ 正如,举个例子,在诸如泰普斯科特(Tapscott)(1996)的宣传的伪未来学著作中提到的那样。

④ 除了在网络空间里的“我们市场的财富”所指的,这看起来是将因特网理解为一个市场。

1996,6)。他进一步解释道：

如果每个买家知道卖家的价格并且卖家也知道买家的心理价位，那么“市场”上的每个人都会做出充分知情的决定，社会资源也会被均匀分配。迄今我们还没有斯密的理想，因为潜在的买家和卖家都几乎无法掌握充分的信息。<sup>①</sup> [……]因特网将会扩张为电子市场，成为终极中介，全球中间商。[……]它将成为购物者的天堂。(Gates 1996,80—181)

也就是说，因特网使得买家和卖家间的普遍沟通成为可能，家庭个人电脑提供的各种商品的普遍接入将防止市场参与者只有“不完全、有限的信息”(Gates 1996,180)。普遍沟通和接入导致“广泛、有效的竞争”(Gates 1996,205；关于“普遍沟通”和“普遍接入”的幻想史，参阅 Schröter 2004a)。这就是市场最终如何能够完全发展(盖茨的现实模式就是作为“健康的电子市场”的存储市场——似乎那里不存在崩溃)。这样普遍的竞争包括几个部分：因此盖茨反复提及一件产品必须能够控制因特网上潜在顾客的注意(Gates 1996,197,211,216,224 etc.)。接着盖茨强调了完全个性化的广告和由网络开辟的生产的可能性：除(略显矛盾的)个人报纸之外，似乎是个人的服饰裁剪特别吸引他。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电子化地“显示(他们的)尺寸(Gates 1996,189)”，那么通过因特网的量身定制将成为可能。他将顾客的天堂定义得更为清晰：

在越来越多的[李维斯品牌]的专营店，客户额外支付约 10 美元便可买到按照他们的精确规格制成的牛仔裤——8448 种臀围、腰围、内接缝，门襟尺寸和风格的任意组合。(Gates 1996,89)

这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奇怪想法，包含了一个在 8448 种相同选项中做出的选择，却不清楚一个针对如此大量选择的概览是如何实现的(Schröter 2004b)。这种概念非常“适合”万维网，其主要问题恰恰在于它缺乏链接目录和压缩机制，向用户提供大量可能的信息，这个数量被作为其观念多元和信

---

① 盖茨在此指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市场经济的策划者之一。

息丰富的证明而经常得到赞美。然而,“一次提供 12000 个结果的搜索所带来的却并非财富,而是白噪声(white noise)”(Winkler, 1997, 176)。众所周知,搜索引擎对该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解决方案(Haigh 2008; 见 Mager 2011 关于搜索引擎的资本主义建设的分析)。

此外,盖茨的文章揭示了一个尴尬的转变。主要焦点不再是用户如何接触到以市场为基础的信息,而是广告和产品是如何轮到它们来接近顾客的。顾客不仅被期望电子化地登记他们的尺寸,盖茨规划了长期目标是“软件中介”商也能够利用潜意识来牟利:

这个问卷可能包括各种意向去努力绘制你的敏感反应。代理商通过比较你和其他人给你反馈,从而将这个过程变得有趣。(Gates 1996, 191)

这种极权主义的订购,包括使人明白“你如何与他人比较”,即什么才算是标准——使得消费效率大幅提升;个人电脑充当了一台效率机,不仅在阿尔·戈尔的工作中,而且在购买方面——确实,将消费者还不知道自身需要的产品推荐给他们看来是有可能的。

“技术末世论”(techno-eschatology)将“无穷扩张的自由市场愿景与对技术的持久信任”连接起来(Dery 1996, 8, 10)。我们可以列举无数的进一步类似的网络宣言:因此,德图佐斯(Dertouzos)(1997, 9)也写道:“对我而言看起来这是自然和无可避免的,未来的计算机和网络世界会和雅典的跳蚤市场一样——只是取代了实体产品,商品会是信息商品。”

这里讨论到的所有文章中,屏障被打破,(市场的)全球化扩张是可预测且永无止境的,普遍的竞争与并发的、无限制的使用因特网不仅是需求,而且或多或少是命令——以一种匿名的“我们”的名义提出的命令。这似乎与万维网的结构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因特网协议使几乎无限的扩张成为可能,因此缓解了资本累积与扩张的压力”(Altvater 1998, 60; Schiller 1999)。

因此在 1999 年前后,一个大约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创造的全新、充满魔力的新词汇开始流传:“新经济”(New Economy)。作为一种新资本主义媒介的因特网,其持续的魔力似乎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好像不知来自何方,网络公司启动的股份一飞冲天,而因特网似乎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赚钱机器。然而,众所周知,不久这个泡沫就在一声巨响中破灭了。



### 三、因特网的生产力与生产条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讨论(其中只有极少的例子)显示了编程机的程序以及他们被联网的方式。它们将服务于资本主义向世界每个角落的完全扩张,包括了个体的内在自我。随着易趣网(*eBay*)的出现,每间公寓都成了全球市场的一部分,每个人主页都创造了一个自我营销的商店橱窗。保罗·特雷纳(Paul Treanor)在很久之前就评论了上世纪 90 年代因特网的扩张具有极权主义特征:

该逻辑实际上是这么说的:“无人能自由身处自由市场之外”[……]网络主义不需要选择:它需要网络,一个网络,一个全球网络,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一个全世界的网络空间,没有别的。似乎伴随着自由市场观念(总体上随着自由主义),与网络共存是不可能了。(Treanor 1996)

但是就像多次被提议的那样,有理由去怀疑——继马克思后——因特网的再贡献与再调整实际上是否真的是无摩擦的。新经济泡沫的爆发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看起来似乎数字媒体的兴起,即“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与资本主义相冲突的——正如司法和警察部门关于像纳普斯特这样的文件分享网站和其他诸如刻录 CD 和非法分享电影等的辩论中所启示的那样。<sup>①</sup> 这种暗示已经可以在今天数字媒体文化的根源之一中被发现。在其 1948 年关于控制论的书中,诺伯特·维纳提到了“超高速计算机”出现的可能性:

没有人作为主体的自动化工厂和装配线离我们仅咫尺之遥,只是受我们的意愿限制,我们不愿投入像以往花费一样多的精力来对它们进行设计,例如,二战中开发雷达技术。[……]对人类而言,有这种机

---

<sup>①</sup> 参阅 Hartmut Winkler,他写道:“人们近乎被提醒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技术再生产的技术潜能和它的社会构成——版权——之间是直接对立的(Winkler 2004,29)。”同样参阅 Kurz(2007)关于一个争辩的,但详细的讨论,如果数字产品破坏了商品的形式。

器很可能是一件好事,有了它可以摆脱对卑贱和令人不快的任务的需  
要,但或许又不是(一件好事)[……]就开放市场而言的评估,对这些  
新的潜能不是好事。[……]不存在一种付给美国锄头和铲子工人维  
持生计的报酬率,低到能够与作为挖掘机的蒸汽铲干的活相竞争。类  
似地,现代工业革命必定会使人脑贬值,至少在一些更简单和常规的  
决策方面。[……]拿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而言,拥有中等或更  
少成就的普通人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任何人花钱去买的东西。(Wiener  
1961,26—28)

在他 1964 年的媒介理论经典著作《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中,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抱怨了“关于失业警报的愚蠢”  
(McLuhan 2003,464)。16 年前,维纳(Wiener)显然已经意识到了第三次(他  
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削减成本的竞争,会导致大规模的工作场所的  
合理化——麦克卢汉称其为“强度和竞争”(McLuhan 2003,136)。在麦克卢  
汉之前 100 年,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这点:因为当一个人仅作为“一个生产过程  
的看守人和调整者”来行事时,那么(至少对大部分来说)劳动[……]才停下  
来并成为财富的伟大源头。生产依靠“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而非“科学的一  
般状态与技术进步”越少,“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会发生更多的  
“故障”(Marx 2005,705)。以工业机器人为例,从汽车工厂到高度自动化的  
录影带租赁店,它们已经使数百万的工人失业,尽管实际工资不断缩水,失  
业还在发展,导致了国内市场的萧条,是一个直接的后果。即使是据认为即  
将出现的“服务型社会”、“信息社会”或者“知识社会”也不能成为解决办法,  
因为尤其在这一部门中——在这里我们回到因特网——数字技术可以将工  
作变得过剩:一个人可以在线购买火车票和飞机票、书、唱片、衣服、壁纸、衣  
柜等(比如易趣网);他也可以处理银行业务,在大量档案卷宗中搜索,甚至  
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一瓶在附近某家店里试过的葡萄酒。<sup>①</sup> 无数销售人员和  
咨询顾问因此变得多余:

---

<sup>①</sup> 马克思早已知道,科学技术使得“一般的社会知识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Marx 2005,706)”——然而,这一辩论恰恰在经济学手稿中出现过,相关章节谈论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基础(以价值为标志)与其发展之间的矛盾、机器等等”(Marx 2005,704)。

正如生产工作因工业机器人而减少或被完全废除,如今办公室工作和服务也因因特网而正在减少或被废除。比起资本主义的剥削过程通过降低产品成本能够重新吸收和市场扩张因此变为可能,微电子革命的第一波或阶段已经导致了更多的劳动力过剩。如果在早先[工业革命的]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代偿机制在微电子革命的第一阶段不再起作用,那么在它的第二即因特网决定阶段更不会起作用了。结果只会是更进一步的、重大的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率的的增长: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失业人数将达到800万到1000万人,而非400万。(Kurz 2000)

如今,当无线射频识别芯片(the RFID chips)被赞誉为超市及各大商店中最新的、获得巨大成就的网络产品的时候,那么大多数大商店和超市员工将流落街头(而这个,并非数据保护,才是新芯片面临的真正问题)。<sup>①</sup> 2005年前后,全球最大的两百家企业完成了超过25%的全球经济活动,但是却只能够雇佣0.75%的人力资源(Kurz 2005, 81)。即使模拟、自动化和网络化导致了生产力潜能的骤升,越来越多的人却似乎被排除在网络工作之外——赚钱——消费,最终使商品经济的整个结构陷入危机之中。<sup>②</sup> 那些不工作的人将不消费不付税,这也意味着生产出的产品将卖不出去(导致国内市场的危机),国家也就不能够为市场的法律、教育-政治等框架的继续运作负责——许多欧洲国家将面临更严重的

---

① 参阅作为最丰富的信息来源的在线的无线电射频识别期刊:<http://www.rfidjournal.com>,检索于2011年11月9日。对该技术及其提供的可能性的最好介绍详见以下链接中的文章:<http://www.rfidjournal.com/article/articleview/1339/1/129/>,检索于2011年11月9日。文章明确写道:“一些自动识别技术,如条形码系统,通常要求人们手动地扫描商标或标签来获得数据。无线电射频识别技术的开发是为了使人们获得商标上的数据并将其传输至计算机系统——而无需任何人介入。”又失去了一份工作!

② 这一观点饱受非议。所谓的“生产力悖论”曾引发过一场大讨论(例如 Brynjolfsson 1992):看起来似乎日益增长的计算机使用率并没有提高生产力,也没有减少工作(对此观点的评论,1999年维尔考科斯和莱斯特(Wilcocks AND Lester)以及2001年特兰克(Trenkle)文章有部分贡献)。但即便是一些该观点最热情的拥护者,像埃里克·布吕诺尔夫松(Erik Brynjolfsson)也不得不在他最近出版的有着引人注目的标题的著作《与机器比赛》(Brynjolfsson and McAfee 2011)中承认,数字技术正在削减工作,也因此导致了一些严重的经济再生产问题。当然,像布吕诺尔夫松这样乐观的作者们不可能触及该问题的实质,资本主义和数字技术可能不能相容——并且可笑的是他和他的合著者居然十分骄傲地称数字技术可能削减工作是他们的新发现(参见 Brokaw 2011 中的引文:“然而关于技术飞速发展的作用却鲜被提及”),就好像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讨论、至少是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1995)的作品从未存在过。

债务。<sup>①</sup> 那些失去了工作或者只能做些短工的消费者只能靠信贷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准。同时企业为了赶上越来越快的生产力的飞跃而被迫陷入债务中。消费者、国家和企业都需要信贷。数字技术的传播、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的增长和(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的通胀三者的并行肯定不是巧合——相反,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与数字化的或网络化的生产力两者冲突的一个确切的信号。

不幸的是,一个明显的用来反驳的论点,即新技术创造了新产业及新工作(如果只为那些人们运送在易趣网上订购的商品),却说不通。如今,与被削减的工作相比,被创造出来的新工作少得多(就算真的被创造出来了,它们也常常只是危险的、低报酬的工作)。

因此,数字技术无论如何也不会导致“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和“终极市场”(Bill Gates);相反,它们使得当前被认为是我们唯一选择的市场经济的功效越来越低(Kurz 对此特别强的立场,Kurz 1999,602—780;同见奥特布利[Ortlieb]2008;豪格[Haug]2003,293,当提到“和计算机相伴的高科技作为其领导生产力已经将[资本主义]推向了其极限时,显得稍微谨慎一些”;也请参阅Rifkin 1995)。因此,这将引向一场[……]“在生产的物质发展与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Marx 2006,1024)。这表明马克思既未谈及技术决定论也未谈及社会决定论——反而,他关注的是技术生产力与社会形式两者的关系:<sup>②</sup>

在一个它们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这些关系转变为它们的羁绊。

---

<sup>①</sup> 更不用提跨国贸易由于疯狂的定位竞争被赋予的减税(Kurz 2005,135—144)。当谈论全球经济时,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本文的一位审稿者问道的:“维纳和马克思书中的结论怎样适用于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问题是针对中国的发展的,没有中国的发展,世界经济危机会更糟糕。这也意味着中国证明了资本主义依然有效,至少在世界的部分地区。那么中国的发展速度能不能算是证明呢?这个问题很有趣,但由于篇幅问题,此处不便详作回答(尤其是因为这不是本文的中心论题)。但可以简单回答一下:中国表面上的“成功”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可能是终极)危机的诊断书(Kurz 2005,180—186;见 Kurz 2010 中关于中国的简短评述)。正相反,中国的发展完全依赖于美国信贷(主要的)形成的虚构资本。中国经济完全指向对外(大部分为美国)出口。一旦美国信贷链中断,中国的发展就会止步——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社会分裂问题。我们将在几年后目睹中国发展的停止、他们经济的收缩以及随之而来严重问题。它的首发症状已经可见。

<sup>②</sup> 即使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偶尔听起来如此,例如当他写道:“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是紧密相关的。在获得新的生产力时,人类会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通过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他们谋生的方式,他们改变所有的社会条件。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Marx 2009,48—49)

随即而来的是社会革命阶段。(Marx 1904,12)<sup>①</sup>

这是“数字革命”这一口号的真正涵义,而这通常不为人所知。控制论方面的顶尖思想家诺布特·维纳似乎早已预见到了这点:“答案当然是拥有一个以人类价值而非买卖为基础的社会。”(Wiener 1961,28)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维纳预见到的计算机技术的潜力与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在现今关于媒介研究控制论的辩论中未曾出现过(Bergemann 2004)——尽管该冲突是与控制论科学相连接的可编程技术的关键影响。看起来好像重读马克思将使媒体与传播分析大受裨益(Mosco 2009)。比如,克劳斯·贝爱思(Claus Pias)写道:

由于——绝对是有疑问的——非确定性的目的论理论(theory of non-deterministic teleology)携带大量政治含义,不仅冲击这样的理念,即一个设置了控制论技术的社会如何能够或多或少独立地将其带入一种渴望的形式(虽然采用何种方式尚不明确)并使自己稳定在那种形式中。[……]控制论的组成能够捕获每次脱离常轨并为了它们的目的提供异常的、动荡的生产。控制论是一个通过干扰和持久危机成长的管理,因为这就是它如何自我稳定的。(Pias 2004,323,325)

控制论的组成、它们的知识及与之相连的数字媒介实际上会动摇贝爱思关于“社会”的欠定概念的基于市场的形式,以上这种可能性未加考虑,这点与利奥塔在1981年提出的宏大叙事(*grand récit*)类似。<sup>②</sup> 与维纳相矛盾,

---

<sup>①</sup> 在卡斯特瑞阿迪斯(Castoriadis)关于马克思的精彩论述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方面的分析似乎是被曲解了。卡斯特瑞阿迪斯指出,马克思指责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放慢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实际上在早些时候,它以无法想象的比例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Castoriadis 1998,15)当那些东欧集团的逾期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鞭策者们断言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解放了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资本主义令生产力发展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而这恰恰又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个发展剥夺了价值积累所依赖的工作。《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生产关系、交换和财产,一个用魔法召唤这些庞大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社会,就像那个巫师一样,不能再继续控制他用咒语召唤地狱的力量(Marx and Engels 2009,10)。”这似乎不是生产条件降低了生产力的发展,恰恰相反,是后者把前者推入了一个困境。

<sup>②</sup> 然而,贝爱思(Pias)确实承认,控制论可能“绝对有问题”。皮尔葛尔(Pircher)只提到“在西方市场经济中自动化被视为一种威胁(2004,93)”——即使它不仅仅被“看作”如此,但实际上过去和现在对许多工作是一种威胁。

“乌托邦的冗余”(Pias, 2004, 325)只有当一个人在未受到这种不稳定影响时才可诊断。2008年后,我们似乎比以往更加明显地经历这一切。

#### 四、简短的小结

很有趣,2000年之后我们目睹了一些历史的重复。上世纪90年代末盖茨乐观地提出了“无摩擦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却遭到随后的网络泡沫破灭的嘲笑。在2008年开始的这场危机之前,也出现过类似乐观的论述,这一次是关于“网络2.0”时代(见 Leister and Röhle 2011 对关于脸书网的乐观论述的批判性分析)。又一次,新的因特网的应用,“社会媒体”,看起来好像能够成为新的工作、价值观和财富的源头。但这并不见效——尽管社会媒体被用来当作控制、惩戒和无意识商业化的新技术(见 Fuchs 2010a; 2010b; 2011)。也许这再次显示数字媒体和资本主义并不相容且没有方法使它们相容。也许它们仅仅是——用马克思的话——与生产关系冲突的生产力。这当然不会自动导致一个新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但是似乎强化了必须做些什么的意识。

#### 参考文献:

- Abbate, Janet. 1999. *Inventing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Altvater, Elmar 1998. Kehrseiten der Globalisierung. *Telepolis. Die Zeitschrift der Netzkultur* 4(5):54—61.
- Alzouma, Gado. 2011. Young People,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in Niger. *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 3(2):277—292.
- Bangemann, Martin et al. 1994. Europe and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Retrieved November 5, 2011, from [http://www.unic.pt/images/stories/publicacoes200801/raport\\_Bangemanna\\_1994.pdf](http://www.unic.pt/images/stories/publicacoes200801/raport_Bangemanna_1994.pdf)
- Barbrook, Richard and Andy Cameron. 1995.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www.hrc.wmin.ac.uk/theory-californianideology-main.html>
- Barlow, John Perry 1996.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s://projects.eff.org/~barlow/Declaration-Final.html>
- Bergemann, Ulrike. 2004. Von Schiffen und Schotten; Der Auftritt der Kybernetik in der Medienwissenschaft. *Medienwissenschaft Rezensionen* 1:28—40.
- Brokaw, Leslie. 2011.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Affecting Employment. Re-

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sloanreview.mit.edu/improvisations/2011/10/26/brynjolfsson-and-mcafee-book-looks-at-digital-revolution-and-its-transformation-of-employment/#.T1imVpi9Zd0>

Brynjolfsson, Erik. 1992.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iew and Assessment*.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ccs.mit.edu/papers/CCSWP130/ccswp130.html>

Brynjolfsson, Erik and Andrew McAfee. 2011. *Race Against The Machine: 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Driving Productivity, and Irreversibly Transforming Employment and the Economy* (Kindle-Book).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98.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ertouzos, Michael. 1997. *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 New York: Harper.

Dery, Mark. 1996.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Grove.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Dyson, Esther et al. 1994. A Magna Charta for the Knowledge Age.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11(4):26—37.

Engels, Friedrich and Karl Marx. 2009.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eddington: Echo.

Flichy, Patrice. 2007. *The Internet Imaginai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10a.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179—196.

Fuchs, Christian. 2010b. Facebook, Web 2.0 und . konomische überwachung. *Datenschutz und Datensicherheit* 7:453—458.

Fuchs, Christian. 2011.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ide Web. Social Medium of New Space of Accumul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Med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Media Industries*, edited by Dwayne Winseck and Dal Yong Jin, 201—220. London: Bloomsbury.

Gates, Bill. 1996. *The Road Ahead*. Rev. ed. London: Penguin.

Gore, Al. 1994. Building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s93894098.onlinehome.us/Mine/WilliamGibson/Source/gorespeech.html>

Haigh, Thomas. 2008. The Web's Missing Links: Search Engines and Portals. *In The Internet and American Business*, edited by William Aspray and Paul E. Ceruzzi, 159—19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ug, Wolfgang Fritz. 2003. *High-Tech-Kapitalismus. Analysen zu Produktionsweise, Arbeit, Sexualität, Krieg und Hegemonie*. Hamburg: Argument.

Kellner, Douglas. 2004. *Marxism and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essays/marxisminformationssuperhighway.pdf>

Kurz, Robert. 1999. *Schwarzbuch Kapitalismus: Ein Abgesang auf die Marktwirt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Eichborn.

Kurz, Robert. 2000. *Euphorie um die New Economy: Das Internet als Traumfabrik des neuen Marktes*.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www.exitonline.org/html/link.php?tab=schwerpunkte&kat=Kritik+%40+Krise+des+Werts+und+des+Geldes&ktext=Euphorie+um+die+New+Economy>

Kurz, Robert. 2005. *Das Weltkapital. Globalisierung und innere Schranken des modernen warenproduzierenden Systems*. Berlin: Bittermann.

Kurz, Robert. 2007. *Der Unwert des Unwissens. Verkürzte 'Wertkritik' als Legitimationsideologie eines digitalen Neo-Kleinbürgertums*.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www.exit-online.org/link.php?table=aktuelles&posnr=264>

Kurz, Robert. 2010. Interview, conducted by Peter Jellen. *Telepolis*.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www.exit-online.org/link.php?table=schwerpunkte&posnr=204>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le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Leistert, Oliver and Theo R. hle, 2011. *Generation Facebook. über das Leben im Social Net*. Bielefeld: Transcript.

Lyotard, Jean-Fran. ois. 1986. *Rules and Paradoxes and Svelte Appendix. Cultural Critique*, 5, 209—219.

Mager, Astrid. 2011. *Algorithmic Ideology. How Capitalist Society Shapes Search Engines*.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926244](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926244)

Marx, Karl. 1904.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International Library Publishers.

Marx, Karl. 1992.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2005.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2006.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2009.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Retrieved November 9, 2011, from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pdf/Poverty-Philosophy.pdf>



McLuhan, Marshall. 2003. *Understanding Media*. Berkeley: Gingko.

Mosco, Vincent.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2nd Edition.

Ortlieb, Claus Peter. 2008. Ein Widerspruch von Stoff und Form. Zur Bedeutung der Produktion des relativen Mehrwerts für die finale Krisendynamik.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www.math.uni-hamburg.de/home/ortlieb/WiderspruchStoffFormPreprint.pdf>

Pias, Claus. 2004. Unruhe und Steuerung. Zum utopischen Potential der Kybernetik. In *Die Unruhe der Kultur. Potentiale des Utopischen*, edited by J. rn Rösen, 301—325. Weilerswist: Velbrück.

Pircher, Wolfgang. 2004). Markt oder Plan? Zum Verh. ltnis von Kybernetik und . konomie. In *Cybernetics-Kybernetik. The Macy Conferences 1946—1953, Vol. 2, Essays und Dokumente*, edited by Claus Pias, 81—96. Berlin: diaphanes.

Rifkin, Jeremy 1995. *The End of Work*. New York: Putnam.

Schiller, Dan.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chröter, Jens. 2004a. *Das Netz und die Virtuelle Realit. t. Zur Selbstprogrammierung der Gesellschaft durch die universel-le Maschine*. Bielefeld: transcript.

Schröter, Jens. 2004b. 8448 verschiedene Jeans. Zu Wahl und Selektion im Internet. In *Paradoxien der Entscheidung*, edited by Friedrich Balke, Gregor Schwering and Urs St. heli, 117—138. Bielefeld: transcript.

Schröter, Jens. 2005. World Brain-Electronic Brain-Global Brain. Pl. doyer für De-Sedimentierung statt Organizismus. *Paragrana.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 14(2): 283—303.

Tapscott, Don. 1996.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McGraw-Hill.

Treanor, Paul. 1996. Internet as Hyper-Liberalism.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1 from <http://web.inter.nl.net/users/Paul.Treanor/net.hyperliberal.html>

Trenkle, Norbert. 2011. Massenausfall. Wie der Kapitalismus an seiner eigenen Produktivität erstickt. Retrieved March 6, 2012 from <http://www.streifzuege.org/2011/massenausfall/print/>

Wiener, Norbert. 1961.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illcocks, Leslie p. and Stephanie Lester, eds. 1999. *Beyond the IT Productivity Paradox*. Chichester: Wiley.

Winkler, Hartmut. 1997. *Docuverse. Zur Medientheorie der Computer*. München: Boer.

Winkler, Hartmut. 2004. *Diskurs. konomie. Versuch über die innere. konomie der Medi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安德烈亚斯·维特尔(Andreas Wittel)<sup>①</sup>

## 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王蔚(译),伍静、吴畅畅(校)

**[摘要]**本文认为,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是相当有限的。在数字传媒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而且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中。本文将通过两个步骤为这种观点提供合理依据。第一步,证明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相当有限,同时,解释这种有限背后的逻辑。第二步,也是这篇论文的核心目标,即探究在面对非市场生产(non-market production)、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数字公地(the digital commons)等现象,面对自由文化、知识产权、自由劳动等讨论时,诸如劳动、价值、所有制和斗争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的紧要性与相关性。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产权、斗争、传媒政治经济学、数字、分布式传媒、大众传媒、互联网、网络

### 一、导 论

本文认为: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相当有限。在数字传媒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而且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这一发展值得欢

---

<sup>①</sup>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高级讲师,近期关注数字传媒和批判理论的相互影响。andreas.wittel@gmail.com, [http://www.ntu.ac.uk/apps/Profiles/70220-2-2/Dr\\_Andreas\\_Wittel.aspx](http://www.ntu.ac.uk/apps/Profiles/70220-2-2/Dr_Andreas_Wittel.aspx)

呼,因为他的概念将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和应用性。本文将通过两个步骤为这种观点提供合理依据。

第一步,证明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相当有限。同时,解释这种有限背后的逻辑,解释为什么数字传媒——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数字事物——打开了崭新的有着光明前途的可能性,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纳入更广泛的范围,以有利于在信息时代分析(特别的)数字传媒和(更为一般性的)资本主义。

第二步,也是这篇论文的核心目标,即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如劳动、价值、产权和斗争等,并对这些概念与数字传媒或数字事物的批评分析的相关性做一简要概括。这些概念特别与深入理解以下现象密切相关,如非市场生产(non-market production)、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数字公地(the digital commons),也与涉及自由文化(free culture)、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自由劳动(free labour)的讨论尤其相关。

文章部分章节重点审视了自由劳动概念,这一概念在阐释社会网络的新发展时非常有效,但其分析严谨性尚嫌不够,并将有较大差异的实践混为一谈。由于在雇佣关系的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商品化劳动之外,还有些人类活动非常繁荣兴旺,因而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需要反思劳动概念。为了推进对自由劳动的讨论,我认为我们需要先讨论劳动。为了思考劳动,我们还需要思考所有制、价值和劳动价值理论(the value theory of labour)。

我在文章中得出的许多结论,只能通过斗争来获取。关于斗争的短评指向了数字传媒和社会运动间的关系。在数字时代,随着对直接行动及其不同调解形式的审视,传媒政治经济学能够占据新的领地。

## 二、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

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一个学术领域,其特点为:线性形式与单向流动的传播,少数生产者向大量接受者提供内容。

仅用几个段落来概括学术领域的关键议题、疑问、讨论和研究结果,是一项艰巨任务。这将导致过度简单化的结论和存疑的概括,同时,要求叙述的连贯性会牺牲观点的细腻性。在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关于这个领域的内容是什么,仍然存在相当广泛的

共识。比较对这一领域的许多介绍(如 Mosco 1996; Devereux 2003; McQuail 2005; Durham and Kellner) 2006; Laughey 2009; Burton 2010) 可以明显看出,关于已经出版的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议题、疑问和研究结果,并不存在太多分歧。

相关研究起始于这样一个观察:传媒机构越来越多地私有化并转变为企业。问题在于,传媒产业并没有被看作是一般的产业。要理解传媒行业与众不同的特性,就必须剖析传媒内容生产的两重性:即是商品同时又是公共物品。传媒内容是一种私有物品,是一种商品,因为传媒产业用这种产品积累利润。同时,传媒内容又是公共物品,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公共领域。这样,一方面传媒机构有社会、文化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它们也被经济利益所驱动。正是这种传媒内容的两重性,使得这一假设相当可疑:假设传媒是一支独立力量,自然地维护民主和公共利益。同样值得怀疑的另一个假设是,大众传媒仅仅是舆论的镜子。

传媒政治经济学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传媒是强大的,他们能够影响公共舆论,塑造公共话语。因而,在一个较为宽泛的政治和经济语境中,关注传媒内容生产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对物质性的关注,对传媒内容生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关注,将传媒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术领域中区别开来。如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中存在更多肯定成分,这些研究一般不把权力与控制研究定位于传媒机构中,而是落脚在积极的受众上,认为受众是真正的意义制造者。<sup>①</sup>和媒体与传播分析相比,传媒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分析同样很多。

传媒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以下议题:第一是了解传媒市场。传媒公司如何产生收入并形成利润?第二是审视传媒组织(包括公共的、商业的和私有非营利机构)所有制问题,分析涉及传媒产品(显然这里尤其与新闻生产相关)的所有权结构的含义。第三,关注传媒部门的变革动力,特别是传媒部门的发展,如传媒产业的国际化,传媒机构的集中化和集团化,传媒产品的多样化等。这些关注引发了关于文化帝国主义和传媒帝国主义的争论。第四个议题关于传媒规制、传媒政策和传媒管理。这个问题最初只是在国内层面,但越来越具有全球视角。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对这些领域的探究

---

<sup>①</sup> 关于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张力的分析,可见凯尔纳(Kellner 1995)和维特尔(Wittel 2004)。关于传媒政治经济学和积极的受众研究之间的分歧的分析,可见席勒(Schiller 1989, 135—157)。

是密切关联的,事实上,其中有相当多的重叠部分。

为了用最简短的方式介绍传媒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我将参照丹尼斯·麦奎尔(McQuai 2005,100)的摘要框。他认为这些都是核心的研究成果:

- 经济控制与逻辑是决定因素
- 传媒结构趋向集中
- 传媒发展全球一体化
- 内容和受众的商品化
- 多样性减少
- 反对和不同声音被边缘化
- 传播中的公共利益屈从于私人利益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通常不会被认为是传媒政治经济学内部圈子的成员,而实际上,他最早提出了这一研究路径。在一篇关于英国报纸行业增长的论文中,他以这一观察开篇:“新闻出版业的历史与经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协调普遍失灵,这必须得到必要的解释。”(Williams 1961,194)他着手开拓这一视角,对跨越170年的历史做了经验研究,得到了具有高度怀疑性的发现:

这些数据并不支持以下观点:新闻出版业发展稳定而缓慢,但越来越好。市场正在稳步专业化,直接关系到广告收入,同时,面向各类读者的流行杂志正在稳步发力。这样看上去,好像不存在一个接受过民主教育的发展中的新闻界,反而像是存在一个越来越有组织的传播市场,这个市场将“大众”准则作为主导的社会原则,并且新闻界的形形色色的功能越来越局限于搜索“卖点”。(Williams 1961,234)

如果我们将这段话的主要观点和麦奎尔的摘要框对比,即可清晰地看到,威廉姆斯预示的多项主题和结论,将在其后50年被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探讨。这段被我们引用的概括,就像是这一领域的缩影。

### 三、马克思和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

传媒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源——至少他们的批判传统(这正是我所关注的)——通常落脚在马克思主义。毕竟,或者说,顾名思义,传媒研究中的

这个领域,是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究传播。那么在这个学术领域内,我们从马克思那里获取了多少养料?答案很简短:有一些,但非常有限。为证明这个观点,我将梳理一些通常被认为具有重要贡献的文献。<sup>①</sup>

第一个且令人相当惊讶的发现是,有相当数量的著作(如 Herman and Chomsky 1988; Schiller 1989; Curran 1991; McChesney 1997; Curran and Seaton 1997; Grossberg et al. 1998; Curran 2000, Nicols and McChesney, 2006)根本没有或者极少提及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极少提及的情况中,提及的作用通常是作为标签(例如将马克思主义者与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传统区分开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做更深入探究。

尽管如此,他们都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特殊部分。他们都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the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model)有直接联系。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物质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物质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上层建筑则指的是非物质领域(the non-material realm),如文化、宗教、观念、价值和规范等。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然而最终,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模式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著作中得以发展,或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arx 1977)的序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Marx and Engels 1974)。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Marx 1977)<sup>②</sup>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

---

① 为保持分析的纯粹,我将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开始阶段,忽略德国马克思主义传媒理论(布莱希特(Brecht),克拉考尔(Krakauer),本雅明(Benjamin),阿多诺(Adorno),恩岑斯伯格(Enzensberger)),其思路——也许是错误地——通常没被纳入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我甄选的文本肯定不那么广泛,也不具备任何方式的代表性,但这些文本对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的确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线索。

② 中文摘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人民出版社,2009年,591页。以下类似处只注简要信息。——译者注

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 and 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974, 64f.)<sup>①</sup>

上述文献直接或间接地将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应用于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部门不同,传媒产业有助于上层建筑的生产。然而,这些文献以不同的方式应用这个模式。同时,对于以线性的、辩证的和简化的视角将这个模式视为确定性模式,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达勒姆和凯尔纳观察到,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强调经济层面,聚焦于所有权、公司化和消费。与此同时,英国则聚焦于政治维度,强调公共广播(public sector broadcasting),强调国家资助且监管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强调广播的政治性(Durham and Kellner 2006, 197)。我想把这一观察再推进一步:美国的传媒政治经济学著作一般更符合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而英国的研究对物质和经济简化论则相对持谨慎态度。我还认为,这些不同的定位与两个国家的传媒景观有关,美国是自由市场传媒景观,英国则是仍然依靠强有力的公共广播的代表。宣传模式(Herman and Chomsky 1988)在美国发展并非巧合,同时也不奇怪,正是美国的关于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研究断定,批判新闻业是一种完全的系统性的失败。该研究认为,美国传媒带来了“民主的破坏”,“高度集中的利益驱动的传媒系统,顺理成章地摧毁了新闻业,同时使提供自由社会极度需要的内容这一理想变得荒谬。”(Nichols and McChesney 2005, ix)英国研究中找不到相似的观点,因其对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持强烈批判态度。例如,柯伦观察到,“这一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上是“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论式解释框架”。(Curran 1990, 157f)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人民出版社,2009年,550—551页。——译者注



到目前为止,我提到这些文献要么根本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或者仅仅做了极少的通常用来作为标签的引用。然而,这些文献都与马克思相关,尤其是以一种更加深刻的方式与其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相关。莫斯可(Mosco 1996)提供了或许是关于该领域文献的最为详尽的分析,他在其著作的开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默多克(Murdock 1982)特别关注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并将这一模式与更以实践为导向的观点相比较。威廉姆斯(Williams 1958, 265—284)详细叙述了这种模式,并且认为,这种模式比一般公认的更为复杂。(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基本的问题已经提出,就是经济因素是否真的具有决定性。我跟踪了这方面的争议,但在我看来,这终究是个无解的问题。”(Williams 1958, 280)和威廉姆斯一样,尼古拉斯·加汉姆(Garnham 1990)也反击了经济化约论的指责。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模式对理解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充分的基础。但他不认为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决定关系,他更倾向于立足于相互影响和辩证关系的模式。

我们的结论是: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最显著的是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后面我们会讨论到他——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理论的应用非常有限。这个学术领域主要(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马克思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用以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所有权的集中,传媒集团化)和传媒内容、意识形态、控制、权力、民主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不要误解,这并不是对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批评。我没有将有限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概念视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失败。我的观点正好相反:这种有限应用在大众传媒时代完全合情合理。它背后有一套自身的逻辑,关键在于传媒技术。在后面的章节我们还会详细讨论。应该注意到,在以大众传媒转变为分布式传媒为标志的过去十年,政治经济学家已经重新发现了马克思,这和我观点是一致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被以多种方式重新发现,这并不仅仅是在重复关于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讨论。<sup>①</sup>

---

<sup>①</sup> 或许第一次全面地将马克思的概念应用于分布式传媒是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ford 1999)。他分析了信息时代何以“非但没有超越资本及其劳动主体之间的历史矛盾,反而构成了两者遭遇后的最新战场。”(Nick Dyer-Witford 1999, 2)此后,其他明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互联网理论化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Wayne 2003; Huws and Leys 2003; Stallabrass 2003; Wark 2004; Terranova 2004; Artz, Macek and Cloud 2006; Jhally 2006; Fuchs 2008; Mosco, McKercher, and Huws 2010; Kleiner 2010; Fuchs 2011, Fuchs et al. 2012。

## 四、数字技术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有限地应用背后,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有人可能指出——再次引出对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马克思显然对物质基础更感兴趣,而忽视了对上层建筑的分析。马克思对媒体与传播也没有太多可说的。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数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家可以而且应该在更为宽泛得多的意义上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如果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传媒技术,或许可以更为接近答案。大众传媒时代,这些技术——即生产资料——非常昂贵。拥有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所必须的资产,大多数人负担不起。这就导致传播给数量庞大的消费者或受众的媒体内容,只是由少数传媒机构生产制作的。因此,大众传媒的特点就在于,少数内容生产者和庞大的受众。对那些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成问题的出发点。生产资料所有权、传媒集中化过程、传媒技术和传媒机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传媒大亨”手中,事实上,这些现象比大众传媒的其他现象更成为问题。在大众媒体时代有限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一种非常具体的历史现实,也产生于大众传媒技术所引发的历史性的空前关注。

数字技术带来了一个从根本上不同的传媒景观,大众传媒不再是城市中唯一的表演。大众传媒开始有了分布式传媒做伴,同时它们似乎逐渐地被这个新成员所代替。分布式传媒的运转有着非常不同的组织逻辑。大众传媒是分等级的,线性的,配备控制中心,媒体内容从少数生产者单向流动到大量受众。反之,分布式传媒是网络化的,非线性的,媒体内容从许多生产者向许多消费者多向度地相互流动。

分布式传媒和数字传媒这两个术语近似,但不完全一致。我使用分布式传媒这个术语,是用来强调媒体的社会组织(尽管这个词也指互联网技术),数字传媒这个术语则只与技术相关。然而,强调社会永远不能够完全离开技术非常重要。每一个介质都同时既是技术的又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技术结构和关系是内在交错及相互建构的。

数字技术的品质和性能深刻地塑造了分布式传媒的逻辑。与大众传媒技术(指的是印刷出版)相比,数字技术的优势在于更便宜和更有效。这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1)可以将文本、声音、图像和动态图像等老的传媒形式制作为数字代码,以重新中介化;(2)可以将信息、传播媒介(纸质信件、电话)、大众媒体(广播、电视、报纸)和传播予以一体化;(3)数字内容可以以最小成本无穷尽复制。(4)没有任何重量,能够以光速扩散。

我想提出,这些数字技术的现象学的品质大部分基于比特和原子的区别,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首先,传媒生产者的数量在数字时代急剧增加。当下,可以使用移动电话或笔记本电脑的每个人,可以访问网络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传媒内容生产者。其次,数字技术催生了新的传媒生产和发布的社会形态,例如大规模的传媒内容的“分享”<sup>①</sup>,大规模的合作形式和类似于开源代码这类大众产品。第三,随着传媒生产者数量的增加,传媒本身正变得无处不在,这表现在,从全球的、公共的到现实生活最私密的层面,全方位的社会领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变得媒介化了(Livingstone 2009)。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传媒技术,他们已经嵌入所有的生产性流程中(Castells 1996)。数字经济现在不再只是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经济,它简直是为经济画上句号。因而这一进程的结果是,数字不仅与传媒领域相关,也与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新生产形式相关,可能也与新的生产方式相关(这一点要看未来斗争是否成功),与“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相关(Benkler 2006)。为此,数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数字事物的政治经济学。正是由于传媒由少数专业人士向更多业余人士开放,从国家、市场向非市场开放,正是由于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才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使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加广泛。实际上在数字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所有方面都的确变得与批判的传媒理论相关。

快速评论一下技术决定论。在我看来,这种对数字事物及其影响的现象学分析,并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的范例。我不主张所有的解释力都在于技术,人只是对技术做出反应的旁观者。然而,我也不赞同反面的观点,这种观点把能动性的所有方面都定位于人。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同样危险。我与马克思的思想大体一致,我认为技术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技术不能以任何方式决定资本主义的未来,未来一定只由受压迫者的斗争塑造。

---

<sup>①</sup> 关于数字时代分享的批判性分析,可参见 Wittel 2011。

或许由于对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技术决定论的强烈反对,评论家们对大众传媒和分布式传媒之间深刻区别的认识有些迟钝。人们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和策略,结果证明,这个新事物(意为所谓的数字革命)的价值被高度高估了。第一种类型的回应是(例如 Murdock 2004)拒绝任何重新评价,认为数字时代和大众传媒时代没有重大区别,历史的连续性比那些区别更为重要。政治经济学家与其迷恋“数字可能性”,更应该研究“市场现实性”。信息社会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它并不真正存在(Murdock and Golding 2001)。第二种类型的回应则更为谨慎,这是一种骑墙观望的方法(sitting-on-the fence approach)(例如,Curran and Seaton 2003,235—293)。对于数字技术的改变,这种回应在态度和观点上都踟蹰不前。第三种类型的回应(例如 Mosco 2004)包含着对这种话语的解构,特别是对互联网爱好者(Internetphiliacs)观点的解构。

确实,忽视连续性是幼稚的。然而,认为一切照旧的观点同样危险。我举例解释一下。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很大程度上主导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话语,这个问题在分布式传媒时代也将不会失去任何相关性。正相反,当新的关注点显露出来,它也将会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然而,这个问题需要以两种重要的方式被重新概念化。首先,大众传媒时代,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仅仅与传媒内容有关。分布式传媒时代,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既与传媒内容有关,也与连通性(connectivity)有关。这不再只是关乎意识形态和信息控制(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也关乎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以及让用户进行社交、沟通和合作的网络和平台的所有权。这不只是关于意义和再现,也关于对人们在线互动的控制,最终关于给予某些社会性和主观性形式以特权。重新概念化的第二个理由,在于“生产资料”的观念。分布式传媒时代,生产资料已经变得更为民主。用户(已经超过 10 亿)能够使用电脑和访问互联网,并掌握一些基本的电脑技能,就具备了生产传媒内容的必要手段。然而,他们并不具备的是分布的方法和在线存储传媒内容的方法。分布和存储的方法由少数传媒集团掌握。他们控制了信息的流动。他们属于沃克所描述的那种高科技阶级(vectoral class)。“高科技阶级将世界推到灾难的边缘,然而为了克服自身的毁灭趋势,他们开放了资源的世界。”(Wark 2004, 025)对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斗争分析,提出了互联网的未來架构的主题,这种分析也是迪尔-维斯福特的主要目标(Dyer-Witheford 1999)。对这一段的总结: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具有历史连续性,但也有一些

显著变化。

德米特里·克莱纳(Dmytri Kleiner)的著作一开篇就令人震惊：“在信息时代中,可能的事情和允许的事情之间存在直接冲突……互联网这样的大众网络使非等级的关系成为可能,但是这种非等级关系与资本主义关于圈地和控制的需求是矛盾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和资本主义,其中一个必须滚蛋。”(Kleiner 2010,7)

这当然是一个略有夸张的观点。不仅只发生了战争,我们也能看到二者之间也在发展新的合作形式、新的模式与布局。尽管如此,我非常喜欢这段话,因为它尖锐而浓缩地概括了政治经济学在数字传媒与分布式网络时代的责任所在。开辟新的生产力的技术既已存在,但带有根深蒂固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依然存在。

想要维护现存生产关系的人,和试图改变这一关系的人之间,存在一场斗争。同时,还存在一个关于如何创造更好的世界的暗示。互联网以其更加不受控制的形式,能够教导我们如何思考整个社会吗?

我们已经走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央。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想探讨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何与数字时代的传媒分析相关。我将重点关注四个中心词,劳动、价值、所有制和斗争,其中劳动的概念会探讨地更为详细。

## 五、劳 动

在西半球,将劳动仅作为雇佣劳动来分析贯穿了整个20世纪。除了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如安德烈·高兹(Gorz 1999),替代雇佣劳动的其他选项几乎没有进入公共话语。一个普遍的感受是,不存在对雇佣劳动的替代选项。显然,这种理论取向是一种对经济现实的反映,而这种经济现实的主要特点就是雇佣劳动为主要生产形式。大众传媒时代的传媒生产也是这样组织的,不管传媒机构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企业,都有雇佣员工,发放工资作为报酬。

当代传媒生态系统已大相径庭。现在的传媒内容不仅来自公司雇员的生产,也来自自由劳动。自由劳动者从事大众生产(散布内容)和“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由约凯·本科勒(Benkler 2002)创造,用来描述一种社会经济生产新模式

式,即大规模群体为了共同目标而一起从事毫无经济报酬的工作。现在传媒内容不仅仅为市场和付费的受众而生产,同时还存在一个相当有价值的非市场向度的传媒生产。这是个新局面。实际上,传媒和创意产业在当下成为唯一面临着自由劳动和非市场生产(non-market production)竞争的产业部门。

伴随着开放源代码运动,非市场生产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而在过去十年,伴随着社会网络的发展,非市场生产以惊人的规模加速发展,并从软件和代码的大众生产延伸至文本、声音、图像和动态图像的大众生产。这些数字公地包括软件公地、新闻公地、信息公地、知识公地、教育公地、艺术公地和文化公地。

无可否认,数字旋风已经对创意产业造成严重破坏。报纸新闻业正在下滑,并努力寻找新的商业模式。在美国,一批题目冠以新闻业衰败的文章,表明了这种衰败发展的严重性,如“最后的记者请关灯”(McChesney and Pickard 2011)。音乐、电影和出版行业也受到沉重打击,正在越来越多地对侵犯版权诉诸法律,并为收紧互联网管制进行政治游说(例如,ACTA<sup>①</sup>、SOPA<sup>②</sup>、PIPA<sup>③</sup>)。

然而,这种新的传媒生态系统的许多影响还毫不明朗。企业劳动和自由劳动在数字公地中的并立现象,只存在于传媒产业和创意产业,还是也会蔓延到其他产业部门?传媒和创意产业与数字公地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处于“无形内战”(immaterial civil war)之中吗(Pasquinelli 2007)?或者说,由于双方有许多合作(例如企业为开源软件生产提供资金),所以这样一种视角是不是太单维化?这对传媒产业的劳动力市场有什么长期影响?传媒和文化生产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合理化,很有可能会导致市场萎缩。但如果的确是如此,市场会有多大程度的萎缩呢?最后,这对于传媒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什么?资本要从自由劳动的剥削中获取利润吗?或者,这个新事物带来的竞争会导致传媒产业生产率的下降吗?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的传媒生态,我们需要关注自由劳动概念。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术语近来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用,但马克思自己并没有

---

① ACTA: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反仿冒贸易协定。——译者注

② SOPA: Stop Online Piracy Act, 禁止网络盗版法案。——译者注

③ PIPA: Preventing Real Online Threats to Economic Creativity and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 of 2011, 保护知识产权法案。——译者注

使用它。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他部分地接受了18和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部分地发展了对这一传统的批判。这些术语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取决于阶级定位,同时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形态(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等等)和特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性劳动是为资本而生产的劳动,它生产商品、交换价值和利润(剩余价值)。非生产性劳动不生产剩余价值。举个例子,私人家庭雇佣的从事烹饪和清洁工作的人,就不生产商品。虽然他/她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但这种劳动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本身却不是商品。所以这就是非生产性劳动。然而,作为雇工的厨师在饭店中工作就会生产商品,因为他/她生产餐点卖给消费者。所以这就是生产性劳动。因此,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并不在于人们干什么活儿(在两个例子中都是烹饪),而在于他们与资本和商品形态的关系。如果将数字平民的自由劳动套用到这个概念上,很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劳动是非生产性的。20世纪80年代,这个概念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很多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人声称,通常由女性来承担的家务劳动事实上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因为这种安排可能会减少那些不从事家务劳动的人们的工资。我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观点,甚至于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过程(labour-process)的区分,同样与自由劳动概念相关。我们先从劳动谈起。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Capital Vol. 1,177)<sup>①</sup>

劳动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人类活动。它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普遍范畴,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经济或社会形态。劳动让我们延续生存与发展。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劳动可以等同于活动与实践。劳动就是我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年,207—208页。——译者注

们的所作所为。

与劳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是指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特定的历史的社会和经济。他使用这种历史方法想要证明,在劳动过程中,具体的工作组织并非是必然的。现存的劳动过程总是可以克服的。马克思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之间的差异特别感兴趣。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在工人将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事实上。对比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与封建社会的劳动过程,马克思强调以下两点:

首先,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Capital Vol. 1,184f.)<sup>①</sup>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确定,异化的两种形式在封建制度中并不存在,在资本主义之前的任何生产方式中也都不存在。第一种形式的异化,是指工人虽然生产产品,自己却没有能力用于自己的生计。第二种形式的异化,是指生产过程掌控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手中,工人没有能力组织工作过程。在马克思所做的劳动和劳动过程的区别中,让我们再次应用一下自由劳动概念。自由劳动在马克思一般意义的概念中常常指的是劳动。然而这个术语并不是指具体的历史的劳动过程。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如果自由劳动能够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如果自由劳动能够取代雇佣劳动,就像雇佣劳动取代封建制度的农奴和封建制度之前的奴隶那样,自由劳动的概念才有意义。我们将更为细致地再次探讨这个问题。

对自由劳动的讨论,最初主要由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年,216—217页。——译者注



Marxists)发起,其与意大利工人主义学派(the Italian operaismo school)关系紧密。它与毛里奇奥·拉扎拉托、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著作相关,而这些著作产生的背景则是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向以及相关进程,比如工作组织(劳动过程的组织)的变革、工作环境中主观性和社会联系的生产,以及认为资本最终将控制生命的生物政治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既是智力劳动又是情感劳动,涉及到许多活动,不再被看作是福特主义工作环境中的工作。

不仅仅只是智力劳动已经渐渐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范。现在的情况是,一种新的“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已经形成,它从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的需求和与工作作斗争所产生的“自我实现”(self-valorization)的形式两者所形成的联合中生发出来。(Lazzarato 1998)

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是受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几页纸的启发提出来的,在该著中,马克思(Marx 1973)提到,财富创造和价值生产越来越独立于劳动。

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数量……而是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体现不再那么鲜明了;人更像成为生产过程自身的守门人和管理者。他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生产过程的首领。在这一转变中,既不是人自己实施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他的工作时间,而是对他自己一般生产力的占用,以及他凭借着作为社会主体的身份而获得的对自然的认识和精通——一言以蔽之,正是社会个体的发展,才是财富生产的巨大的奠基石。(Marx 1973)

正像高兹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语言不太稳定,在许多术语间摇摆。将要取代劳动的事物是不固定的,有“一般智力”,“科学和技术的一般水平”,“一般社会知识”,“社会个体”,和“领导的一般权力”(Gorz 2010, 2)。然而,马克思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很清楚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知识、技术和一般智力首先变得与劳动无关,其次将取代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来源。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几页书稿对于非物质劳动概

念如此重要。然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这些言论和《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马克思并不协调,在后者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并明确认为,劳动是创造交换价值的唯一来源。

提吉安娜·特拉诺瓦(Terranova 2004)也许是充分使用自由劳动概念的第一位理论家。在一篇文章中(此文初版于2000年,当时社交网络尚未面世,维基百科和社交媒体平台也尚未出现),她将自由劳动概念化:“许多活动使互联网成为一个蓬勃且极度活跃的媒介。”(Terranova 2004,73)这些活动包括“建设网站、完善软件包、阅读和应用邮件组,以及创建虚拟空间”(Terranova 2004,74)。与关于非物质劳动的工人主义话语一致,她也将自由劳动的出现置于后福特主义中。“自由劳动是这样一个时刻,文化的知识性消费被转换为过度的生产活动,这些生产活动被愉快地接受,同时也常常被可耻地剥削”(Terranova 2004,78)。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得出了自由劳动的三种特征,这三种特征也得到了参与本次讨论的多数评论者的认同。首先,自由劳动是免费劳动,与免费啤酒是同一个意思,是义务的付出。其次,与自主同义。与雇佣劳动相比,自由劳动享有更大的自主性,而异化程度较弱。自由劳动没有工厂,只有一个游乐场,因此,自由劳动可以被享受。第三,自由劳动是被资本剥削的。

然而,这种自主与剥削的辩证法,体现在大多数对自由劳动的描述中,只是对这种张力存在着不同的解读。特拉诺瓦非常小心地避免强烈的判断,而只是提“复杂劳动关系”(Terranova 2004,73)。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已经在关于真人秀(Andrejevic 2008)、YouTube(Andrejevic 2009)和 Facebook(Andrejevic 2011)等许多研究中探究过自由劳动的概念。他的这些研究对象都是商品化的空间,每一个案例的核心论点都是对传媒研究中的某些论述的批评,这些论述大赞用户参与和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是民主化进程并向用户赋权的标志。与此相反,他认为,投入到商品化空间中的这些自由劳动正在受资本剥削。在他的研究中,自由的、赋权的以及解放的潜能,显然被货币化社会的消极层面夺去光彩。马迪奥·帕斯昆内里(Pasquinelli 2008)又推进了一步,他批判了自由劳动和公地(the commons)。很明显,公地并没有被资本俘虏或者圈占,否则,他将不再是一个公地。各种各样的数字公地都不是商品化空间。但帕斯昆内里并不认为数字公地有任何积极性,因为它们都被资本剥削利用,都是劣质和黑暗的空间。这是一种极度不对称的关系(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他

借用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概念化的寄生虫形象和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的有关“过度”(excess)的观点,提出了“公地寓言”(bestiary of the commons),意为,资本行为就像吸血鬼,吸干了自由劳动者所有剩余精力的鲜血,对此自由劳动者们并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太过幼稚。

我前面提到过的达拉斯·斯迈思,是加拿大传媒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极少数不仅研究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也研究马克思理论其他方面的理论家之一。事实上,他使用了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斯迈思认为,传媒受众是一种商品,由传媒生产商一手打造的商品。看电视的行为将观众和广告商连接起来,这样,传媒观众就贡献了他们的劳动。尽管斯迈思没有使用自由劳动这个术语,他仍然可以被视为自由劳动观点的奠基人。就像安德烈耶维奇一样,斯迈思在商品化背景中研究传媒受众。对斯迈思而言,这是一出由三个演员参演的悲剧:传媒生产商和广告商是坏人,受众是受害者。传媒生产商生产了受众,也把时间卖给广告商,因而也将受众卖给了广告商。他提出,受众付出劳动的原因如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空余时间无不是工作时间。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自由和闲暇的假象”(Smythe 1977,47)。他阐述了这种观点如何与马克思劳动力理论相联系(劳动力有关工作的能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私人财产。似乎人们可以自由支配它。如果人们在某个岗位上工作,你就出卖了你的劳动力。离开了这个岗位,似乎你就不能出卖你的工作。但是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在工作岗位上,人们所出卖的劳动时间并没有获得全部的报酬(否则的话,利息、利润、管理层的薪水就没法支付了)。离开工作岗位,(通过受众商品化)人们的劳动时间依然被售卖,尽管不是主动售卖的。获得报酬的工作岗位上生产的是商品,离开工作岗位所生产的是人们为了明天和后代的劳动力:即工作和生存的能力。(Smythe 1977, 48)

这当然是一个创新的论点。这种研究传媒受众的不同寻常的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为斯迈思赢得很多信誉。然而,有两个问题令他的观点存在相当大的疑问。首先,他将人类生活中的所有时间都通通计算为资本主义制度工作的时间,只不过有时候获得报酬(上班时),有时候没有报酬(下班

后)。这意味着所有的再生产时间(一天 24 小时)都花在了工作上。这个观点比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ur)的观点更重大。对斯迈思来说,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单一的行为都变成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作。这是最大限度的异化,而且没有出路。第二个问题在于,这个观点建立在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曲解之上。马克思的区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区分了用于生产的劳动和劳动力(工作能力),且这里仅指雇佣劳动。用劳动力概念来分析再生产活动(reproductive activities)没有太大的意义。劳动力概念只在可被工人售卖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这正好是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等)其他经济制度的区别。斯迈思努力回避这个问题,他宣称,“离开工作岗位后,你的工作时间被卖掉了……尽管你没有主动卖它”。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演绎”,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劳动力理论基本原理。

最近,大卫·赫斯蒙德霍(David Hesmondhalgh)对自由劳动概念提出批判。他指出两个问题。首先,他批判地质问“将这个术语与剥削概念频繁地捆绑在一起”,既不足以令人信服,且前后矛盾(Hesmondhalgh 2010, 276)。有时剥削与异化相关,有时与意识形态和控制相关,另外一些情况下,与自由劳动被资本的俘获和利用相关。然而,这些情况没有任何一种真正涉及剥削本身。我完全支持这种批评,此外我会添加一个观点: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对自由劳动的剥削是不可能成立的。剥削是指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这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基础。就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而言,在雇佣关系之外可以创造剩余价值这一观点是无稽之谈。

其次,赫斯蒙德霍质问,对自由劳动的批判能够产生怎样的政治诉求。他指出,无偿劳动一直存在,例如家务劳动和社区义务劳动(如教足球),他强调优先秩序的重要性。他质问,在什么条件以及什么背景下,我们可能反对这种无偿劳动?哪种形式的劳动是特别不公平的?他也提出,历史上大多数文化生产都是无偿的。最后,他指出这一事实:那些无偿数字劳动的承担者们,可能获得了其他的回报,例如工作成就感和来自同侪的认可。

对自由劳动的出现以某种方式与后福特主义相连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无偿劳动的存在贯穿了资本主义历史,这着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无偿劳动在维持生计的工作(或者家务劳动)中存在,以非货币化行为的形式存在,例如,社区义务工作和邻居之间相互做临时保姆。然而,赫斯蒙德霍是

将社区志愿足球教练的无偿劳动和(利益驱动型)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劳动混为一谈。前一种无偿劳动是非商业性的,处于非营利性环境中。后一种劳动处于商业环境中,将虚拟的或非物质的空间售卖给广告商。这一区别非常重要。有趣的是,这一区别在关于自由劳动的探讨中一直相当朦胧。让我们回到我前面提到的三位作者。对于特拉诺瓦而言,自由劳动是指“建设网站,修改软件包,阅读和参加邮件组以及打造虚拟空间”;她没有在商业与非商业,资本和公地之间做出区别(Terranova 2004,74)。安德烈耶维奇仅仅写到了与广告空间和利润生产有关的自由劳动。帕斯昆内里仅仅提到了与公地、非营利性的数字网站等相关的自由劳动和对自由劳动的剥削。

这是相当混乱的,和斯迈思的矛盾立场一样混乱。一方面,他声称是每天24小时都发生着剥削,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存在不被资本剥削的时间。另一方面,他又仅指那些工作之余的时间和空间,即广告时间和空间。所有这些不仅仅是混乱,关于剥削、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探讨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简言之,关于价值问题的探讨都高度令人不满。显然,价值既可以源自有偿劳动,也可以源自无偿劳动。然而,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一点也不清楚,甚至于马克思也给出了不同的信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剩余价值只能源自雇佣劳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又提出,技术劳动和一般脑力劳动也能够被资本剥削。我发现,关于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也难以形成一个明确立场。在接下来的关于价值的小节中,我将论证,有价值的事物和一些事物有价值的原因,往往是一种主观范畴。因此,那些客体化的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究竟来自何处是不可能作出明确判断的。

赫斯蒙德霍还提及了可能在雇佣劳动与自由劳动并存的时代出现的政治诉求问题。这再一次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我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作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他的一般劳动(意味着:有别于历史上具体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区分。马克思将一般意义的劳动看作是“人与自然共同参与的过程”,看作是同时改变了环境和人本身的事物,看作是不仅具有经济属性同时具有人类属性的活动。劳动在这些意义上,可以宽泛地等同于实践和活动。这似乎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劳动定义。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一般定义,和拉扎拉托、哈特(Hardt)、奈格里(Negri)以及其他与工人主义学派(operaiismo school)相关

的学者们的观点非常一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将实践这个术语换成生活。在生命政治资本主义里,工作就是生活,工作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关系和我们的主体性。将工作与休闲、传播、创造、游戏等方面区别开来的做法越来越徒劳无益。

从政治上看这意味着什么?在数字时代,自由劳动和雇佣劳动共存。这要么可能被视为一种可以广泛接受的状况,要么,可能像我的看法一样,意识到其绝对有失公平,最终令人难以忍受。这里开辟了两条批判的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对于自由劳动和政治诉求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就像是赫斯蒙德霍指出的那样,可能会招致将自由劳动整合进雇佣劳动体制的呼声。然而,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因为它会引向一个甚至更加商品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每一个个体的人类活动都用交换价值来测量。将雇佣劳动体制及其疯狂的价值测量发展得更加壮大不该成为一种政治议题。第二条批判路径将转向对立的方向,将变为对雇佣劳动经济本身的批判。最近,对雇佣劳动替代品的势头有所增强。给每一个公民发放最低工资要求,可能成为正在探讨中的最突出的替代雇佣劳动的模式。在对“超越雇佣社会”的工作(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的概述方面,安德烈·高兹的著作或许做出了最成熟的贡献。(Gorz 1999)这当然是一种激进的方法,甚至是乌托邦式的,实现的希望不大。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个时代可能需要更多关于我们如何工作、联系、创造和生活的激进的反思。

毫无疑问,自由劳动概念对于阐明社交网络领域的新发展已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数字资本主义中,雇佣关系之外的人类活动繁荣兴旺,反思这些人类活动中的劳动就成为重要挑战之一。然而,“自由劳动”中的劳动的概念,严重缺乏分析的严谨性,它将许多相当不同的实践活动混为一谈。下载一首歌曲和在社交网络平台中与朋友聊天是可以比较的吗?这两种活动又可以和阅读邮件组的邮件或生产维基百科条目相提并论吗?所有这些活动贴上了自由劳动标签,但是他们肯定是不同的事物。在私营频道看电视连续剧,和在不播放广告的公共频道看电视连续剧是一样的吗?商业网站(如 Twitter、Google+、Facebook)的自由劳动和开源网站(如 Diaspora)的用户之间存在区别吗?为什么我们谈论自由劳动时,涉及到邮件组的邮件,却没有涉及我们邮寄给朋友的那些装在信封里的、贴着邮票的实体信件呢?我们在电话中的交流行为,是提供给电信公司的自由劳动吗?要知道电信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如 Facebook 和 Twitter)之间唯一的区别,只是在于商

业模式略有不同。电信公司没有使用广告商,因此他们需要向用户收取服务费用。反之,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商从广告获得收入,因此能够提供免费服务。

或许更成问题的是,有些活动实际上并非真的首要基于自由劳动,却使用了自由劳动概念。常有这样一种假设:自由劳动是没有经济报酬的劳动。然而事实却更加复杂。数字公地是通过与经济报酬相关的多样劳动形式创造而成的。让我们看一看开源代码产品。企业对开源项目的资助处于增长趋势。此外,开源软件的开发者,当其在闲暇时间生产代码的时候,通常还不是公司老板,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开源程序设计员中的绝大多数是被雇佣的程序员,他们为软件公司工作。通常任何形式生产的开源代码都会向开源社区开放(Weber 2004)。所以,这种从事开源软件开发的劳动通常不是直接获得报酬。针对知识公地的生产,也可以提出一个相似的论点。一个维基条目,例如“现代性”,可能是由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如一个哲学家)撰写的,也可能是由受雇于某个大学的人撰写的。

这就是为什么数字公地中的一些领域以令人兴奋的速度发展,反之,其他大部分领域的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开源公地和知识公地是数字公地中的先锋,一个很好的原因在于,这些公地的建设者们,常常确实是有收入的。其他领域,例如教育公地<sup>①</sup>和艺术公地,与开源公地和知识公地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公地发展严重滞后,因为在这里的劳动投入并没有得到其他各方的报酬。这些公地的发展的确仅仅只依赖无偿劳动,他们靠的是那些做出贡献和投入其中却没有任何经济报酬的人们的激情、爱和狂热。

附言:对自由劳动的批判是重要的,对自由劳动批判的批判同样重要。不过,我们也不必对此钻牛角尖。如果劳动就是生活,劳动就是实践,那么,要发展一个比劳动概念本身更为清晰的自由劳动的概念就很难了。这将会被证明是一个虚无的事业,成为一个终将失败的计划。讨论自由劳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不仅是概念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是二者的结合。只

---

<sup>①</sup> 我已在别处(Wittel 2012)写到过当前创立独立自主的大学和独立自主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各种尝试,这些尝试源自并回应了新自由主义对公立大学的摧毁。为了这次分析的需要,我对知识公地(比如维基百科网站)和教育公地作了概念化的区分。这种区分很多程度上与劳动和自由劳动有关。知识公地随着知识的累积而成长。它的成长是自然而然的,只是需要上传到网络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育公地需要付出没有经济支持的额外的劳动(真实的义务劳动)。

有当雇佣劳动和自由劳动再次成为单纯的劳动本身时,这一社会问题才不复存在,而这只能看阶级斗争的结果如何了。

## 六、价 值

为了理解劳动的全部复杂性,我们不得不转向讨论价值。和劳动一样,价值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研究领域。它是一个存在多种含义和观点的术语,一个引发大量讨论,易于分散注意并忽视最紧要之处的术语。那么,第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是,讨论价值这个概念对于传媒政治经济学来说有什么价值呢?第二个问题关乎马克思,关乎他的价值概念对于更好地理解我们当代传媒和传播生态系统的价值。

经济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Graeber 2001)划分了三种关于价值的思想脉络。第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中的价值,其概念包括从根本上而言,什么是人类生活中美好的、正当的或者理想的(good, proper, or desirable)。第二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指物品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及预期如何用定量方法测量。第三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价值,这要追溯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价值被视为有意义的差别。这是一个将语言(或者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关联的概念,一些事物的价值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对照或比较中才会建立起来。

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的概念和劳动概念获得的关注同样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由于劳动和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那些对于劳动感兴趣的文献对价值也同样感兴趣。<sup>①</sup>人们只能推测,为什么对价值的探究被大大忽视了。我自己对这一忽视的解释是非常简单的:一般认为,或者说,看待此问题的出发点是,大众传媒被认为与公共物品享有同样的价值,被理解为是保卫民主的一股独立力量。然而,考虑到大众传媒机构的日益私有化及其所有者的经济收益不断增长,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物品的价值不断受到威胁。如此一来,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关

---

<sup>①</sup> 纳入了劳动和价值概念的文献,常常与广告有关,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正是广告启发斯迈思(Smythe 1977)提出了受众商品概念。最突出的一点是,斯迈思(Smythe 1977)声称,电视受众为广告商和传媒生产者提供了免费劳动,这个观点触发了所谓的“盲点”的争论(Murdock 1978; Smythe 1978; Livant 1979)中有关价值的争论。价值对于苏塔·杰哈利(Jhally 1990)的著作也至关重要,因为他关于广告业、传媒受众的劳动的论点与斯迈思非常相似。



注大众传媒的潜在价值,而是只关注其对立面,关注经济利益和政治管制给民主社会带来的威胁。这一视角具有完美的意义。毕竟,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立足于批判理论的传统。这样,赞美传媒集团和传媒大亨们对公共领域的大放光彩做出了贡献的确会显得古怪。

如果我们将格雷伯关于价值的类型学应用于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我们得到的结果非常近似于方才做出的观点,但也有一些细微差别。可以肯定地说,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从未关注过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因为从未出现过用定量方法测量传媒产品或传媒机构的价值的尝试。可以同样肯定地说,社会学维度的价值还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探究。这原本意味着一场与媒体与传播的社会理想价值的争斗。原本应该有一场关于媒体和传播乌托邦的层面的争论:媒体应当怎样组织,应该怎样运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然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对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上的价值,对于传媒生产和传媒组织的类似形态之间有意义的区别,特别是对于公共和私营传媒组织之间的区别,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还是有几分发言权的。在没有明确提及价值概念本身的情况下,英国传统的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确实对比了公共传媒机构和商业传媒机构,而比较的结果是,给予BBC等国有传媒机构以积极的评价。

这些思想脉络对于分布式传媒时代还有意义吗?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正在成为热烈讨论的问题。确实,对传媒政治经济学家而言,用可计算的和量化的单位来测量价值,往往首先会成为相当可疑的目标。随着非物质劳动重要性的上升,这将不仅仅是可疑的目标——更成为疯狂而徒劳无功的项目。因为日益明显的是,智力和情感事物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然而,从价值经典理论主导的时代开始,关于从经济秩序角度发展的价值理论的可能性,以及将价值视为具体劳动的一种量度的可能性,都发生了不可逆转地改变。”(Negri 1999, 77f)内格里于是反过来提出,可将来自上层的价值理论,转变为“来自底层,来自生活的基础”的价值理论(Negri 1999, 78)。内格里吸收了斯宾诺莎(Spinoza)的观点,将价值视为能够促使行动的权力。这样,我们可以为格雷伯关于价值的类型划分添加第四种思考方式:价值是推动人们行动的事物。

我认为,在分布式传媒的时代,对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的讨论将如雨后春笋。这些讨论关于数字公地,关于自由劳动和自由文化,关于开放、贡献和分享,关于注意力,关于稀缺性和丰富性,关于礼物经济(gift economy),关

于所有制和接近权,关于合作与协作而非竞争,关于匿名言论和匿名行动,关于监管、隐私和透明度,关于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的价值,关于互联网和民主,关于人和技术,关于传媒和政治行动,关于资本主义和退出战略(exit strategies)。这些都在试图判断,什么才是美好的和理想的事物。

我相信我的论断可以包括这些观点: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保卫民主的价值受到威胁。在分布式传媒时代,这一价值仍然受到威胁。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终点。现在,除了权力、意识形态和控制(这些问题当然高度相关)的问题,又补充了关于代理、赋权、权势和可能性等新的问题。在大众传媒时代,关于生活最重要事物的探究和传媒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太多讨论。在分布式传媒时代,这些讨论则如火如荼。

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可以对这些讨论有所贡献吗?让我们迅速回顾一下:在(《资本论》第一卷概括的)劳动价值理论中,马克思驳斥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应当由市场决定,由用货币交换商品的人来决定。然而,价值是商品内在固有的,还是由顾客购买商品的欲望决定的,自由主义观点的立场在这二者间摇摆不定。马克思指出,价值由投入到商品的生产中的劳动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数量)产生。货币和商品的交换掩盖的事实是:正是商品的生产赋予了商品价值。马克思认为,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商品中的具体化。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他的剩余价值概念。剩余价值则是指劳动力的成本(工资)和商品中凝结的劳动价值之间的差额。剩余价值或者利润就是工人的创造和工人获得的回报之间的差额。这样,如果价值是通过劳动创造,那么剩余价值则通过剥削劳动而产生。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理论也一直饱受争议。对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而言,劳动价值理论“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理论中最薄弱的环节”(Žižek 2011, 205)。受到莫伊舍·波斯通(Moishe Postone)观点的启示,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是一种超越历史的理论,而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当代的传媒生态系统,一部分属于资本家,一部分属于公营,一部分属于数字公地,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何以有现实意义呢?在时而被称为“礼物经济”(Barbrook 1999)有时称为“捐赠经济”(Siefkes 2007)的环境中应用马克思的理论有意义吗?如果有意义,那么何以可能呢?让我们思考礼物经济这个案例。在礼物经济中,以把物品作为礼物交换的人们之间的人

际关系为代价,将具体物品的价值来源定位于这些物品的生产中是否真的有效呢?这种方法没有太大意义。对这种仅仅专用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价值理论来说,有必要拓宽其界限。而找到灵感,最明显之处就在关于价值的人类学文献。

格雷伯发表过对关于价值的人类学文献的杰出评论。他一直在寻找能克服将礼物和商品二分的概念,在关于价值的莫斯(Maussean)路径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之间搭建桥梁。他尤其对南希·芒恩(Nancy Munn)的价值概念印象深刻,南希·芒恩在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完成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对芒恩而言,价值是在行动中显现的。它是一个人的行动能力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过程。价值最终与创造社会关系的权力有关。

人们现在可以将对物的渴望和人类关系的重要性视为同一事物的折射,而不是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商品必须被生产(没错,他们不得不流通、交换、消费……),社会关系必须被创造和维持;所有这些都需人投入时间、精力、智力、关心……这种架构事物的方式当然令人想起马克思的幽灵……沿着劳动价值理论这条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处理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更宽泛地定义“劳动”就更好了。(Graeber 2001,45)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这种劳动的概念和马克思作为实践的劳动的一般定义几乎完全相同。同时,它也与内格里和斯宾诺莎将劳动描述为促使行动的权力的概念几乎相同。

所有这些理论可能都很难提出一个依据,来解释为什么传媒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处理价值理论问题。实际上,这并不是我想提出的观点。然而我实际思考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这个术语的宽泛意义上理解劳动)会开辟一条实证研究的新途径。如果将价值视为促使行动的权力,以及将价值视为创造社会关系的权力是站得住脚的话,如果价值关乎的是人们如何为他们的行为赋予意义,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分布式传媒政治经济学将作为一个绝佳的立场,用以重新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建立奈格里(Negri 1999)所声称的那种源自底层的政治经济学。这将是对价值的研究,研究重点不在于结构,而在于主体性和他们创造、连接、沟通、分享、共事以及赋予所有这些事情意义的渴望。

## 七、产 权

在大众传媒时代,产权总是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存在重要关联。但是,传媒内容中对所有制问题引发的关注却相当有限。罗兰德·贝蒂格(Bettig 1996)也许是过度谨慎地表明,尤其是知识产权和版权领域“相对来说较少得到研究”。他是为数不多的研究传媒内容所有制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有趣的是,这是一项数字转向刚刚起步时的研究。

贝蒂格非常关注知识产权规范性原则和现存体系之间的差异。知识产权核心的规范正当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知识和艺术性工作的创造者需要创新的激励。版权意在给予创作者开发自己作品的专属权,这些权利反过来能为作者提供收入,激励作者创作新作品。然而,实际的版权系统没有按照这个理想来操作。大多数艺术和知识性工作都依赖于生产、再生产和发行的过程,而这些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昂贵的技术。在贝蒂格看来,“版权所有权越来越取决于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拥有机器和资本进行生产和发行”(Bettig 1996,8)作品。

正是由于资本家阶级拥有传播资料,就能榨取传媒信息的实际作者的艺术和智力劳动。为了能够获得“出版”,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实际创作者必须将他们作品的所有权转让给拥有发行手段的人。(Bettig 1996,35)

这是对大众传媒时代非常正确的分析,没有留下太多希望的空间。不仅如此,他还令人称奇地预见到:“智力和艺术公地的圈地并非不可避免的,并非必然如此,虽然对资本逻辑的强调令其看上去好像非这样不可。”(Bettig 1996,5)贝蒂格一定已经感觉到了他们正在改变的时代。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的著作出版之时,共享文化(sharing cultures)和数字公地很大程度仍局限于开源运动。当时还没有Napster这样的文件共享软件,还没有创意公地(Creative Commons)这样的版权法律实验,也没有社交网络。大众传媒时代,资本的扩张逻辑没有给智力和艺术公地留下太多空间。传媒内容的绝大部分不是公共资产,而是被资本夺取了。在这个层面上,贝蒂格的观点有一些预言性质。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智力和艺术公地的圈占根本不是

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这是一场克莱纳指出的“你死我活的战斗”(battle to the death),战场的一边是艺术和智力劳动,以及那些想要营救数字公地的人,另一边则是资本以及那些意在圈地的人们。

贝蒂格提出了一个有诸多实证数据支持的令人信服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版权管理——在理想的规范意义上是合法的——没有真正支持智力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却支持了那些控制传播流的人。随着数字化转向,这一相当成问题的版权管理变得更加糟糕。当所有数字物品都可以被无穷尽地复制,并以最小的附加成本进行分发传播时,它们就被当作非排他性的共享物品(non-rival goods)。实际上,大多数知识产权是非排他性的,意味着他们被一个人使用时并不妨碍其他人使用同一物品。然而,数字物品不仅仅是非排他性的,而且天生就储量丰富。如此一来,从有意制造稀缺假象的意义来看,通过数字权利来拯救版权的所有努力都是荒谬的。他们将储量丰富的物品转变成合法的稀缺商品。讽刺地是,在数字时代,只有有意制造稀缺假象才能满足资本家的积累。正是由于数字事物不仅是非排他性的,而且储量丰富,知识产权问题才从一个次要问题走上中心舞台。

用短短几行来总结对自由文化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想发表几句评论,只是为了将几个关键立场与马克思联系起来。首先要指出的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如约凯·本克勒(Benkler 2006)和劳伦斯·莱斯格(Lessig 2004)之间,有一条相对明了的分界线。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知识产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是拥护自由文化的。他们只是提出了完善版权法的建议。他们将数字公地视为一种进步发展并为此鼓掌欢呼,但并不过分关注参与了数字公地建设的自由劳动。本克勒(Benkler 2006, 3)认为,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common-based peer production),加强了个体自由度和自主权。正是在此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他们认为自由劳动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批判政治经济学家阵营中,关于数字传媒的争论并没那么清晰。同时存在两种立场:一边是对自由文化的热烈辩护(例如, Cory Doctorow 2008 或者 Kevin Carson 2011),一边是对自由劳动和资本对自由劳动剥削的热烈关注(Pasquinelli 2008; Kleiner 2010)。我们发现,大部分描述中普遍承认这种困境,而这种困境很难被打破,许多评论家还在持观望态度。自由文化困境的一个出路,就是引起寻找新的模式来保证艺术和智力工作者有一定的收入(例如,彼得·桑德[Peter Sunde]的“支付平台”[Flattr]或者德米特里·克

莱纳[Dmytri Kleiner]的“版权极左”[copyfarleft]和“冒险共产主义”[venture communism]的建议)。

然而,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情况(特别是 Wark 2004 和 Kleiner 2010),这些探讨都规避了讨论所有权本身。即使那些自由文化的热情捍卫者,也以相当实用主义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例如有观点认为,自由文化最终会刺激创意生产和改革,然而版权会导致创意和改革成果的减少。尽管这些论述非常重要,但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一种对知识产权本身的根本性批判至今没有摆上台面。巴迪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反问:我们为什么要“为了确保当权者的生存而固守所有权的全部形式?”(Badiou 2010,5)

这当然正是马克思迟早有用之处。首先我们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是,所有权不是一种自然权利。它是一种历史产物。所有制关系受具体的历史条件所支配。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Communist Manifesto:68)<sup>①</sup>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关于产权的观点是标新立异的,与自由政治理论家存在明显区别。这一区别在于,自由政治理论家没有关注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反之,马克思将所有制概括为一种关系,即人们通过商品所建立的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样,所有制关系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有制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为基础,也以生产资料拥有者一方的利润积累为基础。

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人民出版社,2009年,45页。——译者注

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sup>①</sup>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Capital vol. 1:762—63)

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对物品的所有权关系不太大,但却关系着排除他人使用物品的权利。为了解构这一广泛传播的神话,即私有制是由那些勤奋而愿意刻苦工作的人们公平挣来的,同时其他人则是“懒惰的无赖”,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于所有制起源的替代性解释。

每天向我们说教如此乏味的儿童故事,是为了保护私有制……在真实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Capital vol. 1:713—14)<sup>②</sup>

为什么这句话在资本主义面临其第一次全球危机之时获得如此大的共鸣?第三点,且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是更加重要的观察是,马克思对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private and personal property)的区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私有制是丑恶的,它不仅是异化劳动(雇佣劳动)的结果,更糟糕的是,它也首先是异化劳动实现的手段,并且是维持资本和劳动不公平关系的手段。私有制是生产性的所有制,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至关重要的所有制,是一种能够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所有制。也许我的判断有些简单化,但大体上马克思确实将私有制等同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私有制与个人产权或者用于消费(用于再生产、用于生存)的产权是非常不同的,产权是不会社会化的,因为也没有社会化的必要。毕竟,非生产性的产权或者基于需求的产权是没有一点危害性的。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年,873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821页。——译者注

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Communist Manifesto: 68f)<sup>①</sup>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不是个人(personal)的产权而是私有(private)产权。毫无疑问,它们都是生产性商品,它们生产剩余价值,也为未来的商品奠定基础,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信息生产更多的信息,新闻生产更多的新闻,知识生产更多的知识,艺术生产更多的艺术。因此,知识产权这种发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并不保护这些非物质物品的作者,相反,它却有助于资本主义的积累。贝蒂格用丰富而详细的经验性证据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撑。

在我看来,支持自由文化的人和关注自由劳动剥削本质的人之间的争论陷入了困境。两种立场都应获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支持。他们彼此相互反驳,但是他们与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之间又如此完美地协调。此外,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对于智力与艺术工作者来说,看上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前途。这些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家不愿意出于利他原因支持自由劳动,而那些被剥削者挣的钱只够维持自己的生存。

这种困境的唯一出路讨论私有制本身的合法性。私有制关系反应了社会关系。现在,我们可以结束这个话题了。它将带我们重新回到价值,回到社会学意义上的(我们从生活中所享受到的)价值,带回到建立在斯宾诺莎情感理论上的第四种方式的价值,带回到作为促进行动的权力的价值。它也将带我们重新回到劳动。如果自由文化对社会是有益的(这是一个从未被认真辩驳过的观点),那么社会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支持他们的无偿贡献,他们带给人类的礼物。就这么简单。全球性的基本收入或许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法,但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自由-劳动-自由-文化-困境(free-labour-free-culture-dilemma)应该触发一个相关的讨论,那就是劳动分工。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画家,充其量只有一些人在从事其他事情的同时,也会画画”(Literature and Art, 76)。

如果人们使用他们促进行动的权力来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他们将会投入斗争: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人民出版社,2009年,46页。——译者注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Capital vol. 1:764)<sup>①</sup>

马克思对这场斗争或许有点过于乐观。不过，这种乐观及其带来的希望又是非常需要的。

## 八、斗 争

没错，这是一场关于阶级的战争。但战争是由我所在的富人阶级发动的，并且我们将是赢家。(Buffett 2011)

在大众传媒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是相当有限的。在数字和分布式媒体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能够更广泛地应用马克思的概念，这也是我的主要观点。我已经应用了他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特别是劳动、价值和财产权概念，这些概念都存在内在联系——来表明它们对于分析我们当前的传媒生态是有现实意义的。当代传媒生态包括一个关于国家、市场和公地三者形成的有趣的混合体构成。另一个概念阶级斗争，显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数字和分布式传媒已经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用以抵抗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用以建设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但如果受压迫者没有通过斗争推动更多的根本性改变，就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性能够实现。

跟劳动、价值和产权一样，阶级斗争的概念也是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概念，但仅处于边缘位置(例如，Mattelart and Siegelau 1979)。它还从未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此外，迪尔—维斯福特的声明是对的：“尽管已有一些研究站在阶级斗争立场，关注工人阶级围绕数字机器和电子传媒所进行的战斗，这些研究往往没有提出任何超越了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的理论视角。”(Dyer-Witthford 1999, 64)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年，874—875页。——译者注

分布式传媒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传媒和斗争的理论化。既然有太多的实践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我们怎样才能将阶级斗争概念化呢?这些实践指的是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抵制剥削的工人的行动力,近来已被政治经济学家们详细地探讨过(Huws and Leys 2003; Qui 2009; Mosco, McKercher and Huws 2010)。斗争在这个信息时代也与黑客行动主义(hacktivism)有关,与像“匿名者”(Anonymous)那样相互松散联系的网络“团体”采取的抵抗形式有关。第三,斗争与所有投入数字公地和建设替代商品和结构的精力有关。最后,它与社会运动有关。2011年爆发了首次全球起义。虽然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具体关系确实有待更细致的研究,但我们仍能放心地声称,社交媒体能够为社会运动和政治活跃分子赋权。在数字时代,传媒和斗争之间的联系是复杂而又强烈的。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家正在扩展他们的研究,不仅仅只关注传媒机构或者传媒产业。他们也在研究,网络空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在真实的街头和广场发生了什么。

马克思的确已经回来了,这次是个人化的(personal)。

### 参考文献:

- Andrejevic, Mark. 2008. Watching Television Without Pity. *Television & New Media* 9(1):24—46.
- Andrejevic, Mark. 2011. Facebook als Neue Produktionsweise. In *Generation Facebook: Über das Leben im Social Net*, edited by Oliver Leistert and Theo Röhle, 31—50.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 Andrejevic, Mark. Exploiting YouTube: Contradictions of User-generated Labour. In *The YouTube Reader*, edited by Pelle Snickars and Patrick Vonderau, Stockholm: National Library of Sweden.
- Artz, Lee, Steve Macek, and Dana Cloud (eds). 2006.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s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New York: Peter Lang.
- Badiou, Alain. 2010.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London: Verso.
- Barbrook, Richard. 1999.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In *Readme! Filtered by Net-time: ASCII Culture and the Revenge of Knowledge*, edited by Josephine Bosma, Pauline van Mourik Broekman, Ted Byfield Matthew Fuller, Geert Lovink, Diana McCarty, Pit Schultz Felix Stalder, McKenzie Wark, and Faith Wilding, 132—138. New York: Autonomedia.
- Benkler, Yochai. 2002. Coase's Penguin, or, Linux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The*

*Yale Law Journal* 112(3):369—446.

Benkler, Yochai.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ettig, Ronald V. 1996. *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xford: Westview.

Burton, Graeme. 2010. *Media and Society: Critical Perspectives*.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Carson, Kevin. 2011. How 'Intellectual Property' Imedes Competition. In *Markets Not Capitalism: Individualist Anarchism Against Bosses, Inequality, Corporate Power, and Structural Poverty*, edited by Gary Chartier & Charles W. Johnson, 325—334. London, New York: Minor Compositions and Autonomedia.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a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Curran, James. 1990.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Re-appraisal.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135—164.

Curran, James. 2000. *Media Organisations in Society*. London: Arnold.

Curran, James. 2010.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Curran, James and Jean Seaton. 1997.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Curran, James. 2003.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Devereux, Eoin. 2003. *Understanding the Media*. London: Sage.

Doctorow, Cory. 2008. *Content*. San Francisco: Tachyon Books.

Durham, Meenakshi Gigi and Douglas Kellner. 2006.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Oxford: Blackwell.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08.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ternet Age*. London: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eds. ). 2012.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Garnham, Nicholas. 1986.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

tion. I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Richard E. Collins, James Curran, Nicholas Garnham, Paddy Scannell, Philip Schlesinger, and Colin Sparks, 9—32. London: Sage.

Garnham, Nicholas.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Garnham, Nicholas. 2000. *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rguments About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lding, Peter, Graham Murdock, and Philip Schlesinger. 1986. *Communicating Politics: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Gorz, André. 1999. *Reclaiming 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Gorz, André. 2010. *The Immaterial*. Calcutta: Seagull Books.

Graeber, David. 2001. *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New York: Palgrave.

Grossberg, Lawrence, Ellen Wartella, and Charles Whitney. 1998. *Mediamaking: Mass Media in a Popular Cultu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rdy, Jonathan. 2010. The Contribution of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 *Media and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Curran, 186—209. London: Bloomsbury.

Herman, Edward and Noam Chomsky.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London: Vintage.

Herman, Edward and Robert McChesney. 1997. *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London: Vintage.

Cassell. Hesmondhalgh, David. 2010. User-generated Content, Free Labour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phemera* 10(3/4):267—284.

Huws, Ursula and Colin Leys.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Jhally, Sut. 1990.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New York: Routledge.

Jhally, Sut. 2006. *The Spectacle of Accumulation: Essays in Culture, Media, & Politics*. New York: Peter Lang.

Kellner, Douglas. 1995. Media Communications vs. Cultural Studies: Overcoming the Divide. *Communication Theory* 5(2):162—177.

Kleiner, Dmytri. 2010. *The Telekommunist Manifesto*.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Laughy, Dan. 2009. *Media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Harpenden: Kamera.

- Lazzarato, Maurizio. 1998. Immaterial Labor. Accessed February 29, 2012.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c/fcimmateriallabour3.htm>.
- Lessig, Lawrence. 2004. *Free Culture: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reativ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Livant, William. 1979. The Audience Commodity: On the "Blindspot" Deb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3(1):91—106.
- Livingstone, Sonia. 2009. 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1):1—18.
-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Books.
- Marx, Karl. 1977.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Marx, Karl. 198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ited by Frederic Bender, New York: W. W. Norton.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4.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96.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5;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attelart, Armand and Seth Siegelaub. 1979.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New York: Bagnolet.
- McChesney, Robert and Victor Pickard, eds. 2011. *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 The Collapse of Journalism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Fix It*.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New Press.
- McQuail, Denis. 2005.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Mosco, Vincent.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Sage.
- Mosco, Vincent.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osco, Vincent,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Ursula Huws. 2010.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LTD.
- Murdock, Graham. 1982.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edited by Michael Gurevitch, 118—150. Lon-

don; Methuen.

Murdock, Graham.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109—119.

Murdock, Graham. 2004. Past the Posts: Rethinking Change, Retrieving Cri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1):19—38.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2001. Digital Possibilities, Market Realities: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mmunications Convergence. In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A World of Contradictions*, edited by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111—129. London: Merlin Press.

Negri, Antonio. 1999. "Value and Affect." *Boundary 2* 26(2):77—88.

Nichols, John and Robert McChesney. 2006. *Tragedy and Farce: How the American Media Sell Wars, Spin Elections and Destroy Democracy*. New York: New Press.

Pasquinelli, Matteo. 2007. ICW-Immaterial Civil War: Prototypes of Conflict Within Cognitive Capitalism. In *My Creativity Reader: A Critiqu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edited by Geert Lovink and Ned Rossiter, 69—80.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Pasquinelli, Matteo. 2008. *Animal Spirits: A Bestiary of the Commons*. Amsterdam: NAI Publishers and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Qui, Jack Linchuan.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MA): MIT Press.

Schiller, Herbert. 1989.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 Y. : Oxford U. P.

Siefkes, Christian. 2007. *From Exchange to Contributions: Generalizing Peer Production into the Physical World*. Berlin: Edition C. Siefkes.

Smythe, Dallas. 1977.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Ablex.

Smythe, Dallas.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120—127.

Stallabrass, Julian. 2003. *Internet Art: The Online Clash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London: Tate Publishing.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Wark, McKenzie. 2004. *A Hacker Manifest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yne, Mik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Weber, Steven. 2004. *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Williams, Raymond.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Wittel, Andreas. 2004. Culture, Labour and Subjectivity: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from Below. *Capital & Class* 84(Special Issue): 11—30.

Wittel, Andreas. 2011. Qualities of Sharing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Ethics* 15.

Wittel, Andreas. Forthcoming 2012. Hochschulbildung als Gut: Vom öffentlichen Gut zur Ware zum Gemeingut? In *Wissensarbeit Und Arbeitswissen. Zur Ethnographie Des Kognitiven Kapitalismus*, edited by Gertraud Koch and Bernd Juergen Warnek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Žižek, Slavoj 2011.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New York: Verso.

## 第二篇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卡斯塔尼奥(Pablo Castango)<sup>①</sup>

##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阿根廷传媒民主化， 新自由主义之后

萧肇君(译),吴畅畅(校)

[摘要]本文认为,若要推进社会主义的解放志业,就得深入调查党政干部队伍(political cadres)究竟怎么隐匿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效应,并将公民与劳动者的诸般需求,纳入其调控规约,或甚至是其移花接木的算计之中。若要研究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很重要的一个要件就是,我们必须分析政治及媒体的相互构成关系。为理解阿根廷总体政策意识形态变迁,作者以“媒介立法”为切点,对于军人集团独裁统治时期(1976—1983)下新媒体法的公告施行、民主及新自由政府任内(1989—1999)对新媒体法的修正,还有,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2007—)在2009年针对媒体民主化(media democratization)所批准的新法,分别分析。透过将政策予以脉络化,他并进一步指出-推翻威权,并不代表媒体与社会改革已尽全功,而当代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如果未能正视国家霸权及资本主义仍在跨国资本全球部署的基础上持续再生产,其进步性有待检证。从此角度视之,吾人在各别社会中所面对的难题,其实有其人类共同命运的性质,并足见,以世界为范畴、透过非主流理论视角搜集暨评析相关经验资料,有其益处。至于,如何将这些体会转化为对政策与环境的思索与实践,仍有待有识有志之士,

---

<sup>①</sup> 阿根廷拉马坦萨国立大学法律和政治科学系教授。他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阿根廷的国家危机:全球幻想与国家围堵”,而他在文化与媒体方面的出版,包括了在 *Mediation* 23(2)Spring 2008 发表的专文“从地方电视到国家电视:新西班牙的名人文化及集体认可”。他目前进行的比较研究,关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南欧及南美的政治示威。pcastagno@unlam.edu.ar

一同努力了。

[关键词]批判政治经济学、全球危机、霸权、媒体政策、马克思政治理论、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populism)<sup>①</sup>、基什内尔路线(Kirchnerismo)

## 一、导 言

以阿根廷为个案进行检视,我的目的是,探求国家与党政干部队伍如何努力压制源于国家根本冲突的社会张力,并将之作为诉求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机制,值此同时,再制出跨国阶级的统治,并在其上成就全球资本主义。<sup>②</sup> 我特别主张,媒体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调控及政治斗争的关键场域。在此,说到意识形态(ideology),我指的是,统治政治团体及统治阶级有目的地将其想法散布于全社会,使其想法位居尊位(Marx and Engles 1998/1846),并与文化及政治领导过程的社会形构相调和(Gramsci 2000, 200—210);借由吸纳暨接合其他团体及阶级的论述,消解(统治者)与其他群体间可能的冲突对立(Laclau 1979, 187—189)。据我了解,这些符号实践,实实在在地隐藏了社会那冲突对立的本质(Marx and Engles 1998/1848; Marx 1978/1867, 319—328; Horkheimer 1989/1932, 55)。而我使用“调控”(regulation)一词,所指的亦是见诸于法律工具、国家政策、论述实践等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ologies)。

以此形式将意识形态调控予以概念化,我仍愿维持马克思及后续马克思媒体研究所持之见解,即媒体作为不具本质性的客体(unfixed object),实乃整合在总体的政治经济过程里。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结构对立因而展现、再制、相互竞夺与转型(Murdock and Golding 1973; Garnham 1979; Wayne 2003; Artz, Macek and Cloud 2006; McChesney 2007; Mosco 2010; Fuchs 2011)。这些著作共有的,是批判的理论及方法,以此为凭,对于媒体

<sup>①</sup> 平民主义(populism)在他处或可见译为“民粹主义”,并带有反智的贬义。然而在南美,该词所指涉的范围甚广,凡宣称从人民角度出发、欲与人民位居同列者,则不论左右或参与阶级,似均可类归此畴。然而,作者在阿根廷提及 Kirchnerismo 对于平民主义的自我宣称,所指的,却是本欲持人民立场而与新自由主义断裂、但终究不能不尝试在人民立场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协调的政策思维。当然,这也许也暗示-在阿根廷传媒政策辩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方面,围绕着这个词的阵地战还将持续下去。详见本文第四节。——译者注

<sup>②</sup> 承延 Manuel Castells 的著述,当我谈及全球资本主义,我指的是一经济体制,其主要组成要件能实时在全世界的尺度上运作(2000, 105)。

的研究,方可置于那特定历史时刻下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当中(totality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具体而言,我的任务是要探查党政干部队伍如何响应企业亟欲增加利润的压力、如何将国家机器合法化,还有,如何在资本危机及政治风暴的脉络中处理公民及劳动者的民主需求。<sup>①</sup> 追随马克思,我了解,资本危机即以商品交换实现利润此一过程中任何可能的断裂(Marx 1978, 433—465)。这些危机,包含了不同的事件,比如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些事件却都是以统治阶级亟欲确保资本家获利为特征。

在实证层次,阿根廷所以成为分析上有趣且相关的政治场域,可以归因于 2001 至 2002 年间资本主义那影响深远的衰退、阿根廷先前的几次危机,还有国家意识形态(state ideologies)的周期性变动。依我之见,阿根廷媒体转型的当代史可以依三个重要的政治事件来区分:军人集团(military junta)独裁统治时期(1976—1983)下新媒体法的公告施行(Law 22,285,1980)、<sup>②</sup> 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1989—1999)民主及新自由政府任内对新媒体法的修正,还有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Ch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2007—)<sup>③</sup>在 2009 年针对媒体民主化(media democratization)所批准的新法。就政治倾向而言,目前的政府可以视为是内斯特·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时期(2003—2007)的延续。内斯特·基什内尔总统,在 2001—2002 年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场毁灭性的财政崩盘后上任。那场危机,使得阿根廷总人口 4 成陷入失业或低度的就业状态、过半的总人口在贫穷线下生活(Oficina de la CEPAL 2010; Lozano 2005, 4),<sup>④</sup>国家的正当性可谓因之深切动摇。梅内姆与基什内尔均属于 Partido Peronista,之前是个在 1940 年代兴起的全国性民粹主义政党。然而梅内姆任内,所推动的却是使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联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Castagno 2010, 119—176),这使得所谓的基什内尔路线(Kirchnerismo),<sup>⑤</sup>本身即构成了一个国家存续及改变的复杂个案。

---

① 承延 Nicos Poulantzas(1969, 72)的著述,我所了解的党政干部队伍,乃由一社会类属所构成,而非指单一阶级。其功能,是要将国家再生产出来,而这个队伍对于宰制的经济阶级及整体资本主义而言,可称是至关重要。

② 行政权可统领陆军、海军及空军统帅。

③ 其人即前任总统 Nestor Kirchner 夫人,并于 2011 年大选之后续任总统。——译者注

④ 低度就业(sub-employment)所指的,乃是劳工虽然愿意更长时间地工作,但每周工时却仍低于 35 小时的劳动情状。

⑤ 泛指 2003 年后阿根廷的政策取向。——译者注

要考察这段当代史,我的中心问题是——1970年代中期、1980年晚期,和2001—2002年间,媒体政策到底如何与那些亟欲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响应劳工与公民需求的政策相连结。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危机理论及马克思方法取经,我欲以历史取径回答前述研究问题,并希望能解释国家、媒体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关系。我的一般目标,是要界定并解释不同政权及政府媒体政策的意识形态变化,乃至于较特定的目标,则是要分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的阶级改革及其与视听媒体系统内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此研究中,我将采用质性方法来检视同列为政府整体政治经济政策之一的广电及视听服务媒体立法。在此,我将“媒体立法”(media legislation)定义为一个权力的场域,在此场域中,公民、党政干部队伍及统治的经济阶级奋力建立国家介入的标尺。依此标尺,媒体资源从由分配、公共传播的范畴也因而划定<sup>①</sup>。而此场域,包含、反映并构成了它自己也浸淫其中的社会整体。我主要的论点是,基什内尔路线已然发动了促进资本主义跨国化的资产阶级国家政策(Bourgeois state project),该政策先是由军事独裁政权于1955年至1983年间推动,接着,又再由梅内姆政府承继(Portantiero 1974, 1977; Castagno 2010),乃至于近来旧事重演,基什内尔路线所仰赖的媒体意识形态调控,还仰赖于国家民粹主义(state populist),而这与先前的国民威权(national-authoritarian)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调控尚有不同。聚焦于媒体政策,我希望能批判性地指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声明之间的罅隙。

## 一、将媒体放在脉络之中:资本主义危机及国家转型

要现实地思考国家与资本主义系统,马克思的著作非常关键。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方法(historical-material method)分析了资本主义下由矛盾及阶级斗争构成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展示的,正是资本及薪资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对立、社会经济动力及社会的政治生活间的根本对立,形塑了现代历史。对马克思来说,了解并呈现这样的具体现实,自当是革命实践以肇建平等及自由社会的一部分(Lukacs

---

<sup>①</sup> 我因而分析的主题议题,爰有国家对于媒体所有权的管制、对于广电业者的监督、媒体部门的资本积累,以及媒体的民主化。

2000/1923,3)。他的研究方法建立在批判理论取径上,其目标,一方面是要抓住社会现实与当前社会价值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是要辩证地克服社会研究以及批判实践行动之间的差距(Marx 1998/1845,572—574)。

马克思观察到,资本主义乃是以资本积累及危机的周期出现为特征。如前述,所谓危机,马克思所指,乃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中断(Marx 1978,446)。而如其人所示,再生产乃是建立在企业对薪资劳动者的剥削上,也就是说,为了使所生产的商品(交换价值)可以因为市场交易而获得货币,资本家只愿意付给劳动阶级仅堪其再生产之需的社会必要金额,并从中夺取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剥削了以商品为形式的劳动力。依马克思之见,资本乃是交换价值的积累,它需要资本流通及商品流通的持续进行(Marx 1978/1867,302—336)。是以,对于亟欲劫取利润的企业而言,要确保生产规模扩张、于生产中采用更多科技、增进每单位时间劳动的相对剥削、为市场上增加更多、更便宜的竞争商品,资本积累实属必要。马克思解释,资本主义因而需要在资本投入与消费数据(means of consumption)或消费商品之间求取平衡(Marx 1992/1885)。他强调,危机所以发生,是资本主义系统的内在倾向始然,也就是,“剥削最大量的劳动,却不去考虑市场实际的界线,也就是由可支付能力所支撑的需求的界线;而这又是透过持续再生产或积累扩张达成,而利润亦因之持续地转化为资本”(Marx1978,465)。同时他也提醒,要解决危机,资产阶级—也就是统治的经济阶级—乃是朝着强制破坏大量生产能力、追逐新市场,以及更进一步剥削旧市场等方向而去(Marx and Engels1978/1848,478)。

运用此一理论视野,我们可以分辨出当代资本主义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其一乃发生于1970年代早期。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及其他作者所示,从彼时起,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的资本积累周期开始在美国及世界的其他地方遭遇到严重的困难(Harvey1991,140—147)。为了响应资本主义的获利能力危机,各国党政干部队伍及跨国资产阶级无不以移除国家经济干预主义及建立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方式因应(Smith 1997;Dumenil and Levy 2004)。于是,我们看到,为了解决企业获利的危机问题,党政干部队伍随即将国有公司私有化、消解劳动权利,将商品生产部署于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消除那些针对资本集中化及中心化发展所设下的限制,保障金融资本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以及强化金融商品生产——举例而言,将国民的退休金系统予以私有化;至于刺激新媒介、旅游、休闲及运动

商品等方式扩展文化的商品化,更非例外。<sup>①</sup>时至今日,很明显的是,这样的新自由政策又再遭遇障碍,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也刻正在发展当中。这可见诸于欧盟诸国及美国过去五年停滞不前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然而,远在北方国家的危机兴起之前,新自由主义政策早已毁灭了许多南方国家。

我的论点是,媒体研究必须置放在历史过程之中。以葛兰西(Gramsci)的话来说,我们既要研究经济结构的张力如何反应在政治及文化的转型(Gramsci 2000, 427),同时也要检视政治及文化实践如何转变了经济结构——亦即,辩证而主动的文化、政治及经济过程如何相互构成并改变彼此。举例来说,马克思对革命及反革命过程如何改变国家及私有财产的研究启发了葛兰西,而后者还运用了“有机危机”(organic crisis)的架构解释了商品交换及国家形构所遭受的周期性不稳定。对葛兰西而言,有机危机的主要征兆之一,正是统治的经济阶级不再认为传统的政治图像(political representation)仍属恰当,而该图像同时也受到来自其他从属阶级的抵抗(2000, 217—221)。在此历史情境下,从属阶级转为政治主动的状态,而统治阶级的霸权亦再不具合法性,其统治遂只能以强制来维系,与此同时,经济瘫痪,国家的整体危机也于焉浮现(Gramsci 2000, 218)。

在此意义下,我主张,媒体乃是国家场域之一,其中,政治团体及阶级乃打造了新的意识形态论述、觅得了新的盟友,并建立起霸权来处理有机危机。以葛兰西的话来说,霸权指的是那些获得公民及劳动者同意的政治、文化及道德指令(2000, 194)。正值有机危机侵蚀了制度性行动者(政府、工会、商业协会)之间的契约,公民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也遭破坏,媒体功能的重要性即同步增加。进一步而言,媒体是使商品化及资本积累一般过程得以平顺进行的主要媒介(Mosco 2010, 130; Fuchs 2009; 2011. 135—160),则媒体场域作为一重要的空间,一旦资本崩坏,统治经济阶级还可利用此空间强化商品交易。简言之,从马克思的角度思考媒介,我意图检视的,乃是将资本积累及国家正当性再生产出来的阶级及政治斗争,也是创建另类媒介、政治及经济体系的阶级及政治斗争。这样的探查有其必要,并有助我们用辩证眼光将国家视为一不稳定的形构:一方面它要再生产出跨国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它又要聆听公民的声音。换句话说,媒体的政策分析允许我们用两种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国家(Held 1991, 144):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器官

---

<sup>①</sup> 依马克思的词汇,商品化,也就是将使用价值转换成能交易的商品(Mosco 2010, 127)。

(Marx and Engels 1978/1848, 475); 国家是具有部分相对自主性的机制, 虽然它也再生产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Marx 1978/1852 ; Poulantzas 1969)。当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倾向强调媒体在资本主义再生产方面作为意识形态控制机制的角色 (Althusser 2001/1970, 95), 捕捉国家在再生产与霸权之间的不平衡, 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 二、阿根廷媒体政策中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

环绕在 2001—2002 年间新自由主义大崩溃的进步性政治辩论, 晚近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所推动的媒体改革, 正可作为当中一部分的代表。崩溃彼时, 正是阿根廷拒绝履行政府公债, 甚且在连续 3 年的经济衰退之后, 猛烈地将货币贬值之际。然而本节的讨论, 还聚焦于卡洛斯·梅内姆 (1989—1999) 新自由政府及最近一次军事独裁 (1976—1983) 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性质。对于过往的政策取向, 当前基什内尔路线拥护者的论点是, 先前政策所以“向新自由主义转”, 系由该军人政权所为, 嗣后并由梅内姆深化。这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诠释。目前的党政干部队伍遂可以此诉求公民, 都是因为独裁体制, 结构性的资本主义调整计划才因而推动, 并压迫了劳动者及公民。军人干政时期, 为了消除公民对国家的异见, 动用了国家恐怖主义及经济政策使劳工屈从。这个由军人控制的政权绑架、谋杀劳工、学生及政治行动者, 使得数以千计的他们“被迫消失” (CONADEP 2003. 296);<sup>①</sup> 薪资调降; 为企业引进技术并推动贸易自由化, 以提振所谓的劳工生产力及增加进口; 以北方国家的金融资本将国家经济体紧紧缠绕—提高国债, 也吸收了企业的债务。<sup>②</sup>

然而, 基什内尔路线的论述忽略的是, 打自胡安·多明戈·庇隆 (Juan Domingo Peron) 的民选政府在 1995 年遭军事政变 (coup d'état) 推翻了之后, 庇隆的民族资本主义路线 (national capitalism), 就已经变了调, 并由镇压劳工、确保阿根廷与北方资本主义连结的政策取而代之 (Portantiero 1974;

① 失踪者国家委员会, 由劳尔·阿方辛 (Raul Alfonsin) 的民主政府 (1983—1989) 所建立。

② 至于那些非马克思的取径是如何看待这些事实材料, 可参见 Calcagno (1989) 及 Rapoport (2003)。当前官方说法, 基本上倾向强调军政府造成公民失踪, 而其腐败并使国家负债。换句话说, 并没有将这些罪行置放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前提之下 (按: 即将结构问题予以泛道德的个案处理)。



1977; Castagno 2010)。<sup>①</sup> 前后两次军事独裁(1955—1958; 1966—1973)期间,军人专政强化了国家强制及与北方资本主义的相互依赖。对此,劳工虽然曾透过工作现场的劳动团结、新工会、总罢工与政治动员等方式强力地国家与资本霸权对抗,然对抗未久,很快又迎来了下一波的镇压(Werner and Augirre 2009, 167—260)。而此一国家当局的有机危机,碰巧与深化的经济衰退,以及1975年的超级通膨危机一同发生。<sup>②</sup> 此外,与之相伴的,还有来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也就是我说的北方资本主义——在崭新地理区位上的资本部署(Harvey 1991, 185)。

我的见解是,如采用较长的历史视角,适足以显示,在阿根廷国家与北方资本主义的环环相扣中,改变的是调控的架构、强制的机制,还有意识形态的形式。透过意识形态的形式,国家和党政干部队伍要求公民顺从于国家与资本,但国家采取有助资本跨国发展的策略却始终如一,这可见诸于吹捧外资、坚持出口导向经济、为多国公司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以利其输出资本,以及定期的调节制度使所谓的劳动生产力向国际标准看齐等作为。而借由观察独裁及民主政权、见证阿根廷党政干部队伍先后吸纳了中左思潮、平民民主,及 Peronistas<sup>③</sup> 等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窥见国家如何以不同的调控及意识形态技术来支持大同小异的政策取向。意识形态技术方面,军人独裁系系透过压迫性国族主义(repressive nationalism)来与劳工、工会、庇隆主义政党(Partido Peronista)及全国左翼政党的需求相抗衡。抗衡的结果,参与反抗的庇隆主义劳工、庇隆主义政党的全国左翼部门,以及全国左翼武装团体,莫不被控以煽动、贪腐,以及受国际社会主义影响的国际恐怖主义罪名。而别号国家安全条例、由军人集团对广电制订的 22,285 法,正可以作为此一时

① 举例而言,1957年,百大企业中,有64个是国有企业,至于其他,则都是北方国家的公司。到了1971年,百大企业中,有72个是外国的跨国公司,至于其他的,才是国有企业,而通常也都与北方国家的公司有所牵连(Sourrouille 1985, 51)。如 Juan Carlos Portantiero 批判所指出的,“(在1950年代中期)有两个基本替代方案可供选择。其中之一,是强力推动庇隆主义(Peronism),使发展得以建立在国家与民族资本坚强的联合上。另一个方案,则是创造使资本主义发展得以发展的条件,也就是强调依赖、并保证关键经济部门得受控制的政策取向(Portantiero 1974, 102)”。至于非马克思取径是如何看待60年代的资本主义跨国化,请见 Juan Vital Sourrouille(1985)及 Guillermo O'Donnell(1988)的著作。

② 1975年,资本主义危机的症状,在阿根廷的个案中显而易见:通货膨胀率攀升至444%,国内生产毛额(GDP)及投资则缓步不前,财政赤字飞升至16%,外债走扬,国外贸易恶化,而工会在1975年最终拒绝了剧烈的货币贬值及薪资冻涨(Rapoport 2003, 651—694)。

③ Peronism 一词,系由阿根廷前总统 Juan Peron 的名字演变而来。Juan Peron 曾三度当选阿根廷总统(1946—1952, 1952—1955, 1973—1974),标榜 Peronism 的政党,光谱亦十分广泛。——译者注

期的例证。

举例来说,军人集团在行政权控制(军人集团的总司令)下设立了广电调控制度,包括在阿根廷的媒体调控单位(Comite Federal de radiodifusion, COMFER)<sup>①</sup>中创设了三军代表,并由他们与公共信息部长、传播部长,以及另外两位来自私有媒体组织的代表一起来主管媒体业务。此外,22,285 法也要求媒体内容必不得违背“民意”、国家传统及基督教道德规范。法令要求广电业者“散布讯息、[与行政机关]合作,以满足国家安全方面的要求”。<sup>②</sup> 国有广电与商业广电被要求应避免播送那些削弱爱国主义的内容,此外,法令并要求广电业者应消除那些鼓吹与国家道德、社会及政治规范相冲突的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内容(见第 5 条及 286/81 规定)。此一意识形态的强制,当然也包含禁止非营利媒体的存在在内。<sup>③</sup> 是以,说是广电立法,事实上还是国家威权主义及商业媒体利益的凝结。然而,透过压迫式国族主义来促使资本主义成长,却是在在充满矛盾。

国家威权主义虽然借压迫劳工及文化异议分子的方式来支持资本主义,但与此同时,它也为资本的流通与积累设立了障碍。举例来说,除了限制国籍,<sup>④</sup>借由对广电内容建立道德限制的方式,媒体立法也限制了媒体商品的生产。它要求广电业者禁止传送“凄惨、腐败或压迫性的新闻”、“淫秽姿势”、“邪竟胜正”或“公共骚动”的讯息。<sup>⑤</sup> 22,285 法要求媒体公司主要只能播送本国内容、且只能以西班牙文播送,更要求媒体调控单位 COMFER 认证那些透过 FM 收音机流通的讯息,并禁止私有广播网络的设立。<sup>⑥</sup> 此外,它也禁止播送电视游戏节目、禁止媒体收视率,广电内容中亦不可以出现扣应节目。<sup>⑦⑧</sup> 这些调控手段限制了资本积累,不是因为企业不能将国籍或道德产品商品化,而是因为即便企业可以使之商品化,政策上仍然要对其使用价值的范围,有所限制。

① 联邦广电委员会。

② 第 7 条。

③ 第 45 条。

④ 应指广电业重要人事如发起人、董监事、管理人的国籍限制。——译者注

⑤ 第 22,285 号法案(第 18 条)及 286/81 号施行令(第 1 条)。有关独裁政体压迫文化生活之状况,请见 Guillermo O'Donnell(1984)。

⑥ 第 15、19、58、68 条。第 286/81 号施行令。广电内容总量中 40% 应为本地内容。

⑦ 扣应节目,即允许观众致电电台,与节目中人互动的节目形态。——译者注

⑧ 第 24、25 条。

透过限制资本中心化、集中化及商业化,<sup>①</sup>这样的立法同时也限制了资本积累。22,285 法规定商业广电不能拥有平面报纸公司、管理公共媒体服务,或者,管理超过 4 张以上的广电执照。<sup>②</sup> 它也禁止广电业者成为国外公司的分公司、出售执照,或在营运 5 年之内让股份可以公开交易 (commercializing shares)。<sup>③</sup> 在广告方面——也就是在阅听众及广告主的关系方面 (Mosco 2010, 132)——22,285 法禁止节目中有广告、限制只能播送国有企业的广告,以及限制那些可能“对于家庭及基督教道德”有所冒犯的广告。<sup>④</sup> 简言之,当军人集团亟欲解决 70 年代的有机危机、并企图加强稳固跨国资本主义之际,至少在媒体市场里,它还是以它所允许的道德强制及文化控制方式限制了资本积累。在此意义上,非常清楚的是,独裁政权控制了国有的电视频道,并且抢先在将政权交给劳尔·阿方辛的民主政府手中之前,<sup>⑤</sup>先将 Canal 9 及 Canal 12 两个电视频道给私有化。<sup>⑥</sup>

鉴于阿方辛政府任内,无论是统治的经济阶级或是劳动阶级,均无法解决长久以来的经济停滞的僵局,卡洛斯·梅内姆的民主政府(1989—1999)于是还将独裁时期对媒体市场的限制予以移除。梅内姆承诺劳工,他将会终结这场危机并且增进社会平等,然而,他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却是更偏向资本的一方。在媒体场域,梅内姆去除了先前的道德律令,并允许广电业者播送益智节目、其他非以母语播送的节目,此外,节目间也允许播送广告,扣应节目<sup>⑦</sup>及商品型录 (brands' catalogues)<sup>⑧</sup>亦自此解禁。他的新媒体立法首度允许国有电视频道播送广告,并增加广告播送时间,<sup>⑨</sup>此外,他也允许广电业者进行收视率统计——这个做法所传递的想法是,在社会内有特别的一群人乃是广告商想要吸引的对象。<sup>⑩</sup> 这些调控

① 依马克思的说法,集中化所指的乃是资本积累与劳动过程的对决(资本将所有生产工具集中于许多企业之中),至于中心化,所指的乃是一企业或资本在不同经济部门或不同次部门的命令控制及所有权控制(Shaikh 1991, 76—77)。

② 第 43 条。

③ 第 45、46 条。

④ 第 23 条。

⑤ 其人在总统任内计达 7 年(1983—1989)。——译者注

⑥ 独裁政体将那些电视频道还给了原本的所有者。在 1974 年,Peron 政府将之国有化。

⑦ 1990 年代最受还营的电视节目(Hola Susana)是个益智节目,观众则必须打电话才能参加。

⑧ 施行令 1062/98, 1005/99, 1065/99。

⑨ 施行令 1652/96, 1005/99。

⑩ 施行令 1062/98。阅听众的组成对于商品化过程来说最为根本。如 Dallas Smythe 所观察(1977), 资本主义媒体需要为广告主生产出阅听众来。批判的回顾,请见 Vincent Mosco(2010, 136—138)。

上的变革使媒体内容的商品化或商业化与日俱增,先前无从想象的节目纷纷出笼,像是:脱口秀、政治丑闻、犯罪新闻,主持人亦可为电池品牌打广告的廉价幽默节目,此外,还有有线电视上各式各样的益智节目及色情频道。简言之,梅内姆的媒体政策一如马克思所强调:资本主义对于商品的实际内容漠不关心。依马克思的话来说,“如果商品能为他们自己说话,他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能使人感兴趣。但使用价值,并不是我们(按,即商品)作为客观之物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客观之物,正是我们的价值使然。我们作为商品的自然交易证实了这点。在交易双方的眼中,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交换价值。”(1978/1867,328)<sup>①</sup>

梅内姆政府同样以改变媒介所有权规范的方式来滋育资本主义。它将国有的 Canal 13 与 Canal 11 频道予以私有化、允许报业与电话公司拥有自己的电视及有线电视频道,<sup>②</sup>此外,并将媒体集团可以管理的执照张数从 4 张提升至 24 张、<sup>③</sup>移除出售媒体公司股份的期间限制、<sup>④</sup>允许新广播电视网的筹建,以及移除执照移转的限制。<sup>⑤</sup> 梅内姆对外资的立法也认可了资本在媒体市场的进出。而 21,382(1993)法以及其他 53 项对外资的新协议<sup>⑥</sup>——较之本国法的效力为高——并要求国家应平等对待外资及本资。是以,受核准的国际投资客遂得进而将利润及资本跨越国境而汇回母国。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促进了媒体的集中发展,而这同样也建立在跨国化发展的基础之上。举例而言,报业公司号角集团(Grupo Clarin)因而成为最大的媒介集团:<sup>⑦</sup>特别是,它旗下的公司 Cablevision 可谓买遍了该国的有线电视网络、持有大约 260 张的有线电视执照。<sup>⑧</sup> 值此同时,新全球资本也因而流入

① 译者所译。——译者注

② 第 23,696/89 号法案(第 65 条)。第 26,053/99 号法案(第 1 条)禁止公共服务公司管理广电执照,不过,透过立法允许那些来自于同样许可阿根廷资本经营广电业务的国家的外来资本,该限制后来业已移除。请见后文。

③ 第 23,696/89 号法案(第 65 条)。

④ 施行令 1062/98。

⑤ 施行令 1071/91 及施行令 1005/99。

⑥ 国家宪法(第 75 条)。

⑦ 依 La Nacion 在 2011 年 12 月 20 日的报道(2012 年 2 月 5 日在线阅),2011 年,号角集团控制有 47% 的有线电视市场、9 个电视频道(直接持有或可指派代表)、5 个有线电视频道,在最常收听名列第二的收音机电台(Radio Mitre),以及许多张收音机广播执照、最多人阅读的报纸(Clarin),以及其他 10 家报纸及杂志、掌控了 37% 的报纸广告,以及顶级视听公司的股份。请见号角集团的网站(2012 年 2 月 15 日在线阅)。

⑧ 例子可见诸 Perfil 报在 2009 年 4 月 5 日的报道(2012 年 1 月 5 日在线阅)。

市场:举例而言,Telefonica International——这家同样历经私有化过程的西班牙电话公司——取得了 Canal 11,并同时管理了另外 9 张电视执照,此外,自由媒体公司(Liberty Media Corporation)买了 Cablevision 四分之一的股份之际,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也持有了号角集团 18%的股份(CEPAL 2002,97)。

因此,我们看到梅内姆的媒体政策,其实是整合在他的新自由国家机器里。在此政策取向下,梅内姆同样推动了倾向资本主义的劳动立法、自由化贸易、将所有国有企业予以私有化、将先前政权所积欠的外债与全球政府债券交换,将国家退休金系统部分私有化,推动跨国资本投资,并建立了新的货币体制,使阿根廷披索币与美金间可以等额自动转换(Castagno 2010, 119—176)。<sup>①</sup> 概括而言,依梅内姆的管理,市场将可以使各式各样政府认为无法由国家流通的物质及符号商品进行流通,尽管如此,实际的成效却是,新自由主义剧烈地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一如比阿特丽斯·沙莉欧(Beatriz Sario)在 1990 年初期所描述的,只要梅内姆掌权,“阿根廷即生存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氛围。在此架构下,国家分崩离析且贫困。空有 50 个电视频道、每日 20 小时的播送时间及公共教育系统,当中竟没有任何的符号或物质资源”(Sarlo 1994,7)。这样系统性的社会不平等贯穿了 1990 年代,致使国家在政治上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局面了。到了 90 年代晚期,失业率攀升至 18%,而贫穷率也高达了 30%(Lozano 2005,4)。

在此不平等的脉络下,商业媒体所流通的讯息无不在驱使消费者加入所谓的第一世界(比如,美国迈阿密的购物中心、欧洲的体育活动),值此同时,回避了结构而运用道德或个人主义式修辞,则将贪腐政客视为是阿根廷新自由经济的敌人(Castagno 2010,226—231)。这些问题到了 1999 年早期开始恶化,起因于作为阿根廷最大贸易伙伴的巴西开始推动货币贬值。在此情况下,阿根廷人于是选出了中间偏右的政治联盟 ALIANZA。<sup>②</sup> 该联盟承诺将起诉政治贪腐—此举与国有企业私有化密切相关(Verbitsky 1990)。然而除了这项承诺,这个政府却仍然只奋力保全新自由主义总体

---

① 梅内姆政府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欧元”:当欧元在欧洲取代了先前各国的货币,阿根廷美元(也就是说,该货币成为马克思所称的普遍货币等价物)则成为了国家管控经济的工具,并在全球经济体中压迫劳工适应以美元计价的竞争力。

② 教育、健康及就业联盟(Alianza para la Educacion, la Salud y el Empleo)乃是由传统政党(UDR)及其中左联盟(FREPASO)所创。

的经济架构,确保公债得偿付之际,却使劳工处境日益艰难。<sup>①</sup> 这样的打击,与公民期待相违。工人与公民于是起身抗拒这波新自由主义的樽节政策(neoliberal austerity)。举例而言,两大工会联盟共实行了8次的总罢工,而失业劳工的社会运动也有了新的动力。在关键选区中,废票竟然赢得了2001年的国会选举。<sup>②</sup> 到了2001年年末,主要城市的公民更塞满了公共广场要求该联盟的佛南度·德·拉·鲁阿(Fernando de la Rúa)总统下台。在“他们必须全数离开!”这句口号的号召下,公民们向现任总统和主要的几个政党说不(Solanas 2004; Pousadela 2008)。但尽管有这些游行示威,传统政党却仍然屹立不摇,并以国会条款的方式选出了新总统。以国家为名,继任的爱德华多·杜阿尔德(Eduardo Duhalde)总统还将此衰退转化为资本家的新出路:他的政府剧烈地将货币贬值,并且调低工资,<sup>③</sup>以公民的储蓄为大公司清偿银行负债,并打压抗议的失业劳工(Castagno 2010, 317—338)。而这场国家统治的危机,最终还以2003年总统内斯特·基什内尔的胜出画下句点。

### 三、后自由主义国家与媒体

“只有当(阶级)关系发展到一定高度、而利害冲突非常紧张厉害的时期,一般人才能看穿表象、明白实情为何,此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才方始浮上水面为我们所充分认识。”

——Max Horkheimer, Notes on Science and the Crisis(1989/1932, 55)

尽管新政权的支持者明确地表达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并清楚表达他们国家人民的政治取向,基什内尔路线仍然企图延续在全球资本主义

---

① 该联盟(ALIANZA)通过的劳动法取消了团体协约;降低国内劳动薪资;意图将工会健保基金私有化;而交换来的政府垃圾债券也被推给国内及全球的退休金请领者(Castagno 2010, 287—289)。

②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Buenos Aires)及圣达菲(Santa Fe)等城市,最后是空白票及废票赢得了大选(按:甚至比有效票更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Buenos Aires),空白票及毁损票则得到了第二高票,在科尔多瓦(Cordoba),废票则得到了第三高票。阿根廷属总统制,政府有行政权,至由参议院及众议院(Congreso Nacional)组成的两院(bicameral)持有立法权,此外,尚有司法权。我在此使用国会一词,所指的即前述具有立法权的两院。

③ 货币贬值意味着即使在危机4年之后,平均薪资较之于2001年的水平,仍然低了4个百分点(Grana and Kennedy 2008, 65)。贬值改变了整个经济的相对价格。随着(以美元计)商品出口的增量,(以本国币值计的)工资水平却持续恶化。

经济下推动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并强制使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得以运作。首先,在商品生产部门,货币贬值及全球商品价格走扬(农产品、能源、矿业)双双结合,强化了阿根廷在经济政策上亟欲征服新市场的出口导向:2003到2010年间,出口金额从美金299亿上升到美金680亿。出口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将车辆出口至巴西、将黄豆出口至亚洲,以及将矿产品输出至全球市场。北方资本仍然控制着资本主义在生产方面的骨干(Chudnovsky 2001,96)。<sup>①</sup> 其次,内斯特·基什内尔政府,以及继任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也持续减少外债占GDP之比率,并将私有化的退休金系统重新国有化。尽管如此,目前外债所占GDP比例却已逼近前次衰退水平。值此同时,新的国家退休基金在其投资组合<sup>②</sup>里依然买入了大量的政府公债。换句话说,基什内尔路线同样将国债重担移转给退休金投保者承担,并拒绝给付给退休者薪资所得替代率82%的退休金。第三,基什内尔路线固然重新建立了团体协约制,然而在正常劳动市场之外(也就是团体协约制之外)的劳工比率并无变化,依最少估计值计算,大概都还有34%的总劳动人口属之。<sup>③</sup> 从由视之,在解释GDP中的薪资何以在1970年来即趋于停滞(Grene and Kennedy 2008,4),资本主义攻击的不断加强,可称得上是重要因素。接着,基什内尔路线固然声称贫穷人口已降至一成,但此数据却是基于过时的统计标准而得——它认为一户四口之家每月的维生总额仅需1423匹索(合当美金326元)。<sup>④</sup> 简言之,过去4年内,阿根廷所以能出口700亿至北方国家金融资本中心,适足以证明基什内尔路线仍然将不平等的跨国阶级结构持续地再生产出来(Damill and Frenkek 2009,22;Cano 2011)。

---

① 1990年新自由改革的结果,多国公司持续控制了总汽车出口的99%、总矿业出口的99%,以及总农业出口的62.4%——蔬菜油及谷物(Chudnovsky 2001,96)。

② 当前外债约占GDP的46.3%(Ministerio de Economia 2011)。2001年,私人退休金系统中76%的劳工退休金持有的是政府债券,但由于政府无力赎回致使公债违约,最后只得由信用违约互换出售者承接。(Castagno 2010,159—176)。10年后,国家退休金基金的57.8%系投资于政府债券(ANSES 2011)。超过35%的债券以披索计价,然而非官方的通膨率却是官方的3倍。这是说,未来的退休金持续地贬值。确实,政府并没有为了提高劳工退休金而操作国有退休基金,使私人退休金体系得利,若真的这么做和盗用劳工基金无异了。

③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s Censos(国家统计及普查局,INDEC)于2011年6月发布的报告(2012年1月15日在线阅)。

④ 如同La Nacion Informa报2011年11月8日的报道(2012年2月3日在线阅),在大Buenos Aires都会区,保守天主教教会的财产乃4倍多于官方统计所示。

固然,基什内尔路线对于国家形塑运动中人民民主的累积并非毫无贡献,如梅内姆赦免前军事首领罪责的政府命令被宣告无效了。同样地,扶助失业家庭养育孩童的最低补助编列了。此外,同性婚姻也批准了。还有,媒体民主化也部分地推动了。这些政策某种程度上都算是响应了公民及劳工的需求。一如某位积极参与 La Posta 小区广播的行动者在就媒体改革进行讨论时于国会所言,“我们相信,要回答我国民主何以在当前及 2001—2002 危机之后备受挑战,其解答必当往更广泛的角度去寻,即社会部门参与公共政策的管理、控制及执行的整体情况”(Farco 2009, 42)。<sup>①</sup> 在此,我的任务,还是去评估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的媒体改革(即 Law 26, 522)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捕捉并响应了人民民主在参与公共政管理、控制及执行方面的需求。

第一眼看来,这些媒体改革似乎很深刻地抓住了一般民众对于参与的需求。而新的法律(还有其他那些基什内尔路线进步的公共政策),也得到媒体进步分子、非营利媒体组织、人权团体、工会及学院中人的肯定(Baranchuk and Use 2011; Busso and Jaimes 2011)。这些公民社会的行动者为民主广电联盟(Coalicion paea una Radiodifusion Democratica)发展出进步性的纲领,并将这些不同的部门团结在一起,敦促采取基什内尔路线的政府必须要修改媒体立法。<sup>②</sup> 这个联盟推动的社会运动,与国际媒体运动者同调,目的是为了要将媒介定义为是公共利益的组织,并企图将传播视作是基本人权,并将媒介民主化(International Commisison 1980; Hackett and Zhao 2005)。在此,姑且先不论这个视角能否与资本主义系统相调和,此倡议确实有助于改变政治认知、为民主解放建立法律工具,并可作为松动商业媒体的骨牌。也就是说,奋力建立新的公共领域,对葛兰西所称、关系到长期在文化及政治解放上进行的“阵地战”有所帮助(2000, 225—228)。亦如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所论证的,一个有效运用公共领域概念的方法,就是去将它定义为“一组能实践民主、政治、社会及文化决策的社会过程”(2010, 152)。而我要说,此联盟所取得的成果,必须要策略地解读成:媒体改革为民主及社会主义者解放开创了新的视野。

---

① 阿根廷小区收音机论坛(FARCO),它代表了 80 家小区收音机电台,并倡议社会团结、民主、公开透明、多样性及多元。

② 该联盟重新组织了超过 300 个来自于公民社会的团体(例如:小区媒体、估会、人权组织及公立大学)。



因此,视听传播服务法的进步与否,应当视视听服务能否为公共利益喉舌、促进人们的传播权而定。<sup>①</sup> 确实,该法要求国家应当保障人们信息、参与及言论自由等权利。它强调,视听服务的目的在于鼓吹多样性、普及服务与参与。在自愿的视野上,该法保障了非营利媒体进入媒体场域的权利。更特定地说来,它要求国家在平等基础上就国有媒体、商营媒体及非营利媒体发出无线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及数字平台的执照,而非营利媒体正是要提供媒体服务给特定社群的公民社会组织(基金会、公民团体、教堂及工会)。进一步而言,法律自动许可公共大学、天主教教堂,还有原住民社群管理自己的视听执照。<sup>②</sup>

然而,就发展媒体民主的议程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按:针对商业视听服务的)新法也将受联邦政府控制的公共媒介及国有媒介机制给合并进来。特别是,即便将那些参与相关立法改革及新调控机构讨论的国会政治部门、工会代表、公立大学代表、原住民社群、人群团体都给算进来吧,在阿根廷的个案中,仍然是行政权透过调控机关 AFSCA(Autoridad Federal de Servicios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视听传播服务的联邦机关)执行法律。<sup>③</sup> 行政权及主要的全国性政团提名 AFSCA 的大多数委员:7 席中的 3 席。另外 4 席,其中 2 名代表,则由省级政府代表选举产生——但在阿根廷,正常情况是,赢得全国总统大选的政党通常也会赢得大多省级选举,并在国会中占居多数(见表 1)。同样地,法律并没有建立起任何机制,使国有媒体得以独立于国家运作,特别是,防止任何来自联邦政府的干预。<sup>④</sup> 国营的广播电台 RTA S. E. (Radio y Televisión Argentina Sociedad del Estado)管理了所有的国有媒体,然而,该媒体却大半还是由行政权及主要的全国性政党所控制。<sup>⑤</sup>

---

① 该法逾越了它的范畴。它声称与信息社会的发展有关,但根本上却涉及广电业、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因为它以节目表为基础定义了视听传播服务(第 4 条)。它既不调控因特网,也不调控电信,虽然在某一情况下,它将广电视为「行动接收者」(第 4 条)。相似地,它并未给予作为国家政策的数字电视平台(Televisión Digital Abierta, Open Digital Television)任何特殊考虑。简单地说,数字平台既经建立,调控措施、普及近用,以及民众参与爱应受到重视。这部法案实际上也太好高骛远(overcharged),竟然还详载了北方国家的种种立法呢。

② 截至目前为止,评估这些措施是否对媒介场域带来实质影响尚且言之过早。

③ 第 7 条。

④ 相对地,在其提案中,the Coalición por una Radiodifusión Democrática 也谈到,国家媒体必须为公共(2011,157)。

⑤ RTA S. E. 负责人任命的制度性机制与 AFSCA 的架构类似(第 119、132 条)。

表 1 管制机构(第 12—16,19,32 条)

- AFSCA 是个国家负责执行立法、研发技术规范及控制垄断行为的组织。
- 行政权任命 AFSCA 的 2 位官员;国会委员会则任命 3 位分别隶属于国会最大三个政治部门的官员;而 Consejo Federal de Comunicacion Audiovisual(CFCA,视听传播服务的联邦单位)则任命两名官员(一位必须来自于提供传播学位的公立大学)
- 关于 CFCA 的组成:两位代表由 23 个省级政府及 Buenos Aires 市所推选;3 位代表由非营利媒体工作者协会产生;1 位代表由公立大学广播电台产生;3 位代表由媒体部门的公会代表所产生;1 位代表由人权团体所产生;还有 1 位由原民团体所产生。
- CFCA 向 AFSCA 提供政策建议。
- 行政权可以在居民超过 50 万人的城市径以前述评选作业发出广电执照。
- 为民服务办公室(The Defence of the Public office)受理市民申诉。

另一个讨论的关键,是执照调控。如我所说,新立法基本上限制了先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采取的是将频率平等分配给商业媒体、国家及非营利媒体。它将原本单一广电业者可以持有 24 张执照的上限减为 10 张,也禁止视听服务提供商转让其执照。至于有线电视公司,最多可以持有 24 张执照,并且禁止有线电视持有广电执照(见表 2)。此外,法律强制规定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公司应播送拉丁美洲、国家、省级及地方的频道。<sup>①</sup>

表 2 执照调控(第 2,25,29,37,38,41 条)

- 视听频率资源平均分配给国家、商业及非营利视听提供者(每一类属的视听频率,均应平均分配予 3 个不同部门的服务提供者)。
- 执照不得转让。
- 卫星视听服务提供商(1 张执照涵盖全国)不能持有其他视听媒体的执照。单一视听服务提供商不可以持有超过 10 张以上的(无线)广播电视执照。运用有线电视网络提供付费视听服务的提供者不可管理超过 24 张的执照。
- 任何的视听服务不能有超过 35% 的全国观众触达率。
- 任何单一区域,1 家视听服务者不可以管理超过 1 家 AM 电台、两家 FM 电台及 1 家无线电视或有线电视执照。
- 有线电视公司不能传送超过 1 个为自己所有的有线电视讯号。
- 所有国立公共大学都会有 1 张收音机和(无线)电视执照。
- 所有国家机构和天主教堂也都有权利作为持照人。
- 每一原住民团体在其所在区域都有权利取得 1 张收音机及 1 张电视执照。
- 所有城市或州都有权利取得一张 FM 收音机执照。每个省份及首都 Buenos Aires 市均有权接收 1 张 AM 收音机广播执照、1 张 FM 收音机执照,以及 1 张(无线)电视执照。

基什内尔路线也因而声称,新法严格限制了媒介垄断,并且增加了多样

<sup>①</sup> 举例而言,在 26,522 法案后,有线电视公司必须要播送委内瑞拉电视频道 Telescur、国家电影频道 Incaa TV(阿根廷电影),以及儿童频道 Paka Paka,而这些频道的上架均使媒体多元性增加。

性。然而,真正的灾难是,对抗媒体集中化的官方论述可能是一场徒劳 (beating a dead horse)。换句话说,从马克思的观点视之,有必要强调媒体集中化乃是资本主义竞争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结果。马克思对此的解释是,当企业就生产引进更多科技去生产更多、更便宜的商品在市场上竞争,<sup>①</sup>则就单一商品及商品总体而言,就使用了较少的人工。<sup>②</sup>因此,利润倾向于下降。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及收益的论说是,此系直接剥削劳动者的成果。接下来的反趋势就是,企业需要将不变资本(固定资本、科技)的使用予以优化、强化对于劳动者的剥削,还有创造新的联合生产(Marx 1991/1894,317—375)。简言之,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纯”竞争乃是集中的反命题,但马克思展现了何以资本集中与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两者乃是辩证地相关(Shaikh 1991,76;Fuchs,381)。

因此,如果媒介调控并未妥为建立,必将无法限制“集中”,这是因为媒体公司有累积资本的需求。在此意义上,法令实在令人困惑:它一再提及要限制垄断,但是它同样明文要求 AFSCA 需要促进竞争与投资。<sup>③</sup>立法者并未考虑媒体竞争与媒体集中之间的张力,因为他们无意改变媒体资本主义的基础:对于集中的调控只是将人民民主需求加诸于既有体系论述及制度方案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新法仍然维持有线电视服务提供商只能拥有 24 张执照的规定,并授权卫星电视公司(目前为美洲多国的直播卫星电视)以 1 张执照提供服务给全国,此外,且允许报业与电子媒体公司间的跨媒介所有权,限制电话公司进入媒体市场之际,却允许有线电视公司(比如 Telecentro)提供电话服务,<sup>④</sup>而最终甚至允许任何资本主义公司在阿根廷签署的国际投资条约的基础上运作-即使同样的法令明文禁止外资取得阿根廷媒介公司的所有权,<sup>⑤</sup>原因如前所述,阿根廷所签署的国际条约较于国内法有着较

① 同前所注,这增加了资本的中心化及集中化。

② 剩余价值率,所指的乃是那些转移给资产阶级的无偿劳动除以必要劳动时间,后者即劳工花费以再生产其需求而最后以工资偿付的必要劳动时间-可变资本(Marx 1990/1867,320—329)。利润率也就是剩余价值与总体资本(可变资本及不变资本)在资本再生产循环中的关系(Marx 1991,132—140)。

③ 第 12 条。

④ Kirchnerismo 原本的方案乃是将允许电话公司进入有线电视市场。政府将该条文删除,是否系为了吸引中左阵营立法者的支持,抑或是考虑到目前控制有 9 成阿根廷电话市场的公司 Telefonica international 的权力因素,目前尚不明朗。

⑤ 外国资本不得控制超过任何视听公司股份的三成(第 29 条),但此限制在国际投资条约的情况下可不适用。

高的效力。

前述有线电视执照的例子值得仔细思考。新法允许有线电视公司在不同区域持有 24 张执照；然而，它并未界定究竟是哪些区域。<sup>①</sup> 也因此，有线电视公司可以运用政治压力依照他们的利益去界定这些地区。在此意义上，到底 Daniel Vila 可以透过他旗下全国第二大有线电视公司欧诺集团 (Grupo Uno) 掌控多少张有线电视执照？尚可从这位所有人发出的平面声明中略见端倪 (De Santis 2012)。拒斥该公司掌管的执照多于法定数量，Vila 认为，新的媒介调控制度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调控将门多萨市 (Mendoza) 周边地区、所有由该集团依执照进行管理的有线电视市场并计为一区。结果是，26.522 号法律出台后，该集团目前反而以较少张执照就能许可与过去相同的视听服务范围。接着，新法还在行政及司法方面为公司开了大门。这同样可见于第 161 条规定，该规定给予公司 1 年的缓冲期依新法进行调整或于必要时减资。然而号角集团却拒绝此一立法，目前并借由法律手段停止该法之施行。

因此，可能的情况是，媒体集中化的未来，还是得看行政权及司法权是否仍将偏好特定的媒介集团却牺牲其他人的情况而定。此理甚明，我们也可从号角集团的例子得知。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刻正要求该集团进行减资，然而该集团在新法施行前，却是基什内尔政府核可其取得 Multicanal 这家有线电视公司，并使该集团得以触及 47% 的有线电视观众 (Laboratorio de Industrias Culturales 2011)。总结而言，与媒介部分民主化一致，基什内尔路线的精神乃是要建立国家-商业媒体联合，这可以见诸于公共政策第 153 条规定，依该条规定，行政权“必须采取能促进国家视听联合形塑在所有类型及平台均得以形塑及发展的政策，并使所有经济行动者、公共机构、私人组织及学院机构在有利竞争的情况下<sup>②</sup>进行对话、合作及商业组织”。然而，此一国家与资本家的汇流，却持续为非营利媒体行动者及生产者所拒。举例而言，AFSCA 近期已对授予新国家数字平台执照一事实行竞标程序。然而，非营利媒体组织却也断言，他们既无法负担参与竞标所需的费用，也无力支付国家要求在该平台上播送所需的上架费 (Faro TV et

---

① 管制机关可以决定持照者的地理及人口细致 (第 45 条 c 项)。

② 调节媒体多样性及商业的需求当然不仅见于阿根廷。即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多样性声明也是暧昧模糊 (2002)。它说，文化财——具有认同、价值及意义的向度，必不能只被当成是商品或消费财 (第 8 条)。易言之，文化财仍然被视作是有商品的成分。

al 2011)。他们声称,新的媒体政策实际上“强化了国家而非小区”:而唯一能从新数字平台获利的非营利媒体组织,乃是那些隶属于那些与国家牵扯不清而较为有力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媒体组织(比如,部分保守的工会)(CoorDe-CAAP 2011)。<sup>①</sup>

#### 四、重返民粹主义(populism)

劳工与资方之间没有冲突、国家与外资之间也没有冲突。(National Deputy, A24 Television, 2011)

就马克思取径而言,从基什内尔路线及其媒体政策中提取理论意义有其重要性。我的论点是,基什内尔路线就既有的国家形成加添了人民民主的元素,其作法是去论述人权、媒体民主化、团体协约及社会安全的需求。这包含了对公民进行部分的民粹主义动员。如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述,民粹主义是种政治建构的形式,此形式并以论述及动员平民需求以对抗漠视这些需求的制度化组织为特色。这些需求固然相异,但他们对于建置化的合法现状有着共同的不满。如拉克劳所说,当被剥夺的大众(Plebs)要求要成为整体社群(populus)中的一分子,属于人民的民粹主义抬头,而这在政治场域形成一堵共同战线来对抗那些人民之敌。而当政治主体集体化(collectivizing)或“霸权化”(hegemonizing)那些异质却与平等相关的人民需求,整体社群于是产生质变(2009, 150—151)。更重要的是,整体社群不再是一个事先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重新任命领导人的行动结果。只有当某位领导人能够将人民的需求给凝结在一起,并且动员整体社群去挑战那状似不可或缺之现状,质变才有可能发生(Laclau 2009, 128—130)。<sup>②</sup>举例而言,在阿根廷,基什内尔乃是以对抗新自由主义及独裁残余痕迹、代表响应人民需求的领导者之姿出线。然而,一如基什内尔所承认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建构的形式,可以不同政治运动的样貌出现(2009, 29)。基什内尔晚期对于民粹主义的著作倾向不再强调阶级论述,但我要说,从马克

<sup>①</sup> Coordinadora en Defensa de la Comunicación Comunitaria, Alternative y Popular(保护小区、另类及人民传播组织)。CoorDeCCAP 集结了大约六成的非营利媒体组织。

<sup>②</sup> 举例而言,Peron 将其人民主义及现有的国家资本主义方案相连结。

思主义者视角发展民粹主义的理论,考虑阶级仍有其必要。

在此意义上,我认为,观察基什内尔路线如何在其阶级政策中论述其民粹主义的逻辑,有其重要性。换句话说,基什内尔路线需要解决民粹主义建构及资本主义再生产角色之间的张力。该政策的支持者固然可能会透过在修辞上夸大该政策与现状间差异的方式寻求解套。举例而言,基什内尔路线在为其媒体立法辩护时,所持理由是该立法消解了独裁时期的媒体立法及号解集团的垄断。然而,要以修辞化解结构上的断裂已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基什内尔路线必须要寻求一制度-意识形态的安排,祈使民粹主义的论述与资本主义的目标,得以相结合。举例而言,一如前述,新媒体立法鼓吹国家-商业的联合。它同时要求视听服务提供商播送一定比例的阿根廷内容,其目标既在于强化一国媒体产业实力,并在增加视听领域内的就业(见表3):

表3 视听内容(第65,67条)

- 在收音机广播总播送音乐及内容方面,所有电台音乐应该要播送30%的本国音乐,而所有音乐与内容广播中必须有70%是本国内容。本国音乐当中,其半数所有权人必须是阿根廷音乐家,他们可以将其音乐商业化。
- 在电视频道总播送节目方面,频道必须播送60%在阿根廷产制的节目。在那些最大的城市,所谓的独立生产者(不具备频道所有权的内容生产者),必须产制总电视频道节目的30%。
- 电视频道及收音机广播必须自制播送总节目的30%及50%。
-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必须要传送那些属于国家、公立大学还有各省及 Buenos Aires 的地方政府频道。
- 主要电视频道(指那些超过人口20%的频道)每年必须要播送8部新制的本国电影或3部新制的本国电视电影。

为促进本地媒体产业,基什内尔路线还可以在意识形态上将民粹主义修辞与国家既有的资本主义目标相调适。<sup>①</sup>当然,在将本地内容视作是对抗或至少平衡北美或欧洲商业媒体扩张的文化意义上,这些制度设计仍有其进步性。<sup>②</sup>然而同一时间,它也将国家媒体产制者、非营利媒体及小型商业生产者的内容统合进资本主义媒体工业里。透过这种方式,本国文化产业

① 不言而喻的是,本国内容与军人政府时代的国家-压制性文化工业不同。举例而言,新国家电视 Encuentro 频道或 Incaa 频道还会播送那些挑战计有社会的社会抗争纪录片或电影。

② 关于美国及欧洲媒体的全球扩张,可参见,例如 Herbert I. Schiller(1992/1969)、Armand Matterlart 和 Seth Siegelau(1979),还有 Lee Artx 和 Yahya R. Kamalipour(2003)。

的政策也透过增添商业媒介使用价值的方式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这乃是当代文化非常普遍的过程(Crawford 1992, 15)。相对地,这样的议程对务实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应属可欲,也就是善加利用国家推动本地内容的良机,去敦促国家推动真正的公共有线电视频道或公共数字平台,使其上的文化产品得以民主地发展。

但如果这并没有发生,基什内尔路线的威胁还会在于,当誓言要推动民粹主义,自己所吊诡地推动的,还会类似于马克思观察到的、路易波拿巴之例(Bonapartist)——私有财产及劳工阶级需求间的结构性对立,出口竟在威权主义。<sup>①</sup>依马克思所记,路易波拿巴的前车之鉴,正好是威权政权想要同时保全国家及私有财产,使二者不受社会主义革命之席卷,为此,国家也就消减了资产阶级的权利。当然,这与基什内尔路线不能模拟-举例而言,2011年,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获取了50%的选票而胜选-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人权团体谴责这个政府一意孤行走上歧路<sup>②</sup>。然而,每当思及国家所做的、复杂而令人困惑的种种安排,即便改变了私有财产契约,却无不在允许国家持续再生产出国家霸权及资本主义发展,都让我确实想用这个词来模拟。这种波拿巴式的扬汤止沸(*fuite en avant*),于是创造出我所说的、资本主义及国家威权的灰色地带。而这个灰色地带,正是在公民的民主控制之外。

一个发生在媒体场域的个案是——“人人足球”(Futbol Para Todos)这个电视节目;足球是阿根廷最受欢迎的运动,并且是国家认同的象征。2009年,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突然与阿根廷足协(AFA)达成共识,以巨额税收支付播送足球比赛。阿根廷足协于是打破先前与TyC/Cablevision(TV Publica)的协议,足球赛事的电视转播也因而转至国家的调控下。目前,公共电视频道(TV Publica)业将足球媒体赛事免费向国民转播,而这些比赛,原先仅提供TyC Cablevision的订户付费收看。“人人足球”可以视为是基什内尔路线向人民民主迈进的重要一步,是将先前为私营媒

---

<sup>①</sup> 在雾月十八中,马克思观察到,波拿巴(Bonaparte)在行政部门累积的权力,乃是以公民社会及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制为代价,然而,这却保障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请见 David Held(1991, 147—150)。

<sup>②</sup> 最受争议的,乃是政府近来对恐怖主义所引进的立法。依据 CORREPI(Coordinadora Contra La Represion Policial e Institucional, 反抗警察级制度性压迫组织),国家可以运用该新立法压迫社会抗争及劳工罢工(CORREPI, 2011)。

体“绑架”的“失分”给追回——这是暗示军人集团先前犯行的双关语。然而，在由国有电视频道转播该节目之后，却是由一间亟欲进入全球媒体市场、角逐资本的媒体公司(La Corte)担纲制作<sup>①</sup>。这种国家—商业的模糊联盟在其他场域也可看见。比如，政府对于官方通胀统计的操弄，对于政府发行公债的财务固然有利，但这却是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当政府支持北方国家那些从开放矿坑撷取自然资源的矿业公司，那些矿业却招致在地小区及生态运动的抗议(Svampa and Antonelli 2009)。此外，这样的模糊地带，亦可见于国家为某些输出资本的公司所提供的设备里、在国家对无效率铁路系统的补贴里、在政府运用国有退休金基金以资助资本并平衡财政收支的挪移里、在政府将国家广告挹注于与官方政治立场相近的媒体集团里，或者，在那些将基础建设售予国家的私人公司所组成的新兴的新媒体集团里。<sup>②</sup>

## 五、结 论

一如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他对列宁(Lenin)和丹尼尔·班萨义德(Daniel Bensaid)(Lenin 1965; Bensaid 2004)的解读中所观察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政治领域的特性在于它乃是权利样态递嬗转变的竞技场，竞技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对抗、矛盾与斗争，都被偷换为新的语言，在如簧之舌间被错置、压缩或不经意泄露(Callinicos 2012)。马克思对国家权力之不信任，使他在谈到政治领域的行动时，总是嘲笑政客惯于装模作样、自我欺骗，并对于自身行动的局限性视而不见(1978/1852, 598)。阿根廷也不例外：国家政治领域内的行动者来来去去，但在这舞台上扮演的剧目似乎只是那几套在周期性地更替：爱国威权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我的论点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形式，注定是要隐藏国家真正重要的结构，也就是它必须是代表一般大众及国民作为公民之利益的机构，然而它也同时再生产出跨国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以北方国家为中心之际，却使这

① 可见，例如，El Cronista 在 2012 年 1 月 13 日的媒体报道(2012 年 2 月 1 日在线阅)。

② 关于政府对国家统计数字的操控，可见由一群心思缜密的公立大学经济学家组成的 Plan Fenix(Plan Fenix 2012)对信息权所发的声明。有关铁路公司补助增加，可见 Mario Damill 及 Robert Frenkel(2009, 64)。有关政府广告在不同媒体间的不均分配，举例而言，可见于相关报章报道(2012 年 1 月 15 日在线阅)。这份报道乃以公开信息为基础。而参与媒体场域的国家基础建设提供者，则是企业 Electroingenieria。



个国家的不幸增加,因而,也就引发了公民及劳工对于国家及资本的抵抗。这一切在葛兰西所说的有机危机时期,还再明显不过了。而在阿根廷的例子里,则发生在约摸是1970年代及2000年早期。在此意义上,截至目前为止,基什内尔路线在处理2001—2002年间国家统治合法性崩溃的危机上尚称成功。本文以辩证的理解进路看待国家政治,因此考虑到党政干部队伍能主动地与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结合(Miliband, 1969),并且也注意到国家在构建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上扮演的结构性角色,这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可起互补作用——而这,正是我在本文所采取的视角。

更进一步而言,考虑前述之国家意识形态,我认为,媒体场域乃是个根本的场域,国家通过操作媒体以遮蔽内部的核心矛盾。这个领域乃是个政治斗争的场域,但当独裁政权完全以强制作作为代替霸权时,另当别论。而我在此欲强调的,还是阿根廷政府及政权用不同方式所欲否认、隐瞒或错置的,也就是1970年代与1990年晚期与资本主义危机及政治动荡有关的社会对立。如我所示,由军事独裁政权所建立的国民威权媒体管制、梅内姆政府所建立的新自由主义媒体调控,还有基什内尔路线的平民—资本家政策(populist-capitalist project),在管制及意识形态上各有其特色(按,但都同样有其遮掩作用)。而我相信,通过这个取径,我们对于阶级统治、政治生活及媒体转型之关系的看法,就不会流于机械化:独裁政权限制了媒体中的资本力量,然而它也镇压不同意见而独厚资本家利益;梅内姆政权尽管大开言论空间广纳大众不满,但它鼓吹市场带来的财富并没有转移给工人的日常生活享用;而如果基什内尔路线所局部诉求的人民民主需求,不再能超越媒体改革的意义、不再能调控劳动者与跨国资本的冲突、不再能在商业活动与国家威权之间那启人疑窦的灰色地带找到迂回空间,其支持者可能将亲眼目睹其调控的成果化为乌有。

### 参考文献:

Althusser, Louis. 2001/1970.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Notes for an Investigation.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Louis Althusser, 85—126.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NSES. 2011. *Fondo de Garantía de Sustentabilidad del Sistema Integrado Previsional Argentino, Informe Mensual Octubre*. Buenos Aires: ANSES.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2. <http://www.anses.gob.ar/FGS/politicastransparencia/archivos/informes/Bole>

tin\_FGS\_11\_2011. pdf

Artz, Lee and Yahya R. Kamalipour, eds. 2003. *The Globalization of Corporate Media Hegemon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rtz, Lee, Macek, Steve, and Dana L. Cloud, eds. 2006.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New York: Peter Lang.

Baranchuk, Mariana, and Javier Rodríguez Usé, eds. 2011. *Ley 26. 522: Hacia un Nuevo Paradigma en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 Buenos Aires: AFSCA and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omas de Zamora.

Bensaïd, Daniel. 2004. *Une Lente Impatience*. Paris: Stock.

Busso, Néstor, and Diego Jaimes, eds. 2011. *La Cocina de la Ley: El Proceso de Incidencia en la Elaboración de la Ley de Servicios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 en Argentina*. Buenos Aires: FARCO.

Calcagno, Alfredo Eric. 1988. *La Perversa Deuda*. Buenos Aires: Legasa.

Callinicos, Alex. 2012. The Crisis Wears 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133). Accessed February 1, 2012. <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773&issue=133>

Cano, Fernando. 2011. Dudas Argentinas. *El País*, October 30.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2. [http://elpais.com/diario/2011/10/30/negocio/1319979149\\_850215.html](http://elpais.com/diario/2011/10/30/negocio/1319979149_850215.html)

Castagno, Pablo Andrés. 2010. "The State Crisis in Argentina: Global Fantasies and National Containment." PhD dis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Castells, Manuel.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CEPAL. 2002.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antiago de Chile: Naciones Unidas.

Chudnovsky, Daniel, and Andrés López. 2001. *La Transnacionalización de la Economí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EUDE-BA/CENIT.

Coalición por una Radiodifusión Democrática. 2011. 21 Puntos Básicos por el Derecho a la Comunicación. In *La Cocina de la Ley: El Proceso de Incidencia en la Elaboración de la Ley de Servicios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 en Argentina*, edited by Néstor Busso and Diego Jaimes, 155—161. Buenos Aires: FARCO.

CONADEP. 2003. *Nunca Más: Informe de la Comisión Nacional sobre la Desaparición de Personas*. Buenos Aires: CONA-DEP.

COORDECAA. 2011. Comunicado de Prensa? Qué Está Concurando AFSCA? *Buenos Aires: CoorDeCAAP*.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argentina.indymedia.org/news/2011/11/799065.php>

CORREPI. 2011. Comunicado de Prensa: Leyes Antiterroristas. *Buenos Aires: COR-*

REPI.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correpi.lahaine.org/?p=1103>

Crawford, Margaret. 1992. The World in a Shopping Mall. In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edited by Michael Sorkin, 3—3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Damill, Mario and Roberto Frenkel. 2009. Las Políticas Macroeconómicas en la Evolución Reciente de la Economía Argentina. Seminarios de Economía No 112. Banco Central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ccessed February 28, 2012. [http://www.bcra.gov.ar/pdfs/investigaciones/PaperFrenkel\\_Damill.pdf](http://www.bcra.gov.ar/pdfs/investigaciones/PaperFrenkel_Damill.pdf)

De Santis, Juan Pablo. 2012. Daniel Vila: Los Medios Mensajeros de la Ideología Tienen Una Pauta Importante. *La Nación*, February 2. Accessed February 7, 2012. <http://www.lanacion.com.ar/1444898-daniel-vila-queremos-un-desguace-de-cablevision-y-multi-canal>

Duménil, Gérard, and Dominique Lévy. 2004.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RCO. 2009. Nueva Ley de Medios Audiovisuales; Desafíos Para los Medios Comunitarios y Populares. Buenos Aires: FARCO.

Faro TV et al. 2011. Carta a AFSCA: Televisión Digital? Para quién es la democratización?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2. <http://argentina.indymedia.org/news/2011/07/788002.php>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Studies: Karl Marx and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369—402.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Garnham, Nicholas. 1979.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2): 122—146.

Gramsci, Antonio. 2000. *The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Graña, Juan M., and Damián Kennedy. 2008. Salario Real, Costo Laboral y Productividad, Argentina 1947—2006. *Documentos de Trabajo* 12. Buenos Aires: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Población, Empleo y Desarrollo. Accessed January 10, 2012. <http://www.econ.uba.ar/www/institutos/economia/Ceped/publicaciones/dts/DT%2012%20-%20Grana%20Kennedy.pdf>

Hackett, Robert A. and Yuezhi Zhao, eds. 2005.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Harvey, David. 1991.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eld, David. 1991. *Modelos de Democraci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1980. *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London: Kogan Page.

Horkheimer, Max. 1989/1932. Notes on Science and the Crisis. In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edited by Stephen E. Bronner and Douglas M. Kellner, 52—57. New York: Routledge.

Laboratorio de Industrias Culturales. 2011. Una Aproximación a las Industrias Culturales. Buenos Aires: Secretaría de Cultura.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lic.cultura.gov.ar/investigaciones/industrias/index.php>

Laclau, Ernesto. 1978. *Política e Ideología en la Teoría Marxista: Capitalismo, Fascismo, Populismo*. Madrid: Siglo XXI Editores. English version: Laclau, Ernesto. 1977/2012.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London: Verso.

Laclau, Ernesto. 2009. *La Razón Populista*. Buenos Aires: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English version: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Lenin, Vladimir I. 1965. *Collected Works, Volume 32*.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Lozano, Claudio. 2005. *Los Problemas de la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y el Crecimiento en la Argentina Actual*. Buenos Aires: Instituto de Estudios y Formación de la Central de Trabajadores Argentinos.

Lukács, Georg. 2000/1923.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Marx, Karl. 1978/185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594—617.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Marx, Karl. 1978/1867. Capital, Volume One.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294—438.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Marx, Karl. 1978. Crisis Theory.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443—465.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Marx, Karl. 1990/186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1/1894. *Capital Volume III*.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2/1885. *Capital Volume II*.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8/1845.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German Ideology*, edited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572—574. Amherst: Prometheus.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8/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469—50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98/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Amherst: Prometheus.

Mattelart, Armand and Seth Siegelaub, eds. 1979.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1: *Capitalism,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cChesney, Robert W. 2007.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Miliband, Ralph. 1969.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2011. *Deuda Pública del Estado Argentino*. Buenos Aires: MECON. Accessed February 24, 2012. [http://www.mecon.gov.ar/finanzas/sfinan/documentos/informe\\_deuda\\_publica\\_31-03-11\\_espanol.pdf](http://www.mecon.gov.ar/finanzas/sfinan/documentos/informe_deuda_publica_31-03-11_espanol.pdf)

Mosco, Vincent. 201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1973.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0: 205—234.

O'Donnell, Guillermo. 1984. Democracia en la Argentina Micro y Macro. In *Proceso, Crisis y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edited by Oscar Oszlack, 13—30.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O'Donnell, Guillermo. 1988.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Argentina, 1966—1973,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ficina de la CEPAL en Buenos Aires. 2010. Evolución de la Desocupación en Algunas Áreas Urbanas. Buenos Aires: CEPAL. Accessed January 21, 2012. <http://www.cepal.org/cgi-bin/getprod.asp?xml=/argentina/noticias/paginas/9/9839/P9839.xml&xsl=/argentina/tpl/p18f.xsl&base=/argentina/tpl/top-bottom.xsl>

Plan Fénix. 2012. Derecho a la Información. Página/12, February 14. Accessed February 14, 2012. <http://www.pagina12.com.ar/diario/economia/2-187536-2012-02-14.html>

Portantiero, Juan Carlos. 1974. *Dominant Classes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Argentina Toda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3): 93—120.

Portantiero, Juan Carlos. 1977. Economía y Política en la Crisis Argentina: 1958—1973.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39(2): 531—565.

Poulantzas, Nicos. 1969.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58): 67—78.

Poulantzas, Nicos.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Pousadela, Inés M. 2008. Participation Vs. Representa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ighborhood Assemblies of Buenos Aires. In *Democratic Innovation in the South: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Ciska Raventós, 71—122. Buenos Aires: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Rapoport, Mario. 2003. *Historia Económica, Política, y Social de Argentina*. Buenos Aires: Ediciones Macchi.

Sarlo, Beatriz. 1994. *Escenas de la Vida Postmoderna: Intelectuales, Arte, y Videocultura en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Ariel.

Schiller, Herbert I. 1992/1969.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 Boston: Beacon Press.

Shaikh, Anwar. 1991. Centraliz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In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76—77.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Smith, Paul. 1997. *Millennial Dreams: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North*. London: Verso.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1—27.

Solanas, Fernando. 2004. *Memoria del Saqueo*. Directed by Fernando Solanas. Buenos Aires: Cinesur S. A., ADR Productions, Thelma Film AG.

Sourrouille, Juan Vital et al. 1985. *Transnacionalización y Política Económica en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CET.

Svampa, Maristella, and Mirta A. Antonelli, eds. 2009. *Minería Transnacional, Narrativas del Desarrollo y Resistencias Sociales*. Buenos Aires: Biblos.

UNESCO. 2002. Declaration Universelle de L'unesco sur la Diversité Culturelle. Paris: UNESCO.

Wayne, Mik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Press.

艾尔番·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sup>①</sup>

##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 位置及传播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sup>②</sup>

冯若谷(译),朱清河、范松楠(校)

[导读]本文采取量化研究方法,对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对“马克思”一词的使用状况进行抽样分析,研究发现,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正有意或者无意地避开马克思所关心的关键议题,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扭曲,甚至彻底违背了马克思对于传播问题的主要观点。此外,本文做了大量扎实、细密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多部著作的详实梳理,分析了马克思对于传播问题的相关论述。这些真知灼见虽然散落在不同的著作和章节之中,但其对于传播历史、现状和本质的理解和判断,不仅仅是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更包含了对于当下传播世界的深刻洞见。可以说,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对于“马克思并不关注传播”的有力回击,更是一次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重新发现。

[摘要]本文的研究目的为:(1)通过调查学术出版物中学术研究的特点来检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导思想的理论主张论述;(2)通过再现和评估马克思有关传播方面的著作以证明马克思不关心传播这一论断的错误。本文结合了质化和量化两种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包括两部分研究

---

① 土耳其加辛大学(安卡拉)传播系教授,其著作设计打造传播的理论、方法、意识形态、文化与政治经济。近来其著述主要集中于当下媒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导向,以及一本关于电视节目本质的研究著作。erdogan.irfan@gmail.com,http://www.irfanerdogan.com

② 本文是正在进行中的一项研究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关注当前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导向。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资助了该项目的数据收集工作。另外,作者感谢 Secil Kentel 和 Hakan Ugurlu 对本文的校正工作。

总体并采用多重抽样。其一,传播学期刊收录的论文。这些期刊均被汤姆森路透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引用。其二,马克思关于传播的所有论述。研究发现表明(1)这些论文大都是对于统治阶级利益有助益的;(2)它们大都排除了马克思以及很大重要议题,这些议题关乎统治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模式以及在传播和社会中的交往关系;(3)大多数另类的研究方案都是被控制的路径选择,这些方案明显地或隐秘地违背了马克思的方法和解释在马克思对传播的兴趣问题上,与那些认为他对传播没有或很少有感兴趣的判断不同,马克思提供了关于传播的非常宝贵的解释。因此,如果想要了解传播在社会和社会变迁中的本质和功能,传播学者应当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给予密切的关注。

[关键词]传播研究,传播理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传播学期刊

## 一、引言:研究主题与基本原理

纵观人类历史,控制思想以及精神产品的生产、分配与使用始终都是统治力量的核心关注和实践范畴之一。随着不平等、压迫和权力与财富的不公正分配日益深化,组织化生活也日趋复杂,对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在广度和深度上已经扩展至生活的各个方面。在21世纪,这种控制已经成为一个持续的恶梦,以至于对思考、感受、信任和行动的内容、原因和方式等的管控,已扩展到了不分年龄的所有人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从第一个远古帝国到封建时代的没落,精神思想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一直被神学的和政治的权力中心所控制,这些权力中心不仅占有大众的身体和灵魂,还占据着物质财富。之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由”时代到来了,全奴隶和半奴隶发现他(她)自己从拥有者或主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了,他们被放逐在大街上,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谋生,他(她)的自由到头来变成了奴隶主不必养活奴隶的自由。他(她)的自由成为了一种新型奴役,旧的奴役被工资奴隶所取代。他(她)再也无法得到食品、衣物和房屋的保障。在教堂和城堡之内或之外,为神学和政治权力的利益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们要更幸运一些,因为新的机会越来越多,不断地出现在传统精神生产的范围之外,比如数量稳步上升的学院、大学,以及大众媒介。在知识生产方面,有两个领域快速扩张且变得重要起来:(1)公司的研究部门和公司的研究机构;(2)公立和私立大



学。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权力开始逐渐感受到,全面控制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是很有必要的。在同封建主义斗争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宣扬并十分强调思考和表达的自由。而一旦人们在资本主义系统中要求自由、平等和正义,它就马上成了对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当新自由主义政策出现之后,这种控制机制在全世界得到了强化。这种强化主要来自于以下措施:(1)学校的私有化;(2)大众教育的边缘化;(3)对于课程和教育政策的修订;(4)为符合公司的需要,将大学教育降低到职业教育的层次;(5)建设诸如博洛尼亚协议的项目,以符合服务于特殊利益的区域或全球标准;(6)把学术研究与以人类发展为目的的批判研究剥离开来,并使其倾向于制度利益和公司利益;(7)通过由制度的、地区的、国家的以及区域和跨国组织提供的物质资金奖励,来诱导学者们趋向于功能性导向的研究;(8)通过一些奖励和惩罚机制,也借助于垄断性控制学术成果的生产、分配和提升,包括限制那些已受控制的另类方案的传播和广泛分配,某些理论和方法的路径被视为主导而其他的理论和方法路径则被边缘化。无论如何,当下主流的传播学术导向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目标:(1)攀登学术阶梯;(2)在大学环境中,维护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的现行主流系统;(3)得到由大学、国家组织、本地/区域/国家或跨国基金会、大众媒介和公司构成的利益关系网络的接受、承认和支持。当前的主流结构及其被控制的路径选择是一个历史的状态,充满了控制与反抗。它构成了结构、结构化的交往关系以及知识生产的制度中不断强化的政治、经济和知识危机的背景。当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事实呈现的量化研究取向都始终坚持为工业利益服务时,新出现的以“后”作为其名称前缀的研究路径通过对相对性和特殊性(他们通过微原子化对此进行解释)的极端强调,通过忽略或拒绝社会关系规律及其结构、变化和历史特点的完整性,对主流工业生产模式和关系给予合理化、合法化与神秘化。

有不少实用主义的研究也支持大学与工业结构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研究正在增多(如 Schiller 1974; Gans 1975; Gorz 1980; Berube 1995; Martin 1998; 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 Cerwonka 2009; Domenech 2009)。

所有的这些阐释都在表明:对于精神生产的控制是存在的,这种控制依靠将个人利益和统治利益结合起来的众多机制来实现。而且,这种控制覆盖了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通过专业实践和专业意识形态来实现,而且通过使用者的选择来实现,这些选择深受生产、分配和使用特点的影响。这些

历史性的结构化关系模式恰符合马克思(Karl Marx)的理论解释。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Marx 1969,39)<sup>①</sup>

通过使用“一般地”(generally speaking)、“统治”(ruling)和“统治、支配”(dominance)这样的词语,马克思清晰地排除了那种通过全面控制将个人和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的单向因果关系。如果存在此种单一方向的决定方式从而能够全面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那么,不仅斗争的思想是无效的,而且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也无法实现。如果资产阶级无意于控制精神生产的方式和内容,那么也就不会有对于思想和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制;土耳其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也不会监狱中等待判罚长达四年之久;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后现代的公民专政”时也不会沉默和冷漠;媒体也不会对世界各地的压迫行动和社会不公采取默许的态度;大众也不会这样安静和顺从;媒体人、知识分子和学者也不会大谈“参与式民主”,却在决定自己薪水方面毫无影响力;他们也不会与社会统治力量结成同盟。同样,也不会有广告和公关这样的行业出现。广告商、诸如中央情报局般的机构或者类似于洛克菲勒、福特这样的基金会也不会为操控思想而花费上亿美元的资金。

通过上面的理论推理和论断可知,控制与支配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本质中得以呈现。在那些期刊文章中,控制与支配的形成与持续,不仅强调包括特定理论导向在内的议题,充分支持功能结构主义,而且着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的真正结构进行排除、边缘化和扭曲。本文指出的

---

<sup>①</sup> 中文摘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页。——译者注

是,通过控制生产和分配过程来控制传播,它所蕴含的不是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而是体现出存在着控制与斗争。社会中所有的思想不是也不可能全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更进一步来说,每个人在不同的层面都有着支配性的、冲突性的或者敌对性的思想。也不是任何一点支配性的或者敌对性的思想都是正确或者错误的。在此,要点是,控制与斗争的思想之间具有联系这一本质。它要探讨的是(1)那些期刊文章研究的支配性理论和主题的导向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功能性的;(2)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议题在传播领域大都被排除了;(3)大部分的替代理论都不指向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相反,它们彼此反对而又受控于、服务于资本主义,并且特别反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而且(4)马克思的思想以一种错误的或伪造的形式出现,或者被贬低,声称马克思对于传播没有或几乎没有贡献。<sup>①</sup>

本文有三个基本目标。第一是检验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学术文章,哪怕是大量的定量研究中,都有特定的、支配性的理论和主题导向。这种导向的存在恰恰意味着有一种支配性的主体间性,它为特定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服务。即使每个人都说地球是平的,地球也不可能是平的,而这种论断只能为功能合理性发挥辩解作用。

第二个目标是阐明《媒介和传播研究》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议题大都被排除了,即使有文章提到了马克思,他也会遭遇各种原因的批评或负面评价,被全面地或部分地无效化处理了。排除和边缘化马克思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路径是错误的、没有价值的或者没有贡献的;相反,这只能意味着在错误论断的帮助下,马克思的路径因此被成功地忽略和排除了。这种排除和边缘化也表明和证明马克思对于统治思想总体特征分析的正确性。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马克思是错误的,而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议题不符合另一种关于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相互关系和思想观念的结构。它们会威胁支配性的活动。这不禁令人想起《纽约时报》的信条:“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

第三个目标是展示出那些对排除马克思起到辩解作用的虚假的论断:“对于传播,马克思什么都没说。”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检验(1)研究课题的统计基础,(2)马克思和

---

<sup>①</sup> 福克斯(Fuchs 2010a)对这种站不住脚的论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答案,他分析了马克思对于传播的论述并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生产、流通和消费/接受的聚焦将其系统地呈现了出来。

马克思主义在被分析文章中的呈现,这些文章刊登在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引用的传播学期刊中。

本文的第二部分呈现并探讨马克思的传播思想。以此来表明,与普遍的论断相反,马克思对于传播有相当多的论述。

笔者在题目中使用“失踪的马克思”是为了表明:(1)马克思在“声名卓著”和广泛发行的期刊中被忽略了;而且(2)传播学领域怀念(missing)(需要)马克思。这是因为(1)马克思研究路径的价值;(2)特定产业导向的主流研究路径忽略了并扭曲了重要的社会和学术问题;(3)人们思维理解能力有限或者因为懒惰而不愿花费时间阅读能够驱动人们思考的东西,从而使“超市读物”蔚然成风;另外(4)舆论领袖在传播学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不幸的是,“学术风尚来去匆匆,学院在这种随波逐流中形成同谋,新的领袖出现又隐没”(Tomaselli and Shepperson 2010,52),但他们的遗产与劣质作品却留了下来。由“肢体语言”、“神经语言程序”、“对去语境化和去历史化的后结构主义、后学科的毫无怀疑的采用”等形成的神秘化正在日益蚕食传播学领域。<sup>①</sup>

## 二、本次研究的理论基础

像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W. Smythe)、阿里埃尔·多夫曼(Ariel Dorfman)、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彼特·戈尔丁(Peter Golding)、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和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等这些在上世纪60年代及后来几十年间正派而受人尊重的学者,以及近些年来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麦克切斯尼(Mc Chesney)、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斯图亚特·艾温(Stuart Ewen)、李·亚池(Lee Artz)、尼克·戴尔威瑟福(Dyer-Witheford)、理查德·马克斯维尔

---

<sup>①</sup> 至1975年,我已经在普度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学习了传播学、政治学和研究方法的课程(自1971年起)。但我从未在传播学课程和书本中听过马克思的名字。搜索后我发现了达拉斯·斯迈思的名字,我写信给他告诉他我所在的学校的传播学课程中马克思是不存在的,并请求他帮我找到马克思在传播方面的论著。他给我打电话并告诉我赫伯特·席勒的名字。于我而言,这是“马克思失踪”的终结,因为这二位推荐给我的正是我一直寻找的。受普遍支配性的敏感和利益影响,我们把马克思、切·格瓦拉、斯迈思、席勒以及其他所有致力于为人类的解放和尊严斗争的人的“心灵与智慧”都忘却了。

(Richard Maxwell)等这样的学者,都表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死去,而且与传播紧密相关。

马克思的论著和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生产和散播也是为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一部分。根据马克思对传播的兴趣,费彻尔(Fetscher 1969)和帕多瓦尔(Padover 1974)出版了一本马克思论述出版自由和审查制度的文集。国际大众媒介研究中心的两本关于传播和阶级斗争的著作,以及一本马克思论述传播方法的著作都是这方面的杰出成果。这些书仅仅存在于像我这种人的私人图书馆中,而不是在书店或者图书馆里。这个现象并非巧合。

本研究依据的理论框架完全来自于马克思,所以它并不是什么古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自治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或者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本文采用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试图阐明,在顶尖的传播学刊物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支配性传统和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导向研究的故意边缘化。本文通过呈现马克思就传播的各个方面和/或者各个类型的论述来探讨马克思对于传播的研究路径。这种呈现将表明马克思和他的研究路径在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性,并且证明很多当代论断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本质上的无效、荒谬和可笑。这些论断包括意识形态终结假说、意识形态无意义性,或者马克思的分析是建立在经济还原论,物质生产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划一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或经济基础的优越性之上的,等等。

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看到的,马克思透彻地指出,人类创造他们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种创造存在于人类组织起来的历史社会之中。通过反映人类对于物质条件的思考以及思想、感受、价值观和信仰,人类创造自己的生活条件。通过对这些条件的实践活动,人类维持或者改变他们的物质和(或)非物质的条件。这一理论推理可以带出很多结论。这其中与本次研究有关的结论有:

(1) 关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很多论断都是错误的阐释,因为如果我们的思想都仅仅是对于我们物质生活的反映的话,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建立、发展和改变生活,创造历史并参与到解放事业的斗争中。马克思探讨的是生产方式、交往关系的支配性模式,并且提醒我们旧有物质关系特别是非物质关系残余的持续存在。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当今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也会支持那些依靠宗教和非理性信仰来实现权力的神学政党组织的政府。马克思反驳道:“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

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1969, 39)。<sup>①</sup>“如果[……]我们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区分开来,并且将它们归因于独立的存在,如果我们把自己禁锢在只是声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些或者那些思想是支配性的,而不去关注生产条件和思想的生产者,如果我们因此而忽略了个人和作为这些思想来源的世界的条件的话”(Marx 1964, 79)[我们会陷入困惑]。

(2) 经济决定论、简单还原论和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常见。举例来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假设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的上层存在着一种简单机械的联系”(Grossberg, 1997, 22),这样的论述是荒谬的,也是一种经典的冷战式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对不清醒的读者、学生和学者进行思想控制。这种论述有意或无意地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构。马克思曾评论他的论著仅仅是试图描述从封建主义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人们不应该将“他的有关西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转变为一种由各国命运所注定的、普适的发展模式的历史哲学理论,却不管他们所处的具体适合自己发展的历史环境。[这种观点]对于我来说,既太荣幸,也太侮辱”(Padover 1979, 321)。对于同样的问题,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在 1890 年给布洛赫(Bloch)的信中给出了清晰的解释: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三卷,第 52 页。——译者注

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sup>①</sup>

(3) 对像贝尔(Daniel Bell)、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新兴的明星学者而言,技术决定论是他们研究路径中的固有要素,这些学者宣称互联网将带来“信息和知识社会”和“民主化”。与那些要在互联网和所谓的信息与知识社会之间建立因果联系的当下流行的技术决定论观点不同,只有互联网提供给我们一种对于全体利益有助益的“信息和知识”,并且超越将数百万人捕捉和囚禁在监视器前以实现对他们的利益、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只有超越资本主义企业和机构销售的物质和精神终端产品,只有人们使用互联网来做出明智的选择来满足日常的理性需求,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知识社会。民主化不仅仅需要公共讨论的参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需对政治经济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简而言之,正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丹·席勒(Dan Schiller)、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莫斯可(Vincent Mosco)、戈尔丁(PeterGolding)、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和戴尔威瑟福(DyerWitheford)等学者所生动描述的,互联网代表着一个新的领域,代表着正在持续着的统治和斗争的一种延伸。在任何情况下,所谓的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者服务社会都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互联网实现“民主化”的声称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而是要等待互联网将资本主义从这样的重负中拯救出来。

(4)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著作的阐释中,马克思从未忽略也从未贬低意识形态,也并未给予意识形态以决定性的或者依附性的地位。

(5) 那些认为我们已经抵达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宏大叙事/理论之终结”的论断都是意识形态的,而且这些论断是对诸多政策起着合法化作用的工具。这些政策包括“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助于逃避和忽略在车间和工业政策中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主要表达两层意思:观念/思想的结构和对于观念的研究(如同社会学是对于“社会”的研究一样)。“无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终结”则仅仅意味着“没有观念”、“没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60页。——译者注

有思想”、“思考的终结”或者“观念的终结”。但是,如果没有观念/思考/思想和观念的结构,人类和有组织的人类生活是不会存在的。“意识形态终结”(或者历史的终结,那些间断性的论断,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延续)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建立了功能性的忽视,形成一种知识。通过在宏大理论、苏维埃系统崩溃论、现代主义纪元或者其他的理论之间建立联系而实现的合法化不过是伪造的虚构故事。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方法这一概念在这里仅指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过程。对于经验主义的数据和统计方法的使用并不会让这次研究成为一个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研究。一个主流学者会将研究设计建立在某个特定的理论推理上,收集并分析经验数据,在提出建议,例如,建立一个污水处理厂来清洁被污染的河流是有必要的。而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则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作为基础来设计研究,使用相同的经验性过程来收集数据甚至以统计学的方式来分析数据,并且提出改变生产关系和过程是必要的建议,只有这样河流才不会被污染,而且河流的任意一处都会变得清洁。我们可以准备一份调查问卷来分析工人们态度、意见和评价,以此对公司的政策有所助益,或支持哪些正确的做法。马克思自己也做过批判性、经验性的研究,在1880年他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这份问卷发放给25000位法国工人来确定他们的工作条件,并提出工人们关心的工作条件的问题,这些议题都呈现在问卷中(Bodemann 1979; Babbie 2004, 243; Dei and Johal 2005)。

#### (一) 本次研究的范围

本研究的范围覆盖了刊登在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引用的传播学期刊中,关于马克思的文章以及马克思关于传播的思想。

研究传播学研究导向的本质需要分析已经出版的期刊文章、书籍、硕士和博士论文以及机构、产业研究报告。这项任务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智力劳动。这一严峻的事实要求我们压缩研究所需的期刊文章。

偶尔刊登过至少一篇有关传播议题的文章的刊物,大约超过1000种。但是,目前的研究将总体限制在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引用的期刊。这些期



刊被认为是“核心期刊”、“学科的神经”、“学术关注的实质性焦点和研究方法的晴雨表”，它们对于传播学研究领域来说是最重要的(Potter and Riddle 2007)，也是世界各个大学对于学术研究的衡量依据。有一些刊物采取的是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取向，但我们在支配性的生产和分配渠道的控制中心里，几乎无法找到这些刊物。现存的刊物要么采取功能性—批判性的或者准批判性的导向，要么代表着被控制的路径选择。这些选择被用来对普遍的支配性实践进行合法化，或者对以马克思研究路径为基础的真正可选择的资源进行去合法化。显然，我们找到它们的概率很低，正如赫伯特·席勒曾经指出的(Schiller and Pool 1981)“在十辆卡车的垃圾中寻找珍珠”。然而，这恰恰能够支持马克思的观点，而并不能证明诸如表达自由、机会均等的存在。

## (二) 关键数据和信息来源

本研究的第一部分旨在探究对马克思之使用的本质。这需要分析已经出版的期刊文章、书籍、硕士和博士论文以及机构、产业研究报告。这项任务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智力劳动。这也是为什么本次研究选取文章时要考虑到，期刊文章为正在讨论的问题给我们提供最新知识这一事实。

在2011年，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 Database Coverage List(EBSCO出版)<sup>①</sup>、Proquest<sup>②</sup>和SSCI中一共有多于800种期刊。但是，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up>③</sup>中，仅有85种期刊被列入传播学的范畴。6种非英文的和另外两种刊物被排除在本次研究之外(Circulo De Linguistica Aplicada A La Comunicacion, Comunicacion Y Sociedad, Comunicar, Estudios Sobre El Mensaje, Javnost-The Public, Tijdschrift Voor Communicatiewetenschap, Journal of the SMPTE, and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因此，共有77种刊物被选进了本研究的范围。

通过质疑那些认为马克思对于传播问题毫无作为，或者言之甚少，或者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对于探讨传播问题毫无价值的观点，本次研究的第二部

① <http://www.ebscohost.com/academic/communication-mass-media-complete>; <http://www.ebscohost.com/titleLists/ufh-coverage.htm>

② <http://www.proquest.com/en-US/catalogs/databases/detail/commabs-set-c.shtml>

③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J>

分聚焦在分析马克思在传播学领域的关联性。为了显示马克思提供了有意义的阐释,他的所有相关论述都被用来发现并评估马克思关于传播问题的论断。

### (三) 总体、样本、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本研究的总体包括从 2007 年 2 月到 2011 年 6 月期间,发表在这 77 种刊物上的文章。(表 1)

在数据收集集中,采取了多种方法:

(1) 为了找到这些文章的正文是否提了马克思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用于总体(10104 篇文章)上。

(2) 为了分析“马克思”使用的本质,那些在全文当中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文章被过滤出来。(在总体 10104 篇文章共有 210 篇这样的文章)

(3) 为了确定被研究期刊的总体概貌,本次研究将每一年的第一个议题中的第一篇文章选中。因此,在 77 种刊物中共有 385 篇文章被编码和分析。

(4) 为了分析研究的议题,每个议题的第一篇文章被选中,共 1386 篇文章。

只有学术文章本身被用于这次研究。社论、编辑的报告/评论、书评、被冠以“研究简述”或者类似命名的文章或类似的文章被排除出本次研究。

表 1 本研究包括的期刊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Communication Theory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Continuum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Crime Media Culture	Journal of PR Research
Critical ar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Journalism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tudies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Language and Speech
Discourse and Society	
Ecquid Novi: African Journalism Studies	

(续表)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Health Communication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dia Psychology
IEEE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Multilingu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Narrative Inquir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New Media and Society
Interaction Studi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Publ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PR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PO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Journal of Advertis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	Screen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Text and Talk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Visual Communication
	Written Communication

指标变量是临时分配的,新的指标会在数据收集和编码的过程中继续增加。

**基本导向:**基本导向包括出版商、传播的基本类型(是否为技术型媒介)、研究目标、基本的方法论结构和研究的等级。

**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使用:**(1)包含 10104 篇文章的所有期刊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使用的分布状况和(2)这些文章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著作使用的本质。

**理论导向:**包括对于文章理论导向的分布和本质的定位和分析。

**研究的议题:**分析聚焦在被探讨的议题上。

本研究综合使用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的内容分析。定量研究部分呈现和探讨数据分布的特点。数据的分布特点是由频率分析和方差分析确定的,其目的是检验马克思的论断对于下面的表述是否有效,即在理论、议题和内容导向的本质中存在对于思想、信念和情感的控制。定性研究部分则用来合理评估定量材料和从马克思发表的材料中搜集的定性材料。

## 四、发现与评估

### (一) 基本导向

#### 1. 出版商

这 77 种刊物共有 25 个出版商。最主要的是劳特利奇集团(Routledge)(泰勒和弗朗西斯)(29.9%)和赛捷集团(Sage)(28.6%)。其余部分远逊于前两者,从 5.2%到 1.3%。这一发现反映劳特利奇和赛捷支配着国际出版行业的事实。劳特利奇出版超过 2878 种刊物(<http://www.tandfonline.com>),控制着全世界的期刊(以及书籍)出版市场。赛捷是世界第五大期刊出版商,其出版物超过 645 种期刊,内容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和医药等领域。赛捷为 225 个学术协会和机构出版了超过 280 种期刊(<http://www.sagepub.com/journals.nav>)。在传播学领域中,科学生产与分布的意识形态管控方面,出版商所扮演的角色达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调查。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图书出版,如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报刊四种理论》和近年来的“批判性”和“另类”的书籍,主要不是受意识形态驱动才刊行的。基本观点认为,出版商并不关心意识形态的内容。他们最主要的动机是物质利益,因此,他们出售所有能够带来利益出版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当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利益(包括情感、信仰以及对“敌”战争)就成为主导关切。为了保护资本家在本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统治地位的持续发展,他们投资(或捐助)了大笔资金。

#### 2. 传播的形式(是否为技术型媒介)

在 1386 项研究中,超过半数(59.4%)都与技术型中介传播有关,而 17%的研究聚焦于非技术型的传播(主要是自我传播和人际传播)。23.6%的研究并未涉及传播的类型,但涉及到了概念、方法、理论、议题和过程。在聚焦于技术型传播的范围当中,传统的大众传播依然占据着半数(49.9%)的

文章(表 2),关于计算机传播媒介的文章远远落后于前者(13.6)。

表 2 技术型中介传播的分布

传播媒介	数量	百分比
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播	184	22.4
报纸/新闻	62	7.5
广播	10	1.2
电视	82	10.0
电影	53	6.4
杂志/期刊	4	0.5
书籍、小说	4	0.5
音乐	6	0.7
广告和营销传播	54	6.6
公共关系	21	2.6
通过媒体的政治传播	7	0.9
计算机媒介传播	112	13.6
移动传播	22	2.7
电信通讯	11	1.3
人一机传播	7	0.9
其他(技术型媒介):例如自我、个人传播,人际、群体、组织、技术、科技、专业传播	184	22.4
总计	823	100.0

### 3. 研究目标

进入分析范围的文章有各种各样的目标。但是,超过半数的文章并未提出它们的目标。而且,15.6%的文章对目标的阐述并非真正的目标,而是对于方法的阐释或再阐释。因此,本研究显示,只有 28.6%的文章的目标是有效的。大多数的目标与效果和个人/接受有关。极少数的“另类”研究将质疑工业结构作为目标,而其中的大多数的目标聚焦于各种身份认同议题(除了阶级认同),并强调阶级分析的无效性和马克思研究路径的欧洲中心主义。

### 4. 方法论结构

研究发现显示,65.2%的研究采取了主流的研究导向(23.5%采取的是行政研究,15.5%主要采取学术型研究,但服务于工业或制度的利益)。也有质疑支配性结构和关系的研究(例如媒介再现、身份认同、认同政治),以及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另外一类(后现代、后实证、后建构、后殖民、后结构、自由多元主义等类似风格)在所有研究中占到了四分之一偏多的比重(27.5%)。使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研究(不包括后马克思主义)仅仅占到了7.3%。

各种各样的定性研究设计占据着最大的比重(61.0%),随后是实证—经验主义的定量研究设计(39.0%)。

大约四分之三(73.5%)的定量研究是准实验性的单一调查研究。准实验性的实验室/临床研究设计占到了25.9%。真正的实验性设计仅仅占到了0.6%。在大众传播研究中,没有真正的实验性设计(实验室或临床)。定性的大众传播研究大多数是参数化的或者非参数化的调查设计。一个新趋势是发展测量装置并检验这些装置。但是,这个趋向还处在一种边缘化的水平,因为大多数研究采用的依然是李克特式的测量方法。

大多数的定量研究还处在探究、描述、评估的层次上(39.0%),排在其后的是因果/推理式的研究设计(32.2%)和双变量相关性的研究设计(23.2%)。

几乎所有的描述性研究都打破了一个基本的科学规律:这一级别的研究设计需要在这一研究主题当中,在现有研究水平的情况下,没有或欠缺知识积累,或者需要对现有的知识提出质疑。总的来讲,双变量研究有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它们仅仅比较了变量,阐述了变量间的关系,却没有一个需要相互关系假设的相关性设计。推理/因果研究使用多变量分析或者因素分析,但其中的大部分并没有需要多变量分析或者因素分析的假设。

事实上,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于指向营销目的的受众/消费者分析。除此之外,上文提到的的确是严重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 (二) 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使用

正如在引言部分阐述的,在所分析的文章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使用被推测处于边缘化水平,而对它们的使用在本质上是负面的。下面的研究发现支持这一假设。

### 1. 对“马克思”的名字的使用

在这些期刊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占据着非常边缘化的位置。在2007年到2011年中段出版的10104篇文章中,只有210(2.1%)篇包含了马克思的名字,有450(4.5%)篇在正文中至少一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或“马

克思主义”这个词。

在正文中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有 39 种期刊和 210 篇文章。这 210 篇文章中的大部分只使用了一次马克思的名字(57.6%),使用了两次的有 14.8%,使用了 3 到 5 次的又 14.8%。在 10104 篇文章中,虽然有 2.1%提到了马克思,但其中的大部分对马克思名字的使用也只是作为其叙述的一部分。

在 210 篇文章中,*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出版了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文章(26.7%),之后分别是 *Cultural Studies* (11.0%),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7%),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3.8%),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3%), *Communication Theory* (3.3%), *Continuum* (3.3%), 以及 *Public Culture* (2.9%)。

只有 15 篇文章完全或大部分是在探讨马克思,在这其中,有 8 篇来自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有 2 篇来自 *Cultural Studies*。

下面的图表清楚地显示出 210 篇文章对于马克思名字使用的高度偏斜分布(10104 中的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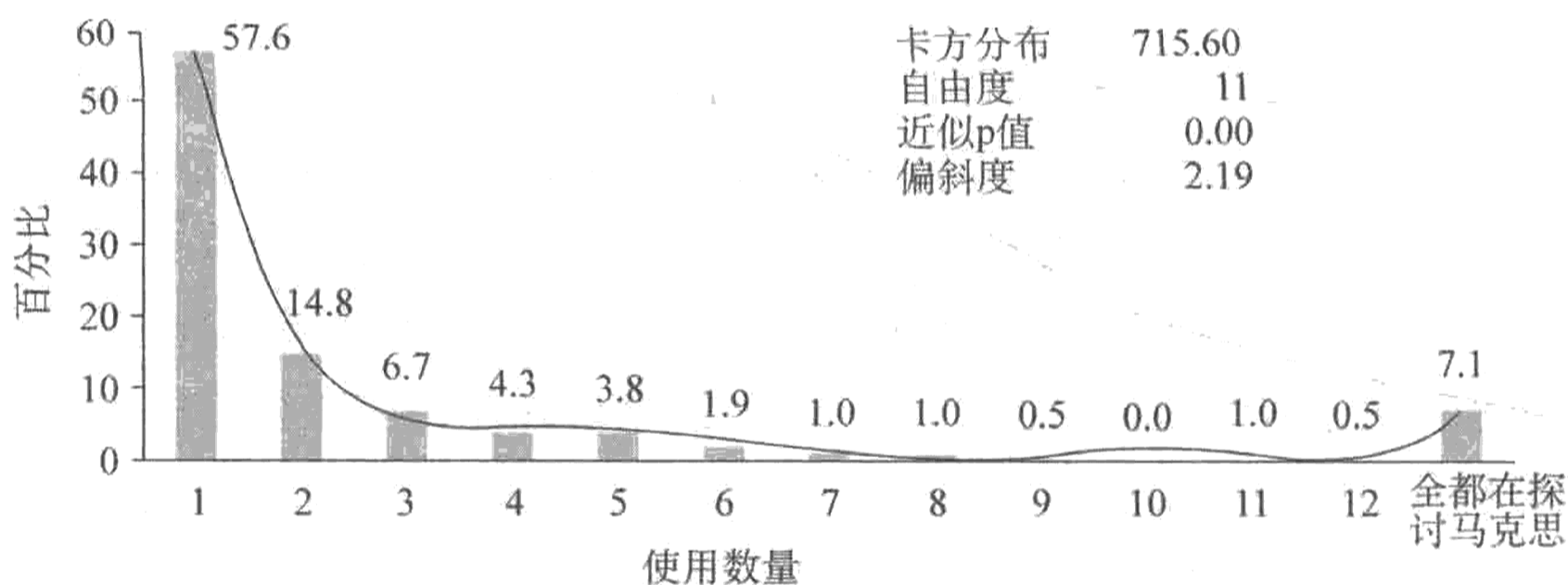


图 1 马克思的名字在正文中被使用的次数

上文的发现以及上图显示的高度偏斜分布指明,这些文章很少使用甚至只是提到马克思。然而,意想不到的,马克思的名字在那些以刊登“批判性文章”为特色的期刊中竟只处于边缘位置。表 3 显示,在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的 247 篇文章中,马克思在其中的 56 篇文章中至少出现一次(22.7%),大多数(56 篇中的 47 篇)仅仅是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1 到 3 次。这一比率在 *Cultural Studies* 中减少到 13.5%,在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中为 10.0%,在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中为 9.7%,在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为 4.6%,在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为 3.3%。

## 使用量

表3 文章中在正文使用马克思名字的分布情况

Journals	1	2	3.5	6-12	a	b	c	d	e	f	g	h	i	Row total	Row %	N of articles analyzed	% use Marx
Asian J of Communication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1.4	104	2.9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104	1.0
Communication Theory	2	3	1	1	0	0	0	0	0	0	0	0	0	7	3.3	96	7.3
Continuum	3	3	1	0	0	0	0	0	0	0	0	0	0	7	3.3	247	2.8
Cnme Media Culture	2	0	2	1	0	0	0	0	0	0	0	0	0	5	2.4	65	7.7
Critical arts	1	2	0	1	0	0	0	0	0	0	1	0	0	5	2.4	81	6.2
Critical Studies Media Communications	3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5	2.4	110	4.6
Cultural Studies	9	3	4	5	0	0	0	0	0	0	0	1	1	23	11.0	171	13.5
Discourse studies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150	0.7
Discourse and Society	3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4	1.9	124	3.2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80	13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2	1.0	90	2.2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2.4	114	4.4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116	1.7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2.9	195	3.1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9	1	2	1	1	0	0	0	0	0	0	0	0	14	6.7	144	9.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88	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110	0.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71	1.4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163	1.2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184	0.5



(续表)

Journals	1	2	3.5	6- 12	a	b	c	d	e	f	g	h	i	Row total	Row %	N of articles analyzed	% use Marx
J of Mass Media ethics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82	2.4
Journalism Studies	4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6	2.9	219	2.7
Language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2	1.0	88	2.3
Management Communica- tion Quarterly	2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1.9	76	5.3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107	0.9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7	3.3	210	3.3
New Media and Society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1.4	231	1.3
Public culture	3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6	2.9	123	4.9
PR review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150	1.3
Quarterly J of Speech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3	1.4	85	3.5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 ly	5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8	3.8	80	10.0
Science Communication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5	92	1.1
Screen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74	2.7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258	0.8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9	9	9	1	1	2	0	1	3	1	0	0	0	56	26.7	247	22.7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3	1.4	100	3.7
Visual Communication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82	2.4
Written Communication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	68	2.9
Total	121	31	31	12	3	2	2	1	3	1	1	1	1	210	100.0	4979	
%	57.6	14.8	14.8	5.7	1.4	1.0	1.0	0.5	1.4	0.5	0.5	0.5	0.5	100.0			

a. 使用马克思的观点进行讨论

b. 整篇文章专注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或者是对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c. 运用马克思来对阶级、剥削、媒体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d. 整篇文章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题分析

- e. 整篇文章专注于探讨某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f. 整篇文章是关于自主性的马克思主义:其不足或者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
- g. 整篇文章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贯穿全文来探讨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 h. 整篇文章用马克思的思想来探讨作者(Grossberg)关于并发分析的理论改进
- i. 整篇文章是一个去殖民主义的无价值的探讨,在没有对马克思进行认真研读的情况下,对马克思进行指责

## 2. 对马克思著作的使用

在至少提到一次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 450 篇文章中,有 85.1%在它们的参考文献中并未使用任何马克思的著作,而 4.0%使用了《资本论》,1.5%使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1%使用了《共产党宣言》。只有 7 篇文章使用了两种,3 篇文章使用了 3 种,两篇文章使用了多于三种马克思著作的资料。

这样的发现表明,对于马克思的研读兴趣是极低的。同时也显示出那些讨论马克思的作者并没有采用马克思的原著,而是要么使用一些支持其立场的二手材料,要么只是他们对马克思言论的一些个人观点,这意味着传播学者对于马克思的著作的知识是低质量的和/或错误的。

在搜寻材料的过程中,我还发现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尤其是从 1992 年开始),这些期刊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使用出现了剧烈下降。

## 3. 使用马克思名字的本质

使用马克思名字的本质,从非常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一个话题进行分析,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在使用马克思名字的 210 篇文章中,有超过半数(50.9%)对马克思名字的使用仅仅是作为说明的一部分而没有评价性的或规范性的阐述。大部分文章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尤其是从 1992 年开始),这些期刊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使用出现了剧烈下降。其余的文章对马克思则表现出多重的导向(图 2)。

消极立场(25.8%):

- 3.8%的文章提供了反马克思的阐述或者负面的评价(例如极权主义的、民主的敌人、粗糙的分析、欧洲中心主义的、乌托邦的、伪科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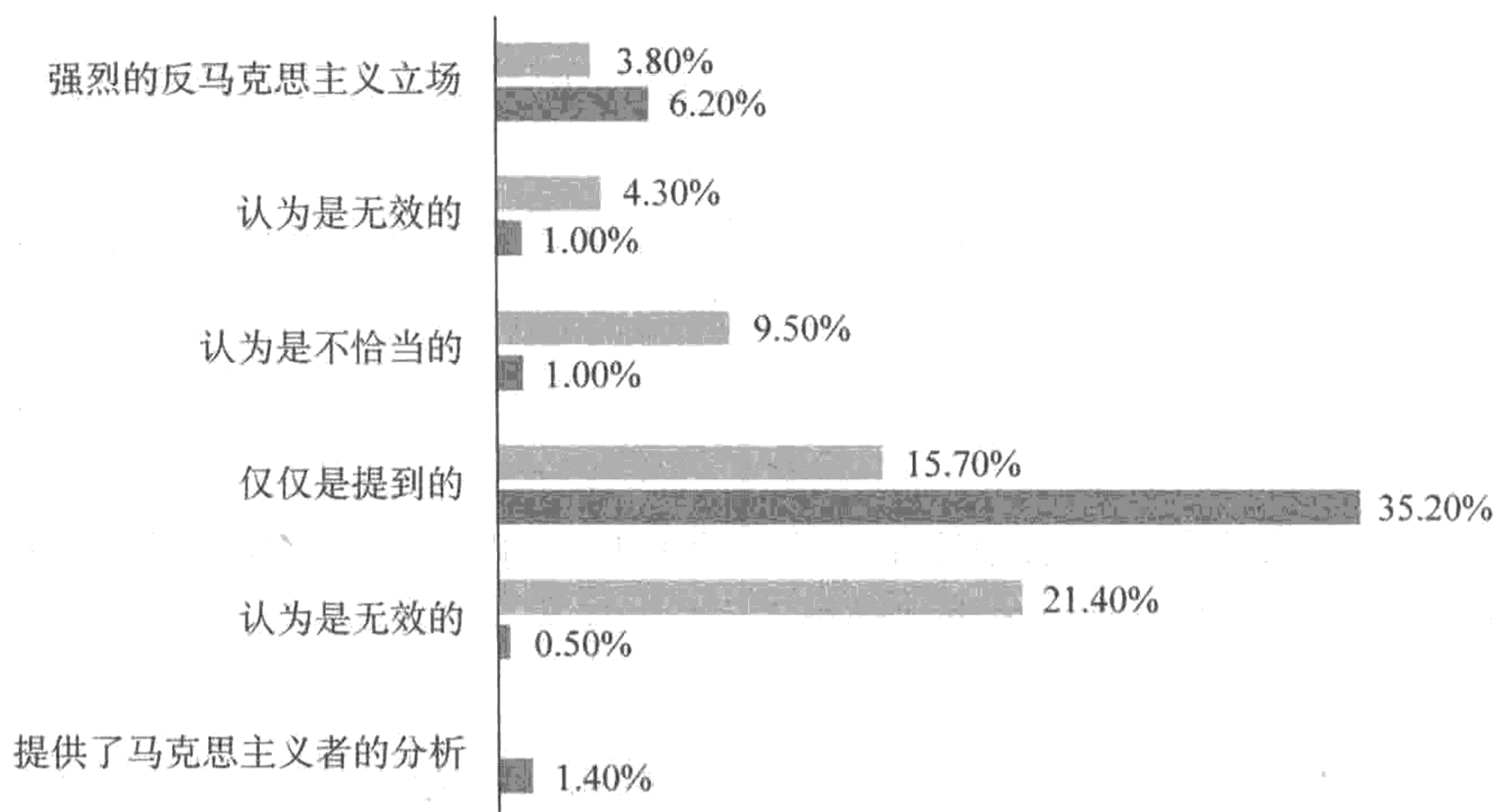


图2 被分析的文章中对马克思的评估的分布

- 10.5%提供了负面的评价并且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无效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阶级斗争/冲突、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公共领域、价值理论、革命变革、劳动的概念、意识形态、商品拜物教、抵抗等诸多观点)。

- 1.0%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部分无效的。

- 10.5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无力的、无效的。

积极的立场/评价(23.3%)

- 21.4%使用一个或多个马克思的概念或者理论路径用于解释和分析(例如,人类创造历史、目的不只是理解更是改变社会、符号与物质力量之间的互动、创造、人道主义、劳动、神话、意识形态、奴隶、技术、虚假意识、进步、无产阶级、小亚细亚生产模式、形式的政治平等、商品、商品生产、拜物教、乌托邦、劳动、阶级与剥削、资本主义危机、阶级斗争、压迫、自由、作为文化研究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流通与消费、原始积累)。

- 1.4%提供了几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特网、一个议题、一种历史解释)。

这些发现是很有趣的,因为大部分负面的评价和认为其无效的观点并没有采用主流导向作为背景。

### (三) 理论导向

在总共 10104 篇文章中,用于分析传播学期刊的理论导向的分析样本选

取了其中的 385 篇。研究发现,这 385 篇文章采取了 150 种理论路径。这一发现也支持了传播学者抱怨的一个常态:传播学中有太多种理论路径。诚然,传播学研究中太多的理论路径,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包括以社会学为基础的、定性分析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都是基于社会心理学的。

所有这些研究中,60.8%的研究设计根本没有理论推理、原理或者探讨(表 4)。同样的,波特尔等人(Potter, Cooper and Dupagne 1993)发现,这些分析文章中 91.9%没有理论基础。波特尔和里德尔(Potter and Riddle 2007)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这一比例是 57.1%。在莱福(Riffe and Freitag 1997)的研究结果中这一比例同样很高:72.4%。坎哈维和韦弗(Kamhawi and Weaver 2003)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发现 69.5%的文章是没有理论的。

表 4 理论结构存在的分布状态

理论性内容	数量	百分比
提出很少的理论/模型,但没有为研究建立理论框架	7	1.8
没有理论,完全没有提出理论推理、原理和探讨	219	56.9
采用已有的理论路径,但没有为研究的问题和假设建立理论框架	8	2.1
一个理论结构被不同层次地使用	151	39.2
总计:	385	100.0

具有不同程度的适合的理论建构的理论框架的研究仅仅占 39.2%。事实上,在研究中使用理论框架,提出理论假设或精确的研究问题、猜想,并在综合研究发现、理论推理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构建研究结论的这种研究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结果都显示:研究者在他们的设计中没有使用理论推理,在为控制目标提供信息之外,媒介和传播研究在认识论上缺乏有效支撑,这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趋势。尽管本研究中的大部分文章没有特别的理论框架,但我发现所有文章中 56%采用的是主流的研究路径。这些研究路径大部分基于社会心理学,其次 9.8%的文章使用了新自由主义多元论,9.9%的文章聚焦于不同种类的批判取向,8.6%的文章使用了后结构主义。4.7%的文章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导向,3.9%的文章是建构主义的,2.6%的文章是后现代的,2.6%的文章根本没有理论结构(它们强调作为工具、程序或应用的功能性),0.5%是后殖民主义的,0.3%是后实证主义的,0.8%是新马克思主义的,0.5 是政治经济批判的。

宏观层面的权力关系问题,组织化的权力结构中的物质和非物质利益中的问题,在几乎所有的理论路径和研究设计中都未能呈现。权力和权力关系在以下三个方面被典型地概念化了:(1)个人选择的自由的角度(根据主流的研究路径);(2)面对根据其个人自由意志来解构和再建构所有事物的被赋权的个体受众时,“作者之死”(生产和传播工业结构的无力)的观点;或者(3)与阶级认同、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这些焦点处于对立面的普遍政治认同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是一个被诅咒的词:我没有见到任何文章使用这个词。然而,那些将“后”作为前缀的研究路径显示出它们对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经济决定论的兴趣。他们主张政治经济、阶级和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并提出所有这些内容属于过去时。政治经济或者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只在很少的一些论文中被使用。

#### (四) 研究主题

在总共 10104 篇文章中,有 1386 篇文章成为对于传播主题的分析样本。

在分析中,这些主题被分为下列三个种类:与技术型中介传播相关的主题(823;59.4%),非技术型中介传播的传播(236;17.0%),所有前两组之外的其他主题(327;23.6%)。

与传播媒介相关的研究有很多种类,但其中 49.8% 文章聚焦于与大众传播相关的主题(表 5)。

表 5 技术型中介传播中主题的分布状态

主 题	数量	百分比
使用权	10	1.2
责任	2	0.2
准确性	1	0.1
广告、营销	24	2.9
媒体人的态度、感知和行为	8	1.0
受众接受、互文性、阐释、评价、建构	6	0.7
内容:媒介产品分析	31	3.8
对话(技术型媒介);公平对待	1	0.1
文化、传媒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关系、文化冲突	7	0.9
发展/历史:媒介、传播教育	23	2.8

(续表)

主 题	数量	百分比
话语(技术型媒介)	17	2.1
效果:个人的态度、感知、行为、动机、认同、选择、信念、参与、信仰、感情和个性	66	8.0
一般意义上的效果	135	16.4
有效性	11	1.3
环境	3	0.4
伦理	8	1.0
媒介分析	21	2.6
身份与身份政治	14	1.7
媒介互动(类社会和人机)	16	1.9
互联网、网络、在线游戏、社交媒介使用	29	3.5
语言运用	4	0.5
政策、政治、法律、规制、传播的控制和自由、审查	57	6.9
媒介建构/意义	14	1.7
媒体报道/描写/框架、再现	77	9.4
媒介教育、传播教育	1	0.1
传媒经济、工业、工业关系	20	2.4
方法:模型、测量、数据分析	35	4.3
生产模式/关系(传媒、音乐工业)	2	0.2
产品设计	2	0.2
职业文化、价值、实践、生产	34	4.1
研究/调查	15	1.8
角色/媒介功能	44	5.3
空间,受众阅听空间	5	0.6
监测	3	0.4
信源可信度	1	0.1
媒体的系统/结构(主流)	5	0.6
技术	9	1.1
理论(包括组织传播、媒介、公共关系、广告和文化研究)	47	5.7
媒介使用(使用的性质/特点)	15	1.8
总计:	823	100.0

经典的大众传播效果分析依然统治着其他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了新媒介(特别是计算机媒介传播)。对于效果的关注以及对于媒介效果不断扩展的兴趣已经在很多研究中得以体现,比如,肖等人(Shaw, Ham and Knott 2000)的研究,他们准确评价了传播学研究中的理论和对效果(以及其他)的兴趣,并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大众媒介时代,但对于大众媒介的效果研究仍然是我们最强大的研究传统”(p. 72)。

在研究主题中,最普遍的类型是有关于处理个人的态度、感知、行为、动机、认同、选择、信念、参与、信仰、感情和个性与媒介的效果研究(24.4%)。聚焦于媒介内容、描写和再现的研究占到了14.9%。只有3.5%的研究聚焦于与互联网相关的主题(网络、在线游戏、社交媒介使用)。

与此相反,研究与工业生产、分配、生产关系以及工作条件和工作场所内的关系相关的批评性议题的兴趣却是微乎其微的。在效果类主题之外,多半自由主义多元论者和那些使用“后……”理论的学者都对媒介描写和再现感兴趣。在823篇文章中,只有2.4%研究工业(传媒经济、工业、工业关系)的一个或更多方面。然而,其中只有3篇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两篇是批判政治经济的,一篇是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这些发现显示,极少的学者对传播工业的结构或本质的研究主题感兴趣。

非技术型中介传播的研究关系到不同种类的无中介传播。然而,其中超过三分之一(36.9%)处理的是有关于人际传播或非技术型媒介的演讲/口语传播(对话、口语中的词)这样的主题。随后是组织传播占到了15.5%。各种关于自我传播主题的研究占到了10.2%(表6)。而那些与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中人的条件在个体和/或人际层面上呈现相关的议题,却没有研究给予调查。它们大都把兴趣放在(a)个人的认知心理学的和行为/选择的特征,(b)个人开始、保持私人关系、解决冲突和结束关系的方式,以及(c)在自我剥削的工作中能够增加员工的动机、涉人和参与的方式与手段。

表6 非技术型中介传播中主题的分布状态

主 题	数量	占百分比
个人的态度、感知、行为、动机、认同、选择、信念、参与、信仰、感情和个性	37	15.7
冲突解决/调停、传播策略、危机的减小	3	1.3
对话、行动、轮替	3	1.3
文化	2	0.8

(续表)

主 题	数量	占百分比
做出决定	3	1.3
话语	5	2.1
教育	1	0.4
效果	28	11.9
有效性	8	3.4
面子管理、关系维系、自我表露	7	3.0
身份和身份政治	18	7.6
个人的思考、记忆、框架思考、表达、演讲以及理解能力	7	3.0
交互:能动性、对话、倾听、技巧、自然发生	18	7.6
为儿童进行的对家庭环境的介入	1	0.4
语言	7	3.0
语言学习	2	0.8
语言使用	11	4.7
方法:模式、测量、数据分析	12	5.1
叙述:讲述、个人、生活故事、难民营	10	4.2
政策、政治、法律、规制、传播的控制和自由、审查	1	0.4
产品(列表、说明书)	1	0.4
专业主义、专业实践	4	1.7
种族主义、种族对话	2	0.8
读者的评估	1	0.4
调查/研究	4	1.7
修辞	3	1.3
传播、谈话和领导的角色	4	1.7
个人行为 and 演讲的情景的和心理的因素	1	0.4
演讲	1	0.4
监测	1	0.4
技术(协助的、科学、语言装置)	1	0.4
理论	28	11.9
本土科学知识	1	0.4
总计:	236	100.0



其他主题的研究集中在很多方面(表7)。同样地,这里大部分的主题与效果、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有关。在一个主题中,运用批判性的议题或者展开批判性的分析,都处在一个最低的级别上。

表7 其他主题的分布状态

主 题	数量	占百分比
个人的态度、感知、行为、动机、认同、选择、信念、参与、信仰、感情和个性	32	9.8
听觉系统	1	0.3
合作和创造、民主、多样性	1	0.3
皈依:信仰	1	0.3
文化、跨文化能力、跨文化读写能力、艺术	12	3.7
做出决定	1	0.3
学科发展	1	0.3
话语	1	0.3
解决争议、组织	9	2.8
经济、人类资本(在人体上的药物测试)	1	0.3
效果	26	8.0
有效性	5	1.5
环境:保护	1	0.3
伦理	2	0.6
健康:日晒和皮肤癌	1	0.3
历史:内战、酒的生产	2	0.6
身份和身份政治	19	5.8
意识形态、人工意识形态	2	0.6
个人对生活环境的适应	1	0.3
个人的知识、记忆、框架思考和表达	7	2.1
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1	0.3
交互:合作、认知过程、社会关系	19	5.8
为儿童进行的对家庭环境的介入	1	0.3
语言学习、损害	9	2.8
语言使用、阅读、学习	5	1.5
语言、类型、语义学、历史、发展、结构、使用	15	4.6
领导力、多元文化	1	0.3

(续表)

主 题	数量	占百分比
方法:学习、写作、训练	7	2.1
方法:书籍设计、治疗说明	2	0.6
方法:模式、测量	22	6.7
叙述:跨文化叙述、贸易、治疗	3	0.9
民族主义:种族化、性别主义、武器销售	4	1.5
组织管理、权威、合作、知识建构、变革	4	1.5
政策、政治、酷刑、参与、生物政治学、人权、隐私	30	9.1
假装游戏:社会组织的分层形式制定	1	0.3
科学的公众理解	1	0.3
调查/研究	14	4.3
修辞:种族划分、总统的	2	0.6
自然的模仿:动物园	1	0.3
空间和时间:全球空间、区域化	3	0.9
演讲的问题、症状、处理、治疗、损害、咬字吐字	12	3.7
监测、监视	1	0.3
技术和技术运用:成像工具、装置、网络应用	6	1.8
理论(恐怖主义、殖民主义、现代性、现实)	34	10.4
暴力:酸暴力	1	0.3
投票	1	0.3
总计:	327	100.0

不仅仅是本研究,几乎所有相关的研究都发现,主题、理论路径和方法是非常多样的。根据波特尔和里德尔(Potter and Riddle 2007,8)的观点,研究工作中宽泛的效果和方法,彼此之间极少的交集让学者之间的分享变得困难。这些分享包括关键术语的定义、对于整体领域“宏大图景”的理解。波特尔的关注应该是有意义的,如果学者的首要兴趣和关切是理解整个学科的全景的话。

所有的发现清晰地表明,在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兴趣中,支配性的导向是基于工业和工业结构的需要,这种需要希望对于个人和媒介效果的评估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这一导向的显著含义证实了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中统治

阶级和思想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有效的。在这种普遍的学术兴趣和引导并供养着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要素之下,提出以下问题就变得荒谬、不正常、不合常理,这些问题包括:(1)为什么学者们都不去研究属于统治阶级的态度、认知、价值观、感觉、心理健康、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个人话语,(2)为什么学者们不去分析他们在生产和分配的本质、工作状态、最低薪水政策、悲惨的人和环境状况等方面的心理倾向的效果,以及(3)为什么学者们不在研究的结尾提出建议,让统治阶级和他们的高级别教育水平的管理干部去接受教育,去通过敏感和移情训练,以及去感受被剥夺权力、被利用、被虐待、被滥用的感觉。

过去的60年中理论和研究主题上的支配性力量依旧发挥着统治性的作用。先前的一些边缘性主题(特别是诠释学、符号学、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现在则是补充性的、时髦的选择。它们成为受青睐的理论路径不是因为她们有着更好的解释力或者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有效性,而是因为它们被整合进了全球市场和商业利益当中,也是因为它们对于思想和行动管理是极端有功效的。总之,它们服务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利益。

大多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文章对经典的、经济还原论的、简化论的、机械论的或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简单论述,并且就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历史相对论、欧洲中心主义、原教旨主义、阶级偏见、超稳论、宏大叙事等类似内容做出了陈腐的判断。

## 五、马克思在理解传播中的位置

一条信息、一个词、交谈、对话、一次交际行为或者收发信息都不是传播。我们不能将工具、手段、表达、再现、语言或非语言的行为或者传播的内容与传播混淆在一起。传播是人类生物地和社会地存在的必要状态之一:如果我们不能传播的话,我们就无法在身体上、心理上、社会上、经济上或者在其他任何方式上生产和再生产我们自身。不能传播意味着没有生命的人、没有生命的社会和世界。没有传播,人几乎什么都不能做。传播、传播方式、语言、符号等同类事物不可能单独存在,我们通过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方式和方法,通过社会关系,在彼此之间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中,做任何我们做的事情。

在理解传播的重要性、本质和研究等方面,马克思占据着一个核心的位

置,因为他提供给我们理解与传播相关的所有事情的最有意义的方式。在所有的研究方案和自由民主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导向在其中各种各样的影响。最重要的、持久的传播学文本是以一些研究路径为基础的,这些路径都受到马克思对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理解的影响。马克思并不是统治利益、结构和关系进行再生产的支配性方式的支持性机制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在传播学研究中,在对马克思进行忽略、排除、责骂和贬低的控制体系中的反常的再生产模式中,马克思却是其中正常的一部分。然而,马克思总是能够在让神话祛魅的实践中,在对不公正的和压迫性的生产关系和模式,包括传播中的知识的、职业的关系和实践的斗争分析实践中,找到他在传播中的位置。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兴趣、理论和方法是有意义的传播学持续探究过程的起点。不管怎样,我们知道,马克思提供了关于传播的解释。

在一个特定组织化时间和组织化空间以及(或者)组织化关系当中的发现,在另一个时间、空间或者关系当中可能有效,也可能失效,因为理论推理和建构的条件是变化的。这种条件的变化并不构成一个理论的修正或者失效的必要或充足的条件。一个理论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理论只有在学术探究的方法论结构和(或)理论推理不能为新的、不同的和变化的条件提供有效的解释的时候,才会失去它的有效性。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为任何组织化的结构和关系起到维护、协调、均衡和合法化作用的理论。它是把对形成、维持和变化的研究和解释作为基础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解传播的过程当中应该占据一个核心的位置,因为理解传播需要理解人类,理解组织化的生活,而不是为其发现和伪造合法化的理由。

马克思在传播中的研究路径主要集中在:(1)对于传播(结构本身和传播产品的再生产以及人的状态的再生产的组织和实践)的物质生产(物质模式和关系)本质的研究,(2)对传播(思想、感觉、敏感性、信念、信息、知识、作为知识的无知的生产、散播和使用)的非物质生产(非物质的模式和关系)的研究,和(3)传播的物质与非物质生产之间及内部的相互关系,但并不涉及再造那些宣传者的无知,他们对马克思无知的质疑包括(1)谁先出现(鸡或者蛋;经济基础或者上层建筑),(2)多元决定论,(3)生产者之死,以及(4)那些根据他们的自由意志来解构和重建意义并且在电视机前面和/或网络空间的虚拟世界中发起斗争的被赋权的个人。

## (一) 马克思关于传播的研究

### 1. 传播的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传播是什么

我们被教育必须知道定义，比如传播的定义。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来定义传播。传播（哪怕是一个苹果）不能被一个或者几个共同特性来准确定义。而且，传播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是来自于五个选项和一个正确的答案。一个科学的定义需要一种详细的解释，这种解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传播的特性和指标，一种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让我们了解传播是什么，还要给出一种排他性的解释，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不是传播。有很多种传播的定义，但没有一种能解释什么是传播，因为这些定义都聚焦于解码和编码的机制/过程，可观测到的互动，例如发送和接受信息、交换观点、要素、功能、角色、目的和结构等。在传播中，没有人会把发送和接收一条信息或者创造、建构、消费或结构意义当作目的。交际行为、信息、写或者说什么、读一本书或者看电视，这些都不构成传播。口头表达或者任何种类的精神的或者相互关系的表达也都不是“传播”。

马克思并没有定义传播，但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了关于传播的非常重要的解释。下列各项关于马克思对传播的理解的陈述使得以下论断失去意义，这些论断有(1)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涉及过传播，(2)一些评价认为马克思仅仅探讨过传播手段以及(3)认为马克思将传播简化为“传输”(transportation)。

我选取了马克思著述中的一些语句并作简要的解释：

- “廉价而便利的传播”(Marx 1846)<sup>①</sup>：传播性质两种指标的存在。
- “《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Marx 1857a)<sup>②</sup>：传播和传播生产的历史的积累性和决定性本质。
-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Marx 1857a)<sup>③</sup>：这些是正文的标题。这些标题表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3卷第87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49页。——译者注

③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47页。——译者注

明马克思对于传播的条件、传播与政治结构、认知之间的关系是感兴趣的。

- “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Marx 1857a)<sup>①</sup>:这个自我探究式的语句表明了传播条件在影响可生产性的权力中的重要性。

- “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快递。”(Marx 1885, chapter 1, 17)<sup>②</sup>:传播工业的重要性。

- “袭扰英国人通往卡尔纳耳和米拉特的交通线”(Marx 1857)<sup>③</sup>:传播的控制。

- “英国人在阿格拉与德里之间的交通线”(Marx 1857)<sup>④</sup>:殖民地的传播网络。

- “《纪事晨报》在上星期五的第四号上刊登了一则电讯”(Marx 1853)<sup>⑤</sup>:通过电报传送电讯的传播。

- “商业的不发达、各城市之间联系的不密切”(Marx 1846):<sup>⑥</sup>传播规模及其结果。

- “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Marx 1846)<sup>⑦</sup>:承认多种传播形式的存在,例如商业传播;意味着传播的实现依靠传播手段;强调传播手段的决定性作用。

- “[……]一切形式的坦率而公开的言论——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是没有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还是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地方报刊。”(Marx 1843g)<sup>⑧</sup>:传播的不同形式。

- “传播的确定手段”(Marx 1846):传播的确定手段的作用。

- “传播手段的影响”(Marx 1857a):传播的影响和后果。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47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资本论》第2卷第64页。——译者注

③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2卷第300页。——译者注

④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2卷第302页。——译者注

⑤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9卷第462页。——译者注

⑥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3卷第59页。——译者注

⑦ 同上。

⑧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385页。——译者注

• “路易-拿破仑也向参议院和 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发出了类似的文告。”(Marx 1854)<sup>①</sup>:传播信息。

• “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Marx 1848a)<sup>②</sup>:传播的垄断;传播的政治经济。

• “世界市场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Marx 1848a)<sup>③</sup>:传播的发展以及市场对它的影响。

• “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Marx 1848a)<sup>④</sup>:传播手段在发展中的作用。

• “促进这种团结的,是由大工业所造成的愈益发达的传播工具”(Marx 1848a)<sup>⑤</sup>: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

• “机器的组织系统,动作从中央控制机器出发,通过发射机的传播,施加到这个机器的组织系统。”(Marx 1867, chapter 15, 3)<sup>⑥</sup>:技术、组织化的传播;机器—机器传播。

• “对于制造业时代的生产需要来说,传播和运输的手段如此的、完全的不能胜任”(Marx 1867)<sup>⑦</sup>:传播状态在生产中的影响。

• “传播和运输手段渐渐变得与机械工业的生产模式相适应”(Marx 1867)<sup>⑧</sup>:传播的政治经济;工业关系,技术控制。

“改善的运输和传播手段为占领国外市场提供了武器”(Marx 1867)<sup>⑨</sup>:传播在殖民中的作用;传播的国际政治经济;战争传播。

• “远洋航行以及传播手段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Marx 1867)<sup>⑩</sup>:传播在工业发展、工业关系、工作力和贸易中的作用。

• “在现有的技术和传播手段的发展阶段,对于有黄金和白银的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0卷第178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4卷第368页。——译者注

③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4卷第467页。——译者注

④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4卷第470页。——译者注

⑤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4卷第475页。——译者注

⑥ 译文摘自《资本论》第1卷第416页。——译者注

⑦ 译文摘自《资本论》第1卷第421页。——译者注

⑧ 同上。

⑨ 译文摘自《资本论》第1卷第494页。——译者注

⑩ 译文摘自《资本论》第1卷第526页。——译者注

新领土的发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Marx 1859):传播在发展、殖民中的作用。

• “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Marx 1863—1883)<sup>①</sup>:传播设施的作用;传播的政治经济。

• “大陆上的政治家,总以为伦敦的报刊可以作为英国人民情绪的温度计,因而他们目前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错误的结论。”(Marx 1861)<sup>②</sup>: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将焦点集中在政治传播、媒体、政治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战争中出版社的作用、上层媒体人和统治力量之间紧密的物质关系、政治家和公司结构对于出版社的控制、出版社的所有权、伦敦出版社维护的利益等方面。

上面这些简短的例子也表明,马克思在这些简短的语句中所说的要比下面的这些研究有意义得多,例如(1)成千上万的“效果分析”,这些分析除了提供一些服务于市场和/或政治控制利益的分配性的相关性的信息之外,什么都没有,以及(2)一些接受分析的确探讨接受本质,如,没有使用功能主义术语也没有分析接受者/个人的积极受众理论。

总之,马克思对此说了很多。

## 2. 传播在社会及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功能和作用

马克思认为,传播贯穿于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过程的始终。马克思对思想、报刊、写作以及传播的手段和功能的解释阐明:对于马克思而言,传播是社会化生产各个阶段(包括分配、流通和消费)存在的必不可少的要素。除本文其他章节对该观点的阐述以外,下列马克思的解释不仅阐明了传播的关系和作用,同时说明传播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必需性:

一旦麻布与别的商品即上衣交换时,商品价值的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为了说明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

<sup>①</sup>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25卷下第733页。——译者注

<sup>②</sup>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5卷第454页。——译者注



上形成它自己的价值,它就说,上衣只要与它相等,从而是价值,就和麻布一样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为了说明它高尚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它的浆硬的物体,它就说,价值看起来像上衣,因此它自己作为价值物,就同上衣相像,正如两个鸡蛋相像一样。顺便指出,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还有其他许多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 B 同商品 A 相等,是商品 A 自己的价值表现(Marx 1867, chapter 1, 11)。<sup>①</sup>……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因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铁、麻布、小麦等等的价值虽看不见,但存在于这些物的本身;它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金相等,同金发生一种可以说只是在它们头脑中作祟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监护人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或者给它们挂上一张纸条,以便向外界表明它们的价格。(Marx 1867, chapter 3, 1)<sup>②</sup>

马克思在很多作品中表达了他对传播作用的观点,这些作品涉及社会中报刊的作用以及传播手段在社会变更过程中的功能。他的报章是政治传播不会屈从于政治运动、国会议程或是选民的态度与偏好的最好例证。他评估了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并说明了传播在新闻报道、政治和公众倾向方面的作用。

对于马克思而言,科技并不意味着工具的集合,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在此,各种传播手段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部分,在从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到了诸如维持、变革等等重要的作用。传播手段被运用以支持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的意义、范围和潜能。

马克思不认为传播手段仅仅是一种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工具:

房屋可以用于生产和消费;就像所有的交通工具,例如轮船和马车,可以用于旅游和运输;就像道路可以用于生产的适度交换和用于散步。(Marx 1859)

---

①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章第 67 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3 章第 113 页。——译者注

马克思给出了对于传播的解释,给出了传播手段与包括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社会结构的维护和控制等因素的诸多方面之间关系。他的解释并不仅仅局限于流通领域,也不仅限于某种技术手段。与此同时,期望马克思会把传播定位为生活生产的中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或是认为传播技术的发展在社会和社会发展中居于首要地位的观点都是非常错误的。<sup>①</sup>

### 传播手段的发展和阶级统治

所有文明的进程,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每次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中的劳动本身作为科技、发明、劳动力的分割和整合的结果,改善了传播手段,世界市场和机器等等的产生,与其说是发展了工人,不如说是发展了资本;因此这再次放大了对劳动力的控制,而这力量只增加资本的生产力。(Marx 1857d,8)

### 传播设施,生产供给的重要性

“必须有一定量的要用在生产上的生产资料处于或大或小的储备状态,以便逐渐进入生产过程”,在这样的阐述中,马克思确立了影响传播设施的因果关系:“这种生产储备的大小,取决于它在更新时困难的大小,取决于供应市场的相对距离,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等等”。<sup>②</sup> (Marx 1885, chapter 13,5)

### 传播手段的发展和商品运输的成本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交通工具和传播工具的发展以及运输积聚(规模扩大),使得单个商品的运输费用减少”。<sup>③</sup> (Marx 1885, chapter 6,13)

### 传播设施和保障生产持续的速度与时间

马克思给出了煤炭供应的例子以说明举出煤炭供给的例子加以阐释其关系:“一个过程的生产加工中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Marx 1885,

---

<sup>①</sup> 参见哈罗德·因尼斯传播技术的在社会存续和发展中的强大作用的观点,杰哈利(Sut Jhal-ly)关于技术决定论的评论,以及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在人类知觉器官和世界向地球村转变过程中,传播技术的影响的观点。

<sup>②</sup>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3章第273页。——译者注

<sup>③</sup>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6章第169页。——译者注

chapter 6,8)①

### 传播工具的进步状态与社会劳动分工的密度和条件

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1861年以来,由于棉花需要量大增,东印度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靠缩小稻米的生产来扩大棉花的生产。结果部分地区发生了饥荒,因为运输手段的先天匮乏,难以承担起稻米产量不足之地从其他地方进口粮食的重担。(Marx 1867, chapter 14,9)②

### 传播手段的发展与季节性劳动

“远洋航行和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基本上摧毁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根基。(Marx 1867,chapter 15,30)③

### 传播与市场控制

“机器加工产品的廉价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为海外市场的开拓提供了利器”。(Marx 1867,chapter 15,22)④

### 传播与商品流通时间及生产地点的变更

马克思阐释了传播手段在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关系和诸如旧生产中心的衰落与生产中心兴起的社会变迁等方面的作用。

如果从一方面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么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运输中的并且是运往远地的商品会大大增长,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与此同时,不是直接用作生产资料而是投在交通工具及为其运转所需而投向固定资产与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也会增加。(Marx 1885, chap-

①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6章第159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资本论》第1卷第12章第391页。——译者注

③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526页。——译者注

④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494页。——译者注

ter 14,2)①

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流通周期,但源于各自不同商品资本或面向不同的市场移动的不同商品资本的不同部分,它们在流通时间上存在的相对差别,不会因此消失。例如,改良的帆船和轮船,缩短了商品的移动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商品到达远近港口的时间。相对的差别仍然存在,虽然往往是缩小了。不过,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相对差别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相适应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一条从生产地点通往内地一个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的铁路,可以使内地的一个不通铁路的较近地点,比这个自然距离较远的地点,绝对地或相对地变远。同样,这种情况还会使生产地点到较大的销售市场的相对距离发生变化,由此可以说明,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此外还应指出,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地说要便宜得多。)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不仅交通工具的数量增多了,比如说,许多条船同时驶向同一个港口,好几辆列车在相同的两地之间同时沿着不同的铁路线行驶,而且例如货船在一周内,按不同的日期,依次由利物浦开往纽约,或者,货车在一天内按不同的钟点由曼彻斯特开往伦敦。(Marx 1885,chapter 14,1)②

### 3. 人类生活生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

#### 物质生活的生产

任何物质生产的特质与变化,包括传播的物质手段在内,都取决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

对于传播产业的生产研究主要包括:对本地、国内、国际范围内有组织生产方式、普遍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定位与分析,对传媒产业的历史与发展以及在生产、分配及消费领域当今通用的做法和适用条件的学科调研。

举例来说,通过将传媒生产实践和人的条件作为支配性实践的最终产品进行研究,马克思给出了英国印刷业令人震惊的事例:

①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4章第279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4章第278页。——译者注

过去在英国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一段学习时期,最终会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凡从事这门子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14、15、16小时,甚至往往一连劳动36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17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Marx 1867, chapter 15, 31)<sup>①</sup>

对生产方式变革与传播手段适用条件二者之间认真思考后,马克思指出:

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促使社会生产活动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变革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以及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它所拥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完全不能再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因而事实上这种状况也被彻底改观。同样地,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快又成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程桎梏,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同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锻冶、锻接、切削、穿凿和铸造巨量的铁,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Marx 1967, chapter 15, 4)<sup>②</sup>

①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531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421页。——译者注

### 精神世界的生产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精神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应当免于任何人为抑制因素的束缚。马克思并不把物质产品生产和精神产品看作是分别独立的两个领域。对他而言,举例来说,新闻报刊业是生产和销售一种叫做报纸的物品的行业,但与此同时,新闻报刊业也生产了有关社会问题的精神产品。对马克思而言,精神产生并依附于所在生活条件与环境: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发展水平(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Marx 1969,15)<sup>①</sup>

与唯心主义及其冠以“后”类之理论变种相比,马克思主义有其理论的唯一性与方法论的独特性,下面陈述就揭示了这种根本区别之所在: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仅仅生存个体的自我体验。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全体生存个体本身出发,把意识考虑为纯粹集体的共同认知。(Marx 1969,15)<sup>②</sup>

### (二) 马克思论大众传媒

马克思论述了关于印刷业的方方面面,主要刊载于他的报载文章和私人信件中。他对于传媒业的关注一直持续至他去世。新闻报刊是他进行政治斗争的物质手段之一,也是资本主义维持统治的方式之一。

马克思可以被认为具有革命性的政治新闻工作者,他时刻把工人的解放事牢记在心。在他的一些报载文章和给报刊编辑的信中,马克思表达了他对于大众传媒的兴趣和他对于传播、舆论、公共传播、报刊、自由、报刊

---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3卷第29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3卷第30页。——译者注

自由,以及报刊与执政权力体系(审查机构、专业人士参与、审查的正当性以及反审查斗争及其参与的报刊)之间关系的特点的见解。

19世纪40年代早期,马克思的论著主要是哲学与报刊文章,它们展示了马克思对于通信自由和对于发挥新闻业在反对报刊审查、反对社会不公、反对政府迫害、反对政府和商业腐败等方面作用的兴趣。他寻求真相,关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真实情况;他为新闻工作者辩护,不畏强权,捍卫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马克思维护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积极参与反抗封建制度及其惯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斗争。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马克思认为新闻自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而对法律体系、新闻法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不再抱持正面评价。他参与了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例如,《新莱茵报》的最后一期全部是用红色印刷的并刊载了编辑的社论,感谢科隆工人的参与,布告以口号“工人阶级的胜利”为结语。1843年的文章大多是对时事问题、对其他报纸和政府的限制与制裁措施的态度。在1848和1849年间,他对德国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849年移居英格兰后,1852至1862年间他担任《纽约每日先驱报》驻伦敦记者,主要以政治、战争、国际关系和政府政策为报道内容。

马克思认为新闻界是一台编造神话的机器,他对于当今所有的主流媒体的评价比此前任何观点更为准确。

直到现在,人们仍认为基督教神话是在罗马帝国时期产生的这一推断可能成立,但这仅仅是因为印刷术在那之前没有被发明出来。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每天的报纸和电报交流,能够在瞬间将捏造的信息传播到地球的每个角落,这样,仅仅在一天之内,(由于资产阶级那伙人信以为真并进一步传播)杜撰出的谎言比过去一个世纪产生的谎言还要多。(Marx 1871)

### 1. 传媒的结构

马克思没有对传媒的结构进行详细的分析,然而他的文章(例如 Marx 1861a, 1861b)显示出他的研究已经触及传播所有权、政治活动和传播实践等;他所做的远远超过对于所有权做出的简单解释。他在物质利益、传媒生产和内容方面的本质间建立了多样的联系,并解释了如此多样联系的意义

和结果。他提供关于所有权的知识,解释所有权与政策间的关系,阐明顶级传媒专业人士、政界人士及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应用于专业实践,用以宣传和支持私人利益与政治利益,并阐明其中的大众位置。以下仅做部分指导性摘录(Marx,1861):

大陆上的政治家,总以为在伦敦的报刊上他们可以找到英国人民情绪的温度计,但在现阶段他们却只能得出虚假的结论。“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初,英国的民族自尊心曾勃然兴起,差不多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响起了对美国作战的呼声。因此,一开始,伦敦报刊与人们的好战热情相比显得平静与温和得多。然而,不久以后,由于王室律师找出了与美国开战的技术性措辞,报刊与人们之间的关系开始走向另一面。报刊的战争狂热情绪也同人们好战情绪一样高涨起来。相反的,伦敦的报刊却显得特别审慎,甚至“泰晤士报”也怀疑究竟是否存在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这种现象应当怎样解释呢?是因为帕麦斯顿对于王室法官们是否能找出合法的战争借口没有把握。情况是这样:在“拉普拉塔号”到达南安普顿之前一个半星期,南部同盟的代理人已经从利物浦向英国政府密告美国巡洋舰企图从英国港口驶出在公海上捕捉梅森先生、斯莱德耳先生等人,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加以干涉。政府根据王室法官的意见拒绝了这个请求。因此,伦敦报界起初的时候才唱着平静温和的调子,与人民不耐烦的主战情绪适成对比。可是,一当王室法官——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他们两人都是内阁成员——发掘出一个向美国闹事的技术性的借口的时候,人民和报刊的态度就倒过来了。战争狂热在报刊上不断增强,而在人民中则不断减退。现在,对美战争在英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民中——除了和棉花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土贵族以外——是不得人心的,而报刊上的好战叫嚣则震耳欲聋。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伦敦的报刊吧。这里为首的是“泰晤士报”,它的主编是鲍勃·娄是英国内阁的一个二等阁员,即教育大臣之流,不过是帕麦斯顿首相一个走卒。“笨拙”的主编之一由帕麦斯顿在 Board of Health(卫生部)里安插了一个位置,年薪 1000 英镑。

“晨邮报”一部分是帕麦斯顿的私产。这个奇特的报纸的另一部分卖给了法国大使馆。剩下来的部分则属于 hautevolée(“上流社会”),给



宫廷的阿谀之徒和贵妇人的裁缝提供最细致的消息。因此，“晨邮报”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报界的詹金斯（一个通常用来指奴才的典型）。

“晨报”是具有经营许可证的食品供应商们的公共财产，也即公共房产，啤酒与烈酒兼营。此外，它还是英国国教的虔诚派教徒以及那些靠赛马、赌博、拳斗等等赚钱的报纸。这家报纸的编辑格兰特先生一度受雇于各报馆做速记员，没有什么写作修养，但却有过参加帕麦斯顿的私人宴会的荣幸。从那时起，他就对这位“truly Englishminister”（真正英国大臣）对俄战争[注：克里木战争。——编者注]之初曾经被他斥为“俄国奸细”的人满怀热诚。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家酒店报的忠诚赞助商都聚首在沙夫茨伯利伯爵麾下听候调遣，而舍夫茨别利则是帕麦斯顿的女婿。舍夫茨别利是那些一心想把圣灵掺和到诚实的“晨报”的罪恶酒精<sup>①</sup>中去的 lowchurchmen 的教皇。

“纪事晨报”！Quantummutatesabillo！（他变化多么大呀！）<sup>②</sup>这家辉格党的大报曾经相当成功地同“泰晤士报”竞争了几达半世纪之久。但是在辉格党的战争之后，它的熠熠星光就开始暗淡起来了。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形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便士报，以“煽情新闻”为生，例如为毒药杀人犯帕麦尔辩护。后来，它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大使馆，但后者不久就懊悔白花了钱。于是它又投身于反波拿巴主义，但仍然没有什么成绩。最后，它才找到了它期待已久的买主——南部同盟在伦敦的代理人杨西和曼。

“每日电讯”是一个名叫勒维的人的私产。他的这个报纸甚至伦敦报界都斥之为帕麦斯顿的 mobpaper（打手报）。它勉强担任这个充满自重和自制精神的角色，感到很不习惯，所以在那以后曾刊登了半打文章来谈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自重和自制精神。而变换方向的命令一到，它就努力来补偿自己前此所受的约束，用狂叫战争的声音来压倒它的所有同行。

“地球报”是政府的晚报，它从所有辉格党阁员那里得到官方的津贴。

托利党的“先驱晨报”和“旗帜晚报”属于同一个老板，它们的立场

① 双关语：原文 Spiritus 有“酒精”和“神灵”两个意思。——译者注

②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译者注

受着两个动机的支配：一个是对于“背叛英国的殖民地”的传统仇恨，另一个是钱袋的长期渐渐变扁。它们知道，同美国作战一定会使现在的联合内阁垮台，为托利党内阁铺平道路；而托利党内阁一成立，对“先驱报”和“旗帜报”的官方津贴也将随之而恢复。因此，这些报纸才比看到猎物的饿狼叫得还凶，因为它们预见到随着对美战争而来的还有大量金钱！

在其余的伦敦的日报当中，值得一提的只有“每日新闻”和“晨星报”，这两家报纸都反对战争鼓吹者。“每日新闻”因为与约翰·罗素勋爵有联系而行动受限制；“晨星报”（布莱特与科布顿的报纸）的影响则由于它享有“不惜任何代价求和平的报纸”的声名而减弱。

伦敦的周刊大多数仅仅是日报的回声，所以绝大部分都主张战争。“观察家报”是靠政府生活的。“星期六评论”极力追求“才智”（esprit），以为自己凭借影响高于“人道主义”偏见之上的愤世疾邪程度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本领。为了显示“才智”，为这家报纸撰稿的被收买的律师、牧师和学校教师们从美国内战爆发以来就对许可“南方蓄奴制度”窃喜不已。自然，这些人随后就跟着“泰晤士报”吹起了战争的号角。他们已经在草拟对美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旁观者”、“观察家”、特别是“麦克米伦杂志”，则应该多少作为可敬的例外提出来。

由此可见，整个说来，伦敦的报刊——地方报纸除棉织业巨头的报纸以外则同伦敦报刊形成一个可嘉的对照——无非就是帕麦斯顿加帕麦斯顿。帕麦斯顿要战争，英国人民不要战争。即将发生事变就会表明，在这一场决斗中谁是胜利者，是帕麦斯顿还是人民。归根到底，帕麦斯顿是在玩一场比1859年初路易·波拿巴所赌的更为危险的游戏。<sup>①</sup>

## 2. 自由和媒体

在马克思的理论主张和各种著作中，人类的自由这一问题都是他关心的核心问题。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体现出他对于把个人从各种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有着相当深刻的感受。

<sup>①</sup>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5卷第454页。——译者注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自由是体现在打印机的油墨中，在财产中，在道德感中。或者在一个政治大会中，自由就是自由”。（Marx 1842 g）

自由不仅包括什么是我的生活，也同样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什么自由的，还包括我也可以自由地做。否则建筑师和海狸之间除了海狸是没有皮毛的建筑师和建筑师是没有皮毛的海狸又有什么区别呢。（Marx 1842 f）

“自由确是人的最大本质，即使不同意这一点的人在攻击自由本质时也要利用自由；他们试图在用他们拒绝使用的人的这一本质装饰来装饰自己呢”（Marx 1842e）。对于批评那些只承认自己的自由拒绝他人所享有的自由的人，马克思对他们的批评非常直言不讳的。

因为这些先生们不愿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然礼物，而想把自由看作是一群特别有利的星团带来的超自然礼物，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和等级集团的个人财产，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逻辑建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者的特殊自由，他们就禁止人类本质的普遍自由。但是，19世纪的相互积怨和被本世纪所染化的现代骑士意识，无法理解那种本身就不可理解的东西。因为其中缺乏想法，也即证明内在的、本质的、一般的规定怎样通过外界的、偶然的、特殊的稀奇事物而同某些个人相联系；同时却不同人的本质，不同一般理性相联系，因而对所以个体而言，他们共同的行动就是：由此求助于奇迹与神力。其次，由于这些先生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象中的地位，因为他们生活在处于现实世界彼岸的世界里，因为他们用想象力来代替头脑和心脏，所以他们就不满意实践，就必然求助于理论，不过这种理论对其他世界的人来却是地地道道的宗教。然而，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辛辣色彩，并且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虚幻的欲望披上圣洁的外衣。（Marx 1842d）<sup>①</sup>

<sup>①</sup>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63页。——译者注

在马克思看来：

“所有关于限制自由的说法都是事实，无可争辩的证据显示出任何时期当权者都相信自由应该被限制，这种信念对其后观点 成为一个指导原则。”(Marx 1842c)

自由的一种形式被拒绝，那自由在多数情况下都被拒绝，因而此后自由也仅只能徒具外表，因此缺乏自由的情况成为主导将只能是纯粹的偶然。缺乏自由是常规的，自由就成了例外的、偶然的意外事件。(Marx 1842g)

### 3. 新闻业：新闻审查和新闻自由，好新闻与坏新闻

最初，马克思的兴趣在于传播的控制，这主要是因为他朝新闻方面努力是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他在1842年5月，在6篇文章中提供了丰富而引人注目的、关于新闻自由与审查制度的讨论。不过，我在这篇文章里也将提及其他的文章。

马克思把新闻看作大众传播的工具和追求真理与解放的工具。对于他来说，“新闻出版是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它不知道尊重个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智”(Marx 1842g)。<sup>①</sup> 他提出问题：“你们要以官方的方式用特殊的外在的标志来确定精神的表达能力吗？”并且解释道：

对别人我不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对自己我就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人。如果对别人我没授权为精神力量，那么，对自己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精神力量；难道你们想把成为精神力量的特权只赋予个别人吗？每个人都在学习写作和阅读，同样，每个人也应当有权利写作和阅读。(Marx 1842g)<sup>②</sup>

他将报刊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别：那些官方报刊与报刊自由（群众报刊）。然后，他比较了两者的特征：

---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96页。——译者注

② 同上。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无刻不在的、警惕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通讯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天然物质形式转变为价值理想形态的一种文化表征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保留的自我坦承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自由报刊是公益精神,它可以传递到每一间茅屋,比煤气还便宜。它形式多样,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精神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思想精神,流回现实世界。(Marx 1842f)①

受检查的报刊即使生产出好的产品,也仍然是坏报刊,因为这些产品只是它们在受检查的报刊内部表现了自由报刊时候,只是按它们的特点来讲它们并不是受报刊检查的时候,才是好的。而新闻自由即使生产出坏的商品,也仍然是好的,因为这些商品正是违反新闻自由本性的现象。新闻自由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卓越、理性和道德。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无自由的平庸巨怪,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Marx 1842e)②

马克思关于审查新闻的以下描述使我们想起了今天主流大众媒体的一些基本原则:

起败坏道德作用的是受检查的报刊。最大的恶行——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恶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丑陋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样)恶行——消极性。报刊不断撒谎,还得拒绝承认撒谎,就必须抛弃羞耻感。恶意的幸灾乐祸式报道,只选取各民族生活中那些搬弄是非与人身攻击的内容,忽视基于史实的历史理性,只向公众提供历史丑闻;由于缺乏事实判断力,报刊只会抓住社会现象与人物个体的某个方面,妄自尊大地追逐神秘事件,最终将导致公共生活的每个污点仍然被掩盖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79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71页。——译者注

起来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信,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Marx 1842f)<sup>①</sup>

如果报刊接受了审查,马克思不认为这些报刊还有好坏之分。

如果要谈报刊的两种类型,那么它们的差别就应当根据报刊的本质本身,而不是根据报刊之外因素的考虑。受检查的报刊或自由的报刊,其中之一必然是好的或坏的。其实争论的也正是: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也就是说,符合报刊的本质的是自由的存在,还是不自由的存在。让坏报刊驳斥好报刊,实际上就是在维持这一状态:自由报刊坏,受检查的报刊好,而这一点正是需要证明的。基本心智结构、个人阴谋与声名狼藉在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中都可能出现。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会生产出这种或那种产品,因而这一点并不能构成它们的类的区别。泥沼上也会长出鲜花。这里所谈的是本质,是区别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的那种内在特性。……那种坏的自由报刊是不符合它的本质的特点的。而受检查的报刊的伪善平庸、娘娘腔和像狗似的尾巴摇摆不定,只不过实现了其本质属性的内在状态。(Marx 1842e)<sup>②</sup>

#### 4. 新闻自由,审查与反审查

为了能谈论自由、控制和斗争,为处理这些特定关系,必须存在有组织的实体机构,而这样的两个机构就是新闻业和有组织的审查机构。后拿破仑时代的德国承诺依宪法成立一系列省级议会。1823年,普鲁士形成了八个省议会(社会各阶层委员会)。他们由皇亲国戚、骑士、贵族、城乡社区等各阶层代表组成。这其实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冲击下的一种封建议会制度。马克思在当时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者,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他也部分地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者。马克思为自由和尊严而战,反对当局控制新闻界、肆意捏造事实的行为。马克思认为报刊实践活动就是言论自由的兑现,这种言论自由规定着报界与公私机构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文

<sup>①</sup>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83页。——译者注

<sup>②</sup>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70页。——译者注

章 1841 年 12 月普鲁士当局报刊审查条例的颁布实施促成的,也在普鲁士的莱茵兰省引发了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随后,一系列“临时联邦法案新闻检查令”与 1819 年 9 月 20 日在德国各地生效。

马克思认为新闻自由与审查机构(的对立)是历史事实。在他看来,“严格审查下的文学时期确凿地证明了审查机构毋庸置疑对于德国精神产生了灾难性的、极不负责任的影响”(Marx 1842c)。

第一篇确实关于新闻自由、审查机构和作者的文章,标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它写于 1842 年 1 月 15 日至 1842 年 2 月 10 日,1843 年发表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Marx 1942a)。

马克思为了将自己与那些在普鲁士审查法令出台前就宣称要“小心希腊人的礼物”(小心特洛伊木马)的人区分开来,他解释说,报刊检查

“就是官方批评,其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在建立同一个基础上的。”而书报检察官“也就是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书报检察官被委任去控制思想,然而这样是不负责任的”(Marx 1842a)<sup>①</sup>。他继续说:

书报检查制度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为超党派利益服务而只是仅关心自身一党之私利的时候,当它不是带着理智的利刃而是带着任性的钝剪出现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实现了自身目的却又不愿承担为此承担责任的时候,最后,当它如此缺乏批判能力,以致错误地把个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专横的命令当作理性的声明,把墨水污点当作阳光耀斑,把检察官的恶意删剪当作精确构建,把粗鲁强迫当作果敢争辩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Marx 1842e)<sup>②</sup>

谈到该法令的性质,马克思提醒我们“审查制度同时保护统治阶级可以拒绝不合意的交流与批评;禁止媒体成为一种可以监控官员的个体阶层而存在”(Marx 1842a)。马克思宣称审查法令并不是法律:“是警察手段,并且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 1 卷上第 134 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 1 卷上第 178 页。——译者注

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因为它所希望的它达不到,而它达到的又不是它所希望的”(Marx 1842f)。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马克思驳斥了国会所给出的力图证明审查制度合理的证据(比如人的不完善、新闻良莠不齐以及人性有恶的部分等等)。比如马克思认为:

如果人类不成熟成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神秘论据,那么,无论如何,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明智的办法了。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究其本质而言永远不会完善。……发言者所发表的言论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议会是不完善的,报刊自由是不完善的,只要有人存在的任何领域都是不完美的。因此,如果任何一个领域因为其不完善完美而不被允许存在,那么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应当存在的,换言之,人类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利。在这么多的不完善中,为什么偏偏只有报刊自由必须得是完善的?为什么一个不完善的等级议会要求报刊自由必须完美?设若按其本质来说,人类的一切按其存在来说都是不完善的,难道我们因此就应该混淆一切,对善和恶、真与伪一律表示尊重吗?(Marx 1842d)②

为了说明此类论点的荒谬,马克思继续说:

要真正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辩论人就应当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之一。而他不来证明这一点,却去证明自由不是人的本质。他为了保存一个良种而抛弃了整个类,因为难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吗?为了消除产生恶的可能性,他消除了产生善的可能性而实现了恶,因为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因此,在没有人向我们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由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本身中产生的以前,我们就一直要把受检查的报刊看作坏报刊。(Marx 1842d)③

---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78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64页。——译者注

③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71页。——译者注



马克思也同样强调报刊自由有不同的特质：

从观念的角度看来，不言而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的辩护理由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积极的善；而书报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是一种表象反对本质的世界观论战论战，它只具有积极性。(Marx 1842e)<sup>①</sup>

马克思说明了在 22 年(从 1819 年底审查法生效起算)中德国新闻界备受压抑的情况

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察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

对于那些应对这一问题的无效手段(抱怨检察官、个人、法律漏洞或是机构漏洞、法律的特质、报刊记者或是公众)，马克思给出了精彩的述评：

对事物本身的憎恨就会变成对某些人的憎恨。有些人以为人一变换，事物本身也就会起变化。…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制度却比人更有强制力量。(Marx 1842a)<sup>②</sup>

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有斗争才能说服政府和人民，也包括新闻界本身，新闻界的生存权利是真实且必需的。只有斗争才能展现这种生存权到底是退让或是必须，是错觉还是事实”(Marx 1843)。“书报检查制度没有消灭斗争，它使斗争片面化，把公开的斗争变为隐蔽的斗争，把原则的斗争变为无力量的原则与无原则的力量之间的斗争”。(Marx 1842a)<sup>③</sup>

##### 5. 新闻法与审查法的区别

马克思认为审查法是作为警察部门反对自由的一项预防措施。他在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 1 卷上第 166 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 1 卷上第 134 页。——译者注

③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 1 卷上第 172 页。——译者注

1842年把它和报刊出版法进行了比较：

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书报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书报检查法是对自由质疑的法律。新闻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它把自由当作罪犯；对任何一个领域来说，难道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不是一种可耻的惩罚吗？……新闻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新闻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是自由的积极存在。它认为自由是报刊出版业的正常状态，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存在方式；因此，新闻出版法只是同那些作为例外情况的新出版界的违法行为发生冲突，这种例外情况自身行为准则，因而也就毁灭了自己。新闻出版自由是在反对对自身的侵犯即新闻出版界的违法行为中以出版法的面目示人的。新闻出版法宣称，自由是罪犯的内在本性。因此，罪犯在侵害自由时也就是在侵害他自己，这种自戕对出版法来说就是一种伤害，而在这种伤害中，出版自由却看到了自身被认可的身影。……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构建了正义，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即使它完全没有被采用，它也必须存在。（Marx 1842 d）<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法律的积极看法在几年时间里有所改变。例如，在1848年，他认为普鲁士新闻法案是“拿破仑新闻专制的经典衣钵”（Padover 1974, 121）。在1849年，他宣称布鲁士专制主义比拿破仑专制主义更糟糕：

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另一方面以一种高级圣物相伴的官员形式直面与我。他的公务性质之于品格如同献祭之于天主教父，不可或缺。…侮辱这样一个神父，即使是一个现在不再起作用也不再是神父而回归到私生活的人，仍是亵渎宗教、亵渎神圣的行为。（Marx 1849b）

马克思不承认法律的预防性特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法律：

---

<sup>①</sup> 译文摘自《马克思全集》第1卷上第175页。——译者注

是不能预防人的行为的,因为它是人的行为本身的内在的生活规律,是现实生活的精神反应反映。因此,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隐在的,而且只有当人的行为展现出人不再服从自然规律时,自然规律作为国家法律才强迫人成为自由的人;同样,只是在我的生命不再恪守这些生理规律,即患病的时候,规约生命的物理法则才作为异己的力量对抗我。可见,预防性法律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矛盾。(Marx 1842d)

因此,任何预防性法律实际上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悖论。所以,预防性法律本身并不包含标准性的、合乎理性的准则,因为合乎理性的准则只能从事物的本性即自由实践中取得。(Marx 1842e)<sup>①</sup>

## 6. 出版和贸易自由

人类生产和再生产了他们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关于新闻,马克思下面的句子中清楚的阐释了它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关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和性质:

使报刊能成为了提高人们文化水平和智力教育最有力的杠杆的是这样的事实:他把物质斗争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斗争,把血肉之躯的斗争转化为思想斗争,这种需要、欲望、经验主义上的斗争就转化为理论、原因、形式上的斗争。(Marx 1842j)

这解释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但也显示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经济还原论并且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错误的因果联系之上的”这一论断的浅薄和无理。

马克思区分了报刊自由(记者的表达自由)和贸易自由(商业权利):

如果把新闻出版仅仅看成一种贸易,那么,它作为头脑经营的贸易,应当比手脚经营的享受有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家知道,手脚只是由于它们所服

<sup>①</sup>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77页。——译者注

务的对象——头脑——才成为人的手脚。(Marx 1842g)<sup>①</sup>

马克思不接受新闻自由是贸易自由一部分的观点：

行业自由、财产自由、道德自由、出版自由、审判自由，这一切都是同一个类即没有特定名称的一般自由的不同种。但为求团结一致而忘了差异，以至把一定的种所具有的评价尺度、标准、领域用作衡量其他一切种的尺度、标准、领域，那岂不是完全错了。对一种自由之种而言，让其只准备好容忍别的种的存在，而这些所谓的别的种又自暴自弃甘愿被其奴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贸易自由只是行业自由，而不是其他什么自由，因为在这种自由中，贸易的本性是按其内在生存法则不受阻碍地发展起来的。自由的每个具体领域就是这一领域的具体自由，就像每个具体生活方式就是其本性具体化的生活方式一样。如果法院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规而不遵循其他领域（如宗教）的规律的话，审判自由就是审判自由。自由的每一特定领域就是特定领域的自由，同样，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特定自然的生活方式。要狮子遵循水螅的生命规律，这难道不是反常的要求吗？(Marx 1842g)

把出版自由视同为各种贸易自由来经营，无异于本想保护它却反过来扼杀它的无益之举。当一种品质的自由应该按照其他不同品质的自由方式样子去自由，难道我不是在废除这种品质的自由吗？新闻出版向贸易说道：你的自由并不就是我的自由。你愿服从你的领域的规律，同样，我也愿意服从我的领域的规律。按你的方式之自由，对我说来就等于不自由；因为如果木匠要求他的行业自由，而人们把哲学家的自由作为等价物给了他，他是很难感到满意的。(Marx 1842g)<sup>②</sup>

马克思承认：

新闻出版也作为一种贸易而存在，不过那已不是作者的事，而是出版商和书商的事了。但是，这里所谈的不是出版商和书商的行业自由，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88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90—191页。——译者注

而是新闻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首要自由不存在在交易行为中。  
(Marx 1842g)<sup>①</sup>

## 7. 公权与自由

马克思在反对统治力量干涉新闻自由的同时,也为公权和自由辩护,马克思表示:

违背人民心境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公民所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惩治社会人心取向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而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有些人可以做另一些人所不可以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缺乏什么客观品质(像小孩子不会缔结条约那样),不,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意图,他们的心境状态遭到了怀疑。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本国的思想趋向。可是,在一个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唯一占有者的社会中,在一个原则上反对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一小撮良知破坏者臆造了一套逆社会趋势的法律,报复的法律,反对民众心境的法律,实际上这些法律填塞的只是政府成员一家之利的法律是以建立在矗立于不道德国家物质观之上的不道德的执政者心境基础之上的。(Marx 1842a)<sup>②</sup>

## 8. 作者、专业实践与专业观念

### 作者方面

记者(也包括学者)在他们的专业实践中主要面临这样二选一的抉择:要么甘冒各种艰难险阻,成为事实真相的热情追随者;要么追名逐利,成为社会现状忠实信徒与支持者。在事实上国内也有争论,其判定结论多半由记者所能承受的风险程度的决定的。

马克思选择了前者。对他来说,新闻工作是发掘真相的工具,是谋求解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93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21页。——译者注

放的斗争工具。对马克思而言：

真理无处不在，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拥有我，而不是我拥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真理不仅包括结论的真理性，而且更包括达此结论的过程的真理性。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要素在终极结果中是融合在一起的。<sup>①</sup> (Marx 1842a)

他鄙视任何规定形式、精神个体发展方向的惯例与法令；他也鄙视那些据此惯例与法律按图索骥式的专业实践。

第二类记者就如那审查马克思的文章的“愚钝的官僚”一样，是不值得尊敬的专业人士。此类记者对同样的物质及非物质环境进行再加工，但他/她是故意地、有意识地、有预谋地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捏造真相的，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他/她是知道事实真相的。然而，他/她与那些愚钝的官员或者那些像伯尼斯(Edward Bernays)笔下的雇工司机笨杰克(Ewen 1996)一样的小人物不在同样的物质和精神状态下。名叫多里沙尔(Lauenz Dolleschall)<sup>②</sup>愚钝的官员是不会让任何人“从天赐的事物中获得乐趣”的，因此他对于所有看起来可疑的内容都进行了删改，并且(就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说：“现在这是事关我生计的事，现在我删除所有的东西”(节选自 Padover 1974, Vol. 8)。然而这些记者的决定不是基于他们无根据的、无逻辑的观念，而是他/她对相关利益的计算：他/她会进行编辑，然后删掉那些不符合他/她的兴趣和不符合他/她的雇主的兴趣的所有内容。

在1849年对他的审讯中，马克思在辩护演说中表述了新闻和记者的责任：

我宁肯去研究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宁肯去分析历史的进程，也不愿意同当地的要人、宪兵和检察机关打交道。尽管这些先生们以为自己很伟大，但在现代的巨大斗争中他们却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决定同这样的敌手交锋，我认为我们必将做出真正的牺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13页。——译者注

② 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察官。——译者注

牲。但是首先,报刊的职责在于为最近四邻的受压迫者站出来讲话。此外,诸位先生,直接同个人、鲜活个体的私生活发生接触的下级政权机关和社会权力机关是奴隶制度这一建筑的主要支柱。所以,只是一般地同现存关系、同最高权力机关作斗争是不够的。报刊必须反对某一具体的宪兵、某一具体的检察官、某一具体的行政长官。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Marx 1849b)<sup>①</sup>

以上陈述说明马克思认为新闻和记者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他来说,“新闻通常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新闻,哪里就应当有新闻自由”。对马克思而言,新闻自由的问题并不在于:

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问题在于一方面的有权是否应当成为另一方面的无权。问题在于“精神的自由”是否比“反对精神的自由”享有更多的权利。(Marx 1842e)<sup>②</sup>

他在关于思想自由、传播自由和记者尊严的探讨、解释与辩护,对于一些每天恬不知耻地屈从于私人利益和国家权力来赚钱的专业媒体人(和学者)是很重要的一课,而另一些记者(和学者),未经正当的审判,因尝试和计划颠覆政府而入狱超过五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土耳其,全球资本主义中全球本地化的公民独裁在这个国家得到了验证。土耳其被囚的记者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大约有 100 名记者在押。大约有 700 至 1000 起在审案件可能判处共计 3000 年的监禁<sup>③</sup>,穆斯塔法·巴尔贝(Mustafa Balbay,著名记者,最近被选举为议会成员)和阿伯拉尔(Mehmet Haberal,世界著名医学博士,巴斯肯特大学校长,最近被选举为议会成员)都因为计划政变推翻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 6 卷第 277 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 1 卷上第 167 页。——译者注

③ 数据来源:<http://europe.ifj.org/en/articles?search=Turkey>

政府统治而被判三年以上监禁。所有为这一情况发表文章或言论的人都被指控犯有“试图影响公正审判”的罪名并被投入监狱。<sup>①</sup> 近来传媒界(以及学界)的主流职业所为就是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批判过的可鄙的专业精神。

马克思同样通过对作者/记者与商人进行区分,确立了为媒介专业人士基本专业标准:

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的目的就是其本身;作品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而言都是手段,因此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把新闻贬低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者应当遭受外部不自由即书报检查制度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更确切地说,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了。(5月19日,1842g)<sup>②</sup>

在在分析授权的记者与无权的记者的划分时时,马克思发问:“那么,对于有资格的记者与无资格的作者的划分是为了谁呢?”他给出了答案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当然不是为了那些真正有资格的作者,因为他们脱离这一划分也可以施加影响。那么因此这就是为了那些想要保护他们自己、想要用外部特权来影响他人的“无资格”的作者的吧。(Marx 1842g)<sup>③</sup>

他补充道:

德国人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知道造成本国政治发展缓慢以及在莱辛以前文学界贫弱境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够资格的作者”的存在。我国的文学界是由那些不够资格的作者创建的。你们把戈特舍德和莱辛两人在“够资格的”和“不够资格的”作者中加以抉择

---

① [http://www.dha.com.tr/chp-leaders-immunity-in-danger-accused-of-attempting-to-influence-fair-trial-son-dakika-haberi\\_255874.html](http://www.dha.com.tr/chp-leaders-immunity-in-danger-accused-of-attempting-to-influence-fair-trial-son-dakika-haberi_255874.html)

②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192页。——译者注

③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96页。——译者注



吧！……你们从你们的同伙中招募一帮官方作者是肯定无法实现新闻自由的。够资格的作者都是官方的作者，书报检查制度同新闻自由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够资格的作者同不够资格的作者之间的斗争。（Marx 1842g）<sup>①</sup>

### 专业实践方面

马克思的在写给编辑的文章和信件中，发表了有关报刊的许多普遍的和日常的实践操作的观点（比如 Marx 1842h；1842i；1842k；1843；1843b；1843c；1848；1849；1860；1861）。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

- 有关探讨政府强加禁令迫害报刊的内容：马克思质疑这些迫害的合法性和报刊所处环境的本质。
- 议论其他报纸和作者对政府压迫某一报纸的反应：马克思批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地对待报刊的人。
- 对其他的记者关于一个问题、宣告、主张、或批评的文章的评论、回应、估计和批评：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主张可谓从赞同到强烈的辩论和谴责无所不包。
- 报刊中对策略的和/或者文体的使用的评价。
- 对一些报刊报道的评价，这些报道包括了政策、报刊与政治家的关系、报刊与群众的关系，还有报刊对战争的态度。
- 一般的新闻评论。

观察新闻对官方使用镇压和检查措施的态度，马克思强烈的批评了德国的报刊（媒体）。

德国的日报是阳光下松松垮垮、最昏昏欲睡、唯唯诺诺的机构！它最不可饶恕的罪行可以在它眼前犯下，甚至是将矛头对准它自己，同时它会保持沉默并掩盖一切。如果事实不是偶然被获知，那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在有些地方三月里绚丽的紫罗兰如何在救世主恩典下生长起来。（Marx 1849）

对于马克思来说，报纸要保护个人，但不是所有人。

<sup>①</sup>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196页。——译者注

报刊必须对情况进行揭露,但我认为它不应该对个人采取告密行动,除非一种社会弊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或者除非公开性已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普遍实现,因而德文中的告密一词已经不复存在了。(Marx 1843d)<sup>①</sup>

马克思把报刊定位于社会中并认为,在公众和统治势力之间,报刊起调节作用。与此同时,他意识到报纸是表达民众需求和不满的声音的不可替代的手段。

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来分担体验这种贫苦感受,从而减轻这种贫困。(Marx 1843f)<sup>②</sup>

对于马克思而言,自由报刊的语言就是人类状态的语言,而不是人类生活或人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他强调了语言的作用和它与生活条件和官方报告之间的关系:

报刊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态度取决于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影响;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言中所不可能有而且

①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360页。——译者注

②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378页。——译者注

也不应该苛求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给这样一个当权者,在这个当权者面前,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而只有不分亲疏的公民。(Marx 1843f)<sup>①</sup>

作者及其职业实践的特性反映了他/她的专业意识。举例来说,在上文提到的马克思的辩护词中表明了,马克思派给记者和报刊任务是展示自我高度认可的职业的世界观。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某些作家和报界的批评表现出了依附与不依附主流的模式和关系的人在专业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别。

## 六、结 论

理论通常是对诸如有组织的人类实践之系统而融贯的解释。这种解释应该符合被解释的事物,否则理论本身或者理论的解释就会失去有效性和可靠性。然而,这种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可以通过生成与理论相适应的实践或是实践性质的概念来完成的,或者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有效的解释,尽管他们是不相关的,前后不一致的或者矛盾的,但他们来自大量的生产、流通和合法化的实践。合法化必须通过至少两种作用机制来取得:首先,通过以客观性、甚至普遍性的合理化要求为基础的主体间性,建立其主导地位。其次,则是与该主体间性联姻的权力运作。换句话说,这种主导地位是通过一定社会中权力与私人利益间组织化的相互关系获得并维持下去的,在这个社会中,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借助于人的能动实践来实现,主体从物质与非物质生活中塑造意识,同时根据物质与非物质条件反映思想与意识。因此拥有这种力量和控制手段的那些主体在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在哪里生产及其分配物质与非物质产品和服务方面处在有利地位。学术界和学术产品的本质成为了这种主体间主导关系的一部分。当下的研究发现表明,当今学术期刊在议题遴选、问题规划、研究目标、理论与方法云运用等方面,其定位的流行特征无不承载着这种主导地位的具象表达。发表在《媒体与传播研究》期刊的大多数研究是各种主流方法的表现;都把兴趣点集中于对个人的态度、兴趣、偏好和行为以及如何推进功能、企业利益和制度结构。

---

<sup>①</sup> 译文摘自《马恩全集》第1卷上第378页。——译者注

其余的研究主要也主要为如何实现控制与功能替代服务,很少有例外。各种功能主义的主流传播学研究已经被不同的研究者讨论过。例如,哈特(Hardt 1997)指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的角度,这一观点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日益增长的媒体行业内的商业投资的实际需求为问题的出发点。他还表明,美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取向是由自由多元的思想决定的,他们支持工商业利益,而这主导了决定媒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统治阶级以各种积极手段和权力结构吸引学者参与和塑造精神产品和关系的情况并不新鲜。在传播领域有许多例子:心理学家和冷战鼓吹者(拉斯韦尔[Lasswell]、希尔斯[Shills]、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坎特里尔[Cantril]、德威特[Dewitt]、盖洛普[Gallop]、利克特[Likert]、勒纳[Lerner]、贝雷尔森[Berelson]、施拉姆[Schramm]、普尔[Pool]等人)因为参与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分配收到了军方、情报组织和基金会(如:联邦调查局、中情局、洛克菲勒、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兰德公司)给予的数百万美元。知识分子的这种形式的参与仍然是可持续的统治的实践的一部分。关于知识分子和国家结构和不同基金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十分有价值的研究(如 Doob 1947; Schiller 1974; Simpson 1994; Gary 1996; Glander 2000; Solovey 2001; Maxwell 2003; Pooley 2008; Summers 2008; Jonas 2010)。

目前,心理战的活动和研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整个民用领域,包括众多合法化和合理的一个国家的多个政党之间的关系,甚至达到国际水平。早期的研究及其资金盟友帮助出形塑了传播的概念,和传播领域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研究的方向。最近的研究不仅在政治场,同时也在经济领域里持续再现着正在持续着的冲突,这是为了通过思想、利益和行为管理以维持可持续发展。

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参与到有利可图的关系网去,增加从不同资源中获取财政补贴的可能性、获得在大学院系中正式认同和成功的可能性、在主流学术圈中赢得受人尊敬的地位的可能性、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著述的可能性、从官方机构获得资金的可能性,资金主体和专业协会对学术立场的需求是:(1)完全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2)表明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3)采用基于文化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等等理论的一种安全的、有益的方法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无效,(4)给出最为错误和歪曲的解释,比如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意识形态的终结、民主化、知识社会、互相依赖、非殖民化、身份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等等。

### 对支持统治权力结构的理论导向的维护

本次研究发现,应用于《媒体与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建立在发现效果和改进对个体世界观和行为的控制机制的基础上。主流的效果研究大都开始于一个以直接的,无中介的效果为特征的有关说服和传播的简单模型,特别是,此模型的基础是劝服和用可观测的行为模型化的受众。对效果的兴趣演变为受众动机和积极受众选择理论的分析结构,包括详尽可能性模型,归因理论,认知一致论与选择性接触,以及使用与满足理论。如两级和多级传播,社会扩散理论,知识沟和社交网络的取用等理论在给个体心理赋予上下文语境和/或转移至宏观解释的同时,实现了新的研究设计技术,尤其在于量化方式,交互影响和历史数据分析方面。20世纪70年代,在传播的政治、经济和制度背景下转移到宏观层面的设计与分析后,教养理论等理论通过强调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媒体逐渐累增的作用,采用了自由民主的批判性方法。为了缓和媒体带给观众的作用,如议题设置理论和媒介依赖论等理论逐渐出现了。不久,议程合并、启动效应和框架理论成为了新的取向。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氛围下,如接受理论,对各种自由多元文化的研究和划一论等各种理论等渐渐出现,并且在主流中不断扩大影响并促进了传统理论的发展。如接收,解构,重构和阐释等概念可以成为一个循环过程:解释性的转向到积极的、原子的个体。最近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被取样的学术期刊中,这些范式并未收到多少收益。此类方法的增长和持续只发生在当前研究实践的主导范式的边缘。然而,克拉珀(Klapper)对20世纪60年代大众传播研究的概括和建议似乎仍是传播领域大多数研究的纲领性文件:

(1) 主流取向关注的是受众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

(2) 文化主义者,社会互动论者,自由主义多元论者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于信息接受中的特定的社会语境比社会人口统计更感兴趣;

(3) 一些后结构主义者聚焦于观众群体成员的信仰结构,而不只是他们的信仰导向是否和以前一致;

(4) 受众信息接受分析在非常精巧的报道中重新提出了积极观众话题,以参与到让企业免于社会责任的过程中。

克拉珀的建议、当前假性批判和功能性的研究方案的取向都很重要,因为他们都是细致的关于“知人”的知识,从而可以做到“制人”。

对理论主导权的维持是通过功能性的替代路径的创造与提升来实现

的。这些维持和推进在学术关系和生产中是十分明显的。现有研究发现,那些试图全部或部分否定马克思,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衰落的、不充分的、种族中心的、认为马克思除了对于阶级身份外,对其他身份十分迟钝的研究,并不是主流,也不是自由民主理论支配下的研究。主流研究忽视了马克思,而自由民主主义者逐渐借鉴马克思。而研究表明,马克思不是被热情的实践者与促进者(Artz 2006, 6)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所谓“批评性”或“替代性”的范式所争辩、修改、曲解、频繁曲解、夸大与滥用。现有的研究并未在文章中发现任何狂热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推动者,只找到那些所谓的“替代者们”就是“马克思的替代者”,最具“批评性”的范式实际上就是那些“瞄准马克思的批评”。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让我们谈一下“策略”,这来自于60年代末的一波流行趋势,一些学者(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莫菲[Chantal Mouffe]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起步,而随着马克思被认为无效、衰落、不充分而停止使用它。这种趋势非常流行且是有成效的,这种精神产品是思想控制和管理绝佳工具,因为他们自称这是当前有效的替代声音(或直接或间接的指向马克思)。

### 理论上和方法上局限的重复

本研究还发现,大多数的研究,特别是经验主义和伪经验主义(调查)的研究,严重缺乏设计过程中的理论推理、假设构建和结论展现。同样地,以前的一些研究中发现了在《媒介和传播研究》中存在低层次理论的使用(Potter and Riddle 2007; Kamhawi and Weaver 1999)。此外,对于研究目标的陈述是基于满足工业需求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为了了解和控制客户/消费者和媒体/知识工作者的。

上述发现支持了这样的理论推理:某些学者唯一关心的是和个人以及私营组织有关的问题,而非建立与之相关的充分的基本原理来解释现象之本质。这样的趋向进一步表明,学术界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工业结构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大部分的定性研究声称他们正在做的“话语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中的思想阐述并不一致,甚至有所冲突,未能提供或者未能提供适当的信息去解释他们的分析。提供这样不一致的理论陈述和解释,并使用被高度限制的符码,并不减少或消除任何不确定性,而是增加了这些不确定。

绝大部分使用多变量统计分析的定性分析没有这样的假设,即需要多变量统计检验。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假设是基于二元变量关系的假设,因此需要二元变量分析。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只提供一些问题,但不提取任何假设,但做统计分析(包括一些没有提供因果假设的要素分析,或者没有提供因果假设却去测验因果关系)。所有这一切表明,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存在严重有效性问题。

### **有价值的可替代方案的边缘化、降格或者排除,控制性的和功能性的选择路径被提升**

主导地位的存在意味着被主导者的存在,这使得主导与反主导的解放斗争始终在持续的动态当中。这种斗争并非铁板一块,相反,它是多种形式,多个层面的,它不仅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但也与主导实践的具体表现相互关联。本研究发现,有的文章拥有“批判性的和高度批判性的内容”,但很少有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另类方案,这种另类方案根基于,譬如,社会变革意味着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理念之上。几乎所有的“批判性文章”或明或暗地,彻底地或普遍地反马克思主义者,它们是例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拉康(Lacan Ja-caueo),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福柯,鲍德里亚,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拉克劳和莫菲的衍生品。

“批评”并不能使一个理论研究具有批判性。“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是指,如果它不是基于马克思的路径,则它是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思索。许多理论方法把他们的前提基于这样的情况,例如,在国会成员的性别组成的变化,受工资奴役或取得同性恋婚姻法律认可的劳动人口中民族构成的改变——这些并不是“可替代的取向”或“批判性取向”,因为他们要承认并重新整合进入他们批判的主导结构中。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成为一个人性化的系统,即使资本主义的议会是由100%的女性、自由派,左派甚至是共产主义者组成。此外,从阶级分析到目前的当前各种身份政治的转向,都是转变的全球政策和“分而治之”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研究中抛弃利益而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表达,在组织关系中回避人性而只关注文本的结构功能或其他散漫无章的展示及类似这样的研究,都不能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的”和/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认为,作为最后

的分析,受支配的和/或功能性替代范式支持着当下的资本主义模式和关系。

传媒领域是由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建立的。它发展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站在每一个社会科学领域(所有其他科学领域)的交叉点。然而,它并非不受待见或一块学术上的殖民地,任由那些对传播学几乎无所了解的学者们研究、书写。我一直批评土耳其这样的一种现状,在那里传播研究领域仍是一片“殖民地”,它被那些连传播学中最基础的文本都不读的人控制着,这些人大多是在自己的领域都不成功,却在殖民地(传播学领域)中找到了栖身之所。近年来,传播研究领域正在被一群最差的门外汉统治着。他们不仅仅破坏性地改变着传播学,也改变着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他们主要是来自文学、符号学、诠释学。传播学中缺乏文学、符号学或者文化背景的学者越来越多的状况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这些学者通过进行文化研究或者话语分析进入这支花车乐队之中。新的殖民者将大众传播的研究从一个领域推向另一个领域,即,从处理在组织化权力结构与利害关系下那真实的人类关系,转换到对支离文本的解释以及无意义的言谈。相应地,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定性的传播研究远离了现实的人的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转向终端产品的分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品、流程或文本互动(如语言、诠释、解构或话语)被称作“决定性的主体/因素”。

### 物质上的、非物质上的富有与贫穷的产生<sup>①</sup>

在学术关系中统治和争斗的本质,也在同样在新闻界、论文、出版界中,它依赖于在一定的时空中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决定条件。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学科思想的交流”,与主体间的主导关系的建立、维护/保持以及扩展深刻相关,这种主导关系有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他们聚集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研究传统周围,提供着安全的工作保障、地位和资金投入。这种相互利益系统中的主导关系包含着对功能性知识的生产 and 分配的控制,这种知识对该这一利益系统是有益的。在21世纪,学术研究群体中的权力关系和竞争形式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形成:它直指“科研中的个人利益”要旨,通过向出价更高者服务而实现,这其中的出价包括金钱、声望与地位。

---

<sup>①</sup> 参看对于知识和知识生产的有价值的讨论:Marx 1971a; Marx 1973; Marx and Engels 1969; Carchedi 2005; Fuchs, 2010; Mosco & McKercher 2008; Mosco 2008; Schiller 1974 and 1987; Schiller 2007; Weiler 2006; Thompson 1997。



在学术刊物中的主导情况是：定量研究占大多数，定性研究很匮乏，标准的研究呈现异常。在这一框架内，研究结果提供支持的事实，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至少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非物质生产的主导关系（生产的意识形态、思想、意识、信仰、感情、情绪、同情、敏感和一切非物质的方面）。

第一种知识生产，是建立在以促进资本主义结构与关系为要旨的科研上。这样的知识生产很少产生于大学，但主要是在控制性的环境中，如 R&D 公司的部门，私人研究公司和政府机构。这种知识是很少为公众和市场生产（不是作为一种商品），这样的知识是一个不公开的，机密的和被高度保护的产品。只有当先进的知识被生产出来和先进的控制机制建立起来时，这样的产品才能面世。这些知识使工业生产、推进和控制成为可能。我们不可能在学术刊物上看到这样的知识，除非它被认为对于建立控制机制和提升市场霸权必不可少。我们没法接近它们。

第二种是为思想和行为管理所生产的知识。我们可以把这种知识生产分成几个子类别：

（1）关于人的知识：这类知识为工业和制度决策、政策制定、执行、审订、监控、订正提供有用的信息，在这一视野下的人是消费者、顾客和选民等。营销、广告和实证经验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在这一领域发挥着作用。

（2）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表现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目的是合法化工业结构和实践、劳动关系、工资政策和工作条件，以及为了去处理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使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从抽象的思想、感情、认同在工作中得到满足。学校中的考试和等级系统，让学生做好准备，愿意接受工业系统中的结构性不平等。组织化的传播研究，着重关注传播审计，灵敏度培训，换位思考，有效沟通，工作人员的态度，行为，工作绩效和在工作中的关系，类似的这些是专为工人操纵所设计，以便在不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情况下有更好的性能。组织内的公共关系活动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3）控制人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为了保持一定层次和类型的意识、感情和敏感性，它们为现实中主流生活方式与关系提供辩护，并且使人们适应恶劣的条件，准备接受统治力量所强派的个人或集体屠杀（杰伊·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 的臭名昭著的主张“我可以雇用一半的工人阶级杀的另一半”已经过时了，统治者不必雇佣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被雇佣与使用）。这样的知识中的某些部分（如情感、宗教和迷信价值观的产生和运用），是统治阶层在人类历史上成功使用的策略的延续。这以前的统治知识在一个国家

被重塑、复制,并且以同样或全球化的形式散播到全世界,被其他国家的其他统治阶级所使用。这是资本主义方式全球一体化的基本环节之一。这种知识的内容和意义并不在于其普遍有效性,而是在于对统治者利益与实践的极大促进作用。例如,宗教思想和情感,让人民在20世纪60年代拒绝看电视,在清真寺使用收音机和扬声器也被认为是一种罪,直到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撤销。这就是所谓的整合,将原有的功能性思想、结构和实践整合到新的利益和统治方式、统治关系当中。这都是真实的,不仅仅是对于那些关于人的知识来说,同时也对于在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的知识来说,这种真实也是因为他们:在本研究中的77个期刊的大多数文章来源于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其他部分的知识属于阶级统治的现有模式。无论它是否拥有穿越历史的特征,这方面的知识是用来维持对人进行控制的所有可能统治方式。此外,控制人的知识对于创造“炫耀性消费”和消费社会,以及建立一种特定利益、参与、敌意和意愿的政治气氛是有功用的。这种知识的目的是在早期青少年阶段僵化人民的心智和兴趣。这种“知识”(将无知视为有知的再生产)是由大众媒体,文化和政治组织,向不同阶级接受正规教育的人提供的。

(4) 为专业人士提供的知识以及由专业人士提供的知识:这是一种受情景条件限定的知识,为适应从事一定功能的职业活动的学者们的注意力、兴趣、研究和教育的关注点而生产的,这些学者一般指向特定的功能性、专业性的活动。这些日常性的、组织化、常规化的活动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并再生产了组织化的生活。大多数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例如电视情景剧的生产者,会对这种产品生产有错误的总体认识。然而,这种可能性在报纸编辑、传媒人和学者那里会低一些。一个学者会对自己所选择的理论和方法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一个经过精确计算的和事先定好的选择。我们讨论的这种知识和知识生产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种专业性研究成果的数量和事实上由组织化的决策者使用的产品的数量都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然而,大多数知识活动的目标是让研究者在特定的导向和关系领域中保持忙碌。这些活动的产品对于工业用途来说是废品垃圾,但同时,对于工业政治的思想和利益控制来说,是极其有用的。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大多数的研究者就像是足球迷:狂热的球迷被吸引去观看或现场观看足球赛,研究者被引导着在特定的主导模式中从事研究。研究者和球迷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球迷们仅仅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而研究者则获得了额外的收益,比如金钱和地位。

第三种是关于知识生产条件的知识生产。我们发现在这里有至少两个规制策略和方法：排除和扭曲的纳入。这类知识生产中的一部分有排他性的特点：就像在本次研究中发现的，它将马克思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对于知识生产和知识生产条件的分析排除了出去。这种排除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最首要的一个是可能的生产价值或者生产的创造剩余可能性。比如，成功排除一种思想，人们会认为这种思想（比如学习大众媒介理论）是没有用的，或者支持某种思想（比如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在传播学研究中的意义）是毫无收获的。纳入性特点包括各种歪曲、无效化、贬低、边缘化和非适当化。

上述有关知识生产的解释表明，社会上作为个体处在不同位置的每个人、每个被组织起来的实体都参与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个人的知识和组织实体的知识以及行为表现都身处意识形态坐标之中，并表现着他们在阶级控制和斗争中的位置之本质。在本研究中，几乎所有的传播学者，很少有例外，将自己定位成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位置上。这是最有可能的，因为他们要获取物质和非物质奖励，这些奖励由同一阶级提供，学者们还要逃避不同种类的惩罚，这些惩罚加于那些行为表现“异类”者。他们没有把兴趣放在为大众利益而进行的知识生产、创造、传播和使用的观点上。甚至，他们对于下面的问题也不感兴趣：影响媒体实践、决策和把紧迫的社会问题当作一个议题去调查。

这样的研究结果也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财富分配本质的结论提供了支持。财富的生产是社会的，因为每个人都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但分配过程是以一种私有的方式，只有少数拥有并控制生产方式的人以此来分配绝大多数财富。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过程中：财富的分配，在物质的收益方面和功能性知识方面被高度控制。

### 主导利益与关系在新媒介中的扩展

最近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议题、问题、关注点、意识形态、方法和理论也适用于计算机媒介的传播研究中。我们所目睹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有关电视类似的神秘化和功能性的讨论，在互联网中得以重现。

现在存在一些新的议题和数据收集技术，起因于新的个人通信技术的性质，如手机和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但是，他们仅仅是执行组织目标的工具，因此他们并未改变或放弃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一些新问题，是老问题的重现，比如说新媒体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也有些令人困惑的新

的术语,如社交媒体,就好像其他媒体不是具有社交性、经济性、管理性和指导性。事实上,所有的新媒体都是具有社会性、经济性、产业性、管理性和指导性。技术上的多向性不会使一个交流的行为变得民主、对称或者双向;手机是一个多向设备,相比于互联网,它的优势在于可以两边交流或者多边交流。但是,并非手机或者互联网决定了关系的本质,决定因素是结构化的权力关系和利益的本质。一个技术设备的双边或者多边性无法改变权力关系的性质和传播的性质。手机不改变你和你老板之间的关系方式,并不会改变即你的老板就是你的老板的事实。如果下列任何一个决定性因素缺失、被禁止或者仅仅由单方执行,民主的关系和传播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不管你是否使用互联网或者手机,如果你不做到以下几点,你便不是自由的,并且你的传播是不是对称或民主的:

- (1) 启动或停止传播
- (2) 组织或影响互动时间,地点,条件的组织
- (3) 填写,修改和改变你想传播的内容
- (4) 在互动中改变或停止信息流的性质(例如,改变话题)
- (5) 在任何节点,结束沟通
- (6) 对目标和结果施加影响,而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

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参加每一次政治的讨论,这种参与不是把政治制度变成民主制度,并且这样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互联网是一个民主化的机构,因为你不能对要讨论的问题、集体采取的政治决定、将要采取的举措和将要被分配和共享的利益施加影响。互联网是经济、政治、心理、情绪和行为控制的最新手段,最新增加的和改进的人民时尚“鸦片”——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对于系统来说具有最大可能的危险性。从本质上讲,它是统治、控制和斗争的新领域。

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互联网研究,它研究互联网技术的结构和使用如何加剧社会劳动实践、财富分配国家监视活动方面的社会不公,以及如何开辟控制与斗争的新途径。然而,有许多对于互联网在参与式民主、自下而上的政治形式(好像这种形式在现行的政治结构中是不可能的)中的作用的,这些研究其中很多都高声赞扬积极活动小组、地下民主、民主的和游击战式的公共空间。我必须重申,使用通讯媒体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了参与式民主或者处在了参与式民主的水平。参与民主或赋权不等于“使用或消费”这一特定的方式。只要我们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只要我们是无法影响决

策过程和主导力量的统治实践,参与消费或使用(包括使用“写作,原创作者”)从来不意味着民主地参与到日常生活或者赋权。曾经有人通过互联网改变他/她的工资或工作条件了么?我在此重申,互联网是不解放的工具,而是一种控制和斗争的工具。我们现在有一个被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控制的额外的介质。它是另一种当代的斗争领域和斗争手段,这斗争反对统治力量在24小时内随意对我们进行监视,这种监视的可能性在急剧增加。

### 建议

这些建议只对于那些习惯质问他/她自己和生活做任何事、所有事的人才有效,而对于那些将自己的利益和出资人的利益连在一起的人就毫无作用,因为他们不会像前一类人那样阅读这篇文章。那些读者要么是支持者、同情者,要么是关心马克思的研究路径的人。有些人读只是为了知道尽可能地多。另一些人阅读是为了收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基于目前的研究和积累到的知识,我给出如下的建议:

一些研究存有严重理论概念和方法论上的问题。那些不是传播学领域却进行了传播学研究的人应当先读一些传播学研究中的基本文献,而不是粗浅地读“信源-信息-信道-受众-效果”这样的简单原则和类似的误解。那些有传播学背景的人,要么远离对文化研究、话语分析、接收分析、符号学等这一类的普遍的兴趣,要么首先增加一些基本的例如符号学及符号学方法的基本知识。此外,不要做出任何评价以及忽略那些最基本的文本环境例如“一般来说”这样的句前或者句后的词句,也是学术尊严的一部分。同样,如果问题是关于马克思这样一个被普遍扭曲的人的,我建议应该读原始资料。

一些研究在选择社会重大问题、理论和方法方面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学术界的普遍性所致。我建议,现在是开始质疑占统治地位的研究取向的时候了,在寻找一种有意义的理解社会中传播的本质和社会变革的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了,功能主义的理论方法、其当代版本和它们对于组织化的人类生活和环境的显性或隐性的假设与结论已经被很好地记录在案,并且在当今的传播学学术界中仍可听得到它们的共鸣。在这个优势力量多方面主导情势下,马克思的方法的基本优势是,在质询社会问题方面提供了许多更好的理论与方法论上手段与途径。同时,它引导我们以最有意义的方法通过综合考量传播产品、控制、颠覆、压制、统治与斗争等如何实现其生产、分配与消费实质的可能语境

决定性要素来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的方法使得多层次关系/互动传播学的系统研究和分析成为可能,其范围可以涵盖从个人到全球层面。还没有足够有效的方法能实现对现有条件、发展和变化的研究。举例来说,基于均衡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方法以及其现代版本的现代化/发展研究,不仅仅在解释方面有不足,而且在关于媒体和传播的相关问题上有神秘化和虚构的趋势。最近的世界性危机同样也意味着对于在社会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传播学领域内普遍的主导方法或是新主导(neo-dominant)方法的危机。因此,尽管存在障碍,马克思的方法仍然是对于任何类型的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方面,最切实有效的方法。

虽然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理论的、概念的及实践上深刻的解释,但我们仍然对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及他对媒介和传播学研究的贡献有需求。像这样不时地考察《媒介与传播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科研导向之本质,是一项重要的、建设性的学术创造。关于该领域地位、历史发展和本质特征的学术讨论是这类活动的必要的成果。

我相信在现在的出版环境和职位环境下,任何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首创行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和整个传播学领域的一项非常有意义和重要的贡献,鉴于单纯提及马克思之名都有可能招致(而且过去也确实常常招致)迫害。

### 参考文献:

Adakli, Gülseren. 2009. The Process of Neo-Liber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urkish Media Sector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edia Architecture. In Jackie Harrison, and Bridgitte Wessels (eds.) *Mediating Europe: New Media, Mass Communications*. N. Y.: Berghahn Books.

Allardt, Erick. 1999. The Fu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A Comment. *Current Sociology* 47(4):13—17.

Babe,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Knowledge: Neglect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Age of Fast Capitalism(as Before). Accessed February 4, 2012. [http://www.uta.edu/huma/agger/fastcapitalism/2\\_1/babe.htm](http://www.uta.edu/huma/agger/fastcapitalism/2_1/babe.htm)

Babbie, Earl R. 2004.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0<sup>th</sup>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Bagdikian, Ben H. 1997. The Realities of Media Concentration and Control. *Television*

*Quarterly* 29(3):22—28.

Bauer, Martin W. , and Pablo Jensen. 2011. The Mobilization of Scientists for Public Engagement.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3—11.

Berube, Michael. 1996.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elling Out. Accessed January 28, 2012. <http://www.altx.com/ebr/ebr2/2berube.htm>

Berube, Michael, and Cary Nelson. 1995. *Higher Education under Fir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Blackburn, Robin. 1973.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Bodemann, Y. Michal. 1979. The Fulfilment of Fieldwork in Marxist Praxis.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4(2):155—161.

Boyer, Richard O. , and Herbert M. Morais. 1965/1980. *Labor's Untold Story*. New York: UE.

Carchedi, Guglielmo. 2005. O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Capitalist State and Its Economy: Democracy in Socialism*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2), edited by Paul Zarembka, 267—304.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Cerwonka, Allaine. 2009.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Hegemony, and Neo-Cold War Ideology. *Cultural Studies* 23(5—6):720—735.

Chouliaraki, Lilie, and Norman Fairclough.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Dei, George J. S. , and Gurpreet S. Johal. 2005. *Critical Issues in Anti-Racist Research Methodologies*. New York: Peter Lang.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Domenech, Antoni. 2009. University Autonomy, a Return to the Thirties. Accessed January 12, 2012. <http://www.barcelonametropolis.cat/en/page.asp?id=23&ui=148#>

Doob, Leonard. 1947. Utilization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1(4):49—67.

Dorfman, Ariel. 1983. *The Empire's Old Clothes*. New York: Pantheon.

Ewen, Stuart. 1996. *PR! A Social History of Spin*. New York: BasicBooks.

Fetscher, Iring, ed. 1969.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Pressefreiheit und Zensur*.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Fuchs, Christian. 2010. Class, Knowledge and New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2(1):141—150.

Fuchs, Christian. 2010a. Grounding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Karl Marx.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4(1):

15—41.

Fuchs, Christian. 2011. An Alternative View of Privacy on Facebook. *Information 2*: 140—165. Accessed February 7, 2012. <http://fuchs.uti.at/489>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Gans, Herbert. 1975. Social Science for Social Policy. In *The Use and Abuse of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Irvin L. Horowitz, 3—23.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Books.

Garnham, Nicholas. 2001.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yth or Reality. Accessed January 12, 2012. <http://www.er.uqam.ca/nobel/gricis/actes/bogues/Garnham.pdf>

Gary, Brett. 1996.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Mobilization for the War on Word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3):124—147.

Glander, Timothy R. 2000.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 Educational Effect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Mahwah, NJ: Erlbaum.

Gorz, Andre. 1980. On the Class Character of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Ideology of/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edited by Hillary Rose and Steven Rose, 59—71. Cambridge, MA: Scenkman Publishing.

Golding, Peter. 2000. Forthcoming Featur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Future. *Sociology* 34(1):165—184.

Grossberg, Lawrence. 1997.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Essays o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Gunaratne, Shelton. A. 2010. 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2(3):473—500.

Hardt, Hanno. 1997. Beyond Cultural Studies—Recovering the ‘Political’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1(2):70—79.

Hardt, Hanno. 2000. Communication is Freedom: Karl Marx on Press Freedom and Censorship. *Javnost-The Public* 7(4):85—100.

Haye, Yves de la. 1980. *Marx and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Paris: International General.

Jhally, Sut. 1993. Communications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Marx, Innis and Technology. *Continuu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e* 7(1). Accessed December 2, 2011. <http://www.mcc.murdoch.edu.au/ReadingRoom/7.1/Jhally.html>

Jonas, Marie. 2010. A Short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Psy-



ch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the U. S. Military. [http://www.law.berkeley.edu/historyofAPAandMilitarypaper\(final\)11June10.pdf](http://www.law.berkeley.edu/historyofAPAandMilitarypaper(final)11June10.pdf)

Kamhawi, Rasha, and David Weaver. 2003.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from 1980 to 1999.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0(7):7—27.

Klapper, Joseph. T. 1960.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Martin, Brian. 1998. Tied Knowledge: Power in Higher Education. Accessed January 7, 2012. [Http://www.bmartin.cc/pubs/98tk/tk02.html](http://www.bmartin.cc/pubs/98tk/tk02.html)

Marx, Karl. 1842a. Comments on the Latest Prussian Censorship Instruction. Accessed January 13,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02/10.htm>

Marx, Karl. 1842b. Prussian Censorship.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free-press/ch01.htm>

Marx, Karl. 1842c. Opponents of a Free Press.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free-press/ch02.htm>

Marx, Karl. 1842d. On the Assembly of the Estates.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free-press/ch03.htm>

Marx, Karl. 1842e. As a Privilege of Particular Individuals or a Privilege of the Human Mind?. (May 12)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free-press/ch04.htm>

Marx, Karl. 1842f. Censorship.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free-press/ch05.htm>

Marx, K. 1842g. Freedom in General.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free-press/ch06.htm>

Marx, Karl. 1842h. Editorial Note: Communism and the Augsburg Allgemeine Zeitung. Accessed January 10,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10/22.htm>

Marx, Karl. 1842j. The Supplement to Nos. 335 and 336 of The Augsburg Allgemeine Zeitung on the Commissions of the Estates in Prussia. Accessed December 3,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12/10.htm>

Marx, Karl. 1842k. The Polemical Tactics of the Augsburg Newspaper. Accessed November 28,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11/29a.htm>

Marx, Karl. 1843. The Ban on the 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12/31.htm>

Marx, Karl. 1843b. Polemical Articles against The Allgemeine Zeitung. Accessed November 28,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3/01/03.htm>

Marx, Karl. 1843c. Stylistic Exercises of the Rhein-und Mosel-Zeitung. Accessed November 28,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3/03/13.htm>

Marx, Karl. 1843d. Cabinet Order on the Daily Press.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11/16a.htm>

Marx, Karl. 1843f. Justification of the Correspondent from the Mosel. Accessed January 12,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3/01/15.htm>

Marx, Karl. 1843g. Justification of the Correspondent from the Mosel. Accessed January 12,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3/01/15.htm>

Marx, Karl. 1848. Articles by Marx and Engels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subject/newspapers/neue-rheinische-zeitung.htm>

Marx, Karl. 1848a. Communist Manifesto.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ch02.htm>

Marx, Karl. 1849. The Censorship. Accessed November 28,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9/03/15b.htm>

Marx, Karl. 1849b. Speech by Karl Marx; The First Trial of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Accessed November 28,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9/02/07.htm>

Marx, Karl. 1853. The War Questio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3904. Accessed October 21, 2009. <http://csf.colorado.edu/mirrors/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nydt/531021.htm>

Marx, Karl. 1853b.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14 Jun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3/06/14.htm>

Marx, Karl. 1853c.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14 Jun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3/06/14.htm>

Marx, Karl. 1854. Declaration of War. -On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Questio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April 15.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4/03/28.htm>

Marx, Karl. 1857. Russian Trade with China. *New York Daily Tribune* 7 April,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04/07.htm>

Marx, Karl. 1857a. Introduction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ppendix I. Accessed November 23,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9/critique-pol-economy/appxl.htm>

Marx, Karl. 1857b. The Revolt in India. *New York Daily Tribune*, September 15. Ac-

cessed November 25,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09/15.htm>

Marx, Karl. 1857d. *The Grundrisse: Notebook III. The Chapter on Capital (Continuation)*.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ch06.htm>

Marx, Karl. 1859.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9/critique-pol-economy/ch02\\_4.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9/critique-pol-economy/ch02_4.htm)

Marx, Karl. 1859a. *Grundrisse: Threefold Character, or Mode, of Circulation*. Accessed December 13,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ch13.htm#p678>

Marx, Karl. 1860.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Free Press: Prosecution of the Augsburg Gazette*. Accessed December 3,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0/02/04.htm>

Marx, Karl. 1861. *The Opinion of the Newspapers and the Opinion of the People*. Accessed January 13,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1/12/31.htm>

Marx, Karl. 1861a. *The North American Civil War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ccessed February 13, 2012. <http://libcom.org/library/american-civil-war-karl-marx>

Marx, Karl. 1863—1883. *Capital Volume III*.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ch39.htm>

Marx, Karl. 1964.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T. B. Bottomore). London: McGraw-Hill.

Marx, Karl. 1867. *Capital Volume I*.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index.htm>

Marx, Karl. 1971a.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 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871. *Letter to Ludwig Kugelmann*. Accessed January 12, 2012. <http://solomon.tinyurl.com/cgi-bin/asp/philo/soth/getdoc.pl?S10022522-D000107>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75.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76. *Capital. Vol. I*,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77.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1885. *Capital Volume II*. Accessed December 13, 2011. <http://www>.

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5 - c2/index.htm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Accessed December 13,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german-ideology/ch01c.htm>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62.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0/letters/90\\_09\\_21.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0/letters/90_09_21.htm)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5.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55). 2<sup>nd</sup> ed. Moscow: Progres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9.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ttelart, Armand, and Seth Siegelau. 1979.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Capitalism, Imperialism*. Bagnolet: 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Research Center.

Maxwell, Richard. 2003. *Herbert Schille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Maxwell, Richard. 200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cChesney, Robert W.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Enduring Issues, Emerging Dilemma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ingers, John. 1996. A Comparison of Maturana's Autopoietic Social Theory and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Systems Research* 13(4): 469—482.

Mosco, Vincent. 1982. *Pushbutton Fantasies*. Norwood, N. J.: Ablex Publishing.

Mosco, Vincent. 1996/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Sage.

Mosco, Vincent.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2008.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Mosco, Vincent. 2008.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1(1): 105—115.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1977.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 and Janet Woollacoot, 12—43. London: Arnold.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1978.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5(3): 339—356.

- Padover, Saul K. , ed. 1979. *The Letters of Karl Marx*.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Padover, Saul. K. , ed. 1974.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Censorship*. New York: McGraw-Hill.
- Philo, Greg, and David Miller. 2000. Cultural Compliance and Critical Media Studi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2(6): 831—839.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www.glasgowmediagroup.org/content/view/3/>
- Pooley, Jeferson. 2008. The New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edited by David Park and Jefferson Pooley, 43—69. New York: Peter Lang.
- Potter, W. James, and Karyn Riddle. 2007.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Media Effects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4(1): 90—104.
- Potter, W. James, Roger Cooper, and Michel Dupagne. 1993. The Three Paradigms of Mass Media Research in Main-stream Journals. *Communication Theory* 3(4): 317—335.
- Riffe, Daniel, and Alan Freitag. 1997. A Content Analysis of Content Analyses; Twenty-Five Years of Journalism Quarterl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4): 873—882.
- Schiller, Dan. 2003. End of the Telecom Revolution. *Le Monde Diplomatique English Edition*, August 2003. Accessed January 10, 2011. <http://mondediplo.com/2003/08/08schiller>
- Schiller, Dan. 2000.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Schiller, Dan. 2007.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IL: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chiller, Dan. 1993. Capitalism, inform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6, edited by Stanley A. Deetz, 386—406. Newbury Park, CA: Sage.
- Schiller, Dan. 1982. *Telematics and Government*.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 Schiller, Herbert L. 1971.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Schiller, Herbert L. 1974. *Mind Manager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Schiller, Herbert L. 1987. *Culture Inc. :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iller, Herbert L. 1991.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iller, Herbert L. 1992.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Schiller, Herbert L., and Ithiel de Sola Pool. 1981.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 Ex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15—23.

Shaw, Donald L., Bradley J. Ham, and Diana L. Knott. 2000. Technological Change, Agenda Challenge and Social Meld-ing: Mass Media Studies and the Four Ages of Place, Class, Mass and Space. *Journalism Studies* 1(1):57—79.

Simpson, Christopher. 1994. *The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82.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Solovey, Mark. 2001. Project Camelot and the 1960s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olitics-Patronage-Social Science Nexu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1(2): 171—205.

Summers, Frank. 2008. Making Sense of the APA: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y and the Military.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18(5):614—637.

Therborn, Göran. 1976. *Science, Class and Society*. London: New Left Books.

Thompson, Herb. 1997. Ignorance and Ideological Hegemony: A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 8(4):291—305.

Tomaselli, Keyan G., and Arnold Shepperson. 2010. All the World's Brothel Metaphysics of the Text and Cultur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ritical Arts* 24(1):51—74.

Wasco, Janet,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eds. 2011.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sup>①</sup>

##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蔡蕙如(译),吴畅畅(校)

[导读]在本文发表前,有关网络的“批判”研究或“批判”网络的研究非常多,但是本文诚属第一篇系统性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源,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厘清所有相关“批判的”网络研究对批判认识的不足,意即没有正视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研究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对目前从事或准备投入批判网络研究的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过去十多年来网络普及程度与变化程度甚快(例:速度、形式-网页、部落客、社交媒体),一直以来,比较多的批判性研究着重关注某些问题现象,并且经验性地诠释“新现象”的意涵,这反映在本文所提及的“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理解何谓批判”和“从规范的程序来理解批判”两种长久以来辩论中。就我的理解,即使前者的“批判网络研究”解释了经验层次上的某些看似不平等或解放的现象,但根本上缺乏宰制结构的系统性分析,所以在研究过程其立论是:潜在(或无意识地)肯定主流因特网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即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核心概念:阶级、剩余价值、剥削、

---

<sup>①</sup>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信息与媒体系媒体与传播研究的讲座教授。他也是统合理论信息研究小组(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Research Group)的委员会成员和 tripleC(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认知、沟通、合作)的编辑:一本为了全球永续信息社会的期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批判理论、媒体政治经济学、ICTs(传播、信息、科技)、批判信息社会研究、ICTs 和社会。它同时也是许多出版品的作者,包括《网络与社会:在信息时代下的社会理论》(New York:Routledge 2008)和《批判媒体与信息研究的基础》(New York:Routledge 2011)。他是 ICTs 和社会网络的创办人之一,也是欧洲社会学协会的研究网络 18-传播与媒体研究的社会学的主席。christian.fuchs@im.uu.se, <http://fuchs.uti.at>



商品化等。所以很轻易地,我们只看到研究问题的表面,而无法提出根本的问题(或解答)。我认为在网络研究里,尤其容易遇到这种状况,这是因为我们在做网络研究时,将其场域特殊化之故。此外,本文的分析与厘清,对我们理解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和关于网络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之间所体现的“批判”背后指涉的意涵,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批判的网络研究,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网络批判理论,批判的网络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马克思回来了

## 一、导 论

在当代资本主义生活中,网络已成为一个形塑当代资本主义生活,并同时被形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技术体系(socio-technical system)。网络研究也成为用来思考社会、个人独特性、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的重要领域(Fuchs,2008)。

有些学者从住房与财经危机探讨第三世界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这也再度燃起各领域兴趣,将其自身贴上明显的批判以及反资本主义者的标签(Harvey,2010; Žižek 2009,2010b),为了反映出网络研究取径,往自身贴上再清晰也不过的批判标签的这种状态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此,本文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批判的网络研究取径的概述,指出此领域的重要概念,并且体现批判网络研究的批评。本文的讨论分为几个部分:回到马克思(第二节)、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第三节)、批判政治经济学/网络批判理论(第四节)、这两种取径的比较(第五节)、批判网络研究概念的探讨(第六节)、批判网络研究的批评(第七节),最后为结论(第八节)。

## 二、马克思回来了

伊格尔顿(Eagleton,2011)认为从来没有一位思想家像马克思一样遭受如此扭曲,并在其著作核心呈现出与一般对马克思的偏见完全相反的态度。齐泽克(Žižek,2010b)认为,最近的经济危机导致研究马克思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再次兴起。这也展现在主流媒体对于马克思的关注。例如《时代》杂志曾以马克思做封面人物,并提问:马克思会怎么思考全球金融危机?(2009

年2月2日《时代》杂志)霍布斯鲍姆(Hobsbawm, 2011, 12f)认为,我们“必须问马克思式的问题”(13)才能理解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以及现存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议题。他也相信:“无论是单一或结合运用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都已无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是时候来严肃看待马克思了!”(Hobsbawm 2011, 419)

如同德里达(Derrida, 1994)所提到的一个笑话:就算人们没怎么指望马克思主义,但对各种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像是不断纠缠资本主义的幽灵,时刻都准备归来。苏联解体后,这种自相矛盾持续了将近20年,资本主义似乎已加剧全球性的问题,导致贫穷、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果,并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形式重返,以及随之而来的是再次出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马克思已死,资本主义长存的论调喋喋不休一再反复,但如今马克思已再度归来。

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时,马克思著作有六大面向尤其攸关:

- 对于许多社会理论家而言,资本主义全球化似乎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个重要面向(例:Callinicos 2003)。这个主题也链接到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团结作为反抗形式的命题,在今日则以另类全球化运动(the altermondialiste movement)<sup>①</sup>实践之。

- 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于机械、传播的意义与一般知识分子的概念时,早就预料科技、知识和媒体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例:Dyer-Witheford 1999; Fuchs 2008, 2011; Hardt and Negri 2004; McChesney 2007)。

- 由于新自由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imimizerization),这意味着需要再度关注马克思主义范畴的阶级概念(例:Harvey 2005)。

- “9·11”后的全球反恐战的暴力和镇压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与监控强化,导致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再度受到关注(例:Fuchs 2011, chapter 5; Hardt and Negri 2000; Harvey 2003)。

- 生态危机的出现,再度实现马克思著作的核心:一个介于现代工业主义和自然之间的对抗,以及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例:O'Connor 1998)。

---

<sup>①</sup> the altermondialisme movement 在此译为另类全球化运动。altermondialisme 为法文,翻译为英文则是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alter-globalization)。对立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另类全球化运动强调的是全球性的合作与互助行动,并且反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反对环境破坏、反对跨国性的劳工剥削、反对侵害人权等议题。——译者注

• 新全球经济危机在 2008 年的出现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至今仍相当重要(Foster and Magdoff 2009),资本主义本质上似乎就是充满危机的。

齐泽克认为这些在生态危机、知识产权、生物遗传学、新形式的种族隔离、贫民窟等这些脉络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抗,显示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有一种“看似可疑又太过简单的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Žižek 2008,6),承诺一些理想却不可能实现的修辞。例如:参与、自我组织、共同合作,这种标示软性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让我们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重新开始,并捍卫其失落的事业。泰尔朋(Therborn)认为,在 21 世纪有“一系列新的力量和反抗的可能性需要保留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使人们从剥削、压迫、歧视,和无可避免的特权和苦难之间的联系中解放出来”(Therborn 2008,61)。杰姆逊(Jameson)相信全球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和灾难来得正是时候”,并从全球失业率来看“马克思如同资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般”(Jameson 2011,1),其所创造的《资本论》第一卷(Marx 1867)就是一本最为实时的书。

网络研究必须具体关注资本主义如何形塑网络,又如何被网络所形塑的分析才有意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反思网络研究,并重新调整成网络的政治经济和批判理论的批判,顾及媒体、科技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特质,即分析“资本主义结构如何形塑媒体(McChesney 2007,79),社会关系结构里的传播角色和……特别受到关注的社会权力,就是为了分析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里的角色”(Garnham 1990,7),以及媒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分析(Knoche 2005,105)。

在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媒体、传播和文化的批判分析如同新物质般改变持续前进的资本主义。20 世纪早期的取径,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包括像是葛兰西(Gramsci)、卢卡奇(Lukács)、柯尔施(Korsch)。后两位思想家影响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Kellner,1989)。葛兰西对英国文化研究有重要影响(Turner 2003)。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有很多相异之处,但都对意识形态批判有共同兴趣。像阿多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马尔库塞(Marcuse)、本雅明(Benjamin)、威廉姆斯(Williams)或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都对马克思的作品有很深刻的认识与兴趣。文化研究也受到阿尔都塞(Althusser)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Turner 2003)。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已受到批判政治经济学派的挑

战,譬如斯迈思(Smyth)和加汉姆(Garnham)曾强调媒体的经济功能,或像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席勒(Schiller)、戈尔丁(Golding)、默多克(Murdock)、赫曼(Herman)、乔姆斯基(Chomsky)、麦克切斯尼(McChesney)都承认媒体经济批判的重要性,但也持续地强调媒体作为生产者的意识形态的角色(Mosco, 2009)。文化与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近来有更多的发展,例如在研究取径上整合不同的方法(例:Kellner 1995);另类媒体理论或多或少来自安成思伯格(Enzensberger)批判理论的观点(例:Downing 2001);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sup>①</sup>出现的重要性(请见 Virno and Hardt 2006)。因此,网络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 20 世纪的历史。

批判的网络研究受到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媒体理论的影响,例如意识形态批判(请看 Lovink and Schultz[1997]在 Net Critique 里的例子),自主论马克思主义(Dyer-Witheford 1998; Fuchs 2008; Hakken 2003),批判政治经济学(Andrejevic 2007, 2009; Fuchs 2009b, 2010, 2011; Hakken 2003)或批判理论(Andrejevic 2009; Fuchs 2008, 2011; Taylor 2009)。

### 三、网络文化研究的批判与非批判(un-/critical)

我们可以区别两种自认为批判的因特网研究取径。一是文化研究的背景,二是政治经济学背景。第一个理论背景,在广义的条件下算是后结构主义者,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者。

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定位明确,像是在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应用(Bell 2001, 65—91; Jones 2006, xv-xvi; Sterne 2006)。贝尔(David Bell 2006b)在其四册合集的《网络文化》(Cyber Cultures)导论中提及 18 个影响网络文化研究的媒体与文化研究的批判概念。其中包括:文化研究、科技哲学、女性主义研究和政策研究,而另一些像是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或媒体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则明显缺席。在这四大册一共 1600 页的书中、以及贝尔所汇编的所有标题中,只能找到一个网络研究的批判概念,读完这 69 章后,一个最令人感到纳闷的问题是:为什么批判面向的概念消失了?剥削、剩余价值和阶级等概念在因特网变成边缘议题,然而一些像是因

---

<sup>①</sup>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也可简称为自主主义(Autonomism),这是意大利从 1960 年代开始,从工人主义的运动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译者注

特网的历史、研究方法、虚拟社区、在线认同、网络空间的身心状态、网络人(cyborgs)等概念都被明确地呈现出来。温斯克(Dwanyne Winseck)、罗宾斯(Kevin Robins)/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或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等人对网络资本主义与剥削的探讨有所贡献,但却在此书中被边缘化。该书辜负了贝尔自己在导论中的承诺,以及他自定义的副标题:“批判概念”。

斯维尔(David Sliver 2006b)强调“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是网络文化研究的第三阶段,出现在流行的网络文化研究和网络文化研究之后。他认为批判网络文化研究为:

- (1) 探索“在线发生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互动”(Sliver 2006b,67)
- (2) 网络空间的论述分析
- (3) 网络近用分析
- (4) 关注参与式设计(Sliver 2006b,67—73)

斯维尔提倡一种浅显的批判概念。第一个性质较为广泛,大多数因特网的分析聚焦在社会、文化或经济议题上(政治与环境的分析除外),因此尚未厘清“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应该特别去批判哪些范围。探讨“在线边缘化”(online marginality)的研究时,斯维尔强调种族、性别议题的重要性(Silver 2006b,70),但却未提阶级。

斯维尔和马莎纳利(David Silver and Adrienne Massanari 2006)呈现他们所收集的25份批判网络文化研究的读物。斯维尔(Sliver 2006a,6f)在导论中提及资本主义是批判网络文化的脉络之一,但他却较少关注“种族、性别、年龄和残疾”的文化差异(Silver 2006a,8)。这也显示对网络的阶级、剩余价值和剥削的分析在此书仍属边缘议题,而网络空间文化差异的议题却占优势位置。

#### 四、网络研究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

批判的网络研究的第二个典型取径是批判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以下针对这些取径的优先级,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非反应其评价好坏。下列取向所使用的语汇,堪称独具意义,都是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用以突显本身属性的术语。

罗文克和舒茨(Geert Lovink and Pit Schultz 1997)认为,“网络批判”(Net Critique)分析非物质领域的组织力量,也分析了网络帝国主义和意识

形态。“网络批判”的目标是自由近用所有媒体和所有内容。不过，“网络批判”不只是理论，而是理论-实践的结合，在数量激增的电子公众中，它代表的是激进的批判立场。自从《寻找网络批判》(*Call for Net Critique*)于1997年出版后，各种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跟着网络批判取径(the Net Critique Approach)出现(例：Lovink 2002；Lovink and Scholz 2005；Lovink and Zehle 2005；Jacobs, Janssen and Pasquinelli 2007；Lovink and Rossiter 2007；Rossiter 2006)，更多在最近出现的还包括对 Web 2.0 的批判(例：Lovink 2008；Lovink and Niederer 2008；Rossiter 2006)。罗文克和其他人认为，“网络批判”取径不只是具有系统性的批判理论，而是一种批判的实践形式，因此必然和媒体行动主义与媒介艺术息息相关。

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 1999)建议我们在分析 21 世纪的科技资本主义时，应重塑马克思主义，并提出网络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迪尔-维斯福特在网络研究运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的取向，并呈现内格里(Antonio Negri)、哈特(Michael Hardt)、维尔诺(Paolo Virno)、拉札雷托(Maurizio Lazaratto)等学者的论述。在迪尔-维斯福特看来，自主论网络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Cyber-Marxism)与下列三者都不同，既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科技决定论、亦不同于新卢尔德主义<sup>①</sup>的布雷弗曼<sup>②</sup>式科技宰治理论<sup>③</sup>，同时也迥异于后福特主义<sup>④</sup>理论化科技陶

① 卢尔德主义(Luddism)此词源自 19 世纪英国手工业者因当时纺织工业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而逐渐机械化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机器并非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取代了他们的劳动力而导致失业。故当时英国各地发生多起捣毁纺织机器的事件。霍布斯邦认为，砸毁机器是一种对雇主和外包制生产中间人施压的通常手段。特别是工人所关心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而是现实上一组关系密切的问题，即预防失业与维持惯常习俗的生活水平，这包括非金钱的因素，像是自由与尊严，也包括了工资。(霍布斯邦，蔡宜刚译，页 17、25)新卢尔德主义(Neo-Luddism)源自卢尔德主义原本的意涵，延伸这种反对机械化、反对自动化的观点来响应当代科技的论述，包括对网络科技、基因科技、纳米科技、信息科技等的批判。美国学者 C. Glendinning 于 1990 年发表《新卢尔德宣言笔记》(Notes toward a Neo-luddite Manifesto)。——译者注

② 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 1920—1976)为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曾于 1937 参与美国托洛斯基主义运动，并且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其知名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4)一书批探泰勒主义，描绘当代的工作特质转变是由资本家将劳工“去技术化”的过程。——译者注

③ the neo-Luddism of the Braverman-inspired technology-as-domination theories 译为“新卢尔德主义的布雷弗曼式科技宰治理论”。——译者注

④ 福特主义(Fordism)强调的是早期工业化的特征：透过工人从事低技术且重复性高的工作，进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消费体制。到资本主义晚期受到全球化影响，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特征则因为企业为或取更高利润而改变生产模式：弹性生产、弹性消费。——译者注

醉<sup>①</sup>(Dyer-Witheford 1999, 38—61)。

埃玛(Greg Elmer 2002)看见三种批判网络研究的特质:

- (1) 驳斥且质疑那些宣称网络具有革命性的意识形态。
- (2) 分析网络财团化和门户化(portalization)的过程(Elmer, 2002, x)。
- (3) 关注基进的批判网络社群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这些宰制形式裂缝中刻画网络的本质。

哈肯(David Hakken 2003)主张一种奠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知识理论。他看见网络空间正形成一种“巨大的矛盾”(Hakken, 2003, 393)。新信息和新传播科技最好“视为抗争之地,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力量。科技是政治的,但不像所有政治,它们反而显示出多重矛盾的倾向”(Hakken, 2003, 366)。

福克斯(Fuchs 2008, 2009a, b; 2010a, b; 2011)认为批判网络理论/研究和网络的政治经济批判奠基在一种更为普遍的取径上,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批判都是批判媒介与信息研究的根基(Fuchs 2011)。因此他就网络批判分析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基础,这些根基是:

- (1) 一般社会理论层次
- (2) 资本主义的分析
- (3) 媒体、科技和传播的批判分析
- (4) 网络批判调查的特定分析具有突发的特质

福克斯定义批判网络理论/研究和网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取径:“它定义并分析网络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它展现了网络如何形塑竞争与合作的冲突力量,并同时被此所形塑;侧重于网络如何结构化宰制与剥削,并同时被宰制与剥削所结构化,阶级形式和潜在阶级斗争如何以科技为中介。它确立以网络为后盾的社会发展和基进问题结构的潜力,以抑止为了共同合作、自决、参与、快乐和自我管理的人类和社会的潜能。”(Fuchs 2009b, 75) 福克斯(2011)将这个取径定义为一个奠基于批判理论、经验研究和以实践为导向的批判道德的哲学根基。

对安卓耶维克(Mark Andrejevic 2009)而言,所谓的“批判媒体研究 2.0”

<sup>①</sup> the techno-euphoria of many theorizations of post-Fordism 译为“福特主义理论化科技陶醉”。——译者注

挑战当前过度欢庆媒体具有赋权与民主化特质而不加批判的状况,反而提出新媒体如何嵌入旧有形式的宰制。“因此,当涉及参与式媒体的革命承诺,批判媒体研究 2.0 的支持者和实践者面对挑战并不再宣称(在所有相似的修辞里)‘所有事物都已变了’,而需要解释为什么变了?即使面对最戏剧化科技发展,基本的社会关系仍然不变。说穿了,批判媒体研究无意就媒体关注媒体,而是为社会而关注媒体”(Andrejevic 2009, 35)。安卓耶维克的取向是其中一种。泰勒(Paul A. Taylor 2009)认为批判理论 2.0 是为了“描绘传统批判理论 1.0 的关键观点,在基础上仍未改变”(Taylor 2009, 93),是挑战 Web 2.0 乐观论的必需品。

这些取向主要的差异来自他们对理论的理解、经验研究所赋予的角色、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例:质性访谈、量化调查、内容分析、统计分析、批判话语分析、或民族志)。例如迪尔-维斯福特的网络马克思主义取径,在网络空间重建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方法。“网络批判”讨论案例时,不是阿多诺的(Adorno)阐述的多面向方法(prismatic method of exposition),而是来自于批判地反省理论所启发的立场。因此,“网络批判”会是刻意地折中,有时夹杂个人的或新闻体的性质,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整体。一方面,福克斯的取向来自更有体系的黑格尔辩证哲学,其中,各个类目在理论系统都有清楚位置,是所有类目则从抽象到具体层次的辩证发展。另一方面,他将辩证哲学运用于具体层次,借此经验研究才能奠定其基础。

网络的“批判理论”或“批判政治经济学”只是共主,其下各取径间存在着理论、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大量差异,不过之间仍有共通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共通点是它们对批判的规范性理解。因此,批判的网络学者反省由来已久的辩论,一方是把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理解批判,另一方是从规范的程序来理解批判。早在 1961 年,德国社会学界的实证主义辩论,就是以此作为核心。波普尔(Karl R. Popper 1962)认为以检验问题解答的方法来获取并且辨别知识的社会构成是一种批判方法,因为研究者以质疑其他人的作品的试错过程来改进知识。对波普尔而言,批判是一种认识论的方法,可以展现逻辑的矛盾。阿多诺(1962)则与波普尔不同,他认为相互矛盾不仅是认识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同时也在对象(客体)内本身,使他们无法透过获得新知识来解决(Adorno 1962, 551)。阿多诺强调,波普尔理想中的价值中立的学术界是一种被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所塑造的交换价值(Adorno 1962, 560)。他认为实证主义以表象作为唯一判准,但批判理论则强调本质



和现象之间的差异(Adorno 1969, 291), 并指出波普尔那种主观认知的批判概念(Adorno 1969, 304)。这是认识论批判(波普尔)和社会批判(阿多诺)之间的基本差异。批判的网络学者质疑, 通过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网络, 并没有植根于彻底的社会分析, 也没有植根于社会的批判理论。这批质疑者当中, 有些人则质疑所有经验研究, 因为他们认为, 支配的谬误是一种规范看法, 无法证实检验, 仅能通过论点辨明。阿多诺聚焦于社会的批判, 他们无不共享这个价值。

第二个批判的网络研究取径之特征是, 它们都认为, 这个领域的传统网络研究, 充斥着工具和科技理性, 其功能在于合理化且复制资本主义, 并将资本主义内部的其他支配形式, 一并合理化了。工具理性意味着“观念变得工具化且自动存有”, 观念不再是“有自己意义的思考”。观念变成只是物, 只是为了达到复制和深化支配的机器(Horkheimer 1974/ 1947, 15)。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另一种说法, 强调的是“思考的元素, 它调整思考的规则, 使适应于控制和支配的规则”(Marcuse 1964b, 138)。技术理性认为, 当前的现实之外, 别无其他现实。它的目的在于“消灭反对的元素, 也消灭超越的元素”(Marcuse 1964, 56)。科技理性造成单面向思考, 此时, “任何观念、任何愿望与任何目标, 只要其内涵超越了既定的言说与行动范畴, 就会被摒弃, 或是被化约为这个范畴而遭吸纳”(Marcuse 1964, 12)。批判的网络学者认为, 主流的网络研究是一种意识形态, 因为他们分析网络时, 并未将其分析嵌入支配结构的分析, 他们也欠缺信念, 未曾介入斗争, 未曾想要追求更美好的世界, 并且消灭支配。

第三种共通性涉及规范层面和实践层面。所有批判的网络研究取径之所以从事批判, 是要批判剥削、宰制、权力的行使、结构暴力等等现象, 从中促进实践, 解放人类, 使其不受上述现象的压制。贝卡吉瓦(Maria Bakardjieva 2010, 61)认为, 相较于统计和诠释的取径, 批判的网络研究其旨不仅探索网络在培力、压迫、解放、异化和剥削等方面的角色, 并且还有针对这些具有规范意义的问题, 提出答案。批判研究不仅分析网络的宰制, 也分析网络的解放。这类取向或多或少都在明确指向, 建立后资本主义社会, 如草根社会主义、社群主义、参与式民主、永续发展的信息社会等概念。这类取径认定, 这个规范的面向就是它们所独具的解放特质。

批判规范面向是批判网络研究的主要特质, 它所传达的是霍克海默的洞见, 他说, 批判理论是为了迈向“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国家”(Horkhei-

mer 1937/2002, 241)。霍克海默的文章《批判理论与传统》(*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传达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建马克思理论,就是重建社会批判理论。

因此,可以说批判网络研究不仅仅受惠于法兰克福学派所理解的批判,甚至,这一理解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总结了规范向度,掌握了“事物的根基”,并奠基于“人是人最高的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终结这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MEW Vol. 1, 385)。① 如果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是对所有宰制形式和霸权关系的批判,那么所有批判研究都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所启发。在我看来,我们不应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反之,我们应该严肃且积极地肯认。

批判的网络研究既有规范面向无法在真空中运作。反之,它强调的是,我们得提出规范,据此批判宰制,目标则是走向解放;这个重点在更为普遍的层次,又与媒体、传播、科技、文化和信息的许多分析取向有关,如果它们也都认同这个规范。就此来说,批判的网络研究与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批判信息系统研究等等分析又格外有关。批判的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②,研究的是“权力关系,如何制约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消费之相互构成”(Mosco 2009, 2)。这个取径所要处理的课题是:“媒体系统如何”与“权力在社会的全面配置”互动,并对其产生影响(McChesney 2007, 77);这个取向提出的是:“正义、公平和公共之善等基本伦理问题”(Murdock and Golding 2005, 61)。媒体与科技的批判理论应该分析的是:“社会有哪些支配与反抗的形式,同时要能批判宰制的存在,批判媒体文化所复制的支配与压迫关系”(Kellner 1995, 4)。这个取向“所遵循的是,对支配的批判,以及解放的理论”(Kellner 1989, 1; 另参见 Feenberg 2002)。批判的信息系统研究所要产出的“知识,是要揭示和解释信息系统如何被误用或使用,致使信息系统被用以强化控制、支配和压制;与此同时,它还要指认并

①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卷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245—404页。——译者注

② 这些取径的代表,像是尼古拉斯·加纳姆、彼得·戈尔丁、罗伯特·麦克切斯尼或默多克,若将之称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则是一个误解,因为政治经济学不一定像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1867)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批判。马克思强调,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系统化了资本主义以“迂腐的方式”宣传资本主义和它“永恒的真理”的成份(Marx 1867, 174f)。由于这些方法通常以英美为背景讨论“媒体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并通常不去自然化且盲目崇拜媒体与传播作为具体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我们称作媒体与传播的政治经济批判是较为适合的。

启发具有转化作用的社会实践,使信息系统能够实现解放潜能”(Cecez-Kecmanovic 2005,19)。它的任务是分析信息系统的角色,辨明其剥夺权利与赋予权利的性质,从而协助“克服不公正与异化的问题”(Stahl 2008,9)。

## 五、批判网络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与网络的批判理论

各种批判的网络研究有一个主要差异,展现在“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以及“网络的批判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分野。前者着重的议题是网络身份的边缘化,后者的议题则聚焦在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

阅读“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的书籍时,我们应该将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的观点放在心上。他说:“种族支配的现代形式,其基础是经济宰制”以及“各种父权制形式也是其来有自,深刻镶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切割,一方是家务经济,另一方是薪资劳动与资本形成的场所”(Garnham 1998,610)。批判政治经济学“认为,阶级,亦即生产工具的使用结构以及经济剩余的分配结构,是决定支配结构的关键;文化研究则认为,性别、种族,以及其他标志差异的潜在项目,才是决定支配的其他结构因素,不是阶级”(Garnham 1998,609)。在“批判的网络研究”里,相似差异同样存在。“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取径倾向认为,网络空间的性别和种族不必然受阶级塑造。在它看来,阶级并不是理解网络宰制的关键,虽说这个宰制对性别、种族和其他差异,已有关键性的影响。它流于忽略阶级、资本主义和剥削等议题。因此带有些后现代色彩的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若要用来解释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网络和传播角色并不合适。危机本身证明了资本主义在当代社会的核心角色,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经济阶级的批判分析,理当是“批判的网络研究”之核心议题。

在一场拉克劳(Ernesto Laclau)、巴特勒(Judith Butler)与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三方对谈中,他们认为后现代取径本身是一种常见的语言游戏,“将‘阶级’转换并列于其他概念‘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其中一种”(Butler, Laclau and Žižek 2000,297),为了强调“阶级”不重要,还刻意将“阶级”置于所有概念中的最后一个位置。拉克劳称之“解构的阶级”(deconstructing classes)(Butler, Laclau and Žižek 2000,296)。我认为在此脉络中,齐泽克毫无疑问地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假设“不可化约的各种斗争”是一种接纳了“资本主义已是‘世界上唯一的竞争’(the only game in

town)”的说法,进而放弃了“任何想要挑战现存资本主义自由体制的真正企图”(Butler, Laclau and Žižek 2000, 95)。

将“阶级”这个概念从属于或等同于其他对立的类别(性别、种族、年龄、能力等),导致的一个危险是:掩盖了研究并创建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整体的参与式替代方案的可能。这个由巴特勒、拉克劳与齐泽克的辩论,指出“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忽视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的趋势,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改良主义式的政治议程,但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主义网络,不可能出现这种概念化的替代方案(Fuchs 2011)。

“阶级”所构连了所有非阶级(non-class)的对抗效应,但并非所有非阶级的对抗效应都彼此构连。当代社会中所有对抗都具有阶级面向,并取决于阶级。“阶级”预视、影响、促进、限制,并压制其他对抗作用,是一种与所有其他对抗紧紧相连的对抗作用(Fuchs 2008)。同时,非阶级对抗会影响阶级对抗,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动态关系。如果阶级是一种不确定或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超对抗(the super-antagonism of capitalism),那么具体关注“阶级”这个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

根据它所自述:“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试图克服“在线边缘化”的问题。然而,他们在边缘化批判的框架下探讨资本主义、阶级和剥削和因特网的关系,以此面向而言,做得不错,但不至被称为“批判的”。“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学者应该更严肃地看待凯纳(Douglas Kellner)的警告:“忽视政治经济、庆贺阅听人和流行的愉悦,轻忽社会阶级与意识形态,不去分析或批判文化文本的批评,将会导致媒体/文化研究仅仅是另一种枝微末节的学术;无害的、最终仅以文化工业本身利益为优先的研究”(Kellner 2009, 19f)。是时候阻止网络文化学者仅只聚焦在哈拉维(Donna Haraway)、透克(Sherry Turkle)、瑞格德(Howard Rheingold)、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各种后现代主义者等偶像身上了(Bell 2001, 74—88; Bell 2007; Silver 2006b, 65; Silver 2006a, 3),要透过阅读与诠释马克思著作来检验这些取径。

对阶级和剥削有兴趣的网络分析越来越多。最近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后现代主义与文化主义的终结,似乎在持续发展。我认为现在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网络研究投注兴趣的时候了。我们宁可不断投入,使它成为一个持续扩大的问题,用来解释:为什么你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

真正的批判网络研究的共通点包括:反对实证主义的网络研究、工具/技术理性、对宰制的批判、为解放而斗争、根植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各种媒

体、传播、科技与信息的批判分析的共享规范。我认为,网络研究不只需要马克思理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早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了,因此网络研究应该承认其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下一节将聚焦在批判网络研究里的特定的马克思类别的分析。

## 六、马克思和批判网络研究的概念

批判网络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早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因此应该承认其马克思主义的根源。以下将透过一些案例帮助我们了解这 11 个马克思主义概念:

- (1) 辩证法(dialectics)
- (2) 资本主义(capitalism)
- (3) 商品/商品化(commodity/commodification)
- (4) 剩余价值/剥削/异化/阶级(surplus value, exploitation, alienation, class)
- (5) 全球化(globalization)
- (6)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y/ideology critique)
- (7) 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 (8) 公共财(common)
- (9)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 (10) 共产主义(Communism)
- (11) 美学(aesthetics)

莫斯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分析置前,其中包括产品、商品化和产品的剩余价值、社会阶级分裂和斗争、矛盾和反对运动,其关系与力量的发展”(Mosco 2009, 94),将媒体去中心化。此分析附加了 6 个关键的马克思的概念:全球化、意识形态、公共财、公共领域、共产主义和美学。

第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辩证法。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来思考如何分析资本主义。辩证法具有“批判和革命的本质”,因为“每个历史的发展形式总在变动,必须尽可能地掌握它短暂状态……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总是充满矛盾”(Marx 1867, 103)。为了将复杂的、动态的和矛盾的网络/Web 2.0 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概念化,避免单面向或科技决定论的问题,

福克斯关注的是认识论和本体论在辩证法哲学的取径(Fuchs 2009b; Fuchs 2011,第2、3章)。卢南菲德(Peter Lunenfeld 1999)和海姆(Michael Heim 1999)曾探讨数位辩证法。其中一些方法有关科技批判理论的辩证视野,因为科技是“一种‘矛盾的’发展,在过程阻断了不同的可能性”(Feenberg 2002,15)。

马尔库塞(Marcuse 1941)试图避免决定论的辩证法,并从结构-功能辩证转向以人为中心的辩证。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辩证的,即资本主义的客观对立结构与其消极的否定可以透由人类实践达成。网络或特殊的网络平台对社会和社会系统而言,有许多(至少有两种)效果,得以共存或彼此于矛盾之中(Fuchs 2008,2011)。基于社会、网络、权力结构和斗争等各面向,潜能如何在各种方式与潜在矛盾中达成形塑科技的使用与设计。

其一,应辩证地思考网络议题,就像马克思思考资本主义的科技如何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所形塑一样。资本主义的“美学形式”的网络生产力,同时处于资本主义的爆发状态(Marx 1857/1858,159),此“非生产的解构力量”(Marx and Engels 1846,60),由阶级关系所操持。例如,Google所创造的服务,只是他们先想到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公共网络,透由人们合作的方式来创造各种利益和新的潜能。不过,这种自由(免费服务近用)现在却提供在线监控和使用者商品化的服务,既威胁着消费者的隐私权,也导致使用者的经济剥削。而所谓的解决之道并不是要求废除或替代Google,但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将它变成一种由公众组成且主导的搜索引擎(例如由公立大学运作的合作计划)。网络本来就同时具备“资本主义的奇观和商品化”的潜力,而“网络景况”的建构就是为了“促进积极的改变与另类的文化与社会形态”(Best and Kellner 2001,237f)。

第二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反映了批判网络研究是一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模式。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积累的系统,而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故“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转向增加这偿劳动”(Marx 1875,310)。因此这个系统是“一个奴隶制度”(Marx 1875,310)。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反映了批判网络研究的一些概念,像是传播资本主义(Dean 2004,2005,2009,2010; Passavant 2004)、信息资本主义(Fuchs 2008,2009a; Schmiede 2006)、网络数字生产力的对抗作用和生产关系(Fuchs 2008,2009b; Žižek 2004,293)、数位资本

主义(Schiller 2000)、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Graham 2006)、或新媒体/数字视觉资本主义(Nakamura 2008)。比尔(David Beer)认为研究 Web 2.0 和社交网站,会忽略“一个对资本主义运作更为开放、更为政治的议题”(Beer 2008,526)。

第三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商品/商品化。马克思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元素,一个商品有其定量的对价关系进行交换: $x$  数量的商品  $A=y$  单位的钱。“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脱小麦,同  $X$  量鞋油或  $Y$  量绸缎或  $Z$  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Marx 1867,127)。<sup>①</sup> 对马克思而言,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Marx 1867,125)。<sup>②</sup> 商品化是指从社会关系变成买方和卖方的交换关系。批判网络研究已经运用商品化的概念,例如:网络商品化(Fuchs 2008, chapter 7)、在线隐私商品化(Campbell and Carlson 2002; Fernback and Papacharissi 2007)、网络空间的社群商品化(Campbell 2008; Fernback 2004),以及分析个资在线商品化机器的概念(Elmer 2004)。

第四,有人发现批判网络研究也使用阶级、剩余价值、剥削和异化等概念。这些概念本质上和马克思有关。两者间的关系则可以用以下这段话来简要说明:“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

---

① 中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49页。——译者注

② 中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47页。——译者注

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sup>①</sup>(Marx 1867,716)

以下提供马克思主义概念在网络研究使用的案例。福克斯(2010b)认为社群 2.0(corporate 2.0)的资本积累是奠基在对生产消费者(prosumer)的无限剥削,并将网络生产消费者商品(Internet prosumer commodity)卖给广告客户。他认为社群网络 2.0 的用户如同无产阶级,一样被资本所剥削(Fuchs 2010b),其分析奠基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的概念和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阅听人商品论的概念。安卓耶维克(2002)和劳尔(Josh Lauer 2008)认为收看媒体的工作是一种剥削和生产劳动的形式。探讨数字媒体的价值创造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参考案例:Bolin 2011, Jakobsson and Stiernstedt 2010)。安卓耶维克表示:“新媒体的互动功能被开发为一种监视的工具”(Andrejevic 2002,239)而劳尔(2008)认为网络的消费者监控如同异化劳工。安卓耶维克(2009)运用“剥削 2.0”(exploitation 2.0)来强调剥削仍是 Web 2.0 环境的基本特征。安卓耶维克(2007)在其他著作连结“被监视的工作”和“数字圈地”的概念。泰拉诺瓦(Terranova 2004)提出网络免费劳动的剥削概念。对贝勒(Jonathan Beller)而言,网络剩余价值的创造具有一种电影生产模式的特点(Beller 2006)。纳卡穆拉(Lisa Nakamura 2009)描绘这些遭受种族化剥削的在线游戏玩家,都面临着边境加工厂的处境。此外,无产阶级的概念也用来分析社交媒体(Breen 2011)。伯斯顿(Burston)、迪尔-维斯福特和赫恩(Hearn 2010)编纂有关“数字劳工”的特辑。《数位劳动:工人、作家、公民》数位劳工研讨会(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2009年10月;见 Burston, Dyer-Witheford and Hearn 2010)和《网络就像游乐场和工厂》一文(New School, November 2009; 见 Scholz 2012),此文的出现与贡献已经到达非凡的兴趣。但一个值得注意问题是,在文化、因特网、网络和讯息的脉络中,阶级关系如何改变(Fuchs 2008; Hesmondhalgh and Baker 2011; Huws 2003; Mosco and McKercher 2009; Qiu 2009)。

第五个概念是全球化。马克思强调,因为“所有人都纠缠在世界市场的大网中”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国际性”(Marx 1867,929),使得资本主义有一个固着的全球化趋势。世界市场、资本出口和全球企业组织形式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的各个面向。凯纳(Kellner 2002)强调以马克思辩证法和批判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26—627页。——译者注



理论理解当代的“科技资本主义”中,全球化和网络是构成对立的争议空间(terrains)的重要性。哈维(Harvey 1990)体现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的本质驱动超越一切障碍”,并且以“传播和运输的意义”连结“被时间湮灭的空间”的概念(Marx 1857/1858,524)。

他认为结合弹性积累体制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新传播科技压缩了时间与空间,产生资本主义新的阶段。对席勒(2000,135)而言,网络是一个“跨国消费的中介”并促进网络数字资本主义。迪尔-维斯福特(1999,130)则认为网络是一种金钱、商品、权力流通的电子通路。韦伯斯特(2002,77)强调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像网络一样是一种:“允许全球化的生产和营销策略及全球金融行业的业务流程”。这些体现马克思观点的取径,即传播科技如同因特网既是媒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结局(Fuchs 2008,110)。

第六个概念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对马克思而言,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的意识、一种被操纵的意识,因此它可看见它自身以外的真实。“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MECW Vol. 5,14)。<sup>①</sup>它是“一个意识颠倒的世界”(MECW Vol. 3,175)。在《资本论》,马克思(1867)认为意识形态如同商品拜物教,使社会关系出现了像是事物的特质,而造就飘渺的意识(Marx 1867,165)。

意识形态批判在批判网络研究的例子,包括薛兹(Trebor Scholz 2008)批判 Web 2.0 是在营销意识形态。凡戴克(José van Dijck)和尼博格(David Nieborg)(2009)认为 Web 2.0 乐观论毫不批评服务企业利益的意识形态,而 Web 2.0 用户将成为更被动的使用者而非积极创造者(van Dijck 2009)。费雪(Eran Fisher 2010a,b)表示 Web 2.0 被资本主义合法化的论述所形塑,具有一种新网络精神的特色。布尔(Marcus Breen 2010)认为数字决定论是一种形塑网络资本主义年代的意识形态。丹恩(Jodi Dean)运用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提出网络拜物教(Dean 2005,2009)。她(Dean 2005,2009)批评这种在线政治具有批判性的本质,并促成相关的政治活动的假设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认为这种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导致没有传达性(communicability)的传播(Dean 2004,2005,2009,2010),经常在意识形态上欺瞒使用者。丹恩(2006)描绘齐泽克的著作,认为网络的政治化并不会自动出现,需要奋斗而来的。福克斯认为资本主义下的“参与式 Web 2.0”概念是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卷3,29页。——译者注

一种意识形态(Fuchs 2011, chapter 7)。马蒂斯森(Thomas Mathiesen 2004)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精神,描绘社群网络(corporate Internet)如同噤声沉默的系统。宰制网络意识形态几乎区隔了工人阶级的日常现实(Olsson 2006)。新科技的兴起经常创造一种“短暂淹没理性的爆发感受”(Mosco 2004, 22)。科技决定论忽略政治经济学的议题。社交媒体决定论对数字崇拜的表现,“其网络空间成为科技和电子崇拜的最新象征,赞叹其跨时代和超然的特质,妖魔化被召唤的深层之恶”(Mosco 2004, 24)。

第七个马克思的范畴是阶级斗争。“所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皆是阶级斗争史。自由人与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雇工,一言以蔽之,即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站在不断相互对立的、进行不间断的隐藏与开战的位置。”(Marx and Engels 1962, 35f)在批判网络研究,例如阶级斗争的概念即体现反资本主义网络的斗争概念,有益于“骇”资本主义(Söderberg 2008);或者,网络的概念如同阶级斗争循环的手段(Dyer-Witheford 1999)。相关概念像是电子织品(electronic fabric)的斗争(Cleaver 1998)和电子公民抗命(Critical Art Ensemble 1996)。卡恩和凯尔纳(Kahn and Kellner 2004)讨论以网络为主的斗争时,认为网络是全球化的基础与依据。同时,真正代替网络作为斗争手段,已在此脉络中被探讨过(Kidd 2003)。

批判网络研究的阶级斗争导向的概念有其根源,来自对于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sup>①</sup>(the Mexican Zapatistas)反抗新自由主义斗争,以及在斗争中因特网的角色。后来,哈特和内格里(Hardt and Negri 2004)的各种斗争的概念已在各个取径成为重要的核心,“对所有在资本规则下工作的人而言,这种行动来说是非常罕见的”(Hardt and Negri 2004, 105)。由非物质劳动所形塑,“创造一些像是知识、信息、传播、关系或一个情感的响应的非物质产品”(同上, 108)。

第八个马克思的概念是公共财。公共财是一种资源,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赖以存续,即所有需求、所有生产的基础。马克思强调知识的共同特征和其“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概念,即“客观的知识的力量”和“一般社会知识”成为“一个生产的直接力量”(Marx 1857/1858, 706)。他指出,知识

---

<sup>①</sup> 墨西哥萨帕塔主义(the Mexican Zapatistas),米里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为墨西哥革命家,为了捍卫其印第安人的权利而战斗,反抗西班牙帝国主义。从1994年开始武装斗争,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生效日(1994年1月1日),进行以维护当地印第安人利益为目标的萨帕塔运动,称为民族解放组织(EZLN, 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有一部分来自人类现代生活的合作,但一部分也建立在早期的劳作中”(Marx 1894,199)。它们共同的特征为“集体劳动影响个人直接的合作”(Marx 1894,199)。公共财的概念已运用在网络的知識脉络,即以集体生产、共享,并由资本维持(例如:Dyer-Witheford 1999,4,219ff; Fuchs 2010b,2011; Hardt and Negri 2009,282; Kidd 2003, Žižek 2010a)。有关网络公共财,讨论最多的特别是自由软件、维基百科和档案共享等概念。

阶级斗争和公共财的概念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和网络批判研究中,特别是以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由此看来,齐泽克(2008,354)批判(主要针对哈特和内格里)将欢庆信息革命当作“一个克服资本主义的特殊机会”,并忽略始于信息科技(IT)的一种没有摩擦的温和资本主义(a new frictionless soft capitalism)的兴起,用一些从未实现过的修辞,像是参与性、自我组织、共同合作等概念。但齐泽克认同哈特和内格里(2009)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剥削(像是网络、教育和文化的知识)的解释,其在政治层次是一种“共产主义概念的复苏”抵抗的形式(Žižek 2008,429)。

第九个概念是公共领域。马克思想像把巴黎公社作为一种公共领域,取代服务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公社取代阶级统治(Marx 1871,274):“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Marx 1871,274)。<sup>①</sup>“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Marx 1871,274)。<sup>②</sup>公社是“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同上,275),<sup>③</sup>“由大会代表管理共同事务”(同上,275),并“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同上,277),将“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同上,277),<sup>④</sup>促进一个“团结合作”的社会(同上,277)出现。马克思要求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同上,277)<sup>⑤</sup>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奠基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见 Habermas 1991,122—129),但马克思看待布尔乔亚公共领域时却带有讽

①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卷17,358页。——译者注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359页。——译者注

④ 同上书,362页。——译者注

⑤ 同上。

刺意味(Habermas 1991,123):“马克思揭发公共舆论就像是错误意识:它在其自身面前掩盖了作为资产阶级利益面具的真正本质”(Habermas 1991,124)。<sup>①</sup> 马克思的“批判拆解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依靠的一切虚构。首先,显然不具备机会均等的社会前提;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每个人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机遇都能成为所有者,允许作为私人进入公共领域,并且获得财产和受到教育。马克思认为,公共领域有悖于其自身的普遍准入原则”(Habermas 1991,124)。<sup>②</sup>

有些作者探讨如何在网络上运用公共领域的概念,并以哈贝马斯的马克思主义根基作为描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何殖民且限制的网络作为一个对公共领域的转型的潜在工具(例:Dahlberg 2004; Dahlgren 2005; Pappacharissi 2002)。然而,大多数作者忽略马克思公共领域的概念即共产主义,它不仅超越了生产数据的私人控制,而且连哈贝马斯也肯认此面向的意义。审慎使用马克思和青年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概念,如同批判的网络研究探讨共产主义网络就竟是怎么一回事(Fuchs 2011)。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不仅是一个规范性的理想,更是一种概念,得以批判媒体政治现实。他强调在此脉络下,自由的公共领域限制其言论自由和公共舆论的价值,因为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公民没有相同正规教育和物质资源参与公共领域(Habermas 1991,227),并且更进一步限制其所拥有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的价值,因为庞大的政治经济组织“控制着具有广泛影响和政治意义的集会和结社形成”(Habermas 1991,228)。<sup>③</sup> 批判网络研究应特别关注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如何被不平等的条件(例如金钱、教育、年龄等)和被庞大经济政治组织所支配的影响力所限制。

第十个概念为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并不是指那种监视所有的人、经营劳教所、压抑人类性格、物资缺乏、限制行动自由等的长期性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社会。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是一个强调共同合作生产、共同拥有生产材料、丰富个人活动领域。资本主义的新危机已带来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兴趣(见 Žižek and Douzinas 2010)。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

---

① 中文摘自[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41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142页。——译者注

③ 同上书,260页。——译者注

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Marx 1867,171)。共产主义在“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Marx1867,739)。在批判的网络研究,例如有些学者探讨共产社会的共产主义网络的目的(Fuchs 2011)、21世纪共产主义(Dyer-Witthford 1999,4)、模控论共产主义(Barbrook 2007)或网络共产主义(dot. communism)(Moglen 2003)、另类网络(Atton 2004)或公共服务网(Patelis 2000,99)等。对网络研究而言,共产主义的概念和现存的共享概念(譬如档案共享平台)与共同合作生产的知识(譬如维基百科或免费开放资源软件运动)相关,构成一种共产主义模式的生产基础。马克思强调,“一般智力”的概念是知识的共同特征,是一种“知识力量的客观化”、“一般的社会知识”,并可成为“一种生产的直接力量”(Marx 1857/1858,706)。他指出,“有一部分知识来自人类现代生活的合作,但一部分也建立在早期的劳作中”(Marx 1894,199)。其共通特征是一种“公共劳动的概念,虽然也涉及个人的直接合作关系(Marx 1894,199)。在网络的知识脉络下,公共财的概念也已经运用在集体生产、共享并且资本拨付的情况中(见案例:Dyer-Witthford 1999,4,219ff; Fuchs 2010b,2011; Hardt and Negri 2009,282; Žižek 2010a)。

第十一个概念是美学。马克思点出艺术不应该被编制成一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但在资本主义下却变成如此,成为一种被商品化的对象(Marx 1863,401)。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指的是劳动力异化的终结,因此所有人可以投入艺术活动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Marx and Engels 1846,418)<sup>①</sup>。阿多诺指出,马克思在艺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里探讨的美学艺术是真正的艺术,这和资本主义忽视工具理性的逻辑不同:“在整个功能世界里,艺术的功能就是无功能”(Adorno 1997,320)。近几年来,已经在网络、在线游戏和计算机游戏的领域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概念(例如:Kline, Dyer-Witthford and De Peuter 2003, Andrejevic 2006, Dyer-Witthford and De Peuter 2009)。

这11个概念是在网络研究中最常见的一些马克思概念。在其他文章中可以看到更多有关这些概念的补充与讨论,但在本文有限的空间内无法讨论更多。这些案例都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网络的批判分析的重要

---

① 《马恩全集》卷3,第460页

性。当然,这样的概念既然受到欢迎,同时也会遭受反对。这个现象将在下一节来讨论。

## 七、对批判网络研究批评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于批判的网络研究的运用,主要受到两种反对策略:一、反马克思主义;二、将马克思主义概念收编于宰制意识形态下,两者目标都是对企业控制网络的其他另类选择进行去合法化(delegitimizing)。

以安德鲁·基恩和约什·拉尼尔(Andrew Keen and Josh Lanier)的反共产主义策略为代表。《业余的邪教组织:今日的因特网如何扼杀我们的文化》(*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 2007)作者基恩认为 Web 2.0 修辞学其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即以散播马克思主义为目标(Keen 2006)。基恩看见 Web 2.0 的危险发展,并且认为新的共产主义 Web 2.0 将导致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终结。“没有杰出的主流媒体,我们将失去我们在记忆里学过的、读过的、和感受过的事物”(Keen 2006)。对基恩而言,任何对于资本主义和企业利益构成威胁挑战的可能性都让他感到恐惧。拉尼尔(Lanier 2006)则认为 Web 2.0 造成“数字毛泽东主义”:一种集权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个性的形式集体主义。

还有些取径鼓吹马克思主义是危险的、反个人主义的,但这是错误的讯息。尽管在毛或斯大林那里,个体价值并没有受到很大重视,但对马克思来说,最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扬弃人的阶级身份并赞扬人的完全的成熟状态。共产主义对马克思而言,不是集体化生活,而是一种创造高度生产力的后社会经济,所有财富共享、最大可能地减少异化劳动、最大空间地自由选择劳动。大幅提高劳动自决,释放创造力的潜能,并促进所有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能力极大化。马克思的前提是扬弃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制度。“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个人经由他们自己的组织而获得自由。”(Marx and Engels 1846, 87)。实际的社群将会是一种“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的关系(Marx 1844, 101f),“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Marx 1844, 102),并且“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Marx 1844, 102)。共产主义社会认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

生活活动”(Marx and Engels 1846,464)。<sup>①</sup>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限制了人类潜能的发展,由于物质资源的缺乏,使得人们无法全面发展他们的能力。然而,在共产主义里,“每个人都发展成完整的个人”(Marx and Engels 1846,97)。“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Marx and Engels 1846,96)。

对马克思而言,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即奠定在此原则上:“根据自身的能力,根据自己的需要!”(Marx 1875,306)这意味着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所有产品和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人类活动都是自我选择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所有共同财富之泉将流得更丰盛”(Marx 1875,306)。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计算机科技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可以提高生产力,使整体的财富可以增加。如果阶级关系由合作关系所取代,在这些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后匮乏(post-scarcity)和财富为基础的自由劳动力(自主的自我决定,而非无薪)和自由的商品和服务(在这个意义上的免费)。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一个共产主义的网络是唯一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免费提供数字商品和服务所创建的志愿合作劳动力,而数字商品和一般商品将不复存在。无论是在线或下线后的自我意识活动将创造一个成熟的特质,这不是数位毛泽东主义(digital Maoism)的形式,而是一个真正实现动态且自我增强的辩证主体性和集体主义的自由。

凯利(Kevin Kelly)再现第二个策略(意识形态统合),所传达的是有关信息科技(IT)在1990年代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新自由主义信条(例:Kelly 1998),并且探讨新网络(new web)的人们朝向共同目标迈进,并共享产品,无偿贡献劳动力,享受免费交换的成果(Kelly 2009,118),共构“新社会主义”-“数位社会主义”。对凯利而言,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用控制工人、管理组织与物品产出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的概念应该被打上问号。对凯利而言,社会主义是集体生产,而不是民主的经济所有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取代资本主义的系统,并且以公共利益优于私人利益”,“不容许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故“需要有效的民主来控制经济”(Frankfurt Declaration of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1951),而凯利的社会主义概念包括微软、谷歌、雅虎和其他网络公司(事实显示,他在其社会主义历史中列出谷歌、亚马逊、脸书和 YouTube 等公司),这并不是

---

① 中文摘自《马恩全集》卷3,516页。——译者注

社会主义的所有概念,而由资本主义伪装成社会主义。对卢森堡(Rosa Luxemburg)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受利润动机,目的是拯救人类劳动的社会”(Luxemburg 1913/2003,301)。她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累积,而是发展全世界的生产力来满足辛苦劳动的人类的需要”(Luxemburg 1913/2003,447)。凯利的社会主义概念不符合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其理论根基可被视为在意识形态上,企图再定义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式的社会主义。

## 八、结 论

本文的分析显示出批判的网络研究在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差异。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忽略了阶级和剥削的面向,因此最好更名为“网络文化研究”。基于对批判理论和网络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认识,“阶级”是用来理解剥削和宰制结构的关键,表现自身在网络和其他媒体的资本主义的统治,所有宰制形式和剥削形式都有关联。无论是显性或隐性的,在批判的网络研究,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已经反映出来:辩证、资本主义、商敏化、剩余价值/剥削/异化/阶级,全球化、认同、阶级斗争、公共财、公共领域、共产主义、美学。反马克思主义和收编(subsumption)这种两策略试图在网络研究消除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关键作用。

这 11 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可以形成一个尚未完整的批判网络研究的议题,其中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1) 如何以一个辩证和历史批判理论来加以理解网络的创造、发展与矛盾?

(2) 在资本主义脉络下,网络的角色为何?这个角色如何理论化并进行经验性的测量?以网络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模型有哪些?

(3) 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哪些商品化形式?它们是怎么运作的?

(4) 不同形式的剩余价值如何在网络上运作?使用者是怎么想象的?

(5) 网络和全球化过程如何相互影响?

(6) 网络有何种迷思和意识形态?如何揭露、分析和批判它们?

(7) 网络在阶级斗争的角色为何?一个另类网络的斗争的潜力、现实和限制为何?

(8) 什么是网络公共财?网络公共财的商品化如何运作?



(9) 加强网络的公共模式有哪些?

(10) 网络作为一种公共领域所带来的潜力和限制有哪些? 什么是公共基础的网络? 公共网络有哪些形式? 如何加强一个以公共为基础的网络建设?

(11) 网络如何改变艺术和美学? 在线艺术和在线美学的潜力是否得以挑战资本主义逻辑并且帮助推进另一种不同的逻辑?

本篇文章企图展现出马克思对批判的网络研究的重要性。结果证实了一些批判媒体/科技研究和信息科学学者们强调马克思对于研究传播的重要性(特别参照 Fuchs 2010a)。斯迈思称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Smythe 1994, 258), 莫达克和戈尔丁(2005, 61)则说“传播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强调科技批判理论是“源自马克思”的(Feenberg 2002, vii), 而马克思提供第一个科技批判理论(Feenberg 2002, 47)。麦克切尼斯认为马克思是传播科学的重要基础, 因为他提供了以下有效的工具:

- (1) 文化工业的资本积累的批判
- (2) 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 (3) 合法化宰制的意识形态批判(McChesney 2007, 53—55)

此外(4)马克思特有的新闻实践应该是一个批判的、独立质量的新闻学模式。(McChesney, 2007 55—57)

赫尔曼(Edward Herman 1998)强调, 以下这些马克思分析的元素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和传播的研究非常重要:

- (1) 利益和积累驱使
- (2) 科技改变的角色
- (3) 创意后备军
- (4) 全球化
- (5) 不稳定与危机
- (6) 宰制阶级对于国家的控制

苏萨曼(Gerald Sussmann 1999, 86)在《媒体经济期刊》(*th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传播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专题中强调, “批判传播科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 “马克思, 是最先认为现代传播和传输即企业工业基础建设的支柱的先驱之一。”斯塔尔(Bernd Carsten Stahl 2008, 10, 32)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信息系统研究和一般批判

研究的批判概念的根基。

如果网络研究是一个高度跨学科领域(Ess 2011),那么批判的网络研究即网络研究的其一分支,并聚焦在宰制结构和网络实践的分析、以网络为基础的反抗宰制、旨在寻求为了使人类从压迫、不公平和剥削中解放的网络使用的方法。

我在本文中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分析网络在资本主义脉络下的角色,并借镜于所有批判研究的马克思的根源,是批判的网络研究必须首要关注的焦点。一些批判的网络研究学者的确认可马克思主义分析对于研究网络的重要性,有些则隐晦地参考马克思的概念。批判网络文化研究的作者倾向架空与阶级和资本主义有关的议题。而现在正是时候,主动了解卡尔·马克思作为批判媒体和信息研究与批判的网络研究的基础(Fuchs, 2010a, 2011),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于理解当代网络和媒体在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请见:Fuchs and Winseck 2011)。马切克(Steve Macek 2006)区别两种数字媒体研究:(1)分析“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唯物论的女性主义、基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学、社会运动理论”;(2)“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媒体学术研究”(Macek 2006, 1031f)。第一个取径无疑是“比其他方法好太多了”(Macek 2006, 1038; 也可参见 Artz, Macek and Cloud 2006 的分析)。此外,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第二种方法是,当我们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候才使用的。

马克思回来了,而资本主义正处在危机中——若想要了解网络在宰制与剥削,和其潜在解放的角色,我们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 参考文献:

- Adorno, Theodor W. 1962.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 574—565. Frankfurt/Main: Suhrkamp.
- Adorno, Theodor W. 1969. Einleitung zum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In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 280—353. Frankfurt/Main: Suhrkamp.
- Adorno, Theodor W. 1997. *Aesthetic Theory*. London: Continuum.
- Andrejevic, Mark. 2002. The Work of Being Watched; Interactive Media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Self-Disclosur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2): 230—248.
- Andrejevic, Mark. 2005. The Work of Watching One Another; Lateral Surveillance, Risk, and Govern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2 (4): 479—497.
- Andrejevic, Mark. 2006. Apprehensions of the Future; Internet Aesthetics and Ideolo-

- gy. In *Ideologies of the Internet*, edited by Katharine Sarikakis and Daya Thussu, 19—34. London: Hampton Press.
- Andrejevic, Mark. 2007. *iSpy: Surveillance and Power in the Interactive Era*.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Andrejevic, Mark. 2009. Critical Media Studies 2.0: An Interactive upgrade.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1(1): 35—51.
- Artz, Lee, Steve Macek and Danah L. Cloud, eds. 2006.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New York: Peter Lang.
- Atton, Cris. 2004. *An Alternative Interne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Bakardjieva, Maria. 2010.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Exploring the Tenets and Contributions of Diverse Approaches. In *The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 edited by Mia Consalvo and Charles Ess, 59—82. Chicester: Wiley.
- Barbrook, Richard. 2007. *Imaginary Futures*. London: Pluto Press.
- Beer, David. 2008.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Revisiting the Story So Far: A Response to danah boyd & Nicole Ellis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2): 516—529.
- Bell, David.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cul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 Bell, David, ed. 2006a. *Cybercultures.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Bell, David. 2006b. Introduction: Approaching Cyberculture. In *Cybercultures.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I*, edited by David Bell, 1—10. New York: Routledge.
- Bell, David. 2007. *Cyberculture Theorists*. New York: Routledge.
- Beller, Jonathan. 2006. *The Cinematic Mode of Production*. Lebanon, NH: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 Best, Steven and Douglas Kellner. 2001. *The Postmodern Adventure*. New York: Guilford.
- Bolin, Göran. 2011. *Value and the Media.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Digital Markets*. Farnham: Ashgate.
- Breen, Marcus. 2010. Digital Determinism: Culture Industries in the USA-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New Media & Society* 12(4): 657—676.
- Breen, Marcus. 2011. *Uprising. The Internet'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Champaign, IL: Common Ground.
- Burston, Jonathan, Nick Dyer-Witheford and Alison Hearn, eds. 2010, Digital Labour. Special issue. *Ephemera* 10(3/4): 214—539.

- Butler, Judith,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2000.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London: Verso.
- Callinicos, Alex. 2003. *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K: Polity.
- Campbell, John Edward and Matt Carlson. 2002. Panopticon.com: Online Surveillance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Privacy.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6(4): 586—606.
- Campbell, John Edward. 2008. *Virtually Home: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ommunity in Cyberspace* (dissertation).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anuary 1, 2008).
- Cecez-Kecmanovic, Dubravka. 2005. Basic Assumptions of the Crit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In *Handbook of Crit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edited by Debra Howcroft and Eileen M. Trauth, 19—46.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Cleaver, Harry. 1998. The Zapatistas and the Electronic Fabric of Struggle. In *Zapatista!*, edited by John Holloway and Eloya Peláez, 81—103. London: Pluto Press.
- Critical Art Ensemble. 1996. *Electronic Civil Disobedience*. New York: Autonomedia.
- Dahlberg, Lincoln. 2004. Net-Public Sphere Research: Beyond the “First Phase”. *Javnost* 11 (1): 27—44.
- Dahlgren, Peter. 2005.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2(2): 147—162.
- Dean, Jodi. 2004. The Networked Empire: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the Hope for Politics. In *Empire's New Clothes*.  
*Reading Hardt and Negri*, edited by Paul A. Passavant and Jodi Dean, 265—288. New York: Routledge.
- Dean, Jodi. 2005.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1(1), 51—74.
- Dean, Jodi. 2006. *Žižek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Dean, Jodi. 2009. *Democracy and Other Neoliberal Fantasies.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Left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ean, Jodi. 2010. *Blog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 Derrida, Jacques. 1994. *Specters of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 Downing, John. 2001. *Radical Media*. London: Sage.
-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Dyer-Witheford, Nick and Gre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agleton, Terry. 2011. *Why Marx Was Righ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lmer, Greg, ed. 2002.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ne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Elmer, Greg 2004. *Profiling Machin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ss, Charles 2011. Introduction to Part I. In *The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 edited by Mia Consalvo and Charles Ess, pp. 11—15. Chicester: Wiley.

Feenberg, Andrew. 2002.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rnback, Jan. 2004. Community as Commodity. Empowerment and Consumerism on the Web. *Internet Research Annual* 1:224—230.

Fernback, Jan and Zizi Papacharissi. 2007. Online Privacy as Legal Safeguar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sumer, Online Portal, and Privacy Policies. *New Media & Society* 9 (5):715—734.

Fisher, Eran. 2010a.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Discourse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Capit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3(2):229—252.

Fisher, Eran. 2010b. *Media and New Capit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Foster, John B. and Fred Magdoff. 2009.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08.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09a.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Rethinking Marxism* 21(3):387—402.

Fuchs, Christian. 2009b.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1):69—87.

Fuchs, Christian. 2010a. Grounding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Karl Marx.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4(1):15—41.

Fuchs, Christian. 2010b.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179—196.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and Dwayne Winseck. 2011. Critic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day. A Conversation. *tripleC* 9(2):247—271.

- Garnham, Nicholas.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 Garnham, Nicholas. 1998.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Reconciliation or Divorce? I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edited by John Storey, 600—612. Harlow: Pearson
- Graham, Phil. 2006. *Hypercapitalism*. New York: Peter Lang.
- Habermas, Jürgen.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akken, David. 2003. *The Knowledge Landscapes of Cyberspace*. New York: Routledge.
- Hammer, Rhonda and Douglas Kellner. 2009. From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Studies through Cultural Studies. In *Media/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Approaches*, edited by Rhonda Hammer and Douglas Kellner, ix-xlvii. New York: Peter Lang.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4. *Multitude*. New York: Penguin.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9.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 Heim, Michael. 1999. The Cyberspace Dialectic. In *The Digital Dialectic*, edited by Peter Lunenfeld, 24—4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erman, Edward S. 1998. The Reopening of Marx's System. *New Politics* 6(4): 131—135.
- Hesmondhalgh, David and Sarah Baker 2011. *Creative Labour. Media Work in Thre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Routledge.
- Hobsbawm, Eric. 2011.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 London: Little, Brown.
- Horkheimer, Max. 1937/2002.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Critical Theory*, 188—252. New York: Continuum.
- Horkheimer, Max. 1947/1974.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Continuum.
- Huws, Ursula.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Jacobs, Katrien, Marije Janssen and Matteo Pasquinelli, eds. 2007. *C' LICK ME. A Netporn Studies Reader*.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 Jakobsson, Peter and Fredrik Stiernstedt. 2010. Pirates of Silicon Valley. State of Exception and Dispossession in Web 2.0. *First Monday* 15(7).
- Jameson, Frederic. 2011. *Representing Capital*. London: Verso.
- Jones, Steve. 2006. Foreword. Dreams of a Field: Possible Trajectories of Internet Studies. In *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Silver and Adrienne Massanari, ix-xvii.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ahn, Richard and Douglas Kellner. 2004. New Media and Internet Activism. *New Media & Society* 6(1):87—95.
- Keen, Andrew. 2006. Web 2.0.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Internet Has Arrived. It's Worse Than You Think. *The Weekly Standard*, May 16.
- Keen, Andrew. 2007.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 New York: Currency.
- Kellner, Douglas. 1989.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Kellner, Douglas 1995.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 Kellner Douglas. 2002. Theorizing Globaliz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20 (3): 285—305.
- Kellner, Douglas. 2009. Toward a Critical Media/Cultural Studies. In *Media/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Approaches*, edited by Rhonda Hammer and Douglas Kellner, 5—24. New York: Peter Lang.
- Kelly, Kevin. 1998. *New Rules for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Viking.
- Kelly, Kevin. 2009. 009, June 2009. The New Socialism. *Wired*, June 2009: 116—121.
- Kidd Dorothy. 2003. Indymedia.org: A New Communication Commons. In *Cyberactivism*, edited by Martha McCaughey and Michael Ayers, 47—40. New York: Routledge.
- Kline, Stephen, Nick Dyer-Witheford and Greg De Peuter. 2003. *Digital Play: The Interaction of Technology, Culture and Marketing*.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Knoche, Manfred. 2005.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iche Medienökonomie als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r Medien. In *Internationale partizipatorische Kommunikationspolitik*, edited Petra Ahrweiler and Barbara Thomaß, pp. 101—109. Münster: LIT.
- Lanier, Jaron. 2006. The Hazards of the New Online Collectivism. *Edge-The Third Culture*.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ge.org/3rd\\_culture/lanier06/lanier06\\_index.htm](http://www.edge.org/3rd_culture/lanier06/lanier06_index.htm)

- Lauer, Josh. 2008. Alien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Toward a Marxist Critique of Consumer Surveillance. In *Participation and Media Production*, edited by Nico Carpentier and Benjamin De Cleen, 41—56.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 Lovink, Geert. 1997. Von der spekulativen Medientheorie zur Netzkritik. *Telepolis*, January 1.
- Lovink, Geert. 2002. *Dark Fiber. Tracking Critical Internet 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ovink, Geert. 2008. *Zero Comments. Blogging and Critical Internet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Lovink, Geert and Sabine Niederer, eds. 2008. *Video Vortex Reader. Responses to YouTube*.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 Lovink, Geert and Ned Rossiter, eds. 2007. *MyCreativity Reader. A Critiqu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 Lovink, Geert and Trebor Scholz, eds. 2005. *The Art of Free Cooperation*. New York: Autonomedia.
- Lovink, Geert and Pit Schultz. 1997. Aufruf zur Netzkritik. In *Netzkritik*, edited by nettime, 5—14. Berlin: Edition ID-Archiv. Lovink, Geert and Soenke Zehle, eds. 2005. *Incommunicado Reader*.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 Lunenfeld, Peter. 1999a. Introduction: Screen Grabs: The Digital Dialectic and New Media Theory. In *The Digital Dialectic*, edited by Peter Lunenfeld, xiv-xxi.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uxemburg, Rosa. 1913/2003.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Routledge.
- Macek, Steve. 2006. Divergent Critical Approaches to New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 8(6):1031—1038.
- Marcuse, Herbert. 1941.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New York: Routledge.
- Marx, Karl.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ineola, NY: Dover.
- Marx, Karl. 1857/1858. *The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863.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ume 1.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Marx, Karl. 1867. *Capital: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871.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237—



29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rx, Karl. 1875.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In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297—317.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rx, Karl. 1894. *Capital. Volume 3*.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Amherst, NY: Prometheus.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thiesen, Thomas. 2004. Panopticon and Synopticon as Silencing Systems. In *Silently Silenced. Essays on the Creation of Acquiescence in Modern Society*, 98—102. Winchester: Waterside Press.

MEW. 1962ff. *Marx-Engels-Werke*. Berlin: Dietz.

MECW. 1975ff. *Marx-Engels-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cChesney, Robert W. 2007.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Press.

Moglen, Eben. 2003. *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 Retrieved August 8, 2010, from [http://emoglen.law.columbia.edu/my\\_pubs/dcm.html#tex2html2](http://emoglen.law.columbia.edu/my_pubs/dcm.html#tex2html2)

Mosco, Vincent.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2nd edition.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eds. 2009.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Plymouth: Lexington.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2005.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60—83. 4th Edition. New York: Hodder Arnold.

Nakamura, Lisa. 2008. *Digitizing Race. Visual Cultures of the Interne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Nakamura, Lisa. 2009. Don't Hate the Player, Hate the Game. The Racialization of Labor in World of Warcraft.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8(2):128—144.

O'Connor, James. 1998. *Natural Causes*. New York: Guilford.

Olsson, Tobias. 2006 A Marginal Resource for Civic Identity. The Internet in Swedish Working Class Households. *Javnost-The Public* 13(1):73—88.

Paparcharissi, Zizi. 2002. The Virtual Sphere.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 4(1):9—27.

Passavant, Paul A. 2004. Postmodern Republicanism. In *Empire's New Clothes. Reading Hardt and Negri*, edited by Paul A. Passavant and Jodi Dean, 1—20. New York:

Routledge.

Patelis, Korinna.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In *Media Organisations in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Curran, 84—107. London: Arnold.

Popper, Karl R. 1962.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14(2):233—248.

Qiu, Jack L.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Rossiter, Ned. 2006. *Organized Networks*. Rotterdam: NAI.

Schiller, Dan. 2000.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chmiede, Rudi. 2006. Knowledge, Work and Subject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In *Social informatics: 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 edited by Jacques Berleur, Markku I. Nurminen and John Impagliazzo, 333—354. New York: Springer.

Scholz, Trebor, ed. 2012.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

Scholz, Trebor. 2008. Market Ideology and the Myths of Web 2.0. *First Monday* 13 (3).

Silver, David. 2006a. Introduction: Where is Internet Studies. In *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Silver and Adrienne Massanari, 1—1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ilver, David. 2006b. Looking Backwards, Looking Forwards: Cyberculture Studies 1990—2000. In *Cybercultures.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II*, edited by David Bell, 61—79. New York: Routledge.

Silver, David and Adrienne Massanari, eds. 2006. *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94. *Counterclockwis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1951. Aims and Tasks of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Retrieved August 8, 2010, from <http://www.socialistinternational.org/viewArticle.cfm?ArticleID=39>

Söderberg, Johan. 2008. *Hacking Capit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Stahl, Bernd C. 2008. *Information Syste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Sterne, Jonathan. 2006. Thinking the Internet: Cultural studies versus the Millennium. In *Cybercultures.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II*, edited by David Bell, 80—106. New York: Routledge.

Sussman, Gerald. 1999.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2(2):85—87.

Taylor, Paul A. 2009. Critical Theory 2.0 and Im/materiality: The bug in the Machinic Flows.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1(1):93—110.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London: Pluto.

Therborn, Göran. 2008. *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 London: Verso.

Turner, Graeme. 2003.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van Dijck, José. 2009. Users Like You? Theorizing Agency in User-Generated Conten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1(1):41—58.

van Dijck, José and David Nieborg. 2009. Wikinomics and its Discontent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Web 2.0 Business Manifestos. *New Media & Society* 11(5):855—874.

Virno, Paolo and Michael Hardt, eds. 1996.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ebster, Frank. 2002.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Žižek, Slavoj. 2004. *Revolution at the Gates; Žižek on Lenin*.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08.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09.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10a. 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Idea of Communism*,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and Costas Douzinas, 209—226.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10b.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and Costas Douzinas, eds. 2010.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Verso.

克里斯蒂安·加兰(Christian Garland)<sup>①</sup>

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sup>②</sup>

## 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

——批判“新自由主义”对于媒体与传播研究的用途及其限制

蔡蕙如(译),殷鹏、吴畅畅(校)

[导读]这篇文章主要谈及“新自由主义”在批判媒体与传播研究的使用与限制,作者认为转变(批判的对象从资本主义转为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是“多元文化论者”击败了昔日的对手“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脉络就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文化研究 vs 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 vs 马克思主义”脉络(页 413),这个“对立”情形至今是否存在?有因为近年“反资本主义”风潮而有所改变吗?然而,对台湾而言,大部分的批判媒体与传播研究同样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作为背景和基础(包括我自己的硕士论文也是),若随机抽样几篇看其内文,鲜少提及“资本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原因很多,也一定和英国批判传媒研究方向有高度的正相关(但不见得也是文化研究 vs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脉络)。因此,借着翻译这篇文章的过程,同时自我反省,我们在选择“批判”的立场时,是否忽略了什么关键之处?

谈及窃听案的部分,可以理解作者提及的默多克派和反默多克派(以BBC和卫报为首)之间的斗争,文中所提的BBC和卫报“本质”(认为基本上还是为“另一边”的利益阶级服务),倒是和我们在台湾地区的认知有段距离。例如:“……若将这个视野用于媒体与文化工业,那么,攻击新自由主义

---

① 英国华威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批判理论研究所, [christiangarland@hotmail.com](mailto:christiangarland@hotmail.com)。

② 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创意艺术、电影与传媒学院, [stephen.harper@port.ac.uk](mailto:stephen.harper@port.ac.uk)。

虽然值得称许,但它将当前版本的‘公共服务’广电当作堡垒,用以对抗商业主义,往往是有问题的。”(页 414)或是“……别忘记默多克是被更具权力的同盟所击败,该联盟包括英国里的反默多克派系和非默多克的媒体—例如 BBC 和卫报。”(页 418)

由于台湾地区的批判传媒研究往往视 BBC 和卫报为“良好媒体”的典范,BBC 的公共广电性质更是台湾批判研究与媒体改革的终极目标,但鲜少谈及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当然这还是和第一个问题相扣连,因此也让我思考这个“引进”的过程,是否遗漏了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问,台湾的批判媒体与传播研究/运动未来的方向会在那里?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批判媒体与传播研究,窃听门

1980 年代早期的媒体与传播研究教科书,可以说是构成了自由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战场(例如, Gurevitch et al. 1982)。在欧洲批判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谈的是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他们指责多元文化论者低估了统治结构(Hall, 1982)。多元主义的媒体评论者根源于美国社会学传统,他们高举民主的主张,抨击马克思主义者是经济决定论与功能主义论。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多元主义者是媒体与文化研究的两大阵营,我们当然可以说,二者的关系史是你来我往彼此诘问与重叠,但无疑地,在晚近数十年里,多元主义观点已经完全击败了昔日的意识形态对手。

当然,在媒体与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总是一再被边绿化。举例来说,在 20 世纪,美国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sup>①</sup>和德国的激进分子决议(Radikalenerlass)<sup>②</sup>,限制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的活动。此外,在 1960 年

① 1950 年代初,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发动全国性的反共运动。以国家安全为由,许多公务员和知名人士因此受到监控、解职,甚至遭到囚禁。之后对于无明显证据,却可公开指控某人亲共,对国家不忠诚,皆称之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译者注

② 1972 年,联邦德国与各邦政府作出了共同决议——“隶属于激进组织的公务员之处置原则”(Grundsätze über die Mitgliedschaft von Beamten in extremen Organisationen)。由内容观之,此一共同决议亦可称为“激进分子决议”(Extremistenbeschluss,亦称为“Radikalenerlass”),决议中总共罗列三个处置原则:一、公务员须时时刻刻、毫无保留且积极拥护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若没尽此义务,致令人怀疑其忠诚者,雇用机关得审查并决定是否开除之。二、欲担任公务员者,必须保证会时时刻刻、毫无保留且积极拥护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凡有敌宪行为、或隶属于某一敌宪组织者,不得进入公务机关服务。三、对于公务机关的工人与雇员亦适用前述原则。——译者注

代和 1970 年代,马克思主义是工人斗争的驱动力,并且在学院里有实质的影响力。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里,随着阶级斗争的衰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边缘化变得特别明显。近几十年来,在后现代主义的庆贺声中,媒体与文化研究学者开始自认本身的多元主义思维,有别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所谓“精英”取向,他们也持续强调自身的立场,以及他们所批评的媒体文化,都有折中的性质。根据多元主义的典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所支撑及继续的意见自由市场,容许报纸读者、电视观众与广播听众自由浸淫在消费文化中,成为积极主动,得到培力(赋权)机会,也是具有抵抗能力的阅听人。因此,虽然资本主义或许有些缺点,但它是“我们所可能拥有的最佳选择”,是以,我们必须使它达到最佳状态: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媒体制度代表了最好的事务安排。流行于 1990 年代文化研究情境的这个视野,就此重新设定了文化与媒体理论的意识形态坐标,致使今日有许多评论者认为,媒体与文化批评的任务不再是批评资本主义,而是要捍卫“民主”和“多元主义”,借此对抗让人不快的市场侵犯——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众多形式,就是展现来自市场的这些侵犯。

的确,多元主义已在媒体与文化研究领域取得霸权地位,伴随出现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显学术用语也开始转变。举例来说,“资本主义”这个词早已从左翼的词汇上消失,诚如齐泽克(Slavoj Zizek 2007, 212)所言,这无疑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胜利的象征。如同波坦斯基和希亚佩洛(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ix)在 1990 年代的观察,[资本主义]这个词已经不再出现在政治人物、工运人士、作家和记者的语汇里,至于社会科学家,更是早已将其放逐到历史的洪荒之中。时至今日的媒体与文化研究论述,我们大体上可以说,“新自由主义”一词已大抵取代“资本主义”(及其较为乐观的用语——晚期资本主义),现今,当我们看到前者时,以前所出现的字眼是后者。不妨举个例子,多产的论述分析家凡戴克(van Dijk 2006, 121)曾有论文,检视媒体的意识形态,他在讨论阅听人的时候,使用的用语是阅听人如何辨别“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或是新自由主义者”。这些表述意味着,昔日的马克思主义和多元主义这对词汇,已由新自由主义和民主(或者,有些时候是拉克劳式[Laclauian]的用语——“激进式民主”)这对新的二元典范所取代。今日,传媒与文化研究领域的许多学术工作者,谈的是新自由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杰出媒体学者方腾(Fenton 2009, 56)就表示,“如果媒体研究必须做些什么,那就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分析和解释其

市场教条的文化与政治意义。”

以新自由主义为对象,抨击其本身,不必然是一种误导。事实上,正如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媒体与文化研究里许多有价值的工作,都已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然而,即便评论者运用这个词汇,但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有时并不明确,论者经常理所当然地以为,该词的内涵一清二楚(Mudge 2008)。对于媒体与文化研究的批判学界来说,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有何相干与效用,这篇论文试图予以廓清;作者提出的问题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媒体的人,在接受了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批判标的及用语后,其批判力道或解释力,是不是真有提升。本文所要特别论称的是,媒体与文化研究业已接受“新自由主义”作为惯用词汇,并且以其作为批判的最终目标,而非资本主义本身。依照方腾的说法,新自由主义是个“市场教条”,它取代了昔日的市场观,当时,是自由民主政体的国家“制衡”资本家的权力;现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人,其动能来自于改良派的视野,他们想要重拾先前的社会民主愿景,“重新拿下国家”(Wainwright 2003),使其免受市场力量之苦。在我们看来,诸如此类的批评是危险的,它们可能让人产生微温,虽有忧心,却又对于早就一去不再复返的“比较公平的”、“更为民主的”资本主义,产生渴望之心,遂此就想呼吁“更新”凯恩斯主义。同时,若将这个视野用于媒体与文化工业,那么,攻击新自由主义虽然值得称许,但它将当前版本的“公共服务”广电当作堡垒,用以对抗商业主义,往往是有问题的。

这篇论文尝试以更为激进的认知,批判新自由主义在批判论述内部的功能,我们将会挑战这个用语的常见假定,我们也会挑战该词在媒体与文化工业的应用。对于媒体的权力问题,我们自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提出知名的论点,我们颇受启发: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sup>①</sup> (Marx and Engels 1970/1845,64)

---

<sup>①</sup> 中文摘自自《德意志意识形态》, <http://www.xiachao.org.tw/ccdb/data/Classics/ME/1845/Feuerbach/F3.html>。——译者注

对于我们而言,再制意识形态得以出现,大众媒体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意识形态,明确地维持了资本主义,使其成为必然发生和永恒长存的真实,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是相同的看法;因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价值形式和利益动机),的确同时就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媒体的亿万老板运用巨大影响力,确切地过滤拥有和掌控的媒体,并直接或间接地,透过同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公司股东,获取“物质生产资料”,因而借此同时得到“精神生产资料的控制”。此外,在实境节目的时代里,镜头以欺骗性的“民主”平民主义,转向原子化的(非)个人,这个方式确实地“支配了缺少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想法”,即便有些人可以迅速地享有名人地位,也只是少数例子。但是这样的支配,不仅只是新自由主义下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指出,媒体与文化工业的重要问题,不仅在于市场力量决定它们的角色,而且也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所有适切的马克思媒体与文化研究批评内容,必须同时包含所谓的“自由市场”,以及保障和协调资产阶级利益市场的国家。我们深信,在“确实存在”的社会真实中。阶级与阶级斗争是存在于较难处理的场域里——场域里不是一些错误及辩解的概念,如“阶级主义”(classism)。如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清楚地知道,“这种斗争是为了粗俗的,物的东西的斗争。但没有这种粗俗的、物的东西,神圣的、精神的东西就无法存在”。<sup>①</sup> 阶级间的物质斗争——换言之,即是反劳工的资本和反劳资关系、价值关系,和薪资关系的劳工斗争——这些定义了从阶级和抽象劳动(abstract labour)的解放条件。若将这些简化成反“市场”的斗争,就等同于冒着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风险。

就格林(Glyn 2007)的学术用语,新自由主义可视为“放纵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需要经济活动去社会化的政治理性(Foucault, 1988),以及特别奉行竞争法则,国家理性化(state rationalization)和生产要素流动性(factor mobility)(或是“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一向认为,市场力量优先于国家介入和统制政策(dirigisme),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是以“有目的性地从公共集体的价值转向私有个人的价值”作为标记(Barnett 2005, 7)。新自由主

---

<sup>①</sup> 中文摘自[德]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张旭东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译者注



义的哲学起源,毋庸置疑是在如哈耶克(Hayek)和弗莱德曼(Friedman)等经济学家的自由市场主张;但直到1970年代晚期,起因于西方政府追求一系列所谓的“解除管制”政策——或是更确切的说是“再管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才开始运用物质力量。接下来几年,国家已逐渐减少提供社会福利,慢慢不再插手经济组织的某些事务——可从近日的发展观察得知,大部分的政策提案已开放如下的程序:向民营第三方企业提出以竞标契约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功能——因此导致一个过度融资、“全球化”的经济和日趋增加的私有化社会政经秩序。这个秩序召唤个人为竞争和自治的、单元的个体(Harvey 2005)。与此同时,像政党,工会和教会,这类昔日足以指导或控制国家的社会团体,和媒体组织的密切关系已经松动,媒体组织反而已愈来愈听从市场驱力,这样的情况特别发生在美国(McChesney 2001; Hallin and Mancini 2004; Hallin 2008)。

如同这个纲要所示,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在过去40年来,帮助启发了西方资本主义压制工人阶级斗争的许多面向。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视市场本身为最理想的境界(supreme good);其相关词语强调的“自由”,终究是从事买卖,与为了取得和维持财产的自由。事实上,“自由”的本质变为经济属性——努力或工作的自由,以及遵守认可这个情况(译者注:经济自由)的法律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计划或许被描述为比凯恩斯主义还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实际上,市场驱力的欺骗,尽可能地无时无刻存在于生活周遭,用马克思著名的用语表达,就是“现金交易体系”的统治。相对于战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完全就业承诺,完善的社会福利安全网、重要产业的公共产权,以及当危急时,国家介入以“投资市场刺激”(pump prime)经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解管制、结构性的失业、公司税的废除、和福利“改革”等这些前提,成功地破坏了凯恩斯学派的共识。在这层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方案策略,一直都是以恢复与维持阶级权力为目的,并借由资本力量,回应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时,工人和学生革命所造成的强烈冲击,但这个冲击不亚于数十年后持续发生的经济危机(Harvey 2005)。

然而,在目前,仍有一些前提需要说明。举例来说,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职权和责任,所“倒退”的程度多寡仍有争论。杜威(John Dewey)曾经评论“政府受到财团的影响大于社会”,然而在规范资本主义上,民族国家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同哈维(Harvey 2005, 159—164)所说,近数十

年来,财富重分配往富有的一方移动,国家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实上,若没有国家去调和竞争的体系,市场竞争者和社会将会相互毁灭而亡。民族国家的功能,就如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所称的“所有资本家的理想集体组织”,是为了规范资本家竞争利益时引起的混乱。左翼自由主义分子和怯懦的“反全球化”行动主义者的部分主张,和拉克劳与墨菲(Laclau and Mouffe 1986)所提倡的“激进式民主”不谋而合,他们经常不满跨国家权力(transnational power)不断夺取民族国家角色,例如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然而这些机构是由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立,并且一直以其利益操作。这些超国家组织的设立,例如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八大工业国组织(G8)和全球二十大经济体(G20)这些组织,欧盟(EU)当然也是其中之一,都确实全是由自由民主国家所设立,因此要求从市场或是新自由主义过度权力面向的改造,充其量都不足以为信。正如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 2005,138)所说:

实际上,许多此类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或者就是反对极端恶毒的大公司,但并不特别反对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害影响可以通过“驯化”全球性公司,或使他们更为讲“伦理”、更“负责任”、更有社会觉悟等手段予以消除。<sup>①</sup>

以此逻辑观之,承诺自由民主的国家,过往所建立的超国家机构,因为服膺于资本,而“不是民主的”机制(请参考 Klein 1999; Monbiot 2001; Herz 2002)。表达这样的忧虑,似乎令人有些困惑。因为这样的批评,往往忽略了国家和市场必然水乳交融的关系。的确,虽然资本主义市场具全球本质,但民族国家的形式,对于资本主义依然不可或缺。正如沙辛(Saskia Sassen 2006)所提及,“全球化”的力量是在民族国家内操作,绝非是民族国家的消失——如同民族国家必然是生存在全球秩序中。因此,虽然民族国家的元素已去疆域化,但国家在资本主义组织里,依旧保持重要的角色,如伍德(Wood 2005,139)所言,“没有任何组织已经着手取代民族国家,并试图承担起对社会秩序、财产关系、社会稳定、合同信度及任何其他的资本日常运营,

<sup>①</sup> 译文取自《资本的帝国》,王恒先,宋兴先译,2006,上海译文出版社。——译者注

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管理和强制保障作用。”<sup>①</sup>

甚至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在上个世纪的生存,即是以国家和市场日趋结合为前提。早在19世纪末,考茨基(Kautsky)在其著作《阶级斗争》(1871/1892)中观察到,国家必须得亲自处理日益增加的许多功能,如观察家布哈林(Bukharin)和托洛斯基(Trotsky)也指出,在20世纪早期更强化了 this 趋势。的确,当时面对革命的威胁和全球市场蔓延所引起的困境,斯大林主义的科层计划经济、法西斯主义和新政式的社会民主,取代了19世纪相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20世纪初期的经济资料支持了这个诠释:19世纪时,英国和美国的政府的支出作为国民生产毛额的一部分,大部分都是固定的,在1920年代开始迅速地增长,而战后福利国家的出现,则理所当然地达到高峰。

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通常认为,战后国家的积极功能开始出现倒退,是出现在里根和撒切尔时期。自198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倾向朝向私有化和外包制,福利国家也同时衰退,更肯定了 this 论点。另一方面,近年英国、美国、爱尔兰和冰岛响应经济危机的方式,是以运用公共财政去担保倒闭银行,这提醒我们,国家仍不断和积极地干预市场操作,以维持资本的积累。据称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军事费用非常庞大,大量的常备军用来征服海外新市场——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这样的事实,使得认为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开始退位的这类观点,实在过于简单,因此是需要被厘清的。事实上,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自20世纪早期,国家的管辖范围,已急速的增加。我们似乎要谨慎地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个名词,绝对不应该以自由民主国家权力的消逝与减弱来理解新自由主义。说句公道话,上述的观察,不得不使我们认定新自由主义是个“霸权的重建精神,并且成为管制转变的(不完整及矛盾)主流用语,而非一个完全一致的体系或拓扑式国家形式”(Peck et al 2010, 104; 也可参考 Ortner 2011)。也许该强调的是,不一致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一些国家和地理区域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程度,更甚于其他地区(Hallin and Mancini 2004; Hallin 2008)。

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对于媒体评论者和社会学家已无解释价值。媒体社会学家使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已开始注意一些主题,例如政治的名

---

<sup>①</sup> 中文摘自[加]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先、宋兴先译,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译者注。

人化,弹性低薪工资的使用,或是媒体产业的外包劳工(Deuze 2007)。同时,文本和文化评论者也适当地强调了晚期资本主义治理下的一些高度个人化的方面。在一些书中,鲍曼(Bauman 2000,2008,2011)坚信地描述和谴责这个不安(restless),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流动”世界,而寇椎(Couldry 2010)、葛拉山(Grazian 2010)、麦克穆拉(McMurria 2008)和史蒂文森(Stevenson 2010)都已精明地评论,实境节目在制作弹性、流动和自我形塑的“企业主题”里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地,佩克(Peck 2008)则很有技巧地概述,在励志书和欧普拉(Oprah Winfrey)的脱口秀里,所强调自力更生的个人式论述,是如何去加强新自由主义的认识论。举例和批判过去20年来媒体和文化产业的激烈去社会化,这样的工作是有其价值,这些表面上的证据,可以从充斥生活风格和消费节目的电视节目表取得略知一二,而这些节目的理想观众,似乎是自我规训的经济人(home economicus),只关心节食、增加财富以及整形。

然而,对于当代机制和主体不断原子化,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有助于产生具有价值的洞见,但作为文化与媒体分析的工具,仍有其限制。首先,的确许多当代媒体文化强调观众是具有弹性、独立自主的消费者,但大部分的媒体文化也具传统的宣传功能,目的是为了创造资本主义国家的爱国公民。BBC的政治讨论节目,例如 Question Time、政党政治广播时段和政治新闻,确切全然地反映出物质利益,并强化资本主义国家的象征权力。很独特的“帮助英雄运动”(Help for Heroes campaign)<sup>①</sup>也是如此——它或许有助于许多好的服务——无疑地服膺于灌输国家主义者和军事主义者的情感。更不用说“平实国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sup>②</sup>以隐晦的形式(Billing 1995),透过在全国性的电视杂志节目和体育报道宣传。虽然以国家宣传的观点去描述媒体,在当代媒体与文化研究中也许有点过时,但灌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感,仍是大部分我们消费的媒体的主要功能,特别是在所谓的“公共广电”服务。这种媒体宣传所带来的恶质效果,以及被断章取义的信息谬误,不仅妨碍、限制了我们对这世界的普遍理解,也窒碍了所有可能的批判——这正是它所希望达成的目的。媒体批评若只聚焦在新自由主义的议

---

① 帮助英雄运动(Help for Heroes campaign)是由英国慈善机构于2007年10月1日所发起,协助提供自“9·11”事件后参战受伤的英国军人完善的服务。——译者注

② 平实国族主义意指国族主义以不引起一般人民注意的方式,实则于每日影响人们的实际想法。——译者注

题和意识形态,将会冒着未能显现真实的风险。

的确,除了作为右翼宣传机器的反动媒体,也有更微妙地存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因此较难受到批评——进行议题设制的自由媒体,他们设定了公共讨论的范围,以哈林(Hallin 1986)著名的讲法,就是划定了“合法争议领域”(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sup>①</sup>的界限。特别是公共广电服务,会传布和再制大众所能接受的论述,因而“制造共识”与合法性将来不会——现在也绝对不会受到质疑。在英国,BBC和Channel 4这两个频道的新闻和时事节目制作流程的编写,有些时候比商业竞争对手还要“严肃”。然而Channel 4和BBC两个频道——作为歇斯底里的小报媒体长期的虚假代罪羔羊——事实上总是私有财富和国家权力的既得利益最忠心的仆人(Edwards and Cromwell 2005; Garland 2011; Harper 2012)。例如从历史的观点来看,BBC总是支持冷战(Jenks 2006)及后冷战(Edwards and Cromwell 2005)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卡地夫大学对于BBC报道伊拉克战争所做的研究显示,比起其商业媒体竞争者,BBC确实较少对侵略行为做出批判。这里重点不是BBC和Channel 4近年来“严肃”新闻报道质或量的消逝;而是两个频道所引以为傲、形塑公共辩论的大众论述的“优质”新闻和时事节目制作流程,其实目的是为了赋予自由资本主义合法性,以及抢占体制内批评的位置。

我们认为,把焦点过度放在新自由主义对政治和文化所必然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导致我们忽略国家与自由媒体的共谋,这个共谋即便没有比负面影响更成问题,至少也同样需要质疑。在此以默多克新闻集团的2011窃听事件“丑闻”案为例,此案揭露一些新闻记者窃听一般大众和许多名人的语音消息的行为。我们也许可思考左翼自由媒体对此事件的响应。众所周知,默多克积极地主张“自由市场”媒体政策,促成了他的蹿起,并且将其理念加诸在为其效力的人身上(McChesney 2001, 14)。事实上,默多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早期代表人物,而他的政客朋友们,如撒切尔和里根,都

---

<sup>①</sup> 传播学者哈林(Daniel Hallin)认为,社会上各种事物分别存在于三个领域,最核心的是共识领域(sphere of consensus),包括那些大众都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或认为是对的判断。第二个领域是合法争议领域(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包括了那些社会上人们并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有许多合理的意见,可以理性的讨论。第三个是越轨领域(sphere of deviance),就是指那些被社会上普遍认为是错误和不道德的事物和行为(李立峰,2001)<http://rthk.hk/mediadigest/md1001/02.html>。——译者注

和他有共同的自由主义信仰。默多克能在市场上取得优势,这个信仰功不可没(Mcknight 2003)。无论是明确或是暗示的方式,很多左翼自由主义学者已认定默多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承诺,不仅可以解释其蹿起,也可解释其日暮西沉的重要原因。例如一位媒体学者曾言,窃听事件丑闻案发生在“不受拘束的新自由主义年代”(Savigny 2011)。的确,许多媒体学者和行动主义组织,业已认定对于丑闻案而言,新自由主义是其背后恶质的意识形态——例如自由运动团体 Avaaz<sup>①</sup>——并呼吁私有媒体的改革(Freedman 2011)。

电话窃听案的受害者和媒体评论者,已义正词严地谴责《世界新闻报》记者令人发指的荒诞行径。虽然左翼自由主义批评者在丑闻案发生之后,谴责新自由主义的具体代表——默多克,但他们已经忽略了这事件更大的政治脉络。无论以何标准来看,默多克虽然是全球媒体的大人物,然而别忘记,他是被更具权力的同盟所击败,该联盟包括英国里的反默多克派系和非默多克的媒体——例如 BBC 和卫报。至少自 2007 年起,英国政府就已知晓《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窃听事件(两位记者因为相关侵犯事件而入狱),因而默多克想入主 BSkyB 的投资案势必已引起英国政府的核心关注。似乎可以很合理的认为,由于默多克媒体的偏美立场,愈来愈让英国感到不快,因此,英国也许觉得是时候该让新闻集团听话,因而间接地迫使默多克亲手收掉他的星期日小报。在这个脉络下,默多克以及《国际新闻》的放低姿态,不应该被理解为民主问责(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压倒全球新自由主义力量的胜利,而应视为是国家借由主流派系,以及忠于该派系的媒体的强大力量,来钳制这个庞大的、让国家产生威胁感的全球性私人集团。以阶级观点来看,丑闻的爆发,正是因为布尔乔亚派系不爽另一派系,恰逢其时发动介入。理解窃听门事件的方式,不是要信奉共谋理论,而是要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各式派系的实质合作是很容易失败的。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说的(1967/1894),敌人间的战斗,其结果就是由权力和诡诈所决定。

的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新闻报》窃听案的曝光与官方紧接而来的媒体伦理审查,显示出的并非是私人媒体企业不受拘束的影响力,也非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遗毒,而是国家主流派系的影响力,作为

---

<sup>①</sup> 2007 年成立的全球公民组织,对于迫切的国际议题采取行动主义,例如人权、动物权、气候变迁等。——译者注

一种隐含意识形态的制约力量,统治、驯服了那些不守规则的分子。窃听案的阶级斗争观点则强调,利维森调查(Leveson inquiry)以及呼吁媒体“改革”的声音,绝非形成反霸权力量,而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主流收编:借由新闻集团的威信扫地以达成媒体“改革”,确实是英国统治阶级主流派系所需要的目标。在这一点上,虽然强调《世界新闻报》窃听案所犯下的罪也许令人憎恶,但它不可能和英国国家每日监视活动的侵犯相比——这点在大部分窃听丑闻案讨论轻易地被忽略。

这些论点,并不认为现今透过利瓦伊森调查去尝试“改革”媒体,是一定倒退和注定失败的。然而,人们谴责默多克帝国所代表的典型“新自由主义”私有媒体权力时所表现出的热忱,我们可以理解,但这热忱不应落入支持这种由国家提出、且毫无批判的改革圈套中,尤其是国家本身的监控机制没有被详加监督;这份热忱,更不应该使我们忽视了非默多克媒体这种彻底的资本主义本质。《世界新闻报》也许是腥膻、造假丑闻的具体表现,而且这份报纸以一种不太令人信服的角度,自行宣称该报之所以能不受制于那些控管“自由媒体”的准则,也是因为捍卫同样的准则——就是服膺民主精神以及符合一种人口统计学上的想象,即“公众”,的利益。正如皮尔格(Pilger 2001,21)所言:

由媒体精英所垄断的英国体制,不仅只仰赖着新闻集团,而且也依赖镜报,卫报,和也许是最有影响力的 BBC。所有媒体都是公司单一经营的方式,这个方式设定了“新闻”的议程,并借由维持特定政党的想象去定义政治,合理化令人厌恶的战争,以及捍卫“自由言论”的限制。这论点借由“坏苹果”已经“根除”的幻象,将持续强化。

正如同皮尔格的最后一句所言,国家权力和非默多克媒体对于默多克的攻击——无论如何会产生任何效果——是具有保守意识形态的意含,充其量以事件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攻击强化了自由民主媒体不会受到权力利益限制的迷思。

新自由主义做为批判典范的限制,也可透过最近正在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媒体报道分析所理解。对于许多学术评论者而言,这个危机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Beder,2009;Dumenil and Levy 2011)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危机,意味着“财政化”(Kotz 2008)、私有化、去管制以及国家介入经济的缺

席。另一方面,著名的马克思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怀疑论者基尔曼(Kliman 2010a,2010b,2012)认为,整体来说,这个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它最重要的原因是利润率的降低(Mattick 2011 and Fuchs 2011,26—29)。基尔曼也提到(Kliman 2012,50—51),虽然新自由主义有助于描述自1980年代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图景,“但在解释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轨迹,它不算是有用的概念”。这里并非是要做复杂的经济理论辩论。然而在基尔曼著述所提出的怀疑,至少给我们空间去质疑这类报道——大众媒体普遍呈现这个危机,是其中一种未受规范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对于许多记者来说,这个危机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短视近利承诺而发生,并过度理解“极端”资本主义的特定形式,甚至在小报和自由媒体上,借由典型的(以及争议的反犹)“贪婪的银行家”,以及无耻的商人,广泛地以这类拟人化方式呈现。如同自由派评论家马奎得(Marquand 2012,27)在《卫报》写的文章:

过去两年,我们经历了近代的第三大资本主义危机,而且还没结束。新自由主义典范主导了发达国家世界的制定政策过程,并且一直朝外发展,尤其是全球经济管理的机制。我们已察觉(或重新察觉),政府掌控的信息一定比市场多。私人贪欲不会导致公共利益的出现。

特别是左翼自由主义的记者,已经普遍地在讨论此议题。如同卫报记者汤恩比(Toynbee 2012,27)所言,最有效治疗这些病征的方法,就是强而有力的财政管制,以及在“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架构里,促成社会经济的“公平”。因此,自由派记者会倾向以平民主义和道德的用语,理解经济危机,并抱怨自由放任的财政上充斥着个人私欲——这个论述对于自2011年开始蔓延全球的各式占领运动的活动和目标的形塑,非常有影响力。然而,一位马克思主义评论者,高思(Gowan 2009)则认为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

虽然自由市场、自由放任机制,或是新自由主义观点,赋予新华尔街体制合法性,但对于开创者而言,无论是在华尔街或是华盛顿,这些似乎还未形成操作的意识形态。奥加尔(Philip Augar)在其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详细研究中提到,这个贪婪机器[……]指出他们大部分已确实操作为有意识的卡特尔(cartel)——即自由市场的对立面。



从这个观点来看,记者以新自由主义去解释经济危机,也许是提供了便宜行事、媒体所需要的代罪羔羊,但他们仍很难对于经济衰退提供一个足够的解释,或是可能的解决方案。“新自由主义”理论已成为许多主流媒体解释这个危机的原因;然而它所导致的道德主义和平民主义,则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如基尔曼(Andrew Kliman)(2012)和马蒂克(Paul Mattick)(2011),所提出对于经济衰退的物质解释,形成强烈对比。

对于媒体与文化研究评论者和先锋者,若新自由主义是有待解决的概念,那么其相对的“民主”概念也有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除了呼吁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媒体需要更多管制外,不出所料地,也呼吁政治生活里需要更多的民主。但这些诉求并不是公开的国家主义诉求——他们似乎是在诉求捍卫“我们的民主”(e. g. Fenton 2011)——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将民主视为新自由主义病征的解决方法,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正如迪恩(Dean 2010)指出,自由民主就非常可能会导致新自由主义,遑论否定新自由主义。诉求自由民主国家管制过度的新自由主义,似乎互为矛盾。这个矛盾关系可由麦可摩尔(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2009)看出一些端倪。摩尔的纪录片动人地描述了工人阶级受到资本主义非人道的的影响。然而,这部片的结尾,似乎是要将在片中详加描绘的痛苦,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到来、“财政化”和逐渐“失去控制”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结尾值得商榷。这部片子以华尔街摩尔呼吁银行部门需要更多的管制的镜头作为结束;因此,这部片子已确认和痛责自由民主的不公义——并且明确地坚持需要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摩尔在此提出,他认为解决财政和机制贪污的方案是“民主”(在这里摩尔暂停了一下,好像正在思考)。事实上,摩尔在别处谈论他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要鼓励他的观众“对民主更积极”(McGreal 2010, 32)。当然,这里明显矛盾的原因,在于摩尔使用了“民主”的两个非常不同的定义:透过这部电影,摩尔正当地攻击民主为资本主义守护者的一种形式,但在影片尾声却诉求更积极的民主,并以草根和工人阶级决策的形式去理解民主——这个民主的定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想法一致。然后摩尔的讨论也许不像一开始出现的那样矛盾。但“民主”的潜在不确定性意义,像民主和“新自由主义”一同出现,即意味着在自由和政治改革的方向,会有退步的危险。如同狄恩(Dean 2009, 94)所警告:

即使是诉求民主,依然无法阐明这是另一条令人信服的政治道路,

因为它承认我们早已知晓会达成的前提——批评、讨论、包含和修正。因此民主的左翼同盟,不仅会为目前的失败开脱责任(看吧,民主并不完全),同时也逃避对未来的另一种政治想象。

确实,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主张民主为新自由主义的解药,不仅是弄错了病征的原因,而且,接受民主是阶级斗争的目标,也不符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970/1875)中提到的“布尔乔亚社会国家的最后一种形式”。

我们不会冒昧地建议大家把前述所表达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分析价值的那些简短意见,当作它的最终定论。此外,我们认为诉诸于“新自由主义”诠释的媒体评论者和记者,有必要思考这个用语的分歧性。新自由主义确实带来明显改变,已影响了近几十年西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某些领域。像哈维(Harvey 2005)的著述,就是在这个主题上最好的作品。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方式,常常就如詹姆森(Jameson 1981)所称的“遏制策略”的功能,它排除了资本主义及其媒体机制的结构批评。的确,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其政治理念建基于自由主义的理念,即一个良性、中立的国家都应是民主政体。毕竟,任何一种比民主更为激进的制度,都带有那么一种欺压式的“大叙事”味道。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所建议的解决方案,通常是更多的国家介入经济,以及更多对于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媒体的管制。然而,正如沃尔夫(Wolff 2007)所说,“左翼分子目光短浅——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重新主张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已放弃马克思重要的反资本家计划”。马克思主义批评必须跳脱在“过度”、“财政”、“去管制”或“新自由”资本主义这些批评,去融合价值形式和资本劳工关系的批评。这个批评必须同时包含商业媒体,及其较为家父长式的竞争者——但依旧是资本主义——公共服务广电。

跳脱新自由主义之外的批评,也需要区分阶级间派系的争斗,如同《世界新闻报》的丑闻案,以及要确认,在媒体里工人阶级维护自我权利的机会。的确,媒体和社会里激进的转变,都需要工人阶级在其领域内斗争:正如同著名的用语“工人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工作”。某种程度来说,媒体的任何激进转变,都需要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并且打倒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要非常小心翼翼,警惕因特网和新媒体具解放潜力的这类浮夸宣称(Fuchs 2011; Morozov 2011; Curran et al. 2012)。社群媒体和网络的新形式——若国家没有禁止网络,而工人阶级具经济上的近用性——的确可

显而易见地,促进反资本工人阶级的觉醒和组织(Hands 2010;Fuchs 2011),这个新形式创造了一个新媒体,但如同以往,这个新媒体仍是在旧媒体的架构里。特别是在窃听门事件中,就我们所知,马克思团体国际共产时事(2011)网站,是唯一分析其丑闻、阶级角色与全球帝国主义的紧张关系的网站,已有数千人对此网站点赞。透过这个网站,一般人可以讨论如何全面对抗和击败资本主义体系,而非新自由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新自由主义一直被理解为资本积累的制度,而这个累积是寄生在,或是外在于另一种没有问题的资本主义的正常功能,因此新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个适当的批判用语。这个词使用的脉络,常常是自由民主的前提,使用这个词的人,往往因为太晚发现国家总是和资本连手,而感到震惊。无论如何,以政策和经济的标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在许多方面已结束,例如主权债危机逼使资本主义国家渐渐采用保护的政治策略。也许现在是时候放弃新自由主义作为分析的范畴了。对于激进分子而言,这个用语在今日并没有太多的词汇价值。费希尔(Fisher 2009)指出,由于目前欠缺明显的另类选择,人们才会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能的政治体制,因此感受不到资本主义的存在,其实是一种矛盾。而为了要以新自由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从而使其作为批判的用语,等于是冒着风险让资本主义“变成隐形”的共犯。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经嘲讽“资本主义是个不喜欢被称呼名字的绅士”;但如果我们希望确认和克服时代的社会政治病征,正如詹姆森(Jameson)(1991,418)所推崇的最有名的1960年代口号重现——“正名体系”(name the system)——就有其迫切需要,因为这个体系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

### 参考文献:

- Barnett, Clive. 2005. The Consolations of "Neoliberalism". *Geoforum* 36(1):7—12.
- Bauman, Zygmunt. 2000. *Liquid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 Bauman, Zygmunt. 2007. *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London: Polity.
- Bauman, Zygmunt. 2011. *Culture in a Liquid, Modern World*. London: Polity.
- Beder, Sharon. 2009. Neoliberalism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ocial Alternatives* 8(1):17—21.
- Benjamin, Walter. 1940/1999.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London: Pimlico.

- Billi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2005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Bourdieu, Pierre. 1996. *On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Brown, Wendy. 2006. Neoliberalism, Neo-Conservatism and De-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Theory* 34(6): 690—714.
- Couldry, Nick. 2009. My Media Studie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10(1): 40—42.
- Couldry, Nick. 2010. *Why Voice Matt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Neoliberalism*. London: Sage.
- Curran, James, Natalie Fenton and Des Freedman. 2012. *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 Dean, Jodi. 2010. Is Democracy Possible? Sure,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jdeanicite.typepad.com/i\\_cite/2010/12/is-democracy-possible-sure-this-is-what-democracy-looks-like.html](http://jdeanicite.typepad.com/i_cite/2010/12/is-democracy-possible-sure-this-is-what-democracy-looks-like.html)
- Deuze, Mark. 2007. *Media Work*. London: Polity.
- Du Gay, Paul. 1996.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at Work*. London: Sage.
- Duménil, Gérard and Dominique Lévy. 2011.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s, David, and David Cromwell. 2005. *Guardians of Power: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Media*. London: Pluto Press.
- Engels, Friedrich. 1947/1878. *Anti-Dühring.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Fenton, Natalie. 2009. My Media Studies: Getting Political in a Global, Digital Age.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10(1): 55—57.
- Fenton, Natalie. 2011. Murdochgate and the News: We Need to Refram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Our Kingdom. <http://www.opendemocracy.net/ourkingdom/natalie-fenton/murdochgate-and-news-we-need-to-reframe-media-and-public-interest>
- Fisher, Mark. 2009. *Capitalist Re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 Foucault, Michel. 1988. Politics and Reason. In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84*, edited by Lawrence D. Kritzman, 57—85. New York: Routledge.
- Freedman, Des. 2011. The BBC is Not Part of the Problem Raised at Hackgate.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www.opendemocracy.net/ourkingdom/des-freedman/bbc-is-not-part-of-problem-raised-by-hackgate>
- Fuchs, Christian. 2011.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Abingdon: Routledge.

Garland, Christian. 2011. *Simulating Events as They Happen: Media Spectacle, Ideology, and Readymade Boogymen*. [http://fu-ber-lin.academia.edu/ChristianGarland/Papers/1143145/Simulating\\_events\\_as\\_they\\_happen\\_media\\_spectacle\\_ideology\\_and\\_readymade\\_boogymen](http://fu-ber-lin.academia.edu/ChristianGarland/Papers/1143145/Simulating_events_as_they_happen_media_spectacle_ideology_and_readymade_boogymen)

Glyn, Andrew. 2007. *Capitalism Unleashed: Finance, Globalization and Welf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wan, Peter. 2009. Crisis in the Heartland. *New Left Review* 55.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www.newleftreview.org/A2759>

Grazian, David. 2010.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alities of Reality Television. *Contexts* 9 (2): 68—71.

Gurevitch, Michael, Tony Bennett, James Curran, Janet Woollacott, eds. 1982.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Hall, Stuart.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edited by Michael Gurevitch et al., 56—90. London: Methuen.

Hallin, Daniel C.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in, Daniel C. and Paolo Mancini.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lin, Daniel C. 2008. Neoliberalism, Social Movements and Change in Media System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David Hesmondhalgh and Jason Toynbee, 43—58. Abingdon: Routledge.

Hands, Joss. 2010. *@ Is For Activism*. London: Pluto.

Harper, Stephen. 2012. *Beyond the Left: The Communist Critique of the Media*. Winchester: Zero Books.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rtz, Noreena. 2002. *The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 London: Arrow.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Current. 2011. <http://world.internationalism.org/>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Jenks, John. 2006. *British Propaganda and the News Media in the Cold Wa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Klein, Naomi 1999. *No Logo*. Toronto: Knopf Canada.

Kotz, David M. 2008. Neoliberalism and Financialization. [http://people.umass.edu/dmkotz/Neolib\\_and\\_Fin\\_08\\_03.pdf](http://people.umass.edu/dmkotz/Neolib_and_Fin_08_03.pdf)

Kliman, Andrew. 2010a. Master of Words: A Reply to Michel Husson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Latest Economic Crisis. *Marxism* 21, 7(2): 239—281.

Kliman, Andrew. 2010b. A Crisis of Capitalism (Not Neoliberalism, 'Financialised Capitalism' or Low Wages).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www.marxisthumanist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2010/10/a-crisis-of-capitalism-rvsvd-1027101.pdf>

Kliman, Andrew. 2012. *The Fail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London: Pluto.

Kautsky, Karl. 1892/1971.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W. W. Norton.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6.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Lewis, Justin. 2004. Televisio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in Iraq: The Case of Brit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6(3): 295—310.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rquand, David. 2010. Green, Socialist, Republican: The New Politics Needs a Realignment of Mind: Tattered-up Neoliberalism Won't Cut It. The Great Question of Our Time Isn't the Deficit, but Halting the Capitalist Merry-Go-Round. *The Guardian*. May 26, 27.

Marx, Karl. 1967/1894. *Capital: Volume III*.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0/1845. *The German Ideology*. Ed. C J. Arthu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70/1875.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ttick, Paul. 2011. *Business as Usual: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Failure of Capitalism*. London: Reaktion.

McChesney, Robert. 2001. Global Media, Neoliberalism and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52(10): 1—19.

McGreal, Chris. 2010. "Capitalism is Evil-You Have to Eliminate it": After Guns and the Iraq War, Michael Moore is Now Taking on an Enti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in his Latest Documentary. So What Message Does the Man Who Once Planned to Become a Priest Have?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32.

McLennan, Gregor. 1989. *Marxism, Pluralism and Beyond: Classic Debates and New*

Departures. London: Polity.

McMurria, John. 2008. Desperate Citizens and Good Samaritans: Neoliberalism and Makeover Reality TV.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9(4):305—332.

McKnight, David. 2003. “A World Hungry for a New Philosophy”: Rupert Murdoch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4(3):347—358.

Monbiot, George. 2001. *Captive State: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 London: Pan Books.

Morozov, Evgeny. 2011. *The Net Delusion: How Not To Liberate the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Mudge, Stephanie L. 2008. What is Neo-Liber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6(4):703—731.

Ortner, Sherry. 2011. On Neoliberalism. *Anthropology of This Century* 1.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aotcpres.com/articles/neoliberalism/>

Peck, Janice. 2008. *The Age of Oprah: Cultural Icon for the Neoliberal Era*.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Peck, Jamie, Nik Theodore, and Neil Brenner. 2010. Postneoliberalism and its Malcontents. *Antipode* 41:94—116.

Pilger, John. 2011. Amid the Murdoch Scandal, There's An Acrid Smell of Business As Usual. *New Statesman*, July 25, 21.

Sassen, Saskia. 2006.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vigny, Heather. 2011. Media, Murdoch, Morals and Markets: Time for A New Kind of Politics?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dmt.uea.ac.uk/media/2011/07/13/media-murdoch-morals-and-markets-time-for-a-new-kind-of-politics/>

Stevenson, Nick. 2010. Education, Neoliberalism 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Living in ‘X Factor’ Britain.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3(3):341—358.

Toynbee, Polly. 2012. Miliband Has Been Proven Right: Fairness Does Matter; How You Share Resources in Hard Times Counts More Than How You Share A Growing Cake. Even Cameron Has To Agree. *The Guardian*, January 10, 27.

Tronti, Mario. 1965. The Strategy of Refusal.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s://webpace.utexas.edu/hcleaver/www/TrontiRefusal.html>

Van Dijk, Teun A. 2006.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1(2):115—140.

Wainwright, Hilary. 2003. *Reclaim the State: Experiments in Popular Democracy*. London: Verso.

Wolff, Richard D. 2007.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is Not the Problem. *Monthly Review*. Accessed 14 March 2012. <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2007/wolff041207.html>

Wood, Ellen Meiksins. 2005.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07. With Defenders Like These, Who Needs Enemies? In *The Truth of Žižek*, edited by Paul Bowman and Richard Stamp, 197—255. London: Continuum.



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sup>①</sup>

## 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sup>②</sup>

王慧(译),金苗、张志华(校)

[导读]本文探讨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传播研究领域中国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和解问题。文章追溯了这两种传统是如何相分离的,一方面是单向度的、消费主义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一方面则是更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受到指责,认为其所持的意识形态概念过于简单并且有误。本文认为意识形态是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驱使的扭曲的传播,并勾勒一种文化分析的多维模式,该模式能用以说明在传播与文化的流通过程中的生产、消费与文本意义诸环节。

依据该分析框架,此论文旨在解释新自由资本主义在近代是如何已经构筑可恢复的合乎大众的合法性,这种合理性超出管理意识形态、宣传本质和日常生活的常识,尽管严重的经济危机周而复始,生态环境日趋严峻,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文中主关键词——“酷”不仅仅是关于美国黑人文化,如今它更得到全球化的体现,而“酷资本主义”理论的关键是“酷”的理念要贯穿政治疆域,将表示不满态度的符号融入资本主义本身,文中更是以多用途移动通讯设备为研究对象,以酷资本主义理论通过以苹果这一“酷”公司来概述与阐明。

---

<sup>①</sup> 英国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社会科学系文化分析教授。他最近出版的专著有《酷资本主义》(Cool Capitalism, Pluto, 2009)和《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 Sage, 2010)。其专著中译本有《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电子信箱:j. t. mcguigan@lboro. ac. uk

<sup>②</sup> 感谢艾尔德—瓦思(Dave Elder-Vass)向我推荐《史蒂夫·乔布斯社会学》(a sociology of Steve Jobs)一文。

[关键词]多用途移动通讯设备,资本主义,酷,文化分析,扭曲的传播(distorted communication),意识形态,多维分析,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

### 不只是廉价劳动力

苹果手机在中国由富士康组装,后者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装配厂家。美国的执行官说,如果没有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它们恐怕很难运转起来。这家台湾公司雇有上百万的工人,他们有很多愿意住公司宿舍、上夜班、每周工作六六每天12小时。中国的工人比其美国同行要廉价很多,同等重要的是,中国的工人更温顺并且数量巨大,一夜间就能雇到成千上万。(Charles Duhigg and Keith Bradshaw 2012,4)

## 一、序 言

在文化与传播研究领域,有各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它们可能无法相互比较,或者,它们也可能共享一个得以进行综合的基础。在就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意义的决定作用进行理论化和分析时,达成共识尤其难以实现。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来看,这已成了争论的焦点并导致思想发展上的分流。而在那些竭力避免经济化约论——曾一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的研究者看来,在传播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过于强调文化自主权与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之趋势。

本文认为,在批判传播研究中最适合的文化分析模式是多维分析。确切地说,除了其他方面,该分析模式重视文化—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很大程度上,批判多维分析并未呈现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式经济化约论的今日替代,相反,我们得用它来挑战技术决定论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考量在当今的文化与社会中,“新媒体”的作用与个人化移动传播的意义时最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

## 二、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

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圈中,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两种传播研究传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分歧。事实上,分歧的一方是文化分析,另一方是政治经济学。此前文化分析已经有很多先行者,而我们在此处探讨的文化分析

的特定传统,在当时与霍尔(Stuart Hall)领导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研究开始紧密相连。而我们所探讨的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在北美与席勒(Herbert Schiller)及其志同道合者的研究的关系最为紧密;在英国,则与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戈尔丁(Peter Golding)、默多克(Graham Murdock)的研究的关联最大;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的关联倒没这么紧密(参见 Murdock & Golding, 1973)。在此没有必要复述上述批判传播学家的研究主旨。不过,仍然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相当简要,为何文化研究的传统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骤然分道扬镳。

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是后来我们熟知的“英国文化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创始人。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就有了这种分离的迹象(Turner 2003)。在对 20 世纪 30 年代在英国某种程度上兴盛一时的有关文化的那类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评论时,20 年后威廉姆斯有些他激愤地说道,“简单地将过去 300 年英国的生活、思想与想象力描述为是‘资产阶级的’,将现在的英国文化描述为是‘濒临灭亡的’(dying)[考德韦尔(Christopher Caudwell)在 20 世纪 30 年代确实这么描述过],就是让现实听任公式的摆布”(Williams 1963 [1958], 272—273)。威廉姆斯自己也觉察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那种过于简化和空洞的辞藻感到不满。但是,即便当时威廉姆斯了解能对文化和社会进行解释的更为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他依然对该领域的真相困惑不解:

或者认为艺术被动地取决于社会现实,我认为这个命题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或是对马克思的一种庸俗化误读;或者认为艺术作为意识的创造者决定了社会现实,这是浪漫派诗人不时提出的观点;最后,或者还认为,艺术同其他事物一起归根到底取决于现实的经济结构,它部分地反映了这个结构及随之而来的现实,部分地则通过影响对现实的态度,有助于或有碍于持续改变这个现实。我发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片混乱,因为依我所见,上述命题在不同场合被不同作者各取所需地使用。(Williams 1963 [1958], 266—267)<sup>①</sup>

---

<sup>①</sup> 中文参见《文化与社会(1780—1950)》,吴松江、张文定译,北大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9 页。译文稍有改动。——译者注

以上不满与其说是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实上,威廉姆斯曾在1958年以赞许的态度引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如说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然,这并不出乎意料。然而,这种不满确实使威廉姆斯在当时觉得他需要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发展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最后,威廉姆斯最终以“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来命名他与众不同的理论见解(Williams 1981),不过,他确实还是将其视为宽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Williams 1977)。然而,到那时——20世纪80年代——威廉姆斯已不再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了。霍尔成了这个当时刚开始热门的研究领域的首席发言人。霍尔(Hall 1986 [1980])在其《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声称,在该领域“游戏的名字”就是“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他甚至不大理会:

……回归更加经典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措词的努力。他们认为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关注已经极其过度。这一努力将会复原“基础/上层建筑”这样的旧时术语,这些术语可在文化—意识形态最终由经济决定这一论断中觅得,而在这个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中,这两个替代性思路[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似乎都不存在。他们坚持认为文化生产的经济过程和结构要比其文化—意识形态层面更具重要性,他们还坚持认为将这些网罗至诸如利润、剥削、剩余价值以及分析文化商品这类更加经典的术语体系中,是完全适得其所的。他们将意识形态概念作为“虚假意识”予以保留。(Hall 1986 [1980],46—47)

霍尔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determinacy)受低估而叫屈,这很可能是正确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是意义的问题,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它极易被视为“虚假意识”。然而,极其不幸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文化分析业已将诸如“利润”、“剥削”与“剩余价值”这样的术语流放在外。不认可这些术语,文化分析将很难称其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而很可能是其他东西。然而,如果霍尔真有此意,他当时可能并不打算将马克思主义完全地束之高阁。不过,也许是不经意间,他确实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其他代表人物事实上这么做铺平了道路。

在霍尔看来,意识形态问题对传播研究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定义它就很重要。他的界定集中在意指的层面:“意识形态权力:以特定方式对事件进行意指的权力”(Hall 1982,69)。在这一方面,霍尔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及

其如何说明意指的“现实效果”(the reality effect)之影响。他也借鉴了早期苏联语言学家沃洛希诺夫(Volosinov)的“语言中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和符号的多重音性,后者与艾柯(Umberto Eco)强调的一词多义类似。霍尔自己有关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模式已经着重强调了对意义的不同阐释(Hall 1997 [1974])。编码/解码模式与传播研究的“使用与满足”流派有相似之处,后者也假定受众在消费时会为了其自身目的而主动地挪用并弄懂媒体讯息。这一思路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有关受众到底有多主动的问题。对霍尔及其最紧密追随者而言,受众的主动性受阶级、性别与种族这些社会性因素所驱动。对其他人而言,不论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亚文化研究领域,则更进一步地突出能动性。例如,费斯克(John Fiske)在当时正变得缺乏批判性的一股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潮流中,将主动的受众/消费者这一概念推演至一个极端荒谬的境地(Fiske 1989, 37),甚至一度将年轻人在购物中心偷窃衣服的行为与越共的战术行动相比。到了如此荒谬的极端境地,购物则俨然成了一种革命行动。这种谬论被有经济头脑的传播和文化评论家幸灾乐祸地嘲讽(见 McGuigan 1992)。

霍尔自己从未走到如此极端境地,但是很明显,他的很多研究是以防止经济化约论为前提的,因此,出现了忽略经济因素而夸大意识形态作用的倾向<sup>①</sup>。在这一方面,他被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有关意识形态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有关霸权的著述所吸引。由于深受阿都塞主义(Althusserianism)的启发,他对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这一讽刺性概念不予理睬,这回避了很多问题。正如霍尔、阿尔都塞和葛兰西以不同方式都论证过的,认为意识形态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观念中,而且还镌刻在人们熟视无睹

<sup>①</sup> 霍尔自己在他有关法律与秩序(Hall et al, 1978)以及有关威权民粹主义/撒切尔主义(Hall and Jacques 1983; Hall 1988)的开创性著述中实际上从未否认过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尽管上述研究中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往往被强调得更多。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登场并鉴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挫折,后来的“新时代”论文(Hall and Jacques 1989)则不得不考虑政治经济领域的划时代变革。并且,在与泰勒(Laurie Taylor)的访谈中,虽然霍尔承认对当代政治有一定的幻灭与困惑,但仍坚持道,“根据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我依旧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资本仍然是一种惊人的革命性力量。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正在看到又一次全球化,为资本创造一个全球性市场的全球化。这大约是第七次攻势。我们已经有过各种形式的全球化:帝国主义、殖民地开拓、冷战、美国霸权(原文注释中为“imperial colonisation, Cold War American hegemony”,经核对二人访谈,应为“imperialism, colonisation, Cold War, American hegemony”之误。——译者注)。现在布莱尔(访谈时仍为英国首相)力求让资本家为我的孙辈提供医疗卫生,让巴克莱银行(Barclays)或乐购超市(Tesco)经营我的学校。这种抱负令人惊讶。只有当资本变成如此巨大的全球性力量时,才会有这样的政治抱负”(Hall & Taylor, 2006: 16—17)。

的实践和日常习惯中的这一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也相当有合理性,即意识形态假定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它们至少包含有真理或真实性的成分,否则,它们的吸引力将大为减弱。但是,也全然没有必要将被扭曲的传播(distorted communications)这一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力量束之高阁,这一概念比“虚假意识”更加复杂。虽然霍尔——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在他有关意识形态的著述中——保留了这样一层含义,即意识形态为现实设定框架,以符合权势者的利益(从而与主导意识形态理论保持一致),但是,当他真的在批判权势者主张的时候,却往往避开对扭曲过程的恰当分析。而马克思则确实强调了这种扭曲,不仅在他谴责主导意识形态的时候,而且还在他描述商品拜物教过程的时候,我把这种扭曲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效果: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Marx 1976 [1867],163—164)<sup>①</sup>

马克思的这一著名段落对今天的文化研究者来说尤其切题,因为当下人们对通讯小装置的深度迷恋——尽管它们是有用的——已经弥散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这些小装置不仅是意义流通的中心枢纽,还是现今资本积累的中心地带,因而它们构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关键联结。

今日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热衷于避免与经济化约论沾亲带故,还甘愿冒着陷入相对主义泥淖之风险而采纳保守主义的认识论立场,而

<sup>①</sup> 中文摘自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88页。

不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现实主义式的质询,后者就要求他们辨别真理与谬误。汤普森(J. B. Thompson)就是其中一例,然而他对意识形态表征的不同方式作出非常有用的试探性分类(合法化、虚饰化、一致化、碎片化与物化),每一类别都与各自的符号建构策略相关联(比如与虚饰化相关联的替代手法和委婉语的使用)(Thompson 1990),这些被我借鉴并应用于我自己对有关“千年穹顶”惨败的研究中(McGuigan 2003)。

### 三、多维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沿着几条不同的路径发展,其程度到了不再有一个基于明显的共识而可分离出的主流立场,唯一可指出的是有可能在任何可识别的意义上它都不再特别地是马克思主义的了(McGuigan, 2006; McGuigan, 2010a)。它也不再是“英国的文化研究”了。随着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当选,正如事情进展所表明的,在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即威廉姆斯所指的“漫长的革命”[Williams 2011/1961])的早期阶段,一批英国的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去了澳大利亚,其中包括菲斯克和班内特(Tony Bennett)。之后,班内特开始打造融合了福柯与管理主义学派(managerialist school)的“文化政策研究”(Bennett 1998)。最后,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期刊的编辑控制权转移到美国由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收至麾下为信号,北美最终接管了该学派。同样,菲斯克也到了美国。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出版一本意图超越美国的管控、代表其彻底“国际化”的文化研究选集也成为了可能(Abbas and Erni 2005)。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霍尔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遗产之间的争论还在继续,尤其是随着一些学者采用多维分析这一可替代的框架的出现。<sup>①</sup> 足以令人称奇的是,这个框架与霍尔和约翰逊(Johnson 1979)自己早期有关该领域未来发展的思考并非有很大出入。

在文化研究中,我提出了对“文化民粹主义”的批评(McGuigan 1992, 1997, 2006, 2011),主要论点集中在以下两个疑难问题上:首先,其单向度本

---

<sup>①</sup> 成熟的传播与文化多维分析的好例子是托比·米勒(Toby Miller 2001, 2005)及其合著者的“全球好莱坞”研究,该研究是出于对大量的电影/屏幕研究及其完全的文本分析取向之不满而产生的。该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新的国际文化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ur*, NICL)。

体论研究方法之不足；其次，它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联合。文化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学派并受其启发，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它几乎仅仅集中关注于消费，并为教育和研究留下一笔极度暧昧的遗产，以致在此后数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是用于追溯并欢庆大众消费的愉悦。而在生产领域则几乎没有分析性的研究，无论是有关文化产品生产过程的劳动过程，还是对媒体和文化产业——即资本主义的媒体和文化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此外，文本分析过度囿于读者反应理论的各种变体，而“民族志”受众研究则常常轻描淡写、驻足表层。面对随心所欲的民粹式阐释(popular interpretation)以及对主动的受众和消费者文化产品的创造性使用，霍尔提出的意识形态被编码进入媒介文本的“优势解读”(preferred reading, 同向解读)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这种方法论可能无以解释文化在流通过程中的本体论复杂性，也无法解释我们如何以及为何获得我们现在拥有的传播和文化产品。只有考虑到从生产到消费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因素的多维分析，才可以做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参见 Kellner 1997)。

消费主义的文化研究过去对能动性的过度估量归因于消费主体，而现在，随着交互式社交网络媒体的出现，则归因于生产者式的消费者(producerly consumer)，这令人想起巴特(Roland Barthes 1977 [1968])的“读者的诞生”，这一形象在主动型受众那里就已存在。这些极度活跃的消费者、血拼者、读者、听众、电视观众、旁观者、网民，以及近来出现的公民记者、博客作者等等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权消费者极为相似，后者是“自由市场”的新自由资本主义之意识形态假定的核心。消费者乃国王或皇后是新自由主义鼓吹不尽的颂歌，仿佛巨型企业真的感激普通人的一时冲动和愿望而非宇宙之主。为了能够对供给发号施令，以下这点应该受到重视，即主权消费者必须已经充分意识到他或她之所欲，同时还能想象能够提供给他们的究竟是什么。说得委婉些，普通人很少——如果有的话——能获悉这类知识；没人能做得到。提供这些物品并培育消费者品味和习惯的，是生产者。然而，新自由主义在掏空我们口袋的时候坚持不懈地取悦我们的虚荣心。即使主权消费者如自由市场“理论”假定的那样全知全能，但也只有极少数知识渊博之士真的拥有足够的财富可在任何情况下购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过去一些左翼批评家可能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普通人是难以招架消费主义之诱惑与媒体之曲解的被动呆子，反对这种观点是完全合理的。同样



合理的是,对文化价值的精英主义假定抱持质疑并对大众流行文化持有更加微妙的、有所区别的评价。这些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据称过于简化的信条很容易因为无关痛痒而遭致摒弃。然而,消费主义的文化研究和我所说的“文化民粹主义”只不过倒转了这些假定,几乎只是无条件地坚持完全相反的主张,因此忽视了资本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的绝对权力。

#### 四、酷的资本主义

在过去几年看似不间断并在 2007 至 2008 年间爆发的危机过后,已经有了一些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质疑以及对替代资本主义的其他体系之探讨(比如 Harvey 2010; McChesney and Foster 2010; Wright 2010)。然而仍有许多严肃的资本主义批评家认为其持久性乃无法超越之假定(比如 Gamble 2009)。在“现实主义者”——其传统观念遍及政治光谱的右翼和左翼——看来,甚至当其生产方式面临系统性的坍塌之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其合法性依旧坚挺。无疑,这至少要部分地归结于国际左翼相对危险的情势,其自信甚至其生存在过去 30 年里遭受重创,几乎被毁灭。尽管如此,在社会基层(in the rhizome)还是存在着充满希望的复兴迹象,复兴不仅具有批判性还具有实践性,它由以下现象所奠定:自世纪交替以来的全球正义运动、21 世纪以来社会民主在南美洲的推进、近期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的示威游行以及全球各地不断壮大的劳工抗争。

没多久之前,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持续受到怀疑:其辩解(justification)不断遭到质疑。批评家们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说服力的缺失、意识形态再生产机器出现故障、在文化上挑战对“现实”的霸权式塑造、阶级斗争的爆发与数不胜数的政治论争场所,后者包括女性主义、同性恋和反种族主义运动。而现在,激进的政治文化安静了许多,如果不是完全沉默的话,而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质疑也许只能调侃似的低声嘟囔了。为什么这样的质疑在当代话语体系中就好像是不可言说的,如果真的在公共领域中听到了,为什么听上去很怀旧而且很明显地过时了?难道认可另一种可替代的方案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能力?是什么样的想象阻止了它?

然而,我们要担忧的首要问题既不是为何批评和反对声减弱了,也不是更大的层面——资本主义如何持续下去。如果我们不那么雄心勃勃,毋宁

说首要问题是资本主义如何证明其合理性。应当承认,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仅仅是由其意识形态的合法化造成的,这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在物质和体制层面的存在都过于根深蒂固——更确切地说,是系统性地存在——并非仅仅由理念来支撑。但是,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1999])认为资本主义在其不同阶段都得证明其合理性,这一点又是对的。必须得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辩护理由,甚至得有正义感与它紧密相连。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还是有所洞察的,他们指出,对一套社会安排(societal arrangements)所做的最有效辩护——有助其更新和维系——看似矛盾地得益于对批评的挪用。这一洞见可能违背我们的直觉,但是指出同一类历史实例并不难,譬如,窃取对手出自19世纪迪斯雷利(Disraeli)之手的衣服。<sup>①</sup>只需想想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中期对于资本主义的重建和恢复所起的作用。

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区分了对资本主义的艺术批判与社会批判。这两种批判形式借鉴了完全不同的愤怒(*indignation*)的来源。社会批判对与资本主义关联的贫穷与不平等抱不平,也向资本主义所助长的机会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价值观挑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上述批评就少有耳闻了。在另一方面,艺术批判因资本主义不再令人着迷和不真实的特征并连同普遍的压抑感而愤愤不平,这在同一时期却带来了更大的反响。要求自主性、解放、真实性与独特性(*singularity*)——这些价值诉求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May '68)之类的运动相关联——的呼声的确已经发出,而且它们显然已经被纳入到体系之中了。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被认为是理性又强健的资本主义的原初价值体系,而“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大相径庭。此新精神的特点是以证券投资工作者(*portfolio workers*)的项目为主导,这是管理主义和网络化(*networking*)思维的一个关键特点,这种思维由商学院产出的大量文献所鼓吹。

正如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所说,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荒谬的制度,它建立在粗暴的剥削基础之上,不仅有创造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破坏性,但是很少人质疑其正当性(*validity*),不论其社会的和个人的代价是什么。那么,

---

<sup>①</sup>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大英帝国时期的保守党领袖,曾任两届首相。此处“盗取衣服”指英国工党领袖米利班德(E. S. Miliband)在2012年工党大会上反复使用“一个国家”(one-nation)这一措辞,而该措辞通常为保守党人所用,并最早由19世纪的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在其政治小说《西比尔》(*Sybil*)中首次提及。——译者注

如何如此有效地证明它是合理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实现不仅要在哲学层面（姑且假定商学院、公司专业知识与主流新闻媒体所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应该归为此类），而且，还需培育出大众的同意（popular consent）。最值得注意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拥护不是来自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假定之真相的理性赞同以及对社会主义指令性管理的计划经济之不足的承认，更重要的是，与此不同，拥护反倒是来自在世俗层面的误识和富有想像力的建构，它们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中无聊与浮华兼具的日常惯例相辅相成。

因此，“酷资本主义”这一论题旨在至少部分地说明当代的——确切地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建构出这种适应力强劲的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的，这种合法性越出意识形态和宣传管理范畴，进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和常识，尽管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反复发作，甚至当今世界的生态环境正日益恶化——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酷资本主义的基本定义是将愤怒收编入资本主义本身。在戈夫曼（Goffman 1971 [1959]）看来，是“台前区域”（front region）以其具诱惑力的高品位吸引着广大民众，无论是相对富裕的群体，甚或有抱负的穷人。可是，同样存在着一个“台后区域”（back region），它更像一个卫生和安全无法达标的有着肮脏秘密的工业化厨房。这个台后区域偶尔被瞥见，并引发质疑食物供应的担忧性言论。如同在任何一家好饭馆，餐厅总管必定会想法子安抚顾客，要不然他们可能会光顾其他地方。也许有个脏厨房很“酷”，反正要煎个蛋饼就得打碎鸡蛋，而有时，鸡蛋就掉到老鼠晃荡的地板上。

没有必要指出“酷”这个词在世界各地被多么普遍地使用，也没有必要指出无论是否真的用到了这个词，与这个词相连的情感被多么广泛地嵌入到了社会之中，后者也同样重要。酷举目皆是。它不是边缘的或另类的潮流。至少就我们可谈论的这一现象而言，它位居文化主流的中心。

拙著《酷资本主义》列了数个今日之“酷”的例子，特别是在商业领域。该书也追溯了这个词的谱系以及它所经历的话语变迁（McGuigan 2009）。“酷”（cool）这个词源于非洲西部的词语“*itutu*”，它的核心意思是指在交战最激烈阶段时的冷静沉着。虽然这个词最初与“男子气概”密切相关，但这可能并非它唯一的意思，在今天也不是。美国文化历史学者汤普森（Thompson 1974, 1976 [1971]）记录了在非洲西部和南部有关“*itutu*”的审美观、这个词经由奴隶贸易到达美洲的历程，以及愤怒的酷文化在美国社会边缘地带的形成。总的来说，“酷”已成为一种个人姿态，一种行为模式和暗语，并与压制

环境下面对压力时的尊严相联系。它是“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文化的鲜明特征(Gilroy 1993),它也变得异常引人注目,吸引了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人,尤其是在经过了20世纪中期的爵士文化之后。

虽然“酷”难以清晰界定——而且它有意如此,但是,庞登(Pountain)和罗宾斯(Robins)还是力图辨识出“酷人物”必备的三个特征:自我陶醉、嘲讽式的事不关己、崇尚享乐(Pountain and Robins 2000)。这些年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大量亚文化的例子,不论是直接或间接与黑人文化相关联,比如从巴黎的存在主义到现今的嘻哈文化。刚刚最近,一本不常在大众市场出售的哲学杂志中就有一篇文章赞美“酷”是“屈服和颠覆之融合”。从这一观点来看,酷人物即使总是处于疏离状态,但发挥了创造性的平衡作用。很显然,此处所说的这位准哲学家认为,“酷劲儿”(coolness)仍然是非常之酷的。而美国的一些黑人评论家却不这么认为。

几年前,社会心理学家梅杰斯(Richard Majors)和比尔森(Janet Mancini Billson)在他们关于都市区域黑人男性气概的实证研究中作出如下评述,“酷劲儿也许是一种生存策略,一种已经让黑人男性——和社会——付出巨大代价的生存策略”(Majors and Billson 1993 [1992], xi)。在它表征黑人在贫民区中的身份和骄傲的同时,这种“强迫性的男性气概”(compulsive masculinity)在此语境下不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有着严重的破坏性,更别说瘾君子式的生活方式、失序的社会性与暴力犯罪活动——这绝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的工人阶级黑人男性。

今天,“酷”不只关乎美国黑人文化,它是全球性的,并无关肤色。这个符号自由漂移。而且,“酷资本主义”论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大体上,“酷”已经从左翼到右翼横贯了政治版图。现在,“酷”更多的是一种顺从的符号,而非抵抗。

这一观点由弗兰克(Frank 1997)有关“把酷征服”的研究所证实。他在研究中指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无因的反叛之兴起,后者拒绝由“二战”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助长的中产阶级生活和经济领域中呆板的循规蹈矩,“酷”的意识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就流行开来了。今天,你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位管理顾问肯定都会弹奏蓝调吉他。依弗兰克所说,反文化以很快的速度在美国企业界盛行。酷的姿态与“创意”这一流行词汇现在是管理意识形态中的时尚必须品(*de rigeur*)。而且,正如两位瑞典管理理论家所指出的,当今的生意就是“时髦”(Ridderstrale and Nordstrom 2002 [2000])。

有意思的是,弗兰克把对“酷”企业和管理话语的研究局限于美国,而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则将研究局限于法国。然而,甚至法国的管理文本受“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影响,甚至,法国官员读的是美国的管理书籍。尽管有其美国根源,现在的酷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现象,决不局限于美国。毋庸置疑,这是“美国化”的一个特征,但是,不得不说的是,美国化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且是理解酷资本主义在世界之存在的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

通过他们不同的方式,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与弗兰克的“把酷征服”都在强调,在由文化与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引发的组织与文化变迁中,管理意识形态的作用。而“酷资本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最显而易见的所在,是消费文化和“酷”商品的呈现。这一点在针对年轻人的服装业中特别明显,像盖璞(Gap)和耐克这样的企业就以其“反叛”的服饰吸纳了反文化的主题和象征符号。然而,今天所有的商品中最酷的要数多用途移动通讯设备,即,能上网的手机和平板电脑,这是本文下一节的主题。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对流通过程中的文化进行多维度分析涉及文本分析(参见 McGuigan 2008 and 2010a)、对生产中的劳动过程的研究(参见 McGuigan 2010b and 2012 待出),以及“酷”企业的政治经济分析与意识形态研究。

## 五、多用途移动通讯设备

多用途移动通讯设备是现今批判传播研究的理想研究对象,也可被视为在宽泛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进行多维度分析的一个完美的测试案例(test case),也许对“酷资本主义”论题而言也是如此。相关的关键问题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广。

为了弄清多用途移动通讯设备在当代文化和社会中的重要性,首先,我们有必要直面老生常谈的技术决定论。在传播研究领域,威廉姆斯(Williams 1974)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技术决定论做出过经典批评,而温斯顿(Winston 1995 [1990], 1996)在20世纪90年代做出了进一步的批评。在此没有必要复述这些批评(McGuigan 2007),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威廉姆斯强调科技创新中意图(intention)的重要性,即在产品开发中总是存在着促使投资、研究与应用的某种社会动机。威廉姆斯最初的测试案例是电视,在

研究中他还将技术开发与历史上伴随着大规模迁移和城市工业化出现的移动的私人化(mobile privatisation)这一现象联系起来。而适用于晚期现代性条件下移动性更强、私人化程度更高的生活方式的,正是能上网的手机、笔记本电脑与平板电脑这类技术小装备。它们经久不衰地在广告中得到如此吹捧,更一般地来说,在技术决定论者的宣传中,这一点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尽管如此,有关政治的技术决定论解释甚至对现今最尖锐的评论家也是种诱惑。例如,英国记者梅森(Mason 2012)在《为何抗争四起:新的全球革命》中对2011年全球各地爆发的民主抗议的阐述。在追溯与激进学生在伦敦的一次辩论时,梅森评述道,“到底是科技、经济、大众心理,或者只是时代精神引发了反抗的全球性爆发?我倾向于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对于经由Facebook和Twitter的社交网络对动员突尼斯和埃及抗议者所起的作用,他兴致勃勃。“是网络”,梅森脱口而出。因此,这也呼应了卡斯特(Castells 2012,3)大约20年前对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的社会影响所具有的看法:大体上是技术决定论式的看法——“网络范式”的出现。然而一页之后,梅森与他自诩的技术决定论又有些自相矛盾:

我们正处于一场变革之中。这场变革由几近崩溃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引发,混杂着技术创新的上升势头、对个人自由之渴望的激增以及有关自由意味着什么的人类意识的改变。经济危机正在使强权显得无能为力,而无权者则被迫采取曾经是小众抗议团体专属的战术。(Mason 2012,3)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段落认为2011年民主抗议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危机以及——与前者不无关联的——失败的补救政策措施,包括对普通人涉及金融资本的轻罪惩治。梅森提到的其他因素包括“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和人类意识的改变”(实际上,这本身是有关文化现象的观点,而不是技术现象)。毫无疑问,数字移动通讯技术和年轻人之间社会嵌入式的使用模式促进了对身体的动员,并促使信息由这些交际网络流经国际公共领域的闸口,从而以放大的形式出现在诸如电视这样的“旧媒体”舆论竞技场上。就像更旧的媒体——如印刷媒体或者更早的口口相传——在过去的民众抗议甚至革命浪潮高涨的历史中发挥作用一样,“新媒体”也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因此,没

有必要把“新媒体”神化(fetishise)为导致近期事件发生的唯一原因,因为它们确实不是。戈尔丁对“技术一”和“技术二”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看清分析时存在的困境:

可以将技术理解为一种机制,通过它,人类操控物质世界。我们可以设想存在两种技术创新的形式。技术一允许现有的社会行为和过程发生更迅速,更有效,或更方便(尽管同样可能带来负面后果,如污染或者风险)。技术二使得之前行不通的或不可想象的活动有可能成为全新形式的活动。本质上,信息通讯技术更明显是技术一而非技术二。(Golding 2000,171)

这一更慎重的区分,并未否定新媒体技术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对平时夸大的宣称——其“改变世界”的能力提出了深深的质疑。当然,数字通讯系统、它们多样的应用程序以及诱人小装备无休止的更替和更新产生了影响,但它们并不是光辉孤立的决定因素,并非与文化、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诸因素的各种结合无缘。这些小装备以及环绕着它们的神话故事是酷资本主义的突出特点。例如,苹果公司与已故的乔布斯。像 iPod、iPhone 与 iPad 这样的“酷”玩意儿,毫无疑问它们是有用的,然而,它们自身也体现了商品拜物教这一过程以及对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剥夺体系的掩盖这一现象。

创业英雄被名流化(celebrification)甚至神秘化在乔布斯这一人物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从批判传播研究的角度来看,他应该被视为可作为文本的一套符号,即一个媒体的建构,就像其他以媒体为中介臆造出的任何虚构名人一样(Rojek 2001)。比如,希利(Healy 2011)将韦伯的魅力型权威理论运用到了苹果首席执行官身上,由此概述了“乔布斯社会学”。此外,乔布斯作为引领企业取得成功的向导已经成为有着巨大管理魔力的人物(Gallo 2011),而且还是传记作家的关注对象(Moritz 2011 [2009]; Isaacson 2011),事实上,在他去世前,尤其是他去世那年,形成了一个迷你出版产业。他的酷哥们形象和他展示给公众的智能装备——尽管事实上并不由他自己设计——例证了对某种经过精心挑选塑造出的表面上的不服从感的收编,后者沿袭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文化潮流,同时也令苹果成为至 2011 年 10 月乔布斯去世时全球最盈利的公司。

在他的乔布斯社会学中,希利只是在乔布斯的“超凡魅力”(charisma)这

一主要观照点之后才提及苹果产品的制造。并且,关于制造问题,希利很快就指出苹果不是唯一一家依靠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显著的是在中国——运作不透明的外包和条件恶劣的劳动剥削制度的电子企业。这让人联想到克莱恩(Klein 2000)在千年之交的《不要标识》(*No Logo*)中关注的服装业的品牌活动问题,因为她单独挑出耐克予以特别关注,而它们都不是其行业中的唯一企业。尽管如此,耐克和苹果是当今跨国资本主义文化和政治经济体系极为相关的实例,因为两者都培养了反文化和反叛的意象,这种意象原本一度可能已经与反资本主义关联起来,但现在已不再如此,从而也就成为了酷资本主义的缩影。将大部分的产品生产外包给对劳动条件和权利的监管——如果真的存在——至少可以说是宽松的低工资经济体,美国的数码电子企业滞后于服装业,但是近年来已大幅赶上。

2006年,以荷兰为基地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OMO)报告了手机产业的结构,呈现了沿着供应链分布的公司网络,一直到那些地处像中国华南地区深圳的出口加工区或经济特区的工厂(Wilde and de Haan 2006)。其他研究型非政府组织,如以纽约为基地的“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和香港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tudents &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ur, SACOM)已经发布了有关中国工厂劳工待遇的民族志研究。阅读他们的报告让人联想到马克思将政府有关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蓝皮书”用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后半部分。

“中国劳工观察”组织于2010年下半年研究了广东省和江苏省的十家电子生产厂,采访了其中的四百多名工人(China Labor Watch 2011)。这些工厂为包括戴尔、赛尔康、<sup>①</sup>IBM、爱立信、飞利浦、微软、苹果、惠普和诺基亚在内的众多品牌提供产品。他们发现工人们被要求加班的时间过多,给付的最低工资(通常150—200美元/月)实际上不够支付生活成本,劳动率(work rates)高度密集,对妇女进行测试以将孕妇排除在雇佣行列之外,一般来说,正式的劳动合同要么不存在,要么实际上并不遵守劳动合同中的条款。

这类研究的目的虽然更多的是描述性,而非批判性,但是为了把握通讯技术在流通过程中的生产环节及由此而来的意义,深入了解该行业的深层

---

<sup>①</sup> 赛尔康公司是移动电话和其他个人手持终端产品的全球最大电源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芬兰,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地有制造基地。——译者注



次结构和过程是至关重要的。通常,全世界的普通大众只是听说一些最极端的虐待行为——尤其是关于童工——与一些个人悲剧的事例。在中国的台资工厂富士康发生的连续自杀事件是近年国际社会尤为关注的焦点,这促使“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 2011)对富士康在深圳、成都和重庆生产 iPod、iPhone 及 iPad 的工厂进行调研。苹果公司应该已经要求富士康对其行为进行整改,但依据这些香港研究者的研究,收效甚微或是徒劳。而来自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研究员的看法更乐观(China Labor Watch 2011:77),他们认为作为对批评的回应,在工资方面,“富士康已成为电子行业的表率”,因为它给新员工每月支付 184.80 美元的工资,入职半年后其月薪会升至 247.13 美元的“巨款”。

2011 年三月和四月,“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采访了在深圳、成都和重庆上班的 120 名工人,他们通常是介于 16 至 30 岁之间的年轻人。研究者在工厂大门外接触他们。调查发现,因为基本工资不够,工人们热衷于加班,但是,加班费能否实际获得却不能保证。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呈现出生产 iPad 的成都工厂工人典型的工作日时间安排:

- 06:45 醒来
- 07:15 排队等公交车
- 07:45 到达富士康(早餐和打卡)
- 08:10 工前集合(work assembly)
- 08:30 轮岗时段开始
- 11:20 午餐
- 12:20 轮岗时段继续
- 17:20 晚餐
- 18:20 加班时段开始
- 20:20 轮班结束
- 21:00 回到宿舍(SACOM 2011,12)

与富士康的其他工厂一样,成都工厂的卫生和安全生产条件很差。通过一些成都工人所说的话,可对他们的生存境况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虽然我们为苹果手机生产,但我从没机会用苹果手机。我相信它非常吸引人,有很多功能。不过,我觉得我没办法有一部我自己的苹果手机。”一位来自观澜镇(Guanlan)于2011年2月加入富士康的工人这样说道。

“我从没想过会买一部苹果平板电脑,那会花掉我两个月的工资。我买不起。我从农村来富士康务工,我只想让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变好一些。”一名24岁的工人说道。

“和iPad的售价相比,我们的工资太低了。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报酬,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为苹果公司创造财富。”一位成都生产一线的主管助理说道(SACOM 2011,19)。

上述经验数据证实了酷资本主义的肮脏小秘密,这个秘密隐瞒得并不是很好,但却容易被忽视。然而,《纽约时报》打破了沉默(Duhigg and Barboza 2012, a, b),他们对苹果在中国的运营发出质询。然而,在美国,此类新闻报道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却围绕着“中产阶级职位”在本土的“凋谢”打转。当然,“中产阶级”是美国用法,指的是工人阶级。有种想当然的假设认为,iPod、iPhone与iPad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制造,是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要低得多。这一点不假。但是,这种假设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事实却可能并不如此。依据《纽约时报》记者杜希格和巴波萨(Duhigg and Barboza 2012a, 6)的报道,由于劳动力价格只占iPhone生产成本很小的一部分,据经济学者计算,在美国生产iPhone只会使产品价格增加65美元。也有人说美国并没有在学士学位以下的适当层面培育出足够的熟练技术工人,这令问题看上去更加复杂。不过更有甚者,原因也许在于美国工人对苹果公司的快速资本积累战略还不够温顺。杜希格和巴波萨讲述了在2007年iPhone推出市场前夕,乔布斯是如何抱怨样机的塑料屏幕太容易被划出痕迹的。他要求在六个星期之内用玻璃屏替代塑料屏。当这些屏幕替代品最终在午夜时抵达位于中国的装配工厂时:

据执行官说,一位工头立即唤醒了公司宿舍里的8000名工人。每位雇工得到一份饼干和一杯茶,并被带入工作车间。半小时之内就开始了为时12个小时将玻璃屏安入弧形机壳中的轮班。不到96个小时,这家工厂就开始每天生产超过10000部iPhone了(Duhigg and Barboza

2012a,2)。

这些非同寻常的小装备及其更新版本强化了世界上相对富足群体的日常乐趣与便利,但却付出了代价,一个人类的代价,即剥削廉价劳动力并使那些愿意拼命劳动的人们悲惨过活,而其工作条件则是世界上的富足群体为了解决自身的相对贫困所没法容忍的。对资本主义酷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作为一种复杂社会现象——不只是作为小装备——的信息与传播技术,进行一套充分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它描绘当今通讯领域的经济—物质层面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关系。<sup>①</sup>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解释了一切。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价值之伟大依然存在——如同在150年前一样——它提出的问题是当权者所不愿被问及的,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使得我们生存于其中但却很少掌控的世界去神秘化。

### 参考文献:

Abbas, Ackbar and John Nguyet Erni, eds. 2005 *Internationalizing of Cultural Studies*. Malden MA: Blackwell.

Adorno, Theodor and Max Horkheimer. 1979 [1944].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New Left Books.

Barthes, Roland. 1977 [1968].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Image, Music, Text*, edited by Stephen Heath, 142—148. London: Fontana.

Bennett, Tony. 1998. *Culture-A Reformer's Art*. London: Sage.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2005 [1999].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 Blackwell.

China Labor Watch. 2011. *Tragedies of Globalization-The Truth Behind Electronic Sweatshops*. New York: China Labor Watch.

Duhigg, Charles and Keith Bradshaw. 2012. Where the iPhone Work Went.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s select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bserver*, 29 January, pp1, 4.

Duhigg, Charles and David Barboza, 2012a. How the US Lost Out on iPhone Work. *The New York Times*, 21 January.

---

<sup>①</sup> 然而,如果对中国通信产业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像诸如洪宇(Yu Hong 2008 & 2011)所做的那样,对本文所提到的劳动过程中生存经验的文化分析以及“酷资本主义”这一论题所批评的对世界各地人们的意识形态诱惑不进行勾连,那将令人遗憾。

Duhigg, Charles and David Barboza, 2012b. In China, 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an iPad. *The New York Times*, 26 January.

Fiske, John. 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n Hyman.

Frank, Thomas. 1997. *The Conquest of Cool-Business Culture, Counterculture, and the Rise of Hip Consumer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llo, Carmine. 2011. *The Innovative Secrets of Steve Jobs-Insanely Different Principles for Breakthrough Success*. New York: McGraw Hill.

Gamble, Andrew. 2009. *The Spectre at the Feast-Capitalist Crisis and the Politics of Recess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Gilroy, Paul.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

Goffman, Erving. 1971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Hall, Stuart, 1997 [1974].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Studying Culture-An Introductory Reader*, edited by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28—34.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Arnold.

Hall, Stuart. 1988.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Hall, Stuart. 1986 [1980]. 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 In *Media, Culture & Society-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Richard Collins, James Curran, Nicholas Garnham, Paddy Scannell, Philip Schlesinger and Colin Sparks, 33—48. London: Sage.

Hall, Stuart, Chas Critcher, Tony Jefferson, John Clarke and Brian Roberts.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Hall, Stuart and Martin Jacques, eds. 1983.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Hall, Stuart and Martin Jacques, eds. 1989. *New Times-The Changing Face of Thatcherism in the 1990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Hall, Stuart and Laurie Taylor, 2006, Culture's Revenge, *New Humanist*, March/April, 14—17.

Harvey, David. 2010. *The Enigma of Capital-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Healy, Kieran. 2011. A Sociology of Steve Jobs. <http://kieranhealy.org/blog/archives/2011/10/10/a-sociology-of-steve-jobs/> downloaded 19—01—12

Hong, Yu. 2008.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ath of ICT Development-A Cri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in Light of the East Asian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456—471.

- Hong, Yu, 2011. *Labor, Class Formation, and China's Informationized Poli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ham, MD: Lexington.
- Isaacson, Walter, 2011, *Steve Jobs*, London: Little, Brown.
- Johnson, Richard. 1979. Histories of Culture/Theories of Ideology-Notes on an Impasse. In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edited by Michèle Barrett, Philip Corrigan, Annette Kuhn and Janet Wolff, 49—77. London: Croom Helm.
- Kellner, Douglas. 1997.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Cultural Methodologies*, edited by Jim McGuigan, 12—41. London: Sage.
- Klein, Naomi. 2000. *No Logo-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 London: HarperCollins.
- Majors, Richard and Janet Mancini Billson. 1993 [1992]. *Cool Pose-The Dilemmas of Black Manhood in America*. New York: Touchstone.
- Marx, Karl. 1976 [1867]. *Capital Volume 1*, tr. Ben Fowk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son, Paul. 2012. *Why It's Kicking Off Everywhere-The New Global Revolutions*. London: Verso.
- McChesney, Robert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2010. Capitalism, the Absurd System-A View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onthly Review Press* 62(2): 1—12.
- McGuigan, Jim. 1992. *Cultural Populism*. London: Routledge.
- McGuigan, Jim. 1997. Cultural Populism Revisited. In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edited by Marjorie Ferguson and Peter Golding, 138—154. London: Sage.
- McGuigan, Jim. 2003.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Disaster-New Labour's Millennium Experience. *Cultural Studies* 17(5): 669—690.
- McGuigan, Jim. 2006.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Cool Capitalism*. *Cultural Politics* 2(2): 137—258.
- McGuigan, Jim. 2007.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Mobile Privatisation. In *New Media Worlds-Challenges for Convergence*, edited by Virginia Nightingale and Tim Dwyer, 103—117. Sydn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Guigan, Jim. 2008. Apprentices to Cool Capitalism. *Social Semiotics* 18(3): 309—319.
- McGuigan, Jim. 2009. *Cool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 McGuigan, Jim. 2010a. *Cultural Analysis*, London: Sage.
- McGuigan, Jim. 2010b. Creative Labour, Cultural Work and Individualis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6(3): 323—333.
- McGuigan, Jim, 2011, From Cultural Populism to Cool Capitalism. *Art and the Public*

Sphere 1(1):7—18.

McGuigan, Jim. 2012 forthcoming. Cool Capitalism at Work, In *The Cultural Career of Coolness*, edited by Ulla Haselstein, Irmela Hijiya Kirschnerreit, Catrin Gersdorf and Elena Giannoulis. Lanham, MA: Lexington Books.

Miller, Toby, Nitin Govil, John McMurria and Richard Maxwell. 2001. *Global Hollywood*,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Miller, Toby, Nitin Govil, John McMurria, Richard Mazwell and Ting Wang. 2005. *Global Hollywood 2*.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Moritz, Michael. 2011 [2009]. *Return to the Little Kingdom—Steve Jobs, The Creation of Apple,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Duckworth.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1974.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3*, edited by 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205—234. London: Merlin.

Pountain, Dick and David Robins. 2000. *Cool Rules—Anatomy of an Attitude*. London: Reaktion.

Ridderstrale, Jonas and Kjell Nordstrom. 2002 [2000]. *Funky Business—Talent Makes Capital Dance*. London: Pearson.

Rojek, Chris. 2001. *Celebrity*, London: Reaktion.

Students &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ur (SACOM). 2011. *Foxconn and Apple Fail to Fulfil Promises—Predicaments of Workers after the Suicides*. Hong Kong: SACOM.

Thompson, John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Thompson, Robert Farris. 1974. *African Art in Motion*. Berkeley &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ompson, Robert Farris, 1976 [1971]. *Black Gods and King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Graeme. 2003.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Wilde, Joseph and Esther de Haan. 2006. *The High Cost of Calling—Critical Issues in the Mobile Phone Industry*, Amsterdam: Centre for Research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OMO).

Williams, Raymond, 1963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Williams, Raymond.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81. *Marxism, Structuralism and Literary Analysis*. *New Left Review* 129: 51—66.

Williams, Raymond. 2011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Cardigan: Parthian.

Winston, Brian. 1995 [1990]. How are Media Born and Developed? In *Questioning the Media-A Critical Introduction*, ed. John Downing, Ali Mohammadi and Annabelle Sreberny-Mohammadi. 54—74. London: Sage.

Winston, Brian, 1996, *Technologies of Seeing-Photography, Cinematography and Televis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Wright, Erik Olin,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布莱斯·尼克松(Brice Nixon)<sup>①</sup>

## 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张韵(译),吴畅畅、殷鹏(校)

[摘要]本文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性质(quality)是由其批判方法所决定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定义被认为并且表现为:注重的是具体的理论旨趣,而不仅仅是其方法。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人类理性生产知识的途径的方法。对马克思而言,批判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因此本文将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探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涉及从马克思到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思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贡献在于,它补充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的不足。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受众劳工理论,是本文一个有益的起点,我将概述这一个观点在与其他批判学者的媒介与文化理论的融合过程中的潜在发展。

[关键词]批判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文化,意识,马克思,斯迈思

### 一、引言

在过去至少40年中,关于文化、传播、信息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许多著名的学者们定义、考察、再考察。我认为,这种集体的自我反思是批

---

<sup>①</sup>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新闻中的传播与大众传播方向的博士生,他的论文关注政治经济学、历史和广告学的文化政策问题。



判研究理论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创造性的品质。然而,有一点却被忽略了,或者至少没有被充分强调——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批判理论所仰仗的批判方法。批判理论依赖于批判方法,马克思的批判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石。因此,马克思不仅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与理论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思考方法本质(the nature of that method)的重要资源。在本文中,我将概述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关联,这对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通过将其与斯迈思(Smythe 1977)所发起的讨论传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位置的“盲点”之争相联系,力图阐明这种关联的生产潜力。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批判理论,经由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成为关于意识生产的批判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由马克思与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展起来的。方法,指的是使用人类理性生产关于人类存在的认知的途径。我沿用了马克思(Karl Marx),卢卡奇(Georg Lukács)与萨特(Jean-Paul Sartre)将人类理性过程作为“方法”的路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方法,指的是将人类存在视为物质现实中的历史过程,通过人类理性去生产关于人类存在的认知,从而认识到现实的人类社会既相互关联,又是相互矛盾。这种理性之所以是辩证的,因为它是一种“人对人的认知和理解”(Sartre 1976, 823);<sup>①</sup>换言之,认知与被认知,主体与客体是辩证相关的。因此,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具有显著的差异,后者的知识生产是通过将现实分离为有差异的部分而实现的,这样的理性不能把握整体的人类存在,因为它将基础性的分离看作是现实存在的,<sup>②</sup>甚至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在主观知识与客观存在之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比如康德 2009)。正如黑格尔(G. W. F Hegel)关于辩证理性知识生产的论断:“真理是整体的”(the True is the whole)(Hegel 1977, 11)。对于马克思而言,人类存在既是独立的又是社会的,既是相区别的又是相统一的,所以任何真正的认识都必须能够辩证地看待人类存在。马克思(Marx 1990, 103)所使用的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为作为一种产生关于社会现实的意识的方法,它认为每个个体作为社会现实,既是社会的

---

① 中文摘自[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骥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序第3页。——译者注

② 例如文化与经济,社会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的分离。

一部分,也因而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也正是通过这种辩证的论证方式形成了他自己的批判理论。辩证法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批判基础,因此我将“批判理论”专门定义为: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产生的理论,这里特指批判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我并不主张只有一种主观的、认识论层面的辩证法或者只有唯一的一种辩证法,也不认为没有一种客观的,本体论层面的辩证法。如果承认知识是对现实的反映,那么认识存在的方法与存在本身是分不开的。“辩证法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客体中的运动”(Sartre 1976,20)。<sup>①</sup> 本文关注如何在媒介与文化研究中,讨论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本质,而不是在哲学层面讨论辩证法本身。所用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为批判的辩证法是马克思理论批判的基石,对有志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者来说,对研究方法的自觉,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概念的自觉同样重要,只有这样,这些概念或者理论自身才会保持持续的批判力而不是变成静止的。本文的目的在于阐述辩证法的批判理论,因为它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相关。

首先,要探讨的是批判的文化政治经济学,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该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们都已经对其做出了定义。但在众多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质的定义中,我上文中所强调的方法,并没有得到重视。庆幸的是,我关注到了两位使用批判的辩证法进行文化与传播研究的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和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其次,我将考察辩证法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角色。对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而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至少和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具体论述同样重要。我还将思考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他们并没有试图把它作为分析政治经济的方法,而是将其运用到了文化和意识理论研究中。辩证地论证和批判地理解文化和意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文化和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关键节点。最后,我将通过考察“盲点之争”和斯迈思关于文化和意识生产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结合起来。

当“受众商品”(Smythe 1977)<sup>②</sup>理论被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所接受

---

<sup>①</sup> 中文摘自[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骥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52页。——译者注

<sup>②</sup> “audience”在所参考的中文译文(台湾版)中译为“阅听人”,本文采用大陆常用的译法为“受众”。——译者注

的时候,可以说,斯迈思的洞见却被忽视了。如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文化研究,特别是意识研究中被更广泛地使用,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将会被拓展和发展为更有效的途径。我认为文化和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要想最有效地发展,必须将辩证法,与其他批判理论(比如 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2; Williams 1977)以及关于文化与意识批判研究的历史维度(比如 Schiller 1989; 1992)相结合。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综述,以前的学者们,在关于本文所推崇的方法论与理论的发展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正是依靠前人的努力,我才得以提出,在他们所指明的方向上,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本文首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正因为他们,我才不必面面俱到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是以方法为基础,讨论其思想史及其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相关性,同时也希望这一方法论的探讨能够引起所有媒介、传播以及文化领域的学者的兴趣。我意图将方法问题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关注的中心,并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在文化与传播研究中的潜力。

## 二、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问题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大批学者对于文化、传播、媒介和信息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除了将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分开来,这些学者们还逐步确立了批判的研究取向。简要回顾过去 40 年的思想史,便可以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总体特征。我将他们全部归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标签之下,虽然很多人倾向于使用更具涵盖力的“传播”、“(大众)媒介”或者“信息”。文化政治经济学最具生产力的特征是能够持续地阐明、定义和批判其确切的性质,使它能够在实际的历史变迁,但其研究方法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关注。然而丹·席勒(Schiller 1996)和福克斯(Fuchs 2011)却对后者作出了贡献。我也呼吁对于研究方法应当给予和理论范畴及概念同样的持续与广泛的思考。

当研究方法被特别拿出来讨论时,它往往成为一种技术性的分析理性,而不是作为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方法——对人类理性能力生产知识的方式的自觉批判和宣告。在启蒙思想的传统中,这正是马克思所指的“方法”。不管是马克思的“方法”还是其他政治经济学者或者哲学家的“方法”,对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方法的问题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关键在于,马

克思(Marx 1990, 102—103)曾认同其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致性,并使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变得更加“批判和革命”。谈到方法时,可以在“哲学”层面进行思考,但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者都必须同时是哲学家;事实上,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学者致力于思考什么是“批判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辩证法的探讨奠定了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关于批判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定义中却并不易找到关于方法论的思考痕迹,但我仍然认为,这一方法论基础对于理论本身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意识生产还没有作为一个基础部分被系统地整合进可能的文化与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相反,政治经济学与意识<sup>①</sup>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政治经济学者们为解决这一矛盾所做的尝试又将理论置于了具体化的威胁之下,而批判理论正是避免这种具体化的手段。已经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可以使意识生产融合进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之中,本文将努力说明这些因素。

首先,我要总结一下过去40年来关于批判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定义。默多克和戈尔丁(Graham Murdock and Peter Golding)将“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巩固和形塑了大众传播的经济环境和政治后果”的“基本特性”(Murdock and Golding 1973, 205)的认识。他们认为,必须将大众媒介机构看作是商业性商品生产的“最初和最重要”的利益基础。媒介商业与其他资本主义商业形式似乎是相同的,但由于其所生产的商品的特殊性,媒介产业又确实有别于其他产业:媒介产品同时还是具化为“文化”了的观念(比如电视节目、音乐等)。文化生产通过大众媒介形成了双重属性,媒介产品既是“商品”也是“观念”,这也是所有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定义的核心阐释(theme present)。对默多克和戈尔丁而言,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阐明媒介工业文化商品生产所产生的“总体的和系统的限制”(同上, 233),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具体和特别地生产出来的(同上, 207)。他们认为,文化生产被其商品属性所限制,由此产生一种强化现状的总体的意识形态效果(同上, 226—228)。“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资本权力关系合法化过程的分析(同上, 232)。然而,默多克和戈尔丁在勾勒出基本的理论及其所依存的历史之时,并没有强调方法。

加汉姆(Garnham 2006/1986)涉及了文化和传播理论研究的批判方法

---

① 通常称为“意识形态”。

问题,他的综合性论述如今仍然是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在大部分的论述中,他讨论的仍是具体的理论问题,对辩证法本身只是进行了暗示,尽管这种暗示很强烈。因为缺少直接的方法论思考,加汉姆没能彻底地拒绝庸俗的唯物主义(vulgar materialism)。虽然富有洞察力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必须被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所强调的方面,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精神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但他没有完全解决自己所强调的问题。依赖于一个部分具体化了的“经济”概念,加汉姆的文化政治经济学也因此部分具体化了:即可以通过理解历史的、具体的“经济”生产来理解文化。虽然反复强调了历史地理解生产的重要性,他却采用了资本主义的叙述方式并将生产视作是“经济的”,这实际是一种去历史化(de-historicize)的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生产。事实上,强调文化生产的“经济”维度,则观念的维度被忽略了(Williams 1977, 93; Garnham 2006/1986, 207)。加汉姆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深刻的但又是矛盾的,这也使他的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和有用的起点。

据此批评加汉姆,显示我似乎在质疑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前提,其实,我的初衷恰恰是相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既不能排除人类活动与“意识”、“意识形态”或是“主体性”的关联,也不是仅仅通过“阶级”、“资本积累”的批判分析就能够被理解的(Garnham 2006/1986, 203),我正在做的是努力拓展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文化生产似乎通过避免成为一种还原论主义的“反映理论”而被吸收进批判理论中,这确实是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总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但是意识生产还始终处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尽管马克思对物质生产的阐释首先就是通过意识。

对论著中的矛盾之处,试举一例:虽然加汉姆(Garnham 2006/1986, 206)事实上清晰地说明了:“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精神生产方式的控制’作出解释。”但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却批评他拒绝充分地探讨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的“精神生产方式的控制”:即必须直接讨论“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通过强调文化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而非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简单反映来回避问题。加汉姆再一次在他的主张中表明需要将文化生产同时看作是商品和观念生产,但作为观念生产的重要性被他忽视了,而这一点却被默多克和戈尔丁(Murdock and Golding 1973, 206)当作是文化生产的重要方面所强调。

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 1980a; 1980b)要求放弃关于社会生产的所有具体化的方法,他认为作为物质生产的文化是最后的、最重要的障碍(significant barrier)。但加汉姆(Garnham 2006/1986,207)却通过强调历史的特殊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和“经济”与“物质”的区分,将其推回到原处。他错误地认为威廉姆斯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并通过一个具体化的“经济观点”来进行反驳,没有认识到威廉姆斯批判方法的重要性。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 1980a; 1980b)指出,如果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范畴要保持批判性,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保持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生活自身社会生产的批判理论(Marx 1978a,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就必须被用于对文化生产的理论分析中。与之相反,加汉姆(Garnham 2006/1986,208)提出了可能是他最有问题的观点:社会形式与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区别,存在着“必要的分界”。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文化和意识不是物质的,直到“它们被转化为社会形式”。意识生产及其与文化的关系,就此从文化政治经济学中被排除出去。他认为没有理由去驳斥现时盛行但是存在问题的“非物质劳动”概念,这一概念代表关于文化和意识的批判理论的逻辑发展过程,因为对意识进行批判分析的任务被留给了别人(Garnham 2011,41)。<sup>①</sup>

斯迈思重新拾起了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被加汉姆所抛弃的方法,尽管斯迈思也没有完全克服他所指出的问题。斯迈思(Smythe 1977)通过马克思的批判的辩证法准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意识生产层面。他并没有停止对于文化工业生产的思考,进一步将受众(audiences)分析为生产者而非消费者。他认为“精神生产方式的控制”完全掌握在“意识工业”手中。观众被迫为广告商工作,后者通过媒介公司购买受众的劳动力。重要的是,斯迈思将个体劳动是自我意识生产中的,而整个过程则是社会的。他的理论并没有完全发展到可以使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同时成为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但提供了实现这一个目的基本方法。他直接强调了辩证法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并且始终追寻阶级斗争的现实”(Smythe 1978,126)。

---

<sup>①</sup> 现在的迹象表明这个概念已经被接受,并且它在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的缺席也被常为人所诟病。

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最初的理论面向仍然保持着文化政治经济学在批判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杰哈利(Jhally 1989, 66)将文化政治经济学描述为一种关于“经济环境中文化的大众媒介化”或者“文化工业”的理论。正如默多克、戈尔丁、加汉姆和斯迈思一样,杰哈利强调了作为商品生产的文化生产的双重属性:既生产用于交换的商品也生产文化意义。对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而言,对两者的强调都是必要的。他深刻地指出:相较于其他更通常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者<sup>①</sup>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文化工业理论”(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2)占了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一半。但是,杰哈利(Jhally 1989, 80)还提出,文化商品的交换价值主导了使用价值,因此有必要通过重新思考分析方法来进一步扩展理论范围。他的这种说法似乎只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现实的简单陈述,却使政治经济学家们忽视了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或“意义”。由于“意义”在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文化生产因此只能部分地被把握,意识生产再一次被推到一边,成为一种只能被其他理论分析方式所理解的东西。批判政治经济学必须成为一种与关注商品生产同等关注“意义”生产的理论。

近期关于批判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对其早期定义的阐释也是对早期定义的回应(参见 Garnham 2011; Meehan, Mosco, and Wasko 1993; Mosco 2009; Wasko, Murdock, and Sousa 2011)。米汉、莫斯科和瓦斯科(Meehan, Mosco and Wasko 1993, 113)通过关于“方法”的讨论指出:那些宣称使用所谓“分析”方法所进行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马克思研究中,并没有涉及辩证法。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性和特性被遗忘了。米汉、莫斯科和瓦斯科更正道“对方法的重新评估”是必要的(同上, 115)。在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特性所做的广泛的研究中,莫斯科(Mosco 2009)为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关于文化、传播、媒介和信息研究的总体性方法补充了细节,但是他对于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论述相对简单,并且没有对辩证法进行强调。他对“批判的”认识论进行了说明:批判性需要在与其他可能是非批判性的、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理论的比较中被理解。瓦斯科、默多克和索莎(Wasko, Murdock and Sousa 2011, 1—2)对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做出了类似的定义,但同样是凭借理论的内容而不是方法的理论化。加汉姆最近批评这个领域始终困在“历史轻易滑过的一系

---

<sup>①</sup> 例如本节所讨论到的那些学者们。

列问题和分析术语中”，受限于“陈旧狭隘的正统”（同上，42）。尽管这一批评直指方法问题，加汉姆同样只是将他的批判限制在概念和理论内容本身。他的“信息”政治经济学似乎只是错误方向上的一种推进。

卡拉贝斯(Calabrese 2004, 2)认同上述学者关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的解释，但他所明确主张的理论的发展朝向与本文所试图推进的方向是一致的：要与“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同上，9），他同时详尽地引证辩证法是这种理论发展的关键（同上，9—10）。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正是朝向“文化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推进，而其中辩证法是关注的核心。

在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领域，福克斯(Fuchs 2011b)和丹·席勒(Schiller 1996)两位学者强调了方法。他们对方法的思考似乎是这个领域中的例外，所以我强调他们的思考是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发展的必要起点。关于传播和媒介的“批判”理论的定义，福克斯的观点(Fuchs 2011b, 97)与前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者们的观念类似：“在支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剥削、压制和控制语境中的媒介、传播和文化分析。”重要的是，他还特别坚持“辩证法”对于批判理论的必要性（同上，3—71），以及媒介和信息批判研究作为批判理论的一个面向的重要性（同上，112）。在对后一种观点的发展中，福克斯集中关注作为传播技术的媒介，这详细地体现在批判的辩证研究方法是如何成为“复杂的技术评估”方式（同上，112—121），并体现媒介和社会辩证关系的。我也关注文化和意识，继承他关于媒体和文化研究的批判的辩证方法，我希望在方法论上有所拓展，以规避技术决定论（同上，112）<sup>①</sup>——虽然这一观点也很必要。依据文化和意识的批判理论，批判的辩证法还是批判地理解文化和意识的社会生产的途径。福克斯还指出，媒介批判理论的发展需要融合那些将媒介或视为压制的，或视为具有解放性的路径（同上，102, 108, 112），本文将在一些部分，致力于这种融合。

丹·席勒(Dan Schiller 1996)强调威廉姆斯关于文化和传播批判理论的观点对传播学理论分析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至关重要。他呼吁建立一个关于“劳动”概念的统一的框架，以便将人类传播理解为一个积极的人类进程，且不将其与人类社会存在的其他层面相分离。他反对在理论上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具体区隔。尽管丹·席勒没有直接关注“辩证法”，但他明显推进了批判方法的理论化进程。如同福克斯的综合的辩证法理

<sup>①</sup> 不管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技术决定论。



论,席勒的统一方法有效地推动了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发展。这种关于文化和传播生产的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批判地理解所有的人类社会活动、活动的条件和基础知识。通过这种方法,文化生产和意识生产成为了文化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对象。关于这种方法论的具体内涵,将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进行说明。在此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法。

### 三、马克思的辩证法: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

卢卡奇(Lukács 1971)认为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要追寻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将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论述当作不容置疑的、绝对的真理。政治经济学,若想具有与马克思主义同等的批判性和革新性,就必须采用辩证的研究方法。直接关注辩证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并不是政治经济领域的;他们回归,是为了寻求一条非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此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对理解文化与传播的重要性有关,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却忽略了这一理论得以产生的方法。我将沿袭卢卡奇对于方法的根本的重要性的强调,关注方法论。对于作为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而言,一种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方法是必备的。批判的、革命的文化政治经济学也只能通过这种方法产生。在本文中,我将尝试阐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如何有助于一种批判的、革命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本节关注的焦点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辩证法的发展将在其后的部分予以关注。

马克思(Marx 1990, 103)凭借辩证法形成其“批判的和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辩证法之所以是批判的和革命,因为它产生的不是维护现存社会的理论,而是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社会的意识,所以它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它是发展的。辩证法及其所产生的理论之所以是批判和革命的,因为它认为意识是一种生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批判性的社会认识,对于一个自由、平等环境中的社会生产而言是必要的手段。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通过辩证法,产生了他批判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以他才能够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

将社会视作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并且看到这一过程的本质。“社会”是一种产品,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者获得生产的自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是马克思形成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段:

理性地说,辩证法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不可避免的走向消亡;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状只是暂时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Marx 1990,103)<sup>①</sup>

在许多著述当中,马克思都批判了其他人的理性主义方法。在理解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时,可以不将其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方法,而是视作使用人类理性的特殊方式,是形成关于世界本真的认识的方法。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解释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区别: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而现实世界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意识只是人脑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并以思维的方式呈现出来。(Marx 1990,102)<sup>②</sup>

马克思由此试图建立起其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理解是认识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马克思认为,“物质”世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其中存在着辩证关系:“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Marx, 1978d,165)。<sup>③</sup> 马克思所说“真正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现实的科学”,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Marx 1978b,108)。<sup>④</sup> 他还指

---

① 中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页24。——译者注

② 同上。

③ 中文摘自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页43。——译者注

④ 中文摘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页158。——译者注

出,批判的、革命的唯物主义把现实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当作“实践”去理解(Marx 1978c,143)。<sup>①</sup> 这种唯物主义的方法之所以是辩证法的,因为它认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人也是“环境的产物”(同上,144)。<sup>②</sup> 人类的“本质”,人类存在的本质,并不是属于个体的特性,而是社会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上,145)。<sup>③</sup>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解物质世界中“人的实践”是理解社会生活的手段(同上)。<sup>④</sup> 这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方面。

马克思(Marx 1978b)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是本质主义的、非批判的以及反革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产生这样一种社会意识:不将人类生产看作是根本的,因此也不将其看作是变化的,当然也不是应该被改变的。这种意识将现存社会——或者至少是现存社会的本质——看作是自然的和永恒的。通过这种意识,人类活动“再现”现存社会的。凭靠这种推理方式,政治经济学天然地站在资本主义的利益立场之上。这一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得以例证,马克思称之为“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Marx 1973,104)<sup>⑤</sup>,被希望代表永恒的生产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此将资产阶级制度(bourgeois institutions)理解为天然的制度。“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同上,120—121)。<sup>⑥</sup> 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现存的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同上,121)。<sup>⑦</sup>

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Marx 1973,106)。<sup>⑧</sup> 经济学范畴是人类产生出来的观念,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同上,110)。<sup>⑨</sup> 因此才可能产生批判的、革命的范畴和批判的、革命的

① 中文摘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3。——译者注

② 中文摘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前揭,页4。——译者注

③ 同上书,页5。——译者注

④ 同上。

⑤ 中文摘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81。——译者注

⑥ 中文版请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94。——译者注

⑦ 同上书,页94—95。——译者注

⑧ 同上书,页83。——译者注

⑨ 中文版请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85。——译者注

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声明,他的研究方法正是生产这种范畴和这种理论的手段,他称之为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因此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是一种生产认识的方法,这种认识认为人类社会活动产生了世界存在,因此人类社会活动可以产生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界定了他的研究方法的前提:实际的人类历史,即人们可理解的人类物质社会或者人类生活。因此全部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Marx 1978d,149)<sup>①</sup>: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同上,149)<sup>②</sup>

马克思反复强调了他的研究方法的前提(同上,154,155),<sup>③</sup>因此可以明确,人类社会生产进程,即人类生活,是马克思运用人类理性去理解社会总体现实的方式的基础。确切地说,这是因为总体性事实上是人类物质活动的持续的社会进程,马克思认为人们是可以获得与之相关的知识的。这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的方面。

马克思(Marx 1978a)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论述,可以并且已经被理解为他经济“基础”的重要性的强调,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所谓语境,他两次在重要的段落中提到,是他最感兴趣的:人类生产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绝对核心,“用于指导”他的研究工作(同上,4)。<sup>④</sup> 在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中,有一段被频繁使用的引言,我也引用了这段话,但我想强调的是开头的介词短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我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论述的关键部分,其原因,在本节中我已经有过清晰的解释。整个的长段落详细

① 中文版请参见: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23。——译者注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页28,29。——译者注

④ 中文摘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8。——译者注

地说明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下面这几句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起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上)。<sup>①</sup>

对于这段缜密的论述,我将着眼于几个关键点进行评析。人类生活的“社会生产”是一个需要抓住的核心概念,以便考察马克思研究方法所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程度。这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理解真正的人类生活的方式。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认为“经济”决定了其他的一切;“经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本质上并不是批判的,但马克思用“社会经济结构”作为一个批判的概念去描述具体的东西——人类存在产生的社会和物质条件。这一关于“社会生产”的观点能够解释,为什么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产生关于社会生产意识的有效手段:因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生产的理论。用一种批判的、革命的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所形成的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理论,是关于全部的人类生产、全部的人类生活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有关“经济”生产的认识。这种认识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产物。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推到了它的极限,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因为这一方法可以产生全部社会生产的知识,以及全部人类生活的意义。在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开始着手(Marx 1978b,70)。<sup>②</sup> 他运用非批判的、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作为形成批判的、革命的理论的手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描述了这一方法的本质:对“分析经济形式”而言,最科学的方法是

<sup>①</sup> 中文版请参见: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23。——译者注

<sup>②</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89。——译者注

“抽象力”。在生活的过程中,人类不断产生关于自身存在的意识:人类有能力从总体的社会存在中进行抽象,通过划分概念和观点来分析总体。人们可以从他们积极参与到的过程中进行抽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推理正是这样一种意识生产,这种方式不会将客观世界从有关它的知识中分离出来。事实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基础是:真正科学的知识只有在作为人类生活本身过程的一个方面时才得以可能,认知只有作为存在的一个方面时才得以可能。人类具有可以通过辩证思考去生产真正的知识的推理能力,但他们不是仅仅依靠存在就能够自动做到这一点。因此,我认为马克思是最彻底的“激进启蒙”(radical Enlightenment)思想家(Israel 2010)。批判的辩证法是形成关于人类生活的认识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因为人类生活不能在自然中观察或是在实验中孤立出来,因为人类不能脱离人类生活。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从过程本身产生认识的方法,因此,它也是真正具有启蒙精神的批判的、革命的方法。生产批判的和革命的意识对辩证法的要求是“唯物主义的”,即人类活动作为基础;同时也是“历史的”,即将人类生活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这种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为它是生产关于人类生活真理(truth)的方法:人类在社会中产生社会存在。“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Marx, 1990, 93)。<sup>①</sup>

####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的发展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里得到了发展,以回应“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式的,作为自然法则而非人类理性能力的辩证法。对辩证方法的再次强调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批判性而不是具体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Georg Lukács)、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萨特(Jean-Paul Sartre)和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并非试图为“政治经济学”创造一个方法,而是为了推动社会“批判理论”的持续生产,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用“经济主义”(economistic)或者“还原主义”(reductionist)的方式处理人类生活的诸多面向,后两种方式成问题地认为部分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页12。——译者注

“上层建筑”或者“反映”了物质“基础”，或者被物质“基础”所“决定”。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经济学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处理问题，因此它必须有明确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为这一过程作出贡献。

卢卡奇、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列斐伏尔和威廉姆斯都反复重申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面向；萨特则发展了方法本身。卢卡奇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基本批判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而言，“抽象过程”是至关重要的(Lukács 1971, 6)<sup>①</sup>，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脱离了现实的人类历史。相反，批判的方法是从历史中进行抽象。因此，在这种方法中，存在着理论和历史的辩证关系。就批判理论而言，世界的历史是抽象的具体来源。通过这种方法，批判理论从事实的“现实存在”超越至了“内部核心”(同上, 8)<sup>②</sup>。辩证法理论的核心是“既肯定又否定当下的存在”(同上)<sup>③</sup>。通过“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通过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批判理论实现了从“对事实的认识”到“对现实的认识”(同上)<sup>④</sup>。批判理论，作为“对总体的认识”(Lukács 1971, 10)<sup>⑤</sup>（这里表明了黑格尔(Hegel [1977, 11])<sup>⑥</sup>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性），是一种能够让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辩证的总体观”(Lukács 1971, 13)<sup>⑦</sup>。它是关于存在的意识，是能够产生不同现实的意识存在的必要部分。凭借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批判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

只有当存在的核心表露出是社会的过程时，存在才能被看作人类活动的产物，虽然是至今未意识到的产物，而这种活动本身又会被看作是对改变存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同上, 19)<sup>⑧</sup>

① 中文摘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 53。——译者注

② 中文摘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前揭，页 55。——译者注

③ 同上书，页 56。——译者注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页 58。——译者注

⑥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页 11。——译者注

⑦ 中文摘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前揭，页 62。——译者注

⑧ 同上书，页 69。——译者注

马尔库塞(Marcuse 1976)作出了相似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将存在揭示为社会过程的方法,以便其可以在意识上进行改变。通过这种方法,理论生产“是实践的;实践不仅仅在最后才到来,而是在理论初期就已经出现”(Marcuse 1973,5)。之所以是革命的、实践的,因为它是关于现实行动的认识。因为存在是辩证的,所以“它只能被辩证地把握”(Marcuse 1976,16)。人类可以历史地、辩证地理解他们自身及其所创造的世界,即社会过程的总体,因为社会总体是历史的、辩证的。社会过程就是人类历史本身,对物质的社会过程而言,辩证法是产生意识的方式。“只是因为在此范围内(insofar)的现实是历史的,辩证的;现实可以并且必须通过辩证法来理解”(同上,19)。

霍克海默(Horkheimer 1972)同样认为是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产生了“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方法,霍克海默尝试对“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进行区别。事实上,他的这篇权威性的论文更名为“传统研究方法 with 批判研究方法”也许更为恰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由批判方法产生的批判理论。批判的辩证法需要批判的理论,而不是静止的理论。传统的方法论,对社会存在现实是不具批判意识的。对传统理论而言,最基本的要求是“和谐”：“所有的部分应该没有摩擦地、彻底地相互配合”,并且没有矛盾(同上,190)。在传统的方法中,理论和历史是相互分离的。“一方面,在概念上制定知识,同时,以此来解释事实”,这种归纳的方法被称为“理论解释”(同上,193)。传统理论是关于现状(status quo)的理论。是关于现存社会需要的非批判的意识的再现(reproduction)。而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关于社会变化的理论:它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将社会看作物质社会生产过程。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意识,因为它展望“合理的社会状态”,“作为自由的人的社区的未来自来社会”(同上,216—217)。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也再次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历史的、革命的方面。他反对“教条主义的”、简化的、“经济主义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Stalinist Marxism),通过批判的、革命的方法定义了一种“辩证的”唯物主义形式(Lefebvre 2009)。列斐伏尔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批评斯大林式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哲学,把“辩证法的规律”作为“自然的规律”(同上,1—3)。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被消极地理解为“反对限制了人类存在的那些教条,不论从外在还是内在而言,这些教条使之(人类存在)从属于某些永恒的存在,或是将之化约为单向度或是某种片面的特殊、绝对的经



验”(同上,98)。列斐伏尔还特别想将“异化”恢复为一个基础概念,以反对排斥或是不再强调这一概念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同上,4)。对他而言,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产生批判的、革命的意识的方法,它产生的是关于“人类和社会现实中辩证活动”的意识(同上,5)。

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目标是实践(Praxis)与生活实际内容的合理表达,以及相应的,从现在的实践(Praxis)向自觉的、连贯的和自由的社会实践的变化。它的理论目的和实践目的——认识和创造性的行动——是不能相分离的。(Lefebvre,2009,100)

同列斐伏尔一样,萨特(Jean-Paul Sartre)也试图反对非辩证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探寻方法》和《辩证理性批判》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萨特而言,“哲学”是方法(Sartre 1968,5),是通过“调查和解释”(同上)从而产生意识的方法。苏维埃式的“马克思主义”将理论和实践分离为“纯粹、不变的认识”和“无法则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 without principles)(同上,22)。“它停止了历史中的生活”(同上,29)。萨特称为“外在的”、“先验的”或是“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将人类历史仅仅视为自然历史一部分(Sartre 1976,27)。<sup>①</sup> 萨特认为,这种方法并不能为人类认识真理的可能性提供基础,因为它将历史的运动看作是在自然中的,在人类影响之外的。相反,萨特坚持辩证法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在其中,生活和认识是同一的(思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存在不能降变(irreducible)为思想(同上,25,33)。<sup>②</sup> “认识”本身是历史的,因此它是被社会地和物质地生产出来的,是一个“认知”的过程(Sartre 1968,4)。“认知”的方法必须是历史的和唯物的,因此它必须是辩证批判的。对萨特而言,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回归—进步和分解—综合的方法”(同上,148),一种“启发式”的方法,它“教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因为它同时既是后退的又是前进的”(同上,133)。其产物是批判的、革命的意识,能够使方法成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的武器”(同上,5)。

---

① 中文摘自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骥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页160。——译者注

② 同上书,页158。——译者注

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重新讨论,将这一理论带回到文化和传播领域。和本节所提及的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威廉姆斯力图阐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机械的唯物论、经济决定论或还原论。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坚持将传播、文化和意识视作物质的和社会性生产的。威廉姆斯理解的辩证法的基础是他所称之为不可分割的、连续的、物质的社会过程。这一不能分解的过程是不同个体的人类活动的统一,同时这种人类活动是物质的。威廉姆斯使用了一个类似马克思的基本概念(Marx 1978b; 1978c; 1978d):人类物质社会活动,或劳动。

威廉姆斯(Williams 1977)特别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功能性提出了疑问。他认为马克思通过批判将“意识”或“观点”独立或优先化(prioritize),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他论证到,马克思认为意识“从一开始就应当被看作是人类物质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以‘思想观念’方式造就的产品也像物质产品本身一样,都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同上,59—60)。<sup>①</sup> 人类物质社会过程是一个包含了意识和思想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同上,61)。<sup>②</sup> 威廉姆斯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对社会意义产品和过程的重新定义,也许是不充分的,因此有必要复兴(reinvigorate)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可以说,取代了意识生产过程,恰恰证明了他的想法的正确性。

正如威廉姆斯所表明的,准确地说,批判辩证法的问题是:如何去辨别什么是事实上总体的、连续的社会过程,以便获取对这一过程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里是对这个问题的补充回答。威廉姆斯的观点直接对批判的、革命的文化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所采用的方法必须将所有人类活动理解为物质生产。威廉姆斯批评非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将总体的社会过程划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劳动/意识/思想/文化,这种方法往往被认为导致了一种“过于唯物主义”,或是属于“唯物主义”的庸俗状态,但威廉姆斯认为,事实上他们还不够唯物主义(Williams 1977, 90—92)。<sup>③</sup> 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不能“理解文化秩序生产的物质属性”(同上,93)。<sup>④</sup> 要克服这一问

---

① 中文摘自雷蒙·威廉姆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页64—65。——译者注

② 同上书,页66。——译者注

③ 同上书,页98—100。——译者注

④ 同上书,页101。——译者注

题,威廉姆斯指出,有必要“在看待我们实际的生产活动时,不再预先假设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物质性的”(同上,94)。<sup>①</sup> 这一论述的精髓在于:意识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可以通过辩证法得到发展。

我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的一种发展,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另一个主要的可能性,这就是意大利或是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向。尤其是自治主义“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所带来的挑战,对于文化和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发展而言是十分必要的。某种程度上说,自治主义“非物质劳动”的理论方法直接挑战了威廉姆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而后者对于文化和意识政治经济批判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自治主义的方法似乎并不是彻底辩证的,也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因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非物质”活动,在技术变迁的当下,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Terranova 2009)。他们认为文化和意识本质上是区别于“物质”过程的,因此不能依靠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理解。一种“非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在变得非常必要,因为价值“正在逐渐变得社会化和主观化”(Terranova 2009)。自治主义的社会工场理论认为,社会关系产生经济价值(Terranova 2009)。我认同发展一种理解主观和文化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将批判政治经济学推向文化和意识,但是现在自治主义将文化和意识变成仅仅是理论客体的方法是存在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计算机科学发展之前就提供了将文化和意识生产作为具有生产力的人类活动的方法。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似乎正是丹·席勒(Schiller 1996)所批判的“脑力劳动”的具体化产物。特拉诺娃(Terranova 2000)正确地认识到“文化”和“情感”(affective)活动是劳动,同时她认为劳动是一个基础的范畴。她关于我们都是“知识劳工”(同上,42)的观点也是正确的:文化和意识是所有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但是,为了将这些活动看作非物质劳动,她所采用的方法,并没有把人类生活理解为总体性的社会过程。工作的过程现在也并没有突然地“从工厂转变到社会”(同上,33)。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过程,尤其是意识生产,总是需要超越工厂或是其他“工作地点”等的严格限制。

非物质劳动,直接偏离了将广告作为一个物质生产过程的理论分析:后工业化的商业“关注的是生产过程之外的领域,即销售和与消费者的关系”。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雷蒙·威廉姆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页102。——译者注

于是广告作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被囊括进了“适当的‘非物质’生产”。这种理论论证正是斯迈思所批判的,因为他坚持受众劳动参与了物质生产过程(Smythe 1977; 1978)。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指出“主体性的产生……直接变得具有生产力,因为后工业社会的目的就是建构消费者或者传播者,并且将他们建构为‘主动的’”。这种断言强调了方法的问题,拉扎拉托坚持主体性是被生产出来的并且个体是主动的,这看似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他坚持过程的整体是非物质的。主体性的生产,即意识的生产,现在不仅仅是“社会控制的工具”,而且是一个“具有生产力的”“经济”过程。对拉扎拉托而言,接受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更为关键的是,作者—作品—受众的“整体社会关系”是具有生产力的。这与斯迈思的观点很相近。但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斯迈思发现意识生产正是总体性物质生产的一个方面,而这恰恰是被他长期忽略的。拉扎拉托的方法却认为,意识生产是一个不同的、历史上全新的、非物质过程,并且社会关系才是有生产力的。与其分析社会关系的生产力,更有用的应该是对文化生产(基于“作者—作品”关系),以及它与意识生产的关系(基于“作品—受众”的关系)的分析。

## 五、走向文化和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为解决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经由辩证法理论,许多学者为文化和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结论的部分,我将提及其中一些人的观点。尽管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没有明确对意识生产进行分析,学者们的思考还是为文化和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发展扫清了道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文化和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深层次的联系在于,前者会使这一批判理论今后的发展更具生产力。如果不能避免“意识形态”名义下,主动的、物质的人类社会过程被具体化,商品化思维的产物就不能被排除在批判政治经济学之外。我们需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不是一种“庸俗”的方法(Meehan 1993),而发展信息政治经济学(Garnham 2011),或是强调产业化媒介生产中的劳动商品化(Mosco 2011),均是意识研究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斯迈思(Smythe 1977)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发起了关于如何理解传播的讨论,指出在理论分析方法中存在一个“盲点”:媒介被“意识形态”,

而不是他们的经济或政治角色所解释。斯迈思称之为“主观”的解释(同上, 1), 因为这种解释没有把他所称的“意识工业”视作一个平滑的工业生产。他认为, 这种对媒介内容中观念的强调, 是以忽视生产的经济过程, 包括媒介和广告产业, 为代价的。斯迈思往往被认为强调媒介的经济角色重要于其“意识形态”角色, 甚至被指责完全抛弃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问题”(Murdock 1978, 113)。但事实上, 他对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非但没有回避“意识形态再生产”问题, 而且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分析这一过程。斯迈思(Smythe 1978, 126)坚持, “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如何生产意识形态, 并总是追随阶级斗争的现实”。在最后这一部分, 依据斯迈思所提供的特殊线索, 我将尝试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文化和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未来的发展究竟有多么深入的相关性。之所以这样做, 因为我想阐明, 意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并不是最终的一步, 而是最初作为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一部分的持续发展。<sup>①</sup>

斯迈思(Smythe 1977; 1978; 2006/1981)指出, 广告所支持的媒介产品并不是通过具体的媒介, 例如报纸新闻、节目等来传播内容的, 而是通过受众。“这些大量生产、由广告主出资支应的传播, 其商品形式”就是受众, 或者更具体而言, 是受众的劳动力(Smythe 1977, 2—3)。媒介生产受众劳动者, 也就是说受众在“工作”。认为媒介产生了心理操控(“效果”)的分析方法不是批判的研究方法。批判的, 即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 传播媒介研究方法是, 对具体条件下生产过程中的现实的人类活动进行抽象。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对受众活动进行分析, 斯迈思提出了关于广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他认为受众是主动地参与到生产活动中的; 他们不是被操控的。但是这个劳动过程是被“意识工业”所影响的, 并同时通过受众的生产性活动产生利润。受众是商品, 或者更确切地说, 其劳动能力是由媒介产生和售卖的, 并被广告商所购买的。受众成员并没有主动选择去售卖他们的劳动力, 但他们事实上是在为广告商工作。“意识工业”是一种资本主义工业, 利润通过人们产生自己的意识的过程而产生, 在这一过程中, 资本同时拥有劳动力(受众)和生产方式(即斯迈思论述中的广告)。

默多克(Murdock 1978, 110)认为斯迈思的观点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媒

---

<sup>①</sup> 详细论述见第二部分。

介理论的摒弃,回应称“以批判的态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开发出架构完整、且具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之大众传播分析,仍然不可或缺”。他是正确的,但是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方法的采用同他所力促的理论的参与至少同等重要。这种方法的采用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和文化与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在今后发展中相互融合。在前两个部分中,我尝试概述了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相关联的方面。在结论中,我想针对对斯迈思的广告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发展提出一个不成熟的建议:将批判理论的贡献和媒介与文化的历史,与斯迈思的理论相结合,可以推动批判的文化与意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受众商品(观众成为劳动者)是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自从斯迈思首先发起辩论(Smythe 1977, 1978; 2006/1981; Livant 1979; Murdock 1978),这个概念被反复地重新审视(Jhally and Livant 1986; Meehan 1993),近来既受到了批评(Caraway 2011; Hesmondhalgh 2010)又被许多学者用来批判分析与互联网相关的人类活动(Andrejevic 2002; Fuchs 2009; 2010; 2011a; Lee 2011; Napoli 2010)。受众商品要保持概念的批判性,必须被运用于批判的辩证研究方法中。这个概念被潜在的具体化的表现是,无法将受众劳动从“用户产生的内容”中区分出来。许多学者使用受众商品概念去观察网络活动的商品化,但是没有完全解释受众的劳动过程与互联网使用者的区别何在(Caraway 2011; Cohen 2008; Fuchs 2009; 2010; 2011a; Hesmondhalgh 2010; Napoli 2010):受众是意识生产中的劳动者,而互联网上生产“用户产生的内容”的使用者是文化生产中的劳动者。很显然,互联网使用者在“消费”互联网内容(包括广告)的同时生产自己的意识;而上传一个在线视频或是在社交网站上进行发布,却明显是在生产文化。商品化了的受众劳动是一个批判的概念,特别是涉及到意识生产过程的时候,但是新媒体的使用者与大众媒介的受众不同,它们同时生产意识和文化。

社交网站上的商品化,举例而言,不只是通过将用户的劳动力售卖给广告商来产生利润;它还是以知识产权形式推动网站文化生产的商品化(比如 Facebook 2011),同时通过决定活动的可行性来控制网站上的文化生产方式,尽管使用网站本身是免费的。因此,互联网研究明显更需要将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和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相关联。事实上,福克斯(Fuchs 2010, 191—192)就呼吁重视文化生产与意识生产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却使用

受众商品化去同时解释这两个过程。因此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批判地分析具体的文化和意识生产的过程和条件,以及两者间的关系。

威廉姆斯的理论对文化和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将“传播方式”概念化为“生产方式”,并将传播和文化解释为人类生产的过程(Williams 1980a; 1980b; 1982),为使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分析文化和意识提供了路径。更重要的是,威廉姆斯将人类生产性活动置于其辩证法分析的中心:“只有囊括了所有的实践活动,才可能从总体上分析一个社会”(Williams 1980a, 44)。文化实践是“总体社会进程”的一个方面(同上),在威廉姆斯(Williams 1980b, 53)所说的“总体的、历史的社会和物质过程”中,也就是人类存在中,人类既生产意识也生产文化。在两种情况下,生产方式都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相结合。作为对马克思(Marx 1978e)的回应,威廉姆斯坚持将人类活动解释为生产过程而不是消费过程,他指出,特别是在对传播和文化实践的分析中,这一点总是很难做到。媒介公司的重要性在于,它们通过将生产和劳动方式转换为私人财产,控制了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过程中,媒介公司是“文化工业”的一部分(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2),拥有生产方式(媒体)和劳动力(雇员),并生产文化商品。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生产是互联网重要的潜质之一(Benkler 2006):尽管他们的产品(文化)往往被商品化了,但是用户的劳动力没有被商品化;在资本主义意识生产过程中,媒介公司是“意识工业”的一部分(Smythe 1977),拥有生产方式(文化,包括广告)和劳动力(受众和互联网用户),并且生产商品化的观念。结合斯迈思和威廉姆斯的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潜在贡献就更容易被理解了。

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2)而言,文化工业包括文化生产,并生产商品化的文化。但他们的论述不是为了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其真正意义在于揭示:文化商品化是为意识生产而进行的。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被在意识生产中消费它们的受众所使用,其产物就是商品化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文化生产是为现存社会所做的广告(同上, 131—136):并以主动的意识生产的方式呈现其功能。大量生产和广泛提供的文化商品的作用,与其说是“启蒙”,事实上是“欺骗大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形成了关于意识,而不仅仅是文化的批判理论。融合他们分析文化和意识的方法,对于文化和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发展应该大有裨益。斯迈思在阐明广告和媒介在意识生产中

的角色的时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使用辩证的方法去批判地分析文化与意识的关系,以及所有作为意识生产方式的文化,因此可以说,电视节目的重要性并不逊于伴随它们的广告。

哈维(Harvey 2002)发展了“垄断地租”这一与文化生产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其方法对于意识生产的分析也会有所帮助。他将垄断地租定义为通过垄断私人财产的交流获取利益(同上,94)。这是一种不需要雇佣劳动的资本积累。根据媒介公司将受众劳动力作为私有财产的垄断程度,正如斯迈思(Smythe 1977; 1978; 2006/1981)所指出的,他们可以从需要接近劳动商品的广告商那里获取垄断地租(相同的观点参见 Jhally and Livant 1986, 125 和 Caraway 2011, 701—702);根据媒介公司将文化作为私有(知识)财产的垄断程度,他们也可以从需要接近文化商品(例如有线电视)的观众那里获取垄断地租;根据广告商支付作为私有财产的、特定的受众劳动力的程度,他们可以从需要接近特定受众的非媒介广告公司那里获取垄断地租。但是,人类最初是如何具有文化和意识生产的能力,并作为劳动力商品出售的?我们需要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斯迈思(Smythe(1977, 16—20)在他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批判中有所提及,他分析了报纸和广告的关系史。哈维(Harvey 2003)也为揭示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生产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概念:“剥夺性积累”。事实上,他明确提出这一过程和文化生产有关(同上,147—148)。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社会权力的积累)并不仅仅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的过程进行,还依靠剥夺过程:侵占,强制和压迫。

斯迈思(Smythe 1978, 121)也分析了强制的、无偿的受众劳动,他指出,受众劳动是一种“思想奴役”,是通过文化和意识生产手段进行侵占的结果。尽管卡拉韦(Brett Caraway)关于媒体公司通过广告商获得租金而产生利润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因此就错误地认为观众劳动是无效的。受众产生他们自己的意识,媒介公司对必要生产手段(文化)和技术(传播媒介)的垄断让这一过程成为一种压迫劳动。意识生产方式的剥夺或者圈占的过程因此显现,学者们也对这个历史过程进行了大量分析(比如 McChesney 1993; 2004; Schiller 1989; 1992; 2006/1991)。

赫伯特·席勒的研究是对文化和意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必要的批判的、历史的补充。他对于“文化帝国主义”(Schiller 1992; 2006/1991)的分析着眼于哈维所指出的依赖剥夺性积累的“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的文化史。关于文化生产,赫伯特·席勒(Schiller 2006/1991, 297)将文化剥夺



称为“跨国公司文化统治”，是一个文化的“控制人和资源的剥削体系”（同上，299）。正如赫伯特·席勒（Schiller 1992, 9）指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国际体系有其历史根源，与国家性的文化生产的剥夺和垄断有关：例如在美国，这是一个多重过程，包括“人们——潜在消费者——聚集的地方被尽可能地圈占，整个国家随之被商业渗透，结果，几乎没有一个文化空间继续存在于商业网络之外”。正如斯迈思（Smythe 1977）对美国广告业历史发展的描述，剥夺性积累和垄断权力不仅仅是国际性的问题；它们同样发生在国家内部。赫伯特·席勒（Schiller 1989）同样具体地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对意识生产的影响，尽管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影响，而不是一个主动的生产过程。但是，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可以在与批判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生产的批判历史的联系中发展。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生产的根源——正如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根源——可以在生产方式的圈占中看到。通过这种圈占，媒介公司生产受众劳动者，这一过程全如斯迈思（Smythe 1977）最初所揭示的：意识生产方式被转化为了私有财产，从生产者中制造“消费者”。受众活动是“生产性消费”（Marx 1990, 290），通过消费商品化文化生产意识。哈维（Harvey 2003）还指出剥夺性积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文化和意识生产中，互联网象征了一个潜在的非资本生产的工具（Benkler 2006），触发了持续的“数字圈地”过程（Andrejevic 2007, 1—4；Meinrath, Losey, and Pickard 2011）。在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推进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时候，丹·席勒（Dan Schiller 1999；2007）和福克斯（Fuchs 2010）都分析了这一历史过程。

丹·席勒和福克斯是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思考“受众商品化”的，他们都用辩证法分析了“数字化”和“信息化”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Schiller 1999；Fuchs 2010）。丹·席勒（Schiller 2007, 152）分析了“网络被迅速殖民化并转变为新的销售工具”的历史过程。他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看到资本家在努力消除活动的独立性，正如广告通过圈占受众劳动获得资金支持（Schiller 1999, 116—123），互联网似乎是通过圈占在线活动和这些活动的商品化。福克斯（Fuchs 2010, 191—192）分析认为互联网上的人类活动是劳动，但是认为用户在线生产内容是只是受众劳动的实例，因而没有将文化生产从意识生产中区分出来。不管是丹·席勒还是福克斯都没有充分利用批判辩证法，使它发挥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唯物主义的的作用：他们没有看到作为物质的社会生产过程的意识生产，是区别于、但是又直接

相关于文化生产的。受众劳动力是在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中被商品化并变得具有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就是意识生产。

斯迈思的理论仍然是一个产生批判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的和有用的方法,它将全部人类活动看作是物质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物质的、社会的活动。斯迈思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方法,将媒介受众“消费”分析为一个生产行为。从中,他发展了“受众商品化”的批判概念,或者称为受众劳动力的商品化。他还特别指出了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必须采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Smythe 1978,126)。但是他最终没有摆脱他所批判的,对媒介和广告的“主观”分析,因为对主动的意识社会生产的批判分析没有完全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斯迈思强调“劳动”,或者人类活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基础,为发展批判的、历史的文化和意识理论提供了路径。文化和意识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唯物主义的道路,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首要的正是回到斯迈思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回到批判的革命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产生的文化和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说明最根本的政策是控制文化和意识生产方式。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将人类活动置于理解社会过程的中心,尤其关注将人类活动变成为资本家的利润生产,对人类带来的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和文化生产因此不被视为是自然的。批判政治经济学使我们看到广告的本质。如同斯迈思的分析,意识生产过程转变为了资本积累的劳动活动。但广告只存在于已经商品化的文化和意识的生产的顶部。这是因为意识生产方式,即文化的分享被阻隔了,文化生产成为了文化工业的商品化活动,意识生产被强制利用于文化的商品化。广告被理解为从拥有自我意识的基本的、永久的人类生产中获取利益的手段。不难理解为什么广告会无处不在:人们“消费”内容的所有活动都可以被转换为斯迈思称为受众劳动的活动。一个实际的回应是“去商品化”(Esping-Andersen 1990; Vail 2010)。广告应该被理解为人们自己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生产利益的途径。去商品化的政策包括扩大公共媒体的能力,以及减少文化活动中广告的数量。尽管认为意识生产高于广告,但生产方式的控制,即文化也仍然属于政策议题,而文化共享(Benkler 2003a; 2003b; 2006)就是一种理想的意识生产方式。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有必要依靠政策去阻止“数字封建主义”(Meinrath, Losey, and Pickard 2011)和“数字圈地”(Andrejevic 2007; Schiller 2007)的发展。

文化和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是发展总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一个方法,它有益于非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创造,因为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对现实的认识”(Lukács 1971,8),是关于实际的历史的。要实现这一点,有必要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历史的特殊性,非资本文化生产的持续存在,文化产品或者文化生产者劳动力的持续商品化,意识生产过程及其与文化生产的关系保持清醒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唯一可以避免思想与现实脱离的方法(Calabrese 2004; Peck 2006):必须在总体性的社会生产中、以及总体性的人类存在中去理解文化和意识的生产,其途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文化和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必要方法,在辩证的、整体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认识文化和意识社会生产:人类通过现存社会提供的方法去生产自身和社会,而这些方法曾经被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出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就是将批判理论和实际的人类历史相结合的方法。

### 参考文献:

- Andrejevic, Mark. 2002. The Work of Being Watched: Interactive Media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Self-Disclosur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2):230—248.
- Andrejevic, Mark. 2007. *iSpy: Surveillance and Power in the Interactive Era*.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Benkler, Yochai. 2003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ons. *Upgrade* 4(3):6—9.
- Benkler, Yochai. 2003b. Freedom in the Commons: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Duke Law Journal* 52:1245—1276.
- Benkler, Yochai.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alabrese, Andrew. 2004.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In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Andrew Calabrese and Colin Sparks, 1—12.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Caraway, Brett. 2011. Audience Labo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 Marxian Revisiting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5):693—708.
- Cohen, Nicole S. 2008. The Valorization of Surveillanc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acebook. *Democratic Communiqué* 22(1):5—22.
- Esping-Andersen, Gosta. 1990. De-Commodification in Social Policy. I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35—54.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cebook. 2011. Statement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www.Facebook.com/legal/terms?ref=pf>

Fuchs, Christian. 2009.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1):69—87.

Fuchs, Christian.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179—196.

Fuchs, Christian. 2011a. An Alternative View of Privacy on Facebook. *Information* 2: 140—165.

Fuchs, Christian. 2011b.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Garnham, Nicholas. 2006/1986.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ks*, edited by 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201—229.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Garnham, Nicholas.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visited.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h, and Helena Sousa, 41—61. West Sussex: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Harvey, David. 2002.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Socialist Register* 38:93—110. Accessed February 26, 2012. <http://socialistregister.com/index.php/srv/article/view/5778/2674>

Harvey, David. 2003.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In *The New Imperialism*, 137—1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gel, G. F. W. 1977.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smondhalgh, David. 2010. User-Generated Content, Free Labour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10(3/4):267—284. Accessed April 30, 2011. <http://www.ephemeraweb.org/journal/10—3/10—3hesmondhalgh.pdf>

Horkheimer, Max. 1972.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188—243.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2002.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ited by Gunzelin Schmid Noerr.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srael, Jonathan. 2010.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hally, Sut. 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In *Cultural Politics in Contem-*

*porary America*, edited by Ian H. Augus and Sut Jhally, 65—81. New York: Routledge.

Jhally, Sut and Bill Livant. 1986. 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3): 124—143.

Kant, Immanuel. 2009.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zzarato, Maurizio. n. d. Immaterial Labour. Accessed March 29, 2012.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c/fcimmateriallabour3.htm>

Lee, Micky. 2011. Google Ads and the Blindspot Debat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3): 433—447.

Lefebvre, Henri. 2009.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lated by John Sturroc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ivant, Bill. 1979. The Audience Commodity: On the “Blindspot” Deb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3(1): 91—106.

Lukács, Geor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Marcuse, Herbert. 1973.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1—48. Translated by Joris de Bres. Boston: Beacon Press.

Marcuse, Herbert. 1976. On the Problem of the Dialectic. *Telos* 27: 12—39.

Marx, Karl. 1973.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Inc.

Marx, Karl. 1978a. Marx on the History of His Opinions.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3—6.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Marx, Karl. 1978b.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66—125.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Marx, Karl. 1978c.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143—145.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Marx, Karl. 1978d. The German Ideology: Part I.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146—20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Marx, Karl. 1978e. The Grundrisse.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C. Tucker, 221—293.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Marx, K.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London: Penguin Books.

McChesney, Robert W. 1993. *Telecommunications,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The Battle for the Control of U. S. Broadcasting, 1928—193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Chesney, Robert W. 2004.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 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eehan, Eileen. 1993. Commodity Audience, Actual Audience; The Blindspot Debate. In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edited by Janet Wasko, Vincent Mosco, and Manjunath Pendakur, 378—397. Norwoo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eehan, Eileen R., Vincent Mosco, and Janet Wasko. 1993.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 Change and Continu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05—116.

Meinrath, Sascha D., James W. Losey, and Victor W. Pickard. 2011. Digital Feudalism: Enclosures and Erasures fro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to the Digital Divide. *Commlaw Conspectu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Law and Policy* 19: 423—479.

Mosco, Vincent.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 Los Angeles: SAGE.

Mosco, Vincent.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358—380. West Sussex: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Murdock, Graham.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09—127.

Murdock, Graham and Peter Golding. 1973.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Socialist Register* 10: 205—234. Accessed October 7, 2011. <http://socialistregister.com/index.php/srv/article/view/5355/2256>

Napoli, Philip M. 2010. Revisiting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Work” of the Audienc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2(3): 505—516.

Peck, Janice. 2006. Why We Shouldn't Be Bored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Debate. *Cultural Critique* 64: 92—126.

Sartre, Jean-Paul. 1968. *Search for a Method*. Translated by Hazel E. Barn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artre, Jean-Paul. 1976.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Volume I: Theory of Practical Ensembles*. Edited by Jonathan Reé.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Smith. London: NLB.

Schiller, Dan. 1996.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iller, Dan.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Schiller, Dan. 2007.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chiller, Herbert. 1989. *Culture, Inc. :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iller, Herbert. 1992.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2nd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Schiller, Herbert. 2006/1991.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 KeyWorks*, edited by 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295—310.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Smythe, Dallas.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1—27.

Smythe, Dallas.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120—127.

Smythe, Dallas. 2006/1981.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 KeyWorks*, edited by 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230—256.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Terranova, Tiziana. 2000.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63:33—58.

Terranova, Tiziana. 2009.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Prelude Part III (speech). Accessed March 29, 2012. <http://vimeo.com/6882379>

Vail, John. 2010. Decommodification and Egalitarian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38(3):310—346.

Wasko, Janet,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2011.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Core Concerns and Issue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1—10. West Sussex: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80a.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In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31—49. London: Verso.

Williams, Raymond. 1980b.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s Means of Production. In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50—63. London: Verso.

Williams, Raymond. 1982. Means of Produc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87—118.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Wood, Ellen Meiksins. 2002.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 A Longer View*. London: Verso.

米歇尔·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sup>①</sup>

##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sup>②</sup>

——萨拉·佩林的反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何明燊(译),左志(校)

[摘要]本文要点有三:批判地利用马恩著作来描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要旨;论证萨拉·佩林所谓的女权属于马恩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表明意识形态批判是研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学术工作。正如结论所示,这一学术工作应指导学者的政治活动。

[关键词]意识形态,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父权制度,堕胎,马克思,萨拉·佩林,政治运动,美国总统大选

### 一、前言

本期《认知传播协作》(TripleC)特刊,大体上探讨了卡尔·马克思著作中媒介批判和传播学之间的普遍相关性,以及马克思主义范畴对调查与干

---

<sup>①</sup>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女性研究系的副教授,专攻影视剧和媒体研究,主要教授媒体与文化课程。学术研究主要针对媒体、性别、女性主义、科技、意识形态、劳动力等概念,并致力将行动力融入学术研究中。多篇论文曾在《传播与批判的文化研究》(*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传播文化批判》(*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批判研究在媒体传播》(*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民主公报》(*Democratic Communique*)、《女性主义者媒体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and Society*)等期刊中发表。michelle@psu.edu,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园区,http://comm.psu.edu/people/mlr31

<sup>②</sup> 笔者感激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和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两位编辑对本文前几稿提出的真知灼见,也感谢顿雅·安图诺维奇(Dunja Antunovic)对本文研究作出的极大支持。



预那些斗争中知识和媒介内容生产的特殊相关性。它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气候危机所示的“末日”凶险(Žižek 2010)以及全球资本“日益集中,弱肉强食局势空前”(Eagleton 2011,7)的重要意义。看来,资本主义已陷入危机,但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屡见不鲜,因而,把当下的状态描述为一种常态的存在,而不是21世纪的新鲜事物,更为准确。然而,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过去的三个世纪,资全球资本集中的日益尖锐,除了适应社会发展和说明资本积累的残酷,也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犀利的批判理论。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最坏的时代(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危险时代),对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研究者而言它又是最好的时代。

对女性主义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如今,在“后女性主义”思潮下,新闻和娱乐媒体“感觉”认同了反抗性别迫害的政治斗争所获的成就,不过是要借此斥之为过时而已,女权主义媒体学者如今反而愿意替父权制度的辣手无情和持久力大做文章(Jill 2007, McRobbie 2004, Vavrus 2002)。伊格尔顿(Eagleton 2011)指出,女性主义所启发的分析和政治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所认知的一样,都是危如累卵的工作。<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者若非要带来资本主义的终结,至少希望见证这个终结,就好比女权主义,目的就是瓦解父权,即研究主题的终结。<sup>②</sup> 毕竟,世上穷人、文盲和难民,三分之二是女性,而无论在家或在工作岗位,无偿劳动者多为妇女。正是贫穷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的各种“护理工作”(如照料小孩和老人、打扫卫生和性工作),使第一世界的各种生活方式成为可能(Ehrenreich and Hochschild 2002)。在美国这个工业化程度最高而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女性主义似乎正受到所谓“后女性主义者”的媒体和文化,以及自诩为“女性主义者”的右翼女政客们所夹击。因此,现在除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之外,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恢复伙伴关系之时了。正如莉萨·麦克劳林(Lisa McLaughlin)在2002年所提出,以及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在2010

---

<sup>①</sup>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在提到女权主义者时并未做多少解释,因而出现在他一本有关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读起来像是个缺乏逻辑的结论:“如果20多年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仍然大有人在的话,那么这将会多么的遗憾啊。”(Eagleton 2011,2)

<sup>②</sup> 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 1978)认为,批判传播学者应该创造一切条件将资本主义陷入危机。

年(及近期出版)的开创性研究所阐明的那样,两者不必“联姻”,这个譬喻意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通过剖析莎拉·佩林(Sarah Palin)“女性主义”思想,以下分析将有助于健全或完整的女性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女性主义的回归。2010年,佩林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用平易近人的民粹主义口吻明确表明了反女权主义的观点和政策。乍一看,佩林的“女性主义”思想似是微不足道的竞选策略,不过是为赢得右翼妇女在中期选举的支持而设计。不过,但就像伊格尔顿(Eagleton 2011, 8)给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一样,以佩林为代表的女权主义恰恰显示了“狡猾”、“足智多谋”的反女权主义(最终表现为父权主义)的性质。作为反女性主义者的话语,佩林的女性主义(Palin's feminism)“做到”了改史以号正宗、强加过时错判之名给女性主义以自称合法,这与后女性主义——所谓自由和激进女性主义是相辅相成的(Douglas 2010)。与它对比,保守的佩林式女性主义(Conservative Palinite feminism)声称女性主义属于更大范围的右翼反对自由堕胎运动的一部分。2010年美国中期大举期间,至少有两位知名参议院候选人拥护女性主义,或被一个反对自主堕胎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推举为候选人。该委员会名叫苏珊·布朗·安东尼的名单(Susan B. Anthony List 或 SBA List, 下简称苏布安名单)。苏布安名单产生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是第一批支持反对自由堕胎的女性主义参议院候选人的集合。

除了希望为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作出一定努力,我还特别想强调莎拉·佩林的所谓“女性主义”如何与批判媒体传播学者的研究工作息息相关:佩林式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原理就是马克思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我最近分析的有关政治运动话语的文章(Rodino-Colocino, 即将出版)对此有所表述。该文观察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所作的概念化,抓住了佩林的女性主义的特征,后者正是通过颠倒女权政治的意义,去造福那些拥有巨大政治经济权势的精英。这观点值得进一步推究,原因如下: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运用到传播和媒体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举例来说,尼古拉斯·迦纳姆(Garnham 2000)认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尤其是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对它的细致分析,就是对“意识形态批判”的运用表现,契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下简称马恩)所描述“对任何可疑命题都毫不批判地肯定、置可疑命题于其保护伞下”的“意识形

态”(Garnham 2000, 140)。具体来说,“信息社会”理论认为“网络”(尤其是互联网)而非资本才是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驱动力,因而过高评估了科技作为促进生产力和个人财富而需要被引入的价值。<sup>①</sup>此外,“信息社会”理论具有政治经济影响力,和意识形态一样,影响物质生产。在美国乃至全球的政商两界都有发起举措,将“信息匮乏者”移转到“数字鸿沟”的“正面”(Sterne 2000,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95)。可是,不去处理诸如结构性失业等系统性问题的话,正如马克思所言,上述努力反而会一再导致“那畸形怪物,即劳动力后备军”,它“被保持在苦难中,就是为了随时受资本支配”。(Marx 1867, 314)

在《美国文化和政治中的控制与安慰——疗愈系修辞》(*Control and Consol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Politics-Rhetoric of Therapy*)一书中,黛娜·克劳德(Cloud 1998)就用马恩理论的意识形态概念,去批判作为慰藉之源的“疗愈系话语”被用来面对裁员、外包和减薪等情况。心理疗法自从20世纪之交普及以来,就把工人的不满、反抗精神、情绪和行动向内转移,转移到自我提升、个人责任和调整适应方面。这种疗愈系话语把资本主义关键的政治经济痼疾的责任归咎于工人个体和私人:实际上,问题在于企业主企图削减劳动成本以提高利润。特别以女性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的治愈系转变(therapeutic turn)为例,用慰藉替代政治经济补偿的“治愈系话语”最终“已经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疏导政治参与力的常见方法”(同上, xi)。这种“疏导方法”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以及其他迫害体制,比如说父权和白人至上主义。克劳德和迦纳姆的研究对传播媒体学贡献良多,而这门学问从事的研究有很多方面,包括分析马克思有关意识形态的第一手文本(Cloud 2001; Fuchs 2009, 2011; Hall 1985, 1986; Larrain 1982)、探讨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y critique)在传播媒体学的地位(Dorfman and Mattelart 1991; Garnham 1983; Golding and Murdock 1997; Goldman 1992; Kellner 1989, 1995; Mosco 1994; Murdock 1997; Smythe 1997)——特别是辩论传播媒体学太着重意识形态批判而忽略了商品生产过程的其他瞬间(Garnham 1979; Smythe 1997)、评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Aune 1994, Schatz 2004)以及对马克思理论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扩充和应用

---

<sup>①</sup> 通过分工、把工作去技能化或者加速的方式,信息和网络技术也可以获得额外的剩余价值,当然,信息和网络技术也同样是劳动的产物,也可以作为商品出售。

(Herman and Chomsky 1988, Ewen 1976, Mattelart 1991, Wernick 1991, White 1992, Williamson 1984)。①

尽管这些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误读也阻碍了它在批判媒体传播学当中的应用。所以,我们继续细读关于意识形态的马恩第一手文本,也是为了修正错误,并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在这一领域的复兴。举例来说,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就误读了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只不过是马克思有关意识形态大量论著中的其中一篇),霍尔以为马恩在说阶级地位和可产生意识形态的能力两者之间存在固定的对应。此外,霍尔错误地将马恩著作中对“统治思想”的简短描述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概念(Hall 1986, 31; Hall 1985, 97; Larrain 1991)。基于对概念的误读,霍尔呼吁概念化的意识形态“不必有固定的对应”(Hall 1985, 94),更普遍的是,正如他论文“马克思主义没有保证”的标题所示(Hall 1986)。② 因此,霍尔的误读,启发了批判媒体传播研究(Grossberg 1986; Lewis 1992; Makus 1990)。因此,作为批判传播媒体研究的工具,意识形态的概念需要更多修饰与彰显。

最后,仔细地分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或许会使读者感觉到,意识形态概念与其说在“回归”,不如说它的批判从未离开过。很多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的正是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cal critique)。就如克里斯汀·福克斯所说,德韦恩·温塞科(Dwayne Winseck)对唱片业修辞的分析“就在意识形态批判之中,甚至超过你的想象”(Fuchs and Winseck 2011, 262)。笔者怀疑自己的研究也比自己曾经认识到的“更在意识形态批判之中”。因此,我希望接下来能够鼓舞更多人去公开承认用马克思所论所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去研究媒体文化。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行存在于两个层面:思想上和政治上。这意味着马克思对媒体所在的意识形态批判,既见于其哲学作品又见于其新闻写作之中。马克思试图将他的批判理论推行至实践领域(“知行结合”)。从索尔·帕多弗(Padover 1974)翻译的马克思有关出版自由和出版审查的

---

① 媒体学和传播学的学者,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关键著作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其中包括阿多诺(Adorno 1997),阿多诺和霍克海默(Adorno and Horkheimer 1994)和马尔库塞(Marcuse 1972)的著作。

② 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解释称霍尔应该细读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写的《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学和意识形态》一书。

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贫困所做的调查性报道以及普鲁士新闻界对马克思的分析所进行的审查,将马克思彻底地推向左派,使他从自由民主派变成共产主义者(Rothman 1975)。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运动(activism)息息相关。他的名句“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Marx 1983,158)主张批判和政治运动(political action)之间的重要关系。史蒂夫·梅塞克(Steve Macek)解释说,马克思的名句意在强调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作为对政治斗争运动的启发,是如何重要的,而政治斗争运动又能进一步启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迦纳姆(Garnham 1983)也对此提过警惕,将洞察的结果付诸实践,使人免于从意识形态批判退步到理想主义当中。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对思想和政治的干预成效显著,从而是时候促成其概念和方法在批判媒体传播学的回归。借用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的口号,现在是时候要“占领意识形态”了。这样做的人除了要阅读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的马克思著作(包括马恩著作)之外,还要阅读他们并没有用上该字眼的著作。马克思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更是一名多产的作家。因此,用一篇文章综合总结马克思的作品并非易事。尽管如此,下文还是分析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段落,以探索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化过程。本文要点有三:批判地利用马恩著作来描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要旨;论证莎拉·佩林所谓的女性主义属于马恩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表明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暨女性主义学者的重要思想工具。正如结论所示,本文应能对学者在政治斗争运动方面有所启发。

## 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概念经营

### (一) 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概念化的意识形态的中心是一种扭曲的概念。不过这种特定的扭曲具备独有功能。马克思理论体系形成的早期(直到1844年),他发展了这种颠倒的理念,从而奠定他意识形态论的基础。<sup>①</sup> 在《黑格尔国家学说之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Doctrine of the State)(Marx 1992),他借用费尔巴

---

<sup>①</sup>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贯穿于马克思写作的三个阶段)的以下解读主要来源于乔治·莱尔因(Larrain 1991,1996)。

哈(Feuerbach)观点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论将国民当作“抽象的人”而不是“实在的人”(Marx 1992,98)。事实上,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化过程并非像本应该的那样“由现实的个体到国家”,而是“从国家到现实的个人”(同上,98)。乔治·莱尔因(Larrain 1991)说,马克思指责黑格尔不但颠倒现实,还把国概念从真正的人民(作为真正的主体)出现之处抽象出来,而不是反过来。于是马克思称为“人类活动”的东西(比如,人类历史,人类制作史),便“必然地被表现为外在于自身之某物的活动、结果”(马克思 1992,98)。把人类活动和现实人类存在表示为抽象的“观念”(“Idea”)的创造,使得黑格尔“颠倒主客观”,结果令“现实的人不经批判地成了观念的实现”(同上,98)。马克思认为这颠倒出自黑格尔的初衷“并非为了带来经验存在的真理性,而是真理的经验存在……通过这途径,神秘深邃的印象于是孵出了”(同上,99)。因此从马克思早期作品,包括上述段落,就能看到历史唯物观的端倪,主张“现实的”“经验存在”对历史的决定,是从地而上,而非从观念(抽象)而下的。

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又是一个错误。根据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读,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自行克服其自身矛盾(矛盾来源于私人利益冲突)并决定市民社会的发展(Larrain 1991; Marx 1992)。在概念化上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马克思认为:

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认为现象世界中的矛盾在本质中即是在抽象意识中是统一的。但是,还有更深的现实,就是基本矛盾。例如立法机构的矛盾本身只是政治国家的自我矛盾,即是社会的自我矛盾。(Marx 1992,158)

黑格尔认为抽象的观念决定存在,此立场颠倒现实。在此另一关键点在于:由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确是个抽象观念,因此黑格尔的颠倒源于现实而非源于误解;颠倒并非“纯粹的幻象”或是谬误(Larrain 1991,12)。莱尔因为强调这一点,而引入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应该受责备的,不是他对现代国家的本质的描述,而是他将其视为国家的本质。”(Marx 1992,126—127)马克思接着指出,“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如此断言,与不合理的现实相矛盾,后者往往与它断言的情况相反,还展现了具体是如何与之相反”(同上,127)。因此,黑格尔的颠倒所掩盖的是为私利服务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矛盾,其理论却受与之对立的观念所影响。黑格尔思想所掩盖的事实支持了国家的合法地

位,并阻止人批判国家的本质。

此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书中进一步解释颠倒如何运行操作,以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为基础指出,如果在宗教之中人类与上帝的关系颠倒,这不仅仅反映现实,还指出宗教作为补偿的不足。莱尔因(Larrain 1991)将马克思的观点总结为“人类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类”(Marx 1992,13,244)。在这句之后不远,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提法推论出“事实上,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这也就指出了意识形态所起到的补偿作用。马克思在此提醒读者“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换句话说,构成宗教的颠倒存在是现实的而非想象虚构的;宗教反映了这个人、国家和社会共存的颠倒世界。

此外,马克思还补充道,“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普遍理论……是对世间苦难的抚慰和辩护”,马克思强调意识形态作为不公义世界的征兆(或译症候)功能及补偿功能。尽管他表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也强调,“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没有灵魂的制度的灵魂一样。”(同上,244)宗教源于现实的苦难,由现实的矛盾所锻造,正如黑格尔的国家观念源于现实的颠倒,并掩盖了现实的矛盾。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同上,244)此外,解决宗教苦难需要现实的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做出现实的行动,不是只做哲学思辨。举例来说,要消灭想在基督教控制下人类对世界所产生的虚幻意识,需要人改变生活状况。诗意的说法是“废除宗教给予人们的虚幻幸福,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开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就是要求抛开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同上,244)马克思的想法与费尔巴哈恰恰相反,仅仅依靠真理无法使人自由。了解真理,受其启发,在现实世界采取行动,才有潜力使人自由。

## (二) 历史唯物论的“意识形态”

如此,构成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意识形态论,在上述早期作品中早有概要:人类创造思想,创造历史,因此,物质世界中的干预,改变物质世界。还有,资本主义下的物质世界中充满着导致苦难的矛盾,充满着乞求要通过干预去救治的矛盾。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通常指写于1845至1846的《德意志

意识形态》是“历史上首次提出唯物史观”(Larrain 1991, 16),甚至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有历史唯物论的“匆匆梗概略记”(Kumar 2006),但马克思更早的宗教批判(1843至1844)证明它们才是马克思批判现实感性世界的重要开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指出“宗教是苦难世界泪成河谷的灵光晕,宗教批判就是苦难世界批判的胚胎”(Marx 19992, 244)。①莱尔因(Larrain 1991)指此书理论在创造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中心性和物质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在哲学中找到了他们的思想武器”,“解放了作为人的德意志人”(Marx 1992, 256)。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早期阶段,批判的目的就是解放物质世界,从这个比喻中就可见一斑:“批判摘除装饰在锁链上的虚幻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戴这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摘除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同上, 244)。②

关于这一点,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996)批评青年黑格尔派把观念认作“人类的真正锁链”,“只不过在反抗这些意识的幻象”(Marx and Engels 1996, 41)。③因此,迫害的来源并非意识产物,而是现实物质世界的产物。所以,要得自由,必须行动。青年黑格尔派们只批判意念,不改现况(status quo),所以他们是“最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只辩论词句”,说白了“他们只是用一些词句来反对另一些词句”罢了(同上, 41)。无论他们的言辞如何“震撼”世界,最终“当他们抗争的仅仅是描述这个世界的词句时,他们将绝对不是在对抗现实存在的世界”,结果,他们的思想工作“只不过作出过有普适意义的发现”。黛娜·克劳德(Dana Cloud)指出,这段文字的重要性在于它强调了唯物主义修辞批判的重要性,“一方面解释了词句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突出了经济利益与迫害剥削体制之间的关系”(Cloud 2001, 7)。上述论据,在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Marx 1983, 158)时,被进一步充实,同时也是马克思在呼吁人在物质社会采取行动。④如此,马克思对人造与偶然的史提出了历史唯物论及其方法论。

① 德文 Jammertales 河谷的泪,见 [http://www.mlwerke.de/me/me01/me01\\_378.htm](http://www.mlwerke.de/me/me01/me01_378.htm) 第 379 节。汉译惯将诗意落实。——译者注

② 又译:铁链生幻花/朵朵批判摘/枷锁无趣慰/幻破绊应除/愿君脱旧镣/伸手采真葩。——译者注

③ 青年黑格尔派指的是继承和发扬黑格尔哲学观点的左翼普鲁士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 30 年代,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时也一度成为了黑格尔派中的一员。

④ 变字体以作强调出自原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除了对历史唯物主义有普遍意义之外,特别值得被注意的,是它对意识形态作为“暗箱”(camera obscura)的概念化过程。在以下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马恩(Marx and Engels 1996)讨论了人类与物质现实的关系,名为“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名为“交换”的生产关系,以及观念意识(idea):

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这些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Marx and Engels 1996,47)

换句话说,观念意识是人类的产物,但又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但是马恩之后又解释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质现实是十分谲诈狡黠的;它又是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产物,同时又生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颠倒现实。马恩对此论据的预言是,“如果在所有意识形态中,人与现实现象颠倒,那这种现象也是在人的历史生命过程中所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从人的物理生命过程中所产生的一样。”(Marx and Engels 1996,47)因此,正如黑格尔在描述资产阶级国家时所说,意识形态颠倒现实是因为现实的确是颠倒的。这是意识形态的关键构成,也正是这个构成,使意识形态在我们分析佩林的女性主义时,以及在分析其他代表颠倒世界的文化文物时,成为特别有效的工具(Larrain 1996)。

同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观点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意识形态仅仅来源于统治阶级。尽管马恩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一个阶级若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那么同时它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Marx and Engels 1996,64),马恩这个说法的意图是阐释物质存在决定观念意识的观点,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此外,马恩在此指的是“观念意识”,而非“意识形态”,但霍尔看来就是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点才把马克思意识形态论解读成意识形态源于统治阶级。(如此看来)这并不是马恩的主张。下文中,马恩在论述劳动分工时有很清晰地表述:

也是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形式,在统治阶级中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他们在这个阶级之中能把意识形态概念化,这些能者,以完善这个阶级关于自身的幻象,作为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这些意念概念和幻象,态度则比较被动和倾向于接受,因为现实生活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活跃分子,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象和意念……(Marx and Engels 1996, 65)

因此,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统治阶级中的“能把意识形态概念化”的人,包括像莎拉·佩林(Sarah Palin)这样的政治家。再者,如霍尔所说,意识形态内容也可能来自依附在任何阶级或阶级派系的个人或文化组织,这是因为马恩并没有指定意识形态的生产,与阶级要“有必然的联系”(Hall 1985, 1986)。除此之外,该文也指出,思想家只会在他们阶级内部不着边际的幻想,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对“阶级内部幻觉”这一概念做实际的解释。于是问题层出不穷: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去“完善关于”资本家作为社会中一个阶级的角色“的幻象”了吗?他们对工作环境、收入、公民权利和公开辩论(以及媒介体制)有控制程度有多大?在分析它时,务必要记得这些意识形态的元素,因为佩林的女性主义认为其对精英和非精英分子都有效。这样做也是因为它可能运载了掌握父权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关于他们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幻象,一些强化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协同关系的幻象。

### (三) 马克思成熟期作品中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后期作品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马克思将“现象形态”或显现(appearance, 又译“外貌”)与现实的关系或“本质”区分开来(Larrain 1991, 3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个层次互相矛盾,但又构成了物质现实(material reality)。因此,马克思提炼了他之前的论据,并使之变得更为复杂,他认为意识观念(idea)必然源于并反映物质现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性的实践是客观的,但对主观也具有能动性作用。举例来说,工资作为现实上的现象形态,对工人的劳动做出了补偿,但隐藏了工人并没有获得所有劳动时间该得的全部报酬的事实。工资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盈利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是“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例,是工人为资本家所付出的

相当于他所得的工资应付出的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所创造的价值。相差的就是剩余劳动,相当于工资的劳动就是必要劳动。剩余劳动越多,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要增加剩余价值,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时长或提高工作效率以扩大“绝对剩余价值”,或者通过缩短工人必要劳动时间去扩大“相对剩余价值”,即是劳动力贬值(Marx 1867)。这一切都没有反映在工人的工资或者商品的价格中。在《资本论》有关工资的章节当中,马克思(Marx 1867)说明: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工的酬劳表面上是劳动力的价格,即为一定的劳动支付一定量货币报酬,于是出现了劳动价值这个名词,并被称之为货币的必要价值或天然价值。劳动价值不但完全抹杀还反转了价值的意义。劳动价值和土地价值一样是个很虚的概念。这都是由生产关系本身所导致的。他们是本质的社会关系在现象层面的范畴。除了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科学,事物表象总是以颠倒的形态去表现事物本身这一概念早已广为人知。

我们来看一下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如何以工资的形式进行转化:

……劳动价值不过是劳动力价值的一种不合理的表达,故此,劳动的价值必然总是少于它所创造的价值,因为资本家总是使劳动力工作时间超过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工作日只有部分获得支付,但价值或价格看来是付给整个包括无偿劳动的工作日……于是,工资的形态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因而都显现成有酬劳动。(Marx 1867,373—375)

工资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成功在于,它掩盖了工人工作并非全部得到支付的这一事实。“工资”的概念所基于的价值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所作出的本质性颠倒,就是认为“价值”具有自然属性,可以简单地由“价格”所反映。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谓的“价值”先天并不具有固定价值,而是通过按照工时付给工人工资以隐藏工人额外的无酬劳动所产生的。因此,马克思指出:

……货币关系掩盖了受薪工人的无偿劳动。为此我们要了解劳动

力的价值和价格被转化成工资形态或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的关键。货币关系这个现象形态,隐藏了社会关系的本质形态,实际上令其以相反的方式呈现出来。它是工人和资本家的法权意识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被神话化过程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中自由幻象的基础、以及庸俗经济学家辩护遁词的基础。(Marx 1867,375)

贯穿《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通那些看似自然、“真实”的现象来隐藏其内在机制的矛盾。于是他探讨了工人卖给资本家的“生产力”如何“表现为像是被大自然赋予了的伟大力量,一种内在于资本而有生产属性的力量”(Marx 1867,228)。在这分析之前,马克思探讨货币的转变和流通的“两个互相对立的阶段”,即是货币转变成商品以及商品经“销售”变回货币。马克思同时还强调现象也是构成现实的一部分,并总结出资本主义的现实运作公式——“货币——商品——货币”,该公式在货币商品流通层面表现得十分明显(同上,106)。现象、困惑、神话(mystifications,或译“玄虚”)和物质现实一样,贯穿整部《资本论》,该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开货币之谜”(同上,33)。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恩格斯编)也提供了对资本主义下的意识形态有用的解释。以下有关“竞争”的讨论在不提及“意识形态”这类字眼的同时,带读者走过意识形态的动态过程,描述意识形态如何在资本主义中通过物质(生产)手段和话语(概念化)途径运行操作;涉及现实的(现象的)颠倒,去施行隐蔽(或神话化),又去施行正符号化,从而令资本主义得以运作(即让统治阶级受惠):

竞争并未表明主导生产运动的核心价值,以及隐藏在生产价格背后的价值。相反,竞争所显示的却是:(1)平均利润……(2)因工资水平变动而引起的生产价格涨落……(3)市场价格波动……所有这些现象,似乎与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相矛盾,也和剩余价值由无酬剩余劳动形成相矛盾。因此,在竞争中一切都显得颠倒。经济关系的最终形态在表面上、在现实存在中以及在概念表达上,与它们的内在本质、隐藏的核心形态,及其相应术语,都是很不同甚至颠倒的,这些关系的承载者和代理人都试图去把这搞明白、弄清楚。(Marx 1894,146)

马克思所谓的“商品崇拜”，或被广泛认知的商品拜物教，或许对意识形态理论做了最好的诠释，展示了他用成熟的历史唯物论批判现实现象形态是如何掩盖深层现实关系的。在此不提“意识形态”字眼的马克思，解释商品的意识形态地运作如何掩盖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力（以及商品构成“固定劳动”）；商品看似有交换价值之物，它显现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将物生产成商品的过程中，资本家从诸多工人中榨取剩余价值），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处处表明商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是实在的现象形态，但商品隐藏人们之间更深的关系，也就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特别是对劳动力的剥削利用。将（有价格的）商品看成是货币价值的表现形式这种误解，神化了价值生产的过程，用价格代表等价交易，为资本生产过程涂上号称平等的亮漆。盈利看来是源于赚取的货币比创造商品的成本为多，它看来单纯是成本价值和出售价格之差，而不是源于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即是可以利用剩余劳力和必要劳动力的比例计算出来的价值。将商品看成货币交换之物，也就是对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关系的颠倒。对“商品”，马克思的解释是：

它之所以神秘，是因为人的劳动的社会性通过商品以一种贴上了劳动的客观性标签展现出来。因为生产者与劳动力总和的关系并非以存在于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而是以存在于劳动力创造的产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Marx 1867, 46—47）

统治阶级的资本家通过把生产关系平等与合法化的方式，并对商品盲目崇拜，从而使他们获利。马克思把“商品崇拜”比作一种资本主义崇拜的形态，并借此回溯到他早期的宗教批判：

为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比喻，我们必须去追索误受宗教迷惑的区域。在那里，人脑的产物显现成有生命的存在，进而影响人与人之间甚至是整个人类之间的关系。而在人手创造的商品世界也是如此。我将其称之为依附在劳动产品本身的“商品崇拜”，一旦劳动产品被生产成商品，它便出现了，所以它与商品的生产分不开。（Marx 1867, 47）

所以，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作为能把意识形态概

念化者去为资本家服务,神化了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从而使资本家获益,借此建立种种经济宗教。综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有关意识形态的元素,商品崇拜为我们解释了物质生产实践和语言如何扭曲、颠倒、隐瞒、辩护、弥补,并服务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果意识形态颠倒现实,这样子的现实需要被纠正,好让人们“摘取生命之花”以享受现实的解放。

表 1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元素

扭曲已经被颠倒的世界。资本主义被颠倒的生产关系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因此,关于意识形态,并没有“假”的东西。包括工资、竞争和商品崇拜。
隐藏政治经济矛盾。
为资本主义辩护、将之合理化。
承诺对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压迫提供补偿和慰藉。
为统治阶层的利益服务。
为统治阶层成员创造了一种有关自身的幻象。
意识形态批判促使反对资本家剥削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抗争运动,亦有可能得到后者的推动。

此外,马恩认为统治阶层并非意识形态的唯一来源,但是统治阶层成员及同盟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或能指出他们持有怎样的关于自身的幻象。最后,马恩认为,意识形态批判能启发(行动和抗争运动的)实践,以终结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迫害。以下讨论的佩林式女性主义,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典范例子;批判它,是强调根除资本主义父权协同迫害系统的必要性。

### 三、作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佩林式“女性主义”<sup>①</sup>

2010年5月14日,莎拉·佩林在一个反对自决堕胎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筹款早餐会上,作出所谓拥护“女性主义”的演讲,赞扬名为苏布安名单的组织“使妇女运动回归其根源”,其目标来自于“女权运动的先驱领袖……她们支持生命(pro-life,即是反对堕胎)……她们有人与你同名……她们还有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后者以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和反抗堕胎而闻名。在2010年11月发行的《心系美国》(America By Heart)中,佩林进一步与斯坦顿和安东尼拉关系,赞美她们是“妇女运动的先驱,付出巨大努力和经过不断冒险,才使女性的能受到与男性平等的认可”

<sup>①</sup> 见本章最后的表2。

(Palin 2010a, 140)。此外,斯坦顿和安东尼拥护“自然法则”和“大自然的上帝授权她们”的规律,这些做法也赢得佩林在书中的美言认可。佩林所引述和阐释的话,部门来自于 1848 年为女权而召开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之后所发表的《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佩林对该宣言的解读是,“最初的女性主义者并不认为男性是迫害者、女性是受害者、未出生的婴儿只不过是‘上帝的选择’”(同上,141)。佩林继续写道:“她们相信,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而作为上帝儿女的所有人,我们无论男、女、在子宫中的小姊妹,都被上帝授予爱和尊重”(同上,141)。根据佩林的说法,堕胎是非自然、反上帝、无人性和反女性主义的。

从意识形态角度讲,要探析佩林如何挪用苏布安名单式的女性主义,我们便必须对女性主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尽管对女权政治运动的历史进行完整阐述,以及说明对女性主义在定义上的争论,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在此分享一些与我们讨论相关的细节,确实是有益的。首先,在佩林声称令自己“感觉有种联系”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者当中,像苏珊·布朗·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这样的 19 世纪女性主义者,她们之所以努力争取女性的选举权,原因之一是希望停止婚内强奸。斯坦顿在 1868 年的报刊《革命》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要想帮助女性避免成为婚姻中“男性欲望的奴隶”,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争取女性的选举权和受教育权(Beisel and Kay 2004, 512)。这些目标相辅相成:制止婚内强奸要急切表达的是(通过扩大选举权)给女性在政治上赋权。斯坦顿和安东尼称堕胎为“谋杀婴儿”,她们这样做是要强调男对女施行性虐待的残忍后果、一个需要给女性赋权来避免的后果。其次,她们代表了美国 19 世纪女性运动中的一个支系,属于激进的、备受争议的一派,她们认为堕胎是丈夫强奸妻子“自然的后果”(Beisel and Kay 2004, 513)。为了争取女性选举权,安东尼和斯坦顿和当时其他的选举权争取者(suffragists)一样,也采用种族歧视和为原住居民争权的言论话语,并接受种族歧视者的赞助去组织活动。

若想对佩林的女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有更深的理解,需要对女性主义下定义,这个定义必须能够将它每段历史都包括在内,同时,定义也要找到它作为政治运动的根源。贝尔·胡克思(Hooks 1984)认为,从事女性主义的思想 and 政治工作,前提是对女性主义的意义要有共识。胡克思把女性主义描述为“制止性别压迫的运动”,该定义为交叉组别分析敞开大门,从而将种族、民族、性取向、能力和阶级都考虑在内。在这一定义之下,女性主义不必基于“平

等”、免于类似“跟谁平等”的无解问题,反而被理解成追求“制止性别压迫”的一项运动,而这就突出了运动具有建设性的目标。此外,胡克思的“女性主义”目标“并非仅仅为了造福某一女性群体、某一种族的或某一阶级的女性,也没有想要追求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的特权”(Hooks 1984,26)。这种对女性主义的定义,也可融入要激进地变革社会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挑战名为父权的统治系统,也对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有所贡献。因此,胡克思认为,“女性主义并非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能够被人对号入座的某种现成身份或角色”(同上,26)与其说女性主义是个形容词(概念描述),不如说它是个动词(行动力)。

作为政治运动,佩林式的女性主义似乎是被多种形容词定义所描述的运动。另外,根据史料记载的,它的所作所为实际违背了第一波“原始的女性主义者”的目标,但它却宣称继承了她们的传统。其实从佩林 2008 年竞选副总统的局势来看,就能瞥见 2010 年中期选举时佩林将拥护女性主义。这样说的理由之一是,共和党提名大会结束几天之后,否定女性主义的“异见女性主义者”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指出,佩林“代表一种爆发,它风格崭新、是男性化的美国女性主义”(Paglia 2008, para. 10)。第二个理由是,2008 年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的恶意采访问到佩林是否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佩林则作出了肯定的回答。(Gallagher 2010)

2010 年 5 月,莎拉·佩林在苏布安名单的演讲中描述了她所代表的女性主义,她认为这种精神要回归到(“男性化的”)美国边疆妇女,她们与美国东岸那种女性化了的、不正宗的女性主义者对比鲜明。34 分钟演讲刚刚过半,佩林向主办单位鸣谢,认为这里是“新保守女性主义者运动的家园”,催生了“保守女性主义身份的崛起”,但之后,她惋惜“太久以来,一提到女性主义这个字眼,很多人总会联想到某某东岸女子学院的教职员休息室,对吧?”佩林式的女性主义源于西部坚韧粗犷的边疆,因而与东部被动的学院派女性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我想提醒各位注意女性主义的另一个传统,一种西部女性主义,它受到我们先母们拓荒精神的影响,她们乘马车穿过荒野,然后定居家园。这些先驱母亲们坚韧自强,她们开辟边疆时所做的工作,和任何一个男人的工作一样有价值。因此,西部最早赋予女性选举权,甚至比东岸斯文城市的姊妹们,也许,更早搞正确了。这些女性的指甲下有泥土,她们照顾家庭、耕地种田、持枪打猎样样精通……这些女性,我们的



拓荒先母……热爱祖国,为了在荒野中的生计开辟与家庭生活而牺牲付出,到达了之前没有女人能够到达之处。想到这些,比如说像安妮·奥克利(Annie Oakley)等等的妇女她们那种坚韧持枪拓荒的女性主义,我感觉惺惺相惜。(Palin 2010b)

这样,佩林模仿“坚韧母亲”的声音和强悍的“母语”,来展现出一种“拿着猎枪拓荒的粗犷女性形象”,并且将自己与安妮·奥克利联系起来。以浓墨重彩如“西部”“拓荒”“边疆”“坚韧”“持枪”的形容词所描述的女性主义,与佩林所反对的“东岸”“斯文”(佩林甚至用法语口音故意误读“斯文”以强调此词)的女性主义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如此一来,佩林的女性主义成为了一种女性主义的身份形式,她们承诺(为被认为是“正宗女性主义者”的人)提供补偿,但并不追求“结束迫害女性”的政治目标,她们把女性主义看作是某种静态的生活方式或者头衔标志(品牌?),而不是将其看作是需要行动能力的政治运动。胡克思认为,即使这种生活方式看上去十分激进,比如说,给人一种“反文明”的感觉、甚至一种“女人主导世界,与男人老死不相往来”的奇怪格局,但是实际上,这种思想反而会使人“从改变世界的女权运动中转移注意力”(同上,26)。此外,佩林对苏布安名单大力赞扬,称其培养了“新保守女性主义运动”,其实是为了创造一种“新崛起的保守身份”,一种叫人回想起女性在西部荒野耕田育女时所分享的身份形象。

虽然美国拓荒女性从事体力劳动,但是她们并非都赞成给女性赋予选举权。安妮·奥克利就是如此。佩林将奥克利说成是“拓荒的女性主义”代表,即是比东岸姐妹们更早赢得(至少是更早享有)选举权的女性。其实不然:奥克利做了40多年的神枪手表演家、象征新一代自由女性,却并不赞成政府扩展女性选举权。她指出给予所有女性选举权可能带来负面后果,并因说出“如果只有好女人投票的话”而出名。(译者按:她才支持女性选举权)(Kasper 1992,213)。这位“小神枪手”(Little Sure Shot)不支持女性选举权运动,是因为它与“淑女形象不符”。那时,由激进派苏珊·布朗·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成立的全国妇女选举协会(National 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排斥男人;相反,由茱莉亚·沃尔德·豪威(Julia Ward Howe)和露西·斯通(Lucy Stone)成立的美国妇女参政权协会(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则欢迎男人加入。后者威胁要赶跑观众,并影响奥克利的表演活动(Riley 2002)。佩林曲解了安东尼和斯坦顿将“堕胎”视

为“杀婴罪”背后的原因,同时又对她们激进的立场缺乏了解(误解她们所出的激进报刊《革命》就更甬说了),因此,佩林把奥克利误认作美国早期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误读美国女性追求选举权的往绩,对历史的颠倒就如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所描述一般。此外,这种颠倒在现实中依然存在:最终佩林所支持的是资本家与父权合流的利益,而不是女性主义者的利益。

或许,比颠倒历史对女性运动更具反作用并更具危险性的,是佩林的对女性产生潜在迫害的政治理念。《心系美国》一书说她所谓的女性主义如何反“左派”,以及“左派”在她2008年竞选副总统时“根本搞不懂阿拉斯加州来的那个妞,在竞选之路上谈论宪法的第二修正案,谈小孩子(多多生育!),谈少靠别国能源以提高国家安全”(佩林2010a,137)。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讲,佩林的这些说法看上去好像“轻描淡写”,只是照搬她在苏布安名单筹款会的演讲,但实际上暗含许多政策,包括放松枪械管制,开放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等等;然而这些政策恰巧就是大多数女性极力反对的(Pew Research Center 2009; Saad 2009; Walsh 2008)。此外,佩林也反对通过国家补助为贫困家庭提供物质帮助。她反而支持用劳动所得税扣抵制度(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去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纳税负担;但是,这么做会对单亲母亲家庭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在美国,42%的单亲母亲家庭收入处在贫困线之下,这一数字是美国整体贫困人口比例的三倍。<sup>①</sup> 这样说来,佩林式女性主义指导下的政策不仅不会终结对女性的迫害,反而会剥夺女性的政治发言权,并且影响她们的经济状况。

佩林最为否定女性的政策取向,是她对堕胎的立场。在她看来,即使在强奸和乱伦的情况下,都不可以堕胎(Goldman 2008)。<sup>②</sup> 虽然她用上帝之名和基督教哲学去为女性维权、去跟男性共享平等(可是她承认男女有别),但她当表述她反对堕胎的立场时,又称之为真正“新”女性主义的有力体现:

把支持女性和支持生命当成两姊妹,是要告诉年轻的美国女性,她们可以应付意外怀孕,同时又能追求自己的事业和学习。令人奇怪的是,很多女性主义者似乎想要告诉这些年轻的女性,你们根本没法做到保住孩子和追求梦想两者兼得。她们传达了这样的信号:“女人,你没

① 同见:[http://www.issues2000.org/Sarah\\_Palin.htm](http://www.issues2000.org/Sarah_Palin.htm)

② 只有在危及母亲生命时,佩林才支持堕胎。

法二者兼得,因为你不够强、不够聪明。你没有能力。”而新女性主义告诉女性,她们是能干并且强大的。如果她们没法自己养孩子,那么给人收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新女性主义旨在为女性赋予更多的权力,让她们真正自决,而不是迫使她们选择错误决定。这既是出于同情,又让这些受惊的年轻女性明白,在不太理想的境况下供养子女时她们可以寻求帮助。(Palin 2010a,153)

这番阐述之后,佩林分享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因为她也经历过“不太理想的境况”下的痛苦抉择:在怀孕时,她得知自己的儿子特雷格患有唐氏综合症时也曾瞬间有过堕胎念想。不过她告诉自己,“上帝不会给我分配应付不来的事”。此外,“不太理想的”境况也包括未成年人怀孕,例如她十多岁的女儿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早孕经历。年轻未婚的布里斯托尔决心把孩子生下来“这条路并不好走却是正确的”(Palin 2010a,155)。然而佩林在讨论堕胎时,却忽略了强奸和乱伦。佩林常用“不太理想的境况”这个措辞来美化在各种悲剧下生儿育女的现实。在强奸和乱伦情况下禁止堕胎肯定是限制女性自决的自由、令女性失去权力的做法,而佩林式女性主义对此承诺补偿和慰藉的政治立场将可能进一步给女性造成压迫。

此立场也颠倒并误读了安东尼和斯坦顿有关女性选举权的言论,她们认为,男性对女性的性虐待“自然会导致”女性堕胎。回想当时她们发动女性主义并不是要给堕胎定刑,而是为了通过突出男性对女性施行性虐待的后果,来动员人们支持扩大女性选举权的倡议。当佩林声称安东尼和斯坦顿之所以同时维护女性和未生儿权益原因在于两者密不可分时,佩林忽略了安东尼和斯坦顿女性主义中关于女性受性压迫的根本因素。

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比如说苏珊·布朗·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认为,堕胎对女性来说极为不利。相反,她们认为,未生儿与女性之间的权益是息息相关的。(Palin 2010a,156)

佩林式女性主义扭曲了早期妇女选举权争取者对堕胎的说法,事实上,她们只是利用堕胎作为修辞上的权宜之计,去突出女性所受的性迫害,而不是提倡用法律限制堕胎。安东尼和斯坦顿想要通过扩大女性政治权利来加

强而不是减弱对自己身体的掌控。

此外,佩林又避重就轻地回避种族歧视、古典主义和优生学的观点,其实这些观点才是美国选举权争取者之所以反对堕胎或明或晦的基础。史料显示,安东尼和斯坦顿同意南北战争后医生们所明言的目标,即在移民潮和放宽入籍限制的大背景下,应该保障美国白种中产女性的生育能力。此外,虽然斯坦顿和安东尼并不支持将白人女性的堕胎刑事罪行化,却把堕胎喻为杀婴,原因在于她们害怕减少白人的堕胎会造成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权力旁落。在1868年的《革命》报刊中,斯坦顿这样写道:

不管是在出生之前还是出生之后,残忍杀害婴儿的例子随处可见,令人胆战心惊,医生们都说,若不是移民浪潮如此汹涌,美国的白种人口可能会大幅减少!(Beisel and Kay 2004,512)

斯坦顿的立场其实是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优生学”思想,当时,该思想鼓励富裕的白种女性多生多育,而引导贫困、少数民族和女性移民节育甚至堕胎。虽然佩林把控制生育运动(Planned Parenthood)的开创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单独挑出来说成是“早期女性主义者大多支持生命<sup>①</sup>中的一个例外”(佩林2010a,157),但是其实除了桑格之外,第一波女性主义者中也有人,比如说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和维多利亚·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提倡要政府通过对个人身体的控制,特别是对生育能力的控制,去防止某些“不适合”生育的人生育(Carpenter 2010;Perry 2005)。此外,伍德胡尔反对孕育“低能儿”,这与佩林的观点恰恰相反:佩林其实就是推崇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下”“生育”,正如她“决定”要生下她首胎那样。因此,从某些方面上讲,第一波女性主义者们提倡要不合格者节育,正好与佩林式的女性主义背道而驰,同时与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要将女性从性迫害中解放出来的理念前提,也背道而驰。佩林扭曲了已颠倒的女性主义,正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扭曲了已颠倒的经济制度。

反对白种人堕胎(正优生学)和提倡贫穷的南欧和亚洲移民女性堕胎(负优生学)的优生学论据,在动用种族歧视的同时再附加上“白人该得工资”的理念(Roediger 2007),这种理念认为身为白种人,特别是北欧白种人,

<sup>①</sup> 反对堕胎。——译者注

就是拥有文化权威,从而为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权力添加砝码。历史学家戴维·罗伊迪杰(David Roedgier)和亚历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也指出,即使是社会主义工会组织者,为了团结白人劳工,也会利用白人害怕会被中国工人夺取自身工作机会而产生的恐惧。综合以上各点,再加上佩林对移民所持的倒退立场(她支持亚利桑那州的“法案请求”[SB 1070],即要求貌似移民者携带移民证件)(Condon 2010; Palin 2010a),莎拉·佩林的女性主义可以说是替今日保守妇女更新了“白人应该享有工资”这个理念。

佩林式女性主义对父权资本主义的支持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她反对政府直接救济补贴贫困家庭,并限制自决堕胎,她用“女性主义”话语为自己政策辩护,但这些政策措施其实使美国的贫穷女性沦为廉价劳动力来源,只能什么工作都做。这样,佩林的政策和辞令维持“产业后备军”历久不衰,马克思称之为榨取剩余劳动的关键(Marx 1847, 1867),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关键。那些政策也在支持父权制度:无法获得国家扶持的贫穷女性急切要工作,或者嫁人,因为男性比女性薪资要高,这就反映出全球贫困差距,贫穷线以下的美国人三份二是女性。而拉丁裔和非裔美国女性生活在贫穷家庭的几率是白人女性的两倍,使她们更有压力去工作(Kendall 2010)。佩林的“女性主义”以否定女性的自决选择权去促进父权制度,不让女性享有男性无需考虑的生殖权利(正如最近某法律草案所示, Gumbrect 2012),并且可能令女性在经济上更为脆弱。所以说,佩林式女性主义支持的政策就是被马克思(Marx 1867)称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经济上死板地强制劳动者完全受制于资本家”那种政策。由于佩林的政策和辞令使女性劳工(包括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女性)受限制,因此她的“女性主义”强化了性别迫害。

此外,佩林的女性主义也支持由资本家科赫兄弟(查尔斯·科赫和戴维·科赫,科氏工业集团的所有人和管理者,业务主要为能源勘探和日用消费品)资助的竞选者进行选举活动。作为富豪排行榜的第四和第五把交椅,科赫兄弟笼络了佩林和新保守派反对自决堕胎的参众两院候选人。2010年,两兄弟赞助了190万美元给莎拉·佩林雇用的议长办公室,还捐款190万美元给茶党快线(Tea Party Express)去支持新保守主义和反对自决堕胎的“灰熊妈妈”候选人,包括安吉尔(Angel)、巴克曼(Bachmann)和欧堂内(O'Donnell)(Good 2010, Loder and Evans 2011, Mayer 2010, Vogel 2011)因此,虽然佩林以鼓动“指甲下有泥土的”女性自居,但她的“女性主义”所反映的政策目标属于富有的父权掌握者。如此,佩林式女性主义反而为我们提

供洞见,让我们看清富豪父权者,对于自身作为一个阶级,持有怎么样的幻象。更具体地,它也描绘出莎拉·佩林替资本家、掌握父权者,以及两者协同所做的工作,一份“能概念化意识形态”的工作。

表 2 比较马克思理论和佩林式女性主义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元素	作为意识形态的佩林式女性主义
扭曲已经被颠倒的世界。把现实中已颠倒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颠倒的方式表述出来。故此,关于意识形态,并没有“假”的东西。包括工资、竞争和对商品的癖好崇拜。	佩林式女性主义扭曲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颠倒后者对堕胎的批判;同时掩盖后者中的优生论者要求被认为是在种族上、经济上精神状态上“不合格”的人节育这种谬论的颠倒性。扭曲安妮·奥克利在女性选举权方面的立场:奥克利反对将选举权赋予所有女性。
隐藏政治经济矛盾。	女权运动是反抗性别歧视造成的迫害,而资本主义依赖父权制度而生存;佩林式女性主义隐藏了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的矛盾。
为资本主义辩护、将之合理化。	将迫害女性的性别歧视合理化(佩林式女性主义通过它自诩跟“正宗女性主义”的联系去剥夺女性在生育方面的权利);为那些不受女性欢迎并影响女性经济状况的政策辩护、将之合理化。
对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迫害,承诺提供补偿和慰藉。	佩林式女性主义自诩为“正宗的女性主义”,承诺要对在父权制度和资本主义之下受到剥削的女性提供补偿和慰藉(要求女性即使在强奸和乱伦情况下也不得堕胎;支持那些忽视女性权利并危及女性经济状况的政策);承诺为当今保守妇女提供与时俱进的“白人应得的工资”。
为统治阶层的利益服务。	支持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赖以维生的保持“劳动力后备军”政策(使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在低工资行业做低薪工作,同时使婚姻对女性比离婚更经济更有吸引力)。佩林的竞选活动和她的“灰熊妈妈”竞选团队得到富有的资本家的大力资助。
属于统治阶层的“能把意识形态概念化者”为统治阶层成员创造了一种有关自身的幻象。	佩林式女性主义指示出这样的一种幻象,一种作为“有概念化能力的意识形态家”的佩林以及她的支持者(苏布安名单的组织者以及像科赫兄弟的富豪赞助人)关于自己在女性政治史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的幻象;佩林式女性主义并非草根哲学。
意识形态批判一方面启发反对资本家剥削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抗争运动,而另一方面亦有可能得到抗争运动的启发。	以停止性别迫害为目标的女性主义运动,看到人批判了佩林式女性主义,能受到启发,而运动本身亦有可能启发人对号称“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作出批判。

## 四、结 论

本文把莎拉·佩林式的女性主义辨析为马恩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下,通过颠倒已经被统治系统所颠倒的现实,佩林式的女性主义对女权统治进行合理化,从而掩盖和弥补这种统治对女性(包括非白种的)和非政治经济精英(包括男性)的支配,并为统治阶级(富有的资本家)的利益服务而已。佩林式的反女权主义的女性主义,代表了父权资本家们及其代表与同盟成员的幻象。毕竟,佩林所代表的“女性主义”,说到底既不“正宗”亦不“原始”,仅仅是个被父权制度扭曲颠倒的版本,谈不上是“后女性主义”日渐入侵的证据。本文借用苏珊·道格拉斯(Douglas 2010)对后女性主义的滑稽解释,把佩林式女性主义称为对甲级老派父权有强化作用的旧式性别歧视(同上,10)。至少有一个民意调查显示,男性比女性对佩林重男轻女的所谓“女性主义”更有共鸣(Stan 2010)。佩林主义透过土腔阿拉斯加口音和招牌递眼色动作来操作,是旧式老派的父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了解意识形态原理,有助于媒体传播批判学者提出更有效的批判,以及反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即物质现实本身才采取的行动,从而避免像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说的“用词语反对词语”(Marx and Engels 1996,41)。因此,该分析所提出的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媒体传播学者如何对资本父权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中作出干预,以阻止在它旗帜下制定的相应政策?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推动改革和变化,从而将妇女和劳动者从枷锁中解放出来?

我们从这篇分析文章中可以得出,空想家往往用能够将历史美化的手法改写历史,他们想象女性主义的历史并不必关乎种族歧视或中产白种妇女的生育能力。去重提这段历史、宣传它的存在,也许正是马克思主义暨女性主义学者的一大思想工作。要这样做,除了要出论文和开课之外,也要凭借公共学术活动(与非学界受众去分享学术成果)。资本父权合流史,正如海蒂·哈特曼(Hartmann 2010)所指那般,也要被如此重提。工薪一族这个工会的推动者在过往数十年已被消灭,可是父权意识形态似乎仍在孜孜不倦地重提所谓男性白人应该享有的工资。还有什么其他文本、图像和话语是在如此运作的?媒体传播批判学者已经就绪,要好好地把这些动因剖析一番。

这种批判还应该突出这段历史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维度,改变历史的时机已经成熟,而这段历史只会因为受到多重压迫的人们(种族、民族、入籍情况、阶级、性别、性取向和能力)团结才能得以改写。从某种意义上讲,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借用了女性主义者提高权益意识的方法而展开的(Rogers 2011)。除此之外,思想和政治两方面的工作又如何得以互相启发呢?传播与媒体的批判学者如何利用意识形态批判启发人政治行动?正如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关键是去改变世界”所示,随着学者成为政治行动家而在学术上拥护政治行动,意识形态的批判也会愈加鞭辟入里(Cloud 2011; Macek 2006; Rodino-Colocino 2011)。或许,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在哲学中找到“思想武器”。最后笔者借用马克思在批判宗教时所用的(Marx 1992, 244)说法呼吁学者去采取行动,不仅是为了以颠覆意识形态去揭示“真理”,而且是为了要颠覆“那需要幻想的处境”。

### 参考文献:

- Aune, James Arnt. 1994. *Rhetoric & Marx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Beisel, Nicola and Tamara Kay. 2004. Abortion, Race, and Gender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498—518.
- Carpenter, Cari, ed. 2010. *Selected Writings of Victoria Woodhull: Suffrage, Free Love, and Eugenic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Cloud, Dana. 2011. The Only Conceivable Thing to Do: Reflections of Academics and Activism. In *Activism and Rhetoric: Theories and Contexts for Political Engagement*, edited by Seth Kahn & JongHwa Lee, 11—24. New York: Routledge.
- Cloud, Dana. 2001. The Affirmative Masquerade. *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 4 (3): 1—12.
- Cloud, Dana. 1998. *Control and Consol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Politics*. Thousand Oaks: SAGE.
- Condon, Stephanie. 2010. Palin: Obama Doesn't Have the 'Cojones' for Immigration Reform. CBS News, August 2. Accessed April 8, 2012. [http://www.cbsnews.com/8301—503544\\_162—20012319—503544.html](http://www.cbsnews.com/8301—503544_162—20012319—503544.html)
- Dorfman, Ariel and Mattelart, Armand. 1991. *How to Read Donald Duck: 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Disney Comic*, translated by David Kunz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 Douglas, Susan. J. 2010. *The Rise of Enlightened Sexism: How Pop Culture Took us from Girl Power to Girls Gone Wil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Eagleton, Terry. 2011. *Why Marx was Righ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hrenreich, Barbara and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2002. Introduction. In *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edited by Barbara Ehrenreich and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1—13. New York: Henry Hold and Company, LLC.

Ewen, Stuart. 1976.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McGraw Hill.

Foust, Christina R. 2004. A Return to Feminine Public Virtue: Judge Judy and the Myth of the Tough Mother.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27(3): 269—293.

Fuchs, Christian. 2010. Grounding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Karl Marx.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4(1): 15—41.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Studies: Reflections on Karl Marx and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369—402.

Fuchs, Christian, and Dwayne Winseck. 2011. Critic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day. A Conversation. *TripleC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9(2): 247—271.

Gallagher, Maggie. 2010. Sarah Palin's Girl Power. Real Clear Politics, May 5. Accessed March 17, 2012 [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0/05/20/sarah\\_palins\\_girl\\_power\\_105650.html](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0/05/20/sarah_palins_girl_power_105650.html)

Garnham, Nicholas. 2000. Information Society as Theory or Ideology: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2): 139—152.

Garnham, Nicholas. 1983.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314—329.

Garnham, Nicholas. 1979. Contributions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2): 123—146.

Gill, Rosalind. 2007. Postfeminist Media Culture: Elements of a Sensi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0(2): 147—166.

Golding, Peter, and Graham Murdoch. 1997. 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 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Volume I*, edited by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 476—506. Brookfiel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Goldman, Robert. 1992. *Reading Ads Socially*. New York: Routledge.

Goldman, Russell. 2008. Sarah Palin Explains Abortion Stance, Explains 'bridge to nowhere' Support. *ABC News*, September 12. Accessed April 6, 2012. <http://abcnews.go>

com/Politics/Vote2008/sarah-palin-defends-abortion-stance-explains-bridge-support/story?id=5787748#.T3dNCxxSupw

Good, Chris. 2010. Sharron Angle Gets a Tea Party Bump. *The Atlantic*, May 14. Accessed April 12, 2012.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0/05/sharron-angle-gets-a-tea-party-bump/56741/>

Grossberg, Larry. 1986. History, Politics and Postmodernism: Stuart Hall and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61—77.

Gumbrecht, Jamie. 2012. Georgia Democrats propose limits on vasectomies for men. CNN, February 21. Accessed April 6, 2012 <http://news.blogs.cnn.com/2012/02/21/georgia-democrats-to-propose-limitations-on-vasectomies-for-men/>

Hall, Stuart. 1985.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2): 91—115.

Hall, Stuart. 1986. The Problem of Ideology: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28—44.

Hartmann, Heidi. 2010.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Marx Today: Selected Works and Recent Debates*, edited by John F. Sitton, 201—22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Herman, Edward. S., and Noam Chomsky.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Hooks, bell.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Jetter, Alexis, Annelise, Orleck, and Diana, Taylor. 1997.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Activist Voices from Left to Right*.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Kasper, Shirl. 1992. *Annie Oakle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Kellner, Douglas. 1989.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Kellner, Douglas. 1995. *Media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Kendell, Diana. 2010. *Sociology in Our Times: The Essentials*. Belmont: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Kroll, Luisa and Kerry A. Dolan. 2011. World's Billionaires 2011: A Record Year in Numbers, Money and Impact. *Forbes*, March 9. Accessed April 6, 2012. <http://www.forbes.com/2011/03/08/world-billionaires-2011—intro.html>

Kumar, Deepa. 2006.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Relevance of Marx's Dialectical Method. In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edited by Lee Artz, Steve Macek and Dana Cloud, 71—86. New York: Peter Lang.

- Laclau, Ernesto.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Verso.
- Larrain, Jorge. 1996. Stuart Hall and the Marxist Concept of Ideology. I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47—70. New York: Routledge.
- Larrain, Jorge. 1991. *Marxism and Ideology*. Vermont: Gregg Revivals.
- Larrain, Jorge. 1982. On the Character of Ideology Marx and the Present Debate in Britai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1): 5—22.
- Lewis, Charles. 1992. Making Sense of Common Sense: A Framework for Tracking Hegemon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9(3): 277—292.
- Loder, Asjylyn and David Evans. 2011. Koch Brothers Flout Law Getting Richer with Secret Iran Sales. *Bloomberg*, October 3. Accessed April 12, 2012.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10-02/koch-brothers-flout-law-getting-richer-with-secret-iran-sales.html/>
- Macek, Steve. 2006. From the Weapon of Criticism to Criticism by Weapo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Marxism,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edited by Lee Artz, Steve Macek and Dana Cloud, 217—242. New York: Peter Lang.
- Makus, Anne. 1990. Stuart Hall's Theory of Ideology: A Frame for Rhetorical Criticism.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4): 495—514.
- Marx, Karl. 1847. Wages. Accessed April 8,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7/12/31.htm>
- Marx, Karl. 1894. *Capital Vol. III*, edited by Frederick Engels. Accessed April 8,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c3/index.htm>
- Marx, Karl. 186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Accessed April 8,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
- Marx, Karl. 1992. *Early Writing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and Gregor Bent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Marx, Karl. 1983.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Portable Karl Marx*, edited by Eugene Kamenka, 155—158.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ederick Engels. 1996. *The German Ideology*, edited by C. J. Arthu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attelart, Armand. 1978.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s Practice in a Dependent Societ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5: 13—34.
- Mattelart, Armand. 1991. *Advertising International: The Privatisation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Routledge.

Mayer, Jane. 2010. Covert Operations: The Billionaire Brothers Who are Waging a War against Obama. *The New Yorker*, August 30. Accessed April 8, 2012.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0/08/30/100830fa\\_fact\\_mayer](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0/08/30/100830fa_fact_mayer)

McLaughlin, Lisa. 2002.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Linger Moments i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In *Sex &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edited by Eileen R. Meehan and Ellen Riordan, 30—4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cRobbie, Angela. 2004. Post-Femi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Feminist Media Studies* 4(3): 255—264.

Mosco, Vincent.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Thousand Oaks: SAGE.

Murdock, Graham. 1997.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Volume I*, edited by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 465—475. Brookfiel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Padover, Saul, K., ed. 1974. *Karl Marx: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Censorship*. New York: McGraw-Hill.

Paglia, Camille. 2008. Fresh blood for the vampire. *Salon*, September 10. Accessed March 17, 2012. [http://www.salon.com/2008/09/10/palin\\_10/](http://www.salon.com/2008/09/10/palin_10/)

Palin, Sarah. 2010a. *America by Heart: Reflections on Family, Faith, and Flag*.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alin, Sarah. 2010b. Sarah Palin Remarks on Pro-Life Agenda. *C-Span Video Library*. Accessed April 8, 2012. <http://www.c-spanvideo.org/program/LifeAg>

Perry, Michael. 2005. *Lady Eugenist: Feminist Eugenics in 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Victoria Woodhull*. Seattle: Inkling Books.

Parry-Giles, Shawn, J. and Trevor, Parry-Giles. 1996. Gendered Politics and Presidential Image Construction: A Reassessment of the 'Feminine Styl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3: 337—353.

Public Takes Conservative Turn on Gun Control, Abortion. 2009. *Pew Research Center*. Accessed March 31, 2012. <http://www.people-press.org/2009/04/30/public-takes-conservative-turn-on-gun-control-abortion/>

Riley, Glenda. 2002.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nnie Oakle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Rodino, Michelle. 2005. War Mothering. *Feminist Media Studies* 5(3): 380—385.

Rodino-Colocino, Michelle. "Man Up," "Woman Down," "Mama Grizzlies," "Feminism," and Tree House Politics. *Women & Language* (forthcoming).

Rodino-Colocino, Michelle. 2011. Getting to “not especially strange”: Embracing participatory-advocac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or soci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1699—1711. Accessed April 12, 2012. <http://www.ijoc.org/ojs/index.php/ijoc/article/view/1299/644>

Roediger, David. 2007.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erso.

Rogers, Stephanie. 2011. What Occupy Wall Street Owes to Feminist Consciousness-Raising. *Ms. Magazine Blog*, December 13. Accessed April 8, 2012. <http://msmagazine.com/blog/blog/2011/12/13/what-occupy-wall-street-owes-to-feminist-consciousness-raising/>

Rothman, Stanley. 1975. Marx the Journalist.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uly/August: 57—58.

Saad, Lydia. 2009. Before Recent Shootings, Gun-Control Support was Fading. Gallup. Accessed March 31, 2012. <http://www.gallup.com/poll/117361/recent-shootings-gun-control-support-fading.aspx>

Saxton, Alexander. 1971.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atz, Thomas. 2004. *Hollywood: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Single Mother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0. 2011. Legal Momentum, September 15, The Women’s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Accessed April 30, 2012. [http://www.ncdsv.org/images/LM\\_SingleMotherPovertyInTheUS-2010\\_9-15-2011.pdf](http://www.ncdsv.org/images/LM_SingleMotherPovertyInTheUS-2010_9-15-2011.pdf)

Smythe, Dallas. 199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Volume I*, edited by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 438—464. Brookfiel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Sparks, Colin. 1989. Experience, Ideology, and Articulation: Stuart Ha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3(2): 79—87.

Stan, Adele, M. 2010. Sarah Palin’s Brand of ‘Feminism’ More Popular with Men than with Women. AlterNet. Accessed April 8, 2012. [http://www.alternet.org/news/148976/sarah\\_palin%27s\\_brand\\_of\\_%22feminism%22\\_more\\_popular\\_with\\_men\\_than\\_women/](http://www.alternet.org/news/148976/sarah_palin%27s_brand_of_%22feminism%22_more_popular_with_men_than_women/)

Sterne, Jonathan. 2000. The Computer Race Goes to Class: How Computers in Schools Helped Shape the Racial Topography of the Internet. In *Race in Cyberspace*, edited by Beth Kolko, Lisa Nakamura and Gil B. Rodman, 191—212. New York: Routledge.

Triece, Mary. 2012. Credible Workers and Deserving Mothers: Crafting the “Mother Tongue” in Welfare Rights Activism, 1967—1972. *Communication Studies* 63(1): 1—17.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1995.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the "Have-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 Accessed April 19, 2012.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fallingthru.html>

Vavrus, Mary. 2002. *Post feminist News: Political Women in Media 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Vogel, Kenneth p. 2010. Face of the Tea Party is Female. *Politico*, March 26. Accessed April 8, 2012. <http://www.politico.com/news/stories/0310/35094.html>

Walsh, Bryan. 2008. Palin on the Environment: Far Right. *Time*, September 1. Accessed April 6, 2012. <http://www.time.com/time/politics/article/0,8599,1837868,00.html>

Wernick, Andrew. 1991. *Promotional Culture: Advertising, Ideology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Thousand Oaks: SAGE.

White, Mimi. 1992. Ideological Analysis and Television. In *Channels of Discourse, Reassembled* (2<sup>nd</sup> edition), edited by Robert C. Allen, 161—202.

Williamson, Judith. 1978. *Decoding Advertisements: Ideology and Meaning in Advertising*. New York: Marion Boyars.

Žižek, Slavoj. 2010.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Verso.

杰拉尔德·苏斯曼(Gerald Sussman)<sup>①</sup>

## 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sup>②</sup>

戴瑜慧(译),吴畅畅(校)

[导读]作者曾在菲律宾待过9年,深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三座大山的交叉压迫,并致力于跨学科研究,以纵横都市研究、传播研究与意识形态研究进行拆解。其博士论文即以菲律宾电信制度的转变为题,*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lecommunication Transfer: Transnationalizing the New Philippine Information Order*,1983。

除了第三世界研究之外,作者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行分析。此篇文章即为作者近年主要研究主题——Propaganda State的一部分。2011年主编*The Propaganda Society: Promotional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Global Context*,以及2010年主编*Branding Democracy: U. S. Regime Change in Post-Soviet Eastern Europe*。上述研究对象以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透过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同时考察,方能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脉络性的体检,这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析方法。

作者历史性的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去工业化、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以及新自由主义兴起历经的变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重心已从制造业移向服务业,此番转型使推销与宣传上升为生产的核心要素,转向以推销为核心的经济形态(promotional economy)。

过去35年,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营销经济的崛起,销售成为最主要的文

---

① 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学院。

② 作者向 Sy Adler and Evguenia Davidova 为此文初稿提出意见评论表达感谢。

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销售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可见的商品到抽象的公共政策。营销经济的崛起非但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和关于剥削与异化的讨论过时,相反,营销劳动这个概念的出现,反而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全球经济的中心。“剥削的深化”体现在正式与非正式劳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面临持续瓦解的趋势。

同时,营销经济强调从“宣传”到“系统性宣传”的转变。宣传(propaganda)是指为了国家或企业的利益,将设计过的文本内容,以各种媒体形式,如声音、影像、印刷制品等进行宣传。系统性宣传(systemic propaganda)则是指推销行为在全社会领域的扩大渗透,包括:国内与国际事务、政策推广、对各种商品、服务乃至社会机构的宣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利用社会心理学的诱因让人们自我商品化(例如对符号、标志、消费习惯、商品文化的认同采用),以及甘于在非正式劳动状态下,为商家在产品制造过程中自愿提供免费或廉价劳动力的“产消合一者”(prosumer)。

流通领域成为财富制造的最重要环节。在营销经济时代,生产的重心集中在推动商品于海内外的营销以及透过监看搜集消费者的资料,保持商品宣传的火热。首先,在服务业领域的剥削不是去工业化,而是超级工业化。过去福特主义时代劳动者不需要肩负营销任务,拉抬业绩。但在营销经济模式下,资本增加了对劳动者的劳动要求,例如连锁店的柜台工作人员,被规定要向消费者反复诵念刺激销售的台词。同时出现“产消者”(Prosumer)这一新概念,旨在打造一批因为对商品产生心理认同,而愿意付出劳动的认同劳动力(identity labor)。

新自由主义的扩散以及数字传播的发展,使得消费者也越发被当作生产要素,整合进生产过程中。过往对劳动者的定义是创造交换价值,但在当代的营销经济体制下,不管是从中国的血汗工厂到美国的商品销售网点以及最后的消费行为,沿途都布满了各式对消费者的监看和交互式传播设计。

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已将劳动从个人的工作范围一路延展到社会领域和私人生活,将整个社会转变为一个大的生产“工厂”,而消费行为也从个人行为扩张到几乎囊括整个社会的组织性消费(Lazzarato 1996)。在营销经济时代,此刻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劳动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生产了整个国家的财富,据此也更有合法性要求拥有政治权力。

传播媒体虽能够襄助资本主义维持意识形态控制,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异议者也同样可以运用传播科技进行对抗,瓦解资本主义的宰制,例如



维基解密将政府刻意隐藏的信息曝光于世、大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日益蓬勃的另类媒体发展、黑客以入侵对抗媒体垄断的财产权、反对广告运动、占领社交媒体等等各式媒体抵抗行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产消合一者,劳动者

## 一、前言

当生产越多地依靠交换价值的兑现,保证交换领域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也就越发重要,各种传播手段与交通就成为推动商品流通的必要成本。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超克时空的障碍,发展各式传播和交通技术,以时间消灭地理空间造成的流通迟缓,对资本主义极为重要。(Karl Marx 1973)

“我们全都是工人”——Levi's 广告

在实践的道路上行走时,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如何将马克思敏锐的分析逻辑活化应用于当代社会的劳动过程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本文将援用马克思主义的媒体研究方法,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大众意识与劳动者的抵抗意识,特别是辩证的分析媒体产业的双重性,亦即媒体产业一方面作为下层结构,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一环;另一方面却又是对社会具有强大影响的宣传系统。媒体一方面产制一国对内对外的统治合法性,但这过程本身却也隐含着致命的矛盾,在制造合法性的同时,却也同时加深劳动者的抽象化、异化和非人性化,而这一切最终将毁灭其制造出来的合法性基础。主流媒体以其积累能力、说服力与种种功能支持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特别是日益以推销为核心的经济形态(promotional economy)。但这些华美宣传与庞大的叙事,虽看似强化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却也辩证的使其弱化,难以继续自我存续以及面对未来的挑战。在数字科技的襄助之下,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的迈向国际化与自动化,也对资本积累形态与劳动处境造成剧烈的变动,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对此番历史巨变进行理解探索的最适研究取径。

本文将追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讨论的四个理论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以及援用这些理论解析当代资本主义形态。奠基于对美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观察(劳动者在制造业的比例从 1987

年的 16.5% 下降到而今的 10%，所占的 GDP 产值比例亦从 1980 年代早期的 25% 跌至 2010 年的 11%)，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造成经济体系的转型，自制造业为主转为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和信息服务。此番转型也改变过往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文化，推销与宣传已经上升为生产的核心要素，更加深劳动弹性化、非正式化的趋势，使劳动者处境越发岌岌可危。

此文中我将援引意大利自治主张者提出的社会工厂主张，他们认为正式与非正式劳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面临持续瓦解的趋势。此外，我还将着重探讨系统性宣传如何将社会公民矮化为个别的消费者以及仅对奇观产生兴趣的市民。第一部分将铺陈马克思主义当中关于下层与上层建筑的讨论；第二部分将讨论宣传在当代生产过程中的角色、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意识形态和宣传与如何强化劳动者在社会工厂非正式化处境的关系。

## 二、宣传和意识形态作为下层和上层建筑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 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中提到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前者是关于生产的社会关系，后者是维持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建制。在研究革命的形成时，区辨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差异是必要的。亦即一方面是科学客观地分析生产领域当中经济形态的转型；另一方面是人们是如何在各个方面，如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意识到冲突的存在与产生为之战斗的决心。也就是在这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就算资本一时掌握诸如媒体、法律等这些上层建筑，也无法彻底消除反抗的可能，这始终是个冲突不断重复浮现的竞争场域，一场非单凭生产力就可决定胜负的竞技。

但资本从来就是追求权力与控制能力的极大化，因此尚未完全掌控的意识形态领域遂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最后的战场。这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征服战有赖于对既有生产秩序的强化、持续的再生产意识形态、说服社会大众、刺激欲望以及强化社会对物质主义的认同。我所说的宣传是指为了国家或企业的利益，将设计过的文本内容，以各种媒体形式，如声音、影像、印刷制品等进行宣传。而“系统性宣传”则是指推销行为在全社会领域的扩大渗透：包括国内与国际事务、政策推广、对各种商品、服务乃至社会机构的宣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利用社会心理学的诱因让人们自我商品化

(例如对符号、标志、消费习惯、商品文化的认同采用)以及甘于在非正式劳动状态下,为商家在产品制造过程中自愿提供免费或廉价劳动力的“产消合一者”。此外,大量的新闻信息商品化、大众媒体的奇观化、以及越发擅长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观众潜意识的各式广告、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的商品化以及对“自我营销”重要性的鼓吹(例如如何善用网站、Facebook、部落格、twitter等)。推销活动对美国社会以及其他国家文化政治生活渗透的广度与深度,已使部分批判学者将之命名为“宣传社会”(参见 Sussman 2011)。这里所指的推销是指一般受雇于菁英或非菁英的各式受过专业训练的营销公司所进行的各种推销行为,诸如广告、营销、直销、公关等等。

在谈到意识形态问题时,我将首先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写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一文。他们首先自商品的一般结构切入。商品,是最能展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将生产的社会关系扭曲异化,在堆积如山的商品里,人们所见的只有物品,却看不见商品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将这种现象称为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消费者眼中所见尽是物品包装过的诱人外表,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诱人商品之后对劳动力的剥削、不列在企业成本之内却由社会和自然环境承担的“外部成本”以及整个从生产到交换的循环过程。这些商品在割断与直接生产者的连结之后,宛如石头迸出的孙猴子,没有历史的乍地诞生,这些花样繁多的商品尚且如人类般,有着这样那样或是象征娇媚、或是体现反叛的各种性格。而这些现象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商品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脱离,商品各自拟人搬的存在,却是如此的理所当然。“上层结构”是指形塑人们意识、思想、态度的领域,当中有着各式意识形态相关建制,例如教育机构、教会、媒体、法院和各式强调自我营销、自我改造的机构。这些意识形态机构进行的种种活动中,有时支持当前生产领域的“下层结构”,使其合法化,并鼓励人们对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霸权接受和顺从。但诚如之前所提,统治阶级并无法全面的掌控意识形态领域,因此我们必须辩证的理解,这些机构进行的各式活动当中,也有批判当前生产体系的,强调对统治阶级价值观与霸权进行抵抗的活动。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讨论对解释当代社会是有效力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了解意识形态具有驯化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分散他们对剥削体制的注意力:

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一般而言,缺乏精神生产工具的人们成为受统治者。统治意识是宰制的物质关系的体现,亦即,宰制的物质关系掌控了意识。(Marx and Engels 1845)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Marx and Engels 1845),“语言就是意识的展现”,而这里所指的语言广义的包含所有涉及意识形态霸权再生产及其后生产领域的各式传播形式,例如广告和营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传播产业与今相差不可以千里计,可以理解处于19世纪的马克思,自是将考察重点聚焦于下层建筑的讨论,即研究传播产业自身作为下层建筑的一环,以及传播如何襄助其他产业进行生产和流通。不管是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hegemonic power)或是阿尔都塞所指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这类的意识形态产业在马克思在世时期都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广告业和大众营销业才开始起步发展,影响所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型态日渐被消费主义主导,而原本的生产流通与消费之间的循环过程,透过广告与营销的鼓吹刺激,也大大加速整个生产到消费的循环过程。19世纪晚期的流通速度与今日根本无法相比,特别是在今日资本、金融资本和其他非物质型态的资本(广告、时尚、文化活动、软件、信息档案、艺术品、摄影等等)可以在全球飞快的进行流通交换。像“品牌价值”就是一种创造出来的非物质型态的价值。透过让消费者认同这个品牌以及崇拜品牌所象征的生活风格,达到资本的社会化,从此一个无形无体的“品牌”,就成了如股票价格般可以上下衡量的“品牌价值”。如同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 2000, 24)所指,“所谓的生命权力……就是说,最能危及权力运作的就是生命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

一般而言,马克思认为一个宰制压迫性政权的建立有赖意识形态的控制,如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中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倾向将意识形态视为一国内主导物质关系与利益的表现。因此任何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型态、神权的、或是社会主义型态的国家,都有意识形态在当中作用。事实上,苏联将政治运动和宣传当作教育群众的手段,灌输他们何为社会主义以及以此动员群众支持社会变革。

不过,总体而言,马克思所处理的还是资本主义如何以意识形态控制作为手段,将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宰制关系自然化,让社会大众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加以接受。此后,葛兰西批判性的继承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探讨,提出更多的思辨阐述。

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透过散布“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合法化既存体系,并使劳动阶级对此压迫体系接受服从。马克思曾提过劳动者如何因为阶级意识的启蒙觉醒,完成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角色意识转换。但他更多的将意识形态视为宰制阶级的统治工具,较少探索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工具的可能,例如让劳动者更多的认识社会主义。葛兰西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透过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意识领导维持阶级宰制,而非对人民直接行使身体控制与肉体暴力。所以劳动阶级若要寻求解放,就必须有能力认清看穿资产阶级宣传机构散布的思想迷障。这个任务也唯有透过在劳动阶级当中培养出深晓压迫滋味,受过教育,能够积极以批判思想对抗挑战宰制意识形态的有机知识分子。

阿尔都塞同样采取辩证的观点考察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在阶级认同形成过程中的角色。不过他主要着墨在意识形态权力的结构型态,认为意识形态建立了人们思考与行动的方法,如其所言:

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只必须再生产劳动者的技能,同时也必须再生产劳动者对既存秩序规则的服从与对宰制意识形态的接受。但除了劳动阶级的再生产之外,压迫阶级也同时进行再生产,培训出知晓如何正确操弄宰制意识形态的下一代。(Althusser 1994,104)

阿尔都塞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主要透过教育系统持续再生产顺从的文化。在中世纪时期,则是教会扮演这个功能。今日,大众传媒可能比教育体系对劳动阶级更有影响力。如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Marcuse 1964)所指,媒体驱动下的消费主义正是驯服劳动者,使其顺从的极权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作用的娴熟了解,则使具体的宣传手段能够发挥更高的影响力。

在整个生产流程里,意识形态无所不在。首先,劳动者必须先为五斗米折腰,接受自己是个没有权力的小螺丝钉,接着,要内化工作纪律使得工作过程尽可能顺畅。接着进入商品的流通过程,意识形态则扮演了重要角色,

包括广告、营销、品牌营销与种种花样繁多的推销活动)。在最后阶段,意识形态扮演着核心角色,让消费者甘心购买商品,完成商品变成货币的转化。特别是数字商品,其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几乎消失,时空的压缩也使得资本的流转得迅速转手,从而推快整个生产到消费的循环速度。

不过威廉姆斯(Williams 1973)反对此等以工具主义或化约论的角度理解意识形态:

如果意识形态只是某种被灌输的抽象概念,如果我们种种关于社会、政治、文化的想法、认识和惯习,不过是特定操弄下的结果,那么只要人们也受过相关宣传训练并好生学习,或许也可轻而易举的推翻终结既存体系,推动社会变迁。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甚至,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础之间不断的交织运作,是过往文化与当前各种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建制之间持续相互建构的结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并不是只有压制异议者这个手段,还会将抗议文化商品化,将其收编吸纳到主流文化中,瓦解当中的革命动能。例如美国著名的Macy's百货公司,它的商标就是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红色五星,如果在60年前麦卡锡主义当道时期,甚至可能被送进非美调查委员会呢。而以精品闻名的萨克斯第五大道,它的建筑手法就像1920年代苏联的国营商场。而全球500大榜单之内的李维斯公司(Levi Strauss),Wieden & Kenedy公关公司为其制作的牛仔裤广告,就有如下标语“我们都是工人”(We Are All Workers)、“为了新工作而强悍”(Made Strong for the New Work)、“每个人的工作都一样重要”(Everybody's Work is Equally Important)。2011年美国吉普车广告打出的口号就是“我们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制造了我们/美国”(Things We Make, Make US),而这句口号,听起来根本就像是马克思理论中撷取的。

资本主义持续的自革命活动中寻找灵感,像是对革命领袖和劳动者压不垮精神的致敬。但其实不过是利用这些激进运动的想法理念,将其重新包装和商品化。然后在挪用收编之外或许还会将这些众人思想汇集的理念申请知识产权,垄断为私人财产呢!就像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在1988年取得生日快乐歌的著作权一样,或许《共产党宣言》也会被购买独占,届时任何人在公共场合朗诵《共产党宣言》就成为侵害知识产权的罪犯。

数字信息时代,产生了两个重大改变,一是新国际分工下制造业工厂纷纷移往工资低廉的第三世界;另一个重要变化则是,流通领域中的推销活动在整个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大大提升。西方国家如美国就成为海外商品的销售场所,而购物也成为美国人在工作和睡觉之外的最主要活动。流通领域成为财富制造的最重要环节——使那被赋予独特情感的第一桶金能够持续滚动(事实上就是流通领域的持续流通,类似钱滚钱的意思),而种种非物质形态的推销活动就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关键钥匙,以此无远弗届的施展意识形态影响力、无日无休的发动阶级斗争以及持续追着工人们妄想将宰制的文化意识施加其上。

### 三、宣传和生产模式

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论述中,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代的商业意识形态呢?在19世纪时期,传播工具主要起着辅助的作用,帮助当时领先的工业城市或国家进行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媒体化的发展。马克思对传播将要造成的影响做出了非常有前瞻性的观察,他认为传播的力量将会加快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速度以及在全球散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封建体制造成致命的打击,就算封建王朝悠久如中国,“其城墙也将因这股强大的外力冲击而坍塌”(Marx and Engels 1848)。不过,马克思主要是将传播工具,像是电报,视为一系列科技历史发展的一环,如同摩斯电码的发明、贝尔实验室的电话和爱迪生的电灯等(参见 Sussman 1997,特别是第三章和第四章)。要到商业传媒进一步的发展,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和卢卡奇等才比较深刻的探索传媒的意识形态作用。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透过科技的协助,国家得以透过镇压式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扩张其意识形态操控的能力,帮助资本积累、施展强制力以及为统治制造合法性。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它是否有能力影响人民的意识,使人民打从心里认同这个政权,认为国家政策以及种种行政管理手段是理所当然的、公平的、也最能体现人民的利益。国家和商业利益透过交互运用意识形态与宣传手段,影响一般大众基本想法、价值观与思想态度,借此达成他们的利益目标也同时扩大他们的文化影响力。宣传是整个商品生产的核心,一方面刺激制造购买欲望,一方面鼓吹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诚如伟恩(Mike Wayne)所言,要应用马克思理论解释当代现象,就必须正视今日世界与过往的差异,例如“在当代的生产过程中,文化传媒、意见的交换与回馈系统、数据分析等(相较工业革命时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Wayne 2003,45)。在营销经济的时代里,生产的重心集中在推动商品于海内外的营销以及透过监看搜集消费者的资料,保持商品宣传的火热。整个搜集消费者个人资料的过程是一个系统性对百万人隐私权的侵犯,同时也打造出一批因为对商品产生心里认同,而愿意付出劳动的认同劳动力。这种好似无所不在的力量系奠基于高度的商品拜物教文化,以此引诱劳动者和消费者在劳动过程和商品价值形成的过程里,贡献上他们的知识以及个人信息。

在斯迈思(Dallas Smythe)广为引用的受众的劳动讨论,他就预料到未来会有部分资本会将精力投注在扩大意识商品化以及更多的依赖价值生产消费者。斯迈思聚焦于研究广告和受众劳动的关系,就他理解,受众在看广告的时候会因为受众不同的人口特职有异(种族、性别、年龄、职业等)。受众成为一种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超越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剩余价值创造的既有讨论范围(斯迈思称之为盲点)。虽然斯迈思未能亲眼见识到今日广告商如何利用种种先进科技监看分析受众,但他的突破性论述指出当代的营销活动打破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线、工作与闲暇时间的分割、以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野。广告商乐于购买的不仅是消费者观看广告时投注的注意力,也同时培养助长了消费的习惯。

企业意识形态透过遮掩商品的剥削本质,掩饰其后的劳动者身影,以及透过商品持有建立个人自我认同(我是我所拥有的商品),使虚假意识成为具体和普遍的存在。通过此番主客翻转的过程,主体沦为客体,而客体翻转为宰制的主体。事实上,若是没有在劳动力(包含生产者、消费者以及生产系统的管理者)当中持续打造卢卡奇所称的“统一意识结构”,资本主义是无法持续运作的。“所谓的官僚体制,就是不断的调整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型态与意识思想,使社会总体政治经济状况可以顺应资本主义经济型态发展所需”(Lukacs 1971)。

营销和宣传活动也成为一国经济表现是否成功的关键。新自由主义的宗旨之一就是透过新国际分工、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等,将世界上还未被资本主义染指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和消费的循环过程里。随着美国农业与制造业的持续萎缩,在2000年时,服务业的产值已



经超过 GDP 的 80% 以及劳动力的 59%。种种营销活动,诸如广告、营销、公关、品牌经营和销售管理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关键。尽管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比例的 4%,但在铺天盖地的营销活动鼓吹下的过度消费,却消耗了世界 1/4 的能源、1/3 的纸和塑料制品。在 2000 年时,平均一个美国人的消费量是一个中国人的 53 倍,当然这个比例可能很快也会随着中国消费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改变。

美国营销经济的发展和集中程度也同样令人瞠目。4000 家广告公司中,前 100 大就占有了 41% 的广告市场占有率。仅仅广告业的产值在 2007 年就高达美金 1537 亿,占了 GDP 的 2.7%。在 2008 年时,全世界的广告支出则高达 5000 亿美金。就算在 2008—2009 年经济衰退时期广告业有所萎缩,但是公关业却持续成长。在 2008 年时,美国传媒产业的产值高达 9239.1 亿美金,比上年成长了 5.4%。这个惊人的数字几乎等同于澳洲的 GDP,更高过 13 个国家的总体产值。

营销文化已经深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公共空间”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它的公共性,成为各式广告招牌和商标的展示场。各个高中体育馆充斥着商品广告、汽水饮料竞相抢进校园、满街跑的车子和公交车站牌也布满了各式商品广告。向来砸大钱的美国超级杯足球赛广告,以 2012 年为例,一支 30 秒的广告就高达 350 万美金的广告费,每每造成话题的世界杯广告也因此吸引许多观众,甚至足与和想看球赛的人相比。个人网站、部落格、脸书、和电子书也同样充斥各式广告。拜美国最高法院所赐,在 2010 年通过“Super Pacs”,允许竞选人可以几无上限的进行宣传广告战,据估计 2012 年美国联邦层级的竞选活动就斥资约 80 亿美金。而这些资金最后大多花费在电视台的巨额广告费以及竞选顾问从中抽取的 15% 分成。

#### 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劳动者的非正式化

一般而言,传统型的宣传大抵是为了推行国家某些特定的政策或计划;而系统性的宣传则是面向全球性且能更大范围进行协调统合的策略,这套策略的施行主要有赖根植其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科技的运用。大约是在 1970 年代,随着去工业化、去管制化和弹性积累型态的出现,宣传方式亦自传统型转向系统型。借由数字传播科技的帮助,国与国之间、

经济与道德、公共和私有之间的藩篱都如同柏林围墙一般崩塌。从福特主义到生产弹性化,资本更有能力掳获“海量的社会和文化知识”(Terranova 2000, 38),将其转化为可贩卖的商品和私人财产。就算在1970年代面临险峻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也未有倒台迹象,面对合法性危机,执政者如 Jimmy Carter 甚将之蔑称为一场全国暂时性发作的忧郁症。面临危机的资本主义体系则在新任政治领导人里根与撒切尔的带领下,重新大张旗鼓并大肆对外扩张。如阿尔都塞所言,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依靠科技创新或是任何个人来维持其生命力,重点在于不断的更新维持它的意识形态控制:“就我所知,没有任何阶级可以长时期的掌握国家权力,却不需要同时透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施展与维持霸权”(同上, 112)。

当新自由主义越发的依赖个人消费和服务业胜于过往的制造业,也就越多的投资于大量的文化生产和符号产制使其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此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特色(Goldman 1992)。企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依赖于物质性商品与非物质性商品的销售。因此有赖各种宣传家的集体努力将包含各式权利的公民权扭曲压缩为只能当个各式奇观的观看者,使消费主义的生活形态成为企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资本主义的营销经济是所有工业经济形态里最具掠夺性的,不只在制造领域里占有殖民劳动者的身体,更要占有殖民劳动者的意识、认同和人格,甚至他们的国家领导阶层。半数以上的美国国会议员在正式卸任之后,担任说客、律师、或是企业执行长,将政府服务变成企业经营的延伸。

营销经济里,劳动者随着一段一段切割的商品生产过程而被原子化,从而无法看见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以及边缘化为机器生产的配件般。此等发展模式随着时间不断地向全球扩展。过去相对稳定的劳动条件也渐渐从主流媒体的讨论中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不确定、不稳定和岌岌可危的生活处境。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发展模式下,人们所有的生活都受制于宰制政权的组织支配、主导意识形态下的行为规训以及被推入劳动分工体系。

从福特主义过渡到哈维(Harvey 2007)所言的“弹性积累”生产形态,由于资本必须随着新国际分工进行跨空间与跨各个生产环结的管理,因此必须发展出对劳动者更强大的规训与控制能力。例如将过去制造业的标准化、流程化、军事化以及单调重复的劳动管理方式移植到服务业。事实上,这不是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更像是超级工业化社会(Sussman 2011, 11—12)。劳动者的个人主体性在整个生产流通环节里被资本控制、攫取、监控,简直

就像是资本的私有财产了。非正式的认同劳动者就和这些雇员们混杂在一起,为资本效力,这种情形特别是在信息服务业以及营销产业更为普遍。

过去福特主义时代劳动者不需要肩负营销任务,拉抬业绩。但在营销经济模式下,资本增加了对劳动者的劳动要求,例如连锁店的柜台工作人员,被规定要向消费者反复诵念刺激销售的台词,例如,你有没有找到你要的东西? 顾客服务中心、技术支持或是电话客服以及侍者等等,在他们与消费者互动的时候,往往会对消费者提供一些额外的消费建议(例如,你想不想搭配饮料呢?)。电视体育播报员和电台节目主持人也被老板期待在节目中安插产品介绍,这些新的对劳动者的营销业绩要求,目的是为了刺激销售增加交换价值,也因此提高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

新自由主义营销经济在数字科技的结构支持下,资本在组织形态以及科技发展上都历经了巨大的再结构,例如去管制化、私有化、去疆域化、政府社会支出的削减、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对工会的攻击、公共领域的侵蚀、制造业与服务业工作的外包以及日益深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不久之前,我们还可以想象工作场所与家庭生活的分开、工作与闲暇的相隔、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生产者与消费者、正式与非正式劳动等种种的区分,而今这些区隔都已日渐消融并且臣服于企业的统驭下。在商品与服务的各式营销活动中,许多劳动者不时的将个人资料递送出去,虽然有时出于企业秘密的监看或是信息窃盗者所为,但绝大部分都是一般劳动者的自愿行为。这些产销合一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用自己的设备和软件,为企业创造了剩余价值,成为免费的非正式劳工。在这个信息成为生产过程重要环节以及对劳动力汲取能力日益强化的系统下,不管是物质性的或是非物质性的劳动,其劳动形式与组成也都经历了变化。

文创企业也经常将一些难解的问题,利用网络或其他方式,从广大群众当中寻求愿意无偿或低价解决问题的业余专家,这些专家通常是为了获得奖品或是享受成就感。这种将问题外包给群众的手段,被称为“众包”。透过众包,企业除了自己的劳工之外,还有广大的群众可以帮助其解决问题、提高交换价值,也就是所谓共同创造的经济形态,就是想方设法从广大消费者群众中运用他们的文化、技术、社会和情感等种种劳动,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Zwick, Bonsu and Darmody 2008, 166)。众多商业众包行径中,最主要的一种形态就是营销活动,企业渴望从消费者透露的讯息知道如何设计更诱人的产品、如何营销以及打造品牌,以加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和扩大消费

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推销经济的快速发展,将生产和营销之间的距离无限挤压,对心力劳动的需求也大过对体力劳动的需求,由此也带来新的劳动形式。如自治论者特拉诺伐(Tiziana Terranova)所指,此种非物质性的劳动,“诸如对文化和艺术标准进行定义与调整、时尚、品味、消费规范或是制定策略影响民意等等活动,都不是过去社会所认定的劳动”(Terranova 2000,41)。但这些其实都是“增值过程”的一环,就算产消者投入的只是一点点的时间和心力,也都为这些商品创造提高了价值。

如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传统媒体产品与广告的分也在大媒体的时代面目模糊,例如“电视信息广告”(infomercial)、“植入式广告”(product placement)和“置入营销的新闻”(news plugola)以及许多其他类似将商品营销的部分混进掺杂入生产过程中。一位科技批判学者就指出,“对劳动力直接剥削的比重会逐渐降低,而出于私利对社会知识进行剥削的行为则会日渐重要”(Tessa Morris-Suzuki,引自 Arvidsson 2006,9)。甚至监视这种举动也在大众流行文化中被视为寻常行为,新闻记者 Chris Hedge 就指出“真人电视选秀节目如‘老大哥’(Big Brother)和‘幸存者’(survivor)等将国家监看此等侵犯行为予以美化,同时利用参与者的自我商品化来刺激吸引观众的窥视欲望”(Hedges 2009,39)。

在以销售为主导的经济形态里,流通领域的重要性越显重要,而剩余价值的创造也越亦依赖推销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吹。这些以刺激消费为目的的产业,例如各式各样的营销活动(广告、营销、公关、销售管理和品牌经营等),也自成一个生产领域。营销经济使得生产和消费社会关系日益相互渗透整合,如同对产消者的动员,已经难以区辨其为消费者抑是生产者,特伦提(Mario Tronti)将此现象命名为“社会工厂”。当中,资本越发将重心放在文化生产,使消费者与产品之间产生想象的链接,透过拥有商品建构消费者的自我认同。威廉姆斯指出如果我们真要认真研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持续扩散成为全球主导意识形态,“我们就应该从活跃且不断自我更新的马克思文化研究传统出发,关注的不是产品的组成内容,而是深入探索这些产品处实际运作的型态……”。

在零售业、电话营销、汽车服务、秘书或其他低薪资非专业的职业形态里,往往依靠高度精准与自动化的手段,例如利用信号系统(如快餐店的铃声与闪灯或是电话客服业的电话科技控制等)制约、规范、控制劳动者的响

应速度与质量,令其持续进行单调反复的动作,处于超级工业化的劳动状态。就算处于服务业,如柜台结账、电话客服或是快餐店的生产线,其实都与制造业的流水线生产方式相当类似。而今连医生都在时间管控下,视病人如同一件件等待处理的物品,以泰勒式标准化方式对待病人。

由于新的非物质型态资本的出现与大量非正式劳动力的存在,使得非物质性商品可以无速限的快速流通。数字型态商品的再制价值几乎无限巨大,因为再制过程几乎不需要花费额外的生产成本,也因此拥有原型的厂家,可对这些数字商品生产者施行超级剥削。也因为这些特质,资本必须在数字商品上市发售之前严密收藏。因为一旦进入流通领域,这些数字商品就非常容易再制与流通。这种档案分享的行为,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是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但我们也可以将档案分享视为对劳动价值的补偿,让人们有更多的软件选择以及创造更多社会利益,就如同建立全国健康保险制度、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以及基本住宅的保障。

## 五、“回不去了”:即将瓦解的国家合法性?

新自由主义的扩散以及数字传播的发展,使得消费者也越发被当作生产要素,整合进生产过程中。过往对劳动者的定义是创造交换价值,但在当代的营销经济体制下,不管是从中国的血汗工厂到美国的商品销售网点以及最后的消费行为,沿途都布满了各式对消费者的监看和交互式传播设计。过去35年来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营销经济的崛起,销售成为最主要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销售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可见的商品到抽象的公共政策。营销经济的崛起非但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和关于剥削和异化的讨论过时,相反的,营销劳动这个概念的出现,反而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全球经济的中心。

既然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交织,将消费者卷入生产过程的社会工厂生产形态也广为采用,则过往资本家因为拥有资本,进而独占所有生产知识与劳动成果,这样理所当然的所有权概念,也就显得越发可议了。很明显,在营销经济形态里,价值的创造来自对社会共同知识的利用,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一般智力”。资本依赖社会创造出的一般智力提高其生产力以及维持利润率。特别是在营销经济时代,借由数字科技、监看技术、对群众知识的利用以及对欲望的刺激,都大大增强资本对社会共同智识的攫

取利用。但如同奈格里(Negri 2006)和齐泽克(Žižek 2009)以及其他学者所言,资本主义却将这些社会集体共同生产的知识占为己有,成为私人财产。同时无所不在的营销经济活动,持续汲取产消者的注意力、时间、知识技能,形同广大群众为资本进行剩余劳动时间的不断延长,也因此减少人们将闲暇时间用来发展自身,从事有创造力的活动或是进行各种创新的探索,阻碍了社会知识继续成长勃发的潜能。

随着将消费者转化为产消者的各种活动的增强,例如顾客调查、投票、众包、焦点团体、网站、消费讯息订阅、信用卡监看、小型文本文件(cookie)、预测观察下一个酷潮流的搜酷行为(cool-hunting)等无数将消费者卷入生产过程,提高产品价值的营销活动,使得所有人都因为其对产品过程的有所贡献而成为理所当然的产品股东之一。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已将劳动从个人的工作范围一路延展到社会领域和私人生活,将整个社会转变为一个大的生产“工厂”,而消费行为也从个人行为扩张到几乎囊括整个社会的组织性消费(Lazzarato 1996)。也因此过往资本家藉由申请专利和著作权和商标注册,以法律、意识形态和财产权的力量,维持其对产品的独占控制以及保证资产阶级对社会规范的掌控。但这些看似正义凛然的论述与法律,不仅过时,更无法反映当前产品生产过程的真实样貌。

当社会一般智力成为生产体系的基础,最适当的所有权形态就理当采取集体所有制,也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有可能施行吗?在营销经济时代里,没有比此刻更加清晰的显示劳动阶级做为一个整体,生产了整个国家的财富,也更有合法性据此要求拥有政治权力。传播媒体虽能够襄助资本主义维持意识形态控制,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异议者也同样可以运用传播科技进行对抗,瓦解资本主义的宰制,例如维基解密(wikileaks)将政府刻意隐藏的信息曝光于世、大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日益蓬勃的另类媒体发展、黑客以入侵对抗媒体垄断的财产权、反对广告运动、占领社交媒体等等各式媒体抵抗行动。尽管美国本土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出现裂痕,但首先所见还是社会具体政经状态的持续恶化,在面对恶化的生存处境时,各个集体与社会逐渐形成集体的抵抗意识、慢慢发展出对社会不同发展取径的想法,以及对社会存在的目的与个人身处当中的角色进行思索,从而发展出足以挑战主导意识形态的抵抗性意识形态。

什么样的反对抵抗形式是可行的?又该如何再度燃起人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呢?在数字信息时代,资本家更难独占脑力劳动的成果,同时也有草

根运动不停歇的建立社会网络以及彼此分享信息,网络更是一个免费的交换领域。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市民一个活跃的传播环境,使人们得在获得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理性的政治与个人抉择,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也不需要拒斥所有资本主义体系的活动,例如我们也可以运用营销手法促进更和谐的工作生活、减少对消费主义的鼓吹,更多的思索如何与地球上所有生物和平共处。所以对社会运动者而言,争取开放的网络系统和公共电波是重要的斗争目标。占领运动(The Occupy Movement)需要将地方电视台和全国电视台视为重要占领目标,因为这些是美国主要的新闻信息来源、宣传管道以及主要的意识形态领域。这些管道持续发布错误的信息、扭曲的意识形态、毁灭性的消费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些思想毒素将阻碍民主社会的建立。

在重视社会公义与平等接纳的原则上,透过网络进行启发性思考的无偿交流,将可重新唤起社会的集体意识,工人阶级也可借此进行团结串连,挑战国家的镇压机构和阶级宰制是理所当然的可笑说法。也可透过集体合作的机制,例如劳动合作社的建立来拒绝和挑战企业主义、松解宰制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控制、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组织以及渐渐消灭各式的剥削与异化形式,最终中止阶级不停再制的不公平。当革命的条件形成以及数字科技的发展,是有可能在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盟国掀起沛然莫之能御的革命海啸。届时,这些帝国大贼就再也不能掠夺占有劳动者的知识,反之,这些人们将运用这些社会共享的智慧与创意,透过集体努力为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的发展谋求共同的福祉。

### 参考文献:

Althusser, Louis 1994.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 an Investigation). In *Mapping Ideology*,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100—140. London: Verso.

Apte, Uday M., Uday S. Karmarkar, and Hiranya K. Nath. 2007.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US Economy: Value, Jobs and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www.ifm.eng.cam.ac.uk/ssme/references/Karmarkar\\_ref2\\_cambrid-gessme07.pdf](http://www.ifm.eng.cam.ac.uk/ssme/references/Karmarkar_ref2_cambrid-gessme07.pdf)

Arvidsson, Adam 2005. Brand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5 (2): 235—258.

Biderman, David. 2010. 11 Minutes of Ac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5. Online edition.

- Brabham, Daren. 2011. The Myth of Amateur Crowds. Flow TV Website. January 15.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flowtv.org/2011/01/the-myth-of-amateur-crowds/>
- Brian. 2010. In Want of Things We Can Touch. *Anidea website*. Accessed February 3, 2012. <http://anidea.com/strategy/in-want-of-things-we-can-touch/>
-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2012. Revolving Door; Former Members of the 111<sup>th</sup> Congress. *Open Secrets. Org website*. Accessed March 1, 2012. <http://www.opensecrets.org/revolving/departing.php?cong=111>
- Cleaver, Harry. 1992. The Inversion of Class Perspective in Marxian Theory; From Valorisation to Self-Valorisation. In *Essays on Open Marxism: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2*, edited by Werner Bonefeld, Richard Gunn and Kosmos Psychope-dis, 106—144. London: Pluto Press.
-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Fleming, Peter and Andrew Sturdy. 2011. “Being Yourself” in the Electronic Sweatshop: New Forms of Normative Control. *Human Relations* 64(2): 177—200.
- Goldman, Robert. 1992. *Reading Ads Socially*. New York: Routledge.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Paul. 2012. Apple Hit by Boycott Call over Worker Abuses in China. *The Observer*, January 28. Online edition.
- Harvey, David. 2007.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dges, Chris. 2009. *Empire of Illusion: The End of Literacy and the Triumph of Spectacle*. New York: Nation Books.
- Higgins, Carey L. and Gerald Sussman. 2007. Plugola; News for Profit, Entertainment, and Network Consolidation. In *Urban Communication: Production, Text, Context*, edited by Timothy A. Gibson and Mark Lowes, 141—162.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IT Facts. 2008. Telecom Spending to Reach \$ 923.91 Bln in 2008. Accessed February 29, 2012. <http://www.itfacts.biz/telecom-spending-to-reach-92391-bln-in-2008/11091>
- Jhally, Sut and Bill Livant. 1986. 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3): 124—143.
- Jubas, Kaela. 2007. Conceptual Con/Fusion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Understandings



and Limitations of Consumer-Citizenship.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7(2):231—254.

Kjøsen, Atle Mikkola. 2010. An Accident of Value: A Marxist-Virilian Analysis of Digital Piracy.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Accessed January 14, 2012. [http://uwo.academia.edu/kjosen/Papers/387636/An\\_Accident\\_of\\_Value\\_A\\_Marxist-Virilian\\_Analysis\\_of\\_Digital\\_Piracy](http://uwo.academia.edu/kjosen/Papers/387636/An_Accident_of_Value_A_Marxist-Virilian_Analysis_of_Digital_Piracy)

Lazzarato, Maurizio. 1996. Immaterial Labo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132—14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ukács, Geor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Marx, Karl. 1859. Preface: A 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ccessed December 18,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9/critique-pol-economy/preface.htm>

Marx, Karl. 1967. *Capital.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71.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1973, *The Grundrisse*. Trans. M. Nicolaus. New York: Penguin.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ch10.htm>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5. The German Ideology. Accessed December 14,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german-ideology/ch01b.htm>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ccessed December 13,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ch01.htm>

McInerney, Vivian. 2003. Presenting a New Ideology. The Clothing Line aims for Style and Quality Without Designer Prices. *The Oregonian*, April 29, C-1.

Mullaney, Tim 2009. Global Ad Spending to Fall in 2009, Forecasters Say. *Bloomberg News*. Accessed January 13, 2012.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Z2ysU0uRIYo&refer=home>

Negri, Antonio. 2006. *Goodbye Mr. Socialism; In Conversation with Raf Valvola Scelsi*.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Sklair, Leslie. 2001.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Malden, MA: Blackwell

Smith, Tony (n. d.). The 'General Intellect' in the Grundrisse and Beyond. Accessed March 23, 2012. <http://www.public.iastate.edu/~tonys/10%20The%20General%20>

20Intellect. pdf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1—27.

Smythe, Dallas W. 1981.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22—51. Norwood, NJ: Ablex.

Sussman, Gerald. 1997.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ousand Oaks, CA: Sage.

Sussman, Gerald. 2011. Introduction: The Propaganda Society. In *The Propaganda Society: Promotional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Global Context*, edited by Gerald Sussman, 1—21. New York: Peter Lang.

Terranova, Tiziana. 2000.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2):33—58.

Tilford, Dave. 2000. Why Consumption Matters. *Sierra Club*. Accessed February 12, 2012. [http://www.sierraclub.org/sustainable\\_consumption/tilford.asp](http://www.sierraclub.org/sustainable_consumption/tilford.asp)

Virno, Paolo. 2001. General Intellect. Trans. Arianna Bove. Accessed January 18, 2012.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virno10.htm>

Watts, William L. Daily Foreign-Exchange Turnover Hits \$ 4 Trillion. *Market Watch*. Accessed January 22, 2012. <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daily-currency-trading-turnover-hits-4-trillion-2010-09-01>

Wayne, Mik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London: Pluto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73.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Accessed December 15, 2011. <http://www.rlwclarke.net/courses/LITS3303/2008-2009/04CWilliamsBaseandSuperstructureinMarxistCulturalTheory.pdf>

Wilson, Eric. 2009. Consumers of the World Unite. *New York Times*. Online edition, January 7.

Wood, Deborah J. 2008. Hanon McKendry Buys into Alternative Media Firm for Online Advertising Growth. Accessed January 22, 2012. <http://www.rapidgrowthmedia.com/devnews/mndscpe1002.aspx>

Žižek, Slavoj. 2009.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Žižek, Slavoj. 2012. The Revolt of the Salaried Bourgeoisi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9—10. January 26.

Zwick, Detlev, Samuel K. Bonsu and Aron Darmody. 2008. Putting Consumers to Work: “Co-Creation” and New Marketing Governmentality.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8 (2):163—196.



### 第三篇 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布莱恩·布朗(Brian Brown)<sup>①</sup>

安娜贝尔·奎恩-哈斯(Anabel Quan-Haase)<sup>②</sup>

## “工人调查表 2.0”：社交媒介语境下生产性 使用研究的民族志方法<sup>③</sup>

何小菲(译),张磊、张晓星(校)

[摘要]我们在本文中提出了一种在社交媒介语境下研究生产性使用的新的民族志方法(Bruns 2008)。这种方法的提出基于三种理论脉络：马克思在《工人调查表》中使用的方法，自治论者的联合研究方法(co-research)，以及近来关于 Web 2.0 的批判理论。为体现这种新方法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我们首先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衍生出的其他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然后，以一项个案研究来例证该方法的多样性，探讨其为研究生产性使用过程和受众商品化(Smythe 1977; Bruns 2008; Cohen 2008; Fuchs 2011)提供新视角的可能性。这项个案研究对互联网上最大的图片分享社区——Flickr 网站的生产性使用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

[关键词]互联网,批判理论,非物质劳动,Flickr,社交媒介,Web 2.0,数字民族志,生产性使用,研究方法

---

① 西部大学信息与媒介研究学院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集中于社交媒介的生命政治、自治理论和视觉文化领域。

② 西部大学社会学院、信息与媒介研究学院副教授。她的研究兴趣是社交媒介、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不平等和偶发性。

③ 本文作者安娜贝尔·奎恩-哈斯(Anabel Quan-Haase)得到西部大学学术发展与社会科学校友研究奖金对本研究的支持；布莱恩·布朗(Brian Brown)于2009—2010、2010—2011年两度得到安大略省研究生奖学金的支持。作者对阿汗迈德·卡莫尔(Ahmad Kamal)和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与建议表示感谢。

## 一、Web 2.0 和批判理论

用户生成内容(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以及 Web 2.0 网站和服务激起了一股彰显其参与者创造力、才能智慧和共享精神的风潮。这些参与者日复一日地在 Facebook、Twitter、Flickr 之类的社交网站上发帖、评论、更新内容。在 Web 2.0 环境下人们的交流方式出现了一种转变,个体之间通过分享思想、观点和好恶来完成交流。日益壮大的 Web 2.0 网站和服务处于这种转变的核心并且丝毫没有衰落的迹象。2010 年的数据表明,至少在加拿大,邮件正被 Web 2.0 服务所取代(Moretti 2010)。在 13—17 岁和 18—24 岁两个年龄组中,分别有 77%和 82%的青少年更多地使用 Facebook 而非邮件。在这样的数字环境中,“使用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生产了大量的内容,却毫不涉及薪酬关系。无报酬的非物质劳动研究,或者用布朗斯(Bruno 2008)的术语“生产性使用”(produsage)研究,其有趣之处就在于,“使用者”们(尽管用“使用者”一词来概括这个群体是毫不恰当的)自愿地为这些网站的拥有者们无偿地生产内容,而与此同时,这些网站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布朗斯(2008)创造了“生产性使用”一词,旨在区分工业生产方式和 Web 2.0 环境下创造数字内容的“生产”方式。布朗斯(2008)指出,生产性使用模式“建立在迭代的、进化的发展模型上,在这些模型中极为庞大的参与者群体对已确立的知识库进行一系列细微的、累积性的改变,从而产生一种渐进式的质的提升;然而在适宜的条件下,这种提升将超过传统工业模式的生产发展速度。”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名词来描述这种新的工作形态的本质和机制。拉扎拉托(Lazzarato 1996)首先创制了一个新名词“非物质劳动”,哈特与奈格里随后在《帝国》(Hardt & Negri 2000)一书对这个名词进行了扩展,在此基础上,泰拉诺瓦(Terranova 2004)提出了“免费劳动”的概念,以描述网络“使用者”所进行的不计报酬的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 2.0 (Cote and Pybus 2007),和信息化劳动(informational labour, Fuchs 2011)等新的概念也不断被引介来描述这些变化。这些概念均强调,薪酬关系不存在并不意味着 Web 2.0 使用者不具有生产力,也不意味着剥削关系不存在。沿着斯迈思(Smythe 1977)所开创的道路,批判理论家科恩(Cohen 2008)和福克斯(Fuchs 2009, 2011)指出,Web 2.0 网站和服务是具有高度剥削性的,

因为它们从“使用者”的工作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却不为“使用者”的劳动付出报酬。事实上,上述作者准确地指出了薪酬关系的缺席恰恰强化了这种剥削关系。

这种形式和关系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地掌握 Web 2.0 网站和服务的“使用者”如何理解他/她们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因此,要对生产性使用模式和不付酬的非物质劳动进行研究,我们需要采用一系列恰当的方法,来揭示劳动者的感受和观点。这样的方法也可以成为一个起点,使得生产性使用者有所警醒,认识到他/她们的贡献一方面是社交媒介环境所特有的所有者与工人之间新关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种新关系仍然立足于工业时代盛行的劳动力剥削的基础之上。现有的方法论,既没有充分考虑到 Web 2.0 生产性使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考虑到生产性使用模式所产生的社群意识,以及这个社群与网站拥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剥削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些生产性使用者及其人工制品之间的密切联系为生产性使用研究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因此,本文指出,每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涌现,我们就需要发展新的研究方法论来适应这些环境改变的特殊性。Web 2.0 的生产性使用模式就提出了这种要求。下文将详细阐述一种研究方法的改编,而这些调整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批判传播研究者而言尤为重要。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民族志方法来研究社交媒介语境下的生产性使用模式,称作“工人调查表 2.0”(A Workers' Inquiry 2.0)。这种方法的提出建立在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意大利自治论者的思想和方法,以及新近关于 Web 2.0 的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为体现这种新方法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我们在第二部分将这种方法和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的方法进行比较。在第三部分我们展示了自治论者对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方法的修正,并且讨论了该方法与参与性行动研究(PAR,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之间的关系。在第四部分,我们解释了生产性使用模式背后的理论脉络,并探讨了与其中一个中心原则相关的批判。在第五部分,我们分析了“工人调查表 2.0”这种新方法是如何修正了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方法,使之在 Web 2.0 语境下更具阐释力。这部分包含了一项案例研究,对 Flickr(互联网上最大的照片分享社区之一)的生产性使用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在第六部分,我们提出,生产性使用模式——以及生产性使用者在其中的核心地位——要求我们重新考量劳动创造的产品或人工制品的经济、个人和



社会价值。这一部分的核心在于生产性使用者及其为网站贡献的人工制品或内容之间的紧密的、通常是个人化的联系。第七部分将我们提出的方法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并指出其优势和劣势。最后,在第八部分,我们讨论如何将“工人调查表 2.0”的原则应用到生产性使用模式、网络资本主义和生产性使用者生成内容的货币化过程等研究中,以此作结。

## 二、马克思“工人调查表”

1880年,马克思在《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中发表了一份问卷,包含101个问题。《社会主义评论》诞生于19世纪晚期,致力于为法国的工业无产阶级提供服务。在这篇名为《工人调查表》(1938/1880)的文章中,这些问题分为四个未命名的部分,对应着那个时代劳动环境的四个不同方面。马克思向工人提出这些问题,旨在衡量法国工业工厂中工人的被剥削程度,并且让工人意识到他/她们自己正在被剥削。因此,“工人调查表”是一次尝试,通过描绘发生在工作场所的社会、科技和政治动态的全景图(Wright 2002):

使得工人意识到他/她们自己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险境,穿透那层阻止工人理解其所处社会环境的由虚妄的幻觉和习惯性反应所构成的迷雾,并使得工人们意识到他/她们有机会去摆脱这种险境。(Burnham, Shachtman, and Spector 1938, 1)

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通过使工人意识到他/她们的险境,这个调查表旨在激起劳动者的愤怒,帮助工人意识到他/她们被剥削的程度,并且,随着这种意识的不断增长,最终促使他/她们采取行动。

《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的编辑发表了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并指出:“随着过去半个世纪中工业生产的变化,某些特定形式的问题已经变得陈旧。但是修正这些问题使之与时俱进并不困难”(Burnham, Shachtman, and Spector 1938, 1)。《新国际》的编辑所声言的,并非该方法论的核心是陈旧的、过时的或者错误的,而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斗争改变了生产模式的形式和内容,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方法必须加以改进和更新。20世纪50年代中期,意大利自治

论者就进行了这种修正,下文将基于自治论者对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的修正来展开讨论。

### 三、自治论者的联合研究和参与性行动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意大利自治论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产生了与马克思相似的诉求,但是自治论者发现自己处于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尽管生产的形式和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参见 Bologna 1980; Wright 2002; Negri 1989),但是同工人对话、借此获得对工人们工作场所的技术和政治环境的深入理解,仍然是自治论者关注的焦点。因此,根据意大利工厂的剥削程度和工人的觉悟程度来调整收集信息的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自治论者采取了一种比马克思更直接的方式,即深入到工厂中去,有时甚至在工厂中工作,以便能够在工人旁边和工厂内部完成自己的研究。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自治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联合研究的方法(Negri 2008,162—163)<sup>②</sup>。和《工人调查表》一样,联合研究的目的是通过问卷、观察和访谈搜集工人工作条件的资料,使工人意识到他/她们自己被剥削的处境,并且给予他/她们采取行动来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联合研究的一项重要优势就在于它发端于工厂生产区,同时立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和政治觉悟的提高。研究者深入到工厂中去、与工人直接交谈、通过访谈向工人提问、让工人完成问卷、感受工人的工作环境,从而对工人的行为有第一手观察;最终,尝试着找到能够将工人从剥削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策略或方法。自治论者延续了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的传统,但对这项传统加以修正,以便能适应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域的特殊性。

作为自治论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军人物,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对联合研究进行了简洁的概括。他的概括是对联合研究方法的步骤最为清楚的阐释,不仅指出了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和联合研究之间的相似

---

① 自治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强调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关系的首要性、创新性和发端性。尽管资本依赖劳动力作为其利润来源,但劳动力也有独立于资本关系的方面,即组织生产活动的技术和知识。也就是说,具有自治的潜力。对这种劳动力自治潜力的最有力证明,莫过于当前 Web 2.0 网站和服务中劳动力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引导。

② 关于更多联合研究在当代的应用,以对组织反抗剥削斗争的多角度尝试,参见 Malo de Molina 2004a,2004b; Situaciones Colectivo 2003; Precarias a la Derive 2004; Brophy 2006。

点,同时还体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

从实践上来说,“联合研究”仅仅意味着使用调查的方法来发现工人作为生产主体对其置身其中的生产过程的觉悟和意识程度。所以,研究者可以进入到一个工厂,和工人取得联系,同时与他/她们一起,对其工作环境进行研究;在这里,联合研究旨在建立关于生产周期的描述并体现出每个工人在其中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触及每个工人所受到的剥削的程度。联合研究也会考查工人的反应能力,换言之,他/她们对自己在体制中受剥削程度的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和主导结构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研究的向前推进,联合研究建立了工厂中斗争的可能性。(Negri 2008,162—163)

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和联合研究的一个核心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把工厂作为研究的核心地点。两种方法都致力于对实体工厂内部工作的工人展开研究,以期使工人受剥削的状况凸显出来,并最终改变这些状况。马克思通过一份在工厂里发行的刊物来联系工人。与之相反,联合研究者则直接进入生产场地,深入到工厂中去,旨在获得工人被剥削程度的信息,并且为工人们反抗这种剥削作准备。因为大量工人在地理上集中在几个特定地点,工作时间是规定的并且可以预见的,同时其工作可以通过一手的观察和描述来被了解,所以工厂就自然成为劳动关系调查的起始点。

自治论者所实践的联合研究,与参与性行动研究或者说行动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方法都强调研究者与个体、组织和社群在共同创造可操作知识(Actionable Knowledge)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然而,两者间存在一个核心差异:联合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工厂,而行动性研究则将研究的地点扩展到各种社区、学校和诊所(Fals-Borda and Rahman 1991; Barnsley and Ellis 1992)。和联合研究相似的是,在行动研究中,社区或机构中的个体不仅积极地参与到研究的目标和方向的建立中,同时也参与到整个研究过程中,包括展示研究成果、研究意义等。行动研究通常与其他研究方法大相径庭。在其他研究方法中,研究对象并未参与到整个研究过程中,因此组织或社群成员被认为是消极的(Whyte et al. 1990)。联合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另外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尝试以项目为基础,通过与个体、组织和机构展开直接互动或对话来获得研究成果(Barnsley and Ellis 1992)。与联合研究相似的是,

行动研究的目标“并不局限在知识的创造上。文献强调,参与性行动研究包含了提高参与者意识的教育功能,并且包含了采取行动来提高参与者生活质量的计划”(Cassano and Dunlop 2005)。联合研究和行动研究认识到了将特定的方法应用到特定环境中以获得新的视角和形成相关结论和行动性策略的重要性(Whyte 1990)。当代劳动环境提出的新问题促使着我们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策略。“工人调查表 2.0”从以上两种方法的联系中获得了启发,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独特的生产领域。下面我们将讨论劳动本质和劳动场域的变化如何影响着研究方法,即在一个相对较新的劳动环境中,我们对社会及政治动态的调查将在何处以及用何种方法展开。我们将在“非物质劳动”和“生产性使用模式”两个专题下对这些变化进行阐释。

#### 四、非物质劳动,生产性使用模式和生产性使用者的角色

Web 2.0 网站和服务的拥有者与产业工厂的所有者既相似,又有本质性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两者均依赖大量工人来生产可以为其及其股份持有者带来利润的产品;不同之处在于,两种剥削关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用不同的概念来解释,如非物质劳动(Lazzarato 1996)或生产性使用模式(Bruno 2008)。接下来,我们将讨论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学者们对该概念的批评,以及该概念与生产性使用模式之间的关系。通过梳理理论脉络,侧重分析生产或生产性使用的人工制品、工人与这些人工制品之间紧密的和个人化的联系,以及生产性使用模式中薪酬关系的明显缺失,我们将进一步阐释本文所提出的“工人调查表 2.0”的方法。

##### (一) 非物质劳动

非物质劳动是毛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 1996)提出的概念,旨在描述发生于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劳动本质的变化。对于他来说,非物质劳动分为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与工业生产既相互关联,又有显著区别。拉扎拉托指出,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标志性特征是,这种劳动一方面创造了关于商品的信息性内容,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关于商品的文化性内容。这两种类型的劳动并不产生实体的或可触的终端产品,而是创造出与商品相联系的语言、符号、形象和观点(Larazzato 1996)。比如,创造关于一件商品的信息性内容,指的是解释某种特定商品的功能、目的、合法性的活动。

某个流行的社交网站(SNS)<sup>①</sup>的服务条款(TOS)、或者市面上某个电子产品的内容丰富的多语种说明手册,都是为某种商品生产信息性内容的劳动的贴切例证。为某种商品生产文化性内容的劳动被拉扎拉托描述为“一种定义和固化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位、消费者规则以及——更具策略意味的——公共意见的活动”(Lazzarato 1996,133)。这项工作主要由广告机构、公关公司、大众媒介机构,以及支持这一类型文化生产的所有的摄影师、版权和影片编辑、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等来完成。在《帝国》(*Empire*,2000)一书中,哈特和奈格里在拉扎拉托最初形成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上加以扩展,加入了“第三种非物质劳动,包括情感的生产和控制,并诉诸于(虚拟的或现实的)人际接触,即身体模式下的劳动”(Hardt and Negri 2000,293)。这种形式的非物质劳动的特点是:工作在服务领域的这些人们的主要劳动成果是生产出一种满足的感觉,例如幸福、满足或沮丧等。

尽管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描述了一个重要的相对较新的生产模式,但从一开始,围绕着这个概念就充满了质疑和争论。争论的关键点是修饰语“非物质”。这些批评主要阐述了这个由拉扎拉托提出、哈特和奈格里修正的理論的两个缺点。第一点是,生产关于某个商品的信息的、文化的和情感的内容仍然要求将物质的身体和思想运用在将要完成的任务上。因此,非物质生产就必然包括了一个物质的核心,这种物质性也要求研究者投入比以上几位学者更多的关注。第二个主要批评针对的是哈特和奈格里(2004)的观点,即非物质劳动在当代具有支配性。也就是说,根据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的,非物质劳动“已经在质的方面成为支配性的,从而加诸于其他形式的劳动和社会本身以一种趋势。换言之,非物质劳动在今天的地位等同于150年前工业劳动的地位。”(Hardt and Negri 2004,109;强调[即中文楷体字]为原文所加。)

在上面的引文中,哈特和奈格里尝试与那些批评展开对话。批评者认为这个概念太快地略过了工业生产的物质形式的恒久性,尤其是涉及到“南方国家”(Global South)问题的时候。哈特和奈格里则辩称对非物质劳动的使用具有其合理性:

---

<sup>①</sup> 关于非物质商品的信息化内容,需要进行额外的劳动,这在 Facebook 的隐私条款中有极佳体现。该条款因为与美国宪法的长度相仿而颇受诟病。Facebook 的“帮助中心”并没有使得使用者阅读和理解这些复杂的规则及条款变得更容易。关于这个条款,Facebook 提供了超过 45000 字的解释(加拿大隐私委员会 2009)。

这并不意味着再也没有产业工人阶级用长满老茧的双手和机器来做苦力,也不是说再也没有农民去耕种土地。甚至,这不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工人数目有所减少。这个理论真正的含义是,非物质生产的本质和特征正试图改变其他形式的劳动,甚至整个社会。(Hardt and Negri 2004,65)

随着这些争论趋于白热化,毫无疑问,拉扎拉托、哈特和奈格里已经发现了一些可以代表一个相对新的、对很多个体的工作生活影响日益增大的劳动环境的核心特质<sup>①</sup>。尽管还存在着问题,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确实在解释世界范围内数量庞大的工人的劳动本质和形式的巨大变化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孤立地考虑这些变化,但我们确实需要思考这些变化和工业模式生产之间的关系(Castells and Hall 1994)。于是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和继续质疑这个概念,更仔细地检视这一概念是如何与产业劳动及其非付酬变量——亦即生产性使用——相联系的。

## (二) 生产性使用模式,生产性使用者和薪酬关系

托夫勒(Toffler,1981)提出了“生产性消费者”这一概念,受其启发,布朗斯准确地把握了那些被误称为“使用者”的特定角色以及他/她为 Web 2.0 网站和服务所做的劳动,从而提出了混合性概念“生产性使用者”及“生产性使用”。布朗斯指出:

生产性使用者并不致力于传统形式的内容生产,而是致力于生产性使用,即以合作方式持续地建立和扩展已有的内容来求得改进。在这样的行动中,参与者并不是传统的工业意义上的生产者。生产性使用者这一概念暗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区隔已不复存在;他/她们工作的作品并不作为分割的、完整包装的产品而存在……他/她们的行动不再是生产的一种形式,因为他/她们行动的先决条件和原则与传统

---

<sup>①</sup> 最近有文献(Duhigg and Barboza 2012)记录了亚洲和拉美电子产品生产工厂的工作条件,这一方面凸显了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之间的紧密互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这些工业生产领域中,政治力量仍在起着重要作用。

工业模型下的先决条件和原则大异其趣。(Bruns 2008,21)

通过统筹分布式网络的“技术-社会能供性”(Bruns 2008,19),生产性使用和生产性使用者的模式产生了显著的效率,不要求、也不需要一个老板来科学地管理他/她们的劳动(Taylor 1915),自上而下地组织他/她们的活动或下达命令。这种多变的、无常的劳动力仅在他/她们想工作的时候才工作,把精力投注在他/她们想要的东西上面,和他/她们愿意共事的人一起工作,也可以在任何他/她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离开这些工作。通过这些概念性的创新,布朗斯强调,在创造和生产电子“人工制品”时,生产性使用者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角色。布朗斯用“人工制品”这个概念来形容当今时代电子创新的动态的和迭代的实质。比起“终端产品”,这个概念更好地强调了电子创新的特点,包括转瞬即逝、充满活力等。布朗斯的生产性使用者、生产性使用和人工制品的概念之所以被广泛采用,是因为它们强调了 Web 2.0 网站和服务的内容产生者的工作本质,这种工作既具有活跃性,又富有创造力。这种工作与工业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特性,下文将会具体阐释。

工业生产的工厂老板和股权持有者提供给工人不成比例的微薄薪资,换取他/她们的劳动力和时间,以此来剥削工人。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比其劳动力所创造的资本要低,而资本主义企业借此从劳动力中榨取利润。这些利润,以及利润背后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企业赖以生存的命脉。盈利的 Web 2.0 网站和服务通过类似的逻辑来运营。这些网站也倚重于一支劳动力大军来生产性地使用人工制品(包括内容和网站开发),这些人工制品把大众吸引到这个网站然后盈利。但是,这些个体并不会因他/她们的劳动力和时间获得报酬。这种商业模式依赖于向广告商出售广告空间,广告商从而可以购买一种向一个固定的和可量化的受众群体销售产品的机会。通过受众商品的概念,斯迈思(Smythe,1977)的论断填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直接地阐明了“这个问题——什么是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批量化生产、广告商支持的传媒业的商品形式?——的答案是受众和读者”。当商业模式在过去的几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之后,如福克斯(Fuchs,2011)和科恩(Cohen,2008)所说,其在 Web 2.0 时代的核心特点是很容易被辨别的。更重要的是,在工业生产模式下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在生产性使用的非物质模式下因为缺乏薪酬关系而加剧了。但是,这种关系因为劳动

力半自愿地加入到这种剥削关系中而变得更为复杂。在表面上看,参加到社会网络中是一种自愿行为,因为他/她们的加入并不受外界力量的影响。但是,如果把当代传播环境的独特性加入考量,再认为这种参与是自愿的就不太具有说服力了。社交网络的网站和服务使得在线传播成为社会交往的核心,以至于大众如果不加入社交网络就会有错过重要信息或者与特定的社会组织失去联系的风险(Raynes-Goldie 2010)。因此,个体实际上是为了规避社会资本减少的风险(Ellison, Steinfield, and Lampe 2007)而被迫加入到这些网站中,这使得“自愿参与”成为一种幻觉。

如福克斯和科恩所说,与工业模式的生产比较,生产性使用模式应当被认为是具有高度剥削性质的,因为这种模式甚至不会为其工人大军提供一份工资来换取他/她们的劳动力和时间。当我们考虑到生产性使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时,这种对劳动力的剥削就变得显而易见了。2005年,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花了5.8亿美元买下了风靡一时的 Myspace (Brook 2005)。6年以后,随着 Myspace 用户的大量流失,新闻集团以3500万美元将它赔本出售(Stelter 2011),有力地证明了 Web 2.0 的受众商品所产生的价值。2011年春天,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公开上市,为其拥有者和投资者获得了80亿美元的利润(Levy and Spears 2011)。微博服务网站 Twitter 在二级市场上的粗略估价为77亿美元(Reuters 2011)。最后,Facebook 传言将于2012年首次公开上市,将具有1000亿美元的价值(Bilton and Rusli 2012; Cellan-Jones 2012)。显然,Web 2.0 的“受众商品”很有市场。以上这些网站和服务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其中存储了大量的生产性使用者创造的关于自己品位、喜好、倾向、习惯、爱好和兴趣等方面的信息。所有这些信息都导向了一个高度精确的受众商品。因此,这些网站可以把该商品卖给广告商,而广告商就可以据此对相应的受众展开微观营销,向那些对其提供的某种商品或服务产生初步兴趣的人进行推销,最终使其投资获得更好的收益。福克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性使用者在这一关系中的核心作用:“如果生产性使用者停止使用诸如 YouTube、Myspace 和 Facebook 等平台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生产性使用者的数量将会降低,广告商将会停止投资——因为其广告信息没有了目标,它们也无法找到潜在的消费者,新媒体公司的利润将会下降直至他们破产。”(Fuchs 2011, 298)。另外,通过关注 Google 及其“用户”制造的商品,福克斯(2012)将分析的视角扩展到万维网:“Google 剥削了它的用户以及万维网上的内容



生产者,因为他/她们的工作为 Google 的资本积累提供了服务,但却完全没有获得报酬。”(Fuchs 2012,44)因此,当生产性使用者开始制作内容时,他/她们就已经在为网站生产价值了,“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说,这意味着他/她们也生产了剩余价值,同时被资本剥削——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性劳动就是制造剩余价值的劳动。”(Fuchs 2009,30;亦参见 Cohen 2008; Klein & Wyrick 2007)根据斯迈思的著作,以及研究 Web 2.0 和社交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文献,Web 2.0 拥有者和生产性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超剥削性”(hyper-exploitative)的,因为“用户”完成了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工作,却竟然没有任何报酬。

已有初步的证据显示,生产性使用者正组织起来反抗这种超剥削性的关系。社交网络网站因为侵犯了生产性使用者的隐私而引发争议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这些争议常常被理解为源于(本质上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交网站对用户隐私的侵犯。将侵犯个人隐私作为分析这类抗议的唯一视角是有失偏颇的,也是错误的。若想更好地理解这些生产性使用者反抗的案例,正如布朗(即将刊印)所言:隐私和社交网络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如果遵从前者的原则就会使得后者的主旨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这些经常发生的反抗案例,最好被理解为在依循着生产性使用模式创制出的高度个人化的人工制品受到剥削后,生产性使用者对这种剥削进行的反抗。这个分类与其他不获报酬但工作卓有成果的群体有着深厚的联系,比如家庭主妇(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3; Huws 2003)和学生(Wright 2002; Touraine 1971)。

如前文中布朗斯(Bruno 2008)所指出的,生产性使用模式的社会和政治动态与马克思和自治论者所关注的工业工厂有着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生产性使用模式的社会和政治动态与家务劳动和学生的劳动也有所不同。当剥削是生产或生产性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和突出的特征时,工业时代所有者和工人的关系以及工人之间的关系,就与 Web 2.0 时代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就要求我们重新修正方法来更好地理解生产性使用模式独特的社会和政治动态。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目标是使工人醒觉自己正在受剥削,从而激起工人的愤怒以使得工人采取行动阻止这种剥削的环境,这也仍是“工人调查表 2.0”的目标。不同的是,研究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诸如 Flickr 等网站展现了生产性使用模式的突出特点,促使我们在研究“工人调查表 2.0”的程序性要素时必须谨慎。当我们试图沿着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

方法开展一项研究时,我们必须对这些特性加以考虑。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在 Web 2.0 环境下尝试着重新思考这些方法。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生产性使用模式的三个独特特点,以及这种模式与当代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我们要阐述的生产性使用的第一个特点是:与《工人调查表》和联合研究的对象相比,它缺乏一种特定的、实际存在的、稳定的地点以供研究者寻找潜在的研究主体。第二,这是一个非正式的、随意的和休闲的领域,使任何 Web 2.0 网站及服务屈从于正式的和严格的学术研究中保护被试的条款,将是一个挑战。一方面要考虑大学中学术伦理委员会非常正式的程序要求,另一方面要顾及 Web 2.0 网站与服务的非常不正式的传播规则和文化行为,这就需要我们选取一条独特的途径。这些途径和方法之间出现的不一致性在下文“工人调查表2.0”上篇中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三个特点与生产性使用模式的人工制品的本质有关,这将在下篇中得到阐述。生产性使用者在这些人工制品的设计、功能和演进中的核心作用,使得我们进一步修正方法论显得十分必要。下文将聚焦于这些修正的细节。

## 五、工人调查表 2.0: 上篇——Flickr 工厂

我们在这一部分将讨论“工人调查表 2.0”的原则,并且展现其对于社交媒体环境下生产性使用模式研究的适用性。我们将检视 Web 2.0 调查中存在的独特挑战,通过引入一个案例研究,即对于 Flickr 的生产性使用模式进行批判性检视,来揭示我们所提出的方法在该领域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 (一) 与研究参与者联系的地点

与“工人调查表”和联合研究相比,生产性使用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缺乏特定的、实际存在的、固定的地点与时间来招募研究参与者。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目标是理解权力关系如何在工业生产方式中循环往复,与之相似,在 Web 2.0 时代,理解生产性使用模式背后的社会或政治权力关系的需要未曾稍减。但是,因为缺乏核心的和固定的地理位置作为主要的研究地点,要像马克思和自治论者与工人联系一样与生产性使用者建立沟通和联系,就变得比出现在工厂大门口复杂得多。但是,Web 2.0 具有开放性,它是高度社交化和传播化的,这使得缺乏一个固定的地点来接触研究参与者这个

问题不像它看上去的那么严重。

这些网站的互联网协议(IP)地址,即 [www.flickr.com](http://www.flickr.com), 等同于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用来联系工人的工厂街区地址。互联网协议地址是虚拟的但又集中的集会地点,供生产性使用者建立和维系这些网站和服务。工业时代的工人们有着提前制定的和可以预计的工作时间,然而 Web 2.0 网站和服务包含着流动的、松散联系的生产性使用者网络。在 Flickr 的例子中,正是在这样一种空间内,生产使用者通过开放式的应用编程接口(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进行软件编码、分享照片、加入小组、与朋友交谈、评论他人的图像。在 Flickr 工厂的虚拟设施中最为关键的是,传播渠道不仅鼓励,而且使得社区成员之间分享思想、观点和意见的倾向变得自然。通过内部的通信系统,即如 Flickrmail 或讨论区,成员之间可以交流任何他/她们认为是重要的、能引发新想法的、或者在某个时刻令人激动的话题。

因此,Flickr 成员之间的沟通,是这个网站的基石。可以预见的是,这个可以被公开访问的论坛中的话题、焦点和精华正如其成员的兴趣和能力一样丰富多彩。从关于摄影技术的普通问题,到电子摄影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影响等深刻讨论,比比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对一个致力于共享照片的网站来说,Flickr 充满了交谈和争论。“找到”一些 Flickr 的成员并让他/她们谈论照片、摄影的方方面面不是一个难题,然而这些 Flickr 成员的诸多面向则成为了一个问题,本文的第七部分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进行这一类的学术性调查,完全遵从伦理条款、标准和正式手续也是具有挑战性的,而且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总之,“工人调查表 2.0”的第一个特点与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主要研究方法相仿。与那些负责在 Flickr 上不断更新人工制品的生产性使用者交谈,是我们衡量和解剖 Flickr 工厂的社会与政治动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些个体的观点、思想、印象、想法和感觉是我们尝试去理解这些社会与政治动态以及把握这些领域的生产性使用者们主观层面的核心元素。生产性使用模式的特性,加之对非医学研究中使用人类参与者的伦理要求,使得我们必须有计划、有策略地考虑和理解马克思和自治论者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 (二) 研究的伦理准则和 Web 2.0 网站的社会规范

第二个核心特点,同样要求修正方法以使其与招募研究参与者的环境特性相一致。我们主张招募研究参与者的方法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1)参与到社区的话题讨论中去;(2)选定一批参与者,更深入地采集数据;(3)访谈之前要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4)约定访谈的时间和媒介渠道。这个招募研究参与者的过程,其目标在于达成包容性,尽可能多地招募到参与者,同时尽量利用 Web 2.0 的传播优势。应当注意的是,下面将要讨论的这种特别为研究 Flickr 而设计的方法,并不能简单地照搬到其他也存在生产性使用的 Web 2.0 领域中去。

对于以人类为对象的在线研究而言,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成功地招募研究参与者,并使其留在研究项目中。当 Web 2.0 环境也同时是研究开展的地方时,这个过程格外地复杂。Web 2.0 网站和服务的规范行为都有其独特的模式。这种模式既随着时间的发展又将其成员的日常行为类型化。实际上,更好地理解 Flickr 不成文的规则和标准,恰恰是采用了该方法的本项研究的首要目标<sup>①</sup>。

与马克思的方法相似的是,“工人调查表 2.0”通过询问生产性使用者一系列问题来了解他/她们关于生产性使用模式的想法、感觉和意识。与马克思的方法比较,另一相似之处是,这个方法旨在提高生产性使用者们对自己被剥削程度的意识。在联合研究中,研究者们进入到产业工厂,有时在工厂里找一份工,与工人工作的同时来完成研究;与之相似的是,“工人调查表 2.0”也鼓励研究者成为 Web 2.0 网站(也是研究发生地)的一员。这一点是具有优势的,因为提前加入到这些网站中去,可以使研究者对这些网站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更为熟悉并对其加以分类,同时对更好地招募研究参与者也有很大的帮助<sup>②</sup>。但是,这一点引入了另一个重要的伦理性考量,需要我们加以重视。既是社群的一员又是研究者,学者或社群成员必须审慎地协商他/她们的角色。这么说的原因在于,如果两种角色的置换没有处理好,其他社群成员对研究者的信任就会被损害,他/她们继续参加研究的意愿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要使得研究获得成功,设计方法和开展研究的每一步都需要尊重这个特定空间的特殊规则。按照这个思路,研究者与社群成员最初的接触

---

<sup>①</sup> “工人调查表 2.0”这一研究项目最初的主旨在于回答以下问题:如果,根据哈特和奈格里(2004,66)所说,获取报酬的非物质劳动是具有生命政治性的,那么不计报酬的非物质劳动或者生产性使用的生命政治性是什么?依照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范例,衡量这个环境的生命政治性的最好方式是尝试去理解那些影响个体行动和反应的权力关系。

<sup>②</sup> 在此案例中,研究项目之前本文的第一作者已经加入 Flickr 有 5 年时间了。

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研究者最初发出的讯息或进入途径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个研究环境,例如太莽撞,或者在某个方面显得笨拙,那么 Web 2.0 网站和服务的成千上万的潜在的研究参与者就归零了。对本研究的设计来说,第一步是通过在 Flickr 的三个不同小组的讨论区里分别提出引人深思的问题来招募研究参与者。三个被用来招募研究参与者的小组是:Flickr 中心小组,Flickr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小组(API),以及 Utata 小组。这三个小组都被设置为“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加入”。重要的是,Flickr 上绝大部分小组都是由成员创建、组织 and 管理的。这些小组都有自我创制的条款来解释这个小组是关于什么的,关注的话题是什么,以及如果加入的话可以获得什么。这条款是我们决定选择哪个小组来招募潜在研究参与者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些条款描述了这个小组的目标,使得研究者对将要探究的小组的规则可以大致了解,尽管这一过程也阻力重重。

在最初讯息的标题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直接,并且也有建设性的问题:Flickr 有用吗?在接下里的讯息里,我们详细阐述了本研究项目的目标、研究者的身份、所属的工作单位以及更广阔的研究背景。这个问题引人思考的本质,加上接下来的描述,在其中两个小组的成员中引发了大量的回应<sup>①</sup>。在第三个组中,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良好回应,这使得我们意识到遵循该组的规则来设计问题的重要性。这是该方法目前存在的弱点,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七部分作更实质性的叙述。

在另外两组中,因为我们所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与小组情况更加符合,所以得到的反响也很好。Flickr 中心小组和 Utata 小组都是 Flickr 的公共小组,成员在其中讨论一系列关于电子摄影和照片分享的话题、观点、问题和要素。这两个小组的成员迅速地、热情地、全面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研究问题。就像在所有的讨论主线里总存在着一个时间点一样,在这个时间点上成员之间的对话按照其内在逻辑运行,并转向另外不同的主线来思考不同的想法和问题。这就是我们采取第二步即招募研究参与者的时机。根据我们对这些虚拟的、多变的环境的经验,迅速地发出要求后续访谈的讯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对潜在研究参与者继续参与研究项目的意愿有负面影响。

---

<sup>①</sup> 在 Flickr 中心小组中,总共有 44 个回应者和 101 条信息。在 Flickr API 小组中,总共有 3 个回应者和 3 条信息。在 Utata 小组中,共有 35 个回应者和 44 条信息。

像很多社交网络一样, Flickr 有一个内部邮件/讯息系统, 叫作 Flickr-Mail。成员之间可以通过这种较之小组讨论区更为私密的传播方式来互相联系<sup>①</sup>。当我们发起的话题开始进入讨论轨道后, 我们就迅速通过 Flickr-Mail 向所有参与讨论的成员发出一封私信, 询问他/她们是否愿意加入到一个更为深入的对话中来, 对话的核心是他/她们投入到 Flickr 上的时间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劳动, 以及他/她们是否感到自己被剥削。

第三个步骤是获取参与者的知情同意, 这在 Web 2.0 环境下是一个非常繁冗的任务。有一点很重要, 同时也有些令人沮丧, 那就是 FlickrMail 不允许在私信中添加附件, 这使得满足伦理要求的研究程序比我们设想的更加复杂。发出并收回一封包含着研究目的、研究者的职责、参与者的权利的知情同意信是任何符合伦理要求的研究的重要环节。但是, 它同时也成为阻碍 Web 2.0 网站和服务中随意的、非正式的、自然的传播流的一个因素。这种阻碍会影响研究参与者们是否继续参加研究。当发出和收取知情同意信的工作并非在研究开展的网站上进行时, 这种困难就更为明显。Web 2.0 的规则和风俗本质上是非正式的、随意的和放松的, 在哪里应该停顿以及语法和句子结构常常被忽略。这与伦理条款的正式的甚至经常是繁杂的特质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正式的文件和 Flickr 及其他 Web 2.0 网站和服务的休闲的、非正式的传播规则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使得成功开展类似于“工人调查表 2.0”之类的研究变得十分困难。

当 Flickr 成员同意参与到我们的研究项目之后, 我们就通过 FlickrMail 发出第二则信息, 询问参与者的电子邮件地址以便我们寄送知情同意信。当我们收到邮件地址之后, 就会将知情同意信作为附件添加到邮件上发送给参与者。这个步骤是十分敏感的, 因为参与者需要提供 Flickr 之外的联系信息。因为参与者在网站上可能使用假名、化名或者其他昵称来保护自己的身份(Raynes-Goldie 2010), 参与者可能在这一时间点上退出研究项目, 这必须引起重视。当收到参与者寄回的知情同意信后, 我们就开始起草第三则讯息, 来确定一个方便的时间和媒介渠道来开展半结构化的、开放性的访谈。<sup>②</sup>

---

① 当一个人注册了 Flickr 账户后, 他就自动地拥有了一个 FlickrMail 账户。

② 在尝试招收尽可能多的研究参与者时,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让受访者选择访谈进行的媒介。在本案例研究中, 电话、网络语音、即时通讯和邮件都被作为与受访者沟通的媒介。

开展访谈,是“工人调查表 2.0”的第一部分中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1938年,当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在《新国际》上再次出版的时候,编辑附带了一些建议,我们遵循了这些建议。这些开放的、半结构化的访谈受到了马克思的方法、问题和目标的启发,但同时又为反映 Flickr 和 Web 2.0 的生产性使用模式的特质而做了调整。访谈在时间长度上并不相同,平均起来每个访谈少于一小时,并且阐述了一系列包括 Flickr 成员是如何思考和感知他/她们花在这个网站上的时间、努力和精力,他/她们对自己的劳动时间和权力被剥削的意识,以及他/她们打算为改变自己的被剥削状态做些怎样的准备(这与马克思和自治论者提出的问题相似)等问题<sup>①</sup>。如上面详细叙述的步骤,“工人调查表 2.0”的第一部分仿效了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方法,但是又修正和改编了其步骤以便使用这些方法来研究当代的情况。如果将注意力仅仅置于生产性使用者的经验、印象和情感上的话,会使我们无法确认哪一则信息最能够反映成员的主观性和意识。因此,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人工制品上。

## 六、一个工人的调查 2.0: 下篇——研究的新目标

与其他利用了成员的无报酬劳动的 Web 2.0 网站和服务类似, Flickr 上几乎所有的生产性使用劳动都是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激励的,也正因为如此,生产性使用和马克思与自治论者研究的工业生产模式有本质的不同。塔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Tapscott & Williams)从商业咨询顾问的角度对 Flickr 大加赞赏,认为它见证了生产性使用模式里程碑式的变化。两位商业顾问评论道:

Flickr 为照片提供了基本的技术平台和免费的主机……使用者做了其他所有事情。例如,使用者添加了所有的内容(照片和标题)。他/她们为这个网站创造了自我组织的分类系统……他/她们甚至建立了绝大多数成员们用以接触、上传、控制和分享内容的应用程序。(Tapscott and Williams, 2006, 38)

---

<sup>①</sup> 这项研究项目的结果过于复杂,以至于不能完全在有限的篇幅内完全的阐释,也因此偏离了本文的中心目标。篇幅所限未能尽述的部分在接下来的其他文章中有所阐述(Brown 2012)。

塔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对生产性使用模式非常欣赏,与之相应,卡特琳·菲克(Caterine Fake)这位 Flickr 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前任所有者也认为:

Flickr 之所以成为 Flickr,是因为使用者发明了什么是 Flickr……像我们一样,外部开发者可以为它建立新的特征,给它赋予新的能力。事实上,我们和外部开发者使用了同样的 API,意味着他/她们和我们具有同样的能力。我们希望人们可以建设那些我们没有时间或资源建设的事物,比如用于 Linux 系统的上传器、桌面管理软件的插件、博客服务等。他/她们确实做到了。我们也希望他/她们可以建设我们未曾想过的事物。他/她们也确实做到了。(Tapscott and Williams 2006, xi)

最后,让我们转向布雷德利·霍洛维茨(Bradley Horowitz)的观点。作为雅虎的一位管理者并在 2005 年参与了雅虎出资约 3 千万美元对 Flickr 的收购(Schonfeld 2005),他直言:“虽然只有不到 10 个员工,Flickr 却拥有数百万个用户来为它创造内容,数百万个用户来为它组织内容,数万个用户在网络上发行内容,数千个不在工资表上的人进行建设和开发……这件事干得漂亮”(Levy 2006)。虽然“干得漂亮”,但从中也可以看出 Flickr 对于全球范围内非付酬劳动力的剥削。正如福克斯所说,“这种状况是无限的过度剥削的一种……(或者)是剥削的一种极端形式”(Fuchs 2011, 298)。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方法论为基础,向 Flickr 的生产性使用者展开询问。但是,生产性使用者在生产性使用模式中的核心地位,驱使我们重新思考一种因素,这种因素在马克思和自治论者调查工业生产模式时从来没有被思考过。

通过“利用”Flickr 会员的“集体智慧”,以及“对待使用者像对待合作开发者一样”(O'Reilly 2005),Flickr 的拥有者和管理者愿意放弃对发展照片分享功能的控制,更加愿意网站使用者来做大部分工作,诸如测试、除错、开发新的应用程序、编写软件,当然也包括上传照片。正如前引所述,生产性使用者的劳动过去是(并且将来也是)在网站的建设和创新上起着关键作用的因素。Flickr 的拥有者并不尝试着预测使用者从 Flickr 网站中想获得什么,也不为这些不可预测的结果贡献稀缺的时间和财政资源。相反的,拥有者把源代码公布给开发者社群,并利用这些开发者来为 Flickr 编码和做骇客。拥有者也



给予网站的会员以足够多的自主和自由,按照会员自己的意愿来建设和开发网站。另外,Flickr的拥有者还积极地鼓励生产性使用者通过论坛来与自己展开交流。拥有者通过密切地关注会员们的发言,从中采纳众多生产性使用者的建议,并由Flickr的正式员工将这些建议融入到Flickr的设计和功能中去。一位Flickr的正式员工,软件开发者埃里克·卡斯特罗(Eric Costello)披露说:“使用者的反馈……促成了很多关于功能的决定。我们很早就有了使用者论坛,人们通过这个论坛来告诉开发者他/她们需要什么……我们确实关注着数字,但实际上我们更注意倾听。我们倾听着人们在论坛上说些什么”(Garrett and Costello 2005,11—24)。因此,Flickr的发展之道并不按照传统公司的层级来进行,即,并不由公司高层告诉其他拿工资的劳动者应该建设什么事物,严格地、科学地管理劳动者应该怎么来建设。相反,通过逆转这个命令和控制结构的方向,网站的拥有者和管理者采用了一种放手的方式,允许生产性使用者按照他/她们自己的设想来建立Flickr。

简而言之,Flickr反映了会员而非拥有者和管理者的主观要求、需求、欲望和劳动。当马克思和自治论者将工业劳动者生产的终端产品视为整个生产模式的重要元素时,从来没有把它们当成一种关于工作场所的社会和政治动态的知识或洞察力的来源,也没有把它们当成生产这些产品的人的主观意识的反映。对于马克思或自治论者来说,终端产品,不管是煤炭、汽车或者是打字机,对工人的主体性而言都没有解释价值或者诠释价值。但是,如Flickr的发展历史所启示的,生产性使用者的主体性在网站的设计、功能和所存储的内容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贡献和地位,这就意味着继续忽视这些人工制品的生产性使用是一个错误。如果忽视这些人工制品,就是把关于生产性使用模式的社会和政治动态,以及建设Flickr的生产性使用者的主观意向等宝贵信息排除出了考虑范围。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一直在发展中的人工制品,把它作为了解工作场所的社会和政治动态,以及工人主观性、禀性、倾向性和意识的重要指数。马克思和自治论者忽视了工业劳动的终端产品维度,这是正当的。因为工业劳动力的科学管理将工人的思想与他/她们双手创作出的产品进行了异化,分割了开来,使得工人的主观性和终端产品之间并不存在一条联系的纽带。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或自治论者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检视这些终端产品,以期获得对那些遵从命令做工的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然而,在Flickr的案例中,劳动者生产了原始内容,他/她们或捕捉、上传、编

写索引,为几千万张照片做脚注,或编写代码以创造新的应用程序和软件,提供稳定的输入流、反馈和方向,这些从网站整体的结构和感觉上,给予了 Flickr 的会员们更高的主体地位。

总之,Flickr 的发展史与很多 Web 2.0 的网站和服务相仿,它们都没有由网站的拥有者或管理者们通过一个层级化的、自上而下的结构来驱动、指导或者科学管理。相反,就像前述一位 Flickr 的前任拥有者所指出的,Flickr 的成员和生产性使用者造成了 Flickr 为什么是今天的 Flickr——他/她们多变的需求、个性化的欲望、俏皮的处理和复制、满怀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他/她们那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治的劳动,成为 Flickr 的发展源泉。如果没有这些会员们的指导、引领和不计报酬的劳动,这个分享照片的社交网络将什么都不是。工业生产过程是繁冗的、单调的和高度重复性的。在 Web 2.0 环境下,与之完全不同的是,工人们不再是对事物的建设毫无控制;恰恰相反,Flickr 网站的生产性使用模式决定了生产什么产品、什么时候生产、怎么生产、这些产品意味着什么、谁的需求会得到满足等。这种区别赋予生产性使用的人工制品以特别重要的阐释性价值。

要完成这个新的研究目标,首要途径是检视在成功引发大家参与热情的 Flickr 内部,特定的小组拥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动力和动员手段。比如说,Utata 小组在本项研究中是招募研究参与者的一个来源,也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个小组仅有几则简单的章程以及要求会员有礼貌,但它的自我组织、自我激励并且不计报酬的管理者进行了生产性使用,围绕着照片、思想和观点的分享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凝聚力的社群。Utata 小组有超过 2 万名成员,有超过 37.5 万张照片上传到小组的照片流中。他/她们组织了每周一次的“照片活动”,每个照片活动都围绕着不同的主题和特定的摄影技术开展。每周四,成员们会加入一个虚拟的“照片漫步”活动。他/她们拍摄自己在当天看到的地点、人像和空间,并把他/她们最喜欢的照片上传到照片流中。在这个小组的讨论区中,成员们对观点、问题、思想和照片进行了彬彬有礼和细致入微的讨论。如果有时候讨论进入到白热化,他/她们可以送给对方一块虚拟的蛋糕以示好意和支持。简而言之,Utata 小组是一个可以将成员们的创造性活动导向富有灵感的成果的一个神奇组织。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Flickr 交响曲”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音符,叫作“平民项目”(The Commons)。平民项目起始于 2008 年,是美国国会图书馆(LOC)和 Flickr 的一次携手合作。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 Flickr,询问是否可

以将馆藏的摄影收藏品与 Flickr 成员分享,并通过“利用他/她们的集体智慧”为这些摄影作品添加信息以进行展示。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扩大和增长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品的公众影响力,同时完善馆藏品可供查阅的信息。国会图书馆将摄影库存通过网络呈现在对摄影感兴趣的最大一组人们面前,并直接问他/她们是否可以提供帮助。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表示,这项工程“得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正面成果”(Springer et al. 2008,2)。

使用 Flickr 的最大好处之一,是它有一个内置的标签系统,生产性使用者可以使用这个系统为别人的照片添加描述性的标签。“在这个具有先驱意义的项目中,格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对标签采取了一种无为而治的策略,不去审查那些明显不恰当的内容。(……)Flickr 社群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只有极少的标签低于文明语言的底线”(Springer et al. 2008,18)。

在平民项目中,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参与对于 Flickr 和图书馆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国会图书馆在其内部报告中作出结论:“国会图书馆的 Flickr 账号获得了压倒性的正面反应,这表明我们应该继续参与到平民项目中去”(Springer et al. 2008,33)。这个项目和 Flickr 工厂在其他方面的成功,对我们理解这个空间的社会和政治动态有着很大的启发。如前所述,与工业时代流水线上的汽车不同,生产性使用的人工制品饱含着经由生产性使用模式创造的多元的主体性,值得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欣赏。

关于这个研究项目的全部结果,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尽述。但是,简言之,“Flickr 交响曲”的社会和政治性动态可以总结如下,即为 Flickr 创制和开发作出努力的个体并不认为他/她们花在网站上的时间、努力和精力是劳动的一种;他/她们也不觉得自己被 Flickr 的拥有者所剥削。但如本文所示,Flickr 的拥有者和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显著剥削性的。通过各种机制和系统深入挖掘 Flickr 的“利他性基底”(Springer et al. 2008,15),这些网站和服务的拥有者可以征募到一支生产性使用者大军来创制社会连接和社会关系,以满足增长的需求,拓展“Flickr 交响曲”的疆界。这种情形颇为吊诡,也正是出于此,我们在研究 Web 2.0 网站和服务时,应聚焦于如何提高生产性使用者对他/她们受剥削状况的意识。

如果我们要理解生产性使用模式中的劳动,理解它的身体和精神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如何与物质劳动有所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可以带来哪些政治潜力,我们就需要更多地了解生产性使用模式中的虚拟装备和齿轮,以便理解其生产出的人工制品,它的内部运作,以及社会动态。换言之,我们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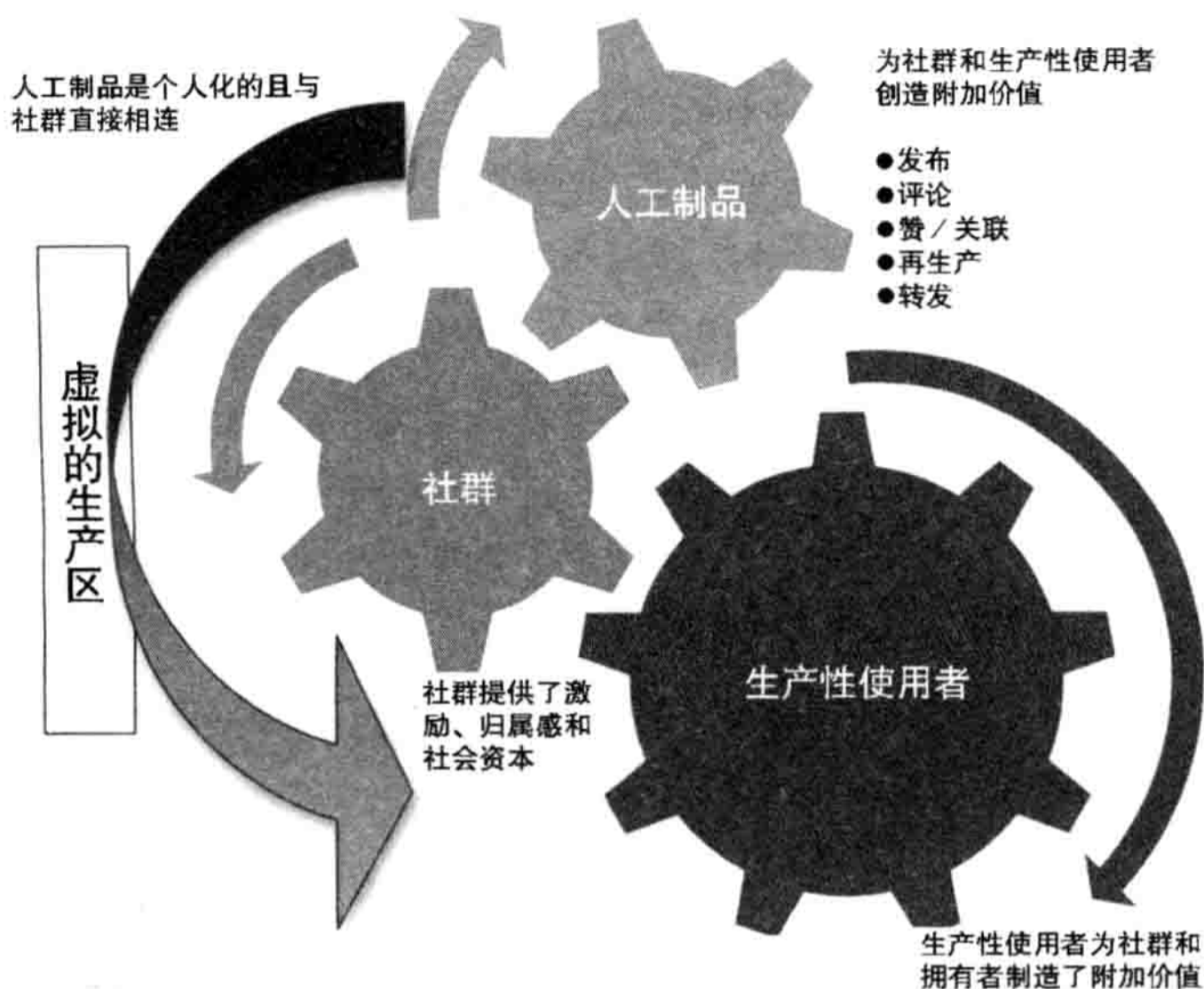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性使用模式的特殊性及其对研究方法的影响

继续参与到严肃的学术工作中去,研究生产使用者怎样工作、他/她们为什么要工作,以及他/她们的工作在哪里被复制。前述方法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条进路。

图1展示了居于我们研究方法框架核心的三个关键维度:(1)人工制品;(2)生产性使用者社群;和(3)生产性使用者本身。马克思和自治论者考虑到了工人本身,但没有理由再去考虑工业劳动的终端产品从而更好地理解工人的主体性。但如图1所示,在Web 2.0时代和生产性使用模式下,人工制品是具有影响力的工具,为生产性使用模式的整体动态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因为这一点,“工人调查表2.0”采用了“上下篇”的分析法。与马克思和自治论者非常相似的是,本研究开始于虚拟的“生产区”,与负责为Web 2.0网站和服务进行生产性使用并因此被剥削的工人展开对话,但是接下来则超越了传统的方法,对工人运作的社群加以考虑,也对他/她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人工制品进行诠释,从中获得关于浸润着生产性使用方法和关系的社会和政治动态的重要细节。

## 七、“工人调查表2.0”的优势和劣势

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和方法论的语境

中探讨“工人调查表 2.0”，还要理解这种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所应用的方法之间的联系。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把这种方法与其他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技术进行比较，来分辨出这种新方法的优势和劣势。更重要的是，我们表明“工人调查表 2.0”是如何建立在人类学家所实践的民族志方法上，侧重田野中的活生生的经验和情况。我们也将展示“工人调查表 2.0”和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的不同之处，并将特别介绍 Web 2.0 和生产性使用中涌现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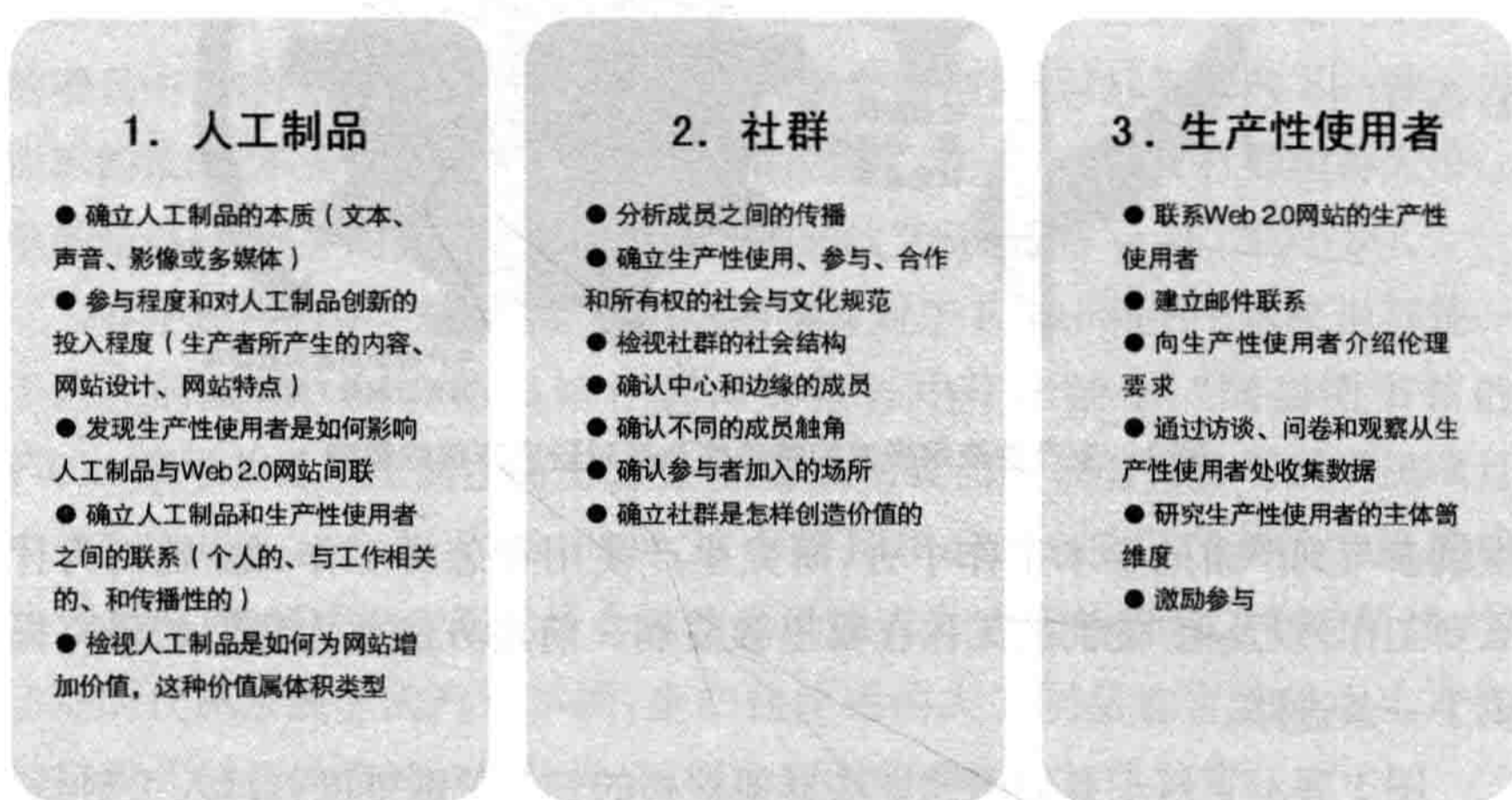


图 2 检视“工人调查表 2.0”的框架

**田野：**在田野中积累的经验是开展任何民族志的核心。不过民族志通常指的是居住在其他文化中或将自己浸淫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而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民族志意味着成为网络社群的一部分(Kendall 2002)。这部分意味着理解社会意义，并参加到“日常的活动”中去(Brewer 2000, 10)。

**多重来源：**“工人调查表 2.0”依赖于多重信息来源，很大程度上是仿效了社会科学所应用的质性研究方法。这不仅包括通过论坛/小组讨论、访谈和问卷来收集关于生产性使用模式的数据，也尝试着超越常规的收集某种数据的方法。图 2 显示，人工制品的本质、其与社群和生产者的关键联系是一个核心的数据来源。

**三角交叉检测法：**与质化研究相似的是，三角交叉检测法在分析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质化分析中的三角分析检测法是指研究某来源的数据与其他来源的数据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比较和对比两个不同

来源之间的数据,来获得一个关于置身其中的个体和他/她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更为丰富和全面的图景。三角分析检测法对于了解网络社群的本质、规范和习俗有着重要作用。

**作为数据的人工制品:**将“工人调查表 2.0”与其他数据收集方法区分开来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把研究重心放在 Web 2.0 环境中被生产性使用者所产制的人工制品上。这些人工制品直接表明了存在于网站的生产性使用者、社群的其他成员以及规范与习俗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人工制品是“工人调查表 2.0”的丰富的数据来源。

**工人的觉醒:**“工人调查表 2.0”的主要目标是尝试展开讨论,理解生产性使用者与 Web 2.0 的网站和服务之间独特的剥削关系。参与到这些社交媒介环境中,可谓收益和成本并存。一方面来说,毫无疑问,社交媒介为其中的参与者创造了收益,包括添加用户创制内容的乐趣,以及参与到社群中并为之作出贡献从而获得特定地位(见图 1 和图 2)。在一项关于 Facebook 的使用与满足的研究中,受访者表明了他/她们核心的满足是要在这个网站上消磨时间(比如,为了娱乐、为了放松和为了逃避)(Paparicharissi and Mendelson 2011; QuanHaase and Young 2010),或者为了社会监控和社会搜寻(比如,在家人和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了解他/她们的信息)(Joinson 2008; Zhang et al. 2011),以及为了维系社会纽带(即与家人和朋友建立联系)(Dunne, Lawlor and Rowley 2010; Raacke and Bonds-Raacke 2008)。另一方面来说,生产性使用者并没有因为他/她们投入到网站上的时间、努力和附加价值而获得报酬。事实上,生产性使用者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控制网站怎样管理内容,例如 Facebook 及其不断变化的条款所彰显的。与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相似的是,通过使生产性使用者意识到他/她们的劳动是这些网站积累财富的来源,可以寻求提高这些生产性使用者关于自己的被剥削程度以及解决该问题能力的意识。如图 2 所示,关于成本和收益的详细分析也是理解 Web 2.0 环境中生产性使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行动和社会变迁:**马克思的“工人调查表”和自治论者的联合研究方法的基石在于,方法不仅仅应该导向工人们关于他/她们被剥削的劳动力状况的意识,并且最终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如前文所述,这项介入的目的是“使得工人意识到他/她们自己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险境……并使得工人们意识到他/她们有机会去解决这种困境”(Burnham, Shachtman and Spector

1938,1)。尽管“工人调查表 2.0”有着相同的终极目标,我们却很快发现这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任务。使这种终极目标变得复杂的是,加入到这种剥削关系有着半自愿的性质。在工业生产模式下,工人们对自己在哪里工作几乎没有选择;但是在 Web 2.0 环境下,加入到生产性使用模式中并不由缺少收入的危机所驱使,而是为社会闭锁和传播隔绝的危机所驱使。虽然生产性使用者可以很轻易地转到其他(通常是新的)Web 2.0 网站和服务中去,但是在当今传播环境下,他/她们只集中在一小部分网站上并依赖这些网站来满足自己的传播需要。随着情况发展,这种方法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并且要应用到研究社交媒介环境下半自愿的生产性使用模式中去。

**核心优势与劣势:**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确认出“工人调查表 2.0”的核心优势和劣势。“工人调查表 2.0”的核心优势,并不仅限于辨认出存在于 Web 2.0 网站和服务拥有者与其生产性使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而更在于依循着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道路,通过直接地与工人接触来试图更好地理解他/她们关于自己被剥削的想法。这种方法使自下而上地从工人角度检视生产性使用模式的社会和政治动态成为可能。但是,“工人调查表 2.0”的功能并不只在于其揭露性,而更在于它尝试着更好地理解生产性使用的政治潜力,以及关于合作小组的自治生产能力的假设。虽然对 Web 2.0 网站和服务的估价明确地显示了剥削关系的存在,这种剥削关系的存在,以及生产性使用者关于自己花在网站上的时间和努力的观点,不应该削弱生产性使用模式创造出的可能与潜能。因此,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检视和甄别那些体力和脑力劳动协同合作、完全自治和不计报酬的组织方式。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首要目标是向工人提供一种可以用来抗争被剥削状态的智识和感情工具。虽然生产性使用是具有高度剥削性质的,Flickr 的生产性使用者却不这么认为。所以,使这种剥削关系明晰化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生产性使用模式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自治模式指出了一种超越资本的同工同生活的模式,这却显然不是一幅完美的蓝图。无论如何,它确实在我们理解这种可能超越了资本剥削关系的生产方式/生产性使用模式的组成部分的过程中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

“工人调查表 2.0”的核心劣势在于,相比全部 Flickr 成员来说,只有有限数量的生产性使用者作为研究参与者获得询问。Flickr 前前后后拥有着超过 5100 万成员,我们不可能与他/她们中的每一位都取得联系。这使得 Flickr 交响曲中的某些乐段未被完全探索,或完全没有被探索。Flickr API

小组对我们的研究问题几乎没有反应,这体现了生产性使用是自愿性质的以及 Flickr 中某些特定小组关注点的特殊性,从而对开展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研究者试图评估和招募 Flickr 成员来参加一个研究项目,但该项目的目标与他/她们加入到该网站的主要目标相异。我们尝试从 Flickr API 小组招募成员就显示了这些新的挑战。

在 Flickr API 小组中,没有报酬的骇客和编程人员使用 Flickr 的代码一起工作,彼此分享经验。虽然 API 小组被设置为“公开的”和向所有人开放的,但这个小组的关注点和绝大多数讨论的主题压倒性地倾向于技术编程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向这个小组的成员提出的研究问题,和他/她们的核心活动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也就被绝大多数小组成员所忽略。这也佐证了我们上文中提到的问题。在 Web 2.0 网站和服务中,即使研究者对该网站的特殊规范有着全盘了解,并能够接触潜在的研究参与者,但特定小组的成员仍可能不会作出回应,忽略参加研究的通知,于是导致研究项目在开始之前就止步不前。

编写 API 所需要的时间、努力和精力是相当多的。正因如此,这个小组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有趣的生产性使用者,可以探讨他/她们是否感觉自己的活动是一种劳动,以及他/她们是否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被剥削。获得这些数据对研究生产性使用者是高度相关的,因为他/她们参与到为 Flickr 创造高度专业化的知识的过程中,部分意义上决定了 Flickr 如何运行,同时也是 Flickr 能够制造人工制品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我们从 API 这个小组招收到了两位研究参与者,但他/她们对研究问题的回答,比之 Flickr 中心小组和 Utata 小组的成员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 Flickr API 小组主要是供骇客或编程者来讨论编写 API 的复杂性、挑战性和机会的。但是我们仍不清楚,为什么作为对 Flickr 开发起支柱性作用的小组,却对回顾关于他/她们劳动的实践最为犹豫。这个未解决的问题仍待以后的研究继续关注。

接触在 Flickr 工厂的重要角落里工作的生产性使用者很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评估生产性使用模式的整体社会和政治动态时,人工制品是格外重要的元素。人工制品不能取代生产使用者的投入,但是如果不考虑人工制品,我们就会忽略对 Flickr 工厂中一些细节的检视。认识到这个方法的缺点对我们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但这一点并不能削弱其他参与到该研究中的成员所提供信息和数据的价值。



## 八、结 论

马克思和自治论者所采用方法的目标,是寻找到工人,与他/她们对话,评估工作场所的社会和政治动态,测量工人的被剥削程度,了解工人是否对自己被剥削有所意识,以及通过这些向他/她们提供可以采取行动的智识和感情的工具。这仍然是“工人调查表 2.0”的目标。我们在上篇中详细叙述了研究设计,描述了修正马克思和自治论者的研究方法来适应 Web 2.0 时代和生产性使用模式的步骤。但是,除了寻找生产性使用者并与他/她们对话这个步骤之外,我们还必须检视他/她们生产性使用的人工制品,以期更好地理解赋予生产性使用模式以生命力的社会和政治动态的复杂性和细微之处。我们在下篇中指出,人工制品关键的功能是被生产性使用者所发掘、引导并生产性使用的,而非被网站和服务的拥有者和管理者生产出来的,因此,这些人工制品是珍贵的数据来源。

这些人工制品,以及产制它的生产性使用模式,提供了一种证据,证明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个体可以通过自治的方式,与别人合作或联合,不计酬劳甚至使用自己的设备来完成工作。这告诉我们,当纯粹的个人利益和金钱关系退居二线时,我们彼此之间是如何建立关系的。虽然工业生产把工人和劳动力变得碎片化,数量众多、科学管理、彼此分隔乃至令人泄气 (Braverman 1998; Lukacs 1967),生产性使用模式则提供了一个场域,允许所有的贡献汇成整体。当我们把这些人工制品及其成果放置在聚光灯下,尽其可能地从中学习,当我们一一检视那些成功、失败、后退和成就,我们能提供给生产性使用者的就不仅仅是他/她们受剥削的证据,更重要的是,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体力和脑力劳动组织在一起的可行性,即使不完美,但它不被资本家命令和控制。最终,人工制品既是对现状的批评,也是未来可能性的证明。因此,从这个微不足道的角度来看,Flickr 为思考生活和劳动在一个超越资本的世界上的意义,提供了智识和感情的工具。

### 参考文献:

- Barnsley, Jan, and Diana Ellis. 1992. *Research for Change: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for Community Groups*.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Women's Research Centre.
- Bilton, Nick, and Evelyn Rusli. 2012. *From Founders to Decorators, Facebook Riches*.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2/02/technology/for-founders-to-decorators-facebook-riches.html?\\_r=1&src=meandref=technology](http://www.nytimes.com/2012/02/02/technology/for-founders-to-decorators-facebook-riches.html?_r=1&src=meandref=technology)

Bologna, Sergio. 1980. The Tribe of Moles. *Semiotext(e)* 3(3):36—61.

Braverman, Harry. 1998.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ewer, John D. 2000. *Ethnography*.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Brook, Stephen. 2005. Sale of Website to News Corp Branded a ‘Giveaway’. Accessed March 20,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2005/sep/01/media.business1>

Brophy, Enda. 2006. System Error: Precarity and Collective Organizing at Microsoft.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619—638.

Brown, Brian A. Forthcoming. Primitive Digital Accumulation: Privacy, Social Networks & Biopolitical Exploitation. *Rethinking Marxism*.

Brown, Brian A. 2012. *Will Work For Free: The Biopolitics of Unwaged Immaterial Labour*.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Faculty of Information and Media Stud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Bruns, Axel. 2008.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New York: Peter Lang.

Burnham, James, Max Shachtman, Max, and Maurice Spector. 1938. Introduction to Marx’s “A Workers’ Inquiry”.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ni/vol04/no12/marx.htm>

Cassano, Rosemary, and Judith Dunlop. 2005.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with South Asian Immigrant Women: A Canadian Example. *Critical Social Work* 6(1).

Castells, Manuel and Peter Hall 1994. *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Twenty-First-Century Industrial Complexes*. London: Routledge.

Cellan-Jones, Rory. 2012. Facebook’s IPO—It’s Up To You.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6835116>

Cohen, Nicole. 2008. *The Valorization of Surveillanc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acebook*. Democratic.

*Communique: Journal for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s* 22(1):5—22.

Coté, Mark, and Jennifer Pybus. 2007. Learning to Immaterial Labor 2.0: MySpace and Social Networks. *ephemera: theory and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7(1):88—106.

Dalla Costa, Mariarosa and Selma James. 1973.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Bristol, England: Falling Wall Press.

Duhigg, Charles and Barboza, David. 2012, January 25. In China, 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an iPad.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1/26/busi->

ness/ieconomy-apples-ipad-and-the-human-costs-for-workers-in-china. html? pagewanted =all

Dunne,? ine, Lawlor, Margaret-Anne. , and Rowley, Jennifer. 2010. Young People'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A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active Marketing* 4(1):46—58.

Ellison, Nicole B. , Charles Steinfield, and Cliff Lampe.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article 1. Retrieved from <http://jcmc.indiana.edu/vol12/issue4/ellison.html>

Fake, Caterina. 2006. Foreword. In *Flickr Hacks: Tips and Tools for Sharing Photos Online*. Sebastapol, CA: O'Reilly Media.

Fals-Borda, Orlando and Muhammad Anisur Rahman, eds. 1991. *Action And Knowledge: Breaking the Monopoly wit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New York: The Apex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09.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 A Critical Case Study of the Usage of studiVZ, Facebook, and MySpace by Students in Salzburg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Salzburg/Vienna: Research Group UTL.

Fuchs, Christian. 2011. Web 2.0, Pro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8(3):288—309.

Fuchs, Christian. 2012. Google Capitalism. *tripleC: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10(1):42—48.

Garrett, Jesse James, and Eric Costello. 2005. An Interview With Flickr's Eric Costello.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www.adaptivepath.com/ideas/essays/archives/000519.php>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Huws, Ursula.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London: Merlin.

Joinson, Adam. 2008. ‘Looking at’, ‘Looking up’ or ‘Keeping up with’ People? Motives and Uses of Facebook. In *Proceedings of CHI'08*, 1027—1036.

Kendall, Lori. 2002. *Hanging out in the Virtual Pub: Masculinities and Relationships Onlin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leiner, Dimytri and Brian Wyrick. 2007. *InfoEnclosure 2.0*. Accessed March 15,

2012 from Mute: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the Net; <http://www.metamute.org/en/InfoEnclosure-2.0>

Lazzarato, Maurizio. 1996. Immaterial Labo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133—147.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evy, Ari, and Spears, Lee. 2011. LinkedIn Retains Most Gains Second Day After Surging in Initial Offering.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5-18/linkedin-raises-352-8-million-in-ipo-as-shares-priced-at-top-end-of-range.html>

Levy, Steven. 2006. *The New Wisdom of the Web*. Accessed March 15, 2012 from Newsweek; <http://www.newsweek.com/id/45976>

Lukács, Georg. 1967.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Press.

Malo de Molina, Marta. 2004a. Common Notions, Part 1: Workers-Inquiry, Co-Research, Consciousness Raising. Accessed February 23, 2012; <http://eipcp.net/transversal/0406/malo/en>

Malo de Molina, Marta. 2004b. Common Notions, Part 2: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articipatory Action-Research, Militant Research. Accessed February 23, 2012; <http://eipcp.net/transversal/0707/malo/en>

Marx, Karl. 1938/1880. A Workers' Inquiry. Accessed March 15, 2012 from Marxists.org;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ni/vol04/no12/marx.htm>

Moretti, Stefania. 2010, November 2. Facebook using Canada as testing ground. London Free Press.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www.lfpress.com/money/2010/11/02/15923106.html#/money/2010/11/02/pf-15923101.html>

Negri, Antonio. 1989.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Great Britain: Polity Press.

Negri, Antonio. 2008. *Reflections on Empire*. Cambridge, U. K. : Polity Press.

O'Reilly, Tim. 2005. *What is Web 2.0? Design Patterns and Business Model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oftware*.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oreilly.com/web2/archive/what-is-web-20.html>

Papacharissi, Zizi, and Andrew Mendelson. 2011. Toward a New(er) Sociability: Uses, Gratifica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on Facebook. In *Media Perspectives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Stylianos Papathanassopoulos, 212—230. New York: Routledge; 212—230.

Precarias a la deriva. 2004. *Adrift through the Circuits of Feminized Precarious Work*.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eipcp.net/transversal/0704/precarias1/en>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Canada. 2009. Facebook Agrees to Address Privacy

Commissioner's Concerns. Retrieved from [http://www.priv.gc.ca/media/nr-c/2009/nr-c\\_090827\\_e.cfm](http://www.priv.gc.ca/media/nr-c/2009/nr-c_090827_e.cfm)

Quan-Haase, Anabel, Alison and Young. 2010.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Social Media: A Comparison of Facebook and Instant Messaging.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30(5):350—361.

Raacke, John and Jennifer Bonds-Raack. 2008. MySpace and Facebook: Applying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to Exploring Friend-Networking Sites.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ur* 11(3):169—174.

Raynes-Goldie, Kate 2010. Aliases, Creeping, and Wall Cleaning: Understanding Privacy in the Age of Facebook. *First Monday*, 15(1), January.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Article/2775>

Reuters. 2011. Twitter Share Auction Suggests \$7.7 Billion Valuation. Accessed March 15,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3/04/us-twitter-idUSTRE7221JL20110304>

Schonfeld, Erick. 2005. The Flickrization of Yahoo! Accessed March 20, 2012: [http://money.cnn.com/magazines/business2/business2\\_archive/2005/12/01/8364623/](http://money.cnn.com/magazines/business2/business2_archive/2005/12/01/8364623/)

Situaciones Colectivo. 2005. Something More on Research Militancy: Footnotes on procedures and(in)decisions. *Ephemera* 5(4):602—614.

Smythe, Dallas.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1—28.

Springer, Michelle, Beth Dulabahn, Phil Michel, Barbara Natason, David Reser, David Woodward, and Helena.

Zinkham. 2008. For the Common Goo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Flickr Pilot Projec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telter, Brian. 2011. News Corporation Sells MySpace for \$35 Million. Accessed March 20, 2012: <http://mediadecoder.blogs.nytimes.com/2011/06/29/news-corp-sells-myspace-to-specific-media-for-35-million/>

Tapscott, Dan and Anthony Williams. 2006.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New York: Portfolio.

Taylor, Frederick Winslow. 1915.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Toffler, Alvin. 1981.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Touraine, Alain. 1971. *The May Movement, Revolt and Reform; May 1968 - The*

Student Rebellion and Workers' Strikes-the Birth of a Social Move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Whyte, William F. 1990. Introduction. I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edited by William F. Whyte, 7—15. Newbury Park, CA: Sage.

Whyte, William F. , Davydd Greenwood, and Peter Lazes, Peter. 1990.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Through Practice to Science in Social Research*. I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edited by William F. Whyte, 19—55.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Sage.

Wright, Steven. 2002. *Storming Heaven: 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 Sterling, Virginia: Pluto Press.

Zhang, Yin, Leo Shing-Tung Tang, and Louis Leung, Louis. 2011. Gratifications, Collective Self-Esteem, Online Emotional Openness, and Trait like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s Predictors of Facebook Use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 (12): 733—739.

卡特琳娜·基瑞特丽·虞格仁(Katarina Giritli Nygren)<sup>①</sup>

卡特琳娜·L·基隆德(Katarina L. Gidlund)<sup>②</sup>

## 技术的牧领权力：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

白杨(译),张志华(校)

[导读]本文意在依据福柯“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思想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现象。<sup>③</sup> 牧领权力并未取代其他的权力概念,但是,在我们考察那些理性又负责任的主体——它们愿意并有能力维持其他的(alternative)权力概念——之塑造时,牧领权力提供了另一个分析的维度。本文主要借助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以及后结构主义关于霸权与上层建筑的最新研究中有关

---

① 中瑞典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其研究领域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思数字文化中的技术,不仅为了加深对技术本质的理解,而且为分析技术促进或阻碍既定社会实践方面的影响提供有力工具;二是关注正常化(normalization)过程中有关种族、性别与阶级的包容和排斥。地址:瑞典松兹瓦尔中瑞典大学(Mid Sweden University, Sundsvall, Sweden),电子邮箱:katarina.giritli-nygren@miun.se

② 中瑞典大学信息学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是对数字技术和社会变化的批判研究。她关注的议题包括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设计、陌生化、设计的话语层面、修辞与实践的互动(霸权及其物质实践、权力结构、主导叙事的影像化与嵌入式的国际性)。她担任瑞典电子治理研究网络(Swedish eGovernment Research Network)联合协调员、国际电子治理会议(International EGOV)和斯堪的纳维亚信息系统会议(Scandinavian Information Systems Conference)项目委员、《公共信息系统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Information Systems)编委。地址:瑞典松兹瓦尔中瑞典大学(Mid Sweden University, Sundsvall, Sweden),电子邮箱:katarina.lindblad-gidlund@miun.se

③ 牧领权力,又译“牧引权力”,指上帝如同牧羊人带领其羊群那样带领民众,上帝施加于世人的权力如同牧羊人施加于羊群那般起着带引的作用。近代西方国家把一种诞生于基督教制度的牧领权力整合进新的政治形态之中而得以崛起。牧领权力制度开启了近现代西方以国家名义为理由的截然不同的治理术,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福柯阐发的牧领权力思想认为,基督教牧领权力在拯救、律法和真相之下建立了其他关系,宗教牧领制度是一种引导人举止行为的特殊权力形式,但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针对该引导权力的反引导(contre-conduite)举动,引导与反引导之间呈现对峙、敌对、交战的关系。——译者注

技术的论述,由是,作者在工业技术语境下的“机器设计”和数字技术语境下的“数字文化设计”两个影响(repercussions)层面对技术予以分析。牧领权力不仅使我们关注技术之形成,还让我们关注有能力为技术承担责任的个体之形成。这意味着有必要承认意识形态权力的有效性以及意识形态的物质现实性。

现在,广泛的时代信念就是促进经济全球化,大力发展互联网。但是,技术的进步和数字通信的实现,降低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这本是作为人们身份识别的基本元素。因此,没有确定位置和可能的时空消逝构建了一种新的异化形式——数字异化,而这种异化不仅使数字的“自我”成为了商品,而且重新创造并隐藏了当代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冲突。正如作者所言:“数字技术提出了一种间接的机制,将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官方目标转换成个人的选择和需要承担的义务,使先进的、自由的管理方式成为可能。”

[关键词]数字文化,异化,牧领权力,数字实践

## 一、引言

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 21 世纪的信息社会,其困难程度和回报程度一样大。难度大,是因为论证的复杂思路要求揭示大量的隐匿现象;回报高,则由于其精细的分析工具能发现存在于任何历史物质性中的权力结构。我们将主要借助马克思早期的文献(Marx 1963, 1986),以及后结构主义有关霸权和上层建筑的最新研究,来论证这一尝试将有助于加深对我们这个时代数字技术实践之理解。在 21 世纪信息社会进行经典马克思式的技术分析,数字技术几乎可被视作对自动化、剥削与合理化诸原则的强化,例如,对电子绩效监控系统的采纳正在进一步强化有关生产率、劳动分工与剩余价值等诸多泰勒式<sup>①</sup>思想(Aiello and Kolb 1995; Carayon 1993)。然而,我们想要关注的是技术发展的另一面——数字实践在私人领域内的运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如果想要认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新方式,进行马克思式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

<sup>①</sup> 通过“泰勒式管理”方法,每一项工作、任务和步骤都可被详细描述和精确测量,以实现时间和经费最优化。——译者注



有鉴于此,我们依据福柯“牧领权力”概念来回顾马克思对异化和技术的理解,以此发现数字时代权力分配的新方式。依据一些福柯追随者的看法,现代(和其他时代一样)以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实践为标志(参见 Bocock and Thompson 1992)。标志这个时代之特性的所有现象,或被用于加强或被用于抵消这种社会实践。牧领权力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取代其他权力概念,而是提供了另一种分析层面,由此可考察愿意且有能力维持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实践的主体之形成。将数字文化中的异化视作权力的牧领形态之衍生物,使得探讨运行于思考和行动之结构中的技术成为可能,而后者在数字时代看上去常常与权力关系无关。

马克思和福柯的理论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之处(参见 Barrett 1991; McDonald 2002),但我们认为,正因为这些张力的存在,才使分析数字文化中的异化会获益良多。两位理论巨人最常被提起的不一致,涉及不同的成因解释,或提出的“为何”与“如何”问题之间的差异。马克思的见解如下: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Marx and Engels 1976, 59)<sup>①</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兴趣在于形成占统治地位之思想的物质关系。这一推理思路隐含着一个本体论解释,即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统治阶级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过,福柯却尽力避免提出本体论问题,反倒聚焦认识论问题。此处的认识论意味着分析技术如何与政治方案、权力以及知识相交织,如何嵌入到社会—文化实践)之中。福柯将社会—文化实践理解为制度和组织环境,而技术产生的过程就位居其中。如同历史上所有的社会转型,信息社会是多维的,包含着技术、经济、社会、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三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页178。——译者注

文化以及政治层面的变迁,因此,有必要对信息技术这一强烈意象的双重性进行分析。

马克思与福柯之间关注点的分野所带来的影响是,激发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我们认为在将数字文化理论化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这两位思想家置于其中,为重新衡量他们可能做出的贡献提供了重要途径。经过牧领权力这一透镜,我们的探讨一开始先廓清数字文化中权力的新形态,随后,通过重温马克思的早期著述,对数字文化中的异化和物化作更具体的分析,<sup>①</sup>最后,我们以客体化和主体化的讨论结束全文。我们认为,异化和客体化在数字文化中依旧有效,但是需要为两者充实对数字文化中权力形态的认识,了解其在物化过程中的运作,正是这个过程生产出被客体化的、被主体化的和主体化的不同主体。

## 二、数字文化中的牧领权力形态

将工业技术实践与数字技术实践相区别是我们分析的起点。工业技术与劳动领域以及合理化思想密切相关(参见 Habermas 1970; Feenberg 2010);而数字技术除了如工业技术一般与劳动领域相关之外,它还与私人领域和个体化思想相关。多了这一层理解,有助于我们分析在数字文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之权力分配。此外,这种理解在保有特定地点的物质历史性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同时,也为作为意识形态或规范的数字实践操作提供了分析路径。

我们对普遍意义上的技术与特定意义上的数字文化之分析,将基于不同“实践”之间的认识论和睦关系(参见 Pacey 1999)。为了将数字实践与异化相联系,我们在分析时部分地依循佩西(Pacey 1999)的论述,对两种技术实践的不同操作进行了区分。佩西呈现了技术实践的两张面孔:其一,是以物为中心的机械论路径,该路径在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它将日常经验边缘化,并导致互相割裂的、异化的实践;另一种,则是更加以人为中心的友好路径,各种社会意义并存其中,它们与个人的反应以及个体的生存经验互动。与近期很多马克思式的技术分析一样(Feenberg 2010),我们采

---

<sup>①</sup> 原文为“a more analysis”,经校对者与原文作者电子邮件确认,应为“a more specific analysis”。——译者注

用这种二分法来理解技术与劳动权力分配以及合理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我们还将数字技术视为与个体化相关联,在其中,主体是权力分配过程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在直白地陈述一个事实,即在现代社会技术与人类是可分离的(既然它们以许多方式相联系),毋宁说,这是在为分析权力分配而重新定调。

因此,我们将数字技术理解为一个“在物质性之初始阶段”的分析客体(Dunne 2005,11),该观点以技术哲学的视角观照数字技术,认为其有待确定。技术制品的未确定性“为社会在不同设计之间进行选择留出空间”,它们“在功能上有共性,但却可更好地服务于这种或那种社会利益”(Feenberg 2010,7)。在芬伯格(Feenberg)看来,这意味着“环境并不仅外在于技术,而且事实上它还携带着社会需求将其合理性渗透到齿轮和杠杆、电子回路和燃烧室的基本运行方式之中”(同上)。数字技术有一种物质存在性,但并无明确的有形物质形态,因此,在几乎任何可能的未来图景中它都可能获得支持。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数理逻辑)被转换成了一种表明数字物品特性的形式,该形式既是对符号逻辑的接纳,也是成为分析对象的实践行为本身(参见 Löwgren and Stolterman 2004)。技术只是霸权性社会概念(如理性化、个体化)的一个镜像,但是,我们需要创造工具、更新工具并再造工具,以分析技术与权力分配之间的互动。因此,21世纪信息社会中数字技术的隐晦性要求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异化和资本主义,分析并批评数字事物的独特性。

对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概念非常适得其所,尤其是在揭示文化生产与市场化之关系的地方。然而,我们认为如此分析还不充分。数字技术的隐晦性需要更为复杂的概念化,用以对权力的运作方式进行更深入的结构分析。我们有必要对如下权力观进行分析:权力不仅仅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来自国家(State)的影响。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提出一套受马克思和福柯共同启发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在对数字文化中的权力分配进行批判分析时,如果要使马克思有关异化的概念和辩证分析法得以充分发挥,就有必要对权力做一番福柯式的分析。

福柯有关牧领权力的概念首先使用于其对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及其被现代国家机器逐步吸纳的系谱分析之处。这一概念集中关注最初生发于基督教环境中的权力的技术与形态(Foucault 1982,2007)。他说明了牧领权力在

18世纪期间获得一个分配这种个体化权力的新方式。现代国家发展成为一种精巧复杂的结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个体就可被整合入其中,即他们的个体性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塑造,并服从于一套非常特定的模式。依照福柯的理论,国家应被视为个体化的现代母体(matrix)——牧领权力的一种新形式。福柯认为,牧领权力是由人们自己再生产出来的,人们将其自身变成了主体。主体最初是“宗教灵魂的肉身”,而后是“市民”,再是“工人”,现在他们成了“文化存在”(Touraine 2007)。在牧领权力从基督教形态转换至国家形态的过程中,福柯总结了牧领权力的如下特征(Foucault 1982,784):

(1) 这是一种权力形式,其终极目标是确保个体在这个世界中得到救赎。

(2) 这不仅是一种发出指令的权力形式,它也必须为了众人的生命和救赎,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

(3) 这种权力形式不仅照顾整个集体,而且还特别保护每个个体,终其一生。

(4) 如果不了解民众的内在思想、探索民众的灵魂、令民众透露其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这种权力形式就无法实施。它蕴含着对良知的理解和指引良知的能力。我们认为,牧领权力再一次找到了分配个体化和主体化权力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的牧领权力。

我们将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 屈从化)这一过程称作“用故事叙述的自我”(参见 Rose 1996; Deleuze 1990; Derrida 1978),而非“主体”。主体化被视为从管治机制中产生,并且此管治机制与权力聚合体(assemblages, 组配, 装配)<sup>①</sup>紧密相关——就现在所说的技术牧领权力而言,管治机制设定了一个逻辑:将我们的多重自我作为商品予以表现。其主旨则是,这是我们出于自愿的表达。譬如,因此我们这几位作者以“精英知识分子”来表现自己,以抵抗市场将生活方式商品加诸我们表现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这些表现包括什么是可说的、可听的、可操作的以及可表现的,而其他现象则不被许可。数字技术成功地遮盖了相关话语实践的成因,这些话语实践发生于具体的网站和程序之中,即使牧领权力成功地将它们伪装成是个体化和自我表现

---

<sup>①</sup> 德勒兹的 assemblage 来自法文 agencement。assemblage 这个英译法首见德勒兹、加塔利合著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英译本,二者的《千高原》英译者也选择此译法而为多数人沿用。亦有人偏好 arrangement 英译。法文原词 agencement 包含“组织”、“安排”的意思。——译者注

的逻辑。这些实践是前个人的(pre-personal),它们存在于如下关系结构中:对某些人赋予权力的同时,又限制了另一些人的权力。是以,自我不被视为一种心理机制,而被视为对话、语法以及规则。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来表现(参见 Rose 1996)。

谈及数字技术,也正是自我叙述的这一对话特征要求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自我叙述是在文化意义上提供有关自我的故事,是个体与他人或其自身进行互动的资源(Rose 1996)。经由训练并结合技术带来的可能性,我们越来越精通于表现自我(我们的多重自我叙述)。牧领实践(pastoral practice)因而愈发历久弥新。由于回应(主体化的交互属性)更容易被增强(例如,通过 Facebook 中的 liking、给博客留下评论等等),因而,我们自我叙述的对话特征通过数字技术也得以强化。因此,求助于管治机制的手法和装备也就很重要了。数字技术的牧领权力通过如下方式加强了这一点:使个体相信他们在表现其自我时所做的选择是其自主所为,并且他们做出的选择是对其个体性的表达。我们正在成为自愿且有能力自我治理的主体。通过将数字事物视为一种说服、表露、增强与传送的手段,并将其理解为是主体化的过程和表现,上述情形就愈发清晰可见了。数字技术的隐晦性得以显露,并成了研究对象。数字技术所具备的特定历史条件,使得个体化过程以如下方式非常有效地将生活世界变为殖民地:

(1) 数字技术增强了我们自我叙述(我们的表现)的表露。

(2) 数字技术加快了我们的自我叙述(我们的表现)的传送。

(3) 数字技术增加了反应的数量,因此也加强了主体化的相互影响。

(4) 数字技术缩短了主体化相互影响的回应时间。

(5) 数字技术以更高效的方式使多重自我叙述成为可能。

(6) 数字技术(软件诸如 Photoshop,硬件诸如数码相机、智能手机)使创建多重自我叙述更为便利。

(7) 数字技术使相互一致的自我叙述成为可能。

受福柯论证的启发,我们提议数字技术可以被视为个体化的现代母体,或者牧领权力的特定形式。福柯写过国家权力的形态,不过,我们将以下引文中的“国家”一词替换成了“数字技术”,请予以思考:

我认为我们不应将[数字技术]视为在个体之上发展出的一个实体,并忽视了个体是什么甚至他们的存在,相反,应将其视为一个非常

精巧复杂的结构,个体可以被整合入其中,只要满足一个条件:此个体性将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塑造,并服从于一套相当特定的模式。(Foucault 1982,783)

数字技术让主体得以个体化、得以呈现自我,因此,技术的(数字的)潜力以如下想法诱惑着主体——有了数字技术我们就可以建构并展示个体性。正如同自动化技术被嵌入到合理化之中(合理性这一社会观念共同建构了社会),数字技术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嵌入到了个体化之中(个体化作为一个同等的社会观念正在共同建构社会)。权力的牧领形态涉及人类个体化过程的全部历史,如同在工业社会拒绝按理性方式行动,在我们这个数字社会有人不想借助数字技术表达个体性,听上去同样令人尴尬。因为这种个体化已经无可争议,看起来似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会对它感兴趣——它是普遍的、中立的、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然而,在福柯谈论“疯癫与理智、病弱与健康”的地方(Foucault 1982,778),我们的论述则指向了下述对抗关系:预先审查与遭受谴责的、台前呈现的与幕布之后的、所表现的与即兴发挥的、所展示的与“脱位的”以及“在位的”之间的关系。

### 三、重温马克思

在现代社会,知识与权力相结合,而两者一起创造了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秩序。马克思的著述为分析客体化的实践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工具,但是用这些工具分析主体化的实践时,会有一些力所不逮之处。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分析与福柯有关规训权力的观念也有着清晰的联系。例如,福柯明确指出规训权力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如影随形,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服从于其体系同时又能更好地被该体系所利用的劳动力(参见 Marsden,1999)。福柯也将马克思提出的谬误经济学与真理政治学(politics of truth)<sup>①</sup>进行对比——前者主要考察经济、物质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后者则主要探究知识、话语、真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了深入理解数字技术之隐晦性,我们认为这两种理论都不可或缺,尤其是福柯的牧领权力思想还能用于论证数字技术的主体化

---

<sup>①</sup> The Politics of Truth 也是福柯一本专著的题名。——译者注

实践,而不只是其客体化实践。福柯有关牧领权力的见解建立在牧人和羊群关系的隐喻之上(Foucault 2007,125—130),在这种关系中,牧人聚集并看管他的羊群,羊群中的每只羊获得拯救都源于牧人个体化的仁慈——换言之,牧人通过个体化的手法管控着羊群中的个体。权力的牧领形态基于人们选择的自由,但该形态具有一种控制作用,让人们选择那些被认为是必要的选项。<sup>①</sup> 人类被建构为客体时与其被建构为主体时所受的控制一样之多,至少当他们的主体性确保了霸权性实践的时候(Foucault 1988)。

数字技术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该制度生产并维系使统治阶级更为隐蔽的跨国物质关系的新形式,同时该制度也生产新的主体性和新的治理形式,后者包括新自由主义的活跃修辞。福柯认为权力的牧领形态是一种与真理的生产相联系的权力,是个体化和全体化的独特组合(Foucault 2007)。由此,在分析数字文化中的异化时将权力的牧领形态纳入其中所形成的概念优势,就为我们观察权力的实践如何成为数字文化中的主体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视野——它带来对物化(reification)和个体化的辩证理解。

无疑,21世纪信息社会中的数字技术具有隐晦性,这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异化和资本主义,而它们的独特性也要得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概念尤其适用于揭露文化生产与市场化的关系,但这样的分析同样也是不够的,因为数字技术的隐晦性需要更复杂的概念化过程,这种概念化有助于对权力的运作方式进行更细致的结构分析。我们有必要对另一种权力观进行分析,即它不只是将权力视作压制者与受压制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认为数字技术的隐晦性有别于工业技术,它比后者更为复杂,必须对支配性的物质关系在其中的理想化表达予以考虑,更不用说霸权性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其中的物质分布状态。马克思关注物质条件而非思想,而福柯关注思想,并视其为物质条件(参见 Foucault 1984)。

马克思著述中对21世纪信息社会的思考有很多地方有待激活。异化和物化概念为更好地理解数字文化中的“数字”元素提供了绝佳的起点。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他的异化理论做了最为清晰的勾连。在论述并指出诸如政治异化、宗教异化等其他异化形式时,他也批判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对马克思而言,劳动的异

---

<sup>①</sup> 有关基督教牧师-信徒间的权力关系及基督教的主体化/个体化实践的描述,可见张凯,《如何塑造个体——福柯论牧师权力》,见《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年第12期,页76—81。——译者注

化是异化的最基本形式:建立在雇佣劳动的特殊形式之上(Marx and Engels 1976),对他来说,劳动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结果(Marx and Engels 1976,1988)。

被异化的个体必定是从某样东西(*something*)中所疏离出来的,这是显现于历史框架内的特定的客体化和二元实践所导致的。因此,异化是人类的总体与人类的自我意识站到彼此对立面的结果。同样地,宗教的异化与身体和灵魂——或者在世的经验生命和天堂的灵性生命——的二元建构相连,而政治的异化则与作为抽象公民的个体和人类个人这一(资产阶级的)二元建构相关(Marx 1963)。在分析劳动异化时,马克思强调了两点:

(1) 在劳动过程中,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人与其自身的创造力疏离。

(2) 他自己生产的物体成为异己的存在,并最终支配他;它们成为不受生产者控制的力量(Marx 1963)。

马克思认为,这种形式的异化意味着个体并没有体验到自己是发生作用的能动者(*acting agent*),相反,这个世界(自然界、别人和他自己)对他们来说依然是陌生的。它们变得物化,并作为客体出现,即使它们可能是他们自己建构的客体。在任何重要意义上,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永远都不能成为自主的、自我实现的人类,他们只能以统治阶级欲其所是的方式而存在。而个体性中这一根本的社会特性他们只有通过私人占有而非社会共同拥有的生产体系才能表达。而为了这个体系,每个个体都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而是作为工具在起作用(Marx 1963)。

在对工业技术和数字技术进行区分时,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对新生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观察(另参见 Feenberg 2010)。马克思在现代工业时代发展了他的理论,当时的工人集中在大型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他们受到不同层级管理人员的严密监控,后者是生产过程中自封的决策者。视工人为机器的延伸是可以的,但视机器是工人的延伸则不行。关于异化的这种分析在 21 世纪信息社会依然有效。并且数字技术也强化了生产率、劳动分工、剩余价值等许多工业社会现象(Aiello and Kolb 1995; Carayon 1993),这表明信息社会——如果真的存在——也不只是一个后工业的社会。但是,如果回到数字技术及其隐晦性这一问题上,我们追随马克思,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探讨随着互联网和信息社会而出现的异化新形式——“数字异化”,由于脱位(*dislocated*)虚拟生活的出现,该异化在脱位



的和确位的(located)存在形式之间(线上/线下身份)构建了一种二元关系。一方面,生活所处的位置(无论数字的还是真实的)仍是确定的;另一方面,解放、不受拘束与丧失稳定性的意象则是(套用马克思的话)当下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一部分。当代的一个普遍信念就是,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与网络通信一道,将降低作为人们身份认同基础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参见 Giddens 1990; Virilio 1993; Negroponte 1995)。“无地方性”的建构与可能的时空消融引致一种新的异化形式——数字异化,这种新异化再生产并隐藏了当代全球社会中的阶级冲突。

马克思认为,一旦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疏离,并因此与劳动本身疏离,那么劳动异化就出现了。他认为,对人类来说,创造性地表达我们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劳动条件下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就失去与自己的联系。而在工业化社会,劳动条件不允许我们掌控我们的劳动以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论证数字异化的思路大致相同,但是以个体化的过程为基础。我们将数字异化与劳动异化并置,其方式与将宗教的和政治的异化与劳动异化并列大致相当:将其作为客体化的和二元的实践。人类的全体被自我意识所疏离,数字的“自我”成了商品。主体可能会抵抗,但是由于和“屏幕”的关系,这种抵抗不断遭到削弱。我们受消费世界“诱惑”,在数字的舞台上表现我们自己。在此,个体仅仅是一个屏幕,上面投射了由新的通信产业制造出来的欲望、需求和假想的世界。那些不再能从自己身上获得身份之确保的人们,隐隐约约受到其意识未觉察之事物的支配(Touraine 2007,101)。

例如,个体在数字文化的舞台上表现自己,而由于数字表现行为的条件(Facebook、Twitter、博客等等),人们失去了对其表现的控制。我们不再能掌控我们所表现的“自我”。我们依照他人对我们的期待(“生活方式”的逻辑)审查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形象,而其后果(product)/自我就被异化了。我们失去对数字自我以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控制。既然模拟的或确位的生活与数字生活相分离,我们很难全身心认定这个自我。新自由主义主体变得依赖(dependent on)劳动力市场,并最终取决于教育、消费、福利国家的规管和资助、消费者商品供给,以及医疗、心理与教育领域的辅导和关怀所带来的机会和潮流。这一切都指向了有赖于机构的资本主义霸权的控制结构。随着数字技术和新自由主义的到来,支配资本主义霸权运转过程的准则和等级制度趋于隐而不显,这令运作过程本身变得诡秘,似乎只不过

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Mosco 2004)。

马克思认为,一直要到真实的个体在其个人境遇中开始理解他们所经历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社会存在(Marx and Engels 1963)。这一思路并非无可置疑,因为它建立在具体的基本假定之上,这些假定涉及由自我去实现一个可能的、完整的本真自我所要具备的条件,后者显然与黑格尔和教化传统有关(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Levine 2012)。这就解释了为何理解数字文化中的异化,最好的转向是将对物化过程的分析嵌入技术权力的牧领形态之中的原因,因为在牧领形态中,物化能具体说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想要避免的是社会结构向度的消失,将异化和物化简化至抽象个体的心理特征层面。关注物化的过程,意味着我们需要理解权力关系,要认识到分析引发异化最终发生的过程比分析异化的条件本身更加重要。马克思运用物化概念来描述一种社会意识的形式,在这种社会意识中,人的关系等同于物的物理属性,因此,披上了合乎常理和不可避免的外衣。同时,关注物化的过程还意味着要分析人的关系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意指的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一理论角度与福柯的理论非常相似。

异化和物化概念的多维性,特别是两者对资本主义关系内在结构的深刻观照,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如何以互联网的形式实现的。正因如此,它们内置于信息通信技术之中,并且由于商品关系的无孔不入,它们给社会意识的物化形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基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物化的新形式已然出现了。

在分析生产出异化和物化的隐而不显的社会关系时引入技术的牧领权力,为在更普遍意义上分析技术和意识形态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神秘化本质提供了范例。这意味着除了商品拜物教,我们还有技术拜物教。在过去工人使用生产工具的地方,现在,生产工具在使用工人。

#### 四、权力分配的多维分析

在文章起始处我们提议,对数字文化中的异化和权力进行重新思考。通过提议对涉及上层建筑与基础、霸权与日常实践的数字技术进行辩证分析,经由以技术的牧领权力为视角观照异化,用以分析数字实践之隐晦性,我们对如何理解 21 世纪数字文化中的异化作了重新审视。牧领权力不仅将

我们的注意力指向权力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关系,还使我们关注那些乐意担负权力之职责的个体是如何塑造出来的。这表明有必要关注意识形态权力的有效性及其物质现实性。

在探讨数字文化中的异化时,我们认为关键之处在于指出数字技术时代出现的异化的特定类型。而在使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数字文化中的异化时,最重要的是将其作为特定的物化和二元实践的结果进行分析。在分析根本性的劳动异化时马克思强调,我们在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并没有体验到自己是发生作用的能动者;而有了数字技术,我们确实感受到自己是发生作用的能动者。然而,无论此一主体如何地接近真实,一个处于确切位置、日常生活附着于其上的有经验的身躯始终都存在着,而虚拟主体正异化于此。由是,数字技术就会引致一种主体化和能动性的错觉,因为没有产生任何经验性的结果——有可能我们表达意见和想法却无人聆听。无独有偶,福克斯(Fuchs 2008,2009,2010)认为,社交网络平台是个人创造力的意识形态表达,这造成了一种假象,即个人表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能在网上发布出来。他还进一步探讨了数字技术的客体化和主体化实践——它们基于工具理性,但又受主动玩乐劳动所驱使——二者间的复杂联系。这种异化形式的结果就是福克斯所说的“人类创造力的总体商品化”(另见斯迈思[Smythe 2006]对受众商品的最初分析)。这与福柯的权力/知识恶托邦(dystopia,反乌托邦)的思想不谋而合,在这一思想中,甚至道德和实践知识都被改造成了认知和技术体系,以对先前的私人领域进行规范和管制(Lash 2007)。至此,引用福柯理论的理由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有了它就能对数字文化现象和主体现象进行更为灵活的探讨。而在分析权力分配时采取马克思的方法在21世纪仍然是有必要的。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分析工具:不仅能揭露在劳动的物质条件方面的物化和异化(极端的泰勒制),也能揭示在数字文化中的物质实践和客体化实践层面的物化与异化。此外,将主体作为商品化和脱位的对象进行分析,令我们得以了解物化在今天是如何表现和运作的。为了更深入理解数字文化中的物化现象,我们以福柯的牧领权力思想补充马克思的物化概念,以剖析主体化实践。分析发现,主体就是不同牧领权力形态中的客体,例如,在持有“数字实践为表达个体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观点的意识形态中。数字实践使主体得以表现个体化,得以展示自我,由此,数字实践就凭着“有了数字技术就有可能建构并展示个体性”这种观点而令主体着迷。

这一理论建构引发了另一层面的分析:依据被客体化的主体(objectified subject)、被主体化的主体(subjectified subject)和/或正在主体化的主体(subjectifying subject)的高超平衡(sublime equilibrium),对权力分配展开多维度的分析。无论是马克思的或福柯的分析都不是完全反乌托邦的,因为他们都为抵抗和行动留有空间。而加入对权力分配、主体化与主体化过程的细致分析之后(参见 Touraine 2007),另一种平衡也达成了。图海纳(Touraine)在探讨自我的形象与主体时,对被主体化的主体与福柯牧领权力思想中的主体这两个概念做了明确区分,此外还加入了拥有抵抗和反思能力的主体化的主体这一概念。通过对主体与主体化者、创造者与被创造者、解放者与受禁锢者进行配对,反思主体化的主体在抵抗主体化实践。通过聚焦物化过程,这一结合了马克思和福柯的框架成功地应对了数字实践中的客体化和主体化这两个程序:客体化是竞争合理化与支配的延伸(换句话说,是工业化借助数字实践的延伸);主体化则是主体的商品化(或是自我的市场化),例如,将消费者变成理想公民的特定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自然化在跨越国界地发生。此外,数字技术也被用作监控的方式。其结果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数字信息的收集和分类,数字文化中的控制和权力日益明显地呈现出对社会的整体监控和管理之趋势。拜数字技术所赐,对私有的和公共的监测机构而言,公民正变得越来越无以遁形。像苹果、谷歌、亚马逊和 Facebook 等业内大佬们已然将我们身处的位置、偏好或生活事件等数据进行整合,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诸语境下使用(Andrejevic 2009)。本文业已表明,数字实践中权力分配的两个维度——作为现代性之延伸的客体化,其中一切事物均依照商业的、理性的与工具性的思维被客体化与被塑造;作为超现代性之表达的主体化,其中工具性由个体的自我选择这一虚幻的意识形态意象所支撑——之间的关系,可作为数字牧领权力形态中的两类物化过程同时予以分析。

因此,物化指涉的是两类当代数字监管实践:

- (1) 被他者统治和/或服从于一个异己的权力系统的过程。
- (2) 特定类型的主体被创造的过程。

数字技术经由提供大量迂回的机制,这些机制将政治、社会与经济权力的目标转换成个体的选择与承诺,以使先进的自由治理方式得以实现。

在数字社会中,全球生产链的任务事关主体的生产,正如它也事关工作供给与利润创造。然而,这样的多维度分析也关乎反乌托邦与乌托邦之间

的超然平衡,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是非此即彼地赞成其中任何一个,而是为了展现权力分配之全貌以及抵抗性实践之潜能。毕竟,在线行动同样也为新形式的公民、共同体和政治实践带来希望(参见 Bernal 2006)。

### 参考文献:

- Aiello, John R. and Kathryn J. Kolb. 1995. Electronic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nd Social Context: Impact on Productivity and Str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0(3): 339—353.
- Andrejevic, Mark 2009. *ISpy: Surveillance and Power in the Interactive Era*.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Barrett, Michele 1991.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rnal, Victoria. 2006. Diaspora, Cyberspa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e Eritrean Diaspora Online. *Global Networks* 6(2): 161—179.
- Bocock, Robert and Kenneth Thompson, eds. 1992.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 of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Press.
- Carayon, Pascale 1993. Effect of Electronic Performance Monitoring on Job Design and Worker Stress: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Conceptual Model. *Human Factors: Journal of 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35(3): 385—395.
- Deleuze, Gilles 1990. *Entretien sur Mille Plateaux*. , translated by S. -O. Wallenstein. Paris: Minui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ibération*, 23 October 1989).
- Derrida, Jacques. 1978. *The Dangerous Supplement. 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Spivak, 141—164.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unne, Anthony. 2005. *Hertzian Tales, Electronic Product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Critical Design*.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Feenberg, Andrew. 2010. 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Social Rationality: From Surplus Value to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4(1): 37—49.
- Foucault, Michel.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8(4): 777—795.
- Foucault, Michel. 1988.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New York: Routledge.
- Foucault, Michel.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New York &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Fuchs, Christian 2008.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 Fuchs, Christian. 2009.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1):69—87.

Fuchs, Christian. 2010. Class, Knowledge and New Medi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2(1):141—150.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Press.

Graham, Stephen. 1998. The End of Geography or the Explosion of Place? Conceptualizing Space, Pla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2(2): 165—185.

Habermas, Jürgen. 1970.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translated by Jeremy Shapiro, 81—127. Boston: Beacon.

Hunt, Alan J. 2004. Getting Marx and Foucault into Bed Together!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31(4):592—609.

Lash, Scott. 2007. Power after Hegemony: Cultural Studies in Mut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4(55):55—87.

Levine, Norman 2012. *Marx's Discourse with Hegel*.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Löwgren, Jonas and Erik Stolterman. 2004. *Design av informationsteknik, materialet utan egenskaper*. Lund: Studentlitteratur.

Marsden, Richard 1999. *The nature of capital: Marx after Foucault*. London: Routledge.

Marx, Karl. 1963. *Early Writ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 Bottomore. London: C. A. Watts.

Marx, Karl 1986. *Karl Marx: The Essential Writings*, edited by F. L. Bender. Boulder: Westview.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6.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 19—539. Moscow: Progress.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Prometheus Books.

McDonald, Bradley J. 2002. Marx, Foucault, Genealogy. *Polity* 34(3):259—284.

Mitchell, William J. T. 2002. Showing Seeing: A Critique of Visual Culture.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1(165):164—181.

Mosco, Vincent.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 MIT Press.

Negroponte, Nicholas. 1995. *Being Digital*.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Pacey, Arnold 2001. *Meaning in Technology*. Cambridge: MIT Press.

Rose, N. 1996. *Inventing Our Selves: Psychology, Power and Personhood*. Cambridge: CUP.

Thorpe, Ann. 2007. *The Designer's Atlas to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Smythe, Dallas W. 2006.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Meenakshi G.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230—256. Malden: Blackwell.

Touraine, Alain. 2007.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oday's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irilio, Paul 1993. The Third Interval: A Critical Transition. In *Rethinking Technologies*, edited by Verena Andermatt-Conley, 3—10.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第四篇 马克思,可替代/社会主义 媒介与社会斗争





米丽娅姆·奥拉格(Miriyam Arouagh)<sup>①</sup>

## 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sup>②</sup>

张小娅(译),吴畅畅(校)

[摘要]本文透过“阿拉伯革命”的棱镜,探讨了由用户创造的应用程序和应用平台的社会及政治影响。如(后民族国家的)网络社会、(后阶级的)非物质经济、以及(水平结构的)群众政治抵抗等时下流行的后现代概念,在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爆发革命之后都需要得到认真的重新审视。这些革命事件引发了人们关于新媒体力量的新一轮讨论,然而这些讨论中涌现出的观点(毋庸说是断言)实则不过重申了更早些时候人们对信息通讯技术(ICT),特别是社交媒体的盲目崇拜。这篇批评文章无意否定新媒体的社会和政治实用性,而是旨在探究互联网的利与弊。我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中介性”的概念来研究互联网及政治激进主义并列出现的现象,并且讨论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如何受到政治经济基础的限制,同时又反作用于后者。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结构性因素,例如信息通讯技术的所有权(社交媒体的政治-经济决策),同时解构经由大众媒体传播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本文的理论观点出自人类学的研究路

---

① 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院中东研究中心准会员。她教授中东地区的网络政治,研究兴趣涵盖互联网激进分子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巴以冲突中的网络战争。她的专著《线上的巴勒斯坦:跨国主义、互联网和身份建构》(Palestine Online: Transnationalism, the Interne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于2011年发表(IB Tauris出版社)。米丽娅姆是一位社会主义激进分子。miriyam. aouragh@orinst.ox.ac.uk

② 感谢皮特曼(Jamie Pitman)对“非物质劳动”的辩论所提供的富有价值的参考;感谢琼斯(Jonny Jones)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贡献了非常友善的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们的宝贵评论;感谢杰克逊(Rob Jackson)细心的校对。

径,并由此而克服了一些“学院马克思主义”(过分依赖理论)的令人遗憾的弱点。

[关键词]中介性,基础和上层建筑,“脸书革命”,中东地区,阿拉伯革命

毫无疑问,互联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媒介(medium),<sup>①</sup>因为它不仅能够为反文化霸权主义的内容提供传播渠道,有时甚至能够允许新形式政治动员的存在。因此,政治激进分子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地拿互联网做试验。而我们却有必要对此类在线政治参与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中东及北非地区的政治背景通常包括媒体审查、军警镇压、战争或是殖民占领。特别是在革命时期,许多在线政治行动的形式最终都毫无意义——除非其能够与线下的街头政治有机结合。自2011年以来动摇此地区的诸多事件已经彻底证明了这一点。通过本文,我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研究、传播学及(非西方)人类学的视角来回顾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

“阿拉伯革命”促生了各式各样的反应,甚至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发表领域,而这也导致了許多对于“阿拉伯之春”的仓促分析,以及一种“思维受挫”的感觉(Sabry 2012,80)。萨布里(Sabry)将“思维受挫”的概念划分为四个领域:失语(智商上的无力);口吃;远程技术(即“专家”);底层(激进分子们自己)(同上,81)。只需迅速扫视一遍传播学和媒体研究领域针对“阿拉伯之春”的学术作品,我们就能发现两个突出特征:海量出版物(数十本学术期刊都针对此话题推出了特刊)<sup>②</sup>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席。事实上,近年来在学术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兴趣已经再次升温,但是与此同时主流学术圈却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不仅体现出了主流学术与新兴学术之间巨大的鸿沟,同时可能也表现出了人们面对“系统性”分析时所怀的固有成见。有一点非常明确,这种现象在人类学研究领域

① 本文中 medium 译为媒介,media 译为媒体。——译者注

② 有关互联网激进主义(activism)与/或阿拉伯革命的学术特刊包括:《国际传播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阿拉伯之春与信息通讯技术所扮演的角色”,第5卷];《传播学评论》(*Communication Review*)[第14卷];《阿拉伯媒体与社会》(*Arab Media & Society*)[第14期];《中东文化与传播学期刊》(*Middle East Journa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第5卷];《全球化》(*Globalizations*)[第9卷]。《网络东方》(*Cyber Orient*)[“阿拉伯之春的净价值”,2012,秋];《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社交媒体与阿拉伯之春”,第62卷]

中也存在(Graeber 2001)。<sup>①</sup> 这种现象的成因有一部分在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核心本身存在混乱,而这种混乱的中心点就是我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上层建筑的从属性。本论文的总目标就是通过互联网的棱镜来批判性地概念化思考阿拉伯革命。当然,我们并不能透过互联网的棱镜来对革命进行研究:为了对互联网激进主义进行研究,我们不仅使用了革命的棱镜,还使用了人种学的研究方式——这其中包括了本人于2011年8月在开罗与埃及激进分子的会面以及他们后来在网络上提供的证言。这种研究方式的好处在于,我们一方面可以尽量回避有关数字体验的普遍性的狭隘设想,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构建一种脚踏实地的经验主义来促进目前已有的批判式研究。

本文有关社交媒体的潜力的理论及政治假设都基于一种对于自由资本主义互联网生态学的激进批判。基于此种理论及政治假设,又生发出了一种对技术还原论的扬弃(这一点也不是因为这种研究途径会干扰必要的唯物主义政治解读)以及对技术能够削弱其使用者权利这一物质性的赞同。社会运动理论(许多此类理论也影响了互联网研究)因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得到了普及,但是它自身也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通过网络空间达成的政治接触对现有的政治动态产生了影响,对于马克思的解读则对理解这种影响的产生至关重要。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艺术理论则为一种针对社交媒体和政治变化的激进研究方式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参考。在这其中,尤以伊格尔顿(Eagleton 1976)年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对我帮助最大。与此同时,传播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作品(比如 Kellner 2004, Wayne 2003)对构建我的观点也襄助甚大。

在伊格尔顿(Eagleton 1976)看来,文学由生产和分配方式所决定。因

---

<sup>①</sup> 这也许不过反映出了一种在更多领域中存在的反马克思主义逆流。这种逆流在美国学术界尤其突出,而后者在国际学术界处于领导地位。如格里波所讨论的,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所受到的迫害,许多人类学学者(在西方大学中)都避免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二战和冷战的高峰过去以后,学者们拥有了更大的思辨空间,然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却仍旧缺席,或是被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进化的)阵营所统治。这种情况在1960年代有所改变,在那个时代许多人类学学者对于自身研究领域的认知都经历了一次变革,他们开始更多地去审视那些不平等且不正义的体系是如何运行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于非西方社会秩序的批判弥足珍贵,这并不是因为它对非西方世界的批判与其对西方的批判不同(此类的相对主义在人类学领域中统治了许多年),反而主要因为这两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相似(2001, 24)。

此,若想真正理解文学的含义,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其历史背景(同上,iv)及其作者的社会构成。这一点又恰巧呼应了我想要用于探讨关于社交媒体问题的广义辩证法。托洛茨基(Trotsky 1991)最早提出了文学在革命运动中的相关性,尽管他也强调了文学形式的高度独立性,这一点在现实中同样成立。伊格尔顿(Eagleton 1976,26)与此观点相关联的分析则指出,文学和艺术并不是仅仅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内部自身的压力也是其发展的动力之一。例如,书籍并不仅仅是(结构化)意义的表达,它们同时也是出版商创造出来用于创造利润的商品。实际上,文学被认为是最高度中介化的社会产品,同时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同上,60)。而上层建筑的功用则不同,它实际上组织并影响着拥有经济生产手段的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这样一个双重比喻很多时候都被歪曲了——基础(政治-经济)的概念很容易与“本质”混淆,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媒体)则被简单理解为“本质”的提取物。在下文中,我将试图证明艺术与文学的辩证法能够为研究网络媒体产品的社会政治含义提供重要的框架。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有时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帮助,但是其阶级理论却非常重要。

本文的总体目标是想要阐明线上和线下的复杂动态究竟是如何塑造并先于当下的革命性变革之前发生,同时又与对“脸书革命”的空虚喝彩保持距离。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数位学者(比如 Doogan, Fenton, Fuchs, Haug, Kellner, Mejias, Sayer, Terranova)在自己的批判性著作中探讨了经常被假定存在于民主的增进与互联网科技之间的关联,我将会在本文中就他们的观点进行讨论。首先,我将会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中介性的概念,这一概念为研究革命乱局中互联网的利与弊提供了富有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工具。特别是在互联网研究中,当研究对象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经济部门和环境时,对于经济背景的批评就尤为重要。中介性的概念揭示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这种关联。在第二部分中,我将会回顾互联网相关领域的重新概念化如何及时地重新定义了激进主义和抵抗的概念本身。我认为互联网既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产物,同时也被用来反对这些逻辑。在第三部分中,我将探讨信息通讯技术帝国主义及其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潜在影响。在最后一部分中,我将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解构政治组织与互联网科技之间的关联,当然我将会避免习惯性地树立假想敌的立场。在所有这些辩论的背后,我会将中介性的概念放置在核心地位,因为它的双重性质和解释学特性能够为我所用。社会中介性并不是仅仅受到“节点”的影响,这

一概念实际上强调了政治霸权主义与互联网政治的解放性之间的关联。尽管我将在本文的下半部分更多地使用综合性的写作方法,我们还是需要在一开始就将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有时是枯燥的)前提阐释清楚。

## 一、解构中介性

之前我曾经提到,学者对于应用马克思理论(以及更多普遍的混乱)有些顾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顾虑大概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基础”代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合,这一组合中的一个元素还是比另一个“更加基本”。就如同恩格斯本人所预言的那样,“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引自 Eagleton 1976,9)。<sup>①</sup> 有关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混乱大多来自对于“基础”的定义。哈曼(Harman 1986)曾对这一混乱进行了重要的纠正,他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就“基础”和“上层建筑”做出单一的区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有两重:一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别;另外一重则是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区别。生产力更加富有活力,有时会跟(更加趋于静态的)生产关系产生矛盾。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做出回应,因此,就如同哈曼明确指出的那样,生产力(指拥有能力和动力的生产力)会背叛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的情况。

所以,我要再次重申,劳动力和劳动组织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在此基础上又生发出某些政体和政治活动(上层建筑),这一切又会因其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而以不同的方式相结合。如果一切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在物质力量社会的统治阶级同时也在智力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那么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和媒体)的动态又从何而来呢?如同我在上文中暗示过的,商业和思想的制造是彼此关联的。例如,文学和艺术作品就植根于(同时也不植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形式之间的中介性需要独立分析。它们都是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相关联的认知形式(Eagleton 1976,7)。中介性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规范性表达的存在,但它同时也取决于中介的形式(书籍、报纸、电影、网站)。每种技术变革都既是对旧有技术的延续又自成独特的革新,当然这要取决于不同的技术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0页。——译者注

发展情况。每种新技术力量的出现同时又意味着不同力量以及所需的不同工具之间的平衡。这才是中介性的马克思主义根源(基础与上层建筑)与互联网政治(例如,表达一种倾向于非暴力水平结构的意识形态)-经济(植根于新自由主义信息通讯技术公司的媒介)的最清晰关联点。

在历史上,传播以及信息技术在可用性及使用上的革命性变革一直都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例如,使用纸莎草纸替代费时的羊皮纸工艺就对欧洲新教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这种工艺通过影响后来的市民阶层又作用到了其他的社会阶层(Deibert 1997)。但是如果我们将前所未有的变化冠以“新”这样一个形容词,我们将无法讨论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日常技术改变的影响(Briggs and Burke 2005)。自2006年以后,博客的流行塑造了阿拉伯公共领域的形态,这也是个很好的例子。阿姆布罗斯特(Armbrust 2007)与乌尔里奇(Ulrich 2009)提醒我们,如果想要对类似于阿拉伯世界博客写作这样的技术(用户创造的)发展进行历史性表述,我们将有必要观察参考一些存在更久的重要文化形式,例如口头传播、或是通过磁带传播的布道,当然还有流行杂志。在历史的延续性和变化之间通常存在一种张力。但是历史性表述并不仅仅意味着追溯技术力量本身的历史轨迹;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在总体生产方式中占据的位置(Eagleton 1976, 74)。因此,这种变革或是改变并不是在一夜间发生的。根据彼得斯(Peters 2009, 18)的说法,绝大多数的大众媒体需要经过五个阶段:技术创新(结合新与旧);文化创新(与新的社会应用相结合);法律规范;经济分配;最后则是,社会主流。<sup>①</sup>但与此同时,上层建筑也指非物质(非经济)的结果。“文化”(无论何种形式或表达)的生产者相对自由,但也会被物质现实<sup>②</sup>所影响。而中介性就是指这种关系的构建方式以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方式。

关于阿拉伯革命中文化与传播的中介性已有不少有趣的讨论,例如萨布里(Sabry 2012, 82)就曾经引用《中介性的美学与诗学》(*Aesthetics and Poetics of Mediation*)。本文准备讨论的范畴实际上超出了题目的字面意思,这里的中介性不止有散播的意思,还指在资本主义规则下基础与上层建筑

---

<sup>①</sup> 在第五阶段之外,还可以加上新技术发明所遭到的不同方式的抵抗,例如有些时候互联网就被想象为反乌托邦的世界,这种想象有时来自左翼进步党派人士。

<sup>②</sup> 如哈曼所言,意识形态与意识的关系是“两个客观过程之间的主观联系”。思想从物质现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反作用于物质现实。所以,尽管思想无法被现实所囊括,思想也不可能脱离现实。

之间的关联。中介性的概念能够揭示这些内在关系,并且阐明那些使剥削关系变得模糊的外在形式。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媒体研究的背景中来。

韦恩(Wayne 2003,128)指出媒体中介性的七个层级:文本;生产过程;生产背景;工业背景;国家;发展模式;和生产模式。所有这些层级都彼此联系,但是在社交媒体(脸书,推特)背景中最重要的层级是生产过程和生产背景。而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包含在传播的实践当中。<sup>①</sup>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1979)引用了阿多诺(Adorno)的《艺术的社会学命题》(*Theses on the Sociology of Art*)一书,强调中介性就存在于媒体自身。而这正好呼应了被人们认为是互联网媒体的核心特征。那么,我们该如何消弭中介性中所存有的这一明显矛盾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系统恰恰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大量工人集中在工厂里,这一方面是一种有组织的剥削方式,但资本主义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这种集中在另一方面也为阶级意识和工人间更坚固纽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因为这种生产关系更严格地规定了人们的身份,并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原有的构建于预期、忍耐力、生活方式和相似度之上的身份构成。但是,传播技术(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对这些传播技术进行私有化)的缺位(免费而易得的)仍旧削弱了被剥削阶级的社会纽带。然而,当这样一道鸿沟在“作者”的意义上被填平,当由用户创造的内容或产品以及用户的意图涉及到自由艺术的发展,涉及社会变革以及(互联网)颠覆性激进主义等领域时,中介性的过程又将发生何种改变呢?当最突出特征为生产者及消费者是同样人群的 Web 2.0 时代到来时,这个过程将发生何种改变?

作者作为生产者(的权力)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媒体理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34年便曾经论及,后来托夫勒(Toffler 1980)创造了产销者这个概念,最近布鲁恩斯(Bruns 2010)又推出了生产用途(*produsage*)的概念。近年来对于这个概念的解读大多集中于资本主义系统内消费者的参与行为,<sup>②</sup>本雅明的解读却与此不同,他更多时候指的是通过革命性干预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市民阶层媒体及意识形态,而更少指产

① 威廉姆斯在这里引用了阿多诺的《艺术的社会学命题》一书。

② 若想更详尽地了解所谓的“民主转向”以及该概念在知识经济讨论中是如何被引入的,请参见阿拉亚(Daniel Araya)的评论:<http://www.danielaraya.com/docs/prosumerinnovation.pdf>



销者通过参与企业的运营来进一步减少投资成本并增加客户——就如同福克斯(Fuchs 2009, 95)就脸书所发表的意见那般。这样一种“产销者”并不意味着民主化(参与),反而更进一步地将人类的创造力商品化了。

我的观点是,意识形态中介性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媒体来源和工具的商品化来实现的。今时今日,这一过程是这样实现的:企业平台的运营者和提供者基本上就是将自己的用户卖给广告商,并且通过这一方式让互联网在线的用户更大程度地暴露于广告商的商品营销攻势之下(Fuchs 2012, 146)。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介化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在阿拉伯革命中最清晰地展现出来:现有的信息通讯技术是企业结构和企业意识形态(统一的)符号最直接的输出,它构建了有关社交媒体和阿拉伯革命的叙述。但我们是否可以对不同的媒体环境都做出同样的归纳总结——Web 0(互联网之前)和 Web 2.0? 新自由主义的分支似乎就是以这种结论作为其理论根基的。与此同时,此种结论也解释了整个社会向新自由主义以及信息经济的转向。结果就是,我们也必须对中介性做不同的理解。为了遵循经验主义,我们有必要采用此种批评;而当我们能描绘出最精确的画面之后,我们已将能够找到线索来决定如何最好地去战斗(或不战斗)。因此,在我继续探讨阿拉伯革命中的互联网之前,我必须要把这个概念解释清楚。

### 从《资本论》和阶级到《帝国》和大众

诚然,世界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或是《资本论》(*Das Kapital*)发表之后的岁月里有了重大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占据统治地位的公司媒体也进行了自我调整和重构,并且转变为不同的生产模式及资本模式。也许技术的革新代表了社会的不同阶段。探讨这个问题的流行方式之一即集中讨论在新国家背景下(从战后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到新自由主义国家)使互联网经济凸显的因素。在许多互联网理论家看来,传播是导致变化的最主要力量。卡斯特(Castells 2009)认为,传播是当今社会的核心力量<sup>①</sup>(及反力量)。现在可以通过信息主义的概念来理解基础,指称一种科技的发展而非生产模式。这种改变与哈特(Hardt)及奈格里(Negri)所

---

<sup>①</sup> 卡斯特指出了四种力量:网络化(networking);网络(network);网络化的(networked)以及制造网络(network-making)的力量。

说的更加粗略的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更加类似。哈特及奈格里看待思想(这一类资本主义的共有特质) (“非物质”)生产的角度是去看它生产出了什么,而不是看劳动的过程。互联网通常被视为一种本质不同的商品,很明显是因为“劳动”(labor)和“工作”(work)的概念被混淆了。在康姆菲尔德(Camfield 2007)看来,这些分析的核心观点并不能扮演分配给它的角色,因为这些分析并没有解释剩余价值是如何被榨取的,并且倾向于低估其下暗藏的剥削。“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认为,随着新技术的产生,消费与生产奇迹般地融合了(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二为一)。这种经济学指出,互联网可以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之外生存,它甚至可以将阶级划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sup>①</sup>与此同时,在哈特及奈格里的著作《帝国》(*Empire*)中,他们将非物质劳动理解为一种“信息化”了的工业产品,而这种劳动也因此而改变了“生产过程自身”。制造业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服务”,而这种服务被认为是推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的幕后力量(2000, 293)。在某种程度上,全球经济是一个实体,超越了国家间的竞争(这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了),因此在阶级之外还有一个为国家(帝国)预留的不同角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哈特及奈格里挑战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同时,马克思其实早就对技术发展的社会意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实际上曾经提到,技术拥有开启人类自由发展以及很大程度减少劳动时间以服务于艺术及科学发展(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可能性。<sup>②</sup>对后现代思想者而言,“劳动”的(老)概念挑战了(新)“知识生产”的问题。但是马克思认为劳动所代表的行动既以新知识为前提,又大量传播这些新知识。尽管许多批评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认为马克思忽略了“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影响,但他实际上将关于人类历史的全部叙述都建构在这一点之上。竞争和剥削导致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则最终决定了一个新兴阶级(以新的生产力量作为基础)能否取代旧有的统治阶级(Harman

---

<sup>①</sup> 人们也许马上能想到存在于博客、开放源码以及黑客社区中的志愿主义(voluntarism)。最近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遭到过去支持者的反对。这些博客作家都曾经免费帮助赫芬顿生产和传播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真正需要被颂扬的非物质劳动。但是当《赫芬顿邮报》的拥有者将《邮报》以数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在线(AOL),这种免费的劳动就停止了:这些博客作家将《邮报》拥有者告上了法庭并且要求在这笔交易中获得提成。请参见 [http://www.politico.com/blogs/onmedia/0411/unpaid\\_bloggers\\_sue\\_huffington\\_post\\_and\\_aol.html](http://www.politico.com/blogs/onmedia/0411/unpaid_bloggers_sue_huffington_post_and_aol.html)

<sup>②</sup> 这些观点都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马克思 1857/1858) 的第 14 章中找到。

1986)。对马克思而言,知识与体力劳动一直相生相伴,但是信息化工业生产的概念则有问题。

关于新资本主义的观点被认为与劳动力市场及全球化的重构息息相关,这种重构衍生出跨国市场体系和新技术,这些都被认为是经济的“去物质化”(Haug 2009)。“旧有”形式的雇佣被互联网生成的话语所取代,这种话语将雇佣很大程度上与知识(“认知”)过程匹配起来。生产现在已经变成了“生命政治生产”,其中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互相重叠(Sayers 2007,444)。这些相当牵强的(再)定义并没有清晰地分析现有的剥削制度机制,并且引发了这样的批评——批评家们认为这些新的推测已经沦为了“新自由主义大合唱中来自左翼的和声”(Doogan 2010,29)。而人们这样做的动机部分来自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并没有在理论上为我们做好准备,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其理论处理生产过程中所吸收的知识和新技术,因此人们开始用“非物质劳动”来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恰巧颠倒了黑白,因为挑战实际上在于要去更明晰地了解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去过度执著于它的效果”(Fine & Saad-Filho 2010,23)。但是在哈特及奈格里(Negri 2004,140)看来,历史在前进,社会现实也在改变,因此旧的理论就不再有效:新的现实要求新的理论。

与之相反,如同我在以上段落阐明的那样,实际上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技术一直是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显然,马克思并没有深入探讨他所处时代的传播与信息媒介,但是他也并没有忽视传播和信息所扮演的角色。在《资本论》中他将现代工业描述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并认为技术揭示了生产过程的本质,因而也“揭示了他的社会关系以及由社会关系而生发出的心智认识的构成模式”。<sup>①</sup>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其实生产关系有赖于财产和信息的生产。进一步说,我们所描绘的互联网所具有的双重特质使得它同时成为了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技术传播产品以及一种由用户创造的媒介。在为其用户提供便利以外,社交媒体同时也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强力机制(Fuchs 2009)。以上观点毫不令人意外地为我们绘制出了一幅不一样的图景,它还影响了抵抗的组织方式。因此,在将相关

---

<sup>①</sup> 引自《资本论》第一卷,本段的其余部分见:<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4/granat/ch02.htm>

概念应用于具体的经验主义案例分析之前,我还需要针对社会运动,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

## 二、互联网对“抵抗”概念的重新定义

对以(西方世界)技术为基础的阿拉伯革命进行歌颂式的描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实际上,在传播学和技术领域里,学术圈对一系列社会运动都有类似的观点,这些社会运动包括:萨帕塔主义者的斗争;<sup>①</sup>反资本主义示威运动的复兴(例如,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世界社会论坛);以及像独立媒体中心(Indymedia)<sup>②</sup>这样的开放源码平台等。这导致了有关互联网作为抵抗运动新空间的热烈讨论;与此同时,社交网站领域内的政治转向也迅速发展起来。但是,随着示威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被理解为示威活动本身,它同时也带来了互联网政治的商品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因为传播我们的需求和替代性分析非常重要。我们想要构建(影响)意义创造的过程;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媒体是在广大人群中实现这一意义创造过程的最重要空间之一。

社会运动领域的文献通常将集体行动的理论作为基础。互联网的强势则挑战了传统的集体行动研究范式在当下的实用性,因为这些理论所产生的时代并不具备今时今日(或者说,已经存在了20年左右)已存在的关键的传播可能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些(先决)条件在激进主义的领域中已经不再广泛适用了呢?比姆博等人(Bimber et al. 2005)被广泛引用的著作认为,“新型的依赖于某种技术的集体行动形式,阐明了过去在集体行动领域里一直模糊的几项基本概念”(同上,366)。<sup>③</sup>两个最重要的改变直接挑战了拥有明确领导者和劳动分工的参与二元选择模式(过去这被认为依赖于强关系和先锋)以及组织的角色(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命令和控制

---

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帕塔主义者被错误地归入最初的互联网抵制神话——而实际上,他们并非互联网激进主义者,而是一群活动于恰帕斯山脉一代、使用互联网来传播线下抵抗活动的游击队。

② 独立媒体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www.indymedia.org](http://www.indymedia.org))是一个集体运营的媒体网络,由许多独立媒体与另类媒体组成。独立媒体中心成立于1999年,起源是一些媒体行动者希望从一般民众的角度对在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的示威抗议进行报道。——译者注

③ 作者们在著作中讨论了自奥尔松(Olson)1965年的著作出现以来在集体行动领域中出现的一些主要理论,他们的观点在该领域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结构)。比姆博等人将集体行动重新定义为“一系列横跨私人 and 公共生活边界的传播过程”(同上,367)。确实,在互联网的协助下(特别是 Web 2.0)弱关系得以存在并且实际上能够对政治组织产生影响;弱关系因而也不会被桎梏于“搭便车者”和“先锋”的角色之间。但是,确实存在一种错误的两分论,外加总体评估上也有一处谬误。首先,强关系和弱关系之间就存在一种两分论,这种两分论虽然看似并不取决于成本与利润的权衡;但是在它乐观主义的叙述之下仍然盘桓着一种悲观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积极性或者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投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效率的平衡,但显然忽视了团结、同志之爱、联合当然还有必要性等因素。我的第二个论点和前一段引用中的“取决于”一词相关;这个词造成了很多的混乱。而这个谜题的答案则可以在“相对的”前提中找到,我将会在接下来对互联网激进主义的不平等效果的叙述中对其加以阐明。

然而,作者们认为最大的障碍在于组织的性质(同上,369)。在这里,西雅图(1999年的反世贸组织示威游行)似乎又推翻了过去的一切,这次示威机构松散,并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及决策或人员征募政策。尽管这次活动被过度地神化了,我还是要对其内在的两点前提提出质疑:所有地方的所有人看似都被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不是这样那这显然就不是一种民主代表形式的组织);看起来人们就像重视线下[实体的]互动那样重视线上活动。下面引用的段落是他们曾经说的话:“现在,每当我们做出一种行动,我们就会发一封电子邮件,然后上百人就会出现。这就像魔术。如果没有电子邮件,我们根本就无法做到”(Bullert 2000,4;引自 Bimber 2005,370)。但是所有过去或现在亲身参与了激进主义运动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魔术。当你试图动员并且发出电子邮件时,这是一种传播,就跟过去的打电话、发短信、贴传单以及站在肥皂箱上讲演一样,其作用其实相差不多。我不认为我们将前述那些行为的效果理解成魔术: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联系在一起。下面的实际情况才与本文的背景更加相关:如果仅仅是通过在线平台收到信息,那么很多人很难被说服去牺牲自己的时间、赔上自己的工作或者甘心接受身体上的伤害。

技术减少了一些活动组织上令人烦扰的困难并且让来自更多圈子的人(成为半/激进主义者)参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承认已有的进步。但是就如同比姆博等人所言(Bimber 2005,372),这里的例子更

多的是有关散播(由于电子邮件,互联网公告栏和社交网站)和更好的共享方式。但是现在新集体行动的动员又是如何受到“很大程度上无组织的努力”的影响(同上,373)?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内容以及需求是如何产生的:究竟是谁在组织最初或最终的电话/会面/示威游行?比姆博等人的观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仍有些片面。如果我们假设政治活动的组织有六个关键的阶段或者领域,那么有关组织协调传播行为的议题最多占其中两个。因此,作为激进主义者,我们卸下了一部分重大的负担,但政治组织的大多数特征并没有被我们征服或改变,因为这些特征不仅与我们倚之生存的权力关系相关,而且还直接关联着那些我们(因为我们的颠覆)不拥有并且实际上希望废除的特权。然而,就如同这些作者所言,“新形式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了形式化的以及非正式的结构”(同上,374)。与此同时,如果这种跨边界现象在以技术为基础的新形式集体行动中位居核心地位,如果这种现象还构成了一个通用类别,传统的搭便车式的决策形式作为其特殊但又非常重要的子集(同上,377),那么如果这种重构因为其低估了过去的非连线动员形式而最终不及我们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种重构呢?有些相同的过程在非技术的互动空间中也可以找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对我们当下传播模式进行历史性表述,并且将这些分析植根于民族志的现实之上是如此重要。例如,一个含有社区杂货店(*baqqal*)、出租车司机、清真寺或者公共浴室(*hamman*)的社交网络就包含有巨大的信息流。当一些位于私人 and 公共领域之间的边界被跨越之后,一切突然间看起来就不那么突出而独特了。但这并不是一个足够深入的分析,在最后一个部分里我将会回到这里更加详尽地探讨在什么时间什么事情最重要。

问题在于,我们身处于一个(如抵抗和革命等)概念背后的现实生活实践遭到挑战的时代,当我们要修正这些概念时,直接结果是压平了抵抗的概念,继而可能使得抵抗的行动也遭到弱化。这一系列的再定义并非自发,而是与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阶级(被认为已经失效)和国家(融解为社交网络的流动)意义的改变,甚至是与政治经济学的被替换,相生相伴而来(Kellner 2002,287)。这些随着理论修正而来的技术调整实际上类似于早些时候的(“后殖民主义”)转变,该转变也导致了分析理论从政治学转向文化。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种自下而上的重新评估从长远来看却是将辩论去政治化了(舍去了一些必要的概念工具),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新殖民主义和帝

国主义的背景下。<sup>①</sup> 新的社会运动转向了创造新身份的可能性,将“旧”这个概念等同于争夺资源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基于阶级联盟之上的身份。与此同时,(原本的)集体身份以及阶级斗争的概念则被认为是过时的、保守的和本质主义的。作为代表性激进主义(文本、视频、在线公共空间)的互联网在代表(representation)的层面发生变化,并与叙述或话语实践(在话语中或通过话语行使权力)相关的社会运动理论和谐相处,最终进一步挤压了抵抗的概念。理论的转变和对互联网社交影响政治变革的新方法的全新阐释相伴而来,因为互联网提供了民主化的社交网络,同时也给予了个体更大的权力。<sup>②</sup>

那么,如果劳动和资本都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国家就是(剥削)前者 and 后者(的潜力)之间的仲裁者,国家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比喻性的连字号。这里最主要(欧洲中心主义的)的缺陷有关一种建议,即“跨出”民族国家去帮助人们争取经济和国土独立甚或是(在巴勒斯坦或者西撒哈拉的案例中)成立国家。如前所述,中介性并非仅仅探讨比喻意义上的代表;它是一种通过相对应的国家结构以及相关意识形态来表现的政治和经济规则。葛兰西(Gramsci)发展了霸权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早些时候列宁也曾经使用过。根据葛西兰的说法,资本主义不仅通过暴力以及政治经济的压制来确保自己的统治,它还推行了一种霸权主义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市民阶层的价值被塑造成了“常识”(霸权主义)。普通人与市民阶层保持一致(统一文化)并且保持现状。带着这样一种对霸权主义的解读,葛西兰进一步强调了上层建筑在保持和摧毁基础关系上的重要性。<sup>③</sup>

互联网并非没有等级架构,与之相反,它恰恰植根于结构化的不平等,并且给予一些(现存的)媒体以超出其他媒体的特权。新自由主义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现实是信息流和那些在互联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媒体不在一个档次(O'Neil 2009, 15),最终的问题是另外一些有权力的势力为这些斗争

---

① 在此类反阶级定义中,“边缘”逐渐具有了“他者”的意思。这里我并不想简单地以一种“第三世界”的观点进行总结,然后承认这些情况也适用于“第一世界”。我选择跟从伊格尔顿的观点:“现在真正的丑陋之处在于几乎所有人都被驱逐到了边缘处”(2004, 19)。

② 卡斯特的四种力量理论常常被人提起:网络化力量(networking power);网络的力量(network power);网络化的力量(networked power)以及制造网络的力量(network-making power)。必须要提到卡斯特是因为他在该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是被引用次数位列第五的作者,有时一些和他本意相违背的被他人重新解读的理论架构仍然被认为是他的作品。

③ 在如下链接可以找到一系列相关分析:<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gramsci/index.htm>,也可参见《国际社会主义学报》(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114, 葛兰西特刊):<http://www.isj.org.uk/index.php?s=contents&issue=114>

制定了规则。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了霸权主义(强制与赞同)的强烈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又被国家机构所散播并塑造。这一点又和中介性作为去偶像化力量的意义相关联,直接揭示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力。米加斯(Mejias 2011)指出,一种认为脸书和推特是推动变革的关键作用者的叙述占据了话语统治地位,而这种叙述实际上是在为企业资本主义洗脱罪责。

从一开始,有关互联网的讨论就和“全球化话语”相伴而生,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确实强势地塑造了常见的传播模式(Featherstone and Lash 1995)。这些讨论包括一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故事:互联网创造了性别的平等,提速了经济的发展,还有其他美好的预期;但是这其中也包含了类似于虚拟现实这样的末日场景;所有这些讨论通常都通过某种后现代理论发声。例如下面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观点(引自《不可能的交换》[*Impossible Exchange*]):

现实正在变得愈发技术化和高效率;所有能被做的事都已被做了,尽管一切都不再有任何意义……至于符号,它正在变成对虚拟世界的纯粹推测和模拟,整个世界成了一块大屏幕,在这里当真实与“虚拟现实”分道扬镳之后,它们都变得不再确定。真实已经失去了其作为符号的全部力量,而符号也不再有任何意义。(Baudrillard 2001,5)

有些新技术在日常生活的领域的确具有革命性意义(如果否认这一点新的现实,那就是否定进步本身)。但也正是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中,这些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拜物主义模式:它们帮助散播了资本主义的规范(Kellner 2002,299)。只要我们今日社会中社会及经济关系的不平等仍然存在,我们就有必要对于新媒体的经济学抱有相同的预期(Mansell 2004,97)。9/11事件之后的政治现实以及在2008年所发生的房市和银行系统的大崩溃有力地“修正”了一些不成熟的说法,这些说法认为互联网的政治影响力降低了民族国家(暂时地)在全球网络中的重要性。琼斯(Jones 2011,89—90)曾经言及此例,他认为阶级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部门)的阶级本质决定了我们的传播风格(尽管也存在开放源码的FLOSS企业主义);互联网支持者组织结构上的阶级属性(与独立的左翼出版物的当街售卖以及游行不同)又对政治组织具有实际意义。正如米加斯(Mejias 2010)所言,后者十分重要,因为社会网理论主要依赖一种状态接入网络的技



术节点；然而绝大多数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准节点”(para-node)。通过这一评论，米加斯呈现了网络中经过编码的纳人和排斥的政治学，它们事实上植根于基于公司利益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革命中的大多数是非节点，被网络排除在外，是一群无法接触为技术所支持的传播网络的人们。技术是众多社会互动中的一种。所有的网络中都有节点，重要的是区分技术网络和社会网络及其各自的性质，同时也要区分什么时候它们各自独立存在，什么时候彼此产生互动(Fuchs 2009, 96)。它们是可以透过中介而产生有机的互动的，我将在下文加以解释。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理解时下的革命活动以及信息通讯技术又有何助益呢？如同我在本文开头所言，如若我们能够弥合从社会结构(由上至下)出发的理论以及从个人动机(由下至上)出发的理论两者间的差异，那么我们就可以揭示一种中介性而不会忽视了人们的个人行为。在社会理论中，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人类学研究中应用价值理论并不多见，这是因为人类学被囿于社会理论总体上的理论困境中(Graeber 2001, 2)。<sup>①</sup> 这最终导致在人类学中应用大理论这件事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一位人类学家的位置在(其他人的)人种学之中。但是，实际上人种学中也一直是应用了理论的，其学科基础便是建构于一系列假设之上，真正的选择在于人们究竟是明白地去思考这一认识论上的挑战，还是将其弃而不顾(Graeber 2001, 20)。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领域，它开始更多地集中探讨“生产模式”的概念，这样一个理论核心让学术讨论超越了(经典人类学的)交换而扩展至社会如何持续地存在并且“复制”自身。问题通常是关于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剥削及不平等形式究竟如何植根于人们构建的社会关系中(同上, 24)。这些被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术语——剥削、偶像崇拜、挪用。在制度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人类学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其影响仍旧是明显的(例如，“批判理论”)，而且激发了一系列崭新的研究方式(同上, 25)。马克思主义最主要动机乃在于揭露隐藏在日常生活最常见表象之下的权力、统治以及剥削结构。但是批评理论的结果却常常破坏了其最好的意图，使权力及统治成为了社会现实最基

---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来自于在生产商品过程中人类所投入的劳动，但是当商品在市场上被买卖时，这一事实却往往被忽视，结果导致商品的价值看似天然形成，就像是其本身所固有的。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我们在重新解读网络商品所遇到的陷阱。

本的性质,以至于人们无法再去想象一个权力和统治不复存在的世界(同上,30)。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就失去了其根本意义。在鲍德里亚等当代理论家看来,因为我们都身处总体化系统中,抵制是完全无用的。下面一段热情洋溢的引文仍旧来自鲍德里亚的同一本著作:

作为所有交换的总领域的经济领域,在总体上看来,不能被任何其他事物所替换。这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坐落于经济以上的上层建筑来替换经济学本身,没有什么存在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赎回经济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是破产的,同时对于全球情报而言也是无解的……政治学里充斥着符号和意义,然而从外面看来,它什么也没有。它并不能证明自己具有普世的意义(所有试图在形而上或是哲学高度为政治学正名的努力都失败了)。政治吸收着一切进入其领域的事物,然后将其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但是它却无法将自身转化为——或是使自身反映于——一个能够给予其意义的更高层现实。(Baudrillard 2001,3—4)

在格里伯(Graeber 2001)看来,这种抽象但又先锋的混合式话语解释了为什么大众消费作为一个话题对于中上层阶级的学者具有吸引力。但他同时也提醒我们,这些笨拙的成见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其出现恰好反映了60年代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土崩瓦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抬头;其兴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左翼并没有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可替换选项(同上,30)。对人类学家对价值的理解影响最深的是阿帕杜雷(Appadurai 1986)的《商品与价值政治学》(*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在阿帕杜雷看来,人类学家最好忘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其重点在于生产,而生产中的价值源自人类劳动,因而从根本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现象),不要去关心那些植根于人类劳动或者是社会系统中的价值,转而去研究那些因个人欲望而兴起的蕴藏于交换中的价值。和马克思不同,他的模型可以被轻松地应用于哪怕连形式上的市场都不存在的情况;毕竟某种形式的交换是永远都存在的。这种研究方式有其优势:它让分析者得以跳过社会总体(意义的结构)的问题,进而集中在个人行动者及其动机之上(Graeber 2001,30—31)。但是问题的另一面则是,这种研究方式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商业作为人类普遍欲望的画面(同上,33),这种画面带有宿命论以及静止不动的特点。这也就不难解释为

什么这种研究方式和强调权力和消费的批评理论恰好契合。

但是还另有一种因巴斯卡(Bhaskar)而兴起的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和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相结合,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在后现代分析面前为批判主义解放性研究辩护。巴斯卡尔的学说认为现实存在不同的层级,发生在表面的现实并不能说明一切,存在于表面之下位于不同结构之中及之间的张力拥有动摇现有社会关系的潜力。这种哲学意在指出那些使人的力量成为可能的社会结构自身也是有先决条件的,但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反思(改变)那些制造了社会结构的行动(Bhaskar and Callinicos 2003)。如哈曼(Harman 2007)所言,这些说法并非新的发现;马克思就曾经指出(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如若外在形式即为事物的本质,那么所有科学皆为多余”;卢卡奇(Luká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强调了不同层级的现实之间的区别,而葛兰西则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有关实践的哲学”。

这种辩证研究方法启发我将社交媒体区分为空间以及工具(见图1)。这种区分方式有一部分受到如上所说的时间与理论区别的影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传统之一。我的双重评价也回应了力量-结构的双线研究方式。互联网空间回应互联网和社会的结构层面,与此同时互联网工具则回应策略层面和政治力量。在完成了此种解构之后,我们还需要一种对于互联网物质性的批判性包容,这种包容需要能够和互联网的实际存在相呼应,例如互联网接入的问题(Alexander and Aouragh 2011)。互联网的实际普及率以及一些其他的统计数据都能够有力地反驳新自由主义旗下的那些歌颂性以及技术爱好者的言论,但是我认为线上和线下的政治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互联网的总普及率实际上并不具备代表性,这一事实导致了对于互联网负面解读的一种误读(进步主义批评家的论调与此相同)。我们无法依据“人口”来估测互联网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我们应该这样估测(特别是其“工具”功能),应该去看互联网对于“激进主义者”的意义。首先,这让我能够更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并且在恰当的时候给出肯定的假设。我会在最后一部分进一步解释这一点。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传播和散播的增长。我赞同互联网理论家芬顿(Fenton 2006)的说法,政治团结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社会-政治粘合,而社会运动所达到的公共合法性以及政治力量事实上来源于线下的团结。我的结论是,如果没有一个拥有核心的有组织团体,那么抵制运动更容

易土崩瓦解。关于革命组织的误读最终会简化为中央集权主义=等级制度=独裁主义。因此,一种对于民主中央集权主义的列宁主义解读就有两个前提:它必须是民主的,因为只有从民主制度那里我们才能得到最好的教训,将最先进的经验内在化,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将其普遍化。但是,第二点则是,共识型的非中央集权主义的激进主义尽管看起来非常自由(并且在道德上更加优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实际。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意见不合,甚至也允许达不成一致。这样一种方法有些时候反映了一种试错的策略,这种策略有时可以改进(或搞坏)斗争的整体策略。与此类研究方法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民主结构的匮乏以及因之而导致的可靠性的缺失——弗里曼(Freeman)称之为无结构的暴政。在葛兰西对于权力和霸权主义的辩证解读中,抵制指的是一个独立而有组织的阶级(通过一个革命性政党而实现),这个阶级代表、而不是代替有组织的受压迫群体。但对于中东问题更相关的可能是下面一点:组织的形式和选择并非自主,而是由地域背景和与之相关的权力平衡所决定。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话语(某种程度上其实际外在表现)改变之后,其效果并未改变(Callinicos 2009)。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实践有所改变;但民族国家之间的网络依然如故(货币汇率的浮动亦然)。问题是在所有这些“空间”和“流动”<sup>①</sup>之中,权力究竟盘踞何处。实际上,全球政治经济学,信息通讯技术和中东政治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紧密相连。

### 三、信息通讯技术帝国主义

不久以前有这样一种虚构的说法,认为信息通讯技术积极地促进了自由,理由是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所产生的工具与服务让公民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从而促进了民主。在中东及北非地区,政治经济学往往涉及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就成了许多信息通讯技术分析中的

---

<sup>①</sup> 公平地说,卡斯特确实强调了因资本主义公司所占据的更加具有统治性的地位而导致的权力的不公平分配。他同时还指出了线上“流动空间”和线下“地理空间”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批判性地精确探讨这个问题。类似的重新解读还部分地存在于新社会运动(*neo social movement*)理论之中。让梅卢奇(Melucci)沮丧的是,他原创性作品中的“新”最终被具象化为了一个类别,并且具备了以集体行动的形式反对阶级的意味,这也就让新旧社会运动理论的支持者之间产生了错误的分歧(Melucci 1996:6)。

“房间里的大象”。但在这些分析中却存在一种奇怪的预期,认为互联网可以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ICT4D)。这种情形并不奇怪,因为在中东及北非地区从国家到自由[私有化的]经济的转化中,信息通讯技术一直跑在前列,这或多或少与1990年代晚期的民主化进程以及社会政治改革相关联。约旦和埃及被认为这一新经验的代表人。当发展的概念被当作修辞工具用来推广互联网时,它通常被认为能够带来经济繁荣甚至是和平;然而真正阻碍中东及北非地区实现正义与繁荣的帝国主义却很少被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广者们所提及。

亚乌(Ya'u 2004)将政治经济学与信息通讯技术的结合称作“新帝国主义”,因为全球经济的参与依赖于信息通讯技术。它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生命线。世贸组织为达到更大的利润率,准许市场信息的流动,因此当我们目光看向全局,我们就会发现世贸组织所强迫实行的例如自由贸易协定(FTA)与其说阻止了不如说增加了数字化鸿沟。但这种帝国主义、控制和所有权的最重要特质则是一种“全球治理”,这种治理由拥有巨大权力的机构所指挥,而这些机构又代表了工业化自由市场国家的利益。简而言之,这种合并只能通过国家支持方能实现。

互联网的上层建筑揭示出像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这样的实体是何等强大且中央集权,这表现在它们是如何分配URL域名和地址的。显然,这里的论点是单纯的信息量就能改变政策。但此类(比如Shirazi 2008)有关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分析大多源自欧洲中心的分析(比如Brinkerhoff 2005),声称互联网有利于表达一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现代性等。弱势的信息通讯技术通常和“后发展”的后独立障碍相关联,这些障碍本身就是从殖民结构里继承而来。在本质上,这些结构几乎没有改变,并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Murphy and Zweiry 2010)延续。互联网被新自由主义的规则所束缚,这些规则令中东地区国家处于弱势(Saleh 2011)。亚乌的重要贡献在于将新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重新加入了我们的语汇库。尽管2003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 SIS)会议议程由私人经济部门所拟定,而为大型跨国企业提供服务的国际电信联盟(ITU)的官方目标是推进信息通讯技术以填补数字鸿沟。如科斯坦萨-乔克(Costanza-Chock 2003, 4—5)所揭示那般,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都被此类峰会邀请参加,其原因就是为了遮掩其新自由主义的议程,科斯坦萨-乔克将这种企业行为称为“帝国主义”。当然对于帝国主义还有另一种定义,这种定义

并不十分清晰,同时也不能仅仅用寄生虫式的信息通讯技术公司解释清楚。

中东地区在很多时候都被描绘为受制于政治及社会矛盾。这些矛盾被描绘为其本质特征,同时它们很少被视为外在因素干预的结果。(被以色列侵占领土或者受到打着“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旗号所进行的侵略,以及为独裁者提供军火以及资金)。如特拉诺瓦(Terranova 2004)所言,互联网的力量并非与实际地理相隔离(虚拟现实),它实际上与其关系紧密。互联网激进主义的前提至少是提供人们负担得起的上网费用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这与所谓非空间无边界的神话相去甚远,与所谓民众自决以及领土自治更加南辕北辙。这里还没有言及那些企业和国家机关通过互联网所获得的海量私人信息(Lyon 2003),特别是在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以及 Web 2.0 到来的时代(Fuchs 2011)。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极为突出的技术权力——这自身也是一种权力结构(如政治-经济学中间的连字号一般)——在埃及得到行使:政府在革命开始之初便关闭了互联网。沃达丰(Vodafone)<sup>①</sup>的行为很好地告诉了我们所谓自由市场是何等的“自由”,在埃及政府提出要求以后,沃达丰几乎立刻就停止了对其付费客户的服务。诺尔(Noor)公司是最后一个停止运营的网络提供商,但这也因为它支撑着埃及的股票交易市场。在讨论莱努西斯(Renesys)<sup>②</sup>公司所提供的有趣的图表时(其中列出了所有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图示表现出了其直到关闭网络之日所有的活跃网络连接数据,这些数据线在关闭当天都突然变平),麦奎兰(Dan Mcquillan)认为“互联网失灵”表现出了一种次序化的模式(带有短暂的间隔),这种模式体现出这些公司是一个一个地接到电话通知它们将自己的网络从空中移除。<sup>③</sup> 于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操控局面的是真实的、拥有权力和地位的人(经理与CEO),他们有选择权,也有决策权。这也暗示着他们终究还是合作者。回顾过去,在最激烈的战斗和国家机器精心策划的镇压(骆驼之战)发生那一刻,互联网连接竟然恢复了,这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也意味着在政权核心存在许多内部分裂。出现的混乱局面可以解释为:面对民众良好有序的组织 and 顽强的抵抗,安全机构显得措手不及。

对于中东地区政治而言,帝国主义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标签,而是处于

---

① 英国电信企业。——译者注

② 互联网监测公司。——译者注

③ 莱努西斯公司的“平线”图表从以下链接找到:<http://www.renesys.com/blog/2011/01/egypt-leavesthe->

压迫与抵抗的正中心。这个地区拥有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磷酸盐),而且其地理位置在事实上决定着贸易路线(包括获取这些资源的通道)。除此之外,该地区是(国家支持的)军火工业的重要来源。考虑到这些现实,拷贝粘贴的颜色革命不仅只涉及本土经验,更多仍是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革命起义。这些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激进分子则称其为革命)由民众示威抗议驱动,与数年之久的筹备活动相关((Marfleet and Al-Mahdi 2009))。

#### 四、阿拉伯革命与互联网

在埃及和突尼斯爆发革命起义之前,通过古典式革命过程进行集体自我解放的想法被认为已是明日黄花。革命“首先是群众用暴力手段进入统治他们自我命运的王国的历史”(Trotsky 1930)。阿拉伯革命推翻了认为革命已成历史的众多社会理论(Callinicos 2011,5)。革命起义更新了关于革命的理念,并通过以城市广场为中心的示威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共鸣,比如西班牙的示威抗议“愤怒运动”(Indignado Movement),<sup>①</sup>始于美国纽约华尔街的“占领运动”,蔓延到 900 多个城市。最初人们对这些运动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示威者也使用新技术,认为同样是互联网引发了“引爆点”。相反,在 2011 年阿拉伯革命之前(在 2009 年伊朗的反对活动,即推特革命之前),外交政策和安全专家的兴趣是在中东地区使用互联网开展反恐和反网络极端主义。这些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思考忽略了其他重要的情况;对革命感到意外的回应凸显了这种偏见。革命中的“引爆点”并非与近在手边的工具相关,而是政治-阶级的动态演变。革命是罕见的,已有几十载未曾发生;套用列宁的话,突然之间数周之内发生的变化相当于几十年。<sup>②</sup> 革命引发关于互联网影响的重要唯物主义认识。革命事件开启了自下而上进行分析的可能性,此前是被忽略的。

在 2005 年到 2009 年之间发生了乌克兰橙色革命(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黎巴嫩雪松革命(Lebanon's Cedar Revolution)、摩尔多瓦推特

---

① 2011 年 5 月开始,西班牙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活动,名为“愤怒运动”,抗议西班牙政府无能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失业率上扬的状况。——译者注

② 目前还不清楚这句引语的出处,但它来自列宁在 1920 年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来自列宁文集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20/oct/20.htm>

之春(Moldova's Twitter-Spring),以及伊朗绿色推特革命(Iran's Green-Twitter Revolution),都是网络上大量“拷贝和粘贴”行为的预演,而这些正是2011年上演的重大事件的标签,互联网的影响提升为“至关重要的角色”。阿拉伯之春/脸书革命既是这种叙述的延续,同时也是一种中断。当斗争变得更加激烈,“革命”开始具有更丰富的意义,超越了“拷贝粘贴”的界限,以及对五彩缤纷的动植物标签的痴迷。对社交媒体的公开崇拜使得人们认为这场革命基本是中产阶级和世俗化的。<sup>①</sup>使用西方经验作为理解模型,通过现代化的棱镜评价阿拉伯革命,与之紧密相连的观念是社交媒体在现代性意义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同这段迷人的分析文字声称的:

就像西方社会那样,埃及社会的一部分正在从传统群体转变为结构更为松散的“网络个人主义”。(Wellman et al. 2011,6)

现代性-技术范式基于一项假设:数字化的政治改变了政治组织的“传统”方法。随着大众传播平台中信息传播的迅速特质,以及新组织形式的到来,规制不再等级森严。在这样的数字世界中,人们假设那些意识形态上“冥顽不化”的群体——比如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不再是组织政治抵抗的唯一方式。在这种叙事中,穆斯林兄弟会不再被视为合法的或是现代的(和数字化相反),而一些个人(例如谷歌公司代表戈尼姆[Wael Ghonim],他同时也是“我们都是萨义德”[Khaled Said]脸书小组的秘密管理员)受到人们的尊敬;形成了一种一厢情愿的思考,即新的社交媒体催生了非意识形态(世俗化)的一代。然而这意味着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注入了主要为本土理念的设想。一种类似的东方主义表征来自将“本土”作为单一实体的阐释与讨论。

我不希望仅仅用积极的本质论取代消极本质论——这是“脸书革命”爆发之初的评论所倾向的,而是将互联网视为更广的政治策略的战术特点。革命提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传播技术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是什么,比如政治力量如何在网络空间并通过这种空间进行传达?虽然优选的“网络”宣称更少的等级结构和更多的自主权,但当地复杂的政治背景驳斥了隐藏在这

---

<sup>①</sup> 这符合地缘政治的双重标准:对于巴勒斯坦人、黎巴嫩真主党、内贾德来说,他们如何使用社交媒体都不重要。



些叙事中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思考方式。革命代表了意识形态的混合物：进步的社会主义，自由的伊斯兰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反动的保守主义；然而，“意识形态”群体，比如活跃的革命社会党以及庞大的穆斯林兄弟会构成了革命的基础。此外，帝国主义的现实也有一些重要影响，其中一项便是保护残暴的独裁者的积极政策，这是许多示威者没有忘记的事实，也提醒我们这是革命仍在进行中的一个原因。本·阿里(Ben Ali)和穆巴拉克(Mubarak)都是西方世界支持的统治者，而西方对于革命的最初反应至多也只能被形容为“串通一气的左右为难”。而后，大规模示威抗议成为确凿的历史性事件并带来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只有当这成为明白无误的事实后，西方国家才转变了政治声明。美英法政治罗盘上的指南针才发生逆转：犹豫不决换为支持。

目前仍未结束的革命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政治格局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兴左翼政党；继1946年成立独立工会以来，阶级斗争再次出现，以大规模工人罢工为标志。阶级关系是埃及政治斗争中的关键元素。卢森堡(Luxemburg 1970)建立了理论解释政治起义具体化为周期性成熟产物的过程：当政治领域的斗争蔓延开来，经济领域的斗争随之扩大。但是，数字世界的不同之处是，政治动态的第三部分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诞生于解放广场的同盟关系。许多人使用并通过在线和离线网络开展活动，这将在下一部分得到阐释。我认为这个积极的角度符合其大规模影响，因为后者是对工具而不是起因的颂扬。

当地的具体情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与运动发生现场的强联系影响着互联网。网络激进主义促进了线下的解放行动策略。换言之，如果没有考虑政治和历史的语境化，对互联网价值的阐释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事实上，该地区早已处于动荡之中，而不是突然“觉醒”。从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Second Intifada)和沙龙(Ariel Sharon)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开始，到美国入侵伊拉克(2003年)，抗议活动已经积聚了近十年，人民对领导者向美国和以色列卑躬屈膝感到愤怒。对该地区政治普遍而强烈的愤怒情绪与国内问题交叠，随着新自由主义(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私有化带来的经济影响、以及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价格上涨，变得更加强烈。

2010年的维基解密事件暴露出的腐败程度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合谋不是民众逐日深化、逐日增长的愤怒情绪的原因，而是印证。在这些非常重要且

引发巨大争议的事件面前,技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可能是突出这些叙事作者的日常条件,而不是彻底思考司空见惯的阿拉伯政治现实。将互联网公司——脸书,推特,谷歌——置于事态分析的最核心,这暗示着某些西方式的特征非常重要,否认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阿拉伯革命。从根本上说,这是东方主义的一种形式。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依赖于使用一套(殖民主义的)愿望和利益来呈现和表述中东地区及该地区的人民。此外,萨义德(Edward Said)发表于1979年的《东方学》(*Orientalism*)显示,东方主义的话语也设定了一些表述的规则。在适当的时候(当受到挑战/抵制)这将会变得非常微妙(正常化的),它甚至无需依赖于带有偏见(沙文主义)的观点。以一些技术爱好者作为中介进行的知识生产在这里非常重要,因为技术象征着现代性,后者又进一步代表了西方文明。然而,这不必然或明确使用这样的组织方式:它还是关于这个地区和互联网作用的内在化主导(霸权主义)观念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其他学科有中东研究这样的紧张感,因为这个领域最根本的基础与外交政策紧密相关(Mitchells 2003)。革命显露出这样的神话至今仍然存在,就像我对技术、现代性和革命之间关联性的批判所阐明的。许多(媒体)话语的谬误在于将互联网等同于新一代年轻的激进分子。这样的框架认为非暴力和非意识形态是更好的形式,暗示着对于各种形式的抗争(暴力的、非暴力的、明显的、隐含的)都怀有否定的潜在倾向。

互联网激进分子所依赖的工具和压迫他们的当权者使用的一样,他们还不得不周旋于自发行动和在事态新发展中被收编的可能性;面对极度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颠覆政权的潜在力量胜算不大。尤曼斯和约克(Youmans and York 2012, 3)提醒我们,社交媒体平台在最初设计时并非以满足激进分子的需求为目的;在商业逻辑和激进分子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基础建设之间,存在直接的不相匹配。信息系统政策帮助独裁政权有能力禁止网络的匿名性。这来源于社交媒体的设置以及政府的担忧,结果在两方面制约了激进分子的活动:使用某种编码编程,以及用户条款(知识产权,内容)(同上,12)。福克斯(Fuchs 2009, 99)将问题简化为:如果排名最高的20个网络2.0平台中的19个都以赢利为目的(唯一的例外是维基百科),用户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权呢?回到中介性概念的辩证法(基础与上层建筑),我设想当(用户生成的)互联网影响物质条件,政治激进主义也牵连其中。

## 线上-线下的辩证法

论及互联网的作用,需要明确我们希望讨论什么样的影响,这非常重要。互联网如何扭转了权力的天平?卡斯特(Castells 2009)简化了这个复杂的问题,他指出社会运动的三个重要进展:灵活性、可扩展性,以及生存性(分别是重构、扩大/缩减,以及运作的延续)。在阿拉伯革命的语境中,可扩展性(关系的扩展)和生存性(运作的延续)这两个观念有特殊意义。截止点创造出一种最极端的生存模式,因此许多前数码时代的技术至关重要(比如拨号调制解调器和网络传真网桥[fax-to-web bridges]),创造出所谓的模拟网络。<sup>①</sup> 我将这些操作化处理(operationalisation)和对互联网评估融合在一起:互联网有两面性,它既是激进分子的工具(生存、运作的延续),也是激进活动的空间(网络的扩展)。文章这一部分将会显示,归档、技术团结(合作)和政治信念证明是反抗霸权主义行动组织的富有意义的元素。

我通过(重新)连接在线政治的(阐释学/民族志)特征,解构了审问的理论(抽象)层面。我提出,将线上/线下的界限解释为对基础-上层建筑之分的反映,将空间/工具之分解释为总体政治策略和战术的一部分,后者也多见于中介性中。此前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实地调查研究表明,某些行动的阶段(或时间安排)对于互联网潜在的作用有更多相关性。于是,我将革命区分为不同阶段:革命前(准备和动员),革命时刻(矛盾爆发的引爆点),以及革命后(胜利的延续或危险的矛盾升级)。互联网抵抗的矩阵模型(见图1)阐明了中介性的这个辩证法,清楚显示出互联网并非支配因素,而是变革的一个要素。将这些概念性解构合并起来,能够帮助我们对互联网抵抗有更加一致的、更富有条理的认识。

首先,政治网络和群体示威活动在线下实现巩固和加强。但是,互动和传播的网络空间放大了政治议程和政治观点。大多数的阿拉伯激进分子选择了社交媒体,仅仅因为是人们(主要为年轻人)在日常通讯中已经这样选择。而且,对于激进分子和参与者中一些特别的群体来说,互联网空间作为反霸权主义空间,发挥着关键功能(Warner 2002)。在革命前阶段,许多这样的空间都清晰表达了对于既有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集体批判。如果没有这个

---

<sup>①</sup> “网络工匠”是一个博客空间的名字,2011年2月10日的一篇博文可见:[http://www.internetartisans.co.uk/socnets\\_with\\_old\\_tech\\_egypt#comment-8423](http://www.internetartisans.co.uk/socnets_with_old_tech_egypt#comment-8423)

抵抗矩阵模型 (分析框架)

在革命的每个阶段, 权力 (及参与其中的行动者) 的平衡都随之变动	阶段	地点	线上	线下
	革命前 (准备及动员)		工具 空间	工具 空间
	革命 (引爆点)		工具 空间	工具 空间
	革命后 (继续与加速)		工具 空间	工具 空间

图 1 互联网抵抗的矩阵模型(分析框架)

准备阶段,难以想象引爆点逐渐成熟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加入一个阐释学的分隔,对于评价技术在反抗运动混乱爆发时的不同价值也很重要。比如,在1月25日,实时在线更新技术的使用就至关重要,目的是发现最安全的游行路线,或是查找并避开最危险的路线。奥尔曼(Kira Allmann 2012)对开罗激进分子的研究展示出移动技术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且,在革命期间,互联网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成为了建立全球团结互助的载体。互联网还成为政治身份形成的平行空间:与反抗行为有关的人们在网络上相遇,并且共享关于示威活动的信息,或是传播进一步激发愤怒之情和坚定决心的信息。在这层意义上,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便于政治协商的线上公共领域和意见形成的空间,有时甚至是决策的空间(当线下活动的可能性受到严重损害时,比如宵禁)。

这些“4月6日青年运动”<sup>①</sup>和“我们都是赛义德”<sup>②</sup>脸书小组(英语和阿拉伯语)的社交空间,以及那些高知名度的个体(法塔[Alaa Abdel Fatta], 3arabawi, 沙猴子[Sandmonkey]<sup>③</sup>)的空间,不仅是激进分子的集合点,还是

① 4月6日青年运动(阿拉伯语:أبريل 6 شباب حركة, 英语:April 6 Youth Movement)是埃及网民2008年在脸书成立的群组,目的是要支援大迈哈莱的工人在4月6日罢工。该组织也领导了2011年埃及反政府示威。——译者注

② 2011年初,“我们都是赛义德”网页在脸谱上宣布要发起“一场埃及自己的革命”,赛义德是埃及一名年轻商人,2009年6月被害后,人权活动者创立了这样一个网页,在脸书、Youtube和推特上的拥护者多达数十万。——译者注

③ 埃及博客作者萨利姆(Mahmoud Salem),网名是“沙猴子”(Sandmonkey)。——译者注

大量转发的手机短信、邮件、推特、脸书评论的源头,帮助动员“连线青年”这一群体。在革命进行的阶段,重复非常重要,“煽动”(朝向解放广场[Tahrir]的游行)、或是“巩固”一般性政治分析(需要坚守在解放广场),以及相应的组织行为也都非常重要。这些参与行为效仿了革命性政治行动组织的三重特征:教育-煽动-组织。参与到这些线上领域的是一部分有选择性的示威者,事实上社会运动本身就是社会中有选择性的一部分。在非常时期,这些子系统的影响可以超越他们惯常的社会交往网络,这标志出数字时代革命的不同之处。在革命时刻,当“临界点”到来,情感/认知的能力非常关键。这与卡斯特(Castells 2009)在上述“进展”中将互联网的公共影响解构为框架、议程设置和反映相一致。如果没有普通人通过脸书、Youtube 提供的海量影像,这些革命不会以同样的强度和深度被公众记录(也不会被感受到)。来自常规信源的大量报道引发政治反响,比如赋予激进分子以信心,通过信息传递的能量推进议程,向公众保证他们不是孤军作战,由此影响激进分子的判断和抉择。

我提到了相对重要性的观点,以反对绝对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之间经常被人遗忘的区别。信息通讯技术相对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是与埃及激进分子相关的特殊实证动态。在精通技术的激进分子、怪客(cracker)和黑客之间还存在有趣的分工;能够使用外语交流的;有固定的、完善的国际网络的;能够影响大量本地受众的(工会,球迷俱乐部,以及学生运动)。激进分子很自觉地使用不同工具对待不同的受众。解放广场上有两顶帐篷为精通技术的示威者配备,供应他们笔记本电脑的电力来自灯柱,帐篷上带有标记,通告视频和图片的收集位置;在停电期间,他们用手机录下影像,收集并上传到网络,以供记者使用。那些在埃及之外的激进分子紧跟来自国内的推特,翻译并转发(RT)给非阿拉伯语的受众,还对歪曲事实的报道提出在线批评。

我有意地提出社交媒体是平行空间和不均衡的,原因是当人们能够面对面接触时,互联网的作用就会降低,比如前文表明的私人场所和公众场合的重叠部分。至于上述对抵抗以及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的讨论,明确地陈述实体会议能够更好地策划组织政治行动并且建立信任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数百名殉难者所证实,这对于征募个体牺牲同样重要。另一个原因是,线下示威地点通常与人口密集的工人阶层街区的清真寺以及大学校园相关。如下事实相当重要:在网络遭到封锁时,革命依旧如火如荼。



图 2 “沙猴子”(Sandmonkey)在推特上关于革命的叙述<sup>①</sup>

① 牛津大学的基拉·奥尔曼协助制图。

一些激进分子在 2011 年 8 月的访视中回忆起他们在早期(1 月/2 月)关于革命剧变的经历。穆罕默德(Mohamed)、萨尔玛(Salma)和迪娜(Dina)记得,切断网络并没有瓦解反抗活动;对于政治运动现场,移动电话业务受到破坏的影响要严重许多。事实上,最终导致民众占领解放广场的关键战术与脸书没有关系:故意发布虚假信息以误导秘密安全部队(*mokhabarat*)。在数周之内,激进分子们每日碰面,通常在一间狭窄的客厅;正是因为活动组织在线下进行,才极少得到着迷于网络的记者的注意。此外,当互联网技术缺席时,人们和他们的身体抵抗非常显著。自相矛盾的是,5 天的网络管制使注意力更加集中,焦点更加明确。类似脸书的社交网站其实不是一个社会网络,而是用于社会交往的工具。所有那些没有连接的、在“节点”的虚拟结构之外的人被米加斯(Mejias 2010)称为“准节点”(para-nodal),和社交网站的用户一起构成网络。因此,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技术性的网络而是真实的人。哈马拉维(Hossam al-Hamalawi)是知名博客作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他认为当主流媒体开始使用互联网数据作为信息源,并且将其观点作为目击者记述,互联网的真实力量才发挥到极致。在 1 月和 2 月,脸书的实时信息更新功能就是如此。备受推崇的媒介(比如半岛电视台)对脸书信息的再次传播增加了这些工具的名气,同时也使人们想起这样间接的中介性。

整体来说,在互联网使用方面,中东和北非地区是全世界互联网普及率增长速度最高的地区(2001 年至 2009 年之间为 1600%);2011 年社交媒体(用户生成)的增长格外有象征性(ASMR 2011)然而,本文没有孤立地看待“互联网”,而是观察到新产生了合力。比如,当突尼斯和埃及的激进分子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时,半岛电视台成为他们的扩音器,此时社交网络与卫星广播的互动是什么样的?在组织并记录激进分子的无畏精神中,互联网不是决定性的,但仍非常重要,这些被记录下来事件对于其他激进分子非常宝贵(Naguib 2011,17)。在不同合力的连结中可以发现互联网权力赋予的真实作用。

通过“沙猴子”带有画面感的口语叙述,我对革命(起点)的进展进行观察。鉴于记录本身具有重要性,数字媒体让其变得轻而易举,实时更新也迅速淹没在同一天内数以百万计的其他更新信息。发生在埃及的革命通过现已世界闻名的“我们都是萨义德”脸书小组、推特和 Youtube 照耀到数百万人。这些数字的足迹源自事件的最中心,从 2011 年 1 月 25 日号召人们示威抗议开始,记录成为文字并在推特上存档。推特上的声音还包括在实体运

动中非常重要的激进分子。<sup>①</sup>

对于互联网可能作为激进主义活动空间或工具的命运来说,还有一些说明。首先,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之间的平衡性日益增长,这在前面关于信息通信技术和帝国主义的部分已经阐明。另一个重要的可能性是,在线的社交媒体空间中,激进分子开展活动的网络社区越来越反映出他们自身的社区。经过(创造出不具代表性的泡沫的)社交网站过滤的数字世界(由寄生的脸书主导)具有暗含的意义,原因在于这些衍生于企业前提和营销算法的网络平台。结果将会影响比纯粹的经济学更广的范畴,包括新的动员法则:辩论,共享,邀请那些基本已经站在你这一边的人们,实质上并没有努力联系更广的网络。帕里瑟(Pariser)(2011)认为,随着个人化技术(比如谷歌和脸书的个性化搜索结果)的到来,互联网用户进入了独有的信息通道,这些通道控制并且制约着我们使用的信息——基础是预测用户最有可能点击哪些内容的动力,这威胁到我们使用或共享信息的自主权。因此,我认为,对这些技术的、社会的权力场(正如本文所勾画出)的认识本身将会愈发重要。这样的社会资本对激进分子有“真实的”实体影响,不同之处是被逮捕和遭遇网络拦截和窃听(被诱骗相信某种叙事)。

## 五、结 论

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终极而又循环出现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些事情还会发生吗?一种回答是,它不会和现在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转发那些令人惊奇的更新信息,比如从“沙猴子”那里,也不能转发Youtube上关于现场的镜头记录以回应许多这样的调解性活动,这些活动聚集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使馆前,抗议我们的政府参与共谋,支持并颂扬那些站起来反抗的民众。如果没有社交媒体,革命者无法对抗政府的许多谎言,这就是社交媒体作为作为中介所发挥的最明显的作用。这个作用对于网页设计师或推特作者的具体劳动事关重大,必须被视为相互联结以及相互构成的。两者都参与了创造价值 and 剩余价值。马克思设想,如果技术从资本的暴政中解放出来,那么技术将成为一种解放的手段。对于马克思

---

<sup>①</sup> 这些选自推特发帖,南斯(Nunns)和艾德尔(Idle)在他们的著作《来自解放广场的推特》(*Tweets from Tahrir*)中列举。



来说,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商发财。<sup>①</sup> 当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增长,人们就对这些障碍熟视无睹。非物质劳动在阶级关系中维持稳定,而那些试图绕过障碍的努力则没有能够领会毁灭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目前正在上演的革命风暴。

当然,另一种回答是:革命仍然会发生,因为促使其发生的主要条件无论如何都已存在。或许不会发生在1月而是2月,或者迫使穆巴拉克下台的抗议持续了80天而不是18天。然而,真正的答案是,我们需要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思考整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原本就不合逻辑,就像“如果没有传单和小册子,早期革命是否仍会发生?”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技术生产和发端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并非由我们自身选择。

我将互联网视为阿拉伯革命中的抗议工具,这场革命本身又是更大的政治经济格局的一部分,政治激进主义分子在其中开展活动。他们暗指一种(东方主义的)框架,反思中介性的马克思式定义更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我描绘了技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援引阿拉伯激进分子作为例证。这样多层次的观察让我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关注点,这种关注点在(主流)互联网研究中十分普遍,占据优势。我的观点回应了卢森堡,认为革命变革并非依靠自发的无组织行为,相反它需要组织者、领导者、决心、以及问责机制。纪律和结构化的组织能够让激进分子从纷繁复杂和不平衡的现实中进行归纳概括,这对政治运动是否能存活非常重要。激进分子的网络没有证实“群龙无首”的观点,当讨论到政治行动的“新”互联网结构,这个观点经常提出。主要原因在于,看上去它似乎是一个新的、年轻的、非意识形态的、在线的横向运动,而关注者中的许多都对主流政治感到失望,不敢对这样的政治行动妄下结论。提出中介性的概念让我们得以理解,关于互联网作用的陈腐论调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互联网的双重特征:它既赋予权力,又剥夺权力。如何形容作为生产的艺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它连接着生产方式和代表性,这也很重要,因为:

---

<sup>①</sup> 《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3/theories-surplusvalue/>(译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9页。——译者注)

除非我们能够将过去的文献(虽然是间接地)和人类反抗剥削的斗争相连接,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所处的现状,因此(将)更无法有效地改变它。(Eagleton 1976,76)

本文由此提供了对互联网激进主义的概念性理解。网络激进主义结合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互联网对于草根社会自身的可能价值和贡献。社交媒体不能沦为资本意识形态,而应与之形成一种特殊关系,向我们揭露这种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这完全不是自相矛盾,而是在名为“资本主义”的最终准则中一起正常化的例外,这个悖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处,就以很好的理由得到彰显。

### 参考文献:

- Allmann, Kira C. 2012. *Mind, Body and Phone: Mobility, Mobile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United Kingdom.
- Aouragh, Miritan 2012. *Framing the Arab Revolutions: Myth Meets Modernity*. *Cinema Journal* (51)4.
- Aouragh, Miriyam and Anne Alexander. 2011. *Sense and Nonsense of Facebook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1344—1358.
- Aouragh, Miriyam 2008. *Virtual Intifada: Online Activism and everyday Resistance*. *Journal of Arab and Muslim Media Research* 1(2):109—130.
- Arab Social Media Report (ASMR)*. Vol. 1(2). 2011. *Civil Movements: The Impact of Facebook and Twitter*. Accessed May 25, 2012. <http://www.dsg.ae/NEWSANDEVENTS/UpcomingEvents/ASMRHome.aspx>.
- Armbrust, Walter. 2007. *New Media and Old Agendas: The Interne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9(4): 531—533.
- Bhaskar, Roy and Alex Callinicos. 2003. *Marxism and Critical Realism: A Debate*. *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 1(2).
- Benjamin, Walter. 1970(1934). *The Author as Producer*. Republished by New Left Review I/62 July-August. [http://www2.warwick.ac.uk/fac/arts/theatre\\_s/postgraduate/maipr/teaching\\_1112/warwick/st2/kobialka\\_reading\\_-\\_benjamin\\_w\\_-\\_the\\_author\\_as\\_producer.pdf](http://www2.warwick.ac.uk/fac/arts/theatre_s/postgraduate/maipr/teaching_1112/warwick/st2/kobialka_reading_-_benjamin_w_-_the_author_as_producer.pdf)
- Briggs, Asa and Peter Burke. 2005. *A Social History of Media 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runs, Axel. 2010. From Reader to Writer: Citizen Journalism as News Producers.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Internet Research*, edited by Jeremy Hunsinger, Lisbeth Klustrup, Matthew Allen, 119—134. Dordrecht, NL: Springer.

Burgess, Jean and Joshua Green. 2009. *YouTube: 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Callinicos, Alex. 2001. *Social Theory—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Camfield, David 2007. The Multitude and the Kangaroo: A Critique of Hardt and Negri's Theory of Immaterial Labou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2): 21—52.

Callinicos, Alex. 2011. The Return of the Arab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30, April. Accessed May 25, 2012. <http://www.isj.org.uk/?id=717>

Castells, Manuel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penter, Charli and Daniel W. Drezner. 2010.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 The Implications of New Media for an Old Profes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1(3): 255—272.

Carey, James W. 2005. Historical Pragmatism and the Internet. *New Media & Society* 7(4): 443—455.

Costanza-Chock, Sasha. 2003. WSIS, the Neoliberal Agenda, and Counterproposals from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2): 118—139. Paper presented for OURmedia III, Barranquilla Conference May, 30 2003. see also: [http://mediaresearch-hub.ssrc.org/ws-is-the-neoliberal-agenda-and-counterproposals-from-civil-society/resource\\_view](http://mediaresearch-hub.ssrc.org/ws-is-the-neoliberal-agenda-and-counterproposals-from-civil-society/resource_view)

Deibert, Ronald. 1997. *Parchment, Printing, and Hypermedia: Communication in World Order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oogan, Kevin. 2011. *New 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Cambridge, MA: Polity.

Eagleton, Terry. 1976.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agleton, Terry. 2004.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Eagleton, Terry. 2011. *Why Marx was Right*.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El-Ghobashy, Mona. 2011. The Praxis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 258. <http://www.merip.org/mer/mer258/praxis-egyptian-revolution>

El-Mahdi, Rabab, and Philip Marfleet, eds. 2009. *Egypt: The Moment of Change*.

London; Zed Books.

Featherstone Mike and Scott Lash. 1995. Globalization, Modernity and the Spatialization of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 *Global Modernities*, edited by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1—24. London; Sage.

Fenton, Nathalie. 2006. Contesting Global Capital, New Media, Solidarity, and the Role of a Social Imaginary. In *Reclaiming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Rights and Democratic Media Roles*, edited by Bart Cammaerts and Nico Carpentier, 225—242. Bristol; Intellect.

Fine, Ben and Alfredo Saad-Filho. 2010. *Marx's Capital*. 5<sup>th</sup> ed. London; Pluto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Reflections on Manuel Castells' Book "Communication Power". *tripleC-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7(1): 94—108.

Fuchs, Christian. 2011. Cognitive Capitalism or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The Role of Class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In *Cognitive Capitalism, Education and Digital Labour*, edited by Michael A. Peters and Ergin Bulut, 75—119. New York; Peter Lang.

Fuchs, Christian 20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cy on Facebook. *Television & New Media* 13(2): 139—159.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11. Arabs are Democracy's New Pioneers. *The Guardian*, 24 February.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1.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Harman, Christ. 1986.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 (32): 3—44.

Harman, Chris. 2007. Dialectics of Moralit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13.

Haug, Wolfgang Fritz. 2009. Historical-Crit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 Immaterial Labou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7(4): 177—185

Hirschkind, Charles 2011 Uprising in Egypt: The road to Tahrir. The Immanent Frame; blog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log: <http://blogs.ssrc.org/tif/2011/02/09/the-road-to-tahrir>

Howard, Philip N. 2010. *The Digit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Isl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dle, Nadia and Nunns, Alex 2011. *Tweets from Tahrir: Egypt's Revolution as it Unfolded, in the Words of the People Who Made It*. London; Or Books.

- Jones, Jonny. 2011.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30.
- Kellner, Douglas. 2002. Theorizing Globaliz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20 (3): 285—305.
- Kellner, Douglas. 2004. Cultural 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1.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essays/culturalmarxism.pdf>
- Kahn, Richard and Douglas Kellner. 2004. New Media and internet Activism; From the “Battle of Seattle” to Blogging. *New Media & Society* 6(1):87—95.
- Kahn, Richard and Douglas Kellner. 2005. Oppositional Politics and the Internet. *Cultural Politics* 1(1):75—100.
- Mansell Robin. 2004.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New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 6(1):96—105.
- Marfleet, Philip . 2011. Egypt Shaped at the Grass Roots. Open Democracy, 25 June. Online; <http://www.opendemocracy.net/philip-marfleet/egypt-shaped-at-grass-roots>
- Marx, Karl. 1857/1858. *Grundriss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ch14.htm>
- Mazarella, William T. S. 2007. The Myth of the Multitude, or, Who’s Afraid of the Crow? *Critical Inquiry* 36:697—727.
- Mejias, Ulises. 2009. The Limits of Networks as Models for Organizing the Social. *New Media & Society* 12(4):603—617.
- Mejias, Ulises. 2011. The Twitter Revolution Must Die. <http://blog.ulisesmejias.com/2011/01/30/the-twitter-revolution-must-die>
- Mitchell, Timothy. 1988. *Colonising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Timothy. 1991. America’s Egypt: Dis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Industry. *Middle East Report* 169:18—36.
- Mitchell, Timothy. 2003. The Middle East i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Digital Collection, MIT-IJMES*(1).
- Morozov, Evgeny. 2011. *The Net Delusion*. London: Allen Lane.
- Naguib, Sameh. 2011.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A Political Analysis and Eyewitness Account*. London: Bookmarks.
- O’Neil, Mathieu. 2009. *Cyber Chiefs: Autonomy and Authority in Online Tribes*. London: Pluto Press.
- Pariser, Eli.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Peters, B. 2009. And Lead Us Not into Thinking the New is New; A Bibliographic Case for New Media History. *New Media & Society* 11(1&2):13—30.

- Sabry, Tarik. 2012. On Historicism, the Aporia of Time and the Arab Revolutions. *Middle East Journa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5(1):80—85.
- Saleh, Nivien. 2011. *Third World Citizens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Sayers, Sean. 2007. The Concept of Labour: Marx and his Critics. *Science & Society* 71(4):431—454.
- Said, Edward W. 1997.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Shirky, C. and Malcolm Gladwell. 2011. From Innovation to Revolution. Do Social Media Make Protests Possibl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 Toffler, Alvin. 1980.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 Trotsky, Leon. 1930.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0/hrr/ch00.htm>
- Trotsky, Leon. 1991.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London: Redwords.
- Ulrich, Brian. 2009. Historicizing Arab Blogs: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Ideas and Information in Middle Eastern History. *Arab Media & Society* 8, <http://www.arab-mediasociety.com/?article=711>
- Wayne, Mike. 2003. *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 Key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London: Pluto Press.
- Warner, Michael. 2002.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Public Culture* 14(1):49—90.
- Wu, Tim. 2011. *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 New York: Alfred Knopf.
- Ya'u, Yunusa Z. 2004. The New Imperialism and Africa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 Village.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1(99):11—29.
- Youmans, William and Jillian York. 2012. Social Media and the Activist Toolkit: User Agreements, Corporate Interests, and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ocial Movem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2):315—329.
- Zweiri, Mahjoob and Emma C. Murphy. 2011. *The New Arab Media, Technology, Image and Perception*. Reading: Ithaca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李·亚茨(Lee Artz)<sup>①</sup>

## 21 世纪社会主义<sup>②</sup>: 打造国家, 推进革命<sup>③</sup>

冯建三(译), 吴畅畅(校)

[摘要]“玻利瓦尔革命”<sup>④</sup>兴起于委内瑞拉, 环绕劳动者与社区, 建立大众组织, 虽然还不稳定, 却已经挑战了阶级关系与市场关系; 这个过程再次确认了两个道理。首先, 虽然困难, 但如果要从根改变社会, 必须夺取政治权力。其次, 资本主义的现存文化实践, 致使革命过程更加复杂。本文厘清国家权力的组成要件, 并单独分析“国家机器”(政府), 将它当作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场域。作者将会表明, 委内瑞拉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成败及其问题, 关键之一就是民主的、参与的传播及公共传媒近用的建设, 能否竞功。取材自作者在委国首都加拉卡斯对社区传媒所做的田野研究, 本文致力于凸显

---

① 爱荷华大学博士, 任教于普渡大学客鲁梅校区传播系, 曾经是钢铁厂工人, 编辑并出版了七本书与数十篇论文, 无不与社会变迁、意识领导权、流行文化与国际传媒有关。

② 作者主张的社会主义, 有两个特色。一是拒斥市场机制, 二是认同劳动者产权与经营权。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与辩论, 在西方已有将近百年历史。在市场社会主义之内, 近年走访中国内地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罗穆尔(John Roemer)支持专业经理人模式, 施伟卡特(David Schweickart)则支持劳动者自营模式, 在大陆, 曹天宇是近年来提倡后者最有成绩的人, 参考氏编(2006)《劳动产权与中国模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挑战中发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译者注

③ 对于委内瑞拉传播与信息部的 Ana Vilorio、Catia TV 电视 ifredo Vasquez、Radio Primero Negro 电台的 Carlos Lujo, 我们敬申谢忱。为了民主与社会正义, 各位提供了时间与锐见。我们走访数十位委内瑞拉传媒工作者, 谢谢 Carlos Martinez 提供的后勤与翻译协助; Steve Macek, 以及委国传播协会「马克思主义与传播会议」的组织者与参与者, 都对本文提供了批评与改正的建议, 在此一并致谢。若无普渡大学提供经费, 本文的田野研究无法成行。

④ 玻利瓦尔(Simon-Bolivar, 1783—1830), 曾任大哥伦比亚(含今之委内瑞拉)总统与秘鲁独裁, 咸认为他是领导拉美脱离西班牙帝国而独立的重要政治人物。委内瑞拉共有 23 省, 亦有一省以玻利瓦尔为名。——译者注

的课题是,从根变革社会,就需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意识领导权,但生产与散播这个领导权所需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实践,必然遭致政治-文化的挑战,同时,各种阶级矛盾也会不断涌现。

[关键词]社区传媒,公共传媒,国家,国家权力,参与式传播,社会变革,意识领导权,文化,革命,阶级,阶级冲突

## 一、前言

客观地说,阶级社运也好,传媒社运也罢,总得挑战权力才能具有革命属性。没人能够自下而治。如果没有置换现有权力关系,就没有草根的社会转变。历史已经再三揭示,从(印度独立运动最重要领袖)甘地(Mahatma Gandhi)、(南非前总统)曼德拉(Nielsen Mandela)一直到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与巴西(前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sup>①</sup>,这些国家的劳工阶级不能,他们具有领袖魅力的这些代言人也不能与爱国的资本家们确保长久的和平共处。止步于论斤计两,为被剥削的人争取较佳待遇,却让资本的社会关系纹丝不动,这不是革命,若说这是务实,那么,以今日的标准衡量,亦难服人。如果我们渴望自由、民主与社会正义,查韦斯与委内瑞拉人在2002年4月传媒(重度参与的)政变后,就对“第三条路”不再抱以任何希望。21世纪若不是全球资本主义,致使更多人类受苦、更大环境生态遭殃崩溃,就得是社会主义,劳动阶级及其盟友就要建设民主社会,推进国际连带与团结。正是委内瑞拉的存在,前面这个声称才能取得绝佳的例子,正面举证。就在委内瑞拉,革命群体通过掌握权力,改变了社会。这篇论文就是要凸显这个历史过程的特征与矛盾,特别对焦于传媒实践,借此阐述国家与革命的辩证关系。笔者的体认是,我们必须重访并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劳动阶级的角色,以及文化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各种关系,纳进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特定脉络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几乎写于两个世纪以前;列宁与托洛斯基另有贡献,他们在孤立的、低度开发的、大抵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建构并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往后数十年来,马恩列托联合完成的这些论述与实践,历经改革派与革命派的辩论、捍卫与重新界定。议会路线的社会民主党人坚定认为,社会主义必能有机地从大众民主

<sup>①</sup> 本段涉及人物的职称与姓名全文由译者补充。——译者注



经验诞生；毛派人士、菲德尔派人士(Fidelistas)，<sup>①</sup>以及其他投身乡村战斗的游队，他们是要“通过枪杆子”夺取权力。无论出自何种路线，从理论考察或实践检验，国家与国家权力的性质对于社会革命的成败，仍然至关重要。本文无意回顾过往或现在仍在进行的辩驳，作者是以委内瑞拉现象作为具体的研究案例，从中看到阶级冲突的上演。我不会话说从前、无意引东道西，而是以葛兰西有关“意识领导权”(hegemony)<sup>②</sup>的提法作为出发点，愚意以为，这个概念具有相当大的澄清作用，我们在理解现代的、工业发展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了解各阶级政党的政治、公民投票与选举，以及商业大众传媒与流行文化，都能从中得到帮助。

若非积极地参与团结运动，或者，如果不是订阅激进期刊，人们大有可能对于委内瑞拉及其鼓舞人心的社会转型宏图，少有所悉。美国传媒专注在两类主题：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总统是个军事独裁者、民粹独裁者、隐身选举秀背后重复把玩、通过石油财富推动社会纲领而形同贿赂人民；以及，查韦斯的反民主作为，显现在对传媒与言论自由的攻击，作风如此，各种社会问题遂迎刃不解。集中这些主题并如此呈现，表明美国对于所有参与式民主的不屑，委国当前的民主，业已经由公民与劳动者通过公民投票，以超高比例批准了宪法，责成民主就是要负起“团结、社会责任与人文协助等各种义务”；然而，这些成就在美国传媒的前述声浪中，隐匿而无法为人所知。美国传媒与美国资本担心的是，委内瑞拉正向世人展示，民主确实能够运作，但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倒向)市场关系的民主。民主需要社会主义。

## 二、革命策略：政府政策与并行的政治机构

委内瑞拉转向社会主义之路，是客观情境与主体物质可能性的结合与统摄，是政治的辩证过程。查韦斯总统与“委内瑞拉联合社会主义党”(the 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Venezuela, PSUV)<sup>③</sup>推动与导引了玻利瓦尔社会主

①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1961年4月美国入侵后，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日后人们常以Fidelistas指涉古巴这段历史进程与模式。——译者注

② 该词最常见的译法是“霸权”，较能指涉国家自上而下所形成的支配现象，但却牺牲该词所具有的“积极同意”(active consent)之内涵，后面这个译法似乎出于香港。——译者注

③ 2007年3月查韦斯公告推动政党整合的计划，至11月组成PSUV，由11政党组成，但另有不加入PSUV的其他左派政党，如革命党、中产阶级革命派、委内瑞拉共产党等。——译者注

义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委内瑞拉革命民族主义,以及国际团结的混血),它提升了劳动阶级及其各联合盟友的权力,使其作为社会变革的施为者。查韦斯在2006年<sup>①</sup>首次清晰明白宣告迈向社会主义之后,战略就一直是运用政府之客观物质权力,拆解与崩盘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扩充公民的参与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所禁锢的“新力量与新热情”,就此组织与动员了起来(Marx 1867)。

支用“国家,推进革命”的委内瑞拉战略,沿着两条交叉轨道而进行,取用合适的战术,创造了针对资本主义的双剪运动,既要剪除资本家阶级,也不能不消灭资本的社会关系。第一,革命领导阶层使用民选政府的合法位置,研拟与执行政策,实践就是要让劳动阶级得利,要让弱化资本的社会关系。查韦斯与玻利瓦尔社会主义者既有政府权力在手,就用以打击资产阶级所设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用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特别是参与决策过程。行政当局每提出重要提案,就会鼓励公众进行对话,同时再有大众传播与大众的公共参与。采取行动之前,先寻求公众认同,这是为政府政策赢取支持之举。政策与措施用此方式推进,堪称具有革命意涵,这个具有意识形态的、政治的与法律的架构,贯穿于政府决策。如此,“社会主义”政府成为武器,对抗资本主义国家。1999年,71%选民公投批准了新宪法,其后就是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整个玻利瓦尔运动依靠复杂的互动过程交织而成,既有公共传播,又由社会运动提出,并且也是为社会运动而倡议的纲领,加上代表劳动阶级大多数人的合法政治代表,持续得以连任。查韦斯作为民选总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PSUV(及其创立之前的组织)则有党员作为民选代表而行使立法权,两权创造并执行了各种新的法律及政策(其间,另有十多次全国范围的选举及公投),司法系统与军队则运用法律授权,确认这些新法律(在遭遇挑战时或不被执行时,)能够得到捍卫与落实。

许许多多具有转型意涵的新法律及政策应运出笼,包括土地改革、住房改革、原住民权利、生产事业广泛国有化(如石油、钢铁、炼铝、电力、电信……以及其他)、劳动者对生产工具握有控制权与产权、创造教育及医疗保健与基本食物

---

<sup>①</sup> 一般认为宣布场合是2005年元月在第五届“世界社会论坛”(于巴西举办),Bruce, Iain(2008) *The Real Venezuela: Making Soc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Pluto Press, p. 16。——译者注

的社会基金,另有其他多种法律,对于有工作但仍贫穷的人及中产阶级,都很有利。通过在城乡镇市议政会<sup>①</sup>或其他场所,各种法律案、市民法规及提案,无一不在此历经公共辩论与讨论。查韦斯政府意志坚定,依法遂行政策并求其落实,决然推进劳动大众的利益,削弱精英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超过十年。

(中央)政府权力的直接运用之外,委内瑞拉支用“国家,推进革命”的第二个互补的战略是:设置并行存在的组织。现有的中央、省级与地方政府机器,充斥旧的科层与官僚技术人员,众所周知,因此委内瑞拉政府通过行政的与立法的倡议,建立并且提升了林林总总,符合大众利益的“任务编组”,使其与传统的政府机构并行存在。这些并行存在的任务编组并没有直接对抗既有的阶层,因此得以避免过早激生社会冲突,这些并行的组织提供人们非常需要的社会服务,它们鼓励参与、培育意识,循此创设了新的规范,团结的行为与社会责任的承担,得以运行。筹设并存的组织与机构,可说是马克思的建议已由玻利瓦尔革命予以执行,这就是劳动阶级理当“蚕食鲸吞,渐次掌权”(Marx and Engels 1998)。不消怀疑,并行存在的战略很管用,举凡新的领导意识、领导阶层、实践、社会关系及意识形态的建立,缺此不可——团结合作、强调参与,人的需要放在利润之前的新文化,赖以打造。并行存在的这些组织与制度,一方面避免与既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直接对抗,他方面透过各种社会任务的形式,等于是先发制人,未来若有任何企图,想要消灭或拆除这些任务,就会有认同并捍卫这些任务的社区活跃分子,不但具有信心,并且经验充分,不肯放弃他们的权利,也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力。对于劳动阶级、都会与乡村穷人,所获服务仍见不足的社区,这些任务编组的机构提供了至为紧要的服务。取自石油的租金与权益金,政府用以重新分配,作为达成这些任务所需的基金。罗宾森任务(Mission Robinson)<sup>②</sup>与里瓦斯任务(Mission Ribas)提供的是免费公

<sup>①</sup> 英文 community councils(另有些时候会是 communal councils),不好译,徐世澄译为“公社”,惟氏既指查韦斯说该经验受到中国革命后“初期经验的启发,但不是照抄……(而是)自己的模式”,那么,既有不同,另改这里的译法,应该可以。该词与概念的法律地位来自 2006 年 4 月《共同社区议政法》(the Law on Communal Councils,西文是 Ley de Censejos Comunales)的施行(徐世澄 2011《查韦斯传-从玻利瓦尔革命到“21 世纪社会主义”》,页 171,人民出版社。)。依据该法,相关人可以自定地理区,少则 10 户(原住民)、20 户(乡村),多则 200—400 户(都会),都可成区,区内若有 30%成人与会讨论,采多数决之后,就可决定专属于本社区的任何事务(从微型金融合作社、造桥铺路…至电台)。——译者注

<sup>②</sup> 罗宾森是玻利瓦尔当年流亡的假名,该计划在 2003 年 7 月启动,目的是教导查韦斯执政时,仍为文盲的 150 万委国成人识字、读写与简易算数。“里瓦斯”则从 2003 年 11 月开始,2013/1/9 读取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ssion\\_Robinson](http://en.wikipedia.org/wiki/Mission_Robinson),[http://en.wikipedia.org/wiki/Mission\\_Ribas](http://en.wikipedia.org/wiki/Mission_Ribas)

立小学与成人教育。在古巴医生的协助下,“深入邻里贫民区”任务(Mission Barrio Al Dentro)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得以得到社区医疗服务。梅卡任务(Mission Mercal)则在邻里街坊设立杂货铺,举国皆有,提供人们买得起的基本食物。<sup>①</sup>另外,联邦中央政府支持的计划,农业、土地、住房、渔业与、合作社与独立社区传媒,一应俱全。这些政府支持的任务与计划,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每一项目都有民主参与。各个社区议政会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彼此合作,确保公民得以持续参与对话。饶富意义的是,全国各主要产业已经设有超过600个工厂议政会(factory councils),控制生产与劳动条件及社区关系。过去10年以来,委内瑞拉革命的经验与战术向世人展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既有价值又能实用,其核心总结就是,革命者可以支用“国家,推动革命”: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经济结构框架了政治与文化实践;根本的社会变革要由新的社会关系与结构予以承载。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胜任社会主义的使命。简而言之,革命者怎么做?理解进而运用唯物史观,推动革命。战略清晰就能产生具有弹性的战术,革命运动要能刻意运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意识清楚地拆解相同的国家机器,与此同时,创建社会主义者的“劳动者自治政府”,这是马克思的用语。

### 三、论国家

国家机器不止包括政府,单是政府也无法完全组成国家,但通过政府权力推进具有革命属性的转型,支用“国家,推进革命”,不仅可行,也是21世纪社会主义必经之路。这是很大的一个辩证。马克思取向的社会观,得先确认具体存在的物质情境是什么,历史矛盾存在何方,或说是否即将出现,人们出于意识而予以介入,究竟应该怎么作,才有机会影响事态的发展。通过无数的论述与辩驳,我们知晓国家拥有多重而彼此互动的组件。概略言之,社会关系的社会再生产,有赖国家的组织。我们合当这么说,国家权力就是主流阶级关系的表达,国家机器是制度化的政治手段,确认阶级关系于强制中。当然,国家机器亦得依赖人们的同意,这才是优势阶级意识领导的真正意思,就在人们演练常识与日常规范时,意识形态与文化主导权就再次得到

---

<sup>①</sup> 该任务于2003年4月创办,至2010年有1.6万所,空间有大有小,另得6000个“汤肴厨房”,整个计划雇用8.5万人,2013/1/9 读取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rcal>

生产的机会(Gramsci, 1971)。因此,国家权力包括了(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2)创造并执行规则的国家机器;(3)合理化(译者注:现况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实践。既是阶级社会,国家权力所结晶的各种阶级关系,就展现在典章制度的结构,各种政策则传达了这些阶级关系。换句话说,各种制度与机构(政府)就是主要展示所,政府政策的内容及其造成的效果透露了社会分工的本质(Therborn, 2008)。通过各级法律规章及其强制执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各级政府之政策,界定并且再生产繁复的市场关系。与此同时,传媒与文化工业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就在提振、强化与再生产相应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实践方式,使之适合资本主义的需要。首要之务是,国家是一种关系,不只是典章制度,不只是工具。通过各种(包括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政策与实践,国家权力表述并且再生产了阶级关系。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运用其政治与强制权力,维持并且延伸阶级关系,或者,任何挑战这些规则的声音与行动,必将遭到阻挠。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功能,就是政治管理人,就是阶级关系(包括薪资劳动、利润归私与市场信条)的再生产者,与此同时,它又反映并强化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实践,循此,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比如,个人至上、消费至上、威权主义、凑热闹的娱乐方式)也被合理化了。了解国家权力具有这个三位一体的性质,我们就比较能够认知与理解,何以资本主义国家仍可将产业国有化,或说,社会主义国家仍可重新引入市场关系。资本主义仍可拥有国营生产工业,前提是薪资劳动与利润(归私)仍然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期之内,仍可运用小规模、原子化的零售市场,但生产与财富归由社会控制的规则与实践仍然必须再生产——虽说我们终究必须知道,假使市场关系维持长久,人们的团结、社会责任与互助协作关系,不免还是要遭致破坏(Lebowitz, 2010),如同梅斯查罗斯所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验,出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Mészáros, 1994)

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是:市场机制弥漫、生产由经理人控制、整部机器充斥党政人员、科层人员及技术官僚;文化方面,娱乐及消费至上若还不是人们整日奉行的消遣活动,至少已是常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集体参与;生产必须社会占有而计划必须集体而民主地拟定;政治与文化领域的特色则是,公共方式的劝导与说服,所有文化生产与活动都能重视参与。一般说来,国家的执掌、聘用的人员,及其决策与行政的过程,也就展现了国家的性质;国家捍卫了哪些阶级关系、创造与强制执行哪些制度与法规,也就界定

了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人事员额理当较少,因为工作者与社区组织按理能够主动倡议、执行与评估政策与实践成效。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其各级法规,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不强制法律的执行,其落实与执行,必须由劳动阶级与其他具有进步内涵的社会施为者(组织)作为自己的代表,予以实现——这是(1999年底,由72%选民通过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宪法所规范的前进方向(Lebowitz, 2006)。资本主义国家鼓励的是,消费者如同原子,彼此无涉,社会活动最好变成个别与私下之所为,市场则是主宰:强制薪资劳动的进行、强制利润归私的持续,借此保障市场,也保障(生产工具的)私人财产权及资本的再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则仰仗人们的团结、集体的承担、平等互惠、协作参与及对公众维持透明:倡导公共论述与辩论、生产工具的公共与社会产权,协作与民主决策。莱波维兹(Lebowitz, 2010)对委内瑞拉社区议政会的解说,相当平易简洁,我们因此得以知道,21世纪社会主义的落实过程,会是何种光景。

委内瑞拉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玻利瓦尔革命信念的社会主义者查韦斯是总统。社会主义政党PSUV在委国立法机构“国民代表大会”拥有多数,宪法宣告要走参与民主的道路。各种“任务编组”、各级议政会、多种生产事业的国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纲领与计划持续扩张,即便如此,委内瑞拉依旧是资本主义国家。2012年10月也许会有1000万人投票给查韦斯与社会主义<sup>①</sup>,或许800万劳工宁可选择工厂委员会,又或许有3万劳工是劳动者民兵团成员。即便如此,委内瑞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若以莱波维兹的眼光视之(Lebowitz, 2010),委内瑞拉现在是“租金”资本主义,因为委国主要资源石油早在1976年就是国有财产,国有化已久,这些油田的一大部分已经由全球众多石油巨人向政府“承租”。虽然国有,资本家剥削劳动力的古典解释,仍可成立,是有薪资的给付,但剩余价值仍以利润形式存在,显示委内瑞拉主流的优势社会关系,并未变化。任何财团都未能“拥有”石油,他们作为油田的使用人,已经支付租金,他们也支付权益金换得抽取石油的权利,无论是钻探、提炼、加工,或是输送石油,他们还是在积累其财富,并未遭致干扰。因此,纯就技术层面来说,租金与权益金是委内瑞拉政府占有的剩余价值份额;然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亦即薪资

---

<sup>①</sup> 2012年10月7日委内瑞拉票选总统,查韦斯以54.07%的819万票张选票连任。——译者注

劳动的存在并无改变,仍然只是作为满足市场的商品生产而存在。石油几乎占了80%的委内瑞拉出口量,以及大约25% GDP。委内瑞拉拥有的石油储存量为世界第五,<sup>①</sup>另有举世最大的页岩油田。坐拥海量油田,扭曲了委内瑞拉的发展。委国人口集中在都会区,农业遭致漠视,食物依赖进口。石油生产之外,委内瑞拉是有其他产业,包括炼铝、钢铁、纸业、水泥业与汽机车装配场,也有纺织、米粮与食品零售及饮料生产,加上传媒娱乐业(Enright, Frances, & Saaverdal 1996)。21世纪之前,委内瑞拉的经济是私有的、商业的与资本家的。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注定展现为泛层的过量生产,以及阶级不平等。全球资本主义尽管洋洋自得,但其胜利无法张扬于委内瑞拉,仅只落得相对落寞的收场。柏林围墙倒塌不久之后,1980年代委国总统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经在首都加拉卡斯(Caracas)激起大众的反抗。<sup>②</sup> 1992年以来,委内瑞拉反资本主义的新方向,就由查韦斯予以个人化的阐述及承担。<sup>③</sup> 委内瑞拉还是资本主义国度,但政府已经不是,风风火火的反资动静,已在其他地方登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现在身陷重围。

#### 四、再生产、改革与革命

以上对国家的理解若无失误,那么,就有下列理论与实践问题浮现:查韦斯的国家机器对于社会主义关系的建设,有其信守与承诺吗?他(们)拥有权力予以执行吗? PSUV/查韦斯政府已经落实了什么,未来,还会用它的(政府)权力做些什么?是否存在经验证据,显示国家机器的各种行动其实还是继续,并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或者,是否存在证据,显示

---

① 另一说法引美国的估计,指委内瑞拉石油蕴藏量5000亿桶(已经证实的是3000亿),目前年开采10亿,见 Weisbrot, Mark and Jake Johnston(2012)“Venezuela's Economic Recovery: Is it Sustainable?”, p. 5, 2012. 12. 19 读取自 <http://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venezuela-2012-09.pdf>——译者注

② 培瑞兹两度担任总统(1974—1979, 1989—1993), 1983年2月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委国经济活动快速滑落、货币贬值,贫富差距急速恶化。1989年,委国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纾困方案的条件,财政紧缩、公共支出大幅删减,民怨及随之而来的抗议行动四起,军警在2月27与28两日镇压首都加拉卡斯及近郊的人群,死亡人数低估是396人,但另有人认为超过3000。——译者注

③ 1992年2月,38岁已是上校的查韦斯发动政变,总统招降,他应允,但要求通过电视,向民众讲演。他说,起义的诉求虽然落空,但失败“只是暂时”。一分钟的号召,查韦斯顷刻成为全国英雄。——译者注

政府政策与行动,已经推进了劳动阶级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关系? 推动改变的条件是些什么,政府的政策与实践作为,又是怎么提振集体行动与劳动阶级的权力? 或者,这些政策与实践作为(包括已经强制执行,或欠缺强制执行的安排)继续了,并且也屏障了资本家阶级的剥削与支配吗? 资本主义经由商品生产,创造了剩余价值,并将劳动力创造的财富占为已久。资本主义必然也再生产了薪资劳动者、经营管理人员、所有权人,以及经济的、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与机构,借此再将那些关系弄成常规,使其显得自然而然。

究竟过去 10 年来,哪些社会关系得到再生产的机会? 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致使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继续与屏障? 以及,查韦斯国家扮演了什么角色,拆解了资本主义关系、打破了利润归私与薪资劳动的窠臼? 政府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推进,资本家组织起来反对政府行动,或是资本家对于政府政策,还算满意,也挺乐观其成? 这个玻利瓦尔国家扮演了什么角色,提振了生产社会财富的集体控制? 换个表述的话语,究竟委内瑞拉国家权力的三个构成要件,是怎么辩证延展的,不同的阶级力量又在做些什么,它们对阶级关系与国家权力的介入,呈现哪些光景?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产权、控制、规范与利润)是扩张了,维持平盘,或是被限缩了? 国家机器(行政、立法、司法与警政)是不是创设了所需的法律、政策并付诸执行,屏障了资本关系或是,推进了社会主义的关系? 是不是出现了或提升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实践,足以鼓励集体协作、团结、公民参与及创造力的发挥,或社会正义的强调,或者,消费至上、自我感觉良好及被动消极的凑热闹心理与习惯,一如往常?

即便仅只是粗略要览,关注之人也能发现,当前委内瑞拉的执政党 PSUV 与社会运动的轨迹显示,得到人民肯定而胜选的领导阶层,确实具有革命属性,他们正在运用政府权力,很有意识地对抗既存的社会矛盾及阶级冲突,若要解决,仅能通过协调有致的阶级行动。这些冲突并非经过政府的策划而出现,它们只是很有系统地冒出了头,它们提供了动能与机会,劳动阶级在有了组织能量之后,就能顺此转变社会关系,取代了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只是取代其政府。在查韦斯领导之下,政府政策及大部分 PSUV 党人似乎力求延伸与强化社会主义的关系:通过将更多产业与服务国有化,延伸社会主义关系;坚持劳动者要能控制生产,借此强化新的阶级关系;创设劳动者民兵团,落实各种决策,并支持社会运动的倡议,加快土地改革、住房改



革与传媒近用。委内瑞拉国家机器正在延伸社会主义关系,创造新阶级关系的空间、介入生产使不仅只是为利润服务、反对仅将劳动当作商品,以及,进行社会生产以便提供基本财货与服务(许多有关传媒、营养、生产活动及民权的新法律传达了这些承诺)。对抗的局面即将到来,但诚如贾华(VP Elias Jaua)所说,“对抗不来,社会效益不到”(Jaua 2011)。

支用“国家,推进革命”,这是战略,为了建立独立的劳动阶级制度,使其拥有决策权与控制权,这是有意如此而进入的过程。这个战略的内涵具有三项互有关联的要件,如前所述:一是生产与产权;二是政治权力;三是文化规范与常模。查韦斯政府的第一步,已经跨出,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由劳动者控制业已国有化的生产工具。这并不只是国有化及政府对产业的占有。非也,改变生产工具的产权,就包括了改变生产关系所需的各种法律及政策,因此就有各种劳动者与社区议政会,以及劳动者民兵团——不是政府控制生产,而是劳动者与社区的控制,是他们决定本地的、区域的及全国的资源分配。

查韦斯每周三小时的电视节目《哈啰! 总统!》仅只是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例子,政府用以推进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劝服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广受人民欢迎的节目是在新的公共服务电视(ViVe TV, TVes, 及 vila TV),以及数以百计的社区电台与电视台播放,这些广电机构都由社区议政会控制与组织,从中我们理当能够理解,民主的大众传播是为了新社会而存在,扩散弥漫于日常生活——传媒近用、公共论述,以及参与传播——节目制作人的政治意识是些什么,在所不论。

## 五、传媒在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传媒的产权结构刻正改变中,生产实务及节目内容也在变化,这些无不揭示支用“国家,推进革命”的战略。国家机器制颁相关法律,包括限制私有产权、给予社区拥有的传媒较佳的社会产权待遇,借此也就提供公共空间作为大众民主及参与之用,扩张劳动阶级近用传播工具的管道;与此同时,阻止资本主义传媒生产方式的扩充;理解这些新社会关系的角度,不再是广告与利润归私的挂帅,也不再是阅听人市场占有率的完全主宰。其中,有关委内瑞拉社区传媒的故事,尤其彰显了阶级冲突的样貌;它凸显了社会主义政府如何运用权力,不但建立,并且提倡劳动者控制而不是国家拥

有的机构,借此,更为社会主义与人文取向的文化,就能进行更有效的传播;这些作为无不在滋润另一种权力场域。委内瑞拉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反映者无他,就是外在更大的资本主义之社会关系,一方是攻击商业传媒,他方就是社区传媒并行崛起,这幅情景同样也揭示了运用政府权力对抗国家权力的战略,是有可能的,这是支用“国家,推进革命”。

委内瑞拉历来就是商业取向与私人所有,高度集中在少数人之手。(Golinger 2004)商业传媒至今仍然占有了超过80%的传媒营运。少数家族企业集团拥有15家电视台,包括影音讯号遍及全国的大型广电业者:“委内电视”(Venevisión)、“利文电视”(Televen)、格瑞纳集团(the Granier group)拥有的“加拉卡斯电视”(RCTV)<sup>①</sup>,以及雷佛尔(Ravell)拥有,恶毒地反查韦斯的、使用超高频(UHF)波段的“环球电视”(Globovisión)是有线频道;另外,还有许多区域电台。多年以来,这些传媒要角都是保守与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支持者,从不间断,它们也都获利丰厚,制播大众娱乐节目,肥皂剧、综艺秀、电视剧,只要能将大量阅听人卖给广告商,就成。“委内电视”频道的东主是西斯内罗斯集团(Cisneros Group),已经晋身全球传媒大亨的第二梯队,在39个国家拥有70家以上的传媒,包括“悠景电视”(Univisión)这家美国最大的西班牙电视网,还包括“直播电视”(DirecTV)<sup>②</sup>、“美国在线”(AOL)与“花花公子”的拉丁美洲频道,并且掌控饮料食品分销系统(比如,拥有委内瑞拉的可口可乐与必胜客连锁店)及其他文化生产公司,包括狮子棒球队与委内瑞拉小姐选美会。委内瑞拉一年制作大约18.4万小时肥皂剧<sup>③</sup>,在38个国家播出,比阿根廷、墨西哥或甚至远近驰名的巴西肥皂剧发行商的出口量,都要大。6个家族拥有发行量最大的6家报纸。大致说来,商业传媒与娱乐内容还是主流,占尽优势、强健有力,净获利超过报纸、汽车及所有农业生产。很重要的是,除了“委内电视”以及近来《头条新闻》(Últimas Noticias)是例外,商业传媒无不耸动,反对查韦斯之余,有些时候,其攻击简直可说是疯狂了。除了这些大型商业电视台,仍有一些比较专门

① 全名是Radio Caracas Televisión。——译者注

② 美国最大的直播卫星集团。——译者注

③ 惟另一文献显示,委国2012年电视剧自制比例仅略高于25%,见Alvarado, Morella, Luisa Torrealba(with Mabel Calderín, Carlos Arcila1)(2013)‘Venezuela: from suspense fiction to nationalized fiction’, pp. 473—508, in Ibero-American Television Fiction Observatory(eds, 2013)Obitel 2013: Social Memory and Television Fiction in Ibero-American Countries, Porto Alegre: Editora Meridional Ltda. ——译者注

的电视频道,如“河谷电视”(Vale TV)是天主教的教育台,子午线运动频道(Meridiano)、美洲狮(La Puma)音乐频道,以及远距(La Tele)娱乐频道(Wilpert 2007)。简而言之,这些传媒的政治经济状态就是:生产工具的私有产权巩固又集中;广告支持的娱乐传媒为了利润归私而进行科层产制;制作并发送节目给阅听人,只当他们是消费者,充斥于这些节目的故事与主题,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既肯定又揶揄,它们强化了消极被动、遵从权威与个人消费的倾向。

## 六、反动与革命

在2002年4月政变失败后,这些传媒产制条件遭遇到了戏剧性的挑战,当时,主要是由主流传媒而特别是RCTV的东主居间串连指挥,加上总商会与天主教会的参与(他们都曾谘商美国)(Gollinger 2006)。政变领袖绑架查韦斯,立刻“废止”所有民权与宪法,解散国民代表大会,关闭委国当时唯一幸存的独立电视台。他们并且在政变期间,通过旗下的所有全国电视网,播放卡通漫画。不过,人民很快就发现这起图谋不轨。政变短命——加拉卡斯劳动阶级当中,意识更为清晰的一部分人,掌握了新兴的社区传媒,包括低功率的社区电台及兼具活跃分子身份的记者,纷纷油印与散发数以千计的传单,借由这些管道发声与策动,大量市民起而行动,群众示威对抗政变(Sanchez 2012)。这些活跃分子随即在5月创造了在线新闻网Aporrea.org(意思是“美洲大众革命大会所”),其后,该网站摇身一变,如今是委国所有社区新闻与信息的交换中心,支持革命。

千千万万支持者涌入街头,包围了总统府米拉弗洛雷斯(Miraflores),现在是政变者的指挥中心。查韦斯总统获救后,人民群众庆祝反击有成。不过,意识更为清楚的领导层对于权力的关系,有着更为清醒的评估。或许,他们心知肚明,查韦斯政府还没有办法攻克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加拉卡斯地区有78位传媒工作者,在其他政府代表也在场之时,会晤查韦斯,他们要求拥有更多的公共独立传媒-支持革命的传媒-不仅只是政策,也要实践。

虽然政府经营的VTV全国广播,所有人都能收到,但诚如社区传媒工作者指出,这类集中管理的大众传播,有其脆弱属性。他们坚持社区传媒必须不能隶属国家,应由工作者在社区直接控制社区传媒。政府对这些建

言,立即有了反应。就在同一年,委内瑞拉创立了新的传播机制:“传播与信息部”(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MINCI)发动“战略目标”,要让传播权回归民众,MINCI 启动了独立的社区传媒方案,同时增加对商业传媒的规范与监理。MINCI 在这里就是国家机器,响应了劳动阶级的需求。国家机器(政府)如今拥有合法权力,掌握在革命者手中,国家权力的三个要项,都已处置。从一开始,查韦斯政府就已经通过法律,提供资源以求将传媒的政治经济情境,作一革命转化,这些法律包括 2000 年的《有机电信法》(*the Organic Telecommunications Law*)建立社区传媒权(比如,该法第十二条说,每个人有权创设非营利社区电台)。国家机器在此行动,削减传媒的资本主义关系,提升社会主义关系。传媒产权有了变化。公共产权与社会产权得到扩张,在各劳动阶级社区,公民参与也彼此协作,直接控制了传媒。不过,人们要在 2002 年才开始集会,彼此相聚,遂能对于参与式的社区传媒产制,有了更清晰、更明显的重点,其后,新的传媒法予以法条化。第一,2002 年有了《开放社区电台和电视台广播裁定文》(*the Open Community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 Ruling*),界定了传媒产制的标准,社区为基础、独立制作的讯息与节目,必须优先播放。2006 年的《广播电视社会责任局部改革法》(*the Partial Reform Law of Radio and TV Social Responsibility*)概述了传媒的权利与旨趣,“就在提升社会正义,协助全体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益于民主、和平、人权、文化、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与经济发展”,并要“提升公民的积极与直接参与”(MINCI 2006, 9, 14)。法案施行数年之内,政府核准了大约 300 家的调频(FM)与电视执照。到了 2011 年,委内瑞拉的社区传媒已经接近 1200 家(Venezuela en Noticias 2012)。石油业国有化之后,政府指定其部分营收作为“社会基金”,再从中提供器材与技术资源,同时匀拨经费作为人员培训之用——一箭双雕,冲撞资本家律令,使不再拥有资源的专断分配权,同时移转这些资源,支持参与民主的推进。通过执照授权,政府提供公共传媒空间——不是大多数国家社区传媒使用的窄波段低功率,而是波段、功率及地理区大到,比如,可以在首都加拉卡斯向 300 万人口广播的“社区”电台。通过支用“国家,推动革命”,传媒生产实务与控制权有了改变,法律与执照授权确保了劳动阶级能够直接近用与控制,革命之声有了合法依据,也得到了培力的机会。这些法律及执照授权过程,认定商营的、国有的、党营的与教会经营的传媒,不是公共传媒,并且,依法公共传媒要有 70% 以上的内容,直接

由本地的社区议会制作。<sup>①</sup>

试举一些例子,当可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究竟能够运用其权力,将传媒的政治经济格局,革命性地改变至何程度,也能看出其对文化实践的显著影响。以全国为范围的公共广电之发展与扩张,堪称委内瑞拉传媒景观当中,最容易就能辨认出的变化。内容产制的纲领与过程则让我们眼神一亮,认知更为民主的政经架构,对于文化实践的意义。除了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古巴与玻利维亚联合协作,创立的“南方电视台”(Telesur)(Artz 2006),以及国民代表大会的电视频道 ANTV,<sup>②</sup>另有三个主要的直播卫星电视台也创立了:TVes、ViVe 与 Avila TV。这些公共广电机构的财政来源都是“社会基金”,外加在委国全境播放的社会服务“广告”。这些电视台都是独立经营,不在政府指挥之内,不经政府督导,甚至也不由政府批准——当中有许多节目高调批评查韦斯与政府,高度显示了前述事实。节目的产制与实践再次表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者辩证进行,这个新社会的生产者、编辑人、阐述者与影像人员,就是新人的诞生——由于他们意识到了、感知到了自己的创造力,也体会了社会矛盾,他们的社会感知与他们的生活,就此得到了发展。2006 与 2009 年的亲身访谈,2010—2011 年的电子通讯,在接触与访谈了数十位生产者、导播与技术人员之后,笔者不得不说他们都表达了决心,无不想要打造新社会,反映民主参与及分享决策权的积累经验,他们认为理当优先强调社区、劳动者、女性、原住民及一般公民。

## 七、公共传媒、公共近用

2007 年,委国最大规模的私有广电公司 RCTV 的执照期效届满。“国家

---

① 纽约皇后学院社会系教授佛南荻丝(Sujatha Fernandes)曾在 2005 年实地调查,她提供的资料是,政府给予合法电台的资助额度不大,并且仅给一次(约 470 美元),地方人士的志愿与定期捐输(如汽机车修理店每个月 47 美元,地方面包烘焙店每个月 71 美元)才是重点,“我们有能力自给自足”。虽然主流的商业传媒说它们“是国家的宣传工具”,但她说,这种污名与实不符,这些电台当中有很多力求自主,表现在它们与官僚的斗争,也表现在就重要议题,它们屡屡批评查韦斯政府。相比于实境电视节目、肥皂剧与猜谜游戏等所想要迎合的全球中产阶级之消费主义文化,她认为这些电台的谈话、教育、地方文史、儿童秀及许多音乐节目与各色多样的舞蹈等等内容,富涵更多公民养分的滋润, Fernandes, Sujatha(2005) Growing Movement of Community Radio in Venezuela, Dec. 26, 2007 年 6 月 12 日读取自

② 一说法指设置之见,2003 年提出,经辩论一年多后,2005 年 2 月开始播出,2013/1/10 读取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Asamblea\\_Nacional\\_Televisión](http://en.wikipedia.org/wiki/Asamblea_Nacional_Televisión)——译者注

电信委员会”(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CONATEL)与 MIN-CI 的评鉴意见是, RCTV 违反并且坦承不讳, 违反广电法许许多多。还有, 新宪法要求公共广电应予扩大, 因此(RCTV 原先使用的)第二频道得另作分配, 给予“委内瑞拉社会电视”(TVes)<sup>①</sup>。如今, RCTV 继续在卫星与有线电视系统广播, “环球电视”、“委内电视”及其他私有的地方电视, 依旧反对玻利瓦尔宪法的社会规划; 然而, TVes 让委内瑞拉有了第一家以全国作为范围, 诉求公共利益, 也提供公共近用, 对所有人同时放送的广电频道。(Ciccariello-Maher 2007) TVes 是公共经营, 董事会由工会及社区组织选举产生, 财政方面, 国会拨款 1100 万美元, 代为制作社会服务广告片又得部分收入, TVes 倚重独立生产者(independent producers, PIN)<sup>②</sup>与记者及社区生产者甚深。TVes 的年度节目表, 有 78 个 PINs 提供约 229 个节目。传播部长拉罗(William Lara)说, TVes 定位在“仅只是一个通路, 独立的文化作品经此进入电波”, (转引自 Ciccariello-Maher 2007), 这是委国广电史第一遭, TVes 的节目有非常醒目的部分, 说的都是劳动阶级、女性与原住民。商业的“委内电视”与 RCTV 播放的是肥皂剧(telenovelas), TVes 并非不播, 但其第一出肥皂剧的主角是黑人。有关人民历史的纪录片也经常 TVes 播放。

早于 TVes 四年创立的“委内瑞拉愿景电视”(Vision Venezuela TV, ViVe)则几乎是百分之百投入于社区产制, 由“社会基金”提供经费, 禁止任何广告, 以独立、公共与合作准则经营, 仅有 10% 节目内制, 其余 90% 取自社区影像工作者与纪录片生产者(特别注重传统的种植技术与实作、原住民音乐表演、地方社区文化活动, 以及对于住房、公用设施, 甚至是宗教节庆事件等, 进行调查报道。)十年以来, 入镜入频道的社区已经超过 14000 个, 平均一周播出 40 出半小时节目。由于创办宗旨作此设定, 社区产制是重点, 因此, 委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女性、非裔委国人及原住民都能在全国电视频道, 取得醒目的出场机会。又为了确保质量无虞, ViVe 以社区为基础, 组织影像产制的培训班, 有些通过社区议政会, 有些则通过劳动者议政会而推进。玻利瓦尔社会主义宏图创造了许多“社会任务编组”, 特别为穷人提供医疗保健与教育。在电视方面, 就是 ViVe, “每个人都能得到服务, 无论阶级、肤色或

① 发音是 te ves, 西班牙语的原意是“看到自己”。——译者注

② 若译为制片人, 或容易与我们习惯的商业制片人, 产生概念的混淆, 因此改译为“生产者”。——译者注

信仰,都能参与更大的政治辩论,讨论社会主义与这个国家的转型”(Sergio Arriasis,转引自 Wynter 2010)。ViVe 不是美国传媒改革运动所主张的公共服务广电。ViVe 是公共近用,是传播已经是公共控制与公共产制。ViVe 甚至运用手机移动传输,在委国各区域设置转播站,另设有相关课程,教导公民广电技术。新的社会权力已经浮现,这是因为劳动阶级社区与个人都能通过直接参与及集体协作,产制有助于团结的传媒与民主文化经验。这些很有创意的生产者代表了新的人类,他们是很有意义的施为者,在劳动大众及其盟友中,努力工作,也为了彼此团结而作。

还有一个重要的公共广电频道,创办宗旨在于建立与委内瑞拉年轻人的联系,值得重视。“阿维拉电视”(Avila TV)在 2006 年创办,出于尊奉玻利瓦尔路线的首都市长巴雷托(Juan Barretto)之提议,这是社会主义传播倡议的一部分。

大约有 400 位二三十岁的人,生产、写作、编辑、拍摄与播出扣人心弦,很有创意的节目,目标是都会青年人。<sup>①</sup> 我们也许可以说,阿维拉电视台敏感如嘻哈,却谱出社会主义的词曲。阿维拉电视典型的一天,会有新闻、政治时论秀、国际与社区议题的专题,有关加拉卡斯劳动阶级家庭的肥皂剧也会在内,就是没有广告。他们决定制作节目的准绳,明明白白,就是新的社会秩序,许多年轻的生产者都能清楚阐述,其中一位说:“我们并不是要卖洗发精,也不是在打造服饰的品牌,也不是为了任何资本家的产品而产制。我们尽力试着遵守我们自订的原则,我们要与消费至上的风尚战斗。”(Mellado 2009)收看阿维拉电视的观众很快就注意到了节目独有的风格、调调与结构。有些时候,音乐都让人觉得很些论点、相当响亮。阿维拉“不是 ViVe,他们走的是论述路线,我们走的是美学路线”(Mellado 2009)。比方说,2009 年春季,阿维拉开始每周播放系列节目,叫作《输卵管》(El Entrompe de Falopio),内容谈的是革命期间妇女及性别议题。《人籁、人的容颜与人的斗争》(Voice, Face, and Struggle of the People)长达一年,其中一集是《豁免》,因政府大赦参与 2002 年政变的领导阶层,主持人、来宾与观众交相尖锐地批评政府。即便是电视剧都有政治的弦外之音,却又不是那么委婉的芒刺,指向

---

<sup>①</sup> 另一笔信息指,该频道启动资金约 510 万美元,是区域频道,观众设定在 14—30 岁,前身是提供青年免费一年影像技术培训的“都会影音生产学院”,2008 年底移转至 MINCI 时,曾有争议,2013/1/10 读取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Avila\\_TV](http://en.wikipedia.org/wiki/Avila_TV)——译者注

不民主的阻拦,也指向政府,认为政府没有为劳动阶级的利益张目,没有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不少纪录片的质量都很高、制作得相当专业也很有创造力,包括众人击掌叫好的《政变》(*El Golpe*),以及2009年的剧情片,《加拉卡斯200年:美洲大陆的起义之都》(*200 years of Caracas: The Insurgent Capital of the Continent*)。阿维拉电台的年轻生产者制播的题材,还包括了非裔委内瑞拉人、原住民文化及同性恋等等,对商业电视来说,所有这些主题若非视若无睹就是禁忌。最后,阿维拉是“红色电视”(RED TV,英文全名是委内瑞拉革命与发展教育台,Education for the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enezuela)的部分,这整个教育计划涵盖了整个都市,要让首都加拉卡斯的劳动阶级社区,都能得到学习剧本写作、电影剧本写作与影音产制技术。到了2010年,加拉卡斯已经有55个社区议政会设有传媒委员会,会员都能得到广泛的训练、悉心的师徒传承,摄影机、计算机、影音产制及其后制所需的编辑软件,都能在这里得到学习及操练的机会。

(有了这些培训与产出,)社区传媒委员会也就定期安排作品上文件,阿维拉电视每日会播放这类影音作品10—15分钟。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政府从地方到中央,均已创设法律、提供资源及备妥空间时段,播放这些非商业的、非资本主义的传媒产品。若用玻利瓦尔这整个大方案的语汇来说,新的“主人翁”现在可以充分参与,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故事,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在产制影音作品,是在做电视节目,是在传播,同时,他们也在打造新人类。劳动阶级社区与社区活跃分子的生活与经验都是很有价值的,人们也予以看重、愿意分享—这就等于是告诉国人,新人类如何打造了出来,是些什么内涵,以及新人类可以,也将要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转化,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 八、社区传媒:独立及参与

(在查韦斯主政以前)这些重要的广电活动与表现,以及社区收音机与电视兴旺之前,委内瑞拉已经存在丰富的参与传播之传统,与其在历史上与政治上,呈现呼应之势,可说是两相互补。在这些参与传播之林,加拉卡斯的“凯提尔电视”(Catia TV)是群伦之长青领袖,这是委国第一家合法社区电视,它的台呼是“不是看电视,是打造电视!”(Don't Watch TV, Make TV!),该台的广电摄影棚外墙,刻上了这些字眼,另有四至七组社区影音生产者联



合组织了“独立社区影音生产团队”(Independent Community Audiovisual Production Teams, ECPAIs)。每一天,这个协作轮值的团队也都展示台呼。各个 ECPAI 决定各广播节目的题材、格式、美学风格与内容,“强调从邻里街坊的角度讲故事,无论是否存在矛盾或变化”(Vasquez 2009)。“凯提尔电视”活生生展示了对于教育与民主参与的重视,它将电视节目的生产,接合于群众集会、事件与传播游击队:涂鸦画壁画者、讲故事的人、口述历史的人、手工艺创作者与玩木偶的人。它的目标就是“作为组织工具,所有社区都要能建立自己的影音论述!”(Catia TVe Collective 2006)协作教学与学习的成果是,数以十计的 ECPAIs 出现了,他们“具备了传播的知识;对于个人或群体必须生活的周遭环境与社会脉络,他们有了批判力的分析;他们又辨识了影响群体或集体愿景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之价值,亦开启了理解现实及如何行动的认知,同时,他们一起学习,建构了集体的知识;他们辨识,也分析了(他们)自己的实践活动。”(Catia TVe Collective 2006)

“凯提尔电视”最早只是“西蒙·罗德里格斯文化中心”(the Simon Rodriguez Cultural Center),这是以志愿者作为基础而发展有成的方案,是在附近邻里的空屋播放电影与其他影音作品,其后,逐步演变,最后就成了以传媒作为基础的社会运动,通过紧密的社区互动,有了扩充,也进行了有机组织。早在 1998 年查韦斯胜选以前,凯提尔西城区的各个社区中心,其产制的新闻及娱乐节目,已经在这个文化中心播放,当时,伊克澳(Blanca Eekhout)是这些“文化中心”的头头。现在,他是 ViVe TV 的理事长,将参与模式的激进社会风潮,带进了公共广电的核心,从实践面确认了玻利瓦尔政府的革命动能。就在委国上下进入开办社区电视之际,“凯提尔电视”在 2000 年取得了执照,到了 2002 年 4 月政变前夕,参与的、民主的与公共近用的电视,标准已由它设定。2003 年以后,数以百计的新社区传媒开办,也就跟进与模仿这个模式。“凯提尔的根本原则就是鼓励社区先有组织,同时带动参与实作。凯提尔试图达成的是,通过社区参与,使影音产制反映社区斗争,并展现如何在社区之内建立多重联络网络!这个目标是创建人民所要的传媒,并以对话为基础,进行民主参与。我们因此认为,凯提尔电视节目,至少要有 70% 委由社区内部产制,这是达成前述目标的部分工作,同时这也符合社区传媒理的初衷,成为人们行使权力的空间。这是因为,凯提尔电视是联系劳动阶级的电视台!每一个参与凯提尔电视的人,都有最起码的政治意识与社会责任!凯提尔电视与加拉卡斯其他社区的组织化的群体,共享传播空

间,我们借此传达抗议之声!”(Catia TVe Collective 2006)

现在,委内瑞拉社区电视数以十计,并非所有电台都能成功整合传媒产制于社区参与。“佩塔雷电视”(Petare TV)虽然也得到了财政支持,也有技术与训练,但却没有太多社区内容,它的存活相当摇摆,欠缺住民的协作与有机联系。若无参与及旨趣攸关,即便政府倡导在先,也是愿景落空,“佩塔雷电视”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佩塔雷社区议政会几乎不存在,近来,哥伦比亚移民多少造成了更多的社会动荡与混乱;犯罪、失业、毒品,以及人际关系不存而原子化,这些都已成为佩塔雷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住在这里的人固然是公民,但胆战心惊之时,多过备受鼓舞。这样一来,“佩塔雷电视”对于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来说,也只不过是众多频道当中的又一个,这个地方的人并不觉得,也不肯认社会责任或集体行动。国家机器无法强制参与,也不能强制新的社会秩序或社会主义的到来;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赖于参与、主动倡议、时间积累、资质性向、创造力,以及进入社区生活,促进有机连带。社会变革有待推动,但心有怨怼或放任自流,都不太可能是动力。

对比之下,委内瑞拉东岸巴洛文托(Balo Vento)的“非洲电视”(Afro TV)却是明证,显示在社区活跃分子领导之下,配合政治觉醒的社区,可望发挥的社区传媒之文化与社会潜能,会有多大。委国人有大约15%是非洲族裔,这是西班牙殖民的历史后果,当年,他们输入奴隶,在东岸垦殖可可。中央政府历来轻忽巴洛文托,任由仍然存在的可可小型垦殖商持续剥削。在新宪法获批准,确认委内瑞拉作为多种族、多文化社会之后,几经讨论,中央政府就在国民代表大会设置非洲后裔次委员会。先前提及教育、医疗与住房等任务编组,延伸到了巴洛文托,同时也引进了公共的、独立的社区传媒之创建机会。“非洲电视”是一群社区活跃分子发动的区域传媒计划,成型算是相当早。他们的使命是重新发现他们的非洲根源,表述他们当前的文化与艺术面貌,组织公众就当前重要的巴洛文托议题,展开对话,如土地改革、发展议题,以及劳动者控制可可生产等等。通过超高频(UHF)波段,2009年的“非洲电视”一日播出4—5小时,同时亦可通过互联网收看。早先的节目包括“齐马洛尼”(Cimmarones),有关奴隶反叛造反的故事,以及“这是什么意思”(Que Es Eso),特写本地人述说他们的故事(Perdemo 2009)。“非洲电视”的规模不大,但仍然足以表明,传媒近用与社区文化经验的关系,以及参与自己所创造的存在经验与新人类的辩证发展,会是何种光景。MINCI的“另类与社区传媒”主任威络利亚(Ana Viloria)说,“社区传媒让我

们的容颜、我们的声音,都能纳入视觉,我们因此得以知道,我们的集体作为与人文关怀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如今是主人翁!我们设定自己的任务就是学习观念,运用政治行动者拥有的工具。”(Viloria 2009)目前委国有超过 10 万位社区活跃分子,他们运用超过四百家电台与 40 家电视台,另有大约 800 家电台还在准备阶段,有些已经进入内容产制、有些还在人员培训,还有些在申请执照或已经定期播出,但大多数这些电台,应该会在 2012 年底以前完成手续。2008 年以来,MINCI 就将社区传媒的设置,当作是全国优先推进的项目,当时,该部公布了新的战略,就这些传媒的财政、人员培训,以及授权社区传媒功率增加至全国广电的能量,均有计划。到了 2009 年,全国已经有 56% 的人可以接触社区传媒。如前所述,这个全国实施的方案,代表了持续的传播与对话,代表了政府与劳动阶级之间,持续协调与互动,要为建立法律及实作,努力通过民主方式,达到控制委内瑞拉传媒的目标。政府意图的一个例子是,查韦斯捍卫 CONATEL 在 2008 年的裁定,让 32 家私有电台与 2 家私有电视台“休养生息”,理由是它们违反传媒垄断法,这些“电台现在属于人民”,人民理当“控制”委内瑞拉传播的“生产工具这个战略要地”(Viloria 2009)。从官员到 10 来岁的青少年产制人员,21 世纪社会主义所联系接合的过程,就是新社会关系的创造,起步是相关产业的产权与控制权的改变,传媒对于新社会意识的促进,传媒对于所有阶级成员的新存在之影响,只是这个改变的一部分。主人翁自己发动政治自觉与权力发展的辩证过程,落实于社区电台。

“元月 23 日电台”(Radio 23 de Enero)以 3000 瓦在加拉卡斯播音,来自超过 50 个社会运动集体组织的社区议政会记者及产制人员,每周播出节目,包括音乐、意见、医疗保健与公共事务消息、新闻。同样是在加拉卡斯,青少年、祖父母辈、DJ 与调查记者一起来,他们集体编排与分享了“第一黑人电台”(Radio Primero Negro)的节目,这个电台组织社区工作的历史悠久。每周,由“学生、主妇、师业者及社区组织的成员”制播的节目,一周超过 60 出(Lujo 2009)。这家电台的社区活跃分子定期进行调查,并与邻里街坊住民谈话,他们借此确保电台节目能够服务所有人的需要与兴趣,同时也借此不断招募更多人参与电台营运,让他们得到电台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及训练。以上两家“社区”电台,电波可以到达加拉卡斯 100 万以上人口——就此来说,这不是美国或其他北方国家所引为典型的“社区”广电机构。

位于图梅雷莫(Tumeremo)的“矿工电台”(Radio Minero)由矿工自己在

其社区经营,他们产制自己的新闻与节目。在朱利亚(Zulia),原住民社区“马拉开波”(Maracaibo)以母语在“尤波电台”(Radio Yupa)播音,故事与主题撷取自他们自己的文化与日常关心之事。大约有40家电视台,数百家收音机台,现在都在播出难以数计的故事,对于观众与听众当能起到鼓舞作用,新手第一次面对麦克风,感受到了传播的力量,直接体验了民主与社区的意义(Labrique 2011)。地方电台各自有自己的领导者、台长,以及关于文化的、政治的、原住民的社区议题的专家,这就创造了导引变革的“传播力量”。(Viloria 2009)

“委内瑞拉愿景电视”(ViVe)、“阿维拉电视”(Avila)、“凯提尔电视”(Catia TV)、“第一黑人电台”(El Negro Primero)与其他公共与社区传媒都是出口,反映了改变中的社会关系。曾受大学与专业训练的记者,共同与社区通讯员及参与取向的记者,建构与发布新闻及专题报道,正确实时,并且其架构与采访来源还要更为民主,因为它们不受广告主需要的约束,其编采也不至于如同一般传媒,任由市场驱力鞭策。客观有了新的形式,带入了派别之见,却是服务大多数人信息与教育需要的不二法门,借此人们才能力求以民主方式,控制自己的生活。21世纪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仅以文字公布,并且是付诸施行,在当前的委内瑞拉,确实如此(但不是政府的恩赐,也不是父权作风的福利给付),它若不是要将劳动阶级及其联盟当作主人翁,重新结构社会关系(包括替换僵硬的、硬将事实抽离于特定脉络的专业新闻业之矫饰规范),就又什么也不是了。

推进21世纪社会(主义)<sup>①</sup>的社区与公共传媒,改变了传媒的实作方式与功能,结合了人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说,参与取向而具有社会意识的传媒,对于新的、具有创造面向的、社会主义人文意涵的文化意识领导权的建立,必有贡献。我们要以合作团结的文化、打造社会正义与团结,以此对抗消费至上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领导。在这个范畴里,新闻事业必然就能更为活泼有力,以劳动阶级的真实体验与情境,辨认事实、消息来源与真实。不仅只是社区电台、电视与报纸,委内瑞拉的传媒争战也进入了网络空间。传媒活跃分子很早就认识到了互联网传播的重要性,遂有2002年5月“点击网站”(Aporrea.org)的创办,它与社区议政会、社区传媒、独立报纸与期刊有许多联系,兼具记者与活跃分子角色的人在此汇聚。他们经由、也共同与

<sup>①</sup> 原文写 social,应该是 socialism 之笔误。——译者注

“全国社区与另类传媒协会”(ANMCLA)合作,“点击网站”已经展现了价值,对于社区传媒来说,这些新闻与信息得以在网络汇集,已经成为委国少数工具之一,对抗着商业传媒的支配状况。与此同时,青年与大学生的优势阶层,更能近用传媒、物质与文化资源都比较多,但他们往往投身于保守的“第一正义党”(Primero Justicia)、<sup>①</sup>右翼的“未来现在”(Futuro Presente)基金会及其他反对团体,(除了传统传媒,)这些力量联合与协调,运用社交传媒与互联网,对玻利瓦尔革命发动攻击。这些保守取向的青年(及社团)备受美国青睐,美国国务院、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sup>②</sup>、凯托协会(the Cato Institute)、“美国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up>③</sup>,以及其他美国与私人机构,无不示好并提供赞助给他们。反查韦斯的年轻人及学生团体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700 万美元的赞助,他们反对前已经提及的那些社会纲领方案与社会改革,运用推特、脸书、博客、网站与电邮,试图通过谣言、煽风点火,造成政府不稳定(Golinger 2010)。委内瑞拉政府并没有撤退寸土吋地。过去数年,政府仍以活力十足的态势,普及互联网,数百万的公民都有了近用机会。2000 年,仅有 4% 委内瑞拉人得到使用互联网的机会,到了 2009 年,数字已经达 33%(Internet World Stats, 2012)。800 万公民互联网使用者的存在,直接驳斥了商业传媒诬指在委国使用互联网受到现制;除此之外,政府还在 668 个社区,建立互联网“信息中心”,免费提供近用机制。2010 年,“科学与科技部”再设 27 个移动信息中心,“偏远至亚马逊河流域、安第斯山区及乡村区域,都能确保免费互联网服务,对所有公民也都提供计

① 查韦斯就任前,委国大学生多为白人菁英子弟,因此着有《查韦斯与玻利瓦尔革命》的戈特(Richard Gott)说,委国“社会排除”的缩写,其实就是“种族”与“种族歧视”,(‘The Battle Over the Media is About Race as Well as Class’, *Guardian*, June 8, 2007)。2002 年政变后,查韦斯在 2003 年底推动“苏克雷任务”(Sucre Mission),从扩大高教人口,背景在此。该任务提供免费高教给经济弱势阶层,学制较短(三年),包括 1999 年他就任后设置的高教机构,已有五所新大学、四所新科技学院;其中,最大规模的是玻利瓦尔大学,至 2006 年有学生 18 万,委国希望在 2009 年达到(在校与毕业生达)100 万、在全国设置 180 个单位的教学区,但实际上在 2012 年是 40 万,2013/1/10 读取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ssion\\_Sucre](http://en.wikipedia.org/wiki/Mission_Sucre),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livarian\\_University\\_of\\_Venezuelae](http://en.wikipedia.org/wiki/Bolivarian_University_of_Venezuelae) 及 *Taking the University to the People: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Venezuela* (November 7th 2012), <http://venezuelanalysis.com/analysis/7435>, 徐世澄(前引书,页 165)的资料则说至 2006 年 8 月依据本计划入大学的人数已有 20 万,而委国 1999 年大学生是 66.8 万,在 2009 年在学大学生已有 226 万。——译者注

② 总部设在纽约、每年制作世界多国的政治与新闻自由指数的。——译者注

③ 1981 年美国总统里根时代创设的。——译者注

计算机训练的机会”,先前,他们并没有近用这类科技的机会(Golinger 2010)。科技部长还编列了 1000 万美元,另行在服务设施不足的邻里巷区,建立 200 个免费网络中心。总计,现有的信息中心能够提供 250 万用户,永远使用,加上临时用户则一年可以达 1000 万。如同对待所有社区传媒的立场,政府对于参与民主也是信守不渝,政府希望移转这些互联网的操作与行政作业给社区议政会,如此,公民就能集体决定住民的科技需要。

延伸近用权,让劳动阶级与原住民亦得机会,只是解放的部分。如同其他社会方案,劳动阶级作为主人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及更为民主的传播形式,他们也将决定“社会主义”互联网的样貌、光景为何。福克斯则已勾勒,在共有地概念作为基础的社会之上,共有地概念作为基础的互联网,可有哪些概略(Fuchs 2012,48),参与取向的社会纲领所要带动的社会—文化撞击,必将也是玻利瓦尔革命所会主张的内涵,但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只能说,延伸了免费自由的公共近用,延伸了社区行政(自主)之外,玻利瓦尔革命对于更为民主的、参与取向的互联网,会产生哪些实际影响,还不清晰。

## 九、社会主义的三足鼎立

公共广电、社区传媒,以及公共近用传媒与参与式民主,三者预示了传媒的新社会功能。新的玻利瓦尔政府有了权力,赋予这些独立的社区传媒法律地位、提供基金,也予以支持,它们仍可以发挥娱乐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具有革命属性。这样的传媒播放劳工阶级自己创造的故事,渴望书写自己未来历史的人,可以借此反映他们的集体创造力与共通的经验;这样的传媒播出的讯息、故事与影像,透露或记录的是团结、集体行动,以及为了民主而进行抗争的社区,是社会正义、是自治,是劳动阶级作为社会的领导者。总结地说,一个革命属性的领导阶层,运用它的政府权力,对抗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场域以求容纳新的参与活动,委内瑞拉劳动与中产阶级、女性、年轻人与非洲裔委内瑞拉人、原住民,及先前所获服务不足,形同在政治社会与经济面向,通通遭致排除的人,都能进入。玻利瓦尔政府为了推进 21 世纪社会主义,已然持续运用其立法的、行政的与施政的权力,导引委内瑞拉全国的资源,用意就在提升劳动阶级的控制权,以及民主的社会关系。人民大众的社区传媒已在浮现,若以莱波维兹(Lebowitz 2010)援用自米沙罗斯(Mészáros 1994,2008)的术语,可说它们代表了“社会主义的三足鼎立”。莱

波维兹与米沙罗斯超越了经济论、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二者扭曲了唯物史观,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包括:(1)社会的生产能量与生产力;(2)“生产”人文素质的社会关系,这是指“环境与人类活动或自我改变,同时进行”,具有革命性格的人类,在其中发展孕育(Lebowitz 2010,49);以及(3)(直接与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呈现对比)创造重视人类团结、休戚与共情怀的社群与社区—人类有意识地劳动,为的是要满足(全球)社群的各种需要,包括所有人类“创造力潜能的完整发展”(Mészáros 1994,817)。查韦斯无疑是认知了这个视野。2005年查韦斯宣告,玻利瓦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生产与消费的共享系统(a communal system)”,当时他引述了米沙罗斯(转引自 Lebowitz 2006,108)。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据此就包括了产业国有化,借此取得社会财富(移除资本家产权,使对于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的剥削消失);工作者控制生产,以此将生产关系民主化(终结为了利润而生产,这种生产对安全、环保或人类的需要,视若无睹;反对国家控制生产);以及,发展民主的、参与的文化,以此决定社会财富如何运用,才能有益于发展人文素质(取代消费至上的、超级个人色彩的种族中心的与自私自利的文化)。委内瑞拉的公共与社区传媒矢志作为“社会主义三足鼎立”的一个部分,他们的传媒生产工具产权,是公共的、是社会的;他们的传媒生产与发行,是由劳动者议政会与社区议政会直接控制(没有来自国家或商业传媒机构的控制);他们投身打造的文化,是有机发展的,是重视团结与培养休戚与共情怀的文化,是要人们自己通过协调合作及参与生产的文化(如同“凯提尔电视”的 ECPAI 团队;“阿维拉电视”与“委内瑞拉愿景电视”的社区纪录片,以及委国上上下下,所有社区电台节目所展示)。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衡量,公共与社区传媒正是绝佳例子,在举证中说明了在委内瑞拉,何谓支用“国家,推进革命”的辩证过程。MINCI 的“社区传媒主任”威络利亚是这样说的,她指“这是矛盾,却又巧妙。国家被用来启动新的实践作为,要求由劳动阶级在国家之外、在国家之上,直接控制。国家(政府)不下令、不强制。国家(政府)不贿赂,不给礼物,甚至也不提公服物给公众。反之,国家(政府)倡导政策,提供基金(取自国有化的社会财富),同时,社区议政会以及劳动者议政会是主角,他们执行、指挥、创造与决定要怎么运用传媒,传播自己的讯息与想法”(Viloria 2009)。

委内瑞拉现在有三分之一广电机构是新生之物,是社会产权,执照由传媒使用者集体持有。这些新传媒的社会关系,完全没有沾惹商业传媒的习

气:上到下的号令与控制。这些传媒并不是将内容广播给“收受者”或“阅听人”。这些新传媒建立了积极的民主产制关系,因为它们直接由工作者就地控制,其运作宗旨是要开展阶级行动,振兴新的社会秩序。国家对于传播所能行使的权力(包括设定私人控制与产权,以及政府规范)正在移转至劳动者组织及其成员,社区传媒成为结构与实践,发挥着组织的力量,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产制规则与意识形态。社区传媒的实践结果转变了每一个人、社区与社会阶级,他们现在直接有了传播权力,体验了权力的滋味,体验了有权进行民主决策与执行的权力。社区传媒,及其在全国播放但性质相同的公共传媒,就是在为劳动阶级这批大多数人绸缪,应对即将到来,(内在于委内瑞拉与来自美国的)资本主义对他们展开的斗争,差别在于,他们现在已经自行体验产制节目,以及传播这些新形式节目,强调阶级团结、集体产权与民主实践的节目。

## 十、权力的现实

未来的旅程是无穷的可能,但是无法尽如人意。在当前的委内瑞拉,社区传媒是真实的历史辩证经验,进展于变化中的革命物质情境。通过辩证的语汇解说,这就是指劳动者及其盟友的社会意识,可能在遭遇眼前的社会结构之前,已经存在,也可能在遭遇之际,油然浮现而同时与其互动。人的变化必然涉及物质的辩证,无法脱离经验与可能性所激发的意识。现在,劳动者与社区议政会已经取得了控制权,逆反了阶级社会的常规,上位者无法再是颐指气使,无法再从科层体制发号施令;这些新兴的情势必将敦促传媒工作者、女性、青年、原住民,以及很大部分的劳动阶级、中产阶级与失业者,想象与创造新的社会实践方式。在传媒领域,这些新的实践方式包括了书写自己的故事、产制自己的节目、依赖劳动阶级作为消息来源、体认劳动阶级的经验与知识之价值与完整、服务他们的社区与文化,并与其他社区建立联系、产生关连。这些实践作为揭开了人的潜能,也鼓舞了更进一步的创造与努力,如同 TVes、ViVe 与 Avila 所展示的经验,这些电视屏幕日日夜夜放送社区产制的新闻与文化。相当重要的是,这些虽然多重但仍可彼此分享的经验,具备了导引主人翁产生新领悟的潜能,他们将会了解,近用传播的新权利及其他权力若要得到确保,就得在社会各个角落建立新的民主社会关系——不能只在一家工厂或一家电台为之。每个人的自我实现有待于 21



世纪社会主义,在社会整体层次的集体实现。

在委内瑞拉,如今革命之声不再仅只是草根的呐喊。革命声浪现在从都会中心的最高顶峰,向外扩散发送。这是因为果断坚决的领导阶层,从总统到国民代表大会,正在支用国家机器,推动革命,革命声浪有了传播的权力、行动的权力,以及生产的决策与控制权力。在民主传媒产制的过程,社会关系与社会意识也在转化中。社会主义毕竟不仅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纲领。社会主义意味新的、革命的人类,握有权力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人们将以自己的意见与声音作为权力——不是向权力说出真理(自以为是却又无权无力的自由派,才会作此虚弱克制的发言)——是人们要以自己是历史重建者的集体施为者身份,用真理行使权力。即便不够充分,社区传媒是至关重要的场所,新人类作为积极的历史施为者,就要在此创造,他们是传播施为者,不再只是听众、观众或凑热闹的人,他们是主人翁,就要打造自己的现实。

## 十一、两个国家:二元权力的均衡状态

当然,钢铁、铝矿及其他产业国有化之后,并没有在整个委内瑞拉置换了资本主义,也没有置换其社会关系;各种社会任务编组也没有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或社会制度与机构;同理,公共与社区传媒发展的旁侧,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诉求流行商业口味的传媒,也就难以置换委内瑞拉人的娱乐导向的、个人消费至上的文化。委内瑞拉的真实情况,其实逆反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美国电视网的认定(译者注:这些传媒的报道,常让阅听人以为委国已无新闻自由,而查韦斯钳制了言论),实情是委国现在的传媒,形式与内涵都相当繁复,其中商业传媒对于查韦斯政府的批评,不但公开,而且苛刻。换句话说,尽管或说正是由于玻利瓦尔运动有了进展,眼下的委内瑞拉有两个国家。一个政府代表了劳动阶级、亦即大多数人。这个政府运用着权力,组织并提振并行存在的机构与场域,作为建立政治权力,以及打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基地。与此同时,数十个富裕家族及其奴从,依旧是强大有力的资本家阶级,他们的利益遍及传媒、金融银行、零售餐饮及配送发行系统,他们在流行文化也占据要津。流行音乐、电影、电视与时尚风潮,以及让人浑身不对劲,却又熟稔的市场关系,所鼓动的又是个人的实时满足,个别为之却又是大众乌合的娱乐及消费至上之事。但是,我们也知道,

资本家阶级已经丧失政治方向,彼此分裂而无法团结,即便他们外有美国的导引。<sup>①</sup>另一方面,各级经营管理人员、小店家老板与出身中产阶级的学生与专业人,内心也在焦虑与忧心,市场挫伤了他们,他们的小商人心态也有局限。大多数人与社会,呈现原子化关系,也与社会疏离,但是也有很多人已经受到吸引,毕竟委内瑞拉在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及信用建立等方面,社会主义改革的成效无不传递民主的脉动。简短一句,玻利瓦尔社会主义日有成长,资本主义身陷重围。大对抗就在眼前。

## 十二、掌握权力,推进变迁

朝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委内瑞拉,两种国家的冲突无法不解决。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表现在当前的玻利瓦尔政府所创设的并行存在之政治与社会机构(包括新传媒),它们改变了生产的社会关系,因此生产已由劳动者取得了控制权,因此劳动阶级的阶级意识与政治组织的质量,迅速增长。资本主义国家已遭削弱,但仍然在全国范围之内以及全球经贸体制里,依托于各种薪资劳动与市场关系,也依赖于盘踞政府科层的各级僚员,特别是在省级与地方层级,更是如此;在意识形态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还从委内瑞拉生蹦活泼的消费至上之娱乐文化,得到滋润。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痛击暮气沉沉,却又可说蛊惑人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各种新社会要件,孕育于老朽腐败的资产阶级社会”(Marx 1871, 335)。资本家阶级不会愿意放弃获取利润与剥削的权力。套用葛兰西的用语,我们很快就要看到运动战的进行。阶级与其联盟的战争就要登场。遭遇战开打已经多时,如2002年4月的传媒政变;2002年12月的石油罢工;在野派对于中层政府官员日常施政的阻挡;不定期由哥伦比亚国境边界发动的攻势;传媒不断煽动而攻击政府政策,包括对罪犯与住房等社会问题的恣意挑衅。前哨战已在进行,更大的、更有组织的社会动荡就要到来,包括内战。当然,若是对照于美国的不断威胁及干预,这些全国的及区域的阶级冲突,竟是黯然失色了,美国继续代理委内瑞拉的精英及更大的美方利益,再三给予咨

---

<sup>①</sup> 反玻利瓦尔革命的政治势力,在2010年9月组成“民主联盟”(the 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Unity, MUD),并在2012年2月推出39岁的米兰达(H. C. Radonski)代表MUD角逐总统职位,先后在2012年10月与2013年4月败选于查韦斯及马杜罗(Nicolas Maduro)。——译者注

询、提供财政协助并介入(Benjamin, 2006; James 2006)。美国总统奥巴马已在 2012 年要求国会批准另一个 500 万美元,支持委国反对势力,先前,美国与欧洲联盟<sup>①</sup>加起来已经在 2010 年给予 5700 万美元(Golinger 2011)<sup>②</sup>。一旦资本家权力遭受攻击之势增强,美国干预必然就会以无数的方式介入。在委内瑞拉不远的将来,必是新旧的激烈斗争。委内瑞拉的劳动阶级及其盟友已经在意识上在组织上,做好了准备,可以挺住攻势,包括美国可能以某些方式的介入吗?支用“国家,推进革命”的战略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对抗,因此就要建立场域及经验,促进劳动阶级的自我组织化。这里可以指认一些成功的地方:社会主义统合党已有党员 600 万;社区议政会已有两万个;国有化产业的劳动者议政会数以百计的成立;数以千计的社会任务编组,由数以万计的社区活跃分子指引与承担工作;3 万个劳动者民兵团;以及数以百计的独立社区传媒。支用“国家,推进革命”不断创造机会,以求劳动阶级与其盟友能够组织自己的机构、关系并采取行动,为社会主义而战斗。一旦行动,国家机器的集体领导、并行的劳动阶级机构,以及独立的政治组织,似乎就能理解,他们的玻利瓦尔目标即将实现于 21 世纪社会主义,但前提在于,他们必须新的国家,取得充分的革命权力,这样的国家要有民主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要有劳动者对生产的控制;要有政治领导层接纳直接的参与,以此作为法律与政策的权威之来源;要有促进团结、民主与民主传播的社会-文化实践作为。

迈向社会主义的转型阶段,就在国家机器承诺了社会主义目标那一时刻,就已启动,包括制订各种法律规章及政策,开启新社会关系的康庄大道,也将社会财富(包含传媒)的生产放入大多数人手中。委内瑞拉宪法(第 57—58, 65 条)已经明定,近用信息与传媒生产工具是人权;2004 年的《广播电视社会责任局部改革法》已经公告电波与无线电频谱是公共财。“国家电信委员会”、“传播与信息部”与国民代表大会已经对于民主化传媒的许多提案,再三阐述。各劳动阶级社区可以是施为者,执行这些方案。有些国家机

---

① 疑有错误。——译者注

② 作者这里引用的 Golinger(2011)文章,提及 2008—2010 年美国资助反对势力(至少)一千万美元,其流向说明很清楚,但对 2010 年的五千七百万之说,仅有一句“adding to the \$57 million they received in 2010 from the US and European institutions”。再者, Golinger 说的是 European institutions,不知是否指美国在欧洲的机构吗?但作者引述时,写为 European Union,应该有误。无论是欧盟或欧洲机构,何以 2010 年的款项这么大笔,似得查证。——译者注

器的存在,如“传播与信息部”的宗旨就是“征求人民群众的参与”,因为革命领导阶层“知道我们所作所为,攸关人类!”因此,“我们认定我们的职掌,就在侦测与察觉”,劳动阶级作为历史主人翁所要采取的“政治行动及其所需的观念与工具,确实存在”(Viloria 2009)。

运用可以取得的指标,我们当可了解,支用“国家,推进革命”的传媒战略内涵,就是公共与社区传媒已经由劳动阶级当家作主,他们也已经明显地协助传媒工作者及其社区,内化并理解集体参与的意义。然而,我们如果清醒地评估,单是这个成绩还不充分,因为消费至上的文化在委内瑞拉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又是以那么繁复的方式,对人招手、诱惑了人心与行为。ViVe TV 的屏幕出现原住民以自己的语言讲话,即便是配上了西班牙文字幕,还是无人能够了解,包括查韦斯派(Sergio Arriasis,转引自 Wynter,2010)。时装秀与选美大会还是大受欢迎,商业电视播放的各种综艺节目与肥皂剧,同样大行其道。

委内瑞拉的公共与社区传媒正在为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建构与广播影像,但它们也日渐明白,新的文化认同会有多种,但不会仅只是来自影像或新闻故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通过政治辩论,只有为了争取社会正义、民主与新的社会关系而投入战斗,才能诞生人的需要,才能绽放在私人利润之前。社区传媒的经验让我们强烈体会到人类的真正创造力潜能。唯物史观历来就在昭示我们,即便时机有利,客观的物质情境仍会制约人们主观介入的空间。在委内瑞拉,物质情境包括石油资源、石油价格、阶级力量、驻足不去的资本主义文化常规,以及美国可能介入。主观情境则包括劳动阶级及其盟友的组织与阶级意识日渐成长,以及他们彼此协作,努力地告知与劝服更多的人,团结真有力而互助合作与争取社会正义,将要带来长长久久的好处。

当然,了解历史的辩证与阶级社会的矛盾,对于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领导阶层,可能会有帮助,却无法保证成功。然而,马克思主义已然再次展示价值,可以导引我们进行社会变革的分析与实践。倡导参与式民主,通过政府行动,力行支用“国家,推进革命”的政策,以及并行设置机构,推进各种社会任务,这是构思良好的战略,正是 21 世纪社会主义所需要。

笃信民主伦理与唯物史观实践逻辑的人,一定会将他们的主体能力,贡献于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推进。我们愈是能够汇集更多声音,就愈是能够集体捍卫、提振、甚至超越委内瑞拉社区与公共传媒的表现,也就愈是能够扩

大外人对这个重要历史时刻的认知,从而增加成功的机会。委内瑞拉的社区与公共传媒正在向世人展示重要的战略真理:只有民主的主人翁掌握权力,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变革。我们理当认识我们自己的力量,团结真有力,这也是在自我策励,见贤思齐,师法委内瑞拉劳动大众与其他公民的努力,动员我们自己的独立政治权力。

### 参考文献:

- Artz, Lee. 2006. TeleSUR (Television of the South): Discarding Contraflow for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2 (2): 225—232.
- Benjamin, Media. 2006. US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Common Dreams. March 4. <http://www.commondreams.org/views06/0304—20.htm> Accessed April 12, 2012.
- Catia TVe Collective. 2006. Television from, by, and for the People. *Venezueanalysis*, July 19. Accessed February 22, 2012. <http://Venezueanalysis.com/analysis/1843>
- Ciccariello-Maher, George. 2007. Zero Hour for Venezuela's RCTV. *Venezueanalysis*, May 29. Accessed February 22, 2012. <http://Venezueanalysis.com/analysis/2415>
- Enright, Michael, Antonio Frances, and Edith Scott Saaverda. 1996. *Venezuela: The Challenge of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Fuchs, Christian. 2012. Google Capitalism. *tripleC* 10(1): 42—48. Accessed April 14. <http://www.triple-c.at/index.php/tripleC/article/view/304>
- Goliner, Eva. 2011. Money and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Wikileaks: U. S. Embassy Requests Funds for Anti-Chavez Groups. *Global Research*. Accessed April 10, 2012.
- Golinger, Eva. 2010. Internet Revolution in Venezuela. *Venezueanalysis*, March 26. Accessed April 10, 2012.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5444>
- Golinger, Eva. 2006. *The Chavez Code: Cracking US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London: Pluto Press.
- Golinger, Eva. 2004, September 25. A Case Study in Media Concentration and Power. *Venezueanalysis*, September 25.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Venezueanalysis.com/analysis/710>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Internet World Stats. 2009. Usage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Venezuela. Accessed A-

April 17, 2012. <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a/ve.htm>

James, Deborah. 2006. U. S.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Accessed April 12, 2012. <http://www.globalexchange.org/sites/default/files/USVZrelations1.pdf>

Jaua, Elias. 2011. Without Confrontation There Can Be No Social Gains. *Venezueal-analysis*, July 20. Accessed February 22, 2012. <http://Venezuealanalysis.com/analysis/6366>

Lebowitz, Michael. 2006. *Build It Now: Socialism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Lebowitz, Michael. 2010. *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Real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Labrique, Laruent. 2011. Community Media Give New Face to Venezuela. Accessed January 16, 2012. <http://presstv.com/detail/164807.html>

Lujo, Carlos. 2009. Personal interview at Radio El Primero Negro. *Caracas, Venezuela*. June, 2008.

Marx, Karl. 1867. *Capital. Volume One*. Accessed April 12,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ch32.htm>

Marx, Karl. 1871.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3*, 307—35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9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48. New York: Penguin.

Mellado, Antonio. 2009. Personal interview at Avila TV, Caracas, Venezuela. June, 2008.

Mészáros, István. 1994. *Beyond Capital: Toward a Theory of Transi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észáros, István. 2008. *The Challenge and Burden of Historical Time: Soc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erdemo, Luis. 2009.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Afro TV organizers in Caracas. Caracas, Venezuela. June, 2008.

Sanchez, Martin. 2012. Ten Years after the Coup: Alternative Media in Venezuela. Presentation at DePaul University, Chicago. April 13.

Venezuela en Noticias. 2012. Community Media in Venezuela Get Funding from Telecoms Authority. *Venezuealanalysis*, January 8. Accessed January 9, 2012. <http://Venezuealanalysis.com/news/6731>

Viloria, Ana. 2009. Personal interview at the Ministry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

cation(MINCI). Caracas, Venezuela. June, 2009.

Wilpert, Gregory. 2003. Venezuela's New Constitution. *Venezueanalysis*, August 27.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Venezueanalysis.com/analysis/70>

Wilpert, Gregory. 2007. RCTV and Freedom of Speech in Venezuela. *Venezueanalysis*, June 2. Accessed January 15, 2012. <http://Venezueanalysis.com/analysis/2425>

Wynter, Coral. 2010. Venezuela: Creating a New, Radical Media. *Green Left Weekly*, May 23. Accessed January 21, 2012. <http://www.greenleft.org.au/node/44207>

彼得·鲁德斯(Peter Ludes)<sup>①</sup>

## 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sup>②</sup>

和曼(译),姬德强(校)

[摘要]为了分析马克思的著作,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更广泛的“代际对话”(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s)框架;第二部分将会回顾马克思所定义的“可替代的、无阶级的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基于,举例来说,理性计划从公司内部投射到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并对其进行修正和更新。第三部分将会探讨更为现实的可替代性导向和传播工具是怎样出现的。就像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制度一样,这一判断将表明两种典型的和互补的力量正在寻求“可替代性”的发展,即“人类面临的感知风险”(Beck)和人权事业的发展。

---

① 德国不莱梅雅各布斯大学大众传播学教授,1973—1975年在美国的布兰迪斯(Brandeis)担任富布莱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1978年完成博士论文《走向一种另类社会学》(Towards a Sociology of Alternatives)并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加拿大的纽芬兰纪念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德国的乌帕塔尔大学(Wuppertal)、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Amsterdam)、美国的哈佛大学(Harvard)、德国的锡根大学(Siegen)、慕尼黑大学(Mannheim)康士坦茨大学(Constance)做访问学者。自2002年以来担任德国不莱梅雅各布斯大学大众传播学教授。1997年,他发起了“新闻启蒙项目”(the Project News Enlightenment)以及关于概念图(Key Visuals)的国际合作:<http://www.keyvisuals.org/>和<http://www.nachrichtenaufklaerung.de>。他曾担任欧洲社会学协会(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传播和媒介研究社会学研究网络(the Research Network Sociology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的联合主席(2008—2011);<http://www.jacob-university.de/directory/pludes>, 邮政信箱:750 561, 28725 Bremen, Germany, 电子信箱:p.ludes@jacobs-university.de

②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所进行的有关可替代性的社会学研究获益于和贝尔(Daniel Bell)在哈佛,和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比勒费尔德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讨论。2009年至今,在不来梅雅各布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人类、现代性和全球化研究中心”(Humanities, Modernity, Globalization),我对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概述的更广泛的“代际对话”项目进行了研究。作者同样非常感谢“3C”(Triple C)杂志社的两位审稿人。



[关键词]可替代性,无阶级社会,(去)文明化过程,导向和传播手段,意外过程,代际对话,长远目标,多元现代化,风险社会,全球性挑战

## 一、前言

自从19世纪,世界步入工业化和民主化的第一个阶段以来,众多学者对阐释这些经济和政治巨变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些学者中间,尤为重要的当属马克思(Karl Marx)和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而当代的重要学者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通过概述这些学者的主要理论视角以及找寻其间的对话逻辑,我们能够获得怎样深刻的见解呢?就动力和阻力而言,借助和根据这样的代际对话,我们又能获得什么样新的理解呢?虽然它与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实践同等重要,但这样一种努力已经远远超越了某种单一的理论传统,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然而,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即无论是从工业化、城市化、官僚化、教育和民主化的各个历史阶段,还是从解释和改变社会状况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来说,强烈的西方偏见从一开始就内在其中。

如果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来自印度,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来自古巴,或者埃利亚斯来自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历史将会有何不同呢?(Burke and Pallares-Burke 2008,17)

没有一种理论、经由一位作者独自完成便能够宣称已经达到了一种全球适用的可替代性理论的地步。但是:

如果我们在当前的社会里面没有在隐蔽的形态下发现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种种物质生产条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种种变换关系,那么任何进行破坏的尝试,都是堂吉诃德式的愚蠢行为。<sup>①</sup>

---

<sup>①</sup> 中文版请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75,页96。——译者注

因此,本文将(1)把马克思的“可替代的无阶级社会”概念置于一个历史和理论网络之中,这一网络将有助于理解长期发展和探寻可替代性;(2)通过择取与之高度相关的论述——包括最初的德语和英语文献,以及作为补充的当代研究文献,比如诺伯特·埃利亚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来详细说明马克思的“可替代的无阶级社会”概念;以及(3)从全球风险性挑战和人权方面来讨论 21 世纪初“可替代性”的一些机遇和局限。

## 二、代际对话

基于埃利亚斯经典的长期社会进程理论,以及下面即将展开的,包括那些更加现实的有关导向和传播的社会学方法,我的讨论主要包括两个基础的组成原则:(1)单个作者以及他们的著作并不是最重要和决定性的分析单位,相反,种种代际关系的结合将催生各种新的见解;(2)虽然单个作者和短期导向的概念很重要,但一部学术“著作”的理念更为重要,在一种“集体作者或集体意识”的背景下,这一理念将会发生转变。考虑到长期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可持续性,转移或者断裂,例如“标题化现象”,这将使我们从一种纵向、传统的历史观念转向平视地看待来自不同时代的作者,并因此形成一种集体性启蒙的视野。

这一判断一方面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来扩展各种传统文本之外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也呼吁为超越西方偏见而建构全球知识的各种努力(Featherstone and Venn 2006;Jin 2007)。为了对这些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杰出的理论家们进行重新定位——他们对国际范围内社会理论形成的特殊重要性在此无法加以深入阐释——本文仅聚焦于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并在更广泛的文献语境中追寻其意义的变迁。因此,本文将涉猎以下 11 位理论家的相关著作,他们是: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马克斯·韦伯、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诺伯特·埃利亚斯、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和托马斯·卢克曼)(and Thomas Luckmann)、尤尔根·哈贝马斯、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和乌尔里希·贝克。

达沃克斯(Danowski)和帕克(Park)近期的一篇文章认为:

基于公共知识分子们在同一讨论语境中的同时在场,在他们之间勾画一张网络结构图将非常有趣。然而,实验研究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因此也无法保证这样一种分析的有效性。

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互联网上,已经去世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拥有一个社会来世(a social afterlife),一种社会语形学的品质在网络空间得以继续。这是一个文化领域,包括公共知识分子们在内的话语结构在这里得以演变。这些发现与现有的评估在线讨论的研究紧密相关。(Danowski and Park 2009,352)

他们总结道:

更多地使用传统的内容分析法会更加地富有成效。语境,作为一种基于讯息内容的构成要素,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内容评估。更加明显的是,与其说是各种脉络的汇总,它更像一种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及其相关思想相关的讨论的持续性评估。它们语义的合成将成为更广泛地关注公共知识分子和互联网的注意力的重要组成部分。(Danowski and Park 2009,353)

代际对话将沿着这个方向前行,通过在线资源、话语和出版物来彰显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转型。“对话”的概念暗含着没有假定或者针对等级制,而是关注于那些组合成为创新纲要的理论要素;它们更多地脱离了其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根基。这一过程延缓了基于生物学和文化的传统的代际观念,如卡尔·曼海姆所提出的那样。它也更加背离了那些强调某些思想家们更重要的传统的思想史,比如福克斯(Fuchs 2009)有关马克思和媒介的精彩著述。

因此,本文所选择的论述不能被解释为基于某一时代的特殊条件和见解,而是要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时间跨度,与代际间的知识创新和反思相结合——如此才可以考察一些概念的变体的基础性解释和选择,比如“社会的可替代性”。

因此,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一目了然的时间线就可以描画出来,图 1 展现

了这一广泛的、包容性研究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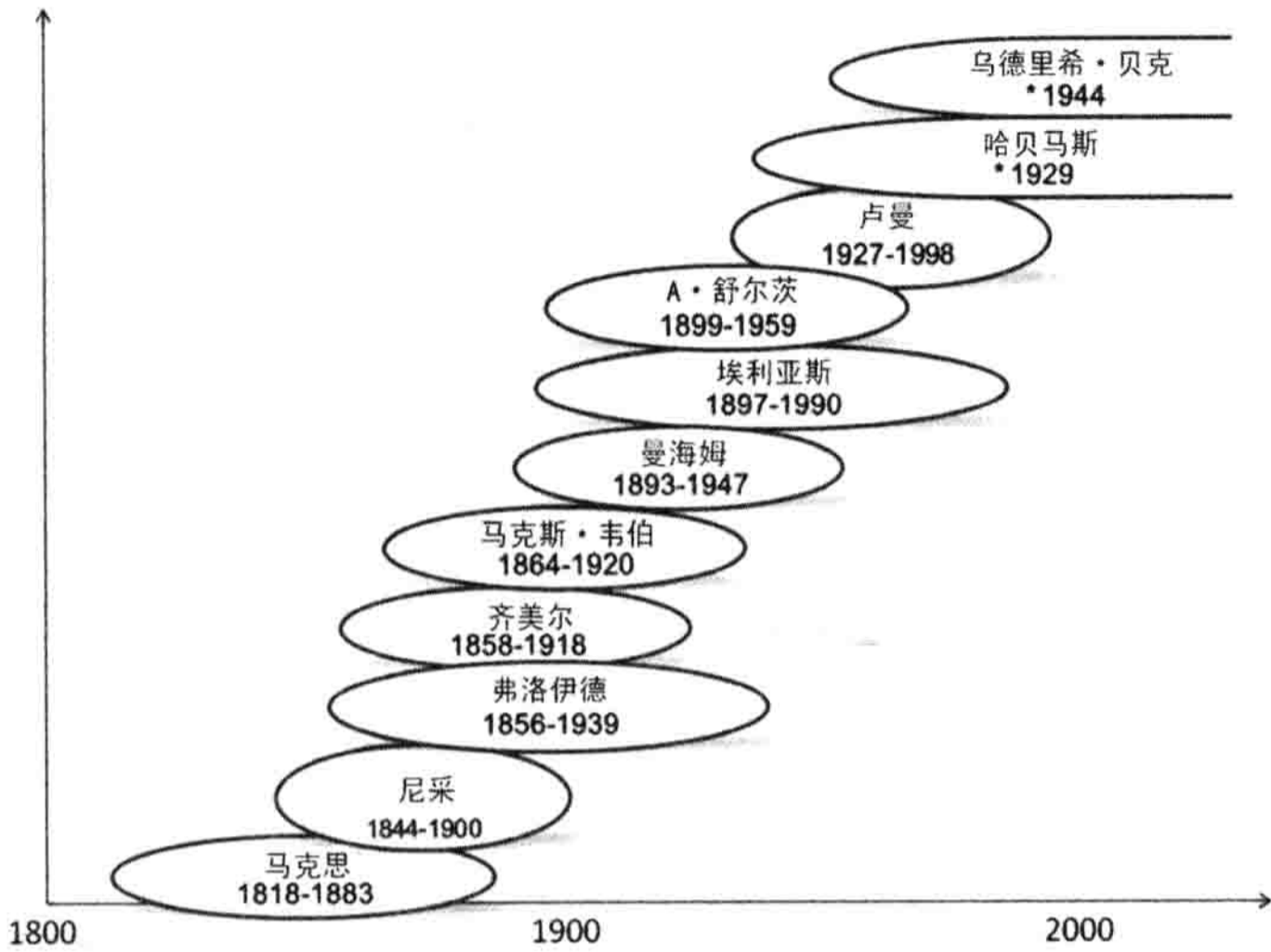


图1 从马克思到贝克,11位公共知识分子们时间脉络

如果我们从每个人的著述中只挑选两个主要概念,比如,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和“可替代性”(作为语义场的核心要素),那么总共22个概念之间存在多达231种关联性。图2和图3将概念之间的关联做了视觉化的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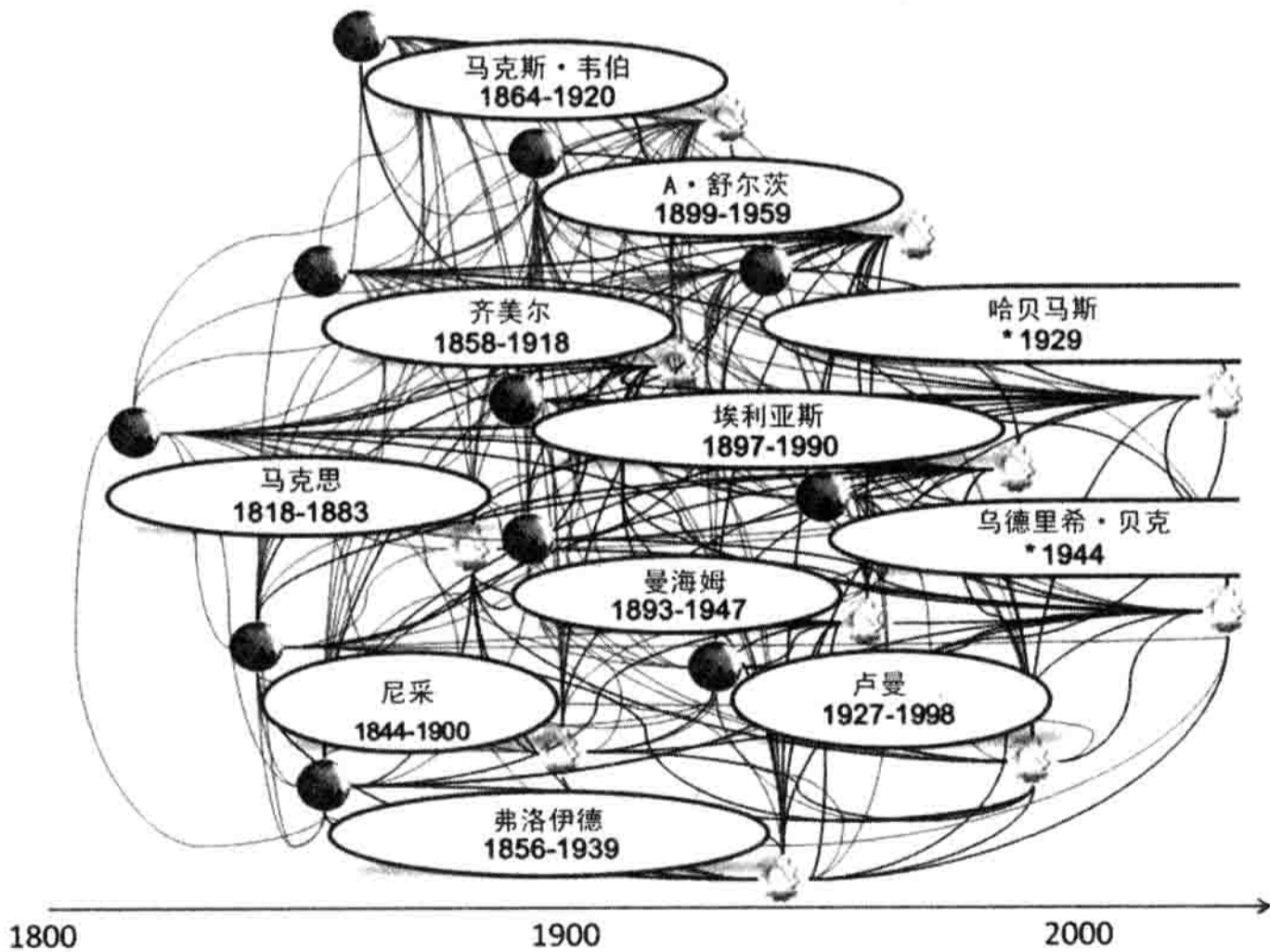


图2 从马克思到贝克,基于“无阶级社会”和“可替代性”两个概念及其22个变体的,来自11位公共知识分子的相关著述的关联性,共有231条关联,以作者为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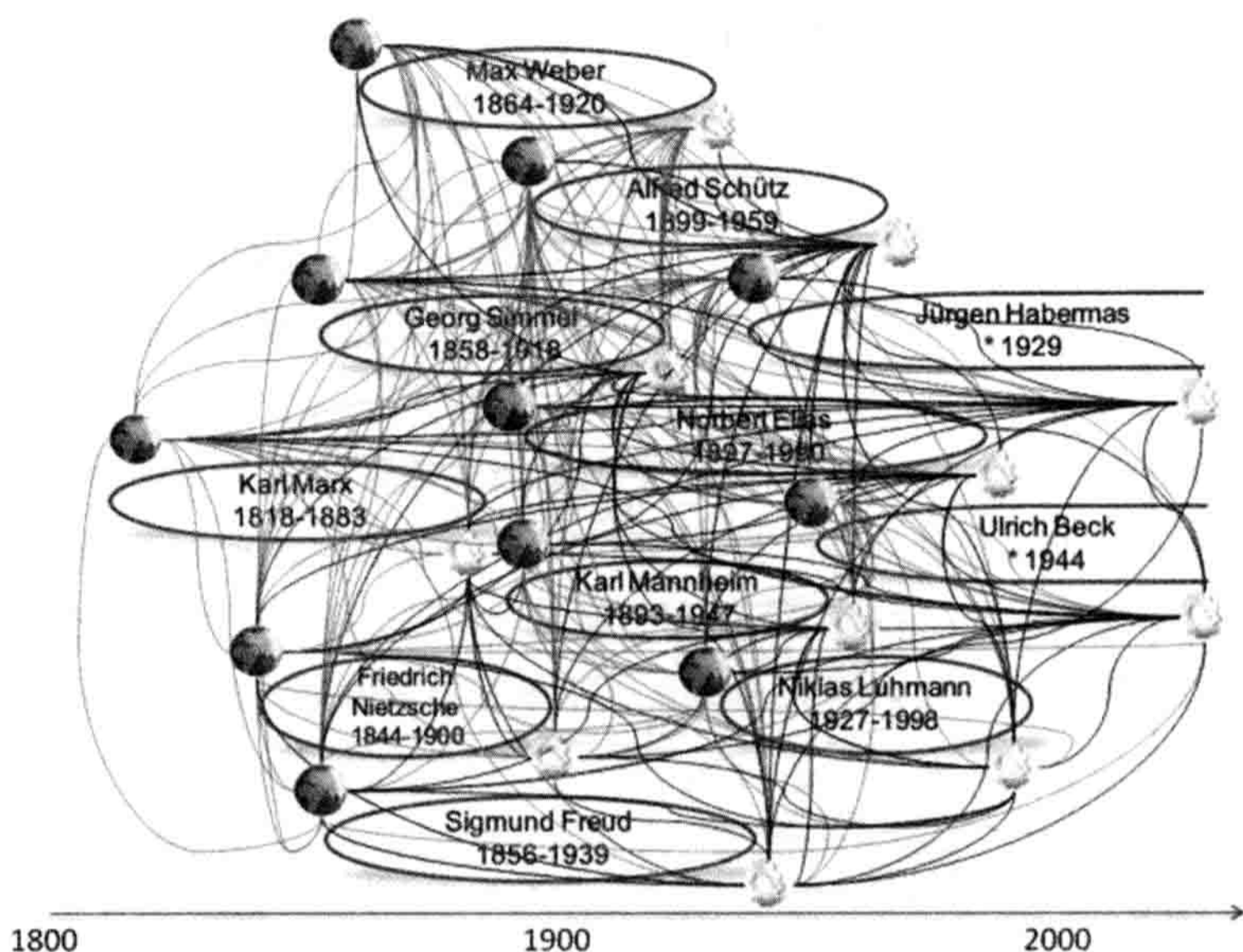


图3 从马克思到贝克,基于“无阶级社会”和“可替代性”两个概念及其22个变体的,来自11位公共知识分子的相关著述的关联性,共有231条关联,以代际之间知识创新的网络为重心

上图将代际对话间愈来愈强的关联性变得可视化,将个人著述作为背景,而概念网络成为前景和重心。据此,对网络出版的相似的脉络化努力将产生更大的数据集和更加复杂的视觉图像。

早在1929年,卡尔·曼海姆就已经发展出了一个超越阶级和政治集团藩篱,包含多种视角的综合性、动态分析框架,但受到了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挑战。然而,这一挑战变得十分棘手,需要超越各种传统的国家视野,并且去发现和展示一种超越了当前目标和当代人的综合性路径。曼海姆的助手埃利亚斯在1933年完成的名为《宫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的“特许任教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中曾经探讨了工业资本主义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段,以此作为国家制度、行为准则和人格特质的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案例。多种多样的社会阶层和功能领域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同时暴力和税收借助各种国家制度形成垄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利亚斯作为观察者稍后(1939, in English 2000)对有关各种行为举止的著述以及人类行为和人格结构的标准所作的阐释奠定了其西方文明进程理论的基础性纲要。在埃利亚斯眼中,国家的形成,行为标准和人格结构可以被视为一体。当然,对历史形成的差异化的文化区域而

言,他的洞见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多元的文明进程(参见 Elias Ben-Rafael 和 Sternberg 2001 年详细的参考书目)。

根据埃利亚斯的长期无计划的文明进程理论,相互依存的网络是多维度和多功能的,参与者或学者们只能认识或理解其局部——这表明任何发现社会经济发展和革命进程普遍原则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它们的数量如此庞大<sup>①</sup>以至于任何单个参与者或者学者都不可能监测即便是小规模但也包含数以百万计连接的网络。在这样的网络或者甚至在网络的局部中,即使尽其有生之年,个体也不可能计算出行为的优势和劣势,还有成本和收益。埃利亚斯(1939 cp. Ludes 1989)的主要观点是,长期的、无计划的社会进程支配着任何短期的个体约束和选择,以及情感关系和深层次的焦虑。这些源自社会行动、策略、相互依存的知识 and 风险的无意识的意外后果成为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构建中的主要考量。

相比之下,基于马克斯·韦伯的行动理论和理性化过程的知识传统,哈贝马斯将关注点从生产方式、阶级关系、文明进程或风险社会,转向“交往行为”。哈贝马斯(1981,第1卷,439和446页)聚焦的是那些言说的交往活动。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总体性经验”作为“存在性真实”的一个先决条件(参见 Wolff 1976),最接近于戏剧性的表演行为,具有根本上的表达性,在一个主观的世界中吁求存在性的真实或者真实性。但是对于任何一种对话而言,参与交谈的人必须相互接受并且倾听彼此,他们必须值得信赖以及充满信任地行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宗教的传统提供了种种限制,而社会发展的世俗化只是局部改变或者替代了这些限制。最重要的是,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中,哈贝马斯(Habermas 1981, volume 2, 585)提出了三个有明显差异的社会领域,即科学、伦理和艺术,穿越这三个领域的交往行为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差异性和互补性制约和型构着有关行为的判断甚至策略的话语。在最近的论述中,哈贝马斯(1999, 2011)强调了“包容他者”。类似于科特·沃尔夫(Kurt H. Wolff)所强调的把关于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的历史断裂当成是从历史上对一切社会关系进行崭新理解的一次挑战,哈贝马斯同样重视基因技术的危险性,尤其是作为改变人类自主性的克隆技术。

因此,一个全球化的话语理论不仅要求把存在性真实作为先决条件,而

---

<sup>①</sup> 参见埃利亚斯 1978 年写的《社会学是什么》中的第三章关于博弈模型及其对社会关系复杂性的计算,页 101,表 1。——译者注

且需要代际纽带,比如一个可选择性的社会机构,以此来质疑当下有关自主性个体、党派、或者阶级以及受个体寿命限制的时间跨度的自我理解。对 21 世纪的开局而言,一些理论家试图借助来自 19 世纪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比如对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和/或无产阶级民主化的工业化早期阶段,尤其是公司内的选举权或者一些对决策制定的国家和公共控制的分析;但这些尝试均落后于马克思用多重视角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分析所取得的成就。因而只有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 19 世纪早期和中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够得以发展成为新型的“可替代性”。因此,这篇论文的目的是根据过去几十年以来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来更新马克思的“一个可替代的无阶级社会”的概念。因为这一更新——暗含着历史的新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始自马克思最初的论断,一些特别相关的论述将被引用;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很显然,本文将用英语撰写:虽然各种概念总是承载着一些原始语义,但是即便在非常优秀的翻译作品中,原始语义还是经常丢失。正如贝尔萨(Bielsa 2011,205)所说的,“在本土化翻译中,英语的全球统治地位得以表达,而这破坏了翻译语言的文化编码”。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只关注了两个“单词”:bedingen,可以翻译为“制约”或者“限定”,本意上类似于“提供东西”或者“提供材料”,但不一定涉及到“物质基础”。另外一个单词是 Notwendigkeit,意味着解除痛苦的必要性;Not-wendigkeit,意指不一定是社会经济决定论(Fleischer,74 和 142)。

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学已经忽略了翻译在学科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包括对理论在国际间流动的中介作用和社会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翻译角色的缺乏兴趣可能部分地源自当今全球的不平等和英美学术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Bielsa 2011,212)

### 三、马克思是如何把一个可替代的无阶级社会具体化的?

大约 30 多年前,通过回顾德语版的马克思全集(MEW),我对围绕“一个可替代的无阶级社会”这一概念的主要前提、障碍和特征进行了重构(Ludes 1979,1980)。主要在那些没有计划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包括《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众多信件——马克思反复强调: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有意识的控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他还强调关于人

类性格形成的根本性转变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就好比是对剩余劳动、劳动纪律和与自己本人以及与未来世代团结一致的一种基本需求;况且传统制度正在衰退甚至于已被废止,比如财产、家庭、货币乃至国家,至少在它的压制性功能方面是如此。

对一个无阶级社会来说,马克思(参考图 1, Ludes 1979, 130)大约 210—215 次提出了其具体的先决条件, 50—55 次提及了发展障碍, 并且告诫说物质财富将可能变成一种金色锁链, 束缚住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工人。

他在大约 150 个段落或者章节中描画了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特征。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MEW 3, 424)为例, 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连同私有制限制了生产力: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 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 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 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 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我们也曾指出, 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 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他们的桎梏的时候, 分工才会消灭。我们还曾指出, 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 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 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 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我们也曾指出, 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 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 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最后, 我们曾指出, 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的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sup>①</sup>

然而, 在《资本论》第一卷(MEW 23, 512), 马克思假设了旧的劳动分工的延缓。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早期的版本中, 马克思预见科学进程的摇摆不定, 这种不稳定性提高了人类对自然, 但也是对工人的控制(Resultate, 80f): “对自然和科学力量的使用使得作为个体的工人成为异化的、客观的和提前进入现在的存在。”

1856 年, 马克思在《人民报》(People's Paper)周年纪念的演讲中提出: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1, 页 506。——译者注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

1881年,在马克思逝世前两年,他给多梅拉·纽文胡斯(Domela Nieuwenhuis)写的一封信中提到:

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性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sup>①</sup>

更为根本的是下面的一些先决条件,即便在21世纪初都尚未出现,这显然弱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写就的《共产党宣言》的适用性: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页154—155。——译者注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割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sup>①</sup>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详尽阐述了他早期的一些思想,如其所述:

倘若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在普遍的交换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欲望、才能、娱乐、生产能力等等,还有什么呢?财富不就是充分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既要支配普通所说的自然,又要支配人类自身的那种自然么?不就是无限地发掘人类创造的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去衡量的那种地步么?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在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可以……代替,紧接着不就是不停留在某种既成的现状里面而要永久处于变动不居的运动之中么?<sup>②</sup>

马克思有关劳动分工作为“真正的自由”的讨论同样值得广泛关注和使用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说:

劳动自身的尺度诚然是根据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而由外面给予的,而且为达到它的目的所遇到的障碍也要由劳动来克服。然而克服这样的障碍,就其自身而言,便是自由底活动——而且更深一层看,外在的目的就是由剥去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底外观而得到的,并且作为由个人自身所设定的目的,它自身就是被设定的——因而就是自我的实现,主体底物化,所以就是真正的自由,劳动就是自由的活动,……使劳动

---

① 中文摘自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页 46—47。——译者注

② 中文摘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页 104—105。——译者注

成为有吸引力的劳动,成为个人自我的表现。当然这决不是说,劳动会变成单纯的消遣。<sup>①</sup>

这一段全部被马克思置于括号中的内容指出,劳动时间里的必要性和休闲时间里的自由度无法截然分开。它指出,在所有社会中,一个人必须根据劳动的一般特征进行区分,比如那些为了达到设想目标和克服这一过程中障碍的工作特征,那些阶级社会的具体化特征;比如,劳动的目标被那些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人设定,他们同时占有剩余劳动,后者既不拥有也不控制生产资料,但为了生存或活着——根据各自的历史和文化标准——需要和前者一起配合。

马克思从未把他的各种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关可替代的无阶级社会的理论,包括前提、阻力、阶段性和特征等要素。然而,依据他的概要式论述,实现一个可替代的无阶级社会,有以下一些系统性阻力需要克服:资本主义非常富有弹性,因此必须承认其长期的生命力;阶级已经被细分化;小资产阶级在努力捍卫着资本主义制度。各种镇压组织,即军队和警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提升着他们的操控能力。大众传媒中的遮蔽技巧和利用科学加强的对于剥削的控制压制着革命前的情绪和行动。

除了阶级冲突,国家战争称霸了整个 20 世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对行动的召唤,而不是一种判断。各种抵制少数派的行为侵蚀了阶级团结。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透明;资本家们不仅带上了角色面具,还摆脱了最民主化的控制而实现了隐身。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松绑而不是锁链——在一个充满大规模毁灭手段的年代,一个世界不仅可以被赢得,也可以被失去。短期的生存需求或者特权推延了中长期的目标——自从 19 世纪以来,为了更有希望的新世界,越来越多活跃的工人离开了祖国。资本主义存在得越久,它就越表现得像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一逻辑深深地扎根在其主要的社会制度之中。因此,小范围内可替代性社会网络的实现将会促成革命的巨变,以致能够取得长远的胜利,同样也是为了革命之后的子孙后代,比如推翻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剥削与压迫。

一般来说,马克思对可替代性的具体化逻辑主要指公司内部的理性计划投射到国家甚至是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同时也是高度被激发的、政治上积

---

<sup>①</sup> 中文版请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前揭,页 249—250。——译者注

极和负责的工人投射到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全体公民身上。自19世纪中叶至今,难道社会经济进程不再需要更多的时新的可替代性概念了吗?根据去/文明化过程、解放性话语以及特定体系的合理性这些新近的理论分析,有哪些特征是过时的呢?

实际上,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具有一些历史的局限性。通过一种更加宽泛的来自另类社会学的具体化分析,我们可以支持这一点,这就要求我们去纳入以下学者的相关理论,他们是埃利亚斯(Elias 193,1984)、哈贝马斯(Habermas 1962,1981,2006 and 2007)和卢曼(Luhmann 1995,1996,1997 and 2010)。比如,国家形成的种种发展模式和失败的国家,以及去/文明化的行为标准,它们关注的是暴力破坏的种种手段和自我/约束(而没有关注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话语、特定体系的合理性和在功能上等效的可替代性选择。为了一个无阶级社会,所有这些障碍以及先决条件的转变需要崭新的判断和行动。

一般来说,可替代性经常被理解为可取的(notwendigkeit,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意思,马克思早已赋予了其含义:反抗苦难)、连续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行动、社会进程,或者社会结构,它们从根本上有别于那些占据主导地位: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上面引文)中所特别强调的:如果在当前社会中没有可替代性社会关系的具体模型,任何推翻它的尝试将是乌托邦式的。马克思在早期写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sup>①</sup>中曾经用过这样一个比喻:“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要它们跳起舞来”!

与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和获取经济财富潜力的垄断化的判断相似,埃利亚斯假设了一个更加一般化的对于各种控制工具的垄断化机制,如同一个不断增强依存关系的集成商,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于财富的积累,两者结伴而行:

- 人口的增长、交往、劳动分工、货币的使用和城市化
- 税收的增长和权力中心的统治
- 贵族权力和收入的衰退,有效使用武器的垄断权的降低,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依存性增强
- 战争新技术的发展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页。——译者注

- 购买士兵,以及
- 国家运用武力的垄断化,这一垄断权主要由税收来保障

根据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和更为现实主义的目标手段,社会学的诊断不应仅关注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如马克思),或者仅强调祛魅、官僚化和理性化(如马克斯·韦伯)。由于它们高度依存,并且由人口密度或者对武力垄断的程度和类型所制约,这些领域不能被分隔开来。长期的代际依存关系指向了任何一代都无法企及的可替代性。自从数以亿计的先人们的经验、忧虑、计划、约束和自我控制把现代人导入目前的情况之中,这些锁链就不能被打破或者去除,这样做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人类和制度的根深蒂固的模式。世世代代的锁链要比资本主义的镣铐更加牢固。或者,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一切已死的前辈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sup>①</sup>。

与马克思有关人性变化的哲学思考不同——尤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的转变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基础,即生产资料社会化——在西方国家形成和衰落的背景下,埃利亚斯把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有关良好举止的书籍阐释为世俗上流社会行为举止和性格结构实际变化的指示器。用埃利亚斯的话来说:

有关功能分化、社会融合和文明化的互补进程是这个长期的错综复杂的发展的几种潮流……关于这种进程的价值,人们同时感到深深的怀疑。人们接受其益处,同时畏惧其危害……对在拥有不同权力的国家中发生的变化和波动同样如此……因此,在与人的本性不相关的领域中持续地改进科学的导向和进行控制的相应机会的连续进步之间,存在着无计划的矛盾。……对人类世界发展的相关回顾,使我们必须归总一个大规模的日益强烈的呼声并且必须怀疑一切进程的价值所在……因此,任何人仍然对发展一个更加充分的导向工具以相应地趋于控制和控制这样的进程都是无能为力的。(Elias 1977/2009, 9, 13, 16f)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603页。——译者注

埃利亚斯继续谈到:

举例来说,假使一个人把相关的资本富裕(capital-rich)工业社会纯粹的经济模型强加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人口占优势的资本匮乏(capital-poor)社会之上,而没有对其发展潜能进行系统的社会学调查,他思考的也许只是个虚幻的计划,以致于自身也将被卷入进去。(Elias 1977/2009,27f)

只有他们深入考察与(去)文明化过程以及更现实的目标和传播手段有关的偶然性和局限性,以及考虑人口统计学以及有关代际配置的长度、密度和程度,可替代性的代际间的长远目标才能够成为导向和交往的手段。

#### 四、21 世纪初,可选择性的机会和局限?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谷歌公司创始人及其雇员们——

已经认为谷歌的互联网原则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自然而不可质疑。[……]但正如佩奇(Page)所洞察的那样:如其硬权力(hardpower)通过成千上万的服务器而遍布全球一样,谷歌的“智力”(brainpower)也将会类似地得以扩散,借助地方性语言而对信息的扩散产生革命性影响。(Levy 2011,5 and 271)

新型的信息挖掘和知识网络已经取代了 19 和 20 世纪的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主义组织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剩余)价值来源。正如福克斯(Fuchs 2012,6)所说:“如果谷歌被征用并且被转变成一个公共的、非盈利的和非商业的组织来为公共利益服务,它才有可能会放松其对抗性的特征。”

从 20 世纪和 21 世纪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关注的更多是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很少涉及政治发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个例外,它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角色和政治腐败提供了犀利的分析,也许,其中只有一个与农民角色极为相关的论述可以拿来引用,因为它显示了马

克思对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鲜明差别的觉察,这在当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对当代中国和印度来说,如其所述:“小农来自大众……正如土豆来自一麻袋土豆……从这些小农中间仅有的一种地方性的关联来看……他们没有构成一个阶级”(Marx and Engels, 1969, 398)。但是,这种交往的无力也为我们展现了对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网络社会”(Qiu 2009)来说,信息技术和设备的相关性。

考虑到政治发展,我们可以举德国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例子。在马克思生前和其后,俾斯麦都是德国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并且从1871年到1890年间担任总理。通过分析他的自传《思考与回忆》(Erinnerung und Gedanke)和他(部分尚需考证)与各种同代人的谈话,以及伽尔(Gall 1983)撰写的一部有关俾斯麦的主要传记,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挑战、冲突和胜利是多么地不同。对于武力和国家机器角色的体验和态度已经远远超越了对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这一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69—1974)的首任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的自传以及关于他的传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了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甚至承认“他们没有完全揭示俾斯麦在德国统一上‘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成就所蕴藏的意义”(Hobsbawm 2011, 71)。这和霍布斯鲍姆(Hobsbawm 2011, 86)的如下判断相一致:“历史性变化框架”中的政治决断,比“去历史的自愿主义”更加充分和有力,后者并不依赖政治判断。罗莎(Rosa 2005, 477f)则用一种类似的方式作了总结,但是基于基础的制度剧变:现代性的政治计划——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向的去同步化——也许已经走到了尽头,屈服于一种短期的混乱。近期,一本名为《自信人》(*Confidence Men*)(Suskind 2011)的书举例分析了华尔街和华盛顿如何影响美国总统而最终使得“无畏的希望”(Obama, 2006, 可以与德国第一位女总理2010年在朗古特提出的施政方针相比较)落空的。

瑟伯恩(Therborn)强调说,对1905—1999年的美国来说,“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资本的集中”与“新领地”的开拓同样重要:哈贝马斯放弃了马克思理论所分析的系统性矛盾,转而关注各种行动和知识兴趣之间的差异,以及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life-world)的冲突(Therborn 2010, 79)。

沃尔夫(参见社会学中有关生存转向的讨论, Ludes 2007)则强调说,自从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以来,人类自我毁灭的潜能就更加暴露

无遗。它对人类生存产生的威胁重构和颠覆了先前的一切社会判断。“冷战”结束后,许多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削减了军事预算,部分是由于高科技在更为先进的大规模毁灭体系中的有效性。为了支撑处于资本主义危机中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弥补危机成本,国家预算的分配在这个意义上达到了有限的平衡。

马克思及其后续的社会学理论“预设了,在所有……现代化的社会中,随着可能的地方性变体的出现,欧洲现代性中发展起来的基本制度……将会‘自然而然地’被取代……但是不断涌现的事实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发展……并未证实现代社会最终会‘融合’这一理论假设。它们事实上呈现的是多种多样的现代自治制度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或家庭。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定义、规管和结合这些自制制度领域有着显著不同的特征”(Eisenstadt 2010, 2)。在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 2010, 12)看来,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多种发展轨迹和解释与西方化是分离的。

因此,对于可替代性的探究将以如下一些十分迥异因素的协调为特征,即生活世界、变化的类型和节奏以及相应的常识和社会科学理论。没有一个连续的度量单位,因为他们存在于多个代际之间,具有时间、空间和经济价值上的重大差异。需要发展而出的是任何现实主义的长期的可替代性。只有通过可替代性概念——在所有主要的可取性、一致性和潜力的层面——彼此相互的反馈,“可取的”行动、过程或者结构才能实现,也才能为根本性转变奠定基础。显然,这种尝试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被特权和对可替代性的遮蔽所束缚,这些特权阶层将会以从上而下的方式加剧阶级斗争(沃伦·巴菲特却将这点看成是在美国取得的胜利)。

因此,如果要构建一种有关“可替代性”的政治、文化、媒介化、网络化和同步性的批判分析,如下一些要点需要长期的努力(参考 Ludes 1989, book 2 and Ludes 2011, ch. 1):

- 既然没有认识“可替代性”的物理或者生物模型,那么可替代性社会模式的代际网络的重要性就必须得到确认和增强。
- 由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差异(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既不容许考虑接近自然的标准化,也不容许考虑话语性的同意或契约,那么其他的协同模式将成为分析和判断的焦点,并在认知、传播和合作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 但这些互动模式正持续遭受暴力冲突甚至是战争的威胁。这就需



要发展传播和导向的手段,从而使得社会的可替代性成为可能——不仅基于阶级分析,而且位于网络化的长远目标之中。

- 这意味着在隔代人的头脑中将会出现曾经功能分化的领域再次同步。因此,更为现实主义的可替代性概念出现了,它们将再次对心智产生影响,尤其是各种行动和制度的展现,还有主导性叙事,即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

- 对有限的地区、领域、时代和事项而言,这些阐释将产生一些可替代性的标准化作用。

- 只有这样的标准不仅在认知层面而且在情感方面,或多或少变得明显些,它们才会发挥作用,就如同可以接受的新起点一样,否则将是无休止的谈判。

这个判断性的挑战呼吁一种基于代际对话的理论建构,在这个对话过程中,有关导向和传播、控制与自我控制、再生产与毁灭的工具与哪些生产性工具相互依存。特定文化的、跨文化的甚至是全球化的可替代性行为、进程和结构的多样性,及其具体化和一致性标准的多样化是如此广泛,以致不能形成有意识的共识。这样的导向和传播手段清晰地指出,超越个体而短期的认知,必须吸纳来自不同阶级、群集和时间跨度的持续反馈,这些反馈来自它们之间互动和“交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ies)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因此,共同标准出现了,并为崭新的行为模式和心智做出了贡献。自觉的交往的可替代性往往嵌入在缺乏自觉性的界限和框架之中(Honneth 2011, 540—567)。

哈贝马斯提议把人权当作一种规管制度,在此基础上,鲁德斯(Ludes 2011, chapter 8)将这一制度放置在传统印刷、广播和网络媒体的脉络之中,象征性地代表了一般意义上与有关金钱、权力、真理或者爱情的传播媒介,以及导向、空间、时间和可替代性的长期工具。自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相伴随的经济脆弱性的反弹和国家破产,哈贝马斯看到了一种“政治可替代性”再度兴起的可能,在此之前这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他为公平的政治交往权利而呼吁,尤其是考虑到与服务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交往问题。危机中不断出现的国家规制的干预行为使得以下观点更为透明,即脱离了国家资本主义不能自主地完成自身的再生产,相反,需要借助国家的税收功能来稳定资本主义国家的紧急状态。

但是,人类的演变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开放过程,主要由以下五个基础性力量来推动,即生活方式,人口生态,认知、等级和尊重的社会分配,学习、传播和价值的文化,以及政治(Therborn 2011,84)。只有对传统概念进行自我反思式的重新概念化,才能驱动信息资本主义的激进化转型,因为信息资本主义趋向于将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进行垄断性排序(cp., e. g., Halavais 2009)。因此,在可替代的公共服务中,通过崭新的认知、交往和合作方式,对于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已经成为抵抗生产和毁灭工具寡头化的主要工具(Fuchs 2011a, section 5)。鉴于可替代性往往不想将其组织建立在商品和广告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将会腐化其政治目标,所以,他们常会面临诸如能源匮乏,不稳定的自我剥削式劳动,以及缺乏关注度和显在性等问题(Fuchs, 2011b)。

但是,除了这些观点和上述的那些阻碍马克思朝向一个可替代的无阶级社会的路径的因素,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马克思那些判断的基础已经过时了: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版图——也就是说几乎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尽管在报纸文章中有一小部分思考涉及印度)——几乎全部在马克思的研究之外。在饱含社会经济、军事、恐怖主义、生态和传播的全球化进程的21世纪,这些先前被排除在外的地区和人民也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规则产生影响。

最近的一本名为《资本主义和环境公民指南》(*Citizen's Guide to Capitalism and Environment*)(Magdoff and Foster 2011)的书提供了一个从单一国家分析投射到全球理论的范例,比如。一种不合适的修辞手法是对于“我们”(we)的使用,举例来说:“我们时刻被告知”(同上,7),“我们有一种经济体制”(同上,12),“我们的经济体制……我们必须要看”(同上,30),“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同上,38)等等,一直到呼吁集体行动者为止,这一概念甚至比先前的自为的和自在的阶级概念都模糊不清,比如,“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同上,131),“社会决定了”(同上,135),或者“我们这些人”(同上,151)。类似地,在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主要以发展为根基,并且只用英语出版,不考虑任何一种上述的来自于例如埃利亚斯、哈贝马斯、霍布斯鲍姆或者瑟伯恩的理论,仅仅具体化为“经济体制”(同上,12,30),“目前的体制”(同上,36),“资本主义”(同上,7,56,101),“资本主义制度”(同上,59),“制度”(同上,83—85),“民主制度”(同上,91),“现行制度”,“制度逻辑”(同上,93),“制度”,“这个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上,96f)“资本主义社会”(同上,

111)或者“社会”(66,有时只单独涉及美国,有时候涉及全世界却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基于这些普遍化的分析,该书进而提出了更加普适的“现实主义的可替代性”,“创立一种完全不同的体制[……]一种真正革命性的变化形式——一起向着一种崭新的体制转变”:这一简化的“计划”变得十分显而易见。尤其在如下的隐喻之中:家是什么样的[……]。类似地,一旦社会决定说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一些有关这些需求是什么的同意达成之后——为了有效地达成目标,需要一种制度来计划生产和分配(同上,135)。与这个《指南》相比,马克思有关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原初概念也许会显得更加具体并且对历史语境更加清楚——同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和话语理论则显得更为现实。

麦杰道夫和福斯特(Magdoff and Foster)的分析以生态灾难为基础——这是由于一个(美国、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根植于经济增长和没有止境的利润追逐,但是它忽略了,比如,“自由市场和更加合作化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Lane and Wood 2009)。只是十分简短地提及贝克(Beck 111),从而避开了贝克和其他人有关自反性现代化、意外结果,以及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的论述。因此,从这本《指南》来看,本文所提出的代际对话为可替代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全球范围内,混合经济和规制占据着主导地位。或者,是否有这样的国家社会,其中多样化的公共制度并没有对资本主义企业施加一定程度的管控?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失败了,而且全球重要的“共产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满足一个无阶级社会所应具有的前提和特征,关于这些上文已经概括过(参见 Mennell 2003, de Swaan 2003 and Chang and Haliday 2005)。

正如傅高义(Vogel)(2011,706f)所主张的:从公元前 221 年国家统一以来,在中国社会中发生的最根本性变化是从一个以农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向一个以城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过渡和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的扩散……

关于全球性的挑战,我将主要引用贝克在(Beck 2008b)有关其风险社会理论的阐述:

现代性的基本准则,包括自由市场原则以及民族国家秩序本身,变得开始受制于变化、可替代性的存在,以及偶然性。你也许会说,全球风险的历史性力量超出了一切由历史而产生的“救世主”:不是无产阶

级,不是被排斥的,不是启蒙运动,不是全球公众,不是全球社会的移民——如果人类所面临的是任何人或任何事从根本上既不能被拒绝也不能被公开表达,那么能够唤醒活力、共识和合法性的就是感知风险,它对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命运共同体很有必要,它将摧毁民族国家界限的樊篱和自私自利——至少终会出现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时刻并且超越民主。……然而,全球风险公共领域跟哈贝马斯所探究的“公共领域”相比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预先假设所有相关的人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并且他们共同许诺遵守理性话语的原则。然而,风险公共领域却不是一个许诺,也不具有理性。有关灾难的图像缔造不出冷静的头脑。假警报、误解、责难都是故事的组成部分。风险公众(Threat publics)并不纯洁,他们歪曲事实,具有选择性,并且煽动情绪、愤怒和憎恨。他们做的越多,与此同时,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就越少。……在一个每个人围绕自己而转动的、无法协调的差异性世界中,世界风险是强加的和强制性的传播媒介。因此公众的风险感知强迫人们去交往,否则他们不想彼此之间有任何联系。这一风险感知把义务和成本强加到那些反对者身上,即便法律往往站在后者这边。换句话说,大规模的风险切断了文化、语言、宗教和制度上的自给自足,就像切断了国家和国际的政治议程一样;它们颠倒了顺序,并且为那些彼此一无所知并互相排斥还彼此反对的阵营、党派以及争吵的国家之间创造了行动的背景。那就是“强制性全球化”(enforced cosmopolitanization)的含义:全球风险激活和连接了那些曾经不想有任何关联的跨国的行动者。……显而易见的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国家的参照系——我称之为“方法论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很显然地会阻碍社会科学理解和分析世界风险社会的动态和矛盾,机会和反讽。

相应地,跟下滑的利润率相比,全球性的灾难及趋向更多地涉及到致命的不可持续性,比如,流感的大流行、转型的战争、恐怖袭击、全球变暖、变化的水和氮循环、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以及抗菌素耐药性。举例来说,恶劣的水质量是一个极其普遍的问题。在2005年,在低收入国家中,10亿多人没有纯净的饮用水,并且约有25亿人在欠缺饮水卫生的情况下生活。在全世界的医院里面,患有水源疾病的病人们占用了大约一半的床位。受污染的

水和恶劣的卫生环境每天导致大约 4000 儿童死亡,每年因此死亡的成人也上升至至少 170 万。加之其他的水源疾病,全部死亡人数超过 500 万。相比之下,交通事故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为 120 万,大致等于每年所有凶杀和自杀人数的总和,而且每年由军事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也有近 30 万之众(Smil 2008,199)。

哈贝马斯(Habermas 2011)和埃赛勒(Hessel 2011)二人均主张,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它提出的部分相似的具体计划相比,《联合国人权宣言》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和建设,因为它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实质上的全球性进程。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已经演化为制度,且不与空想社会主义对比时所显现的所有缺点,它们可以引领我们超越先前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路径,与此同时,还指引我们超越工业化经济的偏见。

这一判断结合了两种力量来诉求“可替代性”,即“人类面临的感知风险”(Beck 2008b)和对于人权的改善;它们既有典型性又有互补性:就像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制度一样。因此,针对这样的全球性挑战的解决方案需要各种各样的途径,而不是一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判断;从 1990 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发展报告》就已经筹备了一些这样的互补性策略。他们的整合性视野来自和包含一切不平等发展的地区、阶层和性别,并且常常思考那些先前的社会理论家们视野之外的问题。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假设:“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在第二部分中曾被引用过)。在 2011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强调:其实,除了不平等和不可持续发展,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从人类发展更广泛的意义来讲,由消费化石燃料而驱动的增长不是人类追求广义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对增进平等的投资——例如在获取再生能源、水和卫生设施以及生殖健康方面的投资——可以同时促进可持续性和人类的发展。更有力的问责制和民主化进程,加上公民社会和媒体的积极参与,也有利于改善现状。成功的方法依赖于社区管理,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制度,以及能够在政府机构和发展伙伴间协调预算和机制的交叉方法。弱势群体是人类发展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也包括那些可能遭受当前人类活动的严重后果影响的未来人群(UNESCO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ii and 1)。

因此,只有将马克思原初的有关可替代性模型的一般化方法运用到更加包容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及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为 21 世纪马克思

的可替代性概念的更新奠定基础。必须将更加全球性的先决条件和阻碍结合起来,才可以不被生产方式和短期的政治目标所左右。把社会科学的长远判断和为了抵制对于大多数社会和人类的剥夺而进行的解放性行动结合起来,将是可替代性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导性挑战。

### 参考文献:

- Beck, Ulrich. 1992.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 Beck, Ulrich. 2008a. *Weltrisiko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Beck, Ulrich. 2008b. Risk Society's 'Cosmopolitan Moment'. Lectur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ember 12th, 2008.
- Ben-Rafael, Eliezer and Yitzak Sternberg, eds. 2001. *Identity,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Leiden: Brill.
- Burke, Peter and Maria L. G. Pallares-Burke. 2008. *Gilberto Freyre: Social Theory in the Tropics*. Oxford: Peter Lang.
- Bielsa, Esperanza. 2011. Some Remarks on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 Reflection on the Global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Sociological Work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4(2): 199—251.
- Chang, Jung and John Halliday. 2005.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 Danowski, James A. and David W. Park. 2009. Networks of the Dead or Alive in Cyberspace. *New Media & Society* 11(3): 337—356.
- De Swaan, Abram. 2003. *Dyscivilization, Mass Extermination and the State*. In *Sage Master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 Norbert Elias, edited by Eric Dunning and Stephen Mennell, Volume II, 119—136.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 Eisenstadt, Shmuel. 2002. *Multiple Modernities*.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 Eisenstadt, Shmuel. 2010.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Sociopedia. isa*: 1—15.
- Elias, Norbert. 1939/2000.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Erster Band; Wandlungen des Verhaltens in den weltlichen Oberschichten des Abendlandes. Zweiter Band; W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Entwurf zu einer Theorie der Zivilisa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4th edition (1st edition Basle 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English: translated by Jephcott, E.) 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

Elias, Norbert. 1978. *Was ist Soziologie?* Munich: Juventa.

Elias, Norbert. 1984. *Knowledge and Power: An Interview by Peter Ludes*. In *Society and Knowledg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Science*, edited by Nico Stehr and Volker Meja, 203—241. New Jersey: Transaction.

Elias, Norbert. 1977/2009. *Towards a Theory of Social Processes*. In *Norbert Elia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6: Essays III*.

*On Soci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edited by Richard Kilminster and Stephen Menell, 9—39. Dubl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Featherstone, Mike and Couze Venn. 2006. *Problematizing Global Knowledge and the New Encyclopaedia Project. An Introduc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2—3): 1—20.

Fleischer, Helmut. 1972. *Marxismus und 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Fuchs, Christian. 2009. *Som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Studies: Reflections on Karl Marx and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369—402.

Fuchs, Christian. 2011a. *Internet Pro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Presentation at the 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 on “Social Relations in Turbulent Times”. September 8th. Geneva, Switzerland.

Fuchs, Christian. 2011b. *Mail to the Author*. October 11th, 2011.

Fuchs, Christian. 2012. *Google Capitalism*. *tripleC* 10(1): 42—48.

Gall, Lothar. 1983. *Bismarck. Der weiße Revolutionär*. Frankfurt, Berlin, and Vienna: Ullstein.

Habermas, Jürgen. 1962/1990.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Neuwied/Berlin: Luchterh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0)

Habermas, Jürgen.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Volume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Habermas, Jürgen. 1999.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Habermas, Jürgen. 2001. *Die Zukunft der menschlichen Natu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Habermas, Jürgen. 2006.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Media Society: Does Democracy Still Enjoy an Epistemic Dimension? The Impact of Normative Theory on Empir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16(4): 411—426.

Habermas, Jürgen. 2007. *Keine Demokratie kann sich das leisten*. *Süddeutsche Zeitung*, May 16th.

- Habermas, Jürgen. 2011. *Zur Verfassung Europas. Ein Essay.* Berlin: Suhrkamp.
- Halavais, Alexander. 2009. *Search Engine Society.* Cambridge, Malden: Polity Press.
- Hessel, Stéphane. 2011. *Engagez-vous! La Tour-d'Aigues.* Éditions de l'Aube.
- Hobsbawm, Eric. 2011.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 London: Little, Brown.
- Honneth, Axel. 2011. *Das Recht der Freiheit. Grundriss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Berlin: Suhrkamp.
- Jin, Huimin. 2007. Redefining Global Knowledg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4(7—8): 276—280.
- Lane, Christel and Geoffrey Wood. 2009. Capitalist Diversity and Diversity within Capitalism. *Economy and Society* 38(4): 531—551. Langguth, Gerd. 2010. *Angela Merkel.* Munich: dtv.
- Levy, Steven. 2011. *In the Plex. How Google thinks, works, and shapes our Lives.*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and Sydney: Simon & Schuster.
- Ludes, Peter. 1979. *Der Begriff der klassenlosen Gesellschaft bei Marx.* Frankfurt and New York: Campus.
- Ludes, Peter. 1980. Marx's Notion of a Classless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7: 1—54.
- Ludes, Peter. 1989. *Drei moderne soziologische Theorien. Zur Entwicklung des Orientierungsmittels Alternativen.* Göttingen: Schwartz.
- Ludes, Peter. 2007. Existential Truths as Prerequisites for a Globalizing Discourse Theory. In *The Sociology of Radical Commitment: Kurt H. Wolff's Existential Turn*, edited by Gary Backhaus and George Psathas, 115—136. Lanham etc. : Lexington Books.
- Ludes, Peter. 2011. *Elemente internationaler Medienwissenschaften; Eine Einführung in innovative Konzepte.*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Luhmann, Niklas. 1995.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Volume 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Luhmann, Niklas. 1996. *Die Realität der Massenmedien.* Opl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Luhmann, Niklas. 1997.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Luhmann, Niklas. 2010. *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 Berlin: Suhrkamp.
- Magdoff, Fred and John Ballamy Foster. 2011.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A Citizen's Guide to Capit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annheim, Karl. 1929. *Ideologie und Utopie*. Bonn; Friedrich Cohen.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MEW. 1956—1968. Volume 1—19, 23—35 and Supplementary Volume I. Berlin; Dietz.

Marx, Karl. 1969. Resultate des unmittelbaren Produktionsprozesses. *Das Kapital*. I. Buch.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VI. Kapitel. Archiv sozialistischer Literatur 17.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Neue Kritik.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9.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Volume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Translated with a Foreword by Martin Nicolaus. London; Pengui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Marx, Karl. 1974.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Appendix 1850—1859. Berlin; Dietz.

Mennell, Stephen. 2003. Asia and Europe; Comparing Civilizing Processes. In *Sage Master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orbert Elias, edited by Eric Dunning and Stephen Mennell, Volume II; 101—117.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Obama, Barack. 2006. *The Audacity of Hope*.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Qiu, Jack L.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Rosa, Hartmut. 2005. *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mil, Vaclav. 2008. *Global Catastrophes and Trends. The Next 50 Year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Suskind, Ron. 2011. *Confidence Men. Wall Street, Washington, and the Education of a Presiden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Therborn, Göran. 2010. *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Therborn, Göran. 2011. *The World; A Beginner's Guid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UNESCO. 2010. *Towards Inclusive Knowledge Societie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8/001878/187832e.pdf>

UNESCO. 201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Sustainability and Equity;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Accessed April 1, 2012.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11/download/>

Vogel, Ezra F. 2011.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lff, Kurt H. 1976. *Surrender and Catch. Experience and Inquiry Today* =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ume LI*. Dordrecht and Boston; D. Reidel.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sup>①</sup>

## 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 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sup>②</sup>

黄艾(译),曹三省、左志(校)

[摘要]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人们对马克思的著作兴趣复燃。本文亦然,但对传播学者应该将研究重点集中在诸多马克思著作的哪些方面提出了疑问。对该问题最普遍的回答是,马克思著作的所有方面,从早期关于意识、意识形态和文化(即批判文化研究)的著作,直到后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关于资本主义结构和动力的研究。然而,对于传播学者而言,尤其需要关注那些并不完全与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马克思或者职业新闻记者的马克思两者主旨之一相吻合的著作。传播学者之所以应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传播、文化以及知识产业中的劳工现象的关照远远不够。而马克思的这两个体系的著作作为本文作者称之为的“传播劳动”和解决传播理论的一般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引。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新闻工作,劳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

① 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系名誉教授,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员,社会学系主任。近来他出版了《传播劳动》(与凯瑟琳·麦克彻 Catherine McKercher 合著,2008)《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二版)》(2009),《获取信息:传播劳工与全球价值链》(与乌苏拉·胡斯、凯瑟琳·麦克彻合编,Ursula Huws, Catherine McKercher,2010)。moscov@mac.com, <http://www.queensu.ca/sociology/people/emeritusfaculty/mosco.html>

② 本文受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委员会的拨款资助。在此,感谢加拿大皇后大学的四位研究生米根·卡恩、迪·卡伦、哈里森·史密斯、艾瑞卡·斯宾克的研究协助。

## 一、马克思回来了!

自2008年末,关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报道充斥了媒体的头版头条,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随着媒体被一些光怪陆离的画面和新闻播报等各种趣闻轶事所充斥,那些多年熟稔马克思思想的人们都质疑马克思是否已经淡出(虽然这一点无关紧要)。伦敦《泰晤士报》首当其冲,在资本主义貌似摇摇欲坠、即将土崩瓦解之时,这份平时略显沉闷枯燥的报纸在2008年10月21日的新闻标题中高呼:“马克思回来了!”《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也刊出了《马克思,在失业年代》的文章(Saxena 2008)。在德国,《资本论》以巨大销量晋升至畅销书之列。在一界之隔的法国,尼古拉斯·萨科齐(Nicholas Sarkozy),这位从来不愿错失抛头露面机会的法国总统,也被人拍到在翻阅《资本论》。甚至于罗马教皇(Pope Benedict)也因称赞马克思“绝佳的分析技巧”而被引述(Kapital Gains 2008)。坎特伯雷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也盛赞马克思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已成为一个虚构神话”,并控诉资本主义鼓吹者的所作所为无异于盲目崇拜(Gledhill 2008)。对马克思这位革命理论家的热捧直到2011年还在持续之中,《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 Week)的一则新闻报道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篇题为《从马克思到市场》的报道称,“这位大胡子显示出罕见之美”(2011年9月14日)。事实上,加拿大的一家全国性报纸头条宣称,“马克思的春天”来了(Renzetti 2011)。

通常不受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被主流媒体争相邀请去解释这一切的发展变化。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封面着重刊载了列·潘尼奇(Leo Panitch)的文章《彻底现代化的马克思》(Panitch 2009)。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sup>①</sup>应

---

<sup>①</sup> 英国左派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他自称“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士、汤普森等马克思派学生交往甚密;在1952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霍氏著作甚丰,有多部专著问世,其中包括最著名的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2010年霍布斯鲍姆以93岁高龄出版的新书《怎样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在西方引起不小反响。——译者注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sup>①</sup>之邀,与其共进午餐。正当他担心是否应小心翼翼地避免激进言论时,结果世界顶级金融家之一的乔治·索罗斯却坦言马克思“在150年前关于资本主义的发现很值得我们关注”(Renzetti 2011)。

诚然,当前对马克思的热议会有些“过火”。(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随着政府通过紧急融资等手段对市场进行有效干预的开展,这种对马克思的尊崇便有所消退。但当笔者将注意力转移到马克思与传播理论相关的著作时,这仍然足以使笔者与之产生共鸣。特别地,本文聚焦于马克思著作中被忽略的两个方面——那些与媒体、以及传播学者尤为关切的部分。

## 二、到底是哪一个马克思?

在我一系列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中,首先形成的一个想法是,需要弄清楚在马克思的多种面相中,他的哪一方面更值得着重关注。很明显,传媒领域关注的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者的马克思,他至少为媒体提供了一些引人深思的内容,比如令人震惊的金融市场崩溃和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日益加深的恐慌。这自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笔者对于马克思在该方面的重要性的著录工作还是颇为熟悉的,这些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理论,对于理解全球传播的重要性尤为关键。然而,另外一个马克思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联系也不可忽视,那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个撰写文化与意识形态专栏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年轻时的其他著作鼓舞了文化研究中的分析评论。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意义上的马克思,是批判传播学研究的中流砥柱”。

然而,有一种排他的观点强调这样一种分歧:“青年马克思代表文化研究,年长后的马克思代表政治经济学”,这一分歧忽视了马克思的两个关键要素,而这两个要素对于当代传播研究是尤为重要的。实际上,尽管本人承

---

<sup>①</sup>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著名的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慈善家和政治行动主义分子。他是个“金融天才”,以“反射性”和“大起大落理论”为理论基础,利用“羊群效应”逆市主动操控市场进行市场投机。索罗斯曾击垮了英格兰银行之后,并掀起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这场扫荡东南亚的索罗斯飓风一举刮去了百亿美元之巨的财富,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许多亚洲国家的金融体系濒临崩溃,经济陷入困境。——译者注

认确实存在区分马克思不同方面的许多方法,但是,其中一种特别有效的办法是将马克思置于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体系之中去理解,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格劳奇、哈普、奇科和芝宝·马克斯四兄弟(Groucho, Harpo, Chico and Zeppo)。<sup>①</sup>除了从事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马克思,还有作为写作饱受各类评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笔记的马克思,以及作为专栏记者的马克思。实际上,尽管马克思一生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最佳的新闻作品仍然在他早期和晚期的职业生涯中架起一座桥梁,成为其职业生涯的一个关键时期。

###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实际上,人们所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由马克思在1857至1858间完成的七本笔记所组成的作品集,这些笔记写作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前五卷之间。这些作品创作时正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中,当然也是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些笔记传统上被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 1973)视为《资本论》的序曲。作为一种不太常规的描述,它们也被尼克·戴尔威瑟福特(Nick Dyer-Witford)称为“通灵笔记”(the delirious notebooks),因为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预言了这样一个时刻:资本发展不再依赖于劳动力的直接消耗,而是基于社会与科学知识的流动。本人接触《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还是一个研究生,当时其第一个英文译版刚刚面市,而本人也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们一道,热烈欢迎这些用于领悟吸收、辩论和使用的新资料。当若干前马克思主义者,如本人的论文导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这些新的著作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用处不大而拒绝接受他们时,这并没有使我的热情消退。

这里,有一些充分的理由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视为《资本论》和其他后期著作中预期论点中的关键。但它也同样探讨了一些马克思从来都无暇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去展开的论题,其中的一些主题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中已被采纳。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所探讨的,他承认技术

---

<sup>①</sup> Marx兄弟也非常受欢迎。他们也是最经典的喜剧之王,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四贱客”,尽管他们只合作了十数部电影,但仍被誉为影史最成功的喜剧团体之一,他们堪称无厘头的鼻祖,热衷于塑造或癫狂或装傻充愣的人物,表现荒诞不经的内容,并凭此独步20世纪30年代的喜剧电影界。——译者注

的贡献,尤其是那些诸如电报之类的新传媒技术,在全球资本扩张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就马克思而言:

资本按照它的天性是要超越任何空间上的限制而向前发展的。所以创造物质的交换条件,创造交通手段和运输手段,以时间消灭空间,便成为对于资本极端重要的必然性。既然直接的产品由于运费所占比例的降低而在远方的市场上大批地销售;既然交通手段和运输本身只能是由资本所驱使的劳动进行增值价值的范围;既然必须有大规模的贸易才能在补偿必要劳动以外留下多余的东西,所以生产更为廉价的交通手段和运输手段便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因而也就由它制造出来了。(Marx 1973,524)<sup>①</sup>

本章旨在揭示资本主义传播的双重本质。它有助于所有生产力的商品化,而它自身也因之而成为一种商品。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传输方式的发展,传播技术在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资本空间扩张上变成了一种关键手段。此外,马克思阐明了商品化和空间化在社会关系的发展和结构化过程中、包括与新兴传播方式的紧密联系:

在再生产的活动里,不仅客观条件改变了,譬如说,乡村变为城镇,荒野变成伐去森林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本人也变化了,他们显露出新的品质,自身为生产所发展,所改造,形成新的才能和新的思想,新的交际方式,新的欲望和新的语言。(Marx 1973,494)<sup>②</sup>

这些思想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核心。它们既为马克思早期作品奠定了基础,又为《资本论》作了铺垫。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仅作为《资本论》长征途中的一个驿站的意义,这一点被第一批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推荐给英语世界的学者们疏漏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资本论》的关键不同并非尼古拉斯(Nicolaus)所断言的,是一种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页147—148。——译者注

<sup>②</sup> 同上书,页112。——译者注

工作进程中的创造性展示同一项完整成型的创造之间的区别。相反,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看似散乱无章,但就其自身而言,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也是批判传播研究领域内一系列重要发展过程的试金石。它所包含的思想,是《资本论》中根本没有详细阐述、但今天却被学界和政界认为颇为重要的思想。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明确关注的重点在于信息对资本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不同时间上是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如社会知识、科学和艺术知识水平、一般智力等,进行表达的。在本质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后果是,这种发展为思考、创造以及提高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整体水平提供了可用的时间。资本主义旨在将个人和社会能力的扩张纳入生产过程,但却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有知识、有力量的工人的抵抗。而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为自身的扩张和工人的抵抗同时创造了条件,因为劳工提高他们自身创造力的机会与日俱增。在阅读《资本论》时,可以衍生出这样一种理解,如果强调技术和物质生产机器就会漏掉笔记(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个核心:固定资产最重要的体现并非是生产流水线,而是“人自身”(man himself)。

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指出,价值之源是信息、创造性工人(有些人如今称之为人力资本):

自然并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机车、铁路、电报和自动纺棉机等等,它们都是人类工业底产物;自然的物质转变为由人类意志驾御自然或人类在自然界里活动的器官。它们是由人类的手所创造的人类头脑底器官,都是物化的智力。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底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Marx 1973,706)<sup>①</sup>

价值的决定,这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是牢牢地以创造性的个人为基础的: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页358。——译者注



作为生产和财富的主要基石而出现的,既不是人类自身所做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他们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人类自己所拥有的一般生产力的付出,人类对自然的理解以及人类通过其作为社会机体的客观存在对自然的征服——一言以蔽之,是社会个体之发展人。(Marx 1973, 705)<sup>①</sup>

随着资本主义日益转向以创造力乃至信息的控制为基础,它(指资本主义)便必须调动所有的社会机构参与到信息生产过程之中。因此,对整个创造机构的商品化的需要,“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全部科学都被抓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才会出现;”<sup>②</sup>结果是:

发明将会成为一种职业,而且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将成为对于生产具有决定和鼓舞作用。(Marx 1973,704)<sup>③</sup>

由于信息日益成为资本发展的核心要素,对马克思所指的信息进行思考便尤为重要了。理解这一点是有难度的,因为马克思围绕“信息”使用了多重表达。然而,有一点很明确,(对于信息)马克思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知识,因为他使用的字眼暗含了艺术和经验知识。例如,在讨论为减少劳力时间的资本需求与当作一种社会财富衡量标准来使用的需求的矛盾时,他提到了资本“在(个人的)闲余时间对个人的艺术、科学等(素养)进行发展”的重要性(Marx 1973,706)。还有,马克思在对一段经济史的激发性结论中设问:

所谓财富,倘若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些在普遍的交换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欲望、才能、娱乐、生产能力等等,还有什么呢?……不就是无限地发掘人类创造的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去衡量的那

---

<sup>①</sup> 中文版请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页356—357。——译者注

<sup>②</sup> 同上书,页355。——译者注

<sup>③</sup> 同上。

种地步么? (Marx 1973, 488)<sup>①</sup>

该段话和其相关段落表明,虽然科学和技术知识是信息外延范畴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它的重要性还远非如此。因为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是衡量包括科学、艺术、经验和创造性在内的全人类能力发展的标尺。

毋庸置疑,那些熟谙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将会注意到鲜明的相似之处。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键的不同点在于,该著作对人类能力大发展的讨论,是表述于坚实而具体的资本主义理论的范畴之内的。资本主义世界使人们发展自己的能力成为必不可少,但它是如此地受制于其自身对自身和社会阶级性的保护的需,以至于它必须严格控制这一过程(指人们获取自身能力的过程),否则将被其后果所颠覆。马克思后续的著作阐述了对资本主义更为透彻的理解,但它们并没有对资本主义自身创造性的结果进行全面思考。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提供了一种潜力,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创造性的基础上进行现实的建构:信息、知识、艺术和体验能力。

关注社会信息和一般智力对于理解劳动,尤其是理解传播业中的劳动而言,具有重要的含义。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承认,新的工业世界可能是瞬息万变的。正如资本主义需要将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创造性产业进行商品化,以实现其目标,它必须将商品化过程扩展到每一个体的总生产力中:

作为中项而插入劳动与其对象之间的,已经不再是劳动者那种经过变化的自然之物了;相反地,劳动者用来作为媒介物而插进他自身和他所控制的无机自然之间,乃是他把它转变为产业过程的那种自然过程。劳动者站在生产过程旁边,已经不是它的主要动力了。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间,作为生产和财富的主要基石而出现的,既不是人类自身所做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他们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人类自己所拥有的一般生产力的付出,人类对自然的理解以及人类通过其作为社会机体

---

<sup>①</sup> 中文版请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页104—105。——译者注

的客观存在对自然的征服——一言以蔽之,是社会个体之发展。(Marx 1973,705)<sup>①</sup>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包括智力和情感)商品化日益加深的过程,证明了人类能力扩展的必要性。资本不再只是需要劳动作为机器的附属品,它当时和现在需要的是个体的整个“社会机体”。在该段及类似段落中,(马克思)认可,对知识和情感劳动的需求,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相当早的时期就已存在。资本需要使工人充满主观性,并进而将其作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把主观性转换为生产力。一方面,这一过程拥有将资本主义延伸到我们现在所称之为的知识、文化和信息产业的极大潜力。另一方面,控制这样的劳动(指具有知识性和情感性的劳动)远远比控制和转换手工劳动更具挑战性,在手工劳动中,知识与情感对于资本需求的满足而言,关系不大。根本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认为理解知识工人、文化工人和创造性工人的劳动是理解资本主义未来的核心所在。资本控制这些工人的力量是什么?这些工人抗争的力量是什么?资本控制这些工人的劳动过程的能力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给予它新的发展方向?正是笔记(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许多段落所具有的这种乌托邦色彩(“完全榨干工人的创造潜力”),使得这部著作如此强大,因为它认可了这些(与知识和创造有关的)利害关系在斗争中是多么重要。这不仅是理解甚至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尽管这样的字眼在《资本论》中并不少见),也同样是意识必须要赢得什么的问题,例如,(无产阶级通过斗争)要获得对自身人性的全面掌控,其中包括了智力和情感意义上的创造性潜力。

本文以上简要的概述,只能大致上描述为什么对于传播学者研究传播劳动和更广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充分利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至关重要的。在笔记(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原作本身、以及对笔记的若干解读论著中,还有很多需要强调的东西。这些解读来自于皮科隆(Piccone, 1975)、哈特(Hardt)和奈格里(Negri)(2004),奈格里(Negri 1991),托纳多蕾(Terranova, 2004),戴尔-威瑟福特(Dyer-Witheford, 1999),高兹(Gorz, 2010)等人。下面,对本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转向对马克思的另外一方面的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页 356—357。——译者注

陈述,它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密切相关,这就是马克思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或者说专业知识工人的生活。

#### 四、作为新闻记者的马克思

在传播学课程中讲授马克思的学者们(往往)仅仅关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很少谈及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马克思。但也有一些例外,其中典型的就具有关键性的新闻学者汉诺·哈尔特(Hanno Hardt,2001)的著作。另一方面,讲授新闻实践的教授们完全不考虑马克思。他们对待马克思时,经常是将马克思的观点等同于苏维埃极权马克思主义(totalitarian Marxism of Soviet)和中国共产主义(Chinese communism)。这一点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从马克思作为专业传播工作者的经历的分析之中,可以获得大量关于新闻工作的知识。由于没有考虑到马克思的新闻工作,理论家们对于马克思真正的赞赏大打折扣。实际上,英国卓越的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汇集史料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他几乎完全忽略了历史 and 经济发展原则”,并跨越至政治经济学的正式研究中(Berlin 1970,12)。此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他的新闻工作有着紧密联系。

尽管新闻工作贯穿了马克思的一生,马克思最出色的新闻工作或许产生在他的中年时期,而这正是他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时。实际上,马克思最有趣的理论思考在于我们称之为知识或精神劳动的这一领域,而恰好在马克思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创作关于知识劳动的最为成熟的著作的这段时间,他将这些理论感悟付诸笔端。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马克思虽然被过于随意地忽视,但他不仅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其著作在今天仍引起强烈共鸣,同时他也毕生从事了新闻领域的实践。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新闻作品占马克思50部作品集中的整整7部之多。马克思的新闻工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早期是他24岁时为《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撰稿、随后任《莱茵报》主编,另一时期是他为普鲁士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进行撰稿和编辑工作。马克思致力于追求新闻事业,是因为他像今天新涌现出的一大批博士那样,在大学里找不到一份学术研究工作,当时大学在普鲁士政府的残酷压迫和控制下令人窒息。这一时期他的新闻工作集中于对普鲁士极权政治机

构的调查,包括普鲁士当局颁发的关于审查新闻自由的无数文件。这些工作使马克思不断受到普鲁士当局的百般刁难,并最终导致他被普鲁士所放逐。1852—1862年马克思被《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聘为欧洲通讯员。在此期间,著作颇丰。《纽约论坛报》是由美国反奴隶制运动的领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创办的。格里利致力于新闻和公共事务的深度报道,极力反对耸人听闻的报道,而那种追求刺激和轰动一时的报道方式在当时占主导地位。<sup>①</sup>在伦敦,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供稿,并在那儿度过他生命的后半段时光。

马克思的新闻工作所一贯遵循的原则,为任何一名新闻记者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尤其对那些旨在学习新闻实践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而且,他所讲的原则开始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并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知识工人。在马克思一生的新闻工作中,他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新闻审查,并为自由表达意见提供充足的论据。例如他对普鲁士一项新提出的审查法评价说:

新闻审查使所有人都服从,这正如在专制制度(despotism)下人们也是“平等”的,如果没有身价,那么(大家都)是不名一文。它是一种妄想将寡头政治深植于人心的新闻自由。充其量,审查制度会宣布某位作家不便或不适合在它的地盘上出现。新闻自由将在这样的前提下前行:应当前瞻世界历史,能够预先感知人民的声音,而由人民的声音来判断哪位作家“称职”或“不称职”。(Marx 1974,43)

当美国人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写下这样一类话时,他们就会被尊崇为自由先驱。但马克思往往却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无论是在他写这些话的时代或是现在。由于不断受到审查制度的烦扰、以及警

---

<sup>①</sup> 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所创立的《纽约论坛报》,旨在“增进人民的利益,提高他们的道德良知、政治素养和社会福利水平”,并一向以内容严肃、格调纯正著称。霍勒斯曾经告诫《论坛报》的记者:“不要描述性地胡说八道!对这种东西我厌恶极了!”他还在《论坛报》上公开指责《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等廉价报纸的庸俗堕落:“《便士报》热衷于对蛰伏在社会内部恶魔般的欲望煽风点火。他们也许不会被指责犯有谋杀罪,但是,它们的的确确是犯了制造谋杀者这种更恶劣的罪行。”他在论及《纽约论坛报》创刊宗旨时写道:“它将摒弃许多著名便士报上的不道德的、下流的警察局新闻、广告和一些其他材料。我们将尽瘁心力把报纸办成赢得善良的、有教养的人们嘉许的、受欢迎的家庭常客。”——译者注

察和当局政府官员的寻衅滋事,马克思不得不从报社辞职,报社也被当局遣散了。

不过,马克思在他余生中始终遵循(崇尚新闻自由)这一原则。但在19世纪50年代,他将更多的批评和注意力放在媒体自我审查这一逐渐兴起的趋势上。《纽约论坛报》在全美被广泛阅读,其报社编辑虽然具有进步性并受到普遍支持,但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阻挠。比如,他们有时会因为某篇文章的政治论调不予刊发,或是对文章内容进行软化处理,或是取消他的作者署名。更为糟糕的是,编辑经常会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插入一些与其观点相去甚远的评论,比如在他的一篇文章的署名后写道:“马克思先生非常有他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些我们深为不赞同”(Ledbetter 2007, xx)。马克思毫不让步,他坚持与负责编撰其文章的编辑人员进行斗争,以反抗编辑的审查。这常常使其文章获得了各式各样的评论,如1857年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些人应受到谴责,当他们像油印小报贩子一样把这些评论贴在我文章上的时候,我还应当把他们这些评论视为祝福,这真是令人作呕”(同上)。

尽管受到这样的攻击,马克思继续着他新闻事业的实践,因为他信奉这样一种原则:新闻事业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或愿望,而是一种政治号召。马克思意识到,像《纽约论坛报》这样的报纸不仅仅是给其支付稿费以维持生活所需,更重要的是它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平台,能够使他的思想影响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在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撰稿时,其发行量达20万份,其中包括像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这样热切的读者(Nichols 2011, 61—100)。马克思也有他自己的发表渠道,亦即我们今天所称的“另类媒体”,但这类媒体的读者远不及主流报纸。本质上,马克思的思想虽然是激进的,但他意识到了主流报纸在广泛传播他的核心思想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的是,他利用新闻事业进行斗争,助力政治变革的发生,如履薄冰般在主流报纸上发表文章,这一切则给他的思想和文字留下了累累印痕。马克思再次向恩格斯控诉道:

粉碎骨头,碾碎它们,再熬成汤,就像乞丐在贫民窟里一般——这就是《纽约论坛报》这样的(主流媒体)对待政治作品的主要方法。(Ledbetter 2007, xx)

虽然 1848 年的反革命让他有些失望,但革命已迫在眉睫,马克思的新闻事业继续展现着他政治使命的紧迫感。正如最近一位评论家在一则富有洞见的评论中指出:“然而,通读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发表的新闻报道,在他描绘的发生在欧洲和印度的暴动与危机中,你不禁会感到急切、兴奋,甚至迫不及待。有时他写道,好像玉米价格上涨、与希腊当局的争吵这样小小骚动就会点燃革命的火花,使革命一触即发。我们并不能因马克思有这样的感觉而否定他;毕竟,在这个时期,欧洲的统治者被推翻,当然在一些场景中,至少可以看到自由革命将可能发生。但有时,他的思想似乎远离他,他也似乎在不断地重复:只有当平民大众准备好时革命才可能出现,但我们只有在民众创造了革命时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了”(Sherman 2011)。

除了坚持“将新闻和言论自由视为政治诉求”这一原则,马克思还利用新闻工作关注他所面对的世界中的批评问题。他的新闻工作当然不是进行现场报道、或者对某位政府官员或非官方消息人士进行采访。对于后者,著名新闻记者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这样来写马克思:“在一个人对新闻工作的所有幻想中,把接近消息人士的这个幻想丢掉是最有用的了……人们对于私下知情的新闻事件,要么不知道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要么一旦知道就会撒谎。马克思则是对访问知情人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Ledbetter 2007, xix)马克思的方法则是在新闻中选取一些重要事件,比如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或是美国南北内战,利用最新的资料分析其政治经济意义。在这一方面,他做得很好。他给《纽约论坛报》的新闻稿涉及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和印度的所作所为、自由贸易、欧洲战争和革命、英国政治与社会、变幻的经济与金融世界以及美国的奴隶问题。

马克思关于在英国统治和自由贸易神话的语境下的中国与印度的作品,写作于一个最好的时期,而且,由于当前西方国家与中国、印度两个亚洲大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因此这部作品在今天也很值得一读。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随着人类可能废除奴隶制,没有什么比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更能激起马克思的愤怒”(Ledbetter 2007, 1)。下面一段文字就表达了马克思一篇文章中的某些洞见与盛怒: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事实上不仅依赖于在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而且依赖于那些贸易的走私属性。假若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

化,与此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国库将会彻底崩溃。英国公开鼓吹毒品的自由贸易,却秘密地维护其制造业的垄断。无论何时我们审视英国自由贸易的本质,垄断总是稳稳地躺在“自由”的底部。(Marx 2007b,31)

在这一切中,西方媒体宣称的自由又在哪里?他的答复值得详细引述:

这些在中国的外国人在大不列颠的保护下,严重违背条约,每日对中国犯下的罪行骇人听闻,而英国媒体对这一切置若罔闻!我们根本无法获悉有关鸦片非法贸易的消息,英国国库的充足是建立牺牲人类生命与伦理的基础之上。我们无法获悉下级官员经常受贿的消息,凭借贿赂中国清政府在购买商品收支上漏税。我们无法获知这些罪行:将那些误入歧途作了担保的移民折磨得快要死去,被卖到秘鲁和古巴当奴役,比奴隶还要更糟糕……因此,那些在国内的英国普通民众,眼睛只盯着他们买茶的杂货店,轻易相信这些由英国内阁与媒体强行塞入公众喉咙的所有虚假报道。(Marx,2007a,23—4)

马克思的新闻工作,为他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实例,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他的生活注入活力。有时,当新闻工作超脱于常规,有利于创作出好的作品,但通常会导致他难以遵循其实践准则,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原则包括不惜代价,坚持言论自由,反对新闻审查,坚持把新闻工作当作一种政治号召的信仰,毫不松懈地关注世界重大议题。当读到一位新闻工作者对他的评价时我一点也不吃惊:“即使没有别的成就,马克思也应当被尊崇为19世纪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之一。”(Wheen 2007, xiii)

## 五、结 论

本文阐述了马克思的工作中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他的新闻事业,迄今为止,还没有将这两者放在一起一并阐述的论著。前者是马克思在中年时完成的著作,它使马克思早期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作品获得跃升,并桥接于他后来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而马克思的新闻实践则贯穿于他的一生,但他作为《纽约论坛报》的欧洲通讯员的这一中间



时期,正是他新闻事业的顶峰时期。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知识和传播劳工的理论建构提供了路径,但他的新闻工作却示范了如何用激情和智慧进行实践。这不仅是马克思学者,更是传播学的学习者需要认真学习和体会的。

### 参考文献:

- Berlin, Isaiah. 1970.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 Dyer-Witheford, Nick.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Gledhill, Ruth. 2008.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Speaks in Support of Karl Marx. *Times Online*, September 24.  
Accessed December 14, 2011.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comment/faith/article4819605.ece>
- Gorz, André. 2010. *The Immaterial*. London: Seagull.
- Hardt, Hanno. 2001. *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Hardt, Michael and Negri, Antonio.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 Kapital Gains, 2008. *Times Online*, October 20. Accessed December 14, 2011.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comment/leading\\_article/article/4974195.ece](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comment/leading_article/article/4974195.ece)
- Ledbetter, James. Ed. 2007. *Karl Marx: Dispatches for the New York Tribune*.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973. *The Grundrisse*. Trans. by Martin Nicolaus.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974. Debates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Karl Marx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Censorship*, edited by Saul K. Padover, 3—47. New York: McGraw Hill.
- Marx, Karl. 2007a. English Atrocities in China. In *Karl Marx: Dispatches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edited by James Ledbetter, 20—24.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2007. History of the Opium Trade (II). In *Karl Marx: Dispatches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edited by James Ledbetter, 28—31. London: Penguin.
- Negri, Antonio. 1991. *Marx beyond Marx*. London: Pluto.
- Nicolaus, Martin. 1973. Foreword. *Grundrisse*, 5—66. London: Penguin.
- Nichols, John. 2011. The “S” Word: The Short History of an American Tradition ...

Socialism. London: Verso.

Panitch, Leo. 2009. Thoroughly Modern Marx, *Foreign Policy*, April 15. Accessed December 14,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9/04/15/thoroughly\\_modern\\_marx](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9/04/15/thoroughly_modern_marx)

Piccone, Paul. 1975. Reading the Grundrisse: Beyond Orthodoxy. *Theory and Society* 2(2): 235—255.

Renzetti, Elizabeth. 2011. Springtime for Marx. *The Globe and Mail*, March 26, F5.

Saxena, Shobhan. 2008. Marx in the Time of Pink Slips. *Times of India*, 2 November.

Sherman, Steve. 2011. Marx as Journalist: An Interview with Jim Ledbetter. Accessed December 14, 2011.

<http://www.marxsite.com/Marx%20as%20a%20Journalist.html>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Wheen, Francis. 2007. Foreward. In *Karl Marx: Dispatches for the New York Tribune*, edited by James Ledbetter, ix-xiii.

London: Penguin, pp. ix-xiii.

威廉·皮考斯(Wilhelm Peekhaus)

## 学术出版的封闭与异化：学术工作者的训诫

毕晓梅(译),陈思博(校)

[导读]作为当代知识生产及传播的最主要渠道,学术出版的发展事关每一位学者的切身利益。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建立在共享及协作基础上的传统学术出版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商业化挑战。如今,在经历了一系列兼并与收购之后,商业出版集团已经成为西方学术期刊出版的领导者,一个由少数几家商业出版集团所垄断的市场已经形成。上述市场格局对当今西方学术界的知识生产及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学术出版的商业化导向与大学的产业化压力相呼应,致使基础学科的研究经费日渐短缺;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学术期刊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其传播却日益被高昂的订阅费所封闭。上述的这些影响都揭示了资本主义对学术出版业的侵蚀在不断加剧。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聚焦于学术出版业内不断扩大的资本控制并批判了其学术生产和传播的负面影响。此外,本文也讨论了目前在蓬勃发展的“开放存取”运动及反抗资本对学术出版控制的诸多努力。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七个小节。第一节综述全文并提出文章所涉及的三个研究问题:(1)当前学术出版业的格局、特点、及其对学术出版与传播的影响,(2)开放存取运动的历史、现状、及其对商业学术出版集团的挑战,(3)学术出版业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沿革、与展望、及其对学术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随后,第二节论述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对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影响。作者以加拿大高等教育为例,论述了教育财政减少以及政府对商业性研究的强调共同导致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学术界的正常化。这导致了当代大学大多被资本占

有规律所支配。上述高等教育的大环境上为学术出版业的过度商业化创造了客观条件。

承接上文,第三节详述了学术出版业沦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前沿阵地的过程以及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对学术传播的负面影响。作者在此特别强调了如下两个观点。首先,同其他传媒产业一样,学术出版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少数几家商业出版集团所垄断的市场,并且学术期刊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如同学科期刊间很少能互相替代)加剧了这种垄断。其次,学术出版业存在着惊人的暴利,因为学术期刊的生产主要基于学术工作者的免费劳动(如撰写文章、同行评审、编辑等工作),而商业出版集团仅需付出少量费用便可占有学术工作者的劳动成果。

第四节为本文的核心理论章节。作者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积累”与“异化”两大理论论证如下观点,即资本支配下的当代学术出版业是资本原始积累及其异化作用的又一例证。具体而言,马克思理论将原始积累的本质归为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这种分离带来了所谓的“异化”效应,即劳动成果被异化为资本(而非其直接生产者)的私有财产以及生产过程被异化为凌驾于劳动者的客观存在。虽然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原始积累归为一个历史性过程,当代学者则强调原始积累的可持续性,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于其对社会公共领域的不断侵蚀,在新的社会公共领域进行原始积累。据此理论,作者认为当前学术出版业的过度商业化正是体现了资本新一轮的原始积累,因为资本将由公共财政资助(因而属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私有化并通过期刊的方式售卖。

接下来,本文的第五节介绍了“开放存取”运动及其为瓦解资本对学术出版业的控制所作的诸多努力。作者在此回顾了开放存取运动的产生及其快速发展,并讲解了两种主流的开放存取模式:基于开放存取数据库的“绿色”模式和基于开放存取期刊的“金色”模式。此外,作者也通过提及有偿开放存取出版的相关丑闻来着重强调开放存取运动的局限性,即开放存取这一模式本身并不具有鲜明的反资本特性。随后,第六节展望了学术出版业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未来,并号召广大学术工作者加入到反对学术出版过度商业化的队伍中。作者在此提出了一种基于开放存取运动的改革方案,即由大学出版社联盟来主导主要学术期刊的发行并通过不同大学间的交叉协议来从总体上降低当前学术期刊的高昂价格。最后,本文的第七节总结了全文,并最后提醒读者:反抗资本控制的斗争任重而道远。

基于上述内容,译者认为本文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新解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对学术出版业内资本控制的分析揭露了资本的逐利本质,旨在警醒广大学术工作者,使其明白来自商业学术出版集团的剥削。然而,译者也需指出本文存在的如下三点不足。首先,本文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出版现状,尤其是非英语系国家(如中国与巴西)的学术出版业的具体情况。以中国为例,当前中国学术出版业仍由(公有制)大学出版社所主导,类似的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特例将多少影响到本文论述情况的普遍性。其次,本文对开放存取运动的表述中未能详细论述开放存取类期刊的可持续性。虽然开放存取期刊的数量在逐年增加,并且有少数期刊已经可以吸收到较高质量的投稿,但绝大多数开放存取期刊在一段时间后会因缺乏投稿而停刊,这已经成为威胁众多开放存取期刊的首要问题。最后,本文第六章节所提方案无法解决学术界内部存在的南北差异问题,即所谓世界性的大学出版社联盟必然由美国所主导,而非英语的学术文献仍将在和英语的学术文献的对抗中处于劣势。

[关键词]学术出版,原始积累,异化,马克思,开放存取,政治经济学

## 一、导 论

“学术工作者的有效传播途径正在被剥夺。”(Mills 1951,152)

随着其不断加速的进展,60多年前令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叹息的情景在今天已经达到了一种近乎“完全剥夺”的临界状态。如同通信和传媒产业内的其他领域一样,过去的几十年学术期刊出版业也经历了一波影响深远的并购浪潮。这些并购导致了一个由少数几家出版业巨头所主导的市场以及这些巨头们对权力的滥用。其最突出的表现是暴涨的期刊订阅费用以及由严控版权和许可限制所带来的极端(学术)封闭。尽管上述影响已在图书馆与信息学以及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学者和从业者圈内被广泛讨论,截至目前从理论层面论述学术出版产业发展及其影响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已有文献中更是缺乏从批判传播政治学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尝试(值得注意的特例包括 Merrett 2006 与 Striphas 2010),即考量(在学术出版业)资本将生产者(学术作者)从其产品(学术出版物)中异化的能力。这种异化是对维系学术出版体系运行的无偿劳动的挪用。

为了部分地弥补上述缺憾,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当代学术出版环境的诸多内在因素与矛盾。笔者旨在探讨学术出版业内不断扩张的资本控制以及抵御和消解这一资本主义学术出版模式的诸多努力。为了探讨上述研究议题,本文聚焦于如下三个问题。首先,学术出版产业具有哪些结构性特征,这些特征又是如何影响学术研究的生产和传播的?其次,各方的角色都做了哪些努力来抵御资本主义模式对学术出版产业的主导?最后,有哪些新的、以至更加激进的策略能够积极驱动资本对学术出版业控制的瓦解?

笔者认为,通过回归马克思的“原始积累”与“异化”概念,我们可以从理论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基于《资本论》第一卷,本文旨在阐明:作为一种维系资本积累的持续性历史过程,原始积累提供了一个适当的理论视角来考察当前商业学术期刊出版商采取的多种封闭政策对共有知识的侵害。作为一篇理论性的补充,本文将进一步论证“异化”——这一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资本家控制下的生产流程的概念——的某些要素抓住了当代学术出版业的实际生产者(学术工作者)的“疏远”体验。本文对“异化”这一概念的解析主要基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讨论。除表述在当今“原始积累”与“异化”二者间的相关性外,本文也将揭示:尽管相对其他工作而言学术岗位拥有更多的权利(纵然这一观点越发收到质疑),学术工作者依然身陷并且受制于资本积累过程所带来的限制与剥削。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文首先将简要表述学术出版业所根植的当代学术生态体系的大环境。具体而言,本文将阐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诸多行径是如何使高等教育机构日趋变质为资本积累规则的附庸。其次,本文将概述商业化的学术期刊出版业,包括其主要结构性特征、近几十年来的兼并趋势,及上述兼并对于学术传播的影响。在构建了上述经验情境之后,本文下一章节将阐述马克思的“原始积累”和“异化”概念。这种阐述的目的在于从概念上分析学术出版业大环境下的运作机制是如何遵循资本积累规则,进而导致公有知识资源的封闭和学术生产者的异化。接下来,本文将论述焦点转向开放存取运动——一场旨在消弭由资本控制下的学术出版业所带来的封闭与异化的运动。本文此处的论述意在表明:开放存取性质的出版业并非具有天然的反资本主义属性。因此,我们需要将传统的开放存取与具有更明确的反资本控制目的的开放存取加以区分,以期订立一种基于共有知识的制度来更准确地反映基于同行评议与共有知识的学术知识生产与传播。随后,本文的倒数第二部分将回答第三个研究问题,提出一些基本策略

以及一种可行的基于开放存取的另类出版模式,以期彻底地消解资本对学术出版业的控制。

## 二、作为当代资本积累场所的学术界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学术期刊出版业,我们首先需要阐述学术出版业所根植的大环境。正如越来越多的学术文献(Bok 2003, Giroux 2007, Krimsky 1991, 2003, Levidow 2002, Newfield 2008, Olssen & Peters 2005, Peekhaus 2010, Slaughter & Rhoades 2004, Washburn 2005)所注意到的,过去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高等教育的特征和运作方面都打上了清晰的烙印,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的急剧削减、大学内部利益矛盾的突显、学术研究方向的偏离、业界与学界联系的渐增、教学和行政负担的加重、非终身教职及不稳定的附属性职位的激增,以及新一代学术工作者日渐被私利而非公共利益所驱动。笔者基本认同上述观点,但并不打算在这里重述这些批判性的研究。本节将聚焦于新自由主义在加拿大日渐突显的几个重要途径(当然,英国与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与趋势),因为这些途径最直接地影响着学术研究的生产和传播,进而也是与学术出版最相关的因素。这些途经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政府教育投入的大幅度紧缩。在加拿大,渥太华于1996年决定将先前分离的高等教育项目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一并纳入加拿大健康与社会转移支付。这种新的从联邦政府到各地方政府的大规模转移支付使得各地方政府(他们各自拥有对本地方教育的司法权)能够自行决定如何分配这些资金。由于加拿大各级政府和政治派别非常强调新自由主义下对零赤字与减少政府债务的承诺,大部分加拿大健康与社会转移支付被用于偿还社会养老保险债务,结果导致其他社会性开支(包括教育)急剧紧缩<sup>①</sup>。

伴随着以上政策的实施,现在许多政府(包括加拿大政府)开始信奉一个“真理”,即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有赖于私营企业对教育机构产出的知识与创新进行商业开发与应用。在加拿大,相关政策正在以多种方式被执行。例如,加拿大大学与学院协会在2002年与加拿大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框架性协定,承诺

---

<sup>①</sup> 在2004—2005财年,加拿大健康与社会转移支付被分成两部分:加拿大健康转移支付与加拿大社会转移支付,以使其更加透明,并负担更多的联邦医疗保障基金。

促使其所属大学将研究项目翻倍,并且将研究成果商业化的项目数量增加两倍(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2002)。作为上述承诺的一项例证,人丁兴旺的技术转移办公室遍布加拿大每所大学,而且他们仍在不断地扩充雇员以应对加拿大校园中不断深化的商业化进程(Bostrom, Bruce, & Flanigan 2007)。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大多数加拿大大学委员会与其他政府高层机构对商业界成员的开放促成了上述变化(Whiteley, Aguiar, & Marten 2008)。

同时,最新的加拿大联邦科技政策——“以科技促进加拿大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趋势。根据这项政策,加拿大需更热忱地促使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商品化的创新。这项由哈珀政府提出的政策使商业界获利颇丰,因其特别申明,大学应参与基础性研究以使私营部门避免与此类研究相关的时间与资本投入;同时,私营部门可以完全无阻碍地获得这些研究成果;并且,若此类研究成果具有实际应用价值,高等教育机构有义务与商业界合作以使其商品化;此外,这项新政策还阐明了如下目标——将新企业投资方面的税率降低至 G-7 国家的最低水平(Government of Canada 2007)。综上所述,我们将见证又一个创新成本社会化和创新成果挪为私用的例子。为贯彻上述措施,该项政策制定了若干旨在削弱加拿大主要研究资助机构的自主性的计划,包括向多个掌管研究资金的理事会的管理层安插商业界的代表,以及征求私营部门对研究计划拨款的筛选政策与程序的修改意见。该政策文件同时号召高等教育机构培养更多的具备“商务技能”的科研工作者——其潜在的信条是我们只需培养具有足够商务素养的科研工作者以进一步促进大学和学院研究的商业化水平(Government of Canada 2007)。<sup>①</sup> 基于上述政策文件的表述加拿大科技政策原则的整体基调,任何读者都不难得出结论,该政策将可资助的研究定义为易于商业化的研究。当然,这种经费分配结构的内在问题之一便是无法迅速商业化应用的研究项目很难获得研究资助。结果,那些关注更宏大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因其非即时性与实用性的特性,而很有可能被边缘化,无人问津。

Etzkowitz 和 Webster(1998)在评价当代学术环境时曾论及“第二次学界革命”,其驱动力量便是,它促使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成果转向为私营部

---

<sup>①</sup> 前英国工党政府有过类似政策,在五年内投入 2.5 亿英镑建设 44 个研究中心培养 2000 名博士生。这些博士生将花费 75% 的时间接受产业界训练(Mulland 2008)



门牟利的新兴产品与业务<sup>①</sup>。Kenney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便已观察到了这种趋势,他在分析大学和商业的关系时注意到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正越来越多地由商人与学术工作者所共营<sup>②</sup>。Elzinga 将上述变化归纳为一种以市场标准来衡量科学效用的知识性迁移(转引自 Etzkowitz, Webster, & Healey 1998)。根据 Krinsky(2003, 7)的论点,这种迁移的结果是:学术保密取代了学术公开,知识的私有化取代了其原本的公有性,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取代了“大学所产生的知识是社会共享性的免费商品”这一观念。在美国,贝耶-多尔法案(Bayh-Dole Act)要求由联邦政府资助所产生的应用性研究成果需进行商业化应用的尝试。该法案极大地促成了产业与大学之间的长期合作,特别是基础性及探究性研究的领域<sup>③</sup>。但正如一些评论者(Bekelman, Li, & Gross 2003; Caulfield & Feasby 1998; Lievrouw 2004; Washburn 2005)所指出的那样,产学紧密结合带来了一系列困境:大学内部合作的受限,学术自由的丧失,学术出版的延误及其他信息禁锢,学术客观性的沦丧,牺牲基础性研究式的应用性研究,对学生的盘剥,迫使教员过度投入商业行为从而忽视自身其他职责(如教学工作)的压力,以及临床试验中对医患关系的滥用。

诚然,正如化学与电力产业对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意义所揭示的那样,科学思想长久以来就被转化成产业应用<sup>④</sup>。然而,科学从发现到应用之间的间隔被不断压缩,政府鼓励(甚至强迫)大学(通过与产业界合作)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行为愈演愈烈,以及学术机构的知识成果对产业界的战略性意义日渐提升——当前的产学结合程度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已今非昔比。的确,科学知识(一种传统上被认为是用以促进其自身领域发展的信息资源)如今正面临不断增长的商业压力,以及日益增长的基于产能提升的研究结果评估(Freeland Judson 1994; Sigurdson 1993; Krinsky 2003)。(由上述因素所导致的)社团主义理念正影响着当前高等教育政策并在大学管理机

---

① 第一次学界革命涉及大学的功能重心由维系文化转向扩展知识前沿(Etzkowitz & Webster 1998)。

② Yoxen(1981)对分子生物学发展历史的回顾表明,科学家们曾十分不愿将自己的工作视为经济增长与产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当这种抵触消失,科研机构中的结构性变迁便很快发生了。

③ 1980年的美国贝耶-多尔法案要求受联邦资助的机构汇报其研究成果中一切具有获得专利权潜力的发现。这些机构只有在提交专利申请并在开发其所获专利后才可保留对其发明的冠名权。否则,政府保留如下权利,即将发明授权其他实体进行应用性开发。显然,该法案认为有必要通过专利权的方式来促进技术发现从政府实验室到大学以至私营部门的转移。

④ 基于对弗朗西斯·培根关于科学与技术的探讨,Hindmarsh 和 Lawrence(2004)提出上述产学转化可追溯至更早的历史时期。

构中形成坚固的滩头堡,从而很可能对那些被认为是与资本敌对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进行严苛的审查。此外,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资本积累机制在教育界的内化更是背叛了默顿学派的科学发展纲领,这直接威胁到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大学的两个最基本的权力——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sup>①</sup>。

笔者通过以上概述想要申明的基本论点是,财政拨款减少的负面效应以及政府对商业研究项目的强调已经促成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学术界的正常化,致使当代大学被资本占有规律所支配。的确,知识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有助于解释大学为何成为资本扩张中受青睐的资本占有场所。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知识传播最主要机制的学术刊物也无可避免的被资本纳入其商业逻辑。

### 三、商业学术出版产业及其对于学术研究传播影响的调查

全世界每年有超过 2500 份经同行评审的期刊出版,并且期刊和论文的数量每年都在稳步增长(Ware & Mabe 2009)。事实上一份摩根士丹利的报告(Morgan Stanley 2002)称,在过去的 15 年中学术期刊已成为媒体产业中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因此,学术出版业在过去的 20 年中经历了于其他信息与传播产业相似的企业兼并风潮,这也并不奇怪。根据 Munroe(2007)的研究,截至 2004 年,西方国家的学术出版仅由 12 家欧洲和北美出版公司所主导。这些公司拥有总计 650 亿美元的年收入与 25 万雇员,其大多数源于 19 世纪的图书销售业。自从 Munroe 的研究以来,其所描述的学术出版中日益明显的兼并现象飞速发展。如今,这一领域仅被 10 家主要出版企业所主导。约 42%的学术文章由科学期刊的三大出版商(里德-爱思唯尔集团,斯普林格集团,和威利-布莱克威尔集团)出版。虽然全世界还有另外超过 2000 家学术期刊出版商,他们当中没有一家能够占有超过 3%的学术期刊市场(McGuigan and Russell 2008)。上述这种学术出版的高度垄断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商业学术出版巨头成功地获取几乎所有学术领域内最有声望和广泛流通的期刊。的确,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学术团体将其刊

---

<sup>①</sup> 对上述批判的进一步探讨可能涉及一系列理想化而非实际的原则,笔者此处批判所强调的是由新自由主义对当代大学的侵蚀所带来的一系列真实的负面性影响,这些影响直接损害了大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自由与活力。

物售卖给商业学术出版商以免除刊物出版和发行过程中的成本与运营负担,以及获得额外的收入用以补贴学会活动及会费(McGugan and Russell 2008; Kranich 2004)。

本文接下来将就过去 10 年中商业学术出版业的几个主要的兼并和收购案例展开论述。虽然这些案例无法全面反映过去十几年中商业学术出版业的资本集中状况,他们基本确立了该行业当今的几家最大出版商及其垄断格局。这些交易的规模提供了一个重要提示,即基于(绝大多数)学术劳动免费性基础上的学术出版业极具赢利性。由于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积极的合并和收购活动,里德-爱思唯尔·集团(Reed Elsevier)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技术与医药期刊出版商。这家盎格鲁-荷兰联合企业也专注法律、教育与商业领域,并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根据里德·埃尔塞维尔·集团的数据,其出版超过 2500 份期刊(主要通过 Science Direct,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医学研究数据库)以及每年约 2 万种新的医学参考、健康科学及科技类图书。该公司也活跃于商业信息出版领域,提供超过 100 份涉及各领域的商业杂志。同样,里德·埃尔塞维尔·集团还拥有 LexisNexis,一个包含超过 40 亿份可检索文件的法律与新闻在线索引,收录了包含超过 35000 种法律、商业和新闻源的数千个数据库。

2003 年初,康多富-盛峰(Candover and Cinven,一家位于伦敦专注于大宗公司交易的风险投资公司)以 6 亿欧元从荷兰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购得克卢沃学术出版社(Kluwer Academic Publishing)的控股权。同年晚些时候,康多富-盛峰又以 11 亿欧元的价格从贝塔斯曼集团(Bertelsmann Media Worldwide)买下贝塔斯曼-斯普林格出版社<sup>①</sup>(Bertelsmann Springer)。康多富-盛峰随后将上述两家出版社合并为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使其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社。2004 年斯普林格出版近 1350 份期刊与 5000 种图书,年收入 8.8 亿欧元。根据斯普林格的网站内容,该出版社收录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与医学类的图书、期刊、草案及参考文献(2741 份期刊)。2006 年,约翰威立出版集团(John Wiley)以 5.72 亿欧元的价格买下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Blackwell Publishing)。当时布莱克威尔每年出版大约 600 种图书及 800 多份期刊,其中许多来自专业性学术团体(Munroe 2007)。这两家公司的合并使其每

---

① 1999 年贝塔斯曼拥有 85% 的斯普林格出版公司(Springer Verlag),包括其出版的科学期刊。

年能够出版超过 1400 份经同行评议的期刊,内容涵盖社会、人文、科技、医学等学术领域。

根据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供职于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的经济学家 Mark McCabe(2002)的研究,学术出版业内的兼并与收购行为在 1988 年至 2001 年期间生物医学类书刊的涨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之类似,其他的研究者也认为商业学术出版社所出版书刊的每页平均要价是非盈利学术出版社的 4 到 6 倍(Bergstrom and Bergstorm 2004)。如此飞涨的价格无疑解释了几家主要学术出版公司的惊人赢利水平的原因。2006 年,里德-爱思唯尔(ReedElsevier)几乎 31% 的运营利润来自其科学、技术和医疗类出版物。威立(Wiley)在上述领域的期刊为其提供了超过 45% 的运营利润,而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则更多投身与社科领域的出版活动,这可为其产生 28% 的运营利润。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Francis)的学术于科学出版部门为其带来了超过 26% 的运营利润,而汤姆森集团(Thomson Corporation)则从它的医疗与科学类出版中获得了 24% 的运营利润(Pirie 2009)。

除逐步整合的产业外,学术期刊市场中存在的一些特定的结构性特点也使资本对学术出版能够更轻易地加以控制。其中一项尤为突出的控制机制就是学术文章的出版要以作者同意将著作的知识产权移交出版社为条件。该机制被几乎所有商业学术期刊出版公司所执行。在相对保守的终身教职与晋升的评价制度的推波助澜下,该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由企业所主导的学术期刊出版渠道。此外,知识作为商品的特殊性质也增强了资本对其的控制力。区别于一般商品,竞争性的学术期刊与文章即便常因主题范围的交叉而存在互补性也很少能够彼此替代。这种可替代性的缺乏实质上强化了出版商的垄断力,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在其各自领域控制了顶级期刊的出版商而言。这是因为学术性图书馆馆藏扩展的政策是由潜在的保存与扩展研究文献存量的目标所驱动的,这种目标使得负责馆藏扩展的馆员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希望订购尽可能多的重要期刊。的确,在教员们要求便利地访问关键学术期刊的压力下,馆藏扩展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并且期刊之间的质量差异通常无法体现在价格差异上。同样,图书馆通常不愿以新的期刊(尽管他们价格可能更合理)代替已有期刊,直到新期刊的质量经过学术界的检验。并且,由于那些在某一学科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期刊通常能够吸引到最好的论文,对于新期刊来说要建立足够严谨扎实的声誉往往任重而道远。在知晓上述这种竞争受限的市场形势下,学术出版商更加积极地

追求利润最大化,例如进行远超通胀水平与装订成本的大幅提价(Bergman 2006; McCartan 2010)。

产业整合与被劫持的市场需求一起导致了通常所谓的“期刊危机”,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性图书馆所面临的困境:与飞速上涨的期刊价格相对的是不变甚至减少的图书馆预算。例如,1995年美国的期刊价格上涨了10.8%,1996年上涨了9.9%,1997年上涨了10.3%,1998年上涨了10.4%(Bosch, Henderson, and Klusendorf 2011)。根据另一份调查的数据显示,期刊的平均价格在1986年至2003年间增长超过了3倍,从89.77美元增长到283.08美元(Greco et al. 2006)。其涨幅远远超过了这段时期68%的通胀率。在购买学术期刊的总体支出方面,图书馆平均增加了260%的期刊预算,从1986年的约150万美元到2003年的530多万美元。考虑到通胀因素,相较之下图书馆非期刊类文献支出其实下降了约2%,由1986年的110万美元降至2003年的185万美元(Greco et al. 2006)。或许,图书馆总预算中不断上涨的期刊支出比例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期刊危机的严重性。在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协会成员中,1986年的学术资料(期刊与图书)支出仅仅略超过其平均预算的32%,到1995年这一比例才上升至不足36%。而在2000年与2003年,这一比例已分别达到39%和43%(Greco et al. 2006)。在飞涨的期刊价格与预算削减的双重压力下,图书馆通常采用取消某些订阅,不再增订新刊,减少非期刊类文献购买数量等方法来维持用于期刊订阅所需的资金。无论从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来看,上述情形对图书馆购买非期刊类文献所产生的影响都日益显著,因为虽然非期刊类文献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图书馆现在所购文献数量占可购文献的比例却越来越少。

即使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学术期刊价格近几年仍在以4%—5%的速度增长,远高于2009年的负通胀率以及2010年1.6%的通胀水平(Bosch, Henderson, & Klusendorf 2011)。根据EBSCO的数据,美国出版的学术期刊价格在2007年至2011年间上涨了近30%,其他地区出版的学术期刊价格则上涨了近34%(EBSCO 2011a)。上述其他地区出版的学术期刊价格的更大幅的涨价可以部分归结为自2008年以来的美元贬值。EBSCO预计2012年美国出版的学术期刊价格会上涨4%—6%,以英镑定价的期刊会上涨7%—9%,以欧元定价期刊则会上涨9%—11%(EBSCO 2012b)。

基于实证研究数据,许多研究者驳斥了“期刊质量取决于期刊价格”的

论调,这与一些出版业的支持者针锋相对。Greco 等人(2006)发现在颇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中,期刊质量与价格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他们发现那些质量最高的期刊(基于 ISI<sup>①</sup> 引用指数)都是由非盈利性学术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些出版社通常收取的订阅费用要低于商业出版社。总体而言,Greco 等人厘清了以下事实:非盈利性非盈利性学术出版社的订阅费、期刊每页平均价格、及每次 ISI 引用平均价格均低于商业学术出版社。尽管 Greco 等人没有完成对人文社科类期刊的相似分析,他们的初步分析结果支持如下假设,即同样的模式也存在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多数期刊中(Greco et al. 2006)。

基于学术期刊市场的结构性特点,主要的学术出版商在销售上普遍采取了一种“打包”的策略,即不售卖单独期刊,而是出售包含数十至数百种电子期刊的数据库授权。这种销售策略迫使图书馆为获得他们需要的期刊而订购许多原本不需要的期刊。上述这种所谓的“大宗交易”通常是长达数年的合约。虽然这种合约有时限制了交易期间的价格上限,但也有学者批评其复杂的价格结构使得图书馆无法在合同期内取消数据库中某种期刊的订阅(Bergman 2006)。这种合约“全有或者全无”的性质使得图书馆对馆藏内容和范围的控制权进一步削弱。这种合约的更本质问题是图书馆通常仅仅是租赁这些电子期刊的访问授权,如果图书馆终止其与出版商的合同,对过往期刊的访问便无法得到保证。许多图书馆因其存档的功能而无法接受无法访问过往文献的后果。这一利于出版商对期刊数据库定价的事实进一步削弱了图书馆在商讨新合约时的议价能力。此外,由于期刊数据库在图书馆的年订购预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当图书馆因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减少馆藏时,小出版社出版的独立期刊往往首当其冲。除限制学术图书馆所服务群体对电子期刊的访问权外,上述的“打包销售”也进一步增强了学术出版业的整合趋势以及商业出版寡头的垄断。

### 破除附加值神话

为合理化出售学者所创造的知识所产生的高额利润,出版社往往声称他们为广阔的知识生态系统提供了附加价值。这种观点完全回避了以下事实,即学术工作者为期刊所提供的内容、同行评审以及编辑工作都被期刊出版社所占有,而这些学术劳动并未获取应得的报酬(虽然有几家出版社支付

---

① ISI 现名为 Web of Knowledge(属于汤姆森-路透集团)

编者少量的报酬,但其金额往往远低于编者劳动的实际价值)。若作者手稿中包含彩色资料或其他受版权保护的资料,出版社往往将随之附加的时间及金钱负担转嫁到作者身上,并将这些工作产生的附加价值通过迫使作者放弃版权(作为出版的前提条件)的方式一并占有。前文所述,作者确实也享受了诸如排版、营销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校对等附加服务。学术界也认识到学术出版所带来的如终身教职、升迁以及学术界内的认可等间接利益。此外,学术界作为电子期刊服务(例如全文搜索、新期刊及目录提醒、引用记录追踪与导出等服务)的使用者也逐渐从中获益。

但是,据一名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的分析,没有一家商业学术出版社在出版过程附加大量的价值,以担保其所赚取的巨额边际利润的合理性:

为了使赚取的边际利润合理化,包括 REL(Reed Elsevier)在内的出版商都强调如下因素:他们所雇佣的高技能员工(在同行评议之前对提交的论文进行预审查)与他们对编委会提供的支持(诸如提供适度的津贴,承担复杂的排版、印刷、以及包括网络出版和托管的发行工作)。REL 的科学类期刊部门共有约 7000 名雇员。REL 也声称其高额边际利润反映了规模经济效应与他们高效率的运作水平。我们认为出版社仅仅在出版过程中增加了较少的价值。我们并不想否认 REL 的 7000 名员工为自身生计所做的工作。我们只是注意到如果这个过程真的如出版商所宣称的那样复杂、昂贵并为出版物提供高附加值,那么 40% 的利润就不可能实现(转引自 McGuigan and Russell 2008 第 18 段)。

甚至连投资分析师也对于商业出版社声称的“出版过程的高附加值”表示怀疑。的确,正如克拉克(Clarke 2007)在对于另类学术出版的分析中所指出的,出版商为出版物增加的主要价值——如打造期刊品牌,积极营销,主动性的消费者管理,以及内容保护等——主要是从出版社所有者及股东的利益出发,而并非是那些生产与消费学术出版物的学者。与之类似,经济学家 Conley 与 Wooders 也批评了出版业宣称“高附加值”的动机,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商业出版社的最主要开销在针对潜在订阅客户的广告宣传、订阅合同的执行、期刊数据库的管理,以及对上述工作的管理、缴税、雇佣律师与会计等工作,上述活动没有一项与促进学术交流直接相关”(Conley and Wooders 2009,82)。

产业整合、强制性版权转移、打包销售、以及日渐高昂的期刊定价——全世界类似于爱思唯尔与斯普林格的商业学术出版社正是通过上述策略从学术的研究与传播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体现了学术出版已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了对上述情形进行理论层面的解读,下文将试图阐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与异化概念为它来分析和理解当代学术期刊出版环境的结构和实际运作提供了一个适当的理论视角。

#### 四、以原始积累与异化的概念解析资本控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最深入地讨论并且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原始积累”这一概念。从本质上讲,“原始积累”可以被理解为分化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本源,这种分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关系下劳动的异化特征,同时决定了其社会关系中内在的对立。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的最详尽的阐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劳动异化具有四个特征,其中前两个与本文密切相关<sup>①</sup>。劳动成果与人类实际活动(劳动)分离的第一个结果是劳动者与劳动成果关系的异化。在私有制与资本-劳动关系的作用下,劳动成果与劳动者分离并变为某种异化的力量。由于工人的劳动成果属于支付其工资的资本家,工人们越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辛勤劳作,上述这种异化的力量越强大,而由工人创造的劳动成果越是与工人自身相对立。虽然上述基本论点也在于学术期刊文章的生产过程中体现,它仍需少量的理论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对生产工具的控制是基于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异化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学术期刊文章的生产过程中,出版商掌控的是传播渠道而非生产工具。虽然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家对期刊内容(后续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因素)的控制部分地代表了资本家对于生产工具的控制,但无论如何,一个十分明确的事实是,相较于传统的雇佣劳动,资本对学术期刊文章生产的控制是一种更加阴险的剥削和异化形式,因为资本家(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既不支付工资也不提

---

<sup>①</sup> 在阐释资本主义异化的第三种特征时,马克思审视了异化对于生产活动中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即生产活动本身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活动。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异化的第四种特征是从人的类存在中异化——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如何从人类中被离间出来。



供生产工具,但却敛取学术劳动成果的收益。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出发,或许在一个更本质的层面,异化不仅仅是直接生产者与其劳动产品以及生产工具之间的分离,还包含其背后内在的资本主义驱动力(谋利动机)与满足社会下人类需求之间的脱节(Burkett 1999; Mandel 1968)。

劳动异化的第二个特征表述了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与其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控制下,不仅劳动成果被化为一种凌驾于实际生产者之上的“异化物”,而且与之相应的生产活动也使得工人劳动过程成为与其自身分离的“客观存在”,这反映了工人与其自身以及自身行为的疏远。被异化的劳动不仅无法满足其创造者(工人)的物质需求,反而作为他人(资本家)的所有物而被贩卖。通过劳动过程的异化,工人与其自身活动之间的关系成为马克思所称的“自我异化”的范例:

……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成果中,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与生产过程中……因此,若劳动成果是异化的产物,则生产本身也必定是一个积极的异化过程,其对生产行为进行异化,故而可视为一种异化的行为。工人与其劳动成果的疏远仅概括异化的最终结果,即(资本主义下)劳动行为自身的异化。(Marx 1975,326)

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主导下,我们目睹了如下情况:生产条件与生产者出现了社会性分离,并服务于资本增值。正如前一章节所举的例子所展现的,上述两种异化过程根植于商业学术出版社主导的学术传播过程之中。商业学术出版社极为成功地将学术研究成果与其直接生产者分离,攫取剩余价值来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求。

因此,原始积累表现了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与阶级性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控制了必需的社会生产资料。大多致力于复兴“原始积累”概念的当代学者<sup>①</sup>将其作为解读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理论。他们倾向于认同以

---

<sup>①</sup> 据其所引理论的不同,这些学者表达原始积累现象的术语亦有所区别。例如, Glassman (2006)虽然倾向于马克思原本的表述“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其文中亦讨论了“基于强夺的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与“通过额外经济手段的积累”(accumulation by extra-economic means)。McCarthy(2004)使用了“通过额外经济手段的积累”;Bonfeld(2001,2002)与 Deangelis(2001,2007)按照马克思的原意使用术语“原始积累”;Harvey(2003,2006)则倾向于以更新后的术语“通过强夺的积累”来代替他认为过时的“原始积累”。

下三个关于原始积累基本观点。首先,原始积累应被理解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积累而言极为重要的持续性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预设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了脚跟,它将维持上述这种分离,并将之重复并扩大”(Marx 1992,874)。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点,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是资本积累的基本前提,因此其对资本原始积累和一般积累而言都是一样的。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占有更大的社会领域)受制于其自身所处的生产领域却又不受制于其自身的生产方式……这完全复制了其产生的模式”(Marx 1994,327)。与之类似,《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探讨了该议题:“一旦(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确立,生产过程只能重复这种生产关系、进行并扩大再生产”(Marx 1993,462)。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sup>①</sup>中指出的,资本积累不过是被“抬高到第二权力”的原始积累(Marx 1967,246)。在《剩余价值论》<sup>②</sup>的第三部分,马克思甚至更加明确地表述了原始积累的持续性,认为资本积累“在更大范围内复制了物质财富独立存在并与劳动相分离的情形”(Marx 1972,315)。因此,资本积累“只是一种持续在原始积累中呈现为特殊历史过程的现象”(同前,272;重点为原文所加)。至此,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讨论中包含着原始积累与扩大再生产之间一种基本的本体论联系,因此普遍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可被视为一种强化的原始积累(Bonefeld 2001,2002; De Angelis 2001,2007; Mandel 1975)。

虽然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可以从时间的角度加以区分——的确,原始积累阶段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随后资本积累阶段的历史前提——但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时间上,而是在于构成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条件与迫切性。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言,“一旦得到历史性地确立,资本便为自身的存在创造了条件(不是其产生条件,而是其存在的结果)”(Marx 1993,459)。换句话说,资本一旦产生,就必须维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并且将之扩大)。为了规范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被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其途径

---

① 《资本论》第三卷,副标题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笔记汇编而成,于1894年(即马克思去世11年后)首次出版。

② 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写作的三卷本的《剩余价值论》在其去世后由卡尔-考茨基出版。有些人认为这部著作是《资本论》的第四卷。

便是：

经济关系无声的压迫确立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虽然直接的非经济手段仍发挥作用，但这仅是在个别情况下。工人们在日常运作中受制于‘生产的自然法则’，即他们对资本的依赖。上述依赖既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同时确保了其永久性。(Marx 1992, 899)

一旦我们认识到原始积累为资本积累的扩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时间便成为一种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再生产以及扩张的长期性因素。上述资本积累过程有两个结果：(1)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剩余价值，(2)社会生产关系的倒置——即社会生产因私有制与商品形式而异化(Bonefeld 1992; De Angelis 2007)。

原始积累的第二个特征是其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对原本公有产品的私有化(这一形式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阶级关系重建具有深远影响)。如上文所述，原本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学术研究及其传播经大规模的封闭已经被转化为新的资本积累来源。

原始积累的第三个特征是其空间扩张的积极性。虽然马克思的著作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民族优越感(马克思也乐意承认这点)，但他在讨论原始积累的历史因素同时也讨论了其在全球的扩张。这种扩张使少数国家无情地从非资本主义文明的人们那里掠夺生产资料：

美洲黄金和白银的发现，伴随着对美洲原住民征服与掠夺而来的屠杀、奴役与种族灭绝，以及非洲因黑奴贸易的沦陷，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这些田园诗般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首要阶段。(Marx 1992, 915)

资本再生产的扩大化取决于新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被不断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历史上原始积累通过殖民扩张与强制推行私有产权而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扩张。如今，21世纪的原始积累已经变得更加广泛与密集，在极大的范围内影响着社会活动。事实上，原始积累驱动着资本的力量将越来越多的社会存在领域封闭化以榨取剩余价值。封

闭使得  $M-C-M'$ <sup>①</sup>及其再生产的扩大化成为可能,因为两者都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分离人与将处在竞争性市场与货币资本之外的社会财富。换句话说,封闭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最初分离提供了一个机制,而这与前文所详述的原始积累理论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De Angelis 2007; Harvey 2003, 2006)。

### 资本主义下的学术出版:资本原始积累的异化案例

正如前文所述,资本采用多种策略来利用学术界成员所共同创造的知识来为自身的积累需求服务。由于大学与研究资助机构日益强调可商业化的研究,学术界所创造的智力成果正被以惊人的频率被资本挪用以维系(而非颠覆)共有知识为资本所用这一状况。从理论上讲,高等教育机构也早已被资本的原始积累行为所侵害。在学术领域,资本已经为自身积累机制建立了一套极为有利可图的模式:挪用维持学术生产的免费劳动、同行评审与学术交流的编辑工作,然后通过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技术保护机制等手段将学术成果封闭。上述过程导致了学术工作者的逐渐孤立与异化,这剥夺了他们对自己劳动过程(学术研究)以及劳动果实(学术出版物)的掌控。虽然上述过程中或许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生产者与其基本的生产工具以及学术生产(或更精确地说是学术的传播及使用)的分离,然而学术正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学术交流与学术出版日渐被纳入充斥着产权、异化、与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市场网络,这种封闭是原始积累与生产异化在当代的实例。

二战后科技信息生产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学术期刊数量的相应增加。资本意识到快速增加的学术期刊与论文带来了资本积累的新机会,从而开始对这一产业以及学术传播的过程加以束缚。这一过程可被视作又一

---

① 传统上,资本累积以  $M-C-M'$  这一公式来表示。 $M$  代表市场中个体资本家用来购买商品的资金,商品以公式中的  $C$  来代表, $M-C$  代表了“购买”行为,即由资金到商品的转变。但是,个体资本家是为了牟利而非满足自己的特定需要而购买商品。当  $M'$  大于最初投入的资金量时,利润就产生了。为了实现这种潜在的利润,商品  $C$  必须重新放回市场上售卖。如果找到买家,并且以  $M'$  高于  $M$  的价格成交,个体资本家便能够获利。这样, $M' = M + \Delta M$ ,  $\Delta M$  代表了个体资本家售卖商品之后资金量的变化。个体资本家可能在这一点停止投资,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系统将在利益驱动下进行新的资本积累循环,从而永无止境地重复  $M'-C'-M''$  的过程。也就是说,更大价值的商品被购买( $C-M'$ ),并被重新放回市场以更高的价格售卖,这给投资者提供了新的资金以购买及售卖商品,进行一种可能的无尽累积循环。贝尔与克利弗(Bell and Cleaver 2002))全面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对于在劳动-制造过程中劳动为资本提供剩余价值的分析。

个社会存在领域被资本控制的案例,这进一步证明了前文所述观点,即原始积累是一个持续性的社会过程。资本对学术生产的侵蚀的结果是大量由学术工作者创造的社会知识被封闭起来,这生动地体现了资本是如何变本加厉地将由公共财政支付(因而属于公共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私有化的。最后,资本将学术出版纳入自己的控制以期牟利的行为也包括了上文所述的原始积累在空间扩张的积极性。虽然学术产业化在发达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但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逐渐面临资本的入侵,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学者感到在西方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迫切性。并且,上述这些例子也表明:资本原始积累与随之而来的资本对社会生产过程的控制增强正加剧马克思所描述的异化过程。这种异化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工业无产阶级与雇佣劳工外的新社会阶层也纳入资本控制范围。

然而,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最初分离是一个实际上极易受反资本的社会力量反抗的过程。这些社会力量寻求收复被资本侵占的社会领域,并将其还原为公共领域。因此,资本往往在对社会领域的封闭过程中两面受敌:资本一方面需要应对其入侵与封闭社会领域时所遭遇的抵抗,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已经被资本积累与商品化所控制的封闭社会领域不被反抗势力所解放。伴随着资本为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最初分离而进行的封闭,反抗也随之而生(De Angelis 2007)。因此,封闭以及由它所引发的反抗给资本提出了一道战略难题。资本如果想要成功地殖民新的社会存在领域或维系已被封闭的领域不被去商品化的力量所瓦解,那么它就必须克服封闭以及针对封闭的反抗所带来的一系列局限。因此,我们注意到资本同时具有内在与外在的局限性。内在方面,资本需要发现必须克服的自身限制(即封闭行为的局限性);外在方面,资本的局限正被其反对力量用来谋求解放已被封闭的领域。然而,无论上述局限如何被定义,我们需要认识到封闭行为的反对者们代表了寻求限制资本积累的反抗力量。无论是抵抗资本对社会领域的新封锁还是解放已被封锁的社会领域,统一战线往往在反抗共同的敌人中产生。“因此,围绕着封闭及其反抗力量,我们有了关于反资本话语的一个基本切入点”(De Angelis 2007, 139)。正如本文后面章节所要表述的,大量反击资本对学术出版的封闭的斗争已经展开。

## 五、开放存取:瓦解学术出版的资本控制

如上文所述,当代学术出版业中的数个趋势将学术成果的生产者(学术文章作者)与购买者(图书馆)置于不利地位。针对上述趋势,在过去的15年中一场旨在倡导与发展学术研究的开放存取模式的长期运动已经展开。例如,1999年的圣达非会议(Santa Fe Convention)催生了档案开放倡议(Open Archives Initiative),其最初的目标是发展一个辅助电子档案访问的“低门槛交互网络”<sup>①</sup>。不久之后,开放社会研究院(Open Society Institute)于2001年12月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探讨学术研究的开放存取的相关议题。这次会议及其所提出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成为开放存取运动在创立时期的一个标志事件。的确,BOAI是第一个受到国际关注的倡导开放存取的正式声明,其表述如下:

开放存取……即学术文献能够在公共互联网上免费获取,允许所有用户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拷贝、传递、打印、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入数据或其他任何合法用途。除了因互联网无法访问而产生的不可抗因素外,上述这些行为不应受任何经济的、法律的,或技术的壁垒所限制。版权在这一领域的唯一作用(或者对复制与分享的唯一限制)应是作者对其作品完整性的控制以及被恰当地致谢与引用的权利。(n. a. 2002, 第三段)

以学术研究应该能在网上被免费访问为最基本的前提,BOAI提出两种互补的策略以达到并维持上述访问权。BOAI的第一个建议是学者们应将研究成果进行自我存档。认识到许多学者可能不具备将其研究存入开放电子档案的技术能力,BOAI包括了自我存档所需的工具与教程的表述。BOAI也为开放电子档案的读者提供了相关指导。通过与档案开放倡议所确定的标准保持一致,BOAI的起草者设想所有新出现的数字档案库可以通

---

<sup>①</sup> 虽然这一直是档案开放倡议的基本任务,如今它已将工作范围扩展至开发不受内容类型以及经济机制限制的技术框架与标准。

过搜索引擎达到最佳的获取与整合效果。这将使用户减少在分散的数字档案库上查找内容所耗费的时间。BOAI 的第二个建议是学者们可以在逐渐增多的开放存取期刊(包括新创立的期刊以及那些由商业模式转为开放存取模式的期刊)来发表研究成果。由于对免费访问权的强调,BOAI 鼓励上述这些期刊以一种确保永久开放存取的方式来界定版权。并且,BOAI 提出一个将从根本上改变学术出版业的倡议,即开放存取期刊应通过取消征订或用户费的方式来避免价格因素对内容访问的限制。BOAI 建议开放存取期刊的出版者寻求与开发其他的财政来源,如政府与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对作者收取出版费用、或者其他适用于期刊所在学科及国家的机制。的确,灵活性、实验性、以及因地制宜是 BOAI 表述的要点,这些因素促进了开放存取运动的迅速发展以及可持续性。

随后几年,许多学科领域内都出现了支持开放存取的国际性声明。例如,2003 年 4 月,来自大学、医疗机构、研究基金会、图书馆、出版社的各界代表们与科学家们共同起草了《贝塞斯达开放存取出版声明》(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针对生物医学研究,该声明表达了对开放存取出版支持。同时,该声明也承诺推动对已出版文献与相关材料进行开放式电子存档(如 PubMed Central),以保证这些档案的开放存取、非限制性传播、互用性、以及长期存档。2003 年 10 月,科学与人文领域一份类似的声明《柏林宣言:科学与人文知识的开放存取》(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也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发表。

随着开放存取运动的开展,BOAI 所提出的两种模式成为学术文献开放存取化的主要机制。创作共用<sup>①</sup>的董事会成员卡罗尔(Carroll, 2011)认为,内容的完全开放存取需要如下条件:便捷的网络访问入口、免费的访问权、不受限的重复使用权、以及作者对其作品归属权的保留。根据满足上述后两种特征的程度不同,开放存取可进一步划分为“免费”与“自由”两种模式。

---

<sup>①</sup> 创作共用项目提供了包含一系列版权许可与相关工具的基础架构。这些工具为创作者提供一种简单与标准化的方式来保留其版权的同时允许他人一定程度上使用其作品,即一种“保留部分权利”的版权路径。这种方式在版权法所确立的“版权所有”的传统情境下维系了开放存取与版权保护的平衡。创作共用的最终的目标是建立、维护并扩展一个巨大的开放数据库来提供可被复制、传播、编辑、混合、以及二次创作的内容,而这一切都与版权法律不冲突(<http://creativecommons.org/about>)。

前者只是消除了学术文献的价格壁垒,而后者则多少去除了一些相关的许可限制。无论采取上述哪一种模式,学术著作都可以通过“金色”或者“绿色”的方式进行开放存取式的出版。这两种出版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出版途径以及传播方式(即文献是通过期刊还是数据库出版)的不同,而非价格或者使用者权限的差异。“金色”开放存取是指文献经同行评审后在开放存取类期刊上发表的模式,而“绿色”开放存取是指文献在某机构或某学科的开放存取数据库中存档。

根据其类型的不同,开放存取数据库可以提供预印文献<sup>①</sup>、印后文献<sup>②</sup>或两者皆可的访问权限。例如,最早的学科电子档案库之一的 ArXiv 就是由保罗·金斯柏格在 1991 年建成的一个物理学预印文献的开放存取数据库。自其创办以来,该数据库不断扩展其所覆盖的学科领域,目前已提供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量子生物学、数量经济学及统计学等领域的超过 700000 份电子文稿的开放访问。另一家电子档案库 PubMed Central 由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开发和维护,其主要保存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全文文献。2008 年 4 月 4 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要求所有受 NIH 资助的研究者需在其研究成果出版后的 12 个月之内向 PubMed Central 提供电子版全文,这极大地促进了 PubMed Central 的发展。截至 2012 年 4 月,PubMed Central 收录超过 240 万条目,包括文章、社论及信件<sup>③</sup>。除上述两个广为人知的

---

① 预印文献(pre-prints)是指那些尚未经过同行评审从而也尚未发表的文稿。

② 印后文献(post-prints)是指那些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稿。这些文稿并不总是等同于已出版的文章,因为这取决于作者是否保留有文稿的版权以及文稿的原出版社是否允许开放存取类的存档。然而越来越多的商业性出版社往往允许文献在一个出版商指定的禁锢期后进行“绿色”的开放存取存档。出版社的开放存取政策可以在 SHERPA/RoMEO 项目的如下地址查阅到:<http://www.sherpa.ac.uk/romeo/>

③ 美国国会正在讨论一项扩大对联邦资助研究的开放存取要求的法案。这项《联邦研究公共存取法案》(*Federal Research Public Access Act, FRPAA*)要求几乎所有由公共财政资助的研究实现“免费在线公共访问”。这项由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起草的法案于 2012 年 2 月 9 日在众议院及参议院提出。它将强化由 NIH 提出的开放存取要求,将出版商的最长禁锢期限由 12 个月降低至 6 个月,并将这一强化后的政策延伸至联邦政府的所有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同时,尽管这项法案允许最长 6 个月的禁锢期,其要求研究成果的开放存取需在其出版后“尽快实现”(Section 4. b. 4)。这一法案能否获得通过并写入法律目前尚不清楚。其实,这一法案的早期版本已经在 2006、2009、及 2010 年提交国会。在英国,英国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s UK, RCUK)于 2012 年 3 月发表了一项旨在修改其开放存取政策的草案。该草案要求所有受 RCUK 资助的研究论文都要在出版后的六个月内实现开放存取。由人文艺术研究委员会(the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以及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the Economics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的研究则可享受最长 12 个月的禁锢期。与上述(转下页注)



事例之外,最近(2012年4月)一次对开放存取数据库登记表<sup>①</sup>的搜索列出了2730个国际机构以及跨机构的开放存取数据库。

除了基于数据库的绿色开放存取模式的极大成功外,最近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基于开放存取模式的期刊出版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学术出版模式(Laakso et al. 2011)。事实上,截至2012年4月,开放存取数据库索引(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OpenDOAR)收录了7600份已注册的期刊。也许更重要的是,许多早期的开放存取期刊仍然保持活跃,每份期刊的年平均文章发表量在1993年到2009年间几乎翻倍。此外,与经同行评审的研究文章的总增长率相比,开放存取期刊的文章数量正以更高的速度增长。上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近些年几个频繁出版的高影响力期刊转为了开放存取模式(Laakso et al. 2011)。虽然开放存取期刊的文章数量的年增长率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有所下降,但其每年仍然有20%的增长率。Laakso等人将上述这些年称为开放存取出版的巩固之年。

同时,开放存取出版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相关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应用的极大发展。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开放期刊系统<sup>②</sup>。这个由公共知识项目<sup>③</sup>创立的期刊管理与出版系统已经成为大约5000种开放存取期刊的软件

---

(接上页注)政策相似的政策已经被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执行。RCUK是英国七大研究委员会战略合作的协商机构。这些研究委员会每年为从医学、生物学到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社会科学、经济、环境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等全面的学科领域提供约30亿英镑的研究资助。英国最大的非政府基金组织(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基金组织之一)维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要求受其资助的研究者在研究出版后的六个月内提供其文章的电子版以供在线访问。2012年4月,维康基金会声称它将开始制裁那些没有遵守这一规定的研究者。

① 作为EPrints.Org网络的一部分,开放存取数据库登记表(The Regist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由南安普顿大学主办,JISC提供资助。JISC曾经代表的是“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但是随时间发展这一组织的工作内容已发生了扩展与变化。开放存取数据库登记表的目的被表述为:“通过提供最新的有关世界范围内开放存取数据库的增长和状态的信息来促进开放存取的发展。研究的开放存取使其成果变得易于获得,从而也扩大了研究影响,使研究更加多产及有效”(n. a. 2012b)。世界上另外一个主要的开放存取数据库列表是开放存取数据库索引(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OpenDOAR)。

② 开放期刊系统(Open Journal Systems, OJS)是由公共知识项目(Public Knowledge Project)开发和维护的软件套装的一部分。该套装还包括开放会议系统(Open Conference Systems)、开放索引系统(Open Harvester Systems)、以及目前正在开发的开放出版系统(Open Monograph Press)。开放期刊系统为学术期刊出版的每一个步骤(从文献上传到最后的在线出版以及索引)都提供了技术支持。对于任何一家想要采取开放存取出版模式的期刊,OJS是一款免费获取的开源软件。截止2012年,这一系统已经发布了19次更新,并拥有19种语言版本。

③ 由加拿大联邦政府资助的公共知识项目(Public Knowledge Project)是一项的旨在扩展和改进研究访问权的尝试。参与这一项目的其他成员包括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加拿大出版研究中心、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

平台。而且,作为对前文所述的多个支持开放存取的国际声明的回应,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使用利于开放存取的授权许可。最后,更多的研究资助机构允许将开放存取费用纳入研究预算,这反映了支持开放存取的学术机构的增加。

上述这种学术机构的支持对开放存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金色”开放存取模式免去了读者的费用,这使得许多开放存取期刊提前募集生产成本以维持期刊的运营。虽然开放存取期刊可以选择多样化的财政模式,其最典型的模式仍然是向发表文章的作者收取出版费用。正如上文所述,这些费用越来越多地由作者所在的机构或研究基金会来支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作者表明无论如何无法支付出版费,许多开放存取期刊会免除这笔费用)。此外,相当数量的开放存取期刊成功获得了一些学术机构的财政支持,从而完全免除了出版费用(Laakso et al. 2011)。

开放存取出版对整个知识生态系统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英国的一项研究将另类学术出版体系的经济影响模型化后得出结论:不断扩大的开放存取出版将很有可能在可能在整体学术传播体系及更广泛的经济体系中产生显著的长期效益。该研究报告的作者认为,虽然开放存取在转型期仅产生较低的效益,但这种效益对开放存取期刊的出版(“金色”开放存取模式)与开放存取数据库的存档(“绿色”开放存取模式)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Houghton et al. 2009)。

此外,许多商业出版社也开始为其作者提供开放存取的选择。尽管这种情况有些令人不安,但它却体现了开放存取出版可持续性的不断增强。例如,施普林格实施了一项名为 Springer Open Choice 的项目。该项目允许作者在支付 3000 美元(或 2000 英镑)的开放存取出版费及相关税费后将文章在任何时候向所有人免费开放。自 2006 年以来,泰勒-弗朗西斯集团也实施了一个名为 iOpenAccess 的类似项目。该项目于 2012 年更名为 Taylor & Francis Open Select,其允许作者支付 3250 美元(或 1725 英镑/1900 欧元)以将自己的文章转为开放存取。泰勒-弗朗西斯集团还宣布将在 2012 年实施一项名为 Taylor & Francis Open 的计划,该计划将扩大一系列学科内完全开放存取期刊的数量。2011 年 2 月,维利-布莱克威尔开始实施一项名为 Wiley Open Access 的计划,该计划目前已出版五种开放存取模式的科学与医学类期刊,其每篇文章的出版费用因杂志不同而在 1850 美元与 3000 美元之间。2008 年,施普林格以 3500 万美金的价格收购了 BioMed Central,这或

许是资本意识到开放存取出版的盈利性的最令人惊醒的事例。BioMed Central 成立于 2000 年。作为一家盈利性的开放存取出版社, BioMed Central 向文章被出版的作者收取 500 美元的出版费用。在被施普林格收购后, 该出版社的出版费用涨至每篇文章 1940 美元, 几乎为原来费用的四倍(根据期刊的不同, 有些的出版费甚至超过 2500 美元)。

然而, 除了主要商业学术出版商外, 越来越多的其他资本力量也开始利用开放存取出版为资本积累服务。例如, 边沁科学出版公司(Bentham Science Publishers)声称其在科学、技术、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版超过 230 份的开放存取期刊。该盈利性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向作者收取统一的文章处理费: 研究论文 800 美元, 文献综述 900 美元, 小综述文章 600 美元, 信函 600 美元, 书评 450 美元。该公司的总部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并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市及荷兰布森市设有办事处<sup>①</sup>。边沁公司因其在招揽期刊编委会成员与征稿过程中几近于骚扰邮件的推销手法而备受质疑。一些学者批评该公司的做法无异于发送垃圾邮件, 因为其发送的邮件往往毫无目的性可言。例如, 某一学科的学者受邀在另一完全不相关的学科领域发表文章, 甚至受邀加入参加明显超出其专攻领域甚至学科领域的期刊编委会。并且, 据一些学者反应, 他们曾屡次要求该公司将自己从其推销邮件列表中删除, 但这些要求都石沉大海(Poynder 2008a)。

虽然边沁公司的上述推销丑行也许会被人们不屑一顾地视作为扩展期刊内容的非专业性作法, 该公司还涉嫌更加惊人的丑闻, 即使其盈利目的过分染指学术出版。在收到大量边沁公司的出版邀请后, 菲尔-戴维斯决定测试该公司同行评审系统的严谨性。他使用一种名为 SCIgen 的软件程序制作了一篇名为《解构访问点》的伪造论文并于 2009 年 2 月将其提交至边沁公司的期刊《开放信息科学》(The Open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TOISCIJ)。SCIgen 可以生成语法正确但上下文毫无关联的计算机科学类论文。虽然戴维斯的伪造论文的图表、参考文献等要素一应俱全, 其貌似专业的外表只需粗读便会被揭穿。例如, 该文章包含如下语句: “在这一部分, 我们讨论红黑树、真空管、课程软件的现有研究。另外, Takahashi 最近的工作为稳定模型

---

<sup>①</sup> 该公司的所有权一直秘而不宣。虽然 Richard Poynder(2008b)一再要求公开此信息, 边沁公司的编辑部主任 Matthew Honan 仅仅表明该公司“由一些个人所拥有, 其注册地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的创造提出了方法论,但并没有论述其影响。”此外,该文章作者所属的虚假机构——纽约州伊萨卡的应用颅相学研究中心(其英文首字母缩写为CRAP,即“废物”之意)——也没能够为该刊敲响警钟。颅相学是一种伪科学,其基于以下观念——头盖骨的形状可以表明特定的大脑能力与性格特点。大约4个月后,戴维斯收到了边沁公司的出版助理 Sana Mokarram 女士的一封稿件录取通知,要求他将800美元出版费邮寄至该公司在SAIF Zone(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个免税区)的邮局信箱。据戴维斯称,尽管这份邮件称文章经过了同行评审,但其真实性无法得到任何证明(Davis 2009b; Shepherd 2009)。为了公平起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戴维斯也向边沁公司的另一家期刊提交了这篇伪造论文,其编辑基于审稿人的评论拒收这篇文章(Davis 2009a)。虽然边沁公司的案例并不具有绝对的代表性,它还是提醒我们,即使在开放存取的旗号下,学术援救的传播依然会被纳入资本的运作逻辑,这可能为整个学术生态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上述事例明确地表明,开放存取模式的本身并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的确,上述出版商们的种种策略体现了资本对开放存取运动的直接回应,其妄图颠覆开放存取模式并将之自身的资本积累机制。事实上,商业出版商可以通过在线开放存取模式获得极大的利润,它使学术期刊生产过程的程的边际成本几乎降低至为零,并且减少了许多由传统纸质期刊出版所带来的成本(纸张、印刷、专利管理及分发费用等)。并且,由于研究基金与大学开始分配更多的资金来支付研究出版费用,出版商们有可能将其盈利模式由订阅费转为向作者收费,这将有利于继续他们对学术出版的控制与寻租行为。历史上,资本往往能够成功地解构阶级斗争,并将自由劳动者创造的共有成果重新挪为己用。如今,开放存取模式正逐渐被商业出版社所接受。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急需学术界的回应。也许这一回应的第一步便是区分“为资本服务的开放存取”以及“反资本主义的开放存取”。后者基于共有领域,其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建立在同行评审基础上的学术知识生产。

## 六、开放存取运动的沿革与展望

开放存取运动是反对资本对学术出版行业的控制的第一波胜利。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学术工作者(特别是已获终身教职的教授们)需要认识到自己在整个知识生态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当前资本主

义学术出版模式对该体系的禁锢。不幸的是,以同行评审为核心的学术界奉行相对保守的价值观与奖励机制,这已成为推翻当前学术出版与传播体系的主要挑战。埃尔格列柯等人的对当前学术期刊出版状况的详尽研究表明,期刊在特定领域的声望、读者数量、以及同行评审的质量仍是大多数学者决定在何处发表其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准,而期刊的出版社的所有权状况(商业出版社还是非盈利出版社)则不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Greco et al 2006)。的确,在美国与英国的最新调查研究都表明,除了对开放存取的认知程度较低的原因外,大多数学者不愿在开放存取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因为“现有的奖励机制(如终身教职评审、晋升、甚至研究拨款)更青睐传统的出版形式以及出版物”(Cullen and Chawner 2011, 462)。虽然青年学者与学生能更快地适应并掌握新技术,但当他们想要融入现有的学术体制时,上述由体制与文化惯性构成的巨大阻力将迫使他们融入现有体制,从而无法挑战或者推翻现状。

作为改变上述情况的努力的一部分,学者们需要意识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基于共有领域的开放存取有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认知度。尽管下面的观点有些显而易见,但笔者想要强调:作为学者,我们更多地是从文章的广泛传播和使用(最好是被引用)而非版税中获益。大量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表明,虽然学科之间存在差异,由开放存取期刊出版的研究将有 25% 到 250% 的引用率优势(Gargouri et al. 2010; Antelman 2004; Eysenbach 2006; Hajjem, Harnad and Gingras 2005; Norris, Oppenheim and Rowland 2008; Donovan and Watson 2011)。诚然,上述研究结果可能遭到关于作者研究数据选择具有偏向性的指责(通常来自当前期刊出版系统拥护者),但正如 Gargouri 等人的研究所证明的,由开放存取所带来的引用优势不在于引用者在引用文章选择方面的质量偏向,而在于开放存取使文献使用者不受访问权的限制,能够更容易地选择要使用和引用的资料。换句话说,开放存取的引用优势是一种质量优势而非质量偏向。并且,基于公用领域的开放存取使可访问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引用率最大化,从而增强了上述优势(Gargouri et al. 2010; 也见 Hajjem, Harnad, and Gingras 2005)。

此外,作为上述努力的另一因素(亦是对现有经验证据的回应),我们必须同样地开始要求终身教职与晋升评审委员会开发新的评估模型,以降低对引用指数(尤其是在当前大多引用衡量工具都受资本主义操控且存在诸多偏向的情况下)和在权威期刊发表的文章的过度依赖。上述两点妨碍了

大学教师,尤其是那些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研究。引用指数在学术出版业具有强大的看门人功能。由于当前许多资本的引用指数归汤姆森-路透公司所有,它们在资本控制下的学术出版业中的角色可想而知。通过对主要的引用指数施加全面的控制,商业学术出版社可以将非主要出版商出版的开放存取期刊排除在外。笔者推测上述情况对基于共有领域的开放存取期刊尤为严重。虽然汤姆森-路透声称其 Web of Science(收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以及人文领域的 12000 种国际期刊的索引)收录了开放存取期刊,但相关期刊的实际数目并没有被公开。此外,除了拥有单方面决定哪些期刊被收入索引的权力,汤姆森-路透每年还通过计算期刊影响因子对于期刊出版产生重大的影响。该公司的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方式如下:某期刊的当年影响因子=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的总被引用次数÷该期刊前两年内“可引用”论文的总数。但是,汤姆森-路透仅对其股东而非学术研究的作者和读者负责,它拒绝透露“可引用”文章的评价标准。PLOS Medicine 的编辑们在对汤姆森-路透期刊影响因子计算方法的简评中提到:“科学目前正在被非科学的、主观的、不公开的评价过程评级”(PLOS Medicine Editors 2006,0707)。除缺乏透明度外,期刊影响因子还受到一些其他的批评。例如,引用的分布情况与期刊的质量并无因果关系;同样,将计算年限定为出版后的两年也使得这种统计数值具有偏向性,尤其是不利于那些新研究所需时间较长的学科。或许更麻烦的是,上述计算方法无法恰当地理清和衡量诸如文章类型(原创研究文章、社论、书评及信件)、多著作者、自我引用及语言等因素。这一缺点使影响因子更易被操纵。例如,某一期刊可以通过发表几份高引用率的研究文章和(或)多篇综述文章的方法来提高自身影响因子,因为这些文章通常比新研究论文更多地被引用。上述这一事例或许能够解释如下这一令人沮丧但似乎愈演愈烈的做法,即某些期刊编辑“建议”潜在的作者引用该期刊的其他文章。考虑到终身教职及晋升的评定等因素,上述这些缺点便更加凸显。若以它们来代表研究质量,学术界将受到实质性的损害。由于影响因子是基于特定年份对某一期刊所有论文的引用,它并不能用来评估某一期刊的特定作者或文章(PLOS Medicine Editors 2006)。

的确,资本支配与成体系的政治、语言和地理偏见极大地影响了当前的引用指数以及其相关的期刊影响因子。他们极大地消解了将学术出版与资本影响分离的努力。幸运的是,其他衡量学术影响力标准的程序与应用正

在涌现<sup>①</sup>。虽然这些工具仍处于开发初期,其有效性、准确性、潜在价值与缺陷,以及它们与已有衡量标准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的商榷,但这些工具的开发已展现出广阔的前景。虽然索引服务极大的资本投入对小出版社形成了极高的价格门槛(更不用提及一些学术组织每年仅出版少数文章),更多的开放存取模式的学术索引,如 PubMed(包含 2100 万条生物医学文献引用)与 Citeseer<sup>x</sup> 已经面世。这些索引不仅能够帮助用户找到学术文献,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够追踪引用情况(Striphas2010)<sup>②</sup>。上述二者都已受到美国联邦基金的资助。此外一项旨在发展开源与透明的引用指数的项目(即与汤姆森-路透相反)也很有可能获得政府资助。的确,既然美英两国都有意促进学术研究的开放存取<sup>③</sup>,一个跨国的合作项目也有可能出现。考虑到上述项目的实际监管与维护,笔者认为美国国家学术图书馆协会是一个合适的备选项。此外,笔者也认为应保证上述努力的国际合作以克服现有体系中由南北差异所带来的对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的低估与忽视。总之,通过结合学术文化的转变以及技术的发展,资本对学术与期刊出版业看门人这一重要功能的掌控有望被打破。

在机构层面,大学需要推行自存档政策以使学者经常地参与这种学术传播方式,这正如开放存取运动的先驱史蒂文-哈纳德所倡导的那样。通过上述实践的最终常规化,学者与大学将能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的传播功能。美国的许多大学,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大学(MIT),以及新近的普林斯顿,已经开始全面实施上述做法并建立了相关的开放存取制度。这些制度授予了大学非专有及不可更改的版权许可,允许其在非营利的基础上发布教员的学术文章。大学在该制度下通常会建立相关数据库来进行文献的存档。但若出版社拒绝其已出版文献的开放存取式存档,任何教员通常都能够向大学申请免除上述许可要求,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求开放存取政策立即兑现。上述豁免选项以及立即兑现要求的缺失受到了开放存取运动的相关人士的批评,因其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可能损害开放存取类电子存档的发展。在使用者这方面,开放存取数据库应通过提高元数据标准与质量以及增强搜索功能的方来增强自身访问量。综上所述,由大学建立的开放存取

---

① Altmetrics. com 网站提供了许多学术影响测量工具的链接:<http://altmetrics.org/tools>.

② Google Scholar 也越来越受欢迎,但是鉴于其公司所有权,对于它的依赖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③ 见注 19。

档案应考虑采纳《档案开放倡议》的一些标准,以及其他已建数据库的成功实践。

开放存取的拥护者(尤其是试图推翻资本对学术出版的寄生性占有的人们)也需要参与到更积极的活动中来。这些提高认识的活动将有助于学术界摆脱对期刊出版现状的错误认识。最近针对爱思唯尔的抵制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项广受支持的抗议明确表明了将学术期刊出版从资本手中夺回所需要的行动类型。这一抗议起源于剑桥大学数学家蒂莫西·高尔斯在2012年1月中旬发布的博客文章。高尔斯在该文章中声明他再也不会 Elsevier 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也不会再为他们担任审稿人或编辑。截至同年4月中旬,世界各地有将近10000名研究者承诺支持对爱思唯尔的抵制。该网上抗议活动由泰勒·内伦组织,并对爱思唯尔的商业行为提出了三点关键性的抗议。首先,期刊的单独购买价格过高。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图书馆购买期刊时被迫选择出版社提供的套餐,这些套餐通常会包括超过某一图书馆所需的多余的期刊。最后,爱思唯尔支持美国的《研究工作草案》(Research Works Act)。该草案于2011年12月在美国众议院提出,其旨在叫停与禁止联邦政府关于开放存取的相关政策,即受联邦财政资助的研究者需于研究成果出版后一年内将其存档至开放存取数据库<sup>①</sup>。爱思唯尔在其网站的一封公开信中为上述立法提议的辩护更进一步表明了商业出版社肆无忌惮的狂妄:

那么我们为何支持这项立法?我们反对毫无根据并实质上是有害的政府法律,以为其有可能损害同行评审出版系统的可持续性。研究工作草案(RWA)的目的仅仅是确保美国政府不会通过法律将已出版或已收录的文章在未经出版社允许的情况下传播。我们原则上反对如下观点,即政府有权决定私营产品的传播方式,尤其是要求这些产品以免费的方式传播。并且,私营部分也不仅仅是像爱思唯尔这样的商业出版社,还包括许多非盈利性出版社以及学会出版社。”(n. a. 2012a, para. 5;重点为笔者所加。)

---

<sup>①</sup> 在《研究工作草案》被加州众议员伊萨和纽约州众议员马洛尼提交至众议院的一个月前,白宫要求其科技政策办公室就一个开放存取相关的政策征集公众意见。该政策将强制所有受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的结果向公众开放。



上述这一可笑言论完全忽略了维系同行评审系统的核心力量,即学者们无偿的劳动。同样,上述对政府强制传播私营产品的指责也忽视了如下事实,即爱思唯尔所售卖的大量内容是由学者免费的劳动所创造的<sup>①</sup>。人们也许会问爱思唯尔在盈利的同时会进行多少的所谓“私有投资”,即便在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该公司也收入32亿美元,达到了36%的利润率。

在2000年到2001年间,针对拒绝在数字档案库中收录文章的出版社所进行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大约34000位学者的支持。虽然还有多少人至今还忠于其承诺已不可得知,上述抗议活动所带来的更重要的进展是抗议发起者们创立的“公共科学图书馆”项目。公共科学图书馆最初作为数字档案库在2000年创立。该项目的创办人哈罗德·瓦慕斯、帕特里克·布朗、与迈克尔·艾森随后将其发展为“金色”开放存取模式并在2003年开始出版开放存取期刊。同年他们还创立了PLoS Biology。作为一家非盈利出版社,公共科学图书馆目前在生物医学领域发行7份经同行评审的开放存取期刊。

开放存取模式(尤其是“金色”模式)的良好发展使学术界所生产的知识能够更多地公共领域免费传播。虽然笔者非常赞同上述这些知识传播方式,但笔者也需要指出它们的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针对金色开放存取模式的免费订阅,虽然这一原则背后的考虑是可以理解并值得称赞的,但它要求期刊能够获得某些外部资金支持或者向作者收取出版费。由于外部资金很少具有长期性,对其的过度依赖往往使期刊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此外,对仅有少量(甚至完全没有)研究经费的学者来说,出版费的收取往往会成为其出版的阻碍。如前文所述,当前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大学过度强调研究的商业潜力,并常常以此为准分配大学预算及研究基金。在此情况下,笔者怀疑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领域可能正面临研究资金缺乏的困境。并且如前所述,那些商业出版社所控制的开放存取期刊的论文出版费用甚至更高。由于终身教职及晋升等方面的评审严重依赖经同行评审的研究出版物,资金不足的学术工作者可能会被迫在传统期刊上发表文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商业学术出版的现状。上述问题的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是由大学设立并资

---

<sup>①</sup> 在强大的公众压力面前,爱思唯尔于2012年2月27日放弃了其对《研究工作草案》的支持。但该公司在其声明中强调,它将继续反对一切旨在扩大开放存取政策的立法提议。同一天,《研究工作草案》的支持者宣布放弃推动该草案在众议院的通过。

助出版项目。这些项目可以由大学图书馆来管理,而学术工作者可以通过它们来支付出版费用。然而,当前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财政困境使得上述解决方案实现的希望十分渺茫,尤其是在当前图书馆还要支付高价购买由资本所控制的期刊的情况下。上述这种方案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不可行,所以其推行还可能进一步边缘化非西方的知识及学者。这导致了当前开放存取模式的第二个也是更系统性的问题,尤其对“金色”模式而言。虽然目前开放存取可以在外围挑战资本对学术出版的控制,但其在多数情况下无法撼动商业出版模式的统治地位,而且开放存取与商业出版的冲突还会给整体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增加额外的费用。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出路来更加彻底地解除资本主义对知识生态的封锁。如前文所述,学术工作者提供了维系学术知识生产的主要劳动,包括实际研究、写作、同行评审、以及编辑工作。现在是学术工作者们从资本手中夺回我们自己的生产过程与劳动果实的时候了。这将复兴共有知识,使其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资本积累。虽然上述努力的实现需要对一些保守的同行进行大量的说服工作,但笔者想要说明的是上述行动在逻辑上并非那么困难。现有的非盈利大学出版社的存在所提供的基本出版架构可以轻易地取代商业出版社。而这种取代并不需要作者的授权或者将繁杂的价格体系以及许可强加于用户。笔者认识到上述提议可能不会得到那些极力反对订阅费的开放存取倡导者的回应。然而,笔者认为这一提议有以下几点可取之处。首先,由于没有利益驱动以及臃肿的营销与法律预算,大学出版社应该能够以远低于目前水平的价格来生产和传播期刊。实际上,笔者进一步认为这种价格的巨大差异能够允许大学出版社在向图书馆收取更加合理的期刊费用,并且同时还能有一部分收入用来补贴专题出版及向作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例如为母语为非英语的作者提供文字编辑服务)。并且,由于上述解决方案符合当下文献采购的财政模式,大学或图书馆仅需做出很小的改变。诚然,上述设想需要某些国内甚至国际合作的支持。这些基于图书馆或出版社联盟的合作需要促进发展合理定价模式,以确保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学术资源平等交换。在这里,笔者认为美国国家图书馆协会应该能够起到直接与有效的表率作用。此外,随着期刊开销大幅度降低的实现,图书馆可能面临另一个挑战,即说服大学管理者将文献采购预算中的结余继续保留在图书馆系统中,以支持那些由于期刊危机而长期被忽视的领域。最后,上述提议允许学者将其研究成果在大学或主题性的

数字档案库中存档,这与“绿色”开放存取模式相匹配。由于现有许多期刊实际掌握在商业出版社手中,笔者的提议无疑需要新期刊的创办。此外,笔者想重申,学术出版改革的许多困难来自于学术界的保守及迟钝,因为正是期刊编辑和编委会的质量与声誉才使特定的期刊能够成功地吸引到高质量的学术投稿。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服大量编委会成员停止为商业出版社提供免费劳动,这些商业出版社正将其劳动高价转卖给图书馆。笔者绝不会低估学术界内部的惯性及其导致的挑战。但是,已经有一些编委会成员辞职并成功地创办与之相竞争期刊的先例(请见《期刊独立宣言》:[http://oad.simmons.edu/oadwiki/Journal\\_declarations\\_of\\_independence](http://oad.simmons.edu/oadwiki/Journal_declarations_of_independence))。最后,由于整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满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我们也许处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期,即人们将更加猛烈地批判资本的剥削行径。我们应该抓住这种不满,并使更多人(包括学术界内部及外部人士)意识到资本主义控制给知识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揭露和公开挑战这种剥削的生产关系,我们才能恢复和复原我们的劳动产品及劳动过程,使其服务于一个富有活力与可持续的公有知识体。商业出版社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现在是它们消亡的时候了。

## 七、结 论

综上所述,资本作为一种异化的社会力量而受到马克思的批判。资本将他人的劳动私有化为个人财产,致使其受制于崇尚个人利益的市场交易,从而导致社会财富的不均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对象逐渐成为一种与实际生产者相异的财产,因为劳动者生存与行动的工具越来越集中地掌握在资本手中。商业出版社通过兼并以及强制性的版权转让等策略控制了学术出版业。这代表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新形式拼命占有和封锁共有知识体,不让其中的学术成果自由的传播。“资本从一开始就试图封锁公有财产。从殖民地化到奴隶制,从工作日到家庭,从行为到深层的思维和情感,资本的历史就是不断侵入人类公有财产的历史”(Neill, Caffentzis, and Machete n. d., para. 46)。

本文中表述的资本学术出版业是原始积累和社会控制不断扩大的又一明证。尽管学术界的知识劳工相比于其他劳动者享有一些特权,但随着学术期刊出版逐渐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他们也逐渐在资本的控制

下被剥夺了对其作品、学术研究成果及其传播实践的控制权。

资本对社会劳动剥削的不断扩张也使追逐利润的动机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了当代生产的驱动力。这导致了为社会生产提供基础的社会条件由资本所控,变为了劳动者的对立面。

社会劳动发展的形式……呈现为资本发展的形式,因此基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上的生产力——以及最终科学和自然力——也呈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合作劳动中的分组、劳动分工下的劳动合作、在机器生产中使用自然与科学的力量来促进生产效率,所有这些都将是个体劳工自身化为外在的、客观的,仅仅作为独立于其自身并主导其自身的劳动工具而存在……而且,事实上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劳动商品的应用都只不过是劳动剥削、榨取剩余劳动的手段,因此也使劳动从属于资本。(Marx 1963,390—392)

在讨论本文的内容时,无论如何强调马克思对于我们当代处境的远见卓识都不为过,尤其是在当前资本在学术出版业已经(并将继续)占有维系产业发展的大量免费劳动力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学术出版的资本主义控制加速了学术生产中具有价值的部分甚至全部私有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主导下,我们目睹了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又一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相分离的例证。

然而,希望仍在。开放存取运动和模式的成功表明,不同于资本主义学术出版的变通路径是存在的。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主流的开放存取模式受制于其内在的中立经济模式,这使其易受制于资本家侵占与剥削。因此,笔者建议我们不论思想还是行动都需要更加激进与彻底,将学术出版从当前的资本主义寡头的控制中解脱。实际上,由于当下信息和知识对于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的重要性,对于学术研究封锁的抗争代表了整体颠覆资本主义的一个潜在的关键因素。正如皮里所强调的:“学术界的抗争将挑战主流的、被盲目追捧的对信息系统的理解,即不加批判地接受信息的商品化。学术界对资本控制的瓦解必须被视作对资本主义系统整体稳定性的极大挑战”(Pirie 2009,54)。综上所述,笔者希望本文能够引起更多的讨论、阐述以及最终策略的实施。这将能够把全部学术生产的产品与过程的共同所有权归还给实际生产者与使用者。

**参考文献:**

- Antelman, Kristin. 2004. Do Open-access Articles Have Greater Research Impact?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65(5):372—382.
-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Framework of Agreed Principles on Federally Funded University Research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2002. Accessed May 2, 2007. [http://www.aucc.ca/\\_pdf/english/reports/2002/frame\\_cadre\\_e.pdf](http://www.aucc.ca/_pdf/english/reports/2002/frame_cadre_e.pdf)
- Bekelman, Justin E., Yan Li, and Cary p. Gross. 2003. Scope and Impact of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Biomedical Research: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9(4):454—465.
- Bell, Peter and Harry Cleaver. 2002. Marx's Theory of Crisis as a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 *The Commoner* 5(Autumn):1—61.
- Bergman, Sherrie S. 2006. Th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Movement: Highlight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Collection Building* 25(4):108—128.
- Bergstrom, Theodore C. and Carl T. Bergstrom. 2004. Can 'Author Pays' Journals Compete with 'Reader Pays'? *Nature Web Focus*, <http://www.nature.com/nature/focus/accessdebate/22.html>
- Bok, Derek Curtis. 2003.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nefeld, Werner. 1992. Social Constitution and the For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Open Marxism*, edited by Werner Bonefeld, Richard Gunn and Kosmas Psychopedis. London, GB: Pluto Press.
- Bonefeld, Werner. 2001. The Permanence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Commodity Fetishism and Social Constitution. *The Commoner* 2(September):1—15.
- Bonefeld, Werner. 2002. History and Social Constituti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s not Primitive. *The Commoner* March 2002. Accessed December 8, 2007. <http://www.commoner.org.uk/debbonefeld01.pdf>
- Bosch, Stephen, Kittie Henderson, and Heather Klusendorf. 2011. Periodicals Price Survey 2011: Under Pressure, Times Are Changing. *Library Journal* 138(8):30—35.
- Bostrom, Dana, Caroline Bruce, and Sean Flanigan, eds. 2007. *AUTM Canadian Licensing Survey: FY2005 Survey Summary*. Northbrook, I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 Burkett, Paul. 1999.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Carroll, Michael W. 2011. Why Full Open Access Matters. *PLoS Biology* 9(11), <http://www.plosbiology.org/article/info:doi%2F10.1371%2Fjournal.pbio.1001210>

Caulfield, Timothy and Colin Feasby. 1998.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Genetics in Canada: An Overview of Policy and Legal Issues. In *Socio-ethical Issues in Human Genetics*, edited by B. M. Knoppers. Cowansville, QC: Les Éditions Yvon Blais.

Clarke, Roger. 2007. The Cost Profiles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Journal Publishing. *First Monday* 12(12),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048/1906>

Conley, John p. and Myrna Wooders. 2009. But What Have You Done for Me Lately? Commercial Publishing,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Open-Access.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39(1):71—87.

Cullen, Rowena and Brenda Chawner. 2011.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Open Access,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Conflicting Paradigms.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37(6):460—470.

Davis, Phil. 2009a. Adventures in Open Access Publishing. In *The Scholarly Kitchen*.

Davis, Phil. 2009b. Open Access Publisher Accepts Nonsense Manuscript for Dollars. In *The Scholarly Kitchen*.

De Angelis, Massimo. 2001. Marx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Continuous Character of Capital's "Enclosures". *The Commoner* 2(September):1—22.

De Angelis, Massimo. 2007.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 London: Pluto.

Donovan, James M. and Carol A. Watson. 2011. *Citation Advantage of Open Access Legal Scholarship*.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School of Law.

EBSCO. 2011a. *Five Year Journal Price Increase History (2007—2011)*. Ipswich, MA: EBSCO.

EBSCO. 2011b. *Serials Price Projections for 2012*. Ipswich, MA: EBSCO.

Etzkowitz, Henry and Andrew Webster. 1998.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The Second Academic Revolution*. In *Capitalizing Knowledge: New Intersections of Industry and Academia*, edited by Henry Etzkowitz, Andrew Webster, and Peter Heale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tzkowitz, Henry, Andrew Webster, and Peter Healey. 1998. Introduction. In *Capitalizing Knowledge: New Intersections of Industry and Academia*, edited by Henry Etzkowitz, Andrew Webster, and Peter Heale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ysenbach, Gunther. 2006. Citation Advantage of Open Access Articles. *PLoS Biol* 4

(5),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bio.0040157>

Freeland Judson, Horace. 1994.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End of Peer Revie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72:92—94.

Gargouri, Yassine, Chawki Hajjem, Vincent Larivière, Yves Gingras, Les Carr, Tim Brody, and Stevan Harnad. 2010. Self-selected or Mandated, Open Access Increases Citation Impact for Higher Quality Research. *PLoS ONE* 5(10):e13636. <http://www.plosone.org/article/info:doi/10.1371/journal.pone.0013636>

Giroux, Henry A. 2007. *The University in Chains: Confront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Glassman, Jim. 2006.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ccumulation by 'Extra-economic' Mea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0(5):608—625.

Government of Canada. 2007. *Mobiliz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anada's Advantage*. Ottawa: Government of Canada.

Greco, Albert N., Robert M. Wharton, Hooman Estelami, and Robert F. Jones. 2006. The State of Scholarly Journal Publishing: 1981—2000. *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37(3):155—214.

Hajjem, Chawki, Stevan Harnad, and Yves Gingras. 2005. Ten-year Cross-disciplinary Comparison of the Growth of Open Access and How It Increases Research Citation Impact. *IEEE Data Engineering Bulletin* 28(4):39—46.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06.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Hindmarsh, Richard, and Geoffrey Lawrence. 2004. Recoding Nature: Deciphering the Script. In *Recoding Natur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Genetic Engineering*, edited by Richard Hindmarsh and Geoffrey Lawrence.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Houghton, John, Bruce Rasmussen, Peter Sheehan, Charles Oppenheim, Anne Morris, Claire Creaser, Helen Greenwood, Mark Summers, and Adrian Gourlay. 2009.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lternative Scholarly Publishing Models: Explor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London: JISC.

Kenney, Martin. 1986. *Biotechnology: The University-Industrial Complex*.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ranich, Nancy. 2004.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A Public Policy Report*. New York, NY: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Krimsky, Sheldon. 1991. *Biotechnics & Society: The Rise of Industrial Genetics*. New York: Praeger.

Krimsky, Sheldon. 2003. *Science in the Private Interest: Has the Lure of Profits Cor-*

rupted Biomedical Research?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Laakso, Mikael, Patrik Welling, Helena Bukvova, Linus Nyman, Bo-Christer Björk, and Turid Hedlund. 2011.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Access Journal Publishing from 1993 to 2009. *PLoS ONE* 6(6): e20961.

Levidow, Les. 2002. Marketizing Higher Education: Neoliberal Strategies and Counterstrategies. *The Commoner* January(3): 1—21.

Lievrouw, Leah A. 2004. Bio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Prospects fo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In *Bio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ta-technologies of Information*, edited by Sandra Brama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Mandel, Ernest. 1968.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andel, Ernest. 1975. *Late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J. De Bres. London, GB: NLB.

Marx, Karl. 1963.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arl. 196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Edited by F. Engels. Vol. II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Original edition, 1894.

Marx, Karl. 1972.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III*. Translated by J. Cohe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rx, Karl. 1975.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1844)*. In *Early Writing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Marx, Karl. 1992.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B. Fowkes. Vol. I.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3.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M. Nicolaus.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arl. 1994.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1—63 (Conclusion)*. In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cCabe, Mark J. 2002. Journal Pricing and Mergers: A Portfolio Approac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1): 259—269.

McCartan, Patrick. 2010. Journals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 publishing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2): 237—248.

McCarthy, James. 2004. Privatizing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Trade Agreements as Neolibe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Geoforum* 35(3): 327—341.

McGuigan, Glenn S., and Robert D. Russell. 2008. The Business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 Strategic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its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Electronic Journal of Academic and Special Librarianship* 9(3), [http://southernlibrarianship.icaap.org/content/v09n03/mcguigan\\_g01.html](http://southernlibrarianship.icaap.org/content/v09n03/mcguigan_g01.html)



Merrett, Christopher. 2006. The Expropri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ing. *Critical Arts: A South-North Journal of Cultural & Media Studies* 20(1):96—111.

Mills, C. Wright 1951.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rgan Stanley. 2002. *Scientific Publishing: Knowledge is Power*. London: Morgan Stanley Equity Research Europe.

Mulland, Asher. 2008. UK to Train 2,000 New PhDs; Multidisciplinary Centres with Business Ties to Produce Physicists and Engineers. *Nature News*, <http://www.nature.com/news/2008/081205/full/news.2008.1279.html>

Munroe, Mary H. 2007. *The Academic Publishing Industry: A Story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http://www.ulib.niu.edu/publishers>

n. a. 2011.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2002 [cited 12 November 2011]. Available from <http://www.soros.org/openaccess/read>

n. a. 2012. A Message to the Research Community; Elsevier, Access, and the Research Works Act. Elsevier 2012a [cited 6 February 2012]. Available from [http://www.elsevier.com/wps/find/intro.cws\\_home/elsevierstatement](http://www.elsevier.com/wps/find/intro.cws_home/elsevierstatement)

n. a. 2012. Regist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2012b [cited 15 February 2012]. Available from <http://roar.eprints.org>

Neill, Monty, George Caffentzis, and Johnny Machete. 2007. *Toward the New Commons: Work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the Zapatistas* n. d. [cited 28 August 2007]. Available from <http://galmuri.co.kr/published/zap/mngcjm.html>

Newfield, Christopher. 2008. *Unmaking the Public University: The Forty-Year Assault on the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orris, Michael, Charles Oppenheim, and Fytton Rowland. 2008. The Citation Advantage of Open-Access Articles.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9(12):1963—1972.

Olssen, Mark and Michael Peters. 2005. Neoliberalism,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From the Free Market to Knowledge Capitalism.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3):313—345.

Peekhaus, Wilhelm. 2010.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Reports from the Field.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30(6):415—429.

Pirie, Iain.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cademic Publish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7(3):31—60.

PLoS Medicine Editors. 2006. The Impact Factor Game. *PLoS Medicine* 3(6), <http://>

www.plosmedicine.org/article/info:doi/10.1371/journal.pmed.0030291

Poynder, Richard. 2008a. The Open Access Interviews; Matthew Honan. In *Open and Shut?*

Poynder, Richard. 2008b. The Open Access Interviews; Richard Poynder Talks to Matthew Honan, editorial director, Ben-tham Science Publishers.

Shepherd, Jessica. 2009. Editor Quits After Journal Accepts Bogus Science Article. *The Guardian* June 18, <http://www.guardian.co.uk/education/2009/jun/18/science-editor-resigns-hoax-article>

Sigurdson, Jon. 1993. Global Companies as Generators and Controllers of Knowledge: The New Challeng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New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The Third World as a Crossroads*, edited by Claes Brundenius and Bo Göransson. London, GB: Taylor Graham.

Slaughter, Sheila and Gary Rhoades. 2004.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 Markets,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triphas, Ted. 2010. Acknowledged Goods;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7(1):3—25.

Ware, Mark and Michael Mabe. 2009. *The STM Report: An Overview of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Journal Publishing*. Oxfor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Medical Publishers.

Washburn, Jennifer. 2005. *University, Inc. : 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Whiteley, Robert, Luis L. M. Aguiar, and Tina Marten. 2008. The Neoliberal Transnational University: The Case of UBC Okanagan. *Capital & Class* 96(Autumn):115—142.

Yoxen, Edward. 1981. Life as a Productive Force; Capitalis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olecular Biology.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Labour Process: Marxist Studies*, edited by Les Levidow and Bob Young.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塞巴斯蒂安·塞维吉纳尼(Sebastian Sevignani)<sup>①</sup>

## 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与替代性社交网站 Diaspora<sup>②</sup>

藤依舒(译),李继东(校)

[导读]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替代性社交网站 Diaspora<sup>③</sup>, 聚焦在隐私权问题上,以期有助于在资本主义语境下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首先,Diaspora 是自由软件运动<sup>④</sup>和开放版权(著作权)运动(Copyleft move-

---

① 萨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Salzburg)媒介与传播、哲学、神学博士研究生,他在2009年获得了传播学硕士学位。2007年至2010年他作为一名学者在萨尔茨堡大学传播系传媒经济学研究小组进修。他开始他的博士论文写作工作,其主题关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隐私权问题,尤其是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塞巴斯蒂安是信息一统论研究小组(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Research Group)的成员,同时他参与了欧盟科技行动“生活于监控社会”中“公共政策与管制监控”的项目研究(COST Action IS0807)。他是《全球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期刊的编辑之一。sebastian.sevignani@uti.at

② 本文由奥地利科学基金会(FWF)项目“监控社会中的社交网站”(http://www.sns3.uti.at)资助,项目编号:P 22445—G17,项目协调:福克斯教授(Prof. Christian Fuchs)。

③ 关于开源社交网站 Diaspora: Diaspora,源于希腊语,意为分散的种子。在本文中,Diaspora 是一个由一群纽约大学的学生在2010年创建的开源性社交网站,该网站的创立的目的是为了对抗 Facebook 之类的社交网站:开源、去中心化、尊重用户隐私,资金来自社交融资网站 Kickstarter 用户的捐赠。Diaspora 在原理上是一个分布式网络,“在这里所有离散的电脑相互之间将直接连接。它能让人们在保留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互相连接”。Diaspora 代表了大众资助的力量,以及人们对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兴趣。见 <http://diasporaproject.org> 或 <https://www.joindiaspora.com> ——译者注

④ Free software(自由软件运动):该运动发起于1983年,自由软件运动的发起者认为,一个软件是“自由”的必须意味着软件对于用户的基本自由的尊重,例如用户在使用运行这个软件的过程中能够进行学习和修改,并拥有发布软件的原版或者重新发布修改版的权力。开发者认为“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之所以说它们重要,不仅仅因为它们可以讨好哪个用户,更是由于它们维系着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具体说来,就是分享与协作的精神。随着我们的生活与文化日渐数字化,这样的自由精神也随之越来越可贵。在一个充斥着数字化音像与文字的世界中,自由软件日益重要,它本身已经成为关系着我们基本自由的因素之一。”关于自由软件运动的说明,见 <http://www.gnu.org/philosophy/open-source-misses-the-point.zh-cn.html> ——译者注

ment)<sup>①</sup>的组成部分,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切入分析该网站的生产方式。其次,本文将介绍个体控制、排斥、所有权等与隐私权相关的主导理论。再次,本文将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置于批判政治经济学语境来考量,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概念理论、马克思对社会生产领域和社会流通领域的区分,以及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来探讨这一问题。再者,考虑到资本主义语境下的隐私问题,本文将评估 Diaspora 作为社交网站的替代性潜力。最后,简要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对隐私问题的探讨。

**[关键词]** 社交网站, 隐私权, 私有财产, 监控, 马克思, 意识形态, 拜物教, 互联网批判研究, 替代性媒体

2010年,纽约大学的4位青年学生聆听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律教授、自由软件运动的拥护者——莫格林教授(Moglen 2010)<sup>②</sup>一场名为“云中的自由:软件自由、隐私、Web 2.0的安全性和云计算”的讲座。莫格林作为《网络共产党宣言》的作者(Moglen 2003),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著书指出互联网时代中免费信息和多民族资本之间的矛盾。在演讲中,莫格林提出基于监控的他治这个问题,即用户面临大型垄断公司的网络控制。例如 Facebook(脸书)和 Microsoft(微软)等互联网公司主宰着用户的选择,当用户面对一份可疑又可能被操纵隐私的交易条款,“我给你提供免费的虚拟主机和个人主页装饰物,而你将被无条件实时监控”,用户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接受或者离开”(Moglen 2010)。莫格林对这种现状发出挑战并强调,这种被主宰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已经成为现实。他指出,当前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摆脱这些强权控制网络的可能性,并向在场的听众呼吁:

---

① Copyleft(开放版权)是一个由自由软件运动所发展的概念,是一种利用现有著作权体制来挑战该体制的授权方式。Copyleft(开放版权)是将一个程序成为自由软件的通用方法,同时也使得这个程序的修改和扩充版本成为自由软件。提出并使用 Copyleft 观念的是 GNU 计划,具体的发布条款包含在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宽通用公共许可证和 GNU 自由文档许可证里。版权(Copyright)的概念是为了限制他人任意使用创作物的自由。Copyleft(开放版权)则是为了保护这种自由而定义的概念。Copyleft(开放版权)作品是有版权的;但它们加入了法律上的分发条款,保障任何人都拥有对该作品及其衍生品的使用、修改和重新发布的权力,前提是这些发布条款不能被改变。见 <http://www.gnu.org/copyleft>——译者注

② 伊本·莫格林(Eben Moglen)(1959年7月1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及法律史教授、自由软件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及义务首席法律顾问、软件自由法律中心创办人及主席。详情参见:<http://emoglen.law.columbia.edu>——译者注

我们是技术人员,我们必须扭转这种现象……你知道每一天都会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消失而我们无法再次获得。每一天都会有更多的数据推论出现,我们却无能为力。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继续为已经拥有了巨量数据资本的人积累更多的数据。(Moglen 2010)

这4位学生受到了莫格林演讲的启发,着手开发另一种社交网站——Diaspora。Diaspora很快就因其是Facebook的潜在敌手而出名。幸福感来临,一方面,Diaspora很快在筹款上大获成功,即在互联网平台上获得了20万美金的项目运行费用。另一方面,Facebook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全球第二大访问量的网站,不仅要面对许多隐私权问题,而且用户的不满也持续高涨。现今,Diaspora已经向更广的公众拓展,而且能够确保获得进一步的资金并逐步完善组织架构。当然该软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仍在不断地进取中——至少在未来仍会保持着其为了可持续信息社会而斗争的角色。

首先,本文认为,Diaspora是自由软件运动(Free software)和开放版权(公共版权)运动(Copyleft movement)的组成部分,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切入分析该网站的生产方式。其次,本文将介绍个体控制、排斥、所有权等与隐私权相关的主导理论。再次,本文将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置于批判政治经济学语境来考量,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概念理论、马克思对社会生产领域和社会流通领域的区分,以及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来探讨这一问题。再者,考虑到资本主义语境下的隐私问题,本文将评估Diaspora作为社交网站的替代性潜力。最后,简要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对隐私问题的探讨。

## 一、替代性社交网站 Diaspora

除了早期发展阶段,Diaspora网站的功能和界面与其他知名的商业社交网站相似。而在隐私问题上,比如,与其他社交网站相关的隐私权上(Raynes-Goldie 2010),Diaspora则允许用户按照自己社交网络活动,赋予不同群体用户各种准入机会。Diaspora之所以有别于现存的其他社交网站,不仅是因为其对用户隐私精心的安排或者是采用募捐获得资金而非广告,更为重要的是其基础架构和生产方式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为用户提供了重要的差异性选择。在描述这个替代性社交网站时,需要从两个层面上加

以区分。一是代码层面,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 Diaspora 的程序是如何被生产,以何种手段开发相似的社交网站以及嵌入何种社交关系中。二是用户层面,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 Diaspora 网站的使用价值,例如,满足用户隐私需求的能力。我们在 Diaspora 网站中将会发现用户层和代码层有着重要的交互方式。

Diaspora 是一种分散式社交网站,即,网站不会集中存储和管理上载的用户数据。与 Facebook 和 Google+ 将用户数据存储存储在庞大的服务器中不同,Diaspora 是由无限的交互服务器组成,这样服务器具有区域分散性而不是被控制在某一个组织的手中。理论上讲,任何用户都可以运行这样一个“豆荚”。因此,Diaspora 项目的核心目标应理解为寻求赋权用户能够更容易地运行个性化、自我控制的服务器。例如“自由盒计划”(Freedom Box)<sup>①</sup>的核心目标“旨在通过用户智能手机与无线路由器的结合来创建私人服务器网络,以保护用户日常生活中的隐私……目前基础硬件和软件架构都已经具备(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正确的方法将社交工具、分散式服务器、智能路由器打包整合在‘盒子’中,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从中获取隐私权的自由(Freedom Box Foundation n. d.)”。然而事实上,服务器数量是有上限的<sup>②</sup>,因此,社交网络尚未广泛分布。尽管如此,Diaspora 背后的原则仍指向这样一个方向:“开启一个社区豆荚,然后将你所有社交数据移到你自己掌控的这个豆荚中,而 Diaspora 的分散式设计也正是意味着你将永不牺牲对自我数据的控制权(Diaspora \* n. d. a)”。这种架构的影响是“很快将变成一个公司所利用的用户种子的数据被公开化,用户离开,公司死亡(至少在这个层次上)。所以 Diaspora 可以促使“你即产品”转变为“软件即产品”(Diaspora \* 2012)。

乔普拉和德克斯特(Chopra and Dexter 2006)曾指出在信息经济中追求利润的传统资本策略是:资本正在关闭源代码,这意味着将其他人排除在这种代码的私有财产权之外。在这种模式中,“‘生产资料’仍然归软件的开发公司所有,因为工人无法修改代码”(Chopra and Dexter 2006, 8)。然而,由于这种生产资料的特殊属性,诸如软件代码等信息商品的生产,将会与资本利益之间产生潜在矛盾,原因如下:

---

① 自由盒(Freedom Box),见 <http://freedomboxfoundation.org> ——译者注

② 见:<http://podupti.me>

- 信息的生产与扩散是网络化的,
- 由于信息的易近性和所有权问题,信息难以被掌控,
- 由于信息是无形的,它很容易被复制和多重占有,这将导致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侵犯(Fuchs 2009,76f.; 同样可参考 Benkler 2006,60)。

马克思认为,“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Marx 1849/2006,28)。Diaspora 的生产和发展是基于一种被称为“对等生产”(Peer-production)的生产方式模式(Benkler 2006,Bauwens 2005),这是一种依赖于汇聚在一起生产和共享成果的个体自组社区产制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劳动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是为了共享而非用于交换。对等生产方式生产的物品和服务不再是商品,因为“只有产品与劳动相互独立”才会变成商品(Marx 1867/1976,57)。

就劳动力和生产方式而言,马克思进一步主张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Marx 1859/1909,12)。

Diaspora 软件使得用户建立自己的豆荚成为访问网站的必要步骤,这一设计来自于自由软件基金会于 2007 年 11 月 19 日所发布的一份自由开源软件授权条款通用公共许可证(GNU's Affero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G-PL))<sup>①</sup>,在 AGPL 许可条款中遵循了“开放版权”的原则。开放版权运动声称代码必须免费,其工作方式应当是:

我让我的代码在免费软件中可供使用,而不是被用在专利软件中,在免费软件中可供使用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其他人编写更多的免费软件。我必须指出的是,因为私有软件开发者使用版权阻止我们分享,我们的合作伙伴之间可以利用版权规定给予彼此自己所有的有利条件,即:他们可以使用我们的代码。(Stallman 2010,129)

开放版权运动利用现有的财产制度去颠覆与使用财产所有权去避免专有软件代码霸权行为(de Laat 2005,Wolf,Miller and Grodzinsky 2009)。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的特殊生产方式,同时也是马克思所指出

---

<sup>①</sup> AGPL3.0 授权条款全文,见 <http://www.gnu.org/licenses/agpl-3.0.html> ——译者注

生产力与财产之间的矛盾体现。这是为了适应软件代码开放和软件免费以及再次在“开放版权”原则之下给予许可的自我保护方法。这显然与为逐利而排他的资本策略背道而驰,“开放版权运动”将资本的逻辑阻隔在有限的领域内,因为“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Marx 1867/1976,874)。

就 Diaspora 和其他免费软件而言,贡献者们拥有将程序现实化的条件,从而确保劳动和劳动的实现不能被撕裂和相互疏远。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领域,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区别正在变得模糊(Toffler 1980,Bruns 2008)。因此,用户可以利用可供使用的免费软件,运行自己的豆荚或从信任度低的豆荚迁移到更值得信赖的豆荚,从而使得用户在社交网站中具有了生产性和贡献性。以 Diaspora 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代码层面的质量会影响到用户,进而赋予用户更多控制权。

上文所引用著名的、引起争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宣称: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物也就或多或少地迅速地发生大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性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Marx 1859/1909,11f.)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从这段话引发出的评论。马克思说,生产关系总和与不同的生活领域中社会意识和观念相一致。他从一个非常高的抽象层次来得出这一论断,对他而言,这篇文章是一个纲领性原则,或者说是调查研究的“主导性威胁”(Marx 1859/1909,11)。显然 Diaspora 的生产模式也许会成为一种替代性社会(alternative society)的萌芽形式(Fuchs 2009,77),但这并不能不代表当代社会的整体生产关系。而且,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一个潜在的不同步关系,这两者约束条件都指明了意识形态结构分析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商业 SNS 网站与隐私权相抵触,并引起了公众强烈抗议,这包括对著名的社交类网站 Facebook 的投诉。例如,来自于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的



投诉,由奥地利的学生投诉至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Europe versus Facebook 2011),或是由北欧的数据检验机构进行的调查(Datatilsynet 2011),这些投诉和调查令以保护隐私为策略的 Diaspora 快速获得成功。Diaspora 自称是“保护隐私、赋权个体、开放源码的社会化网站”(Diaspora \* 2010)。Diaspora 对自己定位的理解使得它区别于其他社交类网站,例如 Facebook 和 Google+,并突出强调 Diaspora 如何在网络架构上使得它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社交类网站。

为了能够评估隐私问题对可替代性网站项目的作用,本文需要说明的是隐私的一般性内涵(第2部分),以及它是如何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第3部分)。

## 二、主导隐私理论:个人控制、排斥性、所有权

有关现代隐私的讨论源起于沃伦(Samuel D. Warren)和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在1890发表的文章。文章的创作动机是因为沃伦女儿的婚礼被新闻侵权。在这篇文章中,隐私被定义为“不被干涉的权利”(Warren 和 Brandeis 1890/1984,76)。“不被干涉的权利”与消极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相同的(Rössler2001,20f.),因此也决定了大部分有关隐私的后续理论研究都基于自由主义传统。与隐私相关的过多价值,如自由、自治的价值、个人幸福感等等,主要源于这种思维。服务于这些价值,在今天信息隐私最常用的定义是在信息流控制或接近信息方面。威斯汀(Alan F. Westin)认为,“隐私是个人、团体或机构的要求,以确定自己何时、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把他们的信息传达给其他人”(Westin 1967,7)。威斯汀着重于信息控制,这使他成为“控制理论”的一个典型支持者(Tavani2008,142f)。另一方面,隐私“接近理论”(Tavani2008,141f)。例如嘉文森(Gavinson)把隐私和我们对于自己与他人的相处程度的关心联系起来,即:他人对我们的了解程度,他人和我们的肢体接触程度,以及他人对我们的关注程度。即:了解度、相处度和关注度。(Gavinson 1980/1984,347)。如果我们把这两种主要隐私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这就可以说隐私权是对个人信息接近的控制(Moor 1997;Tavani 2008)。一些作者挑战“隐私控制”定义的不确定性(例如 Wacks 2010,40f.; Solove 2008,25),他们认为这些理论未能明确隐私权的内容。事实上,控制理论只涉及隐私的“自由选择”(Wacks 2010,41),而不是界定哪一个确定的内容被视为私人的。在这里,隐私主观地视为私人;因此,这样的

理论培养的是个体对专属数据的排他权力,而不愿意、也不主张谈论一个良好社会和快乐生活中的隐私(Jaggar1983,174)。理解这一理论有不同的切入点,这些理论可以表示一种境界的隐私,即不以任何方式出售个人选择(Fuchs 2011b,223)。例如,这些隐私主导理论承认的包括个人、团体、家庭或金融问题,如银行保密制度,具有天赋的隐私性。从接近理论来看,隐私是客观、私人的,因此,这些理论能召唤约束个人的数据控制方面的某些价值观。有一点对于理解“接近理论”很重要:它让我们去思考在一个良好社会中,隐私应当是什么,但隐私本身并不是必需品。事实上隐私接近理论常置于自由主义传统之中并且对个体控制的压力等社会问题的认识有限。

隐私和财产的相似之处在文献中经常被提到(Lyon 1994,186;Laudon 1996,93;Brenkert 1979,126;Habermas 1991,74;Goldring 1984,308f.;Lessig 2002,250;Hettinger 1989,45;Geuss 2001,103;Sofsky 2007,95f.;Solove 2008,26—28;Moore 2008,420;Kang 1998;Litman 2000;Westin 1967,324—325;Varian 1997;Samuelson 2000),但批判性的分析却鲜见(除了Fuchs 2011b)。

作为一个泛指的概念,财产可以用来表示人类的生活及其特征,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关系,无论其存在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Pedersen 2010c)。麦克弗森(Macpherson)提出了三种财产形式:私有财产、公有财产和共有财产。他指出,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具有相似的结构,因为这两种对于物的社会关系都具有排他性(Macpherson 1978,5)。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市场社会化的出现,麦克弗森对财产概念的三种转变做了进一步说明(Macpherson 1978,9f)。正如我们即将论及的,这些变化包括与其相关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的转化:基于排他性关系的私有财产被作为一种财产;生活消费中的财产被定义,诸如谋生手段的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的资产被定义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即,劳动力财产。麦克弗森进一步指出,这些转变不是随意的,而是应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之需(Macpherson 1978,9)。如今,私有财产通常涉及使用权、滥用、转让或交换权,以及有权接受使用的东西所产生的成果这四个方面(Munzer 2005,858)。私有财产或许一直受到国家或社会的制约(Christman 1996),然而“它可以被称为一项在两方面具有的绝对权利:出售转让的权力和使用权,以及一种无条件的权力,即所有者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表现”(Macpherson1978,10)。

隐私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与私有财产之间的排斥关系,我将在现象学的

层面上指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在之后的论述中,我将用更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这一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隐私被定义为个人反他人与社会的权利(保证消极自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共同的”的背后存在着隐私话语。在互联网时代,“正如个体担心的是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控制了隐私,拥有开发权的所有者也想控制谁可以何时访问种内容”(Lessig 2002,250)。

因此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讨论,一方面讨论如何了解、证明和批判无形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去分析、欢迎和哀恸线上虚拟世界中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模糊(关于 SNS: boyd 2007)。通过人们所归属的阶级地位也可以发现隐私和私有财产之间的相似性(Goldring 1984,313; Papacharissi 2010),而这必须搞清楚一个重要的区别,即一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是其生活所必需的,还是远超出其生活必需。一个富有的私人业主,会拥有比他所能使用的大得多的住房空间。另一方面,那些拥有少的可怜的财产的私有财产所有者,只能依靠福利,他们拥有的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在隐私问题上,比如说那些与他人共享一套居室的人,要想暂时有些私人空间,就会遇到一些限制,或者他们会被迫向当局报告私人生活(Gilliom 2001)。不过,仍有一些人拥有较多的隐私。例如,面临有意的隐私入侵,生活在城堡里的人总会被保护得很好,这种保护将他们与噪音和其他事物隔离开来。这些人可以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代替应有的税收和投资顾问,设法避开向国家主管部门报告其财务状况。与其他私有财产一样,隐私状况的好与坏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息息相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依赖于自己所拥有的私有财产来获得物质和文化上的满足。对于有权有钱者,私有财产可以确保他们有权利拥有生产资料并使其为他们的目标服务。而对于穷人而言,私有财产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私有财产,他们才可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以保障人不敷出的生活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和人都要拥有隐私,从而获得在社会上的竞争力来确保竞争的实现,与此同时又保留一部分可以逃避竞争的空间(Geuss 2001,88)。富裕和权势阶层对隐私权的要求,不仅是个性化的,更是出于对确保他们隐藏财富起源的需要(例如银行保密制度)。穷人对隐私权的呼吁,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生活被过度暴露以及避免自我隐私被富有人群滥用(Demirovic,2004)。

不必惊讶,我们所知的理论来自将个人隐私控制理论与隐私权被概念

化为私有财产权两者紧密关联的结果(Laudon 1996, 93; Lessig 2002; Kang 1998; Varian 1997)。财产,根据先前所概述的定义总被人理解为私有财产。隐私作为一种财产需要个体加强对个体数据的掌控(Laudon 1996, 93; 97),并且防止未经个人同意而被访问并且个人数据遭到侵犯的隐私事件发生(Laudon 1996, 99)。“隐私即财产”这种立意要求“在某些商业目的之下,每个人所拥有的自我信息都具有价值。每个人都享有关于他或她自己声誉和图像的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名字所有具有的隐私价值是平等的,即便是穷人也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目前的隐私保护制度下,不应仅是富裕人群可以保护自己的信息”(Laudon 1996, 102)。必须承认的是,莱斯格(Lessig)指出与意识中的其他政治影响相比,在隐私作为一种权利的语境下,“议论财产……将会强化隐私背后的煽动力”(Lessig 2002, 247)。如果隐私是财产,那么就可以将未经同意使用个人数据视为一种盗窃行为。

### 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作为意识形态和私有财产的隐私

在这部分中我将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主流隐私概念,主要运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商品崇拜,以及他对于社会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划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作为一种伞状理论包含了他对拜物教的分析以及流通概念。

首先,我必须澄清的是我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是什么。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含义。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中性词汇,表示一种世界观或某种观念体系。它可以正面地作为一个阶级斗争的概念,并使之成为阶级斗争信念中的标志。它可以负面地运用将一些观念视为消极或教条主义,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启示”这一术语,用来指出那些目前尚未出现或未知的客观现实。

#### (一)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

马克思从未将他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进行提纲挈领的阐述;相反,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有着对意识形态的多重理解。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Rehman 2007; Koivisto 和 Pietilä 1996; Žižek 1995; Eagleton 1991)。我认为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致力于深化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并

以此启发其中的批判意识(Rehmann 2007, 215),而且我想说明的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包含着互为作用的三个维度:社会学、认识论和政治维度,这三种维度均见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认为包含着人类交往这一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问题,引发了如同政治主控结构(structure of political domination)一样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sup>①</sup>。

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经常与马克思理论以及它本身的教化趣味联系在一起。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在写给梅林(Franz Mehring)的信中说到:

意识形态是被所谓的思想家们有意识完成的一个过程,事实上,它包含着一种虚假意识。(Engels 1893)

很显然在认识论方面,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相互关联。然而,人们却常常忘记了马克思理论将真理问题与人类实践密切关联。在《费尔巴哈论纲》(*Theses on Feuerbach*)中马克思将这一问题表述得非常清晰: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Marx 1845—46/1998, 569)

如果这一观点不仅要解释世界还改变了世界的话,马克思在同样的手稿中做出了解释(Marx 1845—46/1998, 571),使这一观点逐渐变得清晰,即“只有在社会不复存在的前提下意识形态才会终结”。

对于社会而言,这需要通过不断变化的实践,而仅仅通过对“真理”的替代性思考来实现的。马克思将关于人类交往与实践的社会学层面的真理问题与认识论的问题相互连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脑与手之间的劳动分工调查了意识形态的形式,他们将思想家引入到社会角色之中。思想家的角色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因此可以想象一个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的“虚假”思想(Marx and Engels 1845—46/1998, 67f.)。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了意识形态在认识论层

---

<sup>①</sup> 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虚假意识作为马克思理论的概念之一,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和个人主义对无产阶级及其他阶级的误导。——译者注

面与政治定义的罕见融合(1991, 79 f),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在阶级社会和政治统治之下使劳动分工处于何种位置。他们认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845—46/1998, 67)

马克思在此谈论到社会关系并再次指出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层面,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声称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概念源于人类交往,并引发了虚假意识和政治统治结构的问题。

## (二) 思想作为隐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构成及其客观形式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假定没有断裂而更愿意认识到其中的连续性,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他最伟大的著作《资本论》,以阐明前面论述过的意识形态等范畴。同时,因聚焦于经济领域,该书被认为窄化了研究范畴。从意识形态而言,可以发现关于这一概念不断地窄化阐明。在《资本论》中,我会勾勒并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来论述隐私权——这种以特殊形式的社会交往作为商品交换并引发了虚假理论和政治统治问题。虚假认识论坚持自然化的人为关系,在此政治统治依靠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得以维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到“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

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Marx 1867/1976,169)。这些思想形式往往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在社会中占据着相同的位置。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和人类活动,如教育、媒介、生态环境、人类生物学和个性,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知识、内容、资源、(基因)编码和个人化数据成为可交换的商品。批判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认为商品交换原则决定整个社会发展(Adorno 2002, 31f.; 43; 112)甚至人类的宿命(Adorno 1972,209)。马克思认为这一特定的资本主义思想方式影响着“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资本主义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Marx 1867/1976,680)。与此同时,需要注意这些思想形式不应该被过度普世化,这里有必要强调马克思认为这些思想形式与人们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角色相关。当商品化在更多的活动领域内起着关键作用时,我们就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市场行为主体。马克思声明的第二个局限在于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对这些思想形式的分析就获知关于意识形态的一切内容。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曾建议,要理解马克思把资本作为社会影响基础性结构来分析,而且要分析其与意识形态具体实践的相互作用(Haug 1987)。我会尽量标明客观思想形式与意识形态的隐私理论两者间的交集。不必质疑隐私和财产理论建立的基础前提,因为它们源于市场行为主体的常识性行为。这种思想形式影响到了隐私和财产理论,但与之相反地理论也是真理:隐私和财产的理论有助于维护这种思想方式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本主义交往形式。下文将探讨这种思想的客观形式是什么,以及如何与隐私和财产相关联。

### (三) 马克思的拜物教论断:解读思想的客观形式

拜物教用来表示倒置主体与客体之间、人与人为的东西或关系。豪格(Haug)看来,对拜物教的研究意味着检验人造物对人的实践力。马克思从分析商品拜物教开始,提出了许多资本的拜物教问题。马克思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财富表现为一种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Marx 1867/1976,125),因此“只有产品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与劳动相对立”交换才会得以实现(Marx 1867/1976,57)。商品交换促成了特定历史时期分工的发展。显然我不必再提及不同的公司生产必需品,而获取这些

产品的唯一方式是变现。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都是市场行为主体。马克思质疑为何大量的差异化物品之间发生了交换,比如鞋子、电子游戏产品、个人数据等等,这所有的一切只有一个可能:是什么让物品之间产生了可比性和可交换性?他在分析具体的社会性私有权问题和独立生产过程中找到了答案,然而却表现为一种完全的非社会化(结论),因为没有生产商之间的协议去计划在多少生产者之间生产多少产品。

马克思指明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并把这种区别作为理解商品生产所包含的社会性的关键(Marx 1867/1976,131—137)。任何劳动不管是单独劳动还是协作劳动,生产因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具有价值的使用价值。这种劳动可以被称为“具体”劳动,因为它们直接满足需求。然而,当物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被交换,那么它们就同时具有了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从何而来?交换价值一定是某种劳动,马克思将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定义为“抽象劳动”。正如马克思定义的概念所说,抽象劳动生产的价值是无形的,而且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起源于一个抽象过程:当两个商品被交换时,交换价值的差就体现在两个商品之间,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形成了价值增长。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这种比较发生的情况类似于我们将水果中的苹果和草莓来做比较,水果这一概念作为苹果和草莓比较的中介角色而存在。水果是与苹果和草莓对应的一个抽象概念。相反苹果和草莓可以食用体现出了它们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而水果这一类别概念本身却不具有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源于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这种抽象概念是异于常规的属性。这并不是头脑中的一个抽象概念,相反这个抽象的概念存在于市场中买方与卖方的行为之中。与头脑中常规的抽象概念相比,物品交换发生即有了可以被定义为“真实中的抽象”的过程发生。孤立无援和私有化的劳工在交换的过程中发生了“可比较的变化”,换句话说生产着价值创造,这是唯一的可能社会标准声称这一切本就包含在交换过程当中。否则,没有比较就不会有交换发生的可能。这些标准可以在劳动总量中发现,通常是生产某些产品所需要花费的时间。(Marx 1867/1976,129f.)。平均劳动量依赖于生产过程中可以选择技术和机器的水平。例如,生产A公司需要45分钟的时间能够生产一把雨伞,同时B公司引进了新的技术因此生产同样的一把雨伞仅仅需要15分钟。那么这两家公司在进行产品交换时他们所认同的生产雨伞的必要劳动时间是30分钟。因为他们没有比较,公司并不知道他们所制造出来的雨伞在被交换



之前在价值交换中所占的位置。当交换没有发生时价值就不会得以凸显,而且价值无法事先预测(Marx 1867/1976,166)。只有当花费在公司内的劳动量与整个社会劳动量发生比较时,劳动才具有价值。当他们在市场上出售雨伞时,公司 A 和公司 B 估算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价值(30 分钟的必要劳动时间)。他们对雨伞所有具有交换价值达成协议。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Marx 1867/1976,167),很明显他们的雨伞具有了作为财产的价值属性而不是被用作建构一个社会结构中的抽象过程(Marx 1867/1976,187)。事实上,劳动创造价值而交换是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决定再生产的因素正是他所谓的“幽灵般”价值(Marx 1867/1976,128)。他说:“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Marx 1867/1976,164f.)。价值创造的社会维度有效地“隐藏”在产品交换背后,但却声称自己得到了人民的支持(Marx 1867/1976,135),因为交换价值必须让参与交换的市场行为主体感兴趣。当他们开始生产商品并卖入市场,他们就思考着如何拥有和售卖交换价值。因此,他们调整行为以确保符合交换价值的需要(Marx 1867/1976,167)。

商品拜物教意味着价值是被物化的客观存在,打破了常规范围向更高级形式的拜物教发展——货币拜物教。当价值表现为财产时,就可以设想一种特定商品的价值客体:货币。通过货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互为彼此,货币的使用价值也发生了交换。价值的这种相对独立的转移规律这时候会变得物化,与此同时价值所有具有的社会属性“隐藏”得更深。拜物教是完美的,而且实际上由于资本关系的进一步确立,拜物教发展趋于完善。最终,它变为货币投资以获得更多金钱(资本拜物教)。之后,我将回归到资本关系中进行如下讨论。

#### (四) 隐私及相互承认的隐私财产所有者

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前提下,思想的特定形式决定着特定的实践方式。在私有财产的普遍权力方面,马克思认为市场行为主体必须“认识到彼此都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源自于合约的这种法律关系,或多或少的发展成为发达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或者反映了两者意愿之间的经济关

系”(Marx 1867/1976,178)。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详细论述了这一点,相互承认的私有产权业主认为,自由和平等意味着“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流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生产和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产物,只不过是更高权力的基础而已”(Marx 1857—58/1983,170)。

在商品交换中自由得以实现,正如同“A 感到自己需要 B 所拥有的商品,他不以武力占有,与之相反,而是他们认识彼此互为东主,人的意志渗透到他们所有的商品中。人的概念被植入到法人当中,自由也是一样,如同之前商品和人的占有关系一样。没有人能够借助武力获得他们的财产。每个人都拥有剥离自我与自我财产的自由”(Marx 1857—58/1983,169)。平等已被赋予,当“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生产之间存在差别就会引发交换行为,同时他们在交换中的社会地位是对等的;因此,这种自然差别是他们在交换行为中社会平等的前提,而且也是他们相互具有生产性关系的前提”(Marx 1857—58/1983,168)。

作为相互承认的私有财产所有者,仅仅是从形式上推断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社会地位并不会影响到这种平等关系。同样,自由在这里似乎作为一种形式。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在《隐私权:一种宣言》(*In Privacy: A Manifesto*)一书中将它描述为:

平等和自由是私人与私人之间交流的基础,贸易伙伴承认彼此平等,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将他者作为一个对象来接受。销售合同不会建立在不平等的地位或财产之上,而是一个自愿同行合作关系。我们不应该太多奢望让社会成为抵御社区压力的盾牌,而是应当将其视为这两者间设置的防护距离。(Sofsky 2008,85f.)

除了自由和平等之外,第三个方面源自于是商品交换,即自我利益:“A 为 B 的需要提供了服务,这意味着商品只有在目前为止,因为 B 的服务需求被满足,那么 A 才实现了和 B 之间的商品化,反之亦然。对他者的每一个服务都是为了满足他者本身,每一个个体都为他者所用,同样地,作为他的手段[……]即双方的共同利益表现为一个整体的行为动机,并作为一个被确认的事实存在;但是,如同这样,利益不是动机却获得收益,如同它的过去一

样,在这些自我反射的特殊利益的背后,在每一个与他人利益相冲突的个体利益的背后”(Marx 1857—58/1983,169f.)。

总之,马克思关于必然交织的两个社会领域的划分(Marx 1885/1992,131f.,139,190),也有助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一个领域是物品生产以及生产过程中必须花费的劳动;另一个领域是诸如市场等人们生产的物品在人与人之间的流通,平等、自由和自我利益则出现在这个领域。

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Marx 1867/1976,280)

通过采用马克思的理论,到目前为止我已发现占主导地位的隐私权概念及其属性——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独揽的控制机制、私有财产的可交换性——而这些都来源于商品交换。但商品交换遮蔽了人类的社会性,价值以财产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因此,重要的是拥有物才能意识到自身价值,但是社会性呈现于人们的背后,并建构一种不为个体所控制的压力,而且自视为竞争者。

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 1962)梳理了从霍布斯(Hobbes)到洛克(Locke)等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和政治学家概述思想的客观形式的巨大影响,并贴上“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标签。占有性个人主义是指一种思维和社会行为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是有益和必要的,因为个人感觉自己或自己本质上是“自己和自己所有财产的所有者,除此之外他在社会中一无所有”(Macpherson,1962,263)也是体现“与其他个体的自我利益的关系”(Macpherson 1962,263)。这一价值观与私有制相关,并且来源于思想的客观形式。诚然,这种隐私观念招致了很多批评(Habermas 1991,

74; Lyon 1994, 186, 196; Etzioni 1999, 194), 但对于这些批评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记住隐私问题源于占有性个人主义但不是专制的; 更进一步来看, 它也是源于物质资料、资本主义的做法。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新的隐私理论, 这些理论不是来自于自由个人主义理论的观点(例如: Solove 2008, 91—98); 然而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捆绑着隐私理论的观点, 我们不能背离社会实践去简单地定义隐私。

### (五) 政治方面: 隐私与阶级统治

思想被定义为一种人类交往的特殊形式并唤起一种虚假意识和建立政治统治结构。我已经表明, 意识形态在商品交换的交往形式中是虚假的, 而且因此使得隐私具有片面性和个人主义色彩。但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维度会如何呢? 我坚持寻找答案, 解决为什么意识形态以及隐私的意识形态观念常常暗含着阶级统治, 并且因此而成为问题, 马克思用他的资本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必须着重强调的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是逻辑统一的, 这是因为商品交换与剥削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同时发生, 这意味着商品交换及其思想的客观形势必然与资本主义相互交织, 也就是说, 我们无法将它们分离, 这也意味着占据主导地位的隐私观念必然维系着政治统治。

马克思将资本描述为自行运作的价值(Marx 1867/1976, 257), 简言之就是 M-C-M 的循环形式: 这一过程中, 货币(M)被投入到特定商品(C)的生产, 若成功地售卖的话, 商品可以换回更多的货币(M)。为什么投资有利可图? 马克思给出了以下答案, 自我运作的价值来源于被商品化的劳动力, 劳动力作为一种确定的商品可以生产出高于它所付出的再生产成本的价值。例如食品和养育后代的机会, 再如空闲时间和睡眠等等, 都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这些成本与工人所产生的盈余之间的差异, 被劳动力买家所侵占。在这种方式下, 资本家可以稳定地获得由工人社会化生产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因此, 资本家与工人相比, 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 因此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划分成为必然。

为何这样的侵占方式是合法的? 是等效原则使这种侵占方式合法化, “互易”、“我给你可能你会给的”、没有人会欺骗其他人, 保持利益的完好无损, 因此私有财产的所有者间的相互承认就不会受到影响。相反, 公平的商品交换——由此而来的隐私的意识形态观念——是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社会

的先决条件。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正如第二部分所讨论的,阶级社会影响了隐私问题。

马克思认为,除了商品交换之外,劳动表现为私有的和孤立存在的,资本主义需要“在工人与生产资料之间完全的分离以便他们劳动的实现”(Marx 1867/1976,874)。在资本主义的史前阶段,就发生了通过暴力手段征收人口的时期,即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Marx 1867/1976, part eight)。自此工人获得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具有模棱两可的特征,这就产生了双重自由观(Marx 1867/1976,270—272)。换句话说,工人获得了个体的自由,譬如他们摆脱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对自我劳动实现的自由所有权。工人一方面可以自由达成合同,而这种自由正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另一方面,工人被迫依照合同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收支平衡,这种自由看似是一种忽略了社会阶级地位的自由选择,但同时它始终存在于商品交换的规则之内。因此,工人被迫维持自己作为贱民阶层的地位,因为资本家依靠工人劳动的创造才得以获得稳定的社会盈余(Marx 1867/1976,729f.),这种光明正大的剥削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个社会实现统治的结构性原因。

阶级社会根据社会中资本家的数量去表达权力,这表现为他们有权力榨干他人的劳动并且拥有通过劳动实现而获得私有财产的权利。这些权利确定了一般意义和意识形态观念里的私有财产权利(Macpherson 1978)。当今这些为了类型不同、各式各样的私有财产的集权的法律框架与商品交换以及社会中剩余产品的生产密不可分,而且因为后者的存在使得前者的实现成为可能(Römer 1978,140)。私有财产的普遍权利,使用、滥用、转让或交换,并有权收取使用的东西所生产的成果,生命所需物品并不要紧,或者是劳动可以被认为是现实中私有财产的境况,或者将劳动力划入私有财产的范畴之中(Munzer 2005,858)。

在隐私问题上,戴克(Niels van Dijk 2010,64)指出欧洲和美国之间在立法方面的有趣差异,在美国,将个人数据作为一种商品可以被用交换(即隐私作为财产),在欧洲“个人数据财产化的空间微小”(van Dijk 2010,64),因为隐私问题被概念化为重要的个人权利和个人尊严(McGeeveran 2009; Shepherd 2012),而人类的尊严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转让的。在针对隐私是否可以被剥夺、可以被用来交换、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了解在资本主义商品化过程中,不被异化或交换权利的先决条件的关键所在。

劳动者不必成为奴隶,也不能将他或者她整个人异化,因为这将颠覆劳动者的双重自由(Pateman 2002,33),相比较以前的社会形态,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意味着统治,渗透在个体自由中的统治依然存在。麦克弗森(Macpherson)认为劳动力的让与性使它本身存在的一个共性前提(1962,264; 同样参见 Pateman 2002),不可剥夺的自我所有权起源并于商品交换的实践之中受到其牵制,马克思已经指出流通领域是以自由、平等、财产和自身利益这些权利为基础(Marx 1867/1976,280)。关于隐私权问题,我认为隐私权是一项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就隐私而言,我的结论是,隐私应当被视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也许有利于隐私权的保护,但是仍然不足以最终替代资本主义的内化统治,如果他们认把自主和隐私的概念定义为自我的私人所有物。

帕特曼(Carole Pateman)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配给的双重自由不过是一种“政治幻想”(Pateman and Mills 2007,17f.),这是因为处于雇佣合同关系的个体不可剥夺的那部分自由与可剥夺的那部分是无法分离的。当雇主购买了劳动力时,要求工人具备知识、技能等,实际上也包括他或她的人身。劳动力无法将其人身存在与个体发展(person-being and person-becoming)分离(Marx 1976,283),隐私与个人数据亦是如此。那种认为用户交换其个人数据而且这种交换不会影响其自身的假设,就是一种谎言,这也只不过是说明了隐私市场的自由和自愿交换的意义,而不得不概念化为不可剥夺而已。帕特曼认为,合同虽然是自愿的,但也形成了优先与从属关系。因此,当用户接受了商业 SNS 的使用条款时,就将自己置于从属关系的风险之中,这种从属关系为最终成为剥削和阶级统治的先决条件。埃勒曼(Ellerman)将这种谎言称其为“人一物错位”(person-thing mismatch)(Ellerman 2005,463),似乎人格等方面像物品一样可以转让。在我看来,关于个体与劳动力或个体与个人数据具有可分割性的政治幻想,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与拜物教。

鉴于隐私可以,虽然不应该被看作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私有财产也理应如此(Andrew 1985,529; Pateman 2002,20—21; Litman 2000,1295—1297)。隐私越接近于私有财产,将会有更多的隐私被让渡或交换的,成为一个商品。这不仅发展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且直接形成了剥削。在表 1 中,我对如何从马克思理论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信息化)社会的隐私问题做了总结。

表 1 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商品的意识形态隐私和隐私权

意识形态 社会流通领域	隐私作为自我所有权/隐私作为不可剥夺的权力	
	平等与自由的私有财产所有者	
	劳动力商品	作为私有财产的隐私/作为商品的隐私
社会生产领域	典型剥削	新型剥削
生产过剩与社会盈余以及阶级统治		

主流隐私理论,侧重于关注个体控制和排他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商品交换同时隐藏了个体的社会性。这来自于流通领域部分思想的客观形式,其中包含着作为自由和平等的私有财产占有者之间的相互承认。然而,这样的自由、平等和所讨论的隐私问题,与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剥削和社会阶层分化并不矛盾。在这个循环运行中,阶级地位再次制约到自由、平等和隐私权的实现。如果隐私可以被看作是用于交换私有财产,隐私本身就成为了劳动力之外的另一种商品,也正因为成为剥削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一问题直接指向社会中的阶级划分。这种基于经济监管的新的剥削形式,我将会在接下来的部分对 Diaspora \* 与诸如 Facebook 和 Google+ 等盈利性社交网站进行对比来讨论这一问题。

#### 四、评估 Diaspora 网站的替代潜能

隐私问题一直是 Diaspora 自我形象的核心,因此,评估 Diaspora 网站的可替代性潜力不仅应当包括其网站生产模式,还应该将隐私问题作为评估的关键,我将结合这两个方面展开以下论述。

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论述了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用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社交类网站(Fuchs 2012,143—146)。Facebook 和其他社交类网站的资本积累战略是采取有针对性的商业广告模式,这就意味着他们拼命地想从广告产业中获得交换合同。商业性社交网站的所有者购买技术设备,例如托管服务器和软件系统,以及劳动力、会计师、软件开发者等等,同时创造出社交网站以供用户交互使用。而用户基于千差万别的理由使用网站,例如获取新闻、提供信息、与朋友联系、形成新的社交关系或者是举办活动,由此他们生产了大量的数据,然后网站将这些通过对用户浏览行为分析而

获得的诸如人口统计信息和消费喜好等数据,出售给广告商。传统的广告是定向推广到广阔的潜在买家群体之中,而目标广告能够精确地界定和区分不同团体,甚至是单个消费者。这就需要更加准确、直接分析和区分不同背景的用户在购买行为上的需求,这一切正是社交网站可以提供的信息。这些社交网站的商业模式就是基于对用户交互行为的二次利用以实现商品化和增值目的(Smythe 1989; Fuchs 2011a)。正如同 Facebook 所承认的那样(Wong 2010),正是这个经济原因商业性社交网站才会大规模发展用户监控系统并存储“所有的一切”。用户的隐私利益只有在用户利益不会影响到社交网站的利益时,才会被考虑。事实上,商业性社交网站已将用户的隐私商品化,当他们隐藏了网络社交价值背后商业利润目的,他们经常未经用户的明确同意就这样做。今天,由于隐私运动所引发的公众压力,越来越多的社交网站不得不通过法律调查来尊重用户隐私,而且出现了像 Diaspora 这样的替代性网站,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类社交网站会放弃他们精准广告模式。商业和广告资助的社交网站,通过让用户自愿同意使用条款的手段,达到需要控制用户的数据并将用户的隐私用于交换的目的。对他们而言,为了维护新的剥削形式,来自于隐私保护的反抗之声根本不算什么挑战;相反,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可以支持隐私权——如同一个对劳动力的比喻——与私有财产相关,因此实现转让或交换。看来,简单的维护隐私并不是挑战信息监控的正确做法(Nock 1993,1; Lyon 2005,27; Stalder 2002)。

Diaspora 打破了将隐私作为商品为基础的广告模式,因此,它保护其用户并避免了用户的个人信息被剥削:

我们的分布式设计意味着没有大公司能够控制 Diaspora, Diaspora 也绝不会把你的社交生活卖给广告商,你不用屈服于某些人制定的霸王条款或者在你说话之前先看看是否被人监视。(Diaspora 2011c; 原始文件中强调)

加里·T·马克思(Gary T. Marx)提醒我们“隐私为了谁、监控为了谁、谁为了什么原因在任何评价中都是需要详细说明的”(Marx 2012, vii)。由于其广泛分布的基础设施和资金不是基于广告的模式,人们可以断言 Diaspora 几乎提供了另一种隐私概念(Fuchs 2012, 153f.)。Diaspora 意识到“隐私作为被统治阶级和受剥削阶级的共同权力需要被保护,以避免企业统治是为



了资本积累、管教工人和消费者,以及为了增加资本主义生产和广告的生产效率,而收集关于工人和消费者的信息”。(Fuchs 2011b,232)

我同意 Diaspora 网站实际上避免了隐私的商品化和网站对用户的利用,从先前的分析中,我还是看到了针对无意识形态概念的替代性隐私概念的限制。不仅因为隐私被当作是一个商品问题,而是因为作为自我所有权概念化的隐私是具有意识形态性德,同时无法与资本主义剥削分开。实际上,尽管 Diaspora 直接反对针对用户隐私权的新剥削形式,它所有的隐私的来源都与剥削的一般情况绑定在一起,正如它证实了剥削的意识形态前提——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占有欲,我将证实这一断言。

在 Diaspora 对网站的各种描述中,最突出的自我声明是:它“是一个你可以控制自己信息的社交网站。你决定你想分享的内容和与谁分享,你有权完整保留所有信息的全部所有权,包括朋友名单、留言、照片和个人档案的所有细节”(Diaspora \* n. d. b; 我强调)。在这里,有两方面的因素互相交织着: Diaspora 针对隐私的特殊定义(“让你控制着自己的信息”)和用户对私有财产可控的承诺(“你拥有自己所有信息的全部所有权”)。

主流隐私理论强调个体对访问个人信息的控制,这种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意识当中,并实践于市场行为主体这一角色当中。Diaspora 的隐私声明中对商业社交网站对隐私人侵行为,最受具有隐私意识的用户关注。隐私理论强调个人控制的一方面效果是,他们规避了个人控制和决策的客观约束,这不关乎公共品。另一个正在建构的隐私替代社交网站, The-GlobalSquare,也与“占领”运动有关(Roos 2011),同样也涉及到了隐私话语问题。该网站更大量地宣称什么是隐私与什么不是隐私:“个体拥有的隐私权,是与所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一部分……影响公众的组织 and 行动并没有保护到任何类似的权利”(Marsh 2012)。在这里个体控制也没有被视为例外,同时这一例子也证明了 Diaspora 可以实现关于隐私价值的另一种实践。就目前我所看到的, Diaspora 并没有提出任何隐私条件来约束独特的个体控制,因此他们所倡导的隐私观念可能适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隐私理论。Diaspora 动员着人们的权力和隐私的力量以此来对抗经济监控,这些他们从不曾认为在社会当中所拥有的权力。可以说, Diaspora 成功地挑战了威胁隐私权的经济基础,但并没有挑战到隐私是一种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观点。

相反, Diaspora 宣称的隐私重点总伴随着强调与所有权的相关性,所有权或私有财产的观念支持社会个体对于隐私和个人主义的观点。在这里,

再一次,Diaspora 反抗了商业社交网站。比如,Facebook 在其使用条款中一直声称,用户授予了 Facebook 一种“非排他性、可转让、默认许可的、免责的,在全世界范围内用户任何 IP、在 Facebook 上所发布的任何信息内容”(Facebook 2011)。而在 Diaspora 网站中,这种被强迫默许的授权不可能发生。然而在同一页,Facebook 仍然声称“你拥有所有你在 Facebook 上的内容和信息,你可以通过设置您的隐私和应用程序或共享设置来控制这些信息”(Facebook 2011)。从所有权的观点出发,现在是否已经有了可以替代资本主义 SNSs 的合适社交网站? 我认为没有,并对上文所述把隐私商品化(例如 Facebook 的许可)和隐私作为所有权的组成部分(Diaspora 的理念)之间的关系持怀疑态度。Diaspora 对隐私保护的愿景是:如第一部分所述,个人有机会去改变豆类(数据库)或社交网站使用的供应商。用户需要拥有对个人数据的所有权,以便于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数据在不同的豆类之间转移:“因为你的信息是你的,不是我们的,你拥有最终的权力——决定并能够将您的个人资料和所有的社会数据在不同的数据存储系统内转移,而不是将你的个人数据牺牲在社交网站的页面之中”(Diaspora 2011c;强调处为原文所有)。假设 Diaspora 不能够提供超越了 Facebook 或者其他类型网站所提供给用户的在网站特征和使用上固有看法,那么,用户可以自愿决定在 Facebook 或 Google+ 出售自己的隐私,他们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隐私有着绝对控制权和所有权。的确,Diaspora 在不断普及宣传关于隐私商品交换的契约,而主流隐私理论的观念却无法提供用户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的理由。

在这一点上,Diaspora 是革新的,这有助于呼唤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中关于“主导性威胁”(Leading threat)的研究。马克思指出了人们开始有了意识冲突和对抗,以及这种转变与社会经济基础和或多或少发生结构转变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因为它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可能由于 Diaspora 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多面性而成产生。

这种资本积累方式与开放版权(copyleft)相关。一方面,开放版权的产品可以被免费使用以便用于非版权生产。例如,大机器生产雨伞的经营运作方式可以被用于免费的开放版权软件生产,雨伞生产商不必为软件付费,尽管软件对于生产者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是有贡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用劳动密集型方式生产出的开放版权产品将会被取代,雨伞生产商避免

支付机器的软件实用费用。另一方面,开放版权产品(copyleft products)对于用户具有吸引力,因为其廉价和使用广泛而便捷,而且具有庞大的协作劳动体创造出的高质量。开放版权的产品往往可以更灵活地适应特定目的的生产,这种方式可以直接应用于资本积累,商业公司可以提供与开放版权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一家雨伞生产商为生产设备,向另外一家公司支付与设备相关的版权开放组件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不是直接作用于资本积累的开放版权产品的生产,而是将劳动用在了采集和提供服务上。我认为,开放版权产品实际上是反资本积累的。然而同时,它又遵循了新的剥削形式,这种形式隐蔽更深——雨伞生产商不需要为版权产品支付任何支出,但这些产品又能使得生产商实现销售雨伞后剩余价值的实现。

但此处论述的最大问题在于开放版权并没有成为生产的主导原则;相反,它被理解为在部分领域中的一种经济基础的转型方式,资本积累行为寄生于开放版权的生产。Diaspora的生产模式属于非物质资料的信息领域,在这一领域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方面,福克斯(Fuchs 2009,79)认为存在三种观点。新自由主义妄想回到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财产权和排斥原则的生产模式中。社会民主党看到了自由软件运动和Diaspora举措中的优势,但他们却旨在建立一种二元经济。佩德森(Pedersen)将其称为“信息卓越主义”(information exceptionalism)。该理论的支持者否认无形生产领域中的信息财产所有权,只要这一切不要发生在有形生产领域:“市场对人类有利,只要这一切行为友好地发生在网络空间之中”(Pedersen 2010b,105)。正因为他们是所有资本利益的独立群体,所以该理论支持者才会站在两个不同的思维出发点去解释这一问题。当公司因为强制执行知识产权而获得利润时,会出现新的合作方式,例如谷歌,它不是通过执行知识产权获得利润,而是最终依靠有形环境中的隐私权获利。

福克斯(Fuchs 2009,79)的第三个观点指向了资本主义,并且他看到了无形生产领域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新的生产模式——但仍旧基于有形生产领域。与此同时,由于这一生产模式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依赖(Barbrook 1998/2005)这种观点经常强调“对等生产”的脆弱性。从Diaspora的生产模式来看,索特伯格(Söderberg)如下的论述是适用的。索特伯格认为“自由编程是参与维持外部市场关系的先决条件。黑客通常从不同的渠道获得财政支持——父母资助、作为学生的生活补助金、社会失业福利,甚至电脑公司的员工,他们的存在与信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物质

材料过剩相关”(Söderberg 2002)。然而,Diaspora 的捐赠资金体系仍然镶嵌于资本结构当中,货币捐赠的价值客体产生于资本结构本身。资本家的捐赠可能是出于理想主义,但这些捐赠的金钱仍然来自于劳动者的工资。从 Diaspora 创始人接受记者的采访可以发现,该网站在未来是否会去获利,在不同项目团队之间存在不同含义(Nussbaum 2010)。Diaspora 的软件贡献者不可能没有任何收入,或者依赖于捐赠项目的有限资金存活(Diaspora\* 2011a),这一问题是所有替代性媒介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因此,《纽约》杂志在对 Diaspora 的一篇报道文章中这样写道(Nussbaum 2010)“团队不得不游说于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风投资本家,尽管到目前为止,网站仍旧坚守独立性”。

有趣的是,Diaspora 网站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土壤之中,它提供了一个暂缓版权开放许可的途经同时又允许资本积累更加直接的发生。除了使用版权开放许可(通用公众授权条款/ GNU Affero General Public License),这一条款可以使网站吸纳免费软件,并确保甚至拓展替代性的网站生产方式,Diaspora 同样采用不同许可证的兼容策略(如麻省理工/ X11 条款/MIT/x11 license)<sup>①</sup>。两个许可之间的差异是,后者不是“病毒”或自我保护,这意味着网站允许“Diaspora™ Software 软件的一般组成部分都被授权使用(例如解析器的标准格式、图书馆实施的标准协议等)”,这些并不被著作权运动保护(Diaspora\* 2011b)。实际上,软件代码不能直接用于专利生产和谋利,虽然间接而言这些行为是可行的(Fitzgerald 2006, de Laat 2005)。

对于 Diaspora 的预先评估显示,这一项目及其替代性生产模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信息时代的资本战略所利用,并敞开了它的大门(Chopra 和 Dexter 2006)。

Diaspora 网站践行了一种保护用户、避免其隐私被商品化的替代性隐私观念,但是同时它并没有将占有性个人主义的隐私观念作为替代目标。正因为如此,这与 Diaspora 镶嵌于在社会和人们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结构当中,有意或无意的多面性并不矛盾。然而,为了强化 Diaspora 和其他非商业性社交网络的替代性作用,应当反思这个隐私问题及其个人资本主

---

<sup>①</sup> MIT 许可协议(The MIT License)是许多软件授权条款中,被广泛使用的其中一种。与其他常见的软件许可协议(如 GPL、LGPL、BSD)相比,MIT 是相对宽松的软件许可协议。此许可协议并非属 copyleft 的自由软件许可证条款,允许在自由及开放源代码软件或非自由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所使用。

义成为时代主流的年代,同时并非简单地进入到关于替代性社交网站的话语范畴。

## 五、结 论

Diaspora 网站挑战了商品化生产,由此,它也向社交网站领域内的资本积累发出了挑战。根据意识形态理论,该网站提供了替代性和协作性的生产模式,提供了关于隐私观念的另一种思考。由于目前的隐私主导理论与商品交换密切相关,我认为隐私权的替代性观念需要基于替代性的物质实践。对替代性隐私观念的思考不是要抛弃与之相关的中肯的有价值的隐私权利,尽管诸如私有财产和排他原则的个人主义观念占据主流,这仍旧是表达了在任何其他社会形式中都无法否定的个体基本的人性需求。就我所知而言,我无法在此提供一个马克思关于隐私问题的正面理论。首先马克思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的负面批判,同时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废除抑制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理论传统中,福克斯(Fuchs 2011B)和艾莱梅(Allmer 2011)为社会主义概念的隐私提供了一些批判言论。我试图全神贯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隐私作为私有财产的负面批判,下面将论述常被提到后两者之间的关联。

进一步讲,关于隐私的另一种想象至少必须包含反对社会不平等关系的观念,而且对替代性隐私价值理论具有建设性,同时又基于一个“个性化的社会概念”(Pateman 1989,136)。这是一个能反映出个体和社会以及不同路径之间的替代性关系的重要理论任务,其中也有着严肃的对个人主义隐私观念的批判(例如:Solove 2008,91—98; Cohen 2012)。不幸的是,这些方法路径无法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统治结构的深刻批判理论相适应。在拜物教分析中,马克思沿着商品交换而引发出来的假设认为,作为个体的她或者他在社会中一无所有的話,又就无法脱离社会。社会在个体的背后维持着自我的主张,并决定着个体的行为,而接受并自觉地塑造自我的社会性将是更好的选择。作为个体谈及隐私,并宣称排除他人,从一开始就反对社会是毫无意义的。隐私保护仅仅成为一种“社会化许可”(Etzioni 1999,196),如何最好地满足个人隐私的需求关乎一系列共同事务,如家庭、孤独、沉默、反思、休闲、自由的表达和决策、个人存在与亲密关系、信任和尊重、保密和保护或避免被伤害。隐私的纯主观控制理论应当被抛弃,而是需要综合的

民主结构,以促使个体更为有效地在实际中与他人共同塑造隐私许可。而且,隐私这时不是我的财产,我不能将其用于交换和变更,继而我可以宣称仅仅作为社会一员,来共同实现了个人价值。将隐私理解为自我所有物的一个方面时将不说明任何问题,而且应该将其被概念化为一个不可剥夺的集体权利。

作为一种与意识交往的隐私的客观观念是有价值的,Diaspora 实践性地发展了这一点:它基于保护社交网站用户隐私而挑战经济管控的理念。因此,也就抵制了如同 Facebook 和 Google+ 所做的——剥削用户和数据商品化的观念。Diaspora 的拥护者们自觉地与彼此间成为同盟,不是以商品交换为中介,而是代表着一种开放版权的实践行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重新赋予了隐私一个客观的概念。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只要社会存在体系性的剥削和阶级统治,个性、自由、自主和隐私就不会存在。作为这一理论的切入点更容易被接受的是——隐私的社会化概念,Diaspora 很难达到这一目标,Diaspora 反剥削的事件已经实现了关于这一概念的某种结果。Diaspora 提供了面临隐私商品化和用户剥削的另一种选择,但是该网站在隐私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不是中立的,它预先认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观点和 Diaspora 代替商业性社交网站的目标之间存在矛盾。Diaspora 把隐私问题完全归于所有权和个体控制,是因为这正是最有力的实现资本主义的行动手段。我引入的例如“信息卓越主义”等观点,是无形资本生产方式中最受欢迎的转变形式,但它们并没有对常规资本积累形成挑战。在隐私保护方面坚持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承诺,有可能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内在化的改造,这不会真正取代资本主义反而可能促使资本主义整个系统的重生。

对马克思主义的隐私理论和例如 Diaspora 这样的替代性社交网站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私有财产和隐私问题这两者剥离(Goldring 1984, 321f.),并且隐私不再作为商品出现,同时它也不再为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假设做出贡献,而在 Diaspora 网站、著作权运动和类似性质的项目已经发现了这些思想的物质基础。

### 参考文献:

Adorno, Theodor W. 1972. Society. In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 edited by Robert Boyers. New York: Schocken.

Adorno, Theodor W. 1976.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edited by Theodor W. Adorno, Hans Albert, Ralf Dahrendorf, Jürgen Habermas, Harald Pilot, and Karl R. Popper, 105—122. London: Heinemann.

Adorno, Theodor W. 2002.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mer, Thomas. 2011. A Cri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Privacy Studi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thics in Society* 9(2):83—101.

Andrew, Edward. 1985. Inalienable Right, Alienable Property and Freedom of Choice: Locke, Nozick and Marx on the Alienability of Labour.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3):529—550.

Barbrook, Richard. 1998. The Hi-Tech Gift Economy. *First Monday* Special Issue 3. <http://www.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517/1432>

Bauwens, Michel.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er Production. In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37:33—44.

Benkler, Yochai.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oyd, danah. 2007. Social Network Sites: Public, Private, or What? *Knowledge Tree* 13. <http://www.danah.org/papers/KnowledgeTree.pdf>

Brenkert, George G. 1979. Freedom and Private Property in Marx. I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8(2):122—147.

Bruns, Axel. 2008.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cers*. New York: Peter Lang.

Chopra, Samir and Scott Dexter.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www.sci.brooklyn.cuny.edu/~sdexter/Pubs/chopra-dexter-TC05-paper.doc>

Christman, John. 1994. *The Myth of Property: Toward an Egalitarian Theory of Owner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hen, Julie E. 2012. *Configuring the Networked Self: Law, Code, and the Play of Everyday Pract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tasilnet. 2011. Questions to Facebook from the Nordic DPA's.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www.datatilsynet.no/upload/Dokumenter/utredninger%20av%20Datatilsynet/Letter%20with%20questions%20to%20Facebook%20from%20nordic%20countries%20endellig.pdf>

- Demirović, Alex. 2004. Hegemony and the Paradox of Public and Private.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www.republicart.net/disc/publicum/demirovic01\\_en.htm](http://www.republicart.net/disc/publicum/demirovic01_en.htm)
- Diaspora\*. n. d. a. The Diaspora\* Project.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diasporaproject.org/>
- Diaspora\*. n. d. b. Join Diaspora\* blog entry "What is Diaspora\* ". Accessed October 23, 2011. <http://blog.joindiaspora.com/what-is-diaspora.html>
- Diaspora\*. 2010. Flyer about Diaspora\*.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blog.joindiaspora.com/2010/04/24/awesomeflyers-are-here.html>
- Diaspora\*. 2011a. Diaspora\* blog entry "Diaspora\* is Back in Action".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blog.diasporafoundation.org/page/2>
- Diaspora\*. 2011b. Diaspora\* Contributor Agreement.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s://github.com/Diaspora/Diaspora/wiki/New-CLA-12-13-10>
- Diaspora\*. 2011c. Diaspora\* blog entry "Diaspora\* Means a Brighter Future for All of Us". Accessed March 6, 2012. <http://blog.diasporafoundation.org/page/5>
- Diaspora\*. 2012. The Official Diaspora\* Wiki entry "Why Client Side Encryption is a Bad Idea".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s://github.com/Diaspora/Diaspora/wiki/Why-client-side-encryption-is-a-bad-idea>
- van Dijk, Niels. 2010. Property, Privacy and Personhood in a World of Ambient Intelligence.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2(1):57—69.
- Eagleton, Terry. 1991.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 Ellerman, David. 2005. Translatio Versus Concessio: Retrieving the Debate About Contracts of Alienation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oday's Employment Contract. *Politics & Society* 33(3):449—480.
- Engels, Frederick. 1893. Letter to Franz Mehring from July 14, 1893.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3/letters/93\\_07\\_14.htm](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3/letters/93_07_14.htm)
- Etzioni, Amitai. 1999. *The Limits of Privacy*. New York: Basic Books.
- Europe versus Facebook. 2011. Complaints against 'Facebook Ireland Limited'.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www.europe-v-facebook.org/EN/Complaints/complaints.html>
- Facebook. 2011. Statement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ccessed March 6, 2012. <https://www.facebook.com/legal/terms>
- Fitzgerald, Brian. 2006. The Transformation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30(3):587—598.



- Freedom Box Foundation. n. d. Flyer about the Freedom Box.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freedomboxfoundation.org/doc/flyer.pdf>
- Fuchs, Christian. 2009.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1):69—87.
- Fuchs, Christian. 2011a. Web 2.0, Pro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8(3):288—309.
- Fuchs, Christian. 2011b. Towards an Alternative Concept of Privac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thics in Society* 9(4):220—237.
- Fuchs, Christian. 20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cy on Facebook. *Television & New Media* 13(2):139—159.
- Gavinson, Ruth. 1980. Privacy and the Limits of Law. In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Privacy: An Anthology*, edited by Ferdinand Schoeman, 346—4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uss, Raymond. 2001. *Public Goods, Private Goo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liom, John. 2001. *Overseers of the Poor: Surveillance, Resistance, and the Limits of Priv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ring, John. 1984. Privacy and Property. *The Australian Quarterly* 56(4):308—324.
- Habermas, Jürgen.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 Haug, Wolfgang Fritz. 1987. Outlines for a Theory of the Ideological. In *Commodity Aesthetics, Ideology and Culture*, edited by Wolfgang Fritz Haug, 59—9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 Haug. 2005.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Berlin: Argument.
- Hettinger, Edwin C. 1989. 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8(1):31—52.
- Jaggar, Alison.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Rowman & Allanheld.
- Kang, Jerry. 1998. Information Privacy in Cyberspace Transactions. *Stanford Law Review* 50(4):1193—1294.
- Koivisto, Juha and Veikko Pietilä. 1996. Ideological Powers and Resistance: The Contribution of W. F. Haug and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Rethinking Marxism* 9(4):40—59.

de Laat, Paul B. 2005. Copyright or Copyleft?: An Analysis of Property Regimes for Software Development. *Research Policy* 34(10):1511—1532.

Laudon, Kenneth C. 1996. Markets and Privacy.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9(9): 92—104.

Lessig, Lawrence. 2002. Privacy as Property. *Social Research* 69(1):247—269.

Litman, Jessica. 2000. Information Privacy/Information Property. *Stanford Law Review* 52(5):1283—1313.

Lyon, David. 1994.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yon, David. 2005. *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Macpherson, Crawford 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cpherson, Crawford B. 1978. The Meaning of Property. In *Property: Mainstream and Critical Positions*, edited by Crawford B. Macpherson, 1—1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arsch, Heather. 2012. A Proposal for Governance: Privacy and Transparency.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wlccentral.org/node/2445>

Marx, Gary T. 2012. Foreword: Privacy Is Not Quite Like the Weather. In *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 edited by David Wright and Paul de Hert, v-xiv. Dordrecht: Springer.

Marx, Karl. 1849/2006. Wage-labour and Capital. In *Wage-labour and Capital & Value, Price, Profi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857—58/1983.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Marx Engels Werke (MEW)*, Band 43. Berlin: Dietz. English translation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Marx\\_Grundrisse.pdf](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Marx_Grundrisse.pdf)

Marx, Karl. 1859/1909.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Marx, Karl. 1867/1976.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One*. Middlesex: Penguin.

Marx, Karl. 1885/1992.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Two*. Middlesex: Penguin.

Marx, Karl. 1845/1998.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German Ideology Including Theses on Feuerbach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569—571. Amherst: Prometheu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845—46/1998. The German Ideology. In *The Ger-*

*man Ideology Including Theses on Feuerbach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27—658. Amherst: Prometheus.

McGeveran, William. 2009. Disclosure, Endorsement, and Identity in Social Market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2009(4):1105—1166.

Moglen, Eben. 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 Accessed March 20, 2012. [http://emoglen.law.columbia.edu/my\\_pubs/dcm.html](http://emoglen.law.columbia.edu/my_pubs/dcm.html)

Moglen, Eben. 2010. Freedom in the Cloud: Software Freedom, Privacy, and Security for Web 2.0 and Cloud Computing.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www.software-freedom.org/events/2010/isoc-ny/FreedomInTheCloud-transcript.html>

Moor, James H. 1997. Towards a Theory of Priv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omputers and Society* 27(3):27—32.

Moore, Adam D. 2008. Defining Privacy.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39(3):411—428.

Munzer, Stephen R. 2005. Property. In *The Short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Craig, 858—861. London: Routledge.

Nock, Steven. 1993. *The Costs of Privacy: Surveillance and Reput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de Gruyter.

Nussbaum, Emily. 2010. Defacebook: Four Young Friends Who Are Out to Create a Very Different Sort of Social Network. *New York Magazine*, September 26, 2010.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nymag.com/news/features/establishments/68512/>

Papacharisi, Zizi. 2010. Privacy as a Luxury Commodity. *First Monday* 15(8).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Article/3075/2581>

Pateman, Carole. 1989. *The Disorder of Women: Democrac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teman, Carole. 2002. Self-ownership and Property in the Person: Democratization and a Tale of Two Concept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0(1):20—53.

Pateman, Carole and Charles W. Mills. 2007. *Contract and Domination*. Cambridge: Polity.

Pedersen, J. Martin. 2010a. Free Culture in Context: Property and the Politics of Free Software. *The Commoner* 14:49—136.

Pedersen, J. Martin. 2010b. Properties of Property: A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The Commoner* 14:137—210.

Pedersen, J. Martin. 2010c. Free Software as Property. *The Commoner* 14:211—286.

Raynes-Goldie, Kate. 2010. Aliases, Creeping, and Wall Cleaning: Understanding Priva-

cy in the Age of Facebook. *First Monday* 15(1).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775/2432>

Rehmann, Jan. 2007. Ideology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4):211—239.

Römer, Peter. 1978. *Entstehung, Rechtsform und Funktion des kapitalistischen Privateigentums*. Köln: Pahl-Rugenstein.

Roos, Jerome. 2011. The Global Square: An Online Platform for Our Movement.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roarmag.org/2011/11/the-global-square-an-online-platform-for-our-movement/>

Rössler, Beate. 2001. *Der Wert des Priva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amuelson, Pamela. 2000. Privacy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nford Law Review* 52(5):1125—1173.

Shepherd, Tamara. 2012. Persona Rights for User-generated Content: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Priva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ulation. *tripleC* 10(1):100—113.

Smythe, Dallas W. 2006.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Durham G. Meenakshi and Douglas Kellner, 230—256. Malden: Blackwell.

Söderberg, Johan. 2002. Copyleft Vs. Copyright: A Marxist Critique. *First Monday* 7(3—4).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www.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Article/938/860>

Sofsky, Wolfgang. 2008. *Privacy: A Manifest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olove, Daniel J. 2009. *Understanding Priv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alder, Felix. 2002. Opinion: Privacy Is Not the Antidote to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1(1): 页 120—124.

Stallman, Richard M. 2010. Copyleft: Pragmatic Idealism. In *Free Software, Free Society: Selected Essays of Richard M. Stallman*, 129—131. Boston: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Tavani, Herman T. 2008. Informational Privacy: Concepts, Theori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thics*, edited by Kenneth Einar Himma and Herman T. Tavani, 131—164. Hoboken: Wiley.

Varian, Hal R. 1997. Economic Aspects of Personal Privacy. In *Privacy and Self-regul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dited by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 Washington: NTIA.

Wacks, Raymond. 2010. *Privac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Warren, Samuel and Louis Brandeis. 1890.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Privacy: An Anthology*, edited by Ferdinand Schoeman, 75—1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stin, Alan. 1967.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 Wolf, Marty. J., Keith W. Miller, and Frances S. Grodzinsky. 2009. On the Meaning of Free Software.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1(4):279—286.

Wong, Phil. 2010.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Internet # 5: Anonymous Facebook Employee.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http://therumpus.net/2010/01/conversations-about-the-internet-5-anonymous-facebook-employee/3/>

Žižek, Slavoj, ed. 1995.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Verso.

帕德玛贾·肖(Padmaja Shaw)<sup>①</sup>

## 马克思的记者生涯：重温言论自由的辩论<sup>②</sup>

冯结兰(译),张志华(校)

[摘要]成年马克思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事记者工作。他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编辑、专栏作家、特约记者等职务,他的记者生涯为其日后的理论工作带来了重大影响。通过参与19世纪的欧洲政治革命,就捍卫言论自由以及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需要扩大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马克思形成了最精辟的论述。本文描述了在使用和扩展民主自由过程中印度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本文提出,马克思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之间还有差距,并认为在当代印度,迫切需要保护言论自由、反对审查,并加强基于民主原则的独立宪法机构的建设。

[关键词]资产阶级民主,言论自由,印度左翼政治,印度新闻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

<sup>①</sup> 女,印度海德拉巴市奥斯马尼亚大学传播与新闻系教授。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Osmania University)新闻学硕士,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文科硕士(电信学),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Osmania University)发展研究学博士。1988年以来任教于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新闻传播系。研究兴趣为:广播电视制作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她定期为媒体观察网站“猫头鹰网”(The Hoot)撰稿,是当地英文日报《印度汉斯报》(The Hans India)的专栏作家。地址: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Osmania University, Hyderabad, 500044, India。电子信箱:padmajashaw@gmail.com

<sup>②</sup> 海德拉巴大学(University of Hyderabad)政治学退休教授、著名人权活动家哈拉戈帕(G. Haragopal)教授给本文提出意见,特此鸣谢。

## 一、引言

1842年,马克思在欧洲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并为捍卫言论自由取得了非凡战绩;过了整整169年,2011年,就这一已为全世界所接受并实践的原则——言论自由,一轮新的论争已然兴起。当反抗压制性政权的人们为了拥有生命、解放、结社和言论等基本自由而努力的时候,那些身处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人们也走上街头,发泄他们由于丧失了同样的自由而产生的愤怒,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们有关生命、解放、结社和言论的自由被剥夺了。

分析人士将当前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类比为1848年革命时期遍布欧洲的情形。形成于20世纪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乃最稳定的形式之共识,正面临着挑战。

纵观历史,建立工人阶级掌控生产的民主抗争(democratic struggles)与其目标之间的关系,依旧存在问题,有时也被遗忘。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对利润无节制的追求,后者妨碍工人阶级作为主导力量的出现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媒体在20世纪被用作促进全球资本之利益的工具,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制造并维系由资产阶级民主的稳定性这一观念而发展出的主导性社会共识方面,媒体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体的逐步公司化(corporatisation,企业化)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创造并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参与者。有鉴于此,我们还能期待企业化的媒体产业保护人们的各项权利么?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媒体机构是否在为工人阶级的抗争提供空间?为媒体企业工作的记者是否有可能质疑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前提?

为了领会马克思的言论自由思想,不论是他所形成的思想框架,还是在整个成年阶段作为记者他所发挥的不同寻常的根本性作用,我们都有必要重温马克思的著述。作为一名记者,马克思在19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1842—1865)就每一重大事件写了大量的文章,涵盖了笼罩大部分欧洲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觉醒。那些年,他编了《莱茵报》、《新莱茵报》,为多种德文和英文报纸撰稿,如《人民新闻报》(The People's Press)、《新闻报》(Die Presse)、《新奥德报》(Neue Oder Zeitung)等,他还为其他数份报纸撰写文章,包括作为《纽约论坛报》的欧洲记者为其撰写的大约487篇文章(125篇由恩格斯所写,12篇与

恩格斯合写,350篇独自完成)。尽管在他为《纽约论坛报》撰文时,由于《共产党宣言》尚未译成英文,马克思作为这一革命文献的作者在英语国家并不广为人知(Ledbetter 2007),然而,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的专栏因其对人民所关心的问题的关注而受到欢迎,这与报纸创始人格里利(Horace Greeley)宣称的宗旨是一致的。格里利在创办《纽约论坛报》时称,它要敏锐地站到当时便士报琐碎无聊风气之对立面(Emery and Emery 1954,124)。

马克思在其新闻写作中关注的三个主要方面——言论自由与审查、作为行业自由之一部分的新闻出版自由、媒体在资产阶级民主中的作用,在当代,与如印度这样的国家有着深刻的共鸣。本文将呈现马克思有关此三个问题的主要论述,而后检视在印度这样一个以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左翼政党和知识分子的作用。

## 二、言论自由与审查

19世纪40年代,大部分欧洲国家还被专制的君主们统治着。由于缺乏言论自由的传统,或者还没通过那保障一切权利的权利法案,记者和作家们不断受制于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Padover 1974, xi)。1841年,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条审查法令,扩大了原有审查法令的范围,以压制任何对“宗教基本原则”持批判立场以及“有悖道德与良善”的事物。

马克思,一位年仅24岁的黑格尔主义者,带着其对言论自由与审查尖锐而深刻的分析,突然现身德国政治舞台。5月5日至19日期间,他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代表们所制定的书报检查法发起慷慨激昂的挑战:

书报检查法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因为它所希望的它达不到,而它达到的又不是它所希望的……书报检查制度使每一篇被禁作品,无论好坏,都成了不同寻常的作品,而新闻出版自由却使一切作品失去了这种特殊的外表。(Padover 1974, xiii)<sup>①</sup>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78。——译者注



马克思反对审查制度,并不是说他希望建立一个不受规管的新闻出版界,他只是强调要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制定新闻法规:

……书报检查制度……把任性提升为法律。……新闻出版法和书报检查法各不相同,法官和书报检察官对待新闻出版的态度也不一样。

……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不独立的书报检察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员……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新闻出版界的一定的违反行为,而在书报检察官面前受审的却是新闻出版的精神。法官根据一定的法律来审理我的行动;而书报检察官不仅惩罚罪行,而且他自己也在犯罪……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指控我违反了现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见有罪,因为这个意见不是书报检察官和他的上司的意见。我的公开行动愿意听从世界、国家及其法律的评判,但是它却被提交给隐蔽的纯否定的势力审判,这种势力不能被确立为法律,它怕见阳光,而且不受任何普遍原则的约束。

书报检查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要惩罚的不是违法行为,而是意见;因为它无非是一个以条文形式出现的书报检察官而已;因为任何国家都不敢把它利用书报检察官这一工具实际上所能干出的事情在一般的法律规定中表述出来。因此,书报检查制度的执行不是交给法庭,而是交给警察机关。(Marx 1842a)<sup>①</sup>

通过将真正的书报检查视作批评——这是新闻出版自由的精髓,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就是由政府垄断了的批评,然而,政府只想秘密施行,但其自身却不愿受到任何批评(Marx 1842b)。<sup>②</sup> 马克思还进一步论述了新闻出版法与书报检查法的区别:

在新闻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书报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书报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新闻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法却把自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79、181。——译者注

<sup>②</sup> 中文摘自《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上册,前揭,页107—135。——译者注

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因此,新闻出版法根本不可能成为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措施,不可能成为以惩罚相恫吓的一种预防罪行重犯的简单手段。……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Marx 1842c)<sup>①</sup>

### 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论述: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Marx 1842d)<sup>②</sup>

对于马克思来说,新闻出版是“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它不知道尊重个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Marx,1842e)。<sup>③</sup> 马克思认为,革命运动必须参与到公众生活中去并且对无产阶级起到教育作用,这样的话,就有必要保护言论自由,因为报纸是公众交流的首要工具(Hardt 2000)。

在描写摩泽尔省的满目疮痍时,马克思阐释了为什么需要一个自由的新闻出版业:

为了解决这种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

---

①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75—176。——译者注

② 同上书,页179。——译者注

③ 同上书,页196。——译者注

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free press*)。……“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Marx 1843)<sup>①</sup>

1842年10月,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编辑,他的天才获得广泛认可。作为报纸的编辑,有了来自恩格斯和一些黑格尔主义者定期的稿件,马克思发起了一场为争取德国统一和捍卫工人阶级权益的运动。马克思早期新闻实践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为反击那些针对言论自由的攻击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这些攻击有的来自国家法令,有的则是当时的竞争对手如《科隆报》(*Kölnische Zeitung*)等刊载的重要文章。《科隆报》在当地持保守观点的基督教徒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马克思用他那敏捷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尖锐的文字风格,揭露出对手报纸的虚伪,这些报纸对普鲁士政府花样百出的镇压措施抱支持态度。

然而,马克思在1842年至1849年间曾出任编辑的两张报纸——《莱茵报》和《新莱茵报》——在当时遭到政府的步步紧逼,最终被迫关闭。在《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离开了德国。1848年革命后他重返德国创办了《新莱茵报》。针对后革命时代普鲁士政府所颁布的《普鲁士出版法案》(*Prussian Press Bill*),马克思逐条予以驳斥。他向世人揭示了该新法案与新闻出版自由之间存在的刺目的矛盾:

从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官员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逞凶肆虐、横行霸道和违法乱纪了;他们可以放心地打人和命令别人打人、进行逮捕和不加审问就加以监禁。唯一有效的监督——报纸将变成无效的东西……其实,当不能让公众蔑视理应受到公众蔑视的东西的时候,究竟还有什么出版自由呢?(Marx 1848)<sup>②</sup>

有一个典型的实例可充分反映马克思的锐利文风。他补充道:

---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78。——译者注

<sup>②</sup> 中译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页271—272。——译者注

他(汉泽曼先生)(Herr Hansemann)不妨宣布:任何使官员先生们不仅遭受公众蔑视、而且遭受公众嘲笑的企图都应受到惩罚。不然,这将是令人非常痛心的缺陷。<sup>①</sup>

在迁居英国之前,马克思无情地批驳了某些德国报纸反工人阶级的蓄意宣传。马克思批驳了《新柏林报》(Neue Berliner Zeitung)对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报道(Marx 1848)。<sup>②</sup>在当时专制主义和审查制度盛行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还揭露了官员们对于权利的侵犯。

1849年,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并在伦敦度过余生。自1851年8月至1862年2月期间,他担任《纽约论坛报》的欧洲记者。《纽约论坛报》发展迅速并成为销量最大的英文日报,每天售出30万份。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阅者甚众的著名经济记者(Musto 2008,163)。

### 三、有关行业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

19世纪,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信奉当时各种意识形态潮流的个人和投资者们都拥有媒体。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状况,以及它是否可被纳入“行业自由”的一般理念之下,当时的立法机构还曾讨论过。马克思对该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行业自由只是行业自由,而不是其他什么自由,因为在这种自由中,行业的本性是按其生命的内在原则不受阻挠地形成起来的。如果法院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规而不遵循其他领域(如宗教)的规律的话,审判自由就是审判自由。自由的每一特定领域就是特定领域的自由……(Marx 1842f)<sup>③</sup>他说,要保障某一领域的自由,该自由必须是由其内在的本质特征孕育产生,而非来自其外部关系。难道被贬低到行业水平的……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吗?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把新闻出版贬低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者应当遭受外部不自由——书

---

① 中译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页272。——译者注

② 同上书,页118。——译者注

③ 中译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上册,前揭,页190。——译者注

报检查——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其实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了(Marx 1842g)。<sup>①</sup>

然而,马克思承认,新闻出版也是一种行业,但那不是作者的事,而是出版商和书商的事。通过清晰界定何为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绘制了一幅利用自由民主所提供的空间拓展个人自由的线路图。哈拉戈帕(Haragopal 2012)教授认为,<sup>②</sup>权利限定了自由的边界。在资产阶级的观念中,个体以自我为中心并具有对抗性,因而,有必要界定自由的边界。而当社会被视作一个集体时,这种对边界的限定就不是必须的。人权活动家认为,个人自由必须和集体自由相协调,这二者并不必然是对立的。

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及新闻出版作为一种行业的分析,对于在如印度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左翼政治而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些国家中,左翼继续在政体中发挥即便称不上重要但也是持续的作用。在探讨左翼通过新闻出版业在扩大民主自由中的作用之前,有必要对印度左翼政治的现状进行简要概述。

#### 四、印度的左翼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在反殖民斗争的政治势力中心,左翼一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1917年的俄国革命影响并激励了印度的反殖民斗争(Nair 2009),同时,甘地(Mahatma Gandhi)发起的革命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也初具规模。在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内部,形成了几个有着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权力中心:以甘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bourgeois democratic thinking)和以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派(Fabian socialism)。在国大党之外,还有遍布各地的激进革命团体,他们通过强度不一的武装起义,与英国殖民统治作斗争。

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一样,印度的左翼也必须与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协作,这是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在印度也是个挑战

---

<sup>①</sup> 中译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上册,前揭,页192—193。原文有斜体,中文粗体为中译文所有。——译者注

<sup>②</sup> 个人访谈,2012年3月16日。哈拉戈帕教授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著名的人权活动家,海德巴拉大学业已退休的政治学教授。

(Nair 2009)。在印度的反殖民斗争中,一些马克思主义团体提供了理论和意识形态依据,并与甘地的/主流的资产阶级动员协作,但是,激进的革命团体在这一影响之外运作,他们在全国各地进行武装斗争(Rajimwale 2009a)。

独立之前,印度有 565 个土邦。当时由尼扎姆王朝(Nizam)实施专制统治的海德拉巴邦,被认为是其时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国。封建专制政权引发了激进的左翼政治。1947 至 1948 年,民族独立运动达致高潮,在左翼力量领导下的特仑甘纳(Telangana)农民武装斗争控制了超过 3000 个村庄,<sup>①</sup>并开始实施激进改革,其中的第一项就是重新给穷人分配土地,并提供教育和医疗卫生(Pucchalapally 1971a)。

然而,武装斗争却遭到新独立的印度国家的野蛮镇压。镇压由印度军队施行,被称为“治安行动”(Pucchalapally 1971b)。治安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将业已重新分配的土地返还给封建领主,与此同时又承诺实施土地改革以安抚人民(Pucchalapally 1971c)。1948 年,共产主义政党被禁止活动,数位领导人转入地下。在特仑甘纳地区、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Tripura)<sup>②</sup>的武装斗争激发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几个历史阶段,但也引发了后续阶段的一些争论。

首先,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进行民主选举时,许多农民运动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以大多数票被选入立法机构。在南部的喀拉拉邦,通过选举程序,印度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于 1957 年执掌邦政权(Rajimwale 2009b)。20 年后的 1977 年,在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邦,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通过选举上台,此后重新获选,连续执政长达 34 年,直至 2011 年。因此,讨论左翼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政治权力的可能性仍然十分重要,至少在印度的某些地区是如此,尽管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对获选的左翼政府之限制,仍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接下来,由于选举经验的加强,那些立志要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对以武装斗争挑战装备精良的国家的

---

① 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的详细分析见:<http://www.scribd.com/doc/15379761/Telangana-Peoples-Armed-Struggle-19461951-Part-One-Historical-Setting>。孙达拉雅(p. Sundarayya),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的积极参与者、支持者,曾任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

② 特仑甘纳地区是印度安得拉邦的南部地区,人口约 4000 万,由安得拉邦十个行政区构成,包括安得拉邦首府海德拉巴。该地区的分邦运动已延续 50 多年;喀拉拉邦位于印度西南部;特里普拉邦位于印度东北部。——译者注

可行性提出了质疑。那些已经进入选举政治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政党将武装斗争视为冒险主义行为。早在1964年,这种观点导致了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正式分裂,拥护革命道路的共产党和倾向以民主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sup>①</sup>自此,革命的武装团体也分裂为数个规模更小的组织,但是,他们已经大大扩展了自身的影响范围。

1967年,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地区的又一场农民武装起义,<sup>②</sup>将激进的左翼政治带回了印度的政治话语之中。此后,形式不同、强度各异的武装起义继续出现在印度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被称为“红色走廊”(red corridor),一些武装团体掌控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有关报告估计,毛派的影响力范围持续扩大,在印度的626个县中,从2001年的56个县扩大至2010年的超过200个县(The Economist 2010)。<sup>③</sup>为了建立典范社区,他们也在实施激进的左翼改革,例如重新分配土地、集体化、扫盲以及医疗卫生。但是,在过去的60多年中,国家通过出动军队和颁布特别法案来遏制并镇压这些团体,带来双方持续的人员伤亡。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参与选举政治的共产主义政党业已发现,由于所有其他政党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和学生组织,他们在无产阶级中的政治基础正不断遭受侵蚀。以下情形进一步侵蚀了无产阶级的基础:自独立以来印度经济“无工作的经济增长”历程;从前为工会制度提供意识形态凝聚力的纺织、黄麻产业中心与其他生产活动的衰落;自1991年起施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共产主义政党的词汇和动员方式被中间派甚至激进右翼势力所借鉴,这一更具有潜在负面性(insidious)的过程令民众对左翼的特性更加感到困惑。

与可从形式上认定的左翼团体不同,还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记者、学者、律师、法官、公民自由活动家,甚至政府官员,他们喜欢称自己为

---

<sup>①</sup> 印度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1964年,受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印共背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修正主义,于是,以孙达拉雅和南布迪里巴德为代表的一派从印共分出后组成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简称印共(马)。至1969年,印共(马)内部有一部分人认为印共(马)背离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另建印共(马列)。在印共(马列)内部,毛主义影响愈益增强,毛派组织纷纷出现。2004年9月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是目前印度最大的毛派组织。——译者注

<sup>②</sup> 指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无地农民运动“纳萨尔巴里运动”(农民革命战争游击运动的统称),因斗争最初发生在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警管区而得名。——译者注

<sup>③</sup> 该报道分析了矛盾冲突的性质,并绘制了一幅深受毛派影响之地区的详细地图。2012年1月25日取自:<http://economist.com/node/16650478>

“独立左翼”。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印度的左翼运动中,左翼团体已将自身认同于俄罗斯共产主义者、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等。独立左翼则带来了充满活力的持续不断的批评,并在总体上为左翼运动提供方向,而他们并不信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阐释。

而由一系列左翼政党组成的“议会左翼”,他们在某些邦组成左翼联盟,并在议会中协同合作,他们面临着来自“独立左翼”的批评。“独立左翼”团体认为,这些政党缺乏内部民主,而且是按名声不佳的斯大林主义遗产所构造。在“独立左翼”团体看来,左翼政党在选举中的失败与衰退,并不必然意味着印度左翼的衰落。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民主和抵抗的文化、一个运动和组织的网络以及一组新的更具活力的战役的左翼,议会之外的左翼将继续蓬勃发展”(Menon 2011)。

从事武装起义的左翼团体鄙弃主流的民主斗争,认为其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无关。他们质疑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何以实现根本性的变革,既然它不得不在刚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之内运转,而其中的官僚制度以及司法和立法程序正是旨在否认工人阶级的权利。

## 五、新闻界与左翼

左翼在印度新闻界的存在,如同左翼政治图景一样,纷繁复杂。这一存在可被视为将工人阶级的抗争纳入公共话语的努力,以此作为围绕资产阶级民主之稳定性所制造的共识的对立面。了解左翼介入媒体的性质,理解何种介入有助于扩展马克思主义实践中所固有的民主价值,可为未来提供经验教训。

在印度,新闻界中中间偏左立场的信息发布有三种途径:(1)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独立的中间偏左新闻媒体机构;近期出现的网站和党营电视新闻频道,(2)为主流报纸和杂志撰稿的“左倾”知识分子,(3)全国性和地区性媒体组织中的记者。

此处所指的“左倾”广泛地包含了那些就以下问题开展研究与写作的人:农民和工人的阶级斗争、对国家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发展范式和大规模的社区迁移、对种姓制度和宗教身份政治的批判、人权和公民权问题、全球化及其后果、对资本主义及其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的批判等。不过,下文将指出的几位作者可能不会将自己视为“左倾”人士或马克



思主义者。

记者当然不想被贴上左翼或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因为关注社会而又没有意识形态标签是他们可信度的重要来源。但是,也有一些记者因为以左翼视角报道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而出名的。

## (一)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版物和独立的中间偏左新闻媒体

### 1.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

马克思主义政党将印刷出版物——报纸、杂志、期刊——作为其活动的组成部分。两个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CPI]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IM])都以英文和各种印度语言出版日报,此外,还有针对妇女组织、学生、产业工人、农业工人的期刊。

这些出版物的目的主要是解释“政党路线”和传播有关动员方案的信息。这些政党结构严谨、层级分明,不大可能公开辩论意识形态议题。因此,党营报纸上很少见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激烈讨论。它们主要的任务是刊登政党针对当天的具体问题将采取的战略举措。不过,这类出版物都没有大范围流通,但是,由于它们被视为宣传的工具,因此,当主流媒体在讨论中涉及政党路线时,它们往往得到引用。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国家机关,都密切关注这些出版物。通过发布历史和当下的信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维护更新自己的网站。2011年,印共(马)还在喀拉拉邦开办了一个电视新闻频道。

那些分裂出来的激进左翼团体,大部分还在积极印制小册子。这些出版物主要是为了向党内干部传递信息,同时也向外界表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

### 2. 独立的左翼出版物

譬如《主流》(Mainstream)周刊,创刊于1962年,由资深马克思主义者兼新闻记者查克拉瓦蒂(Nikhil Chakravartty)先生所创,是对各种中左立场观点持开放态度的独立左翼出版物的代表(Goyal 1998)。

《经济和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创办于1949年(早期名为《经济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website 2012),因其成为协调一致又充满生气的独立左翼研究的发布平台,而别具一格。学者、记者、人权活动家等不仅分析评论当前问题,还就影响工人阶级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做调查充分的学术文章。

《主流》与《经济和政治周刊》均为英文出版物,并在知识分子和学者中

流通。两者都非大众读物,但它们在经济上都可维系运营,收入主要来自订阅和一些非商业性的广告。两本杂志的创办人都已离世,但新主编秉承刊物的传统,并弘扬其精神。

《卡非拉》(Kafila)始于2006年,在新媒体时代,它就像一个由“独立左翼”知识分子办的集体博客,它为讨论当代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平台(Kafila website 2012)。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出版物/网站,它们有着相似的流通范围,譬如在加尔各答出版的《前沿》(Frontier)杂志(Frontier website 2012),以及“逆流网”(Counter Currents)(Counter Currents website 2012),它们发出了异于主流的声音。

## (二) 为主流报刊撰稿的“左倾”知识分子

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以左翼的视角观照印度的政治和经济,他们有时也通过报纸和杂志的定期专栏表达意见。《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和《前线》(Frontline)杂志同属印度南部的一家主要出版企业——卡斯特利家族出版公司(Kasturi and Sons)——所有,多年来一直为“左倾”的学者和记者提供表达意见的平台。《印度教徒报》已有134年的历史,总部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它在13个城市出版,发行量达406万份(The Hindu Website 2012)。因其报道客观真实和具有专业精神而声名远播。

同一家出版公司的《前线》是新闻杂志,刊发大量深入分析的文章,涉及的主题宽泛。拉姆(N Ram)曾任该集团的总编辑,编辑《印度教徒报》和《前线》杂志达数十年之久。他从不隐瞒自己支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拉姆曾为“左倾”作者提供刊发作品的机会,如毕瓦伊(Praful Bidwai)、昌德拉萨卡(C P Chandrashekhar)、高士(Jayati Ghosh)、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艾哈迈德(Aijaz Ahmed)、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帕沙德(Vijay Pershad)等。《前线》杂志还定期关注与工人阶级、未加入工会的工人、部落居民事务有关的议题(Frontline magazine 2012)。

其他人——如米特拉(Ashok Mitra)——和学者——如乌特莎·帕特奈克(Utsa Patnaik)、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在主流媒体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一些学者写的专栏被多家报纸和杂志同时刊登。发行面广的全国性报刊偶尔也会刊发多种视角的讨论,中间偏左的观点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 供职于全国和地区媒体机构的记者

活跃于媒体中的记者有两类:(1)为那些在城市精英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主流英文媒体工作的记者;(2)供职于那些在特定语言群体中有很大发行量的地区语言媒体。

#### 1. 主流英文媒体

印度报纸的总发行量为3亿2900万份,注册报纸有82222种(RNI website 2012)。无论在印度的杂志或报纸的新闻报道中,总有这样一些记者,他们持续报道与人民利益攸关的议题,试图通过新闻栏目建立人们对该国政治和经济领域中重要问题的批判意识。

其中最著名的是梅塔(Vinod Mehta),直到最近,他一直是《瞭望》集团(*Outlook group*)的总编辑。他称自己为“左翼自由派”(Mehta 2012a)。在其卓尔不凡的记者生涯中,梅塔报道过重大新闻,揭露了国家(state)的反人民政策以及贪污、滥用职权与治理不力等案例。这些报道的影响曾波及全国。《瞭望》杂志刊登过梅塔有关工会的劳工行动和特别经济区的报道,报道采用更加全面的视角,对工人的意见给予充分的关注。《瞭望》杂志也为罗伊(Arundhati Roy)的激进左翼观点留有广阔的平台。罗伊是获过“布克奖”(Booker prize)的作家,同时还是位活动家。在一次采访巴特(Bhatt)时,梅塔说:我是左翼自由人士,所以《瞭望》也是左翼自由派杂志……我确保……我们报道了人民的不平等状况。政府不能说市场力量将决定任何事情、一切事务。对于印度应该如何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我们努力——我强调这个词——我们努力在我们的杂志中倡导这个想法(Mehta 2012b)。

塞纳斯(Palagummi Sainath)一直在报道农业危机、全球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以及农村的普遍困境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和手工织工自杀身亡。塞纳斯是《印度教徒报》的农村事务编辑,出版的畅销书《旱灾无害人人爱》(*Everyone Loves a Good Draught*)是他在印度各地农村关于农村困境况的报道文集。塞纳斯曾凭借《印度时报》提供的奖学金游历印度农村地区,其间他向这家印度发行量最大的多版本报纸供稿,发表了84篇评论文章(Thakurta 2012,504)。

塞纳斯认为,印度媒体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但是它们受其所有者的牟利动机所禁锢。他说,即使是在报纸最糟糕的时候,人们也可以找到谈论贫困和农业困境的版面,但是,死亡的人数得足够大,才能获得新闻版面

(Palagummi 2011)。他说,任何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来自不同意见者。那些代表现有权力结构的记者从未被冠以“伟大”二字(Palagummi 2008)。

塔库尔塔(Paranjoy Guha Thakurta)。他曾为《每日电讯报》和《今日印度》这样的新闻杂志工作过,同时还是位电视评论员。塔库尔塔曾做过重大调查性报道,涉及企业与提交法庭审理的案件,挑战了国家及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有关2G频谱分配的争端是塔库尔塔最近的调查主题,对此印度法庭仍未给出定论。

塔库尔塔(Thakurta 2012)认为,共产主义在印度政治领域中从来就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是个贬义词。<sup>①</sup> 由大型企业所拥有的主流报纸,如《印度时报》、加尔各答的《每日电讯报》,即便其编辑方针呈现明显的反左翼立场,但它们仍然给左翼的专栏作家和记者留有空间。

除了此处提及的记者外,还有很多记者一直致力于报道工人阶级事务以及环境、性别、工会、农业危机和外交事务,在政策议题上塑造社会舆论。

## 2. 地区语言或方言新闻报道

随着印度人读写能力的提高,印度方言或地区语言媒体增长迅速。该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觉悟日报》(Dainik Jagran)是一份印地语报纸,发行量达1千640万份。其他主要的地区语言媒体有:《帕斯卡日报》(Dainik Bhaskar)(印地语)、《安那都报》(Eenadu)(泰卢固语)、《美丽马拉雅拉报》(Malayala Manorama)(马拉雅拉姆语)。<sup>②</sup> 事实上,《印度时报》是印度排名前十的报纸中唯一的英文报。印度是按每个地区使用最多的语言进行地域划分的,因此,报纸的发行被认为既要适应地域因素,又要考虑语言群体因素。

除了在职的记者雇员外,地区语言报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正式的特约通讯员网络,他们能广泛接触到每个邦的偏远角落。在安得拉邦,有将近9000名特约通讯员为当地报纸工作。

印度的两大主要左翼政党,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都有本党的日报和其他出版物。除了有党派出版物作为内部交流之用,激进的左翼革命团体一开始也接触那些主流报纸的特约通讯员,后来,党内干部自己也开始成为报纸的特约通讯员或者农村记者。

一项研究指出:“左翼团体的干部/支持者、同情者渗入报社机构。曾经

① 个人访谈,2012年1月17日。

② 印度西南部居民使用的一种方言,接近泰米尔语。——译者注

的活动家如今占据报社办公室的高位……干部也渗透到基层农村通讯员网络之中。这些通讯员是报纸专栏中“纳萨尔新闻”<sup>①</sup>(naxal news)的主要撰稿者”(Kasanagottu 1996, 202)。

卡萨诺格图(Kasanagottu)指出,报纸管理者也有意无意地招录一些与各种纳萨尔团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非严格意义上有时也指毛派)有关系的人,原因有两个:首先,左翼的同情者/活动家有文学才华,这可为报纸所用;其次,记者与纳萨尔成员的接触可能会带来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报道,这是其他途径所难以获取的。

史蒂文森(Stevenson 2000, 228)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些记者加入了纳萨尔派,而一些纳萨尔派成员进入了记者队伍。纳萨尔派成员进入新闻报道这样的主流行业,一般是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在戈德瓦利卡尼(Godavarikhani),<sup>②</sup>《维沙兰德拉报》(Vishalandhra)(印度共产党办的报纸)的一名记者加入了“人民保护协会”。后来,他脱离运动,创办了一份泰卢固语周报。然而,他在一次与警察的“偶遇”中遇害。<sup>③</sup>

史蒂文森补充道:“另一方面,在每个县都有相当数量的通讯员和撰稿者(非在编记者),他们早先曾参与纳萨尔运动,并已经放弃。这正说明,媒体为这些曾参加左翼活动的人提供了庇护所,以及媒体在社会中所行使的权力。”他说,左翼干部认为,由于可能导致负面报道,执法人员一般会小心应付记者。

这也是在国家抗击左翼造反的战斗中国家与媒体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在几十年来造反时间长但强度低的邦,有许多记者因被怀疑是毛派线人而丢了性命。

如今,很多团体已被禁止活动达几十年之久,记者一方面已经成了普通公众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却成了国家报复的目标。也有这样的情况,革命团体怀疑他们的记者渠道变成警方的告密者,而对他们加以遏制。工作在新闻业最底层的记者,表达出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却面临着来自国家安全部门和左翼团体的双重压力(Lankesh 2010)。然而,他们为左翼观点进入主流的地区语言新闻报道开拓了空间。

---

① “纳萨尔”指主张以武装斗争反对印度政府的激进左翼组织。该运动于1967年始于西孟加拉邦一处名为纳萨尔巴里(Naxalbari)的地方。——译者注

② 印度的一个煤炭工业城市,人口约40万,很多矿工家庭,工会影响力大。——译者注

③ “偶遇”(encounter)是国家安全部队执行就地处决时的委婉说法。这一直是政府“对付”左翼极端团体及其民间支持者的常规策略。

## 六、印度的言论自由与商业媒体

印度的媒体长期运行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传统之中。但是,在该体系的知识性和结构性的制约之下,存在着左翼思想勾连其立场的空间。有时候是因为它是媒体所有人的意识形态,有时候则是编辑使这种空间得以存在。

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竞争性的市场力量也为左翼思想创造了空间。据塔库尔塔(Thakurta 2012)说,<sup>①</sup>他曾向一家新闻杂志提供一篇重大事件的调查性报道,但被拒绝了,因为杂志与该新闻报道的主角——某企业集团的“战火”才刚刚停歇。塔库尔塔将稿件投给属于大型媒体企业的一家大发行量的商业日报,后者立刻就采用了。撇开竞争优势不说,很多记者相信,大型报纸/媒体企业较之规模较小的报纸,在对抗来自国家和公司的权力时会更容易应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印度媒体业的多样性使得不同政见者和辩论的空间成了可能。

另一名资深记者是维贾帕卡(Mahesh Vijapurkar),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直向《印度快报》和《印度教徒报》这样的重要报纸供稿。维贾帕卡(Vijapurkar 2012)说,<sup>②</sup>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编辑从未因威胁到商业利益而阻止刊发一篇新闻报道。他们只是要确保新闻报道符合公众的利益,以及在刊发前信息已被充分核实。塔库尔塔也重申了这一点(Thakurta 2012)。<sup>③</sup>他说,无论是他供稿的媒体企业,还是报纸编辑,都给予记者相当大的自由,只要刊发的信息经过了充分的调查与核实。

有意思的是,当被问及在印度威胁到言论自由的来源时,记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尼南(Ninan 2012)认为,<sup>④</sup>记者处理公司的议题时小心谨慎,有时候是因为公司投放广告所造成的影响,但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记者已经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化了。她还觉得记者未必把这一点视为关乎言论自由的问题。

---

① 个人采访,2012年1月20日。

② 2012年2月17日,电话采访。维贾帕卡在《印度教徒报》工作了30多年,还是DNA网站的“查错人”(fault finder)。

③ 个人采访,2012年1月20日。

④ 2012年电子邮件采访。尼南是媒体观察网站“猫头鹰网”(The Hoot)的高级记者、专栏作家和编辑。

维贾帕卡认为,在印度,言论自由的威胁主要来自媒体产业的内部动力。在他看来,电视网高层领导要求记者在没有大新闻的日子大肆炒作新闻报道,要求在报道新闻的同时提供观点,这对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是更大的威胁。他还认为,国家和政客并没有对言论自由构成太大的威胁,因为私人拥有的媒体虽然偶有违犯行为,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平台,

与此类似,梅塔说:“不幸的是,腐败在上层,在编辑的层面。报纸的议程正是在那个层面被设定的。他们妥协退让、偏袒徇私、别有所图,他们是背叛了这个职业的人。”

像梅塔、塔库尔塔、塞纳斯这样的资深记者,他们因站在反帝国主义、反全球化的立场报道政治和经济议题而赢得赞誉,此外,他们的共同点还包括信仰民主,并相信新闻报道在促进异见和辩论方面所起的作用。左翼的论争能保有活力,他们所做的贡献可与《主流》、《经济和政治周刊》这样的独立左翼期刊发挥的作用相媲美,因为他们的出版物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接触到。他们出版物中的广告议程似乎并未影响到他们作为独立记者所发挥的作用,原因也许是读者中存在着对左翼观点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必须承认的是,即使一些记者已经屈服于商业或政治的影响,这一行依旧为独立的新闻报道留有空间。

在郊区和县域工作的记者,也持续提供来自偏远地方的有关国家和左翼团体行动的新闻。但是,每当对激进团体的异议不能容忍或来自国家的压制发生时,他们常常是首当其冲者。在印度民主的中心地带,在红色走廊地区,受影响的邦颁布了严厉的“新话法律”(Newspeak laws)<sup>①</sup>,例如“公共安全法案”(the Public Securities Acts),不仅准许任意逮捕被禁左翼政治组织的活动家,而且实行完全的信息封锁。记者进入某些被准军事特种部队控制的地区是被不允许的,而提出人权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或遭逮捕,或不得不面临不合时宜的煽动法的威胁。<sup>②</sup>

哪怕为了在市场中存活,商业媒体也不得不留意公众的看法。正是这个原因,有助于主流媒体对在红色走廊地区国家的压制行动、在冲突地区

---

① 新话,或译新语,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设想的为控制民众思想而采用的模棱两可的新人工语言。——译者注

② 森(Binayak Sen)博士是一名在部落社区工作的儿科医生,已被监禁多年,最近才由最高法院保释。罗伊(Arundhati Roy),作家、活动家,据《煽动法》,因其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看法,遭受被捕的威胁。

人权活动家遭到逮捕和暗杀予以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媒体起了对抗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报道都是不偏不倚和公正的。议题的报道框架,国家机器、政客、官僚机构与企业利用媒体发表倾向性报道,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然而,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尽管新闻过滤器在持续运转,<sup>①</sup>真相会在这个或那个平台上浮现,并到达公众,虽然主流商业媒体为异见的发声提供了空间,但是,商业内容淹没了这些声音。这种状况引发了近期的一次重要辩论,辩论就是否需要约束媒体的商业利益、在留存民主价值观方面新闻立法与审查制度的作用和可取之处而展开。对于印度国家试图审查如谷歌、Facebook、Twitter等提供上网服务的中介机构,主流媒体曾经有过激烈的辩论。但是,对于在红色走廊地区和印度东北部或克什米尔的其他“造反地区”的地毯式审查以及信息封锁,无论是“议会左翼”抑或主流媒体,都未曾发起类似的辩论。

左翼政党的报纸和出版物以鼓动宣传(agit-prop)的风格出现,普通读者和政党自身都清楚地将其视为宣传工具。议会左翼与长期同国家展开武装斗争的激进左翼团体之间,存在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这也使议会左翼不再强烈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正在使用的审查制度和严刑酷法。长期来看,这会使已经在快速腐蚀的民主空间遭到严重萎缩。由于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教授在其精辟的分析中提及的“唯经验化”(empericisation)(Patnaik 2011),议会中的左翼政党一直不能促进对问题开展激烈的理论争论。他解释道:

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党派,并不在于它不会用世俗的、日常的政治“玷污其双手”……而在于,即使在这一层面,其参与过程也叠加了其超越资本主义的方案,并受到卢卡奇(Lukacs 1924)所称的“革命的现状”意识的启示。……在“此时此地”的实践中,连接“此时此地”与整个超越方案的理论如果缺席,那么我们的运动就存在一个唯经验化的过程。……在我们的政体背景下,这种唯经验化至少会产生三种倾向:首先,它导致对手归咎于共产党的“罪行”范围……譬如,追名逐利、“地盘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地方层面的大权独揽。其次,它带来“适应”既定情

---

<sup>①</sup>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中关于“宣传模式”的讨论中,列举五层新闻过滤器:媒体所有权、资金来源、信息获取渠道、批评责难、反共意识形态。



境以避免损失,而不是将它作为革命实践的一部分予以推进这一倾向。反过来,这又引起党与自己所为之战斗的“基础阶级”疏离的过程。“基础阶级”即工人、农民、农业劳动者与农村贫困人口。“党的利益”就与基础阶级的利益隔离开来,不再等同。为即时捍卫“党的利益”,党想到并求助于“此时此地”措施,这与基础阶级的利益相差甚远。第三,唯经验化导致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形式之间的距离缩小。

在一篇颇见思考深度的有关喀拉拉邦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达莫达兰(K. Damodaran)同志的文章中,其子萨西(Sasi 2012)考查了在近代历史的不同时期印度共产主义政党的运作。它揭示了民主运行机制的缺乏,遭到甚至是来自左翼政党高层领导反对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孤立无援。部分问题的出现也是由于左翼执政的邦政府在转型中失败引起的,他们本欲实现更宽泛的民主自由或者更完善的政府管制或者更优越的物质条件。

上述两个批评显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着差距。两个批评都说明,形形色色的左翼政党需要像马克思那样凭借资产阶级的自由进行谈判并扩大资产阶级自由的范畴,并需要创造条件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如果党内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主讨论的空间,那么,当国家和资本这些能动力量要限制言论自由和民主讨论的时候,坚持要求权利以反对国家和资本的限制将缺乏说服力。为了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内以及在改造了的社会内容中采纳并强化自由主义民主积极的一面,重要的是确定基本指导原则并使之制度化。

新闻出版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重要手段。在达拉普(Draper)看来:“对马克思而言,争取民主形式的政府——国家的民主化——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努力的前缘部分(leading edge),并非其全部意义之所在,却是其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Draper 1974a, 101—124)

达拉普也讨论了马克思所称“民主诈骗”(Democratic Swindle)指什么(Draper 1974b, 118)。他说:“马克思(1864年9月14日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称美国为‘民主诈骗成风的典型国家’<sup>①</sup>,并非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更少民主,原因正好相反。事实上,美国已经产生了最具民主形式的宪政共和政体

<sup>①</sup> 中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页424。——译者注

这一形式结构,这意味着其资产阶级同样也得将某种艺术发展至最高水平,即将民众意见的表达控制在符合其阶级利益的渠道之内的艺术……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时,将其作为这样一种举措,即凭借在民主形式上的最小让步,劝服最大多数民众相信他们正参与到国家权力之中。”在印度也是这样,民主的形式结构由来已久,不过,事实的民主却被资产阶级和资本成功地“诈骗”了。

因此,围绕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辩论,对于言论自由也是意义重大。正如卡维拉吉(Sudipta Kaviraj)所言:

民主原则上(或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无论是资产阶级授予其人民这个意义上,还是资产阶级通过斗争赢得的这个意义上都是如此。今天,民主的一般形式是无产阶级靠激进的斗争所赢得的结果,斗争的目的是扩大在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下政治权利的狭窄范围。如果民主同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可分离,那将是个巨大的遗憾。无论如何,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民主、民主是个坏东西。毋宁说,资本主义不好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实现民主。只要阶级间的不平等仍然存在,民主必定依旧是形式上的。这意味着,当阶级消失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几近消失时,民主的形式机器才能具备获得成功的实质条件。(Kaviraj 1989, 50—58)

马克思对民主的探讨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他对官僚政治的看法。马克思认为,官僚集团可能“拥有”一个国家,如同其私有财产。一旦事实果真如此,它就将迷恋于对内的等级结构和对外的保守秘密。当市民和工人无需冒任何风险就能指挥那些执行技术和行政职责的人的时候,用以改变政策和成为国家主人的民主权利才成为可能。若非如此,官僚集团往往就如同拥有其私有财产一般拥有国家(Harrington)。换言之,官僚集团充当了“民主诈骗”的手段。

马克思在其早期记者生涯中发表关于言论自由和审查的观点,反对严厉的普鲁士审查令,后者被用来当作阻碍民主化进程的工具。他在科隆自由派人士的支持下创办了《新莱茵报》,这些人士后来成为立法会议员,他们为了继续掌权,开始违背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而马克思的批评则既尖锐又

持续不断。但他的报纸却因挑战了当时的审查法令而被关闭。

在印度,言论自由权受宪法保障,不过,媒体中不同声音的出现为挑战主导的资产阶级共识带来可能,其主要原因却是政党以“公众利益”兜售其政策。

另一方面,在印度的某些地区,人民的物质现实使激进政治不可避免,而部分主流媒体歪曲这一现实,很像马克思描述的英国报纸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在煽动战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尽管人民反对它(Marx,1861)。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在承认如《旁观者》(The Spectator)、《考官》(The Examiner)和《麦克米兰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这类罕见的可敬的媒体之同时,他还阐述了所有权的本质以及媒体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而在印度的媒体产业中,企业间结成联盟、政治权属(political ownership)与寡头垄断的出现,正在成为言论自由日益迫近的威胁。

马克思的后半生在英国生活和工作,那里的审查制度不像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那般问题严重。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所提供的自由想方设法扩大工人阶级的自由。马克思在全神贯注于书写此一阶段经典著作的同时,还通过报纸专栏从阶级的视角解读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无论是作为编辑、记者还是评论作者,公开指名批评报纸、批评报纸中的具体的文章、或报纸在某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对于马克思都是稀松平常的事。马克思的批评合乎逻辑而详尽缜密,努力让广大读者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印度的新闻报道中,很少见到对对手报纸的批评,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还是质疑不合专业操守的行为。<sup>①</sup>

在印度,尽管多样化的媒体业受独立司法和像《信息权利法案》(Right to Information Act)这样的授权法案的支持,使得揭露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公司权力的滥用成为可能,但是,媒体的干预往往引发国家的不同反应,这取决于觉察到媒体的权力能影响多大范围的公众舆论。如果挑战国家的是有着大量受过教育的城市受众的英语媒体,国家不得不尊重宪法赋予媒体的自由表达权利。如果是内陆地区的地方媒体机构,政府则严厉打压。而地区性的语言媒体(如红色走廊的起义地区)的任何违犯行为,都会受到一连

---

<sup>①</sup> 在上次议会选举期间,“有偿新闻”(paid news)丑闻席卷了印度各大媒体。一些地区性和全国性媒体记者谈论并公开谴责报纸在收受巨额下落不明的付款后在硬新闻(hard news)版面给予对方候选人支持性报道的行为。印度媒体评议会(Press Council of India)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与塔库尔塔和瑞迪一起)调查这件事。该报告点名批评了沉溺于这种行为的几家大型报纸。

串法律的严厉处罚或查禁,这些法律使国家可以下令暂停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很多记者在“偶遇”中被枪杀。事实上,多年来,这一双重策略一直被印度国家纳为常规。这留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印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但同时,大量的侵犯人权行为也发生在这个国家大片的隐蔽地区。这也体现在全国性媒体资深记者们的观念中,他们认为国家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并没有比行业内部问题以及记者缺乏诚信带来的威胁大。

在挑战资产阶级国家的上述倾向时,议会左翼和独立左翼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独立左翼连同为主流媒体工作的记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因被认为具有独立性和可信性,在接受挑战时更具优势。而议会左翼则面临更多的困难,因为政党有机会经由民主选举而掌权,但却未能清晰无误地证明,当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通过政策,或通过日常的科层管理——能带来哪些益处。

哈林顿(Harrington)认为,马克思在这个词语最深刻的意义上解释了社会主义,将其界定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真理”,认为它是剥去了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强加于其上的结构性限制之后的民主。基层记者对国家权威的揭露,往往使主流媒体有可能在要求权利和改变政策方面施加压力。同时作为其批评者和支持者的印度主流媒体,是左翼政治在政治空间中一股强大力量。而迄今还是多样化的媒体,有一个威胁正在迫近,即所有权的集中。

要认清这一真相的是形形色色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体,以为深化和强化印度的民主而努力。新闻出版是深化民主价值的最有力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左翼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到那些读者、听众和观众甚多的媒体的重要环节中来,是必不可少的。

## 七、结 语

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构性限制,是左翼面临的任务。印度政体采纳了一套民主的基本原则,而一定程度上,像司法部门和选举委员会(Election Commission)这样的独立机构在控制行政权力和公司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印度,媒体部门已经成为一种有力的工具,也是司法部门和选举委员会的盟友。

在马克思的分析语境中重温言论自由的辩论,我们清楚认识到,必须不断加强宪法机构,如司法部门、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确保强大的新闻法在

不缩减媒体自由的情况下得到制定和执行；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都应受到挑战和质疑，因为它将专断的权力交至官僚机构手中。印度的经验也表明，独立的媒体突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它终将在政治民主化和民族解放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

### 参考文献：

Counter Currents website. 2012. <http://www.countercurrents.org/aboutus.htm>

Draper, Hal. 1974a. Marx on Democratic Forms of Government.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Accessed December 9,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draper/1974/xx/democracy.htm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website. 2012. [http://beta.epw.in/about\\_us/](http://beta.epw.in/about_us/)

Emery, Michael, and Edwin Emery. 1954. *The Press and America*. NY: Prentice-Hall.

Frontier website. 2012. <http://sites.google.com/site/frontierweekly/aboutfrontier>

Frontline magazine. 2012. Accessed January 25, 2012. <http://www.frontlineonnet.com>

Goyal, D. R. 1998. Remembering Nikhil Chakravartt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XXXIII(29). July 18. 1911.

Hardt, Hanno. 2000. Communication is Freedom; Karl Marx on Press Freedom and Censorship. *Javnost-The Public* 7(4): 85—100. Accessed November 26, 2011. <http://javnost-thepublic.org/article/pdf/2000/4/6>

Kafila website. 2012. <http://kafila.org/about>

Kaviraj, Sudipta. 1989. Perestroika: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Power. *Social Scientist* 17(194—195). July-August, 50—58.

Ledbetter, James. 2007. *Karl Marx: Dispatches for the New York Tribune*. Edited by James Ledbetter, xix. NY: Penguin.

Marx, Karl. 1842a.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Censorship*. Rheinische Zeitung, 135, Supplement, May 15.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free-press/ch05.htm>

Marx, Karl. 1842b. Debates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Karl Marx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 Censorship*,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aul Padover, 27. NY: McGraw-Hill

Marx, Karl. 1842c. Debates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Karl Marx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 Censorship*,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aul Padover, 29. NY: McGraw-Hill.

Marx, Karl. 1842d.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Censorship*. Rheinische Zeitung, 135,

Supplement, May 15.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free-press/ch05.htm>

Marx, Karl. 1842e. As a Privilege of Particular Individuals or a Privilege of the Human Mind? *Rheinische Zeitung*, May 12.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free-press/ch04.htm>

Marx, Karl. 1842f. Debates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Karl Marx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 Censorship*,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aul Padover, 39. NY: McGraw-Hill.

Marx, Karl. 1842g. Debates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Karl Marx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 Censorship*,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aul Padover, 40—41. NY: McGraw-Hill.

Marx, Karl. 1848. The Neue Berliner Zeitung on the Chartists.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June 24.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06/24b.htm>

Marx, Karl. 1848. The Prussian Press Bill.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July 19.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07/20a.htm>

Marx, Karl. 1843. The Mosel Region and the Cabinet Order of December 24, 1841. In *Karl Marx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 Censorship*,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aul Padover, 77. NY: McGraw-Hill

Marx, Karl. 1861. The Newspapers and the Opinion Of The People. *Die Presse*, 25 December. Accessed March 25, 20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1/12/31.htm>

Mehta, Vinod. 2012a. Interview with Sheela Bhatt. Accessed January 26, 2012. <http://www.rediff.com/news/slide-show/slide-show-1-corruption-unfortunately-is-at-the-editor-level/20120130.htm>

Mehta, Vinod. 2012b. Interview with Sheela Bhatt. Accessed January 26, 2012. <http://www.rediff.com/news/slide-show/slide-show-1-corruption-unfortunately-is-at-the-editor-level/20120130.htm>

Menon, Nivedita. 2011. 'End of the Left' in India? Statement by Leftists after Recent Election Results. 24 May. KAFILA. Accessed January 25, 2012. <http://kafila.org/2011/05/24/end-of-the-left-in-india-statement-after-recent-election-results>

Musto, Marcello. 2008.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 Oxon, UK: Routledge.

Nair, Somasekharan K. G. 2009. Indian Communists versus Marxism-Leninism. *Mainstream*. XLVII(34)8 Aug. Accessed February 2, 2012. <http://www.mainstreamweekly.com>

net/article1558.html

Padover, Saul. K. 1974. *Karl Marx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 Censorship*.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aul Padover, xi. NY: McGraw-Hill.

Padover, Saul. K. 1974. *Karl Marx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 Censorship*,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aul Padover, xiii. NY: McGraw-Hill.

Palagummi, Sainath. 2011. Interview with NewsClickin. 22 June. Accessed January 25, 20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endscreen&NR=1&v=bu9W53Skr28>

Palagummi, Sainath. 2011. Interview with NewsClickin. 22 June. January 25, 20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ewCqpgBiuw&feature=related>

Pucchalapally, Sundarayya. 1971a. *Telangana People's Armed Struggle*, Part 2. 27—35. Accessed on February 5, 2012. <http://www.scribd.com/doc/15380676/Telangana-Peoples-Armed-Struggle-19461951-Part-Two-First-Phase-and-Its-Lessons>

Pucchalapally, Sundarayya. 1971b. *Telangana People's Armed Struggle*, Part 2. 42. Accessed February 5, 2012. <http://www.scribd.com/doc/15380676/Telangana-Peoples-Armed-Struggle-19461951-Part-Two-First-Phase-and-Its-Lessons>

Pucchalapally, Sundarayya. 1971c. *Telangana People's Armed Struggle*, Part 2. 35—36. Accessed February 5, 2012. <http://www.scribd.com/doc/15380676/Telangana-Peoples-Armed-Struggle-19461951-Part-Two-First-Phase-and-Its-Lessons>

Rajimwale, Anil. 2009a. Ajoy Ghosh: The Creative Marxist. *Mainstream*. XLVIII(1) 26 Dec. Accessed February 2, 2012. <http://www.mainstreamweekly.net/article1843.html>

Rajimwale, Anil. 2009b. Ajoy Ghosh: The Creative Marxist. *Mainstream*. XLVIII(1) 26 Dec. Accessed February 2, 2012. <http://www.mainstreamweekly.net/article1843.html>

RNI website. 2012. Accessed January 25, 2012. <https://rni.nic.in>

Thakurta, Paranjay Guha. 2012. *Media Ethics*. N. Delhi: Oxford.

The Economist. 2010. Maoist Insurgents in India: More Bloody and Defiant. 22 July. Accessed January 25,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650478>

The Hindu Website. 2012. Accessed January 25, 2012. <http://www.thehindu.com/navigation/?type=static&page=aboutus>

## 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

### ——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

张志华 王满满

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于2013年7月19—20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传播驿站”由赵月枝、吕新雨和冯建三三位教授共同发起，旨在批判性地介绍和发展性地引进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同时训练青年学人在对原著的译介和批过程中习得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吸收学术萌芽的养料、扩展学术思考的视野、掌握学术思想的入门钥匙。“传播驿站”的翻译团体主要由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组成。此次工作坊围绕 TripleC 杂志特刊 *Marx is Back*（《马克思归来》）展开，辅以有关传播政治经济视野的研究论文，以及国外知名学者的讲座和青年圆桌会议等。工作坊与常见的新闻传播学高端研讨不同，始终洋溢着蓬勃朝气，并不断出现热烈昂扬的探讨。

### 一、工作坊寄语

在开幕环节，三位发起者阐述了“传播驿站”的创立初衷与希冀。

赵月枝认为翻译对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十分重要，关键词的错译将导致整个立场的翻转或扭曲，如被译成“贸易联合会”的 *trade union*（工会）、被译成“政府”的 *state*。翻译涉及中国与西方话语的对话、思想的殖民化与去殖民化，以及译者如何批判地面对西方学术等诸多问题。因此“传播驿站”



希望经由翻译吸引青年学人的加入,并借此打破传播政治经济学予人的“高冷”形象,最重要的是,通过传播驿站的系列活动形成学术共同体。吕新雨认为传播驿站是青年学人参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好机会,可提高翻译水平和学术水平,增进对基本学术脉络的深入了解,通过翻译实践和答疑解惑,发展共同的学术事业。冯建三则分享了翻译心得,如通过多翻译来建立学术信心、翻译需要耐心、适当加注等。

## 二、工作坊主题:Marx is Back——修辞或语境?

首场发言涉及话语研究和政治经济权力,同时介绍了国内甚少关注的批判组织传播。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吴畅畅(现调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在《网络空间中的话语联盟与民主幻想》发言中以谷歌退华事件、茉莉花革命和南方周末新年贺词等事件为个案,分析了中国自由派等网络话语联盟的形成。他认为,在谷歌退华事件中,自由派话语集团初见雏形,“南周事件”则标志其形成,而内外话语联盟的联合在重庆事件话语互动中达到顶峰。这个话语联盟把中国的未来武断地等同于某些公共领域的准则或新闻自由等诉求,暗示民主改革必须伴随着经济改革,却忽视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是社会环境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忽略了社会平等、社会正义和民主诉求。因此,如何看待该话语联盟提出的民主、宪政背后的阶级性局限十分重要。

中国传媒大学的徐培喜在《狼和小羊的故事新论:中美网络安全争议》发言中,梳理了中美网络安全争议是如何重演“狼和小羊”的故事并赋予其新的寓意的。美国炒作中国黑客攻击论的动机包括挑起国际对立来维护美国对互联网资源的垄断、以国家/商业安全为由来抵制中国企业而保护本土市场并同时促进美国企业在华扩张、通过诉诸恐惧的方式聚拢民意并弥合两党分歧、打造新的网络军工复合体。但狼和小羊的故事在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上有了新的演化,美国打着国家安全旗号谴责中国的“动机”,而中美关系在斯诺登事件前后也经历了几重变化,包括中国提出的“中美夫妻论”,值得思考的是,如何从权力视野下重新看待这一切,他认为斯诺登的隐喻是:全世界的政府/资本都变成了狼或狈,人民则都变成了羊。

美国天普大学传播学院的徐开彬就《组织传播批判:组织文化与话语、组织民主、组织生产》为题做主题发言。他强调:社会、政治层面的民主往往

遮蔽了组织内部的民主,而组织对社会影响很大,应关注组织生活中的民主这个核心问题。组织是为了效益,但政治无处不在,比如当代企业热衷的团队建设其实增加了员工彼此监督的压力,表面的民主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中国学者要从批判角度去研究组织传播就应避免从概念到概念,需要定量或质化的数据,结合解释学与批判学派,反思中国历史遗产(如“鞍钢宪法”),同时研究组织话语、组织文化与组织生产活动,并将组织微观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分析及对不同阶级的宏观分析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组织活动及组织的本质,也能有利于促进组织民主。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所的龚伟亮在发言中抛出与本次工作坊相关的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谈“马克思归来”,是一种修辞还是社会语境,是一种想象还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及其转向)?马克思何曾离去?谈论马克思归来对今天的青年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的学术青年又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重新激发出本来的逻辑说服力与情感感召力?尤其关键的是,怎样在某种可能的历史转向中寻找和把握一个边缘性的思考位置?

随后,赵月枝和吕新雨两位教授对本场进行点评。赵月枝认为,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事实,批判不容小觑。吴畅畅和徐培喜从话语、政治经济力量的角度进行了跨文化网络政治经济学分析,前者所说的话语联盟实际上包括西方媒体和中国某些媒体的合谋,形成网络上的跨国联盟,后者的论文则从政治经济权力角度来分析,狼、羊和狈的比喻也道出了学术观照时仅有民族—国家框架是不够的。吕新雨的评议认为,中国语境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需要互相支持和补充。吴畅畅从话语层面上阐述了跨国话语联盟如何形成,而这个联盟得以结成的核心就是有关“民主”的一套特定自由主义言说。将这一分析与徐培喜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看,就能发现真正力量之所在。由于这一自由主义“民主”言说的感召力及其带有冷战色彩的“民主/专制”二元对立框架的欺骗性,国家(state)成了替罪羊,所有国家行为都被认为是不“民主”的,中国跨国话语联盟能形成的重要纽带就是国家,中国国家被认为是邪恶的,是造成所有不“民主”的根源。随着后斯诺登时代来临,美国的自由民主本身面临危机与挑战,这就为重新讨论“什么是民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徐开彬从组织传播的角度打开了新的空间,作为基本社会组织的企业内部的民主问题在传统的“民主”观中往往被遮蔽。也可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遗产,新中国确实有过政治民主与社会结

合的尝试与实践,比如“鞍钢宪法”,还有人民公社的一些实践。在这个框架下,重新思考国家的角色,重新分析国家的逻辑就很重要了,这需要修正对其负面的、反“民主”的刻板指控。后斯诺登时代恰恰证明国家必须要建立某种防御体系,需要思考的是,应该以什么原则来构建该体系?徐培喜认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可能成为狼狽为奸吞噬的对象,这个基本判断没有错,但需要在更复杂的具体历史语境下重新理解美国和中国国家性质与角色之不同以及相互关系,避免简单肯定或否定。

批判组织传播的视角引发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并就国企改革、效率等展开热议。吕新雨认为,将国企界定为专制的、属于国家控制的,而私企就是民主的、市场的,这恰恰忽视了组织传播的角色。她指出,私企内部的非民主化管理是更严重的事实,而国企改革的真正方向应该是推动国企内部的民主化改革,媒体机构的改革可以同理。赵月枝则认为需要反思“效率”本身。“效率”一词由谁来界定、为什么要有“效率”?过去国企的设计不是为了简单定义上的效率。而国企问题也不是垄断与否的简单二元问题,如果国企内部是民主的,那也是民主的一种方式。吕新雨补充说,管理的民主化和生产目的之间应建立联系,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效率是对资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时代的国企是用政治来保证效率,出发点是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 三、传播资本主义、网络化媒体迷思与民主 ——西方学者的反思

工作坊特邀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姆史密斯学院政治学教授乔迪·迪恩(Jodi Dean)做了两场围绕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演讲。

第一场演讲以《传播资本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局限》(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in an age of Networks)为主题<sup>①</sup>。迪恩教授用“传播资本主义”指称媒介、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在当前的结合。近用、融入、讨论和参与的设想被认为可经由电信的全球扩展来实现,而且就在其中得以实现。信息和通讯网络的变化深深影响了资本主义和民主——在将资

---

<sup>①</sup> 中文版载《全球传播学刊》第2卷第2期(2015年6月),第54—64页。此处与译文中的表述略有不同。

本主义和民主合二为一的时候也加速并放大了其中的要素。当传播成了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后,会给民主带来何种影响?即,当参与和辩论(分享和交换思想、政治动员、表达异议,甚至反抗)成了资本生产和流通的主要要素时,它们作为民主政治的机制还有何功效?她的回答是,传播资本主义在将民主变现时,耗尽了民主的使用价值。过去30年(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得以巩固的时期)中出现的参与式媒体带来一种便捷、普遍式的民主——任何人只要有手机或能上网就能发声。民主成了营销口号,成了AT&T、苹果和微软们的扩张手段。与新媒体相链接的民主对手机、笔记本电脑、软件、社会化媒体等企业尤其有吸引力。在西方这一传播与资本主义融合的情境下,无论是经由蜂窝网络、光纤通线路到各类屏幕、网站进行访问、存储、检索和计算,传播都被纳入到它所产生的并放大的资本循环之中。由于当代资本主义是传播资本主义,因此各种民主修辞如近用、透明度、表达、讨论、反思和参与都在强化资本主义在网络化社会中的掌控力。越是被赞为民主的,事实上越是资本主义的。传播资本主义重新赋予民主理想以新的用途,即用以强化和支持全球资本主义。在社会运动层面,“点击行动主义”(clicktivism)替代了街头行动,当人们的政治变革热情融入到了通过使用媒体来参与事件的这一热情之中,也改变了事件本身,以至于媒体(尤其是Facebook和推特)本身成就了新闻报道,而不是人们的街头战斗。当事件最后浓缩成为有关社会化媒体的新闻报道,人们就失去了对革命形势至关重要的有关经济不平等的洞察。这是在将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抗争限制在西方民主的脚本之内。演讲中,迪恩还说明了传播资本主义的三个特点,以及五种特定的剥削方式。

在互动环节,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教授指出,马克思在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中已经指出统治阶级通过制造“虚假意识”扭曲人们对现实的认知,迪恩的分析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应用与延伸。迪恩认为“虚假意识”论题关注的是人们对现实状况的理解改变之后会带来变化与抗争,但在当代技术背景下,“虚假意识”论题的批判效果降低了,因此她关注的不是人们之所想,而是人们之所做,她认为行动更重要。而美国信息与传播学者关注的是传播的内容,而非作为手段的传播,现在正需要强化这一视角。针对与会者指出的,在现实中,网络是人们政治活动的重要渠道,通过网上行动可引起政府关注,迪恩认为,如果网上的反抗会遭到匿名攻击,恰恰说明了线上方式之脆弱,因为无法确定是与谁在交流,而政府对网络活动的掌控超出人们的

想象,比如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美国的FBI多通过网络获取情报信息,她认为线上世界并不是真正寻求帮助的场所,应该回到街头。针对与会者提出如何与网络世界的强大监控进行对抗并寻找替代方案,迪恩认为,这需要长期的有组织的行动,要让网络使用者意识到只能将媒介当作工具使用,避免落入自由主义话语的窠臼。针对迪恩指出的传播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邱林川提出四点对策:从工人需求出发,由小事做起;按媒体属性布局,失败何足惧;上网有保留,切忌微博控;长期团结根据地,集中力量促变革。

迪恩的第二场演讲《网络化媒体的三个神话》(Three Myths of Networked Media)<sup>②</sup>阐释了网络化媒体的三个迷思:丰富性、参与性和整体性,三个将互联网和民主相联系的幻想。这三个迷思有助于理解传播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

对丰富性(abundance)的幻想:从讯息到贡献。互联网不仅使数量众多的人得以访问大量信息,还使其能表达观点。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丰富性表明了网络技术的民主潜能。这一幻想遮蔽了一个事实:在传播资本主义中,讯息的交换价值压倒使用价值。讯息的有用性(是否有回应,是否被理解)不再重要,一条讯息不再主要是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讯息,取而代之的是其贡献——它汇入了快速流动变化的巨大规模的内容流之中。讯息(使用价值)转变为贡献(交换价值),这是传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任何特定的讯息只是流动着的数据流的一部分,加入后者就是其贡献。作为贡献,讯息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被重复、被复制和转发。具体讯息的特定内容是什么、由谁发出、被谁接收都无关宏旨。当然,有些讯息也是有用的。但是,恰如很多商品确实乃人们之所需,但决定其成为商品的并非其有用性,而是它们在资本主义交换中的经济功能。

对参与性(participation)的幻想:技术拜物教。由于可以通过网络表达,人们将其对内容流的贡献视为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以为只需点击按钮、在请愿书上添加自己的名字或评论一篇博文就是主动的。齐泽克称这种行动为交互被动(interpassivity),你以为自己主动,实则不过是别人在替你做某些事情(如请愿),你是被动的。基于网络的疯狂举动(如点击)反倒阻止了实际行为的发生。网络化传播和信息技术把对政治参与的努力变成了为内容流动做贡献。政治行动简化成了传播行为。在传播资本主义

<sup>②</sup> 中文版载《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2期,第105—116页。此处与译文中的表述略有不同。

中,技术拜物教有三种基本操作方式:压缩、取代与否定。

对整体性(wholeness)的幻想:全球零制度(a global zero institution)。传播资本主义有赖于前两个幻想。这两个幻想让人们感觉线上行为有政治重要性。而整体性的幻想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感觉,即我们对内容流所做的贡献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将所做的贡献置于可能是最重要的空间——全球。但事实上,传播资本主义的空间所在是互联网,而非全球。

“零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互联网在人们对全球的想象中起了关键作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最早使用这概念,一个部落内的两个亚群之间存在对抗的状态,但正是“零制度”使所有成员都感受到同属于一个部落。“零制度”并不意指特定的社会制度,而是社会制度之存在,这一存在使部落成员感受到了他们属于同一个部落。而在传播资本主义中,因特网正是零制度,它使无数选民将自己视为同一个全球结构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基本上没有共识、相互没有联系,存在于碎片化的、支离破碎的网络空间,但只要接入互联网就成了全球的一部分。这是个迷思,因为不论是节点还是与节点相连的链接,在互联网中都不是随机分布的,因此,任何站点所能获得的点击量与其他站点是不均等的。一个机遇无限又机会均等的开放、温和的虚拟世界只是个幻想。互联网空间充满差异,而整体性幻想使我们无视差异,因此想象出来的全球整体性中不存在根本冲突。

迪恩认为,几十年来上述关于新媒体的迷思在西方影响广泛。它们俘获了政治能量,并将其弱化为为传播资本主义的信息和娱乐流做贡献。

赵月枝老师就迪恩的演讲做了三点评论。一是迪恩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不仅聚集信息传播的宏观结构问题,而且深入到传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意识形态、迷思和主体性层面。二是她的分析使我们对国际语境下信息监控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在当今全球信息时代背景下,无论民族国家还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的世界秩序下,信息监控可分为两个层面:国际体系中为了国家利益的本国国家控制(national control,相对于外国控制),以及为了国家内部的党派利益的政治监控(political control)。在美国的两党政治语境下,本国控制往往被认为是保护国家利益理所当然的,而出于党派利益的政治监控是被质疑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今天,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信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的“本国控制”已被发展到了连美国本国法律都不许可的全球监控;美国媒体在攻击中国时,将中国为了维护本国信息主权的“本国控制”与“政治监控”混为一谈,使前者也没有了合法

性。三是作为一个“后—后结构主义”者,迪恩的研究既填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未能充分处理的主体性问题,又克服了后结构主义在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等问题上的极端解构。对此,迪恩回应,虽然美国在变化,但掌权者的资本主义意识没有改变,国家对客体/主体意识都在掌控,将我们自己想象成自由流动的、超越意识形态控制的自由主体与全球资本和国家控制下的客观现实是互相矛盾的。

#### 四、专题讨论一:批判视野下的技术与网络

在随后的专题讨论中,参与翻译或校对的青年学子、学者分别就自己参与的文章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就翻译和文章观点阐述自己的思考,其中涉及如何与中国当下的实践相结合。

专题讨论一共设两场,都围绕技术批判展开,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解释和批判技术、网络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作用。

在第一场,南开大学的董仕衍认为,《反商品化:大学、认知资本主义与新兴技术》一文属于技术批判理论中的“设计批判”范畴,论证了在资本的指派与控制下,大学研发出了特定的新技术,这些技术反过来又强化了资本对大学与高等教育的控制。该文提出了反抗方案,认为技术可以为反抗提供可能性和阶级意识觉醒,但需要大学师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董仕衍认为,这个观点对解决当下中国大学生商品化意识的问题过于乐观,对学人的能动性作用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他也质疑文章是否太过拔高新兴技术的地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的王祎则从科学技术如何为资本主义展开更有力、更隐蔽的“圈地运动”角度对该文进行了思考。她认为,资本主义利用其在全球范围的绝对统治权征用了信息技术,使其变成最新、最强有力的盘剥工具,致使免费数字劳工大量涌现。像大学这样本应独立的领域也充满了商品化与反商品化、拜物教与破除迷思的斗争。她同样认为文中的抵抗策略有简单化倾向,需要具体设计。另外,她指出两点需注意: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工作与娱乐界限模糊,数字劳工等出现,且呈现低龄化趋势;资本扩张所需要的特定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将压迫和剥削嵌入日常生活,人们习惯于不断自我规训,主体性被不断消解。最后,她提出了该如何看待学术激进主义这一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的白杨回顾了《技术的牧领权力:反思数字文

化中的异化》一文中涉及的牧领权力、异化理论、物化理论,以及在当下的信息社会中这些理论的延伸。数字技术允许主体的个体化,让人觉得可以依靠数字技术构建和演示个性化,但实际上却设定了人们将多重自我作为商品呈现的逻辑,而人们却自认为这是出于自愿的表达。数字异化重新创造并遮蔽了当代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冲突。由于摆脱不了与“屏幕”的联系,主体的抵抗不断遭到消解。

安徽大学的罗锋指出,《“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提到两个重要概念:产销者、生产工具的两种类型(社会型生产工具和经济型生产工具),文章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互联网既是一种传播工具也是一种生产工具,那么,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的互联网真的能同时成为传播工具吗?罗锋认为,这是重新理解网络时代的一种开拓性视角,并使人重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仍然具有重要的解释力,但该文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和解决方案。

在点评环节,冯建三教授就学术激进主义做出回应。他认为,在当代政商复合体的大学中,教师需担当责任、扮演好角色、不断激发力量来改变现状,可能都得先从微观层面做起。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的刘建平则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强调了对马克思思想宝藏的主体性认识,认为要避免重复西方的批判,不能仅停留在翻译层面,而应真正关注中国的问题,创造本土知识,本土的知识生产是确立民族主体性的前提,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获取学术地位的工具,避免成为西方新闻的殖民地、技术的殖民地和学术的殖民地,否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自己国家的背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异化。邱林川回应了评议和发言,他认为应该回归到“思想去殖民化”,每个人都要问问自己是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不同意文化本质主义,阶级分析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因为阶级问题是跨越国界的。针对发言者提出的对技术是否关注过多,邱林川认为正相反,现在非常缺少深入、批判、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技术研究(比如大数据)。吕新雨接着强调,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很严肃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是否为了私利?能否经得住真正的考验?是以背叛马克思、还是重返马克思的方式回到马克思?可由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而她自己的方式则是检视马克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可能存在的盲点。她同时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要持开放、真诚的学术态度。

在第二场,北京师范大学的藤依舒认为,《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与替代性社交网站 Diaspora》一文阐释了社交网站的用户隐私问题,通过联系马克



思理论和财产权、所有权,进而与整个社会资本运行相关联。文章指出,隐私越接近私有财产,就会有更多的隐私被让渡或交换为商品,它不仅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直接形成了剥削,从而指向了新的阶级划分。该文对有别于 Facebook 的另类社交网站——Diaspora 的分析富有启发意义。随后,藤依舒提出应如何看待中国的隐私权问题,比如翻墙技术成为炫耀的资本并积极投入资本怀抱,以及看似封闭的微信传播场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王满满指出,《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一文主要对以卡斯特等为代表的网络理论家的网络本体论与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进行了比较与批判,并重建了马克思剥削理论。网络理论家在“排斥主题”下组织批判,网络隐喻与排斥具有同源性,极大地削弱了对权力的理解和批判,容纳/排斥的二元逻辑几乎无视剥削关系。排斥主题之局限性呼吁重新将剥削主题引入当代社会批判。马克思通过“生产”范畴来物化过程、及其对内在关系和矛盾的独特理解来使其剥削理论不断发展,使其与信息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相衔接。王满满认为,作者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思路都非常值得称道,同时她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比如网络本身是否存在垂直关系等。她认为,就中国传播研究而言,扁平化的网络思维大行其道,需要重新反思对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解。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的蔡蕙如介绍了《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这篇系统性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本源,试图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角度厘清所有网络批判研究的文章,该文强调要反思网络研究,并用马克思主义的 11 个核心概念来阐释网络批判研究的实例,这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式的网络研究取向与路径有重要意义,有为网络批判研究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蔡蕙如也认为,在确定路径后,某些网络文化实践形态可以进一步做深度描绘。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系唐旻在发言中指出,《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一文从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资本流通和循环的角度来考查当下新兴技术发展。技术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媒介融合的跨产业背景、“数字编码”带来了商品和消费者身份的消失等。这些技术的产生是资本流通的要求,是资本流通的过程和方式所决定的。唐旻认为该文以资本为主体可能陷入资本或技术决定论。她还提出了几点思考:不同身份的个体、群体和机构在传播技术发展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怎样的?如何理解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去人性化和新技术所展现出的个

性化之间的矛盾？

在点评环节，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的李继东认为，翻译者译述后且有反思并与中国现实结合，非常值得肯定。此外，他认为对正在进行的中国文化产业大繁荣、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等热门研究都需要冷静反思。清华大学的王维佳则围绕本场所有讨论的核心，即互联网与公共性、民主的关系，尝试在点评中建立一个包含三个层面的框架：一是技术带来的参与可能，即赋权，这一点最受关注和强调。但马克思主义者、政经研究者与自由主义者经常犯同样的错误，即将所有问题集中在赋权上，仅视为不可能与可能之争，没有看到整个政治经济控制，没有进入文化讨论层面，没有深入到后两个层面。二是主动参与。大量消费文化是大众单向度接受，大众无法把握真正的政治立场，失去主动参与的意识。晚近的文化研究开始关注在网络文化和消费文化内部的抵抗，而事实上，身份认同的转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民主的问题，难以达到真正的解放性政治。三是有能力参与。自由主义者将现实和虚拟世界做二元区分，遮蔽了控制黑手，制造了公共性假象。马克思的分析方式带来思路的解放。王维佳同时也提示，后两个层面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有更多不同的政治、文化以及本土的知识。

7月19日当晚，第一场青年圆桌论坛在夜色中拉开帷幕。青年圆桌采用提问与发言、讨论结合的方式进行，气氛非常活跃。本场圆桌主要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论点：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如何与现实勾连，或者如何真正影响和改变社会？与会者均认为，除了坐在房间里讨论，抵达社会也很重要，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实践性，这需要不断扩大阵地和队伍，不断关注并参与社会实践。邱林川提出，可以向“酷资本主义”学习，让马克思主义也酷起来，影响更多的人。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之足与不足。赵月枝认为要辨明足与不足之标准，如果是就接近真理而言，那么就涉及什么是真理的标准的问题；如果就解决问题而言，也不可避免地涉及解决“谁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是在现实世界历史的斗争过程中，把对真理的追求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统一起来。吕新雨认为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需要从极其复杂的现实出发，遵循历史的、逻辑的思路，才可避免陷入简单的政治正确性，才能与不同观点对话，发展出学术可能性。她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对于冷静思考和客观对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非常有意义。讨论一直延续至夜深，意犹未尽。

## 五、专题讨论二：资本、劳动与传播

本场专题讨论的问题围绕着对资本运作中劳动和剩余价值的重新认识与思考,以及媒介在其中产生的影响。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熊琦指出,《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主要以哈维的“剥夺性积累”为线索,阐释了剥夺性积累和裹挟的暴力(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议题)与新闻媒体在剥夺性积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两个问题。资本主义面对剩余资本无法进一步进入资本循环、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危机,于是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其中,信息技术起了重要作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正是代表了开辟新的剥削关系中产生的客观暴力这样一个面向。熊琦进一步反思:在当今中国公共服务被私有化的背景下,中国媒体在剥夺性积累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资本、媒体与国家三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结构性关系?

山东大学的王华指出,《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一文主要梳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商品化这个关键词。商品化已侵入当今西方社会的全部生活,因此,特别需要重新认识包括马克思、斯迈思等的思想,以及了解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和概念。该文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强调“受众商品论”很有意义,非物质劳动包含了压制与解放,但压制却长期被忽视,同时新媒体的监控能力大大加强。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新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提出非物质劳动(象征性或智力的劳动与情感劳动)、诸众(multitude)等重要概念,他们强调应批判工具理性和经济主义。此外,王华认为应改变国内传播学教科书中主流话语长期失衡的现象。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蔚认为,《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引入分布式媒体(distributed media)的概念,强调媒体的社会组织性质与分布可能性,同时该文着重展开对自由劳动(free labour)的理解和反思,包括对马克思、斯迈思的再思考,以及对“自由劳动也受到资本剥削”、自由劳动是无偿劳动、剩余价值来源等的批判。王蔚认为该文的后半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并且在理论梳理部分忽略了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此外,她认为,在中国语境中不能仅局限于资本与自由劳动关系的视野。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华的发言《从世界体系视角看拉美传播》是

其阶段性研究成果,他研究的“全球南方”视角与此次工作坊的精神契合。他从委内瑞拉个案出发,探讨了底层自发抗争与查韦斯政府自上而下对社区媒体的赋权,使得针对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上下呼应。他认为南方国家之间的横向流动是拉美国家在不平衡的全球信息与传播秩序中的跨国传播联合,以拉美民众利益为诉求的“南南传播”在西方发达国家占据支配优势的世界传播结构中发出了可贵的“南方之声”。他的发言呈现了委内瑞拉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反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与建设。反观中国,他指出,在国际传播层面需要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新的国际主义,在国内传播层面需要思考“群众办报”等历史遗产的当下意义。

在点评环节,上海大学的高明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冯建三各有侧重。高明指出,批判之后如何建构,是需要面对的挑战,比如如何看待那些致力于摆脱资本控制的乡村建设工作者的价值创造,仅仅从文化研究入手往往力不从心。她还建议建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词库。冯教授回溯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斯迈思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现实的关照,尽管其分析在90年代遇到挑战,有人认为他错误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认为来源是电视公司的制作人、演员等,而且看电视的行为也是非强制的,但是,从社会整体的层面,重新思考受众商品论反倒更具有意义,尤其是在互联网出现后,比如,谷歌等公司的剩余价值从何处来就很值得剖析。

## 六、专题讨论三:传播政治经济学——思考与实践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林玉鹏指出,《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一文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及其意识形态效果进行检视,并以2011年《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案为例,讨论“新自由主义”在现今媒体与传播批判研究中的不足,并强调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林玉鹏随即反观台湾地区的学术研究,认为存在同样的弊端,比如将BBC等作为台湾批判研究与媒体改革的终极目标,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此,他认为需要重新思考台湾批判研究/运动未来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殷鹏认为,《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主要以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剥削理论分析自由作者受到的剥削。文章指出,有关文化工作自主性和控制劳动过程的争论忽略了劳资关系中的剥削,而这正是影响文化工作的关键。文章以文化公司榨取自由作者剩余价值的两

种方式——剥削无偿劳动时间和以不合理的版权制度侵占知识产权——来展现这种剥削。马克思主义视角能够揭示文化产业转型和工人经历转型的动态过程。此外,殷鹏结合自身从事的人类学研究认为,与人类学相比,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研究对工人的应对策略缺少描述,而人类学研究对困境的描述则过多停留在经验层面,但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获得启发。

中国传媒大学广电研究中心的姬德强从教学的角度介绍了在中国传媒大学开设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他认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实践形式”之一,开设课程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和社会批判精神纳入了新闻传播学的系统化知识体系中。尽管面临着理论框架宏大、实践案例较少、教学互动的有效性相对不足等现实挑战,但他认为,教学实践工作仍大有可为。

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戴瑜慧认为,《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一文主要以美国为对象,历史性地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去工业化、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以及新自由主义兴起等一系列变化。美国产业结构的重心已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一转变使推销与宣传成为生产的核心要素。营销经济的崛起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和关于剥削和异化的批判再次来到时代浪尖。系统性宣传是指推销行为在全社会领域的扩大渗透,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商品化即臣服于非正式劳动状态下,为商家在产品制造过程中自愿提供免费或廉价劳动力的“产消合一者”(prosumer)。但是,戴瑜慧也对运用传播技术展开抵抗行动持乐观态度,如另类媒体、反对广告运动、占领社交媒体等。

吕新雨教授随后的点评鞭辟入里。她赞赏林玉鹏对BBC和《卫报》作为台湾地区批判传播典范的反思,因为如果新媒体危机与资本主义整体危机有内在相关性,那BBC和《卫报》这些传统媒体的典范性代表是否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例外?如果不是,那么如何勾连传统媒体面临的危机和新媒体危机?此外,现今晚期资本主义的媒体状况实际是再封建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对于新媒体来说是这个过程的翻版还是另有原因?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需要反思我们对新旧媒体的讨论是否要相互隔离。就殷鹏对自由作者的探讨,吕新雨指出,应当避免将“自由劳动”之自由与“自由主义”之自由联系在一起,自由劳动看似不存在剥削,实际上却是整个结构性剥削的体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劳动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逻辑。需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发展出有别于资本主义逻辑和雇佣劳动逻辑的劳动和获得报偿的形式,对此,吕新雨认为,可回溯前资本主义时

代发掘可能性,重新讨论生产和交换的问题,以重新构想生产关系。这一点对于新的包括乡村实践在内的社会实践的历史可能性和理论可能性至关重要。吕新雨还就传播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做进一步设想,她设想在全国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建立课程网站,开放网络课堂,不断更新和补充案例,尤其是比较缺乏的中国实践案例。就戴瑜慧论及的营销经济,吕新雨建议可以梳理和考察营销专业和课程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主流大学占据高地的过程,并分析这一过程与市场经济的关联。吕新雨指出,营销经济不仅是消费主义的新表现,更标志着一种新的剥削形式的确立。

第二场青年圆桌对本次工作坊中涌动的问题和困惑做了进一步的讨论与深化。作为出版合作方的华东师大出版社六点分社的负责人倪为国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赵丽华等从出版角度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如果要走得更远,就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重视阅读经典,同时关照现实进行创造,也要在学科发展道路上要警惕边界的模糊,始终保持清醒的学术态度。而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出版机构也应该参与其中,互相合作。其他发言者也回应和重申了作为研究者和教学者,重读原著经典、立足国情、投入实践、努力实现学术本土化、增强学术自觉和自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倪为国寄望青年学者要有问题意识,关注真正的中国问题。这场圆桌是本次工作坊的尾声。

## 七、结 语

不论是关注的面向、争论的焦点、反思的问题,还是自由、平等的对话方式,此次工作坊的特点和风格与传播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非常吻合。赵月枝老师在工作坊闭幕时提醒,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批判力量很容易让研究者处于亢奋的状态,但是,在激动、兴奋和充满抱负的同时,需要的是冷静、客观、从自我和身边的实践做起。

当今世界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再次激发了世界各地人们的批判诉求和重建秩序的渴望,回归马克思主义,凝聚更多有生力量加入传播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观照全球和中国现实,发展并探索新的批判传播理论,具有迫切意义。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是个开端,它饱含互助的精神和思辨的能量,让青年学人带着工作坊所激发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想象,继续未来的学术之路。